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第六册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



目　　录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书

（一九二九年二月八日）

亲爱的同志们：

看过你们的政治局底报告与新中央自六十三号至七十七号通告（按即一号至十五号——译者），以及各地党部工作报告等材料之后，我们感觉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与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根据中国局势之变迁，所决定的为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批准过的新策略，在根本上新中央虽能运用遵行，但是全党整个的执行程度仍然非常薄弱。譬如从你们的报告与通讯中，可以看出，在党内仍在有普遍的散漫与无组织的现象，这对于党的工作发展大有妨碍。因此必须很快的使全党对于党的路线有清晰的了解，在最短期内克服这种现象，并须以伟大的贯彻精神与坚决的态度，鼓励全党党员群众，完成迫不容缓的基本任务。

现在的危险，我们必须以布尔什维克的态度很深刻指明，就是有一部分的党员以及一部分在革命高涨时期受党指导而同情于党的工人对于革命的前途是很怀疑的。在现在革命的工人运动非常困难的环境之下，这种危险非常严重。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下发生的消沉与犹豫的心理，是过去得很慢。因为反革命进攻的结果——对于党的组织与黄色工会的打击，在许多懦弱的人们中很容易发生超过实际情形以外的悲观，甚至于以为革命运动已经完全失望而消灭。另一方面，在国内战争停止之后，全国一部分经济的活跃，造成了发生幻想之相当的基础，以为在中国开始了资本主义的“健壮”，开辟了中国政治经济和平发展的道路，新的革命高潮将不会发生或者无论如何也要延长到遥遥所期。

这种观点，对于现在的环境，完全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不知道促成革命高涨的根本矛盾没有解决，而且统治阶级绝没有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这种观点是中国党第六次大会及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所肯定的，他不仅只有理论上的根据，而且在详细的研究了最近一年内的事变之后，已经找着了许多具体的证明。

现在政治局势中之根本矛盾

国民党与南京政府企图在民众中间造成一种幻想，以为可以由外国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和平的解放出来。同时帝国主义列强大家又公认中国某种的形式上的主权（例如关税自主），实际上是搪塞了“帝国主义滚出中国”的口号，而把中国束缚得更紧。特别英国在南部日本在北部尽量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以巩固他们自己的统治地位。由这些事实上来看，如其说，以“外交方法”来乌托邦式的解放中国，不如说是在瓜分中国以准备着与此相密切联系的前途——帝国主义战争与军阀互斗。

自然，帝国主义列强对付中国的战线绝对不是巩固的，而且也不会巩固。这里首先就表

现着美国与英日的竞争。假使没有这一竞争，则日本在自己积极用兵于中国北方的时候，绝不至于半途动摇，而且英国（其他各国也是一样）也绝对不会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与修改不平等条约。这是事实，但是不应当夸大这种事实的意义。

在中央第六十五号（第三号——译者）通告上，认为美国与英日的根本政策是完全冲突，这是不正确的。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与英日一样的是帝国主义的，区别只是在应用这种政策的方法。美国所提出的"门户开放"的原则，绝不是使中国有脱离殖民地的政策，这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假面具，这种假面具可以帮助遮饰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

因为在现在的客观条件之下，美国需要应用比较英日不同的帝国主义的策略。美国依靠自己的经济力量，将政策的重心用在取得经济的统治权以及在财政与外交上制服中国政府，使中国政府希望他只是友谊的态度而没有地盘的及势力范围的侵略，不像英日在中国用强迫的方法来巩固他们在中国的地位。

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没有能力进行一种独立的民族政策，他企图利用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竞争，主要的在美国的帮助之下，取得中国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机会，但这是一个空想。事实上除了在某一时期适合于某一大帝国主义（现在如美国）的利益以外，他不能得到任何其他新的"权利"。只就一九二九年二月一号南京政府所公布的关税细则看来，就可以知道南京政府不能够得着比这更大形式上的权利，帝国主义所承认的关税自主非常微弱。这种的关税税则仅只能相当的提高南京政府的收入，而不能适合于民族工业发展的需要。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软弱，在这一税则上得出了很明显的反映。在目前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殊利益，绝不反对中国有相当巩固的中央政府，反而要希望一切过去的及将来的借债都有保证。每一个关于保证债务的条约，都要促成中国更深入于殖民地的束缚。

去年一年中国的一切经济活跃，一直到现在，大部分仍然是帮助了帝国主义工商业的恢复，只有很小的一部分影响到中国民族轻工业（特别是丝业到现在仍在停滞之中）。同时各地方中国民族工业仍然继续着转递于外人之手（有些企业卖给日本人了）。固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之相当的发展虽然是很困难，但在最近的将来是可能的。因此，中国全国生产力，向独立的民族资本的路线的发展倾向将要反对着由国际帝国主义所施行的使中国殖民地化的倾向，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这种冲突的过程中，将要一步一步的出卖中国独立的民族利益。假使以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叛变革命以后，已经买办化了，完全继续着以前的地主军阀政府的政策，是不正确的。因为中国民族工业独立的发展与帝国主义的利益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绝不能完全放弃自己的民族改良主义的政纲。但是这一政纲的本身，是一种经常与帝国主义妥协的政策，实际要使民族资产阶级屈服于帝国主义之下。并且中国资产阶级的各部分与各个帝国主义有经济上之共同利益，使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不能采取一致的政策。各部分的资产阶级与这一个或那一个的帝国主义有相互的联系，在民众中间发生了反对与他相竞争的帝国主义的运动的时候，则资产阶级在虚伪的反帝国主义的旗帜之下，也要利用这种机会（例如现在汉口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运动）。并且即是在这种资产阶级的运动中，只要这个运动牵动了广大的民众，资产阶级立刻就要反攻。

共产党的任务在于揭露这种民族改良主义的反革命性，发动广大的劳苦群众与小资产阶级，进行彻底的反帝国主义斗争，使这些群众脱离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同时揭破国民党政府的反革命作用，指明国民党政府对帝国主义之表面的反对态度，来遮饰他对于帝国主义的投降，使中国走到更陷入殖民地的奴隶地位。

无论由帝国主义统治之下的完全解放或是中国真正统一的实现，对于资产阶级与国民党的政府，都是不能实现，而在他们看来是没有利益的任务。国民党的南京中央政府仅只是口头上是一个全中国的政权，事实上并未曾统一全中国，而且不能统一全中国。不仅满洲，并且许多西南各省的政权，事实上是离开南京政府而独立的。国民党的军阀独立的管理他所统治的省区，差不多与旧式的督军一样，在全国经济不统一的状态中，这种军阀不仅在保持着半封建的关系上而存在，而发展，并且应当注意在国民党各派军阀的后面都隐藏着各个帝国主义列强，帝国主义希望利用他们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使他们在将来的国内战争之中成为自己现成的工具，这样使国民党及其政府成为帝国主义掌上的玩物，而预先执行他们的计划。

中国统治阶级内部相互的矛盾不仅是反映着中国各派军阀之历来的斗争以及帝国主义之相互的冲突，并且也反映着豪绅地主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阶级矛盾，资产阶级经过国民党参加这一统治联盟在此联盟之中进行着争夺阶级领导的斗争，但是若是夸大了这种现象的意义以及中国资产阶级的战争力，那便是错误。在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之中，曾有一处表现这种夸大，那里说，“资产阶级现在企图给豪绅地主一个致命的打击”，同样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一号出版的布尔塞维克上，也说资产阶级（并说到商业资产阶级）预备着“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权”，不是，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也没有愿心去这样做。一九二七年革命的震动及工农运动的高涨不是空过了的，确使当时阶级的矛盾，一方面是无产阶级与农民，另一方面是资产阶级与地主的斗争，走到最紧张的时候，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事变表露出资产阶级最后的转变到反革命的营垒中去了，向帝国主义投降，放弃了彻底的肃清封建残余的斗争。中国统一与解放的任务与土地革命及肃清一切封建残余的问题有很密切的联系。解决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间的三大问题，只有革命高潮与工农专政的政府能够做到。至于现在的环境，则是农业危机的逐渐紧张，农民的状况日趋贫困。许多区域（山东，直隶，山西，甘肃等）的饥荒，据报告有两千万的饥民，不能说这种灾荒是偶然的天然的现象，这与农村经济的崩溃有很密切的联系。

中国农村经济需要改良灌溉耕种及整理水利等等，但是农民在地主高利贷及军阀无限制的掠夺之下，甚至于失去了最低限度的生产工具，使单纯的再生产也不能够继续。因为中国最多的是小地主经济，使减租政策也难于实行，就是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方法，因为没有剩余土地的关系，不能解决土地问题，就是对富农与佃农的让步也是不可能，就是小的改良仍然没有实行。去年在革命势力逼迫之下所规定的减租，仍然被反动势力战胜了。中国资产阶级与土地关系的密切联系，使资产阶级或是由农村中直接收出许多地租，或是间接的以高利贷及商业资本剥夺农民，就是这个事实就可以使资产阶级不能去实行农村的改良。若说这一军阀地主资产阶级合组的国民党政府来实行改良，更是没有希望的事。

因此，不仅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根本问题未曾解决，而且中国资产阶级与国民党政府（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未解决，这是很显明的事实。一切所谓中国走向基码尔道路的发展，都是些无稽之谈。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基本矛盾，不仅没有削弱。而且日益紧张，不可免的走到新的革命恐慌的过程，而且比较以前更广大深入。

在每一时期中，必须根据实际情形与正确的分析向党员的群众及一切革命的工人经常的解释这种过程及其前途。对此必须特别注意根据具体的观察去说明，新的革命高涨发展的速度问题。

很明显的，关于这个（发展速度）问题，中国党第六次大会已经给了答覆，我们现在也

只有很少的补充。六次大会说："最初的薄弱的新的革命高潮之象征，已经可以看见"，并且说："不可以过份估量上述的这些现象，因为即使这些现象综合起来，也还不能形成真正的高潮。"虽然在许多区域中发生了群众自发的斗争，工人群众的心理已经有了相当的转变，消沉的情绪已经开始转变到复兴的状态，但是这种估计，一直到现在仍然保持他的正确。

在一部分中国同志中间有一种倾向，以为高潮是一个"短的前途"（这可以说是革命的急性病），就是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也未曾完全脱离这种心理。因此有许多地方发现着夸大了反革命内部的分离矛盾的紧张。例如在中央第六十五号通告（按即第三号通告——译者）上，我们看出了这种意思，说：资产阶级"正在准备对桂系的战争，因此，反动政府更快的走向完全动摇崩溃的道路"。这种结论是表现着相当的过于性急，我们不能说国民党政府在这半年中间是"很动摇"，应当承认新的革命高涨的成熟还是走得很慢。

一部分同志以为现在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是会使革命的高涨牵延到很长的时期，这是同样不正确。一般的说来，理论上自然不否认直接革命形势（可以直接武装暴动的形势）有延长几年的可能。但是若以为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将有长期的"和平的"发展，没有严重的经济组织的动摇（农村经济的危机，饥荒，个别民族工业的危机），没有帝国主义的激烈的冲突，没有军阀间的武装战争，没有无产阶级更大的斗争，没有乡村的农民暴动——以为这样，便是很大的错误。在这许多的危机中，豪绅资产阶级的政府，在现在的条件之下，他们彼此正在互相斗争的派别可以暂时作更可耻的更卑鄙的结合，以延长他的命运，但是因为他们每次的结合与妥协，都是要加重劳苦群众的负担，这自然要引起劳苦群众的反抗，这就造成了新的革命高潮的客观前提。

共产党在自己的政治行动中，不应当以这一种或那一种可能的极端为出发点，而必须常常对于环境加以正确的明晰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认为中国现在是准备群众走向革命高潮的时期，这一点非常重要，中国共产党一定要注意。中国共产党应当使党的本身以及广大的群众，特别是无产阶级准备着将来推翻豪绅资产阶级的政权，来建设革命的工农德谟克拉西的专政，假使共产党不预先整顿自己的队伍，不巩固自己在工业无产阶级中的影响，不能保证工业无产阶级在农民中的领导权，就是发生了全国直接革命的形势，我们也不能利用这种客观的条件，来取得革命的胜利。

策略问题与党的最近基本任务

中国共产党在过去一年中，还未能很充分的使自己的革命工作适合于转变的客观条件，这一点一直到现在仍然是中国党很大的缺点。

中国党是革命高涨之中产生而发展的，他的斗争经验是在革命的群众运动的高涨及公开工作条件之下取得的，他并没有准备着，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的秘密工作。因此反革命的进攻已经使他走到组织很涣散的地步，使他现在遇着非常大的困难，干部中之知识分子的过多，绝不能减轻他在工作中的困难，没有充分的布尔塞维克的经验，不能正确执行日常的革命工作，许多绝不是很坏的同志完全成了消极的状态。还有在中央的一次通告上所说的"等待"，如像许多等待军阀战争（蒋桂战争），以为战争可以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另外还有人等待着，国民党实行民主，以得着公开工作的条件。过去之"左倾"与右倾的残余与

现在这种情趋有很密切的联系，这都是过去的残余在新的形势上的表现。党应当很明显的认识，由此所发生的一切危险。

在现在的环境之下的特别危险的是右倾，中央在第六十九号通告之中曾指出过，是很正确的。我们在工农群众中间的工作，是应当利用一切公开工作的可能，这个观点是非常正确的，假使只注意到这种策略的一方面，则只是指出了这一方面利益。但是，这种观点表面上是使自己的工作适合于新的客观条件，事实上会是放弃了革命运动中之旧的根本的任务。要使我们的工作适合于转变的客观条件，绝不是放弃革命运动中之旧的根本任务，他只是说在新的条件之下，为实现旧的基本的口号与任务起见，需要一种新的工作方法。所谓尽量利用公开的可能，这一口号只应当这样去了解。但是有许多公开主义者，得着相反的观点，他们为着不放过公开工作的机会，所以提议降低党的口号，以为这样不惊动政府，而避免政府对于革命运动的干涉。照这些人的意见，参加公开的群众组织的工作实际上是作改良主义者的工作，于是利用合法工作的可能，便变成了对于合法条件的屈服。拿这种公开工作与共产党的秘密工作相对照起来，则这种公开工作绝不能使我们得着工作的成绩。合法主义者将要认为秘密条件下的共产党，一切原则上的批评是在实际条件下的不可能武断办法，而且中央的通告是不合于实际工作，障碍着工作进行。因此，这种合法主义在最后就形成了取消派的倾向，这是与共产主义的指导与共产党处于相反地位的，因此在现在这个时期以内中国党第一个基本任务是巩固秘密的共产党，加强他的组织与威信，以及他的领导的影响，合法倾向在始而不明了种这工作的重要，阻碍这种工作的进行，最后会走到与种这路线完全相反的地步。

现在中国革命中右倾的危险特别严重，因为国民党的统治阶级用尽一切方法来扩大他在小资产阶级以及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因为如此，所以一面对共产党们屠杀政策，同时继续进行公布一些社会改良的条例（部分的减少工作时间，分配红利等等），南京政府立法院与上海社会局所公布的一些条例。资产阶级的一切民主的及民族改良主义的宣传，在社会上造成一种幻想的空气，以为国民党的左派领袖还希望反对封建地主与军阀以及保持民族自由而反对帝国主义。

这种空想对群众的影响是不会长期存在的，因为他在口号上与实际上的区别是非常显明。但是在相当的时期之内，他可以对群众发生影响，我们不能轻视这种危险。在现在因为共产党的组织力量的薄弱，我们的工作十分困难，国民党人可以利用国家政权的工具，利用一切统治阶级的权，在一个相当的时期中，保持着一部分群众对于他们的幻想。假使在共产党员中（无论怎样少），对于国民党还有妥协的与尾巴主义的政策，那么，就可以知道在共产党以外的劳动群众中间，自然更没有肃清对于国民党政策的幻想。

肃清一切的幻想，揭破国民党的政策之假面具，发动劳动群众去反对国民党的政策，准备群众以推翻国民党的统治——这就是现在时期中的第二个重要任务。忽略这种任务，就是以上所说的右倾危险，应当有反对这种现象的斗争。

我们并不是说，中国党内的右倾危险已经到了他的最后的完成，并不是形成了一个危险的派别。党员在现在是有了个别的右倾的错误与动摇，党若不用严厉的自我批评的态度来干涉他的发展，则他将成为很大的危险。去年一年中许多党员脱离党的现象（甚至于向国民党政府自首），这就是党内右派危险的征兆。这种危险在党外职工运动中将更有力量。无论在党内或是群众中，只要那里表现着有那种小资产阶级的动摇，都要用坚决的彻底的手段来反对他。这种工作，特别要揭破小资产阶级领袖的假面具，如像现在还有从左面批评国民党的第三党

谭平山等他们反对共产党的斗争，事实上他们已成为国民党的工具。在中国党中央的一切通告中，我们没有看见一点关于反对他们的特殊指明，没有看见与这种反共产主义团体的斗争。

中国党六次大会坚决的号召全党起来纠正“左倾”的危险（盲动主义，军事投机，个人恐怖等）以及所谓国民党式对待群众的方法（命令主义）因为客观条件的变更，盲动主义及军事投机的危险，在过去一年中已经失去了他发生的基础，但是假使以为“左倾”错误的残余已经完全肃清，这便错误的。在去年夏天中央所发的六十一号通告中，还写了许多盲动主义的计划，将全国划分为若干军区，准备着军事行动，还说首先要打倒最反动的桂系，又六十一及六十三号通告中还可以看见以许多“左倾的话头，来代替实际的革命行动，如杀死一切豪绅地主！”“消减一切封建势力！”等等的口号。甚至最近一次中央所发出关于年关（十二月到一月内）期内地方党部工作的七十一号通号中，我们还看见对农村工作有这样的号召：“都到豪绅地主家里去过年！”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倘若以这种空自夸大的高调，并不能引起任何的群众运动，这样决不能巩固群众对共产党领导的信仰，适得其反的要削弱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只是表示与群众的隔离，六次大会说左倾是“不愿意进行日常的经济的政治的斗争”和“不承认部分要求争斗的必要”这种左倾的病态在党内还没有完全消灭，直到现在还可以看出不明了工会工作伟大革命意义；不知道正确的去利用公开可能；和不了解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正确联系等等的现象，正因为不会照着革命的原则去运用争斗的公开形式与方法，以为在运用这些公开形式与方法中，必将发生右倾危险与公开主义的幻想而裹足不前。

对于不觉悟或者半觉悟及动摇群众的革命教育和说服工作，本来是一种极难的艺术，若不从实际工作中去求了解就不会正确的明了这种意义与必要，因此现时中国党的第三个基本任务就是——消灭党与广大劳动群众脱离的现象，获得群众——尤其是工人群众并使其革命化，不了解这一任务而事实上仍沉溺于“左”的病态中，这种形式就等于怠工。中国同志在口头上是完全正确的接受六次大会及共产国际六次大会关于获得群众的决议，但事实上不是所有的党员都在认真的去执行。此中原因最主要的是“左倾”危险，党应当无条件的彻底的肃清。发展在劳动群众中工作的时候，党要特别注意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性，因此；中国党要特别注意民族的问题(特别是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六次大会特别指出本党非常重大的错误，就是轻视反帝运动，及放弃反帝运动中的领导。不过我们应当明确了解我们参加这种运动决不是帮助国民党之反对派式的把戏。我们的参加是要使为一部分资产阶级所影响的反帝运动变成劳动群众之真正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使他同时又是反国民党的运动。

中央在最近提出了许多正确的部分要求，他可以称为最近党一切日常活动的主要政纲。为揭破国民党的这种假民权主义的政策，唯一的动员群众与反对国民党，这些工农群众一切政治自由（自由集会出版等）的要求，将比以前有更大的意义。但是每个环境中应当注意日常口号与党的基本口号正确的联系，中央通告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并不时常是正确的。有时候没有注意到日常斗争的口号，有时候没有注意到党的基本的口号，这都不适合于党的斗争的利益。

有时候党的主要宣传口号很机械的与日常斗争的口号摆在一起，如有时写许多直接行动的口号，而同时又写一些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的口号：没收地主土地，组织工农兵苏维埃等等，这只能加增群众心理中的糊涂。

在现在一切日常的斗争中我们注意策略路线的目的，是要尽可能的准备我们党以及广大劳苦群众的力量，以备实现革命高潮到来时的任务夺取政权的斗争。因此根据这种观点使着

这类部分要求（如撤退帝国主义驻华的武装，加紧在铁路工人及兵士中的工作等等），在现在已经有了极重要的意义，党对这些问题，要特别注意共产党员在一切群众运动中，罢工运动，农民运动，反帝的群众运动中的积极参加，应当是向着实现这一战略的方向去做，庶可发展工人阶级的革命决心，结合城市与乡村广大劳苦群众都绕围着在工人阶级的周围，以保障着无产阶级在解放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因此中国同志要特别注意并认真的组织群众，准备在某一适当的环境中来实现总的革命罢工，铁路工人总罢工，等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方法，因为这种斗争的方式，可以征集全国革命力量于无产阶级周围，于中国革命中将有极重大的作用。

工 会 工 作

所有的党员都应当知道若是在工人阶级的中间，没有坚固的基础，在各企业及工会运动中没有广大工人组织的基础，党便不能在中国革命中握着领导地位，要使同志知道若是党现在产业中在工会中及罢工运动中能够取得非常稳固的地位，在将来激烈的阶级战争中，有更巩固的力量。

在六次大会前中国党的中央曾经指出革命工会自武汉失败以后，曾由七百三十四个减到八十一个，当时中央说黄色工会有四十个，并且还有六十四个没有群众的，从这次通告之后，革命工会的环境自然是继续的恶劣，国民党工会继续增长，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实，假使我们承认在中国的条件之下，不允许改良主义在工人运动中有广大的稳固的基础，那我们对于黄色工会（如上海七大工会）的估量就有极大的错误。事实上这类黄色工会是中国工运中革命发展的有力障碍。经过这种工会，反革命统治的政党，企图在工人运动中造成自己政权的巩固的基础。使他们的代理人包办工会中的领导，而有时用恐怖的手段，破坏一切有阶级觉悟的工会，对付这种国民党式的法西斯蒂，共产党应用尽各种方法在工会外或工会内进行积极的有系统的反对他的斗争。

在现时环境之下，我们应当努力恢复并强固革命的阶级工会，在这不公开状况中，自然要使我们的工会工作非常困难。因此我们一面应当为我们秘密的工会找着公开的遮饰；一面加紧秘密工会的组织工作，使其强固而争得半公开的存在。在产业中应当进行反对压迫与限制工会组织自由的运动，每个工会巩固的基础，应当建筑在各个产业上，要受着党的支部的指导，可是我们的党“团”（甚至在赤色工会中）——在大企业中革命工会已有强固基础的地方，应当利用时机直接取得事实上的公开。最好的机会自然是当着革命分子领导罢工而得着胜利的时候。在某些条件之下许多公开的社会团体，如兄弟团，同乡会等（可组这类性质而名义不同的组织）的组织可以作为赤色工会的公开掩饰的工具，此外工厂委员会组织，及定期的工人代表会议等，是发展公开及半公开的革命工会，那是非常错误的说法。不要忘记除共产党所领导的工会以外，还有有群众的公开的国民党黄色工会。因此我们的任务是要钻进国民党的群众工会中，而□□三、中央过去对各级党部之策略上的指示，职工运动的督促，确能帮助各地实际工作上的发展。对于如何组织群众如何动员群众为日常要求而斗争的工作，亦无疑地取得相当进行，使目前斗争乃能更加开展，党在这些斗争中已取得相当领导，尤其显著的是上海五一与五卅的示威运动。不过同时中央应认清这一领导中还存在些弱点，尤其是中央还没能将这一工作的经验实施到全国各级党部中去。对于反帝运动，党虽能把工人的罢工，农民和兵士的斗争与反帝运动联系起来，但全会仍认为中央还缺乏实际的去领导小资

产阶级下层群众的反帝运动。中国民众，除国民党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军阀买办及一小部分富有的人外，大多数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过去往往有小商人，雇主，店员，职员，学生甚至工农群众自发的反帝运动，党几乎没有一次（这次上海的五卅示威与张案后援会除外）能够领导这些运动，以致完全在国民党或资产阶级领导之下而走入与帝国主义妥协的道路。对于农民运动，尤其是苏维埃区域中的工作，因为各地报告材料非常缺乏的缘故，中央还很少在实际工作上的积极的具体的指导。中央应特别注意在广大的灾民群众中工作。各地士兵工作多表现得异常忽视，中央的注意力亦还不充分，对于红军尤其是朱毛及游击队的工作，还少有具体的计划与指导，这些缺点在以后中央的工作中，都需要努力纠正，同时中央应特别注意与加紧促进各种群众工作的配合，职工运动与农民斗争，士兵运动，反帝运动，反国民党，反军阀战争的配合，当积极的出来表示积极的态度，向这些大多数同情罢工的工人讨论他们的重要问题与提议。

共产党员在工人中积极的宣传时，应当注意破坏仲裁法庭的威信和国民党的调和，并且指出黄色领袖的作用，是资本家与政府的走狗。在罢工中应当提出所以发生罢工经济的或政治的要求，这些要求应当是罢工工人自己所叫出来的，是他们自己所感觉的重要要求。在罢工的时候，应当尽力使罢工委员会及工人的代表机关，使为资产阶级政府承认是代表工人谈判劳动条件的全权代表，在这时候，假使这个企业中有国民党的工厂委员会，便应当乘机宣传改选。即是当着罢工已经完结的时候，也应当使罢工委员会不立即解散，应当尽可能的使他事实上变成工厂委员会（或者需要改选他的成份）。

关于党之组织及思想的巩固

照中央的材料来看，党之组织之状况，可以说完全不能令人满意。中央第六十九号通告说："城市支部大部分都是散漫的，许多的工人积极分子都找不着党，因此相继不断的都脱离了我们的组织，大多数的活动分子，都没有职业，脱离了群众，依党为生活"。照政治局的报告说全党的工人党员最高限度不过四千（其中上海占一三〇〇，香港占六〇〇，其他的大城市中更非常之少）。在大多数的城市中，甚至于在最大的工人中心如武汉，天津，广州，"什么工作也没有"。

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央在六十九号组织问题的通告上曾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正确的指示，指出首先要注意工业中心重要城市的工作，要注意重要的产业工人，要吸收工人积极参加党的工作，号召没有职业的失业党员到工厂中去，建立产业支部及其工作方法，提高党员的政治水平线，健全地方党部，改良指导机关的工作等等。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将中央所提出的这些指示能够真正的去执行。在中央所指出的这许多任务中，有两点我们觉得对于中国共产党有特殊的意义，我们想特别提出这两点的重要。

第一、建设生产支部和其工作。党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健全的生产支部，他是在周围的工人群众中有领导的作用。生产支部的数目已经很少，并且还逐渐减少，在大而重要的产业，简直没有支部。中央通告第六十九号说："譬如在上海那里最多的是手工业支部，店员支部，所谓产业支部，只是名义上的，事实上完全没有"。支部内部生活在现在非常之薄弱，大多数的支部，对于一切政治问题，实际问题，没有集体的讨论，也没有支部内部的分工。在这种条件之下，支部一方面是脱离了群众，另一方面又不能训练自己的党员（有时候说勇敢的工

人入党以后反变成怯懦的了）。因此现在的任务，要用尽一切力量，坚决的去恢复产业支部中的支部生活。没有这个党是不能前进的，不是这样，党便会腐化，因为这样可以消灭自己之生存的一切的组织基础。对于这部分工作，在过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集有极丰富的经验，中国同志应当学习这些经验，并正确的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中去应用，只有从建立这些积极的有能力的，虽然是小的秘密的产业支部才可以造成党可靠的基础。

第二个任务是加强全党之理论上的武装。这里首先就需要严重的去研究马克思的理论。应当知道不仅在党的指导中间，并且在一切宣传煽动的人材中，若是没有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上的预备，则党员群众便失去了必不可少的理论基础，在将来形势转变，政治问题复杂，对于党对于革命进程都有严重意义的时候，党一定不能正确的应用适合于环境的策略。因此必须加紧党员的政治教育，必要用尽一切方法来提高党内政治水平线，要在党员群众革命青年中进行特殊的教育工作（办党校政治班发行通俗的关于马克思的书籍等等）。在现在特别要使全体党员认识国际的纲领，六次国际大会的决议，中国党大会的决议。忍性的，细心的，原则的解释，同志关系的批评，在现在反对党内右倾左倾的斗争中，应当成为最主要的工作方法。等于政治洗剂式的开除党籍，仅止是在他实际上屡次不改正自己错误的时候才能应用。现在在中国共产党中对于这一种方法不能广大的运用。

六次大会关于实行党内民主的指示，中央以及一切党的工作人员，应当尽量的去执行，只要是秘密条件下是可能的（譬如选举制便不能在所有的党部都实现），在党内民主的口号之下不应当发展派别的意气的无原则的斗争。这种现象不幸在中国共产党内依然不少，党应当用尽一切必要的方法，首先是说服的方法来肃清这种现象。全党的义务，要不动摇党的一致，党的纪律以及指导机关的威信，应当反对一切同志之破坏党之行动。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希望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努力党的巩固，应当知道没有坚强的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武装的共产党，绝对谈不上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希望除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外，各省各地的活动分子都有机会来了解认识这一封信。

（二）关于农民问题，我们认为还有他的重要意义，这一封信上并没有说到。关于这个问题，在最近再给你们专门的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中央对国际二月八日关于中国党应针对目前形势怎样正确地运用六次大会和国际大会的正确路线的训令的决议

（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五日）

I 现在政治局势中之根本矛盾

一、国际二月八日来信是指示中国党应针对着现时情形怎样正确地运用六次大会和国际大会的正确路线于一切工作上。中央政治局认为这一指示（除关于农民问题的指示还没到外）足以成为中国党目前主要的工作方针，他一方面证明中央半年来关于政治原则及斗争策略的指示和决定在根本上完全正确，另一方面更将中央对于政治上各种分析的缺点指出，这足以端正党内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加强党的正确领导。

二、依据国际的分析观察中国现实环境，应更加认清外国帝国主义是中国一切政治经济生活中真实的统治者。自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尤其是国民党打下北京后，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是日益加强；不但英日帝国主义势力在南北有显然的发展，便连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也有突飞的进步，甚至其所号召承认的关税自主与修改条约也都是形式上公认中国某种主权，实际上则是加紧中国一层束缚，使中国更深入殖民地化的（更为帝国主义所奴隶所统治的）过程。在这殖民地化的瓜分政策下，帝国主义相互间的矛盾正在加紧军阀战争的制造，与联系到世界大战的准备，所以他们对付中国的战线绝对不能巩固，主要的是表现，看美国与英日的竞争而都是一样地要在中国取得更多的利益。然不应夸大这一竞争的意义甚至以为美帝国主义会帮助中国资本主义独立的发展，或美国会永远以和平侵略的方式来统治中国，这简直是不明了帝国主义本质的妄谈，或者更推论到美帝国主义已经取得了南京政府的领导权，这更加不明了帝国主义相互间的争夺必然要加紧战争的危机决不是从和平外交上可以得到，故美帝国主义用自由主义的假面具以达到统治中国的欺骗政策在群众中确实散布了一些幻想，因此，我们应对群众指出无论任何帝国主义用什么方法来对付中国，其目的都是一样地加紧对中国工农劳苦群众的剥削和破坏中国的独立。

三、中国资产阶级自从背叛革命之后，再也不能而且不愿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了。虽然因着生产力的推进，表现民族资本与帝国主义殖民地化的发展矛盾，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绝不能放弃自己的民族改良主义政纲，但当着这种矛盾冲突的过程中，中国资产阶级只有妥协帝国主义，一步步地出卖民族独立的利益。故民族改良主义的政纲便是妥协帝国主义的政纲也就是阻碍为中国独立斗争的政纲，他实具有十足的反革命性，中国资产阶级企图在帝

国主义竞争或美帝国主义帮助之下取得民族资本独立发展的幻想，正是改组派的理论根据。其实关税增加只能相当地提高南京政府的收入用做战争的军费，美国借款即使实现也是要投资于交通运输事业好便利于外货商场的扩大，并不能适合于民族工业发展的直接需要，固然客观上在将来是要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相当发展的，但他的发展前途终不能脱离帝国主义的经济控制与其所利用的封建势力的束缚，并且，中国资产阶级因为与土地关系的密切联系使他更要加紧对农民直接的或间接的剥削，故他同样不能施行农村的改良，甚至连二五减租的假面具最近也在浙江作最后一次的撕破。自然这决不是说民族资本发展的倾向与封建制度的剥削关系会没有矛盾存在而是说在中国的农村经济与土地关系之下不但改良主义的方法不能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便连小小的改良，中国资产阶级也很难求得地主的让步，所以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在反动的联盟中进行夺取阶级领导的斗争是一显明的事实，但我们不应夸大这一事实的意义要认清无论封建半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都是一样不能统一中国不能使中国解放的。如认中国资产阶级还有推翻封建势力的能力和愿心，更是足以助长右倾观念发展的极大错误，且中国资产阶级的各部分又与各个帝国主义经济上之共同利益，同样又因其与土地关系的密切联系，故使中国资产阶级不能完全脱离其买办性与地主性，使他对于帝国主义或封建阶级不能采取一致的政策。

四、不过我们也应承认在现在的蒋桂战争以及未来的军阀战争中帝国主义的相互冲突固是这些战争的主要动力（不管他是直接的或间接的）军阀抢夺地盘的斗争固是这些战争的直接导火线，但确也反映着豪绅地主与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便是过去的军阀战争也同样含有相当的阶级矛盾在内）这三种矛盾的相互表现使着中国统治阶级内部的虚伪和平与表面统一亦不能有好长时期存在，战争乃成为统治阶级内部必不可避免的最高度的矛盾表现，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愈加紧，中国的工农劳苦民众的痛苦将愈加深。资本的进攻农村的剥削，捐税的繁重，战祸灾荒的流行，在中国已经不是一时的偶然的天然的现象，这与帝国主义的积极侵略农村经济的崩溃有极密切的关系，所以国际的来信很明显地指出“不仅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根本问题未曾解决，而且资产阶级与国民党政府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未解决，……一切所谓中国走向基码尔道路的发展，都是些无稽之谈。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基本矛盾，不仅没有削弱，而且日益紧张必不可免地走向新的革命恐慌的过程而且比以前更广大更深入。”

五、使中国从帝国主义的羁绊之中解放出来的任务与土地革命及肃清一切封建半封建残余的问题有很密切的联系。只有新的革命高潮到来与工农武装暴动建立工农兵苏维埃的政权才能实现这些任务，六次大会后工农群众斗争的形势，尤其是大城市工人斗争自去年五三以来，的确是逐渐复兴的形势。这不仅上海自邮务水电两次罢工推动了最近三月来将近二百次的工人斗争，发动了两年来所未遇见的数千人纪念五一的盛举，便在北方也由半年来大小数十次的工人斗争酝酿到开滦五矿的怠工，在香港最近三月我们领导的工人斗争有十六次，便在湖北，工人斗争的情绪也绝不是低落，在满洲过去三月中也还有八九起可以统计的工人斗争。在乡村农民斗争并未停息，苏维埃区域并未完全消失，朱毛的红军仍然在反动的统治区域存在。投身到农民暴动区域的兵变仍时时发生。过去反日运动的发展，客观上亦确是表现广大劳苦群众反帝情绪的高涨。城市贫民对于苛捐杂税的繁重和国民党军阀的统治已渐生不满，这些都足以证明城市的工人斗争正在开始复兴，乡村的土地革命运动也在逐渐开展虽然这些现象不可以过分估量，但新的革命高潮的薄弱象征的确可以看见。便是党的领导，在这半年来艰难困苦的工作环境中，的确已争得了一些进步，如上海在邮务水电罢工以来，党在

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和领导的确较以前扩大（自然还有许多错误）。香港从和平发展的现象转变到能发动和领导工人作小小的斗争。北方从合法运动与隔离群众两极端的现象中逐渐地争得在群众斗争的相当影响。这虽是极少的进步，但确是我党在这几月来艰苦斗争牺牲许多同志战胜许多困难得来的结果。这一结果是党有可能去领导广大群众斗争之不可忽视之基点。自然，在这些群众斗争中还有很大的弱点，如改良主义在群众中的影响存在群众中失败情绪与合法观念并未减视多少，黄色的群众组织仍有增加，党的领导力量薄弱以及党与群众脱离的现象还没有多大改善，因此，如认革命高潮是马上或很快地就要到来，很显然地对于革命的急性病，中央政治局更坚决地指出如果我们不能逐渐地克服这些弱点，则正在开始复兴的工人斗争必又要经挫折而延缓其进展，土地革命得不到城市工人阶级的领导也必然要受着继续不断的挫折，党的很少进步必又要遇到新的阻碍，故就理论上说来，当然不否认这一直接革命的形势有延长几年的可能。但是因此便以为中国将有长期的“和平的”发展而没有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各种基本矛盾的严重危机，这却是很大的错误。党必须纠正同志中间以这一种或那一种可能极端为出发点的分析方法必须坚决地认定只有斗争只要看我们争取群众的力量才能决定革命高潮到来的快慢行程。

Ⅱ　党的最近基本任务与策略问题

六、根据上述的政治形势的分析和估量，根据半年来党的工作经验，证明六次全国大会争取群众准备暴动的路线与决议无疑地是正确适用，只是在执行的程度上还没有很大成效；其中最大的困难是党内失败情绪与涣散状态之存在，无产阶级干部分子之缺乏，党没有充分布尔什维克的经验以及党内不正确倾向之继续发生，这都是需要党以极大努力极艰苦耐心的工作精神才能战胜这些困难，故党在争取群众于党的周围之总路线下，应特别认清深入产业工人群众，发展群众斗争，巩固党，加强党的组织与威信及其在群众中的领导影响，实是目前党的最迫切的任务。

七、为实现这些任务，党的策略上所特别遇到的困难便是党内右倾思想的发展。这一右倾的危险绝不仅是继续着党内机会主义的残余而复活，他更有现实环境之不可轻视的基础。自从统治阶级以白色恐怖的压迫改良主义的欺骗从宣传上组织上极力向群众进攻以来，党内反映着一部分群众失败情绪与不正确的观念及小资产阶级思想，于是和平发展合法运动的右倾思想便一天天地发展。在理论分析上是夸大资产阶级的力量，错认中国资产阶级可以在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之下取得反革命的领导权，对统治阶级内部各种不可调和的根本矛盾予以忽视，对工农革命斗争的开始复兴与党的力量存在（虽是很弱的）予以否认，甚至认统治阶级已经走向稳定或是革命高潮之来到将遥遥无期，于是表现在策略之观点上便是和平发展合法运动，降低我们政治口号，接受资产阶级的欺骗政策，在组织的观点上便是党内和平（这种观念是要停止我党对一切不正确倾向的斗争，这是最危险的观念）与放弃赤色工会中心组织的主张。同时党在组织上无产阶级基础的削弱，干部分子停顿在知识分子成分上，党员政治水平线之低又都足以成为右倾思想发展的组织来源。固然我们在工农群众中间的工作必须利用一切公开的可能，而且目前已经开始了一点成绩，但这只是在非法的环境下需要一种新的工作方法来争着实现党的基本任务，决不是放弃我们原有的基本任务降低我们的政治口号去迁就客观条件以求得统治阶级所不干涉的合法存在。这后一见解根本是机会主义者的主张。

这样做去，不仅要成为第三党以至改组派的尾巴，并且还要推着群众走入不可挽救的改良主义的陷坑。在最后，便要完成取消派的倾向与党内以及群众中间动摇犹豫恐惧消极的观念相结合以至取消革命，取消党，与共产主义的领导和组织立于完全相反的地位。当然这还不是说中国党内右倾危险已经到了他的最后的形成，已经有了一个危险的派别，但依着他有可能的发展前途来看党必须站在正确的路线上坚决地斗争以克服目前党内正在发展的右倾的特别危险。

八、但仅仅站在党内去克服这一右倾危险，是不够的，必须特别认清助长党的右倾思想发展的客观条件是改良主义的影响。统治阶级国民党除掉用屠杀政策外，还极力用一些改良欺骗的方法来扩大他在工农劳苦群众中的影响，虽然改良主义在中国的经济基础很少发展可能，但资产阶级绝不会放弃一切民主的民族的改良主义的欺骗宣传，在社会上便要造成了对国民党的幻想，以为国民党还真要反对封建势力，还真要为争民族自由而反对帝国主义这种幻想经过屡次的事实证明尤其是民众痛苦的日益加深，固不会长期存在，然在目前群众斗争中还存在许多弱点党在群众中的领导还薄弱的时期，他的影响的危险便不容忽视。最近半年来改组派的活跃（第三党的群众多跑向改组派方面），黄色工农会的增加，过去反日会在国民党领导之下活动，都足以证明改良主义的影响在群众中并未减轻。且不仅群众，党内至今犹存在着在国民党下级党部做事，受国民党委派占领黄色工农会机关以至与改组派讲联合的等等现象，便可知改良主义影响与党内右倾思想如何密切的关系。所以“肃清一切的幻想，揭破国民党政策的假面具，发动群众反对国民党的政策（尤其是改组派以至第三党的欺骗政策）准备群众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实是现在时期中的第二个重要任务。

九、另一方面，党内左倾危险自六次大会后虽逐渐失去了他发生的基础，但假使以为“左倾”的错误已经完全肃清，那便等于容许这左倾的残余在党内存在，于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也同样要有危害。在目前最严重的左倾危险是不愿意进行日常斗争，不承认部分要求斗争的必要，不愿意争取公开的活动机会，不愿加入有群众的黄色工会去争取群众，保留着些命令主义的精神，提出一些空自夸大的高调（目前实行的口号），幻想一些大的斗争来到，这都足以使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不仅不能加大，且将日益缩小，日益与群众隔离。故国际指出消灭党与广大劳动群众脱离的现象，取得群众尤其是工人使其革命化，实是现时党的第三个主要任务。不了解这一任务，便不能克服党内左倾危险的残余。

十、在中国反帝国主义斗争必不可分离地要与工人阶级日常生活的斗争农民争土地的斗争密接，但这是就中国革命任务的关系言，并不是说在工作上除了工人斗争农民斗争要一般的关联到反帝斗争外便没有了反帝的本身工作。恰恰相反，在过去各大城市的反日运动客观上证明了广大群众的反帝斗争确有发动的极大可能。只是党内存在着许多偏向如误解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以为工人斗争不起，或是没有形式上的赤色工会加入反帝运动便不能树立起我们的影响，于是客观上便成为忽视反帝运动，放弃反帝运动中的领导。这需要党以极大努力领导群众加入并组织各种反帝运动，使一部分资产阶级国民党所影响的反帝运动变成工农劳苦群众之真正的反帝斗争，使他同时又是反国民党的运动。

十一、发动与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已成为现时中国党的经常任务。在困难的工作环境下，极艰苦耐心地向前工作。在群众中很细心切实地提出各厂各业的部分的要求做成目前党的经常工作的主要口号。但这些日常斗争的口号必须与党的基本口号有正确的联系，同时必须在日常斗争中解释工农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意义。且不仅在宣传上便在实际斗争中

也必须注意到党的策略路线是要尽可能地准备我党以及广大的工农劳苦群众的力量以备实现革命高潮到来的任务和夺取政权的斗争。因此，党应特别注意每个共产党员在一切群众运动中的积极参加都应当是向着这一战略的方向去做。

十二、农民运动的中心口号无疑地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交由农民代表会议处理。但根据两年来土地革命的经验，乡村阶级斗争的形势，在策略上我们必须认定贫农是斗争的中坚，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富农于中国国家封建制度残余的剥削下，在相当的斗争阶段之中，我们还有吸引他参加反帝国主义军阀地主豪绅的斗争可能。但当着农民与他的主要敌人地主豪绅决战的时候，富农中兼半地主或拥有多数佣农的分子必然是跑向反革命的方面，故同样地不应放松农民对他们的阶级斗争。现时全国的灾荒现象尤其是北方的灾荒仍然继续，在客观上农村斗争有极大发展的可能，只是在农民群众中，北方的和平发展观念与南方失败落后的躲避情绪都很浓厚，党必须坚决地发动农民群众的日常斗争，促进乡村中阶级分化，并以游击战争重新团聚和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到有组织的斗争，走向建立苏维埃深入土地革命的道路。自然这些斗争要尽可能地得到城市工人阶级的领导，要从斗争中加紧农民的组织，从游击战争扩大农民的武装，以准备革命的最后胜利。现时存在的苏维埃区域与红军必须以党与工农群众为前提，必须与全国的劳动群众斗争联系起来，使他日益扩大和发展。红军的行动必须与军阀的土匪军队有根本的不同，他不应向农民派饷，不应向农民及当地劳苦民众征收捐税，必须做到使农民自愿地帮助红军并起来组织帮助红军的委员会。红军只应向豪绅地主派饷。只有在这种条件下，红军才能得到劳动群众的拥护，才能成为新的革命高潮生长的一个动力。

十三、中国军阀制度不仅在保持着半封建的关系上而存在而发展，并且帝国主义列强正维持着这一军阀制度以加紧其进行瓜分中国的阴谋，故中国工农革命如得不到广大兵士群众的参加，如军阀军队中广大兵士群众仍成为中国统治阶级与帝国主义压迫革命之最残酷的工具，则中国革命便是发动起来，也将不能得到并保障最后的胜利。但中国大革命的震动与工农运动的高涨不是空过去的，尤其是两年来农村经济破产的急剧，灾荒区域的扩大与土地革命的开展均足以加紧中国军阀走向崩溃的过程。在这里，事实的表现便是对人民的剥削已到敲筋吸髓的地步，对地盘的争夺更加剧烈战争的祸害更加扩大，军队的生活更加恶化，新军阀克扣军饷虐待士兵方法比旧军阀还要残酷，因此，军队的倒戈与士兵的哗变以及整队的士兵投转到农民斗争区域与红军方面的都时有所闻。所以反军阀战争运动，破坏军阀军队与争取士兵群众到革命方面来在中国革命中实有一般的重要的意义，应成为党的经常的主要任务之一。六次大会以来，各级党部对于士兵运动的工作有一般的忽视，党应用极大努力纠正这一倾向，加紧动摇军队的宣传，鼓动士兵群众日常生活的斗争以联系和发展到士兵群众投身于土地革命运动，同时应在士兵群众中发展党的秘密组织以树立工作基础，以夺取广大的士兵群众到党的政治影响之下来。在帝国主义驻华的海陆军中，党一向缺乏有系统的破坏工作。根据上海暴动与汉口夺回英租界时的经验，帝国主义驻华海陆军的压迫与在他们中间的士兵运动尤其是在印度安南士兵中的运动对于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战实占非常重要的位置，党应一方在群众中从事要求撤退帝国主义驻华海陆军的运动，另一方应在这些士兵中间有经常的宣传工作，以促其觉醒和自己要求撤退尤其要督促青年团加紧这一工作。

十四、在中国革命运动中，青年与妇女亦占有重要的位置。中国轻工业工人中，女工童工的激增，农村中青年农民斗争情绪之易于发动，农妇在农村斗争中的地位和影响，广大士

兵群众中，青年士兵要占大多数，青年贫苦学生在革命斗争中，尤其在反帝与争民主自由的运动中还有他相当的作用，这些都指明党在青年与妇女的运动中要有不断的努力，不仅在工会农会以及一般城市贫民运动中，党应将各种斗争关联到青年与妇女的利益，并应帮助与督促青年团在这一工作路线上争取广大的青年群众，到自己组织的周围。过去青年团在青年群众中，尤其是在青工群众中工作的软弱，妇女运动，尤其纺织女工运动一般的忽略，党应负相当的疏忽责任。

Ⅲ 职工会工作

十五、国际信中说："若是党现时在产业中，在工会中，在罢工运动中，能够取得非常稳固的地位，则在将来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才会有巩固的力量"这是党在职工运动中的主要的工作方针。现时各大城市的工人斗争正在开始复兴，但在这些斗争的统计中我党能起领导作用的居最少数，甚至有些党员虽处在工人群众的领导地位，但失败恐惧的情绪与新的策略的不了解和工作方法的缺乏常使他们表示出比群众还落后的态度。大产业中我们影响之少，赤色工会常常是退缩秘密到党的范围以内。这些都证明党在职工运动中，还没有树起他的中心工作，还没有能针对着统治阶级经过黄色工会扩大他影响造成他的基础的企图，给以严重的打击，去建立我党的自己工作路线。虽然在过去半年，上海香港北方的多次斗争中，党已学得不少在工人群众中如何争取自己地位的策略和工作方法，但还须认清职工运动是党的基本工作，应注意造成普及全党尤其产业中的这一工作路线。

十六、赤色工会是我们组织工人群众的基本任务。在这非法的环境中，自然要使赤色工会的工作非常困难，但工人群众的斗争组织决不应安于秘密状态以与广大的群众隔离，故力争赤色工会公开和领导各种合法与半合法的（社会的相当容许的，并非以国民党登记的为标准）团体生长到赤色工会的组织，是我们目前工作的主要路线。不过赤色工会之公开存在与其他合法半合法团体在性质上的转变均须由斗争来争得来决定，他与公开主义合法运动没有一点联系。因畏惧这种左倾错误，便因噎废食的保持赤色工会单纯的秘密状态，不去利用各种公开机会以发展工作，这很显然的是另一极端的左倾错误。因此，党不但要注意非党的工人群众团体中的工作，并要利用任何机会不拘任何形式创造非党的工人组织，同时要尽量利用多少有点公开性和合法形式的群众组织，团结广大群众，发动群众斗争，以加重赤色工会的作用。但对于有封建性或半封建性的群众组织，我们只能利用加入的机会夺取群众，组织赤色工会，决不应保存或助长其组织上的封建习惯或性质。

十七、假使我们否认改良主义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我们便会对黄色工会的估量有极大错误，事实上，黄色工会在现在的确已成为有群众的组织。因此，凡在黄色工会有群众有下层组织的工厂企业作坊之中，我们要有组织的加入黄色工会，进行反对国民党代理人的斗争，但不是做少数运动。我们在黄色工会中，要设法组织干部分子，其主要的工作应是：1.形成强有力的工人党团，2.综合工人的迫切要求，3.将这些要求与揭露国民党及黄色领袖之欺骗政策联系起来，4.要求黄色工会民主化（工会委员代表组长等由大会选举等等）。使群众赞助我们的政策，改变黄色工会，使之成为真正在我们领导之下的工会。然当着我们在黄色工会已取得多数而仍不能推翻黄色领袖和改变整个工会性质的，即应将在我们领导之下的多数群众组织赤色工会。同时我们要在这些黄色组织中坚决的反对国际改良主义对于中国工

人阶级所施行的种种企图。

十八、在反对黄色领袖，争取工人直接利益，发展赤色工会影响的斗争中，群众的罢工，确有很重大的意义。在准备罢工与选择罢工的时候，我们应估计可以取得胜利的条件，应尽可能的发动群众的直接斗争形势（即是直接选举代表、关车、关厂等等），在群众的拥护下，成立直接指挥罢工的机关以脱离黄色领袖的影响。

凡是遇到工人群众的罢工，尤其产业工人的罢工，党应动员所属地方的党员全体集中力量来参加指导和援助这一罢工，以影响其他产业与工人群众，因为这是党争得在群众中的地位的最好机会。指挥罢工的机关在罢工后应尽可能的使他成为事实上的工厂委员会。不仅在罢工中，便在经常的小斗争中，也要设法取得组织工厂委员会或定期的工人代表会议的机会，同时必须注意要尽可能的用各种方法组织工厂委员会性质的工人组织。在工人运动中要使工农联合问题不仅得到宣传上的联系，并要与一切实际斗争密接起来。

Ⅳ 党的组织问题与党内生活

依据目前的全国组织状况，可看出党的弱点极多，主要的如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削弱，上级组织有许多架空机关，巡视工作一般的缺乏，党与群众组织的关系不正确，这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现象。但决不能因此便忽视党的组织存在，否认在这些现象中的小小进步。假使这样只有走入取消派的倾向，丝毫不能创造出无产阶级长期耐苦的工作精神。故党在组织上的正确路线，必须认定：(一)欲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要首先深入到产业工人群众中去，寻求积极而斗争的分子吸收入党，以改善党员的质量；(二)支部是党的基础，群众的核心，党要以建立中心的产业支部创造支部生活并以试办工厂小报为联系党与群众关系发动群众斗争的主要武器；(三)地方党部目前在组织上应以建立中心工作，实行党内正确的民主化，造就工人干部，注意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和分配宣传品的工作，指导党员职业化为其中心工作；(四)上级党部应多努力于政治及中心工作的指导，加紧巡视工作；(五)党与工农群众组织必须划分，两者中间不同的性质必须弄清相互的关系必须有正确的规定。在这里我们更应深切的认识国际的指示，建立产业支部及其工作与加强党的理论上武装实成为目前组织上两个不可忽视的任务。

二十、六次大会后党内生活的确表现了一些新的精神（在六次大会正确路线之下工作的新精神），但因为有些同志对于决议案还不了解，致发生组织不正确的主张。有些同志主张党内和平，有些同志主张极端民主化，破坏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有些同志发生组织的消极观念。现在秘密条件之下，所有的敌人——帝国主义、军阀、国民党、改组派、以及第三党的领袖，将我们包围得异常严密，而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又甚浓厚，我党不独应当注意政治路线的正确运用，还须注意党内铁的纪律的保障。各种不正确倾向对于党的生存都有莫大关系。不执行党的决议就是削弱党的战斗力与党的领导。闹党内纠纷就是妨碍党的进步。否认党的旧基础，蔑视党的组织力量，就是发展党内取消主义的倾向。对于不正确倾向，没有什么党内和平，破坏党的纪律，是布尔什维克党所决不容许的。自然中央以及各级党部每逢遇着不正确倾向发生时，在执行纪律以前，必须很注意于审查这些倾向。

政治局为新中央执行第六次大会的决议与国际训令的时间虽然很短（仅只半年多）但已经将党从散漫无组织的状态下挽救出来了。在每一次领导工农运动之中，可以很显明的看出

党的进步。中央只能在得到全党共同努力的时候，才能很实际的执行大会与国际的决议。也只有运用正确的政策，纠正一切政治上、组织上、策略上的错误与弱点，有系统的耐心的训练党的干部分子，尤其是工人同志，发动党所有的力量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党才能执行自己的革命任务，夺取群众到革命方面来，领导他们达到胜利的暴动。

中共二中全会政治决议案

——现在革命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一九二九年六月——

1　国际革命危机的加深

（一）六次大会与共产国际六次大会指出，世界革命已进到第三时期，即是世界革命各种的危机进到异常激烈的时期。同时并指出，在这国际形势之下是能够帮助中国革命的发展。这一年来，国际上各种重大事变之经过，充分证明这一估量的正确。第一，帝国主义战争的危机更加紧迫，各帝国主义国家受着生产力的发展与市场枯涸的矛盾的推动而加紧争夺市场，重行分割殖民地，互相敌视。特别英美的冲突，已是毫不掩讳的公开的加紧的准备战争。英法海军协定，揭露各帝国主义国家都如火如狂的竞相增加军备。在太平洋上，因瓜分中国问题，英日与美的冲突也是同样的紧张。英日同盟复活的空气，曾一度传播于国际间。这都是空前惨酷的世界大战快要到临的充分的证明。现在英国资产阶级虽然换了一个新的工具，所谓工党内阁，这不过是资产阶级想借此欺骗工人阶级，以便利它更加紧它的战争的准备。帝国主义战争的灾祸，决不会有半点的和缓。他如日本乃至法国将要发生的内阁更选，也是同样的把戏。第二，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的巩固与发展，吸引了全世界无产阶级更加认识了社会主义前途的光明，促进了他们斗争的勇气，苏联遂成为世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大本营。因此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企图更加积极。帝国主义的反苏联的联合继续的增长，它在西方与苏联为邻国的国家中加强军事的准备，指挥阿富汗的军队袭击苏联的区域，最近又指挥着中国国民党政府搜查哈尔滨的苏联领事馆，想借口把中东路夺在手中，实现它军事上反对苏联的目的。最近的裁减军备会议（帝国主义者在这个会议中一致的否决了苏联底真实的裁减军备的提议），以及巴黎赔款会议，不只明显的表现了帝国主义相互间的矛盾，并且表现了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对于苏联的阴谋。帝国主义者把中国的反动派买办地主资产阶级加入反苏联的联合中。这些压迫中国革命的刽子手，同时就是帝国主义者反苏联的工具。最近苏联领事馆之搜捕以及中国资产阶级之不停止的进攻苏联等等，都是中国的反动派在外国帝国主义者指挥下的一贯行动。所以进攻苏联的战争，也是日益迫切。第三，各国的阶级斗争，与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尤其是日益激烈起来。巨大的罢工不断的在各帝国主义国家中爆发起来（德国五金工人，英国法国与波兰的纺织工人，英国矿工，日本海员等），今年五一节全世界工人阶级壮烈的总示威，特别是德国工人阶级开始了他的武装冲突，已经使全世界资产阶级发抖。帝国主义在工人群众日益左倾的威吓之下，积极企图打破工人群众革命斗争和拥护苏联的意志，是帝国主义进行世界大战、反苏联战争以及一切帝国主义行动的主要前提之一。

因此，帝国主义者除掉以法西斯蒂方式压迫屠杀工人群众外，更一方面使社会民主党和黄色工会与政府机关更加亲密的合作，另一方面又豢养所谓左派社会民主党（这是工人阶级

最奸险的敌人)的新工具来欺骗工人群众,企图在这样左派改良主义者联合中解决这个任务。这些帝国主义的新旧工具虽然极力用尽一切方法来阻止群众的革命斗争，但是广大群众仍然日益趋向于革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日益增大。殖民地的革命更有显著的发展，印度已开始了它的革命高潮，拉丁美洲的革命不断的爆发，中国革命又是开始复兴的形势。全世界革命的火山都在冒火吐烟了。这样帝国主义战争危机的加紧，进攻苏联战争的迫切，与国际革命斗争的激剧化，很明显的是世界革命各种危机的同时加紧，这些危机的爆发，便是世界革命巨潮的来到。

(二)在帝国主义战争危机中，瓜分中国是主要的导火线之一。在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战争当中，中国也是帝国主义进兵的重要的根据地，这样一方面固然加重了中国工农劳苦群众在世界反帝国主义革命中的任务；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互相争夺的矛盾，推动着中国军阀战争特别加紧，使豪绅买办资产阶级的统治力量益加削弱，特别是世界革命的激剧，可以增长中国工农劳苦群众无限的革命的勇气。所以现在国际的形势是可以帮助中国革命的进展。

2　现在中国政治局势的根本矛盾与革命形势的开展

(三)依据国际形势观察中国现实的环境，应更加认清外国帝国主义是中国一切政治经济生活中真实的统治者。自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尤其是国民党打下北京后，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日益加强；英日帝国主义势力在南北有显然的发展，英国在南中国的统治恢复。日本出兵山东，侵占北满，显然是互相默契瓜分中国的进行。同时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也有突飞的进步，对华贸易增进的速度已经突破以前的纪录，特别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买好，已经取得了许多政治上的经济上的新的特权（如财政顾问，航空协定，这对于美国的帝国主义计划有极大的军事意义)。英日美各个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既然同样增进，于是在市场上在政治上在各种特权的攘夺上都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遂造成现在英日美互相敌视的三角冲突的形势。美帝国主义一贯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政策，这是公开的攘夺英日既得特权的口号，尤其是最近一年来美帝国主义挟其庞大的财政资本的优势著著迈进，更引起英日的嫉视，所以现在太平洋上英日美帝国主义三角冲突之中,已表现着英日接近与美对抗的形势。帝国主义既然这样互相竞争,遂各自操纵中国的军阀与反动的政治派别,成为他的攘夺的工具,因此造成中国不断的军阀战争，这是目前中国政治局势中第一个根本的矛盾。我们要明白指出这些帝国主义强盗的互相敌视，完全是为着争夺中国的利益，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对中国都是一样的侵略的政策。美帝国主义的政策与英日帝国主义的政策在根本上没有一点不同，所谓承认关税自主与修改条约，这不过是美帝国主义的一种自由主义的假面具，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政策的一贯的表演。只有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才会幻想在美帝国主义帮助之下来取得中国工业的独立的发展，这就是改组派的理论基础。其实关税的相当的增加，只是帮助了军阀战争的军费，更加助长军阀战争，于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并没有帮助。美国的投资也是与英日一样，首先要投资于交通运输事业，以便于它的商品市场的扩大，并不能适合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直接需要。并且美帝国主义这种政策，因为英日的对抗和其它各种矛盾的关系，必然要遇到严重的打击而无法进行，纵令这种政策有多少的实行。在客观上纵要使中国民族工业相当的发展，但是这样发展的过程，始终是在帝国主义经济控制之下，而使中国更加一天一天走向殖民地化的道路。所以如果认为美帝国主义的政策可以帮助民族资本主义独立的发

展，便是坠入了资产阶级理论的泥坑，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还有第二个很大的错误，就是过分估量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势力的发展，以为美帝国主义已经取得了南京政府的领导权。这更加不明了帝国主义相互间的争夺必然要加紧战争的危机，决不是从和平外交上可以得到。这种观念是一样的帮助美帝国主义的宣传的极端错误观念。

(四)现在中国的经济上，封建阶级尚有坚强的基础，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大部分都在地主阶级惨酷剥削之下。虽然因货币关系的发展，封建剥削关系受着很重大的打击，而日益崩溃，但仍然是占有很大的优势。特别是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发生广大失业破产的群众，造成封建军阀制度的基础，使国家封建制度的残留又有一时恢复的形势；再加以帝国主义的利用与维护，于是军阀制度，封建的和半封建的上层建筑仍然是中国政治变动的主要动力之一。没有根本消灭封建的或半封建的民主革命，则不会解决中国的基本问题。中国弱小的资产阶级，本身既还带有封建的剥削关系，尤其是他要企图统治全国，更不得不与军阀联合起来，因此形成现在买办地主资产阶级军阀联合的政权。所以国际反对派以为中国已经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政权，中国革命已经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这完全是抹煞一切中国实际的经济剥削关系的无稽之谈，所以中央全体会议坚决的指斥了这种观念以及类似这种观念的倾向是极端错误的。

(五)过去一年中国经济状况表现有相当的活跃，一直到现在，大部分仍然是帮助了帝国主义工商业的恢复，只有很小的一部分影响到中国民族轻工业（特别是丝业到现在仍在停滞之中)。同时各地方中国民族工业仍然继续着转递于外人之手（有些企业卖给日本人了)。固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之相当的发展是很困难，但在最近的将来决不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中国全国生产力向独立的民族资本的路线的发展倾向，将要反对着由国际帝国主义所施行的使中国殖民地化的倾向。所以认为资产阶级反革命以后，便完全与帝国主义的利益混合了而没有一点矛盾，是不正确的。因为中国民族工业独立的发展与帝国主义的利益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绝不能完全放弃自己的民族改良主义的政纲。

同样，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倾向，也要与中国尚很强固的封建剥削关系发生矛盾，中国资产阶级也同样的主张自己的民族的民主的改良政纲（如二五减租，减轻田赋等)，以便利自己的发展。可是在中国中小地主占优势，特别是货币关系发展，使这些中小地主要日益趋于破产的形势之下，就是这样的些小改良的政纲，也是地主阶级所不能接受。这样，便推动着中国豪绅买办资产阶级来争夺这反革命联盟统治的领导权。同时以中国军阀制度的存在，各系军阀争夺地盘财政的冲突，永远无法解决，于是中国反动统治阶级的各派与各系军阀，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特别是各个帝国主义的指使，遂造成中国连绵不已的战祸，这是中国现在政治局势中第二个根本的矛盾。

(六)我们决不应夸大了这一矛盾的事实，资产阶级的改良政纲是一种经常的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妥协的政纲，就是使中国屈服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之下。并且中国资产阶级的各部分与各个帝国主义有经济上之共同利益，使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不能采取一致的政策。各部分的资产阶级与这一个或那一个的帝国主义有相互的联系，在民众中间发生了反对与他相竞争的帝国主义的运动的时候，则资产阶级在虚伪的反帝国主义旗帜之下，也要利用这种机会（例如不久以前汉口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运动)。并且即是在这种资产阶级的运动中，只要这个运动牵动了广大的民众，资产阶级立刻就要反攻。

同样的，中国资产阶级也尚未完全脱离封建的土地剥削关系，使各部分的资产阶级与各

部分的封建势力在乡土的关系上还有密切的联系，这样使中国资产阶级对封建势力也更不能采取一致的政策。故他同样不能实行农村的改良，甚至二五减租的假面具最近也在浙江作了最后一次的撕破。所以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中间表现的矛盾，仅是为要求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些小的让步，都不能得到容许，决不是资产阶级是有什么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统治的要求。并且以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强大，和资产阶级力量弱小，在这种冲突的过程中，中国资产阶级，必然要一步一步出卖中国民族独立的利益，妥协封建势力。特别是资产阶级对群众斗争的恐惧，天天在设法镇压群众的革命运动，更加妥协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并且帝国主义与中国反动的各个阶级和各派别间的矛盾，会在它们对于中国革命的共同的矛盾之前，仍然是要联合一致。谁要认为反动中的一个阶级或一派会走到或“被迫到”革命方面来时，则他自己已走到中国的反动方面去了。所以以为资产阶级反革命以后，便买办化了，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利益混合了，没有矛盾了，自然是不正确的；但是如果夸大了这一矛盾，以为资产阶级还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统治的要求，还有革命的作用，更是极大的错误。

（七）所以现在的以及未来的军阀战争，帝国主义的互相冲突固然是这些战争的主要动力（不管他是直接的或间接的），军阀抢夺地盘的争斗固是这些战争的直接导火线，但同时确反映着豪绅地主与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以及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各部分利益互相的冲突。这三种矛盾的相互表现，使着中国统治阶级内部的虚伪和平与表面统一都不能有好长时期存在，战争乃成为统治阶级内部必不可避免的经常的状态。就现在的事实，更是一个长期混战的局面。所以如果以为中国资产阶级可以以和平的方法，一步一步实现他的改良的政纲，走向中国的统一与解放，这完全是一种无稽之谈。所以驱逐帝国主义，肃清封建势力与统一中国三大任务，只有广大工农劳苦群众革命斗争的完全胜利后，才能彻底的实现。

（八）中国资产阶级既然不能求得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让步，要与帝国主义的商品竞争，所以他唯一的出路，只有更加紧对工人的剥削。这一年来工人群众的生活状况，已经比以前更加低劣。中国地主阶级要维持自己的地位，也只有更厉害剥削农民。特别是中国的军阀，对广大劳苦群众的残酷的剥削，捐税的繁重，战祸的流行，因此更使广大群众加速的破产与死亡。现在的空前灾荒，决不是偶然的现象，这是帝国主义的侵掠，军阀的剥削，地主阶级和资本的压榨所造成。这样的结果，当然要激动广大工农劳苦群众为救死求生的斗争。同时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强，当然与中国广大工农劳苦群众要求民族独立自由的愿望绝对相冲突，因此引起了中国反帝运动的复兴。

从济案以后各地广大群众的反帝运动不断的爆发，一直发展到上海五卅纪念与援助张案的总示威。这种形势恰与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相对抗。所以这样的斗争必然继续向前开展，最后更要汇合各种的斗争成为革命的巨潮，驱逐帝国主义，颠复统治阶级，建立工农兵士贫民苏维埃的中国。任何的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与改良主义的欺骗，都不能消灭这一革命胜利的前途。所以现在反动统治与群众革命的斗争的冲突，是中国目前政治局势中第三个根本的矛盾，而且是最严重的矛盾。

这一年来的过程，中国资产阶级不只是没有解决这些根本的矛盾，而且他自己企图解决的问题也一点没有解决。所以很明显的，中国革命的危机是在一天天加深的。

六次大会后工农群众的斗争尤其是大城市工人斗争，自去年五三以来，的确是逐渐复兴的形势。这不仅上海有邮务、水电两次罢工推动了最近数月来将近二百次的工人斗争，发动

了两年来所未遇见的数千人纪念五一的盛举以及数万工人学生群众五卅政治的大示威，便在北方也由半年来大小数十次的工人斗争酝酿到开滦五矿的怠工，在香港最近三月我们领导的工人斗争有十六次，便在湖北方工人斗争的情绪也绝不是低落，在满洲过去数月中也还有八九起可以统计的工人斗争。在乡村，农民斗争并未停息，苏维埃区域并未完全消失，朱毛红军仍然在反动的区域存在，投身到农民暴动区域的兵变仍时时发生。过去反日运动的发展，客观上亦确是表现广大劳苦群众反帝情绪的高涨。城市贫民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也是不断的兴起。并且在这样斗争的形势中已表现着几个重要的发展的现象：第一，从日常的小斗争已发展到了大的罢工运动；第二，从反抗资本进攻的经济的斗争开始进到争自由反国民党的斗争；第三，黄色领袖和改良主义的欺骗影响已相当的缩小，上海几个有基础的黄色工会下面的群众都发生很激烈的反黄色领袖的斗争；第四，共产党与赤色工会在群众中的影响已有相当的扩大。这些都足以证明城市的工人斗争正在开始复兴，乡村的土地革命运动也逐渐在开展，整个的革命运动都在向前发展。所以认为群众斗争只是一种暂时活跃的形势，而不会有它继续开展的可能前途，很明显的是不正确的观念。虽然这些现象不可以过分估量，但新的革命高潮的象征，的确可以看见。且党的领导，在这半年来艰难困苦的工作环境中，所争得的一些进步，如上海在邮务水电罢工以来，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和领导的确较以前扩大。香港从和平发展的现象转变到能发动和领导工人小的斗争。北方从合法运动与隔离群众两极端的现象中逐渐的争得在群众斗争的相当影响。这虽是很小的进步，但确是我党在这几月来艰苦斗争牺牲许多同志战胜许多困难得来的结果。这一结果是党有可能去领导广大群众斗争之不可忽视之基点。自然在这些群众斗争中还有许多的弱点，如改良主义在群众中的影响存在，群众中失败情绪与合法观念并未减轻多少，黄色的群众组织仍有增加，特别是党的领导力量薄弱以及党与群众脱离的现象还没有大的改善。因此，如认革命高潮是马上或很快的就要到来，很显然的是对于革命的急性病。中央全体会议坚决的指出，如果我们不逐渐地克服这些弱点，则正在开始复兴的工人斗争必又要经挫折而延缓进展，土地革命得不到城市工人的领导也必要受着继续不断的挫折，党的很少进步必又要遇到新的阻碍。故就理论上说来，当然不否认这一直接革命的胜利有延长几年的可能。但是因此便以为中国将有长期的“和平”的发展而没有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各种基本矛盾的严重危机，以及革命高潮的来到将要延长到遥遥无期等的观念，这都是莫大的错误。党必须纠正同志中间以这一种或那一种可能极端为出发点的分析方法，必须坚决认定只有斗争，只要看我们争取群众的力量，才能决定革命高潮到来的快慢行程。

3　党的总路线与基本任务

（九）根据上述的政治形势的分析和估量，证明六次大会与共产国际六次大会和国际执行委员会最近的指导信所指出的，目前党的总路线，是争取广大群众以准备武装暴动，是完全正确的。党在一年来工作的结果，党政治影响已有相当的扩大，党与群众的关系已有相当的进展。但是国民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尚未完全打破，改良主义在群众中还留有很多的幻想，群众组织斗争力量还很薄弱，党在群众中的威信还没有广大强固的基础，所以党应更坚决的继续执行这一争取群众以准备武装暴动的总路线。

（十）根据现在革命的形势，革命主观的弱点，和一年来党的斗争的经验，党要争取广大

的群众，必须坚决执行下面的任务：

1． 加强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联系到反对世界大战与拥护苏联。帝国主义的侵略加强与国民党出卖民族独立的利益，已使广大群众极端愤慨，所以党应坚决的发动并领导一切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使广大群众都团结在党的周围。同时党应更进一步的指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和抢夺其他殖民地的世界大战的危机的紧迫，指出苏联是世界反帝国主义革命的唯一的领导和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企图，并且号召广大群众作坚决反抗的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发动广大群众在党的政治影响之下与世界革命的力量亲密的联合起来，而达到颠复帝国主义统治的最后胜利。在反帝国主义斗争的理论与策略上有几个基本的观念必须严重的指出：第一、帝国主义统治中国最主要的工具是中国封建的和半封建的残余势力，所以不能根本肃清封建的和半封建的残余，就决不能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同样，如果不能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决不能完成土地革命，因此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与领导土地革命彻底完成是目前革命阶段上两个不可分离的主要的任务。第二、如果因此便以为在土地革命斗争以外，便没有独立的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当然是很大的错误，因为广大群众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必然要起来坚决的斗争，所以我们必须坚决的经常的加紧领导反帝斗争。反帝斗争的扩大当然可以推动工人运动农民斗争的发展，同时必须工人运动农民斗争有了比较强大的基础也才能推进反帝运动广大的发展。所以反帝运动与工人经济斗争农民运动是有互相影响互相推进的作用。如果不注意工人农民的日常斗争，而单纯幻想爆发广大的反帝运动来掩护工人农民运动的复兴，更是极严重的错误观念。第三、过去在反帝运动中没有充分注意到反世界大战与拥护苏联的宣传和斗争，是一个明显的缺点，党必须坚决的纠正这个缺点，在一切的群众斗争中特别在反帝运动中，加紧注意反世界大战与拥护苏联的宣传和斗争，然后才能领导群众的革命斗争，执行它在世界革命中的任务。

2． 坚决领导反对豪绅买办资产阶级国民党统治，发展一切群众的斗争，向着这一总的目标前进。国民党一切勾结帝国主义，妥协封建势力，残酷的压迫剥削的罪恶，已经在广大群众中暴露出来。党只有在一切群众的斗争中，坚决的提出反国民党的口号，领导一切斗争都向着这一总的目标前进，才能将国民党留在群众中一些残余都打破无余，才能更加坚决群众革命斗争的勇气而团结到党的周围。

3． 扩大反对军阀战争的斗争。军阀战争直接加与广大群众以莫大的痛苦，党必须在一切城市与乡村中利用一切的机会发动并扩大反军阀战争的斗争，这一斗争必能卷入广大的群众，使在同一口号之下，一致的行动起来，这是目前特别重要的任务。反对军阀战争的总路线是要采用失败主义的原则，就是这些军阀战争只是统治阶级内部互相攘夺剥削工农劳苦群众的强盗战斗，没有丝毫革命或进步的意义。所以党应坚决的号召广大群众起来斗争，对于任何一方面都加以坚决的攻击，而使之失败，同时要坚决的宣传只有群众的革命暴动才能消灭战争的口号。但是在目前执行这一路线的行动的策略上，是要利用一切军阀战争所给与广大群众的痛苦来发动广大群众的斗争，如反对摊派军饷，反对拉夫拉车，反对关闭工厂，反对增加工作时间，要求发饷，反对开差等。必须这些斗争已经掀动了广大的群众，工农兵士的斗争都已经有伟大的爆发，然后才能汇合到广大群众的革命暴动来消灭军阀战争的前途。所以以为军阀战争起来，不问工农斗争发展形势如何，便无条件的在士兵斗争中发出暴动杀自己官长的口号，这是很明显的错误。

4． 加强领导扩大并深入土地革命的斗争。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封建

剥削，不但没有减轻，而且是日益加紧，资产阶级土地改良的政策一点也没有实行，所以土地革命的斗争仍然是继续的发展，各省不断的自发的农民斗争都有土地革命的意义。大革命失败已经两年，而广东江西湖北湖南各地还有苏维埃区域的存在。工农革命的红军还在继续发展，固然统治阶级不能稳定，军阀战争的继续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广大农民群众土地革命斗争仍在继续开展，更是基本的原因。所以土地革命彻底的完成固然要在全国工农暴动夺取政权的胜利以后，但是如果以为全国工农暴动没有胜利以前便没有农村的土地革命斗争，实在是一个错误的观念。相反的，在现在这样客观政治经济条件之下，农民土地革命斗争的发展，同时在土地革命过程中建立红军，是推进革命高潮决定全国工农最后暴动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所以党应继续坚决的发动并领导广大农民群众的土地革命斗争，特别是在苏维埃区域与游击战争中，要加紧实行六次大会的土地政纲，然后才能夺取广大的农民群众在党的口号的周围，而消灭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影响。

5．继续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坚决斗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纲，完全是妥协帝国主义妥协封建势力的政纲，就是延长帝国主义的统治延长封建剥削的最好的保障，所以不肃清改良主义在群众中的影响，不推翻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决不能实现彻底驱逐帝国主义肃清封建势力的任务。军阀战争不断的爆发，国民党继续一步一步的投降帝国主义，二五减租的公开取消，对群众的剥削压迫加紧，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群众中的影响的确有相当的缩小，因此改良主义的派别如改组派第三党等都发生破裂溃散的现象。但是如果以为改良主义已经死灭，已经不是革命的严重的敌人，这是不正确的。很明显的，在各处的群众斗争中都还表现着对改良主义的幻想，黄色工会农会还在继续加多，特别在北方的确欺骗了广大的群众，并且群众主观上还存在着许多弱点，党在群众领导力量还很薄弱，这都是改良主义还可以继续发展的条件。还有资产阶级决不会轻易放弃了这一政策，必然要继续扩大它的欺骗方法与宣传，所以改良主义仍是目前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仍然要我们继续加紧与它作坚决的斗争。但是如果又走到另一极端，夸大了改良主义的作用，甚至以为改良主义有很大的现实的可能，这更是极大的错误。因为国民党既不能取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让步，不能解决中国革命的根本矛盾，那就很易于使这一改良主义的欺骗性在群众的前面暴露，决不会有长期影响的存在。所以只要我们能执行很正确的策略，必能克服改良主义在群众中的影响。反改良主义的策略，最主要的是要坚决的领导群众的斗争，在斗争中来揭破改良主义的欺骗。因为要把改良主义的影响在群众中驱逐出去，单只宣传煽动是不能的，主要要靠群众自己的政治经验。另一方面，对改良主义作系统的理论的攻击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过去这一工作的确是异常欠缺，这是党以后应该特别注意的。

6．加紧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进一步的汇合各种斗争到争自由反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的总的斗争。发动群众的日常斗争，仍然是目前争取群众的重要任务，因为在大部分的群众中还保留有很深的失败的情绪，斗争的勇气尚未提高，党只有提出一切的群众的日常的痛苦来发动群众的斗争，正确的运用斗争的策略取得不断的胜利，然后才能渐次提高群众斗争的勇气，而调动广大群众团结到党的政治口号之周围。但是就现在的形势，决不应拘束在日常斗争的口号之下，而应进一步的坚决的领导群众从日常的小斗争扩大到大的罢工，从经济的斗争发展到政治的斗争，并且应有计划的准备着汇合各种群众的斗争到争自由的总的斗争。因为在部分的群众中，日常斗争已经有相当的发动，斗争的勇气已经有相当的提高，特别是这些斗争都直接受到国民党的压迫，而使群众感觉到争取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自由的迫切

的需要。所以党应坚决的起来领导群众的各种斗争到争自由反国民党的政治斗争，领导各工厂各作坊的小斗争扩大到同一产业或同一职业的大的罢工。只有这样才能继续提高群众斗争的勇气，扩大群众的阶级的政治的认识，团结更广大的群众。如果拘束在日常斗争的口号之下不敢领导群众的扩大的斗争，这就无异于阻止群众的斗争，断送群众到国民党改良主义影响之下，放弃争取群众领导群众的任务。

7． 加强工会运动与黄色工会中的工作。如果党在工人阶级的中间没有巩固的基础，在各企业和工会运动中没有广大的工人组织的基础，党便不能在革命中握着领导的地位，所以加强职工运动特别是铁路海员矿山等重要产业工人中的工作，是党的目前最主要的任务。在现在黄色工会不断的生长的情形之下，如果要树立党在职工运动中的基础，只有打入黄色工会中去，特别加强工作，揭露一般黄色领袖与国民党的欺骗，然后才能克服黄色主义的影响，夺取广大群众到党的政治口号的周围。如果以为支部工作才是党的基础，而忽视群众运动的工会工作；如果以为赤色工会才是我们的中心，而忽视黄色工会中的工作，或者轻视黄色工色工会的影响，而不加入进去工作，这些观念都是妨害党争取群众的基本任务的最不好的倾向。党的秘密的支部工作与公开的或半公开的工会运动必须同时并进，然后支部才能成为真正领导群众的核心，才能组织广大的群众。必须加紧黄色工会中的工作，才能帮助赤色工会影响的扩大。

在职工运动中的中心策略是要力争赤色工会的公开，反对国民党用委派整理登记的方法来禁止群众的自由。加紧黄色工会中的工作，反对黄色的领袖，织组接受我们的影响的左倾的干部分子，夺取其广大群众，以转到赤色工会的前途。注意发动群众的日常斗争，织组同一产业或同一职业的同盟罢工。正确的运用工厂委员会的策略以夺取广大的群众。同时要特别加紧在铁路海员矿山兵工厂等重工业工人中的工作。这些策略在职工运动决议案上应有详细的解释与说明，各级党部都必须坚决执行这一策略的路线。

8． 加强对农民运动的指导，更有计划的去进行工作。这一年来在客观上农民运动仍然是继续不断的进展，但的确欠缺党的有力的指导与有计划的工作。大部分的农民斗争都是一种自发的形势，所以大多数都在偏僻区域中发展，而在重要产业区域和中心城市的周围，农民运动极少发展。这样固然难于形成农民运动的中心基础，特别是在党的最后夺取政权的任务上看是莫大的缺陷。所以党以后必须特别加强对农运的指导，更有计划的去进行工作。农民运动的中心口号无疑地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交由农民代表会议处理。但根据两年来土地革命的经验，乡村阶级斗争的形势，在策略上我们必须认定贫农是斗争的中坚，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富农在中国特殊经济条件之下兼有半封建半地主的剥削，所以他在土地革命过程中便要由动摇以至反革命，所以必须坚决的反对富农，才能彻底完成土地革命。至于富农还留在反军阀地主豪绅的战线内的时候，党必须极力发展雇农贫农在思想上组织上斗争上的影响，以与富农争夺领导权。同时注意发展雇农的组织并领导他们的斗争，已经是党的迫切的任务，因为不仅是雇农与贫农是土地革命的领导力量，特别是在革命的下一阶段——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更只有雇农坚决的斗争与贫农结成巩固的同盟而使中农中立，才能取得反对农村资产阶级的胜利。现在全国的灾荒现象尤其是北方的灾荒仍然继续，在客观上农村斗争有极大发展的可能，只是在农民群众中，北方的和平发展观念与南方失败落后的躲避情绪都很浓厚，另一方面过去盲动残余烧杀政策等仍然存在，所以党在农村工作中的路线，必须坚决的反对右倾的机会主义的危险，同时决不可放松对于盲动残余及其他左倾思想的纠正。党

必须坚决地发动农民群众的日常斗争，促进乡村中阶级分化，并以游击战争重新团聚和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到有组织的斗争，走向建立苏维埃深入土地革命的道路。自然这些斗争要尽可能地得到城市工人阶级的领导，要从斗争中加紧农民的组组，从游击战争中扩大农民的武装，以准备革命的最后胜利。

9．领导游击战争，扩大苏维埃区域与建立红军。六次大会指出现在中国农村的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条件，农民斗争很容易走到武装的冲突，所以党应坚决的领导游击战争与自发暴动，在游击战争中建立工农革命的红军。同时指出党在苏维埃区域的策略，是要坚决实行党的土地政纲，以发动更广大的群众，扩大苏维埃区域，同时要用尽一切的可能来扩大红军的组织，这是决定中国革命高潮的主要条件之一。一年来农村斗争的经过，农民自发暴动在各省不断的起来，游击战争继续扩大，红军组织虽然经过军阀数次的围剿，不只没有消灭，而且得到了新的发展，这都证明六次大会的指示是异常的正确，党以后应继续坚决的执行这一路线。但是党应同时注意游击战争的行动更有组织，更正确的实行农民斗争的口号，而坚决纠正盲动残余的烧杀政策，和其他错误的行动，才更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至于红军行动的策略集中或分散，是要决定于一切客观和主观条件，如军阀战争的形势，农民斗争的状况，以及红军组织的成份与地理的条件等，不应机械的一般的来指示集中或分散的策略。

10．加强兵士运动的工作。中国军阀制度不仅在保持着半封建的关系上而存在而发展，并且帝国主义列强正维持着这一军阀制度以加紧其进行瓜分中国的阴谋，故中国工农革命如得不到广大兵士群众的参加，如军阀军队中广大兵士群众仍成为中国统治阶级与帝国主义压迫革命之最残酷的工具，则中国革命便是发动起来，也将不能得到并保障最后的胜利。但中国大革命的震动与工农运动的高涨不是空过去的，尤其是两年来农村经济破产的急剧，灾荒区域的扩大与土地革命的开展均足以加紧中国军阀走向崩溃的过程。在这里，事实的表现便是军阀对人民的剥削已到敲筋吸髓的地步，对地盘的争夺更加剧烈，战争的祸害更加扩大，军队的生活更加恶化，新军阀克扣军饷虐待士兵方法比旧军阀还要残酷；因此，军队的倒戈与士兵的哗变以及整队的士兵投转到农民斗争区域与红军方面的都时有所闻。所以反军阀战争运动，破坏军阀军队与争取士兵群众到革命方面来，在中国革命中实有一般的重要的意义，应成为党的经常的主要任务之一。六次大会以来，各级党部对于士兵运动的工作有一般的忽视，党应用极大努力纠正这一倾向，加紧动摇军队的宣传，鼓动士兵日常生活的斗争，以联系和发展到士兵群众投身于土地革命运动，同时在士兵群众中发展党的秘密组织以树立工作基础，以夺取广大的士兵群众到党的政治影响之下来。过去在士兵运动中有两种错误的观念：第一、就是兵变主义，以为兵士运动的目的就是破坏敌人军队，所以应该以兵变为原则。而不知道我们的任务是在夺取广大的兵士群众，盲目的兵变，只是消灭党在兵士中的基础，对于敌人的打击极微，这完全是与我们的任务不相容的，所以我们在原则上反对兵变主义。至于自发的兵变，或已被敌人发觉不得已而兵变，或者是在红军与苏维埃区域和农民斗争激烈的区域接近的地方军队为着保障农民斗争的胜利而需要兵变，当然我们要坚决的领导。第二种观念以为兵士运动没有日常的经济斗争的工作，其实不然，军队中一样的有日常的经济斗争，并且只有日常斗争，才能激起广大的兵士群众的反长官的阶级觉悟。这种观念的错误，结果是一样的要走向兵变主义方面去。在帝国主义驻华的海陆军中，党一向缺乏有系统的破坏工作。根据上海暴动与汉口夺回英租界时的经验，帝国主义驻华海陆军的压迫与在他们中间的士兵运动，尤其是在印度安南士兵中的运动，对于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战，实占非常重要

的位置。党应一方在群众中从事要求撤退帝国主义驻华海陆军的运动，另一方应在这些士兵中间有经常的宣传工作，以促其觉醒和自己要求撤退，尤其要督促青年团加紧这一工作。

11．巩固党的组织，扩大党的无产阶级的基础。一年来工作的结果，克服许多的困难，已开始表现着党的进步，但是党的组织特别是支部还没有脱离涣散的现象，党在产业无产阶级中，特别是铁路海员矿山工人中的基础仍是异常薄弱，这样决不能使党成为群众斗争的强固的领导者——无产阶级的先锋军，所以党应用尽一切的力量来克服许多困难，巩固党的组织，扩大党的无产阶级的基础，这也是党在革命中的重大的任务。

12．宣传与教育的任务。党必须坚决的勇敢的在一切群众的日常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中极力扩大党的政纲的宣传，特别是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是群众解放的出路的意义。同时特别加强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尤为重要，过去对于这一点极少注意是一个莫大的缺点。一切日常鼓动的口号都须与党的宣传口号联系起来，才能使广大群众在不断的斗争经验中深切了解党的口号的正确，然后在革命高潮到来的时期，党才能征调广大的群众来完成这一革命的任务。同时若没有对于全党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教育工作，特别是在斗争中解释党的基本的理论与策略，决不能推进党的布尔塞维克化，完成党领导革命的重大的任务。当然这样的理论的教育，要注意与实际斗争策略，党的日常工作，发生密切的联系，离开策略，离开工作去高谈理论，这是一种清谈的倾向。这不只是使同志得不到正确的政治认识，而且是妨害党执行在目前革命当中实际任务的最恶劣的倾向。

13．扩大党在城市贫民中的影响，特别注意学生运动。城市贫民是工人阶级在城市中最好的同盟军，是革命的一个重要的力量。一年来城市贫民的运动，如反抗苛捐杂税的斗争，在客观上是很发展的，罢市停业的事件到处发生。这是很明显的证明城市贫民已经开始离开国民党的影响，走向革命斗争的道路。可是党对于这一工作，在全党中都成为一般的忽视。以后党必须经常在城市贫民中加紧宣传鼓动的工作，帮助他们的组织，特别是在他们斗争的时候，党应设法打入进去起领导的作用。同时学生的斗争，也是很激剧的发展，群众表现着一天一天的左倾，如果认为学生群众经过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的革命高潮后，已完全失掉他的在革命中的作用，这是不正确的观念。当然工人运动的发展，是革命斗争的领导的力量，但是在现在政局根本矛盾日益加深，国民党的威信日益破产的条件之下，学生群众除掉一些反动的分子以外，仍然是要趋向于革命的，特别是反帝与争自由的运动，并且是工人阶级有力的同盟军。党必须坚决的反对这样错误的观念，更有力的加紧在学生运动中的工作，以扩大党的政治影响，而夺取广大的学生群众到党的政治口号之下来。但是应该严重的注意，使小资产阶级的动摇观念，不要在工人群众中及党中存有影响。

14．注意青年妇女的工作。目前政治趋势发展的过程中，特别的显示了青年群众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与特别的任务。

一年来青工女工在生产中数量的激增与生活的恶化；广大的青年士兵与农村青年群众在不断的军阀战争中，农村经济破产的过程中，更推动他们走上斗争的阵地；青年贫苦学生群众反帝与争自由斗争的发展，这些都明显的看出了青年运动发展的趋势及斗争和组织的前途：(一)青年生活状况恶化，政治压迫的加厉；(二)青工与女工在产业中数量的增加，在生产中的比重加强；(三)因此，青年的愤懑和需要组织与斗争的准备也正在尖锐化，这在过去一切斗争中，青年群众斗争积极的加强，便是例证。但是青年团在这种形势之下的工作尚不充分，特别是在青工群众中工作的薄弱，如象过去在斗争中：(一)忽视青工特殊利益；(二)

忽视青工群众的组织等。这些都指明党在青年与妇女的运动中要有不断的努力，更应积极的帮助与督促青年团在这一工作路线上争取广大的青年群众到自己的旗帜之下。因此青年团的工作：(一)应积极的创造团的无产阶级青年的组织基础；(二)加强团员群众政治生活，经过团的组织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于青年群众中；(三)青年团应肃清前一时代非青年的工作方式与方法，创造新的青年工作方式与方法，夺取广大的青工群众到赤色工会方面来，在斗争中争取青年的特殊利益；(五)加强反帝国主义的工作。党更应当在一切斗争中关联到青年与妇女的利益，尤其要加强纺织女工运动的工作。

15． 加紧党员军事化与群众的武装训练的组织。党应不忘记广州暴动获得了很多的武器群众不会使用的教训，所以党应从现在起加紧注意党员军事化与群众武装训练组织的工作。在工人农民和青年群众中必须经常的发展有武装训练性质的组织，如纠察队赤卫队等特别是群众的斗争当中，更应特别注意。这一任务与最后的武装暴动的总任务有莫大关系的。如果以为只要武装群众的脑筋，不要武装群众的手足，这是孟塞维克的思想，这是布尔塞维克所坚决反对的。

4 策略的路线

(十一)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在现在国民党残酷压迫而群众斗争又在开始复兴的客观条件之下，党的策略的路线是要利用一切的可能来争取公开的活动，同时要加强党的秘密工作，使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亲密的联系起来。只有利用一切机会公开的做宣传鼓动的工作，公开的组织群众，公开的号召群众的斗争，才能影响广大群众发动广大群众。同时特别注意加强党的秘密的工作——支部与党团的工作，才能更加巩固党的领导的力量。必须秘密工作的加强，才可以帮助公开工作的发展，公开工作的发展又可以使党的秘密工作易于扩大。所以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的联系是一条路线，而不是两个对立的策略。只有右倾或左倾的观念，才把他分割起来，对立起来，来比较他的相互的重要，以企图取消对立的一方面，这是绝对错误的。同时要特别注意的，是要在客观可能的条件之下以斗争来争得公开，所以公开工作的本身就包含了斗争的意义，决不是投降到国民党的法律下面去求得公开。另一方面不顾群众的情形与客观的条件，以为一开始工作便必须把党的一切根本的政治口号都摆出去，这必然要吓退群众，实际上都是取消公开工作的办法。在上海五一至五卅示威工作的过程当中，运用这一路线，的确收到了很显著的效果，证明这一路线是异常正确的。所以党以后更应坚决的来执行这一路线，才能实现夺取广大群众的任务。

(十二)为实现这些任务，党在策略上所特别遇到的困难，便是党内右倾思想的发展。这一右倾的危险绝不仅是继续着党内机会主义的残余而复活，他更有现实环境之下不可轻视的基础。自从统治阶级以白色恐怖的压迫，改良主义的欺骗，从宣传上组织上极力的向群众进攻以来，党内反映着一部分群众失败情绪与不正确的观念及小资产阶级思想。于是和平发展，合法运动的右倾思想，便一天一天地发展。在理论与现实分析上是夸大资产阶级的力量，错认资产阶级可以在美国帝国主义帮助之下争得反革命的领导权，对统治阶级内部各种不可调和的根本矛盾，予以忽视，对工农革命斗争的开始复兴与党的力量存在予以否认，甚至认为统治阶级已经走向稳定或革命高潮之来到将遥遥无期，于是表现在策略之观点上便是和平发展合法运动，降低我们的政治口号，接受资产阶级的欺骗政策，在组织的观点上便是党内和

平（这种观念是要停止我党对一切不正确倾向的斗争，这是最危险的观念）与放弃赤色工会中心组织的主张。同时党在组织上无产阶级基础的削弱，干部分子停顿在知识分子成份上，党员政治水平线之低，又都足以成为右倾思想发展的组织来源。固然我们在工农群众中间的工作必须利用一切的可能争取公开的活动。而且目前已经开始了一点成绩，但这只是非法的环境下需要一种新的工作方法来争着实现党的基本任务，决不是放弃我们原有的基本任务降低我们的政治口号去迁就客观条件以求得统治阶级不加干涉的合法存在。这后一见解根本是机会主义者的主张。这样做去，不但要成为第三党以至改组派的尾巴，并且还要推着群众走入不可挽救的改良主义的陷坑。在最后，便要完成取消派的倾向与党内以及群众中间动摇犹豫恐惧消极的观念相结合以至取消革命，取消党，与共产主义的领导和组织立于完全相反的地位。当然这不是说中国党内右倾危险已经到了他的最后的形成，已经有了一个危险的派别，但依着客观的环境与他的可能的发展前途来看，右倾的确是特别的危险，党必须站在正确的路线上坚决地斗争以克服目前党内正在发展的这一特别危险的倾向。

（十三）另一方面，党内左倾危险自六次大会后虽逐渐失去它发展的基础，但假使以为“左倾”的错误已经完全肃清，那便等于容许这左倾的残余在党内存在，于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也同样要有危害。在目前最严重的左倾危险是不愿意进行日常斗争，不承认部分要求斗争的必要，不愿意争取公开的活动，不愿加入有群众的黄色工会去争取群众，保留着些命令主义的精神，提出一些空自夸大的高调（目前实行的口号），幻想一些大的斗争来到，这都足以使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不但不能加大，且将日益缩小，故要克服党与广大劳苦群众脱离的现象，取得群众尤其是工人使其革命化，必须坚决的肃清左倾的危险。所以认为党在反对右倾的特别危险的时候，应放松对于左倾的攻击的观念，显然是不正确的。

5　党的组织问题与党内生活

（十四）依据目前的全国组织状况，可看出党的弱点极多，主要的如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削弱，与群众组织的关系不正确，这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现象。但决不能因此便忽视党的组织存在，否认党在几月来克服这些现象中的进步，假使这样，只有走入取消派的倾向，丝毫不能创造出无产阶级长期耐苦的工作精神。故党在组织上的正确路线，必须认定：（一）欲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要首先深入到产业工人群众中去，寻求积极而斗争的分子吸收入党，以改善党员的质量；（二）支部是党的基础，群众的核心，党要以建立中心的产业支部，创造支部生活，并以试办工厂小报为联系党与群众关系发动群众斗争的主要武器。（三）地方党部目前在组织上应以建立中心工作，实行党内正确的民主化，造就工人干部，注意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和分配宣传品的工作，指导党员职业化，为其重要工作。（四）上级党部应努力于政治及中心工作的指导，加紧巡视工作。（五）党与工农群众组织必须划分，两者中间不同的性质必须弄清，相互的关系必须有正确的规定。

在这里我们更应深切的认识最近国际的指示，建立产业支部及其工作与加强党的理论上武装，实成为目前组织上两个不可忽视的任务。

（十五）六次大会后，党内生活的确表现了一些新的精神（在六次大会正确路线之下工作的新精神），但因为有些同志对于决议案还不了解，致发生组织上不正确的主张。有些同志主张党内和平，有些同志主张极端民主化，破坏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有些同志发生组织的消极

观念。现在秘密条件之下，所有的敌人——帝国主义，军阀，国民党，改组派以及第三党的领袖，将我们包围得异常严密，而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又甚浓厚，我党不独应当注意政治路线的正确运用，还须注意党内铁的纪律的保障。各种不正确倾向对于党的存在都有莫大关系。不执行党的决议，就是削弱党的战斗力与党的领导。闹党内无原则的纠纷，就是妨碍党的进步。否认党的旧基础，蔑视党的组织力量，就是发展党内取消的倾向。对于不正确的倾向必须领导全党同志与之作坚决的斗争，决没有甚么党内和平。破坏党的纪律，是布尔塞维克党所绝不容许的。自然，中央以及各级党部每逢遇着不正确倾向发生时，在执行纪律以前，必须很注意于审查这些倾向，尤其要使全党同志得到正确的了解。最近党内发现了国际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小组织，这一反对派现在已成为帝国主义破坏苏联反对世界革命的工具，无疑义的在中国的反对派要同样的成为中国统治阶级反对革命破坏党的工具，所以党必须坚决的予以制裁，以巩固党的组织。

(十六)中央执行第六次大会的决议与国际六次大会决议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已经打破了许多障碍，克服了一些不正确的观念，将党从散漫无组织的状态下挽救出来了，在每一次领导工农运动之中，可以很显明的看出党的进步。中央只能在得到全党共同努力的时候，才能很实际的执行大会与国际的决议。也只有运用正确的政策，纠正一切政治上组织上策略上的错误与弱点，有系统的耐心的训练党的干部分子尤其是工人同志，发动党所有的力量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党才能执行自己的革命任务，夺取群众到革命方面来，领导他们达到胜利的暴动。

组 织 问 题 决 议 案

（一九二九年六月中共二中全会通过）

一 党的主要任务与组织路线

目前革命斗争的开展加重了党的夺取群众准备暴动的总任务

目前中国的政治局势是反革命营垒中继续不断地表现他们危机的加深。虽然他们仍然联合一致地反对中国革命，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冲突，中国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军阀战争的继续，他们不但无法避免，并且日益紧张，甚至他们所要解决的改良问题也都未解决。因此，中国工农劳苦群众的生活只有更加痛苦，群众斗争的要求只有更加迫切。现时全国的革命斗争，工人的斗争正在开始复兴，农村的土地革命运动正在逐渐开展，城市反帝运动与争自由的斗争也正在向着汇合的道路进展；凡此都使党必须担负起加强自己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与有组织地夺取群众的重大任务。党必须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从日常斗争发展到较高度的政治运动，以准备群众走向武装暴动。

六次大会指示的组织路线无疑的是正确

党在这一总的任务之前，六次大会所指示的“党应以建立产业支部，健全地方党部，发展工人群众组织为组织上主要任务，以达到党成为工人阶级自己的群众化的战斗的党的目的”，无疑的是正确。只有加紧这一任务的执行，党才能加强自己的战斗力和党的无产阶级化，才能开展党的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范围，而走向革命高潮。

二 目前党的组织状况及党内组织路线的斗争

一年来党在组织上的进步

六次大会时，党方在革命失败之后，受着巨大损丧而减低了战斗力，故当时党的涣散无组织的状态非常严重。大会后半年多的工作，党在组织上虽处境仍是非常困难，但经过党内党外不断的斗争，的确已取得了相当的进步，已将党从涣散的状态中挽救出来，并已建立了组织上的相当基础。主要的进步现象是：党员在数量上虽没有增加，但在质量上主要的城市

党员确较以前改善许多（如在上海最近的工人斗争以及五一到五卅的运动中，在香港近几月来与北方工人的斗争中，党员的活动力都见增加），主要的城市支部在群众中渐能起领导作用，创造了相当的支部生活（如上海、香港、天津的某些支部），地方党部经过整顿的地方已渐表现它的指导能力（如上海的某几区，香港和广东天津某几县等），巡视工作已渐能打入党员群众的实际中去（如上海、顺直等处），党做了许多工作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发展，党员职业化在一部分失业干部中间收到相当成效，党领导群众争公开活动的路线在上海香港已取得一些成绩（如今年的五卅与沙基惨案），一般的说来，党的削弱趋势已渐稳定，在客观上更造成党的发展的优越条件，且在组织上党已相当建立了正确的路线，工作的进行已开始懂得如何将自己的力量集中于几个重要问题上，并得到相当进步。

同时还存在组织上许多弱点与缺点

自然，这些进步在全国说来还是很少而很缓慢，决不容许我们过分估量，决不会掩盖了党的组织上的弱点和缺点。党的主要弱点是无产阶级基础还不宽广，工人党员的成份仅占全党百分之七，重工业工人中党的发展极弱，支部生活多不健全，从斗争中吸收进来的积极分子还不见多，党的干部缺乏尤其是工人干部缺乏，党员的理论水平线尚很低微，党员多不缴纳党费，大产业区域及中心城市之党的组织尚多半没能建立与恢复，农村党员中还包含有富农甚至地主的成份，农村支部多与群众混合。党在工作上的主要缺点就是：党还缺少工作的系统性，工作的进行多带偶然的性质，工作的路线及方法在有些地方党部中尚存在国共合作时代的机会主义残余，少有用方法来肃清工作上的缺点，少有建立系统的监督来保证组织路线的巩固，党的中心领导还不巩固，且对于党的秘密工作尤不懂得需要经常地有系统地注意，致常常因一隅之事失败影响到整个党的安全与发展。在这些党的弱点中间，特别是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薄弱，党员理论水平线低微，机会主义及盲动主义尚有残留，工人干部缺乏，很容易助长目前党内各种不正确政治思想的发展尤其是右倾思想的发展。

但因为这些组织上弱点缺点之存在，乃更不容许全党忽视另一方面的进步，因为这一些进步正是消灭和肃清党在组织上弱点和缺点之基点。全党应针对着这一进步基点，长期耐苦地向前工作，走上组织上更健全更发展的道路，以巩固党的更正确的组织路线，以根本肃清党内各种不正确政治思想尤其是右倾思想的组织基础，以加强党的布尔塞维克化。

党需要坚决地肃清党内不正确的组织观念

在目前党的生活中，有几种极不正确的组织观念，需要全党坚决地予以肃清。

第一是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六次大会后党内对于反命令主义委派制度的误解，对于党内民主化未能正确地运用，致引起了在组织上各种不同的非布尔塞维克化的倾向。有些同志不顾党的主观条件如何，不顾党的秘密存在与严厉的白色恐怖，要求无条件的实行党内民主化，甚至常借此反对指导机关的决议和指示，闹党内纠纷问题，削弱指导机关的威权，形成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有许多不觉悟而且大多是有害于党的分子，更提出了“党内极端平等，绝对自由”的口号。怀着这种观念的同志不懂得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更不懂得在目前党内无产阶级基础削弱的条件下，加以客观上白色恐怖的严重，党内民主化的执行限度是应当有

条件的，同时党在各地必须实行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最高机关的决议，下级机关应当无疑地执行。在必需的时候下级党部的委员与书记，上级党部可以指派。一方面民主集中，一方面逐渐实行党内民主，并且要加强党的理论教育，才能帮助党争取广大的劳苦群众在党的周围。

第二是取消主义的发展。在党的组织时受损失的现象中，在工作环境的艰难困苦中，党内取消观念正在从各方面表现，如怀疑甚至否认目前组织上进步的现象，以为党已一无所有，否认党的旧基础的作用，否认指导机关的指导作用，常采取对立状态，否认赤色工会在群众组织中的中心任务，甚至否认中国党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斗争的过程中生长的历史。这些取消观念的发展，一方面可走入否认组织极端自由的无政府思想，一方面必然要与合法运动公开主义相结合，而助长党内右倾思想的发展。

第三是形式主义的残留，与取消主义对立的便是形式主义的残留。委派制度的存在（特别是对于赤色工农会），命令主义的遗毒，机关主义的工作方式，都是帮助形式主义在各方面的残留。自然，在组织上还因脱离群众的现象犹未消灭，形式主义常伴着官僚主义的倾向，在秘密党的条件之下存在。这最足以障碍党的争取群众的任务。

第四是党内和平观念。在目前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发展的过程中，只有站在六次大会的精神之下，为正确的路线与一切的偏向斗争到底，才能克服不断发生的党内不正确的倾向，才能创造出布尔塞维克党的生活。但党内有些同志根本就认不清党的正确路线，便畏惧这种斗争，以为欲免除党内纠纷便须号召党内和平。这种倾向的发展，只能使党的正确路线更加模糊，党内政治认识更加低落，党的组织更加分裂，决不能助长党的进步，因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与劳苦群众斗争的先锋队，根本上必须与一切党内不正确的倾向斗争。党对于一切反布尔塞维克的倾向，不能稍事妥协与让步，断无所谓党内和平。只有与一切不正确的倾向毫不妥协的斗争，才能提高党员的政治水平线，保障党的路线得以正确地执行，以求得党的巩固和一致。还有同志以为在党干部缺乏的今日，全党应和气的合作才能保全干部。殊不知党的干部固应注意于保全，但是要在党的正确路线之下一致努力和不断的斗争中来求保全，决不是无原则地所谓和气合作所能保全，且尤其重要的还是要从群众中不断地吸收新的斗争分子入党，以加强党的干部，以推动党的前进。否则只拘于保全干部，甚至干部的观念错误也放任他不予以纠正，则必然要使党的改造停顿而不能前进，必然要使党的前途日趋于削弱而不能发展。同样，以为犯了错误的干部便要不得而不去教育，也是另一极端的错误。

这种种不正确的组织观念在党内存在，很显明地党还没能完全走上布尔塞维克的组织路线，需要党坚决的肃清这些不正确的组织观点——亦即孟塞维克（少数派）的组织观点，然后党才能取得更进步更巩固的发展。在这一工作路线上，党首先要注意到坚强党的中心领导，建立党的组织理论，使全体党员艰难耐苦地在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上为党的一致而斗争，以肃清党内一切不正确的组织观点。

三　党内主要的组织任务

为要针对着目前党在组织上一些进步而求发展，为要消灭党在组织现象中的弱点与工作上的缺点，为要肃清各种不正确的组织观念，中国党的组织任务要集中在下列几个主要的问题上：

深入重要产业工人群众中去，注重党员质量的发展

（一）关于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共产党欲扩大自己的无产阶级基础，只有首先深入到产业工人群众中去以改变党员的成份，也只有当着它的基础建筑在工业无产阶级的时候，它才有力量。中国党在六次大会的时候仅只有百分之十的工人党员，现在更缩小到百分之七，而农民党员又极其增减无定，欲使这种现象不再继续，党必须集中力量走向大工业中，尤其重要的是铁路、海员、矿山、金属业、兵工厂、市政、纺织业（要特别注意大多数的女工）中，在那里巩固我党的组织。过去在这些产业中的党的组织，多部分不能使人满意。虽然在这个路线上的工作是比较困难，是要比在手工业者农民中间的工作困难得多，但无论如何党都应与这种困难奋斗，必须使党的发展向着工业无产阶级，使无产阶级分子成为党的基础。

在目前工作困难的环境下，党更要重在质量的发展。只有最觉悟最积极最勇敢的斗争分子被吸收到党里来，才能担负起目前党的严重任务。改善质量的主要条件在成份，但在工人群众中，也不应将所有的革命群众看着是党员。吸收党员的主要条件：要有坚强的阶级觉悟、政治认识，能在党的支部中工作，是斗争中的积极分子，最好有社会职业或要有决心向社会中求工作出路的人。

在产业工人群众中发展党员不要经过候补期，主要的要打入重要部门。一个产业支部的党员，并不必求数量如何的多，而应要每一个党员都能在群众中起领导作用，都是积极工作的分子。庞大而不实，不如质量精悍的支部便于作战，于革命的发展更有作用。但这不是说对于没有力量的支部，就要将它取消，相反的，正要我们加紧努力，使它渐次成为有力的支部。

广大的农民要求入党，不是用拒绝的方法选择质量，而是应从积极方面，将党与农民的组织分清，将党的组织严密起来，使广大的群众容纳在农会方面，党从中吸收积极的雇农贫农分子，建立乡村中党的发展基础。同时要巩固党在乡村中无产阶级的核心作用。在一般原则上党要防止富农分子的加入，知识分子党员一般失业的恐慌，只有向社会中工厂中求生活出路，才能振起战斗的精神和决心。且这些同志如不能从积极工作、积极斗争中找革命出路，必致要发生动摇消极怠工以至落伍而分化出党的现象。当然党不应该否认知识分子党员在党内的积极作用，但知识分子入党，必须从斗争中选择，必定要有较长的候补期。

改造旧基础与发展新基础要同时并进

党内有些同志因否认党的旧基础在改造过程中的作用，而烦闷没有出路，或想超过旧基础去建立工作。诚然在旧基础上求改造是一件极艰苦的工作，但如果忽视它，想超过它去求改造，便连新基础也建立不起。因为旧基础要不是整个腐烂了，脱离了党，它必可因其历史上存在的斗争经验与社会关系而帮助党的改造进步，反之，若放着它不去改造，而只去建立新基础，它便要在同一环境中发生其社会的历史的关系，妨碍着新基础的发展。不过如停顿在旧基础上，只讲改造，而不发展新基础以促进这一改造，则改造工作亦根本做不成功。故改造旧基础与发展新基础当同时并进，并须以发展群众斗争推动日常工作为这一工作的联系。

发展产业支部，建立中心支部与创造支部生活

(二)关于支部生活。支部是党的基础，群众组织的核心。党在产业机关中的工作，应建立在党的产业支部上，党应尽力发展并巩固产业支部使它成为党的组织基础。中国党的产业支部在数量上还是很少，除上海、香港、津、唐外多是很零碎的；有支部生活的居少数，大多数只做传达指导机关的决议以及起一部分的宣传作用，一切问题多不在支部中讨论，由地方党部代为决定甚至代为执行，因此它的工作便不是领导群众的而是脱离群众的。故党在支部中，尤其在产业支部中，要有中心支部的建立以创造健全的支部生活。重要的产业支部工作如能作起，它必然会影响到其他支部而起中心支部的作用。

支部的成份必须是群众中最勇敢最先进的分子。支部干事或书记必须是群众中选出来最积极而有威信的同志。支部本身要有严密的组织，要有日常生活，要能经常开会，要讨论党内一切政治问题，要分配每一个同志工作，要有系统的训练同志，要交换同志间的工作经验，要有计划的领导群众一切斗争和宣传组织群众，要能建立起群众中的中心工作。要在群众中有日常的活动，要在中心支部中建立工厂小报。支部的日常活动，要与党的一般政治任务相联系。支部指导机关要在关于工作的加紧，决议及工作计划的完成，出版品的改善以及保持支部的观点上准备党所领导的斗争与行动。支部在群众中只能起党团作用，切忌代替了群众组织。支部机关及负责人员，要切守保持严密的原则，不可向群众公开。

农村支部要特别注意于中心分子的训练，以树立党在乡村中的中心。

党员要从支部生活中为党工作

每个党员必须为党工作，但为党工作的意义决不是如一些同志所误解的，以为只有在党内机关中工作的才算为党工作，或甚至以为领党生活费的才算为党工作。党员为党工作的起码条件，要从支部生活中建立起来。每一党员在支部中必须：一、经常地到支部会；二、按月缴党费；三、讨论党的政策及本身日常工作；四、参加群众斗争并指导斗争；五、读党报；六、分配宣传品给群众；七、介绍同志；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党员在党内的生活，才能紧严起党员在支部中的生活。

健全地方党部与建立中心区域中心工作

(三)关于地方党部。为集中力量以巩固并发展产业支部的工作起见，党应注意地方党部的工作（县市区委等）。地方党部的主要责任是要使党员的努力不是散漫而无指导的，不是人自为战的，要有组织地有计划地集中到几个革命斗争主要问题上，并使着当地工作与党的一般任务联系起来，但地方党部不是直接指导每一个党员去做工作。特别是支部工作方在开始的时候，若没有地方党部的帮助，则支部的工作决不会做好的，因为必要使每个支部的工作与党之一般工作发生联系，而不只限于本部（工厂街道部分的）以内的利益，这正是地方党部的根本任务，故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口号，必须经过地方党部的推动与指导，才能逐渐的建立起来，决不是放任支部由其乱干或简直不干，这与地方党部代替支〔部〕是一样的错误。

地方党部是建立党的正确组织路线的枢纽。现在各地的地方党部多没有建立在城市中，除掉很少的工业城市外，地方党部仍多避免在乡村里。现时在全中国工商业政治军事中心的城市有党的组织的不及半数。各县的工作中心必须从乡村中移转到城市中来，党必须注意于中心城市的工作，党必须认定地方党部是建立中心区域中心工作的组织基础。中心城市的中心工作做起，必能影响其他区域其他工作。地方党部在工作上必须注意于铁路、海员、矿山、金属业、市政、纺织业等的工运重要口岸的反帝运动，沿铁路大河及附郊的农运，主要部队的兵运以及苏维埃区域的发展等，在组织上党应集中人力财力到中心地方党部去推动工作。关于中心区域中心工作的建立，必须有一较长时期的工作计划，并以长期的艰难耐苦的精神去工作，才能将工作树立起来，在最近期内党的中央应加紧对于全国某些中心区域中心工作的恢复与建立，特别是对于武汉广州与全国的海员、矿山，在苏维埃区域的地方党部应力求党的发展平衡与扩大到附近的白色区域中去。

考查并加强地方党部的工作

现在中国党面前——特别在中央省委面前之一个最主要的组织任务，就是要很快的考查各地方党部的工作：是否各地方党部都有实际指导当地日常工作的能力，在各地是否所有的党员都加入支部，是否经过支部使所有的党员都被吸收于党的工作之中，各地工作是否集中于几个革命斗争的问题上，是否与中国党之一般的政治任务有所联系？

考查地方党部工作之基本问题，就是关于地方委员会之工作能力问题与如何加强问题。决定地方工作委员会能力之最主要的条件有以下的几点：

(一)委员会的成份应当是当地党员中最有威望、最有信仰的同志与工农群众有关系的分子。

(二)假使在当地党部之下有工厂支部，则该委员会，应当有当地大工厂支部之有威望的代表加入。

(三)地方委员会应当与地方支部发生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应当是这样：地方党部根本上必须知道，劳动群众生活上政治的经济的条件如何，当着有了事变发生以后，支部应当立刻报告地方委员会，而地方委员会应当很快的指示支部以应付这件事变的方针。另一方面地方委员会接到了上级机关的指导以后应当立刻的将这种指导传达到支部中去，应当帮助支部怎样在具体工作中使着这种指导得以实行。

(四)地方党部还应当经过自己的党团与当地的群众组织（工会农会学生会等）发生密切的联系，地方委员会应当负责在这所有的群众中，都建立起共产党的党团要有系统的指导党团中的工作，树立党在这些群众中的影响。

(五)地方委员会应当注意群众组织中之党团的工作与当地各支部之日常的工作发生联系。一方面党团之日常工作，应当建立在支部的工作上；另一方面支部在某个群众组织中，应在党的口号之下，进行组织群众的工作。

(六)地方委员会在自己的日常工作中，应当审查自己计划及上级机关指导执行的程度，应当使当地的党部，有共产党章中所有规定的铁的纪律。

(七)地方党部应有系统向上级机关及在党员群众前报告自己的工作，支部干事会或书记亦应经常不断的向地方党部及党员群众作报告，以增加党员群众的对党的政策讨论的兴趣和

执行的决心。

(八)一般工作无出路而失却生活战斗力的失业党员，地方党部应指导其深入群众寻找职业，从社会中找工作出路，并谋得生活解决。

(九)在现在的条件之下，地方党部应当对于所有的党员军事训练加以很大的注意，同样的对于为苏维埃政权而战的工农群众，武装斗争的准备也须加于极大的注意。

(十)党员与党失了联络，在革命失败白色恐怖严重的区域是很难免的现象。但这些党员在失去了联络许久之后，要求恢复关系必须有工作上的表现，有党员的证明，经过所在地的地方党部考察后，才能发生组织关系。方恢复关系的党员主要的要得到支部生活的训练和考察，非万分必要和可靠时各级党部不应立即分配其做党的内部工作，尤其是机关工作。

(十一)地方党部应坚决的执行党员缴纳党费的督促与收集的责任。地方党部的经费要逐渐都作到自给，他不仅应依赖于党员的党费，并可在可能的环境下向群众中举行同情者的募捐运动。

(十二)地方党部委员会的内部应有正确的分工与集体的指导。

建立正确的党内民主化

(四)关于党内民主化。在目前党内无产阶级基础削弱的条件下，加以客观上白色恐怖极其严重，党内民主化的执行限度是应当有条件的。但这种条件决不是妨害了党内正确的民主化生活，而是要更适合于秘密条件下的民主化，以加强党内政治生活，以巩固党的领导力量。譬如政治问题要直接到支部中去讨论，而许多事务问题便须集中更灵敏地到指导机关去决定。一个问题的讨论，在集会不可能的环境中便可由书面或个别谈话来讨论。且民主集中制也不是对立的，是党内生活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化。故政治讨论直达支部，上级机关须在正确指导之下作报告做结论，并须指导其与日常工作及党的一般政策相联系。党内的政治争论须有原则有范围的，不是漫无限制的自由论战，更不是离开实际离开策略的学院派的研究。目前党内政治清谈的倾向必须予以纠正。在目前党内成份与环境中选举指导机关，更须有指导的选举，而上级党部指定的办法也还需要。民主化的正确运用，地方党部成为最主要的枢纽，因为党的政策能达到支部，民主选举能自支部作起，必须有强健的地方党部才能有适宜而正确的指导。

要以正确路线纠正非无产阶级意识

关于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发展，各级党部必须以正确的路线来纠正，来与之作坚决的斗争。肃清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主要方法，是加紧党内民主化，提高党内政治生活。在非无产阶级意识的发展中，首先要反对党内小组织倾向与派别观念，因为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活动，近已侵入中国党内，它在目前中国党内理论水平低微与党历史纠纷尚有残余的条件下，很有可能与党内一般落后的、消极的、离开工作、不满意指导机关的党员相结合，以助长党内小组织倾向与派别观念的暂时发展，而形成中国党的反对派。这一方面需要党在政治上说明反对派理论上非布尔塞维克的观点，指出反对派在国际上反革命的罪状；另一方面需要全党在正确的政治路线上为党的一致斗争，坚决的反对任何小组织倾向、派别观念、以至反对派

的分裂党的运动，在组织上严格地肃清反对派在党内的领袖的活动分子，并从工作上斗争上克服党内一部分落后的消极的党员之种种不正确倾向的发展。党内小资产阶级意气之争，党亦须从站在党的正确路线上实行政治上的自我批评入手，以求根本肃清。健全地方党部，建立支部生活，更从积极工作上去打破党内不要组织、取消主义、个人拼命等等不正确的倾向。党的经费来源，亦要做到建立在党员的党费与群众援助上，以便从根本上打破经济平等、雇佣革命的观念，消灭乡村中脱离群众的筹款方法等等。

坚强党的纪律以巩固党的组织

党内因为对说服群众运用的误解，常常影响到党的铁的纪律的执行。有些不努力实际工作而专尚政治清谈的党员，常常不依照组织路线，在党内群众中间散布一些不同的政治见解与主张而妨害党的一致。有许多下级党部，更是纪律涣散。党员的言论行动，在平常非常自由，不受任何的拘束，有错误时亦受不到任何教育与制裁；等到发生退党与反党的事实，指导机关不是执行躲避他的方法，便是要求执行非常手段的制裁；在有些苏维埃区域，甚至以非常手段看做普通纪律，以造成党内的恐怖空气，这实是很严重的错误。嗣后各级党部应严厉禁止此种行动。如发现有党员反动，应提交中央处理。各级党部在目前的工作条件下，坚强铁的纪律特别必要，但同时应该了解所谓坚强铁的纪律，并不是机械的去执行。共产党之纪律，首先要建筑在每个党员对于自己的责任的自觉上。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只有组织好了，才能得到胜利，没有坚强的纪律，不会有好的组织。工人组织中之纪律的必要条件，就是少数服从多数，每个党员都服从指导机关的命令。

党的组织内应当有坚强的内部纪律，但党应当计算到对于错误的事，谁也不能保险，错误是在实际工作中不可免的东西。党内有集体的指导与向党员群众作有系统的报告，是防卫和很快地纠正错误之最好方法。对于未执行上级党部指导的办法，也应如此。只有集体指导与党的工作中一切主要问题有系统的在下级组织讨论，才能很快的发现未执行决议和通告的事。如果有意地不执行或曲解指导机关的决议和计划时，则上级机关应详加研究，并采取相当的制裁。有了经常的教育方法与组织上的制裁，党员的行动言论才能得以约束，有了错误才能得以纠正，退党和反党的事也才能从积极方面得以减少。至非常手段的制裁，绝对的禁止成为党的一般纪律。党要坚决的肃清有些地方党部的党内恐怖空气，因为这与党的夺取广大群众的路线，是立于完全相反的地位。

密切各级党部的关系与加紧巡视工作

（五）关于省委组织与巡视工作。关于省委这一级组织工作，目前应以缩小机关，多努力于政治及中心工作指导，加紧巡视工作为中心问题；而建立中心产业支部，考察并加强地方党部，加紧巡视工作，是目前各省委在组织路线上的主要任务。

省委对于其所管辖的区域，应有一个全局的布置，应有经常的工作计划。在全省的中心区域中心工作上应集中人力财力去谋发展。关于中心工作的讨论和注意，应成为省委日常工作中主要的议题。省委对于所在地或主要区域的重要斗争应亲身或派人去指导，并利用这种经验和斗争方法教育全省党部。在目前党的幼稚状况下，省委对于地方党部的指导，要带有

充分教育性。省委本身的组织，要有候补制，要相当分工，要能集体指导，要建立自己的组织和宣传工作。省委要不断的参加所在地的主要工厂支部，了解下级和群众实际情形，考察工作并指示以正确的策略和工作方法，以帮助地方党部去建立中心支部。

巡视工作是目前密切各级党部关系加强政治指导的主要方法。中心县委和特委应经常派人巡视其所指导的各县及重要区委支部；省委应经常有人巡视各特委各中心县委及重要地方党部与支部；中央应经常有人巡视各省，直接检阅地方工作。巡视工作的主要条件：考察并了解下级党部与群众间的实际情形，传达上级党部的决议和指示，与当地党部共同决定目前的工作计划，帮助并指导当地党的工作和主要斗争。巡视员要是各级党部中有能力而积极的，政治认识较清楚的分子充当。各级党部要建立经常的巡视会议。各级党部间的交通网应有严密的灵敏的组织，传达文件以帮助巡视工作之不足，地方党部彼此间的关系，上级机关应予以联络上的帮助。

党应当帮助青年团发展工作看作自己的任务

(六)关于党与青年团的关系。过去党与团的关系不好，主要的关键在党没有(把)团的工作团的发展看着是自己的工作的一部，故党对于团的指导和帮助常不列入党的经常工作之内，甚至对团存取消观念，在有党团纠纷的地方，党对团的指导和批评，亦常采取对立的状态，以至影响团对党的态度，亦常常是对立的。在组织上和工作上，团固然是独立的，但他在总的任务上终是夺取广大的青年工农群众在党的周围和党的口号之下的一种组织。然而他又决不是工会农会，同样是无产级阶先锋队中的青年组织，是党的后备军，故党必须将帮助团发展工作看做是自己的任务。

党与团的各级委员会中须互派其有代表决议的代表出席。为帮助团的日常工作起见，团的所有工厂支部必须有一该工厂的党员参加，党除给团以政治上的指导外，并应予以物质上的帮助。在党没有组织的地方，团得自己发展到成年群众中去，但其政治活动必须依据上级党部的政治路线，同时须介绍团员的积极分子入党，以成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团应介绍其成年或非成年的积极分子入党，给党以干部人才，同时党应顾及团的工作，不应将团的得力党员调得太多，致减弱了团的指导力量，党更应经常的指导兼团党员，经过他们在青年团中发挥政治指导上的影响。

四　秘密党的组织原则

党应严重注意秘密工作

两年来的白色恐怖与敌人进攻，总是日益加厉，并且是组织有计划的进行破获我党机关消灭党员肉体工作，但党从半公开转到地下，对于秘密党在组织上和工作方法上都没有严密健全，致各级党部常常招受可以避免的破获。大会后半年，许多地方的工作在主观上客观上都有了不少进步，只因为秘密工作之忽视与不健全常受着很大的损失，致影响好多时候的工作或组织上一时的中断，故党的秘密工作，实成为目前很严重的问题.党内忽视秘密工作的浪漫习惯，党应认为客观上是帮助敌人，应受严重的处分，同时党应坚决地纠正并防止躲避主义

的个人秘密与脱离群众的现象。

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应有好的联系

在白色恐怖厉行之下，中国党只能极端秘密地存在，党的指导机关当然要非常秘密，就是党的下级组织（支部、职工会中的党团等）现在也是在秘密条件之下工作。另一方面，党所准备的武装暴动，要不能吸收工农主要群众，将归于无望，所以需要党对这些积极准备工作并争群众的公开活动。同时在工作中严守最秘密的规例，建立起自己的秘密机关，安置与侦探以及奸细斗争的方法等。但是在这工作方向之中，党不应当一刻忘记党的机关和党的一切组织的主要作用，是在能帮助党钻进群众去，争取公开活动的机会，和在党的口号之下把他们组织起来作革命的斗争，党应站在巩固与扩大工农群众运动联系的观点上，去建设适合于白色恐怖之下的工作机关，应使这些机关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加强与工农群众的联系，以便有系统的准备工农群众走向革命的发动，而不仅是党员和同情者狭小范围的人去作革命的发动，故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应有密切的联系。

党可以建立内部很复杂的而且比较难于发现的很好秘密组织，其中有各种配置，但是这种组织无论各方面怎样周到，如果与工农群众没有经常联系，则便不是一个真共产党的组织，也不会组织成工农群众胜利的发动，至多不过能够组织成好的军事冒险而已，这种军事冒险与目前的一切任务完全没有共同之点。

党要从深入群众中去消灭党员自首叛变的现象

党员的自首叛变，是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薄弱，支部生活不健全，党内政治教育缺乏，党员阶级意识模糊，以及机会主义残余的存在致经不起严重的白色恐怖与利诱而破裂出来的现象，这种现象在两湖过去最为严重，最近且蔓延到下江流域及北方各地。但过去只注意消极的对于很少数自首叛变分子，执行非常的手段裁制，这是很不够的，党应当从积极方面阻止这一现象的发生，只有坚守深入产业工人群众中去的路线，从群众生活群众斗争中创造党的支部生活，加强党的政治教育，锻炼党员的阶级意识和革命信仰，增高党员的政治水平，指示党员找工作的出路与为党正确斗争，以不断地改造党，使党真能生长到群众去而不是架空脱离群众的组织，同时再加紧对于秘密工作的建立与对于秘密条件的绝对遵守，然后才足以根本消灭这一自首叛变的现象。

另外，每一个党员都必须注意：任何一个党员，在他被敌人捕去后，不管是有无证据，他对于革命对于党对于无产阶级唯一的忠诚与责任，便是：**不供出任何党务，不承认任何关系，不指出任何同志。**

五　工厂报纸与地方党部的出版品

建立工厂小报与发行分配工作

第六次大会以为欧洲各国通行的工厂小报与工厂小传单，是秘密的党与广大群众发生联

系的有效方法之一。中国党过去和现在对于向群众中散发传单及标语，作了很大的工作，这种工作应当尽量地继续发展和巩固。除党的中央机关所发行的传单标语外，工厂支部、小城市的县委、乡村支部等的下级组织，必须发行同样性质的印刷品。工厂支部与乡村支部所发行的传单标语，当然在质量上（内容与外表）没有党的上级组织发行的那样好，而这些地方的工厂的党的报纸，虽然又有许多弱点，但对于广大群众的鼓动影响，则比较由中央机关送来的技术上做的很好的宣言和报纸，还要深刻得多，因为他们能够说到工农群众特别接近和特别了解的问题。党的这种鼓动工作形式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在这些宣言和工厂报纸帮助之下，使工厂支部比较能够容易地钻进那些工人群众里面去，在宣传作用上它是联系群众日常斗争到我们政治口号之下的一个主要环子。工厂小报的开始建立，必须得到地方党部的帮助，并可成为创造支部生活的一个有力工具。

在秘密党的条件下，欲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发行分配工作特别重要，决不应将它看着是技术工作。发行分配工作的中心在地方党部，因地方党部如果不将分配工作做好，中央省委便是能将各种刊物送达地方党部，仍然不能影响到群众。地方党部应经常地有计划地督促考查各支部党员关于宣传品分配的工作情形，并报告给上级党部。自然，宣传品的内容与格式也颇与发行分配工作有关，故各级党部对于群众刊物的编印，必须注意于内容的通俗与格式之便于携带。

六　关于干部的工人化

党应坚决的执行引进工人干部的路线

中国党自八七会议以后，对于引进工人积极分子到党的指导机关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党应从工人中造成干部人材的任务，不要看成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宣传工作，而要看成是一个为改良自己指导之长期的坚决的有系统的工作。在这件事上，党内的任何动摇是不容许的，且不应有丝毫的迟疑。

被吸收到指导机关的工人同志们，必须担任一定部分的工作，对这种工作要实行负责，不应使他们与指导机关的真正日常工作隔离，而只是来参加委员会的很少会议，甚至只是形式上的陪衬。

党在继续这种工作当中，同时应纠正有些党部的组织对于这一问题的曲解，曲解到对非工人出身的同志，一定担任不好指导工作，这是完全不对的。如以为每个知识分子一定要做出错误，而每个工人一定具有正确的布尔塞维克的路线的观念，也是不对的。考察一个党员，应该以其政治认识、纪律性及对工人阶级利益的牺牲性为标准，此外还要加上他与广大工农群众的联系，他在这些群众中的威信和影响，以及指导群众的能力等标准。

此后党内的干部分子都应有系统的从支部中训练出来，有计划地从工作中斗争中训练出来，而地方党部更应成为干部分子直接的训练机关。各级党部开办训练班时，必须由地方党部中选拔人材。

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工作

为要提高党内的理论水平，为要加紧对于干部的训练，党首先应加强党内的理论基础，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工作应从支部中做起。马克思列宁主义愈能通俗化，愈能使其理论和原则在群众日常生活和斗争中得到根本的认识和了解。地方党部对于这一任务的指导，要特别努力。同样，党的对外宣传，也要使党的政治口号与群众的日常斗争相联系，从实际行动上证明党的政纲、党的政治口号一般的适用。

七　党在群众中的组织任务

在党的组织问题中对于工农群众组织中的工作，应加以最严重的注意，首先就应注意对工会和农会中的工作。

近半年来，中国党与群众组织的关系及其在群众组织中的工作，在几个主要城市（上海、香港、天津）与某些乡村（广东的东江、琼崖，湖南的平浏，赣南、闽西等地）中已有了一些改善，但就一般的说来，党的面前仍放着这两个非常严重的任务。一个是如何确定党与群众组织的关系。一个是群众组织如何争取公开活动。

党与群众组织应建立正确关系

党是党，工农群众组织是工农群众组织，两者中间有显然不同的界限。党所需要的党员，的确是群众斗争中积极能为革命工作的先锋分子；而工农群众组织则本身既是广大群众的阶级组织，尤其是在目前这一严重压迫之下，革命的工农会决不容许合法公开的存在，黄色御用的组织更到处来吸引群众，欺骗群众，而群众自发斗争的开始复兴，处处表现需要组织的领导，故现在的工农群众只要知道阶级的团结，要为本身谋利益，我们必须吸引他们到革命的工农会中来。革命的工农会，也只有在吸收广大的群众到自己的组织以内，才能更易于领导群众斗争，才能更易于揭破黄色组织的欺骗群众的罪恶。因此革命的工农会尤其是工会，必须打破现时退缩到党的范围以内的秘密状态，必须利用各种合法半合法的形式，争取公开的自由，以吸收更广大的群众。先锋队的党可以在群众组织中起核心作用，以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和领导，而群众的组织则须直接接触群众，吸引群众，发动群众，然后才能尽其组织的作用。这两者中间的性质既然有别，故它们中间的关系亦须于此处确定，即是说党不能以任何命令形式直接指导群众组织，只能经过它的党团起领导作用。党可在群众组织中吸收最觉悟的分子入党，而群众组织则应发展在党的范围以外。每一党员在其生产部门，必须加入其所在之工农会；在斗争的实际上，党员更不仅是群众中的战斗员，且必须是群众中的先锋分子。

争取赤色工会公开的活动

在目前政治阶段中，凡是带有斗争性质的工人团体都要被禁止，要被迫着秘密起来。因

此利用或创造一切合法的或半合法的团体，例如"体育会""读书班""俱乐部""疾病失业婚丧互助会"等在他们的掩护之下工作，发展群众斗争，加强党的政治影响，以加重工会的作用而生长到赤色工会组织，并力争工会公开存在，"这是我们在目前中国革命之阶段中最主要的实际任务"。我们是为革命斗争争得工会公开存在，以便利它的活动和发展，但绝不是公开主义，因为在现在革命阶段中，只有从斗争中才能争得公开机会，且必然要受压迫，所以要不断的斗争，反抗不断的压迫，一直走向革命高潮。同样我们是要掩藏在合法半合法形式之下，去进行我们组织工人群众的中心任务——赤色工会的工作；因为只有这样，赤色工会才能在工人群众中得有组织和领导的更大作用，否则只有日益限于赤色工会的秘密形式之内，永不能得到公开的活动机会，永不能吸引广大的群众到自己组织以内，但这种利用或创造合法半合法形式的组织只是为的掩藏，决不能降低我们政治主张，避免群众的斗争，以迁就统治阶级所批准许可的合法存在，如这样做，便将成为机会主义的合法运动观点！

党在工会中的组织任务

在上述的组织路线上，党在工会中最具体的组织任务有如下几点：

(一)在所有的工人阶级的组织中，组织党团，在当地党部有系统的指导之下工作。

(二)使党的工会工作的中心，移到最主要的工业部门和大企业内。

(三)在党的支部与日常斗争的基础上，团结在支部周围，同情于党的无产阶级群众及工会中积极分子，都去参加工厂委员会的斗争组织，这是工会工作中最适宜最主要的组织形式。

(四)凡是有群众有下层组织的黄色工会，党必须有组织的加入活动，以支部起党团的作用，并团结群众中中心分子，目的在逐渐的取得领导，改变工会性质为赤色，而不是做少数对抗运动。

党应使农会成为广大群众组织，以贫农雇农做中心

在农民中对党的信仰愈高，愈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农民群众中的领导地位，但同时必须使农民认识自己群众的组织，一切斗争必须经过农会的领导，党只能从中起党团作用。有时在斗争发展的区域，党可以有公开代表在农民群众组织中活动，但他亦只能用建议提议的方式去工作，绝对不应以党的名义，用命令方式来指导工作，而党的组织无论在什么时地，都应保持严密的状态。斗争中心在农会，然后党才可能经过他们吸收农民中勇敢积极在斗争中能起领导作用的分子入党，以坚强党的组织。农会的组织成份应以贫农雇农做中心，在原则上要反对富农加入农会。当着有些地方富农还停留在农会中时，我们应号召雇农贫农领导中农与之作坚决斗争，以肃清其出会。假使富农占多数的农会，则我们便应无疑地号召雇农贫农领导中农组织自己的农会，以反对富农的农会。更主要的，我们必须领导雇农组织自己的独立系统的组织，以树立无产阶级在乡村中的基础。

党不仅应加入且应创造城市贫民组织，领导其走向革命方面

自革命失败以来，党与城市下层小资产阶级的组织逐渐隔断，于是一切城市贫民争自由

的斗争，我们多不能参加，尤其是半年来城市贫民的反日运动，我们简直与之无关。这种现象的来源有二：一种是观念上的错误，以为凡是在贫民争自由及反帝运动中，只有等工人阶级加入，才能树立起无产阶级领导。固然，一切贫民运动我们必须用极大力量领导工人群众乃至工人组织加入活动，起强固的领导作用，引之走向革命方面，但即使这一工作一时不易作起，亦必须极力设法打入城市下层小资产阶级组织里，经过这种组织从中活动以起党的领导作用。另一种来源便是组织上的弱点。党不但在工会中的关系不强，即在城市下层小资产阶级的群众组织中的关系亦几至绝缘(除了上海北京几处有学生会的关系外)。故目前党的组织任务，对于城市下层小资产阶级的群众组织，不但应加入活动，而且应创造这些组织，以领导广大贫民群众尤其是学生走向革命方面，特别是对于反帝运动、争自由斗争的群众组织。假使这些组织已为敌人所领导，更应打入揭破其阴谋，推翻其领导。

党应当将青年妇女工作看成党的一般任务

党应帮助青年团在青年工农贫民群众中工作，并给以工作发展的机会。在工农会中是尽可能地领导青年工农参加各级指导机关及各部工作。在工农群众中，青年的单独组织，如体育队、童子团以及乡村的少年先锋队均应隶属于工会或农会指导之下。在工会中可成立青工部与青工小组，在农会中成立青农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和中国本国的工业之发展，年年使许多妇女群众加入生产。在纺织业和轻工业中，女工几占全体工人之半数。女工一方面是低廉的劳动力，另一方面是不大好闹事的分子。在许多工厂中女工虽占半数，但党内女同志的数量则占极少，到现在还极少女同志的干部参加指导机关。乡村里，农妇在斗争中的地位和影响亦渐扩大。因此，党必须在妇女中工作，必须吸收工厂里之最觉悟的女工到自己的队伍里来，必须引进得力的女同志干部到各级指导机关担任相当工作。在工农会的各级指导机关中，要有积极的女工农妇参加，在这里边组织妇女运动委员会调查和计划妇女工作，并应有妇女到各部工作。于必要时，工农会的妇委得召集定期的妇女会议讨论一切工作，但非经常的组织，因为这种妇女会议只是一种非经常的运动，帮助工会农会去教育鼓动女工农妇到阶级斗争的队伍里来。

加紧党在反革命军队中的工作

在中国维持秩序的帝国主义军队兵舰中，很多工人分子以及失业工人分子，以至被压迫的有色民族。固然这些分子尚很多囿于民族观念，不了解整个世界的阶级团结，常有仇视和虐待中国工人农民的事实，但正因如此，中国党必须用很大力量在帝国主义的军队中经常而有系统的去做革命工作，吸收帝国主义军队兵舰的士兵加入革命，并破坏帝国主义的军队。在这里首先要做的是宣传和鼓动的工作。各级党部所在地，如有帝国主义军队兵舰的驻泊，必须发传单标语给其士兵，说明他们的作用是在为帝国主义所奴役以压迫屠杀中国工农劳苦群众。这种工作首先要征调革命的青年学生参加，以便易于走入与他们接触的团体如青年会等地方中去。

在中国军阀军队中工作，更是党的重要任务。中国军阀军队的士兵大多数是无地或失地的农民，很少数是失业工人。这些分子自然是反对军阀的，但因为有了军纪的镇压和缺少我们有

系统的工作，所以屈服于军阀统治之下，转成为军阀压迫革命的唯一利器。全党及每个地方党部必须将在军阀军队中工作看做党的一般任务，而不是各级军委的专门任务。或是传单宣言，或是口头鼓动，每个支部每个党员都可从事这一工作的。每个在城市或是在乡村里的党员，都有责任邀请士兵去茶楼里谈话，甚至有可能时组织游艺会茶会邀请士兵参加。每个党员都有责任写信给军队里的相识士兵，描写他们及工农生活状况与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迫情形，以鼓动他们的反抗和斗争的情绪。每个党员更有责任去组织小组代士兵的家族写信给士兵及讲解士兵给他家族的来信。士兵中的先进觉悟分子须组织到党的支部中来。党必须出版特别给士兵看的刊物。

目前党团的作用要建立在下层组织中，尤其是要使支部起党团作用

历来中国党在群众组织中的活动，支部是不起什么党团作用的。过去下层工农会的活动，多半是听命于上级工农会，并非在群众中有几多民主化的生活。因此，支部在下层群众组织中，便也不起什么党团作用，不成什么群众活动的核心领导。现在党处在秘密环境中了，群众上级的赤色组织多半消失，党的活动中心益发需要建立在下层基础上，建立在每一厂每一业每一乡村的工农群众中。在这些活动中，支部便居于特别重要地位，成为党在群众中活动的枢纽。故党团的作用必须在党的支部活动中特别表现其重要。党在工厂工会、厂委、乡农会中可不必另组党团，即以支部起党团作用。在一般群众组织中党应组织党团，尤其在黄色工农会中，支部要有组织地有计划地指导同志起党团作用的活动。

六次大会反对组织同情者的特别政治团体，但认为在他们中间的工作有非常注意的必要，这一点对于各地群众组织之党团的工作非常重要。在现在中国的条件之下党自然不能有很快的数量上的发展，这种情形使中国共产党要在同情于我们的工农分子中间，进行有系统地个别地征收党员的工作，在现在的条件之下，中国党是有可能使着广大的无产工人对它表示同情与实际之帮助的。因此，党之一个最主要的任务，是要提高工农对我党之同情，要有系统地选择接近党的群众，参加革命运动中的工作，并交付他某一种任务。最大的同情于我们的组织，自然是群众组织。我们吸引没有觉悟的工农参加群众组织中间的日常工作，比较吸引他们入党是容易得多；但是假使党能以引导他们，使他们在党的指导之下，在职工会中为无党的工人之迫切的要求而斗争，在农民协会中，为无党农民之最迫切的要求而斗争，这便是吸引工农分子入党的第一步工作。

在产业中的党的支部，在群众组织中之党的党团，对于同情于我们的无党工人的关系，应该是用极忍耐、极正当的方法使他们参加日常斗争中的实际工作，并使这种争取部分要求的斗争与我们党之一般行动之政纲发生联系，因此，党支部以及党团，更应注意引导一般同情于我们的群众，参加我们所领导的斗争，其中接近于我们的同情者，便应介绍其入党。

在动员群众参加革命运动之日常工作中，要善于依靠着同情于我们的广大群众，经过这些同情者的帮助，更可吸引着更广大的工农基本群众都走到我们党的领导之下。

二中全会职工运动决议案

（一九二九年六月）

一　反动政治局势与工人生活状况

六次大会后，正值帝国主义在中国企图实行瓜分政策，五三惨案的发生，正是帝国主义企图的表现；因为帝国主义互相间的矛盾必然不可避免的要爆发帝国主义的大战而形成帝国主义在中国互相竞争的形势，更促进中国的军阀的混战，同时使它更加急进地对于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大本营的苏联进攻。

国民党背叛革命后，不仅挽救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并且继续不断的出卖中国投降帝国主义，使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日益加强，加深中国殖民地化的过程。同时国民党内部互相间的矛盾和冲突不可调和的加紧爆发起来，形成军阀混战的局势。

反动的政权虽然不能得到和平统一的稳定地位，但是对革命势力是一致地进攻，白色恐怖的厉行，加紧压榨工人阶级是不遗馀力。中国资产阶级因为客观的主观的条件，没有独立发展的可能，虽然在妥协帝国主义之下，得到一点发展，但是更帮助了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发展，因此它只有加紧剥削中国工人阶级以求得与帝国主义的工商业相竞争。

中国工人阶级在这种反动势力一致进攻之下，生活状况陷于不堪的地位，一切自由均被剥削殆尽，过去在斗争中所争得的利益和条件，早已取消无存，继续的加长工作时间（十时到十八小时的），减低工资，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经营工厂内合理化的实施，以及中国资产阶级为节省生产费用加强劳动率，更使工人的工作加重，长久失业的恐慌，大批的改用女工童工代替成年工人的工作，更加重的来剥削与压迫，待遇的苛刻与工头的虐待和额外勒索，物价不断的高涨，以致工人生活标准日渐降低；至于工厂卫生各种设备，对于工人的健康妨害是有加无已，使工人阶级的生活愈陷于牛马奴隶的地位。

因此工人阶级在这样残酷压迫和剥削之下，因生活的痛苦，必然要起来斗争；加以革命失败后工人阶级经过相当的休息，斗争的情绪与力量，逐渐有了恢复；再以帝国主义的凶横与国民党的卖国，更加激起来群众的革命情绪：于是工人的斗争继续不断的发展起来。

二　全国工人斗争发展的形势

1　工人斗争的发展到现在是开始复兴的形势

全国职工运动，自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失败之后，工人阶级在不断的反抗斗争失败中，

的确受了严重的摧残和牺牲。直到一九二八年国民党三次北伐的时候，全国的职工运动遂又开始转到新的方向而发展。

党的六次大会正值五三惨案发生的时候，激发了全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情绪。虽然国民党无耻的投降帝国主义，压迫群众，破坏革命的反帝运动，但的确促进了工人阶级经济斗争的发展，继续不断的起来反抗资本的压迫并为要求改善生活而斗争。但是这种形势只有上海是继续的向前发展，并且多偏于店员手工业工人的斗争。到上海邮务罢工以后，更推进产业工人及全国工人斗争的开展，北方及各地斗争的相继发生，开创了全国职工运动新的局面。但同时改良主义乘机侵入工人群众中积极活动，黄色工会更借反动政治势力在全国有了相当的发展，群众的和平斗争的倾向，在这一时期表现得更明显，但经过不久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爆发蒋桂战争，更加促进军阀战争的局面，全国工人阶级的斗争更加急剧的发展起来，开始复兴的形势。

在最近的新形势，不仅是继续以前的形势向前发展，不仅是群众斗争的扩大，而是斗争的形势有了新的特点，我们必须加以详细的分析与正确的认识。

（一）斗争形势的扩大与深入

现在全国工人的斗争是形成普遍的发展，不仅上海、天津、香港几个大工业区，而无锡、苏州、南通、青岛、厦门、汕头、北平、唐山、江西、景德镇、吉安等处都是继续不断的发生，并不是限于一地的发展，或是偶然发生斗争的形势。不单是对于资本的反抗，而是进一步的经济要求，加工资，减时间，订立劳动条件，在全国斗争中成为主要的要求。罢工的事件是不断的发生，万人以上的大罢工时有所闻，直接行动的斗争形式，日渐发展。斗争的内容已由经济的斗争逐渐进到政治斗争，争自由的斗争为工人斗争中的中心问题。目前群众斗争总的形势是扩大深入了，在客观上表现阶级斗争的形势是一天天的进展。

（二）工人阶级政治意识的增进

目前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深，军阀战争局势的发展，国民党更加露骨的压迫工人，资本严厉进攻剥削，揭破了改良主义和平统一的欺骗面具。在群众斗争发展中，的确可以使工人群众对于国民党的幻想逐渐打破，政治的意识是有相当的进展。工人群众对于国民党及其政权已开始由愤恨进到公开的反对，反国民党的口号渐由党的宣传成为群众中的实际斗争的口说，在群众的会议中，特别是斗争中表现得更明显。在上海自五卅运动示威，在群众中更加使这斗争的形势扩大。虽然这一现象是在开始发展，还没有在一般群众中普遍的发展起来，但是斗争的发展愈剧烈，必然使这一形势逐渐扩大到一般群众中。目前的确表示工人群众的政治意识与从前不大相同，这是阶级斗争深入的表现。当然不能过于夸大这种事实，但是它的发展亦有客观的原因。目前工人群众在他的生活上、斗争上，国民党的压迫的事实上，反动政治的表演中与斗争事实教训中以及党在群众中政治影响增加，均是使工人群众一方面打破许多幻想，另方面促进阶级的政治意识发展。我们的党必须认清这一现象，加紧促进这一形势的发展，这是目前的主要的任务。

（三）黄色工会的群众逐渐左倾及黄色领袖的动摇开始发展

在前一时期，黄色工会在群众中的确有相当信仰，目前群众斗争的发展更加扩大和深入，

使黄色领袖欺骗的面具，特别是帮助国民党对于工人的压迫，更加显露的表现出来，遂引起工人内部的斗争发展起来。全国黄色工会最有基础的上海邮务商务英美等工会，在群众中已开始动摇。加以国民党各派的冲突反映到黄色领袖间，发生互相攻击的分裂现象。当然目前黄色工会在北方以及将来其他地方，还有发展的可能，在群众中还有很大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却表示黄色工会在群众中开始动摇，这是群众斗争深入的时候必然发生的事实。——还是因为无产阶级的政党不能深入群众领导群众推进斗争的发展，未使黄色工会的裂痕剧烈的爆发起来。在这些新的特点中，都是表现新的形势发展，的确是工人阶级的斗争开始复兴的形势。当然在这新的形势发展上，还带有许多的弱点，正是经过革命大失败后将转向复兴的过渡中必有的现象，特别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在这些斗争中还不能表现伟大的领导作用，与群众的关系还不密切。若是以这些弱点认为是群众斗争仍是消沉，甚至以为群众斗争的性质还是防御的形势，而抹煞客观斗争的形势，这都是不正确的观念。固然对于一种形势的估量是不要过于夸大，同时对于新的形势的特点要有正确的认识，才不妨害党的策略路线。

2　工人斗争的弱点

群众的斗争虽然是开始复兴的形势，但是在斗争中还有很多的弱点：

(一)改良主义与黄色工会的发展在群众中有相当影响，使群众斗争发生合法的和平的斗争倾向，对于国民党还存有幻想。

(二)群众斗争的组织力量表现得很薄弱，许多大的罢工运动因而遭失败。

(三)全国斗争的发展还不能有很好联系，形成广大的强有力的阶级战线的形势，自发的斗争居多，表现时起时伏的现象。

(四)群众在革命失败后的恐惧心理还未完全消灭，减弱直接行动斗争发展的力量。

(五)在许多群众斗争中，党与赤色工会的领导缺乏，不能加强斗争发展的力量。

这些弱点均足减弱斗争发展的力量，因此党与赤色工会必须去了解和认识这些弱点。要正确地针对这些弱点来规定职工运动的策略，才能在不断的斗争中克服这些弱点。

3　斗争发展的前途

目前职工运动新的发展形势，在客观条件上，不仅是上海、北方等地以及将来的武汉、广州等地斗争，必然要同样的广大的剧烈的爆发起来，必然是继续向前发展。因为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间的矛盾加紧（帝国主义的矛盾，军阀间的矛盾，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军阀混战的局势发展，全国得不着真正的统一，反动的政权不能稳定，中国资产阶级不能有独立发展，只有加紧剥削工人来积累资本，不能改良工人生活，改良主义很少实现的可能，国民党对于工人的压榨更加锐利，这些根本问题没有得到一个解决，工人的斗争是不会减少，只有更加猛烈的发展。

这一形势的发展，是否促进革命高潮到来的关键之一，这是看无产阶级的斗争力量加强，斗争形势的扩大，以及党的努力如何来决定。因为在这一新的形势中还有许多弱点，合法倾向，斗争的组织力量薄弱等，特别是改良主义与黄色工会活动是不会停止的，群众斗争的发展愈急进，改良主义活动愈加锐利而企图阻碍这一形势的发展，根本来消灭群众的革命斗争，

走向改良主义和平发展的道路。因此在目前客观新的形势上，无产阶级的政党仍然要艰难困苦的做群众工作，夺取广大的产业工人群众在它的周围，必须要艰苦的来战胜主观上客观上许多困难，才能推进目前形势发展，促进革命高潮到来。

三　目前反动势力对于工人阶级进攻的策略

目前全国职工运动虽然有了极大的发展，但是反动势力联合一致地对于工人阶级的进攻愈加锐利，这正是工人阶级革命势力的发展与反动势力进攻相针对，其形势如下：

1　帝国主义更加锐利的进攻中国工人

中国革命运动在过去虽遭失败，但是震撼了国际帝国主义，于是帝国主义一方面直接用武力的进攻，勾结反动的国民党来压迫革命，同时更指示在欧洲欺骗工人有力的工具——国际改良主义者，与反动国民党联合一致向中国工人阶级进攻。东亚改良主义者日本铃木更与国际改良主义共同企图明年四月在孟买召集亚细亚劳动会议，来破坏革命的太平洋劳动会议秘书处，阴谋企图消灭东亚民族独立运动，这是显然的事实。中国职工运动在目前应当坚决的号召广大的群众与国际改良主义斗争，揭破他们的阴谋，特别对于太平洋沿岸各国革命工会的联合工作，在过去太不充分，今后应加紧这一工作，这是非常必要的。

帝国主义除此以外，更直接加紧对于工人的剥削和压迫，运用新式生产工具于中国直接开设之工厂内加紧剥削，派遣驻华海陆军驻扎工厂，压迫工人，任意屠杀中国工人，如汉口水案，上海吴案，最近青岛马案，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各地的屠杀，帝国主义对于中国工人的进攻更加锐利。过去党对外国工厂斗争的领导还不充分，尤其没有使工人经济斗争与反帝运动相联系，对于反帝运动的领导和发动还缺乏，因此在职工运动中反帝运动与经济斗争的联系与扩大是目前斗争中一个重要的任务。

2　国民党愈加露骨的压榨工人

反动的国民党因为群众斗争的发展，愈加露骨的来压迫工人，更加以利用反动的政治势力来压迫工人的一切斗争，继续白色恐怖的政策，更毫不掩饰的来剥削工人阶级的一切自由，稍有斗争行动的工会，动辄遭封闭和改组，拘捕工人中革命首领，残酷的屠杀共产党员。这一方面因为反动政治的反映，同时工人斗争的扩大和深入必然使反动的国民党只有露骨的施行其反动政策。这并不是它放弃了改良主义的欺骗，在目前改良主义的欺骗还是国民党进攻工人最厉害的方式，我们不应忽视它。为了统治职工运动及阻碍革命工会的发展，进行黄色工会的组织以欺骗群众，但在这种欺骗不能生效时，只有加紧反动的压迫。过去党对于工人经济斗争的领导，没有很好的将反国民党斗争，与反对国民党压迫罢工改组工会拘捕工人等斗争，联系到工人阶级争自由的总斗争，目前反国民党与争取自由是职工运动中最主要的政治斗争。

3 资本进攻的加紧

中国资产阶级因为客观的主观的条件限制，不能有独立的发展，只有加紧剥削来积累资本，与帝国主义竞争，于是为减少生产费用则裁减工人，加强生产制度，延长工作时间，降低工资，苛刻的待遇，大批的开除成年工人，代替以青年男女及童工，更为削弱工人斗争的力量。尤其是群众斗争愈发展，资本家为保持其过多的利润的剥削，则更加紧对于工人的进攻，并不因为群众斗争的激烈而放松，有时也以民族改良主义来欺骗工人群众，如劳资合作，为民族利益而牺牲阶级利益等等。所以在目前职工运动开始复兴形势的发展，因为资本进攻而更加促进。

4 改良主义与黄色工会的作用

目前改良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并不是偶然的现象，正是中国大革命遭了暂时失败后，必然要发生的现象。尤其是目前中国革命形势的存在，新的高潮必不可免的要到来，更促使改良主义在中国积极的活动。这当然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反动的资产阶级用来加强消灭中国革命的企图，甚至封建军阀有时也利用来缓和群众斗争和增加政治上的作用。当着全国工人斗争再接再励发展的时候，改良主义对于工人的进攻是更加锐利，中国资产阶级自反动后，不仅企图以改良主义的正纲来求得本身的发展，并且要将改良主义的影响扩大到小资产阶级和工农群众中，以增加他的政治地位，这更促使改良主义积极向工人群众进攻。改良主义在中国实行的基础是极小的，无论对于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改良主义发展的前途，仍然只有加深中国殖民地化的过程，维持封建势力的存在。至于真能实行改良工人阶级的生活，更没有可能。只能暂时欺骗群众，麻醉工人阶级于一时。不过目前群众斗争正当发展的时候，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还未十分深入，领导斗争的力量还薄弱，党与群众的关系没有建立亲密的联系，一般阶级意识模糊的群众易受其影响。特别是在许多小的利益争取上，可以麻醉群众于一时，来阻碍群众斗争的向前发展。

改良主义欺骗工人群众的方法，主要的是利用政治势力来传播改良主义的种子（如黄色工会的发展，劳资仲裁，制定工厂劳动法等），在思想上提倡劳资合作，为民族利益应牺牲阶级利益，和平斗争，中国工业不发达只有努力生产才是工人的出路等等，来抹煞阶级对立的形势，麻醉工人阶级的意识，消灭群众的直接斗争，领导斗争来破坏斗争，以小的利益来代替大的要求，引导到和平的合法的改良主义道路，更以法律来束缚工人的行动，如登记注册等，收买工人中的妥协分子和上级工人，建立在群众中的组织基础。特别是国民党的改组派，假左派的名义，有时也喊些不关工人实际生活的左倾口号来欺骗群众，如反对封建势力，反对某一个军阀，以掩饰整个国民党的罪恶，使一般阶级意识模糊的群众更易受其欺骗，我们在群众中应当坚决与之斗争，揭破其欺骗的面具。改良主义的发展是与群众的斗争发展成正比的，在去年五三以后，群众斗争的开始发展中，改良主义积极的施其活动，的确在群众中发生相当影响，这是六次大会以后职工运动中显明的事实。

改良主义的作用，在全世界都是资产阶级对于工人阶级有力的工具，阻碍群众革命斗争的发展，企图消灭革命运动，改良主义在中国当然与在全世界是一样的作用，是在政治上革

命斗争发展过程中来麻醉群众于一时，缓和和阻碍群众斗争的发展。因此目前对于改良主义正确的认识和估量是非常必要的，不要过于夸大，但是不能忽略了改良主义在目前的作用。它的确是党争取群众最厉害的敌人，党必须采取坚决的斗争策略与之斗争，扫清改良主义在群众中的影响。

黄色工会是改良主义欺骗群众最有力的工具，是国民党用来统治工会运动掩饰国民党压迫工人的面具，是阻碍革命工会发展的，它是依据改良主义的政治影响和政治势力的发展和扩大而生长。黄色工会和过去白色的反动工会在群众的关系上，显然不大相同，而是利用法律地位组织关系来夺取工人群众，以欺骗的方法有时也替群众争得小的利益，并领导斗争来破坏斗争，以合法的和平的斗争形式来代替阶级斗争的直接行动，以拖延政策来缓和群众的斗争，但是斗争发展与群众的情绪发展到激烈的时候，则以政治势力的恐吓来压制群众斗争。它反对阶级斗争，主张劳资合作，因此使一般落后的阶级意识模糊的群众易于受其影响。它的作用与反动的工会是相同的，都是消灭工人斗争，阻碍革命工会的发展。虽然黄色工会当着群众斗争剧烈的时候很易于使黄色领袖面具揭破，使工人群众认识而起反抗，但是目前黄色工会还有大部分群众在其组织和影响之下。虽然在上海有开始动摇的现象发生，但是在北方则正当发展最盛的时候，其他各地也都有它的发展的可能。无产阶级的政党不应忽视这一事实以及轻视黄色工会在群众中的作用。

黄色工会的发展既然是依靠政治势力，并不是由于经过了思想的发展在群众中生长起来，在黄色工会群众中只有少数黄色领袖是接受了改良主义的思想，成为忠实的改良主义的信徒，大多数的群众不能认为黄色的群众。黄色工会的群众基础是建立在工厂的职员、工头、上级的工人和工贼走狗身上。因此党对于黄色工会的策略，不应提出反对整个的工会，只能提出反对黄色工会领袖的口号；不应在黄色工会中采取少数运动的策略，组织赤色工会与之对抗，来分裂群众，应当是参加到黄色工会下层群众中，扩大党与赤色工会的影响，起党团的作用，领导群众作反黄色领袖的斗争，夺取大多数的群众到党的政治影响之下，转变到赤色工会领导之下的工会。拒绝参加黄色工会作下层群众工作，这是无异于放弃大多数群众的争取，在客观上帮助了改良主义与黄色工会在群众中的发展。

在黄色工会群众工作中，放弃反黄色领袖的斗争，这是非常的错误，不但助长黄色领袖在群众中的信仰，并且他自己要变成黄色领袖的工具，党对于这种倾向应当严厉的纠正。

反黄色领袖的斗争，必须能动员广大的群众和群众组织的力量，才能得到反黄色领袖斗争的胜利。必须广大群众在党的政治影响之下，才能达到夺取大多数群众的任务，才能战胜黄色领袖一切欺骗和威吓群众的诡计。

改良主义与黄色工会的发展，是中国革命失败后职工运动发展中一个特殊现象。它的发展当然有许多客观原因：

(一)革命失败，群众的恐惧心理还未完全消灭，不敢直接发动斗争。

(二)工人群众在资本严厉进攻之下，生活痛苦，需要改善生活，不过斗争开始发展的时候，还不能起来作大的斗争，只要稍小的经济改善。

(三)无产阶级的政党在过去左倾的错误路线下，与群众关系脱离；自六次大会虽然稍有改善，可是还不充分，对群众斗争的领导力还是薄弱；还有许多右倾的错误，在客观上亦帮助它的发展。这许多的原因给予了改良主义与黄色工会在群众中的活动机会。无产阶级的党必须努力增进与群众的密切关系，坚决的发动群众经济的政治的斗争，必须用尽一切力量来

夺取黄色工会中工人群众的大多数，扩大党的政纲和政治主张的宣传。只有坚决发动群众的斗争，才能揭破改良主义与黄色领袖的欺骗，才能打破群众对于它的一切幻想，围绕着党的周围。

5　六次大会的策略与党的工作和经验

六次大会对于职工运动的策略在这一年事实中都证明是正确的。大会指示职工运动的基本任务是动员所有的无产阶级群众来围绕着它的阶级组织（党与工会），中心的策略路线是领导工人日常经济的政治的斗争，反对反动工会，组织革命工会，用宣传与鼓动方法提高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反对命令主义委派制度以及红色恐怖强迫罢工等。这一年群众斗争的发展事实和现象，证明这一策略路线是非常正确的。为了实现争取群众的任务，定出工厂委员会主要的策略来团结广大的群众，指出发动经济斗争是能动员广大群众，特别的指出改良主义与黄色工会在职工运动中的企图，提出"反对阶级合作与资产阶级欺骗宣传"，"加入有群众的反动工会，争取其群众"，"力争工会公开自由"等等的中心策略，现在都是无疑的正确。

（一）党对于职工运动的工作

由六次大会到现在，党对职工运动的工作，是能够有很大的注意，群众工作也有相当的进步，党与群众的关系有了相当的改善，但是对于总的任务执行还表现极不充分。当然在客观上白色恐怖的严厉，各地党部不断的遭破坏，都增加工作上的困难，加以党内许多不正确倾向的存在，以及职工运动干部人材的缺乏，使工作进行上发生许多阻碍；但是各级党部对于六次大会的决议案，还不能有充分的了解，坚决的执行，正确的去运用，许多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到现在还未正式成立起来，因此对于群众的宣传与组织工作，都作的不充分。除了上海香港有进步外，各地党部与工人群众的关系还是很隔离的，对于群众斗争的领导，除了上海有进步外都是表现很薄弱。对于黄色工会的工作，虽然有些地方有了进步，左倾与右倾的错误还未完全改正。这是目前职工运动中最值得注意的问题。

各地工会工作，在六次大会后，上海香港等地虽有进步，但是还偏于形式上，组织的工作还没有建立广大群众的基础，不能坚决的建立群众工作的路线；委派制度虽然逐渐纠正，还未完全彻底肃清；工作范围仍然缩小，党的支部还没有深入群众，还不能艰难困苦来进行群众的日常工作和斗争的领导；许多地方还只有狭隘的秘密工会组织工作，不能运用公开机会来扩大赤色工会的工作；有的因为利用公开的活动又犯了很严重的合法主义，工会的工作作得不充分。

在目前职工运动工作中，对于铁路、海员、矿工、五金等重要的产业工人的工作的忽视，这是全党工作中一个极大的损失。虽然各地党部在主观上对于这些工作说是注意，但在工作上是表示忽视的，香港对于海员、五金工人虽较其他各地注意，但是工作上不但做得不充分，而且有很多的缺点，至于铁路工人运动，全党均没有积极的注意。这些重要产业工人，是职工运动的中心工作，是党的无产阶级的主要的基本力量，若是不能积极的建立这一工作，这是非常大的错误。目前反动势力特别对于这些产业工人群众的争取（特别是铁路工人），更为我们工作中的严重问题。

无产阶级的党若是在工人阶级中间没有坚固的基础，在主要的产业工人及工会运动中没有广大工人组织的基础，党不能在中国革命中占有领导的地位。当然目前职工运动工作中有

许多困难情形摆在党的面前，必须坚决的艰难困苦的来战胜这些困难，才能使党在产业工人中在工会中及在罢工运动中取得非常稳固的地位和威信，将来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才有更巩固的力量。

（二）工作的经验

（一）正确的运用争取公开活动的策略，才能推动群众斗争的发展，扩大群众工作，这是党最近在上海五卅运动及最近工作中所得到的实际经验，并收得有伟大的成效。狭隘的秘密工作是不能将党的影响及赤色工会的活动，扩大到广大的工人群众中。这个策略的运用，必须与秘密工作有正确的联系，必须是在斗争中求得公开，防止合法的倾向与形式主义的发生。

（二）只有广大的政治运动的发展，才能增加群众的政治的认识，提高群众斗争的意识，只有加紧领导群众的经济斗争，才能更快的发展到政治的斗争，加强政治斗争的力量。今年五卅运动，对于党的政治影响，的确是有了广大的发展，上海群众的斗争更加推进向前发展。但是在一个政治的群众运动中，必须注意工人经济斗争的发动，使之互相联系，才能增加群众斗争的力量，才能动员广大群众起来。党在一个政治的群众运动中，必须有正确的策略和计划，充分的动员党员群众，来准备这一工作，才能使运动本身更有力的发展起来。党只有政治影响的扩大，才能争取广大群众；只有充分发动群众的经济斗争，才能加强群众斗争的发展；只有重要的产业工人的斗争的发展，才能推进其他工人的斗争（如上海邮务罢工，平奉铁路工人斗争）。产业工人的工作和斗争的领导，是职工运动中最中心的工作，但是手工业店员在职工运动中有大的作用，特别是在没有产业工人的城市，则等于产业工人作用一样，我们不要又走到另一极端，完全忽视这一工作。

（四）*取消主义放弃职工运动的工作，是目前党内对于职工运动中最严重的倾向之一，这是阻碍党对于广大工人群众的争取以至放弃工会运动。他们的表现：（1）是狭隘的党的工作观念，以为没有党的组织和健全支部，群众工作是不能建立起来。于是只注意支部工作发展，党员的吸收，不做群众工作，无形将群众的工作取消了。这种现象在党内甚为普遍。因此支部没有建立在群众中，脱离了群众，失掉了核心作用。（2）为了建立由下而上的工会组织系统，对于改变工会工作路线，纠正机关式的工作，建立群众的基础，于是又走上取消群众工作的路线，单由党的路线（支部）来代替它的作用，如取消海总铁总等。（3）狭隘的组织观念。以为群众中的灰色组织，我们应当经常的保持其本来面目，不必转变成为赤色工会，或发生赤色工会作用（当然这种组织不经过斗争和长期的工作，是不易转变成为赤色工会），至于赤色工会则另行进行组织。这无异于取消了扩大赤色工会运动的作用。单纯组织观念的发展，必然要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

目前这些错误倾向，都是阻碍党争取群众的工作，应当严厉的纠正，才能正确的执行党的争取群众的任务。

（五）和平发展合法主义是目前最危险的倾向。在目前职工运动中，和平的发展最易于发生，因为白色恐怖的严重，不敢领导群众斗争，形成和平发展的现象。还有以为目前职工运动只有在群众中建立基础，才能领导群众斗争，这种先组织后斗争的观念，也是和平发展的倾向，不了解群众组织的发展，必须在斗争中才能扩大的强固起来。至于利用公开活动的

---

* 原文如此

策略，又走上合法的道路，为了保存公开的地位而向国民党登记，降低群众斗争的口号，不敢直接斗争，以及在黄色工会中不敢发动群众反黄色领袖斗争，甚至投降到黄色领袖下面，变成黄色领袖。这都是目前在职工运动中最容易发生的右倾危险，党必须与这些倾向作坚决的斗争。

(六)左倾的残余在职工运动中尚未肃清。目前许多地方党部仍然建立在农村中，放弃职工运动工作，除了几个大城市外，其余成为普遍的现象。如不能艰难困苦的来做群众日常工作，放弃领导日常斗争，以及对于黄色工会的轻视，不加入黄色工会群众中进行群众工作，以及不会照着革命原则去运用公开形式与方法，为恐惧发生右倾危险和公开主义的幻想，遂裹足不前，宣传与鼓动的口号不能分开，并列一起，不能有正确的联系，这些左倾残余不能彻底肃清，都是妨碍群众工作的发展。

6　今后党的任务与策略

(一) 目前中心任务

(一)积极的发展铁路、海员、矿工、五金重要产业工人的组织，建立职工运动中心群众的基础，建立和扩大上海、香港、天津、武汉、广州、满洲、青岛、无锡、南通等重要工业区域的工会工作。

(二)反对改良主义，领导群众斗争，在斗争中揭破改良主义一切欺骗，打破群众的合法观念与一切幻想，夺取广大群众在党与赤色工会影响和领导之下。

(三)积极的参加有群众的黄色工会，在下层群众中，扩大赤色工会的宣传，发动群众的斗争，夺取广大群众到赤色工会影响之下，驱逐黄色领袖，逐渐转变到赤色工会领导的工会。

(四)加紧领导和扩大群众的经济的政治的斗争，强大工人斗争的战斗力，促进目前斗争开始复兴的形势向前发展。

(五)由下而上的在群众中发展或扩大斗争性的群众的组织，建立赤色工会的群众基础，扩大赤色工会运动。

(六)加强党与赤色工会在群众中的政治宣传和扩大政治影响，坚强工人的阶级意识。

(七)注意青女工的工作，夺取广大的青女工群众，团结在赤色工会的周围，并积极领导他们的斗争，以加强工人的阶级斗争的力量。

(八)领导失业工人的斗争，并团结在赤色工会组织之下。

(九)开始发展和建立农村的工人运动，建立工会组织，领导经济斗争，以建立工人与农民的亲密关系。

(十)发展和扩大工人武装的组织，和训练工作。

(二) 策　略　问　题

A　运用公开活动的机会扩大赤色工会运动

(一)赤色工会的组织在秘密活动之下是很难有大的发展的，只有限于一部分的组织，不能将广大的工人群众包括在组织内，不能将它的影响扩大到群众中。因此，要使赤色工会在群众中有扩大的发展，必须利用社会一切公开的可能性与机会，使赤色工会在公开或半公开

的形式之下，扩大它的组织与影响。这一策略的运用，必须正确的与秘密工作有很好的联系，坚决的纠正右倾的危险与左倾的残余。

(二)利用社会公开的可能性，不是合法运动。去向国民党注册登记，这不是利用公开，而是合法主义。更不是以公开为目的。为保存公开的存在，必然走到合法运动。利用公开的可能性，是在社会一般所能允许的组织和名义，如俱乐部、图书社、储蓄会这一类的组织来取得公开活动的机会，但又不是专以这类名义和实质来组织群众，而是名义上的利用，实质上乃是赤色工会的组织和行动，来扩大我们的工作，才能吸收广大的群众到里面来。

(三)以各种纪念节日或游艺会的名义，罢工运动的时候，以及各种共同斗争的问题来召集各种工人群众或工会代表开会，或者讨论工人中共同问题，或斗争行动起来进行组织某一产业的地方的公开联合组织，更运用这种组织来公开领导广大群众斗争，以及发展和扩大群众的组织，这都是利用公开机会来扩大党与工会的群众工作，这一策略正确的运用，在目前职工运动中有很大的作用与意义。

B　工厂委员会的策略运用

(四)工厂委员会的策略，自六次大会后，在职工运动工作中，很少执行这一策略，甚至在许多群众工作中，因为不能了解工厂委员会的作用，和正确运用的方法，以致失却团结广大群众的机会，减少群众组织和斗争的发展，在过去工作中是一个很大的损失。目前群众斗争，虽然向前发展，但是群众的恐惧心理还未完全消除，不敢接近赤色工会，还有广大群众到现在没有工会组织。只有正确的运用工厂委员会的方式，使一般害怕斗争和组织赤色工会的工人群众，以及工人中有政治的派别的，经过工厂委员会相当的工作的时候，能引导全厂群众到赤色工会领导之下。因此，工厂委员会是目前职工运动最主要的策略。

(五)工厂委员会完全以争取全厂工人共同的经济利益来团结全厂的群众，因此不问工人中宗教的不同，政治的派别，全厂每个工人都是会员，也没有会所，也不收会费，由全厂工人或代表会的形式选举几人组织委员会，来办理或领导全厂工人的斗争问题，逐渐使一般思想落后、有政治派别、和恐惧白色恐怖不敢斗争的群众，经过工厂委员会的形式，在经济斗争中引导走上阶级斗争的战线上。因此赤色工会可以经过工厂委员会的工作，逐渐扩大它的影响与组织。

(六)工厂委员会是维持我们和群众密切关系的一个最好的方法。是反对国民党和帝国主义进攻工人们一个最好的抵御。是党在反对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施行逮捕及屠杀时最好的工具。是反对国民党和黄色工会的侦探们一个武器。是集中群众力量反对压迫的一个工具。是给予群众一个发泄他们愤怒的集体的和代表的机关。使得群众能提出他们集体的要求。使得他们能够对付他们每天所遇的一些愤激不平的事件。是集合各种政见和意见不同的工人的机关，是为建立斗争的工会的一个巩固基础。

(七)目前对于工厂委员会这个策略的运用，决不以机构的形式来进行这个工作，应当根根工厂实际情形来决定这个组织形式。名称按照客观环境，和群众的需要而决定。这个组织是否公开继续存在，和转变为赤色工会，这都是按照当时的环境和群众的情形正确的运用，才能推进工作向前发展。

(八)工厂委员会决不是由少数人所组织，而是经过全厂工人举出来的。更不是和平发展的，而是由斗争产生出来的。工厂委员会的组织立场，是建立在群众的斗争上面。在我们运用策略时，都是应当注意。

（九）工厂委员会与赤色工会支部是不相同的，不能与赤色工会混合一体。赤色工会支部与党的支部在工厂委员会中只有起党团作用，不能直接指挥。

（十）在工厂委员会领导群众斗争发展到罢工的时候，可将工厂委员会扩大和转变为罢工委员会，或是在罢工中指挥罢工的机关，经过罢工后应尽可能的使它成为事实上的工厂委员会，不仅在罢工中，便是在经常的小斗争中，也要设法取得组织工厂委员会或定期的工人代表会议的机关。同时必须注意要尽可能的用各种方法组织工厂委员会性质的工人组织。

C　斗争的策略

（十一）日常斗争是发动斗争的主要策略。因为群众中恐惧心理与失败情绪还未打破，以致不敢直接起来斗争，只有发展日常斗争，才能提高群众斗争的情绪，逐渐打破群众的恐惧心理。

（十二）在目前群众斗争发展中，不应束缚于日常斗争的策略，应由日常斗争生长到大的斗争，注意对群众大的斗争的领导，特别是广大群众的罢工运动的领导更有意义。同时在罢工运动领导中，力求斗争的胜利，才能加强斗争的发展。

（十三）在反帝运动，反国民党，反军阀战争中，党与赤色工会应努力领导工人群众来参加这些运动，并在这些斗争中，建立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特别在外国工厂的工人斗争中要注意发展到反帝运动，必须使这些斗争互相联系，特别与工人的经济斗争相联系起来，才能加强工人群众参加斗争的力量。

（十四）目前争取工人自由的斗争，是工人目前政治斗争的中心斗争，在一切的经济斗争中，都要使它发展到争取自由的斗争。只有这一斗争剧烈的发展，才能加强群众的阶级意识，才能更促进反国民党和其政权的斗争向前发展。但是政治斗争，必须加紧领导经济斗争，才能更强有力的发展到。

（十五）凡是遇到工人群众的罢工运动，尤其是带全国性的产业工人的罢工，党与工会应动员所属地及全国有关系的党部与工会，要集中力量来参加斗争的指导，和号召其他工人起来援助这一罢工，才能借这一罢工来影响其他工人的斗争，推动全国工人斗争的发展。

（十六）在群众斗争中，动员群众的工作要做到充分，要运用各种斗争组织方式来调动大多数群众参加斗争或罢工中的工作，才能得着广大群众对于斗争的拥护，保障斗争的胜利。

D　反改良主义与黄色工会的策略

（十七）反改良主义最有力的策略是发动群众的经济斗争，领导群众作直接的斗争行动，要利用改良主义欺骗群众的事实，一点一滴的事实都不要放松，不断的在斗争中揭破改良主义的欺骗面具，使群众在事实上把他对于国民党改良主义幻想以及合法观念完全打破。

（十八）党应坚决的反对党所领导下的工人群众组织向国民党注册登记，请愿调解，助长群众的合法观念和对改良主义的幻想，应该发动群众作直接行动的斗争。对于群众对国民党还有很大的幻想，群众要去请愿登记等，党应该利用许多事实指出这种行动，只有工人受害，没有一点利益，应该以说服的精神来克服群众中一部分的落后思想，不应随着群众走，变成群众的尾巴。即或群众中还是大多数主张去请愿调解，党一方是公开的批评这种行动的错误和危险，同时要参加进去，使群众在这些行动中，以事实来证明党的主张正确，揭破国民党及改良主义的面具，打破群众的幻想，进到群众的阶级斗争的形势。

（十九）应该针对改良主义一切欺骗宣传，在群众中加强阶级斗争的革命的一般理论之灌输，在思想上加强工人的阶级意识。对于国际的改良主义的国际劳工局与黄色国际，应指出其与国民党勾结压迫中国工人，破坏中国革命的阴谋，以及在欧洲出卖工人，及破坏太平洋

革命工人的联合的罪恶。

(二十)对黄色工会的策略，是参加到下层群众中，利用下层组织机关来接近群众，领导群众起来斗争，利用各种代表和群众会议来反对黄色领袖，一方面扩大党的政治影响，揭破黄色领袖出卖工人利益的事实，使群众在事实上认清黄色领袖，将他们驱逐出工会。不是采取少数运动的策略，分裂一部分群众，而是将群众与黄色领袖对立起来，夺取大多数群众到党的政治影响之下。

(二十一)因此对黄色工会的组织策略，不是在黄色工会内进行赤色工会的组织，而以党的支部在群众中起核心作用，团结群众在支部周围。可在工会之下进行各种附设组织，以团结一般革命分子在党与赤色工会影响之下，加强对于群众领导的力量。赤色工会要与这种革命分子的团结发生密切关系。

(二十二)在反对黄色领袖，争取工人利益，发展赤色工会影响的斗争中，群众的罢工，确有很重大的意义。在准备罢工与选择罢工的时候，我们应估计可以取得胜利的条件，应尽可能的发动群众的直接斗争形势（即是直接选举代表、关车、关厂等等)，在群众的拥护下，成立直接指挥罢工的机关，以脱离黄色领袖的影响。

(二十三)黄色领袖在群众斗争发动的时候，常常以拖延方法来缓和工人的斗争，以政治势力的威吓，压制工人的斗争情绪。这个时候必须发动广大的群众，用各种群众会议的决定，以及下层组织的反抗，强迫黄色领袖执行，揭破黄色领袖出卖工人的面具，必须真能动员下层广大的群众起来，以群众的力量才能战胜黄色领袖一切恶劣的行为，将他驱逐出工会指导机关，改选革命分子。在黄色工会内提出民主化的口号非常重要，使一切工会问题都是经过群众讨论和决定。

(二十四)当群众反对领袖的斗争发展到剧烈的时候，国民党必然要假改组和整理工会的名义来压迫群众反黄色领袖的运动，党应当领导群众起来坚决的反对国民党派人改组和圈定名单，由群众自己直接选举工人中革命分子充当工会职员，改造工会执行机关。即或黄色领袖借政治势力的保障，不能由群众力量驱逐出去，仍由群众另行选举职员成立新的执行机关。

(二十五)反黄色领袖的斗争，必须领导群众在不断的斗争中经过相当时期的工作，使大多数群众真能接受党与赤色工会的政治影响之后，才能使黄色工会逐渐转变成为赤色工会领导之下的工会组织，并不是单纯依靠夺取上层指导机关所能达到的。

E　失业工人运动的策略

(二十六)党与赤色工会应当开始来组织失业工人，用一切方法（宣传、鼓动、组织、示威等）来领导失业工人向政府及市政府社会团体资本家要求救济和津贴。

(二十七)失业工人是工厂工作的候补者，资本家可以利用来威吓在业工人不敢斗争。因此在工会中应单独成立失业工人委员会，团结广大的失业工人群众。必须使失业工人在组织关系上与在业工人建立密切联系，并且要在业工人尽力来帮助失业工人，向政府及资本家要求救济，使失业工人来帮助和拥护在业工人的斗争和罢工运动。

F　组织的路线

(二十八)由下而上的来建立工会组织的系统，发展带群众性的斗争性的群众组织，建立赤色工会的群众基础，扩大赤色工会运动。

(二十九)发展和扩大赤色工会的组织，是职工运动组织上最主要的任务。赤色工会要实

行民主化，吸引广大群众的积极分子参加工会的工作和问题的讨论，培养工会中的干部分子，形成工会组织上的骨干。

(三十)对于许多不能组织工会的地方，党可运用灰色名义如俱乐部、体育会以及合作社等来发展群众的组织。这种组织必须建立在争取群众的阶级利益的斗争原则上，来团结群众，使他成为将来生长到赤色工会的群众组织基础。

(三十一)对于工人群众中已有的各种原始的封建组织（如兄弟团、姊妹团等），只要带群众性的，党应参加进去，扩大党及赤色工会的影响，逐渐减少原有组织的特性，加重工会的作用，在工作中群众斗争中，逐渐转变成为赤色工会的群众组织基础。党不应提倡或是自己注重去发展这种组织或助长其封建性。

G　宣传问题

(三十二)党在群众中不仅在一切斗争的领导中，扩大它的政治影响，应当在工人群众中经常的宣传解释党的政纲和政治主张，灌输一般的阶级斗争的理论，扩大党在一般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夺取广大群众在党的影响之下。

(三十三)在上海利用公开或半公开出版的日刊已有相当的成效，其他如香港、天津及满洲、武汉、广州重要的工业区域要同样发行一种专向工人宣传的日刊或三日刊，产业的地方的总工会都要尽可能出版这种刊物，编辑各种宣传小册子，各种刊物，要在各种工人中设通信员，使各种刊物要为群众的说话的喉舌。

(三十四)党与工会的工厂支部应尽可能举办工厂日报和壁报，作经常鼓动群众的刊物，必须要注重本工厂实际问题，提出最实际最具体的要求口号。

(三十五)宣传与鼓动的口号要分清楚，不能平列一处，减少鼓动口号的作用。鼓动的口号不宜太多和太长，长易于失掉鼓动的作用。鼓动的口号必须是工人中最实际最主要的问题。

(三十六)飞行集会是在目前环境之下，不能经常的召集广大群众的会议时最好的一种鼓动群众而带有行动性的集会方法。当着工人上工或下工的时候，在工厂附近临时召集群众会议作三五分钟的演讲，讲演的词句要简单明了，不宜太长或混乱不清，使群众不易了解。因此飞行集会在事前应有计划的准备一切，使飞行集会易于转变为群众的示威行动。

(三) 青工女工运动

在目前资本进攻与生产合理化之下，大批的开除成年工人，以青工女工代替，这不仅是使资本加紧对于工人的剥削，而且在轻工业中，使工人斗争力量的重心转移到青女工群众身上。在过去斗争的经验中，青女工占斗争中的很重要地位，每每因为动员青女工的工作不充分，而影响斗争的失败。因为青工女工受剥削与压迫的特别厉害，对于反抗和斗争亦表现积极，特别是青工和童工斗争情绪易于发动，改良主义的欺骗较之一般成年工人不易接受，因此反改良主义的斗争中表现特别勇敢。过去党与工会对于这一工作没有充分注意，不能在青女工群众中建立有广大的群众基础，在许多斗争中却明显的表现忽视这一工作的弱点。

目前职工运动中夺取青工女工的广大群众是主要任务之一。因此，党与工会不仅站在青工女工的特殊情形之下来注意这一工作，应当站在目前职工运动中主要关系上来积极发展这一工作。

党在职工运动中要获取广大的青工女工群众，必须坚决的在一般工人利益的争取外，积

极领导青工女工的特殊利益的斗争，才能推进青工女工积极的参加整个的工人阶级利益的斗争。

在公开或半公开的工会中，应当设立青工和女工委员会或青工部，来进行青工女工会议及训练宣传工作。

在不妨碍整个工人斗争的原则上，由工会领导作青工女工特别利益的斗争。

在黄色工会中，青工或学徒，可在工会之下单独成立青年及学徒联合会等组织，提出青工学徒的要求，来压迫黄色领袖承认执行，以引起反黄色领袖的斗争。在没有组织的群众中，可单独成立组织，但是必须使这个组织来帮助工会发展。

党在职工运动中应帮助青年团在工会工作来进行青年工人运动。党对于女工运动，应尽可能采取各种方式（如读书班等）来进行女工组织。党的组织发展，应特别注意吸收女工同志加入党，加强党对女工运动的力量。

（四）农村工人运动

农村的工人运动到现在还没有正式的来进行。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工业无产阶级的数量不十分发达，除了手工业工人以外，要算是农村无产阶级的雇工。实在中国农村中有二千余万的广大群众，不仅在中国革命将来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且在目前民权革命阶段中，对于领导农民实现土地革命有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城市的无产阶级经过雇工与农民的组织和领导的关系，更加坚固的密切起来。党与工会不应忽视这一工作，使它混合在一般的农民运动中。要建立独立的组织和工作在城市的无产阶级领导之下。

农村的工人运动，除了雇农以外，还有手工业的工人（不是手工业者；凡是带有剥削关系的，不准加入）和店员都应包括在内。对于农村工人的组织，在雇工及手工业店员占多数的地方应该成立独立的工会，与城市的工会建立组织的关系，同时与农协亦发生组织上的联系，特别是斗争要互相连接起来。在雇工及手工业工人少的地方，可在农民协会下成立雇工部，但是雇工部要与城市的工会发生组织的关系。

对于雇工手工业工人的经济斗争，党当然站在工人的利益上坚决领导斗争，争取他们的利益，不应为了巩固农村的联合战线而牺牲雇工的利益，那又是走上机会主义的道路。

党与地方的总工会应在雇工多的地方派人开始建立工会组织，特别是在农民斗争发展的区域以及苏维埃区域内，应即刻建立组织，与地方的总工会发生组织关系，在没有地方总工会的地方要与全总发生直接关系。党在农民运动中应该要帮助工会进行这一工作，使已有组织的雇工工会立即与城市的工会发生关系。

（五）工人武装组织和训练工作

工人纠察队自卫队组织与工人群众的武装训练，党与工会必须严重的注意这一工作。在目前工人群众中已表现对于这种组织和训练的必要。这种组织与训练不仅在将来暴动有很大的意义与作用，并且在目前阶级斗争剧烈发展的时候，对于群众自卫与反工贼的进攻，以及群众斗争时都是群众的中心力量，在政治示威都有很大的作用。党与工会必须竭力来进行，或扩大已有的组织，经常的作政治的军事的教育工作，并且要利用公开或半公开名义达到公开或半公开的活动。

（六）赤色工会的任务

赤色工会在目前职工运动中占非常重要的地位。对于革命运动的发展有伟大的作用，目前扩大赤色工会运动，争取广大的工人群众到赤色工会周围，是目前党在职工运动中的最主要任务。赤色工会的意义，不仅是主张阶级斗争，站在阶级关系上来团结工人，应当坚决领导工人群众不断的作经济的政治的斗争，坚决的反对劳资合作，合法斗争，反对一切妥协的方式（劳资仲裁等），采取直接行动的斗争形式。不仅要在党的政治领导之下不断的争取工人阶级的经济改善与政治上的地位，而且要在党的领导之下领导工人阶级不断的为获得工人阶级最后的解放与夺取政权而奋斗，这是赤色工会最主要的任务。

(一)赤色工会在目前政治上的任务

1．坚决的领导群众作反对帝国主义斗争，要求撤退驻华海陆军，取消一切不平等的条约，以及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屠杀等斗争。

2．坚决的反对国民党、国民政府，当然在一切斗争中不应放松反国民党国民政府及各派军阀的战争的工作，应当坚决反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力争工人一切自由。

3．必须与国际工人阶级有亲密的联合，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反对第二国际及黄色国际劳工局，亚洲劳动会议等改良主义者，拥护工人祖国苏联。

4．赤色工会在工人群众中宣传工人阶级应该赞助农民的土地革命，应当和农民的组织建立亲密的关系。

(二)赤色工会在经济斗争上的任务

5．八小时工作制是目前工人经济斗争中主要的一个要求，赤色工会要领导群众不断的要求减少时间以为实现八小时的要求而斗争。

6．赤色工会不应忽视群众的经济要求与领导，增加工资，规定最低工资，星期日休息，改良待遇，及工人卫生等要求，都是赤色工会领导群众斗争的主要任务，赤色工会只有坚决领导群众作经济斗争，才能加强群众斗争的力量和阶级认识。

(三)赤色工会的组织任务

7．赤色工会的发展应注重在重要产业工人（海员、铁路、矿山、五金、纺织、丝厂、市政、码头等）群众中及重要工业区域（上海、满洲、香港、广州、天津、青岛）的工作。

8．赤色工会应注意基本组织的建立，在工会内要实行民主化来吸引广大工人群众来参加工会工作。

9．赤色工会应该要引用非同志的工人中革命分子到指导机关，必需要坚决的执行，必需要在公开或半公开工会执行委员会中有女工青工的代表参加。

7　党与全总的工作

各省省委没有职工运动委员会的组织的，应即刻正式成立起来，讨论研究职工运动的工作，贡献关于职工运动的策略和计划于党，帮助对于全省职工运动策略和工作的指导。各县各市在常委中均应有一人负责职工运动的专责。应当动员全体工人支部的党员在群众中进行职工运动的工作，这是他的经常的主要的工作。支部的发展应当在群众工作的发展中来发展来扩大。

党对于职工运动的干部人材，应在工作中注意养成，对于一般下层职工运动的工作人员

不宜任意掉换工作，使他在工作上多积累工作经验。职工运动必须有专门工作人员的培养和训练，在目前是非常必要的。

党与工会的工作应当分开，纠正党的支部代替工会的现象。工会的工作路线应该在党的支部以外的群众中来建立群众工作。党与团的同志应该全部参加工会工作做群众运动，除特别情形留一部分的同志在党内工作，不参加工会组织和工作。党对于工会的党团应特别注意政治的工作的指导。

全总的工作以铁路、海员，上海、香港，矿工、五金为它的工作中心，应当加强对于这些工作的指导。除经常的来指导上总，按期的派巡视员到铁总、海总及重要工业区域考查及实际帮助该地工作，其他重要工业区域（如满洲、武汉、广州等），应当开始派人去建立工会的组织与工作。全总应与全国的赤色工会建立组织的正式关系和经常的指导，各地党部，应尽可能来帮助，使各地工人群众组织与全总建立正式组织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工人》应按期出版，注重职工运动的理论和策略的讨论，以及编辑各种问题的小册子，都是目前迫切的工作。

培养和训练职工运动的下层干部分子来供给全国各地职工运动的人材也是全总重要工作之一。过去虽进行训练班的工作，仍然不充分，现在应积极来进行这一工作。

全总应加强对于赤色工会的政治指导，应当利用全国工人斗争的事件，不论它是否赤色工会和黄色工会，应当公开提出全总的主张和办法向工人群众中宣布，以增加全总在群众中的信仰和赤色工会的影响。

今后要制定全国工人斗争的政纲，各地方总工会和产业总工会都要规定工人的总要求，在群众中作广大宣传，领导为总的要求而斗争。

8　海总铁总与各地的工会工作

（一）海　　总

（一）改正海总非群众的工作路线。由下而上建立群众的组织，充实海总下层群众的基础，纠正过去机关式包办式命令式的工作方式。要运用组织的形式来领导群众的斗争。

（二）建立船上的工会支部组织是海总最中心的工作。要将已有会员群众按照各船的生产部门形成组织，以组织的形式来训练和指导船上支部使能独立工作，在船上海员中起领导作用，扩大工会的组织。

（三）参加到寄宿舍（馆子）和公所群众中扩大海总的宣传，发动群众为清算账目和改良各种待遇的斗争，以改组其组织和兄弟馆的建立，使他团结到海总周围，以扩大海总群众的基础。对于失业海员的工作要特别加紧形成组织，进行训练工作，使他将来上船作工后成为发展海员工会组织的基本力量。

（四）海员工作以香港、南洋、上海三处为工作的中心，在每一地方应择其重要的航线和船只为中心工作，建立中心群众的基础。香港与南洋应以外洋航线为中心，上海的中心为沿海及长江航线。

（五）要注意对于反动工会的工作，领导或发动群众反对反动工会的斗争，不缴纳会费等。

（六）海总在上海要有一种经常宣传刊物，在各船设通讯员，扩大海总在群众中的政治宣传。加紧反帝国主义和反对世界大战的宣传，打破海员中的狭隘民族观念，进行国际海员的联合。特别使经济斗争要联系到反帝运动，在斗争中来消灭群众中的帮口观念和落后思想。

（七）海总在群众中的工作有了相当发展，应召集代表大会改选海总执行委员会，吸引非党的海员参加指导机关，逐渐成为海员群众的组织。

（八）沿海各省的党部要以最大的力量来帮助海总建立海员工作，加紧对于党的海委工作的指导，注意海员中党的发展，加紧党员训练工作。

（二）铁　　总

（一）纠正过去以小站包围大站，放弃开车生火工人的工作，注意路棚小工的错误观念。在铁路中应以大站为中心，开车生火及机器工人为中心群众，建立铁路工会的基本群众的基础。

（二）参加到各路黄色工会下层组织中，领导群众在不断的斗争中反对黄色领袖，夺取大多数群众到铁总影响之下，特别注意中心群众的争取。

（三）加深反军阀战争的宣传，反对一切军阀割据铁路，加紧剥削工人，搜刮铁路的收入，拖欠工人的工资，作战争的用费，以及对于工人的欺骗宣传。在战争中要领导群众作反军阀战争的行动。

（四）在北方铁路工人中要坚决反对新旧交通系、改组派及一切军阀走狗破坏铁路工人运动，分裂工会的组织。在国民党各派的冲突中不应帮助这一派来反对那一派，党与铁路工会应当提出工人的经济要求，反对整个的国民党。在群众中要指出国民党无论那一派都是压迫工人，利用工人作工具以作政治上的活动，应当领导群众将他驱逐出去，由群众自己来组织工会。对于没有工会组织的，应运用工厂委员会的策略将他团结起来。

（五）铁路工人运动以北方为主要工作区域。全国铁路以京汉、京绥、京奉、津浦、南满、中东、沪宁杭、粤汉为中心路，在每路中要以主要大站为中心，如京汉之长辛店、石家庄、郑州、信阳、江岸，京绥之南口、张家口，津浦之天津、济南、浦镇，京奉之唐山、奉天，南满之大连，中东之哈尔滨，正太之石家庄，胶济之四方，沪宁、沪杭之上海、吴淞，粤汉之武昌、徐家棚、长沙、新河，陇海之开封、洛阳，道清之焦作，广九之广州，广三之佛山为中心工作。

（六）铁总的工作，在目前应以顺直为中心，应即刻派人到满洲开发各路组织和工作。在河南、山东及南方各省铁路工人运动，全总应以最大的力量来帮助铁总恢复各路组织和工作，加强对于南方各省的铁路工人的指导。在工作稍有发展时，即召集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选举铁总，强健指导机关。

（七）铁总要改变过去委派工作人员到各路工作的方式，多派人参加各路工厂中做工，特别要注意训练过去有斗争经验的失业工人帮助恢复工作，或参加到其他各铁路工厂工作。铁总及全总应即刻开始进行各路在业工人的训练工作，培养下层干部人材，树立各路群众的基础。

（八）铁总的周刊应立即恢复按期出版，扩大铁路的宣传，在各路设通信员，建立各路独立发行系统。

（九）在铁路所在地的各省党部，应以铁路为主要的中心工作，集中力量艰难困苦的来建立这一工作，加强对于各大站地方党部的组织和领导。

（三）矿山五金工人的工作

（一）矿山运动以唐山、本溪湖、抚顺、福中、中兴、淄博、六河沟、象鼻山等为中心工作，唐山五矿为最主要的中心。目前的工作是积极参加到黄色工会内夺取下层组织的群众，特别在维持队的工作，建立党的基础与群众中心组织力量。目前的策略是发动各部群众的日常斗争，扩大党与赤色工会的宣传，反黄色领袖。其余各矿应立即开始去建立工会工作。

（二）矿工运动应注意机器工人的工作，使里工外工也组织在一个工会内。反对国民党与黄色领袖分裂群众的组织。运用工厂委员会的组织团结广大的群众，逐渐转变为赤色工会的组织。

（三）五金工人运动以奉天、太原、武汉、上海、成都、广州、巩县等处兵工厂，和上海、香港造船厂为工作中心。这一工作历来党与工会都没有充分注意，加以敌人对于兵工厂的防范特别严厉，在工作上感觉进行的困难。但是有关系各省的党部与工会必须要艰难困苦有耐心的去建立群众中的基础，开始进行工作的方法，可运用各种灰色团体的组织去团结群众，逐渐在工作中斗争的领导中发展到赤色工会的组织。

（四）上海工会的工作

（一）上海目前工会运动应坚决的运用公开活动的策略，使工联会的组织成为广大群众总的团结，扩大赤色工会运动，将上海总工会的秘密路线之下的工作，转移到工联组织，去加强工联的组织与领导力量。

（二）在上海工会运动中要肃清委派制度的残余，建立群众组织的路线。工联会要尽力吸收非党的工人领袖和积极的分子参加工联的一切工作，纠正过去以工作人员所形成的组织系统。要在工会内实行民主化，多召集各种形式的会议，使大多数群众参加工会一切问题的讨论，逐渐成为群众的组织。

（三）工会运动的基础，大部分还建立在手工业工人店员方面，过去对于重要产业工人的工作，做得不大充分，今后应当将工作中心转移在产业工人中，特别是工联的群众基础要建立在海员、铁路、五金、市政、邮电、码头等重要产业工人的组织上。目前工联要以这些重要产业工人的工作为主要的中心工作，建立中心群众的基础，但不要又走到完全放弃手工业店员工作的极端道路。

（四）在上海没有组织的广大纱厂工人，工联应积极将他们组织起来，最好的方式是运用工厂委员会来团结这些无组织的群众。在轻工业中的女工青工是轻工业工人主要群众的工作，更运用各种方式来组织他们领导他们的斗争，特别是女工群众，过去对于这一工作的忽视是非常错误的。

（五）过去对于黄色工会的工作，除了在邮务有进步外，其他重要的黄色工会如商务、英美、南洋、报馆、笔墨等没有有计划的去发展下层群众的工作，和反黄色领袖的斗争，今后更当特别注意这一工作。只有在这些黄色工会的工作有基础后，夺取其群众到赤色工会影响和领导之下，才能给黄色工会运动一个重大的打击。

（五）香港的工会工作

（一）严厉纠正过去狭隘的秘密的工作路线，在香港应用公开活动的方式扩大赤色工会运

动是可能的。对工人代表会的组织，应用公开活动的方式来扩大他的组织和影响。

（二）香港的黄色工会多系行会性质的工会，对有群众的工会，我们应参加进去，按照产业的组织和工厂委员会的方式夺取其群众。

（六）其他各地的工作

（一）武汉、广州在过去极端白色恐怖摧残之下，使工会工作在不断破坏中完全瓦解。但是群众的革命情绪并非被白色恐怖压迫下去，目前正是蕴藏待发。党与全总应以最大的力量来恢复和建立这两个重要区域的工会工作。

（二）满洲在日本帝国主义直接经营之下，工业的发展到最近实令人惊骇，差不多变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了！在历史上对于满洲的职工运动非常忽视，至今工会运动还是尚未开发的状态。最近东三省在名义上是统一于国民党旗帜之下，对于工人运动仍然是极端压迫，就是国民党在群众中的活动，同样是秘密方式。满洲的工人群众虽然缺乏斗争的历史，但是群众的生活在日帝国主义直接和间接剥削之下已痛苦不堪，自发斗争逐年增加。满洲不仅在工人数量占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日帝国主义对于中国侵略关系上，以及邻近世界第一个工人国家苏联更表现其重要的地位，这是党与全总不可忽视的。要以最大的力量去开辟满洲的工人运动，运用各种方式（办学校、俱乐部、寄宿舍、体育会等）去发展工会的工作，铁路、矿山、奉天兵工厂是最主要的中心工作。

（三）天津、唐山、青岛、北京是黄色工会最发展的地方；参加黄色工会的下层群众中，要正确的运用对黄色工会的一切策略，夺取大多数群众到党于赤色工会影响之下，是目前职工运动中最主要的任务。目前群众斗争正是继续不断的爆发中，合法斗争的倾向有非常严重现象，坚决的发展群众直接行动的斗争，是引导群众脱离改良主义的影响，走上革命斗争的道路，这是目前最主要的策略。

（四）无锡、南通是工业发展、产业工人多的区域。最近群众斗争的发展，特别是无锡几次总罢工的发生，因为党过去没有注意此地职工运动的工作建立，在这些罢工中，党没有一点影响，这是非常严重的现象。今后应立即开始来建立这两个地方的职工运动。

（五）南京、芜湖、九江、杭州、宁波、济南、厦门、汕头、宜昌、成都、苏州、长沙这些重要城市职工运动都不发展，今后各地党部应以全力来发展职工运动，建立城市领导的基础。

告红军将领士兵同志书

（一九二九年六月）

英勇奋斗的同志们：

你们艰苦奋斗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在中国革命大失败之后，在反动统治阶级残酷的白色恐怖时期中，你们帮助湘鄂粤赣闽工农劳苦群众的斗争，曾经建立了若干县的苏维埃区域，实行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肃清封建势力，创造群众自己直接管理的政权。并且经过二百余战，都给封建军阀以严重的打击，使革命政纲的影响，更加在广大群众中扩大，使镰刀斧头的红色旗，仍然飘扬于白色恐怖的中国，使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的勇气更加兴奋，使反动统治阶级发抖，这不仅在革命的历史上有伟大的光荣，而且在促进新的革命高潮的前途上亦有很大的意义。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工农劳苦群众对于你们表示极诚意的慰劳！尤其是对于因奋战而死亡的同志们表示十分哀悼！

现在反动统治阶级，已经走上他们崩溃的道路。革命复兴的时期，将要来到我们的前面，帝国主义、买办、地主、资产阶级，他们联合一致的镇压革命以后，他们马上互相抢夺在我们工农劳苦群众身上压榨得来的赃物，又在互相火并起来。蒋桂两系新军阀的战争早经开始了，现在蒋冯战争又在酝酿，再次爆发，更引动了阎系奉系，也参加这一冲突，也在互相仇视，故全国范围的战争在扩大，是一必然不可免的事实。他们这样的混战，便是他们必然崩溃的一个条件。

在反动统治阶级镇压革命，高唱他们胜利的凯歌当中，更残酷的向我们广大工农劳苦群众压榨：帝国主义加紧来奴隶中国民族，地主加紧对农民剥削，资本家对工人进攻，军阀加紧对兵士的压迫，特别是白色恐怖的摧残，将近几百万人都死在统治阶级刀枪炮火之下，统治阶级自以为是完全胜利了，而不知道这正是掘自己的坟墓！现在他们正在开始争夺这一肥厚赃物，而广大工农劳苦群众又已开始新的反抗的斗争。全国工人群众，上海，香港，天津，武汉，几个中心的区域，斗争已开始复兴，全国农民群众，尤其是湘粤赣闽，反抗日益加强。军阀军队的士兵群众受不住官长的苛虐待遇，反抗哗变的事，更是日见增多。虽然统治阶级用尽威逼利诱的方法，想来遏止群众斗争，但是群众革命的情绪，仍然是向前开展，这便是新的革命高潮，必然到来的象征！

英勇奋斗的同志们，全国几万万的工农劳苦群众，都在整顿自己的队伍，加强自己的组织，培养自己的力量，准备着一致向统治阶级进攻，推翻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的政权，你们应该继续你们艰苦卓绝的意志，英勇斗争的精神，扩大你们的武力，继续游击战争，尤其是要与广大农民群众联合起来帮助他们斗争，你们只有在广大的工农群众拥护之下才能战胜一切敌人，假如广大的群众离开了你们，必然要遭受很大的失败。这样与将来全国革命斗争的力量汇合起来，实现革命的彻底的胜利。

英勇奋斗的同志们！你们是工农的武装力量，你们是革命的先锋队，你们不仅是要以你

们的行动来影响工农群众，而且要把你们自己的经验和认识告诉工农群众与敌人军队中的士兵，提醒他们痛苦的来源，指出他们的出路，告诉他们只有自己的组织斗争的力量才能扫除压迫，才能得到解放。使他们都在你们影响之下，组织起来，斗争起来。然后革命的力量才能更加扩大。你们不仅要做一个革命的武装战士，而且要做一个革命的宣传员和组织员！

中国共产党正在领导着全国工农兵士群众作艰苦的斗争，与你们一样的艰苦的斗争。我们相信只有我们斗争的胜利才能解放我们自己！我们相信只有彻底驱逐帝国主义，肃清封建势力，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工农兵士贫民自己管理的政权，才能得到最后的解放。我们相信反动统治阶级，必然要在群众革命威力之下瓦解崩溃，最后的胜利必然归于我们！

英勇奋斗的同志们，你们已经开始了建筑革命道路伟大的工程，全国工农劳苦群众也在一样的开始这种伟大的工作。中国共产党号召你们，继续你们艰苦卓绝的意志，英勇奋斗的精神，来完成你们未尽的使命！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代表买办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府！

消灭军阀战争！

建立工农民主共和国！

工农解放斗争胜利万岁！

工农的武装——红军万岁！

中　央

（原载《布尔塞维克》2卷9期）

中国共产党
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的决议与精神

——中共中央通告第四十号，一九二九年七月九日——

各级党部，全体同志们：

六次大会后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业于日前开过了。此次全会开在六次大会一年之后，正当着世界革命运动与中国群众斗争都在开展的时候，他负有重大的历史任务，来解决目前许多严重的策略问题。全会到有过半数的中央委员及参加的同志六人，会期六天。在六次大会的路线与共产国际训令的指导之下，在全党一年来艰苦奋斗与党内一致的精神之中，全会很顺利地成就了他的重大任务。会议中通过了政治，组织，职工和对于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的各种决议案及各种宣言，主要的成功在获得关于政治的原则的更正确的分析和解释，政治上策略上更具体的工作方针，组织问题，职工运动更显明的任务与工作方法，特别是对于中央政治局过去一年来工作路线的满意并给予今后工作以更实际更周密的指示。

现在扼要地报告如下：

全会认为中央确能正确地应用六次大会的策略，
并承认党已有了进一步的巩固

全会对于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报告，认为在总的工作路线上确能依照六次大会的精神，正确地应用六次大会所规定的策略。在过去九个多月工作中间，全会承认我党于不断的党内党外的艰苦斗争中在政治上组织上都得着了进一步的巩固。这一方面证明六次大会路线的正确，另一方面正因为中央能将大会所规定的原则，在实际斗争中正确地运用。全会指出中央过去有时对于政治事变的应付迟缓，对于政治形势的分析在原则上虽都完全正确，只在有些解释上不免有过于机械或过分估量的毛病，致引起一些同志不正确的政治观念，今后需要更求正确，全会满意中央过去对各级党部之策略上的指示与职工运动的督促，尤其是关于五一，五卅运动对于主要城市的具体指示。因此，全会特指示中央政治局对于八一运动的工作，应运用五卅运动在上海的经验，对全国要有更具体的布置。关于农民运动，苏维埃区域工作，士兵运动，红军及游击队中的工作，全会认为中央还少工作上的积极指导。反帝运动注意得还不充分。工作区域及各种运动缺乏平衡的配合，尤其是武汉广州中心区域的工作至今犹未建立，需要中央之极大注意。全会承认中央在组织宣传工作上取得了相当进步，同时指出他一些缺点。

全会同意中央在党内政治斗争的路线

全会同意中央在党内政治斗争中所采取的主要是反对右倾的路线，同时防止左倾的情

绪。中央解决党内非政治纠纷的原则是教育方法，他在教育方法感觉不足时便须采取组织上的最后制裁，如中央对于江苏问题顺直问题的解决，全会是认为正确而需要的，并批准将×××与×××同志从中委会中开除出去。全会同意中央指出最近托洛斯基反对派在中国党内活动，有他暂时的发展可能与其反革命的作用，值得全党之严重的注意。这些党内政治斗争的路线，是巩固中国党之最有力的保障！

全会指示中央之今后对各部分的工作方针

全会指出中央以后对各级党部的指导需要更具体切实。过去一年来青年团是始终在六次大会及党的中央正确路线之下奋斗的，全会指示党中央今后更应加紧帮助青年团工作。中央农委妇委应加强自己的工作。全总党团应更集中力量于汉路海员矿山等工运以及与各地赤色工会的关系和指导。济总党团应开始建立济难会本身的独立的群众组织与工作。全会更特别指出中央过去对于针对着国民党群众运动的反抗运动做得极少，需要中央今后之极严重的注意。在宣传上要注意理论上的批评运动。关于中央本身的分工与集体指导，中央各部的相互联系，中央与各地的交通，与国际以及兄弟党的密切关系，全会都指示中央今后应更求改善。这些工作之更完善的建立与发展，必能使党在群众中的领导更加有力，使党夺取群众的范围更加扩大，而日益走向革命高潮。

世界革命危机更深，中国革命运动开展，
同是加重了中国党目前争取群众的任务

一年来国际上各种重大事变之经过，充分证明我党与国际六次大会所指示的世界革命危机加深是铁一般的正确。第一，帝国主义战争的危机是更加紧迫；第二，因为苏联的巩固与发展，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企图乃更加积极；第三，各国的工人阶级斗争与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尤其是日益激烈起来。在准备世界大战前面，帝国主义乃更加紧了进行瓜分中国的阴谋与中国的军阀战争，同时世界革命的急剧，亦帮助了中国革命的发展。现在中国的政治局势，全会认为存在有三种根本矛盾：

第一，国际帝国主义是中国一切政治经济生活中的真实统治者。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日益急进，因此，更加紧了各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根本冲突。最主要的在英日美帝国主义三角冲突之中，已经表现着英日接近对美的形势。但他们对华的侵略政策根本上都没有一点不同，如果幻想美帝国主义可以帮助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独立的发展或是过分估量美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发展，以为他已经取得了南京政府领导权，都是极端错误的。

第二，现在的中国经济，封建阶级虽日益崩溃，但尚存在他的强固基础，加以帝国主义的利用与维护，于是军阀制度和封建半封建的上层建筑仍然是中国政治变动的主要动力之一。所以国际反对派以为中国已经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政权，中国革命已经是社会主义革命，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同时，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反革命以后，便完全买办化了，与封建势力没有矛盾了，完全放弃自己的民族民主的改良主义政纲，也是不正确的。故现时统治营垒中，仍存在有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与封建阶级的根本矛盾。但如果夸大了这一矛盾的事实，以为资产阶级还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统治的要求，还有革命的作用，更是极大的错误，并且他们在对于中国革命的共同矛盾之前，仍然要联合一致的。因为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冲突的加紧，因为统治阶级中有阶级矛盾的存在，因为军阀抢夺地盘的争斗加紧，战争仍成为统治

阶级内部不可避免的经常状态，而日益加紧其走向崩溃。因此，统治阶级对于工农劳苦群众的剥削乃更加残酷，群众生活乃更加痛苦，群众斗争乃必然不可避免地向前开展。同时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压迫剥削加紧，地位加强，亦引起群众反帝运动的复兴。

第三，现时的反动统治与群众革命斗争的冲突是中国目前政治局势中最严重的矛盾。现在工人斗争正在开始复兴，乡村的土地革命运动正在逐渐发展，有些苏维埃区域及朱毛红军仍然存在，投身到农暴区域的兵变仍时时发生，反帝运动正在复兴，这都证明整个的革命运动是向前开展的形势。在这一形势中，全会指出有几个特点：一、从小斗争发展到大的罢工；二、从反抗资本进攻开始进到争自由反国民党的运动；三、改良主义及黄色领袖的影响相当缩小；四、党及赤色工会的影响相当扩大。这虽不可以过分估量，但新的革命高潮的象征，的确可以看见。故以为中国革命高潮之来到将遥遥无期，或以为很快地便要到来，都是不正确的。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必须坚信只有斗争，只有看我们争取群众的力量才能决定革命高潮到来的快慢行程。

在目前政治局势下，全会认为党须坚决执行十五项政治任务

依据目前的政治局势，益发加重了党之争取广大群众准备武装暴动的总任务。党及国际六次大会所指出的现在的革命根本任务：驱逐帝国主义，统一中国，实行土地革命，消灭封建势力，推翻豪绅资产阶级国民党的政权，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无疑地是正确的。并且党在一年来工作的结果，党的政治影响及领导群众力量已有相当进步，但是国民党改良主义在群众中影响尚未完全打破，群众斗争力量还很薄弱。党在群众中基础还不强固，所以全会认为党要争取广大群众，必须坚决执行下述任务：

一、加强反帝斗争，联系到反世界大战与拥护苏联。同时要认明推翻帝国主义统治与土地革命之彻底完成是两个不可分离的任务，但决不是土地革命之外便没有独立的反帝运动，然又必须与工人运动反国民党反军阀战争有密切联系。

二、坚决领导反豪绅买办资产阶级国民党统治，发动一切群众的斗争，向着这一总的目标前进。

三、扩大反军阀战争的斗争，总路线是采取失败主义的原则，目前要利用战争所给与群众的一切痛苦发动日常斗争以联系到总的政治任务。

四、加紧地领导，扩大并深入土地革命的斗争。土地革命的彻底完成固要在革命胜利之后，但如果以为全国工农武装暴动前便没有土地革命斗争，实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

五、继续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坚决斗争，要从群众斗争中揭破改良主义的欺骗。同时，理论上的攻击也是非常必要。目前改良主义的影响的确有相当缩小，但如果以为改良主义已经不是革命的严重敌人，这是不正确的。另一方，如果夸大了改良主义，以为有很大实现可能，那更是极大错误。

六、加紧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仍是目前争取群众的主要任务，但现在的形势决不应拘束在日常斗争的口号之下，而应进一步坚决地从小的斗争扩大到大的罢工，从经济斗争发展到政治斗争，并应有计划地汇合各种斗争到总的争自由斗争。

七、加强工会运动与黄色工会中的工作。如果党在工人阶级中特别在重要产业工人中没有坚固的基础，没有党所领导的工会，党便不能在革命中握着领导的地位，但如果以为赤色工会是我们的中心而忽视黄色工会中的工作，也是错误的。在工运中目前最主要的最中心的

任务是特别加强在铁路海员矿山等重工业工人中的工作。

八、加强对农运的指导，更有计划地进行工作；在目前农村斗争中，无条件地反对富农，仍是错误的(注)，但决不应放松雇农贫农对他的阶级斗争，同时应注意发展雇农的组织。现时全国的灾荒尤其是北方在客观上农村斗争有极大发展可能，因此党必须坚决地反对农村中和平发展合法运动躲避主义等等右倾危险，同时也应纠正左倾的残余。

九、领导游击战争，扩大苏维埃区域与建立红军。目前农村斗争的形势，很易于走到武装的冲突，故领导游击战争必须是有组织的成为群众斗争的行动。党在苏维埃区域是要实行土地政纲，以发动更广大的群众。扩大苏维埃区域，同时要尽一切可能建立和扩大红军的组织。至红军的集中与分散，要依据主客观的条件来决定。

十、加强士兵运动。中国革命如得不到广大士兵群众参加，将得不到并不能保障革命的最后胜利。过去各级党部对于士兵运动有一般的忽视，以为这是军事工作人员专门的工作，其实对于士兵的鼓动和宣传是每一党员的责任。在目前兵运中，如采取兵变主义，或是不承认军阀军队中有士兵的日常斗争，都是错误的。在帝国主义驻华军队中，党也要有鼓动和宣传工作。

十一、巩固党的组织，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尤其是要深入铁路，海员，矿山，金属业，兵工厂，市政，纺织工人群众中去，建立党的支部，以强固党的斗争和领导力量。

十二、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扩大党的政纲宣传，特别是加强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在斗争中解释党的基础理论与策略，并联系一切鼓动口号与宣传口号。以提高党员政治水平线，但同时反对党内政治清谈的恶劣倾向。

十三、扩大党在城市贫民中的影响，特别注意学生运动。在反帝与争自由的运动中，城市贫民特别是学生群众是工人阶级在城市的有力同盟军。认为中国学生群众的革命作用已失掉了，是不正确的观念，但同时要严重防止在一切运动中，小资产阶级动摇性的表现。城市贫民反苛捐杂税运动，党也须坚决领导向着反国民党统治的道路前进。

十四、注意青年妇女工作。青年工农生活的日益恶化，女工轻工业中数量的激增，农妇地位的重要，青年妇女在工农斗争中作用的重大，都使党要用极大力量来注意青年妇女工作，尤其是帮助青年团的工作。

十五、加紧党员军事化，与群众有武装训练的组织。党若不努力实现这一任务，党便没有决心准备武装暴动。在工农和青年群众中党必须发展纠察队维持队赤卫队等组织以实施武装训练。

全会指出党之主要的策略路线

为要完成上述十五项任务而减少困难，全会指出党必须为下列的主要的策略路线在党外党内作坚决的斗争：

第一、争取公开活动，同时应使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联系起来。在非法的环境中，党只有利用一切机会，公开做宣传鼓动工作，公开号召群众斗争，公开组织群众，才能影响发动和夺取广大群众到我党的周围。同时应加强党的秘密工作——支部与党团的工作，才能更加巩固党的领导力量，而公开工作的发展也可使党的秘密工作易于扩大和存在。且公开活动是

(注) 此句错误处在共产国际关于农民问题之指正信来后，中共中央已于原决议案上加以改正。

在不断斗争中受到不断压迫一直争向革命高潮，决不是降低我们口号向国民党求得公开的公开主义。

第二、目前党在策略上所特别遇到的困难是党内右倾思想的发展。这不仅继续着党内机会主义残余，并且反映群众中一部分失败情绪与不正确观念，故和平发展，合法运动，公开主义等右倾思想便不断发生。当然这不是说他已到了最后的形式，已有了一个危险派别，但依着主客观条件来看，实须党坚决地予以斗争，以防止他可能的发展。

第三、另一方面，假使以为一切"左倾"的危险已完全肃清，或者"左倾"并不危险，那也是非常错误的观念。目前严重的左倾危险，是不愿意争取公开活动，不愿意进行日常的部分的斗争，不愿加入有群众的黄色工会，盲动主义残余与急性的情绪等等，都须党予以肃清，以打破党之脱离群众的现象。

全会指出党在组织上的进步与弱点，
工作上的缺点以及正确的组织路线

依据党的组织状况，全会指出党虽在一年来处境仍是非常困难，但经过党内党外不断的斗争，的确已取得了相当进步，已将党从涣散状态中挽救出来了。一般地说党内的削弱已渐趋稳定。但同时还存在有组织上的弱点与工作上的缺点。这些弱点，特别是党的无产阶级基础薄弱，党员政治水平线低微，工人干部缺乏，机会主义及盲动主义尚有残留，乃很易助长党内各种不正确政治思想尤其是右倾思想的发展。然决不应因此便忽视了组织上另一方面的进步，且应针对着这一进步，艰难耐苦地努力消灭党在组织上的弱点与缺点，以加强党的布尔塞维克化。全会认定党在组织上的正确路线是：(一)欲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首先要深入到重要产业工人群众中去，注意党员质量的发展，使改造党的旧基础与发展新基础同时并进。(二)支部是党的基础，群众的核心，党要注意建立中心的产业支部，创造支部生活，使每个党员都能在支部中为党工作。(三)地方党部目前在组织上应以建立中心工作，实行党内正确民主化，坚强党的纪律，建立工厂小报与地方宣传品，注重发行分配工作，加紧训练干部尤其是工人干部为其主要任务。(四)上级党部应特别努力于政治及中心工作的指导，加紧巡视工作。(五)党应将帮助青年团的工作看做自己的工作。党内应严重注意秘密工作，从深入群众中去消灭党员自首叛变的现象。(六)党与群众组织必须划分，相互关系必须确定，党在群众组织中必须有党团的组织和工作。

全会坚决反对党内不正确的组织观念，
并主张消灭反对派在党内的活动

全会承认六次大会后党内生活，的确表现了些新精神——为党的正确路线斗争的精神。但有些同志却主张党内和平，主张极端民主化，破坏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有些同志发生了组织上的取消观念或形式主义的残留。现在党处在白色恐怖下，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又甚浓厚，特别是小组织倾向与派别观念的发展，很易与国际反对派的活动结合来分裂中国党，因此，全会认为我党不仅应注意政治路线的正确运用，还须注意党内铁的纪律的保障。各种不正确的倾向，必须领导全党与之作坚决斗争。不正确的组织观念，必须坚决地反对，而反对派在党内的活动，更须予以理论上的指斥，组织上的制裁，来消灭，并肃清其领袖的活动的分子。

全会指出目前工人斗争在开始复兴中的特点，并规定今后工运的中心任务

全会指出在现在反动政治局势下，工人的生活状况愈陷于奴隶牛马的地位，工人的斗争乃继续不断地发展。在工人斗争开始复兴的形势下，斗争的特点表现出更加扩大，深入与政治意识的增进，黄色工会下的群众亦更加左倾，而他的前途必然是继续开展。反动势力帝国主义国民党资本家都在一致地加紧进攻工人，尤其是改良主义与黄色工会的作用是最妨害工人斗争发展的武器。六次大会所规定的职工运动的策略，根据于一年来的工作经验，无疑地是正确。全党对于这一任务的执行虽表现有相当进步，但还不充分，许多右倾与左倾的错误还未完全改正，重要产业工人中的工作还有忽视，工会工作还没能有广大群众的基础。因此，全会更规定工运今后的策略路线与中心任务是：一，积极发展重要产业工人运动，特别是铁路海员矿山工人运动；二，领导工人群众与改良主义作坚决斗争；三、参加有群众的黄色工会，发展群众斗争，扩大党的宣传，组织中心干部，夺取广大群众，以推翻黄色领袖，改变其工会性质；四，发动和扩大工人群众的经济的政治的斗争，强大工人斗争的战斗力；五，由下而上地去群众中发展和扩大阶级性的群众性的工会组织；六，利用社会一切公开可能机会，扩大赤色工会的活动；七，正确地运用工厂委员会的策略；八，加紧青年工女工的工作；九，领导失业工人的斗争；十，领导农村工人的斗争与其工会的组织；十一，加紧和扩大党在工人群众中的政治宣传；十二，注意工人武装的组织和训练。在这些任务前面，全会认为赤色工会的工作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应争取广大群众到自己的周围，坚决地反对劳资合作，揭破黄色领袖欺骗，不放松反帝反国民党反军阀战争的斗争，联合国际工人阶级，反对第二国际，赞助农民土地革命，努力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加紧领导群众日常斗争，注意重要产业重要地区的发展，引用非党的工人到工会机关。只有在不断地实现这些任务的过程中，全总的工作才能获得了稳固而广大的基础，党才能争取了广大的工人群众到自己的周围。

× × ×

同志们，以上便是二中全会的决议与精神！全会的一致的决议是我们在六次大会精神与国际指导之下制胜敌人与夺取广大群众促进革命高潮之更进一步的成功的武器！

中央政治局依据全会的指示，号召全体同志站在六次大会的精神之下一致地努力执行这一切的决议，使全会的决议成为实现六次大会精神与中国革命使命的最完善的工具！

中 共 中 央

（原载《布尔塞维克》2卷9期）

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农民问题的信

（一九二九年六月七日）

亲爱的同志们：

在前次那封关于政治问题的信里，我们没有说到农民问题，因为我们打算另外写一封信来专门说明这个问题。自从发出前次的信以后，我们虽然经过相当的同志在口头上传达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可是我们以为最好是不只限于口头上的传达，而除了口头上的传达以外，并用书面的形式来叙述我们对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的观点。

局部地说来，还有一个原因，也使得我们必须写一封专门信，这就是：有个别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在解决农民问题时，至今还犯着极严重的错误。例如我们最近接到的关于中央工作的文件和材料（关于农民运动问题的训令、中央给毛泽东同志的信、蔡和森同志和李立三同志在“布尔塞维克”杂志上的争论以及其他许多材料），都是证明。许多党员，对于中国共产党依照目前的环境而应该在农民问题上所采取的策略，还不十分明了，对于无产阶级必须和中国农村里各个社会阶层所应该建立的关系，还不充分明了。这类的问题，对于中国共产党，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如果不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那末就会引起很严重的和很不好的结果。因此我们号召你们来极其认真地重新讨论农民问题，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请你们注意到我们的以下几个意见：

在前一封信里，当我们分析到中国经济底一般情况时，我们就已经指出中国农业危机底增长。因为世界帝国主义破坏中国底最古的农作物（茶、丝），因为地主军阀和高利贷者强盗式地抢劫农民，因为灌溉设备荒废不振，农业生产力日益破坏，所以收成极坏，饥荒流行。严重的和绵延的农业危机，一定会使农民基本群众底生活日益变坏，日益贫穷破产。中国的反动势力完全没有能力来阻止这个过程，完全没有能力来减轻现在的农业危机。大家知道，在中国，只有在肃清目前笼罩中国农村和阻碍国内一般经济发展的那一切封建关系残余以后，农业生产力才能有多少切实的和显著的发展。大家也知道，中国反动势力在这一方面并没有得到任何成绩。这是不言而喻的。中国资产阶级，大多数都是与土地私有制密切联系着，与整个封建剥削制度密切联系着。以南京政府为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联盟，已经证实了，它甚至于不能够而且不愿意暂时和局部解决土地问题。

不错，南京政府现时正在准备某些地制改良。以胡汉民当主席的委员会正在进行这件事情。但是无疑义的，这些改良将使农民基本群众底生活更加变坏。他们正在规定新土地税则；不难预料，这个税则底重担，将完全落到贫农（佃农和半佃农）肩上。同时，他们又预备实行依照政府定价来收买土地的办法，这个办法，当然会成为统治阶级剥削独立小农的工具。无论如何，国民党的“草案”甚至于还不能象俄国斯托雷平地制改良那样，稍许助长资本主

义的发展哩；它们无论如何都不会减轻农业危机，而且就是它们幸而实现了，实际上也不过是等于改变土地税，使农民更加破产和更加遭受束缚。

南京的统治者连多少有点切实意义的地制改良，都不能而且不愿实行，这样他们便使中国农村里在现存制度内所不能解决的矛盾，更加紧张起来。而国民党农民政策底整个实际，是要在经济方面来加紧压榨完全没有政治权利的农民。实在的，现在中国反动势力底胜利，对农民说来，就是加重租税担负，新添附带捐税(由地主豪绅征收来维持民团)，派遣围剿队伍，实行残酷压迫，实行“清乡”等等。这类的实际，把一切认为在保持地主资产阶级政权时能够减轻农业危机和提高农民群众幸福的幻想，都打得粉碎。

而在日益发展的农业危机底基础上，农民群众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底恶化，必然会加紧中国农村内的阶级斗争，必然会加深和加紧农民基本群众与剥削他们的那些剥削分子中间的冲突，必然会使农民运动有雄伟的新高涨，必然会使农民组织增长起来，必然会使广大农民群众迅速革命化。这种前途，在现时就已经被中国各省不断的农民发动所证实了。

甘肃省的回教农民运动，依其运动底范围来讲，是具有重大的意义。农村里“红枪会”、“小刀会”及其他秘密的和神秘的团体，都重新积极活动起来。朱毛底游击队伍，虽然反动势力三番四次企图扑灭他们，可是他们不但能够保存了自己的干部，并且最近在福建省还达到了许多胜利。在其他的地方，也有农民运动。尤其是必须指出，农民武装起义，甚至于蔓延到上海附近的地方。虽然，在这些发动之中，有大部分是为反动分子所领导，然而共产党决不应当因此而就削弱自己的积极性，而且反而应该进行更加坚决的斗争，以求取得这些自发的，客观上革命的，为土地、为反军阀苛捐杂税的农民运动的领导权。

你们不要误解我们的意思，以为我们所举出的这些事实，就是证明强大的革命高潮（农民运动高潮在内），已经到来。不，这种结论，是不合于实际情形的。我们举出这些事实，不过是想着重指出：在中国共产党面前，是和从前一样，还保存着非常有利于到被剥削农民群众中间进行工作的前途。党应该利用这种客观环境，去宣传自己的纲领，去恢复农民底革命组织，去准备迎接行将到来的革命高潮，去在与帝国主义及中国反动势力作不调和斗争底旗帜之下动员群众，去揭露国民党，使大家知道，国民党为了地主的土地占有制，使极大多数农民势必陷于死亡、贫困和破产。

但是，如果不和农村中各个社会阶层建立正确关系，则党底争取农民群众的斗争就不能得到成效。在这里，我们首先须得提出对待富农的策略问题，因为中国同志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最重大的错误。对待富农的策略问题本身，在中国共产党内，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这个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底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也曾加以讨论。还在那个时候，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分析到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说到无产阶级与全体农民联盟时，就已经把往往带有公开的或暗藏的反革命作用的富农，放在这个联盟以外。因此第六次代表大会决定：“无产阶级在农村中的坚固的柱石是贫农；而中农则是坚实的同盟者。”为什么必须把富农放在全体农民群众以外呢？许多中国同志，直到现在还不明了这个问题。他们机械式地了解列宁关于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上工人阶级对农民态度问题底提法，而把中国的富农当作无产阶级底同盟者。

而在事实上，列宁底工农联盟公式，对于中国也是依然适用的。可是列宁从来没有主张联合富农。联合富农，这无论在什么条件之下都是不容许的。从列宁的公式中，绝对得不出结论说，在中国党底一些文件中所提出的“联合富农”这个口号是正确的。这个结论，对中

国说来，更是不对，而且如果注意到使中国富农与俄国富农二者之社会本质不同的那些特殊条件，则这个结论的不对更是明显了。在俄国，一直到在一九〇五年革命被镇压下去以前，富农都是资本主义关系底代表人，当时，富农是与那采用封建剥削制度来树立自己的经济势力的地主阶级对立的。而中国的富农，却少采用资本主义剥削形式，而多是封建地主剥削制度底代表人。中国的富农，在大多数情形之下，都是小地主，他们用更加束缚和更加残酷的剥削形式去剥削中国农民基本群众。中国富农底这种社会本质，是由于许多原因造成的。在这中间，外资统治中国，是起着不少的作用。大家知道，外资在你们半殖民地的国家内，同最落后的、半封建的生产相依为命，扶助它、利用它、并使它屈服于自己。外国资本阻碍着中国资本主义底完备发展，这种阻碍作用，使随着农村商品货币关系底发展而来的阶级分化（以及整个资本主义发展），是在保存着许多半封建关系的基础上异常畸形地进行着。此外，还加上中国的土地关系是具有特殊的形式，因为有这种特殊的土地关系，所以富裕发财的农民，要是采用雇佣劳动，就比较用半封建方法去剥削农民基本群众的利益要少些。中国的富农，出租土地，放高利贷，这样就可以避免在独立经营农业时所必须的（尤其是灌溉设备所必须的）大批投资，就可以保证自己不受到连绵不断的军阀战争底破坏影响，就可以保障自己不受到层出不穷的天灾，就可以把这种情形所产生的一切重担，都放到佃农群众肩上去。农村里人口过剩，农民基本群众完全没有土地，这种情形使地主富农能够用奴役地租和高利掠夺方法，利用自己的资本和自己私有的土地来获得大利，所以在中国，经营自己的经济，以生产为目的而租借土地，为生产而利用雇佣劳动的富农，是极其稀少的。在中国比较最普遍地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富农——半地主。有些中国同志，想凭借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与全体农民联盟问题底提法而加以机会主义的解释，却不顾计到中国富农底这些特点；这些同志，是犯了很严重的错误，而这种错误，会使党在对中国非常重要的农民问题中必然走上不正确的路线。这种错误现在尤其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在中国革命失败以后，在农村里，富农分子照例到处都是公开地站到反动势力方面，来反对农民群众底革命斗争。

毫无疑义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案里那些不甚明确和不彻底的条文，是给了一部分人某些根据来曲解我们的农民问题策略。例如，在政治决议案里，说不要故意加紧反对富农，以便不至于抹煞农民与地主阶级间的主要矛盾。这个立论底基本的（完全正确的）意思，是说中国乡村里剥削者底中心人物和主要敌人，乃是地主和军阀，是说党在自己的策略中不应该丝毫忽略这个情形，而应该避免因忘记中国农村里目前革命阶段上农民与地主阶级间的基本矛盾而产生的一切错误。正是由于这样，第六次代表大会对于最近的阶段所提出的要求，并不是分配一切土地，而只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可是，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里说不要故意加紧反对富农，这样的条文，并没有表示出解决农民问题的真正意思，而恰恰相反，这个条文，因为没有加以理论的说明而变为独立的口号，这样就使人可以根据这个条文来做不正确的政治结论。尤其是，这个条文，可以使人这样来解释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没收地主土地的决定：以为这个决定并不适用于富农的地产，而这种解释，实际上是不对的。另一方面，在农民问题决议案里，却有一个更不彻底的条文，在那个决议案里，说要反对反动部分的富农，同时却主张使中国农村里的富裕阶级中立，甚至要吸收一部分富农，即按照第六次代表大会底意见，并未失去革命可能性的那一部分富农，来参加反军阀的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所有这些条文，便使得一部分同志拿来当作根据，用显然机会主义的精神来解释代表大会底农民问题决议案，以为必须联合富农。

不仅个别同志曾经抱有这种观点，而且——这是更重要的——在中央委员会底许多决议案与文件中，我们也看得见把党底策略解释为联合富农的观点。譬如拿中央给毛泽东同志的一封信来说吧，在那封信上说道：

"依照总的策略任务(与地主阶级斗争)，就必须联合富农；如果你故意加紧反对富农，那就错误了……。"

在另外一个地方又说道：

"可是，党不应该只是根据我们的总策略路线是要联合富农，就来放弃贫农反对富农的斗争。"

这样，党底依靠贫农而与中农联合的总路线，就被机会主义的"联合富农"的路线所代替了。因此，关于农民问题的全部争论（例如蔡和森与李立三间的争论）是走了不正确的轨道。同志们不去纠正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上的不精确的条文，却反而加深了错误，企图在理论上辩白无产阶级与富农联合的必要（例如，他们拿我们与民族工业资产阶级联合时期做比喻)。

这类的错误，尤其是在中国革命运动现时的条件之下，更是严重的危险。以前，在进行土地革命时，在农民运动第一次伟大高潮时，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中国反动势力的公开武装斗争时，在游击运动强大发展时，在有许多苏维埃策源地和我们共产主义军队存在时，我们曾经顾虑到，对于小有产的农民，以及其中的富裕部分，不要造成额外的困难；在以前那个时候，这种顾虑，是容易明白的，因为当时在极紧张的反帝国主义及反地主阶级的斗争下，与小有产农民以及其中的富裕部分的冲突，曾经处在次要地位。在那些条件之下，"不要故意加紧反对富农"，这个口号也有一些根据，因为当时一切革命力量，曾经应该集中起来，首先去打击中国革命底比较更严重的和基本的敌人。但是已经在那个时候，既然富农跑到反动势力方面去了，这种公式就已经造成错误策略底基础。至于在现时，在革命失败时，在须要重新建立自己的组织，重新建立我们的影响底支柱时，如果没有进行坚决无畏的斗争去反对任何形式的压迫和剥削，那就不能动员农民群众，首先是不能动员贫农群众。如果不提出阶级意识稳定的斗争口号，就绝对不能加强我们在贫农间的影响。而为要加强这种影响，就要领导农业无产阶级及贫农广大群众底斗争，去反对地主和富农底压迫与剥削。

对富农的策略不正确，这同时就是对贫农与雇农的策略也不正确。很明显的，既然规定联合富农的策略，党就不能认真进行工作，去组织农业工人，去加紧他们的斗争，去提高这部分最落后的而同时又是我们的农村柱石的无产阶级底阶级意识。反之，共产党只有极坚决地克服在富农问题中最有害的机会主义的动摇，才能够领导农村工人来进行有成效的斗争，以改善他们的经济生活和政治地位。共产党如果主张联合富农的路线，或者甚至只是主张不能加紧反对富农的路线，它就不能领导贫农底阶级斗争，就必然会削弱贫农群众底积极性，而帮助中国乡村里的富农剥削者。

正是相反，现时，在共产党面前，比任何时候都要紧张地摆着这样一个任务，就是必须发展乡村无产阶级底运动，把贫农统一联合起来。解决这个任务，应该是"不顾"富农，不要害怕富农"退出革命"。在现时的环境之下，就是说在国民党不无成效地利用富农来镇压农民运动的时候，而害怕富农"退出革命"，真是完全令人莫明其妙了。

农民群众底斗争，应该是与城市无产阶级底革命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在另一方面，我们党在乡村中的策略，应该与我们党在城市无产阶级日常经济斗争过程中争取城市无产阶级的

工作，互相适合。农民运动，并不一定要从号召进行土地革命开始，并不一定从游击战争和武装起义开始。反之，根据中国目前环境底要求，我们党正是应当利用局部细小的冲突，鼓起这些冲突，扩大农民基本群众反对一切剥削形式的日常斗争，将这个斗争推进到更高的阶段上去。为改善雇农底劳动条件而斗争，抗捐抗税，反对新的军阀战争，反对高利贷，尤其是为减租或抗租而斗争，——所有这些，都应该成为这样一个中介的环节，共产党一抓住这个环节，就能够鼓起数千百万群众，就能够巩固自己的影响而引起农民运动底新高潮。

我们所介绍的策略，应该不仅应用到半地主的富农身上，而且也应用到在中国比较不大普遍的自己经营农业的那种富农身上。对于后面这一种富农，党不应该拘束雇农群众底阶级斗争，不应该使自己的行动丝毫屈服于这类富农在解放运动中的态度，甚至在这类富农参加抗税运动或反军阀运动的时候，也不应该向富农让步而拘束自己的积极性；党不应该改变自己对富农的总路线，它应该与富农斗争而争取对农民群众的领导权，不使富农有利用群众去谋自己利益的可能。

组织农村无产阶级，以及团结贫农，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可以争得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对农民基本群众的领导作用。因此，在雇农中间的工作，同时也就是为的要吸收雇农去参加反帝土地革命底积极战士队伍。雇农就是没有土地的农民：他不能够，而且也不应该对全体农民为土地的斗争和反封建制的斗争袖手旁观。这里不应该忘记，虽然农民资产阶级和半地主的富农已经成了中国反动势力在镇压农民运动方面的同盟者，而国民党与中国反动势力在乡村中的社会基本的支柱，到底还是地主豪绅，因为这些分子在乡村里的统治并没有被破坏。因此，一方面，不能丝毫模糊农业无产阶级与富农间阶级对抗底认识，同时又必须在农业无产阶级群众面前，以及在全体农民面前，明白指出乡村里的中心剥削人物，就是地主豪绅和军阀以及站在他们背后的外国资本家。必须把为局部要求的斗争，去和宣传党基本口号的宣传工作，去和解释国民党政策底反革命实质的解释工作，连结起来。

要实现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就须进行极坚决的斗争，去争取中农，去使中农脱离资产阶级与富农底影响，去当着中农揭露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民族改良主义（从蒋介石的到谭平山的改良主义）底反动性，这形形色色的民族改良主义，都是一样仇视中国广大农民基本群众底实在利益的。党应该设法巩固无产阶级与中农的联盟，吸收中农参加反对军阀与反对地主的积极斗争。同时，党扩张在雇农间的工作时，应该顾计到，有很多中农都是要临时雇用劳动力的(主要的是雇用季候工人)。

为要切实把农民群众组织到共产党及其基本口号和局部口号底周围起见，除必须成立农业工人底独立组织以外，还必须建立农民革命委员会，作为农民——首先就是贫农——革命斗争底下层机关，以便反对地主豪绅、高利贷者和富农。农民委员会不应该是上层分子的组织，而恰恰相反，应该领导农民基本群众与农业无产阶级目前要求的日常斗争，在这个斗争基础上，与他们密切联系起来，而成为真正强有力的集中农民群众革命毅力的核心。在这个斗争基础上，农民委员会应该吸收农民群众参加革命农民协会，并这样去巩固它们的群众基础。同时，农民委员会应该在夺取反动组织里的农民群众工作中表现主要的作用。

现时我们要讲纯粹实际性质的指示。在这里，我们认为必须指出的，就是为要在农民间进行有成效的工作，就必须细心研究农村里发生的一切事变过程，而关于这些事变过程，直到现在，在党底理论机关报上还很少阐明。这就使党底领导机关不能把自己的指令具体化，不能审查自己的一般的决议。

在另一方面，党应该大大注意培养农民运动工作人员底特别干部。直到现在，党总是派遣在城市中找不到工作的城市知识分子工作人员到乡村中去做工作，这种惯用的办法，决不能保证巨大的农民运动工作有顺利的执行。为要实实在在发展农民运动，就必须在最近几个月里，培养出一批农运积极分子。

特别必须在最短期间派遣一些负责工作人员到广大的回族农民武装起义区域里去，那里的武装起义，现在完全没有中国共产党参加，更谈不上中国共产党底领导。在把回族武装起义群众夺取到自己方面来的斗争中，党首先应该考量到这个运动底明显的民族运动性质，并且应该根据这个事实来替中国内部被压迫民族制定自己的斗争纲领和口号。在其他的游击运动区域内，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应该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而保证与这些运动发生良好的联系，并保证自己给这些运动的领导。

在发展农民工作时，党底最重要的任务，是要在乡村中组织许多坚固的党支部，和在农民群众组织内成立党团。最后，党应该大大注意在乡村手艺工人与手工业者间的工作，力谋多多吸收他们参加一般的革命斗争。这里必须特别注意到妇女手工业者。

在终结我们这封信的时候，我们要警告你们的，就是你们切不要作出结论说中国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这种结论是完全不正确的，纯粹托洛茨基主义的结论；而如果有同志误解我们关于富农的意见，那末他就会得出这种结论。我们现在把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对乡村各社会阶层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加以确定，以及取消机会主义的“联合富农”口号，这并不动摇我们把中国革命目前阶段看作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观点。既然中国革命底资产阶级民主阶段上的基本矛盾，仍旧没有解决（还没有消灭封建地主土地占有制，还没有推翻外国资本底统治，还没有消灭军阀制度和真正统一中国），那末，对于当前中国革命浪潮新高涨底初期说来，资产阶级民主的性质仍然保存着。

但同时必须指出：除了其他的情形以外，还有在目前解放斗争阶段上就已经发生的两个情形——无产阶级与贫农联合以及巩固无产阶级对全体农民的领导作用——，也应该好好影响到从革命底资产阶级民主阶段转入社会主义阶段的转变速度。

我们觉得，在这封信里关于中国共产党在农民运动中的任务所应当说到的一些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如此。我们相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将注意到我们的意见，完全纠正党在农民问题方面的路线，将克服在这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的动摇，将加紧农村里的实际工作，将利用良好环境来在农民中进行工作，以保证在巩固工人阶级及其共产党先锋队底领导作用之下，来加速农民运动底强有力的高涨。此致

共产主义的敬礼！

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

中共中央接受国际对于农民问题之指示的决议

中央接到国际对于农民问题的指示以后，经过详细的讨论，认为国际指示之总的路线，完全是正确的。因此过去一切决议案上通告上以及对各地的指导上所发生的语句上的策略上的错误，必须加以切实的纠正，特通过下面的决议：

（一）中国农村经济关系的特点

1　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度是资产阶级的方式占优势(土地可以买卖)，地方对于农民的剥削关系是封建的方式占优势(如农产物交租和劳役制的残余)，所以中国农村经济关系是一种半封建制度。

2　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渐次打破中国农村的半自然经济，同时使广大农民群众急剧的破产。因此，一方面促进了中国农村的阶级分化，极大多数的农民沉沦到极贫苦的地位，同时也发生了极少的富有的份子(富农)；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又维持着中国的封建势力的剥削，来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于是使中国农村经济，停留在半封建关系之下，极困难的走向资本主义的发展。

3　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农村中发生广大的破产失业的群众，遂造成中国军阀军队的基础。帝国主义又利用军阀来统治中国，加以极力的维护，使国家封建制度残余形式的军阀，又恢复起来。于是军阀对于农村之各种各色的残酷的剥削，更加甚了农村的穷困与荒废，因此军阀的剥削是中国广大农民群众最不能忍受的。

4　中国土地的分配，各省的情形虽有不同，但是就全国讲，大部分的土地仍是集中在地主阶级手里，同时大地主很少，中小地主占优势。这些中小地主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日渐穷困，因此更残酷的加紧对于农民群众的剥削，并且地主愈小，剥削也愈加厉害。这样就使广大农民群众与地主阶级的对立，更加尖锐，而积极的为土地革命而斗争。所以中国的土地关系，在土地所有关系上，地主与农民的界限并不森严（即是说富有的农民很易变为地主），但在土地使用关系上，农民与地主阶级的对立，却非常尖锐。

5　中国的乡村政权，完全掌握在豪绅手里，极力镇压农民对于地主阶级的反抗，可以自由屠杀农民，抽收捐税等各种的特权，并且有他们专为镇压农民的武装（民团，保卫团……等），所以豪绅是地主阶级政治上的代表，同时豪绅又为帝国主义在乡村中的买办，军阀的爪牙，常常还是兼高利贷者，所以中国农民反对豪绅的斗争更特别的厉害。

6　中国乡村中的自然经济日益打破，货币关系日益发展，广大农民群众需要金钱日多，于是发生高利贷和商业资本对于农民的剥削，并且这种剥削常常是极残酷的。在农村中高利贷与商业资本虽然与帝国主义城市资产阶级有密切关系，但是直接经营者还是豪绅地主

与富农，绝少专营高利贷与商业资本的人。所以农民群众反高利贷的斗争，常常与反地主阶级的斗争联系在一块。

7　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阻碍着中国农村资本主义化，使地主对佃农的剥削日益残酷，高利贷的利息日益提高，于是使中国农民中的富有阶级，觉到剥削雇佣劳动的利益，还不如出租土地，放高利贷所得的利益多。所以富农有了资本便买土地出佃，和投在高利债上去，而不愿扩大自己的农业经营；这样，就造成中国富农之兼具半地主半封建性。

8　经过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把农村中最贫苦的广大群众都发动起来，主要在南方各省；这样，一方面使土地革命的斗争，益加激烈，同时也就促进了农民中的阶级矛盾(雇农贫农对富农的斗争)。

9　在中国北方各省（如河南，山东，顺直，山西等）土地关系与农村经济还有他的不同特点：第一，土地分配上，地主阶级占有的土地比较少，而农民占有的土地比较多，所以自耕农比较多，佃农比较少。第二，这些省份工商业不如南方这样发展，因此军阀的剥削大部份都是出自土地，于是军阀是经济上的大地主的意义更加明显，所以北方反军阀苛捐杂税的斗争，是土地革命中的主要内容之一。第三，因此，农民群众与军阀大地主对抗的形势异常尖锐，而农民中阶级斗争的形势，没有南方这样激烈，所以现在北方的农民斗争，虽在全国土地革命的波浪之中，但还停留在土地革命的初期。

10　满洲的农村经济，在全国中具有稍异的形式。满洲除掉与北方农村中具有同样的自耕农较多的条件外，富农经济已渐发展，而“地主经济”或地主租田制度已渐渐向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方式中进行，于是少数较大的资本主义式的农场，农业公司已渐渐出现。但这种农业经济，大半还是过渡式的半资本主义居多(即仍旧采用出租制度)，且还遇着中国特殊条件的阻碍，如东三省的大小军阀，多兼营地主经济，他们剥削而来的金钱大多用在扩充军队，以备争夺关内地盘上头，很少有余资投在农业的改良和技术的增高上头，且因其城市剥削的不足，必然要增加苛捐杂税及于乡村的自耕农，而军阀的地主经济亦遂多用租田制度以剥削佃农。因此，满洲农业的资本的发展仍然是非常之慢。南满一部分小农的破产与关内破产失业的农民不断的移到满洲去当佃农雇农之生活的痛苦，都成为满洲农村斗争的主要动力。故满洲的反军阀的苛捐杂税，反地主的封建剥削，及乡村中的资本主义剥削，是有相互关系而成为同等重要的斗争。还有一点，南满一带有日本资本投在农业上，组成很多的农业公司，如南满铁路会社，满洲棉业会社，关东厅等经营的烟草棉花等农场，以及其他方式的经营，而中国的富农经济亦多操纵在日本帝国主义手里的，所以满洲农村中的阶级斗争，亦必然要紧靠着反帝国主义的斗争。

从上面这些农村关系的特点，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

1　目前中国农村中一般的主要矛盾，是反军阀地主豪绅之土地革命的斗争，就是农民群众与地主阶级的冲突，并且这一矛盾经过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一点也没有减轻，而且还是日益尖锐的形势。

2　中国农民的上层份子（富农）一般的说不是纯粹的乡村资产阶级，而是兼有或多或少之半封建半地主的剥削。

3　农民中的阶级分化，已经日益显明，尤其是经过激烈的土地革命斗争的地方，雇农贫农对富农的斗争，已经日益激烈起来。

4　托洛茨基主义与中国的机会主义者认为“中国地主阶级已经努力资本主义化，封建

剥削已经不是农村中主要的形式，所以现在农村中主要的矛盾，已经不是反封建势力的斗争，而是反各种各色的资本主义的斗争。”从上面分析的现在农村中经济关系的特点看来，充分证明是一种无稽之谈，这就是他们走上了取消主义的根本原因。

（二）现在中国农村斗争的情形

1　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失败以后，广大的农民群众，虽然受到军阀豪绅地主残酷的白色恐怖的镇压，但土地革命的斗争，不只是没有消灭，而且是继续发展。农民的自发暴动，游击战争，从未停止，北方反军阀的群众斗争与南方各地红军活动的扩大，充分证明农村中土地革命斗争尖锐的形势。

2　国民党曾企图以各种改良的方法（如二五减租，减轻田赋等）来缓和这一矛盾，但是这一企图完全失败了（如各省正式宣布取消二五减租，百分之一的田赋政策一点没有实行)。这是由于中国军阀制度的存在，同时中小地主占优势，只有加紧榨取农民，以更残酷的方法来镇压农民的反抗，才能维持自己的崩溃，决不能接受资产阶级这种改良的办法。因此，国民党这种改良的办法始终是一种企图，决不能解决农村中的矛盾与经济危机。这样就使国民党在农村中的社会基础，始终是建立在地主豪绅上，同时正因为他的阶级基础是地主豪绅，更不能实行任何改良的办法。

3　在农村中斗争初起的时候，富农还参加反军阀地主豪绅的斗争，但是他极力想夺取这一斗争的领导权。到了土地革命深入的时候，尤其在斗争失败的时候，便很快的走到反革命方面去；如鄂西富农实行对雇农的抵制，闽西暴动危急的时候，富农是首先主张调和者，平浏赣西富农首先“反水”，都充分证明富农的动摇与反革命性。

4　雇农要求改良劳动条件之反富农的斗争，在各省都已渐次发展起来。

5　北方农民斗争还停留在一种原始的形势之中、广大农民的组织还多半是一种半封建的红枪会大刀会等。斗争的主要内容反对军阀苛捐杂税等一切残酷剥削，斗争的领导还操在中小地主与富农的手里。农民的阶级斗争，还不激烈，因此，斗争的形势便更易为中小地主与富农所领导而走入与军阀大地主妥协的道路出卖广大农民。同时国民党的资产阶级各派便看中了这一必然妥协的力量，常常勾结他们与另一派军阀冲突，以争取反革命的领导，使农民解放的运动归于失败。又一年来西北的大灾荒，更加推动农民斗争激烈起来，因此遂发生陕甘等回民的大暴动。

（三）党在目前农村斗争中主要的任务与策略

1　目前党在农村中主要的任务是领导广大农民群众反军阀地主豪绅的斗争，以彻底完成土地革命，以消灭一切封建的半封建的剥削，以摧毁了乡村中之封建基础。

2　完成土地革命与反帝国主义是两个不可分离的任务，因为封建势力是帝国主义统治和剥削中国农民的工具，所以帝国主义极力维持中国的封建势力。因此要完成反帝国主义的任务，必须彻底的完成土地革命；要完成土地革命的任务，必须彻底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

3　中国资产阶级早已叛变革命与封建势力妥协，他对农村中改良的企图只是延长封建势力对于农民的残酷剥削之反革命的作用，所以要完成土地革命，必须坚决的反对资产阶级

与他对农民的改良欺骗。因此对于现在资产阶级任何一派(国民党，改组派，第三党等)，党必须毫不放松的在农民群众中攻击他们的欺骗。

4 因此，党在农民斗争中的总的路线，是建立广大农民群众之反封建势力的革命战线。贫农是土地革命的主要动力，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雇农是党在农村中的基础，因此，这一革命战线的内容，应当从雇农起至中农止。

5 中国富农兼有或多或少之半地主半封建的剥削，在土地革命的过程中，就是动摇妥协以至反革命。所以党的策略决不应企图联合富农在反封建势力的战线之内，而应坚决的反对富农。

6 在农村斗争初起的时候，富农虽还参加反军阀地主的斗争，但党必须看清富农反革命的不可免，坚决的领导雇农贫农的斗争，扩大雇农贫农在思想上组织上斗争上的影响，极力巩固与中农的同盟，以与富农争夺领导权。

7 党应极力发展雇农独立的组织，领导雇农为改良自己生活的斗争，提高雇农的阶级觉悟，同时要领导他们成为反帝国主义军阀地主豪绅之最积极的战士，要告诉他们不应该离开一般农民反对封建势力争取土地的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巩固雇农在一般农民斗争中的领导。且在实际上，农民力争土地的运动，必然要农民到反对富农的斗争，而这些斗争又多因富农兼有半地主的剥削，以至发展到没收他的土地，或者因其拒绝雇农要请增加工资而封锁农场，则结果不是由党引导雇农走上共耕的道路，便是由雇农自动手的没收其土地——这是在土地革命深入的阶段必然的现象。

8 现在北方各省农村阶级斗争虽还不激烈，大多数富农虽还留在反军阀战线之内，但党必须毫不犹疑的执行上面指出的路线，以与富农争夺领导权，以严防富农之必然妥协以至反革命，以斩断国民党利用农民的前途。当然整个斗争之主要口号，仍然是反对军阀一切残酷的剥削与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

9 在满洲的路线应该是：反对军阀一切残酷的剥削，反对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反对乡村中资本主义的剥削，反对帝国主义的剥削，反对帝国主义的剥削应当平列着互相关联着成为满洲农村斗争的主要内容。因此，雇农与贫农之基本力量的树立，中农的吸收，仍成为乡村中巩固的革命战线，而富农则毫无疑义要走向反革命方面。

10 因此在组织上也是一样，农民协会必须以雇农贫农做基础，而吸收广大的中农加入，原则上拒绝富农加入农协；如果富农现在还留在农协之内，必须坚决的加强雇农贫农在组织上的力量与富农争夺对中农的领导，以至肃清富农于农协之外。同时加坚雇农独立的组织，已是目前迫切的任务，不可有丝毫的放松。雇农一面要有自己的工会组织，同时加入农协，形成雇农小组，以便在农协中起核心领导的作用。在苏维埃区域，如农协还有群众所信赖而未取消，我们不应采取机械的取消办法，而应先加强苏维埃在群众中的领导与组织作用，以减少农协作用，以逐渐达到取消农协目的。雇农工会则应独立的永远的存在其组织。

11 党在农村中的发展基础是雇农与贫农，但同时要巩固党在乡村中无产阶级的核心作用与领导力量。党必须坚决的拒绝富农入党。

12 党在目前农民斗争的策略，是动员广大群众，组织广大群众，领导他们的斗争，以走向新的革命的高潮，这就是说，现在不是组织暴动而是准备暴动的时候。自然在现在农村中矛盾这样尖锐的时候，农民的自发暴动与游击战争，不可避免的要不断的爆发。党对于这些自发的暴动与游击战争应当坚决的领导与扩大以深入土地革命，而扩大党在广大农民群众

中的影响。党必须使城市工作与农村农民斗争有适当的配合为发动，以促进革命高潮之到来。

13　党要实现动员广大群众的任务，必须坚决的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提出群众一切迫切要求的口号，反对捐税，反对民团，反对高利贷，减租，抗租，借粮，分粮，改良待遇，增加工资，反对拉夫拉车，反对摊派军餉等，来发动一切被剥削压迫的群众的斗争。如果认为在农村中只有武装暴动，没有日常斗争，这完全是一种极端错误的左倾思想。不过同时要认清现在农村阶级矛盾这样尖锐的时候，地主常常用残酷的武装压迫，所以农村斗争很易于走到武装的冲突，因此，在斗争发动和深入的时候，党必须坚决的有计划去领导这种武装斗争。

14　现在农村经济日益破产，广大农民群众日益穷困失业，军阀地主豪绅为着消灭农民的土地斗争，实行把农民向他处移殖(如山东顺直的移殖满洲，广东福建的移殖南洋)。党必须在农民中揭破他们这种破坏农民土地革命的阴谋，告诉农民移殖他处，还要更加痛苦，领导他们向本地的军阀地主豪绅作坚决的斗争，以争得土地与生活的改善，以深入土地革命。至于农民自动的移殖，党必须组织他们领导他们力争移殖的便利的条件（如提出地方公款津贴农民，轮船火车免费等），这样也就可以把他们消极的移殖，转到积极的向军阀地主豪绅进攻。

（四）过去的错误与现在党内不正确的倾向

在过去策略上发生错误的问题，就是富农问题。

1　机械的把富农分成资产阶级性的与半封建性的两种不同的东西，其实在现在中国农村经济关系上每一个富农兼有或多或少的封建的剥削，尤其是在他发展的前途上，资本主义的与半地主的两个前途，互相纠缠着。并且因为整个经济条件的规定，尤其是帝国主义经济在中国的控制，使他更易于走向半封建半地主的前途。这样就使富农更接近于地主阶级。过去这样机械的分划，的确是策略错误主要的来源。

2　把富农的资本主义的与半封建的两个性质，机械的分划，于是得出了反对他的半封建性而不反对他的资本主义性之奇怪的结论。其实同一富农，既然在他的半封建性上决定了他必然走向反革命，决没有又因为他的资产阶级性而参加革命。同一富农可以兼有资产阶级的与半封建的两种不同的剥削，但是不能同时兼具革命与反革命的两种行动。既然因为他的半封建性走到反革命方面去，那么，我们当然要同时领导雇农贫农坚决的向他斗争。

3　即使乡村中有很少的富农非兼有任何封建剥削，而只是拥有雇农，但他与地主阶级并没有根本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国土地又分划的极小，大地主极少，使富农看着剥削富农与兼营商业资本高利贷，堆积金钱，以购买土地，而将自己也变成地主去剥削佃农，要比参加农民为土地的斗争，轻易得多，实惠得多。加以过去大革命与土地革命深入的教训，使他更轻易了解妥协要比革命还更有利于他自己，所以过分的估量他与封建势力的冲突，以为他反对军阀的苛捐杂税便不会妥协，以为他会因希望没收地主土地，而会放弃高利贷的封建剥削，实在是错误的。

因此，党对富农的策略发生极大的动摇，或认为“不是故意加紧反对富农”（六次大会政治决议案)或认为“无条件的反对富农是不对的”（二中全会的总结通告)；或使党的策略

路线受富农态度的支配(六次大会农民决议案)。甚至提出联合富农的口号(如中央对朱毛的指导信),尤其错误的是因联合富农而牺牲雇农的利益(如江苏淮阳恐怕富农反革命而要雇农减低要求)。这些错误,尤其是联合富农的错误,可以妨害党领导农民斗争完成土地革命之急迫的任务,而走上机会主义的道路。

5 现在党内托洛茨基主义与机会主义,他们对于农民的策略上也是提出反对富农的口号,但是他的观点与党的路线是绝对不同的。他们从他们抽象的认为现在中国是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观点出发,因此不管事实的分析中国农村经济已经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占优势,所以要反对富农,这是照国际来信指出现在中国农村主要的矛盾是反封建势力的土地革命的斗争,反对富农主要是因为富农是具有半封建性的观点是绝对不同的。因此他们对中农的策略就犯了极严重的错误,认中农是"中间动摇分子",因此,他们的策略是使"中农中立"。很明显的在现在农村中,中农是一样的受军阀地主豪绅之残酷剥削与压迫的群众,他们为土地而斗争的要求是异常迫切而坚决的,所以党必须坚决的巩固与中农联合。如果采取使"中农中立"的政策,客观上就是削弱土地革命的力量,使雇农贫农陷于孤立而失败,这是极严重的错误的策略。党必须坚决的反对这种错误的观念,然后才能执行正确的策略。

这一决议案必须发到下级党部,特别是农村党部去讨论。中国农村经济关系是异常之复杂的,各级党部按照本地实际的情形,依据这一决议的总的路线决定具体的明确的策略。并须将当地的实际情形与讨论的经过及决议详细报告中央,然后中央才更能了解全国实际的情形,对各地作更具体的指导。

工人运动的发展和工会工作

（一九二九年二月）

项　　英

全国工人阶级斗争发展的形势

全国工人阶级，在过去虽在极端白色恐怖之下，受了很大的打击，但是对于反动势力进攻的反抗，还是不断的发生。在最近一年来，工人阶级斗争的情形，已逐渐向前发展，表现复兴的形势。这种原因：一、工人群众在资本家严厉进攻之下，生活状况日趋恶化，几乎不能生存，因受生活的压迫，要起来争斗；二、工人阶级虽经白色恐怖，将工人革命的斗争一时压迫下去，但现在已经相当时期的休息，斗争的力量和情绪，又逐渐恢复起来；三、帝国主义的凶横，国民党无耻的卖国，对于群众的压迫和欺骗，激动了工人阶级革命的情绪，因此工人阶级斗争，在这种情形之下逐渐开展起来。现在分述如下：

一、国民党三次北伐前后工人斗争的情形

国民党自反动后，借口“清共”及军事时期，巩固后防，来无情的压迫工人，拘捕和屠杀工人中的革命分子，以御用工会来钳制工人的行动，广东、武汉甚至解散一切的工会。全国工人群众在这情形之下，表现暂时消沉的状态。但是上海的工人群众的争斗，自“四一二”以来，并未停止，反因国民党的压迫，工统会、工整会的无耻欺骗和压迫，更激起工人不断的斗争，特别是对于资本进攻的反抗。以至北伐将开始时，国民党宣布停止民众运动，禁止罢工，但是上海工人群众的斗争和罢工，并未因此而停止。从一月至四月罢工有三十五件发生，打破国民党对于工人压迫的命令。不过当时斗争的主要群众，是店员、手工业的工人，产业工人因为过去受摧残最重，工会组织多半瓦解，即或有工会的，又为工贼流氓所把持，很少有斗争发生。其中曾有一次六万人的丝厂大罢工发生，〈反〉抗警察殴毙工人，后因工整会的压迫，强迫上工，可是这一斗争并未停止，以后又为的要求发给罢工工资及惩办警察，不断的发生二三次的总罢工，这是在国民党反动后第一次大罢工了。后北方战争已发动，国民党更借口军事时期，防止奸人捣乱后防，禁止一切罢工集会，来制止工人的争斗。

附表　**一九二八年一月至四月上海发生罢工事件统计表**

（据上海社会局的调查统计）

月份	罢工件数	罢工人数
1	7	10,812
2	8	7,265
3	8	65,113
4	12	4,670
共计	35	87,760

二、"五三"惨案发生，全国工人群众的愤慨和斗争的开展

"五三"惨案发生，上海及全国工人群众非常愤慨，自动的起来组织各种反日的团体，演讲示威，特别是上海工人群众，有一百余工会起来组织反日会，发宣言，组织讲演队，到各区讲演，并决定开全上海工人大会，全市罢工一天，举行示威。而无耻卖国的国民党，自"五三"惨案发生以后，提出和平交涉，提交国际联盟会议办理，借口防止奸人捣乱后防，禁止集会结社，同时借口集中力量，取消一切反日组织，归并在市党部所御用的反日会，特别是对于工人的行动，更加严厉禁止，甚至有违反者以军法从事。当时工人群众目睹国民党无耻卖国，投降帝国主义，压迫群众反帝运动，非常愤慨，在一次反日代表大会中曾提出打倒国民党、工人直接起来行动等口号。在工人群众中也自动起来游行示威，打日本人（如杨树浦工人打日本人等）。后来因为黄色工会一般领袖（如邮务沈天生、陆京士等）的妥协与国民党勾结一气，将反日会无形解散，遂使轰轰烈烈的工人反帝运动受一打击。但是一般工人群众，由此更加将斗争的情绪激发起来，各种工人的经济斗争，遂开始发展起来。全国各地反日运动，也因为国民党的压迫、制止工人的行动，把持一切反日组织，同样变成他们御用的东西。

工人阶级自"五三"惨案发生后，群众斗争的情绪提高，到"五卅"三周年纪念的时候，上海的工人群众有数千人到南京路游行示威等，而帝国主义亦不敢十分压迫，还有未停工的工人，则在工厂关车举行纪念，可见当时工人群众的革命情绪。上海工人的经济斗争，遂继续不断的发生了，罢工是逐月增加，斗争的范围也逐渐扩大（参看下表）。如估衣业店员的罢工与熟货业的罢工，并引起上海各工会的援助，后来组织被压迫工会联合会等。其他各业工人斗争不下百余次，继续不断的发生，而影响全国的邮务工人大罢工也继续发生了。在江西景德镇有几万瓷业工人的大罢工。广州的自来水、兵工厂、电灯厂、铁路，都有斗争发生，虽被李济深武力压迫下去，也可见广州工人自暴动失败后，在极端白色恐怖之下，开始作斗争起来了。北方铁路工人索薪斗争是每路都有。

其他各地工人斗争，当也不少，可惜无详细材料，不能报告出来。

附表　**一九二八年五月至九月上海罢工事件统计表**

（五六两月是据社会局的统计，以下是据上总统计的）

月　份	罢工件数	参加人数
5	7	2,492
6	4	66,095
7	14	7,697
8	15	18,102
9	14	9,755
共计	54	104,141

三、上海邮务罢工后全国工人的斗争是开始复兴的形势

上海邮务工人二千五百余人于十月二日大罢工，更表现工人的斗争是向前。原来邮务工

人的斗争发生甚早，酝酿数月，均被黄色领袖陆京士、沈天生等，始而用恐吓手段（如前年广州暴动时，邮务工人要罢工，陆、沈等以罢工是帮助共产党、是共产行为来恐吓，将罢工制止），继而用延挺政策（如和平交涉、派代表到南京请愿等），来和缓斗争。但自"五三"惨案以后，上海工人斗争的发展，邮务工人的斗争情绪更加增高，使黄色领袖鉴于群众的情绪不能再遏，亦恐众怒难犯，不得不赞成罢工，乘机攫取罢工领导机关，再来设法从中破坏罢工。自邮务罢工，国民党恐惧非常，一面与帝国主义勾结，用武力威吓，同时以欺骗方法，什么"维持国家交通"、"维持党国威信"这一类肉麻的话，并驱使其走狗商务印书馆六工会的领袖来劝邮务工人复工。在罢工的领导权落在黄色领袖手里的邮务罢工，加以内部群众组织还不十分坚强，黄色领袖遂得大施其妥协方法、出卖罢工的手段，为国民党尽忠效劳，用威迫劝诱的方法，无结果的先行复工，再行解决条件。这一个伟大的罢工，就是这样结束了。

（一）上海工人的争斗是继续向前发展

上海工人的斗争自邮务罢工后，各业工人的斗争更加发展起来。不久时期（十一月二日）又发生法电全体工人大罢工。法电的罢工的发生，是工友吴同根被法国水兵杀死而引起全体工人的愤慨，起而反抗，并提出要求，准备罢工。后被市党部社会局与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同法帝国主义勾结一气，用威吓欺骗将吴同根案解决，至于工人要求，由社会局负责调解；同时市党部派其走狗洪东夷、刘云等借口来指导工会，其实鉴于工人斗争情绪的激昂，借此来防止工人的罢工发生。可是迁延数月之久，不仅工人要求没有解决，连答复都没有了；社会局和市党部只有一味迁延欺骗，说什么"尊重国体"、"和平斗争"、"服从社会局市党部"的话。但是时日过久，工人群众已知其欺骗，并已知和平交涉之不能解决，只有直接行动（罢工）才能取得胜利，于是酝酿很久之罢工，遂于十一月二日实现了。

国民党见工人斗争情绪不可制止，欺骗方法已被工人识穿，遂改变方法，扬言赞成罢工，勾结工会中妥协分子和工贼，把持罢工委员会，用封锁政策，禁止法电工人与上海革命的工友相接近，假借工友会议，每日宣传三民主义来麻醉工人，罢工会不开会，罢工中各种组织（如纠察队、宣传队等）不进行或是只有名义存在，使他不发生组织作用，以削弱群众斗争力量。随时造谣、恐吓，以涣散群众情绪。在会议中有发言者，或提出质问者，即诬为共产党，与对付邮务罢工同样的，驱使七大工会的走狗，表面借援助名义，派代表帮助工作，其实进行破坏罢工工作。他们的政策是领导罢工来破坏罢工，同时与杜月笙及法帝国主义勾结一气，欺骗工友，说条件已确定，强迫上工。可是群众上工后，法国资本家不但是没有承认条件，反变本加厉压迫起来。工人群众到此时才知道受骗，于是第二次罢工又发生，经过十四日之久，国民党的走狗刘云又勾结工贼华志勇、陈茂林等用欺骗手段复工了，但是条件仍未得着解决。当时一般工人群众已知受国民党的欺骗，已喊出打倒国民党的口号。最后工友第三次的罢工，才得相当的解决（详情见全总出版之"工人宝鉴"第二册）。在这次罢工中，上海一般工人群众组织的工会，都尽力起来援助，可是被国民党阻挠，不得与法电工人见面；同时勾结巡捕房将工会组织的后援会解散，拘捕二十余人，这都是国民党破坏罢工、压迫工人的勾当。

在法电罢工时，有金银〈业〉工友为工会职员被资本家与官厅勾结而被捕，全体罢工反抗。华商电车工友已提出条件斗争。英界电车提出条件要求，亦得相当胜利。接连有棉织工人的

罢工、中国造灯厂罢工、邮政局快信工人罢工、商务印书馆的怠工、新新公司大罢工、英美烟厂罢工、沪宁、沪杭铁路工人要求加薪的斗争、南洋烟公司浦东分厂工人反对停工的斗争，最近内外棉七厂的罢工、吴淞兴华纱厂罢工等，不断的发展起来，形成群众斗争向前发展的形势。

在江苏外县的工人斗争亦有发生。如徐州因警察打死车夫三人，引起全埠工人总罢工五日；苏州绸缎业染坊工人罢工二十余日等。

附表　**一九二八年十月至十二月上海罢工事件统计表**

（据上总统计调查）

月份	罢工件数	参加人数
10	13	9,078
11	22	11,587
12	16	22,237
共计	51	42,902

（二）北方工人的斗争正开始向前发展

北方工人的运动，自国民党打到北京以后，改组派遂利用党部在工人中大施其活动，组织北京、天津总工会及唐山铁路工会等组织，在工人中极力宣传改良主义，以利用工人的组织，以为他们上政治舞台的工具，所以虽然组织了工会，亦不愿工人有斗争发生。但北方工人斗争发展是由上海邮务工人罢工后，遂影响到北京邮务工人起来响应，并提出要求，其他工人的斗争也发动起来。北京电车工人为军人不买票殴打工友发生罢工，电灯工友要求加薪的斗争，天津英美烟厂提出要求四条（失业复工、开除工人及招添工人须得工会同意、厂主担任工人学校经费、每月加工资三元）并发生罢工，裕元纱厂为要求吃饭时间在厂关车，又有地毯工人的斗争。而平奉铁路工人提出要求，反对局长斗争已开始，并酝酿全路总罢工。北方工人运动数年来均在北洋军阀压迫之下，生活痛苦到不堪的地步，目前斗争，只有更加扩大的向前的发展起来。

北方铁路工人，在军阀直接管理之下，拖欠工资，有的到十余月，各路工人对于索薪运动的斗争是普遍的发生。

（三）汉口反日大罢工

武汉工人阶级自国民党最后反动后，大遭军阀的屠杀，到桂系军阀掌握武汉政权以后，更变本加厉来屠杀，动辄以共产名义任意屠杀工人，绝对禁止集会结社，凡是工人群众的组织，都目为共产党的行动。武汉工人在此种情形之下，无异遭受一大厄运。但自“五三”惨案发生，全国工人斗争的发展，使武汉工人受此影响，其革命情绪，又活跃起来了，所以日本水兵杀死车夫水杏林事件发生，工人群众的革命情绪激发，遂发生汉口日界工人的大罢工（据报告参加者有八千余人）。虽然这次罢工在形式上是桂系所指示之下的党部所领导，桂系军阀表面也赞助这次罢工，这不是桂系军阀贸然改其军阀反动的行动，领导工人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是因为其主人（英帝国主义）的指示。原来英、日帝国主义的冲突，自“五三”惨案后已加尖锐，如指使其工具在中国发展其势力（详见报告第一段），因此，桂系在这种情形之下来利用这次罢工，以效忠于英帝国主义，更可利用这次罢工在政治上以对待他的

政敌——蒋介石。同时因为工人群众的革命情绪的激发，桂系军阀知道简单的压迫是不能成功的，遂采用改良欺骗的方法来消灭群众的革命情绪，这也是反日大罢工的发生原因。

因此，罢工发生时，即被桂系一般走狗将罢工会把持，只提出惩凶、赔偿、道歉——中国外交上惯例的卖国骗人的条件，不敢提出收回租界，更不敢喊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当然更不愿意提出工友的要求。虽然有纠察队，但不敢武装起来，并且主张和平的抵制，所以屡次被日本水兵将纠察队及工友拘捕毒打，使工人大受其苦。虽然在这种情形之下，工人群众现在已罢二月余，仍然坚持，可见其革命精神。虽然这一次罢工被桂系军阀所操纵把持，但是一般工人革命的精神是充分表现出来了。

(四)广东、香港的工人争斗也呈活跃现象

广东的工人运动，自广州暴动失败，同武汉一样的在桂系军阀铁蹄之下，就是从前反动的机器工会也遭解散，可想见该地的反动情形。在“五三”以后，工人的斗争已逐渐开展，自电灯局、铁路工人斗争后，继有油业工人反对减人的斗争、面粉工人为厂方取消下栏工作钱的斗争、车衣女工的争斗、汽车工人的罢工、佛山油业工人反对开除工人而罢工、轮渡工人反对剥削的斗争、东莞、石龙的长生店工人要求加薪斗争、西江肇庆建筑工人的斗争，其余南路海口、北海以及英德、韶关等地工人，亦有零碎的罢工发生。

香港是英帝国主义在华统治的根据地。香港工人群众自“五三”惨案后，已逐渐开始活跃起来，群众的斗争，如水师工厂斗争，织造女工反对工厂的苛例，太古糖房工人反对开除工人，金银工人反对虐待的斗争。自该地邮务工人的发生加薪斗争后，更加发展。虽然一些斗争尚属零碎，但是已经将沉闷很久的工人群众推向前进，将来斗争的发展是无疑的向前发展起来。

附表　**香港十一、十二月工人斗争调查表**

业名	原因	要求	参加人数	斗争方式	结果
冯祥树胶	反对炸伤工人	要求抚恤	未详	未详	胜利
冯祥树胶第二次		作不好不扣罚鞋底破坏不扣电油不盖不扣	未详	未详	胜利
太古漆务	反对减少工资一元减二毛八角减二毛		未详	包围工厂	无结果
太古漆务第二次	反对西人打伤工人		未详	未详	相当胜利被打工人复工
电厂	反对送礼扣一元半钱给西人		未详	未详	胜利
邮务			未详	未详	失败
四海酒楼	反对工头	要求花红加薪等	未详	未详	胜利
大兴织造厂	反对虐待女工		60	罢工	失败

棉艺织造厂	反对扣工钱及工头虐待工人		未详	打工头	工头屈服
金星织造厂	反对开除工友	增加工钱改良待遇	未详	未详	胜利
民福织造厂	反对开除工友		未详	未详	胜利
太古船厂青工	反对工头任意开除工人	以后不得开除工人	未详	未详	胜利
九龙船厂	反对猪仔头		未详	未详	失败

其他各省工人争斗，已在开始发展。如厦门的锡工、煤炭工人、运输工人和船夫子；浙江杭州的织业工人，萧山、湖州的丝厂工人，宁波的纱厂工人，都有小的斗争发生；山东淄博的矿工有一次罢工发生。

附表　**一九二八年下半年上海各业工人斗争比较表**

业别 \ 月别	7	8	9	10	11	12	统计
纱厂	10	8	0	3	3	2	26
丝厂	1	2	1	2	2	0	8
烟厂	1	5	2	3	0	5	16
蛋厂	0	0	0	0	1	1	2
火柴	1	0	0	2	0	1	4
造灯	0	0	0	0	0	1	1
烛皂	0	0	1	0	0	0	1
制麻	1	2	1	0	0	0	4
制砖	0	0	1	0	0	0	1
金属业	1	1	1	1	0	1	5
市政	1	1	0	1	4	3	10
铁路	3	0	0	0	1	0	4
码头	0	4	0	1	1	5	11
海员	1	0	0	0	0	0	1
手工业	10	7	11	10	14	9	61
印刷业	0	1	3	2	10	3	19
店员	3	3	4	5	2	4	21
公仆	0	0	0	1	0	0	1
统计	33	34	25	31	38	35	196

附表　**一九二八年下半年上海各业工人斗争原因统计表**

原因＼月份		7	8	9	10	11	12	统　计	百分率
资方的进攻	资方破坏条件	3	4	6	3	5	1	22	
	开除工人	5	8	3	4	3	8	31	
	禁止组织工会，拘捕领袖	2	2	2	0	3	3	12	
	资方关厂，减少工作	3	2	1	1	1	3	11	
	增加工时	0	1	1	0	0	0	2	
	加重工作	1	1	1	1	0	1	5	
	减少或克扣工资	2	3	0	2	2	1	10	
	克扣红利及储蓄金	1	0	1	0	0	0	2	
	取消米贴	1	1	0	0	0	0	2	
	滥　罚	1	2	0	0	0	0	3	
	包捐人舞弊	0	0	1	0	0	0	1	
	待遇恶劣	4	3	2	1	1	2	13	
	共　计	23	27	18	12	15	19	114	32
工人之反攻	要求签订或改订条件	2	2	8	9	0	5	26	
	加工资	11	10	11	9	17	12	70	
	要求星期赏工贴花红	4	2	1	1	3	1	12	
	要求改良待遇	12	4	10	7	9	3	45	
	要求减少工作时间	3	2	1	1	3	0	10	
	要求开除洋走狗	3	0	0	0	0	0	3	
	要求减少车租床费	2	0	0	0	0	0	2	
	要求减轻工作	1	0	0	0	1	0	2	
	要求打破包工制	1	1	0	0	1	1	4	
	要求不中断工作	0	0	1	0	0	0	1	
	要求安插失业工人	1	2	1	0	0	0	4	
	共　计	40	23	33	27	34	22	179	60
其他	打倒工贼	0	0	0	0	0	1	1	
	帮口冲突	0	0	0	2	0	1	3	
	共　计	0	0	0	2	0	2	4	8
统　计		63	50	51	41	49	43	297	100

现在总结起来说，全国工人的斗争在这一年中逐渐向前发展起来。其发展的趋势，概括如下：

一、发展的阶段："五三"惨案发生后，全国工人的斗争开始活跃起来。到了上海邮务罢工，一直到现在，全国工人的斗争，继续向前逐渐走向复兴的形势。

二、发展的形势：在"五三"前后，斗争尚偏于上海及店员手工业工人方面，以后逐渐发展到全国及产业工人方面．直到现在，是在继续的发展。

三、斗争的性质：当然是多偏于经济方面的，这是工人斗争由开始复兴的必有形势。

（五）全国工人斗争中的弱点

全国工人的斗争是在继续向前发展，逐渐走向复兴的形势，但在斗争中还表露很多的弱点，这些弱点在工人斗争开始走向复兴形势的时候，若是不能逐渐消除，也能妨碍斗争的很快向前发展，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特别指出如下：

一、在全国工人的斗争，大多数的是自发起来的，特别在广东、香港、北方、其他各省，就是上海的工人斗争也是多数缺乏斗争组织的力量，偏于部分斗争居多，因此，表现零碎斗争的形成，尚不能形成广大的斗争向前发展。

附表　**上海各业工人斗争中领导力量的比较表**

月份	斗争次数	上总	黄色工会及党部	自发	不明
七	30	10	3	17	
八	33	11	5	17	
九	24	9	5	10	
一〇	29	7	1	21	
一一	37	23	0	10	4
一二	34	10	9	15	
共计	187	70	23	90	4
百分率	100	37	12	49	2

二、因为缺乏组织的力量，在斗争中又很少能扩大组织的力量，因此使斗争本身不能继续发展，表现时起时伏的现象，许多斗争遭失败。

附表　**斗争胜利失败的统计表**

月份	斗争次数	完全胜利	相当胜利	失败	妥协及无结果	未解决	不明
七	30	5	9	6	4	无	6
八	33	11	4	6	10	无	5
九	24	5	4	2	8	无	5
一〇	29	2	4	6	7	5	1
一一	37	11	11	2	4	10	无
一二	34	7	4	4	7	8	4
共计	187	41	36	26	40	23	21
百分率	100	25	19	13	21	11	11

三、在这些自发的缺乏斗争组织力量的斗争中，主要是缺乏赤色工会的领导，因此，不能使这些斗争得着胜利的保障和有力的扶持，大部分在黄色工会领袖领导和国民党影响之下（特别是北方的斗争及其他各省），只有使斗争失败的居多。甚至在反日运动中，及最近汉口对日大罢工斗争及全国反帝运动的领导权，完全被买办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所把持，更使许多革命的斗争走到妥协的道路，使革命势力不能迅速的向前发展。

四、一般工人群众受生活的压迫，需要起来争斗，但是在革命失败后的恐惧的心理，仍未完全消除，因此不敢直接起来斗争，使改良主义及黄色工会乘机大活动起来，大多数群众，都受这种影响，特别是一般工人中的领袖分子，不免走上合法运动道路的倾向，增加对于国民党的幻想。

附表　**上海工人斗争形势的比较表**

月份	斗争总次数	罢工	和平交涉请愿仲裁	群众直接行动	厂方让步	厂方自动加资
七	30	14	12	2	3	
八	33	15	12	3		
九	24	14	9		2	
一〇	29	13	13		2	4
一一	37	22	11		1	
一二	34	16	11	5	3	
共计	187	94	68	10	11	4
百分率	100	50	37	5	6	2

赤色工会运动的工作及其工作的缺点

赤色工会运动，自国民党叛变后，一切反动势力联合进攻以来，受了很大的摧残，不仅完全失掉了公开的地位，陷于极端秘密的状态；在不断的摧残当中，虽非赤色工会的组织，稍带革命色彩的群众组织，亦遭压迫。发现赤色工会的会员，不是杀戮，就是监禁。这一年来赤色工会的工作达到极端困难地位，赤色工会的组织，也缩小到了极小的限度。

赤色工会当国民党反叛革命后，不久的期间，各地赤色工会均遭封闭，赤色工会的领袖和革命分子，不是遭枪毙，就是拘捕监禁，或被通缉，流亡于外。赤色工会的组织，遂完全瓦解，随后虽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仍然继续恢复，或建立赤色工会的组织和工作，但在恢复或建立工作中的继续不断的受摧残，使赤色工会组织随起随灭，遂至有许多地方（如武汉、湖南、广州）到现在赤色工会的秘密组织都很困难的建立起来。因此，全国赤色工会的范围是缩小了很多。

一、赤色工会运动的概况

以前赤色工会在产业工人中最有基础是海员、铁路工人。但海员运动自国民党叛变以后，一般工贼遂乘机攫取海员总工会的招牌，或另组织其他名义的工会，赤色海员工会完全陷于秘密工作状态，工作范围只限于香港、南洋及上海三处，至于武汉、天津、潮汕、广州等地，

都无组织和工作关系了；就是以上三处，也只有香港、南洋稍有群众组织的基础，上海的工作是非常的微弱。赤色工会的会员，大部分是太平洋航线的外洋船上，基本组织有的不大健全，有的尚未形成组织，分散于各船上。因此，赤色工会的组织，在群众中还不能有如何领导的作用。

铁路工人运动自"五卅"后，国民军的失败，铁路工人运动又遭打击，公开组织遂瓦解，一直到北伐军抵武汉时，还没有工作；至国民党背叛革命时，在北方的铁路工人运动更加停顿。后来虽曾经恢复工作，而没有成绩，在不久以前，才开始整顿铁路组织，开始进行各路的工作，尚无大的成绩。在广东、两湖的铁路工人运动受白色恐怖而停顿。总之，铁路工人，在过去工作没有积极来注意发展这一工作，使有历史关系、群众基础的铁路工人运动，反而无甚工作，这是非常错误的地方。

重要城市的工人运动，第一就是上海。自"四一二"以后，赤色工会的工作虽然继续进行，因为工作方法不良，不能使赤色工会有广大的发展，虽领导了不少的群众斗争，还不能建立在群众中真实的群众基础。上海的赤色工会运动在过去的重要群众基础是纱厂工人，目前纱厂工人群众中黄色工会的组织不大发展（因为大部分的纱厂没有工会组织），但是赤色工会的组织虽有少数会员是分散在纱厂工人群众中，仍然是一种秘密状态，很少能在群众中起领导作用。其他重要的五金工人（兵工厂、造船厂、铁厂）还没有赤色工会的组织。码头工人及市政工人都很少有组织的建立，只有电车工人有组织关系。其余大部分是在公开的手工业、店员和印刷（特别是店员）工会中，上总是可以影响和指示他们的工作和斗争。上总虽在群众中有相当的关系和影响，但是赤色工会的群众基础和群众组织，还是十分微弱，还不能与群众建立赤色工会的组织关系，工作多偏于店员手工业方面，忽略了主要的产业工人的工作。

香港的赤色工会运动，也是数月前才恢复工作的。群众组织在船厂工人群众中虽有秘密群众组织，但都是人数很少。其他工人群众中也有点秘密组织，或是借其他灰色的名义来组织。以上的组织，在群众中领导作用都非常薄弱。目前虽将以上的秘密组织联合起来，发起组织香港工人代表会，但是正在筹备中。

广东内部各地的赤色工会运动，都没有工作的发展。

天津的赤色工会工作，以前多半忽视，到现在才开始，但没有什么大的发展。

唐山的工作，在矿工及铁路稍有点工作，但是组织和力量都是薄弱。

江西的景德镇，在磁工中有点工作和组织的关系。其他各省各县的赤色工会的工作，不是因为环境困难进行，就是没有注意这一工作。总之，赤色工会运动，虽因环境关系，在工作上发生许多的困难，但是工作的观念和工作方法的不好，也是使赤色工会的工作不能有大的发展的一个原因。

二、赤色工会运动在工作上的弱点

赤色工会运动，在过去公开工作时代，在形式上虽取得了广大的产业工人、手工业工人及店员等群众，但是在工作中没有造成在组织上的骨干，没有造成与企业中工人之密切关系，同时也没有充分训练出工会干部人材；工会中缺乏民主化，还未吸收广大工人群众来参加工会工作，只形成少数的一部分人来包办工会，以命令方式来指挥群众，使工会组织未真能成

工人群众的阶级组织，遂使一般工人群众对于工会没有正确的认识（认为是少数人代群众谋利益的组织，不是群众自己的组织等）。

过去赤色工会虽领导了许多伟大的革命争斗，但未能充分注意工人切身的经济利益的争取，遂使一般工人群众对于工会认为是政治的组织，养成群众依赖政治的观念。因此这些缺点给予工人群众的影响，直到现在还存留在群众的脑筋中，遂使黄色工会在工人的这些弱点中大施其活动来骗取工人群众。

三、目前赤色工会运动的主要的缺点，概括的指出如下

(一)在极端白色恐怖之下，赤色工会的活动又陷于极端秘密状态，只有保持上层的组织，在群众工作上和组织上更运用委派制度，偏重空架机关式的工会组织系统建立，不能深入群众，与群众关系更加隔离起来。赤色工会的组织和工作，仍归少数工会运动者来包办一切，不能逐渐扩大到广大群众中去成为群众斗争的组织。

(二)在斗争时，不能‹用›宣传鼓动方法来动员广大群众起来，不能运用工会组织来推动群众起来斗争，完全采取脱离群众的方法强迫群众，命令罢工，用红色恐怖的政策对付工贼。

(三)忽视工会经常工作，特别是组织工作，忽视日常斗争的发动和领导，每每企图大的罢工。作工会工作不能建立在群众实际生活关系上面，逐渐脱离了群众，形成群众外的组织。

(四)在斗争时不能正确估量客观条件和主观力量来领导群众争斗，斗争的口号不是过高，就是太多，以致在客观环境上不能达到胜利而遭失败，甚至溃散，将工会的组织基础完全瓦解。

(五)不了解赤色工会利用公开活动的策略来扩大群众的组织和斗争，限于极小范围的秘密活动。有的运用公开活动策略时又走到合法道路，遵守国民党一切限制工人的办法，不敢领导群众起来，如注册登记、开会事前报告，以及听其派人来改组工会、不罢工、经过劳资仲裁等等，走上合法运动的道路，使群众增加对国民党的幻想和合法的倾向，这是过去工作最大的错误。

(六)简单偏于组织方面和平发展，不了解在斗争中来发展和扩大工会的组织和工作，甚至发生先要建立组织然后才能领导群众斗争，完全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

(七)过去的工作，多避难就易，不肯艰难困苦去进行群众工作，只注意公开的手工业、店员工会的工作，忽视重要产业的工作，如铁路、矿工、五金、市政等等，更使赤色工会的基础更为缩小。

（原编者按：摘自一九二九年二月项英同志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的报告，«过去一年来职工运动发展的形势和目前的总任务»，文字略有删改，标题是编者加的）

全国苏维埃区域与红军扩大的总形势

（一九三〇年一月）

典　琦

全国工农斗争正在复兴，农民群众的武装斗争日益普遍的发展，特别是南方各省土地革命的深入和苏维埃区域的扩大以及红军的发展成为不可抵御的潮流。兹就各省中较重要的几个区域，述其所已达到的疆界如左：

（一）江西　江西全省，除南昌附近一隅之地外，都已在赤色区域版图之内了（反动派自承认八十一县，无一县无“共产党”势力）。沿赣江而下，红军势力至吉安下游之峡江县，其他赣东赣西赣北各区，乡村中几全部为武装工农群众活动的范围，城市亦多数成了赤色的都会。兹将江西八十一县中属于赤色版图者列左：

赣　北：瑞昌　永修　安义　德安　星子　九江

赣西北：武宁　修水　铜鼓

赣　西：万载　萍乡　分宜　新喻　安福　莲花　永新　宁冈　遂川　万安　泰和　吉安　吉水　峡江　宜丰　上高

赣　南：兴国　雩都　宁都　乐安　永丰　崇仁　宜黄　临川　南丰　广昌　石城　瑞金　会昌　信丰　赣州　南康　上犹　崇义　安远　龙南　定南　虔南　大庾

赣　东：弋阳　横峰　贵溪　玉山　广丰　上饶　铅山

赣东北：德兴　乐平　鄱阳　浮梁（景德镇）　湖口

（二）湖北　湖北和江西一样，除武汉三镇尚为白色统治外，全省乡村及多数市县，均已在赤色区域之内，甚至武汉郊外数十里内外，即有红军游击队或赤卫队的踪迹。兹将赤色区域各县列左：

鄂　东：阳新　大冶　黄冈　蕲水　蕲春　鄂城　黄梅　广济

鄂东北：黄安　麻城　罗田　黄陂　孝感

鄂　北：郧阳　枣阳

鄂　西：施南　鹤峰　五峰　巴东　宜都　松滋　枝江　荆门　江陵　公安　石首　监利　沔阳　潜江　宜昌　沙市　长阳　宣恩　汉川

鄂　南：咸宁　蒲圻　通城　嘉鱼　崇阳　通山

（三）福建　闽西各县，完全是苏维埃区域，且赤色势力渐渐展至闽南及闽北。

兹将红色区域各县列左：

闽西：长汀　上杭　武平　龙岩　永定　宁化　清流

闽南：平和　漳平　大田

闽北：建宁　归化　将乐　邵武

（四）广东东西北三江及琼崖，都是有斗争历史的区域，虽曾遭国民党军阀的严重压迫，而乡村群众武装组织及农会还有许多存在，最近东江及琼崖等地工农群众斗争又呈现进攻的形势，红军的游击惹得反动政府手忙脚乱，大调海陆军防堵。兹将最近斗争激烈的县分列左：

东　江：丰顺　梅县　饶平　大埔　兴宁　五华　蕉岭　平远　海丰　陆丰　紫金
　　　　河源　惠阳　普宁　惠来　潮安　揭阳　澄海

琼　崖：琼山　文昌　安定　琼东　乐会　万宁　陵水

（五）广西　广西的苏维埃区域，是广西工农兵群众在反蒋桂军阀的战争中创造出来的。广西的西部二十余县，都在苏维埃的影响之下，其中心各县如左：

百色　奉议　恩隆　恩阳　果德　隆安　养利　东兰　南丹　河池　那马　龙州

（六）湖南　湖南全省的工农群众，都经过长期斗争，可是在白色恐怖累次的高压之下，群众组织曾被大破坏。然而湘东与湘西大苏维埃区域，两三年来始终存在，最近又有扩大的趋势，湘南的斗争也渐渐起来。三大区域的县份列左：

湘　东：平江　浏阳　醴陵　攸县　茶陵　酃县　桂东

湘　西：桑植　永顺　石门　慈利　澧县　安乡　华容　大庸　龙山

湘　南：耒阳　郴县　宜章　汝城　资兴　新田　宁远

除以上六省之外，还有几个区域，也是一天天在生长之中，分举如左：

（七）河南　河南南部靠近湖北安徽的地方，本来已有几年的斗争历史。现在赤色势力更形巩固而有扩大之势，该地大部分红枪会逐渐走向革命化。商城是这一区域的中心，还有次要的两县，为光山，罗山。豫西亦有广泛的农民武装斗争起来。

（八）四川　四川民众在无数小军阀屠杀剥削之下，产生了反抗捐税的"神兵"运动，蔓延川东各县。一九二九年旷继勋旅叛变，全旅士兵走到苏维埃旗帜之下来。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日益普遍到广大士兵及农民，上川东下川东各地的"神兵"，都一天天革命化了。这些"神兵"，在万源、城口、开江、垫江、邻水、长寿等县，势力极大。他们以抗捐、抗粮、抗重利盘剥、打倒军阀为号召，并且准备成立苏维埃政府。总之，四川大部分"神兵"，已知道和红军合作，这一区域的伟大的前途，是可以推想的。

（九）安徽　皖北各县，溃兵土匪，本已成群结队的破坏着豪绅地主的秩序，皖西更靠近鄂东和豫南，当然要受那些地方斗争的影响，故皖西群众革命的斗争亦渐活跃，游击战争亦已开始。英山、霍山、六安、霍丘等县，均为红色区域。最近报载，霍山已被红军占领。

（十）江苏　江苏的宜兴、江阴、无锡各县，是一九二七年的暴动区域，小斗争始终不断，最近江北各县斗争，更为激烈，许多失业农民的自发的武装骚动，如大刀会、小刀会等等，虽然仍不免受豪绅富农甚至军阀的利用，但都有一部分革命化的形势。南通、如皋、泰兴、清江、泰县等江北的县份，是赤色农民武装斗争最烈的区域。

（十一）浙江　浙西的兰溪、义乌等县，曾发生过著名的斗争，近来斗争最激烈的有永康、武义、宣平、遂昌等县。最近赣东红军游击入浙，江山、常山等县亦变为红色区域。

上面所说，表示农民游击战争的区域已蔓延到十一省的范围，尤其以江西福建两湖两广六省为声势浩大。在这些省分中间，许多已经实行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贫农兵士耕种，建立了苏维埃政府的地方更多。有的地方，虽然还没有苏维埃的形式，实际上已经有了乡村

苏维埃，或成立革命委员会，即政权归于农民协会或农民委员会。

其他五省，虽然赤色势力还没有支配着广大的区域，可是发展的形势是很快的。四川河南并曾成立了苏维埃的政权。

此外，北方各省，在大饥荒之后，自发的农民斗争纷纷起来，亦迅速的走向苏维埃道路。如直隶的玉田、遵化正在发动广大的农民斗争与组织，而且有快要转变到游击战争的趋势。直南的磁州一带，更有发动游击战争的广大基础。直北的怀柔、密云以及房山、易县一带，都在准备发动游击战争。

东三省如进攻苏联的前线如满洲里、同江、富锦受了苏联红军影响的兵变，都到农村中开始游击去了。该地工农兵士反对进攻苏联的种种行动，表示着群众对于苏维埃政权有相当的认识。

总而言之，苏维埃的旗帜，不仅飞扬于大江南北，他已经自珠江流域长江流域向黄河流域发展了，他已经从粤闽之东南而达到蛮烟瘴雨的滇桂之交了！

（编者按：此文作于一月，现在这情形更加扩大了。）

（原载《中国苏维埃》）

全国红军概况

（一九三〇年）

红 旗 社

在全国革命形势日益开展的时候，红军自然也跟随着日益长大，而且是推动这一局势的主要动力之一。他有长期艰苦斗争的历史，应用游击战术，发动无数次的斗争，组织了无数量的群众，帮助他们武装起来，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而且最近在龙州，没收了帝国主义的银行财产，赶走了帝国主义的领事教士。所有在民权革命阶段中的主要任务——肃清封建势力，打倒帝国主义和推翻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他们是在彻底的执行。

目前全国革命形势逐渐走向高潮，反动统治表现着极度的动摇崩溃，红军在全国劳苦群众拥护之下，坚决的纠正过去分散力量回避敌人向偏僻区域发展的种种错误，积极的把力量集中起来，在统一的指挥之下，向交通区域和中心城市推进，汇合全国的城市工人斗争，地方暴动，兵变以及一切的革命势力，给敌人严重的打击，促进最后胜利之早日到来。因此就是最讲体面的资产阶级机关报，近来那天不是连篇累幅的登载红军攻陷城市的消息？红军的声势，不独震动了全中国，简直世界每一处都听到了我们红军战斗的喊声！

在英勇的斗争中，红军组织之猛进，更是一日万里之势。目前已成立的共十四军，人数约十万，主要成分为贫农，平均占全数百分之六十，枪械六万以上，炮二百尊，飞机五架，分布在湘鄂赣闽粤桂豫皖江浙四川各省。除了鄂北第九军，鄂西第十军和浙南第十三军三军，我们还没有得着详细的报告之外，其他各军的情形，大概如此：

第一军：由鄂东北的红军第三十一师，豫东南第三十二师和皖西的三十三师合编而成，人数五千三百，其中百分之六十是贫农。武装三千以上，飞机一架。三十一和三十二两师，已有三年的斗争历史，并且开始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的工作。现在鄂豫皖三省边境游击，分向武汉三镇发展。

第二军和第六军：第二军就是贺龙领导的军队。自东江失败后，转入湘西边境，两三年来，经过多次的奋斗，武装了五六千农民，在湘西鄂西一带游击，已开始了土地革命，并建立政权。人数六千，其中百分之四十是贫农。武装四千六七百。第六军是由鄂西的农民斗争中产生，所以贫民成份占了全军人数（六千人）百分之八十五。武装五千以上，军长旷继勋。为了实现集中的策略，最近派了一个纵队和第二军发生联络，并要与第二军组织共同指挥机关，推贺龙作总指挥，向武汉方面发展。

第三军第四军和第五军：第三军是由赣西南第二第三第四各团及第一第二大队合编而成，人数五千以上，多数是当地的极苦农民，占全数百分之八十。武装四千六七百，在粤北

湘东以及赣西南一带游击。第四军就是朱毛领导的军队，他是由八千武装工农的英勇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在湘东湘南赣西赣东南粤北东江和闽西一带，经过三四年的战斗，组织了两三百万农民，武装了一万以上的群众，击溃了湘赣闽粤四省许多白军，推动这四省广大群众的斗争，分配了许多土地，建立了无数的苏维埃政权。第五军是两年前平浏暴动的产物，由彭德怀领导，在湘东鄂南赣西各处游击，有与第四军一样光荣的历史。人数七千，成份中百分之七十是贫民，武装五六千。最近过去曾和四军联合，在江西游击，推动长江中部的革命斗争，走向地方暴动的前途。最近又在赣西南汇合了第三军，组织了三军的共同指挥机关，以朱德为总指挥，毛泽东为总政治委员，分向长江方面发展，准备夺取汉浔，建立一省与几省的政权。

第七军：桂系军队哗变后，接受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成立为红军第七军，在广西左右江一带游击，人数八千，百分之八十是哗变的兵士，武装极完备，枪械八九千，飞机四架。一月底攻陷了龙州城，不独推翻了国民党的军阀统治，并且扫除了帝国主义在龙州的一切势力，没收了海关，没收法帝国主义的教堂银行和大的商店，法帝国主义在龙州的领事，和一切不服从苏维埃法令的侨民，一概护送出境。帝国主义国民党在极度恐慌中，只有用雄厚的武装力量，向群众作凶猛的压迫，于是法帝国主义差使了五百个法兵，五架飞机，四百磅炸弹，联合了国民党军阀希图扑灭这一赤色的政权。群众在这种残酷摧残之下，曾不顾生死的为拥护苏维埃政权而战，夺取了法帝国主义的飞机二架。但终因势孤的关系，暂时不得不退避一下。

第八军：第五军第五纵队攻打大冶城的时候，被调去防守的白军正是独立第十五旅，他们早就听见了红军的故事，羡慕红军的生活，只是没有门路找到红军，现在看见机会到了，于是首先由第二团第二营第五连的士兵开始发动，接着各连各营各团的士兵群众，都起来响应，杀了反对的长官，活擒了县长，占领了县城，竖起红旗，欢迎红军。他们转变到革命方面以后，联合了第五军第五纵队和鄂东的武装农民，组织为红军第八军，在鄂东鄂西一带游击，实行土地革命。全军人数五千，多是转变的兵士，武装四千，现在鄂东南和赣北一带游击，向武汉方面发展。

第十一军第十二军：叶贺原有部队，联合东江的革命农民，组成了红军第十一军，在东江方面作游击，向惠州方面发展。人数五千，贫农占了百分之六十，武装四五千。第十二军为朱毛在闽西所武装的农民，人数九千，贫农占全数百分之八十，武装八千以上，在闽西十余县作游击战争，已建立政权，分配土地，现在势力已扩展到闽北和闽南，并要向韩江东江方面发展，和十一军取得联系，准备夺取潮汕。

十四军：现在只成立了一个纵队，分三支队，分布在南通如皋海门泰兴等县作游击，人数二千，贫农占全数百分之六十，武装千余，现在正在扩展中，并向长江中心区域发展（据最近消息，十四军人数已扩至四千，武装二千以上）。

除了这些正式的红军，另外直隶之南部（磁州）北部（怀柔密云等)和京东(玉田遵化)东三省之边境（同江富锦密山延吉海拉尔等),河南之唐河邓县，四川之万源城口綦江，湖南之新田耒阳郴宜,广东之琼崖,江西之景德弋横和安徽之南陵，都已成立了大小的游击战队，而且正在准备建立红军的组织。至于各处苏维埃区域的赤卫队和其他特别队伍等，力量不见得低于红军，武装也不少于红军，目前也要逐渐集中，准备转变为红军的组织。

总之,中国革命一天天的发展,红军的组织就会一天不停的增长，他的前途，岂可限量？

国民党军阀，不用说，将要在红军和革命工农群众的镰锤之下死亡，就是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者，亦要在红军和革命工农群众的镰锤之下消灭！

按：此文所根据的材料，新旧不一（最旧的是去年十一月的，新的也只到三月），而在原红军猛进的扩展期间中，许多数目字，都需要添改了。

（原载《中国苏维埃》）

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

——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一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

一　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

（一）最近国际事变的发展：海军会议以后，各国战备的竞争更加急剧，法意冲突的尖锐，英日美极力操纵中国军阀战争，显示出帝国主义战争的危机更加迫切。日本极力利用白俄扰乱的阴谋，白里安组织欧洲合众国以一致进攻苏联的企图，美国指使美洲各国对苏联绝交，环绕苏联各小国波兰、立陶宛等在美法帝国主义指使之下军事的动员等，更表现着帝国主义一致向苏联进攻的紧迫。这是由于全世界资本主义都走到严重的恐慌时期，从它的不可调和的根本矛盾，产生出这样不可解决的严重危机。另一方面，各国工人阶级罢工浪潮的汹涌，失业斗争的扩大，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的成绩，更增加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信念，社会民主党以及他的左派日益丧失他在群众中的地位。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日益增高起来，尤其使我们严重注意的，普遍全世界殖民地革命运动的高涨，印度革命的高潮，安南的暴动，以及其他各殖民地的扰乱，中国革命急剧的发展，这样一切，都是在动摇帝国主义统治全世界的基础。因此帝国主义更加紧迫的企图首先进攻苏联以挽救自己的危机。所以进攻苏联的战争成为目前主要的危险。这样普遍全世界的严重的经济恐慌与政治危机，便是说明空前的世界大事变与世界大革命的时机，都在逼近到我们的面前了。这一国际形势，无疑是有利于中国革命发展的条件，是与一九二五年——二七年第一次大革命时完全不同的优越的条件。

（二）在帝国主义统治的世界看来，中国是帝国主义一切根本矛盾最集中最尖锐的地方：中国是世界的主要帝国主义——英日美冲突最激剧的地方，是资本主义的世界与社会主义的苏联直接接触的地方之一，是殖民地反帝国主义革命最深入的地方，同时中国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最易于尖锐化——譬如现在每次工人的经济斗争都迅速的转变为严重的政治斗争以至武装冲突。这样，一切帝国主义的矛盾都集中在中国而且最易于尖锐化，遂造成中国无可挽救的经济政治的危机，造成不断的军阀混战，造成统治阶级无法稳定而日趋崩溃的基础，造成工人阶级与广大劳苦群众只有日益走向革命来找寻自己解放的出路。所以中国是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锁链中最薄弱的一环，就是世界革命的火花最易爆发的地方。所以在现在全世界革命危机都已严重化的时候，中国革命有首先爆发，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到来的可能。

（三）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殖民地，即是世界资本主义最大的商品市场和投资地及原料的供

给地，因此中国是整个帝国主义的经济组织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假如帝国主义的统治失掉了中国，便是帝国主义——首先是英日美帝国主义不可避免的末日到临。因此帝国主义必然要一致的用尽一切的可能极残酷的来镇压中国革命，所以中国革命必然要遇到与帝国主义的极残酷的战争。可是因为中国革命的爆发，可以掀动全世界大革命的客观条件，到了这一残酷战争的逼临，我们不只是可以动员国内几千万以至几万万群众对帝国主义作激烈的斗争，并且可以号召起全世界无产阶级与殖民地的劳苦群众与帝国主义作最后的决战，无疑的，在这一最后决战的当中，可以取得我们的完全胜利。

(四)对于这一形势认识的错误，成为取消思想与一切右倾思想最主要的根源。陈独秀说："中国革命只有在世界革命爆发的时候才有可能"，以及一切右倾同志认为"现在革命固然是在发展，可是将来对帝国主义没有办法"和估量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条件，要选择在"帝国主义势力比较薄弱的省区"，都是不了解中国革命有首先爆发而掀起全世界大革命，中国革命便要在这一世界大革命当中取得胜利的可能的客观条件，而勇敢的争取这一前途。我们必须明确的指出这一悲观的右倾观念的错误。

二　日益逼近的新的革命高潮

(五)目前中国的经济政治状况，因为帝国主义各种根本危机的影响，特别是两年以来继续不断的国内军阀混战，已进到异常剧烈的恐慌。金融紊乱，产业衰败，失业的危机日益增加。百物昂贵，劳苦群众的生活更加痛苦。农村经济更是空前的破坏。普遍全国的灾荒兵祸，使千万群众陷于饿冻流离死亡的境地。南方大部分的区域都处在农民与地主的残酷战争当中。统治阶级的任何一派都已经无法挽救这样的危机，无法统一全国，而且都必然要更加瓦解，更加崩溃。另一方面，工农劳苦群众处在无法生存的境地，只有进行坚决的革命斗争。这就完全说明革命的客观的条件的成熟，回答了取消派"资产阶级统治正在稳定"的谎言。并且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飞速的向前发展，工人罢工浪潮的扩大，从经济斗争转到政治斗争，广大工人群众从国民党黄色工会欺骗之下脱离出来，走向反黄色工会反国民党的斗争，从和平请愿的合法斗争的方式之下解放出来，走到直接斗争，以至武装冲突，这是证明工人群众的政治觉悟，已经向着革命的高潮飞速迈进。经过今年红色五月——五一与五卅，普遍各地严重的政治斗争，这一形势更加明显。尤其是农村斗争，无疑的已经进到极广泛的高潮，不只是使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的统治在农村中崩溃起来，而且在许多区域中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与统治全国的帝国主义、国民党政权对立起来。经过这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第一次代表大会，必然要有更迅速的扩大。加以红军的猛烈发展，与军阀军队士兵群众的革命化，自觉叛变的增加。这一总的形势，都表明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的前面了。

(六)这样一方面，统治阶级继续削弱崩溃，另一方面，群众斗争日益逼近革命高潮，极明显的指示出这一军阀战争的前途，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与军阀统治的最后死亡。并且只有工农群众的革命暴动的胜利，才能根本消灭军阀战争，实现中国的统一与和平。因此共产党的当前的任务，就是号召广大群众，以革命斗争来反对军阀战争，坚决准备汇合各种革命势力的总暴动，来推翻军阀统治，彻底消灭军阀战争，争取革命的胜利。

(七)革命高潮的主要标志，是革命的先进阶级，一般的甚至落后的群众对政治斗争的积极，伟大的政治罢工在主要的城市中爆发起来。可是如果只看到现在城市与乡村发展尚未平

衡的表面的形势；而忽视着工人斗争，阶级对抗的异常尖锐化，广大群众革命的决心与勇气正在飞速的增加与统治阶级统治力量的日益削弱与破产，这样形势之下，在每一个事变上都有爆发伟大的革命斗争的可能，那末必然要形成严重的右倾甚至取消思想。工人罢工运动尚未形成革命高潮的主要原因，决不是工人革命觉悟的落后，尤其不是工人不需要革命，而是由于正在崩溃的统治阶级要在城市作最后的挣扎，用尽一切可能的方法——白色恐怖与欺骗，极力来镇压工人斗争，所以城市的斗争比乡村要更加严重，更加残酷，这就说明要我们更加倍的努力于城市工作，以争取革命的最后胜利。可是现在工作中最大的障碍，就是对工人斗争的怀疑悲观的右倾观念，肃清这样的动摇，是推动工人斗争高潮迅速到来的主要条件。

（八）就一般的说，并不是每一个工人群众的大的斗争，都可以发展成为革命高潮，而必须有其他必要的条件的配合。在现在中国的形势：有了农村暴动的广泛发展，有了工农红军的迅速扩大，有了兵士群众的动摇与自觉哗变的增加，有了统治阶级这样的严重的危机，的确只要在产业区域与政治中心爆发了一个伟大的工人斗争，便马上可以形成革命高潮，——直接革命的形势。不仅如是，而且在现在的形势，如果中心城市爆发了伟大的斗争，这就是统治阶级不只是在乡村而且在城市都无力镇压革命斗争，无法统治的时候了，这就有了武装暴动的客观条件的成熟，所以我们可以指出革命高潮的爆发必然要紧接着武装暴动。因此我们从现在起就要积极的准备武装暴动，不只是要注意政治上的准备——在广大群众中宣传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必要，而且就要加紧组织的与技术的准备。如果我们不认清这样的客观形势，无疑的会犯到策略上的严重的右倾错误——忽视武装暴动准备的必要，而且无疑的会成为群众的尾巴，甚至阻碍革命。

（九）中国经济政治的根本危机，在全国任何一处都是同样继续尖锐化，没有丝毫根本的差别，因此在中心城市爆发了伟大的工人斗争，必然形成全国革命高潮，并且在这一伟大斗争的本身，就是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的标志。所以革命高潮，可在这一省或那一省首先爆发，但决不能有离开全国的单独一省或几省的革命高潮。因此，党在准备全国革命高潮的时候，必须严重的注意全国的配合与发动。割据一省或几省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观念，无疑义是极端错误的。

三　一省与几省重要省区的首先胜利与全国革命政权的建立

（十）在产业落后的中国，一般的说来，尚没有形成可以完全支配全国的产业的经济中心。而且在几个帝国主义通商的商业经济中心支配之下（如上海、香港、天津、武汉、大连），造成政治上军阀割据的局面，因此全国的统治阶级动摇与崩溃的形势是一样，而动摇崩溃的程度却有差别。所以在全国革命高潮之下，革命可以在一省或几省重要省区首先胜利（在目前的形势看来，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客观条件更加成熟），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之下，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

（十一）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是与全国革命高潮不可分离，“没有革命高潮的条件之下，这种胜利没有可能实现”（六次大会决议案）。因此要准备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一定要注意全国工作的配合。现在军阀战争的继续扩大与加深，无疑的是更便利于一省或几省首

先胜利的条件，积极争取这一胜利的实现，是目前党的主要任务。可是要注意革命已经或者在一省或几省胜利的时候，反动势力的各派，各省军阀，尤其是各国帝国主义，要暂时抛弃他们互相的冲突，联合一致的来压迫革命。以前第一次大革命时，革命政府可以割据广东一年来准备自己力量的形势，在现在苏维埃革命的阶段，是绝对不可能的。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必然马上遇到残酷的战争，不仅是消灭反动势力的内战，而且是反抗一切帝国主义压迫的国际战争。所以必须在准备全国革命高潮之下，来争取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革命政府才能很迅速的调动全国几千万以至几万万群众，一致坚决的与反动势力作拼死的决战，并且还要取得全世界无产阶级特别是已经胜利的苏联无产阶级的援助和一致斗争，以克服反动势力，争取全国的胜利。所以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只是全国胜利的开始，只是全国革命进到更剧烈的斗争，决不会有什么"割据""偏安"的局面。任何一个省区都必须积极准备争取一省胜利的暴动，以与这一总的形势配合。所以在准备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时候，必须特别注意全国工作，同时加紧，并且要注意与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联系。特别加紧中国革命在国际无产阶级中的宣传。

（十二）争取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力量，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不特别注意城市工作，想"以乡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所以组织政治罢工，扩大到总同盟罢工，加紧工人武装的组织与训练，以树立武装暴动的中心力量，是准备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主要策略。更要注意统治阶级要在城市作最后的挣扎，这残酷斗争必然比乡村更加厉害，所以要加倍的努力城市工作，在主要城市，尤其是在重要产业工人中，树立强固的基础，唤起广大群众拼死斗争的决心，是目前最严重的工作，是战略上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十三）在中国客观的经济政治条件之下，单只无产阶级斗争的高潮，而没有农民暴动，兵士暴动，红军的有力的进攻，各种革命势力的配合，同样是不能有革命的胜利。而且在四种革命势力中，缺乏任何一种，都是不可能的。取消派轻视农民，取消红军，无疑的是企图削弱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消灭革命战斗力的反动思想。农民在革命中伟大的作用，在中国有更严重的意义；在土地革命中产生红军，更是中国特有的条件，这是托洛茨基主义取消派所绝对不能了解的。同样认现在城市的工人斗争，尚未进到高潮，要农村采取保守的策略，停止红军的发展的等待观念，也是极端错误的。工人斗争固然还没有进到革命的高潮，农民暴动，士兵暴动与红军发展也还表现着不够，所以我们是要特别注重工人斗争力量的加强，同时要抓住农民暴动的发展，士兵暴动的爆发与红军猛烈的扩大。

四　改组派与取消派

（十四）在革命继续急剧的向前发展当中，改组派更暴露了他是统治阶级的一派，不只是在此次军阀战争中完全与帝国主义和阎冯军阀相勾结，而且在广西与法帝国主义联合一致，极残酷的摧毁龙州苏维埃，屠杀工农革命群众数千人之多。证明认他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中间营垒，完全是一种迷惑工农群众的谎言。不过因为他处在半在野的地位，可以喊出一些改良欺骗的口号来愚弄群众，所以他还能打入一部分群众中散布改良的幻想。特别在农村中，富农群众是他最好的基础，更易于扩大他的反革命的作用（最近在湖北苏维埃区域中，已经

发现了改组派的有组织的活动，便是明显的例证)。这是要我们严重注意，积极到群众中去揭破他们反革命的面目。这一斗争，不能有丝毫的忽视。

(十五)现在取消派无论在他的政纲上(召集国民会议)，行动上(勾结工贼，破坏罢工，在苏维埃区域与红军中实行反革命的阴谋)，都与改组派没有丝毫原则上的差别。他的作用完全是欺骗群众和缓革命，或为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另一工具。到革命高潮的时候，更无疑的要公开的勾结帝国主义与军阀，变成完全的法西斯蒂。所以对取消派的斗争，不只是党内思想上的斗争，而且要特别注意到群众中揭破他们反革命的作用，消灭他们的影响。

(十六)在革命继续向前发展当中，特别是在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国民党蒋介石这一工具完全破产，改组派汪精卫必然成为帝国主义最宠信的工具。取消派陈独秀各派，同样要在帝国主义指使之下更积极的反革命，这是极明显的前途。只有我们从现在起，坚决的到群众中去肃清他们的影响，才能扫除他们反革命的危险。这是准备革命高潮准备革命胜利的主要任务之一。

五　准备革命的转变

(十七)现在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是消灭封建势力的土地革命，无疑义的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取消派认为现在民主革命的任务已经终了的滥言，只是使我们放松民主革命的任务，放松动员广大群众实行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的反动思想。可是现时无产阶级已是唯一的革命的领导阶级，资产阶级已经是反动联盟的一部分，因此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与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不可分离，并且必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巩固与苏维埃政权建立的胜利，这就决定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必然转变为社会主义的胜利。

(十八)革命已经在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时候，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必然要用尽一切力量来反对革命，武装进攻，经济怠工，组织反革命的暴动等。这一残酷的战争，是对帝国主义地主买办的战争，同时就是对资产阶级的战争，这时革命政府为着力争全国革命的胜利，不只是要没收帝国主义的银行、企业、工厂，使民主革命彻底，而且要没收中国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银行，以铲除反革命的武器。并且为着对付严重的经济封锁必然要实行组织生产，管理生产。同时在政治上为着对付顽强的反革命的进攻，必然需要更集中独裁的政权。这就必然需要从工农专政进到无产阶级专政。革命转变主要是阶级关系的转变，无产阶级专政，便已经是社会主义政权的性质。所以革命胜利的开始，革命政权建立的开始，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中间决不会有丝毫间隔的。

(十九)如果以为革命一定要在全国胜利以后，才能开始革命的转变，这是严重的错误。因为这时革命政府，如果不坚决执行阶级的策略，没收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银行，铲除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武器，便会停止革命的深入，而且会障碍力争全国革命的胜利，这就是革命的自杀政策。所以革命转变的阶段论，无疑的是极端危险的右倾观念。另一方面，如果以为"革命胜利的前夜，还是民主革命的性质，革命开始胜利以后，革命政权一开始建立，便是纯粹的社会主义的政权"，也是错误的，这就忽视了革命转变的过程(不论这一过程是如何的短促，然而是必然经过的)，忽视了这时反帝国主义反豪绅资产阶级的残酷的进攻，还需要在民主革命的口号和政策下来动员几千万万的群众，来克服这一反革命的进攻。

(二十)革命胜利的开始必然就是更残酷的阶级战争，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除掉极力进

待反革命的武装进攻，必然还要用尽一切方法来引诱尚留在革命战线内的小资产阶级来反对革命。所以革命的转变的过程中不可免的要发生新的动摇与叛变。所以我们决不应幻想革命的和平转变，而要从现在起，运用我们的正确策略，加紧无产阶级的领导，建立雇农的独立组织，并巩固与贫农的联合，肃清富农的影响，争取中农，以减少将来革命转变的困难。这样正确的坚决的策略，的确有决定将来革命转变更加顺利的严重意义，不容我们丝毫忽视的。

(二十一)决定革命胜利以及革命转变的另一重要条件，就是已经胜利的苏联无产阶级有力的帮助，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兴起。依据中国半殖民地的条件，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胜利与世界革命的胜利，将是不可分离，中国革命对帝国主义的空前猛烈的争斗，必然要掀起世界革命的高潮，同时没有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高潮，也很难保障中国革命胜利的持续。所以特别加强中国革命在国际无产阶级中的宣传，特别是加强斗争的联系，是目前严重的任务，是准备革命胜利与革命转变主要条件之一。

六　党的任务与策略路线

(二十二)在革命急剧的发展、伟大的革命巨潮已经接近的现在，党不只是要注意到夺取广大群众，组织广大群众的斗争，以促进这一革命巨潮更快的爆发，尤其要注意到革命巨潮爆发时，组织全国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任务。因此加紧组织群众的政治斗争，加紧宣传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必要，注意促进全国革命高潮，注意武装暴动的组织上和技术上的准备，注意布置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首先胜利，是目前党的策略总路线。

(二十三)军阀战争这样继续扩大，使广大群众陷于流离、破产、死亡无可挽救的地位。整个国民党的统治，不只是表现到他自己已经走到最大的恐慌，特别是广大群众已经对他绝望。因此只有坚决执行对军阀战争的失败主义的路线，在反军阀战争的中心口号之下，才更能动员广大群众。如果党不积极的提出这样的口号，而单只提出一些部分的经济的要求，反使群众感觉无出路而不积极的起来斗争。群众好久以前就在说："是暴动的时候通知我，我一定到来"。现在党应当勇敢的号召群众，"暴动的时候快要到了，大家组织起来"。过去党对反军阀战争的斗争注意得异常不充分，是严重的缺点。现在党必须坚决提出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特别是反军阀战争的口号，组织同盟罢工以至总同盟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士暴动，号召红军积极进攻，以实现变军阀战争为消灭军阀的革命战争的总路线。

执行这一路线，首先要注意到中国革命的国际的任务。中国革命的爆发，不只是要促起帝国主义一致的压迫中国革命，而且要促起帝国主义更积极的进攻苏联。因此武装保护苏联，要成为革命的中心口号之一。并且要同时注意与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殖民地的革命斗争的联系，加紧中国革命在国际革命群众中的宣传。另一方面，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也在日益紧张起来，因此作广泛的反帝国主义战争的宣传和鼓动，加紧发动极广泛的反帝运动与援助殖民地革命运动，也同样是非常迫切的任务。

在反军阀战争的斗争中，必须同时加紧拥护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决议，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运动。必须告诉广大群众，只有推翻军阀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这一运动，必须深入到每个工厂、学校、农村中去，以鼓动广大群众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决心。

（二十四）这一路线的最中心的问题，是组织政治罢工。不只是要注意在经济罢工中加紧政治的宣传，不只是要领导每个经济斗争转变到政治斗争，而且是要坚决的提出政治的口号（如反对军队驻厂，反对白俄，反对拘捕工人，反对黄色工会，要求组织工会与罢工的自由，最中心的是反对军阀战争），来组织广泛群众的政治罢工。没有坚决的政治斗争，决难取得经济的胜利，只有坚决的政治口号，才能更提高群众斗争的勇气（在战术上每个政治口号的鼓动，每个政治斗争与经济要求的联系，自然是要严重注意的）。组织五一，五卅运动的教训，一般的都是政治的宣传鼓动不够，不能勇敢的提出政治的口号来组织五一，五卅的罢工，大都只注意到以经济的口号去发动群众，这是在各地未能组织广泛的罢工的主要原因。这是极严重的右倾错误，这不只是群众的尾巴倾向，而且是障碍群众斗争的严重的错误。

（二十五）现在工人运动中一般组织的薄弱，成为最严重的弱点，我们必须加以严重的注意，用最大的努力来扩大赤色工会，建立工厂委员会的组织。可是一定要注意到只有在坚决的政治斗争的口号之下，这一努力才能收到更大的成功。必须坚决的发动争取组织工会与罢工的自由，争取赤色工会的公开的斗争，发动反黄色工会，反国民党的斗争，才能团结更广泛的群众。如果只束缚在狭隘的秘密的范围之内，群众组织很难有广泛的发展，很难强固起来。

（二十六）建立并扩大工人群众的武装组织（赤色先锋队与纠察队），加紧军事训练，成为目前迫切的任务。不只是要在斗争中宣传组织纠察队的必要，而且要以准备武装暴动的口号来鼓动广大群众加入纠察队与赤色先锋队的组织。只有这样，才能迅速的扩大群众武装组织，才能使纠察队和赤色先锋队成为暴动的中心队伍。

（二十七）坚决的组织地方暴动，是实现目前总路线的主要任务之一。地方暴动的目的是夺取地方城市，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是农民暴动的最高形式，他的前途必然要与中心城市汇合起来，完成全国暴动的胜利。现在农村斗争，已经进到高潮，无疑的地方暴动的条件，已经是一般的成熟。党应毫不迟疑的，在号召地方暴动的口号之下，动员广大群众起来，实现这一任务。现在实现这一任务的最大障碍，是过去“游击”的观念，只是攻打城市，而不是夺取城市，没有决心将地方苏维埃政权在城市中树立起来，这是一种农民意识的反映，与目前的路线没有丝毫的共同点。地方暴动胜利以后，应当马上建立起地方苏维埃政权，并且应当马上动员广大群众实行坚决的进攻，积极的向外发展。

（二十八）猛烈扩大红军，更是目前严重的任务，特别是苏维埃区域的任务。在军阀制度统治的中国，没有强大的红军力量的配合，决不能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现在党特别是苏维埃区域的党，应当动员广大群众起来加入红军，拥护红军，集中武装到红军中去。必须告诉广大群众，只有豪绅资产阶级国民党政权的完全推翻，只有全国革命的胜利，才能保障土地革命的胜利，以冲破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这一观念，是目前猛烈扩大红军的最大的障碍。第二个严重的障碍，就是没有认识整个革命形势的发展，仍然株守着游击战术的军事观点，来反对红军的扩大以及扩大（进攻）的策略，这是完全不了解军事的战术，配备，编制，组织都应随着整个政治路线而改变，如果用旧的军事观念来束缚党的策略的转变，便是严重的右倾错误。

（二十九）红军的战略与战术，不只是要坚决进攻打击敌人的主力，向着主要城市与交通道路发展，根本改变他过去的游击战术，而且要在变军阀战争为消灭军阀的革命战争，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总的计划之下，有配合的有组织的实现他的军事作战的任务。这一任

务的总的目标，便是与主要城市的武装暴动配合，夺取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过去的游击战术已经与这一路线绝对不相容，必须根本的改变过来。现在红军另一严重的任务，就是特别加强阶级的政治教育，目前红军的成份农民群众占了最大数量，这必须严重注意阶级的政治教育，才能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肃清一切农民意识的错误倾向。

（三十）在目前总路线之下，兵士运动的任务，不只是要发动军阀军队的兵变，投到红军中来，而且要以组织反军阀战争的兵士暴动为中心战略。这就是说，不只要鼓动简单的零碎的哗变，而且要有组织，有计划，并且与各种革命势力配合的举起反军阀战争的旗帜，实行消灭军阀的暴动。这样在暴动以后，便应坚决采取进攻的战略，以瓦解军阀的军队，切实纠正过去哗变以后即行逃跑的办法。

（三十一）执行这一总路线的最大的障碍，便是与这一总路线绝不相容的右倾观念。党必须坚决的与各方面的一切动摇的右倾观念，特别是尾巴主义的倾向斗争，是执行这一总路线的前提。系统的取消主义思想的取消派，已经在事实上，从党内的反对派发展成为阶级的敌人，需要党在党内特别在群众中更坚决的斗争。可是暗藏在党内的右倾思想，因为他表面赞成党的路线，而在每个实际的策略上都发生怀疑，动摇，怠工，不积极的执行，的确是同样的成为目前的莫大的危害。不克服一切右倾的思想，党的路线与策略决不能有充分的执行。

（三十二）青年与妇女是革命斗争中一个重要力量，我们要坚决地反对忽视青年运动与妇女运动的倾向，因为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现在任何一个斗争上，都看到青年与妇女的积极作用，党应当积极地把他们吸引到革命的战线上。党更要多方面帮助青年团工作的转变，反对团内的清谈倾向。

七　党的组织问题

（三十三）目前党的组织力量的不够（特别在城市中），是革命的主要的弱点，在任何一次斗争中都极明显的表露出来。如果因组织上的弱点而怀疑现在革命形势，怀疑党的路线，是极严重的右倾观念。可是忽视党的组织的弱点，不积极的为强固党的组织而斗争，同样是严重的错误。因此特别注意强固党的组织，是执行目前总路线的总任务。

（三十四）在目前党的组织上，的确暴露出许多异常严重的弱点，首先是在工人中发展的缓慢，无产阶级基础未能迅速的扩大起来，新的工人化的干部引进得非常之少，支部生活不健全，不能在群众中实现核心的领导作用。这样党的正确的策略不能完全传达到群众中去，而群众的落后意识，却时常反映过来发生对于党的策略的动摇。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支部执行反右倾的斗争异常不够，许多地方反右倾简直还没有传达到支部中去，以至许多动摇的右倾分子尚占据着支部的领导地位，妨碍着一切策略的执行，首先就妨害着支部生活的健全。因此在支部中坚决执行反右倾的斗争，加紧支部的教育，培养支部中的干部分子，是健全支部生活、发展党的组织使党的路线与策略能够实际的正确的执行的先决条件。这是要特别唤起各级党部严重注意的问题。

（三十五）现在党的组织上，还表现着一种小资产阶级浪漫性的危险：不能有组织的、有规律的去进行工作，督促工作，常常表现着寒热症的状态，这是大有害于工作的紧张，特别是对秘密工作的忽视，简直直接影响党的存在。最近几个省区的严重破获，主要原因都是由于不注意秘密工作。这样严重的血的教训，应该唤起全党的莫大的注意，坚决与小资产阶级浪漫倾向斗争，成为巩固党的组织的主要任务之一。

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

（一九三〇年五月十五日）

李 立 三

现时革命斗争的发展日益接近革命高潮——直接革命的形势，提出了许多严重的问题，严重的任务摆在我们前面。如果对于这些问题不能找到正确的列宁主义的解答，我们将会犯到可怕的严重的错误，甚至断送革命。我在最近几期的红旗上面写了一些短篇的论文来解答这些严重的问题。虽然是零碎的篇章，却还可以找出系统的贯串。又因迫于实际工作不能再作长篇论文，所以把它汇集起来，重行在布报登载，暂给这些问题以初步的原则的解答。

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

（一）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殖民地，即是世界资本主义的最大的商品和资本市场与原料的供给地。因此中国是整个帝国主义的经济组织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帝国主义的统治失掉了中国，便是帝国主义——首先是世界三主要帝国主义日、英、美灭亡的到来。所以中国革命成为世界革命主要柱石之一。

中国革命最主要最严重的敌人是帝国主义，所以中国革命的胜负不只是要决定于国内的无产阶级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的斗争力量，而且要决定于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力量。同时中国革命的胜负也必然要决定世界革命的胜负；中国革命的胜利必然紧接着世界革命的胜利；没有世界革命的胜利，也决不能保障中国革命胜利的持续。这是半殖民地的中国，与苏联不同的条件得出来的必然的结论。

中国革命的开始，不只是要遇到残酷的国内战争，而且马上要遇到更残酷的国际战争——帝国主义压迫中国革命的战争。这一战争只有，而且必然是全世界无产阶级与中国革命及全世界殖民地工农劳苦群众站在一边（无疑的社会主义的苏联是这一战线的领导者）全世界帝国主义与全世界殖民地的封建地主资产阶级站在一边；作决定各自寿命的最后的搏战。中国革命要在这一最后的搏战中取得胜利，同时世界无产阶级也会在这一最后搏战中取得最后的胜利，完成社会主义的世界。

如果有人拿一九二五——二七的革命，国民党政府可以用外交政策来缓和帝国主义的压迫来比拟将来的形势，那么，他是完全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阶级关系的转变——那时帝国主义还可以采用引诱中国资产阶级叛变的方法来消灭中国革命——与整个国际形势的截然不同，无疑的这样忽视对帝国主义的残酷斗争是极危险的机会主义的观点。中国革命只有在与

帝国主义作决死争斗，取得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强大的援助与共同斗争的条件之下，才能保障最后的胜利。所以更加巩固与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联系，特别加强世界无产阶级对中国无产阶级的信念，加强他们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以取得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强大的援助与及时的一致的行动，这是准备中国革命胜利的主要的条件，这是中国指导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而且是国际与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严重的任务。

（二）

依据中国这样的客观条件，取消派的人们便得出了他最无耻的结论，"中国革命高潮，只有在世界革命或者帝国主义战争爆发才有再来的可能，并且才有胜利的可能"。这样等待世界革命与帝国主义战争再来革命的观点，这不只是没有进一步的去了解国际与中国的客观条件，而且没有了解极粗浅的革命的各部分的力量互相推进的作用。遂形成了他"睡在李树下等候李子落到口里来"的最无耻的懒汉的观点。

帝国主义是中国主要的统治者，固然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不能保障中国革命的胜利；没有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决难有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的胜利；可是就帝国主义统治的整个世界来看，中国是帝国主义一切根本矛盾最集中的地方，而且是最尖锐最严重的地方，这就是说帝国主义束缚世界的锁链中，中国是最薄弱的一环，就是革命最易爆发的地方。所以世界革命有首先在中国爆发的可能，而且这一爆发以后，必要引起整个世界革命的兴起。

中国是世界之主要帝国主义——英日美冲突最厉害的地方，是资本主义的世界与社会主义的苏联直接接触的地方之一，是殖民地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最严重的地方，同时也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最易为尖锐化的地方——譬如现在每次工人的经济斗争，都迅速的转变为严重的政治斗争以至武装冲突。这样一切帝国主义的根本矛盾都集中在中国，遂造成中国无可挽救的经济政治的危机，造成不断的军阀混战，造成统治阶级无法稳定而日趋崩溃的基础，造成工人阶级与广大劳苦群众只有日益走上革命来找自己解放的出路。这就是中国革命最易为爆发的主要原因。

假如中国革命要首先爆发，自然要遇到极残酷的斗争，极严重的牺牲，然而这是历史赋予的伟大的使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有最大的决心准备最大的力量来完成这样伟大的历史使命。谁想逃避这样的使命为这样空前的残酷斗争所吓怕，他就必然成为取消主义者，客观上就是帝国主义统治的支持者。

（三）

目前革命形势无疑的是日益接近新的革命高潮，根据中国的经济政治的条件，在全国革命高潮下，革命有在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可能。党的任务是在准备全国革命高潮之下最严重注意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条件。

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是全国革命政权的建立，是全国革命胜利的开始。根据上面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的分析，更可知道一省与几省的政权的夺取，是有他的严重的国际意义。他不只是马上要遇到残酷的国内战争而且马上要遇到残酷的国际战争。所以在我们准备这一胜利的条件的时候，必须严重注意这样伟大的残酷的斗争，决不容许我们有丝毫的儿戏。

我们要特别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力量，要准备各种革命势力的平衡发展，要准备全国的

配合，而且要特别加强与世界革命的斗争联系，这都是准备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不可缺少的条件。

世界革命浪潮的正在发展，无疑的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条件，可是世界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注意——虽然有共产国际的指导与号召，还是不够，所以我们在准备伟大的革命斗争的时候，要严重注意与国际无产阶级的联系，而且我们应当要求国际动员全世界无产阶级注意中国革命问题，准备拥护中国革命伟大的争斗。

论革命高潮

（一）革命形势决定党的战略

党的主要战略，是要依当时的客观形势来决定；我们要正确的精密的去估量客观形势就是为着要确定我们的战略，与战略的转变。在有革命形势与没有革命形势时，以及在一般的革命形势和革命高潮时，无产阶级列宁党的战略是完全不同的。

六次大会正确的指出："现时没有广泛群众的革命高潮，……武装暴动只是宣传的口号"，"将来新的高潮时，便应把武装暴动从宣传的口号变成直接实际行动的口号。……"

所以我们提出革命高潮问题是有严重的战略转变的意义：如果离开党的战略而斤斤于现时是否是革命高潮的争论，或者说"党的战略并没有什么不够"，而对革命形势又估量是"革命高潮已经到来"的名词的争论。这是十足的书生式的清谈，完全不是列宁主义者提出问题的方式。

（二）革命高潮的标志

现时形势，无疑的是革命复兴，日益接近革命高潮的形势。可是在全国范围内的确还没有表现出革命高潮已经到来的主要的标志。

对的，现时土地革命是有空前的发展与深入，生长了很多的苏维埃区域，特别是红军的扩大与巩固。工人斗争与罢工运动也在继续不断的兴起，兵士群众也在日益革命化。然而这些只能说是革命高潮将要到来的形势，还不能说是革命高潮已经到来。

革命高潮的主要的标志，一定要注意革命势力中先进阶级——工人阶级的斗争形势。只有产业区域与政治中心涌现了工人斗争的高潮，广泛的甚至落后的工人群众都表现出对政治斗争的积极，才是革命高潮已经到来的标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动摇统治阶级的根本，才能领导各种革命势力汇合起来，进行夺取全国政权的武装暴动。现在工人斗争的形势，的确比以前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已经渐次从国民党黄色工会领导之下脱离出来，走向反国民党反黄色工会的斗争；从和平合法的斗争方式之下解放出来走向直接斗争。这样的不同，的确有严重的政治意义，证明工人阶级已经得到很多的政治经验，已经有了更高的政治觉悟，成为革命高潮将要到来的主要征兆。可是另一方面的确表现出还停留在一厂一业的斗争，还没有汇合成为伟大的争斗，还表现出时起时伏的散乱的形势，特别是还留有不少的对国民党黄色工会幻想的残余，以及最主要的产业工人——铁路，海员，兵工厂，市政工人，还没有普遍的积极起来，这些现象就可说现在还不是广泛群众的革命斗争的高潮。自然在现在军阀混战日益扩大，统治阶级统治的力量日益削弱的形势，经济与政治的恐慌更加严重的形势，特别

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形势，革命高潮的到来决不会是很慢的。而且在这样客观条件日益成熟之中，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都有爆发革命高潮的可能，这是要我们严重的注意，决不可丝毫忽视的。但是即令明天就爆发革命高潮，今天这样的估量，仍然不免是错误的。

就一般的说决不是每一个工人群众的总罢工都可以发展成为革命高潮，而必须有其他各种必要的条件的配合。在现在中国的形势，有了农村暴动的广泛的发展，有了工农红军的迅速扩大，有了兵士的动摇与自觉的哗变的事实的增加，有了统治阶级这样严重的危机，的确只要是在产业区域与政治中心爆发了一个伟大的工人争斗，便马上可以形成革命的高潮——直接革命的形势。这更是我们应当特别严重注意的。因此取消派在估计客观形势的时候，完全把农民暴动的发展除外，现在更进一步的与国民党同声的詈红军为土匪，这除掉帮助统治阶级欺骗群众来消灭革命以外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

（三）目前主要的危险仍然是对革命形势估量不足的右倾观念

我们对于过分估量革命形势的左倾幼稚的观念固然应当避免；可是目前主要的危险，仍然是对革命形势估量不足的右倾错误。在现在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之下，左倾的观念，只要还没有犯到过早暴动的策略上的严重错误的时候（当然，如果我们不及时纠正必然会犯到这样策略上的错误），还不会大有害于群众斗争；可是对革命形势估量不足的右倾错误，不要说连到策略问题，就是这种观念本身已足灰懒群众斗争的勇气与决心，已经是帮助统治阶级松懈革命阵线缓和革命斗争的最好方法，所以我们应当严厉的指斥这种观念的错误！

我不愿意多来批评取消派的“现在丝毫没有革命高潮的象征，只是统治阶级稳定，革命低落时期”的说法，因为这不过是帮统治阶级宣传的无耻的勾当。经济的事实已经回答他：严重的工业恐慌与军阀战争所造出来的饥荒与破产都是表示出革命的形势。政治的事实也已经回答了他：反动统治的恐慌，战争的扩大与延长特别是工人斗争的尖锐化，农村暴动的普遍发展，红军的扩大与兵士的革命化。这难道还不够说明革命形势的存在与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吗？如果否认这些事实，那么，他若不是瞎子便无疑的是在无耻的替国民党蒋介石作宣传。我要劝动摇于取消派的人们（声明一句决不是劝陈独秀彭述之刘仁静梁干慈……等纯粹的取消派，因为他们已经是自觉的阶级叛徒，列宁主义的叛徒），去拿列宁著的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第七章甚么是国际主义中论到当时欧洲革命形势的一段细读二遍，便了然于这样的真理，便可知道陈独秀彭述之们现在干的甚么勾当！

现在要特别批评的就是党内现存的一种对工人斗争的悲观观念，他并不否认革命形势的发展，他觉得现在工人斗争没有如农村斗争一样的高涨的形势，也还是对的。可是他因此便怀疑到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他觉得工人斗争很难有很快的高涨，这就是极危险的右倾错误。在他这一分析上，缺乏一点非常重要的认识。他只机械的看到了现在群众的组织力量还是很薄弱，党的组织是更加不够，便结论到革命高潮不会很快的到来。他却不知道在经济政治的恐慌日益严重，广大群众失业破产饥饿死亡没有出路，这些革命客观条件日益成熟的时候，再加以统治阶级改良欺骗日益破产和群众斗争已在发展的条件，那么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都有爆发革命高潮的可能；而且在革命高潮到来的形势之下，群众组织可以飞速的从极小的组织发展到几十万人甚至几百万人的伟大的组织，同样，党的组织也可以在几星期甚至几日以内变成广泛的群众的党。这是在革命的历史上可以找到不少的例证。如果在党决定策略的时候不抓住这样的客观形势，无疑的要犯到严重的右倾错误，而且无疑的将会成为革命发

展的尾巴，甚至阻碍革命，那就已经是十足的机会主义了。

自然这样的认识决不会使我们松懈对于加强城市工作的特别注意。因为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尤其要特别加强党在工人群众中工作，极力扩大群众的组织与党的组织，加强群众的斗争力量与党的政治影响；然后才能树立强固的基础促进革命高潮更快的到来，领导革命的彻底胜利。否则革命高潮的爆发，将使我们措手不及，而又受到严重的失败（不管这一失败是如何暂时的，都是严重的罪过）。所以特别注意工人运动的工作，加强赤色工会的组织，组织政治罢工与同盟罢工是目前党的最主要的任务。

准备建立革命的政权

目前全国范围内还不是革命的高潮，但显然的是逐渐接近于这种革命高潮的形势。因为如此，所以准备建立革命政权的问题，在目前便应该使广大群众严重注意，因为他造成了最近斗争的目标，他已经有了实际的策略意义。

就全国范围内看来，革命的群众斗争，工人，农民，士兵，红军，确是一个普遍发展的形势。从哈尔滨，唐山，天津以至武汉，上海，厦门，广州，香港，都是平衡的向前发展。在目前这一统治阶级大破裂的客观形势之下，使着无产阶级的先锋——共产党，必须显明的认清最近革命发展的前途。革命高潮的客观条件已经无疑义的正在成熟，我们只是不能预料其爆发的时日，只是要尽量准备着这一爆发，只是要用最大的主观的努力，以配合与促进这一客观形势的发展。

在这样形势之下，怎样去建立革命政权将要成为策略路线的中心问题。我们党第六次大会的政治决议案上说：

> “反动统治在各区域巩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总的新高潮之下，可以是革命先在一省或几省重要省区之内胜利。”

这个原则在目前接近革命高潮的客观形势之下，他有严重的策略上的意义。他告诉我们，当全国范围内已经到了革命高潮的时候，但革命政权或许不能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而要首先建立一省或几省的革命政权。

因为中国在经济上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集中的组织，还没有垄断全国经济之唯一的中心。上海是长江流域的统治中心，但还不能说是全国的唯一中心。南方的经济中心是香港，北方的经济中心是天津，满洲的中心是大连与哈尔滨，他们固然都受上海的影响，但上海并不能绝对的支配。这种形势在政治上的反映，就是使全国政治上有许多封建军阀的势力，将中国分裂成一种显然割据的局面。这不仅对统治阶级有严重的影响，他同样也影响于革命发展的前途。柏林的暴动，可以——并且必然——使整个德国起来响应，巴黎的胜利便是在整个法国胜利，但中国却没有任何的重要城市能有巴黎柏林这样的作用。上海是中国第一个产业中心，这里若发生了暴动，自然对全国以至对全世界都有很大的影响，但他并不能马上使全国反动势力都完全死灭，一九二七年的三次暴动便是一个显明的例证。其他的城市，自然比上海的领导作用还要小。在这一种形势之下，革命势力在某一省或某几省得着胜利之后，反动统治还不免可以在其他省区内保持一个相当时期的最后挣扎。我们的任务是要力争一省或几省政权的前途，建立全国的革命政权。来完成我们全国革命的胜利。

一省或几省的革命政权，虽然还不是全国范围内的革命胜利，但他必已经是有了全国范

围内之革命高潮。这种政权虽然建立于一省和几省，但他的基础一定不只是依靠于某一省或几省的革命势力，而必然要依靠于全国范围之广大的革命高潮。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一省或几省的政权，不但不是一个和平割据的前途，并且比现在各省苏维埃区域还要更激烈的争斗，极力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经过一省或几省的政权，过渡到全国范围内之苏维埃政权的胜利。

怎样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的条件

六次大会指示我们：

> “反动的统治在各区域巩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总的新高潮之下，可以是革命在一省与几省重要省区首先胜利”。

最近政治事变与革命形势的发展，已显示出全国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可是另一方面虽然全国的统治阶级无疑的都在日趋于崩溃，然而各省军阀撑持他的统治的力量上已有明显的强弱的不同；因此全国的革命斗争虽是同样的日益尖锐，而发展的速度与各种革命势力配合，也就表现在某几省区更加成熟的形势。这完全证明六次大会指示的正确。因此在准备全国革命的胜利的任务之下加紧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已成为党的目前的总的战略。

第一，首先要了解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是与全国革命高潮不可分离。“没有革命高潮的条件之下，这种胜利没有可能实现”（六次大会）。因此要取得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首先要注意全国的配合，没有全国的配合，决没有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现在军阀混战的扩大与加深，无疑的是更便利于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的条件；可是只要革命已经或者将要在一省几省胜利的时候，反动势力的各派，各省军阀，尤其是各帝国主义，马上要抛弃他们相互的矛盾联合一致的来压迫革命。以前一九二五——二七的革命政府可以割据广东一年来准备自己的力量的形势，在现在苏维埃革命的阶段是绝对不会有的事。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以后必然是紧接着残酷的战争，不仅是消灭反动势力的内战，而且是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际战争。如果不是有全国革命的高潮，如果不能调动全国无数千万工农兵士劳苦群众，一致坚决的与反动势力作拼死的决战（并且还要加上全世界无产阶级尤其是苏联的有力的援助，一致的斗争），决不能克服反动势力争取全国的胜利。所以一省与几省政权，必须是紧接着全国革命的胜利，决不能有什么“割据”，“偏安”的局面。所以在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的时候，如果只注意在某几省区的狭隘的范围而忽视了全国工作同时加紧的配合，便是绝对的错误观念。

第二，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力量。没有中心城市，产业区域，特别铁路海员兵工厂工人群众的罢工高潮，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想“以乡村来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中心城市”都只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所以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的条件，特别要加紧主要城市尤其是重要产业工人中的工作。所以组织政治罢工，扩大到总同盟罢工，加紧工人武装的组织与训练，以创造武装暴动的胜利的基础，是准备一省与几省政权夺取的最主要的策略。还要特别认识，在统治阶级日趋崩溃，乡村的统治日益失败的时候，必然要紧抓着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作决死的挣扎，因此城市的争斗必然要比乡村还要残酷十倍。所以在城市尤其重要产业工人中，树立起摧毁不坏的基础，唤起着广大群众拼死斗争的决心，是目前最严重的工作，是战略上首先要解决

的问题。

第三，在中国客观经济政治条件之下，单只无产阶级斗争的高潮，而没有农民的暴动，兵士的哗变，红军的有力的进攻，各种革命势力的配合，同样是绝对不会有革命的胜利。而且在这四种革命势力中，缺乏任何一种，都是不可能的。取消派轻视农民，不要红军的思想，无疑的是企图削除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消灭革命的战斗力的反动思想。同样，认为现在城市的工人的斗争尚未高涨起来，要现在农村中采取保守的策略，停止红军的发展的等待观念也是极端错误的。农民在革命中作用的伟大，比以前俄国革命的情形，还要严重的多；在土地革命中产生出伟大的红军力量，更是中国特有的条件，这是托洛茨基主义取消派所绝对不能了解的，所以托洛茨基主义的危害革命，在中国尤为严重。现在的形势，工人斗争固然还没有进到革命的高潮，农民暴动与红军发展也还是表现着不够。我们应严重注意加强工人的斗争力量，决不应过虑农民与红军的发展超过城市超过工人。因为即令农民与红军的发展超过城市，超过工人，决不会有害于城市工作有害于工人斗争，而且还可以帮助工人斗争更便利发展的条件。所以我们的策略，不是停止农民与红军的发展，而是要特别着重工人斗争力量的加强。所以我们对于农民与红军，同样要采取积极发展，扩大与进攻的策略。

四月二日

准备建立革命政权与无产阶级的领导

现在革命的发展，无疑的是日益接近着新的革命高潮——直接革命的形势。这一形势的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把广泛的落后的群众——无论在城市与乡村都是一样，都卷入到政治斗争的漩涡。因此加紧准备武装暴动，准备并促进这一新的高潮的到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革命政权，成为党的目前的中心任务。

按照中国客观的经济政治的条件，这一全国范围的革命高潮，将要在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决不能与全国范围的革命高潮分离，尤其是要争取这一胜利，必须是工人，农民，兵士，红军斗争力量的总的汇合，特别是工人阶级的领导。没有极广泛的罢工运动，没有中心城市的政治的总罢工，决不能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

因此无疑的，红军是主要革命力量之一，可是想单凭着红军的力量，来夺取一省与几省的政权，建立全国革命的政权，便是一种异常错误的观念；因为不只是不可能的幻想，尤其是这样的观念，便会在策略上忽视着我们最主要的工作：组织工人的争斗，组织政治罢工，组织工人的武装队。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他们的头脑与心腹，单只斩断了他的四肢，而没有斩断他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还不能制他的最后的死命。这一斩断统治阶级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的残酷的争斗，主要是靠工人阶级的最后的激烈争斗——武装暴动。所以忽视准备工人阶级的武装暴动，不只是策略上的严重的错误，而且会成为不可饶恕的罪过。

这一偏向的来源由于不信任现在工人阶级的力量，工人斗争的悲观观念。他觉得“现在革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乡村的发展，特别是红军的扩大远超城市，远超过工人的斗争。”因此便形成单凭红军的力量可以夺取政权的观念。而在策略的结论上便必然走上忽视应特别注意加强组织工人斗争的偏向。

自然从这样对工人斗争悲观的观念出发，而走到这一策略的偏向，还是比较积极的较好的一方面，更坏的一方面必然会走到取消红军，取消农民暴动，取消革命的取消主义派倾向上去。

就现在的斗争形势看，乡村已有极广泛的农民暴动，苏维埃区域普遍的发展，而城市工人阶级的斗争，只是一厂一业的罢工而没有形成伟大的政治斗争，的确是表现不平衡。不过这仅仅是表面的，今天的形势。至于阶级斗争的实质与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无论城市与乡村的确是同样的异常的尖锐。无论在南方与北方，在任何一个城市中的工人斗争，每一个很小的经济斗争都很快的转变为严重的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政治斗争，转变为残酷的武装斗争；而且激烈的反黄色工会反国民党的争斗，已经普遍的在工人中发展，在上海，天津，青岛，武汉，都爆发了政治罢工与示威运动，这就充分表现出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其所以还没有汇合成为伟大的总的政治争斗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统治阶级白色恐怖的镇压，统治阶级镇压革命的力量还超过工人斗争的力量。无疑的现在统治阶级是日趋崩溃的末日，可是正因为他在日益恐慌，特别是在乡村已表现失败的时候，他必然要尽他的力量在城市中作顽强的挣扎。这样就造成城市工人斗争，更残酷更严重的条件，这样就造成今日城市工人斗争还没有总的爆发的形势。如果统治阶级在城市，也如在乡村一样毫无统治的力量了，那么，便已经到了他上断头台的最后的末日。

因此，城市的争斗，既然更加严重，更加残酷，所以更需要伟大的强固的革命的主观力量，才能冲破白色恐怖的镇压，战胜统治阶级，促进他的死亡，就现在主观力量的估计，的确，无论在党与群众的方面都还是异常不够。因此特别注意工人群众中的工作，加强党与群众的力量，组织政治罢工与同盟罢工，以汇合现在还在散乱的斗争形势，成为伟大的革命高潮，这是党准备建立革命政权任务的最中心的策略。

可是还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要认识现在军阀战争的继续扩大，无可解决的经济政治危机迅速的加深，无疑的要使到统治阶级统治的力量继续削弱，更促进工人斗争力量的飞速发展，而造成革命高潮的更成熟的条件。这就是说现在统治阶级这样的镇压，仅仅是企图维持自己寿命的挣扎，不只是不能由这一挣扎重复走到“稳定”的途程，而且这一挣扎只是加速他的崩溃。因为统治阶级无办法缓和根本的政治经济的危机，自然最后挣扎的白色恐怖，只是更促进广大群众的愤慨与斗争的决心，使最落后的群众都会渐次认识除掉推翻现在的统治，毫无生路。所以我们目前特别注意加强工人斗争的力量，是有很便利的客观条件。虽然这一斗争是异常残酷的，可是，确有很快发展的可能。并且在这样客观条件更加成熟的时候，将会在一瞬间，爆发出伟大的争斗，这就是说从现在到工人革命的高潮，决没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因此如果只看见现在工人的总的争斗尚未形成便主张停止红军的发展以等候工人争斗，是异常错误的观念。

所以特别注意发展工人斗争的力量，组织政治罢工与同盟罢工以加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力量，这是现在党准备新的革命高潮，首先夺取一省与数省政权，建立革命政权的中心策略。单想凭借红军的力量以夺取政权自然是错误的观念；如果企图停止红军的发展以等候工人斗争的高潮，甚至主张取消红军，那就走到了与取消派的观念毫无根本的区别了。

建立革命政权与革命转变

现时全国革命斗争无疑的是日益接近直接革命的形势，因此准备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建立革命政权的问题，已经提到党的任务的前面。紧随着这一问题要同时，而且必然同时提出的就是革命转变——从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

目前革命斗争的主要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是消灭封建势力的土地革命，所以无疑义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取消派认为现在民主革命的任务已经终了的滥言，只是使我们放松民主革命的任务，放松动员广大群众的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的民主思想。可是中国资产阶级已经是反动联盟的一部分，因此民主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同时也必须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与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不可分离，而且必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巩固与苏维埃政权建立的胜利。这就决定民主革命的胜利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胜利。

革命已经在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的时候，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必然要用尽一切力量来反对革命，经济怠工，组织反革命的暴动与武装进攻等。这一残酷的战争是对帝国主义买办地主阶级的战争，同时就是对资产阶级的战争。这时革命政府为着力争全国革命的胜利，不只是要没收土地，没收帝国主义的银行企业工厂，使民主革命干到彻底而且要没收中国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银行以削除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武器；并且为着对付严重的经济封锁必然要实行组织生产，管理生产。同时在政治上，为着对付这样顽强的反革命的进攻，必然需要更集中独裁的政权，这就必然需要从工农专政进到无产阶级的专政。政治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没收资本家的工厂企业和银行，由革命政府来组织生产管理生产，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性质了。所以革命胜利的开始，革命政权建立的开始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中间决不会有丝毫的间隔。

如果以为革命一定要在全国胜利以后，才能开始革命的转变，这是严重的错误。因为这时革命政府如果不坚决执行阶级的政策没收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和银行以削除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的武器，不只是停止革命的深入，而且会障碍着力争全国革命的胜利，这就是革命的自杀政策。所以革命转变的阶段论，无疑的是极端危险的右倾观念。另一方面如果以为“革命胜利的前夜，还是民主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开始胜利后，革命政权一开始建立便是纯粹社会主义的政权”，也是错误的。这就忽视了革命转变的过程（不管这一过程是如何的短促，然而是必然经过的），忽视了这时反帝国主义反豪绅资产阶级的残酷战争，还需要民主革命的口号和政策以动员千万、万万群众来克服这一反革命的进攻。所以这一错误的观念，也是很危险的。

革命胜利的开始，必然就是更残酷的阶级战争，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除掉极力进行反革命武装的进攻外，必然还要用尽一切方法来引诱尚留在革命战线的小资产阶级（乡村残留的富农与中农，城市中的小商人……等）来反对革命。所以在革命转变的过程中不可免还要发生新的动摇与叛变。所以我们决不应幻想革命的和平转变，而要从现在起运用我们正确的策略，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建立雇农的独立组织并巩固与贫农的联合，肃清富农的影响，稳定中农的动摇，以减少将来革命转变的困难。这样正确的坚决的策略，的确有决定将来革命转变，比较顺利的严重意义，不容我们丝毫忽视的。

决定这一革命以及革命转变胜利的另一重要的条件，就是已经胜利的苏联无产阶级的有力的帮助，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兴起。依据中国半殖民地的条件，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胜利与世界革命的胜利将是不可分离。中国革命对帝国主义的空前猛烈的争斗，必然要掀起世界革命的高潮；（就目前世界革命浪潮正在高涨的条件来说）同时没有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高潮，决不能保障中国革命胜利的持续。所以特别加强中国革命在国际无产阶级中的宣传，特别是加强斗争的联系，实在是目前严重的任务，是准备革命胜利与革命转变的主要条件之一。

（原载《布尔塞维克》3卷4.5期）

中共中央通告（第八十四号）

（一九三〇年七月二十一日）

一、一切事变的发展，都在证实或已经证实六月十一日政治局通过的政治决议，对于政治局势估计的正确。已经成熟了的中国政治经济与革命的危机，都在加速转变的过程，军阀战争高度的发展，造成的更大混乱，与经济破碎，工人失业，农民极度的贫困化，城市贫民大量的增加，再加食粮的恐慌与生活程度的激昂，这样的把广大群众都卷入反军阀战争的战线。工人罢工示威，农村斗争的高潮，地方暴动与兵变的发展，这一切都是革命高潮前夜的形势。这一个形势，一般的都在猛烈的向前转变的推进，向着更高的形式发展。在这一个形势底下，党的任务应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组织总同盟罢工，是目前的中心策略。

二、对于这一个革命形势估计不足，是目前党内主要的右倾危险。因为对于革命形势转变估计的不够，对于策略的执行动摇的右倾，并且有的省份不能站在整个革命形势的立场上来坚决地执行党的策略，而发生一种地方的“例外观念”，以及对于工作布置，不能抓紧革命形势的转变而更加展开。这一切都是对于目前革命形势转变估计不足所产生的右倾危险。这一切右倾危险，就是机会主义的前提，我们应当坚决的与这一右倾倾向斗争，才能保证党的路线正确执行。

三、在革命形势加速的向前转变，党应当夺取广大的群众，更实际的加紧准备全国武装暴动，与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实际布置。加紧反对世界大战，武装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援助殖民地革命运动。在这一个总任务下，坚决的反对军阀战争，执行变军阀战争为消灭军阀的革命战争的策略路线。为能充分的实现六月十一日政治局决议所决定的策略路线，应加紧以下的工作布置：

（一）各省须成立行动委员会，以集中力量来发动目前的工作，同时必须积极的动员全党，使同志能了解革命形势的转变，坚定对于策略执行的决心。

（二）扩大党的政治宣传煽动工作。党应该印刷各种宣传品，每天经常的向群众中散发，号召广大群众起来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变军阀战争为消灭军阀的革命战争。一定要认清楚，今天如果能在群众中扩大党的政治宣传与煽动，在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广大群众都能在党的政治影响领导之下，而作坚决拼死的斗争。

（三）组织总同盟政治罢工。在今天一定要认清革命形势的转变，与斗争形式转变的迅速，在一个前提下来发动政治罢工与同盟罢工。目前斗争形势，客观上已经早已具备政治罢工与同盟罢工的条件。没有能很广大发动起来的原因，主要的是执行策略上的右倾倾向：（1）对于革命形势转变认识不够的动摇；（2）不能坚决的提出政治口号来发动；（3）组织同盟罢工，缺乏整个的布置来抓住中心发动，而是组织中心斗争来推动同盟斗争的观念。应当坚决以政治要求来组织斗争，并应运用合适的同盟罢工的新的斗争方式。

（四）为适应总同盟罢工与同一产业的同盟罢工，应采取新的组织斗争的方式。组织同一

产业同盟罢工的行动委员会（各纱厂、市政等），这一个委员会是一个群众系统，同时集中党的力量。各个产业的行动委员会，直接在市总工会的指导之下，若因地域不集中，可以建立分会（如上海沪东、沪西的纱厂委员会分会），每一个工厂同样建立委员会，在他的下边团结群众的及党的活动分子于其周围来行动。每一个行动委员会，党派出得力同志参加或主持。如果该区区委所属的重要工作对象是纱厂，那末，区委重要工作负责人应参加主持该区分会。每一个行动委员会应当每天开会，计划与指导这个产业的同盟罢工的工作，只有这种方式，才能适应目前新的斗争形式。

（五）建立赤色工会的组织是组织斗争的先决条件。极力纠正群众组织的狭隘的右倾观念，应以赤色斗争纲领，运用公开的群众路线，广泛的发展与建立赤色工会，经过赤色工会来扩大建立工人纠察队的组织。

（六）赤色先锋队与党员军事化。赤色先锋队是准备武装暴动的具体的军事组织形式，他完全是军事系统，属于军委。每一个支部以及青年团支部及工会党团，都应有军事特派员，负责建立赤色先锋队，每一个党员都应负责建立赤色先锋队，党员除在支部内受特殊的军事训练以外，一般的应在赤色先锋队内受军事训练。

（七）猛烈的扩大红军与建立工农革命军事委员会。红军目前应当猛烈的扩大与大规模集中，消灭当前的敌军，向主要战略目标进逼。目前红军扩大与发展最困难的问题，是地方党部、苏维埃与红军关系不好，现在在战区内应立即建立工农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最高政治军事的指导机关，集中统一指挥。

（八）组织地方暴动。在今天组织地方暴动，应是中心产业区域武装暴动的联接点。目前应加紧中心城市产业区域周围以及沿交通路线的主要城市及工人区域的地方暴动，使其与整个革命转变的形势配合，与城市武装暴动相衔接。

（九）加紧士兵运动与组织反军阀战争的兵士暴动。目前士兵运动一定要与我们准备武装暴动的主观力量来对比，以加紧军阀体系的中心部队工作，组织反军阀战争的士兵暴动，必须要与整个革命形势转变来配合。

（十）农村中与苏维埃区域工作，应当有极大的转变。积极发展地方暴动，建立政权，深入土地革命。苏维埃区域应站在争取全国革命胜利的立场上，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政治领导，广大的动员，普遍的武装群众，猛烈的扩大红军，建立雇农工会与贫农委员会的组织，巩固与中农的联盟，镇压富农的反动。

（十一）城市贫民工作。组织贫民闹米荒的骚动，与整个武装暴动的准备及组织总同盟罢工配合。应建立贫民群众组织与武装组织。

（十二）扩大党的阶级基础，是党的组织主要路线。在大产业中发展党员，坚决执行向产业工人开门，建立支部生活，是目前党的主要组织任务。在农村中巩固阶级领导，建立党的基础于雇农群众之上，坚决肃清在党内的富农成分。

（十三）最后，各地对于工作布置，应当站在全国革命形势的立场上，与全国首先胜利的形势配合。

中　　央

目前政治形势与党在准备武装暴动中的任务

——一九三〇年八月六日在中央行动委员会上的报告——

李 立 三

同志们！目前中国革命的形势，正在突飞猛进的向前发展，已经显然表示着到了历史上伟大事变的前夜。中国革命当前的任务，已经显然是推翻统治阶级与建立苏维埃政府，这使着共产党的任务也更加重大。在现在形势之下，不仅要有健强的党的大机关，并且要有全党同志的动员，自上至下的总动员。整个党的组织需要军事化，要更集中与严密的指导。因此，中央政治局决定现在必需有全国总行动委员会的组织，以及北方局、长江局、南方局，江苏总行委的成立，这些组织成立的意义是要使全党的指导更敏捷、更迅速、更巩固，这就是向忠发同志今天所报告的总行委成立的意义。总行委成立以后，是要根据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执行政治局所付托的任务，因此，现在必需将中央政治局对于全国政治形势的分析，对于目前党的任务的决定，在这里作一概括的报告，作为总行委今天讨论的基础。

甲、目前中国革命形势的特点

一、中国革命生长于世界革命的第三时期

中国革命之第一个特点，就是中国革命生长于世界革命的第三时期中。世界革命第三时期的特征，是世界资本主义之一切内外矛盾的紧张，整个经济制度之严重的危机，显然表示要急剧的走向崩溃与死亡。中国是一半殖民地的国家，是世界帝国主义制度之经济组织中的一部分，现在世界帝国主义之一切矛盾，都在中国反映出来。中国是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苏联冲突最紧张的地方，是英日美三个主要帝国主义相互冲突最激烈的地方，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矛盾最尖锐的地方，同时也是半封建地主与广大农民群众的冲突最严重的地方。这一切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矛盾，都全数的在中国集聚起来。正因为这些国际上矛盾都集中于中国，所以造成中国之一切政治与经济的危机，革命的危机，生长成为现在中国的大革命。这一国际条件是与前一次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完全不同的。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在客观上之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是资本主义之暂时稳定，是所谓第二时期。现在不然，现在是整个世界革命迅速发展的时期，全世界普遍的逼进于直接革命的形势，这是便利于中国革命的发展的。这一国际条件，可以决定中国革命的大爆发。特别是因为中国是一个最大的殖民地，是现在帝国主义制度的一个主要经济基础，更必然要做出这样的结论，这是中国革命之第一个特点。

二、统治中国的军阀制度的崩溃

目前革命形势中的第二个特点，便是统治中国的军阀制度之迅速的崩溃。因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因为中国封建势力的存在，都利用军阀制度来做统治中国的工具。各帝国主义中间相互的竞争与冲突，又加以封建势力之争取地盘的特性，于是使中国不断的发生着军阀战争。远一点说，这种战争曾延长了二十年，近一点说，在近三年来的国民党统治之下，同样完全没有停止。这一长期的军阀战争，使广大群众陷于绝境，全国经济的大破产，使广大群众破产、失业、饥饿、死亡。在这一种形势之下，全国广大群众确是已经觉悟了，除了坚决的对军阀战争作战以外，别的是没有出路的。特别是现在全国农民暴动的发展，土地革命的深入，这是直接动摇了军阀制度的基础。数百万的军阀军队中的士兵，这些都是失业破产的农民，因此，农民暴动当然一定要动摇军阀军队中的士兵。这一次的长沙事变，便是一个显然的例证。当红军进攻长沙的时候，何健的军队超过红军几倍，并且在何健军队中间，我们共产党的工作是非常薄弱的，几乎是完全没有，但是何健的军队一到与红军见面的时候，不开一枪的大批的潮水一样的投降红军。自然，这一军阀制度的崩溃，不只是简单的农民暴动的一个原因，同样有另一个原因，就数十万以至数百万的士兵群众，已经受了长期的军阀战争的痛苦。但是在每一次的军阀战争中，士兵群众眼看着自己弟兄变成炮灰，战场上的尸山血海，换来的不过是军阀们的升官发财。因此，广大士兵群众知道在军阀战争之下是没有出路的。因此，士兵群众的哗变暴动，投降红军，不仅在一些杂色军队中看见，并且在南京政府下之主要部队中也不断的发生。这一军阀制度之迅速的崩溃，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整个中国豪绅资产阶级统治崩溃的象征。这是要特别认识的第二个特点。

三、中国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斗争的尖锐化

第三个特点便是中国阶级斗争的尖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的极端的尖锐化。这一认识在目前的最严重的策略上的实际意义。比从前列宁在俄国革命中，曾指出俄国阶级斗争的一个特点，就是工人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之不可分离。当俄国工人提出经济要求的时候，必须与沙皇的宪兵警察发生严重的冲突，因此，经济斗争便必然要成为反对沙皇的政治斗争。这一种形势，在现在中国革命中还更要明显，中国现在阶级斗争尖锐的形势，比当时俄国还要更加十倍的严重。现在当世界资本主义战后第三时期中，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剥夺，特别是对工人阶级的剥夺，客观上必然要非常残酷的。中国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经济的压迫之下，若不是残酷的剥削工人，则简直不能维持其生存。在这一种形势之下，所以中国的帝国主义以及资产阶级，对中国工人绝对没有改良主义的可能，而最主要最基本的唯一的方法是白色恐怖。不错，在中国也有改良主义黄色工会，但他与西欧是完全不同的。中国黄色工会只有对工人群众之口头的欺骗，绝没有在工人中可以存在发展的经济基础。因此，中国黄色工会已经完全法西斯蒂化了。完全成了国民党之御用的工具。由此造成了斗争的特点。目前中国工人斗争的形势，任何是小的经济斗争都必然要成为反黄色工会反国民党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以至成为直接的武装冲突。这个现象，大概每个在党内参加工作的同志，在这两年的斗争实际中都可以看出。并且，在今天看来，这种形势更为明显。从北京人力车夫的武装斗争以来，以及北宁铁路工人的斗争，青岛纱厂、火柴、人力车夫的斗争，上海电灯泡厂以至现在的法界电车，我们不必详细的举例——因为根本没有一个例外——，每一个经济斗争，结果都必然成为非常严重的武装冲突，群众拘捕、巷战、屠杀。因此，我们肯定现在中国阶级斗争尖锐的形势，比俄国从前还要更加十倍的显明。

由于阶级斗争的尖锐，产生出两个结果，首先便是黄色工会的官僚化，法西斯蒂化。黄

色工会在现在的阶级斗争中，就是表面的中立的地位也是不能维持的，他必然的成为国民党压迫工人的工具。北方黄色工会的领袖，一出来便要带手枪，南方黄色工会，也是一定要带手枪，才能收会费。上海在每一个罢工中，黄色工会是公开的出来阻碍罢工，破坏罢工，完全成为国民党的工具。我们毫无疑义的可以肯定，黄色工会在群众中的影响，早已完全的根本的破产了。广大的工人群众，已经无数次的直接打黄色领袖，在现在若仍然以为黄色工会在群众中很大的作用，则必然会得出非常右倾的结论。

还有第二种现象，也是由阶级斗争极端尖锐化的条件所产生的，这就是广大工人还在没有伟大政治罢工之前，已经迫切的有了武装暴动的要求。譬如现在的工人斗争，还没有象一九二五年五卅的大罢工，也还没有象现在法国之十余万人的大罢工，但是广大工人群众确已有了武装暴动的认识。这不是理论，而是中国现在的实际情形。如果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形的人，他必然以为这是共产党人的夸大狂，或者布浪基主义。假使现在跑到工厂中去，问工友是否需要暴动，工人一定答复需要暴动。许多工人都说："暴动的时候，你们要来通知我"。南京的铁路工人，当我们初次召集他们开会的时候，他们只到了五人，问他们为什么不到会，他们说："只是开会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我们厂中驻的有军队"，后来我们同志又告诉他们：现在开会是为的准备暴动，于是许多工人群众都高兴了，第二次到的人数简直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纠察队立刻成立了很多，并且他们对党的信仰也异常提高了。他们大呼："这才是办法"！在这次长沙事变中也是一样，当红军进攻长沙的时候，我们长沙党的基础是非常薄弱的，不过只有两个支部，并且因为白色恐怖的压迫，我们支部在群众中很少活动与影响。在这一种形势之下，广大工人群众及城市贫民当红军进攻长沙的时候，依然在拥护中国苏维埃及打倒国民党的口号之下，暴动起来，响应红军。这些都证明，还没有到广大的政治罢工的实现，工人群众已经迫切的有了武装暴动的要求以至行动，这是中国阶级斗争特别尖锐状况之下的产生出来的现象。在西欧，因为黄色工会之长期欺骗，改良主义的影响，特别是国会制度所存在，使广大工人群众在伟大的总罢工还未实现之前，很难有武装暴动的觉悟。中国工人则不然，总罢工还没有实现，但工人已经迫切的要求武装暴动了。

这是中国革命第三个特点。

四、中国的农民革命

现在的中国经济状况，我认为比俄国一九一七年还更落后。就在这一经济基础上，使中国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比从前俄国农民还要更大。中国无产阶级若不能得着广大农民做他的同盟者，则中国革命绝没有得着胜利的可能。并且，客观上的经济条件，使着中国农民仅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能得着解决土地问题的可能。中国还不象当时的俄国，俄国还曾有过地主资产阶级的斯托里平的政策，还做过些必须的农业改良。中国没有任何斯托里平政策的可能，国民党改良派虽然尽量宣传二五减租，但是这种对农民的改良主义也是与对工人的一样，不过只是一些口头的欺骗，绝对不会实行的。这不是别的原因，乃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与中国之半封建式的土地关系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彻底的帮助农民执行土地革命。这一了解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在这里才能了解无产阶级对农民之领导的问题。许多人对于这个问题是非常机械的认识，他以为只有城市有伟大罢工的时候，然后才能说农村革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许多人看领导问题是只看见了斗争的领导，而没有看见政治上的领导。固然，无产阶级在现在还没有广大的政治斗争，以领导与配合农村的斗争，这是现在之非常严重与非常严重的问题。可是，无论如何，绝不能因此说农村革命不在无产

阶级领导之下。因为这些农民革命，都完全执行了无产阶级所提出的政纲，显然在无产阶级政治领导之下。广大的农民革命已经直接动摇了整个统治阶级的基础，已经使国民党的统治在广大的区域完全崩溃。农民在广大区域中，都建立了苏维埃的政权，这在中国革命中是有非常伟大意义的，这是现在形势的第四个特点。

五、红军的存在与发展

中国革命之第五个特点。便是中国红军之存在与发展。有许多同志以为只有革命战争中产生红军，而不是红军促成革命。就由这一观点，更根本怀疑到红军的存在，以及整个党的策略路线。自然，取消派陈独秀们是不用说了，他们当红军占领长沙以后，曾开会讨论："长沙是谁人打下的？"自然，取消派的无耻，他们当然可以与国民党统治阶级做一样的回答，说"长沙是土匪攻下的"。自然，这是统治阶级对于我们的污辱。我们自己应该是非常了解的，六次大会已经告诉我们，红军是由土地革命中产生出来的。在今天我们更可以补充的说，是与统治阶级的崩溃，工人斗争的尖锐，及整个革命形势的发展，都是不能分离的。不如此，便不会对红军有正确的认识，并且不能决定红军发展之根本的策略问题。现在是非常显明的，现在长沙，南昌，九江，大冶，黄陂，沙市这些围绕武汉一切重要城市，或是已经被红军占领，或是完全在红军的威胁之下，这种形势，我们确不敢断定红军在什么时候可以与武汉工人暴动会合起来，占领武汉。我们固然不能予料这个日期，但占领武汉的形势是非常的显明，并且有很大的可能。不过，若是不能明了红军的意义，我们可以走到非常右倾的策略。在俄国革命前曾有过农民的游击战争，中国不仅有游击战争，并有正式的红军，六次大会指出红军是革命的动力之一，这不是偶然的，而是根据于中国政治经济之客观的条件。

乙、全党的总任务

由我们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就可以知道目前中国革命形势的严重。中国革命正遇着整个帝国主义政治经济的大恐慌，军阀统治之急剧的崩溃，阶级斗争之极端的尖锐化，土地革命的深入与发展，苏维埃区域的扩大，三十万红军之迅速的发展，就在这些条件下来决定中国革命与我们党的任务。

一、准备武装暴动

在六月十一日中央政治局关于全国政治任务的决议案中，曾指出中国革命中的一个特点，就是中国革命高潮到来之后，必然紧接着全国武装暴动的形势，这一指出，到今天已经更加显明了。六月十一日的政治决议案，到今天虽只有两月之久，但实际斗争生活已经完全证明了他的正确。在这两个月的全国政治生活中间，我们确已看见了六月十一日政治决议案之伟大的领导作用，假使这一决议案在今日才发出，则我们便已做了全国革命斗争的尾巴。

自然，许多重要的问题，在这一决议案中都给了根本的正确的解答，这些解答在今天自然仍是完全的适用，在这里我不必重复了。今天我需要特别提出的问题，就是关于革命高潮与武装暴动的问题，这一点在今天有更严重的意义。在一般的说来，当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并不一定马上就是武装暴动。譬如在一九二五年上海五卅事变以后，上海三十万工人的大罢工，开始了中国革命之伟大的高潮，直到两年才有上海的三次暴动。即使以北伐为武装暴动的开始，但也在五卅事变一年以后，可是，现在中国革命的形势已经完全不同了。

现在革命发展的形势中，表现着在政治与产业中心城市中，还没有极广大群众的政治罢

工。这是由于统治阶级在城市中，用尽一切白色恐怖的压迫，以保持着在城市中的最后挣扎。当然，在这里我们应当承认城市工人力量的对比还是不够，但是决不能因此否认工人运动推翻统治阶级的认识和决心。的确，现在还没有赤色工会广泛的发展，还没有极广泛的政治罢工，这里一方面是由于我们运用策略的不正确，另一方面是由于统治阶级的残酷的白色恐怖。统治阶级知道城市是他最后挣扎的基础，将他一切的反动力量都集中在这里，因此，革命势力在城市中必需要有更加十倍的努力，才能冲破敌人的阵线。现在，统治阶级已经失去了广大的农村，同时，城市革命斗争之迅速的发展，使反动统治在城市中已经有了巨大的动摇，这种动摇更加急剧的时候，必然就是大革命的爆发，统治阶级整个的死亡。在一九二五年五卅以后，有了广大的城市的革命高潮，但统治阶级在农村中的基础并没有动摇，因此，很难迅速将统治阶级推翻。现在形势，统治阶级在农村中的基础，已经是严重的动摇与崩溃，若是城市爆发革命高潮，统治阶级失掉了他的镇压的能力，则马上武装暴动，那么统治阶级的基础，已经完全瓦解，无疑的便是夺取政权的时候的到来。所以在伟大的革命高潮的爆发，一定要紧接着武装暴动，甚至武装暴动与总同盟罢工同时到来。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今天伟大政治罢工还没有爆发的时候，我们便需要积极的准备武装暴动。不仅在政治上要准备，并且在组织上技术上要准备，若是现在不知道预先准备，一定要到总政治罢工实现以后再去准备，那么，我们便会完全丧失对革命的领导。准备暴动马上便要积极的进行，要以准备武装暴动为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不然，伟大事变的到来，将使我们措手不及。

在红军占领长沙之后，广大的工农群众要求暴动在各处都表现出非常迫切，因此，准备武装暴动在今天的意义，甚至于比六月十一日的政治决议案中还要更有直接的意义。譬如现在武装暴动，我们真是不敢预定的。假使武汉的总罢工在今天实现了，我敢说，武装暴动一定要今天开始，假使明日总罢工实现了，武装暴动也一定便要在明天实现。正因为如此，所以关于武装暴动的准备，绝不是要候到总罢工实现以后，因为在那时便已经来不及了。假使在今日我们不积极的准备武装暴动，那我们便必然会做革命发展中的尾巴，会成为断送革命的罪人。

伟大政治罢工的实现，他已经逼近了我们的前面。广大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决心，反对军阀主义的勇气，这种客观形势已经告诉我们到了伟大事变的前夜。那些认为武装暴动还是遥遥无期的人，固然是十足的取消派，但同时将今天准备武装暴动还看成只是组织广泛群众的罢工，而不需要实际的组织上技术上的准备，不需要特别加紧工人的武装组织与训练，这也是同样的机会主义。

因此，积极准备武装暴动，以武装暴动的目的来布置全国的工作，这确是全党在今天的总任务。

二、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

在准备武装暴动中，最中心的政治口号便是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最近全国军阀战争的形势，已经完全证明了我们过去估计的正确。若要问最近军阀战争的前途如何？我们可以直接回答，一定是双方俱倒，革命战争。任何人都可以懂得，现时中国已经决没有任何一个军阀可以将中国完全统一起来。军阀战争延长了这样长久的时间，全国政治经济之大破产，使广大群众，求生无路，群众不但必然要起来反对军阀战争，并且已经起来了。城市的罢工浪潮的高涨，农村中广大的暴动，红军的猛烈发展，特别是军阀军队的激剧动摇，证明中国广大群众已经是非常坚决的反对军阀战争。很显然的，现在只有一个伟大的力量，他能坚决

号召反对军阀战争，能勇敢的做反对军阀战争的领导者与组织者，则无疑问的，广大群众一定会汹涌的起来拥护他。这里，首先是要求我们有真正的起来反对军阀战争的决心，要勇敢，勇敢，再勇敢的前进，一定可以取得全国最广大群众的拥护。

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之前，坚决反对季罗维也夫及加米列夫关于武装暴动的动摇。季罗维也夫与加米列夫在当时坚决的反对暴动，以为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不能得着其他政党的帮助，一定没有广大群众的拥护。列宁坚决反对这种意见。列宁说，无疑问的，只要布尔什维克取得了政权，一定可以得着广大群众之热烈的拥护。特别是在变帝国主义战争为革命战争的口号之下，无产阶级首先可以夺取广大农民士兵的同情。在今天中国的情形看来，正与列宁所说的一样，无产阶级政党若能真正坚决的起来号召反对军阀战争，领导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则我们无疑问的必然得着广大中国工农兵士劳苦群众的拥护，建立与巩固中国的苏维埃政府。并且，不仅是我们领导了反对军阀战争的斗争，一定可以得着广大劳苦群众的拥护，我们必须要更进一步的认识，我们党现在已经有了这样的可能，有了这样伟大的力量。我们不仅在客观任务上应该起来反对军阀战争，并且在主观的能力上，我们有力量可以消灭军阀战争。固然，我们党在组织上还没有团结广大的工人群众，赤色工会的组织还不强大，但在政治上我们党的确已经得到中国工人阶级大多数的拥护，共产党是中国工人群众之唯一相信的领导政党，数千万的农民群众，现在已经公开的在政治上与组织上都信仰我们党的领导，作决死战争。三十万以上的红军，完全在党的直接指导之下，广大中国劳苦群众的革命斗争，都无疑问的接受了我们党的政治口号。因此，我们党不仅是在客观任务上需要反对军阀战争，并且是现在中国之唯一的有力量的政党，可以领导消灭军阀战争的斗争。问题仅只在这里，就是看共产党是否能认清这一形势，是否真正的有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决心，中央政治局是认清这一形势的，是有了这一最大的决心的，就在这一点上，中央政治局号召全党的同志，举行全党的总动员，准备着这一伟大事变的迅速到来，坚决领导全国消灭军阀战争的革命战争。

丙、争取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的首先胜利

一、更迫切的准备武汉暴动的任务

在六月十一日的政治决议案中，已经指出了关于这一问题的一般的策略原则，自然在这里不必来重复的说明。在今天的形势看来，六月十一日政治决议案中所指明的一切，都已经得了完全正确的证明。特别是，在执行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的总任务中，应当争取武汉附近省区之首先胜利，这一点在今天已经成了非常可能与非常迫切的任务。长沙的占领，广大红军绕围武汉的发展，统治阶级之不可终日的形势，使着帝国主义的机关报已经公开承认："武汉入共产党之手，只是时间问题"。帝国主义机关报自然不会帮助共产党宣传，因为事实的真象确是如此。现在武汉的形势是非常显明的，一方面是统治阶级之严重的白色恐怖，另一方面，罢工仍然是不断的爆发。广大的工人群众，都积极的要求武装暴动。农民暴动与红军都逼近了武汉。敌人的士兵群众，甚至蒋介石在前线的基本部队都倾向我们，找寻我们的领导，这一现象是中国革命中的一个特点。在西欧其他各国中，假使没有工人的大罢工，士兵群众是很难革命化的。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则不然，到处的士兵，都自动的经过各方面的关系找共产党，要求领导他们兵变或暴动。许多自发的兵变，揭起红旗子，借此寻找共产党的

领导。在我们党各级军事委员会的工作中，时常遇着许多这样的事实。这不是偶然的。这个现象的起源，是因为长期的军阀战争，使广大士兵群众在军阀长官的驱逐之下，成千成万的死亡，绝不能换取任何精神上物质上的安慰。另一方面土地革命的深入，在广大士兵群众中有非常伟大的影响，已经使士兵群众整个的动摇起来。士兵是失业的农民，他看见了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土地革命，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所以才使他们迅速的革命化。特别应注意的，我们不能将兵士革命化与工人革命斗争分开，因为兵士革命化的原因是因为整个革命势力的发展。而整个革命的发展，完全在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之下，特别是整个革命发展中，红军的发展，红军之不断的胜利，更是直接影响到军阀军队的动摇，现在已经有十万以上的红军，正在非常迅速的向武汉进攻。假使在适当的配合中，我们有极大的可能，举行武汉的武装暴动，以与红军汇合起来夺取武汉。现在客观形势是已经成熟了，我们的中心任务就在加重斗争的配合，努力组织武汉工人的政治罢工与武装暴动。

二、红军进攻与无产阶级的领导

有少数同志对于红军之积极向武汉进攻，是非常怀疑的。他们以为武汉现在还没有工人斗争的高潮，若以红军的力量向武汉进攻，这似乎是以农民领导了工人，又似乎是军事投机，由此便对党在目前之总策略路线发生怀疑。这样的怀疑是非常错误的。我们要完全了解，如若没有工人群众的武装暴动，单纯红军是决不能夺取武汉的，因此，党在目前之最基本最严重的工作，是要加重在武汉工人中的政治宣传与鼓动，扩大他们的组织，发动政治罢工，准备武装暴动，党绝对没有单纯以红军进攻的观念，并且坚决反对单纯以红军进攻的观念。但同时，党一样坚决反对另一种观念，以为“夺取武汉仅只能组织武汉工人暴动，在武汉工人还未暴动之前，红军便不应向武汉进攻”。这完全是一种书呆子的见解。单纯用红军的力量，不去组织工人群众的政治罢工与武装暴动，这不仅是错误，而且是罪恶。但只知道工人武装暴动，而不知道运用现在的红军，这一样的会成为严重的断送革命的罪恶。我们要夺取武汉，必须特别注意各种革命势力的汇合，一方面要加紧武汉的武装暴动的准备，特别是组织武汉工人的政治同盟罢工，同时，必须积极的领导红军向武汉进攻。如果红军更加逼近武汉，统治阶级更加失败动摇，这便是武汉暴动的更成熟的条件，无疑的我们可以领导武汉工人暴动起来，而取得完全的胜利。红军是一种革命的力量，放弃或轻视这一种革命力量，当然是革命的严重损失。第五军进攻长沙的时候，红军不过三四千人，何健的兵却有七团以上，但红军与何健部队接触的时候，何健部队都水一样的向红军投降。我们在长沙工人中的工作特别弱小，可是在何健军队日益失败的时候，长沙工人便在城内暴动起来，使何健军队更迅速动摇而完全失败。现在红军进攻武汉的时候，又安知道不会遇着这样的形势？假使是可能的——的确不仅是可能而且是必然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领导红军进攻武汉呢？让红军在远远的等候武汉工人暴动，恐怕只有书呆子会这样想。红军的发展。他与城市的工人斗争不可分离，党在坚决的准备武汉工人的武装暴动的时候，便同时应当指挥红军向武汉进攻。

三、坚决的反帝国主义的战争

武汉的首先胜利，必然紧接着便是残酷的国内战争，以至国际战争。六月十一日中央政治局的决议案便指明了这一点。斗争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假使我们夺取了象武汉这样的城市，帝国主义者一定组织国民党各派军阀，联合起来以向革命势力进攻，这必然是国内战争更残酷的形势。不仅如此，帝国主义必然自己出来，直接以武力炮舰压迫革命，龙州、大冶、岳州、长沙的经验都告诉了我们，使我们可以断定，在夺取武汉以后，马上便要到来的便是

更残酷的反帝国主义的国际战争。若我们企图以外交手腕来避免与帝国主义的冲突，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帝国主义是很聪明的，他知道中国苏维埃革命的胜利，将要致他的死命，如果不是在他已经无力摧毁的时候，绝不会允许苏维埃政府存在，尤其不会与苏维埃政府进行和平的外交的。中国是殖民地的国家，反帝国主义是其最基本的任务，中国苏维埃革命，苏维埃政府只有在坚决反帝的斗争中才能生长起来，才能巩固起来。对于这一点，必要有很明了的认识，然后才能坚决的发动全国之反帝国主义的斗争。

正因为如此，所以武汉的胜利，绝不能只依靠于武汉附近省区的革命势力，而必要有全国的配合。不仅要工人的暴动，而且需要农民，士兵，红军及各种革命群众力量的配合。不但如此，因为武汉胜利要紧接着反帝国主义的国际战争，所以更必须特别加紧在国际无产阶级保护中国革命的运动，以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

因此，我们现在的工作布置，必需在全国范围内同时加紧。要准备天津、武汉、上海、广州及各产业中心的政治罢工，要准备各省重要城市的暴动，要组织全国铁路海员的反对军阀战争的总罢工，要组织前线上以及后方之重要军事政治中心的兵士暴动，要配合着全国红军以向大产业中心城市集中发展等等，这些都是全国范围内的工作。一定要有全国的总动员，然后才能夺取武汉的胜利。

同时，中国党必须加紧中国革命在国际上的宣传与鼓动，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起来援助中国革命。无疑问的，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残酷战争，一定会发展成为全世界之最后的阶级决战。这不是我们主观上愿意如此，而是客观形势上所决定的必然的结果。很显然的，当中国苏维埃成立之后，帝国主义绝对不仅是压迫中国革命，同时一定会更加紧对于苏联的进攻。帝国主义知道苏联是世界革命的大本营，当他进攻中国革命的时候，决不会放松进攻苏联的。帝国主义压迫中国革命及进攻苏联的事，一定是同时并进的。在进攻苏联的战争发动以后，这便是全世界之最后的阶级决战到了。所以在中国革命爆发以后，将要转变成为国际战争，在这时候，必然要有全世界革命的大爆发，才能根本消灭帝国主义。

四、兵士暴动问题

还有一个为一般同志们所怀疑的问题，这就是兵士暴动的问题。有些同志以为革命的武装暴动，一定要以工人群众为他的基本力量，假使单只是兵士是不能暴动的。一般的说来，这个观点有一部分理由，因为若是没有广大的工人群众做革命的基本力量，则兵士是不会革命化的。可是我们必需注意，在目前中国革命形势的特点之下，虽然当工人群众之广大政治罢工还未实现的时候，但兵士群众已经积极的普遍了武装暴动的要求。在这里，我们首先要认识军阀战争所给与广大士兵群众之直接的痛苦，土地革命与红军发展所给与士兵群众之伟大的政治影响。这些都无疑的是在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之下。

现在全国还没有工人暴动的时候，已经在许多地方发生了兵士暴动。即使在将来之各处大城市中，也许会有在工人暴动之前，首先是士兵暴动做导火线，这个现象是不能避免的。假使有人由这样的事实做出结论，以为这表示兵士领导了工人，这便仍然是书呆子的见解。因为兵士暴动，是目前整个革命斗争激剧发展下面的产物，绝不是离开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的。兵士暴动之正确的出路，一定是组织苏维埃政府与执行无产阶级的政纲，这就是说，他一定要在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之下，不然是不会取得胜利。

破坏统治阶级的军队，夺取反动军队中的士兵群众，这是每一个革命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政治任务，特别是在中国这一种军阀制度的国家中。并且，目前中国革命中之一个主要的

动员群众的口号，就是反对军阀战争。而反军阀战争之最有力量的直接行动，这是兵士暴动。因此，兵士暴动不仅是士兵群众的需要，而且是全国广大劳苦群众的迫切要求，无疑的可以得到极广泛群众的拥护，可以引起革命斗争的大爆发。

五、怎样组织工人群众

最后，还有一个为少数同志所不能了解的，就是以为“现在客观的形势虽然很便利于革命的发展，但我们党的主观的力量还很薄弱，赤色工会很少，因此，我们还不能拿准备武装暴动来动员群众，而是要很艰苦的做每一厂每一厂中的工作”。这种观念是不正确的。首先在现在状况之下，无论如何，我们绝不能忽视了我们党主观力量之伟大，我们党在政治上已经无疑问的取得了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我们对于夺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这一口号，主要的一定要从政治上了解，绝不能很机械的，以为赤色工会的会员占了百分之五十一的时候，才算是夺取了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即使在资本主义很发展的国家中，譬如西欧各国，任何国家的赤色工会——甚至连黄色工会一齐，都不能占全国工人群众的大多数，当然在中国更是不可能。现在世界上只有苏联的工人有多数——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在工会的组织之中，在中国一定也只有革命成功以后，赤色工会才能在组织上取得工人群众的大多数。至于在政治方面，广大的工人群众——无论是先进的或落后的——确已接受了我们党的政治口号，许多自发的罢工，都揭出了党的政治口号，都坚决的反对国民党黄色工会，工人群众都自发的经过各种关系找取我们党的领导。这证明广大的工人群众，接受了党的政治影响。

自然，我们应当非常严重的注意组织工作，我们一定要在每一工厂每一作坊中建立强固的组织，因为仅只有政治上的影响是非常不够的。没有强固的组织基础，政治影响决不会巩固，决不会成为群众的革命行动。但是，问题只在这里：我们用什么口号去组织工人群众？用什么口号来扩大党的无产阶级的基础？假使我们只用经济的口号，这是绝不可能的了。事实是这样，中国阶级斗争特殊的尖锐化，工人群众每个经济斗争都遇着国民党的残酷的压迫与屠杀。广大工人群众完全知道没有坚决的反国民党的斗争决难有经济斗争的胜利，这就是造成了工人群众武装暴动的迫切要求。假使我们现在不用准备武装暴动的口号，将使广大工人群众失望消极而离开我们。准备武装暴动已经是广大的工人群众的迫切要求，只有在这个口号之下，才能动员广大工人群众，才能扩大赤色工会的组织，扩大我们党内之无产阶级的基础。我们是要到每一工厂每一作坊中加紧组织工作，但我们必定要以准备武装暴动做组织群众的主要口号。

从总的政治上以至策略上，都说明了我们党现在已经不是在一个经常工作的时期。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历史上之大转变的前夜，到了中国革命之最紧张的关头。我们必要使全党的同志都认清目前这一政治形势，认清党的任务的重大，将全党同志都动员起来，在一致的战斗的精神之下，领导伟大的中国革命。

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

（一九三〇年六月）

一　中国革命运动底高涨

（一）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全世界代表大会底决议案，认定中国革命浪潮底新高涨是必不可免的，最近中国事变完全证实了这些决议案是完全正确的。中国革命运动底新高涨已经成为不可争辩的事实，这和右倾机会主义投降派、托洛茨基派、陈独秀派以及其他取消派的预言，完全相反。尤其是最近几个月来，革命解放斗争已开始很迅速和很显著地发展起来，中国革命底动力——工人阶级和农民——在恢复受过反动势力打击的元气以后，又在土地革命、消灭帝国主义统治和推翻反革命国民党政权的这些口号之下，重新起来实行革命斗争。

（二）中国过去几年的反动统治，使劳动群众底生活状况恶劣到万分。接连着中国革命失败之后，中外资本家猛烈进攻了工人阶级本来就很痛苦的生活水平。极深刻的经济危机底结果所引起的大批失业，把中国无产阶级底一大部分人，弄到濒于饿死的地步。一切劳动条件都恶化了。工资更加减低了，而食品价格却不断高涨着（最近以来，米价增涨了百分之七十七）。农民基本群众遭受不断的破产和贫困化。饥荒达到空前的范围，使几千万农民趋于死亡。城市小资产阶级，尤其是手工业者和手艺工人，大批地陷于破产，这个过程，更加厉害起来。中国反动统治底这一切结果，自然不能不使劳动群众日益觉悟到：他们自己的生活在现存政治制度之下是没有出路的，国民党的一切"计划"是完全没有希望的。所有这些情形，都不能不加强全国危机，不能不使工农广大群众革命化，不能不推动小资产阶级，尤其是城市贫民去作斗争，以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势力，反对站在这反动势力后面的国际帝国主义。所有这些情形，就不能不使革命胜利结局底时候一天比一天接近。

（三）在中国，新革命高涨底增长过程，带着特殊形式。新革命高涨是在个别区域里成熟起来，大部分是已在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革命中奠定了基础的那些区域里成熟起来，后来才渐渐地扩展到其他区域。同时，因为这个原故，所以在新革命高涨底最初阶段上，革命运动就有一些弱点：进行斗争的群众不能够立刻抓得工业中心，而斗争力量底一般对比起初是不利于工农。只有在革命斗争向前发展底过程里，即在无产阶级所领导的农民浪潮扩大到新的区域时，这种对比才会改变过来。

（四）在分析目前斗争阶段时，我们的出发点，应当是根据这样的事实，就是，此刻还没有全中国的客观革命形势。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底浪潮，还没有汇合起来。就是总合起来看，

这些运动也还不能够保证必需要的力量，去袭击帝国主义及国民党的统治。农民底革命斗争，暂时还只在南部几省里胜利地发展着。统治阶级之执政集团内部的分裂和互相斗争，还没有使他们完全削弱和在政治上完全破产。但是，事变发展底趋向是：最近将来革命形势即使不能够包括整个中国，但至少也要包括几个有决定意义的省份。要加速这个过程，大部分都要看共产党是否实行正确策略，而首先是要看共产党是否正确解决那巩固自己的领导和继续发展苏维埃运动的任务。

二　党底最主要的任务

（五）苏维埃运动在党面前提出第一等重要的任务，即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并改善这个政府底工作。对于中国工农苏维埃政府的问题，党应当注意到：要在最有保障的区域里建立完全服从共产党底领导和能成为政府底支柱的真正的红军，然后这个政府才能够有应有的力量和意义。因此，必须集中注意去编成和巩固红军，以便在将来依照军事政治的环境，而能够占领一个或几个工业的行政的中心城市。

共产党应当了解：建立完全有战斗力的和政治坚定的红军，在现时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是第一等的任务，一解决这个任务，就一定可以保障革命底强大的开展。

在成立政府机关时，必须尽量谨慎地选择人员，无论如何不要让国民党的旧官僚钻进去，而只用经过审查的和绝对忠实的人来担任工作。临时革命政府底任务，是要联合和尽量统一农民运动，其基础是坚决铲除封建制度与军阀制度，和镇压富农高利贷的分子。临时革命政府，要实行广大的鼓动和动员斗争群众，同时，自己应当成为使无产阶级能够在农民运动中获得领导权的政权形式，应该使群众能够亲自参加革命政权底上下各级机关。

（六）在苏维埃区域内，党应该集中注意力去解决土地问题。土地革命应当不是富农的，而是贫农中农的。土地革命中的动力应当是雇农和贫农，同时他们应与中农结成坚固的联盟，并由工人阶级来领导。必须坚决打破富农们底企图，富农或者企图阻碍没收地主的土地，或者企图按照农民所有生产工具之多少做比例去分配已经没收的地主土地。党应该拿实行没收一切地主、教堂寺院以及其他大私有主底土地，并把这些土地交给贫农中农去平均分配，来与富农底企图对立起来，但没收土地的原则不要实行到生活优裕的中农身上。同时党应该宣传土地国有这个中心口号；把土地国有口号底实行，与全中国底革命高涨以及与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底胜利联系起来。

（七）与苏维埃区域里的土地革命任务有密切联系的一个任务，是要组织雇农和乡村无产者工会，是要组织贫农团，而这些组织底目的，应当是把中农团结到自己的周围，并且使苏维埃机关底一切设施都有利于贫农和中农。因此，应该达到使苏维埃机关完全是选举出来的，并剥夺富农、豪绅和地主底选举权。党应当把农村苏维埃当作农民群众底基本组织形式，而抱定把苏维埃区域内农民协会逐渐溶化到苏维埃里去的方针。

（八）在苏维埃区域内的经济政策方面，党应当避免为时过早的设施，不应当实行只会使农民群众离开我们的领导的办法。在这中间，应该容许贸易自由，暂时不要禁止土地买卖制，不要实行集中供给，不要限制内地贸易和物价，除非有特别情形（食盐、煤油），因为要满足军事需要，或是因为要打倒（一定要根据群众自己的要求来实行）投机生意和怠工行为，才可以实行例外办法。

（九）在改善苏区工人生活方面，应由立法手续来规定八小时工作制，订立最低限度的社会立法，确立阶级工会底组织自由与活动自由。其余一切改善，应当不是靠苏维埃机关底命令手续来办到，而应当按照各地具体情形，经过阶级斗争和工会活动来取得。

（十）在苏维埃领土内，党底全部工作和革命机关底一切设施，都应该是以农民底真正群众斗争底利益为出发，应该是以农民运动向前发展底利益为出发，应该是以巩固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为出发，应该是以巩固苏维埃政权和继续扩大苏维埃区域的利益为出发。为着这个目的，党应当利用苏区所有一切富源，去组织工农红军。必须使党能够完全领导和监督红军，而红军在继续发展革命斗争底事业当中，应当尽极伟大的作用。应当把红军变为真正全民的军队。社会团体，首先就是工会，以及贫农团，应当用按期动员自己会员的方法，去充实红军底队伍。红军底成分，要有强固的工人核心，同时应该用贫农以及一般革命农民来扩充。红军官长，首先就应当由先进工人来担任。红军底军事领导而尤其是政治指导，应当提高到应有的程度，并且要最大限度地集中化。

（十一）党在一切运动中以及在整个群众鼓动工作中，应当特别用工农苏维埃政府底名义，而着重提出以下的中心口号：把地主土地没收来转交农民；与帝国主义者斗争，如果他们违反中国苏维埃政权底法律，那就一直做到把他们的企业和租界收归国有；使中国变为统一的、独立的苏维埃国家；推翻国民党的政权，赞助和扩展苏维埃运动到全中国；八小时工作制；工人团体监督生产。

（十二）党在苏维埃区域里的工作，应当和它在全中国领土内的工作联系起来。在日益增长的革命高涨底条件之下，党底基本任务是要保障坚定的和彻底实行的无产阶级领导权。

只有在这种条件之下，农民群众底斗争，才会胜利地进行，以及整个革命解放运动才会进到反帝斗争底高级阶段，这种反帝斗争，除了肃清封建制度和军阀制度以外，还会肃清那为着本身利益而赞助、加强和利用封建残余，各种军阀派别以及中国资本家的外资统治。

（十三）为要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党就必须进行斗争，来继续发展罢工运动，来组织和领导中国无产阶级底经济战斗。在配合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时，党应该加紧全部力量去发展政治罢工，准备一切或几个工业中心点底政治总罢工。在组织政治罢工时，除了提出反军阀和反国民党的口号以外，还必须提出为全体工人群众所觉得切身攸关的，就是工人阶级最落后的阶层也觉得切身攸关的经济要求。党要加紧在黄色群众工会里进行工作，并应该尽量巩固赤色工会，团结工人阶级底自卫队；同时，在凡是国民党反革命统治刚一薄弱的地方，在凡是革命斗争增长的地方，就要设法使革命职工运动由秘密的变为公开的。

（十四）为要实现无产阶级底领导权，党就必须努力发展和领导反帝运动，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列强。党应当时刻注意，而切不要忽视向前扩大反帝斗争的任务。凡属帝国主义任何暴力压迫底表现，党都应当利用起来发动群众去做革命斗争。党应当在谋得民族独立、统一中国、中国经济政治完全独立自主这些口号之下，在消灭国际帝国主义底统治和压迫的口号之下，在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和反对帝国主义企图进攻苏联的口号之下，在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殖民地与附属国里的劳动群众的口号之下，去扩大自己的群众鼓动。

（十五）为要实现无产阶级底领导权，党就必须努力发展革命的独立的群众运动。

反对军阀战争，把军阀战争变为阶级的国内战争，反对一切军阀和国民党一切反革命派别，——这都应当成为党在目前群众鼓动中的迫切口号。同时，在争取群众影响时，应当更加紧反对国民党改组派，反对第三党，反对胡适派，他们都是企图拯救中国的反革命以避免

日益迫近的伟大的新的革命高潮。同时党应该揭露陈独秀派与托洛茨基派底反革命的工贼作用，使他们想与群众组织发生联系的企图不得成功。党应当揭破托洛茨基派理论底反革命实质，使大家知道：托洛茨基派底理论，在实际上是对新革命高潮抱着显然取消主义的态度，完全蔑视日益扩张的农民群众革命斗争，他们的召集国民会议的口号，显然是为着驯服效劳于国民党和帝国主义。

(**十六**)在发展非苏区的农民运动方面，党应当建立农民委员会、农民协会和斗争委员会，应当利用农民群众底任何形式的组织，去进行整个革命工作，应当加强自己的群众鼓动工作，尤其是因为饥荒更加扩大和军阀战争更加发展的缘故。党应当发展抵抗地租和抵抗军阀税捐的运动，应当号召进行游击斗争和援助苏维埃区域。党应当号召农民去进行斗争和解除地主豪绅反动势力底武装，而组织地方的赤卫队和少年先锋队。

(**十七**)此外，党应当加强自己在少数民族中的工作。党对于中国北部的回民运动，对于内蒙古的民族革命斗争，对于东三省的高丽工农斗争，以及中国南部的苗瑶民族斗争，应该力谋建立巩固的联系，并加以领导。同时，党应当认识安南日益增长的革命斗争是有极大的意义，而扩大自己对安南人民群众的影响，尤其是在云南、香港和广州。

(**十八**)从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后到现在，中国共产党在其思想的发展道路上以及在其队伍的布尔塞维主义化事业中，都达到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并不是这方面的一切任务党已能解决了。现在，党除了解决组织任务以提高自己的战斗力以外，还要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应保障自己思想上的布尔塞维主义的团结一致。但是要保障坚定的政治路线，保障党正确解决摆在自己面前的新任务，保障在实际工作中真正实现党的路线，就只有实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和“左”倾盲动的闭关主义的倾向，就只有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与这两个倾向斗争，并集中火力去对付主要危险的右倾，才有可能。对于共产党本身队伍内极小的“左”右倾向——就算是没有形式的倾向也好，都应当进行毫不调和的无情斗争；如果不是这样，那末，就不能够完全战胜陈独秀派和托洛茨基派，就不能够完全克服对他们的调和态度。只有在真正不调和的两条战线的斗争之下，才能够确切地和真正地本着布尔塞维主义精神去解决摆在党面前的新任务。两条战线的斗争应当是党的一切行动和指导底基础。

(**十九**)在目前阶段底条件之下，危机底深入和阶级矛盾底剧烈已经这样厉害，甚至于个别的带有真正群众性质的发动底失败，也不能够停止解放运动底增长；在党底面前，摆着这样的任务，就是要在斗争本身过程中，准备和收集力量，去迎接最近将来的决战；因此党就应当真正用革命精神去尽量发展成千百万群众底革命毅力和斗争；——在这种条件之下，主要的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底表现就是：尾巴主义，党或个别党的组织落后于群众革命运动发展底速度，对反帝斗争底继续发展抱机会主义的害怕心理，不肯做罢工斗争底发动者和急先锋，合法主义，不坚决揭露黄色工会底领袖，而有时还投降黄色领袖和按照他们的要求而停止罢工，轻视游击战争，在苏维埃区域里赞助富农的要求。

(**二十**)可是，由于必须尽量发展游击运动和勇敢领导农民武装起义与罢工斗争，盲动主义倾向与闭关主义倾向底危险就加强了。这种危险底表现，就是轻视群众底作用，不计算广大群众底参加情形而定出武装起义计划，有时候，偏重于军阀军队里的与广大农民群众相隔离的兵变，企图在罢工斗争中用形式主义态度来机械地实行革命策略，在苏区经济政策中表现出“左派”幼稚病等等。党底任务，是要同时加紧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尤其是反对右倾，因为从顺利执行摆在党面前的任务方面看来，右倾乃是主要的危险。

三　中国革命底前途和任务

（二十一）地主资产阶级联盟没有解决、而且不能解决那引起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革命的矛盾，反而加剧了和加深了这些矛盾。现时，这些矛盾在扩大的基础上重复暴露出来，按历史的必然性来预先决定，革命浪潮一定会有新的和更加强大的高涨。而且这个新的革命高涨已经开始表现出来，虽然这个革命高涨在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联合力量底打击之下，有局部失败和退却之可能，虽然有暂时停顿之可能，可是，无产阶级所领导的土地革命，将向前发展下去，结果一定会造成中国革命底全国的高潮。

（二十二）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现在就不得不提出中国革命底道路和任务问题。只有认清中国革命必然发展底前途以后，才能够认识现时斗争底进程，才能够正确规定党底目前任务和策略。一九一一年革命和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革命都没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底任务没有解决，所以在新的革命高涨时，仍旧保存着以前的基本任务：消灭帝国主义的统治，取消地主的土地占有制，打倒地主资产阶级的联盟，建立工农革命民主专政。所有这些任务，就决定中国革命底当前阶段是带着资产阶级民主的性质。

（二十三）然而中国革命和普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同，这不仅是因为革命动力成分之不同，不仅是因为工人和农民已经不是同着资产阶级一块和更不是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而且是因为工人和农民是在直接与资产阶级斗争中去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底任务。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底特殊性，就是，它在取得胜利时，就开辟社会主义发展底前途。由于许多条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时就是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它准备着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底前提。这里，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就会成为使中国革命经过许多中间阶段而逐渐地和一贯到底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底物质经济基础。

（二十四）中国的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将与布尔塞维克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底情况下所预料的民主专政，有重大的区别；这里的区别，首先就是因为中国革命处着新的国际环境，因为有胜利地发展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存在。另一方面，根据中国现时的情况，我们可以预料，在革命政府里，共产党将占多数。因此，无产阶级对于农民将能不但实现思想领导，而且能够实现国家政权的领导。同时，必须还要注意到一种情形，就是，中国革命不但要和封建制度进行残酷的斗争，而且也要和中外资本家进行残酷的斗争。中国的民主专政，将不得不一贯到底地没收中外资本家底企业，不得不实行很重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步骤。社会主义成分之存在，就会正是中国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底特点。中国革命，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时，其中间阶段，将比十月革命底中间阶段多些，但是中国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底期限，将比按照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底条件所预料的，要大大缩短；中国革命由资产阶级民主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底速度，将比按照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底条件所预料的，要迅速的多。

（二十五）从中国革命转变底前途看来，国际的条件，一般地说起来，是很顺利的。社会的前提也是顺利的。无产阶级底广泛组织，无产阶级与贫农底联合，在中国新革命高涨底最初几个阶段上就形成起来。这种情形，不能不相当地影响到中国革命发展底形式和速度。并且，在革命过程中，必不可免地要进行国内战争来反对中国的反革命，进行反帝战争来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在这种条件之下，农民基本群众就会被革命进程所推动来赞助那些过渡性质

的必要的反中外资本的革命设施。

(二十六)中国国内的经济条件，亦提出非资本主义进化的必要。中国工业农业的危机，使经济上需要那些进到社会主义去的过渡性质的设施。现在中国面前，摆着两条道路，在这两条道路中，必须选择一条；或者是堕落到完全殖民地的奴役束缚地位，甘愿使群众们更加破产下去；或者是走上苏维埃的、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以后在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步骤，可以一般的预先规定出来，这些步骤在经济上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并且能保证造成使中国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前提。这些步骤，应当由中国共产党在以后斗争实际中具体规定出来。

在这些步骤之中，可以指出以下的步骤：外国资本家的工厂、一般的银行、新迪加、股份公司、铁路、航空运输业和大的水路与汽车运输业——首先就是属于外国资本的，——都收归国有；对于组织反革命斗争来反对工农苏维埃运动的中国资产阶级，为着在经济上解除他们的武装起见，把他们的企业和资本收归国有；对于其他的以及比较小的企业，则实行监督；土地、水利和灌溉设备，收归国有；一贯到底地使人民合作化，从消费合作社贩卖合作社的最简单的形式做起；往后的一步，便是要完全根据农民自愿的原则，和拿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底技术帮助为基础，来实行集体化；制定预算案和国民经济计划，同时要注意继续加强革命的中华国家底经济命脉。

(二十七)中国革命在最初的阶段上，当然不会剥夺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恰恰相反，尤其是在农业方面，在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以后，在消灭高利贷的和军阀的残酷剥削以后，资本主义一定要表现向前增长的趋势。中国革命在经济方面的非资本主义性质，应该并不在于立刻就把资本主义排斥于一切社会关系之外，而在于革命民主专政底机关，要利用争得的经济地位，逐渐造成一些前提和优势，去一贯到底地发展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形式的生产。这两个倾向间斗争底成效，将不但由国内的条件来决定，而且由国外的条件来决定。应当注意到：社会主义不能够一下子和直接施行的。要过渡到社会主义，须经过许多中间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长期的过程，这个过程包含许多具体的和一贯执行的设施。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那些个别步骤，应当是从群众底需要出发，并且应当使大多数人民认识这些步骤底必要。这些步骤应当是在经济实际情形里面成熟起来的，应当是经济上完全可以实现的。在中国，就是说在小经济占主要地位的国家，这些过渡办法应当和农民基本群众底利益联系起来。应当顾到各区域里社会结构底区别，农民群众底组织程度和觉悟程度之不同，家族制度和氏族制度以及其他各种制度底影响底势力；应当记着：我们的任务，并不是取消小农经济，而是改造小农经济。无产阶级在规定过渡办法时，无论如何不应脱离自己的农民后备军。

(二十八)在提出和宣传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时，必须指出共产国际在这个问题中的立场是完全和(1)托陈派的观点以及(2)和孙文主义的思想相反的。提出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问题，并不是象托洛茨基派一样承认中国革命底目前阶段就是社会主义的。托洛茨基底特点，正是拿“左的”空谈——说中国革命是社会主义的——来掩饰着完全蔑视现在发展着的农民群众斗争的心理。托洛茨基底特点，正是轻视农民底力量和革命可能性，不懂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底任务以及由资产阶级民主阶段转变为社会主义阶段的过程。中国革命底中心是土地革命。革命本身，便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形式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关于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也就是说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学说，和托洛茨基说中国革命

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空谈，没有丝毫相同的地方，托洛茨基底这种空谈，乃是用来遮盖孟塞维克托洛茨基主义的实际口号——召集“国民会议”——的一种假面具。另一方面，孙中山底空想，说可以用局部节制资本的办法来避免资本主义底弊病，这也是和共产国际底立场毫不相同的。孙中山思想底反动性质，是非常明显的，他说，为要实现他的计划，必须得到周围资本主义世界底帮助；只要拿这一点来说，就可看见孙中山思想底反动性质了。

中共中央三中全会
对于中央政治局报告的决议

（一九三〇年九月）

三中全会听了政治局报告以后，认为在近一年来革命运动的发展过程之中，在中央正确的领导之下，党的影响大大的扩张了，党对于工农群众斗争的领导的加强，博得了很大的成效。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稳定与相当的扩大，在中东路事件之中党坚决的执行武装拥护苏联的策略，对于军阀战争的失败主义的策略，变军阀战争为革命战争，坚决的发展农民暴动，红军的建立与巩固的策略——凡此都与革命的发展相符合，党的领导作用也同时巩固起来了。

党曾很坚决的同托洛茨基主义的分子及取消派（陈独秀彭述之等）奋斗，防止取消派在党内的发展，很敏捷的动员全党与取消派斗争，把他们清除出党，由此党就一天天的布尔什维克化，实行对于各种不正确倾向的斗争，特别是反对右倾。凡此都足以表明中央的路线的正确，中央的领导的坚决，与全党布尔什维克化的进步。

三中全会认为政治局在六月十一号的政治决议案之中，犯了些冒险主义的与左倾的关门主义的错误（仅仅是策略上的错误）。这是因为没有研究客观形势，所以未能有正确的分析。全会接受国际的指示，认为国际的指示完全是正确的，政治局在执行这些指示上的动摇怀疑态度是不正确的。这些错误使政治局走上冒险的道路。

当政治局感觉自己的错误以后，便很坚决的进行自我批评，并很敏捷的纠正自己的错误，这是真正布尔什维克精神的表现。全会号召全党用这种精神来检查自己的工作。

暗藏在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分子利用这一机会，企图反对党的路线，破坏党的领导机关的威信，说“党的路线是同共产国际的路线对立的”。全会指出这些说法完全是公开的造谣，是给取消派以客观上的帮助。党在中央与国际的一致路线之下，坚决的反对取消派的这些行动，把取消派完全清除出去。此外，党还须坚决的反对调和派，以至右倾与左倾的错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组织上及思想上没有丝毫的区别。调和派在客观上是右倾与左倾的拥护者，若不战胜调和派，党便很困难战胜与驱逐暗藏在党内的右倾分子。“左倾”的错误在实际上是巩固右倾的地位，中央以及全党也必须同他们坚决的奋斗。

在中央与国际的路线之下，必须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特别是对付右倾，同时经过自我批评来检查自己的一切工作——只有这样，党才能更加布尔什维克化。

中国共产党三中全会扩大会

中共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

——一九三〇年九月，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秘书处一九三〇年七月的中国问题议决案的决议——

一　国际形势和中国革命

一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兴盛和全世界的经济危机

现时世界的状况是：在资本主义一般危机的基础之上，开展着全世界的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整个系统的一切主要矛盾剧烈到极点，开始了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末日；同时，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业化和集体农场运动已经有迅速的发展和伟大的成绩，虽然还有很多的困难，可是，在布尔塞维克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之下，在世界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民众赞助之下，苏联的发展已经是大踏步的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前进。这样，使全世界的劳动群众更加看见现在世界的主要矛盾的日益深入，这种主要矛盾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日益兴盛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日益动摇。因此帝国主义列强，更加加紧对于苏联的侵略，积极准备进攻苏联的战争。而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也因为更加要加紧争夺市场，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所以发展着相互的冲突，日益促进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矛盾，也极端的剧烈起来——资本家对于工人实行残酷的进攻，群众的大批失业，工资的降低，工作时间的加长，社会保险的取消，税捐的加重等等；资本主义国家法西斯蒂化，剥夺群众的政治自由，社会民主党和黄色工会也法西斯蒂化，他们和资本主义的政府机关混合起来；工人群众正在用广大的罢工斗争来反对这种资本的进攻：国际的群众政治示威，失业工人的广大运动，德国，法国，波兰，以至英国美国都有广大的斗争爆发，殖民地的劳动民众，也发动革命的斗争，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中国，印度，安南等）。总之，世界的经济危机，引起无产阶级更进一步的反攻，和殖民地革命斗争的兴起，在有些国家里面，经济危机已经引导到政治的危机；所以全世界工人运动和殖民地劳动群众的革命高涨已经开始，而最近的世界危机只是更加促进殖民地上，尤其是中国革命的国内战争的开展。这种情形，很明显的把国际的和中国的托洛茨基派和党内右派对于世界革命的悲观的取消主义的估量，打得粉碎。

二　世界革命的高涨和中国革命

同时中国的反帝国主义革命，已经是在世界革命的总高涨的情形之下进行，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所以说只有最主要的资本主义列强国内革命胜利之后，中国革命方才能够胜利的说法，固然是错的，同样，看不见中国革命胜利，有促进世界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掀动世界革命的伟大意义，亦是非常之错误的。

二　中国革命运动的高涨

三　中国政治经济危机的深入

中国最近的事变指示出：中国反革命的国民党军阀政府更加密切的和帝国主义列强的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全世界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影响到中国，使中国的经济危机——巨大的工业，农业，金融的危机，更加深入（工业的停滞和衰落，巨大饥荒的继续，失业之增加，银价低落和米价等的高涨）。工人受着中外资本家极端残酷的进攻，农民群众和小资产阶级贫民，亦大批的更加破产和贫困化。而帝国主义列强，正在为着抢夺劫掠中国市场，而加紧侵略中国，重新瓜分中国，争夺中国的势力范围。于是中国国民党——中国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政党，他的各派军阀政客，代表着地主资产阶级的各种集团，互相倾轧和排挤，在经济危机深入的推动之下，更加加紧争夺着对于工农贫民群众的“剥削权”，同时他们也就各自勾结某些帝国主义国家，受他们的实际支配，而替他们争取势力范围。中国统治阶级内部的这种斗争，不但已经爆发成为连续将近两年的军阀混战，而且已经完全毁灭了所谓“青天白日旗统一中国”的幻想，公开的分成几个互相排挤互相战斗的政府（北方政府的成立，满洲政府的“中立”和最近张学良的出兵进占天津北京等），一次战争没有完全结束，立刻又暴露更加扩大范围的第二次战争的准备步骤。更明白表演着：——中国全国的政治经济危机，国民党军阀制度的崩溃进到了更高的阶段。反革命的军阀混战的延长，和统治阶级的更加分裂，愈益削弱地主资本家的政权，同时这是更加加重对于群众的剥削和压迫，而日益引起群众方面更加积极的反抗和斗争。

四　中国革命运动高涨的新时期

中国革命势力的发展，也正在走进新的时期。中国的工农红军，占领过长沙一次，接着在退出长沙之后，利用占领长沙的一切军事政治上的教训，集中并且改编自己的力量，而进行更有效的反对反动统治的战斗。长沙十天的苏维埃政府，不管帝国主义国民党各派和陈独秀托洛茨基等怎样诬蔑咒骂，他对于全国以至全世界的劳动民众都引起极广泛的同情和赞助。固然，第一次占领长沙之中：第一，红军各部队的力量没有充分的配合行动，第二，红军的进攻和长沙的群众斗争没有充分的联系，第三，当时没有充分组织后方和根据地，第四，仍旧保留着许多游击战斗的性质。然而，长沙的占领，开辟了中国革命高涨之中的新时期。——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广州苏维埃暴动，是前一次革命失败过程之中的“退兵的战斗”；而现在长沙十天的苏维埃，却已经是新的革命爆发的“进兵的斗争”——他开始了为着全国苏维埃胜利的革命战争。江西、湖北、广西、福建、广东的红军，正在这个时间更加发展自己的力量的斗争；新的苏维埃区域的建立和发展，农民的游击战争，地方暴动，以及自发的农民斗争，也都在扩大。军阀军队里的兵变和士兵暴动的酝酿和发动比以前更加增加了他的力量，扩大了他的范围，尤其是和红军接触的部队。城市贫民自发的斗争，也往往成为广大的骚动和抢米运动。最主要的城市工人群众，在最残酷的白色恐怖之下，发展着群众的罢工运动，时常发生和警察、巡捕、军队的武装冲突（一九三〇年全国红五月的广大运动，和政治示威，八一运动，上海水电罢工，上海五万人丝厂女工的罢工，青岛的纱厂和人力车夫的大罢工，

武汉裕元纱厂的罢工等等）——虽然运动和斗争的规模和力量，还没有充分的巨大，可是斗争的剧烈和日益高涨的形势是很显然的。一般工人反对黄色工会和国民党的斗争，更加普遍，更加剧烈，这是证明对于除出武装暴动没有出路和必须推翻国民党政权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认识开始更加深入到工人阶级里面去。这种斗争情形明显的表现着：中国工农红军的发展，长沙的占领和革命战争的开始，是在中国一般的新的高涨的背景之上的，而且苏维埃已经是能够总合一切革命运动的唯一的旗帜。

五　现在革命运动的特点

现在革命运动的特点，是从工农群众部分的革命行动进到总的革命进攻的过渡时机：（一）城市阶级斗争虽然还没有发展到充分的力量，足以袭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整个统治，可是正在更加剧烈和日益高涨；（二）农民运动的发展和力量，也有各地方不平衡的现象，有些地方刚在开始农民的游击斗争，有些地方却已经能够推翻当地的国民党政权；（三）而且红军战争的主要区域已经进到规模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军阀的正式战争，跟着军阀军队的兵士的革命哗变和响应红军的运动，也正在日益扩大。——这样，部分的说来，军阀混战已经开始变成革命战争；（四）苏维埃区域的逐渐汇合，要从零星散乱的各地方革命政权的树立，进到建立苏维埃的临时中央政权，来指挥组织革命的战争，集中革命的势力——用统一的革命的苏维埃政权去和反革命的国民党政权对抗，去领导起全国的革命运动，为着苏维埃政权在全国的胜利而斗争。

六　国民党的屠杀和帝国主义的出兵干涉中国革命

中国国民党就用发狂的白色恐怖和屠杀政策，企图挽救帝国主义军阀地主资本家的统治。凡是反动统治现时还维持着的地方，不论是城市和乡村，都是这样情形。国民党军阀，在帝国主义军事顾问包探专家的帮助之下，特别布置主要城市（武汉等）的“防御工事”。国际各国的帝国主义的海陆军和国民党各派军阀，都用极残酷的手段来攻打苏维埃和红军，施用飞机炸弹，整个的轰毁许多村镇，杀死成千成万的民众。国际帝国主义的列强，已经公然计划，并且实行出兵几十万到中国来干涉革命。

七　国民党改组派和取消派等的拥护白色恐怖政策

这样，革命和反革命决定胜负的斗争一天天接近，使一切种种所谓“第三派”更加加紧的企图用“国民会议”等口号的欺骗宣传，来蒙蔽群众，破坏革命。可是，国民党的改组派，汪精卫等，最近参加北方政府，公开勾结帝国主义，赞助军阀，宣传并且实行反对苏维埃革命的白色恐怖政策，使改组派的假面具完全揭露，甚至于完全丧失。托洛茨基陈独秀等取消派，亦跟着改组派提出国民会议的口号，反对苏维埃，说“长沙是土匪占领的”，这很明显的表示他们实际上拥护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政策。其他胡适之的“民权派”，邓演达等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也是同样的作用。取消派等都是资产阶级的走狗，实际上也是在努力维持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

国际的托洛茨基派，以及白朗德尔派，也和中国国内的陈独秀一样的，他们对于残酷的白色恐怖，以及长沙汉口等处最近屠杀几千工人和共产党员，并没有表示半点抗议，而对于

中国红军，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却极力的诬蔑。

八　中国革命进展的前途

帝国主义的列强，这样积极的实行领导反对中国革命的战争，运用他们一切种种走狗的赞助，来镇压那争取中国解放的工农苏维埃革命；中国国民党各派的白色恐怖政策，以及陈独秀、邓演达等的反动宣传，都这样一致的来反对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这足以更加明显的指出：一方面对于中国革命敌人的力量（帝国主义和中国地主资产阶级）需要更伟大的更有组织的发动极广泛群众的革命力量，来和他们对抗和斗争；别方面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自己已经认识清楚——在全世界工人运动和殖民地劳动群众，一般的革命高涨的情形之下，中国革命的向前发展，对于帝国主义的世界统治，都有极大的危险，对于中国国民党的统治，那简直是死亡的日期一天天的接近。

三　共产国际对于中国现时革命情形的正确估量

九　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一致的总的政治路线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秘书处，一九三〇年七月对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估量中国革命的运动说：中国"革命的爆发，一天天的接近"，"最近期间，革命形势即使不能包括到整个中国，至少也要包括到几个主要省份的地域"，不过是"暂时我们还没有全中国的客观革命的形势（武装暴动的形势）。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浪潮还没有汇合。总合起来，这些运动还没有保证必需的力量，去袭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然而"中国革命运动的新的高潮已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和一切取消主义机会主义的预言完全相反，中国最近的事变，照上面所讲的看来，正是确切的证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估量完全正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委的这种指示。

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承认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是正确的，是和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致的——根据于中国的一般的革命运动的新的高涨情形，党的路线的确应当是：发动群众斗争，集中革命力量，组织革命战争，积极准备武装暴动，去为全国苏维埃政权而斗争。这就是说：要在工人群众之中，首先是在工厂中加紧党和赤色工会的作用，组织和领导无产阶级日常的经济斗争，并且把这些斗争密切的与政治口号及斗争联系起来，以动员和组织工业城市之中最广大的工人群众；同时，使工业城市群众运动，与革命的农民运动以及红军的行动配合起来，创造总罢工武装暴动的必要条件，巩固并且扩大苏维埃区域的根据地。

十　中央全体会议对于过去错误估量的纠正

同时，中央全体会议认为必须指出：中央政治局最近期间对于目前形势的估量，在许多重要问题之中，有模糊而不正确的地方——对于时局有过分的估量，对于不平衡发展的观察不清楚，忽略苏维埃根据地的重要，忽略工业区域日常斗争和政治问题的联系；总起来说——就是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没有充分的估计到：现在的事实是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力量，还没有平衡，还没有汇合，农民战争之中还缺乏充分的无产阶级领导和组织作用；政治局亦没有充分的估计到：目前统治阶级还没有完全削弱完全破产；于是对于帝国主义反革命统治崩溃的

形势和可能，对于革命势力的现状，和革命形势发展的速度，都有过分的估量。中央政治局六月十一日的决议案，在一般的正确路线之下，就已经有这种估量上的错误——认为“城市工人尚未走到‘客观革命的形势’的主要原因，只是由于白色恐怖的镇压”，而忽略共产党在群众之中和革命之中的组织作用的还不充分，亦是这种情形的一种重要原因；甚至于认为“只要在产业区域和政治中心爆发一个伟大的工人斗争，便马上可以形成客观革命的形势”。这种估量是不清楚而不正确的，一定可以，而且已经引起策略上的错误。

这种估量之中还没有充分的认识到：(一)现在大城市的产业中心里，还缺少更加广大的群众动员和群众发动；(二)各地苏维埃区域，和红军的发展扩大，还需要领导的加强和集中，需要建立巩固的阵地，去迎接更加残酷巨大的决定胜负的战斗。因此，政治局过去的策略上，就有个别的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的任务，没有能够充分的和争取群众的任务密切联系起来，所以冒险倾向的轻易暴动的布置，代替了切实创造武装暴动前提的斗争。

为着更加坚决彻底执行国际和中国党一致的路线起见，必须遵照国际执委的指示，立刻完全纠正这些错误，而在一般策略和工作上，实行必要的转变。

十一　反对动摇党的路线

同时，中央全体会议指出来：实行纠正政治局过去策略上的错误，决不是变更党的路线。最近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却利用这些个别的错误，企图进攻中央的路线，企图用曲解国际路线的手段——认为现时应当采取保守政策——而来推翻中央和国际一致的路线。总之，左倾的估量认为全国客观革命的形势已经到来，应该马上到处布置暴动；右倾的估量就否认全国总危机和一般的革命高涨事实，而认为应该抛弃准备总同盟罢工，和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的方针，这都是违背国际和党的一致路线的。而右倾的估量，简直是投降政策——客观上是取消派埋伏在党内的奸细。

总之，空喊“工人只要暴动不要罢工和示威”的“左倾”机会主义，以及反对政治斗争，反对创立武装暴动必要的条件的右倾机会主义——这两种倾向都阻碍着争取广大群众及发动和领导坚决的战斗。党应当坚决的斗争：——反对空喊总罢工武装暴动而忽略工厂之中日常的群众工作，和群众直接的日常要求的“左倾”机会主义，反对只看到经济斗争而否认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联系的密切，不去努力创造总罢工武装暴动的必要条件的右倾机会主义——而且现在右倾是主要危险。

四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

十二　共产国际指出的任务的总意义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秘书处一九三〇年七月的中国问题议决案，根据对于中国形势正确的估量，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目前任务，更有详细明确的指示。这任务的意义是：(一)巩固和发展各苏维埃区，集中农民斗争的力量，加强无产阶级对于工农红军的直接领导，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临时中央政府，去组织革命的战争——争取一省几省的首先胜利。(二)同时，积极的扩大中心城市工人群众的鼓动和组织工作，发动并领导全国反动统治区域里面各

种方式的群众革命斗争，争取极广大的劳动群众来积极准备武装暴动，以加强并巩固无产阶级对于农民战争的领导权；——这样去坚决的为着全国苏维埃政权的胜利而斗争。

十三　苏维埃根据地的建立

革命势力——工农红军的发展，正在从零星散乱的游击战争，进到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正式革命战争；长沙占领事变的经过，更加明显的指出这样情形。中国红军的三，四，五，八军的汇合和广大的苏维埃运动的发展，正是证明当前第一等重要的任务是——建立巩固的阵地，就是建立集中统一的真正和工农群众密切联系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最有保障的地域——苏维埃的根据地，创造并且巩固真正坚强的，政治上军事上有充分无产阶级领导的红军，以便依照军事政治的环境，进而占领一个或者几个工业政治中心——这种形势，现在是湘鄂赣区域最为成熟。

十四　苏维埃区域里的政策

这种任务的执行，首先就要不但继续扩大发展各苏维埃区域，而且要切实加强这些区域里无产阶级的领导：(一)要切实组织并且整顿各级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政权——吸引广大的工人农民群众的参加，排斥富农和投机分子；(二)要坚决彻底的实行土地革命，分配田地；(三)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最小限度的保护劳动的社会法令；(四)实行适当的以承认自由贸易和施行劳工监督生产为原则的经济政策，和一般抑制剥削者的政策及租税政策；(五)实行坚决的肃清反革命政策，和革命的民权独裁；(六)实行经过群众团体定期征调志愿兵的办法，去坚决改良红军的社会成份，建立红军之中无产阶级的领导干部，提高和巩固党在红军之中的领导作用及绝对的威信。……这就必须发动当地更广泛的群众，组织他们的斗争，发展并且巩固当地的赤色工会，雇农工会，贫民团等，去团结中农群众于自己的周围，而肃清富农的一切反动影响和领导。只有这样，苏维埃才能有巩固广大的群众基础。国际执委的议决案，对于这些问题的详细指示，应该立刻坚决的去执行。

对于这一个问题——建立工农苏维埃政府，创造并且巩固真正的红军，以确立最有保障的地域（根据地）以及随着这个方针而必须执行的许多步骤和办法——中央政治局直到最近才加以充分的注意。这个任务的执行，决不是“割据偏安”的“和平建设”，恰恰相反，只有在斗争之中，才能够发展出坚强的政治上稳固的真正红军和苏维埃政府。——这种巩固红军和苏维埃政权，肃清苏维埃区域内部反动势力的方针，正是要用更加巩固革命阵地的方法，使胜利的进攻得到多分的保证，这样去真正扩大苏维埃区域，——为着全国苏维埃政权的胜利而斗争。现在不彻底的去准备苏维埃根据地，不加强和改造红军，不做政治上军事上更好的准备，而使单纯扩大战斗的政策束缚了自己——这是很有害的。

十五　城市工人运动里的任务

反动统治区域里城市工人的斗争，女工运动，青年工人和童工运动，以及失业工人运动，必须加以更加充分更加切实更加坚决的领导，对于自发的经济战斗和反对国民党及黄色工会的斗争，以及还在黄色工会等钳制之下的运动，必须加以更多的注意：要保障党的政治影响的扩大，使他不但不至于比客观自发斗争的剧烈化还要落后，而且能够得到组织上的巩固——首先就是党和赤色工会的发展，以及工厂委员会运动的切实执行和扩大，这就必须更坚决的去执

行独立领导斗争，团结广大下层群众，反对黄色工会，消灭黄色工会的策略。城市工人运动的中心问题就是在准备总同盟罢工的方针之下，去加紧组织政治罢工——因此，必须努力加强对于日常部分的经济政治战斗的领导，扩大罢工运动，直到各业同盟罢工，并且发动群众的更广大的政治斗争，不但不把经济和政治要求机械的分割对立起来，而且要能够综合联系政治和经济的要求去组织伟大的政治罢工。要能够发动群众的经济战斗和政治战斗，从这种部分要求的群众运动的领导，联系到为着全国苏维埃政权的总斗争，这样去真正切实的准备政治总同盟罢工，以至于武装暴动。

对于罢工运动不能充分领导群众切身要求所激起的部分斗争，同时又并不能使政治罢工的鼓动深入群众，并且不能联系部分要求的斗争和总的政治斗争——这是争取群众的很大的障碍。至于机会主义的动摇分子，企图分割政治的和经济的斗争，要使运动停顿在经济的小斗争范围之内，并且把准备总同盟的政治罢工推到第二等的地位——那就简直是尾巴主义的最严重的表现。

十六　争取群众和积极准备暴动的联系

反动统治区域的农民运动，饥民运动，兵士运动，反帝国主义运动等，亦都应当在这种原则之下去进行。总之，对于目前任何细小的斗争，党都不应当忽视；必须认清：争取大多数工人群众，一直到落后的广泛的劳动群众——是和积极的准备武装暴动，发动游击战争和地方暴动的任务，绝对不能对立起来的。恰恰相反，正应当利用工人和厂主，店员和雇主，农民和地主，兵士和军官……以及帝国主义军阀和中国民众，反动的中国政府和境内弱小民族之间的一切冲突，去领导和发动广大群众的斗争，在斗争的过程中，削弱反动的统治，争取，动员，并且组织革命群众，这样去积极准备武装暴动。

十七　革命武装力量的扩大和准备

这些斗争的发展之中，应当注意到工人军事上的编制训练和武装训练；应当坚决的从抗租，抗税，抗债等斗争里，从发展新的苏维埃区域和土地革命运动的斗争里，发展更广大的农民武装，游击队和游击战争，适当的去创造新的红军；应当对于兵变给以正确的领导，并且在适当的条件之下组织士兵暴动，使他们的发动，的确能够削弱反动军队，而加强革命的武装势力——和工人农民以及红军的斗争联系起来。主要的问题是在所有这些运动之中，实现并且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这里，不能够有冒险的行动和布置；因为准备的不充分，以及和兵士群众的联系的缺少，或者因过于夸大计划而等待不可能的配合——这些行动和布置，反而可以断送我们在敌人军队之中的力量。

十八　苏维埃区域和反动统治区域任务的相互关系

自然，反动统治区域的这些斗争任务，决不可以和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任务割离起来，尤其不可以互相对立起来。恰恰相反，这两部分的任务，只是一个整个任务的两方面，——这个整个任务，就是为着全国的苏维埃政权而斗争。所以两方面的任务，应当互相适合，互相联系。例如要在日常斗争里去引起广大群众的发动，在反对军阀混战，变军阀战争为反对军阀的革命战争的总口号之下，起来拥护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反对攻打红军，阻挡运输军械军队去打苏维埃区域，号召兵士投到红军，工人替苏维埃政府去工作……等。总之，党的总方

针，是要组织现在的革命战争和积极准备城市暴动，互相配合和联系起来。

十九　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运动

一般的全国工农兵士贫民群众的斗争，苏维埃区域的政策，以及红军的战争，都要集中统一的组织起来，领导起来，适当的联系和配合起来。所以最近党的具体任务就是要领导起极广大的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运动。要能够切实的把全国大城市和一般反动统治区域里面工农群众的解放运动，以至日常斗争，和苏维埃大会的准备运动，密切联系起来，并且要能够真正发动各苏维埃区域极广泛的群众，来积极参加大会的准备，这样，使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和将要在大会产生的临时中央工农苏维埃政府，的确有全国斗争的劳动群众做他们的支柱。

二十　苏维埃政府的大政方针

全中国以及全世界范围之内，要发动广大的赞助并拥护中国苏维埃大会而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的广大运动。——要百倍的加强列强驻华海陆军里面革命的兵士运动。要经过苏维埃政府——中国工农群众自己的政府，在一切宣传鼓动的运动里，提出主要的中心口号：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劳工团体监督生产，推翻国民党政权和帝国主义的对华统治，建立独立的解放的统一的苏维埃中国，取消帝国主义的一切特权——中国境内，不论是中国和外国的资本家，凡是违背和破坏苏维埃政权的法令的，都要受到严厉的制裁，一直到把他们的企业租借区收归国有；——要公布这种苏维埃政府的目前大政方针于全国和全世界。并且要特别提出联合苏联的口号，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群众，来和中国苏维埃政府及民众，共同拥护苏联，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进攻苏联以及压迫中国革命的战争。

二十一　党的组织任务

所有这些任务，很明显的要求党努力去加强主观的力量。首先就是要扩大党的无产阶级的基础，广泛的征求产业工人女工入党，而征求农村工人雇农苦力等入党，亦是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同时，要在广大的半无产阶级的贫民群众之中，发展党的组织；要坚决提出工人干部，训练新的干部，要百倍的加强党的各级指导机关，直到支部干事会。要扩大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一切革命的群众团体，尤其是赤色工会和工厂委员会，以及劳动童子团，工人纠察队，赤色先锋队，少年先锋队，革命的农民及兵士团体，反帝国主义大同盟，革命互济会等等。

现在，一方面要努力加强党对于青年团工会以及其他革命群众团体的领导作用；别方面正要更加扩大群众的非党团体，广泛的发动他们的组织，提高他们自己的活动能力和独立工作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发展并巩固党对于广大群众的政治影响，使有组织的革命势力，不仅仅限于最先进的先锋队伍，而能极广泛的包含到伟大的群众。任何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上的某些办法，足以妨碍这种任务的进行，甚至于事实变成取消青年团以及妨碍工会工作等的现象的——都极端的有害，而不能不立刻改变；要真正建立并且强固各种群众团体里的党团工作，要努力扩大并加强党的支部和他在群众之中的核心作用，尤其是产业支部。

以后党的最主要的组织任务之一应该是：有系统的扩大赤色工会的基础，使他们在工厂之中成为真正的群众组织。全总，上海工联，各省的总工会，以及各产业工会，都要成为有

战斗能力的组织。要从工厂里面最好的最积极的工人之中，特别是从罢工及各种斗争里面最积极的分子之中，提拔新的工会干部。应当铲除害怕和不信任非党的无产阶级分子做工会指导机关工作的倾向；党的支部和党团，应当在工厂和工会里面，把这些选拔出来的广大的无产阶级干部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党团和工会，都应当特别注意劳动妇女运动，尤其是女工运动，必须各级党部，团部，工会的整个指导机关，一直到每个支部，每个工会下层组织，都负责积极去进行妇女工作。

党对于青年团要注意到现时极严重的青年团的危机状态——青年工人的工作薄弱到极点，团员的工人成份，比党还要稀少，苏维埃区域虽然有青年群众的组织，而极端缺乏团的正确领导。党必须百倍的加强对于青年团政治上组织上的领导，加强青年团的反对右倾主要危险，同时加紧反对障碍青年团实际工作转变的"左倾"清谈和关门主义，而切实执行青年共产国际所指示的转变，实行工作上的青年化，尤其要反对党内轻视青年工作的倾向。党的中央政治局的关于"总行委"决议，事实上得到了取消团的组织的结果——这种错误直到最近方才纠正；——这种错误引起了取消青年团倾向的加强，所以特别要坚决的反对这种取消主义的重要危险。同时，也要加强斗争，去反对因为这些最近的错误而更加激起的先锋主义的"第二党倾向"。

二十二　下层统一战线的方针

现在革命发展的形势，是革命和反革命开始日益接近决定胜负的战斗，国民党改组派，陈独秀托洛茨基的取消派，邓演达的社会民主派，胡适之等的民权派，凡是这些企图站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所谓"中间"派"第三派"，都自然要更加努力帮助统治阶级——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地主资本家——想出比较巧妙的方法，来欺骗群众，拉住群众，阻碍群众的革命化，而维持反动的统治。他们一致的口号是"国民会议"；他们多多少少相同的策略，便是企图诱惑群众走到合法主义的"正轨"上去，甚至于露骨的做破坏罢工的工贼，出卖农民群众斗争的奸细——已经成为通常的现象。就是不成派别的工头，帮口，红枪会等类的首领（富农豪绅等）事实上也是传达改组派等影响到群众中去的工具。这种政治派别和破坏革命的分子，甚至暗藏在苏维埃区域里去活动。他们的活动，尤其是在反动统治区域，往往还能够欺骗落后群众，至少是使群众暂时的犹豫，散乱，认不清目标。所以共产党的任务，就要更加加紧反对这些派别和这些分子的斗争，争取群众自发运动的领导，主要的是要在政治上解除他们的武装。这就必须实行"下层群众的统一战线"的策略——就是在一切斗争，尤其是日常部分要求的斗争之中，共产党应当和非共产党的一般下层群众团结起来实行斗争，独立的去领导他们的运动，使这些运动都走到苏维埃政权的总口号之下来。这样，在斗争的过程之中，要在每一步，每一件事情上，都切实去暴露这些派别，黄色工会的领袖，红枪会等类的首领……的反革命作用，以及他们欺骗钳制出卖压迫群众的真相。

二十三　革命转变问题和反对孙文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

中国革命发展的趋势，是斗争急剧的发展和迅速的深入。因此，共产国际执委特别指出中国革命当前的任务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前途问题。中央政治局对于这一问题——中国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在最近几次议决案上，指出"两个革命完全隔离"的说法，以及"革命开始胜利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说法的错误，固然是正确的，

可是，自己的群众，也是不清楚的，而且是机械的（“一省或几省革命胜利就一定是革命转变开始”的说法）。党必须根据国际七月议决案的详细指示纠正这些错误，更切实更明确的指出并且解释：中国革命现时阶段，还是民权主义的性质，而他的胜利的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并且应当在这个问题上更加加紧反对孙文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

五 反对倾向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

二十四 自我批评和反对倾向的斗争

党现在要担负起组织革命战争——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的严重任务，要在组织上加强自己的战斗力，要加紧反对一切反革命派别在群众里的影响，而争取广大的群众。为着执行这些任务，党必须根据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的七月议决案，和本次全体会议的决议案，切实检查党的工作，实行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从中央一直到支部，都要站在国际和党的路线上审察批评策略上组织上工作上的错误和缺点，而坚决的执行纠正，使全党都了解这些错误的实质和教训。别方面要防止调和主义精神的非布尔塞维克的“自由批评”——离开党的路线，甚至攻击党的路线的批评。并且党在现在情形之下，应当比任何时期，都要更加保障思想上布尔塞维克的一致，实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反对左右倾和调和主义。

二十五 “左倾”的错误

因为必须坚决的领导罢工斗争，尽量发展农民的游击战争，和地方暴动的关系，除主要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危机之外，又发现了盲动主义关门主义倾向的错误——就是往往不去争取群众，不能估计群众的力量而只有脱离群众的发动计划等等。同志之中发现“不理黄色工会”“凡是不是雇农，一律都应当开除出党”“杀尽富农”“只要领导十亩以下的贫农去抗税抗租”等类口号的提议。并且已经有放弃群众日常斗争的领导，忽视组织上巩固党的影响和群众团体等的现象。甚至于借口“群众只要暴动，不要罢工，只要大干，不要小干”的论调，而实际上走到极有害的机会主义的消极。群众之中的这种情绪，只足以表示群众对于国民党统治的毒恨的增长，以及群众力量组织的需要的增加。如果因此就不去领导群众日常斗争，那就成了等待暴动。别方面，这一类的“左倾”情绪，在革命战争之中，往往会引导到表面是“坚决向前进攻”，实际是继续“没有后防的作战”方式；在苏维埃区域里，就是不会适用对于帝国主义的应付政策，脱离农民群众的“左倾”幼稚政策，反对富农而不会团结中农于自己的周围；以及一般的不会在政治上解除改组派取消派黄色工会富农等等的武装，而反对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

“左倾”的错误，是在于只看到先进分子的情绪，而不去切实艰苦的去争取群众，因此，脱离广大群众而落到小资产阶级的急进主义。“左倾”的错误，事实上是巩固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所以一定亦坚决的反对一切“左倾”，不应当有任何调和的态度。

二十六 右倾的主要危机和调和主义

同时，现在党要在斗争的过程中，准备力量收集力量去迎接最近将来决定胜负的战斗，

要勇敢的去发动，并且独立的去领导几千百万群众的革命斗争——在这种斗争条件之下，党内主要的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

现在的状况：最严重的危险事实上的确是对群众斗争落后的尾巴主义——有些同志甚至于说"群众都是右倾落后的"来掩护他们自己的怠工。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上实际上的表现，就是：工会的合法主义（投降黄色工会，放弃独立领导斗争的黄色倾向），农村里的"富农路线"（阻碍土地革命，保守和和平发展的主张，放任群众在富农影响之下等等事实），对于农民战争的蔑视，恐惧反帝国主义运动的"过分"发展等等。可是最近这些个别表现之外，还有更严重的现象——甚至于形成整个的右倾路线，企图鼓动同志来反对党的路线。这种右倾路线是：（一）说"国际无产阶级帮助中国革命是空话，而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是实在的力量"，所以革命战争的胜利是没有希望的；（二）说城市工人没有革命的斗争，没有同盟罢工的可能，只能实行日常的经济的小斗争；（三）说农民的斗争，因为没有工人革命斗争起来，所以不能成为什么大的力量，说农民战争是"部落式的暴动"（"长沙的占领是决没有前途的"）；（四）借口发展不平衡，否认世界的总危机和一般的革命高潮（否认"第三时期"），否认中国全国的政治经济危机和总的革命高潮；（五）因此，认为不应当有组织革命战争，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的总路线，并且根本否认党的成绩，发展悲观的论调——主张避免剧烈斗争来和平的发展"主观力量"，说一定要赤色工会组织了大多数工人之后，才有别的办法；（六）造谣挑拨说党内实行纯粹的委派制度，"弄得同志都不敢讲话"，发展煽动无原则的派别斗争。这个路线显然是反对党的整个路线——亦就是反对国际的路线。可是这些右倾分子却利用着中央政治局策略上组织上的个别错误，不但造谣诬蔑挑拨离间，进行小团体的活动，而且宣传中央的路线和国际是不一致的，用政客外交的手段，冒着"拥护"国际路线的名目，实行反对国际和党的路线。这些分子的领袖，又正好就是从二中全会以前，江苏问题的争论，反对陈独秀斗争的最初阶段以来，一贯的是反对中央的。

而且，在党批评和打击这些右倾分子的时候，居然有些同志还采取调和态度，说右倾路线并没有形成，说思想上反对右倾固然需要，组织上的制裁是用不着提起，只说中央和国际不会不一致，而不答复右倾分子的诬蔑中央；总之，调和主义的特点，就是说，在组织系统上当然服从中央，可是思想上的自由，讨论上的自由，即使是要动摇党的路线的也还要保留着。这些调和派是向来有小组织的派别主义倾向的一些同志，他们现在事实上是在阻碍党反对右倾的斗争，如果他们不抛弃暗藏的机会主义的立场，那么，自己也始终要走上公开的机会主义的道路。

党必须同时反对调和主义，然后才能无情的克服这种右倾的机会主义的主要危险，然后才能战胜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和工头富农的意识，如果这些同志不纠正自己的错误，而且继续坚持，那么，党必须肃清他们——因为这种形成整个路线的右倾分子，客观上不能不是取消派埋伏在党内的奸细。

二十七 两条战线上的斗争的党和革命任务的执行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一致的认为共产国际执行最近对于中央政治局的一些纠正和指示，都是完全正确的。为着要执行这些指示，以及为着要执行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案，纠正过去个别的策略上工作上组织上的错误，并为着更加坚决的执行国际的路线起见，为着要担负起当前的严重的革命任务起见，必须坚决的实行两条战线上的斗

争——反对左倾，反对右倾和调和主义，尤其要集中火力打击主要的右倾危险。党在这个问题上的任务，就是同时加紧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尤其是反对右倾——右倾是现在阻碍党去执行当前重要任务的主要危险。

注：

中央政治局从六次大会之后，大致已经习惯了把“革命高潮”的名词与“直接革命形势”的名词，用成同等的意义。字面上“高潮”和“高涨”极容易混淆，而“直接革命形势”（国际这次决议案上称之谓“客观革命的形势”）和“高涨”在实质上却大不相同，所以“高潮”的名词应当废除。

以后划一名词：

（一）凡是表示革命运动向上生长的普遍意义的，一律只用“高涨”。

（二）凡是表示可以有武装暴动直接袭击统治阶级的统治之形势的，应当用列宁的名词“客观革命的形势”，以后不用“高潮”。（马鲁伊里斯基同志最近的解释：“直接革命形势”是以前齐诺维也夫所用的，也有不妥当的地方）

组织问题决议案

——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八日扩大的三中全会通过——

一、二中全会后党的组织状况

二中全会后，中央在组织上的进步是：党员的数量有很大的增加（一二二三一八人），特别是在苏维埃区域；支部数目只就大城市的产业支部说，也增加到一倍以上（由九八到二二九）；有些中心城市如武汉、广州等地的工作不仅恢复而且有了发展；党的政治影响，在群众中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历次的政治示威中，尤其在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扩大以及两次进攻长沙中，党的政治影响特别扩大，中央红旗日报每日销数将近一万，各地红旗亦有销一两千的）；党在群众中的领导力量特别在苏维埃区域表现出很大的进步（北方矿山、铁路、人力车夫大斗争，上海市政、纺织、码头、店员、手工业工人的历次罢工，武汉纱厂工人的示威，南方工人的不断斗争，大都有党的领导，赤色工会会员的发展达到了十万以上，苏维埃区域的农民组织以及赤卫队各有数百万，红军以最严格的计算也近十万，其他群众组织如济会亦有数十万）；尤其是党在反托洛斯基主义陈独秀取消派以及右倾调和主义的斗争中，更表现出它的坚定性与党的布尔塞维克化。这些就足以证明中共本身的稳定和它与群众关系的进步，已成了中国革命新高涨的前提和基础。谁要否认这一大的进步，谁便要在客观上帮助了右倾。可是中共的组织力量和它在群众中的工作，总还是落在这日益加速的群众的革命斗争过程之后。特别是大城市工人党员的增加还是很慢很少（产业工人党员由一千多增加到二千多）。在全国党员数量上，工人成份竟成了相对的减少（即是说工人成份的增加，赶不上其他阶级出身的党员之增加的速度）。这种主观力量的落后，对于目前革命运动的发展，对于最近将来武装暴动的准备，对于在这些斗争中革命领导的保证，正是一种主要的危险。在这里首先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者对于主观力量的悲观论，同时也要反对忽视加强主观力量与只要客观形势一到主观力量不成问题的自然论者。为要不做事变的尾巴，扩大的三中全会同意国际的指示："党的全部组织工作，在最短期内应有最严重的转变"；更切实的说，应有新的组织工作方式，应有更高的组织速度与更广的组织范围。

二、目前党的中心组织任务

目前中国时局的特点，正如国际所指示："是从工农群众部分的革命行动走向总的革命进攻的过渡时机"。党的队伍要能有迅速动员和迅速改编的能力，以适合环境的任何改变。因此，中共的中心组织任务是：要最大限度和最大速度的发展党的无产阶级成份；要考察和巩固党的各级委员会的工作，尤其是要巩固支部；要加强和发展党内新干部，在中央正确路线的基

础上，团结积极分子到党的各级指导机关的周围，尤其是工人干部；要特别注意苏维埃区域之党的工作，要肃清停留在党内的富农成份和官僚主义投机分子；要特别加强群众组织中党团的工作，尤其是支部在群众中的核心作用。在两条战线上，尤其主要的是在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战线上，进行无情的斗争，来考察党的组织之各种部门的工作，来纠正各种不正确的组织观念，来巩固党的纪律，以便更有力量的领导群众进行坚决的斗争。

三、征收党员运动

党在组织上的主要关键，在于加速党的发展和加速党内工人干部的发展，这首先就须增加党内工人核心和工人干部人材之比重。因此中央及地方党部应将加紧徵收新党员和检它在数量上社会成份上所得的结果，“看成一种战斗的任务”（国际组织决议案）。党要向产业工人开门，要使吸收产业工人入党成为一种潮流。要使党的发展方向集中全力于城市工人和乡村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尤其要认清目前敌人白色恐怖统治最严厉的地方，中共党员的数量也发展得很弱，特别是在大企业中如海员、铁路、矿山（开滦五矿最近却有大的发展），兵工厂等党员数量之稀少，大城市支部之流动不定，都到了不可容许的地步。“中央应以徵收新党员，建立新支部及巩固现在的党的组织的成绩来作地方党部工作成绩的尺度”（同上）。这一切的发展和巩固，都须在斗争过程中进行，都须在坚定的宣传共产主义广大的鼓动党的口号的基础上进行，都须在支部有系统的进行党的工作中进行。关于吸收新党员，党应排斥一切惧怕新党员只找旧线索之机会主义的见解，党要把群众斗争中一切较好的成份，勇敢的无所畏惧的吸收到党的队伍里来。党应加重训练新党员的任务，分配他们参加实际工作，给他们办短期训练班，引导他们积极参加党的生活，使他们能担负起党的下层工作的任务。多量的吸收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入党，在支部中将起生力军作用，这是改造支部的主要出路。党在女工农妇中的发展也要放在主要的地位。

为要达到这一切目的，扩大的三中全会完全同意国际的指示，中共全党应举行徵收党员运动，同时更应扩大这一运动到青年团、赤色工会、赤色农会中去。

四、厂内活动与支部工作

为使党的政治影响在群众中更加扩大，为使党的策略在群众中起真正领导的作用，为使党能发动起更广大的群众，能组织起更多的赤色工会会员与能灵活的宽广的运用工厂委员会的组织方式，党必须加重在工厂作坊内的活动与建立和巩固支部本身的工作。没有这个在城市中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的工作，便将没有群众的基础。过去许多自发的工人斗争得不到党的领导，在有些罢工中党的领导失败，各地的政治示威发动群众不宽广，赤色工会在大城市的发展还极微弱，并且下层基础也极流动；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便是党缺乏在工厂作坊内的活动。党的政治口号常常成为厂外的号召；党的策略指示至多达于支部书记；地方党部与支部关系是常靠“厂门口等人”的办法来建立；支部一般说是缺乏经常与独立生活的；因此，支部便失去其在群众中核心的作用，常与群众组织无异，有时连反映群众要求和斗争的能力都缺乏，这是目前实际工作中最严重的现象，扩大的三中全会唤起全党注意：必须将解决实际问题的中心，放到厂内活动上去，这首先就要建立经常的支部生活，尤其在目前，许多

产业部门，党员数量要有大量的增加，因此，更加要建立起健全的独立的支部生活。支部干事会要有组织的有系统的领导支部工作，分配每个同志到群众中去活动，并采取适当的分工（组织、宣传、青年、妇女等）。在人数多的支部，要更加强支分部干事会乃至小组长的领导作用。支部要发展关于策略上工作上的讨论，要深入反倾向的斗争，要肃清和平发展与党内和平的观念，以加强支部的战斗力与在群众中的领导力。支部要注意与失业同志的联系以及在失业工人中的发展。这一切都要求全党尤其是地方党部予以最大的注意。首先便要帮助中心产业支部加强起来，稳定而发展起来，尤其是培养支部中的中心干部，以树立自立的工作基础；这样更推广到一般支部中去，使党的一切活动的重心，由厂外转到厂内，由上级移到支部中来。

五、干部问题

革命运动的突飞猛进，反映出目前革命的干部感受极端的缺乏。但直到现在，全党对于干部问题的注意，都还存着一种听其自生自灭的状态，全党对于引进新的工人成份到一切群众工作中去，引进工人干部参加指导机关的实际工作，还表现不可允许的迟缓与犹疑党。还不甚了解在从最近革命斗争——罢工、示威、农民斗争等等中表现出的新的力量上来扩大党的干部的任务。党对于新干部的训练和养成，还缺忍耐性，各级党部如不能团结党内积极分子尤其是工人干部在自己的周围，以传达和执行党的路线和策略，则党的各级指导机关必将脱离群众而成为架空的组织。支部的群众工作与教育工作是训练干部的基础，从最广泛的个人教育工作，直到有系统的训练班，都必须努力去做，以提高党员的政治水平。继续着留恋在实际上不可挽救的旧干部，对于党只有害处，这是必须指斥的机会主义的观点。但决不因此丝毫减低对于不了解的党员之政治讨论的启发，务“使每个党员能够自主的懂得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现时行动纲领”(同上)。一般干部中有不敢提出不同意见来讨论的恐惧；这正足以助长机会主义者的活动，全党上下应一致的肃清这一障碍。没有这个，党内反倾向的斗争，将不能深入，党将不能团结成巩固的铁的纪律的一致行列，以执行行将到来的革命战斗。

六、巩固各级指导机关

扩大的三中全会完全同意国际的指示“在目前形势下，巩固党的组织，最高限度的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和内部纪律，最高限度的改善和巩固党的领导机关等成为党的当前第一等的重要任务”。为要加强各地方的领导及支部工作，首先就要求中央巩固各省委的工作。省委中心的组织任务在巩固地方党部的领导，加强对大产业支部和中心农民斗争区域之党的直接领导。许多支部之不稳定，不能在群众中起核心作用，许多地方党部的软弱，工作无计划、不实际或保持着机会主义的情绪，许多农村党部之停留在富农甚至地主的领导中，或另一偏向走入杀尽富农甚至拒绝贫农中农分子入党的“左”倾危险中，都成为放弃障碍甚至断送革命斗争之严重的问题，需要中央和省委刻不容缓的去执行整顿和改造的任务。对于地方党部的改造，必须引进在业同志参加指导机关，必须培养指导机关独立的工作能力。为彻底的实际的执行这一任务，各级巡视工作更成为极端重要，中央对于地方，省委对于支部，经过巡视工作必须有直接的实际的了解和指导。

为使国际指示的两方面的政治任务更能切实的有保障的执行，扩大的三中全会完全同意中央政治局立即在苏维埃区域建立中央局的办法，以统一各苏区之党的领导。当着苏维埃临时中央政权建立起来后，苏区中央局应经过党团在政权中起领导作用。苏区各特委凡能与苏区中央局发生直接关系的地方，都应隶属其指挥。另一方敌人统治区域的中央局，长江局是最关重要的一个，中央政治局应尽可能使之得到安全的保障，其他各局可次第设立。在分设各局以便于分区指导的原则下，中央仍保有与各省在工作上必要的报告和指导的关系，但一般的必须经过各局。

七、党　　报

党报不仅是统一党员意志的指南，而且是鼓动群众、说服群众、组织群众的利器。中央的红旗日报为使他更能实现这一任务起见，必须唤起中央政治局更加负责与注意，必须使全党党员了解党报是党的喉舌，必须使党报的文章具有最高的指导性和最大限度的具体性，必须尽可能的通俗化，使它真正能够深入极广大的劳动群众中去。党报必须设立全国系统的工农通讯员，经过他们使党报与广大群众密接起来。必须建立群众的发行网，以保持秘密的发行路线。在群众中党的支部应组织读红旗的小组以扩大宣传。最近红旗日报屡受敌人的摧残，中央及各地党部更应在群众中发起拥护红旗运动，从精神上物质上给红旗日报以帮助，并给敌人以有力的群众的反抗。

同样，在各省委与各地方党部亦必须尽力出版地方党报，多注意于讨论当地党部的任务与策略及地方性质的问题，此外，必须尽可能使各支部出版工厂农村小报。

八、工作检查与巩固纪律

为使党的组织工作在实际上有个真正的转变，为使党的纪律更巩固起来，全党应实行自上而下的工作检查，检查的方法依国际的指示：1．遣派巡视员到地方支部中去；2．发展自下的自我批评。但这一检查须是巩固纪律的，须是加强工作速度的，“自我批评要成为国际和中央路线而斗争的工具，不要恶化为个人的或偶然性的无原则的争论”(同上)，更要反对党内暗藏的取消派机会主义右派利用中央或省委某些个别错误，进行反对党的路线与中央或省委的活动。扩大的三中全会尤其同意中央政治局对于过去几个星期中所犯的个别的严重的政治错误，在国际的指示之下，采取的严格的自我批评的态度。中央这一自我批评的领导，将更加巩固党的集体指导的威信，将更加有力的打击一切反党的企图，而加紧进行对右倾和“左倾”的斗争，在检查工作上，对于各级党部之工作报告和工作计划之实际内容，对于工作计划之实施程度，都要有严格的审查与批评，要消灭一切虚浮夸大，隐瞒不切实际的现象。在检查工作上，要反对命令主义残余的复活，要反对一切不要组织的小资产阶级的浪漫性，要反对手工业式的工作方法，要反对工作上寒热病的状态，要建立各级党部尤其是地方支部中之系统的经常的工作，要巩固下级党部中松弛的铁的纪律。在检查工作上，对于研究工农革命斗争的经验，应加以最大的注意，尤其是对于群众的示威运动或武装冲突，更应研究其教训，以指示全党。

九、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

在开始的革命的国内战争中，极端的白色恐怖要成为统治阶级最后的挣扎，于是党的秘密工作更成为十二万分的重要。一切小资产阶级浪漫冒险的情绪，一切农民散乱无组织的习惯，都成为无产阶级谨严的秘密原则的敌人。党必须在深入群众和反对机关主义两个原则上来建立秘密工作的基础，地方党部的工作应深入到群众中去，与群众打成一片，吸引一切在业同志参加党的工作。同样中央及省委也要尽量减少机关工作人员，利用在业同志参加工作。各级机关来往的文件要减少到只是最必要的程度。各级书面的指示要避免冗长难懂或失去中心的毛病，报告讨论接头和开会时间，要在最紧缩的时间中完毕它的工作。一般干部的力量要多用在群众斗争的注意，发动和领导上，不当以机关工作消耗其主要精力。

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有密切的联系，争取公开活动的方式，要会灵活的运用。在敌人力弱尤其是斗争发展的地方，党要很灵活的争将一切革命的群众组织公开起来，在群业中公开党的领导面目，但并不因此便破坏了党和赤色工会的秘密组织基础。甚至在苏维埃区域中，党及革命的群众团体必须保有它们的秘密组织基础，准备能在万一的挫折中很迅速的转入秘密的状态中去。

十、行委与党的组织军事化

行动委员会的组织，是适应某一政治斗争或某一群众罢工行动之一种临时集中的群众性的组织，党一年来对于行动委员会的组织方式有了认识上的错误，故至每一次政治示威中都将行委变成党内的组织，同时又另组织了群众的公开的团体代表会，这一方面，使党的经常工作发生影响，另一方面在示威的指挥上又嫌叠床架屋，反而妨碍扩大群众力量一致行动的根本意义。至于这次全国行动委员会的组织，1、由于中央过去对于目前革命发展的速度与程度的估量是有错误，2、由于一惯的对于行委的组织方式运用错了，故有些不适当的组织。并且因此行委组织，取消了团的独立组织系统，障碍了工会的日常独立工作，这一错误显然已影响到下层群众工作中去。扩大的三中全会完全同意中央政治局接受国际的指正，承认行委在党内的组织是不适当的，并立即恢复团的独立系统与工会的经常工作，同时，并指出在某一示威时，在某一大罢工的发动和指导时，单纯为这一问题的本身仍然需要行动委员会的组织以集中与统一指挥，但绝不因此便要妨害了党内的经常工作或取消了团与工会的独立指挥系统。相反的，愈因革命潮流日益高涨，党愈需要经过一切非党群众的组织发动更广泛的群众来加强革命的力量。

在这里扩大的三中全会要批评“党的组织军事化”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这一口号的解释与运用将要障碍目前在可能限度内之党内民主化的实施。即在国内战争与军事共产时代，列宁也只将党需要最集中的组织，从精神上比做军营一样，党的决定常常看做军令去执行，铁的纪律解释成近于军事纪律，但却从未说要军事化了全党的组织。因此党在目前需要严格的执行党员军事化与党在国内战争区域需要实行军事纪律是与“党员军事化”仍有分别的。

十一、青年妇女工作

在政治路线的执行上，尤其是在反取消派反右倾的斗争上，青年团表现它与党相同的坚

决性及其进步，可是团对于本身工作转变到青年群众中去的任务，执行得非常不充分，甚至初步的成功都没有做到。青年团组织在大城市中的消弱，青年工作的缺乏，青年干部的引进和发展不够，都到了不可容许的地步。党对于青年团的帮助与督促万分不够，最近复因行委的组织，造成了取消团的独立组织的错误。团的青年工作，遂陷于一时的停顿。这样，团内特别是党内一切取消团的倾向更特别发展。扩大的三中全会除去纠正这一党团合并的错误外，并应认清青年团是非党的青年群众的共产主义的组织，它在党的政治领导之下实施青年运动路线，它将党的政治口号运用到青年工作上去，同时它并保有自己的独立组织和工作系统。党应坚决的帮助和督促团执行工作上的转变，反对对于团的取消倾向和只是消极的批评。同时，青年团内要同样的加紧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反对右倾的主要危险，加紧反对障碍青年团向着实际青年群众工作转变的"左倾"清谈和关门主义，消灭"第二党倾向"的残余等等。团固应不断的供给党以新的干部，但党从团的组织中抽调兼党团员必须在不妨碍目前团的紧急工作与发展为限，党尤应坚决与团之兼党青年干部不安心做团的工作的情绪斗争，以巩固团的领导，在支部中党对于团的帮助尤关重要。

女工农妇在革命斗争中之地位的重要已成无可争辩的事实，目前中心问题便是要怎样建立这一工作到全国去，到工会中去，到妇女群众中去，这先决条件要从支部中，下层工农会中都注意妇女运动与建立妇女工作做起，各级党部与工农会的妇女要有它自己的工作，下层女工农妇会议要常召开，要建立妇女通讯员，并要注意到工农家庭中的妇女工作。各级党部要有方法的训练女干部，要给他们以参加实际工作的机会，要在每一斗争中，每一组织中检查妇女工作之实施与否的程度，要反对对妇女工作的取消倾向。

十二、群众组织与党团工作

为了准备力量以进行决战，尤其为取得胜利，不仅需要一个共产党员的组织，而且需要更广大的有组织的非党工人的核心组织。革命斗争的迅速发展，需要中共应用新的方法以更快的速度，用更大的努力来扩大与巩固各种方式的工人群众组织和巩固党对于这种组织的领导。这首先便是赤色工会在整个产业中的建立和发展。依据上海的经验，党内在大产业城市建立产业委员会（部分的职工运动委员会的作用），以推动阶级的产业工会能自下而上的建立起来，这在目前十分必要。但党的"产委"绝对不能代替工会，绝不能妨碍上级工会建立产业工会或其分会之直接指挥系统与日常工作，因"产委"本身只是一种党内工作委员会的性质，它既不能直接指挥工会，也不能指挥党的支部，它只可以推动着各支部去告诉他们怎样去筹备与建立产业工会的分会与总会。当着产业工会及各厂分会正式成立以后，"产委"便应取消，过去有将"产委"解释成行委的，也甚不妥。且工会一经成立，即应建立起他的直接指挥系统与工作范围。尤其是党的支部在赤色工会分会中的党团作用，赤色工会下层基础的扩大，吸引非党工人到工会委员会中工作，防止工会职业家的流弊，尽可能的实行工会内的民主化，一切党的策略和决定必须经过党团活动，经过工会委员会通过才能在工会中执行，以建立独立的工会群众路线；这些，都成为建立赤色工会之组织上的中心问题。同时党团工作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

在下层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党应运用各种群众选举的斗争委员会工厂委员会的组织以动员和团结广大群众。赤色工会除了保存自己的秘密组织基础外，应加强各种形式的公开活动，

上海历次示威的宝贵经验值得我们注意。但同时也要认识历次示威都因厂内发动群众的工作薄弱，致动员群众极不宽广，有时复因示威次数太多，致群众感觉疲倦，这需要中央乃至各级党部予以严重的注意和纠正。斗争委员会工厂委员会是要从工人群众某一斗争罢工中或其日常生活中建立起来的。全厂工人组织，党和赤色工会，应采用各种不同的工作方式建立起自己的领导。

此外，工人纠察队，赤色先锋队（它是偏于军事系统的组织）等组织，都是工人武装自卫以至巷战的直接参加者。但切忌把目前活动的工作与当前的斗争搁置起来，专拟一些空的计划静等武装暴动的到来。

在敌人统治区域的农村中，群众组织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农民委员会，要使他为最近要求的日常斗争扩展到为深入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一切城市下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组织，也都应严格的使之环绕在党及赤色工会领导的周围。且这些组织于团体会员之外，还要注意于发展个人会员，以加强其独立工作能力。

党在中国境内少数民族中的工作，应如国际的指示加紧在他们中间的组织活动与反抗军阀、地主、土司、王公斗争的领导。在有少数民族区域的省委，应组织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以管理此事。

十三、宣传鼓动工作

党必须扩大对工农和城市贫民新阶层的鼓动，中共过去鼓动的工作，只限于接近党的工人的狭隘的阶层中，几乎完全没有传达到工人阶级的落后阶层中。党还没有学会在应有的范围中去利用一切可能和公开可能，传达共产党的精神和口号到群众中去，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联系还没有运用得好。共产党员在黄色工会中夺取群众的工作做得还很弱——尽管群众不满意黄色工会及其领袖，但也不立刻便倾向我们。从鼓动群众斗争，罢工直到示威，这中间须经过很艰苦的了解群众生活，了解群众心理及其注意力，了解群众斗争情绪等工作，须经过极艰苦的厂内工作，须发动起成千成万群众对政治的热忱和反抗的决心，这样，才能依据群众的力量冲破警察的罗网，这样，才能实行领导群众夺取街道，掀起广大的示威。所以每个党员每个赤色工会会员之日常有系统的宣传鼓动工作，分配党及工会的报纸宣传品给群众看的工作，是取得和准备群众力量之必要的链环。党在这里，首先便要建立起宣传鼓动工作之全国系统，在地方党部尤其是支部中要训练出宣传鼓动的干部，以推动和领导这一工作，同时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通俗教育也须极力使之深入到支部中去，到群众中去。

十四、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工作

扩大的三中全会完全同意国际对苏维埃区域的组织问题之全部指示。苏维埃区域一切组织问题的中心都须适合于正在向前开展着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国民党军阀的革命斗争的需要，且要使这一斗争的胜利与全中国的工农斗争联系起来，以便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阀统治而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的制度。这便是正在开始进行着的革命的国内战争的特点，因此，更首先需要党在苏维埃区域中实行更集中的组织与军事纪律。要使每个党员对于革命，对于一切组织行动负严格的责任，尤其要严厉的反对党员中有官僚主义腐化堕落或比一般群众处在

特别优遇的地位的状态。当然军事纪律绝对不能解释成为没有教育意义而用武力威吓的恐怖办法。使党员屈服于武力之下，这是国民党的办法。无产阶级的党要教育同志自觉的服从革命的利益与铁的纪律，要用群众的斗争力量克服同志间的错误。要对于不可挽救的党员，无情的在群众中公开宣布其罪状而肃清他们。党在苏维埃区域要反对农民群众中散乱无组织的倾向反映到党里来，并且党还应教育和领导群众，使他们能逐渐习惯于无产阶级的原则，习惯于苏维埃政权的使用，以加强革命的组织力。

为使中央的领导在苏维埃区域建立巩固的威信，党必须坚强自己的各级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应训令苏区中央局及各特委执行自上而下的极严厉的工作检查。凡各级指导机关存在有官僚主义分子、腐化分子或甚至有被富农地主分子占据的，或有下层党部被宗法观念所包围，整家整族的介绍同志，并成立家庭支部，以致彼此对峙，甚至造成宗族的械斗局面的——上级党部都必须予以彻底的改组和肃清。各级党部必须选拔在群众中最有威信的积极分子，必须吸引工人干部参加指导机关，这要成为改造各级党部的基本条件。

党在苏维埃区域已成为公开的政权的党，但绝不能因此便减弱他的秘密组织基础之建立的需要，党对苏维埃政权机关和群众团体的领导，只有经过党团的活动才能见诸施行，各级党团的领导者，应以党中最得力的同志充当，但党团必须绝对服从各该级党部的指挥。许多苏维埃区域现在尚存在着党与政权混合不分，党委员会书记有直接命令政府机关的现象，亦必须坚决肃清。在红军游击赤卫队中，党的威信应提到最高度，要使全体武装群众对中共有绝对的信仰。这一任务的实现，首先要决定于党在红军游击队赤卫队中的组织力量，政治委员的领导力，与政治工作的成绩，同时武装群众中的雇农与贫农成份的加重，尤其是主要干部之工人化，也居于决定这一问题的主要地位。

苏维埃区域中徵收党员时，要实行与正式党员有真正区别的候补期，要对新党员施行必要的共产主义的训练。在一切行动上必须使群众感觉到共产党与群众组织的不同，的确是群众革命斗争的唯一领导，加入共产党绝不是随随便便的事，而是有严重责任有异常需要有光荣的一件事。

苏维埃区域除以组织赤色工会（苦力手工工人及产业工人），雇农工会为主要任务之外，党必须依照国际指示进行其贫农团的组织，它的性质是社会团体，它的成份是包含贫农雇农乃至苦力（雇农苦力要以小组加入从中起领导作用），它的作用是要用以与乡村富农成份对立起来，以便进行并加紧反富农的斗争，但它绝对不包含丝毫反中农的倾向。相反的，它应吸引中农在它的周围，推选中农积极分子到政权机关中去，到各种委员会中去参加苏维埃的一切设施。在这里，党还须反对以杀尽富农或经济上消灭富农的“左”倾幼稚政策的危险代替与富农斗争，从政治中排斥富农的正确办法。

在农民群众中进行合作社运动以及文化教育工作，发展合作社以及各种文化团体的组织，在目前苏维埃区域都是必要的，但要防止和平建设的倾向与农民群众中保守观念的发展。

为要坚决的执行国际所指示的两方面的政治任务，目前在全国举行拥护苏维埃政权与准备全国苏维埃大会的运动，更成为异常紧急的工作。党不仅在苏维埃区域要进行自下而上的各级苏维埃的改选，要吸引最广泛的群众参加这一政权的建立，党更应在敌人统治的区域，使这一苏维埃运动深入到工厂中、农村中、兵营中去，与工厂委员会、农民委员会、兵士委员会等群众组织密接起来，要在群众中做到公开的推选代表派遣到苏维埃区域去参与全国中央临时政权的建立，以推广拥护苏维埃政权的运动，扩大为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的斗争。

十五、巩固党内斗争的战线

最后，党在两条战线，尤其是反右倾的斗争上，必须从组织上巩固自己的阶级路线。过去中央在反对党内无原则的斗争上，尤其在反对取消派和右倾的斗争上已表现党在思想上的坚定性，已经领导全党开始走上布尔塞维克的道路。现在随着革命斗争的发展，党内又开始着取消派暗探的活动，右倾和“左”倾之不断发生，调和倾向之存在，这都需要党与之作无情的斗争和坚决的肃清工作。且这一党内反倾向斗争必须以思想上的斗争作骨干，而联系到组织上的制裁，必须深入到支部中去，深入到全国党的组织中去，深入到群众中去。不如此，即使表面上某些个别犯倾向错误的分子受到组织上的制裁，但一切不正确倾向仍会在党内发展的。

为要从组织上巩固自己的斗争战线，党必须反对一切小组织倾向，派别观念，无原则斗争，极端民主化，政治思想绝对自由等等不正确观念；这一切，与布尔塞维克的党内斗争原则没有丝毫共同之点。相反的，它只是破坏党的一致与铁的纪律之小资产阶级的企图。党必须加紧党内关于组织观念的训练，并在巩固布尔塞维克的组织原则下来实行自我批评，来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尤其是反右倾调和派的斗争。这样，党才能日益巩固起来，日益布尔塞维克化起来，以争取革命的胜利。

三中全会职工运动议决案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扩大的
全体会议通过，一九三〇年九月——

(一)工人斗争的形势和共产党的工作

一、现在工人运动的特点

最近一年来，因为国内政治经济的总危机，进到了更高的阶段，工人群众的生活受着更残酷的剥削和极端白色恐怖的压迫，所以“罢工斗争日益高涨，这斗争的性质和程度都更加提高”。最显著的事实，就是重要城市的工人群众，在最严重的白色恐怖镇压之下，却发展着广大群众的罢工运动，时常和警察巡捕军队发生武装的冲突（上海水电罢工，纱厂罢工，丝厂总罢工，最近青岛人力车罢工等等)。虽然这些罢工运动，还没有更大的规模的巨大的力量，还不足以去直接袭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整个统治，可是，斗争的剧烈化和日益高涨，已经是明显的事实，现在工人斗争的特点是：(1)斗争的发展范围和规模还没有充分的伟大，经济斗争还是散漫的和不相配合的现象，可是经济斗争剧烈的形势却一天天的利害起来；(2)虽然还没有坚强而巨大的政治罢工，然而多种斗争之中的政治性质正在增高起来；(3)一般工人群众的政治觉悟的确日益提高，先进的工人更日益表现对于推翻国民党和武装暴动必要的认识，但是一般斗争之中党和赤色工会的组织作用和领导作用还不充分，特别是在工厂作坊中的组织还很薄弱，并且缺乏对于斗争的准备与领导；总之，群众对于暴动的决心，尤其是群众之中的组织力量还没有十分坚强起来。城市工人斗争的力量，一般的说来，还没有和农民战争的力量互相汇合和平衡。

二、赤色工会的进步和弱点

赤色工会运动，自从党的二中全会之后，得到了相当的进步和发展：(1)更加积极的参加，并且领导群众的经济斗争，把经济斗争转变到政治斗争转变到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斗争，——总之，对于这种方针，能够积极的努力；(2)最重要的产业（铁路、矿工、海员等)，和最重要的城市（上海、香港等）里面的工会工作有相当的发展；苏维埃区域的赤色工会相当的建立，赤色工会组织的扩大（从三万会员增加到十万以上的会员）产业工会的开始建立（铁路，上海等)；(3)党和赤色工会的政治影响日益扩大。可是，党和赤色工会的发展和实际工作，还是落在群众积极性之后，表现很多的弱点和缺点：(1)赤色工会组织直到现在还是薄弱和散漫，并且是极不稳定的流动状态，重要产业工人之中，和重要城市之中赤色工会的组织尚且还是极其弱小，特别是在重要产业里没有建立起真正稳定的基于工厂作坊里面的和群众有

联系的组织，没有加重工厂作坊中组织工作，尤其对于童女工及失业工人组织工作；(2)对于群众斗争的领导，还不能有系统的准备和动员，大多数的罢工斗争和冲突，仍然是群众自发的，不能充分的注意罢工的准备与领导，因此不能把各种产业工人的散漫的斗争配合起来，并且有些是停滞而不能扩大，对于动员成千成万的失业斗争以及与在业斗争联系工作极不充分；(3)在黄色工会之中也缺乏有系统的坚定工作，特别在罢工之中和反对国民党黄色工会的斗争之中都表现了不坚定性；(4)对于罢工运动之中策略的运用，表现许多机械的工作方式，尤其表示“没有充分的技能去实行下层的统一战线”，许多罢工计划都表现与工人群众的联系薄弱；(5)对于苏维埃区域赤色工会运动注意得太少，特别是对于城市工人斗争和乡村农民战争之间的联系，缺乏实际的工作。这些缺点和弱点，在全国革命之中，在争取广大工人群众准备武装暴动的总任务之上，在汇合工人斗争和农民战争，加强无产阶级领导，为着苏维埃政权的总斗争之上，都是很大的妨碍。

三、职工运动之中党的策略上的错误

党对于职工运动的路线，从二中全会到现在，一般的说来，是正确的；政治局曾经迅速的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更明确的确定赤色工会独立领导工人斗争的路线，可是，最近政治局策略上的错误，不能不反映到职工运动上来：(一)组织政治罢工之中，对于经济斗争的注意减轻，没有把政治的和经济的要求充分的联系起来，去领导和组织广大的群众；(二)偏重工人武装的技术上的组织和训练，没有充分注意把武装训练工人的任务和领导群众日常斗争的任务联系起来，而且和赤色工会的发展隔离起来；(三)尤其是各级“总行委”的组织方式和运用的错误，事实上代替了赤色工会的领导机关，妨碍了工会群众组织的独立指导系统。使工会的领导机关（例如全总和上海工联）和工厂里面的工会组织以及群众斗争不能密切，工会领导机关的行动和工作停顿起来，这样，自然是削弱了赤色工会的整个组织的活动，这对于真正争取广大群众来积极准备暴动的任务，是最大的危险和障碍。而“左倾”的空喊暴动，说“工人只要暴动，不要罢工和示威”，这种观念，事实上只是引导到对于群众日常斗争的机会主义的消极态度，而且是加强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本次会议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委正确的指示，坚决纠正这种危险和错误，而要求执行必要的转变，同时，严重的指出：这一转变固然是要坚决反对空喊暴动而不艰苦的争取群众的倾向，可是，这亦就是要对于目前最主要的危险——黄色倾向尾巴主义的机会主义路线，做更加坚决的斗争。

(二)共产党现在对于职工运动的中心任务

四、发展赤色工会领导经济战斗和组织政治罢工

中国现在的形势是：从工农群众部分的革命行动进到革命的总进攻的过渡时机。因此，共产党在职工运动里的中心任务，就是：(一)在坚决的独立领导群众斗争的过程之中，去努力巩固和扩大赤色工会的组织——特别要在全国重要产业工人之中（铁路，矿山，海员，兵工厂，纺织业等）和在重要城市之中（上海，香港，武汉，天津，满洲等)，发展和建立最重要的产业工会组织；(二)在准备总同盟罢工的方针之下，去加紧组织政治罢工，——因此，必须努力加强对于群众日常部分的经济和政治斗争的领导，扩大罢工运动，以发展各业的同盟罢

工，并且发动更广大的政治斗争，联系经济和政治的要求，这样去组织伟大的政治罢工。这是目前最中心的战略。同样，要加紧对于苏维埃区域赤色工会运动的领导和发展，要使工人斗争和农民战争更迅速的汇合起来，要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而巩固发展为着苏维埃政权胜利的总斗争。

五、两条战线的斗争

职工运动之中，必须实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同样加紧反对“左倾”和“右倾”的斗争，而右倾是目前主要的危险，尤其要集中火力来反对。关于政治罢工的问题，“左倾”的错误是——认为每一个总同盟罢工，“必然紧接着就是武装暴动”，这种机械的断定，客观上引导到“罢工和暴动没有区别”的观念。反而形成放弃组织罢工而等待暴动的现象。再则，把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机械的分别对立起来，这亦是很大的错误；因为这种错误，可以引导到只用政治口号而忽略经济要求的号召罢工。其实，总同盟罢工转变到武装暴动的可能，必须党和赤色工会用自己的组织力量去努力争取，方能够得到胜利的实现，而总同盟罢工和政治罢工发展的“必要的前提，正是要能够运用正确的方式，去领导一切日常的部分的经济政治斗争”；没有这个前提，就只能取得少数先进工人的同情，而不能引起最广大的落后的群众来积极参加斗争。关于政治罢工的问题，右倾的错误是——机会主义的消极态度，尾巴主义的落后行动，自己不能积极的独立的去发动和领导群众斗争，不能抓住广泛的自发斗争，不能认识现在中国工人经济斗争之中，特别包含着严重的政治成份，因此，也就不能适当的领导赤色工会去提出政治口号，反而认为现在应当只做经济斗争，不应提出组织政治罢工的任务，并且认为总同盟罢工是遥遥无期的次要的问题。现在，中国全党范围之中，这种右倾机会还是最主要的严重危险。现在事实上关于组织政治罢工问题的错误和缺点，的确是：（1）没有更充分的，从领导群众日常部分的政治经济斗争的基础上去组织政治罢工；（2）没有把政治口号和政治罢工的方针，深入到广大群众之中去，很实际的把这种口号和方针联系到群众日常的部分要求——直到最落后的群众要求，——来发动群众领导群众到伟大的政治斗争；（3）尤其普遍的是，没有在群众经济斗争的领导之中，正确的抓住斗争的政治实质，来动员群众而转变到政治罢工。

党的任务是——反对“左倾”和右倾的对于政治罢工的观点，尤其是要加紧反对尾巴主义的落后行动。这就是要努力使政治罢工的口号深入到群众之中去，联系着一般工人群众最切身最实际的要求，去在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混战等口号之下，发动并且组织政治罢工。同时，也要加强注意：要从积极领导群众日常的部分的经济政治斗争，来发展和联系为着全国苏维埃政权的总斗争，来准备几个最中心城市的地方总同盟罢工和全国总同盟罢工，以至于武装暴动。

（三）赤色工会的总任务和组织原则

六、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和赤色工会

赤色工会的总任务是：——加紧发动和领导广大群众的斗争，组织工人阶级的力量，加强反对军阀国民党帝国主义的斗争，拥护苏维埃和红军，以及反对军阀混战和赞助革命战争。因此，必须由每一日常的部分的政治经济要求和斗争联系到为苏维埃政权斗争的总口号，必

须在坚定的组织政治罢工准备总同盟罢工的方针之下，去领导并且组织群众的日常部分斗争。目前，尤其要加紧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宣传和组织工作。要有系统的鼓动群众组织群众，起来实际行动——示威罢工等等，去赞助红军的胜利，反抗并且阻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进攻苏维埃区域和红军（实行调动工人群众去破坏交通和运输，鼓动军阀军队里的兵士群众）同时，实行帮助苏维埃和红军的行动……在各业各地工人之中组织代表团到苏维埃区域参观等。赤色工会要在这些斗争之中，密切的联系着群众的部分斗争和要求，日益组织更加广大的工人群众，领导他们为着苏维埃政权的全国胜利而斗争，更加使工人群众武装暴动的决心坚决起来。

七、赤色工会组织的扩大和工会生活的建立

赤色工会组织的扩大和巩固，是目前职工运动之中最主要的基本任务——就是组织工人阶级力量，去迎接将要到来的决定胜负的战斗。扩大赤色工会的工作，必须在领导群众斗争的过程之中去进行，必须在反对黄色工会和独立领导罢工的斗争之中去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这里的任务，首先就是建立工会的下层组织和群众基础——要深入到工厂作坊里面，使每一个赤色工会，都有真实的工厂里面的会员。这就是说：在斗争过程之中去发展工会。必须消灭现在的流动而不稳定的现象，而切实的建筑群众里的基础。这样，同时也就使反对黄色工会斗争里，赤色工会的影响和领导，真正得到组织上的巩固。

至于巩固赤色工会的工作，那么，首先就是工会生活的建立，赤色工会组织的扩大之中，必须：(一)工会和工会会员有更加实际和密切的联系——缴纳会费，定期开会，讨论日常斗争的领导，这样，去消灭群众之中那种"除某时斗争之外，可以不需要工会组织"的观念；(二)切实运用工会的组织作用，去和群众斗争密切联系，这就是说，每次斗争之中，工会要有组织的讨论决定进行斗争之中的每一步骤，而且都要会员群众来参加；(三)切实执行白色恐怖之下可能的工会民主主义（职员的选举，问题的集体讨论）实现并且加强集体的指导，消灭一两个共产党员或工会职员包办一切的现象；(四)工会组织——各业工会从下而上从上而下的各级执委，要有独立的工作系统的组织路线，尤其要提倡下层组织，工厂作坊里面的工会组织，以至各个会员，对于工会的建议能力，发展他们的积极性和独立的活动能力，——要消灭命令主义委派制度的残余。这样来建立经常的独立的工会生活，才能真正在扩大之中巩固赤色工会。在这种工会生活的群众化的基础之上，才能扩大而巩固的建立产业工会——把重要的全国各业的产业工人组织合并起来，同样，把各大城市所有的各业各厂零星组织联合起来，成立各业的全国产业工会（铁总等），各地每业的产业工会，以及各城市的总工联会。"如果不是这样，那末，对于经济斗争和各业的同盟罢工的切实领导，对于政治罢工的组织，对于总同盟罢工的真实准备，以及一般工人政治斗争的发动，都会感受到极端的困难"。

八、党与赤色工会的关系和群众组织的路线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组织，他要巩固并且扩大自己和广大工人群众的密切联系，——尤其是在现时的中国，——就只有更加充分利用工会组织的系统，经过各工会去组织极广大的工人群众，工会应当有他自己的组织上的独立；赤色工会应当在党的政治影响和领导之下，可是，他不可以和党混合为一，(也不能为任何行动委员会所代替）因为这样，就使工会的组织狭小起来，丧失他组织广大群众的作用。因此，党现在要更加加紧消灭党和工会混

合的某些现象，而努力帮助工会组织的独立和工会路线的建立。——从中华全国总工会直到某工厂委员会的独立的组织系统和工作路线的建立。

党对于工会的领导，必须经过党团去实现。经过工厂支部去实现。要坚决纠正“党包办工会”和“党团代替工会执行机关”的现象。要充分吸引无党的工会会员，来做工会的干部，来参加工会各级指导机关，——这是彻底消灭“党包办工会”的基本办法。

同时，为着加紧发展赤色工会运动和彻底执行工作上的转变起见，党必须有系统的有计划的有耐心的在工厂之中，注意斗争过程里新的工会干部的培养和训练。党分配到工会里去工作的工会干部，不应当随便改变工作，而且要用党的最好干部，来担负工会的职任。

最近党的各级职工委员会之中，分配最好的干部临时组织专管各产业的小委员会（所谓“产委”），去专心帮助各产业工会的建立，——这种方法，的确有了很大的作用。然而这种党部之下的小委员会，或者工会上级机关的小委员会，只是临时的工作委员会，他们绝对不能代替工会的本身，所以只能在开始建立和发展某业产业工会组织的时候适用。等到产业工会的基础和群众工作发展起来之后，这种“产委”就必须取消。党到这种时候，就应当组织各该产业工会里的强固的党团，来实现自己的领导；而在组织路线上，应当帮助各该产业工会建立自己独立的工作和组织系统。

(四)实行下层统一战线

九、反对黄色工会的斗争

赤色工会要执行这些严重的任务，就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去坚决的加强反对黄色工会国民党等的斗争。党对于反黄色工会斗争和黄色工会内部的工作，已经改正过去的错误而得到相当的进步和成绩；可是党内还存留着两种不正确的倾向：(一)认为黄色工会已经完全法西斯蒂化，绝对不能欺骗群众，于是放弃反黄色工会的斗争，走到狭隘的赤色工会关门主义的道路；(二)对于黄色工会斗争不坚定的机会主义路线，只反对领袖而不反对黄色工会和国民党，不敢拿公开的赤色工会纲领去独立领导斗争，而隐藏在黄色工会组织的形式之下，完全变成国民党的俘虏——这是最严重的黄色倾向。这两种不正确的倾向，都妨碍党和赤色工会独立领导和争取广大群众任务的执行，必须坚决的肃清这些倾向和实际行动。

党应当在黄色工会内部采取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工作方针，对于一切欺骗工人群众钳制工人运动的派别和分子，都要这样。现在国民党黄色工会虽然更加法西斯蒂化，更加成为政府机关的一部分，执行警察和资本家代理人的作用，可是，他们还靠着白色恐怖的威吓和资本家协作的关系，维持他们形式上的存在和压迫群众的作用。广大的群众，虽然认识黄色工会不是工人自己的工会，可是，还只有消极的表示不满，多数群众还没有组织起来公开脱离黄色工会，就是潮流一样的来加入赤色工会而受赤色工会的领导。这里，正需要党和赤色工会独立的去领导群众斗争，加强赤色工会在反对黄色工会斗争之中的组织作用。这就是说：党和赤色工会，不但要能够领导黄色工会内部的先进分子，做反对黄色工会的斗争，而且要特别注意一般群众以至最落后的群众的动员，使他们都积极起来参加反对国民党黄色工会的斗争……以至于消灭黄色工会。因此，目前最中心的策略问题，就是实行下层群众的统一战线，这不仅在黄色工会之内争取下层群众而且在无组织的工人群众之中，也是十分重要的策略。

执行下层群众的统一战线，当然，绝对不是放弃党和赤色工会的纲领，不是放弃独立领导，而去和黄色工会的首领实现联合战线。恰恰相反，正是为着白色恐怖之下，大多数无党的群众，以及非赤色工会会员的群众，还不敢公开赞成党和赤色工会的主张的关系，所以必须由党和赤色工会，提出最适当的斗争口号，最切近于广大群众的实际要求，并且把这些口号和要求联系着中国革命的总口号，独立的领导群众的斗争和行动，这样去实现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赤色会员和非赤色会员之间的下层群众的统一战线，使先进工人能够把广大的以至于最落后的群众团结于自己的周围，争取青年工人和童工女工，以及一切劳动群众，来在党和赤色工会纲领之下，反对黄色工会及其领袖，打破群众之中的帮口观念和帮口组织——这样，在斗争过程之中，罢工运动的发展之中，一直达到消灭黄色工会。

改良主义的基础，在中国虽然非常狭小，可是，民族改良主义在群众之中还有影响。工人运动之中，必须加紧反对一切种种改良主义的斗争，反对国民党改组派，反对邓演达派，特别要反对工人阶级叛徒的陈独秀托洛斯基派，揭露他们反革命的真面目。过去反对黄色工会以及这些派别的斗争，还不充分，必须格外的加强。

十、工厂委员会运动和斗争委员会等的组织方式

实行下层统一战线，以争取广大群众的任务，现在使工厂委员会（作坊委员会，船只委员会，车站委员会，矿、坑委员会等）的运动更加成为最中心的问题了。工厂委员会是团结工厂内先进工人以至最落后的工人，领导他们一致行动的最根本的组织方式。赤色工会在工厂之中要努力成为工厂委员会运动的中坚；同时，工厂委员会的建立和发展之中，正可以扩大赤色工会的组织，而且巩固赤色工会的工会生活。从六次大会二中全会决定工厂委员会运动的方针之后，直到现在，全党对于这个问题，注意得太不充分，实际工作上差不多有忽视这一工作的现象（上海只有部分的很少的经验）；本次扩大的三中全会，特别号召全党严厉的纠正过去这一缺点；赤色工会和党的工厂支部，都要用最大的努力来发展工厂委员会。

党和赤色工会还要会用各种辅助组织——俱乐部等来团结群众在自己的周围。尤其要会运用临时的组织方式，例如斗争委员会，罢工委员会，行动委员会等。这种斗争委员会是临时领导斗争的组织，如反对罚钱，反对加工，要求增资，反对关厂等等；罢工前后就是罢工委员会；这些组织要尽可能的转变到经常的工厂委员会。为着领导规模广大的斗争，更可以组织行动委员会，统一各种群众组织，在一致的动员之下来行动，以加强工人阶级对于其他劳动群众的领导作用。

（五）赤色工会的组织问题

十一、发展和巩固赤色工会的重要产业和中心城市

赤色工会的发展和巩固，在下层统一战线争取广大群众的任务和组织政治罢工准备总同盟的方针之下，首先要集中力量，注意：(一)重要产业里的发展，最主要是——矿工，铁路，海员，兵工厂等；(二)重要城市的市政，纱厂，丝厂，印刷，铁厂（五金），码头……以及他们的联合；主要的城市是——上海，香港，广州，武汉，天津，青岛，大连，哈尔滨等。同样，要注意到反动统治区域的农村工人（雇农苦力等）。

十二、失业工人运动

中国现时总的经济危机之中，失业工人运动愈加严重了，工厂停闭和大批开除工人，使失业问题成为失业工人和在业工人共同的斗争。过去党和赤色工会没有把这个运动认为目前最中心的工作之一，仅仅做了某些工厂倒闭时候的临时斗争的领导，这是非常错误的。对于失业工人，必须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去领导他们的斗争，建立他们的组织；领导他们去进行“要工作，要工资，要饭吃，要政府和资本家实行经常的失业救济和失业保险”的运动，举行示威游行，包围工厂和政府机关等的行动。但是失业工人的斗争必须与在业工人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要求减少在业工人的工作而加增工资，反对开除裁减工人，反对加重工作和减少工资等斗争，可以和失业工人要求工作……赞助在业工人罢工的运动联系起来。失业工人的组织，也必须同时各自参加各业的赤色工会。而且要训练失业工人之中的积极分子，使他们成为工会的新的干部。

失业工人的斗争，必须联系到一般的政治斗争——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因此，失业工人运动之中，同样要加紧关于苏维埃和红军的宣传。要号召失业工人加入红军。要由赤色工会选派积极工人以及失业工人的最好分子到红军中去，充当红军干部或者帮助苏维埃政府工作——以坚强无产阶级对于苏维埃区域红军的领导。

十三、女工运动和青年工人运动

党对于女工青年工人之中的工作，虽然历次会议和决议之中都有正确的决定，但在实际工作的检查之中，发现很严重的取消青年工人女工运动的倾向（不积极争取女工青年工人加入工会，对于女工青年工人的特殊斗争不去领导，以及工会之中这两种工作只有形式上的机关，尤其是忽视在纺织业中这种工作等等）。现在必须切实的反对这种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这是发展青年工人女工运动的前提。

现在资本家加紧的剥削和进攻，——生产合理化等等的压迫之下，更加增加了青年工人女工在产业之中的重要和他们斗争的积极性，这是在争取广大群众的时候，绝对不容许党和工会再有丝毫忽视的。必须动员全党和赤色工会的组织，来争取青年工人女工加入工会，要加紧领导他们的特殊斗争。党和赤色工会要把这种工作认为自己的中心工作之一。

为着加强青年工人女工的工作，必须不但设立青年工人部女工部，而且要党和赤色工会的整个组织，直到工厂支部，都切实注意起来；要努力培养工厂之中的青年工人女工干部，吸引他们实际参加各级工会的指导机关。

赤色工会里的青年工人部，要实行他的作用，必须由下而上的建立起来，必须纠正过去只有上层机关的错误。要使青年工人部和女工部切实执行青工女工的一切工作，领导青年工人代表会，女工代表会的运动；青工部还要建立和发展劳动童子团的组织和工作。同时，在黄色工会内及无组织的青年工人女工群众之中，也要努力进行女工代表会和青年工人代表会的运动。这种代表会必须经过广大群众选举，建立经常固定的工作，来团结青年工人女工的群众，使他们围绕赤色工会而成为斗争的组织。

十四、工人的武装组织和训练

现在群众斗争的发展之中，应当同时经过工会，去加紧工人武装组织和训练的工作——

工人武装自卫团体的编制和演习（纠察队，赤色先锋队和少年先锋队等）；应当实行军事的编制训练和政治教育以及武装的练习。必须防止脱离斗争而单纯的机械的进行武装组织和训练；必须使这些训练和组织，更密切的和群众日常斗争联系起来，而且要建立在厂内活动的基础之上：例如保护示威，保护罢工工人，保护青工女工斗争，保护赤色工会组织和会议等等。这样，才能更加帮助赤色工会的扩大和发展，以及真实的准备暴动。

十五、工会的鼓动工作和鼓动组织

赤色工会必须建立经常的有系统的独立的宣传鼓动工作，利用每一次大小的斗争，宣传赤色工会的纲领，——不论这种斗争是在黄色工会钳制之下或是无组织工人的自发斗争。从全总直到最下层的工会组织，都应当有经常的定期刊物，直到墙报和工厂小报，而且这种最接近群众的出版品，却是最重要的。赤色工会，特别是下级工会和工厂支部，要建立宣传鼓动的组织，要训练鼓动的干部——宣传队，读报团，演讲会，工厂小报或墙报的编辑委员会，工人通信员协会，红旗读者会等等。要吸引无党的工人，以及非赤色工会会员来参加这些组织。

十六、赤色工会的公开和秘密工作

赤色工会运动，在严厉残酷的白色恐怖统治之下，常常是处于极端秘密的地位，因此，赤色工会争取公开的活动和秘密工作的方式，需要极切实极灵敏的联系，赤色工会，甚至工厂委员会，为着争取公开活动起见，可以运用各种灰色的名义，发展自己的工作，而且同时要争取公开活动。至于反动统治动摇削弱到某种程度的时候，要求赤色工会整个组织自动的公开出来，以领导广大群众的直接行动；这种时候，赤色工会尤其要注意公开活动之中，保存秘密工作的组织和基础。这种工作方式上的组织问题，特别“须要一方面有很大的敏捷能力和适应能力，别方面，还要党和工会支部有极坚定的原则和策略路线”。

（六）苏维埃区域的赤色工会运动

十七、苏维埃区域工会运动的重要

苏维埃区域里的工会运动，“完全是一个新的问题”，现在建立苏维埃的根据地和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巩固无产阶级对于农民战争领导的总任务之下，为着苏维埃政权在全国胜利的总斗争之下，苏维埃区域的赤色工会运动，成为最中心的问题之一。党和工会过去对于这一问题，没有充分的注意，的确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委对于这一问题的指示。

苏维埃区域赤色工会的任务是：——拥护苏维埃政府，帮助巩固苏维埃政权机关和红军，保障八小时工作制及劳动法令的实行，赞助发展土地革命斗争，及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斗争。苏维埃区域的工会和工厂委员会，要在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实行劳工监督生产的任务。同时，赤色工会要用自己领导群众斗争的力量，来实现苏维埃的劳动法，保障工人的经济利益，不应当完全依赖政府的力量去达到一切。

苏维埃区域内的工会组织，必须成为真正群众的组织，更加发展群众对于工会的积极性，

吸引广大群众来参加工会工作，实现工会的会员生活，坚决纠正机关主义的倾向。

党和全总，为着加强苏维埃区域内赤色工会运动的发展起见，应当派出大批的工会干部，到苏维埃区域去领导工会运动，应当有系统的建立当地统一集中的产业工会和手工工会的联合。中央临时政府的所在地，中华全国总工会要设立苏维埃区域的执行局，派得力的全总执行委员去主持，以统一当地工会运动的指导。

苏维埃区域的赤色工会运动，必须和反动统治区域，特别是重要产业区域的赤色工会运动，建立密切的联系。产业中心城市的赤色工会，对于苏维埃区域的赤色工会，要实行加强政治上的领导和组织上的帮助——调动自己的干部去加强苏维埃区域的工会。苏维埃区域的工会要把当地工人生活和胜利的情形，广泛的报告到反动统治区域的工会，以发展广大的宣传和鼓动，引起更加广大的群众，起来为着苏维埃政权而斗争。

十八、雇农工会问题

苏维埃区域里面，也和反动统治区域一样，要更加加紧组织独立的雇农工会。苏维埃区域之中，雇农工会应该是实现现时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和反帝国主义革命之中的领导权的重要工具之一。特别为着彻底肃清富农路线，加紧反对富农的斗争，为着争取中国革命将来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雇农工会的组织和领导斗争，更加成为一个中心问题，党和赤色工会，要加派工会干部到苏维埃区域，以及反动统治区域的乡村之中去，发展和领导雇农工会的运动。这是再也不能迟缓的了。

苏维埃区域的雇农工会，应当和贫农团建立巩固的联盟，并且争取中农群众的领导。雇农工会的独立的组织，是苏维埃政权在乡村里的支柱，必须加以严重的注意。苦力工会的运动，也是同样的重要。至于反动统治区域的雇农工会和苦力工会的会员，也要对于农民委员会起核心的作用。

中共三中全会告同志书

（一九三〇年十月）

一

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共产国际执委的指导之下，对于当前的革命任务，有更明确的规定，要求整个的党，坚决的实行策略上组织上相当的转变，去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的历史使命。现在中国群众革命斗争正在日益高涨，革命危机更加尖锐，军阀战争继续不已，农民的革命战争却在无产阶级与其政党的领导之下有了猛烈的扩大，工人群众的罢工运动亦在高涨。反革命的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表现着更加动摇；工农苏维埃政权，却日益扩大。长沙战争之后，这一形势更加明显，因此一切反革命势力更加加紧残酷的白色恐怖，拼命的挣扎，企图勉强延长自己的寿命，同时也就更加暴露他们的恐惧和削弱。这种形势，明显的证明：中国正在从工农群众部分的革命行动进到革命的总进攻的过渡时机。共产国际七月的中国问题议决案，三中全会的议决案，都明确的规定了这种时机党的任务。全党的同志，都应当深切的了解并且积极的执行这些任务。党的现在状况，使我们不能不特别加重的说明：为着执行这些任务起见，必须要更加集中巩固党的力量，动员并且训练自己的队伍，提高自己的战斗力，扫除党的领导作用反而落在客观革命斗争发展之后的现象，同时防止无产阶级先锋的党脱离广大群众的危险——因为这样方才能够真正组织革命斗争和革命队伍，去迎接最近将来的决定胜负的战斗，而领导革命到胜利的道路。

中央政治局从二中全会直到现在，完全站在和共产国际一致的路线之上，领导着全党进行革命的斗争，使中国共产党真正成为全国劳动群众的领袖，组织上思想上的发展和布尔塞维克化的斗争都有很大的成绩，尤其是肃清资产阶级的奸细——陈独秀托洛次基的取消派，强固了党增高了党的战斗力，并且继续反对盲动主义的残余，特别加强反对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危险。最近政治局在三中全会之前，以及对三中全会的报告里面，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之下，更能够公开的用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的精神，检查自己的工作，指出过去的缺点和错误，领导起全党来为着更加彻底执行中央和国际的一致路线而斗争，为着加强党的战斗力和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参看三中全会的议决案和报告)。

二

现在，我们号召全党同志和各级党部，根据这种精神，坚决的实行对于工作的检查——实行自我批评。自我批评的任务，（1）是要发见工作上各种缺点和错误，以及他们的来源，而加以坚决的迅速的纠正，所以不但要有对于错误的认识，而且要有积极的具体的提议，来

纠正这些错误。(2)必须切实的提出当地的具体问题来批评：这一省、这一县、这一支部的工作上策略上的问题，而不是仅仅限于一般原则和全国政策上的空洞的批评。(3)必须认清批评的目的，是在于研究怎样更加有力量有成效的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国党一致的路线，而决不能够动摇总的政治路线。(4)必须有布尔塞维克的公开承认错误的精神，公开认清事实的勇敢，而不应当夸大和隐瞒。

列宁说："一个政党对于自己错误的态度怎么样，这是一种最重要最可靠的标准，可以用来判断：这个政党是否认真，是否事实上能够执行对于本阶级和劳动群众的责任。公开承认错误，寻找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发生错误的环境，细心审查纠正错误的方法——这是认真的政党的标志，这是党执行自己的责任，这就是教育并且训练自己的阶级以至于群众。"

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党员和各级党部，都应当执行列宁的这个教训，很切实的依照共产国际和三中全会的议决案，执行对于自己工作的检查，而努力的积极纠正过去的错误。

三

现在中国共产党要能够正确的解决当前的新的任务，比任何时候，都要更加保障自己思想上的布尔塞维克的一致——实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反对右倾和"左倾"的机会主义，反对理论上实际上的这两个倾向，集中火力对付主要的右倾危险。

(1)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领导之下，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之下，早就已经开始反对"左"右机会主义的斗争，布尔塞维克化的斗争。如果说以前中央政治局因为"过分的"反对右倾，所以并没有实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并没有反对"左倾"——那是不对的。实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并不是要减轻些反对右倾的斗争，而是要更加加强这一个斗争，同时，加紧反对"左倾"。——"左"倾并不是更革命些，其实正是加强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的。所以说过去反对"左倾"不充分，决不是因为反对右倾过分了，恰好是说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力量还需要加强。

(2)反对各种机会主义倾向的斗争，不应当仅仅限于理论上的斗争，而且要坚决执行反对实际机会主义的斗争。甚么是实际机会主义呢?——就是表面上并没有发出理论上的机会主义见解，可是在实际工作上，结果是做了群众斗争的尾巴，降低政治口号，投降黄色工会和富农意识，阻碍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右倾)，或者，结果是脱离群众，忽略广大工人群众的经济斗争，妨害中农群众的利益而破坏无产阶级对于他们的领导……(左倾)。因此，特别要注意使两条战线的斗争深入，一直到支部的党员群众之中。支部中不正确倾向的表现，大多数往往是在实际工作上，如果只注意到反对机会主义言论的斗争，那就可以忽略各种实际工作上的错误。而且反对这种实际机会主义的时候，必须注意到：这种错误，决不是简单的提出机会主义的名词，加以咒骂，就足以纠正的，一定要耐心的去寻找错误的根源，积极的指出纠正的方法。

(3)再则必须注意：理论的实际的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都是妨碍党去解决争取广大群众的任务的。"左倾"的盲动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很明显的，不但由于指导机关过分估量客观的形势而有脱离群众的发动计划，或者，不能充分认识党在革命之中的组织作用和领导作用而忽略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而且也由一般共产党员直到支部之中，往往还不能充分

的认识：共产党员是群众的先锋和领袖，他们的任务，不仅只是自己去革命，还要领导群众去革命。共产党不能充分明了这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所以会有不信任群众的观念：认为非共产党员的工人和贫农，都是没有力量的，或者是“只要我们来了，他们都会跟着来的”。这样，自然就会不注意党和赤色工会的发展，工厂委员会运动也不能扩大，更坏的观念是认为不积极参加斗争的群众都是工贼，或者是认为党只有到了武装暴动才有出路而认为群众的日常斗争是没有出路的，这样使准备武装暴动的任务和争取群众的任务逐渐脱离起来……结果，是要走到只有共产党来替群众革命，而不是共产党领导起群众来革命的观念了。

右倾机会主义根本否认革命高涨的形势——对于军阀国民党的欺骗口号（国民会议等）抱着幻想，对于进攻红军的时局，发生悲观失败主义的情绪等等。所以右倾的尾巴主义和投降政策，就是不去争取群众到党的政治影响之下来，却是要把党往后拉，拉到落后的“群众”观点上去——实际是投降资产阶级的奸细，黄色工会和富农等，因为这是要党不去做群众的领袖，而去做群众的尾巴。右倾的个别表现，例如工会的合法主义，这是不去反对黄色工会，或者只反对黄色工会领袖的个人，而不坚决的提出反对国民党。因此，即使能够领导到群众自发的经济斗争，可是在这种方针之下，不但不能去抓住斗争的政治内容，领导群众进到政治的罢工斗争，反而是模糊政治斗争的观念。其结果，一定连经济的最小胜利也仍旧是要丧失。在农民斗争中，只是停顿在抗税抗捐的阶段，不敢发动游击战争，不敢组织地方暴动去创立新的苏维埃区域，或者在苏维埃区域采取保守割据偏安的方针，阻碍土地革命的深入，总之，是投降富农，不反对富农——不但事实上对于雇农独立工会的组织和斗争怠工，并且放任中农群众落到富农的反动影响之下去。右倾机会主义的一切表现，都是放弃争取群众，不要组织革命的一切运动，不领导群众的斗争来扩大集中为着全国苏维埃政权胜利的总斗争。

总之，要完成争取群众，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的任务，必须坚决的加紧两条战线上的斗争，集中火力对付右倾的主要危险。

四

为什么现在右倾是主要的危险呢？

并不是因为“左倾”比右倾要好些。而是因为现在的事实是这样：客观上革命运动的发展很快很激烈，可是党在革命运动之中和在群众之中的组织作用领导作用，却比较的落后。最近一年以来，党的领导群众运动，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罢工斗争，由党领导发动起来的，比较以前要更多；自发的农民骚动和兵士哗变，由党去参加而取得他们的领导，或者至少得到相当的联系的，也要比较以前更多些。可是，如果看一看全国的情形，那么很明显的，党的这些进步还是太不够了。工人的经济的战斗，还有许多是自发的，党没有能够取得领导，或者虽然领导了参加了，可是不能巩固党的影响，不能使党的政治口号深入，不能领导这些客观上带着充分的政治性质的经济战斗，使他转变成明显的政治罢工。农民群众，尤其是在北方，自发的激烈的斗争着，有许多地方的运动，的确有很大的可能可以转变到更高的阶段，可以进一步而反对以至于消灭欺骗群众利用群众的反动领导（富农等），进一步而转变到地方暴动，建立新的苏维埃区域，深入土地革命。可是，事实上还有很多运动，因为党不能去领导，或者因为领导的方法是机会主义的，因此，失掉正确的道路，仍旧被反动领袖

把持着。这种情形之下，右倾机会主义，即使是个别的表现，即使是无意的不自觉的实际工作上的表现，也是非常严重的危险。这种危险，客观上是代表统治阶级的影响，来阻碍革命运动的扩大和深入。

尤其应当注意是：陈独秀托洛次基的取消派，虽然已经肃清出党，然而他们的残余仍旧有些留在党内暗中活动。右倾机会主义不但有个别的实际工作上的表现，甚至于形成整个的路线，来反对共产国际和党的正确路线。这种形成整个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不管代表这个路线的同志，主观上是怎样想法，可是，客观上不能不也成为取消派埋伏在党里面的奸细。关于这一点，三中全会的政治议决案已经详细的指出，这里不再重复叙说。总之，代表这种路线的同志，例如江苏的何孟雄，事实上是根本否认中国革命的新的高涨，根本否认积极准备武装暴动和组织革命战争的路线。这些同志，在一九二九年八九月间，党开始反对陈独秀的取消主义的初期，他们对陈独秀主义就是采取调和的态度。现在，他们借口中央的策略上的个别错误，就说中央领导完全破产，中央路线完全错误。他们宣传这种说法，还带着鼓动无原则的个人纠纷，企图把中央政治局里的个人和整个领导机关对立起来。尤其表示他们政治上的外交手腕的，是他们企图说自己是“拥护”共产国际路线来反对中央的路线。这里，很明显的是：他们企图曲解共产国际和中国党的路线，而来进攻中央。他们事实上是反对共产国际路线的，事实上是要破坏中国的党的。他们的活动，更是显然的客观上帮助取消派帮助统治阶级，来扰乱无产阶级先锋的队伍。他们的路线是：在中国工农部分的革命行动进到革命的总进攻的过渡时机，来阻碍这个过渡，阻碍斗争的前进和深入，要使工人斗争停顿在经济的小的范围之内（反对政治罢工），根本否认农民战争的作用（说长沙战争是部落式的暴动，没有前途），投降帝国主义（说中国工农对于列强的机关枪大炮是没有办法抵御的），取消中国的和世界的革命前途（说“国际无产阶级赞助中国革命是空话”）。

这样，我们应当明白：为什么右倾是党内主要的危险了。所以全党同志，必须坚决实行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加紧反对右倾和加强右倾立场的“左倾”，集中火力对付右倾的主要危险。

五

同样，我们应当反对对于右倾或者“左倾”的调和主义。很明显的，如果放任对于右倾或者“左”倾错误的调和态度，那么就一定不能够坚决的实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不能够彻底的为着布尔塞维克的思想一致而斗争。布尔塞维克的不调和态度，主要的意义，并不是绝对不容许讨论和研究。不是的。布尔塞维克的党一定不能够容许这种命令主义的精神，而必定要增高各个同志的自动能力和建议能力，必定要有集体的领导和集体的行动。不调和态度，也不是说反对倾向的斗争纯粹只有组织上的斗争（处罚开除等）；反对倾向的斗争，必须有教育一般党员的意义，必须加紧思想上的斗争，使党员群众都能深切的了解。布尔塞维克的不调和态度的主要意义是：（一）必须坚决的为着唯一的一致的路线而斗争，反对容忍两三条路线在党内来自由讨论和自由批评——因为这样，就会把为着总路线而反对“左”右倾的斗争，变成功反对总路线的斗争，就会把为着总路线的自我批评，变成功反对总路线的自由批评；（二）必须在民权集中制的原则之下严格的执行党的纪律，这就是说，反对倾向的斗争，不能够仅仅限于思想上的斗争——解释、驳斥等等，必定要有相当的组织上的结论——对于

有倾向的同志首先要他遵守党部集体的决议去执行，违背党部的决议，就要受到相当的处分，一直到开除出党。

凡是反对这种布尔塞维克的不调和态度的调和派，事实上是暗藏的机会主义，胆小的机会主义，他们不公开的来反对党的路线，不敢明显的赞成机会主义的主张，所以站在调和主义的立场，企图缓和党对于机会主义的进攻，亦就是帮助机会主义的发展。例如江苏党部反对何孟雄的机会主义的时候，有些同志就是这种立场。自然这种同志要声明"组织上服从中央，政治见解上还要保留自己的意见"。总之，对于这种调和主义，全党的同志也一定要坚决的反对。

同样，党应当继续肃清无原则斗争，小团体小派别的纠纷的残余。这种无原则的纠纷是消耗党的力量，破坏党的队伍的（例如河南的陈原道同志等）。布尔塞维克的无产阶级的共产党，是不能容许这种现象的。小团体的无原则斗争之下，不论是进行实际工作的自我检查和自我批评，不论是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右倾主要危险的斗争，都会发生削弱和减低这种工作效能和政治斗争力量的现象：小派别的分子往往对于自己"所亲近的同志"，采取调和掩护的态度，对于自己"所嫌恶的同志"，就故意扩大事实，甚至于造谣挑拨。因此，全党同志和各级党部都必须注意：要努力和这种无原则纠纷的残余奋斗。这种现象，亦都是小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影响，表面上虽然是无原则的，实际上同样含着严重的政治意义，至少是客观上帮助机会主义以至于托洛次基取消主义的发展。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必须加以严重的打击，以至于完全肃清。

六

中央政治局号召全党坚决的切实的执行共产国际执委最近的指示和三中全会的一切决议。现在中国革命的新的高涨，已经正在走进更高的阶段，革命的爆发一天天的接近，最近的将来，就要迎接决定胜负的战斗——坚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和布尔塞维克的一致，以提高党的战斗力，是万分必要的了；必须切实的在党的总路线之下实行自我检查和自我批评，必须坚决实行反对右倾"左倾"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集中着火力反对右倾的主要危险，必须反对调和主义，反对破坏纪律，反对无原则的纠纷。只有这样，党方才能够更进一步的布尔塞维克化，方才能够指导中国几万万的劳动群众的斗争，使他们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去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中国地主资本家的政权，而完成中国苏维埃的革命。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

（一九三〇年十月）

共产国际执委会很满意地接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通知，说在伍豪同志报告之后，政治局已经取消以前的决议，而完全同意于国际执委和中国共产党中央代表团所共同拟定的决议。国际执委很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本着布尔塞维克的坚持精神和一贯精神，去实行国际执委决议案、决定以及政治指令中所包含的政治路线，这样去保证中国反帝土地革命底继续向前发展。

可是，因为在中国革命底重要历史时期内，在国际执委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几个委员（这是一方面）和政治局其他几个委员及立三同志（这是另一方面）之间，发生了最严重的意见分歧，所以我们认为，我们应该把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和政治委员会底决议案和决定发挥一下，来说一说这种意见分歧底实质。因为必须明白了解：这里的事情并不是什么偶然的意见分歧，或者什么在时局底估计和策略任务底认识方面有次要的不同意见。必须完全明白了解：在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时机，曾经有两个在原则上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彼此对立着。如果抹煞这两条路线底原则上的区别，这两条互相对抗和势不两立的政治路线底原则上的区别，那就不仅是遗害无穷，而且一定会潜伏着在将来又重复这些错误的极大危险。

立三同志底政治路线，得到党底领导机关里面个别同志底拥护。这个政治路线，究竟是什么呢？立三同志拿自己的路线来和国际执委底政治路线对立起来，他是从怎样估计时局和怎样估计力量对比出发的呢？

立三同志并不是从分析客观情况出发的，并不是从分析斗争力量底对比出发的，而这种分析，对于每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却是必须的。因此，他所犯的错误，并不只是个别的错误，而是造成了整个错误观点的系统，定下了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这个立场既然是离开具体的实际情况，离开群众，不去组织和动员群众，于是就不能不发展成为盲动主义的冒险主义的策略。但是这个立场，不过是用假冒的“左派”空谈遮盖着自己的消极性，而在实质上却是机会主义的立场，好象托洛茨基主义一样。从这种非马克思主义非列宁主义的立场，就产生这样一种理论，说中国已经有在全国范围内成熟的革命形势，并且说这样的革命形势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成熟了。在武汉、南京、上海、天津、北平、哈尔滨、广州、香港、大连等处举行武装起义，发动红军去进攻长沙、南昌、武汉，——这就是立三同志底观点。他一贯地发挥了自己的提纲，说在一省或几省内得到胜利就是表示在全中国范围内有直接武装起义的形势。他还用一个显然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提纲来补充这种著名的观点，说革命胜利底开始，革命政权建立底开始，一定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立刻直接转变成无产阶级革命的开始。

立三同志提出的政治路线，就是这样的。这条路线底错误、危险和害处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立三同志没有估计到现在中国革命高涨底最重要特点之一：国内革命运动发展底不平衡。国内工人运动底高涨、发展、水准、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是非常不一致的。用不着证明的事实，就是：一方面，在中国南部很大的领土内有苏维埃区域存在，红军正在增长，游击队战争正在汹涌发展，农民反地主的战争正在扩大，而同时在国内其他各地，农民却还只是刚才开始加入斗争。甚至于在南部的广东，在革命运动曾经很发展的广东，现在，革命运动也展开得迟慢。在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农民战争正在发展；而在浙江、四川、安徽、江苏，农民战争却还只是刚刚开始，在云南和贵州，农民战争还没有展开。在中国北部和东三省，我们在农民中间的影响还非常薄弱等等。国内各地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底原因，是由于中国底封建割据形势，是由于各个不同的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各部分各有自己的影响和政权，是由于中国各部分底经济发展不平衡。事实本身表示出来：革命运动能够在某些省份里，在某些区域里，得到胜利，而且完全胜利；而同时在国内其他的、有决定意义的部分里，却还是由反动的、血腥的反革命势力掌握着政权，立三同志底提纲，认为在一省或几省里得到胜利，就是直接表示革命形势已在全国范围内成熟，这个提纲就是要想一下子驳倒国际执委和中国共产党所已确定的一切事实，这些事实就是：在中国，存在着封建军阀割据形势，各帝国主义者已经瓜分中国，中国各地经济发展得不平衡，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

第二，立三同志提出来和国际执委底分析对立的观点，完全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这事实就是农民运动高涨底速度和规模，远远超过工人运动。工人运动，的确是在高涨着。工人斗争已经普及到最遥远最落后的地方。可是，不能不估计到：一般说来，工人运动底高涨，甚至于在有决定意义的工业中心城市里（长江流域的上海、武汉，更不用说广州、香港、大连、哈尔滨等）都要比农民运动落后些。甚至于在上海和武汉，自发的罢工斗争也发展的不快，我们的党还未能成为巨大的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底组织者和指导者。今年在上海和武汉的五月斗争和八月斗争中，参加的只是先锋队底先锋队；无产阶级组织得薄弱。在我们和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工人代表的谈话中，就能够看出：党在普遍宣传苏维埃政权口号方面的工作，还做得十分薄弱，基本工人群众还没有认识苏维埃政权就是他们自己的政权；而且，大部分基本工人群众还抱着这样一种心理，以为只有在红军跑来把蒋介石的军队打败以后，工人才能够发动起来。

第三，如果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来分析中国底情形，就应当估计到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巨大作用。正是那些最重要的工业中心点，也就是无产阶级的中心点，不但是处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底直接打击之下，而且帝国主义把这些最重要的工商业的行政的中心点，完全拿在自己的直接的经常的军事政治监督之下。让我们来看具体事实吧：当立三同志提议在武汉举行武装起义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只有两百个党员，赤色工会只有一百五十个会员。所有最近以来在武汉举行的发动，都是证明：无产阶级底组织性还很薄弱，无产阶级还没有准备。而据我们所得完全可靠的消息，帝国主义当时在武汉则拥有等于十师现代欧洲军队的势力。而且就是在上海方面，当时的情形也并不比较顺利，何况国民党的反革命派，当时也还拥有一些尚未瓦解的武装势力。如果在这种情形下面来实行武装起义，那就一定会使中国无产阶级底精华受到帝国主义底直接打击，那就一定会使那些对于将来巨大战斗有决定意义的工业中心点的工人阶级受到很大的摧残，那也就一定会使我们的运动向后退去。

中国共产党已经抱定武装起义的方针。建立苏维埃政府，这就是表示中国共产党立意在巨大的和最大的工业中心地点举行武装起义。但是在现在这个时候，即是在阶级敌人底力量占优势的时候，如果不估计具体环境，不分析现在大的工业中心点和最大的工业中心点的力量对比，而实行武装起义，这就不是列宁主义，而是盲动主义。必须竭力动员工人群众去作争取局部要求的斗争，这样来准备群众，以便及时选择最顺利时机来实行武装起义。这种路线就是对敌人实行的真正的进攻，而谁如果稍微企图把国际执委底路线看作或解释成为暂时的退却，都是最有害的右倾机会主义。

第四，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清醒地估计到中国苏维埃运动底力量和弱点。要知道，在中国还没有苏维埃政府，要是说有的话，也只是宣言上的，只是纸头上的，而不是一个实在的政权，武装起义群众底组织者和指导者。苏维埃区域还没有组织起来。苏维埃政权没有团结起来。甚至于在苏维埃领土内，土地革命还没有实行到解决最重要的任务。不但富农，甚至于小地主，也钻到苏维埃里来，钻到新的政权机关里来，钻到红军里来。富农企图收获土地革命底果实。主张按照生产工具比例来分配土地的富农口号，并没有遇到应有的回击，有些地方，提出只没收超过五十亩的地主土地的口号。有些地方还提出一种口号，主张偿还不满五十亩的地主高利贷者的债款。这种口号，只配由谭平山提出来，但和布尔塞维主义没有丝毫相同的地方。平均分配土地，这是土地革命最重要的任务，可是实行的情形很少。组织贫农的工作，甚至于还没有开始。贫农团没有建立。没有把苦力和雇农组织到工会里。苏维埃区域里的无产者，无论在数量上如何稀少，都必须组织到工会里去。我们可以说，甚至还没有开始真正地本着布尔塞维主义精神去解决这些任务。而不解决这些任务，就不能建立真正的苏维埃，就不能把中农从富农影响之下解放出来，就不能同中农建立强固的联盟。新的政权机关还没有建立起来，在许多地方，苏维埃并不是选举出来的。除掉运动底这些弱点以外，还有些过早的和错误的企图，要想建立集体农庄和苏维埃农庄，要想实行有计划的经济，实行垄断制，要想在没有军事必要的地方也去统制经济生活。第一次苏维埃代表会议通过了临时土地法，这个土地法对于许多问题解决得根本不对。只对于被没收的地主土地，才实行平均分配，这是不正确的。不分散大农场，而把它变成苏维埃农庄，这也是不对的。在现时阶段上就把分得土地的雇农联合到集体农庄里，这也是不对的。认为红军兵士只有在全国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后，才应分得土地，这也是不对的，而且十分有害的。已经颁布的苏维埃政府纲领，显然带着托洛茨基主义的精神。由我们所得到的关于这个纲领的通知当中，显然看出，苏维埃政府公然认为自己的目的和任务就是直接和立刻施行社会主义，却不去建立坚固的苏维埃政府，坚固的苏维埃政权，却不去开展和实行自己的纲领，却不去组织和巩固革命的根据地，以便联合苏维埃区域，以便巩固已得的胜利，以便实行真正贫农中农的土地革命，以便组织后方和督促后备军。立三同志对目前时局中的这些最重要的根本任务，甚至于没有提出来。

第五，我们不来详细讲立三同志对于革命底武装力量所作出的神奇古怪的过分估量（他说有五百万工人，有三千万农民，在每个城市里都有工人赤卫队，在少年先锋队里有五百万队员等等)。可是必须指出的，就是立三同志绝对不明白我们现在还没有那具有工人的指挥干部和强固的共产党骨干的真正工农红军。现在，红军底成绩很大，它的增长，它的英勇功绩，已经引起整个国际无产阶级底钦佩。可是，这个红军还薄弱，还组织得不够，还没有完全握在中国共产党手里。红军底社会成分还很不能令人满意。在许多红军队伍底兵士成分

里，以前的军阀军队兵士还占多数。富农往往钻到红军里面来。必须把红军变为具有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军队。苏维埃、工会和贫农团，应当共同努力，以便使红军底士兵成分是由贫农、苦力和雇农组成，而红军底指挥干部则应当由工人充当。主要的指挥职位，应该由优秀的共产党员担任。也不可不看见红军军事技术底薄弱。红军底武装不好，军需品非常欠缺，大炮非常缺乏等等。因为有这些情形，所以红军还没有力量去占领最大的城市，还没有力量去猛攻现代的帝国主义军队，去进攻最大的中心城市。经验已经证明：占领长沙和夺取汉口，对于红军，还是力不胜任的任务。这种情形是能够变更的，而且一定会变更的，但是应当顾到眼前的事实，应当清醒地估计到力量的对比，而定出自己的实在的任务。

第六，从这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总立场之中，就产生出许多其他的错误。例如，说工人只愿意参加武装起义，而不愿意参加示威、罢工、经济斗争及政治斗争。其实，这种说法，不过是用虚伪的左派空谈，来遮盖机会主义的消极心理。最近以来，党对于经济战斗的注意力是减弱了。党忽视了工人阶级底日常斗争。赤色工会底工作，黄色工会内的革命派底工作，也减弱了。不去进行真正群众底真正斗争，却企图在全国范围内到处去突然举行群众大会。不去切实组织和准备群众政治罢工，却在还没有应有的组织工作和准备工作时，就在四月里宣布四次总政治罢工，五月里宣布五次总政治罢工。把党的支部和团的支部合并起来，使赤色工会专门准备武装起义，这样一来，就使党和赤色工会底工作陷于解体。立三同志认为：在革命时期，党、团和工会底单独组织是不需要的，要开始革命，就要取消党、团和工会。立三同志不去努力实行革命底实在任务，却反而异想天开，用虚伪的左派空谈，来遮盖自己的消极心理——就是说不愿执行现时实在的重要任务。

这就是立三同志底路线，这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国际执委曾经认为，而且现在还认为，这条路线是非布尔塞维主义的，非列宁主义的，所以斥责了和驳斥了这条路线。这条路线底结果，就是消极，就是失败，就是极危险的冒险。这条路线是与共产国际执委和中共中央代表团所共同制定的路线对立的。共产国际执委认为，整个环境所要求中国共产党来立刻实现的中心实际任务，就是：

(一)立刻团结真正的工农红军，即使在最初的时候这种红军只有四万五千到五万人，可是它的社会成分应当是工农的，它的基本的指挥干部应当是工人的，它应当有坚强的共产党的骨干，要由最优秀的最可靠的领导者来领导，要有铁一般的纪律。这个完全握在中国共产党手里的红军，应当在一个或几个苏维埃区域内有坚定的物质基础，这些区域同时就应当成为革命底根据地。必须刻不容缓地解决这个任务，必须集中党内最好的力量来立刻解决这个任务。

(二)立刻建立坚强而有工作能力的苏维埃政府，在这个政府里，要以共产党员占多数，要吸收最好的非党工农和红军兵士来参加。苏维埃政府应当建立在革命底根据地里，而以红军为依据。苏维埃政府要规定并公布自己的纲领，反帝土地革命底纲领，着手实现自己底纲领，并用事实来表现给劳动群众看：苏维埃政权是能够不要帝国主义者和地主而为劳动群众创造新生活的。实行中农贫农的土地革命，彻底改善工人阶级底生活，建立新式国家机关，并勇敢地提拔工农群众来参加这个机关，建立群众组织（工会、贫农团等等），实行正确的经济政策——这样来把苏维埃区域里成千百万工农群众团结到苏维埃底周围。

(三)进行真正的革命的群众工作，在苏区里用布尔塞维主义的精神来组织群众，在非苏区里，用布尔塞维主义的精神去发展经济的和政治的群众斗争，并在这斗争底过程中组织群

众。中国共产党应当领会：非苏维埃领土内的每一个经济斗争，每一个罢工，每一个群众发动，不但是进到组织群众的一步，也不但是进到武装起义道路去的一步，而且是对于苏维埃区域的直接帮助。忽视工农底日常需要和要求，这在客观上便是替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出力；没有应有的先决条件而玩弄武装起义的口号，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底群众组织工作是很少帮助的，也正好象不去准备和组织政治罢工，而玩弄政治罢工的口号一样。说工人只能起来实行武装起义，或者是连什么都不能干，这种理论是最有害的机会主义的理论，即使他用"左派"空谈来遮盖着，也不会成为革命的理论。必须动员群众去为着日常要求而罢工，把这些日常要求和无产阶级底一般阶级任务联系起来。正当在非苏区现在货币跌价，物价腾贵和资本进攻而使工人工资减少的时候，在非苏区提出增加工资问题；正当现在苏区方面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时候，在非苏区提出工作时间问题；正当现在苏维埃实施社会立法办法的时候，在非苏区提出社会立法问题；正当现在在非苏区失业工人增长的时候，在非苏区提出失业津贴问题、劳动条件问题、工人待遇问题以及一切关于工人的问题，——提出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并应当成为非苏区斗争底出发点。建立工人自卫团问题底提法，当现在工人群众眼看着红军正在发展的时候，已经与从前不同了。对于在现在这时候，我们在黄色工会里工作，我们征收工会会员的工作，征收共产党员的工作，可以而且应当比以前进行的不同，因为苏维埃底胜利，以及整个经济的政治的环境，都提高了工人底战斗情绪。同时，必须在暂时还不是苏区的地方，发展农民运动，发展游击战争，用农民风潮底铁围来包围当地的城市，以及大城市和最大的城市，在军阀军队里组织我们自己的力量，十倍加强我们在这些军队里的工作，就是说，瓦解国民党的政权，到处动摇国民党的政权。只有这样，才可以准备大工业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才可以准备由武装起义工人和红军来占领这些城市。每一个罢工，都是组织群众和准备武装起义的一个步骤。每一个罢工，都是给与苏维埃的一个实在的帮助。建设真正的红军、建立坚强的政府以及在非苏区方面极端努力地组织群众的经济的政治的斗争，这在现时便是党底最重要的任务。

这就是应该紧紧抓住的主要环节。

同时，国际执委曾经认为，而且现在还认为，不仅可以，而且必须向帝国主义者玩弄手腕，设法周旋。我们预先警告中国共产党，使它注意：以为可以和帝国主义"和平"共居，便是有害的、危险的幻想。但是，同时必须尽我们的能力，去利用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去削弱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革命派底联盟，去避免在我们尚未巩固以前作决定最后胜负的冲突，去推延我们和帝国主义间的决定最后胜负的战斗。同时中国共产党一定要十倍加强反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斗争，动员和教育工农群众，提高农民底认识，使他们了解全国性质的反帝斗争的任务。

这就是国际执委和中共中央代表团完全一致规定出来的那条政治路线底基本特点。

只有完全和布尔塞维主义不相干的人，才会把这种路线当作退却。中国共产党正是在执行这条路线的时候，并不是退却，而恰好相反，正是进攻。革命并不停止，而是展开着。任务并没有降低，而恰好相反，正是具体地和实在地成为革命底决定的任务。武装起义底方针已经抱定了。应当用布尔塞维克的坚定精神和一贯精神，用列宁主义的坚持精神，去准备和组织武装起义。共产主义的先锋队一定要去教育、团结、组织群众，把他们引导到决战的阵地上去。不要消极，而要进行布尔塞维主义的群众工作。不要谈论武装起义的"左派"空谈，而要切实准备和组织武装起义。不要提出力不胜任的任务，而要努力实行革命底最重要

的实在任务。

共产国际执委很满意地接到通知，说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已经接受这条路线，而排斥立三同志底根本相反的路线；我们希望全党都接受国际底这条路线和排斥立三同志底根本相反的路线。国际执委希望布尔塞维主义底中国队伍，一贯地实行国际执委底列宁主义路线。国际执委完全赞成远东局因为反对立三同志底立场及主张而采取的办法。国际执委认为自己的过去一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和指示，都完全继续发生效力。国际执委要你们特别注意的，就是必须始终一贯地执行职工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关于中国职工运动问题的决议。国际执委认为，如果现时来争论所有这些问题，那就一定会使党底工作陷于停顿，就一定会使党底力量离开革命底决定的任务。可是，必须向所有的积极党员，十分明白地和用布尔塞维主义的自我批评态度，去解释这两条政治路线底实质，说明立三路线底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实质，而把党员团结在正确的布尔塞维克路线底周围。

这一点之所以尤其必须的，是因为在立三同志底发言中包含有危险的论调。立三同志公然运用共产主义底“左”右叛徒所爱用的、而且已经被打碎的理论，就是说共产国际不知道实际情形，说中国的情形是例外的，说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革命发展底趋势。他公然敢于把对共产国际的忠实态度拿来和对中国革命的忠实态度对立，他在九月三日政治局会议上说，忠实于共产国际、遵守共产国际的纪律是一件事，而忠实于中国革命又是一件事；又说在占领武汉之后，就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去和共产国际说话了等等。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立场，不能不引起这种敌视布尔塞维主义和敌视共产国际的行为。

国际执委深信：中国共产党底全体党员会给这种反共产国际的立场以致命的回击，中国全体布尔塞维克会万众一心地来实行共产国际底路线。

只要你们始终不倦地进行布尔塞维主义的工作，勇敢地坚决地为着国际执委底路线而进行布尔塞维主义的斗争，那末，你们党就会使中国革命得到新的伟大的胜利。

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中央紧急会议的决议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九日）

最近在共产国际关于立三路线的来信的指导之下政治局十一月二十五日的决议指出三中全会的错误并且开始进行解释立三路线的工作。现在，在这解释工作的初步所表现的许多事实，使政治局认为必须根据国际来信发展十一月二十五日的决议更彻底的明白的指出：

(一)六月十一日决议案是立三路线。六月十一日决议案前后，三中全会之前的最后一期，立三路线领导了政治局的工作。所以对于这一时期政治局工作的正确估量应当是：当时政治局的路线是和共产国际路线不一致的，是不正确的。

(二)三中全会却承认这一时期中央的路线仍是和国际一致的，承认六月十一日议决案是一般正确的。因此三中全会虽然一般的接受共产国际的路线——但是这是在调和主义的立场上去接受的——就是对于立三同志的整个路线取了调和态度，并且替这一路线辩护——这就把互相矛盾互相对立而不能并存的国际路线与立三路线混淆起来（恰如国际来信所说）这就不能彻底解决执行国际路线的任务，因此三中全会的路线也就不正确了。

(三)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的立场，就不能够充分正确和正确的遵照国际路线去规定新的策略和任务，更不能够使全党明白的了解，共产国际路线之下的策略和任务是和立三路线的策略和任务，原则上完全不同的，这样即使三中全会了解到必须实行策略上组织上工作上的整个转变，然这个转变也就成为不可能的了。而且实际上正如国际来信所说又正在重复这些错误。

(四)三中全会有了这种调和主义的立场，自然对于立三同志的各个反列宁主义的理论，也不能够给以必须的和充分的批评和指示。现在是却正需要从解释工作中领导这一反对与肃清立三路线的斗争，反对一切调和主义的错误，执行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以根本肃清立三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的存在以及其领导的影响。

因此政治局认为必须通过新的政治决议案，以纠正三中全会的严重错误，而彻底明确的完全遵照国际路线来规定党的任务和策略，这样才能保障路线上的转变的完成，保障反对和肃清立三路线斗争的彻底，消灭一切调和主义的错误，保障执行国际路线的任务，得到完全的解决。

中央第九十六号通告

——为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号召全党，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一、国际七月决议案明显的指示中国党以真正发动群众去进行革命斗争的进攻路线，最近国际来信又彻底的揭发立三路线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方针和危害党的实质，要全党的布尔塞维克象一个人一样，一致的团结起来实行国际的路线与反立三路线之绝不调和斗争。中央政治局在接受国际这一指示下，深刻的检查自己过去的工作，认为立三路线之为害于党已成无可争辩的事实。立三路线之历史的根源是在六次大会前的盲动主义的残余并未肃清，而组织上陈独秀的家长制度又给立三路线的统治以组织上的保障，所以自中央七十号通告后，经过鄂代会苏代会，立三路线遂日益形成，到了六月十一日决议案在政治局通过，立三路线遂成为中央的路线而统治着全党。从此直到三中全会，中央的工作是站在反国际路线之下进行盲动主义冒险主义的方针，掩盖着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引导党到消极和失败，而加强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的。三中全会本是为的接受国际路线而召集的，但因为站在调和主义的立场上来接受，结果使三中全会的路线仍然成为立三路线的继续，并对立三路线加了一层保障，如说六月十一日决议案是一般的正确，中央路线在六月十一日后还是与国际一致等等；因此，三中全会对国际路线的解释，在理论上策略上也同样发生了许多错误。这样，就使调和主义的中央所领导的全党工作仍然在重复与继续立三路线的错误。直至国际来信后，中央政治局虽承认了立三路线的错误，但在十一月二十五、十二月九日两决议案中，在中央告同志书中还是保持着调和主义的态度，如首先肯定三中全会是一般的接受国际路线，后来又说根据三中全会决议，发展二十五日决议等等；这都是不能斩断调和主义尾巴之不可容许的错误。中央政治局现在公开的承认这些错误，并暴露这些错误于全党，要从错误的认识中来确定反立三路线反调和主义与执行国际路线的总方针。

二、现在政治上与党内的情形是怎样呢？首先是红军苏维埃区域在立三路线的领导之下，不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不去建立和巩固真正的工农红军，不去建立苏维埃政府与实行自己的政纲，不去发动广大群众有步骤的争取在湘鄂赣省区一省几省的革命首先胜利，反而执行无后方无阵地的脱离群众的冒进攻坚，结果造成目前苏维埃区域整个削弱与红军受了严重打击的形势。立三路线的指导是在布置全国武装暴动，调和主义的三中全会虽将武装暴动的布置取消了，但实际工作中立三路线仍旧统治着，从中央以至各地仍在空喊同盟罢工发动农民战争组织革命兵变的口号，而并未实际去真正努力组织群众的政治经济战斗，去真正发动群众为反抗进攻红军拥护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因此，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及发动群众的能力大大削弱了，赤色工会的组织退步了，党在黄色工会中的工作大大削弱了，群众组织的独立系统受着障碍了，党渐渐脱离群众了，党的指导机关与党内群众也渐渐脱离了，青年团的转变也就成为不可能了，广暴纪念示威的失败，是一个最显明的例证与总结。在这样的政

治基础上，党内情形也就呈现出非常状态：家长制度的统治，抑制了党的自我批评，打击了为国际路线而斗争的同志，尤其是中央政治局几次反抗国际的决定和指斥，这就使最能保障正确路线执行的国际领导受到障碍，使布尔塞维克党的生活变成了毫无生气的官僚机关，使党的领导走上一错再错的复辙；——这是目前党内最严重的危机！

三、中央政治局在了解了自己错误与党内危机之后，特通告全党执行下列的决定，以实现坚决的布尔塞维克的转变：

1． 三中全会的决议与最近两次补充决议及告同志书是不能领导全党执行国际路线进行反立三路线的斗争的。要坚定这一斗争战线来执行国际路线，只有采取非常紧急的办法，在适合秘密条件下，产生新的政治决议来代替三中全会的一切决议。在这里，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与最近来信是党的目前行动的根本方针。

2． 为要保障国际路线与反立三路线之绝不调和的彻底的执行，党内应实行改造。发展党的无产阶级基础是根本的办法，改造各级指导机关是紧急的处置。在这里，必须发展布尔塞维克的自下的自我批评，而反对抑制与恐惧自我批评，必须坚决实行党内民主化而不妨碍秘密条件，必须引进积极反立三路线反调和主义的干部尤其是工人干部到指导机关，必须坚决的反对以派别观念对抗反立三路线的分子，而造成掩护立三路线的小组织行动。这样，才能冲破家长制度命令主义惩办主义委派制度，而开展反立三路线之绝不调和的斗争。

3． 为要使国际路线在中国党内得到根本的巩固，党现在就应开始准备七次大会，这不仅解决党内问题，且要更进一步去解决一切政治上的根本问题，如党纲问题等等。

4． 反立三路线的斗争是一长期艰苦的工作。立三路线是用“左倾”的空谈，掩盖着右倾的消极，所以反立三路线的本身便是两条战线的斗争。一切用各种形式来掩盖在立三路线之下的企图，党都须予以无情的打击，这不仅要有思想上的斗争，且要有组织上必要的制裁。反立三路线反调和主义，必须在执行国际路线的基础上来真正实行实际工作中的转变，绝对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将国际路线解释成为退却的路线，尤其要反对托陈取消派利用这一时机来做破坏党的阴谋。

全党同志们！动员起来！要挽救目前革命进展中的部分失败与消极，要挽救目前党内的危机，全党同志只有团结一致的站在这一反立三路线之绝不调和的立场上，来执行国际路线，来实现上述决定，这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到新的伟大胜利。

红一方面军前委会、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指示

（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六日）

（一）吉安胜利与新的革命高潮

长沙的占领与继续严重的进攻，一、三军团的汇合与吉安主要城市的夺取，这一红军势力的猛力发展，配合全国各主要城市无产阶级尖锐斗争，农村中苏维埃的发展，已使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形成总的爆发，特别是吉安的夺取是完成赣西南数百万有组织的群众，二十余县苏维埃政权最有群众最有基础的暴动。吉安胜利就是江西一省胜利的开始。这一胜利是红军群众几年来的战斗中第一个主要城市的夺取，他不仅是更有基础的帮助红军向前发展，他不仅要号召全江西革命群众最近期间完成江西总暴动，这对于全国革命形势的推进，对于争取全国革命胜利，同时是有伟大意义的。无疑的应继续吉安胜利的发展，争取江西首先胜利。

（二）国际事变与世界革命的发展

最近国际事变的发展，如意法备战，意法海军谈判决裂，法国对海军的积极扩充，捷克斯拉夫的排德暴动，英国痛诋美国关税提高政策，南美洲十七个共和国组织南美联盟，对抗美国的运动，都表现帝国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紧张。美帝国主义指使欧洲美洲对苏联经济封锁。特别因为苏联最近正在美贱价抛麦，引起美国麦价惨跌，更无法挽救其农村生产过剩的恐慌，更对苏联的仇视；各国之抑制共产党运动与拘捕领袖，更表现进攻苏联的加紧。但在帝国主义垂死时期所发生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上面，已促进了世界革命怒潮，法国最近选举中共产党的大获胜利，柏林五金工人反抗政府百分之八减薪，十四万工人大罢工，西班牙之马加拉船坞工人罢工，蔓延到维多利发生总同盟罢工，造成叛乱形势，政府虽采取严厉手段，不能镇压。匈牙利五万工人游行示威，捷克共产党之反对排德大示威。波兰京城总罢工，抗议政府拘捕反对党领袖，智利南部之突起革命，日本丝纶工潮走到与警官队武装冲突中，印度揭竿而起的居民暴动，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之巩固与发展，就农产品一项，已压倒美国农产品。凡此说明世界革命正在怒潮澎湃的开展起来，这一形势非常便利于中国革命，这将要转变进攻苏联的战争为争取世界革命胜利的战争。

（三）军阀混战中几个事变

A． 蒋介石攻下济南后，张学良发出巧电主张和平统一，听候南京政府处理。

B． 张学良开三军入关，进驻北平天津，近且通电主张在北平召集善后会议，要讨论什么“努力救国”问题。

C． 蒋介石发表两个重要电报：一、请国民党政府大赦政治犯，除陈炯明、阎锡山及共产党外一律赦免。二、召集国民党四次代表大会，确定召集国民党会议，颁布约法宪法。一个告国民书中述剿共（限期三月到六月，一面分区负责，一面整个会剿），整理财政，澄清吏治，发展经济，厉行自治等五项。

D． 报载南京中央宣传部长刘芦隐对时局报告有“日文报对东北当局张汉卿造作种种谣言……日本政府在华外交官吏，竟使日报在我国境内肆行离间，致使吾人不禁怀疑其有意操纵”，又说“英人辛博森助阎强占海关，当犯有参加外国内乱之罪，经我国数次之抗议迄无表示，我们认为英国驻华外交当局不负责任，就是英国政府亦不成个东西了。”

E． 蒋介石占领郑州，冯玉祥部队据报载一部被蒋缴械，一部投降蒋，一部退豫北，有进攻山西说。

F． 蒋介石调徐源泉、王金钰、陈诚、夏斗寅、蔡廷锴、蒋光鼐、岳维竣、肖芝楚等部回鄂，谭道源、金汉鼎、许克祥、彭启彪、毛炳文、李云杰、唐云山等部入赣，镇压革命。

（四）对于这些事变的估量

A．蒋冯阎的战争，即是英日美的战争，日本利用英美冲突的紧张，处在举足轻重的地位，乘机取巧于美蒋妥协，使其走狗奉张取得河北地盘。果然英美两方都不能不向他让步，跟着蒋阎两方对奉张的进兵，都不能不加以承认，特别在蒋要利用这一着以对阎。

B．长沙占领与继续的严重进攻，以及吉安的夺取，这不但使中国革命形势有广大的转变。同样转变了统治阶级的关系，就是说革命势力的发展，阶级的根本矛盾，已使帝国主义、中国统治阶级极力想缓和自身的冲突，联合对付革命，美帝国主义固然感觉所统治的南京政府下面，革命势力日益威逼，需要如此；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自然也觉得中国革命之胜利，首先是与日本不利，所以日美有暂时妥协的可能，蒋亦不得不拉张，以迅速结束战争。在英帝国主义方面，镇压中国革命，也是急需，加以在日美联合，在阎冯惨败之下，也不得不暂时屈服，在帝国主义军阀这一暂时联合对革命之下，所以蒋介石有从前线大调兵力进攻革命的需要与可能。同时镇压中国革命需用新的改良主义，欺骗政策，所以蒋介石于开封郑州占领前后，乘军事上的胜利，连篇通电提出改良欺骗政策，企图树立反革命的领导，所谓赦免政治犯与召集国民会议，实际是接受改组派的纲领，企图争取中小资产阶级，同时拉拢冯的部下以抗阎，组织一个由蒋系领导，即美国领导的反共联盟，镇压中国革命，这不仅是争取反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同时也就是争取进攻苏联反世界革命的领导权。

C．这一反革命联合，必然要在革命高潮面前瓦解。这是统治阶级之矛盾与动摇崩溃，革命势力之猛进可预先肯定的。帝国主义军阀，虽然竭力在拉合，可是内部的矛盾跟着紧张，张学良善后会议的主张，显然与蒋介石的国民会议对立，蒋冯阎混战，实际得了北京山东地

盘的只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张学良，因此凑紧了日美张蒋的冲突，刘芦隐的报告，已露其端倪，蒋介石匆匆调兵南下，限期三月至六月肃清"共匪"，就表现张蒋战争的紧张。特别是因为统治阶级中政治经济根本破产，全国规模的金融紊乱，农村经济的严重破产，南方各省今年持续的农民反抗地主的暴动，国民党各派都无法解决，就看出这一问题的更加严重。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生产恐慌的影响之下，大批停顿倒闭，增加失业危机。冯阎虽然失败，但是一切破产了的山西、陕西无法生存，必然出于争地盘一战，因帝国主义为挽救其产业的危机。对于已丧失的中国势力及其政治上的领导权，必然要极力以求挽回，这就证明了帝国主义及中国统治阶级因为经济政治的根本破产，所以不能稳定的前途，亦即不能有巩固的联合，新的军阀混战必在不久的将来更促其崩溃。蒋介石的所谓和平统一，只是欺骗无耻的妄谈，就连吴雅晖走狗已在说："要思想永久和平，恐怕不能有十二分钟的把握"。基于上述这一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无产阶级及广大群众的革命运动，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走向推翻国民党统治的坚决斗争中，群众所要求的不是军阀官僚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会议，而是工人农民士兵广大被压迫的劳苦群众苏维埃大会，业已定期十一月七日召集；民众所求的不是维持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的什么宪法约法，而是保障无产阶级专政，保障工农劳苦群众利益的苏维埃政治。国民党改组派蒋介石派为什么要在这个时节提出这一套把戏呢？正因为革命已走到高潮，要根本推翻统治阶级，看见民众为上述各种要求坚决斗争，便不得不提出什么国民会议、宪法约法，拉拢中小资产阶级以共同镇压工农的要求与革命。这种阴谋欺骗，只暴露统治阶级愈加崩溃，在革命高潮面前，恐慌无措的丑态。帝国主义军阀这一反革命的联合是在今日全世界革命怒潮澎湃、中国革命猛烈开展之下进行的。因此这种进攻的性质是统治阶级挽救危亡的进攻，决不象过去革命潮流低落时期统治阶级欲消灭革命势力而举行的会剿井冈山一样的进攻。我们对于蒋系军阀的大举进攻，必定要来一个全国规模的革命暴动去答复他。在帝国主义军阀，一面不得不妥协，一面又无法调和矛盾就在这一动摇崩溃的形势中，我们肯定指出这一阶级决战的胜利。不但是争取一省，就要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

D．关于军阀混战有两种不正确的估量：第一是非阶级的空洞乐观估量。以为军阀混战总是愈打愈大直到自取灭亡，无论如何不会联合对付革命，这一估量完全是非阶级的错误估量。这是因为不了解阶级的矛盾超过统治阶级自相矛盾时，统治阶级必然要作最后的挣扎，暂时抛弃自身的矛盾联合起来，对付革命。这种估量的结果，将松懈革命工作的布置，实际行动上容易走到脱离群众、单纯的军事观点，因而一遇着反革命的联合，就觉得手忙脚乱，这种空洞的乐观估量，就必然走到极端悲观。另一种就是以为敌人联合对付我们，革命就遇着很大的困难，因而发生悲观。这仍然是一种非阶级的分析，并不了解革命高潮。因为统治阶级之最后的联合挣扎，是对付革命势力的进攻，这就证明革命已到高潮。革命到了要消灭统治阶级，统治阶级为挽救自己的危亡，岂有不联合之理？革命势力正在一省内发展的时候，统治阶级每每用一省的力量对付革命，游击战争的时候，即是如此。相反的如果遇着统治阶级全国规模联合的时候，无疑的就证明全国规模的高潮，谁不认识这一点谁便不真正认识革命高潮，谁就要走到悲观、逃避、可耻的取消主义。正确的认识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但要遇到国内军阀，而且遇到国际帝国主义残酷的战争。在革命开始胜利时，帝国主义军阀是有抛弃本身矛盾，一致联合对付革命的需要与可能。这只有加紧全国工作的布置，注意四大革命势力的平衡发展，准备残酷的决战。中国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根本破产无法挽救，革命势力猛烈开展，我们一定要在全国工作的配合与世界革命顺利的条件中，争取中国的胜利。在目

前的统治阶级联合对付革命，右倾分子容易发生悲观，一向持乐观的也要走到悲观，因此正确的指出统治阶级的动摇崩溃，新的战争的酝酿与革命势力之猛进，与悲观观念斗争，是实行阶级决战争取一省胜利的前提工作。

（五）反对争取一省政权的游击路线

争取一省政权的工作，今日已实际的摆在我们面前，要能达到这一任务，必须转变过去红军游击时代所留下的游击路线——就是由单纯军事观点发生的轻装袭击路线。这一路线由于对军阀混战估量不正确，不了解争取一省胜利是阶级决战的工作。因而走到离开群众，不注意争取群众，建立群众工作，不注意扩大红军与加强红军力量。在军事技术上仍专门利用游击方式，不懂得阶级决战时所必须准备的条件。单纯的轻装袭击（这里所讲的袭击，是指争取一省的战略路线，不是反对军事战术上的袭击），结果表面上似为坚决进攻的左倾路线，但实际延缓了革命首先胜利的到来，成了极端的右倾路线。长沙和吉安事件，足够教训我们，第一次的不能坚决持续占领长沙，主要的是群众条件不具备，红军在力量上亦尚不是红军的中坚。第二次因为仍然缺乏群众条件与敌方士兵的配合，成为单纯的红军的攻坚。所以猛攻半月不能胜利。吉安就在相反的条件之下，有了广大群众基础，所以就能真正的夺取。至于长沙，第一次之能攻取，是因为敌人无援兵可增，无工事可守，仅只有在这样条件之下，轻兵袭取才有可能。目前在敌人大举增兵与南昌、九江固守工事的形势之下，单凭红军轻袭南昌、九江，而且红军相当给养都不具备，运输条件十分缺乏。这无疑的要成为游击的进攻，结果攻不下，又转而他往，反使一省胜利延期实现。所以这一轻装袭击的游击观点与争取一省首先胜利有计划的有布置的战略绝不相容，应加以严重的纠正。中央最近指出，红军须加紧训练，提选好的农民成分工人干部创造红军中坚、红军铁军。指出必须有三万至五万红军中坚，方能把握着大城市的胜利，树立群众对红军的信心。作战必须有计划的有布置的使用战略，这更深刻了我们争取一省实际工作的布置，我们认为这一指示非常明确。但如借口群众尚未配合，红军不采取坚决进攻，无目标的分散工作，或因为没有群众配合，就在有胜利把握时也不攻坚，不了解给养补充训练，都只在有计划的斗争中才能解决，当然也是放弃一省胜利的任务，也是严重的右倾观点，应该注意防止的。另外，还得指出一点，就是不了解战略与战术活泼的运用，战略是依客观形势与主观力量而决定，战术是依据当时各种实际条件运用一切手段，以达到战略的实现，因而战术在不违背战略之下，是时常可以转变的。在夺取南昌的任务下面，首先争取吉安，这一战略是非常正确，就不应简单机械地说本是打南昌，为什么打吉安？又如战略是确定占领南浔路，在战术上，或采取一直袭入或在赣江两岸适当地点消灭敌人主力，再行进占，这都归并于当时主客观两方实际条件，不能一定拘泥，这在红军下级干部及士兵群众尤要使之明了，否则群众只知道总目标，亦有因战略与战术上的变化，便怀疑动摇起来，甚至要使上级指导机关迁就群众的落后意识，妨碍战略战术的活泼运用，这是值得注意的。

（六）争取江西首先胜利是一方面军与江西党部的当前任务

在争取武汉的中心附近省区首先胜利的前提之下，目前应争取江西胜利继续实现武汉的

胜利，江西胜利，自然决不能离开全国革命高潮，不过在江西本身说来，这种条件有更多的可能，江西有六十余县的苏维埃区域，农民暴动已成为普遍的革命高潮，一、三军团的汇合与红军第十军向鄱阳湖口的继续进攻，特别最近吉安的夺取，是汇合一切革命势力，成为夺取南昌严重的威迫形势。江西地主资产阶级在农村中的经济基础，大都破坏干净，而且在革命形势日益发展威迫之下，更促进其动摇崩溃，红军在清江与敌军十八师隔江宣传，士兵即是一排人拖枪叛变，投入红军，敌军士兵相约我们打南昌不打枪，敌方官长大起恐慌，深夜集合训话，最近又有拖枪来到第三军团的，告说五月不发一文，兵士都不愿干，官长常被暗杀，军队中常发现到红军去的呼声，他们感觉当红军不受压迫，这一形势就证明统治阶级所持以挣扎的工具都靠不住。加以历次作战敌军士兵动摇不愿硬打的经验，更使我们知道敌军虽多并不足畏。目前蒋系军阀，虽然派遣许多部队到来江西，但在统治阶级反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并未解决，新的冲突正在酝酿，蒋介石不过利用暂时妥协抽空对付革命，而且在长期混战之余，士兵极端疲惫动摇，只要我们加紧政治上组织上的领导，无疑的可以消灭敌人进攻的主力。所以江西党与一方面军的任务，无疑的是配合江西群众有计划的有布置的实行阶级决战，坚决争取江西首先胜利。

（七）在上述这一任务之下一方面军与江西党工作路线

1． 加紧反对军阀压迫革命与武装暴动夺取江西政权的宣传鼓动，扩大吉安胜利与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建立及所颁布的一切法令文告的宣传，提出“反对军阀压迫革命”、“实行武装暴动夺取江西政权”,鼓动群众为苏维埃政权而奋斗，坚决的以阶级决战答复敌人的进攻，夺取江西首先胜利，在革命高潮之前加紧反对一切改良主义、改组派、第三党、AB团取消派及最近蒋介石之国民会议欺骗政策，尽情的暴露他们一切罪恶，肃清在群众中的影响，这成为阶级决战时打破敌人缓和革命阴谋的严重的政治任务。

2． 建立南昌、九江、南浔路的工作：无产阶级的暴动在今日成为争取主要城市，不可缺少的主要力量。敌人最后的挣扎是凭坚固的工事死守城市，长沙事件教训我们争取一省胜利，缺乏主要城市工作是不可能，现在应纠正对城市工作的悲观与忽视，克服一切困难，建立城市工作。职工运动的主要路线，是直接组织武装暴动，加紧政治同盟罢工的布置。建立群众的赤色工会与纠察队及暴动时中坚队伍的赤色先锋队，至于日常的经济斗争当然不会放弃而是要联系到武装暴动。

3． 完成地方暴动：首先应将赣西安福、太和、新余、分宜、袁州，赣东吉水、永丰、乐安、新干，赣南的赣州等县地方暴动完成，在白色区域，须坚决发动游击战争，布置暴动，坚决消灭赤白对立的现象，把所有的赤色区域连合起来。要进而与闽粤湘鄂连成一片，准备以群众暴动的烈焰，消灭敌人进攻部队，完成地方暴动，必须学习过去的教训迅速没收一切土地，彻底平分才有可能。在这一斗争中要树立雇农的领导建立独立的雇农工会，建立贫农委员会，苏维埃赤卫队中须严防富农分子参加，坚决提选雇农贫农之为领袖，农村斗争一开始不仅猛烈的进攻地主阶级，同时即须从平分土地不完租债，反抗富农对贫苦农民一切剥削压迫，发动贫苦农民群众对富农的阶级对抗，如此才能彻底消灭封建势力坚定革命基础。

4． 动员广泛群众参战扩大苏维埃，指出全国革命形势的开展，政治上的必然胜利，号召群众，这次军阀压迫革命，我们必须男女老幼一齐动员配合红军，实行阶级大决战，消灭敌

人主力争取江西首先胜利。凡属敌军进攻的区域，如峡江、新余、分宜、袁州、安福、莲花以及吉安、吉水、永丰、乐安等县须集中赤卫队、少年先锋队，加紧军事政治训练，统一指挥，侦察敌人出进要道，扰害敌人后方，破坏敌人交通，收缴敌人枪枝，断绝敌人供给，漫山遍野的埋伏，作各种骚动与恐慌工作，使敌人陷在红色区域进退不能，根本消灭。赤卫队帮助红军放哨侦察、运输、救护，各县须有组织的准备起来，各县武装梭标土大炮、火药须尽各种可能分区乡充实准备，上述这些工作，必须用鼓动方式群众路线，各区乡召集苏维埃群众大会，由群众自己决议参战的实际行动与准备，必须发动自觉的热烈的参加，才是政治上的胜利。因此必须坚决反对命令主义（不经过说服鼓动，群众不了解，强迫的执行）狭隘路线（党和苏维埃不在群众中起煽动领导作用，重大问题不由群众会议解决，形成少数上级人的指气，使群众感觉只为个人命运而行动）。另一方面须暴露军阀压迫革命屠村烧山的残酷压迫，自首反水阴谋，提高阶级的仇恨，提出“为阶级奋斗到底决不投降”以鼓动斗争决心。在作战的苏区须同样动员，猛烈向外发展，消灭赤白对立的现象，以争取群众，一致向豪绅地主进攻，说服赤色群众，制止报复主义，以坚决平分土地。在白色区域相当时期的占领，帮助群众分田建立赤卫队等来消灭赤白对立的严重障碍。

5．加紧白军士兵运动：白军士兵因为混战的残酷性与生活上不堪的压迫和恶劣，以及受了工农革命高潮的影响，非常动摇，最近自动拖枪投红军的事不断发生，士兵暴动的条件完全成熟，还没有成批地发动，就仅在缺乏共产党的组织与领导。地方党部和军队党部须纠正过去对这一工作的忽视。用最大力量来注意。必须了解，没有敌人部队的瓦解，决没有革命的胜利，这一工作的路线，是要树立广泛的政治基础与建立严密的组织领导。要以变军阀战争为消灭军阀的革命战争，变屠杀工农为帮助工农解放的战争，发动士兵的阶级觉悟，组织士兵暴动，纠正过去的狭隘的机会主义的路线与单纯的兵变主义（少数人的拖枪逃跑），地方党和红军政治部须建立士兵运动委员会，调遣大批人利用各种机会插入敌方军队进行此一工作，特别在目前对来赣的白军士兵下级官长须加紧宣传鼓动，主要是抓住他们在山东河南长期苦战，所得的只是白白的大批死伤，现在又要调回打工农，认识军阀的罪恶，指明现在革命形势的开展与他们的出路，只有参加工农革命，鼓动他暴动哗变。在敌人进兵的区域，必须来一个群众的士兵运动，利用士兵宿营，动员妇女小孩老头子以洗衣小卖（但主要粮食必须断绝）与之接近鼓动。赤卫队一面须勇敢的收缴敌人枪枝，一面对俘虏白兵必竭力优待，争取白军士兵群众，打破敌方说赤卫队惨杀白军使士兵不敢哗变的谣言欺骗。

（八）赣西、赣南及其它苏维埃区域的严重任务

1．团结贫农雇农对抗富农，在那富农把持肥田的区域，要迅速的再来一个质量上的平分土地，实行抽肥补瘦，这是揭开农村阶级的阵线，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根本镇压富农阶级反革命阴谋的最实际的政策。至于那些在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都已经彻底平分了的地方，应该保障分田胜利。不得动摇原有分配。我们的口号是：“分得公平的不动，分得不公平的再分。”

2．改造全部党的组织和团的组织重新建立，不使有一个富农反革命分子（ＡＢ团）留在党内团内，因为现在赣西南的党内和团内充满着富农反革命的原故。这一改造，只有彻底平分土地，发动雇农贫农对富农的阶级斗争，以及动员对付反革命进攻的阶级决战中，洗刷

富农及一切怠工动摇分子等，提选积极的雇农贫农分子才有可能。同时在地方城市内（各县城特别是吉安城）要彻底执行穷苦工人的意志，以工人监督资本实行劳动保护法的口号对抗资本家的剥削，对于工人中与资方接近的及非直接受剥削的阶层要从组织上加以防止，从这些斗争中洗刷城市乡村支部的一切小资产阶级动摇分子，提选坚决的无产分子。

3．提出"撤换违反贫苦工农利益的委员""撤换违反苏维埃会议的委员"的口号，改选原有全部苏维埃政府，重新提选雇农贫农真正群众领袖为苏维埃委员，不使有一个富农反革命分子（ＡＢ团）留在任何地方，留在任何一级苏维埃之内，这是因为赣西南各级的苏维埃政府充满着富农反革命分子的原故。苏维埃政府同时须肃清新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这是脱离群众，断送苏维埃的自杀政策。巩固苏维埃的主要策略只有引进广泛群众参加苏维埃的管理，一切重大问题均经过代表会议的讨论与解决，政府工作向代表会议报告，接受代表会议批评，这就要定期召集乡村苏维埃群众大会，及乡以上的代表大会，反对固定的代表制，提出"选举贫苦工农领袖为代表"由村乡群众大会选举。乡政府下面人口过多、地面过广者，须设立村苏维埃，政府人员不脱离生产，不支给养。如此才能防止新式官僚主义的发生，才能使苏维埃一切行政合乎群众要求，取得群众拥护，使苏维埃巩固。

4．从政治上指出AB团各种欺骗阴谋，肃清在群众中的影响，严厉的镇压AB团，处决AB团中一切活动分子。

5．城市中建立真正的阶级工会，实行工人监督资本加强纠察队的组织与训练。

6．建立独立的雇农工会，这是树立乡村中无产阶级领导的非常重要的组织，须建立雇农工会支部生活，加强阶级教育，领导对富农的斗争。为着争取贫农基本群众，发动对富农的阶级斗争，要建立贫农委员会，我们过去受重租重息剥削的贫农，现在分了田而仍贫困的贫农，注意提选积极分子为领袖。

7．用鼓动说服方式猛烈扩大红军后备军，坚决反对命令主义，欺骗方法，因为这不是扩大红军，而是在阻碍扩大红军，后备军须注意军事政治训练领导参加群众工作。

（九）一方面军目前工作

A．军事战略：一三两军团在敌人多数增援向我们前进的情况之下，认为是补充红军枪械，扩大红军创造红军铁军，最好的时机到来。目前的战略是在占领南浔路占领南昌九江的总目标之下，继续吉安胜利，争取进一步的胜利，即在吉安南昌之间一带地区发动广大的群众，筹措给养，同时加紧后方的群众调动与给养筹措，准备与敌人作大规模的决战，消灭敌人主力，实现全省胜利。

B．加强军队中政治训练，目前应集中实行阶级决战，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政治鼓动，指出反革命联合的必然崩溃，大举进攻是创造红军铁军的绝好机会，以提高官兵斗争的决心。同时军队中应注意反AB团改组派，对新兵尤要注意一般的政治教育，建立士兵委员会与党的组织。特别注意党的领导力量加强与组织扩大，各军党员数量一个月内应较原数扩大一倍，并以注意有计划的宣传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各种革命策略的问题，以及识字教育，提高红军的政治水平。经常领导士兵做群众工作。从群众斗争中吸引坚决的工农分子，扩大红军，达到创造红军铁军的任务。

C．加强实用的军事训练，成为创造红军铁军的严重工作之一，这尤其是对于多的新兵成份，实行阶级决战，所不可忽视的。这须取消不适用的形式上的操练（如姿式教练），除下操外，更要利一切行动休息时间来达到这一任务，各军长官须有计划有督促有检阅的执行这一工作。

红军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
江西省行动委员会 付印

红军第一方面军命令

——移师于江东岸分散工作筹款的命令，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一日午后二时于新喻罗坊之园前村——

(一)高安上高带有敌公罗两师樟树有张（辉瓒）师之两团丰城有邓（英）师万寿宫有敌一师（番号不详）彭启彪旅在南昌附近许克祥开往湖口附近谭道源师胡祖玉旅在南浔路蔡廷锴蒋光鼐两师已开到鄂南湘敌李觉师进到袁州

(二)方面军以原任务拟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决以主力移到赣江东岸相机取樟树抚州发展新淦吉水永丰乐安宜黄崇仁南丰南城各县工作筹措给养训练部队

(三)第三军团为中路军（由彭总指挥滕政治委员指挥）应即迅速渡过袁水南岸集中队伍准于本月五日在新淦对河附近渡江向樟树前进相机略取樟树并在樟树通丰城新淦两大道附近筹款二十万发动群众以后之集中地在永丰之藤田附近

(四)第四军第十二军为右路军应于三日集中部队四日检查工作五日开到峡江附城六日渡江（归林彪杨岳彬指挥）经崇仁向抚州前进相机略取抚州在南丰南城崇仁宜黄各处工作筹款四十万发动群众以后集中地在乐安之招携市附近如中路军受优势之敌威逼时则应提早集中时间向中路移靠以便应敌

(五)第三军（由黄公略蔡会文指挥）为左路军担任赣江西岸一带地区（包括安福）扰敌工作与二十军及中路军取联系牵制敌人进攻吉安

(六)第二十军应在吉水永丰新淦一带工作须经常与总部确取联络

(七)工作时间以一个月为期各部须按期完成该县区之工作

(八)后方联络线经峡江到吉安驻吉留守处仍旧

(九)总司令部拟于五号在峡江城渡河位置于峡江县城对岸通新淦之大道旁以后则随中路（三军团）行止

附记(一)工作时间以筹款为第一位同时应发动广大群众加紧本身训练

(二)在分散以后所有口令信号如经遗失得各自订用通报邻友并报告总部

(三)工作期内各方均应用一切方法送报告来总部

总司令　朱　德

政治委员　毛泽东

给江西省行委的一封信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毛　泽　东

省行委转左路行委、赣西行委、湘东特委：

1．我到水南知道：这方面对于应敌工作，已有相当的准备，各乡开了群众大会，全区开了活动分子会，坚壁清野亦有准备，特别是对白军士兵的宣传工作做得好，水南街上房内房外都写满了标语宣言和歌谣，又组织白军士兵运动委员会，这样看来，水南的应敌工作，比儒仿区之一点没有做，吉安洋油大部搬办，盐没有搬完，宣传工作不力，要好得多，从儒仿区及吉安的情况看，西区、儒林区、纯化区、太和、永新、莲花、安福、永丰、兴国、尤其是东路的雩都，各地的应敌工作准备工作恐怕亦相差不远。此时值得省委推动赣西、赣东两行委及湘东特委重新严格的指示一次，去指示时要指出吉安打下后，大家以为天下太平了的错误观念，要指出分宜县委、县政府之全部都覆灭，新余县委、县政府曾受重大损失，峡江紧急会议被敌人冲散，吉安无盐并以洋油和万多斤盐资送敌人等等严重的教训。

2．报载六〇师三团从鄂南开动五日完毕，六十一师继续开拔遂川、莲花方面，进攻赣西，永新、安福两县委、县苏委飞速准备敌外，湘东特委尤要飞速准备应敌，对于牵制蒋蔡两部（这是敌军主力），湘东群众和独立师要担负很大的责任。一进到永新，安福，太和，吉安等地，赣西行委就要指导各地群众实行牵制该敌，同时已进到吉安之敌，要想尽办法去牵制他，务使蒋蔡罗李四师不能渡过河东，在这个任务下，红军第三军负了很大的责任，上述许多工作，左路行委和左路指挥部都要指导。左路行委和左路指挥部，截至现在，正好象没有行使他的职务，既没有发一个通告各地，指示工作，又没有发一个通报到各地报告敌情，实在是非常之大的缺点，以后非改变不可，湘东方面左委左部都要指挥，就是省行委对于湘东行委，赣西行委对于赣湘东行委，赣东行委、赣南行委属境亦不能在这紧张时候，断然划分区域不加指导，近日开的赣西行委扩大会，赣西各县委员会联席会，雇农代表大会，均不邀莲花、萍乡、兴国、宁都、永丰的代表到会（至少应该邀他们列席旁听）真是非常之不应该。

3．水南区还不知道，只发柴、菜钱，不发油、盐、米的事，别处还是相同，对于供给红军油、盐、米一事，当没有接得通告，我要财政部派两人，一往永丰、宁都，一往纯化、水南、陂头、白沙、东固办理红军给养问题，财政部负责人员，只接应了实际并没有做，等两天红军到了这些地方了，油、盐、米问题全仍然不能解决，特别是盐须予从省政府的盐中挑一部到这些地方，方能供给红军，不用钱买。筹款一事，一百二十万元还只有十三万元到手（此十三万元无论何人非得总前委命令不能发用分文，务望注意），非努力进行捐款不可，红军一到红色区域，一切供给都要向省政府领取，此外没有第二出路，务望省委对于此重新计

划一番，随时严厉督促不稍疏忽，是为重要，省委应该每天开一次会，召集省苏负责人参加集中指导一切。

4．我们今日可到“白沙”，明日可到藤(藤田)，望省委左委，赣东行委、赣西行委，二十二军军委每天各有一个情报送总前委，务使消息灵通为要，湘东行委最近报告（内述独立师缴枪五百余等事的）在此收到。

红一方面军攻击进占龙冈之敌张辉瓒师的命令

——命令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午后八时于尹埠街总司令部红字第十二号——

(一)敌张辉瓒师由南龙向我前进，本（二十九）日午前十时其先头部队到达此三十里之龙岗圩（戴岳旅一〇三团），后续部队不明。潭头有到敌说。

谭道源师仍在源头、上下潮。

毛炳文师移到洛口、平田、东山坝一带。

(二)方面军决以左路军于明(三十)日攻击龙岗之敌，右路军则应派部队协助歼灭该敌。

(三)第十二军（缺三十五师包括六十四师在内）任左翼，应于明晨四时前出动，向表湖前进，应以一部分占领龙岗南端、水西西端之盲公山，以主力截断通南龙之大道（经×石茅平），须于午前十时占领所要之阵地。

第三军任右翼，应于明晨五时出动，占领木坑以右地区及亭子×之主要阵地，向龙岗攻击前进（须于午前九时半开始攻击）。右与左路军派出部队确取联络，如右路军未派出部队，则应向右延伸，特别注意右翼。

(四)总攻击龙岗时间为三十日午前十时。

(五)右路军应于明晨派出一部经回龙到还铺附近，左接第三军，右接第十二军，向龙岗之西北端（张家车附近）攻击前进，到达时须即向三军及总司令部取联络。如上固无敌，则应主力向还铺、张家车之线攻击前进，而应以小部警戒下固、潭头。

(六)各军小行李及伤兵收容所、绷带所需等，均自择位置，敌方俘虏招待所设小别。

(七)大行李仍住置于阳×停止待命，如小布发现敌情，则逕向约溪移动。

(八)总司令部明日移到小别附近指挥。

附记：

1. 明日出发前，各部应集合官兵讲话，做好政治鼓动，预备队亦应随时做好政治鼓动。
2. 十二军应注意竭力截断敌南龙之增援部队。
3. 各军俘虏兵可向小别招待所转送。
4. 各军应注意相互间之联络及搜集情报。
5. 各部须注意搜集西药，无线电亦不准破坏。

此　令

总司令　朱　德

政治委员　毛泽东

红一方面军追击敌谭道源师的命令

——命令一九三一年一月二日午后十时于小布胜字第二号——

(一)敌谭师因闻张师惨败，已于本日晨五时逃退。一部经元头、中村向南北坑败走，其后头部队经被我二路军截缴枪械甚多；另一部（主力）则经南团向东韶逃去。视此情形，敌军似有全线退走之模样（其余敌情同前）。

(二)方面军决于明晨追击东韶之敌，然后次第扑灭宋逆绍良部之许(两团）毛（两旅)，以树政治上之声威。

(三)第十二军任正面之攻击，应于明晨十时前经南团、林池到达东韶街附近，向东韶之敌攻击前进。应占领林池以北，杀尾嘴以南之阵地。

第三军任左翼①，应于明晨十时前到达陂头附近，向东韶之敌攻击前进。

第三军任右翼②，应于明晨十时进至田营，以主力牵制洛口之敌（许 师）之增援，另以一部迂回到东韶街东端、山下坪北端之高地，向东韶攻击。

第四军为总预备队，位置东韶西方之龙坛（第四军应于明晨十二军出发后随十二军后行进)。

政卫团仍位置于麻田，应于明晨派出游击队分向洛口及东山坝、平田游击。

(四)三军团之小行李随三军团后行进，三军之小行李亦随三军后行进，四军、十二军之小行李（由十二军派出小行李指挥官指挥）则随四军后行进（行李不准乱插队伍)。

(五)总司令部随工农革委会接四军后进到龙坛总预备队位置指挥。

附　记：

1．三军团行军路线，由元头经曾坊、石凹下、场毛凹、张家前、杨坛、庐园、枫山、新坛、白水、陈家到陂头。

十二军行军路线，由下潮经南团、焦边、坳背、王家坑、龙坛到东韶。

2．各军绷带所位置自择。医院位置在阳城，各师雇人送去。

此　　令

总司令　朱　德
政治委员　毛泽东

①②原文如此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通令（第四号）

——二次战争的意义目前敌我的形势和
争取二次胜利的准备工作——

（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日）

红军各级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地方各级政府：

（一）争取二次胜利的中心意义在于转变敌我形势

自从军阀战争暂时停顿敌人向革命进攻以来，敌人是一种攻势我们在大体上说始终是一种守势，龙冈战争，虽然取得大的胜利，但仍未能转变这种攻守形势。因此转变敌我攻守的形势，成为二次战争的中心任务。我们要转变敌我攻守的形势，就要给第二次进攻的敌人以严重的打击。取得比龙冈战争更大的胜利。必须这样，才能使敌人溃败下去，退守中心城市，把敌人的攻势，强迫着他变成一种守势，必须使敌人退守到中心城市去了，我们才能彻底解决苏维埃区域的巩固问题。必须使敌人退守到中心城市去了，我们才能使现有苏维埃区域广大的发展一步。必须在敌人溃败下去，苏维埃区域有了切实的巩固，尤其在有了广大的发展了，才能使红军得到进一步的扩大与精练。必须在苏维埃区域切实巩固与广大发展，红军进一步扩大与进一步精练的形势下，才能给全国政治局面一个大的影响，一方面促进统治阶级内部各派争夺领导权冲突的迅速爆发，使各派的力量更加削弱，使各派之间的无政府状态更加发展，造成革命的客观形势的有利条件。一方面促进反动统治区域工农兵士贫民斗争情绪的高涨，斗争实质的加深，斗争范围的推广，扩大旧有的红色区域与红军。创造新的红色区域与红军，使革命发展在全国内更加扩大起来，由此去争取一省几省首先胜利，以至于发展到全国的胜利。假使我们不能争取这次战争的更大胜利，便不能转变敌我的攻守形势。那与我们上述的任务是违背的。所以我们必须努力去争取第二次战争的伟大胜利，那一个对于争取这一次胜利不努力，那一个就是革命的罪人。

（二）目前敌我形势和我们二次战争的胜利条件

龙冈东韶战争以后的政治形势，在反动统治方面军阀战争的危机一天一天继续发展。如最近山西编制问题的就绪，张学良对于口口旧部的拉拢，北方七省财政会议的召集，蒋介石极力拉拢黄绍雄解决两广问题，召集军官讲话团结干部，派人到各省拉拢小军阀，四川云南等省小军阀的冲突不得解决等等，都是蒋张冲突不可避免的要到来的证据，另一方面蒋介石

对苏区和红军第一次的进攻在全国范围内都是失败，第一军在鄂豫皖边界有胜无败，最近打下黄梅等处，蒋介石派七师兵力去打，无可奈何，贺龙等领导的第四军团在湘西鄂边活动蒋介石也曾派四师兵力打过，也奈何他不得。赣东北的第十军湘鄂边的第十六军很活动，十六军曾在通城解决敌人整个一团，缴枪千枝，闽西龙岩虽失，红军现又向汀州发展，打了胜仗，广西第七军驰突于桂湘粤三省之交，最近到了上犹崇义，不日即可和我们汇合，至于我第一方面军第一次战争的伟大胜利更是影响全国，给反动阶级以一大的威吓，给各地工农以一大兴奋。据近日上海来人说上海工人曾起来热烈庆祝这次胜利，至于江西红色区域，除一些城池被敌人占领，接近这些城池的地方有一部分群众反水之外，有些地方还有发展，特别是广昌、石城、宁都三都七保以至永丰、乐安、南丰等地，新争取了几十万群众，在红旗之下斗争起来，至于兴国、赣县、吉安、吉水、安福，以至北路的群众，都在不怕疲劳的与敌人不断斗争，所以上面这些一方面证明军阀的冲突策略，一方面又证明革命势力的顽强，这样使得蒋介石对于南方各省革命势力的镇压，尤其对于第一方面军二次进攻的企图不得不更为积极些。

蒋介石在江西的兵力，除原有的公、罗、蒋、蔡、毛、许、口等部外，虽然增了王金钰孙连仲两部，数目较前加多，但后方交通须要许多兵力维持，红军第七军来赣，又要抽兵对付，因此实际用上来的兵力将不能超过九师，仍较上次兵力差不很多，加以张、谭惨败兵心较前更加动摇，赤区进兵较前更加困难，敌人方面的弱点，原来是很多的，我们方面，虽然在数量上比不上敌军，但我们有一个最大优胜条件，就是军心团结，大家磨拳擦掌只想打仗。第二龙冈战争之后，我军加强了实力（枪弹政治军事训练等）。第三增加了地方武装，武装了广大群众，统一了地方武装的指挥。第四富田事变的解决，争回了被欺骗的群众。第五争取了三都七保这个最反动的区域，扩大了宁都、石城、广昌、南丰、永丰等地的群众斗争，肃清了部分的地主武装，巩固了战争的后方。第六红军第七军到来江西，给群众一个兴奋，给二次战争一个帮助，所以第二次战争的胜利，是必然归于我们的，只要我们大家下决心，努力的去争取。

（三）逼在目前的第二次战争与我们的准备工作

目前敌人已开始移动，南丰增加四团敌人，王金钰已到南昌，设督办署，王部有到南城说，郝梦龄部到达吉水，吉安有部队增加，并极力拉伕，二次战争的爆发，已一天一天逼近了。加紧准备二次战争的一切工作，是争取二次胜利的必要条件，除关于军事训练工作已有参谋部指示外，本部特将政治方面的准备工作分为红军与地方两个方面指示如下：

第一，红军的准备工作

1　以军为单位召集政治工作人员会议，除口口政治委员，政治部科长以上人员到会外，宣传队长，士兵会主席均应到会。会的口口主要是报告政治形势，二次战争的意义和军中宣传鼓动，计划报告之后，须口口讨论注意纠正各种不正确的见解，与实际宣传鼓动的执行方法。

2　以师为单位，召集士兵大会，主要是报告政治形势，与二次战争的意义。对争取二次胜利做一大鼓动，讲话的人除师长师政治委员之外，军长军政治委员军政治部主任要分别出席。

3　指导士兵会开士兵会，主要是提出争取二次胜利的各种问题来讨论。使士兵对于政治方面的问题，能进一步的了解，对于准备的实际工作能使士兵群众自觉的做起来。

4　以军为单位，在大部队集中后开誓师大会，部队之外要发动当地群众参加，主要意义是鼓动士兵群众，提高士兵群众的作战勇气。在大会中讲话的内容和技术，要简短有鼓动性，讲话中要插入少数口号，鼓起会场的热气，并须有准备的推动士兵提出一些关于作战方面的问题如连坐法等重复在大会通过。

5　在群众会士兵会誓师会中都要讲到军事方面的问题（如作战注意作战经验报告各部队的特殊优点与缺点等）。

6　组织并鼓动作战附近地区的群众做各种参战及鼓动红军的工作，如举行赤色戒严，派代表团对红军慰劳组织担架队欢送红军作战，送茶水粥饭等。

7　政治部应即进行对俘虏宣传工作及宣传品的准备。办到每个俘虏有一种好的宣传品。

第二，地方政府与工农群众的准备工作

1　以县为单位召集各级政府主席游击队长民众团体负责人的联席会，报告政治形势与二次战争的意义，计划白军前进时坚壁清野及参战的工作。

2　以区为单位开群众大会主要是鼓起群众热烈参战。

3　选举有说话技能、观念比较正确的同志组织地方慰劳红军代表团，到红军中鼓励红军作战。来时至好有布置红旗，上面用大字写鼓励红军的口号，写明送给某军，某某地方工农群众或某团体赠送，同时有宣传单告红军战士，能带些慰劳品来更好。

4　准备敌人经过地方的宣传工作，各村各乡应满写着宣传敌人士兵的标语，散布许多简单明了（如几句口号凑弄来）的传单，但口号条数不要多，到处多写相同的几个主要口号。

5　各乡村组织士兵运动委员会，做白军士兵运动。

6　动员群众准备欢送白军俘虏的欢送工作，如俘虏经过的地方政府应招待饭餐，杀猪给他们吃，沿途送茶水饭粥，高呼欢送新同志的口号，由群众送食物给俘虏同时对他们宣传鼓动。

7　地方武装部队参照红军政治鼓动工作准备。

二次作战中红军及地方游击队早晚点名口号：

一、勇敢冲锋！

二、拼命杀敌！

三、拥护共产党！

四、拥护苏维埃！

五、活捉何应钦！

六、打倒蒋介石！

七、二次战争胜利万岁！

八、工农解放万岁！

对白军宣传鼓动口号：

一、白军弟兄是工农出身不要拿枪打工农！

二、白军士兵要发清欠饷只有暴动起来！

三、白军弟兄杀死反革命的官长自己举出官长成立红军！
四、白军士兵不上前线打仗不替军阀当炮灰！
五、白军士兵是工农出身不替军阀屠杀工农！
六、欢迎白军士兵下级官长打土豪分田地！
七、优待白军俘虏兵！
八、医治白军伤病兵！
九、欢迎白军弟兄下级官长来当红军！
十、穷人不打穷人！
十一、士兵不打士兵！
十二、白军是军阀的军队，红军是工农的军队！

主　任　毛泽东

公历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日
闽西苏维埃政府翻印

红一方面军攻击富田的命令

——命令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四日午后八时于总司令部——

(一)敌情见参谋处本日通报。

(二)方面军决先消灭王(金钰)、公(秉藩)两师之敌，拟于后(十六)日从左向富田方向出击。

(三)第三军团为左路军(三十五军在内)，应于明(十五)日进至江树头附近宿营，严密断绝交通。后(十六)日经固陂向富田前进，须于后日午后一时以前攻击富田。

(四)第三军(缺三十五军)为中路(正面)，应于明(十五)日拂晓进到罗坑、张家背、淘金坑一带，并占领白云山、更鼓、石唐、窑子、大垅一带阵地。十六日午前八时开始向桥头江一线攻击前进，得手后以一部追击败走之敌，以一部协助正面之第四军侧击观音崖之敌。

(五)第四军(并六十四师)亦为中路(正面军)，明日以全军进驻东固一带，以一师占领三彩、神弯前一线阵地，六十四师则应位置于蜗斗山之北端，十六日分两路一攻观音崖，一攻九层岭向富田之敌进歼，十六日午后二时猛攻。

(六)十二军(缺六十四师)为右路军，明(十五)日以一部占领大山脑一带主要阵地，牵制由上坊、罗坊、潭头三方向之敌，后(十六)日待我左路与中路得手后，敌全线败退时，则相机向水南追击。如后天右路之敌(上坊、潭头等)不来，则为方面军之总预备队。

(七)一〇四团亦归第四军指挥。明(十五)日应即集结兵力，后(十六)日午前八时相机向大元坑之敌攻击，策应中路军，待敌败走时配合正面军夹河向富田追击，攻取富田河北端阵地，截击由富田溃走过河之敌。

(八)野战医院应于十五日移到东固开设(各军伤兵即送此转后方医院)。

(九)总司令部随中革军委，明(十五)日仍在此地(坳上)，后天则在正面军后沿三彩、观音崖向富田前进。

附记：1. 各部应各带米粮五天。

2. 战后俘虏兵送东固。

此　令

总司令　朱　德

政治委员　毛泽东

红一方面军攻击中村的命令

——命令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一日午后
七时五十分于尧坊总司令部——

(一)据三军团报告，中村有敌高树勋部之一旅，其先头部队于本日午后与我六师之前哨接触，该敌似系掩护后面主力之运动。

(二)方面军决于明（廿二）日攻击该敌，乘势下南团，消灭高师之主力。

(三)三军团任左翼（第二天攻击南团亦任左翼），攻中村之东北端，沿地盘源、张家岭、西源垅三路攻击中村之北，应于明（二十二）日三时由石马出发，六时半到达预备攻击阵地。

第四军任右翼，沿四十九脑向焦坑、罗笔山、牛坑、冈上之线向中村南端攻击前进，须于明晨三时由龙坊一带出发，六时半到达准备攻击阵地（第二天攻击南团时担任正面）。

第三军为总预备队，应于明晨三时由现在地出发，沿童坊、狭江口、下纸棚、木梓脑、伞子坑、中坑、普化庵、濠源、桥下坑策应第四军，相机进入元头宿营，准备第二天(廿三日)攻击南团担任右翼（须向南团严密警戒，并侦察敌情）。

第十二军为总预备队，应于明晨三时三十分在三军后行进，位置于第四军阵地后濠源、桥下坑附近，第二天攻击南团时跟三军之后担任右翼（以韩婆嫲、赖珠亭、中村至松树岩之线为战斗区分线，线以北归三军团担任，线以南〔线在内〕归四军担任）。

(四)如中村之敌退走南团或源头时，则三军团尽量进入通南团方向宿营，三军、十二军、四军都进入元头一带宿营，准备后日向南团攻击。

(五)总司令部及直属队随军委进至东坑附近指挥，明晚则在中村街上接收报告。后日打南团，指挥阵地在上下潮。

此　令

总司令　朱　德
政治委员　毛泽东

致周以栗、谭震林同志信

（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毛　泽　东

以栗同志转边界工作委员会
震林同志转十二军军委：

此次十二军工作区域分得不妥当，清流、连城应让第二军作第二步工作区，十二军中心任务应不是筹款，而是建立深入宁化、石城、长汀三县的工作。十二军担任这三县，卅五军担任瑞金一县，三军担任雩都、会昌二县，均以两个月（七八两月）为限期分完田，建立地方武装、地方临时政权和临时党部，把这四个问题真正的解决，使雩、瑞、石、宁、会、汀六县连成一片，这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十二军两个月要做三县工作不是容易的，二次战争后，四个月中，十二军做了石城一县、宁南半县工作，现在宁南是半色区域，石城是全色区域，过去成绩如此，现要二个月做三县工作是必然难做好的，必定要增加工作时期才行。若推广到清、连二县并且把十二军主力卅四师摆到二县去，那末十二军工作将又是毫无效果。因此，须变更康都决议，把卅四师迅速调返来使他担任宁化全县，卅五师担任石城全县，卅六师担任长汀全县，军直属队在三县之间，望坚决照此布置。

依大局看来过去所拟三军团去二崇，四军去宁安的计划，不但客观上帮助蒋介石打击两广，为蒋介石所大愿，并且要很快引两广的对共行动乃由我们一身遮断两广反蒋视线，使之集注于我们自己，必然要促进蒋粤妥协对共的过程。我们不应如此蠢去南丰以北，目前事实上既不许，整个策略上亦不宜。因一则无巩固政权可能，二则威胁长江，太甚西南北三面都不可，便只有东方是好区域。第一，蒋系地盘无直接威胁两广之弊；第二，地势偏僻即不受威胁，若较之我们出南丰宜黄者为小；第三，有山地纵横无河川阻隔，最适宜造成新战场；第四，有款可筹，一军以内不愁给养；第五，群众很多可以出兵扩大红军。因有这些条件我们应该在这区域作长期工作计划，三军团应以建宁、太宁、将乐为工作区域，以顺昌、邵武、光泽为筹款区域。四军应以归化、清流、连城为工作区域，以沙县、永安、口口为筹款区域，即在三县筹款自给。卅五军以瑞金为工作区域筹款自给，三军以雩都、会昌为工作区域筹款自给，赣东独立师的中心工作区是广昌使之联系建宁与石城。所谓工作区都是要分配土地建立政权的，筹款区只打土豪做宣传，而不分田地不建立政权，工作时期暂定两个月，延长下去可到口个月。敌人来了集中起来就在这个附近打，敌人不来我们就是这块工作下去。十二军在宁化、长汀、石城工作要力戒口口，在石城最近在宁工作之失败（石城游击队尽是流氓富农通

通反了水）要来一个透底的转变，坚决反对群众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如若三县工作再如过去建宁、石城一样，那么军委和三个师委须负严重的责任。

总前委　毛泽东

6月13日下午10时于建宁石城

石城信所说三个月工作时间原缩短一个月因敌进攻紧迫。

致十二军军委并转周以栗同志及边界工作委员三十五军军委信

（一九三一年六月三十日）

毛　泽　东

十二军委并转以栗同志及边界工作委员卅五军军委：

二十一日由石城、瑞金两方面付上一信未知收到否？今日无线电消息，何应钦由南昌进到抚州，称为其前敌总司令蒋介石有密电对何应钦，电首机急，何总司令官速译转第三军团及追击军一、二两路所属各部队，又据郝梦麟电台通报称，本军奉电令仍随卅四师（二十八）由永丰向上行由沙溪推进等话。根据各方面情况判断，敌军定很迅速的向我们进攻已毫无疑义，在此形势决不能容我们此（长）时期做准备工作，大概下月内准备作战，已电令四军及三军团去顺昌沙县立即摆在将乐归化筹款，以十天为筹款时期，自然要以敌情为转移，敌不进不集中；五天为集中时期，集中地点在宁化、石城。昨信说二十二军筹款不是主要任务，宁化、石城、长汀三县群众工作才是主要任务，现在看来筹款和群众工作同样主要任务，并且做群众工作，若布置得多只有筹款有利口决不会妨碍筹款的，大约此信到宁化时卅四师已在清流筹款五天左右，已经筹得相当款子了，应该去信要他们迅速结束清流筹，款开向宁化，布置宁化为重要地点，一面筹款，一面把群众大大发动，做到分配田地。卅五师之一团应在安远，其另一团及师部应去石城，白水工作暂时放弃，因为石城是很要紧的。军直属队在宁化境内，卅六师在三汀（注意做石、瑞、汀、宁县交界工作），这样以主力在宁化、石城两县各有一部，筹款与群众工作两具（顾）及，要达此目的卅四师必须从清流、连城撤宁化，并须迅速撤回才不会妨碍宁化工作，即使清流筹款很有希望亦不宜超过一星期至十天。就是把他撤回，因一星期十天之久已经把款子筹得相当的多了。宁、石、长汀三县工作在目前形势之下只能计划做一个月（一个月后敌容许再延长就是），即是在七月内把三县工作做个大大的多中心点，是要（把）田地分配，如因地域大、宽，部队分配不来，即择重要地点分配，如宁化之安远中沙县城禾口石牛五点，石城之小松丰山县城坪山龙冈大犹坪六点，长汀县之县城馆前，石城及四县交界四点。每处须有一个阶级认识明确，领导强的人去指导，如震林、炳辉、谭政三同志应不在一块，每人专任指导一处，同时需兼任巡视一处或二处，每隔十天集合各军委机关开会一次，震林同志一人普遍地出去巡视，不专任一处亦可。须知团连两级负责人很少能独立指导群众工作而（××）错误的，即师一级师长政委亦很难说每个都有明确的阶级的认识，坚强领导能力，过去各师所做工作之失败就是证明。你们接到此信须根据上述原则重新来一个布置。口卅五军在瑞金工作应注重九堡铅坝武阳围西冈四处，使在一个月内真正的分配土地，而不要去占会昌，西冈市虽属会昌境内，但介瑞、西、雩、东之间，为雩、瑞、会交界之

要地，这处群众工作起来了，影响三县交界很大，所以卅五军应把西冈市的工作放在自己范围内，并使工作迅速收效。井泉同志昭良同志应亲往各处巡视，因为卅五军下级干部更不会做群众工作。

红军通信第二期附上可做士兵的政治课教材。

总前委书记　毛泽东

六月卅日晚于建宁

致谭震林并十二军军委信

（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

毛　泽　东

震林同志及十二军军委：

二十九日宁化的信今日（一日）收到没有？说到卅六师及以栗同志行动不知他们已去长汀否？照你们现在的希望是以筹款为中心。因此，石城方面口口口派何人去，你们现在这种布置可以做一个月，短时期做一星期至十天。一星期至十天满，卅四师在清流连城的部队即行撤回宁化，布置在中沙到长汀界上的线及宁化与石城两县交界的线多多工作起来。百〇四团仍在都工、安远到中沙的一线上，但工作要向江西边界推进，便与江西赤色连接。百〇三团及卅五师师部十天后应去石城布置在三个重要地点工作起来，白水如顾不及，应暂时放弃，第二步再去工作，工作区重新划分，你们只管宁、石、长三县，真正要做好三县工作非长期用大力不可，瑞金为卅五军专管，广昌归赣东独立师专管（赣东特委直接指导），不归你们，建化已经作起工作来的地方暂时归你们指导，这块扩大的红军亦归你们补充，但未起来的地方应归三军团，将来在大局上建宁应划归三军团。

枪弹等由参谋处答复

总前委　毛泽东

七月一日下午一时于建宁

命　令

——八月八号于约溪总司令部——

(一)敌之整个布置见蒋介石八月二号命令，已另录。龙冈有敌第五师四团五十四师两团(昨日未与我军作战的)，加上昨天与我军作战的四十七师五十四师败兵约两团，共尚有敌八团。崇贤方太之蒋蔡部，兴国江背洞之赵观涛部，青塘古龙冈之孙连仲部均在向我军前进，但明日（九号）不能达到龙冈。

(二)我军决心以全力消灭龙冈之敌。

(三)攻击龙冈部署如左：

三军团及七军任左翼，今夜宿营于兰石，担任攻击龙冈之西北端。三军任右翼，今夜宿营于小别，担任攻击龙冈之东北端。四军任正面，今夜宿营于表湖，担任攻击龙冈之南端。十二军位置于四军之后作总预备队，今夜应宿营于表湖附近。

各军明晨（九号）四时一律总攻，务于上午十二时以前解决战斗。

(四)解决战斗后各军宿营地区分于左：

三军团及七军在上固下固缺家坪一带。

三军在小别。

四军在水西、高车、大蕉坑、下车、中塘陂一带。

龙冈圩、表湖、张家车、樊铺一带不驻兵。

(五)明日上午作战时总部在表湖。作战后至夜间，在龙冈圩区政府（圩场的南端），后晨移石路坑。

(六)明日下午七时，各军军长政治委员军团总指挥政治委员均到区政府总部开会。

总司令　朱德
政治委员　毛泽东

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战役计划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四日于广昌发）

第一　情况判断

照一般说来，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反动统治阶级，在进行对全国苏区的四次"围剿"，是利用各苏区连系不易、配合差欠的弱点，逐次转移重兵来实施其各个击破的计划。我们看敌人逐次对湘鄂西、鄂豫皖、湘鄂赣、赣东北等，转移攻势，总未能如其所愿，然而他上述的计划，实已显明。敌人对鄂豫皖进攻的部署，是于某些方面扼守支点，某些方面，使用并列的几个强大的挺进纵队，深入苏区，寻找我主力求战，再以其政治工作的兵团，逐步推移。这一部署，是敌人在每个苏区屡遭红军各个击破和消灭的结果，在目前敌人迅速布置大举进攻中央苏区时，转用到中央区是极有可能的，并且现在已开始要调动部队增援江西，可是，对中央区的这一部署未完成以前，各方大半都是扼守支点，以小部进扰苏区，阻我主力出击，企图以包围的阵势配合经济封锁，遂行其合围并进的"围剿"计划。

现在敌军配置，如标示要图第一（图略）。

第二　战役纲领

本方面军为要策应各苏区红军，互相呼应的作战，乘敌人上述部署未完成的时候，击破敌人一方和连系东北红军起见，拟出敌不意迅速而同时地消灭建宁、泰宁、黎川的敌人而占领其地域。占领泰宁的兵团，并于占领泰宁时即刻拨出一个相当的兵团，直趋邵武，沟通崇安红军。该兵团任务完毕，即归还建制，其余各兵团在达到以上这些任务后，应赤化所在地域及征集红军所需的资材，以利于此后的战役，但须集结主力，常作战斗准备，和集中姿势。

为遂行上述任务时。敌人如从南城、南丰方面（甚或伸到广昌）并列向黎川进攻，则我军向建宁集中而攻击其右侧翼；敌人如从北向南并列进攻苏区时，则我军也向建宁集中与之决战于广、石、宁中间的地域。

其他沿苏区边境之作战地的军队，都应向敌人后方，特别是沿其交通干路的后方，普遍发展游击动作，动员广大的工农群众，瓦解敌人军队来减弱和消失敌人进攻苏区的能力，这些军队的干队，须集结游击于敌人的交通干路。

第三　诸兵团前进开始的地位

1．第一军团——头陂

2. 第三军团——广昌
3. 第五军团——甘竹
4. 第廿二军——巴口桥
5. 总司令部——广昌

第四 纵队区分及其应取的道路

1. 第廿二军为右纵队，应具有消灭梅口铺、泰宁敌人，并出一部兵力直趋邵武，沟通崇安红军之目的，取道尖峰、客坊、均口、梅口铺向泰宁前进。

2. 第一军团为中央纵队，应具有消灭建宁、里心敌人并派一部兵力到康都向南平掩护建宁之目的，应一经广昌、水南、里心向建宁，一经白水、尖峰、客坊、黄泥铺、双溪口向建宁前进。

3. 第三军团为左纵队，应具有消灭黎川敌人之目的，取道干善、康都、西城桥、横村向黎川前进。

4. 第五军团为战役总预备队，应具有援助一军团第二十二军消灭建宁、泰宁敌人之目的，取道干善、傅坊、蛟洋、建宁、猪树下，须于十九日到达梅口铺以西地区，策应二十二军的行动。

5. 总司令部随第一军团取道水南、里心道路前进，占领建宁后，拟移建宁北之安仁。

第五 诸纵队前进的实施

诸纵队统于十月十六日各从所在地开始前进，其并列前进的日到地区如诸纵队向作战地域前进计划表。

本方面军诸纵队向作战地域并列前进计划表

部队 \ 日期 地点	十六日	十七日	十八日	十九日	二十日	二十一日
左纵队	石嘴	西城桥	黎川	黎川	就工作地区	同右
中央纵队	广昌、白水之线	癸洋、客坊之线	建宁	建宁	就工作地区	同右
右纵队	客坊	均口	梅口	泰宁	梅口铺	泰宁
总司令部	广昌	长桥	马鞍桥	建宁	安仁	安仁
总预备队	干善	宁家源	建宁	梅口	泰宁	
附记	中央纵队一路在广昌及其以东地区之线，一路在白水营前之线。	中央纵队如癸洋房子未够，一部应进至癸洋以东宿营。				

第六　预定兵站线

兵站线暂时仍旧，不过由广昌延伸到建宁一段，应取道总司令部所经过的路线，此后应筹备下述的两条兵站线：

1．安远市，石城，固厚，曲阳，到后方办事处。

2．安远市，宁化，沿岗圩，壬田到瑞金。

第七　赤化所在地域和征集资材应注意事项

1．这一战役达到主要任务后，应以一部实行赤化所在地域和征集红军所需之资材的工作，而主力应集结备战。

各军团主力集结地域及其分布地域，如标示要图第二（图略）。

说明：

一、一军团向康都、傅坊、癸洋、客坊、安远市地域派工作部队，而以其主力集结于建宁附近。

二、三军团向黎川及黎川东北和西北地域派工作部队，而以其主力集结于横村、樟村附近。

三、五军团向官仓、均口、猪树下地域派工作部队，其主力集结于梅口铺附近。

四、二十二军向泰宁东北及东南地域派工作部队，其主力集结于泰宁附近。

2．各兵团除一般侦察外，应有计划的派侦察队接触敌人，以利适时集中。

3．应有计划地繁殖游击队，并使健全起来，成为巩固当地苏区的主要条件。

4．征集资材以不妨害发展阶级斗争为主旨。

附记：

1．各兵团须各就行动地带，详细侦察敌情地形并应便道消灭路上的白军团匪。

2．各兵团须注意对空防御，尤其是要隐秘我军企图。

右战役计划第十二号送达

总 司 令：　朱　德

总 政 委：　毛泽东

代总政委：　周恩来

注：原件封面上周恩来同志写有："如有便请送给毛主席一阅"。

〔附〕一九三一年一月至一九三三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战绩统计

年　别	击溃敌军	消灭敌军	俘获敌军	缴获武器	缴获电台
1931	150,000	60,000	52,000	44,000	8
1932	300,000	106,000	71,000	54,900	5
1933	300,000	150,000	75,000	66,800	6
总　计	750,000	316,000	198,000	165,700	19

〔附注〕(一)材料来源：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出版的《红色中华》第一二一期。

(二)统计范围：仅限于主力红军的战绩，游击队和地方部队的战绩未列入。

(三)计算单位：击溃、消灭、俘获敌军以人为单位；缴获武器以枝为单位；缴获电台以架为单位。

〔附〕红军消灭白军一览表

（一九三一年一月至一九三三年三月）

白军师别	被消灭情形	俘虏情形	缴获情形	作战时间	作战地点	胜利的红军	备考
第十八师（张辉瓒）	全师覆没	师长张辉瓒旅长王捷俊官兵近万	无线电一架机步枪迫炮共九千余	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	江西永丰龙岗	第一方面军	该师收容放回俘虏又补充成立由朱耀华任师长
第五十师（谭道源）	消灭一旅	官兵三千余人	无线电一架机步枪迫炮两千余	一月四日	宁都东韶	第一方面军	
第二十八师（公秉藩）	全师覆没	师长公秉藩付师长一官兵四千余人	无线电一架枪炮三千余	五月十六日	东固附近中洞	第一方面军	公秉藩被俘后混入俘虏中逃出后该师收容俘兵又补充成立由王茂德任师长
第四十七师（王金钰）	消灭四团	官兵三千余人	轻重机枪步枪三千余支山炮两门	五月十六、十七、十八日	东固九寸岭	第一方面军	该师溃败后王金钰去职由上官云相任师长又补充成立
第四十三师（郭华宗）	消灭一旅	官兵三千余人	轻重机枪步枪两千余	五月十九日	吉水白沙	第一方面军	该师溃败后郭华宗去职由刘绍光任师长又补充成立
第二十七师（高树勋）	消灭一旅	官兵三千余人	无线电一架机步枪两千余	五月二十二日	永丰中村	第一方面军	
第五十六师（刘和鼎）	消灭四团	官兵三千余人	无线电一架机步枪两千余	六月一日	福建建宁	第一方面军	师长刘和鼎军衣证章均被缴获
第五十四师（郝梦林） 第四十七师（上官云相）	消灭七团	官兵七千余人	无线电一架机步枪迫击炮共六千多	八月七日	兴国莲塘良村	第一方面军	击毙四十七师副师长魏我威
第八师（毛炳文）	消灭一旅	官兵三千余人	无线电一架机步枪迫击炮共两千多	八月十一日	宁都黄陂	第一方面军	旅长曾志远被俘后混入俘兵中逃出
第九师（蒋鼎文）	消灭一旅	团长王铭官兵三千余人	机步枪迫炮三千	九月七日	兴国老营盘	第一方面军	
第五十二师（韩德勤）	全师覆没	师长韩德勤旅长张忠颐以下官兵万余	无线电一架机步枪迫击炮万支	九月十五日	东固附近方石岭	第一方面军	师长韩德勤混入俘兵中逃出，该师由十一、十四各抽一旅重新成立，师长李明
粤军独立旅（范德星）	消灭一团	官兵千余人	机步枪数百支	一九三二年二月	贡州新城	第一方面军	

续表

白军师别	被消灭情形	俘虏情形	缴获情形	作战时间	作战地点	胜利的红军	备考
第三十三师（岳维峻）	全师覆没	师长岳维峻以下官兵万余	机步枪七千余支	二月	湖北广水	第四军团	该师后收容放出俘兵又补充成立由万信任师长
第四十九师（张贞）	消灭两旅	副旅长一旅参谋长一官兵四千余	无线电一架飞机两架营炮十五门机步枪三千	四月十一、二十、二十一日等	龙岩南靖漳州	红一方面军	前敌总指挥杨逢年军衣证章均被俘获
第七十五师（宋天才）	消灭一旅	官兵两千余旅长一团长一	机步枪两千支	四月二日	河南潢川	红四方面军	
新二十师（郜子举）	全师覆没	副师长一旅长一团长五官兵四千	机步枪四千多支	四月二日	河南潢川	红四方面军	
第七十六师（张纺）	消灭两旅	旅长一团长三官兵三千余	机步枪三千	四月四日	河南潢川	红四方面军	张方之二十路三师共十七团被消灭十三团
第三十三师（葛云龙）	全师覆没	师长葛云龙以下官兵七千余	机步枪六千余	四月	湖北蕲水	红七十五师英山独立师	该师收容放出俘兵补充成立由冯兴贤任师长
第七师（厉式鼎） 第三十五师（阮肇昌）	全师覆没	旅长二团长六官兵两万余人	步枪一万三千多机枪一百八十架无线电一架	五月	安徽天安苏家埠	红四方面军	
川军第四师（范绍曾）	全师覆没	团长一官兵四千余人	无线电一架机步枪三千余	六月十三日	湖北潜江	红二军团	师长范绍曾受重伤
第四十八师（徐源泉）	消灭一旅	旅长韩昌俊以下官兵两千余	机步枪千余	三月	湖北天门	红二军团	
第四师（徐廷瑶）	消灭一旅	旅长张联化以下官兵两千多	重机枪三十余炮步枪两千多	一月	应城龙集	红二军团	自动步枪三十余支
第四十八师（徐源泉）	消灭一团	官兵千余人	枪千余	一月	应城龙集	红二军团	系特务团蒋作均部及工兵营与武汉保安团之一部
何主任陈浚副官长兼特务团长（曹振五）	消灭两营	团副一以下官兵六百余人	手提式二十余花机枪五十余支步枪四百余	一九三一年九月	天门皂市	红二军团	系特务团及武汉保安团之一部

续表

白军师别	被消灭情形	俘虏情形	缴获情形	作战时间	作战地点	胜利的红军	备考
武汉要塞司令（钱大均）	消灭一营	营长以下官兵三百余人	机步枪三百余	一九三二年一月	汉阳黄陵	红二军团	
独三十七旅（刘培绪）	消灭一团	官兵七百余	花机枪七十多长短枪六百多	二月	天门黑渡	红二军团	
新三旅（徐德佐）	消灭一团	官兵千余人	机步枪千余迫炮两门	一九三一年七月	荆门沙洋	红二军团	旅长徐德佐后在岳口被我军击毙
第五十一师（范石生）	消灭一营	官兵百余	枪百余	八月	湖北钟祥	红二军团	
新安警备旅（刘正增）	全旅覆没	旅长一团长一官兵千余人	枪八百余	十一月	湖北房县	红二军团	
川军（戴天明）	消灭一团	官兵数百人	机步枪数百支	八月	湖北保康	红二军团	
川军（郭勋）	消灭两营	官兵五百余	枪四百余	九月	荆门厚港	红二军团	
陕军番号不详	消灭一营	官兵百余人	枪百余支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	陕西武关	红二军团	
第三十一师（张印相）	消灭两旅	官兵两千余	山炮三门机枪三十架步枪千多	七月六日	湖北麻城	红四方面军	
第八十二师（容景方）	消灭两团	营长二官兵千余	机步枪七百余	七月	湖北咸宁	红十六军	该师后又被消灭一营并且一营投红军
第四师（徐廷瑶） 第八十三师（蒋伏生）	消灭两旅	官兵三千余	自动步枪五十余步炮两千多	八月十一日	六安	红四军团	
第二十七师（高树勋）	消灭两旅	官兵四千余并击落飞机一架无线电五架	机枪十余步炮共三千余	八月十七至二十一日	乐安宜黄	红一方面军	

续表

白军师别	被消灭情形	俘虏情形	缴获情形	作战时间	作战地点	胜利的红军	备考
新编第四旅（周志群）	消灭一团	官兵八百余	机步枪五百余	十月十九至二十一日	建宁邵武	红一方面军	第二团团长胡廷扬家眷被俘
独二十四旅（罗启疆）	消灭一团	官兵两千余罗启疆受重伤	机步枪两千余	十月	湖北随县	红四方面军	此次作战中尚有李默庵第十肖之楚第四十四蒋伏生第八十三等师均同时溃败
第二十四师（许克祥）	消灭一团	官兵千余	机枪十余架步枪千余	十一月二十二日	南城附近	红一方面军	此次尚李云杰之二十三师同时溃败缴械约一营
第五师（周浑元）	消灭三团	旅长周士达以下官兵两千余	无线电一架机步枪千多	一九三三年一月五日	金溪黄狮渡	红一方面军	该师长胡祖玉于一九三一年在广昌被红军击毙
第九十师（吴奇伟）	消灭二团	官兵两千余	机步枪两千余	一月八日	金溪枫山铺	红一方面军	团长陈云机受重伤此次二十七师残部消灭两团
第十四师（周志柔）	消灭一团	官兵千余	机步枪千余	一月八日	金溪彭家渡	红一方面军	旅长夏楚中受伤
第五十三师（李蕴珩）	消灭一团	官兵八百余	机步枪七百余	一月	江西万年	红一军	击毙团副一
川军（田颂尧）	消灭一旅	官兵千余	机步枪两千余	一月二十日	四川巴中	红四方面军	毙旅长万士义及团长一名
川军（王名章、黄正贵）	消灭一旅	官兵千余	机步枪千余	一月二十二日	四川巴中	红四方面军	
第五十二师（李明）	全师覆没	师长李明以下官兵八千余	无线电一架机步枪八千多	二月二十八日	宜黄蛟湖	红一方面军	师长李明受伤被俘后毙命两旅长均毙
第五十九师（陈时骥）	全师覆没	师长陈时骥以下官兵八千余	轻重机枪百余步枪七千多	二月二十八日	宜黄黄陂	红一方面军	两旅长均击毙有一团长在后方被逃走
第十一师（肖乾）	消灭五团	官兵七千余	无线电一架轻重机枪百多步枪六千余	三月二十一日	宜黄草鞋冈	红一方面军	师长肖乾受伤毙旅长一团长三伤旅长一此次五十九师亦被消灭两团

续表

白军师别	被消灭情形	俘虏情形	缴获情形	作战时间	作战地点	胜利的红军	备考
第九师（李延年）	消灭一团	官兵千余人	轻重机枪数十挺步枪千余支	三月二十一日	宜黄草鞋冈	红一方面军	深夜溃窜时遗下枪炮子弹军用品七八百担
第七十七师（罗霖）	前后消灭一旅					红十六军	
第二十六师（郭汝栋）	前后消灭全师					红十六军	
第六十四师（岳盛宣）	前后消灭全师					红四方面军	

被红军击败溃不成军的

白军师别	溃败情形	作战时间	作战地点	胜利的红军	备考
第六十师 第六十一师（沈光汉）（毛维寿）	死伤约两千全部由兴国溃退赣州	一九三一年八月	兴国高兴圩	红一方面军	蒋光鼐、蔡廷锴通电称此战为该部从未经过之恶战
粤军独三师、独二旅、第四师、第五师	死伤一千八百余溃退南雄始兴龙南各处	一九三二年七月	南雄水口	红一方面军	二旅旅长陈章四师副师长巫剑雄均受伤
粤军第一师、第二师	死伤七、八百全部溃入大庾城	七月		红一方面军	一师长李振球受伤
第一师（胡宗南）第二师（黄杰）第八十八师（俞济时）	死伤千余全部溃窜黄陂	十月	湖北黄安河口	红四方面军	
第一师、第四十四师、第六十四师（刘正华）	死伤两千余	十二月	河南淅川	红四方面军	

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制

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

（一）共产国际一九三〇年七月中国问题决议案，以及以前的决议，明显的指示中国共产党以真正革命的组织群众和动员革命势力对于帝国主义封建制度国民党反革命作开展进攻的任务。然而正在革命高潮生长的紧要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李立三同志的路线占着统治地位的情形之下，不顾共产国际的这些指示，而走到冒险盲动和反共产国际的政策的道路上去。现在人人都明白立三同志反共产国际的路线，给了党极大的损害。要把立三同志反列宁主义的和冒险主义的路线实际施行所产生的一切严重恶果，数个清楚，是不可能的，四中全会现在指出最主要的实际恶果是：党对于群众的影响和联系是削弱了，党动员群众的能力是大大的缩小了，一切群众团体的行动是削弱了，我们的职工运动是向后倒退了，对于罢工运动的领导和组织，我们不但没有进步，反而远远的后退了。党由于立三路线的领导，不但不在革命高涨的条件之下用尽一切方法去巩固党、青年团和群众团体，反而实行在事实上取消群众团体取消青年团和涣散党。别方面，立三同志对于拥护共产国际路线的同志，实行压迫的制度，引导了党内生活到完全非常状态的地步。党的情形这样一般的恶化和消弱，就一方面使托洛茨基陈独秀派的行动，别方面使党内右倾分子的行动，都得以乘机活跃起来。同时好些用纯粹盲动主义的方法去举行了暴动——不估计环境，没有必须的前提和准备——都只是使党在群众之中丧失威信，使我们最积极的干部受到肉体的摧残，使我们的组织在国内最重要的地方受到破坏。扩大反帝国主义运动的任务，却完全被忘记了。党内的领导对于开展非苏区农民运动的日常斗争几乎丝毫都不加以注意，因此对于在非苏区农村中领导，发展和逐渐提高农民群众的斗争，使之能进到直接帮助和参加苏维埃运动的程度的任务，也完全被放弃了。最后，从立三同志立场所发生的极蠢的错误，在苏维埃区域也发生了，这对于红军的巩固和发展有了极坏的影响。当我们多少巩固的后防都不曾有，任何必须的准备工作都还没有进行，当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与群众的帮助的时候，便发出了过早的冒险的固执的指示，去夺取大城市，长沙的失败也是由于这错误的缘故。另一方面，在苏区内，对于立三同志过去的联合富农的理论，没有充分坚决的斗争。对于组织贫农团和雇农工会苦力工会，也没有做任何工作。因为地方党部的完全疏忽与由于立三政策的结果，使富农分子得以侵入指导机关，为他自己利益而获取土地革命的结果。李立三所提议的集体农庄及一切过早的社会主义办法，事实上不能不使富农地位反而更加巩固。禁止贸易自由与土地买卖的指令，使苏维埃的经济状况更加困难。这些错误，使我们和中农的联盟受到危害。使极大多数农民的积极参加苏维埃运动，亦受到危害。李立三的领导，完全忽视建立巩固的苏维埃根据地的任务，完全忽视建立强有力的苏维埃政权机关，并且发出取消游击战争的指令，认为所有这些都是过去的阶段——这样就使现在军阀进攻苏维埃区域的条件之下，我们的阵地是已经大大削弱的状态。所有这些，亦就是红军现在受着严重失败的大部分的原因。同时，没有进行广大的

帮助苏维埃运动的工作，特别是在对于召集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扩大的四中全会在计算立三路线产生结果总结的时候，特别要指出六次大会以来直到一九三〇年六月为止，中央虽然在富农问题黄色工会问题改组派问题等上面，做了许多个别错误，但在一般的正确路线之下，党是有很大成绩。由于立三路线执行的结果，这种成绩中的一大部分已经消灭了。

（二）立三同志的错误不是个别的偶然的错误，而是联系许多错误观点形成一贯的反列宁主义的系统。这些错误观点在实质上是重复了托洛茨基的理论。立三路线否认一般的革命高涨的基础之上世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这就否认中国革命胜利和巩固这一胜利的可能。立三路线与中国革命性质和阶段的正确了解，处于完全矛盾的地位，他用托洛茨基否认革命之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阶段的观点，来代替列宁的革命转变的理论，这就表现他对于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任务，完全的不了解。否认中国国内革命发展的不平衡，不理会中国政治经济的特殊性，所以立三路线就取消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可能。立三路线对于党是革命的组织者作用完全不了解，对于共产主义先锋队和工农群众之间应当的关系亦完全不了解。立三路线曲解而且实际上拒绝了马克思列宁的武装暴动的理论，就在理论上来替冒险盲动主义政策的道路建立基础，并且实际上推动党走上这条道路。在这里有关系的，就是立三说："工人只愿暴动不愿做罢工斗争"。总合起来，立三路线完全和共产国际的路线互相矛盾，不过是"左倾"的掩盖之下的机会主义和对于实际上真正革命的去组织群众的任务的机会主义消极。立三路线的历史根源，是在六次大会形成而到现在党还没有肃清的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立三同志依仗了这样绝对错误的路线，实行了反共产国际的斗争。不服从国际纪律，而用共产国际的"左"右叛徒的理由来说共产国际不知道中国情形，不能领导中国革命。

四中全会坚决斥责一九三〇年六月到八月期间中央政治局的反列宁主义的路线以及他对于共产国际敌视的绝对不能容许的态度。并且特别指出：现在党所遭受的一切严重影响，都是立三同志和赞助他的同志们忽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令和预先警告的结果。同时，四中全会指出中央委员会路线的纠正与一切错误克服，是全靠了共产国际。

（三）共产国际要求党完全揭露立三同志"理论"，在实行中去完全消灭他的一切反共产国际的方针。中国现在的形势，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的进攻苏维埃区域，更加使党必须从半托洛茨基主义的立三路线坚决的转变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决议的路线上去。从这个观点来估量中国共产党三中全会，现在扩大的四中全会指出：三中全会是没有解决这个任务的。三中全会的政治决议案以及和三中全会有关的好些文件都证明这一点：（一）三中全会的政治决议案只指出了立三同志的个别错误，并且在指出这些错误的时候，也是异常温和的。在决议案中间，甚至连影子都看不出。这里问题是关系到一条绝对错误的路线，原则上和共产国际路线对立的路线。（二）这个决议案对于有名的六月十一日决议案还给他肯定的估量，而六月十一日决议案正起了反共产国际政纲的作用。（三）三中全会的政治决议案对于六月到八月期间政治局的政治路线和工作也给了肯定的估计，而这中间政治局的工作里正是半托洛茨基主义的立三路线占着统治地位。（四）明显的从这种错误的对于立三路线调和的立场里面，就发生好些具体的错误——包含在三中全会的政治决议案及其他决议案的个别条文里面。

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案，证明当时党的领导还是没有认识立三方针的全部错误。还没有认识这种方针对于唯一正确的共产国际路线是原则上完全对立的。自然，这决议案没有造成

必要的前提，使党的整个方针有坚决的转变，这些决议案不能够成为揭发立三同志的"理论"和实行上完全克服这些错误的理论基础。

其余和三中全会有关系的文件，错误的程度更大，更加混淆共产国际对于中共所要求的党的路线上的纠正。例如(一)三中全会的告同志书，把政治决议案的措辞更加减轻了，于是使党员们完全不能知道共产国际路线和半托洛茨基主义的立三路线的区别。(二)秋白同志"三中全会的意义"那篇文章，在"实话"第一期上和三中全会决议共同发表了，竟一个字也没有提起错误，更谈不到提起立三的冒险主义的路线了。(三)中央在三中全会之后的通告里，不但没有去揭发立三同志的路线，反而给以根据去解释立三路线是正确的路线，是和国际决议一致的路线了。三中全会总的调和路线，引导到三中全会之后各地党部的工作里，毫没有党的政策真正转变的痕迹。在这个时期里边，北方局、南方局、江南省委和其他党的组织，都通过了不正确的决议。

此外扩大的四中全会指出，党的领导对于共产国际代表有不可容许的不尊重态度。这种不尊重表现在：政治局的几个同志和共产国际代表互相预先同意了对于三中全会政治决议案的修改和词句（其中有关于立三路线和政治局六月到八月期间的工作的估量），可是，虽然讲好了，却没有加进政治决议案里去，而且这又没有预先通知共产国际代表，以致于共产国际代表不能及时的对于政治局里对于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倾向加以纠正。四中全会承认：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的立场，造成纯粹只是字面上承认共产国际的可能，以及对于共产国际代表的不尊重——这里最主要的责任，都应该是秋白同志负的。

(四)虽然政治局十一月二十五日的补充决议（十二月九日也是同样）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最近来信，指出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对于六月到八月期间的政治局工作给了正确的估量，指出立三路线是反共产国际反列宁主义的，这样又向着转变到共产国际方面走了一步。可是因为这一决议的第二条说三中全会一般的接受了共产国际的路线，所以这个决议的意义始终是埋没了，它的政治意义大大的损失了。

九月十六号的通告纠正了政治局的错误和十一月二十五日决议的错误，但是这个通告还有好些错误，这个通告没有宣告立三主义的破产，而说党的危机——党其实正在现在进了克服立三主义的过程，走上健全化的道路。再则这一通告指出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已经就是两条战线上的斗争，这证明对于两条战线上的斗争的了解是不正确的。不错，立三主义是用左倾词句掩盖着实际上的右倾机会主义，然而反立三路线决没有包括两条战线斗争的全部，右倾机会主义可以找到并且已经找到（如郭妙根等）其他的方式去表现他自己。不可忘记对于立三路线之盲动主义作斗争虽是异常重要，但右倾依然是党内目前主要危险。且必须牢牢记得党只有与机会主义盲动主义以及对于他们的调和主义作斗争，并且克服他们，才能站在国际路线基础上，来实行发展革命的进攻。这些在九十六号通告的措辞中都没有提到，这样部分的也就是反对右倾分子的斗争之中解除党的武装——这些右倾分子正在假的反对立三主义斗争的旗帜之下积极活动，来曲解国际路线，站在右倾的立场上来进行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否认右倾危险的存在，和模糊右倾斗争的必要，企图使有些下级组织用不正确的斗争方法来反对立三主义，例如：否认党内有转变到实际工作上去的必要，要求极端民主化，无条件的撤换整个中央与一切犯过错误的领导同志的武断口号，企图把原则斗争变成派别的和个人的斗争，拒绝自我批评等等；或原这个通告说政治局一直到最近只是在继续和加强立三路线，不错，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立场的动摇，使他不能够领导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可是九十六号

通告这样去解释中央转变到共产国际路线的过程却是不正确的，更使党在中央领导之下去实行反对理论上和实际上的立三路线的斗争，发生困难。

（五）扩大的四中全会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最近来信，为着实行共产国际的一切指示起见，对于全党提出下列的最不可延迟的任务：

（1）在理论上和实际上去克服立三路线和对立三路线的调和态度。四中全会着重的指出：要执行这个任务，必须实际执行共产国际的一切指示，必须党的全部工作有坚决的转变，不能够仅仅限于纯粹的口头上的反对立三主义的斗争。四中全会号召全党团结起来坚决执行党当前最重要紧迫的许多任务。

为着执行这个任务起见，扩大的四中全会认为须取消三中全会所补选的赞助立三同志的中央委员，引进反立三主义的斗争之中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到中央委员会里来，并且重新审定政治局的成份，以保障党的正确领导。

（2）党的全部工作里面实行坚决的转变，这个转变之中的主要成份之一，就是实行斗争去反对实际工作上的机会主义，反对消极，反对失望的分子，他们造成各种反党的倾向和偏向的基础，并且也是这些倾向的表现。

（3）恢复已经损坏的党和青年团的组织，改善群众团体的工作，首先是工会，特别应该注意工厂中的工作，巩固和加强支部的活动，党必须认真利用公开的可能，同时必须用尽方法去发展和巩固自己对反帝国主义运动的领导。

（4）引进新的干部，首先是工人的积极分子来做领导工作。

（5）党的全部的各方面的动员，去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进攻苏区，进行苏维埃代表大会和组织工人阶级、农民，反对正在准备的对于苏联进攻——这是最主要的任务。

（6）扩大的四中全会委托新的政治局根据这个决议案，去规定指令和实际任务给各地党部，以代替三中全会的那些决议。

（7）四中全会认为必须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大会，委托新的政治局开始必须的准备工作，以保障这次大会要有各地党部的好的代表，要有对于苏维埃运动经验郑重的总结的可能，要通过党的党纲和其他文件。

（8）四中全会指出：青年团的三中全会接受了党的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的路线，并且反映到它自己的决议案里去，而青年团的中央直到最近期间还未表现过纠正自己以前的立三路线的不坚决，实际上没有执行少年共产国际的路线到实际工作中去。四中全会认为政治局已经执行的改变青年团中央的成份是完全对的，青年团中央在改组以后确实已完全站到国际路线上去工作。四中全会同时批准在最近期间召集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第四次全体会议。

（9）扩大的四中全会依照国际的指示，纠正了党的政治路线，解决了党内问题和革新了党的领导，去保障这一路线的执行，四中全会深信，全党将像一个人一样的团结起自己的队伍来，和睦的以布尔塞维克的精神战胜一切困难，担负执行它当前的重要历史中心任务。这就是党的新的成功，这就是中国革命高涨的继续和必然的向上发展中工人群众的新胜利的担保。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

（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通过）

在一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关于全总党团及江苏省委报告的决议案发表之后，右派小组织以罗章龙为领袖的活动，不仅没有停止，并且公开的发表反党的小册子——“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中央政治局认为这一个问题更加严重，特成立下列决定：

一、这一反党的小册子，是右派小组织反国际的整个纲领之最具体的表现，而为罗章龙所主持的（便是与他同道者西更同志*也不能否认这是章龙编印的）。罗章龙在这小册子上，学尽取消派反党反国际的口吻：第一，他是公开地“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的；所以他说四中全会是“助长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发展，是比三中全会更可耻的会议”，“是丝毫没有民主化的包办式的会议”，而继续“号召全党同志为召集自下而上的紧急会议而奋斗……成立临时中央，主持紧急会议”。但是四中全会是在国际路线下，在国际代表领导之下而为国际所批准召集的。四中全会的结果，又已为共产国际所承认。所以反四中全会即是反党反国际的；并且罗章龙所继续号召的紧急会议与主张成立临时中央，更是露骨的分裂党的第二党的主张。这样，他便更进一步的反对国际代表，“向共产国际建议立即撤换负四中全会主要错误责任”的国际代表，但是，国际代表是百分之百的执行国际路线来指导中国党的，所以反国际代表实际上即是反国际——这是陈独秀以及一切反共产主义“左”右叛徒所用惯的把戏。第二，他更等于向敌人公开告密，说四中全会是国际代表某某领导；这简直是反革命的行动，因为这种宣传，除掉便利于敌人的巡捕房、警察局外，再没有其他意义。第三，他说“立三路线……造成党中央领导的破产，革命的巨大损失”，这一估量的根本思想是在本年一月一日他所起草的全总党团决议案上。这一决议上说：“立三主义是破坏了党与团的组织，是破坏了工会与其他群众的组织，是破坏了红军，是破坏了中国革命。”这种不正确的估量，正是暴露他自己对于革命的失望，其目的是要得出取消派的结论。根据这种估量来借口反对整个领导，用意是在破坏我们的党。因此，他说“中央的威信是丧失得干干净净，中央的领导在政治上早已完全破产”，恶骂中央“暗中秘密布置四中全会……证明中央所采用的方法是与国民党官僚黄色工贼同其性质”，所以他主张“立即停止中央行使职权”，“根本改造政治局”（即是全部撤换）。这与取消派的估量和要求完全一样。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将中国党从革命斗争紧张战线上拉到右派的退却路线上来。最后，他自然就暴露了他一贯的反六次大会的立场，他认为中国党六次大会是在右派布哈林领导之下采取了调和立场的；其实中国党六次大会是在共产国际直接领导之下绝对正确的，不仅布哈林的右倾路线没有在那时暴露，便是布哈林演说

* 此地所写的西更即已经反革命的徐锡根。

中的个别错误，也没有为大会所接受，怎能说到是调和立场？这样，就更加证明他的右派纲领与取消派一般无二。根据这四点，已足证明罗章龙的思想和行动，已经不是无产阶级队伍中人了。

二、这一反革命小册子的印行，完全是罗章龙把持全总党团机关用以进行其反党的右派的小组织之最具体的产物。同样，在一月以后，罗章龙主持的全总党团，除掉成立一月一日的右倾决议案外，并在一月十七日公开号召与领导全总党团反对四中全会，反对国际代表，实际上就是反对国际；在组织上派遣被他煽动的同志到各省（如满洲、河北、山东、广东等省）去进行反党的右派小组织活动，最后他还抵抗中央政治局一月二十日决议的执行，丝毫不改变他的反党行动，而且还鼓动全总党团同志拒绝移交全总党团的工作。这一切都表示他没有丝毫诚意来在全总党团执行国际路线，而是在假的反立三路线旗帜之下，利用全总机关作为进行第二党的组织与活动的大本营。

三、罗章龙这种反党反国际反六次大会的活动，决不是偶然的；他远在六次大会前陈独秀时代和两湖秋收暴动时候，就犯了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在六次大会上，他并没有承认任何他自己的机会主义错误，而且提出了不要任何旧的中央委员当选新中央委员的主张，当时是遭了国际代表与最大多数到会代表反对的。六次代表大会后，他对于六次大会路线的执行是机会主义的消极，在全总的工作可以做为证明。并且有些政治问题，是常常暴露他的右倾观点的，如对六次大会后至去年六月以前的中央路线是否正确不回答，对那时期党的进步不回答，认目前中国革命运动还不是高涨时期，他一直在四中全会后还是如此坚持。并且在四中全会上，他领导了少数同志，反对四中全会，反对国际代表，反对国际路线，并声明退席。会后，他又在四中全会决议案修改委员会上举手反对四中全会决议案，所以他结果便拥护与取消派一类而已被开除的王仲一（他公开说他自六次大会以来反对中央一贯的路线）来参加紧急会议。在国际来信前，党内反立三路线的斗争中，罗章龙是一贯的采取消极态度。国际来信后，他便由机会主义的消极进而站在公开的右倾机会主义立场上来反对党反对国际了。尤其是他所进行的右派小组织，欺骗一些同志到环境不允许而对党秘密的地方去开会，便利敌人以破坏我们的机关，这是要罗章龙负主要责任的。

四、根据以上这一切反党反国际反六次大会之反革命的行动，罗章龙是一刻不能停在党内与无产阶级队伍中了。中央政治局特决定开除罗章龙的中央委员与永远的开除罗章龙的党籍，并报告共产国际请求批准。

五、中央政治局特要求全党同志在深刻的认识罗章龙这一类反党的行动中，必须坚决的与罗章龙右派小组织作无情的斗争。要从思想上到组织上完全与他分开，并且与他完全隔离起来。中央政治局更号召被罗章龙右派小组织所欺骗所蒙蔽的同志，应立即醒悟与彻底认识自己的错误，而回到党的路线上来，并且要向全党公开声明这一右派小组织的一切活动的经过与罪恶。

六、这一决议一直发到支部去，使全党了解开除罗章龙，将是全党在反立三主义反调和主义的热烈斗争中解除右派武装的开始，将领导全党拥护四中全会执行国际路线更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去，执行坚决的转变，而加速中国党的布尔塞维克化的过程。

〔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

（一九三一年一月）

（罗章龙右派纲领）

为彻底肃清立三路线调和主义坚决执行国际路线而斗争！

正当中国革命新的高涨的生长时期中，中国革命迅速发展的进程是愈加重了我们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不幸，在这个时候党的中央立三路线发生了根本原则上的完全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共产国际的路线，造成党中央领导的破产、革命的巨大损失！

全党同志为端正党的领导，保证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的迅速胜利，站在布尔塞维克的立场上坚决与非无产阶级的立三路线及其拥护者作无情的斗争，在这个长时期斗争的经过中，是已遭受了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顽强的抵抗，并遭受了他们的种种无耻的欺骗和诬蔑，在紧急会议被破坏四中全会举行之后，立三路线中央的背叛阶级利益的罪恶是愈加彰著了，全党同志为国际正确路线而斗争也就是为阶级革命胜利而斗争的责任是更加严重！

因此，每一个布尔塞维克的党员，在今天应该有一种严重的责任，为肃清立三路线及调和主义，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勇敢坚决为着国际路线而进行布尔塞维克的斗争！

(一)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立三路线是完全破产了。

中央立三路线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路线，立三路线统治着全党已经发生了很严重的结果，使党与革命受到不可计算的损失，这证明中央的立三路线的领导现在是完全破产了（至于立三路线的实质、历史根源及其对于党与中国革命的恶果，参看另发之材料，此处不重述)。

(二)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比立三路线更加危险。

中央立三错误路线曾经过共产国际的指斥和党内同志不断的反抗，但是中央始则用顽强的态度敌视共产国际的意见，用家长制度惩办手段压迫党内同志的自我批评，后来国际一九三〇年七月间中国问题决议案等来到中国之后，中央召集三中全会，在三中全会上中央更狡狯地模糊混淆着两条原则上不同的路线（国际正确路线与中央立三错误路线),硬说过去中央路线与国际路线完全一致，同时否认立三路线的存在，对于全盘皆错的六月十一日中央决议还认为是正确的，又在三中全会根据立三路线补选新的中央委员与政治局委员，因此三中全会是公开保证立三路线继续执行，是更加有力阻遏党内同志反立三路线的运动，所以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只是立三路线的变本加厉，只是扩大和延长立三路线的恶果，只是推迟了对于国际正确路线的执行达六个月之久，增加党与革命更浩大的损失，是比过去立三路线还更危险的东西。

(三)三中全会后有系统地重复做着许多错误继续执行立三路线反对国际路线。

三中全会闭幕后，共产国际最后寄来一封长信，当时党内同志反立三路线及调和主义的斗争在全党已经到处普遍起来，中央一方面是用压迫手段阻挠党内同志反立三路线的运动，

另一方面是用挑拨离间的造谣诬蔑对付一般积极反立三路线的分子，但是结果都归无效，中央受着党员群众的威迫不得不从事修正三中全会决议，做出更无耻的几次补充决议。中央在十一月二十五日补充决议说“三中全会路线是一般的接受了国际路线”，禁止讨论立三路线并限制国际来信及二十五日决议只可达到地方党部，在九号补充决议仍然掩饰调和主义的更大危险性，在九十六号通告仍然是一贯的调和主义，只是表面上承认立三路线的错误，纸上接受国际正确路线，在消极的承认中央政治局的错误的时候根本抹杀了反立三路线与执行国际路线的实际任务，取消了国际来信所指示的各项迫切任务的主要内容（如苏维埃任务、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等），同时对于立三路线来源只是片面的认识（认为是盲动主义的残余），立三路线与调和路线对于党与革命的损害估量得非常不够与模糊，尤其错误的是认为反立三路线便包含两条战线的斗争的右倾观念，松懈了对于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的攻击，至于三中全会后，党的中央仍然继续立三路线的统治，中央在这期间是自觉的有系统地重复做着许多错误，没有丝毫诚意的接受国际路线。

(四)紧急会议是执行国际路线建立党的正确的领导保证党领导中国革命胜利的必要步骤。

立三路线是完全破产了，调和路线更使党的危机加深，革命受着更大的损害，这证明中央已无领导革命的能力并缺乏对于阶级的忠诚（四中全会政治局报告公开承认中央自觉的反抗国际），中央的威信是丧失得干干净净，中央的领导在政治上组织上早已完全破产，一般党员群众的呼声不是要修改三中全会决议，而是要根本废除他，废除历次补充决议，一致向国际代表要求立即停止中央政治局行使职权，由国际领导反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的中央委员组织临时中央机关，召集党的紧急会议，从根本的解决政治上组织上诸问题。

紧急会议的要求是围绕着广大的党员群众，是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的，是要求改变党的错误的领导使回复到正确的路线，对于紧急会议的建议如下：

(1)紧急会议列席成分必须以坚决反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的党的干部与群众组织中的干部同志为主要成分。

(2)彻底接受和坚决执行国际路线。

(3)取消三中全会的决议和选举。

(4)正确估量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彻底予以肃清。

(5)根据国际七月决议及最近来信，汇合全党各方面工作经验，郑重规定党的总任务，党的组织问题，职工运动问题，农民运动问题，土地问题，苏维埃问题等决议案（关于这些问题的正确意见，散见反立三路线各文件中，不久将另整理整个意见提出）。

(6)根本改造政治局。

(7)确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日期（与七次大会密切有关的即目前急须恢复党内民主，进行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发表反立三路线的决议与文件等）。

(8)执行铁的纪律，处罚有系统的坚决执行立三路线及调和主义的中央主要负责分子。

(五)为紧急会议而斗争。

围绕在紧急会议周围的是反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最坚决的广大党员群众，尤其是党的下层组织与在工会及其他群众组织中工作同志，他们是不约而同的起来作无情的斗争，就现在所知道的一部分说，已经包含有中央委员之一部分，全总党团、海总党团、铁路总工会办事

处党团、上海工联党团、上海反帝同盟党团、苏维埃区代表团全体同志、苏准会工作全体同志、江南省委外县委员会书记全体同志、北方天津党部、山东省委、青岛市委、上海各区委（闸北沪东沪西沪南沪中等）及上述各地的所属多数产业支部、中心支部、中央直属小组以及全国积极的工会干部同志等（青岛上海天津武汉海员铁路苏区厦门等地）。中央在党员群众威迫之下，知道简单的高压政策决不足以继续维持其错误的领导，这样便采取了种种非无产阶级的手段，用欺骗的方式向党员群众假装着接受紧急会议的要求，以和缓同志们的反抗，例如中央向全总表示决定召集紧急会议并书面通知全总党团负责人起草紧急会议职工运动决议案，忠发在中央工作会议全国济总党团及苏准会工作同志报告中央已正式决定召集紧急会议（会议的成分规定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中央委员参加者不超过四分之一等等），秋白恩来到闸北区到沪中区做报告时均详示服从区委同志决议，赞成紧急会议，国际代表屡次向全总负责人员表示均言全总党团决议的正确并声明政治上组织上保障其胜利，同时却在暗中秘密布置四中全会，这一切都证明中央所采用的方法是与国民党官僚黄色工会工贼同其性质，另方面证明紧急会议的召集是急不容缓之举了。

（六）立三路线派及投降分子破坏紧急会议。

立三路线派是极端仇视紧急会议的，因为他们知道紧急会议必然是要葬埋立三主义及其统治的，同时还有那些在思想上同样犯有立三主义错误的陈绍虞等自然是怀着同样的恐慌，因为陈绍虞等过去是站在左倾的口头上的反对立三路线的，他们在中央工作人员会议讨论六月十一日决议案时是完全同意立三路线的总策略的（即布置全国暴动总同盟罢工等），他们是用左倾的口头禅认为全国已有直接革命形势，而说六月十一日的估量为过低的，他们在三中全会后是承认“三中全会有重大的意义”，认为立三主义只剩有“残余”只要中央承认错误“可以避免争论”（引文见陈绍虞十一月十三日意见书），因此在紧急会议运动迅速发展之中他们是用种种不正确的宣传破坏紧急会议的工作，他们说：“立三主义已不存在”，“反立三主义的理论争斗应该停止”，“国际路线已在党内完全实现”，“中央省委已承认错误同志便不应该再谈改造党的组织”，“紧急会议是左倾分子的活动”。这些便是证明立三派及投降分子等是时时在企图破坏反立三路线的运动继续维持立三路线的领导，并且他们这种企图是受着国际代表米夫不正确的指使，米夫是公开地向着全总党团、工联党团、海总党团负责人用左派别的观点估量反立三路线的整个运动，命令他们离开反立三路线的运动，服从陈绍虞等领导（自然上述各党团负责人是当面拒绝并指斥了他）。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们便暗中布置合于旧中央及陈绍虞小组织派别的目的的四中全会以代替党员群众需要的紧急会议。

（七）四中全会的经过。

四中全会的召集，原则上与党员群众们所提议的紧急会议完全两样。第一，参加会议的成分是由中央政治局自由指定的，主要的分子是中央政治局本身三中全会补选中央委员罗迈贺昌等中央机关工作人员，长江北方南方各局的书记，这些都是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积极分子，他们占列席总人数的多数。第二，四中会议的举行，除上述诸分子之外，中央对其他被召列席的坚决反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的中央委员及群众的干部同志是全守秘密的，他们在赴会之前是完全不知道会议的性质及会议内容的，因此引起各列会的群众中干部同志的愤怒与严重质问，并一致声明保留其对于紧急会议的意见。第三，会议与讨论时间是非常短促的，全部会议以时间规定仅仅十五小时，每人发言不得十五分钟，因此有些同志因时间限制连第一次发言都没有允许，这完全表现是丝毫没有民主化的包办式的会议。

(八)四中全会是没有解决党的政治上的组织上的主要任务，并且保证立三派的继续领导。

四中全会做了些什么呢？第一，中央政治局在四中全会中拒绝同志们提议在肃清立三路线实行国际路线原则之下讨论党的总任务及诸项重要工作问题，这些不可再迟延的重要议事日程是被调和主义的政治局始终忽略认为不足轻重的和不需要的。第二，十一月二十五日补充决议明明是用调和主义的观点说"三中全会一般的接受了国际路线"，但是四中全会不敢明白指出，反说"二十五日决议又向国际路线走了一步"(紧急通告已宣布废除三中全会及二十五日决议，四中全会连这一点都不肯承认)。第三，及九十六号通告中央站在离开领导的立场，只是消极的承认错误，忘却了目前党的迫切的紧急实际任务，同时在分析立三主义来源上，在指出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就是两条战线的斗争上，在估量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等等地方，都犯着严重的原则上的错误（理由可参阅一月一日全总党团对紧急通告的决议)。这些错误都是从调和主义来的，但是四中全会对于九十六号通告却认为完全站在国际路线的基础上是正确的。第四，正因为上述这些原故，所以四中全会对于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及组织路线实际上是赞助的，在决议案中虽然表示过要取消三中全会的补选，但结果三中全会的补选除贺昌罗迈之外其余多数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分子更加了一重保证，并且在四中全会上公开拥护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积极分子，把最高指导机关的中央解释成为教育错误同志，试验那些几年以来从陈独秀到现在一贯的机会主义分子的地方，因此周恩来向忠发项英任弼时等仍旧继续中央政治局的领导，李立三瞿秋白仍使其隐藏中央委员会之内，对于毫无工作经验同样犯有立三路线错误的陈绍虞等使其加入政治局负领导重责。第五，在会场上很明显的中央政治局及其从属的上层机关调和主义分子的主张是一方面，坚决反立三路线的中央委员及下层群众干部尤其工人干部分子的意见是另一方面（几乎没有一个例外)。中央是有计划的指定列席成分造成自己的多数，实际取消会场的民主，垄断选举并加反对者以种种罪名（如"反国际""右倾""取消派""暗探""小组织倾向""无原则的派别纠纷"等等)。

(九)反对四中全会要求在共产国际正确领导之下召集紧急会议。

四中全会的结果，政治上是调和主义的继续，我们认为不是国际路线而是米夫曲解国际路线，并且米夫自己站在派别观念上故意制造派别，造成党的纠纷，这里更明显的是组织上的立三主义一贯组织路线（家长制度命令主义）变本加厉的继续发展，虽然表面上引进了一部分工人同志，但实质上仍继续着小资产阶级书生的领导（如周恩来陈绍虞等）四中全会是助长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发展（如九十七号通告充满了立三路线及调和主义精神)，是比三中全会更可耻的会议，实际阻碍了国际路线的正确执行及反立三路线运动的进行，因此我们应站在国际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立即推翻他的全部决议，向共产国际建议立即撤换负四中全会主要错误责任的米夫，并号召全党同志为召集自下而上的紧急会议而奋斗，要求国际重派正确的代表领导坚决反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中央委员，成立临时中央，主持全国紧急会议，解决党的政治上组织上的迫切问题。只有在紧急会议中产生新的中央，由它召集和主持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才能保证第七次大会的真正胜利，我们反对四中全会产出的调和主义的中央的领导，反对他们召集和包办的第七次全国大会。

(十)拥护共产国际要求撤换负四中全会主要错误责任的米夫。

现在立三派及投降分子陈绍虞等小组织是到处继续造谣诬蔑恐胁欺骗那些积极反立三路线反四中全会的同志，他们最主要的借口便是说"四中全会是国际领导的，反四中全会便是

反国际”，这种说法正如李立三及其党徒在三中全会时对于当时反对三中全会同志的诬蔑同一口吻。我们知道当时国际代表领导三中全会犯有错误，他曾经反对“把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对立”又说“党的路线与国际路线相适合的，从来没有两条路线”(引语见远东局代表致三中全会的信)，我们是曾经反抗过这种错误的，并且现在已经证明我们这种反抗正是为忠实国际路线而斗争。这次米夫领导的四中全会是本其在六次大会时附和右派布哈林调和主义的立场及其私人派别的成见，完全抹杀党员群众的意见，重复着做出严重错误，显然是违反共产国际的原则，这是毫无疑义的，因此只有坚决的要求国际撤换他的职务，纠正他的错误，才能使肃清立三路线执行国际路线的障碍彻底铲除。

(十一)号召全国团的同志为反四中全会召集紧急会议而斗争。

立三主义取消了团的组织，是青年运动的极大障碍，立三主义在团里面还有很深厚的基础，团的中央是顺从着党的中央系统地做着错误，因此在反对四中全会力争紧急会议的运动中，党的同志必须领导团的同志，赞助团的同志在少共国际正确指导之下，从下而上的召集紧急会议，实行向团中央的立三主义调和主义作无情的斗争，解决团的路线问题与组织问题。

(十二)反对斗争中的不正确倾向。

我们要在思想上组织上实际工作上坚决反立三路线调和主义到底，并且要时时注意站稳布尔塞维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坚决的正确的作两条战线的斗争，与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奋斗，尤其是反对党内最主要的右倾危险，反对托陈取消派分子乘机混进党内活动的阴谋，反对李立三及陈绍虞等小组织的活动，并且要在不断的以正确的彻底的自我批评来检查立三路线长期统治之下全党在各方面工作中及思想上工作方法上所犯的一切错误，同时要在加紧实际工作中去坚决反立三路线调和主义，以完成国际路线所指示给我们的迫切任务。

(按：“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刊印，原件无标点。)

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

陈 绍 禹

三 版 序 言

这本小册子于一九三一年二月在上海出第一版，当时名称是“两条路线”。于一九三二年三月在莫斯科再版，当时因为作者加写了“再版书后”，所以改为现名“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

时光荏苒，我们党反李立三路线和反罗章龙路线底斗争，迅已将近十年。十年来的历史事实，完全证明了李立三路线和罗章龙路线反革命的本质。罗章龙及其亲近的信徒们，早已作了反革命的公开侦探走狗，李立三路线也全部宣告破产。同时，反李立三路线和反罗章龙路线的同志们，有的则已英勇为革命牺牲，有的仍始终为革命奋斗，这便是斗争双方是非曲直的最好证明。

反李立三和反罗章龙路线斗争距今将近十年了。本书已经成为历史的文件，本无再出版的价值；不过因为我们党近几年来有很大的发展，成千累万的新干部新党员，对于我们党的历史发展中的许多事实，还不十分明了。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但莫斯科出版的本书，在延安份数甚少，因此，好些同志要求将此书加以翻印，这就是本书三版的动机。

当本书第一版时，作者曾在几点必要的声明里说：“这小册子的内容，虽然有些个别的词句上——甚至某些个别问题上，有些不十分妥洽的地方，但我在今天看来，也没有再加修正的必要，因为在我个人及反立三路线斗争中，这已经是一个历史的文件，我自己应该保全它的真实性，批评指责，只有听诸全党同志。”这一段话在小册子三版的今天，也还适用。因为任何人的思想，历史的事实，都是向前发展的，都是整个发展过程中的一定片段，而当事过境迁之后，再去审察已经过去时期的事实和理论，当然比当时当地当事人容易明白得多。但是，每个忠诚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不能离开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来看待和处理问题，不能把昨日之是，一概看作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断定不能作为昨日之是。同时，也不能把此地之是，一概看作异地之非；或把异地之非，一概断定不能作为此地之是。一切决定于时间和空间，一切决定于当时当地所处之各种具体条件和具体环境。因此，如果我以今日的见解，来修改十年前关于具体问题的历史性的著作，则是去掉历史和事实的真实性，这一点是不应当的。因此，除对个别词句作必要的注释或修正外，我对于本书现在不作任何重要的修正。

我们党进行反李立三路线和反罗章龙路线底斗争距今已十年了。当时参加这一斗争的许多主要同志，已经离开了人世！何子述同志早已在北平监狱内痛苦而死；沈泽民（即书中所

写的则名）同志早已在鄂豫皖苏区病饿而死；陈原道（即书中所写的列甫）同志早已在南京被反革命所屠杀；夏曦（即书中所写的劳侠）同志早已在红二方面军工作时英勇牺牲；殷鉴同志早已因在北平监狱中多年磨折而病死；张孑之（即书中所写的戒知）同志早已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与反革命奋战阵亡。当本书三版之际，抚今思昔，缅怀为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而殉难之各战友，无任怆然！本书之三版，或亦可作为对已故诸战友之一点纪念！

最后，附带说明一点，本书初版、再版时，均用“韶玉”这一笔名，此笔名，作者开始用于一九二八年夏季作者与其他同志所译关于武装起义问题之一书上（此书系专为我党六次大会代表看的，作者在前面曾用韶玉笔名写有序言）。其后，因秘密工作关系，作者在编“红旗报”“劳动报”和“布尔塞维克”等刊物上曾用过各种笔名，如：慕石、兆雨等等。王明这一笔名，系在一九三一年底开始采用的。近年来汉奸托匪份子，在许多刊物上故意发问说：“为什么陈绍禹又叫王明呢？”把这说成好像“不光明”的事，企图以此来迷惑还未参加革命工作的青年。其实问题是很简单的，每一个革命者在反动政府压迫之下，不能不随时改换姓名的，这是不得已的但同时是最光荣的事情。这些专门出卖革命者的血腥人头贩子，大概到现在还悻悻于怀地问我说：“你原来为什么不写陈绍禹于上海，而写韶玉于武汉呢？”换句话说，他们很不高兴他们几年以前未曾捉到作者去领取那十万元至十五万元的赏格。当然，对于这种人有什么道理可说？对于这种人的言论根本没有驳斥的价值。但是当本书三版之时，作者已能用真姓名问世，为使读者明白前后署名不同的原因，故特附志于次。

陈绍禹　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九日于延安

写在前面的几点声明

一、这一本小册子，原来只是集合作者在反立三路线时所写的几篇意见书而成的，所以当时命名为“两条路线”——“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现在因为再版序言的增写，原来题名已经不适合了，特将它改名“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

二、再版书后，一方面是为的补充对立三路线各个问题底说明，另方面，是为的阐明反罗章龙路线底斗争。

三、小册子后面附录的那几种文件，可以帮助同志们更加明了反立三路线及反罗章龙派斗争的主要内容。

四、同志们要想更详细地研究反立三路线的问题，必须想法购买苏联伯力国家出版部远东分部一九三一年所出版的“反立三路线”的文集。这文集里面有共产国际关于立三路线致中共信，有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有各种反立三路线的文章。

韶玉　一九三二年三月于庐山

编 辑 部 的 话

共产国际执委十二次全会底政治决议指出：“在中国，有革命形势，而且在很大一部分领土内有苏维埃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近年来的发展和胜利，与中国苏维埃革命底唯一领导者（共产党）内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密切关联着。韶玉同志底这本小册子，反映出两年来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底实际内容。这本小册子，是中共进行两条战线上斗争的武器之

一。因此，这本小册子不仅有很大的历史的原则的理论兴趣，而且有很大的迫切的实际政治意义。

这本小册子，在国内早已出版了。可是，直到现在，国外侨居的同志们，还不是每个人都已经读过了。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编辑部就把我们从国内接到的一份拿来翻印，以供给我们的全体同志以及一切注意中共布尔塞维克化问题的读者。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七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周年纪念日）

几点必要的声明

一、这本小册子是在三中全会决议发出后，利用那时立三同志等停止了我的一切工作的空闲时间来写成的。小册子的第一部分是根据我对于六月十一日决议在中央工作人员会上的发言原则（这一发言我有书面东西交中央）写的，第二部分是根据三中全会决议及当时发表的国际几种决议材料写的。在接到国际十一月关于立三路线来信时，我检查我所写的这一小册子的内容，与国际路线没有原则上的任何不同（当然有许多问题，我没有国际来信所说的那样深刻），不过只在小册子后面又加写一段关于“维它同志等对于国际最近来信的态度”的那一段，同时，加写了前面一个引言和后面一段组织结论。以后又开始了实际工作，所以没有工夫继续写下去，以致不能批评中央九六号通告以前及九六号通告本身错误的东西。

二、这一本小册子是差不多费了半个月时间写成的，当写的时候，多半是写一点被同志们拿去看一点，所以文气有许多不十分衔接的地方——或者重复的地方。

三、这一小册子在国际来信前的一个时期中，的确曾经起过相当的反立三路线及对立三路线的调和态度的纲领作用；虽然当时只匆促的抄过三份，但是曾经过几十个积极反立三路线的同志们看过的，有许多地方也曾经因看的同志的批评或建议而加以补正过的。

四、这本小册子的内容，虽然有些个别的词句上——甚至某个个别问题上，有些不十分妥洽的地方，但我在今天看来，也没有再加修正的必要，因为在我个人及反立三路线斗争中，这已经是一个历史的文件，我自己应该保全它的真实性，批评指责，只有听诸全党同志。

五、四中全会后，反立三路线及对立三路线的调和态度的斗争，绝未有丝毫的结束，而只不过是在国际路线的领导之下来从理论上实际上真正进行反立三路线的开始；我感觉到我这一小册子对于反立三路线及对立三路线调和态度的斗争，还是有相当的帮助的；因此，我便把它整理出系统的节目来（原来是多少次继续写的，没有目次），请求中央将全文向全党同志发表。

韶玉 一九三一月二月十日上午于武汉

两 条 路 线 底 斗 争

拥护共产国际的正确的列宁主义的路线，反对以李立三为领导的反共产国际的路线。

1 引　　言

中国共产党从第六次大会以来的两年中，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有很大的成绩。在李立三路线未正式形成以前，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一部分领导同志们虽然犯过许多个别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如联合富农、改组派估计的问题等等)，但在总的政治路线上，还是执行了共产国际及党六次大会的指示。当然，我们深刻相信：如果没有这些个别的政治上机会主义的错误以及组织上陈独秀主义的残余，则在成千累万的英勇同志以及他们所领导的千百万广大工农群众的奋斗努力之下所得到的成绩和进步，要更多和更大些。自中央政治局今年（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一日政治决议案发表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内一部分同志便正式形成了一条以李立三为领导的反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是与共产国际的路线不能并存的。李立三路线在它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已经给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以部分的损失和打击。现在共产国际的列宁主义的路线与李立三的反列宁主义的路线正在作残酷的斗争，每个中国共产党员应该下最大的努力来从理论上实际上认识立三路线的真面目，来坚决无情地反对李立三路线及对这一路线采取调和的态度，来彻底卓绝地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以取得和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

2　李立三路线底理论与实际

一　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

一　对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的估计

要正确了解现在国际形势，首先必须了解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一历史时期的特点——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的特点；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不正确，就产生了现时共产主义运动中右倾机会主义的派别。共产国际与右倾机会主义者对这一问题的主要分歧点，就在于：共产国际肯定，"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是资本主义一般危机增长起来，而帝国主义内外矛盾日加剧烈的时期，此时期的矛盾将要达到伟大的阶级冲突，将要达到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将要达到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浪潮之发展，将要达到殖民地反帝国主义的大革命。"（见"共产国际执委第十次全体会议的政治决议"）以布哈林为首领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则以为"第三时期具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时期"，是"资本主义的新的工业革命的时期"（美国罗佛斯通），至少是与战后资本主义第二时期没有什么真正区别的时期（维它同志在共产国际第六次全世界代表大会

上，就认为没有第三时期，但同时以为在决议上写下也无妨）。立三同志怎样估计第三时期的特点呢？他在一二二期“红旗”上所写的“第三时期与中国革命”这篇文章中说：“第三时期是普遍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时期。”事实上，世界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并不能作为第三时期的特点；因为“从帝国主义大战，特别是从苏联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日起，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已经开始了新的阶段——总危机的阶段”。（见莫洛托夫同志在联共第十六次大会上的报告）立三同志把普遍的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作为第三时期的特点，实际上便是否认了第三时期。第三时期不简单地是继续表现着战后资本主义的总危机。而是“在这个总的危机的基础之上，开展着现时的经济危机”。（见以上莫洛托夫报告）“第三时期是资本主义总危机更加剧烈更加尖锐的时期，是资本主义暂时的局部的稳定更加动摇、更加腐蚀而走向完全崩溃的时期。”

由此，可见立三同志对于第三时期的估计的观点，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右的机会主义的观点是一致的，就是根本否认和取消了第三时期的特质。此外，立三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又把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与整个帝国主义时期甚至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对立起来，把第三时期看成“超帝国主义”的阶段，因之便否认“资本主义发展绝对的规律——不平衡规律”（列宁）能应用于战后资本主义的第三时期。

二　对第三时期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问题的了解

立三同志没有托洛茨基那样的“勇敢”，不敢公然否认列宁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只好躲在“第三时期”的这一面盾牌的掩护之下，来否认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他在一二三期“红旗”上所写的“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与世界革命”一文中说：“现在列宁之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分析，在目前世界资本主义之各种不同的经济危机的形式中，又表现出来；可是，目前已经在另外一个历史阶段中，就是资本主义危机程度虽然不平衡，可是资本主义之总的危机的趋势是一致的。假使在前一时期，英国资本主义崩溃的时候，美国资本主义还可以度其繁荣的生活，可是今日，这种形式已经不会有了，英国与美国可以有程度速度范围都各不相同的危机，但必定是一样地走向没落、崩溃与死亡（这些同志惯用中国革命胜利、美国还没有革命的假说，真是美国除外主义的思想）。”我们从立三同志这一大段话当中，便可明了立三同志对于这一问题——第三时期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思想昏乱、糊涂到何等没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基本常识的地步了。第一，他以为第三时期的特点，只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趋势是一致的”，换句话说，就是现在不仅没有在资本主义总危机基础上开展着的全世界经济总危机的事实，并且世界资本主义一般危机这一点，也不过还只是将来的趋势。这样，就不仅取消了第三时期的存在，并且根本否认了帝国主义的特质，以至否认了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总趋势！这种思想简直是丝毫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市侩的意识。第二，他以为英国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而表现出“程度、速度和范围的不同”，而是美国资本主义在第三时期以前，有另外一种趋势——不走向“没落、崩溃和死亡”的趋势；只是到了第三时期的时候，美国资本主义才和英国及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有走向没落、崩溃和死亡的趋势。这种“美国例外”的思想，恐怕是受了叛徒罗佛斯通的影响吧！第三，他以为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不是表现在国际的和国内的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危机的程度、速度和范围‘不一致’”，而是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不一致”，这真是空前未闻地对于列宁主义的庸俗的曲解，这真是歌颂资本主义制度为人类

社会发展的最后形式底资产阶级学者的论调。实际上,"经济的和政治的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的规律"(列宁),在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中,这一规律更加明显地有效。"目前的世界危机发展得不平衡,虽然总的方面都有危机,但是各国的危机是不平衡的。"(见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十六次大会上的报告)"同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各国危机现象的形式、程度和性质的不一致。在有些国家中(坎拿大、澳洲),美国危机的影响直接引起它们的危机形式;在另些国家中(东欧、殖民地、中国与印度、南美各国、日本),占有广大领土的正在开始着经济衰颓;在第三种国家中(德国)——一般危机正在增长;在第四种国家中(英国),许多最主要工业部门的慢性衰颓加剧;在第五种国家中(法国)——危机现象最初的征候已经发生,生产开始低降,裁减工人,股票跌价。"(见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扩大会议根据曼努伊尔斯基同志报告通过的关于正在成熟的世界经济危机、群众失业与罢工运动的决议)立三同志根本不懂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这一规律的真实意义和内容,所以形成立三同志对于第三时期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问题,犯了托洛茨基主义的错误。当有些同志公开指责立三同志不了解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问题的错误时,他更发出毫无常识和令人发噱的理论,他说:"有些同志把总危机与不平衡对立起来或割离起来。"这真是荒谬绝伦的笑话:总危机与不平衡是一椿不能分离或对立的整个肌体,如果不先见到总危机,那里会发生总危机发展不平衡的论据来呢?!对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了解不同,是列宁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的根本分歧点之一,这一问题密切关联到一个国家的革命能否首先胜利的问题,一个国家内能否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以及目前国际形式的真实状况问题和各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了解不正确,便不能正确的了解目前国际形势,不能正确地了解苏联的一切对内对外根本政策,不能正确的了解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以及中国革命与世界其它各国革命间的正确相互关系。

三 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及和平政策问题的意见

立三同志因为对于第三时期及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这两个根本问题有了非列宁主义的了解,于是便不能不怀疑和反对苏联对内对外的根本政策。他在一二三期"红旗"上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与世界革命"一文中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开始的时期,特别在苏联革命胜利而世界革命又已暂时低落的时候,否认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他必然要走到否认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无疑义地要成为帝国主义的伙友,无产阶级的叛徒,这就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必然归宿。可是,在现在的第三时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到来的时候,特别在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大爆发的前夜,不把如何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争取世界革命胜利的问题,提到无产阶级的前面,而提出中国革命是否可以维持胜利的问题……这一提问题的方式,已经是十足的机会主义……。"

从立三同志这一段话的内容看来,就是苏联共产党现在的主要政策不是努力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五年计划;不是领导全世界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大战和援助世界各国革命运动;而应当是马上"完成世界革命"。立三同志这种论点的来源是,在他看来:"没有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便决难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见"布报"四、五合期立三的"革命新高潮前诸问题"一文)同时,"帝国主义世界与苏联及苏维埃的中国不能同时对立并存。"他对于中国革命与苏联的关系,只看见消极的方面,仅指出"中国革命的爆发……更加促起帝国主义积极进攻苏联";(见六月十一日"政治决议")而不看到积极的一方面,"中国革命的爆发,减

弱了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力量"。(见中共六次大会决议案)因此，便得出奇怪的结论来："或者中国革命与苏联共同一下子消灭全世界帝国主义，或者帝国主义世界在消灭中国革命时同时也消灭了苏联。""苏维埃的中国及苏联不能与帝国主义世界同时对立并存的。"(见立三在一二三期"红旗"上的论文)

四 中国革命与世界各国革命的相互关系问题

这一问题的正确了解应当是：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的爆发和胜利，一定要更加影响和推动世界其它各国革命的爆发和胜利；同时，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爆发和胜利，同样更加影响和推动中国革命的爆发和胜利。在现在国际形势和国内条件的情况之下，中国革命不仅有先于其它主要资本主义或殖民地国家爆发的可能，而且有首先胜利并且保障这一胜利的"持续"的可能。立三同志在估计革命意义这一问题上，便充分表现出夸大狂的精神，以为：帝国主义世界的一切矛盾都集中在中国，中国革命一爆发，"便是帝国主义，首先是世界之主要帝国主义英美日等灭亡的到来"，中国革命一开始，便是世界最后阶级决战的开始。"中国革命只有在这一最后搏战中取得最后的胜利，同时，世界无产阶级也会在这一最后搏战中取得最后的胜利，完成社会主义的世界。"(见同上"布报"论文)所以"中国革命的意义比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意义，更要伟大得多。"(立三同志在中央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讨论六月十一日决议——上的发言和结论)但讲到革命力量问题时，立三同志却完全露出悲观失望的态度，他说："中国革命最主要最严重的敌人是帝国主义，所以中国革命的胜负，不只是要决定于国内无产阶级和广大劳苦群众斗争力量，而且要决定于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力量。同时，中国革命的胜负，也必然决定世界革命的胜负，中国革命的胜利，必然紧接着世界革命的胜利，没有世界革命的胜利，也决不能保障中国革命胜利的持续(点是我加的——玉注)，这是半殖民地的中国与苏联不同的条件得出来的必然的结论。"("布报"第四、五期)他只认识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国家，中国革命的最主要的敌人是帝国主义这一劣点，但他完全不认识和不了解，中国革命条件中包含的优点，例如(一)无产阶级能够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基础上，动员和领导几千万几万万的广大群众与百十年来血腥统治中国底世界帝国主义作拼死的战斗；(二)无产阶级能够在土地革命及反军阀制度的斗争中，取得广大农民群众的同盟军；(三)无产阶级的年龄比民族资产阶级老，而且力量比它大；(四)无产阶级有千百万广大破产、失业、饥饿、贫穷化了的半无产阶级成份作亲密的战斗员，城乡的阶级斗争都极明显而且尖锐等等。他不相信中国国内的丰富的革命动力(几万万工农劳苦群众)的力量，他不相信苏联对于中国革命和世界各国革命的伟大影响和力量，他不相信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劳苦群众对于中国革命的同情声援的力量；因此，他不相信，在现在国际形势下，在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中，尤其是在世界革命高潮日益向前发展的形势中，一方面凭借本国几万万工农劳苦群众伟大战斗力，另方面得到胜利的无产阶级的国家(苏联)、世界无产阶级的强有力的革命运动以及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运动的暴动与骚动等帮助之下底中国革命，不仅有先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爆发的可能，而且有先于它们胜利的可能；不仅有先于它们胜利的可能，而且有保障这一胜利持续的可能。立三同志对于中国革命与世界各国革命的相互关系的实际内容，可能简括起来说明如下：在革命意义上讲："中国革命，便是一切，世界革命，没有什么！"在革命力量上讲："世界革命，便是一切；中国革命，没有什么！"前者的思想来源是孙中山式的"我大中华民

族主义”，后者的思想来源是对于强有力的帝国主义的统治表示畏缩、失望、投降无出路的情绪，这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方面表现，其中存在着不可分离的辩证的联系。

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公开地用取消主义观点来解释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问题，他们公开地说：“中国革命，只有在世界革命成功或者帝国主义战争爆发时才有爆发可能，并且才有胜利的可能。”李立三机会主义者则躲藏在“左倾”的词句之下，——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同时一齐胜利的空想高调之下，来否认中国革命有首先爆发、首先胜利和保障这一胜利的持续的可能。

二　中国革命底根本问题

一　中国经济性质问题

要想正确地懂得和确定中国革命的动力、性质、政权、领导权及前途问题，首先便须正确了解和认清中国经济的性质。中国是半殖民地地位的国家，所以中国的经济充分表现出殖民地经济的特点，即是帝国主义国家经济的附庸，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商品销售、原料榨取、资本输出及廉价劳动利用的市场，国家一切主要的经济命脉（如铁路、矿山、银行、航业、重要工业等）都握在帝国主义者手里。民族资本主义在极端痛苦、迂回、畸形的形态之下发展着，而且主要地只限于一部分轻工业（纱厂、丝厂、面粉等）并对于帝国主义有极大的依赖性。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带着激剧的势力和畸形的方式侵入经济生活，另方面还保有封建剥削关系的优势。经济系统是非常复杂，有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经济，有“新兴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广大的商业资本，有简单商业经济以至自然经济。帝国主义在全国经济生活中，占着统治和支配的地位。在农村经济中封建余孽(首先表现在地主对农民剥削关系上：百分之五十到七十的农民收获品付给地主作地租、非经济剥削等等）仍然占剥削关系中的统治地位，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都与封建剥削关系密切关联着。中国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对于中国经济性质问题的认识，完全是叛徒罗易之流的“非殖民地化”的理论，他们以为“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使中国经济资本主义化、工业化”。(见反对派刊物“动力”第一期）“中国经济已经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封建残余已经没有，或只是残余的残余。”这不过是歌颂“帝国主义送给落后民族以兴盛、进步和文明”的社会民主党的应声虫！他们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躲藏在中国革命性质已经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左的”假面具之下，实行取消了中国以反帝国主义和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现在阶段的革命，同时，即是取消了一切革命。立三同志对中国经济性质问题的认识，完全代表着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认识的另一种有害而且危险的观点，即是根本否认殖民地半殖民地有相当的畸形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他在一九三〇年七月间的中央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上，公开地拥护“中国经济主要的只是封建经济和半封建经济”的理论，他不了解他这一经济分析的危险是否认了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事实，否认了中国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存在，否认了乡村中阶级分化（农民分化为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的过程，结果不仅否认了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与革命转变的前途，不仅否认了中国现在阶段革命有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与必然，并且根本取消了现在阶段的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托陈取消派从“左方”来取消革命，李立三同志从右方来取消革命。

二 中国革命的动力问题

立三同志既然对于中国经济性质有了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认识，当然无从来正确地认识中国革命的动力。他始终把富农看成小资产阶级（见一九三〇年"布报"四、五期合刊的"中国革命高潮前诸问题"论文或一九二九年的"布报"上立三与和森关于富农争论的文章），以为富农可以革命，也可以反革命；他把小资产阶级看成整个的阶层，他不知道小资产阶级这一阶层中包括有剥削他人劳动的"上层"和不剥削他人劳动或受人剥削的"下层"，上层小资产阶级在武汉时代后已转入反动的营垒，现在有革命作用的只是小资产阶级的下层。他不了解资产阶级的大中阶层及一切资产阶级改良的派别（汪精卫改组派、胡适之民权派、陈独秀托洛茨基取消派等），都各是反动营垒的一翼，而且他们看成是站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所谓"第三派"或"中间营垒"。他把学生看成整个的范畴，认为学生是"城市贫民"，不看见学生中的阶级分化过程，认为现在还有"夺取整个学生群众"到革命营垒来的可能。尤其重要地，他在六月十一日中央政治局的政治决议中，讲到一切足以引起中国革命爆发的各种内外矛盾时，忘记或者抛弃了农民与地主阶级这一社会矛盾。他不能了解阶级关系在革命发展过程的各个阶段上的分化与结合，他不能了解中国革命经过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广东时期与武汉时期——尤其是经过广州暴动而开始了苏维埃阶段的时期，阶级力量关系，到底有过些什么实际的转变和变化，他时时在梦想着再来一个"五卅运动"。他不能正确了解中国现在革命阶段的革命主要动力是：工人阶级、雇农和贫农，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加上城乡的广大的半无产阶级成份和小资产阶级的下层。

三 现在阶段的中国革命性质问题

立三同志的脑筋中，始终找不出对于现在阶段的中国革命性质的正确了解，他根本不曾懂得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点，他不懂得现在阶段的中国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主要的是因为现在阶段革命的中心内容——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客观上还未能超过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的范围；同时，现在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坚决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得到彻底胜利。他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现在阶段上已经怒号着伟大斗争：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反封建余孽的斗争，反资产阶级的斗争，现在阶段革命之所以还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性，是因为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在经济制度上社会发展上及社会矛盾力量上的比重和地位，还次于民族解放及土地革命的地位和比重。然而，同时，中国现在阶段的革命性质，虽然还未踏进俄国十月革命的前夜，但却又已跨过了俄国一九〇五到〇七年革命的进程。他对于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的了解，与一九〇五——〇七年的俄国孟塞维克（如马尔托夫之流）和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中国孟塞维克（如陈独秀、彭述之等）的观点正相符合。他以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中，不应该反对资产阶级。他对反富农问题的观点便是最好的证明。他说："……我们因富农兼半地主性，在资产阶级性革命中一定要反动，但他们——指取消派——（附注）认为富农是资产阶级，要反对资产阶级，所以要反对富农。"（见江苏省委一九二九年"教育周刊"第四期——立三的关于反对派与机会主义问题的报告）"而我们之所以反对富农，正因为富农不是资产阶级！"（见立三在江苏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的结论）

四 革命政权问题

列宁同志时常指出："一切革命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他时常指出，革命的正确阶级定义的必要。他说："没有对于专政的了解，便不能作出正确的阶级的定义。没有专政的准备，便不是真正的革命者。"立三同志不能了解革命政权的重要意义和运用方法（他只空喊扩大革命战争和地方暴动，但反对建立真正的苏维埃政权和不注意创造能为这一政权支柱的红军），不能了解临时革命政府在革命发展进程上的伟大意义和作用（他自己在三中全会的发言里，承认他以为"在农民革命战争胜利区域里建立临时革命中央政府，是开玩笑！"），不能了解现在阶段的革命政权底正确阶级性（他所写的文章中及他起草的六月十一日政治决议案上，都只就地说说"建立革命政权"，但不能也不愿指出这一政权的阶级性是工农民主专政），不能了解现在阶段的中国革命胜利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苏维埃形式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政府，是无产阶级对于广大劳苦群众在政权组织中的领导权初步的实现；这一政府的任务有它的过去与将来两方面，即一方面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另一方面准备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的阶段。他"对于苏维埃政权的认识不清楚"，他在三中全会发言中自己承认的。因此，他便没有夺取、建立、巩固、运用和扩大政权的一切应有的和必需的认识、决心、勇气、能力、准备与实施。因此他便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公开的以国民会议的口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李立三同志等以不认识苏维埃政权的意义、作用与前途来忽视和放弃苏维埃政权。

五 革命领导权与前途问题

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议（一九二七年二月）对中国革命问题决议案，便指出中国革命发展有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前途。共产国际执委的历次对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及共产国际全世界第六次大会的决议，都确切指明和确定中国革命发展的这一前途。同时，并且指出由现在阶段的资产阶级民主性的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必须经过相当的一定的必经的阶段，这一转变阶段的时间的长短，要由国际的和国内的斗争环境和力量来决定，大体说来，要比俄国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时期转变经过更多的阶段，同时，比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中的转变速度要快得多。现在阶段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必然开辟出社会主义的前途，经过一定步骤和阶段，完成革命的转变。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便是在现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中，已经含有和存在着一定的个别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份；而且国际的（苏联的存在，世界资本主义的空前经济危机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增长）与国内的（A.反帝国主义斗争；B.不仅与封建残余和军阀制度作残酷的斗争，而且要与中国资本家作残酷的斗争；C.共产党是革命的唯一领导和共产党员占多数的苏维埃形式的政权；D.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苦农民群众的结合，在革命新的高潮的最初几个时期，已经相当地形成起来；E.工业农业的深刻危机，需要采取趋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性质的办法等等）各种条件，都有利于而且促进革命的转变。然而这些条件之中的最主要的条件，还是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具体地主要地是由自己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来争取和实现，共产党只有用正确的政治路线，坚决的阶级策略，灵活的组织方式，灵巧的工作方法和勇敢、坚决、勤奋、艰苦的工作精神与毅力去启发、教育、动员、组织与领导广大工人群众及一般劳苦群众的各种各式的革命斗争，才能取得和实现无产

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

立三同志始终不能明白了解决定中国革命转变前途的那些国际的（在六月十一日政治决议上说："决定革命胜利以及转变的另一重要条件，就是已经胜利的苏联无产阶级有利的帮助，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兴起。"）和国内的条件（他曾经公开取消赤色工会、公开联合富农，公开主张不反对资产阶级，他忽视雇农工会，不懂组织贫农团，不了解苏维埃政权等等）。他始终忽视共产党根本任务和根本政纲（社会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宣传，他尤其忽视和放松保障彻底的实行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任务（首先表现明显地，就是他忽视党和群众组织的作用，他以为革命形势的发展，"只要客观好了，主观便不成问题，主观与革命形势发展没有关系！"）。他忽视和放松了党对于工农劳苦群众的一切日常斗争的领导。因此，他对于革命转变前途问题，始终不曾有过正确的了解。他一方面说："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开始，革命政权建立的开始，一定是革命转变的开始，中间是不会有丝毫间隔的"，摭拾托洛茨基主义不断革命论的牙秽，企图跳过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切必经步骤和阶段；另方面说："我们不要幻想和平的转变"，服膺彭述之的二次革命论；不相信可以经过苏维埃形式的工农民主专政政权而来逐渐实行革命的转变（当然要经过极残酷的武装的和非武装的阶级斗争），以为还须再来一次武装起义推翻现在阶段革命胜利的既存政权而再去创造无产阶级专政，事实上就是根本否认中国革命的转变前途。

立三同志对于上述的这一切革命根本问题，都有了非马克思非列宁主义的见解，都或多或少的堕入托洛茨基主义与孟塞维主义的泥坑，结果不能不使立三同志当中国革命新高潮日益生长的紧急关头，完全离开共产国际路线而几乎造成断送中国革命新高潮的罪恶。

三　时局估计与党的任务

一　对时局的两种估计

"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对于阶级的相互关系和每个历史时机的具体特点，有最正确的估计，并在客观上证实了的估计。我们布尔塞维克总是尽力之所及以求忠实于这个要求，从无论那种政策的科学根据上看来，这要求无疑地是必须遵守的。"（列宁——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远方来信"第一信）只有根据客观存在的事实，根据阶级相互关系的状况，根据阶级力量的对比，根据事变发展的特点来正确地科学地估计时局的情势，估计革命运动发展的现势和前途，才能正确地了解与规定在革命运动的每一历史阶段上的党的具体任务和为实现这任务的具体策略。今年（一九三〇年）夏秋之交的中国时局的实际状况究竟是怎样呢？在世界经济危机日益剧烈和深刻的基础之上，开展和加深着全中国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危机，军阀战争不断爆发，统治阶级内部日益分崩和破裂（国民党改组派联络北方各派军阀在北平成立政府以对抗南京国民党政府），使统治阶级的统治日益削弱而走向破产的道路。过去几年因为中国反动统治的结果，中外资本拼命向工人阶级进攻，工人阶级的生活已经恶化到极度，再加以现时极深刻的农村经济危机、大批的群众失业、金贵银贱、物价腾贵（首先就是米贵、米价涨了百分之七十）的结果，使工人的工资更加低落，中国无产阶级的大部分简直几乎快要到了饿死的程度。战争连绵不已、交通破坏、金融紊乱、捐税加重、征发不断，地主、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更加扩大和加深其对于广大农民群众和城乡贫民的剥削和压迫的范围与程度，成

千累万的农民活活饿死，城市小资产阶级，尤其手工业者和农村手艺工人大批的破产和失业。工农劳苦群众这样痛苦颠连的生活，使他们更加认清在现在这种统治之下没有出路的事实，使他们更加对于国民党的一切欺骗宣传（民族解放、国家统一、天下太平、改良民生等等）表示绝望，使他们不能不一天一天地革命化，使他们不能不起来去进行反对资产阶级地主的反动统治和站在他们后面的国际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中国革命的动力——工人阶级和农民——受着反动势力的打击之后已逐渐恢复了气力，在土地革命、消灭帝国主义统治和推翻反革命的国民党政权的口号之下，又重新起来实行革命的斗争，反动军队中的兵士，因为厌恶军阀战争和不满意牛马生活，时常有部分哗变逃跑等事变的发生，有时也有直接投奔红军和援助工农斗争的事实发现，军阀制度的崩溃情势日益明显。革命的爆发一天一天的接近。从全国形势一般看来，新的革命运动的高潮日益增长，实在是不可争辩的事实。但是，因为中国政治经济在各个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所以在革命新高潮生长的过程之中，表现出不平衡发展的特点和弱点，这种不平衡发展的现象，一方面表示在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的浪潮还不能适度呼应的相互联合和汇合，南中国许多省份里的好多县的广大农民、手工工场工人、手工业工人、雇农、苦力等群众，在共产党一般政治影响和领导之下，已经实行起来直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而开始建立自己的苏维埃政权与红军，而重要城市的工人运动虽然是一般的高涨，但在中心城市和中心产业部门的工人斗争还极散漫而且薄弱，斗争性质也还未达到直接为政权而战斗的地步。另方面又表现在革命运动发展的地域上的不平衡，农民战争广大发展的省份，还只限于湘、鄂、赣几省的区域，就是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策源地的广东，比湘鄂赣也不免落后，福建农民战争还只停留在闽西的一部，河南、安徽、广西、四川的地方暴动还只限于边境的若干县，江苏、浙江的农民游击战争还不过是零星局部的现象，北方各省（山东、山西、直隶等）以及西北各省（陕西、甘肃、新疆）虽然广大的农民的半原始性的自发斗争时常发现（如红枪会、大刀会、回民骚动等等），但共产党在那些地方的政治影响和组织力量还极其微弱，以致运动的领导主要的还操在小地主、富农之手，还未真正走向革命斗争（虽然客观上有反军阀制度与反军阀斗争的意义和性质）的轨道，云南、贵州的运动还一般地落后，东三省的情形与长江流域有着显著的差别。工人斗争比较发展的，也还只限于上海、天津、青岛及其他一切次要的城市（如景德镇、自流井等）就连武汉以及香港的斗争，也还零乱脆弱。共产党在全国各重要中心城市中组织力量还很薄弱，赤色工会会员在全国十万人中，苏维埃区域便占去了绝对的大多数，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人团员的数量，绝对的减少（原来数量即比党少）。把上述这整个事实的全景综合看来，我们便可正确估计当时的时局真象是：全国革命运动的新高潮日益生长，但是统治阶级各派的分裂和互相斗争，还没有使他们走到政治上完全破产的地步，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浪潮没有汇合起来，农民的革命斗争，广大发展着的还只不过南中国几省的有些区域，整个军阀军队的兵士——尤其是主要军阀的基本部队，还未达到应有的和必须的崩溃和革命化的程度，综合一切革命运动的力量，还不能保证必须的力量，去根本袭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因此，目前我们还没有全中国的直接革命形势，但在全国革命运动新高潮日益生长和不平衡发展的条件之下，直接革命形势，最近可以首先包括一个或者几个主要的省份。这种估计毫无疑问的是合于客观事实及事变特点的正确的列宁主义的估计。这就是共产国际对于当时中国时局的估计。立三同志怎样估计当时的中国时局呢？"现在中国的形势，有了农民暴动的广泛的发展，有了工农红军的迅速扩大，有了兵士的动摇与自觉哗变的事实的增加，有了统治阶级这

样严重的危机，的确要是在产业区域与政治中心，爆发了一个伟大的工人斗争便马上可以形成革命的高潮——直接革命形势。”（见“布报”四、五期立三同志的“中国革命新高潮前诸问题”一文)“革命运动发展，表面上是不平衡的实际上是平衡的。”“万事俱备，只候东风，只要在中心城市有了一个伟大的工人斗争，马上便是全国直接革命形势。”——（立三同志在中共工作人员讨论会上的结论)“目前全国的形势，无疑地是日益逼近革命高潮——直接革命形势的形势。”（见立三起草的六月十一日中央政治局的政治决议案）这种估计显然地是不符客观事实，不计算阶级相互关系，不顾及每一阶段的事变的特点的非马克思主义非列宁主义的估计。至于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讴歌中国统治阶级的稳定，根本否认中国革命运动新高潮的事实，以及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新高潮已经推迟到遥遥无期的将来”的论调，毫无疑问地都是张伯伦、汪精卫、蒋介石等的应声虫的唧唧哀鸣，根本值不得客观事实和列宁主义武器的一击。

二　革命运动高潮与革命形势

革命运动高潮是什么呢？这就表示“革命运动的继长增高”(见斯大林同志著的“列宁主义概论”一书中“革命运动的高潮与低潮”一段)，即表示统治阶级的力量日趋削弱和崩溃，被统治阶级力量日益增长和强大。革命运动高潮时期的党的策略应当怎样呢？“党的策略是进攻的，……政治罢工、政治示威、总罢工、武装起义以及革命斗争等等。”（见同上一书）所以高潮是表示革命运动由开始发展到最高顶点整个时期的形势，革命形势是高潮发展的顶点，高潮在一定条件之下发展到适当的时候，要发展成为革命形势，只有在高潮发展成为革命形势的时候，武装起义才是直接行动的指令。革命形势的标志是什么呢？“一般的说，什么是革命形势的标志呢？假如我们指出下面的三个标志，大概我们是不会错误的，即：(一)统治阶级再要形式不变地保持自己的统治成为不可能了，这种或那种的‘上层’危机，统治阶级的政治危机，引起被压迫阶级的不满与愤怒。通常革命的到来，仅仅‘下层不愿’忍受旧式的统治还不够，还要‘上层不能’按照旧式的统治而生存；(二)被压迫阶级的贫困与痛苦的剧烈大非寻常可比；(三)由于上述的原因，大大地增高了群众的积极性，这些群众在‘和平的’时代，让人家安静地掠夺，而在风雹的时代，整个革命的环境以及‘上层’自己将他们吸引到独立的历史的事变中去。……没有这些不仅不依各种派别政党的意志为转移的，并且也不依各阶级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变动，按照一般通例，革命是不可能的。”（见列宁著“第二国际的破产”一文）因为武装起义及起义胜利的条件是：“第一，要起义胜利，应当不凭借少数人的阴谋行动，不凭借党，而凭借先进的阶级；第二，应该凭借民众革命的高潮；第三，起义应该凭借正在滋长的革命的历史的紧急关头，即当民众先锋队伍的积极性最大时，即当敌人营垒中与柔弱的、不彻底的、不坚决的革命朋友的队伍中发生动摇最剧时。”（列宁）正确地了解革命运动的高潮与革命形势的相互联系和区别，是正确地了解在高潮发展的各个阶段中的策略的必要前提，是正确地准备武装起义和举行武装起义的先决条件。立三同志的论文以及以立三为领导时的中央政治局文件上，都把革命运动的高潮与革命形势混成一谈，把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当成同一范畴来相互并用(“日益逼近高潮——直接革命形势”)。当有些同志指责立三同志这种理论上错误及因此而产生的具体策略错误时，立三同志把这种严重的策略争论，曲解成“名词争论”，“翻译错误”，他的“十足”理由，便是：(一)在中国党同志的习惯上以及一般文件用法上，都是把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当成表示武装起义形势而相互并

用；（二）中共六次大会决议上所说的"高潮"，便是"直接革命形势"。其实，这两点理由，都不过是立三同志强词夺理的遮羞之词。我们姑不引证中国党一般同志的习惯用法并未将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相互并用的各种例子来驳斥立三同志的谰言，即就立三同志自己的习惯用法来讲，也可看出立三同志这种说法的欺人自欺的愚笨可笑。例如立三同志在"布报"五期上的"中国革命新高潮前的诸问题"一文的三二、三三、三七各项上说："工人群众罢工的高潮"、"无产阶级斗争的高潮"、"工人斗争的高潮"等等，难道都可以解释成"工人群众罢工的直接革命形势"、"无产阶级斗争的直接革命形势"、"工人斗争的直接革命形势"吗？恐怕立三同志也觉得有点"说不通"吧！？第二，中共六次大会决议上所说的"高潮"不即是革命形势一节，就决议上高潮所指的意义和事实上看，便可以明白地证明并非把它即当作革命形势，例如六次大会政治决议案上说："……新的革命高潮的微弱象征，如：（一）反帝运动的复兴……（二）工人阶级经济斗争的逐渐兴起……（三）苏维埃区域的存在……已可以见到……"，难道这可以解释成直接革命形势吗？难道可以说在六次大会时中国已经见到革命形势的象征吗？恐怕就连立三同志也觉得有点"难为情"吧？！然而立三同志究竟为什么要把这两个所谓名词（含有革命现状估计及策略决定严重意义的名词）混为一谈呢？在他把这两个名词合而为一的手法之下发现了些什样把戏呢？第一，他用窜改共产国际执委决议案的方法，否认和取消了世界革命运动日益增长的高潮（他把去年国际执委第十次扩大会议决议及莫洛托夫报告中的世界革命运动的"高潮"，都改成世界革命运动"复兴"或"浪潮"）；第二，他用涂改和曲解国际决议的方法，否认和取消中国革命运动中日益增长的新高潮——特别是工人斗争的高潮（去年国际在论职工运动的信上已经指出："在中国已经有罢工运动的高潮。"）（去年一年中国罢工人数七十五万人，占世界第一位，印度第二位，五十三万一千人），在今年春季论改组派信上说："在中国正在成熟着新的革命运动，新的高潮最可靠的标志是工人罢工斗争的高潮。"立三同志等将这些高潮都改成"复兴"或"浪潮"，直到今年对于六月十一日政治局决议案争论时，立三同志还否认中国革命运动已经有了新的高潮，他在"红旗报"上还极力否认"高潮已经到来"以至"高潮开始到来的"事实。此外，即就文字的涵义来讲（对于每个马克思主义者，理论上的名词涵义，有极大的具体策略意义的，"理论"与实际是不可分离的），"复兴"或"浪潮"绝不能代表"高潮"的意义，"复兴"是表示已经毁灭和衰亡的事物重新还元或复活，"浪潮"有"高潮""低潮"的不同，都不能显示中国革命运动新高潮的真实意义；第三，他在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的混合及全国形势都是日益逼近革命形势的这一好听的名词之下，根本否认了在全国革命运动高潮的形势之下，革命形势有首先包括一省或数个省份的可能的事实，因而就否认了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可能。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公开的否认世界革命运动与中国革命运动的新高潮，右倾机会主义者怀疑和不相信世界革命运动与中国革命运动已经存在着日益增长的新高潮；立三同志等在高潮即是直接革命形势这一"左的"词句之下，来否认和取消世界的和中国的革命运动新高潮。

三　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与一个或数个省区的革命首先胜利问题

中国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的弱点，在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的第一个革命高潮中，已经显明的呈露过。这一不平衡发展的来源，是根基于中国经济政治的背景。第一，半殖民地的中国被世界主要帝国主义（英、美、日、法）在经济上政治上划分成几个势力范围，在每个一定势力范围内，经济上政治上都保有相当的独立性；第二，因中国社会发展的落后和

畸形，以致在经济上还不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经济生活，还保有极有势力的封建残余，政治上还存在着军阀制度的割据形势。以致全国还不能够形成为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单位；因此，第三，在各个不同的区域里，阶级的组成与力量的对比关系不能齐一的一致，以致各个区域里统治阶级的崩溃的程度与速度是不平衡的，工农群众斗争的经验、决心与力量也是不平衡的。在共产国际直接领导之下开会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地认识了这一特点和弱点以及其社会的历史的原因，所以在政治决议案上说："反动统治在各区域巩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总的新高潮之下，可以是革命在一省与几省重要省区的首先胜利。"在这一次革命运动新高潮日益增长的过程中，革命运动的发展，依然显露出不平衡的弱点和特点。从地域上讲，新的革命高潮首先成熟的地方，大部分还是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种下根基的那些区域，随后才渐渐地推广到其他的区域里去。从工农斗争上讲，"在某种意义上，工人运动比正在发展中的农民武装斗争要落后些，就是工人斗争还没有表现于直接为争取政权而战的形式。"因此，虽然一般地看来，革命运动新高潮是大体上具有全国范围的性质，但这一高潮不能在全国范围内同时发展成为革命形势。革命形势可能而且难免只首先在那些条件最具备的地方（统治阶级崩溃破产的程度和速度特别剧烈，被统治阶级的斗争经验、决心、勇气与力量都特别深广的地方，共产党的力量强大——例如湘鄂赣各省等）成熟起来，在那些首先成熟了革命形势的地域，我们必须夺取政权，建立起红军和临时中央革命政府，建立起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以便真正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进而推进与争取全国范围内的胜利。以立三同志为领导的一部分中央政治局同志们，既把高潮与革命形势混为一谈，既否认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的特点和弱点，既躲藏在"左倾"词句之下来否认全国革命运动新高潮已经存在的事实，当然不能不作出："在中国革命中，只有争取全国范围内革命胜利的问题，绝对没有巩固或维持一省或几省政权的问题"的策略结论，自然不能不认为"割据一省或几省来促进全国直接革命形势的观点，是极端严重的右倾错误"，是"和平割据"、"保守观念"等等。立三同志等既根本不了解中国革命运动的一切特点，当然不能了解所谓中国革命首先可以在一个或几个省份胜利的实际意义和作用究竟何在。他们不了解如果所谓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涵义，只是一省与几省首先举行武装起义，"紧接着"便是全国武装起义，那末，根本便无所谓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了。难道俄国十月革命不最先在当时的彼得堡起义，然后才在莫斯科起义，然后才在南俄等处发生起义吗？难道法国、德国等革命一定是全国各地同时一齐举行武装起义，而没有一点先后之分吗？为什么列宁在俄国革命中不提出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可能问题呢？为什么不说法国、德国等等革命，也有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前途呢？因此，可见所谓中国革命在全国总的新高潮之下，可以是首先在一个或几个重要省区的胜利的实质，绝不仅是说革命先在某一省或几省首先爆发，而是讲不仅在这一省或几省可以首先爆发，而且可以首先胜利，不仅在这一省与几省可以首先胜利（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而代之以苏维埃政权），而且有可能与必要来巩固与保障这一胜利的持续，以便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实行真正争取全国革命胜利的斗争。我们不仅要了解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实现，要引起与国民党军阀的残酷战斗和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引起全国阶级斗争的更加尖锐化和深刻化，引起全世界各阶级的震栗咒诅与兴奋同情；同时，还必须要懂得，我们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实现以后，不仅可以，而且应当动员、组织与武装既经胜利区域的千百万群众，以及发动和领导反动统治区域里工、农、兵、贫民群众的各样各式的革命斗争，以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武装进攻，建立起与国民党政府对抗的临时中央革命政

府，彻底实行我们的革命政纲，使我们既经胜利的区域，能够作为全国革命胜利的基点和根据地。立三同志等把巩固既得的一省与几省的革命胜利的问题，与争取全国范围内的革命胜利问题分割和对立起来，他们不了解巩固既得的胜利作为革命根据地，正是将全国革命运动统一在苏维埃革命的旗帜之下而争取全国范围内革命胜利的最实际最重要的步骤和手段之一；因此，便不能不作出“或者全国暴动，全国胜利，或者一处也不暴动，一处也不胜利”的“左”表右里的结论。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公开的反对中国革命有首先在一省或几省胜利的可能，立三同志等隐藏在“全国范围内革命一齐胜利”的“左”的词句之下来否认和断送一省或几省革命首先胜利的可能。

四　时局估计与党的任务

根据对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各根本问题的两种不同的了解，便产生出两种不同的时局估计，根据两种不同的时局估计，便产生出两种不同的对党的任务的了解，根据共产国际执委对于中国目前时局估计，则党的主要任务是：在日益增长的革命新高潮的条件之下，彻底保障实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彻底实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条件之下，去动员、组织、发展与汇合苏维埃区与反动统治区域的革命运动，以促进革命形势的成熟，虽然不能够包括到全中国的地域，至少也要包括几个主要的省份，在苏维埃区域第一等重要任务是：在最有保障的区域里来建立起苏维埃中央政府和完全服从共产党的领导而能够做这一政府的支柱的红军，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根据地，以便将来依照军事政治的环境，进而能够占领一个或者几个工业的行政的中心城市；在反动统治区域里，加紧发动和领导工、农、兵、劳苦群众的各种各式的斗争，从部分的日常斗争到较大的政治发动，加紧开展独立的群众革命运动，加紧去作反对国民党改组派、第三党、胡适民权派、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以争取群众中党的政治影响底斗争，加紧在少数民族中的工作，加强党、团、赤色工会以及各种群众组织的力量，加紧在有群众的黄色工会中的工作，在政治上、组织上、群众基础上(当然同时还须加紧党、团员军事化、工农武装及夺取敌人武装的军事准备工作)，真正准备和创造武装起义的一切必要前提。根据以立三为领导的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对当时中国时局的估计，则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和实现（事实上是等待）某个“产业区域与政治中心的一个伟大的工人斗争”，“马上形成全国的直接革命形势”，以便马上举行全国武装暴动。苏维埃区域与反动统治区域里的党的任务没有丝毫的差别（六月十一日政治决议案没有一点提到党在苏维埃区的任务，便是最好的例证！）。

根据这样对党的任务的两种不同的了解，便产生两条政治路线，两个策略，两种组织任务，两种斗争方式与方法，两种工作方法与方式。

A　关于苏维埃区域方面

（一）关于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及地方苏维埃政权问题

共产国际执委决议指出：“苏维埃的运动，已经对于党提出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以及调节这一政府的行动的任务，这个任务是有第一等重要的意义的。”同时，国际指出：必须使苏维埃政权成为真正工、农、兵群众的代表机关，真正由群众团体选举出来的代表组成的政权，真正有无产阶级与雇农的骨干而团结起来广大贫农、中农群众在周围的政权组织，“每个党部，每个党员，必须积极的参加苏维埃选举的筹备工作、帮助雇农、苦力、工人与贫农选出

精干的代表，向中农宣布要选举最勇敢、最忠实于民族解放运动及土地革命的代表，在苏维埃之中的党团，受当地的党部指导；党团必须是苏维埃的提案与决议的创首者及召集报告会与其他各种会议的发起人，必须注意整个苏维埃的工作人员及苏维埃每个委员的工作情形，并须留心不要使富农、已经被剥夺选举权的人及其他劳动民众的仇敌混进了苏维埃，要把广大的无产阶级、雇农与贫农及红军士兵的积极分子团结在苏维埃的周围。”而以立三为领导的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和苏维埃区有些党部作了些什么呢？关于在相当区域建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问题，立三同志自己承认说：“他们以为在未打下武汉以前在山头上去建立中央政府，是开玩笑。”（在三中全会上的发言）他们为苏维埃区发展的实际环境逼迫，勉强地指定一些代表在今年五月在一个非苏区里（！！）开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代表大会，虽然决定了许多决议和法令，对于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问题，依然搁下不提。同志们对这一问题提出坚决的抗议，要求中央努力召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以便统一集中苏维埃运动与红军的领导，而立三同志等还表示反对与怠工；到经过同志们三、四次严厉督促以后，立三同志等才勉强发出一号召这一大会的宣言，成立些架空的脱离群众组织的苏准会机关；对于苏维埃政府工作这样的忽视和怠工，简直是不可容许的错误。对于有些地方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尤其不加以应有的注意。苏维埃政权的选举运动，未曾在广大群众中进行，有些地方党部不愿把忠实能干的同志派到地方苏维埃中工作，而时常派些所谓“受处罚”、“成问题”的同志去干这些“党外”工作，以致形成有些不了解的同志们把到苏维埃政权中工作看成“处罚”之一种办法的现象（见赣西南的报告）。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未曾经常有计划的执行，以致有些地方富农、地主在国民党、帝国主义直接帮助和指使之下，不仅时常在赤色区围内部打游击，而且阴谋组织许多名目的反革命团体（A.B.团，——即反共团、社会民主党、托陈取消派等等），有些地方党部及苏维埃政权的领导成份中富农占十分之五六，以致直到现在，虽然南中国几省的苏维埃政权运动已经蔓延了一年多，但始终未能建立起真正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府。

（二）关于建立真正的工农红军问题

国际政治决议特别指出：“对于中国工农苏维埃政府的问题，党应当注意到：要在最有保障的区域建立起真正的红军——完全服从共产党的指导而能够做这一政府的支柱的红军，然后这个政府才能够有相当的力量和意义。”同时，更指出：“建立完全有战斗力的政治上坚定的红军，在现时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是第一等的任务，解决这个任务，就可以保障革命的强大的发展。”建立真正工农红军的具体办法是：（一）改善红军的社会成份——使大部分红军兵士是真正得到土地革命利益的贫农、中农和苦力；（二）健全红军的指导干部——首先就是坚强的工人成份；（三）加强红军的政治工作，完全保障党对于红军的指导和监督；（四）集中红军的军事政治的指导；（五）在最有保障的区域里，将现有红军新编红军加以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改造和训练，使之成为真正政治上坚定、有强固战斗力而能担负大规模作战的“铁的”红军。以立三为领导的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们对于红军建立问题的指导与实施怎样呢？最初一个时期，完全抱着听其自生自灭的态度，在今年苏区代表会以前，差不多各地红军苏维埃运动都是由个别同志及地方党部凭直觉的阶级意识及英勇的创造行动来发展的，直到某部分红军建立起来时，立三同志等只限于派一个或几个军事同志去当军长、师长或大队长，对于红军的其它一切建设工作，都未曾采取过正确的和积极的指示。到湘赣鄂红军有

了相当庞大发展时，立三同志等由一个极端又转到另一个极端，以为红军已经是“打天下”的力量了，每天调动刚刚形成的红军去攻城掠地，唯一的指导口号是：“猛烈的扩大，猛烈的扩大，再来一个猛烈的扩大；进攻，进攻，勇敢地向中心城市进攻。”（立三同志在中央政治工作人员讨论六月十一日决议讨论会上的报告与结论）至于改造红军社会成份、建立健全领导、加强军事政治教育训练工作等等，立三同志等不仅未曾做过，连想都未曾想到过。以致当时虽然名义上有二三十军红军，实际上战斗力真正比较坚强的还不过朱、毛、彭、黄所带领的几军。

（三）建立革命根据地问题

国际指出必须在最有保障的区域里建立起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真正能够为这一政府支柱的红军，建立起巩固的苏维埃革命根据地；因为这样在政治上可以形成与反动统治明显对立的中心，可以统一和集中全国苏维埃运动的领导，可以建立起强固的红军与强固的军事后方根据地。立三同志等始终认为这是“和平割据观念”、“保守观念”与“地方观念”，他们不懂得“和平割据观念”、“保守观念”、“地方观念”等等的右倾观点的真正来源、内容与意义，他们不懂得也不能够真正进行反对这些右倾倾向的斗争，他们不懂得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根据地，正是真正准备发展和实行扩大苏维埃运动的必需手段，他们把巩固胜利与扩大胜利的问题完全分割和对立起来，以致形成许多苏维埃政权成为“流动机器”或昙花一现（随着红军游击队的来去而生灭）的现象，以致形成赤色区域的广大逃难难民的现象（跟随红军“跑反”），以致国民党便于利用红军流动的机会来屠杀苏维埃区的成千成万的工农（如安徽六安英山霍山等几县苏维埃成立后，当时红军第一军全部开赴武汉附近游击，并且地方武装亦完全开走，国民党乘机派遣大批白军杀戮民众一万数千人），以致有些苏维埃区工农群众多不能相信自己的力量和胜利，以致形成红军无目的地攻城掠地的行动，以致到一九三〇年冬还没有能够建立起一个能够真正成为最有保障的革命中心的根据地。

（四）土地农民问题的解决

国际几次关于土地农民问题的指示——尤其是最近关于中国问题的政治决议，曾坚决地指出：“苏维埃区域之中，党的注意的中心，应当是土地问题的解决。土地革命应当不是富农的，而是贫农、中农的。发动土地革命的力量，应当是雇农和贫农，他们和中农有巩固的联盟，而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之下，必须坚决打击富农的企图——这些企图或者是想阻碍没收地主的土地，或者是想按照农民各自所有的生产工具去分配已经没收的地主的土地。党对于这样的富农企图，应当反抗，就是要实行没收一切地主土地，没收教堂、寺院以及其它大私有财产者的土地，把这些土地依平均分配的原则交给贫农和中农；同时，不要把没收的原则应用到富裕的农民的土地上去。同时，党要宣传国有土地的中心口号。这个口号的实行，应当和全中国革命高潮以及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胜利联系起来。”立三同志等对于中国土地农民问题，始终不曾有过正确的了解和解决；在六次大会后的第一个时期，立三同志等曾经公开地主张联合富农，在联合富农的理论和实际受到国际指责与一部分同志抗议及江西农民反富农的事实的打击以后，二中全会上立三同志等便来一个“只反对兼半地主半封建性的富农，不反对资本主义性的富农”的决议，结果依然是联合富农的变相策略；当立三同志等这一理论与策略，受到一部分同志抗议及农民革命行动打击以后，立三同志等便又想出别种口号在客观

上执行富农路线，他们说："变动了富农的土地，便消灭了乡村雇农，消灭了党在乡村中的阶级基础。"（立三在中央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上的结论）——稍有列宁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小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的农民社会主义的幻想——所以他们反对平均分配土地的办法。在当时召集的所谓苏维埃区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土地暂行法上，规定："分配没收来的地主阶级的土地给农民"，而未指明应当怎样和根据什么原则来分配，在分配土地时，对于农民各阶层的不同办法应该怎样等等。因此，很多地方实行这种分配的结果，富农不仅不吃丝毫的亏，而且得到新的土地——因而基本农民群众有时得到很少的土地。另方面，他们又在"左的"行动之下来危害革命利益；如土地暂行法令上规定着："不分配大私有者的土地"、"立刻实行组织共耕"、"组织集体农场"、"绝对禁止土地买卖"等等过早办法——使广大农民群众脱离无产阶级领导的办法，以及"在全国革命未胜利前，不分土地给红军兵士"的错误办法——使红军不能巩固和扩大的办法。立三同志客观上执行了富农意识。至于土地国有的中心口号与全国革命胜利的联系宣传，简直是绝无仅有的事，以致形成许多苏维埃区域富农成份充满在党及苏维埃领导机关中，甚至在一部分红军队伍中、改组派、A.B.团、取消派都能有许多机会利用着来作反革命活动。至于立三同志所谓中国北部的土地革命的中心内容，只是抗捐抗税，这更加明显地证明立三同志对于中国土地革命，有一贯的富农路线。总而言之，立三同志等始终企图（无论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使中国土地革命成为少数富农的，而不成为广大贫农、中农的。对于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中心内容之一的根本问题，完全与国际采取相反的路线。

（五）雇农工会与贫农团问题

国际决议指出："苏维埃区域里土地革命的任务，不可分离地和组织雇农工会、乡村无产阶级的工会的任务联系着，和组织贫农团的任务联系着。"因为只有有了独立的乡村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以及紧密地团结在它的周围在它的领导之下的贫农团的组织，才能坚决地进行推翻地主反对富农的斗争，才能将更广大的中农群众团结在苏维埃政权及一切革命群众组织的周围，才能真正进行建立苏维埃政权与红军的工作。以立三为领导的有些地方党的同志们对这一问题怎样解决呢？他们以为"雇农在分配土地后完全消灭了，完全用不着组织工会"，"雇农组织工会，农民反对，所以不应当组织雇农工会"；"雇农没有知识不革命，所以用不着组织他们"，公开反对组织雇农工会的富农理论，存在于有些苏维埃区域；"减低雇农及农村手艺工人的工资来解决所谓'剪刀'问题——即农产品价格低，工业品价格高的问题——的办法"，在有些地方曾经有时实行过。苏维埃区域中，只有闽西一部分有雇农工会的组织。至于贫农团的组织，立三同志等不仅未曾决定作过，而且也未曾梦想过，因为他们只听见过，在俄国十月革命后，曾经组织过贫农委员会，所以他们正等着革命转变时再来谈贫农组织问题。他们不懂得用组织雇农工会及贫农团的办法来彻底保障土地革命的彻底实行和准备革命将来转变的条件。

（六）经　济　政　策

国际指出我们在苏维埃区域要有一定的经济政策，这一经济政策的基础，应该建立在正确的阶级立场上与适合于革命运动向前发展的观点上，就是一方面要处处顾到工人和乡村基本农民群众——尤其是雇农、苦力、贫农的利益，打击和抑制一切剥削者，另方面不采取一

些过早的办法，以保障工人阶级对广大基本农民群众的联合。前者的具体办法，例如：实行工人监督生产，征收统一所得累进税，军事上绝对必要时，实行向富农及一切剥削者征发，必要时限制和调节一部分为境内广大人民自己所要求或军事上的必要的物品如（燃料、盐、煤油等）底价格，反对营业者投机和怠工等：后者的具体办法，例如：在苏维埃法律范围内，允许商业自由，暂时不禁止土地买卖，不实行集中供给，不一般地限制境内商业和商品物价等等。因为只有用这样的正确的经济政策，才可以调剂苏维埃区的人民经济生活和供应红军的需要，否则便要受到被敌人经济封锁及自己造成经济混乱的危害，因而影响到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过去海陆丰苏维埃的经济政策，便是最好的例证）。立三同志等对于苏维埃区的经济政策，根本不谈；如果有同志提到，便骂人家是“保守观念”与“建设观念”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当然，如果谁幻想在现有苏维埃区域里“和平地”实行苏维埃经济建设工作，而且因此忘记了革命国内战争是当前最急切的任务，自然是“土地分了，革命成功了”的不正确意识的反映；但是，苏维埃区的正确经济政策却是万分必要的东西，不仅对于改善工农劳苦群众物质生活是必要的，对于革命战争更是非常需要的；因为没有相当的建设工作，便不能顺利地进行革命战争。因为立三同志等对于苏维埃区没有一定的经济政策作领导，于是有些党部及苏维埃便各随所愿地作出许多时“左”时右的行动；有些地方不懂得怎样执行限制资本剥削的办法，不抽收任何累进税，作出许多离开阶级立场的右倾错误；有些地方却又限制一切商业自由，限制一切物价，甚至实行强迫挨户征发，自己造成经济的困难。

（七）对帝国主义的策略问题

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是革命现在阶段的中心内容之一，只有以民众武装斗争的方法，才能根本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这是共产国际和中共早已认定了的原则。但是，在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过程中，中央的或地方的苏维埃政府，在自己的力量还未达到一定巩固和扩大的程度时，有没有可能暂时地采取某些灵活策略，以避免在我们未有准备充分以前与帝国主义直接武装冲突，以便我们能够更充分地准备反帝战斗呢？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我们这种策略的主要目的，就是在于使我们有可能利用时机以动员、组织和武装更广大的群众力量来根本驱逐帝国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者只以外交手腕来解决帝国主义与中国革命间的矛盾的幻想，与我们所说的上项策略没有丝毫相同的地方。立三同志等始终不了解正确的对帝国主义的策略。他们对于苏维埃区的指导，或者是叫他们简单地避开外交谈判，或者是叫他们用些土枪土炮轰击一切外国商船、兵舰。立三同志等的策略就是或者不战而降，或者冒险奋战而死，绝不懂得怎样应用灵活策略来极力准备与帝国主义的直接武装作战。在立三同志看来，对帝国主义问题实际上是没有办法。从无出路中去找出路，立三同志等就幻想在“全世界革命大爆发中”中国民众去“与全世界无产阶级共同取得战胜帝国主义的胜利”！

B　关于反动统治区域方面

（一）对于工人运动的策略

国际的决议是：“要党去发展罢工运动的斗争，组织并且领导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党应当联系政治的和经济的斗争，尽量去发展政治罢工，定出准备各地的或者几个主要工业城市的同盟罢工方针。组织政治罢工的时候，除反对军阀和国民党的口号之外，必须提出接近一

般工人群众生活的，一直到最落后的工人阶级的经济要求。党要加强在有群众的黄色工会里的工作，同时，应当尽量去巩固赤色工会，坚强工人自卫的团体”。立三同志等的策略是：现在工人斗争，唯一方式是政治罢工与总同盟罢工，罢工口号只是在总的政治口号之下，有时附带联系到某些经济要求，把经济罢工与政治罢工完全隔离起来，以为只有“武装暴动的口号”，才能动员广大的工人群众，忽视和放弃一切日常的经济斗争，空洞地规定总罢工的计划（上海四月间五次，五月间四次），在“左倾”词句之下，宣布说中国绝对没有一点改良主义的社会基础，说黄色工会已经完全破产和完全法西斯蒂化，因而实际上一般地放弃在黄色工会内作争取群众的工作。同时不去尽力巩固赤色工会，赤色工会会员多半是流动性的；不去努力发展赤色工会，以为只要等到革命形势到来的时候，马上便可以发展会员到几十万、几百万。结果使党逐渐与广大工人群众隔离，工人群众许多自发的斗争得不到正确的领导——尤其重要地好些地方党部同志对于职工运动，多半没有过经常刻苦深入的系统计划工作，时常成为群众自发斗争的尾巴。今天某厂有斗争，便上自上级领导同志，下至整个支部都出马到这一厂，明天另一个厂有斗争，又是一齐出马跑到另一厂里去，斗争一完，大家又把这个厂放弃了。

（二）对于农民运动的策略

国际指出在反动的统治区域里现在农民运动中的主要工作内容，应当是发动和领导抗捐、抗税、抗债以及一切反军阀制度，反封建剥削，反帝国主义等各式的斗争引导农民群众走向游击战争和地方起义，但并不一定而且也不能在一切地方都要从发动游击战争和地方起义做起。立三同志等的策略是：全国各地，无论南方北方，无论近郊偏地，游击战争与地方起义的条件都已经完全成熟，所以地方起义是目前农民运动中的唯一的工作内容。结果便放弃广大农民群众迫切要求的斗争的组织和领导，结果把地方起义变成完全无条件的或者完全无配合的行动，结果是或者根本发动不起来、或者少数人发动起来、被敌人很快地各个击破。

（三）对于士兵运动的策略

国际指出要注意领导士兵群众的一切部分斗争，准备和造成兵变或军队参加工农武装起义的条件，准备和造成夺取、分化敌人基本部队的工作。兵变或兵暴一定是军队的群众行动或与工农斗争配合联系的行动，不要过早地或无目的地把我们在敌人基本部队中的潜伏力量揭露出来，或消失下去。为的是在革命紧急关头时，使这些革命军队转变到革命民众方面来。立三同志的策略是：兵变或兵暴的条件到处完全成熟了。有三个人也“变”，五个人也“暴动”，在上海也立即举行“兵暴”，在南京也马上组织“兵暴”。结果如何呢？使我们失去了广大军队阵地，使我们在客观上自己把敌人军队中的我们的最好力量断送和消灭。

（四）对反帝国主义的工作

国际指出我们“要加紧发展领导反帝的斗争，党应当预防忽视继续扩大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危险，帝国主义方面的一切强暴政策的表现，党部应当利用它们来引起群众的革命罢工和示威”。立三同志对于反帝运动异常忽视，半年以来，帝国主义对中国暴行层出不穷（如日本军队再四屠杀满洲中、韩农民，日军演习攻长春，日舰队在长江会操示威，法水兵淹死船板

夫，芜湖日轮打死忻丁昌案等），立三同志等都未能领导党的地方组织去号召和组织群众的各种抗议运动，党内许多积极干部对于这一点非常不满意。他们常常自动地做了许多英勇的反帝工作。最可笑的，当忻丁昌案发生时，江苏省委一声不响，各区委群向省委质问时，省委一个同志说："国际决议来了，我们工作转变了，所以我们不作声，看你们注意不注意这件事，如果你们不注意，那就证明你们还不懂工作的转变。"这真是一段十足遮羞怠工的说话，这是对于国际决议执行上的最可耻地机会主义的曲解的最好例证，这是根本不了解党的领导机关对于政治事变应有和应尽的责任。

（五）对少数民族工作

国际再三指出中国境内有千百万回民，还有千百万的藏、蒙、苗、瑶、满以及安南、朝鲜等等的少数民族，对这些民族的工作与反帝运动及土地革命有极大意义和作用。中国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曾要中央加紧注意这一工作，并且要中央准备好中共关于民族问题的纲领，交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立三同志等对这一工作，不仅未作过应有的实际的设施，并且在重要决议案上都未曾作出对这个问题的提案或答案，这一点充分证明"大汉族民族"主义的狭隘的传统思想的残余，在立三这类同志的头脑中有极大的影响。

（六）对于反对一切反革命派别的斗争问题

国际指出：要想达到目前党的策略任务的执行，首先就要加紧注重争取群众中之政治影响的斗争，加紧去进行反对国民党改组派、社会民主党、第三党（中华革命党）、胡适民权派、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等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派别的斗争，揭穿他们的假面具，证实他们提出国民会议的口号，不过是拼命救济反革命统治的忠实走狗。立三同志在写六月十一日决议时，把改组派与取消派看成完全无分别的东西，说它们都已经完全破产；不指出取消派虽然在主要政纲上与改组派无分别，但它们打起假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旗帜，企图打进工人阶级内部来作资产阶级的奸细这件危险的事实；因之六月十一日决议对于那时正在组织的第三党（中华革命党）及胡适民权派等都一字不提，立三同志在中央工作人员讨论会上作报告时，更说"改组派是老爷，取消派是马弁"，以及取消派根本没有多大作用等等"左倾"谰言，来忽略和轻视反取消派的斗争。对改组派、取消派等，立三同志等始终没有作过系统理论的斗争，更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在苏维埃区里，因为忽视肃清反革命的工作，以致在有些党部、苏维埃和一部分武装队伍中，都曾发现改组派、A B 团、取消派等反革命分子，这些反革命分子产生的来源，当然主要地是由于苏区内部地主、富农的积极活动和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底培植和援助；但是，如果我们在肃反工作中采取了积极正确的办法，那末，这些反革命分子活动的范围和程度就要缩小和减弱得多了。

（七）关于党的组织问题

国际指出：要想党担当目前历史任务的执行，首先就要注意党的主观力量的加强，首先就要使党员数量发展——尤其是工人党员——党员政治理论水平线提高，党报的数量与质量加多和提高，党的各级指导引进新积极干部——尤其是工人干部来加强领导的力量，建立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正确联系的工作方法，加紧发展赤色工会与青年团组织，尽可能地扩大自我批评，在苏维埃区域实行军事纪律等等。立三同志对于这一问题怎样呢？在理论上首先就

说："只要客观好了，主观便不成问题"，"只要直接革命形势到来，马上党员就可发展到几十百万"，"现在我们的党已经有了足够担负伟大事变的力量"，于是在立三路线之下的实际表现就是：工人党员并未大量增加，有时甚至减少，借口"暴动事忙"，停止中央及许多省委训练班，对于各级干部及新加入同志，绝没有任何政治教育训练工作，"布尔塞维克"停版几个月，将"红旗三日刊"与其他报纸合而为一，实际上取消了一切理论策略指导的刊物，仅有一张主要是刊登国际和上海消息的秘密日报。自中央到各级党部，对于培养和吸引新干部——尤其是工人干部——在立三同志等从未加以真正的充分的注意。对于苏维埃区域，立三同志等固然不懂得指示他们准备任何秘密工作，以预防暂时挫折或暂时退却的事变到来，而致有些党和革命群众组织的机体遭受挫折的危害；对于反动统治区域内，立三同志等，更是一方面不注意和不懂得秘密工作，另方面纯粹不了解利用公开可能来进行深入广大群众中去工作，把利用与争取公开可能变成冒险盲动的行动。立三同志等从来不了解："我们的秘密工作的原则，是尽量将党的政治路线和政治影响传播到广大群众中去，一方面我们保障与工农群众的亲切联系，另方面能够保证干部的安全。"立三同志所了解的秘密工作，不是深入群众取得群众的掩护，而是脱离群众。立三同志所了解的争取公开可能，不是凭借广大群众的斗争力量，而是少数人的冒险。立三同志借口现在是"军事时期"，造出非列宁主义的"党的组织军事化"的理论，完全公开地反对任何方式的自我批评（立三同志本来也就没有了解和承认自我批评的方法和意义），完全肯定和扩大了六次大会公开指责过的陈独秀机会主义的组织方式和工作方式——家长制度，惩罚主义，命令主义，委派制度等等。对于同志们有任何原则上、组织任务上、工作方式或方法上提供自己的意见或不同于指导机关的意见时，便马上加以各种捏造的罪名（"右倾机会主义"，"小组织"，"取消派暗探"，甚至"反革命"等等），而加以组织上的处罚（停止工作，警告，严重警告，留党查看，开除等等）——而对于与国际路线相符的意见，尤其视若仇雠，对于与国际路线相符和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们，尤其仇视到极点。无产阶级政党内铁的纪律，当然是绝对需要的东西；然而这需要有领导同志或领导机关的政治路线正确，执行纪律的条件和方法合乎列宁党的原则，党员能自觉地了解和接受纪律的制度，铁的纪律才是巩固和加强党的力量底主要工具之一。共产党内全体党员在政治路线上的绝对一致，当然是非常必要的条件；然而这首先就需要党的领导同志所决定的党的领导机关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只有在这种前提之下，坚决反对有路线不同的政治意见的斗争，才是健全和统一党的战斗力的根本工具之一。立三同志在自己的错误政治路线的前提之下，来抑制一切自我批评和滥用党的纪律，于是结果就造成许多干部及同志对于策略上工作上有许多意见而不敢公开发表，好些的沉默不言、埋头工作，坏些的消极沉闷、敷衍了事。做报告时，必定"多少要吹点牛皮"，在开会要发言时，必定先准备好"我完全同意"，使党的生活不能健全和有活气。这些不好现象的来源，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中国党内许多同志们的幼稚，同志们政治准备的不充分，布尔塞维克的党的生活和斗争经验的不够；但另方面，立三同志等所实行的家长制权威的日甚一日，确是很重要的原因。这种家长制度是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密切关联着，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的领导，不能不凭借这种权威来压制党内布尔塞维克路线的拥护者。在六月十一日政治决议以后，立三同志等在全国成立总行委，取消了党的经常组织和工作（一切由行委解决），取消了工会的群众组织的独立系统，取消了青年团的独立组织，成立了产业委员会及许多空架机关（如各级苏准会），实际上完全混乱了党与群众组织的系统，把党与非党组织完全混合（在苏准会等系统中，都公开地把党列为与各

革命团体——工会、互济会等——一律的团体之一！），使党失去了对群众团体的领导作用，使群众组织的活动范围和作用缩小到极度，事实上不仅取消了团的与工会的组织，而且同样地差不多取消了党的组织！

尤其重要的，国际决议特别指出："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应当是党的一切行动和指导的基础"，因为，"现在，党在解决组织任务提高战斗力之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要保障自己的思想上的布尔塞维克的一致性。然而要保障坚定的政治路线，要保障党能够正确的解决当前的任务，保障真正在实际上能够执行党的路线，就只有实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和'左倾'盲动主义、闭关主义的倾向，反对理论上实际上这两个倾向，集中火力去反对主要的右倾危险。在共产党自己的内部，对于右倾和'左倾'倾向——就算是很小的没有形成的倾向，如果没有不调和的无情的斗争，那就不能够最终地克服陈独秀派和托洛茨基派，不能够完全消灭对于它们的调和情绪，只有真正不调和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才能够清楚地真正布尔塞维克式地去解决党的当前新任务。"立三同志等对于这一问题的态度是怎样呢？根本没有所谓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始终以为"'左些'总比右些好"，"在现在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新形势之下，左倾的观念，只要还没有犯到过早暴动的策略上的严重错误的时候，还不会大有害于群众的斗争"（见"布报"四、五期立三论文），因而不仅对于左倾——以"左"的词句或旗帜掩盖机会主义实质的倾向（如关门主义、强迫罢工、冒险盲动、某些苏区的经济上过早办法等），始终不采取任何斗争的步骤，反而尽量启发和奖励，对于反右倾的斗争，只是提出"右倾"这个抽象的名词，在这个名词之下所指出的东西，最多不过是"尾巴主义"、"农民意识"、"保守观念"、"割据观念"、"例外主义"，一些零零碎碎的空泛的缺乏实际内容的论调。至于党内当时一部分同志中已经存在的整个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从经济问题起到工作方式止）虽然许多时候是用"左"倾空谈掩盖着，立三同志等自己不仅不顾和不能指责，并且反对同志们的驳斥；当七月中央工作人员讨论会上，我和几个同志提出党内一部分同志以"左"倾词句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质错误时，引起了政治局一部分同志（立三、忠发等）狂热的愤怒，认为是反中央和反党的路线，"因为这些同志所说的右倾和左倾观点，都恰是中央（实际上主要地是立三的观点——玉注）的观点"（见立三，忠发说话）——事实上这些"左"右倾观点，确是以立三为领导的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们的观点，而且暂时的在政治局内占着优势地位的观点。当然立三同志等自己不独不会和不能反对，同时还要反对和打击那些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同志，反加说话同志以右倾机会主义的头衔。在这一时期立三同志等和江苏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对党内斗争所采取的办法，是共产党内不可允许的办法；他们把同志们的正确发言和意见，完全不发表；另外自己在各种会议上及党报上捏造许多与别人意见完全相反的谣言。或把原则斗争解释成许多无原则的个人攻击或纠纷，混乱斗争的真相，模糊同志们对党内斗争的正确观点，结果，是阻碍了党的布尔塞维克化的过程，是障碍了党的列宁主义的发展，帮助了"左倾"与右倾机会主义的增长，客观上增加了托洛茨基主义与陈独秀主义者在党内外的影响。

四　长沙事变与立三路线的破产

七月二十九日红军第八军及长沙近郊农民武装队伍占领长沙。这一事变，对于立三同志等简直是晴天霹雳，使他们震撼得手足无措；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在全国武装起义形势

——直接革命形势之下，才会有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因此，立三同志等虽然在中央七十号通告上，即空喊争取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但在实际上立三同志等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群众动员上，并没真正为实现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准备与布置；对于苏区红军并没有指示建立革命根据地，并没有指示他们建立各地强健的苏维埃政权及各地苏维埃间的联系，并没有帮助他们强固工农红军及建立对红军的政治军事统一集中的领导。当长沙事变既经到来之后，据立三同志等估计，当时既还没有全国直接革命形势，则长沙的占领，只不过是一件偶然不可思议的事变；所以对于长沙红军及各地红军并没有给以正确坚强的指示，在长沙占领之后，立三同志等简直不知如何办才好，在他们想来，既没有全国直接革命形势，红军如何会占领长沙？而红军既已占领长沙，大概全国已经有了直接革命形势，然而他们已为事变所惶惑，莫知所措，因此，在反动统治区域内，对长沙事件一声不响，立三同志等在红军占领长沙直到红军退出长沙的整个时期中（自七月二十九日——八月九日）没有发表一个决议，没有发表一个通告，没有决定采取些什么办法来帮助红军的今后行动，当胜利的红军和武装农民游击队，在帝国主义、国民党强大武装压迫之下，不能不退出长沙城的时候，立三等又下令去再次进攻长沙，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在长沙被红军占领后，大大地讨论："什么人占领了长沙？"他们回答说"土匪"，因为他们公开地反对占领长沙的工农红军，他们帮助统治阶级摇旗呐喊。立三同志等，在长沙占领后，大大地猜想："为什么占领长沙？"他们回答说："莫明其妙。"然而在立三同志等一猜再猜之后，结果猜出其中奥妙来了，他们猜定了："我们的理论大概是不会不合乎实际吧？大概全国直接革命形势已经到来了吧？"在这样一种懵懂幻想之下，立三同志等便决定：一方面下令集合三四五八红军再攻长沙，同时，下命令全国重要城市——武汉、香港、广州、南京、镇江、上海、青岛、天津、哈尔滨等等，马上组织武装暴动。同时，立三同志等根据自己半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的全部理论——便企图马上"命令"全世界无产阶级暴动起来进行全世界的最后阶级决战！企图使全中国和全世界都同时一致地大战起来，中国革命便可"乘机"与全世界无产阶级共同取得"伟大的胜利"(?!)这样一来，便把原来以"左倾"词句为盾牌的以立三为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一跃而成为最冒险、最投机的"左的"盲动主义的布朗基主义的理论与实际。在"左的"盲动主义的形式之下，正式形成了以立三为领导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一贯系统的政治路线的理论与实际。这种反无产阶级的政治路线的理论与实际，当然与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的理论与实际不相容，当然不能不使立三同志公开走上反共产国际的地位，因此，当共产国际指令制止立三同志等全国武装暴动行动及指斥全世界大战的可耻空想时，立三便公开发表出反对共产国际的言论。

二次进攻长沙遭受失败，南京、上海的浦东和南市及武汉各地暴动未能发动起来，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利用这些机会流了我们一部分英勇同志的鲜血。如果不经国际再三严厉的抗议和制止，如果不经过党内干部在理论上实际上的反抗，以立三为领导的一部分同志，可以造成断送中国这次革命高潮的罪恶！血的教训完全证明共产国际政治路线的正确，宣告了立三同志等的政治路线的死刑。这样一来，便在理论上、政治上、组织上、策略上、斗争方式上、工作方法上正式暴露了以立三为领导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的政治路线的最后原形！从立三同志路线在中央政治局内占着优势时，即六月十一日决议发表时，正式开始了党的领导的危机，到此时，便形成立三路线领导的破产。

据上所说，我们可以看出以李立三为领导的中国党中央政治局一部分的领导同志在这一

时期的错误，绝不是简单的“个别的策略的错误”，而是整个的总的政治路线的错误。从工作方式和方法起，到策略问题和原则问题止，没有一个问题不错，而且这些错误相互间是有一贯的密切的联系，错误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是产生于错误的组织任务和策略任务，错误的策略任务和组织工作，是产生于错误的政治路线，错误的政治路线是产生于错误的时局政治分析和估计，现在时局的错误估计，是产生于对于中国革命根本问题（革命性质，革命动力，革命领导权，革命前途，政权等等）的错误了解；革命根本问题的错误了解是产生于对世界政治经济系统（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性质的不正确了解和认识。

据上所述，可见立三同志所代表的反列宁主义的路线的产生来源，不简单地由于：（一）立三同志等根本没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相当理论基础，连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内容之一——唯物辩证法也完全不懂（这点是立三同志等公开承认的）；（二）立三同志等没有在实际工作中根据布尔塞维克的观点来积聚经验，只是用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的错误观点来了解和积聚工作经验；（三）脱离群众已久，不能了解政治生活的实际；（四）中国党内陈独秀主义残余及一九二七年来的盲动主义在另一环境中历史发展等等原因；而是由于它反映和代表着一定阶层的阶级意识，即是反映和代表着长期被帝国主义和封建残酷压迫剥削的半殖民地的老大中国内的破产、失业、脱离生产已久，贫穷到极点而充满着无穷悲观、失望、消极、无出路情绪的小资产阶级（破产失业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工业者、脱离生产的农民及流氓无产阶级等等）的意识。他们平时是消沉、失望、绝望到极点（从此就产生机会主义的右倾消极），遇有另一机缘，便一跃而走另一极端——拼命冒险（从此就产生“左倾”的盲动策略）；这一部分冷意狂热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遇到了当前紧张的革命关头，便不免被历史怒潮把他们冲激到正轨以外去！

五　三中全会与调和态度

一　三中全会应该做什么？

自六月十一日决议产生，直到三中全会开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一部分领导同志们，不仅在理论上完全创造出一条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路线，而且在实际上以“左的”盲动主义的行动，几乎酿成断送中国革命新高潮的罪恶。共产国际执委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各种指示来到中国后，立三同志等一方面把它们隐藏起来，不向全党公布，另方面依然按照自己的政治路线去命令全国武装暴动（二次进攻长沙，指定武汉、南京、镇江、上海、南市、浦东等暴动，均在国际指示到后决定举行的！），到中国事变完全证明国际路线正确与立三路线领导破产的时候，才不得已来召集所谓三中全会。三中全会的应有的任务是什么呢？换句话说：三中全会应该做什么呢？三中全会应该做的是：（一）勇敢地、公开地、以自我批评的方式完全揭露过去以立三为领导的中央政治局的一部分同志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的理论与实际的完全破产；（二）诚恳地、完全接受共产国际执委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各种决议的指示，根本改变中央政治局内占着领导地位的一部分同志的反国际路线；（三）在政治上组织上彻底肃清在中央政治局内占领导地位的立三路线，根据国际正确路线的基础，决定三中全会本身及全会后的各种工作，坚决号召与领导全党进行一个真正的路线上、策略上、组织任务上、工作方式上的大转变，把党从反国际路线的破

产了的立三路线领导中挽救出来。然而事实却不如此！

二　三中全会做了些什么？

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的第一个根本工作，就是尽量否认中央政治局内占领导地位的曾经有过以立三为领导的反共产国际的反列宁主义的路线，一口咬定国际与中央路线是完全一致(?!)；因此，第二，就拼命把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所犯的根本路线的错误和因此错误而造成公开反对共产国际及几乎造成断送中国革命新高潮的罪恶完全抹煞，轻描淡写地说："犯了些'左倾'的个别策略错误"，以自欺欺人的手段来模糊全党同志的意识；于是，第三，便在接受国际决议的名义之下来曲解国际决议，在拥护立三错误路线的原则之下来继续立三路线，因而就产生了三中全会的不正确决议，三中全会在血的教训和事实打击之下，同意了国际指令的某些部分，停止了全国暴动的行动，取消了总行委及各级行委的组织，承认国际指出的党目前的两方面（苏维埃区域和反动统治区域）任务的方针；但因为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对于反列宁主义的立三路线采取了拥护和调和的态度，所以在中国革命各个根本问题上及目前策略问题上，都不能按照国际路线来决定，而且或明或暗地继续了立三路线。

三中全会决议及全会本身工作之所以犯了严重错误的原因，就是由于全会的主要领导者仍然是立三同志及赞助立三路线的维它同志等，所以三中全会的一切错误，都是要由立三、维它等同志负最主要责任的。

三　维它同志等把三中全会的政治决议变成掩护立三路线的产物

A　维它同志等反国际路线的两件显明事实

(一)维它同志起草的三中全会决议并未表示接受最近国际执委对于中国问题的全部决议案，——维它同志等在此次决议上，虽然因为许多原因，不便再公开采取前次立三同志对于国际来信的办法（将国际来信压下不发，先发出几号与国际来信大约相同的通告，然后再在接受国际决议的决议上说：国际来信恰恰证明中央路线的正确），然而维它同志等决不愿诚恳依照布尔塞维克式的来完全接受国际决议，他把国际决议，只作为三中的参考材料。他在决议上并不如布尔塞维克党一般通例一样，在开始便写出：中共中央扩大的三次全会完全接受和同意共产国际执委最近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而只在决议的第二部分上，轻描淡写地说一句："中国最近的事变，照上面所讲的看来，正是确切地证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估量完全正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委的这种指示。"这充分地表明出维它同志等对于国际决议采取了决不容许的不诚恳态度。

(二)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根本否认存在过立三路线——国际决议的根本内容和根本任务，便是以布尔塞维克的列宁主义的路线来扫除以立三为首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一部分领导者的反列宁主义的路线；而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决议上首先确定下："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承认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是正确的，是和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致的。"同时，坚决肯定："实行纠正政治局过去策略上的错误，决不变更党的路线。"而对于从六月到三中全会前在政治局内立三路线曾经占着领导地位这一点，却一字不提，这就是根本否认立三路线在领导机关中存在过，这就是根本否认过去立三路线是反国际的路线，这就根本减弱了和模糊了国际决议的意义和力量。这就根本减弱了和降低了三中全会的作用和意义。

B 维它同志等继续立三路线的实际何在？

（一）对于路线问题的模糊

"路线"问题，这几个字在立三同志等的玩弄中，变成了不可思议的怪东西。立三同志等起草的六月十一日决议案，对于革命全部问题，几乎完全错了，他们却还要说："路线绝对正确"。其他同志要提出任何政治问题的意见或疑问，立三同志等马上便加以"动摇中央路线"，"与中央路线不同"，"党内绝不许有两条路线存在"的严厉抵抗。究竟什么叫"路线"问题呢？立三同志等一部分负责同志可以有因人而异或因地而异的答复。但综合起来，不外下列几种主要的意见：

第一，"以武装暴动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而代之以苏维埃政权，这就是路线问题。这个路线，立三同志等与国际是绝对一致的。"其实，这个问题是党在这一整个革命阶段上的总的根本任务问题，对这个问题上，中央与国际不会不一致也不能不一致，因为对于这个问题的赞同与否，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主要分水岭，不是党内在某个阶段上的政治意见的分歧。

第二，"国际路线是进攻的，中央也是进攻的，所以路线是一致的。"对的，在日益增长的革命高潮时期中，党的策略路线一般的是进攻的，只有李立三同志一类的完全没有丝毫列宁主义常识的人，才会侮蔑国际路线是"退守"的。然而仅说空洞的"进攻"两个字，是没有丝毫实际意义的。"进攻"的问题，要看如何进攻及向什么方向而来决定是否布尔塞维克的进攻；有布尔塞维克的进攻路线，也有孟塞维克的进攻路线，有出奇制胜的进攻，也有以头撞壁的进攻，有共产国际的列宁主义的进攻，也有立三同志等的盲动冒险的进攻。当然，如果谁要在现时中国形势下，主张退守的策略，谁便就是公开地跑进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的反革命营垒去，谁便就根本不配在共产党内来讨论"路线问题"。

第三，"国际要争取一省、几省的首先胜利，然后争取全国的胜利；立三同志等也是这样说，所以国际与立三同志等的路线是一致的。"这种说法同上两种一样滑稽，在党内发生路线不同的问题的争执，只能是如何实现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以及全国革命胜利的问题，绝不能是根本要不要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及全国革命胜利的问题；如果谁公开说：不要一省、几省的首先胜利及全国革命胜利，试问他还有什么资格配称作共产党员呢？

到底什么是政治路线问题呢？就是政党的政治活动的方向与方法问题。任何阶级的任何政党，在整个历史阶段上，它有它的一定的总的政治路线（战略），在这整个历史阶段的每个一定的阶段上，它有它的一定的政治路线（策略），同时，在每个阶段的总的策略路线之下，还有个别的策略问题。我们一般地讲到某个政党内部在运动某一阶段上的政治路线分歧问题，实际上即是这一政党内部对于当时时局估计及策略任务的了解问题。立三同志等与共产国际执委在这一时期发生了两条政治路线的分歧，虽然这一分歧还根基于对于革命根本问题认识的分歧，但主要地还是对于时局估计和策略任务了解的不同；根据对于这种估计和了解的分歧，就产生出一条立三同志反共产国际的路线，另一条共产国际的布尔塞维克的路线。

究竟国际与立三同志等的路线是否一致呢？我们再不拿多的理论与实际来阐明和解释，就拿维它同志写的三中全会政治决议案的本身作解答就够了。决议第九项上说："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承认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是正确的，是和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致的——根据于中国的一般的革命运动的新的高涨情形，党的路线的确应当是：发动群众斗争，集中革命力量，组织革命战争，积极准备武装起义，去为全国苏维埃政权而斗争。这就是说：

要在工人群众之中，首先是在工厂中加紧党和赤色工会的作用，组织和领导无产阶级日常的经济斗争，并且把这些斗争密切的与政治口号及斗争联系起来，以动员和组织工业城市中之最广大的工人群众；同时，使工业城市的群众运动，与革命的农民运动以及红军的行动配合起来，创造总罢工、武装起义的必要条件，巩固并且扩大苏维埃区域的根据地。"接着在决议第十项说："同时，中央全体会议认为必须指出：中央政治局最近期间对于目前形势的估计，在许多重要问题之中，有模糊而不正确的地方——对于时局有过分的估量，对于不平衡发展的观察不清楚，忽略苏维埃根据地的重要，忽略工业区域日常斗争和政治问题的联系，……积极准备武装起义的任务，没有能够充分地和争取群众的任务密切联系起来，所以以冒险倾向的轻易暴动的布置，代替了切实创造武装起义前提的斗争。"无论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决议上怎样用尽全力来证明国际与中央政治局内占过领导地位的立三路线的一致，无论此处所引证的决议本身在解释国际路线及承认错误上、还带有许多不正确性及外交性，然而即就这两段东西比较看来，我们已经有十二万分地把握断定：是把两个绝对不一致而且相反的东西，强词夺理地说成一致！把这两段话详细看看，如果再去辩论国际路线与立三路线是否一致的问题，那不是有意多费唇舌，便是决心不顾真理了。

（二）在主要问题上继续着立三路线

维它同志等既然在三中全会上首先确定了："中央政治局六月十一日的决议案"，还是在"一般的正确路线之下"决定的，同时，又迫切声明："决不变更党的路线"，当然在许多主要问题中，都不能不继承立三同志的路线。

1. 对于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问题

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对于这一问题继续过去立三路线的实质是：（甲）对于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及目前世界革命运动新高涨问题，依然不了解；（乙）对于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一声不响，而且不懂得；（丙）对于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及中国革命与苏联相互关系方面依然只看到消极一方面，只看到"……因此，帝国主义列强，更加加紧对于苏联的侵略"，而不见到另一方面积极的作用和意义（最有趣味而且最可证明维它同志等继续立三路线的事实是：关于国际形势及中国革命这一部分决议底前一大部分文句，差不多完全是从联邦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联共在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莫洛托夫同志的报告底决议中抄录下来的，但抄的时候，它却只抄半段——例如帝国主义加紧进攻苏联的那半段，而把另一段——说明更加减弱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力量和增加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困难以及世界工人运动更加革命化等等的那半段——丢掉了，以求与立三同志等通过的六月十一日决议相吻合）；（丁）对于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的正确相互关系问题，只淡淡地指出："只有在最主要的资本主义列强国内革命胜利之后，中国革命方才能够胜利的说法"的公开取消派的观点，"固然是错误的"，以及"看不见中国革命胜利，有促进世界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亦是非常错误的"，而对于过去立三同志等的"只有在全世界革命大爆发中，与全世界无产阶级共同取得革命的胜利"的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却默不作声，对于中国革命有先于其他资本主义先进国和殖民地国家爆发、胜利和保障这一胜利的持续的可能，依然否认！

2. 对革命转变及前途问题

维它同志等在对于这一问题继续过去立三路线的实质是：(甲)对于国际决议所指出的转变条件、转变阶段的实际步骤，以及转变前途等等问题，都一字不提；(乙)对于过去立三同志等对这一问题的彭述之的“二次革命论”的观点，一声不响；对立三同志等对这一问题的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跳过资产阶级民主的阶段“一省与几省革命胜利的开始，革命政权建立的开始，一定是革命转变的开始，中间绝没有丝毫间隔的”的观点），只淡淡然地说道：“是不清楚的、机械的”；(丙)在决议案的第八页上，维它同志等说到“中国革命进展的前途”时，简直作出令人哭笑不得的毫无马克思主义常识的结论；维它同志写道：“中国革命的向前发展，对于帝国主义的世界统治，都有极大的危险，对于中国国民党的统治，那简直死亡的日期一天天的接近。”哈哈！看维它同志等怎样来推想中国革命进展的前途！从他们看来，中国革命发展的前途，不仅没有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是现在阶段的革命胜利也是没有希望的，因为现在阶段的革命胜利，不能不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的推翻和国民党统治的死亡；而维它同志等推想的中国革命发展的前途，只是国民党的统治是死亡日期一天天的接近而已。难道这可以作中国革命发展的前途的解答吗?!这样的观点，是立三路线的掩蔽者的观点的发展底必然的归宿！

（三）对于目前中国革命运动发展形势的估计问题

维它同志等对于这一问题继续立三路线的实质是：(甲)对于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的实质及原因问题，依然不了解。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决议第五段上，说到“现在革命运动的特点”时，写了一大段，都只不过是说明革命运动发展在各个区域的地域上的不平衡，而对于工农运动发展的不平衡，却“忘记”了。这件“小事”的“忘记”或“疏忽”，结果便会产生出不加紧工人运动的危害策略。至于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的客观原因，决议上一字不提，维它同志在结论中只说：“我们必须说明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党的领导作用组织作用”，而对于不平衡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历史的各种原因一字未提，实际上就是不了解不平衡形势的特点和弱点；(乙)对于将革命运动高潮与革命形势混在一起的理论原则错误，及因此而产生的对于时局估计的右倾机会主义及“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都一字不提，依然把它们解释成“名词问题”，依然继续着过去曲解共产国际决议及党六次大会决议的错误；(丙)对于过去立三同志等对于时局估计时所犯的右倾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真正实质和来源，不加正确解释，只简单地说明是“对于时局有过分的估量”，“对于革命运动发展的速度和程度估量得过分”，企图用这些所谓“名词”问题来掩饰问题本身的真相，即掩盖对于时局估计的不从阶级力量相互关系、不从阶级力量对比、不根据客观事实等等为基础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估量的真相，以及因这种估计以致产生出右倾机会主义和“左”的盲动主义的策略的真相；(丁)对于立三同志等在估计时局上把“主观”与“客观”绝然对立和完全隔绝的错误（“革命形势的到来，纯粹是客观原因，与主观没有关系”的立三理论），隐瞒不提；有意地或无意地模糊全党对于立三同志等对这一问题的错误认识，同时，也就使同志们不能了解对这问题的真正列宁主义的观点。

（四）对于苏维埃区域和反动统治区域的策略问题

1. 关于苏维埃区域方面

A 土地农民问题

维它同志等对于这一问题继续过去立三路线的实质是：（一）对于立三同志等过去领导的所谓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代表大会法令上，及有些苏维埃区行动上所犯的“左”的错误，使广大农民群众脱离我们和危害革命发展的过早办法，如：决定在现在即组织苏维埃农庄，强迫共耕，大私有经济的土地不分配给农民，绝对禁止土地买卖，不分配土地给雇农，红军兵士在全国苏维埃政权未建立以前不能分配土地等等，不加以丝毫的指责和打击；（二）对于“没收一切土地”这个帮助地主、富农反革命的口号，不加以任何的打击；（三）对于土地国有的中心口号与全国苏维埃政权胜利的联系宣传，根本不提到；（四）对于土地革命一定要使之成为广大贫农，中农的、而不是少数富农的这一点，只字不提；反而公开地继续着富农路线的要求和办法，在决议上说到苏维埃区域政策里，只含糊地写一条：“彻底实行土地革命，分配土地”；不具体指出分配什么土地和怎样分配土地；（五）在国际政治决议上所写的：“富裕农民的土地不在没收之列”的词句下，自己擅自加上一个括弧，在括弧中标明一句，“这里是指富裕的中农说的”，这就是公开主张“没收富农土地”；立三同志等对于富农问题，始终没有一点正确的辩证法的了解，在他们看来，只有或者联合富农以及完全不动富农土地的富农路线政策，或者完全没收富农土地，甚至现在即实行“消灭富农”的“激进”办法和空想政策；他始终不了解：在中国现在革命阶段中，可能要反对富农，但不可能消灭富农。在解决土地问题中，反对富农的具体办法是：按照人口与劳动力的混合原则，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形，来在富农、中农、贫农、雇农、苦力、红军兵士中，重新平均分配一切土地；在这种平均分配土地当中，经过乡村雇农工会、贫农团及苏维埃政权的正确运用和指导，不仅将富农所有的多于按照一般平分原则所应得的那部分土地分配出去，并且将富农有的质量上较好的土地设法转移给贫民、雇农和中农，使富农得到较坏的土地。同时，不提出“没收富农土地”的口号，以避免混乱现时乡村阶级斗争战线的主要内容（农民与地主阶级的斗争）和动摇中农的情意（关于这一个问题，请参看再版书后B部第1页）。

B 职工运动问题

维它同志等在这一问题上继续过去立三路线的实质是：（一）对于过去忽视甚至反对雇农工会独立组织的理论与实际，未加以丝毫的打击；（二）对于有些苏区里一部分同志忽视工人运动，甚至反对工人群众的理论与实际，未加以任何的斥责；（三）对于国际决议特别指出的“确立阶级工会的自由”这一条，完全删去；他不了解“工人生活的改良，要经过工会工作及阶级斗争中来求得，而不是简单地凭借苏维埃政府的法令”（见国际决议），他完全忘记了和忽视了现时有些苏维埃区域对于职工运动问题不能容许的情形。

C 经济政策方面

维它同志等对于这一问题继续过去立三路线的实质是：（一）对于有些地方实行的使广大农民群众脱离我们的过早办法，如：绝对禁止贸易自由、限制一切物价等等，不加以丝毫的

指责；(二)对于军事需要及广大群众急需的物品（如煤、油、盐等）在必需时加以价格限制和由政府专卖的必要，以及对于投机怠工的工商业的处置，也未特别指明；(三)没有指出，在保障工农民主专政政权的利益之下，允许商业自由原则，而只是笼统地说“承认自由贸易为原则”的经济政策；(四)将国际具体指明的，征收统一累进税及阶级税（税捐应该加在有产阶级身上）的我们阶级的租税政策，改成为一般空洞的“超阶级性的”“租税政策”。

这样一来，对苏维埃区域目前的几个根本政策，都作成了与国际不同的决议；所以虽然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决议上接受了国际指出的苏维埃区域现在的主要任务的意见——建立革命的根据地，建立临时中央政府和真正工农红军的任务，但实际上不能认真完成这些任务。

2．对于反动统治区域的策略

A　对职工运动的策略问题

发展、组织与领导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是共产党和赤色工会在目前发展的阶段中最主要的任务，所以国际决议说：“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实行，要党去继续发展罢工运动的斗争，组织并且领导中国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党应当联系政治的和经济的斗争，尽量去发展政治罢工，定出准备各地的或者几个主要工业城市的政治总同盟罢工的方针。”（见“国际七月决议”）维它同志在写三中决议时，却依然和六月十一日决议一样的说：“城市工人运动的中心问题是在准备总同盟罢工的方针之下，去加紧组织政治罢工”，“党的任务是……准备几个最中心城市的地方总同盟罢工和全国总同盟罢工，以至于武装起义”。这两个说法在理论上在实际策略运用上，都是不相同的。国际策略是加紧领导、组织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联系政治的、经济的斗争，同时发展政治罢工，以便真正创造各地的或者几个主要工业城市的政治的总同盟罢工的必要前提。立三、维它同志等的策略是：政治罢工、总同盟罢工以至武装起义的条件已大体具备，为的实现这些东西，不能不附带的联系到工人阶级的经济要求。这种策略在实际上的运用，一定依然是所谓“只要大干，不要小干”，一定依然放弃和忽视工人阶级的一切日常的经济的局部的战斗，而空喊和盲目计划总同盟罢工以至武装起义，实际上放弃和忽视真正准备总同盟罢工以至武装起义的必要前提的工作。北方局主要负责同志在三中全会后，马上规定和计划实现北方三大城市（天津、北京、太原）和四大铁路（平汉、平绥、平奉、京浦）的总同盟罢工，便是最好的例证。这一切依然是以空洞的同盟罢工和总同盟罢工的计划，代替了实际上领导工人阶级各种日常斗争的艰苦工作。至于江苏省委宣传部负责同志将秘书所起草之号召广州起义纪念示威宣言上之“罢工、罢课、参加广州起义纪念和拥护红军示威”的口号中的“罢工、罢课”等口号取消，认为谁再提罢工、罢课等口号谁便是立三路线的继续，那毫无疑义地是一方面对国际路线的最可耻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曲解，另方面是对立三路线的最露骨的拥护和继续。

B　对农民运动的策略问题

立三同志等过去对于农民运动的策略错误是：以为全国各地游击战争和地方起义的条件已完全一律地成熟了，农民运动的中心工作，便是马上发动游击战争和地方起义，因而放弃和忽视了农民群众的一切局部的、日常的斗争的领导和发动。因此，国际此次决议特别指出：“在地主资产阶级政权统治之下的区域中，党另有特别的任务。在这些地方，党在乡村中的

工作，必须注重于推动一切后备军来帮助先锋队，但是，这里的工作，并不是一定要从游击战争及地方起义做起。以后，仍然应当利用军阀之间一切部分的以及小的冲突，扩大农民基本群众反对各种形式的剥削的斗争，逐渐引导他们到革命的更高阶段，力争改善雇农的劳动条件、抗捐、抗税、反对高利贷，特别是减租与抗租，这些斗争都依然是中共在反动统治之下的乡村中的工作的主要内容……。"维它同志等对于立三同志等过去农民运动的错误，不加以指责，而依然只简单地提出"发动游击战争与地方暴动的任务"，不遵照国际指示来提出目前的工作主要内容和真正发动游击战争与准备地方起义的前提；以致在实际运用中，依然是继续过去的错误。例如北方局领导同志在最近决议中，规定北方各省组织革命战争是目前中心任务，这毫无疑义地是直接阐发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的议论。

C　对士兵运动的策略问题

立三同志等过去对这一问题的错误是：无条件地发动兵变（或兵暴），以少数士兵的逃溃行动代替了瓦解敌人军队和夺取广大旧有军队到革命方面来的策略，将军队哗变看成与工农斗争、甚至军队本身斗争没有联系的行动；借口士兵运动中没有进行日常的为局部经济或政治的要求的斗争的可能，以为只有或者什么不动，或者拖枪逃跑，以致使敌人便利地消灭了敌人军队中的革命力量，放弃了广大军队工作。所以，国际曾经再三地指出过去这种兵运策略的错误，指出他们根据布尔塞维克在俄国革命中的经验，以及西欧各国革命运动的经验，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在敌人军队中进行比较长期的艰苦工作，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去领导和组织士兵群众的日常部分斗争，我们在敌人军队中工作的中心任务是：瓦解和夺取敌人的军队——尤其是使敌人主要部队能在革命最紧急的决定胜负的关头，转变到革命民众方面来（例如进攻红军的敌人队伍投降红军，重要城市的敌人军队响应红军和工农武装起义等等）。我们在敌人军队中的目前工作，不是无条件的必须从兵变做起，而是加紧领导和组织士兵群众的一切日常斗争，加强使士兵群众革命化的工作，使兵变成为广大士兵群众投奔革命民众的行动，成为工农兵武装起义的肌体的一部，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对于立三同志这一错误，未加以严厉的打击。

此外，维它同志等对于国际决议指示的几个重要策略问题，都几乎完全置之不顾。（一）对加强反帝运动问题——国际决议曾郑重指出帝国主义对于中国革命的危险，尤其是忽视反帝运动和对帝国主义表示畏缩的危险，要求中国党加强领导广大中国民众的各种各式的反帝运动，，各帝国主义在中国各地的暴行，几乎是日有所闻；然而立三同志等却未能抓紧一件事变来号召和组织群众的各种形式的反抗行动，这是极端错误的现象，维它同志等却轻易地地将这件"小事"忘掉了。在三中全会后，中央政治局一个同志所起草的苏区工作计划上，也没有提到关于反帝运动的重要和策略，这无疑的是继续过去立三同志等忽视反帝运动和对帝国主义没办法的错误表现。（二）对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中国境内有几千万回、蒙、藏、苗、满、瑶等小民族，这些弱小民族，不仅同样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而且还受中国军阀政府的压迫和中国高利贷资本与商业资本的残酷剥削。这些民族的反帝国主义和反中国反动统治的斗争，在历史上及目前事实上都表现得异常明显。所以中国党第六次大会特责令中央加紧注意中国境内的民族问题，并准备具体的民族问题的政纲交第七次全国大会。国际屡次关于中国问题指示，均特别指出正确地提出中国境内弱小民族问题的策略的必要；此次来信并特别唤起中国党注意环绕中国周围的安南、朝鲜等革命运动的作用和意义。

然而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对于这个问题依然一声不响，依然客观上表现出继续李立三同志的“我大汉民族主义”的错误。(三)关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派别问题——过去立三同志等对于这个问题的错误是：(甲)将改组派、取消派、第三党等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派别，都一律看成小资产阶级的政党；(乙)只指出取消派与改组派在政纲上没有分别，而不指出取消派躲藏在假的工人阶级的政党的旗帜下，企图从工人内部来破坏革命是更加危险；因而不能使全党对于反改组派反取消派的斗争，有异常明显的坚定的和系统的认识与办法。而维它同志等在三全文件上，却将改组派取消派等称作“企图在反革命与革命间占一席”的所谓第三派，显然继续着过去立三路线的错误。

对于这一切主要策略问题，维它同志等都作下了对立三路线调和、投降以至继续的错误，所以使三中全会不能完成执行国际决议的任务。

(五)对于长沙事变的估量问题

红军和农民武装队伍占领长沙，是中国农民革命战争的第一次大的胜利，是农民运动与城市工人运动汇合的英勇企图，是变军阀战争为国内战争的部分开始。长沙的占领，是因为在全国革命运动一般高涨及不平衡发展的条件之下，在湖南首先成熟了革命形势，长沙的退出，部分地是因为立三同志领导在事前及当时没有争取和保障这一胜利的决心、准备与布置。第二次进攻长沙之所以不能胜利，一方面是因为敌人力量已经在相当期内准备和增强起来，另方面是由于我们轻易错过第一次长沙胜利的机会，暂时松懈了群众斗争的情绪，轻易放过了组织群众与武装群众的机会。对于这一事变的估计正确与否，对于目前策略的决定，有极大的意义和作用。维它同志等对于这一事变的估计，依然继续过去立三同志等的错误：就是一方面，轻视这一事变的意义，认为长沙“第一次进占而又退出”，以及“第二次进攻不能得到胜利”，“是军事行动上常有不足为奇的”一回事(见三中全会上维它同志的结论)；而另一方面却又故意暗中证明过去立三路线的正确，认为它是“进兵的斗争”——“它开始了为着全国苏维埃胜利的革命战争”；第一种估计的错误，是单纯的军事行动的观点，是与过去立三路线一般轻视长沙占领事变的意义和作用的观点，没有两样；第二种估计的错误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如果将长沙占领解释成为“进兵的斗争”，而这一“进兵斗争”的意义，恰是失败的广州起义所谓“退兵的战斗”的反面(维它同志正是如此说法)，那末，就恰是继续立三路线否认中国革命运动新高潮日益增长的右倾观点，因为所谓广州起义是退兵的战斗的意义，是指它的失败结束了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中国革命运动第一个高潮；如果将长沙占领解释成开始了中国革命运动新高潮，那末，就是承认在占领长沙前，中国还没有存在着日益增长的革命运动的新高潮；第二方面，如果将长沙占领解释成“进兵的斗争”，而这一进兵斗争的意义恰是全国革命爆发的开始，却并非一省与几省革命的发展(维它同志等又恰是如此说法)，那末，就恰是继续立三路线以为长沙占领后应该全国立刻举行武装起义的“左”倾观点：因为如果对于长沙事变撇开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问题，而一般地提出全国苏维埃革命的开始的问题，无疑义地是承认在长沙占领时已经成熟了全国革命形势。至于有人以为长沙胜利的未能特久保障，恰已经是证明国际决议上所指出的：“已经看见的新的革命高潮，在国际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联合力量的打击之下，亦有部分的失败退却的可能，亦有暂时沉寂的可能”的正确，换句话说，就是以为红军退出长沙这一事变，已经是革命新高潮部分失败退却或暂时沉寂的表现，毫无疑义地是对于国际决议加以机会主义的曲解。

（六）三中全会与两条战线上的斗争

维它同志在三中全会上利用国际指出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的正确指示，来作掩护“左”的盲动主义与右倾机会主义的护符，对于以立三为领导的用“左”倾空谈掩盖着右倾消极的整个机会主义路线的理论与实际和许多盲动冒险的策略，只轻描淡写地说成“个other的‘左’倾的策略上的错误”，而把“左”的盲动主义的非无产阶级意识的来源，解释成“只看见少数先进分子的情绪”；对于立三路线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以为中国经济只是封建经济或半封建经济，以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不应反对资产阶级，忽视农民战争的意义和作用，忽视苏维埃政权的作用，否认世界革命运动与中国革命运动已经存在着日益增长的新高潮，忽视赤色工会作用，拒绝在黄色工会内进行斗争，尾巴主义……等等），未加以丝毫的揭破和打击。对于某些个别领导同志在反对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斗争中所采取的动摇调和的态度，未加以任何的指责；对于立三同志公开反对共产国际底罪恶行动与侮蔑国际底事实，未加以丝毫的举发和申斥；对于因立三路线的冒险策略失败后，如果不迅速地坚决地执行国际路线，则将不可免地要更加引起与加重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危险（失败情绪、消极、沉闷、无出路等等）的事实，未加以严重的指出。而在三中全会上，竟补选〇〇、〇〇等同志为中央委员，〇〇同志当时在政治上是李立三第二，是南京、镇江、上海儿戏暴动底主要负责人之一，是江、浙、皖三省工作损失的主要负责者；在组织上及工作方式上是实行家长制度、命令主义、惩办主义、反对任何自我批评的最好模范；〇〇同志是立三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和发挥者，是执行家长制度、命令主义、惩办制度最标本的一人。然而〇〇、〇〇等同志，竟在三中全会上不受到政治上与组织上的制裁，反而得到政治上、组织上的尊信；立三、维它同志等始终不了解党内斗争的真实意义和方法，经常不了解两条战线上斗争的意义和作用，经常把党内许多原则斗争曲解或劣化成无原则的斗争。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对于最近几月来立三同志及江苏省委领导同志对党内斗争所采取的非布尔塞维克方法（把同志们正确意见书隐藏起来，反而在会议上和党报捏造一些与正确意见书完全相反的意见，妄加同志们以右倾机会主义者头衔……如对陈、王、秦、何等对六月十一日决议意见，江南问题对列夫（即陈原道）同志处罚等），不仅不加以指责，反而继续和扩大这类错误。这些都毫不足奇，它是三中全会上维它同志等政治错误所必然产生的结果。

六　三中全会后维它同志继续立三路线的错误

一　隐延国际决议与上海党的混乱状况

三中全会闭会已经两月了，就连交通比较便利的上海党的组织，也还未有接到和讨论国际的决议。三中全会前，维它同志等把国际决议隐藏着不发布出去，说要候三中决议一齐发出去；三中全会后，依然不发，说要候江南省委扩大会议决议一并发下去；江南省委决议也出来好久了，然而国际决议依然还是停滞在中央和省委的文件处里，以致交通比较便利的上海各区区委最好的不过是刚才得到国际七月政治决议；至于支部，则国际决议根本没有得到，讲到讨论国际决议和根据国际决议来真正检查过去工作和实行目前彻底的转变，是根本没有做过。上海的工作，除了不得已停止暴动及取消行委组织以外，没有任何变更；而行委取消

后，成立了广暴纪念筹备会的组织。这一组织名义上已经不是党、团、工会三者合并的组织，但是实际工作，依然是为纪念而作纪念工作，脱离经常工作，脱离厂内斗争，只有上层号召，没有群众基础的架空组织。一切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依然是照旧一样。工作情形是"九一"比"八一"坏，"九七"比"九一"坏，"双十节"比"九七"坏，十月革命纪念节比双十节更差，已经是任何人不能否认的事实。立三路线还继续在上海一部分领导同志中占主要地位，而且继续发展到非常可怕的地步。例如一个区委负责的同志，平时不作经常工作，到十月革命纪念节前一天的晚上，才急得自己出马，拿一包传单在马路边散发，引起四、五个工人的注意和拾看；这一件事却受省委负责同志大大赞扬。因为立三路线继续发展和国际路线不能传达到一般同志及广大群众中去的缘故，结果便发生许多同志的消极、沉闷、无出路的状况。因为他们一方面听说过去错了，但又不知错在什么地方；另方面现在工作还是走不通，又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得好。于是一部分干部，还在那里拼命努力埋头干，总想干得好结果出来，但依然是费尽心力，得效甚少；另一部分在那里找不到正确出路，只有敷衍工作；甚至两月以来，上海同志离开工作或离开组织逃跑的，竟达数十人之多——这种对革命怠工和开小差的现象的来源，一部分固然是由于这些分子中有些人的"半途革命家"的劣根性，另方面立三路线的领导确有一定的作用。这一些现象，不能不使每个布尔塞维克党员得到警惕，警惕到因党的立三路线领导破产而同时国际路线又被隐蔽起来不能传布到全党中去，以至延续着党的混乱的现象；警惕到怎样唤起全党来健全党的肌体。

二　维它同志等不能解决敌人进攻红军的问题

长沙事变后，中国军阀战争已经部分地变成了国内革命战争；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各派军阀，感觉到革命势力猛烈发展的威胁，于是便在张学良出兵的局面下，造成暂时休止大规模军阀混战的境况，以便反革命势力得以一致地去进攻苏维埃区域。我们只有认识进攻红军是反革命与革命力量之间的残酷斗争，是目前政治生活中第一等重要事变，我们才能正确地解决这一严重的问题；我们一方面固然不因敌人的进攻而抱消极悲观的观点，但另方面绝不能取淡然视之的乐观态度。我们只有正确的认识这是目前革命运动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危险，我们必须设法战胜这一危险，而且相信我们能够克服这一危险。就是我们必须向苏维埃区及反动统治区域的广大劳苦群众，解释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红军的意义，鼓动他们积极起来以无限的觉悟、勇气、决心与战斗力来回答敌人的进攻，必须遵照国际决议，一方面在苏维埃区域，彻底执行正确的苏维埃的政策，以便用布尔塞维克的进攻战术（在政治上、军事上）来冲破敌人的围剿；另方面，在反动统治区域，加紧号召、发动、组织和领导工、农、兵、贫民、少数民族的一切部分的发动和广大群众的斗争，如罢工、示威、不运兵、不运械、不造枪弹打工农红军、游击战争、地方起义等等行动来捣乱敌人后方和牵制敌人的进剿。但是维它同志等因为根据着自己的反国际路线的观点去看待和解决这一问题，所以又完全错误了。维它同志在起草中央第十二号通告时，分析敌人进攻红军意义说："事实上他们进攻红军，正是'肃清后方'以准备新的军阀混战的一种步骤，甚至于各派军阀正在共同进攻红军的时候，也有开始自相冲突的新的军阀混战的可能。"这种陈独秀的向导式的分析，陈独秀式的对于中东路的分析，不但不能提高群众的阶级警觉，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进行正确的布尔塞维克的进攻，以冲破敌人的围剿；反而麻醉和模糊了群众的警觉，妨碍了正确的布尔塞维克的动员和组织群众与反革命斗争。在维它同志等这种错误分析的领导之下，江南省委常委领导同志在

三次常委会上，认为现时军阀内部的冲突大过红军与军阀的冲突，即是认为反革命内部的矛盾目前还大过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矛盾，这真是十足的非阶级的观点。在这样一种严重错误认识之下，那里会谈到真正鼓动、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去冲破敌人对于红军的围剿？在反动统治区域里，我们直到现在还未引起广大群众热烈地拥护红军的情绪和行动，这绝不是偶然的事情。至于苏维埃区方面，如果按照维它同志等所决定的一切苏区政策去做，则是完全仍违反国际指示而继续立三路线，当然难于战胜敌人的围剿。这一切都切实证明：现时的领导同志维它等，已经没有可能再继续自己的领导，他们不能执行布尔塞维克的政治策略来解决当前的革命紧急任务。

三　维它同志等对于国际最近来信底态度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最近来信，是彻底暴露立三路线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性。维它同志等接到这一来信后，应当如何诚恳地承认他们在三中全会上否认有立三路线、对立三路线调和以至继续立三路线底错误。然而维它同志等却不这样做，维它同志等在国际这样严厉来信的逼迫之下，不能再不承认过去有一条以立三为领导的政治路线，然而他们却不诚恳承认：(一)立三路线即是在中央政治局内暂时占过领导地位的路线，而只含糊地说：曾经在政治局里“占着优势”底路线。(二)不承认立三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与共产国际路线不能并存的路线，是半托洛茨基主义是布朗基主义的路线，是以“左”倾词句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而只含糊地说：是“和国际路线互相矛盾的立三路线的半托洛茨基路线”。(三)不公开承认立三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尽力掩盖错误，是非布尔塞维克态度，反而认为：“立三同志在三中全会已经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立三在三中全会上的发言（见中央印发的立三发言），简直不是布尔塞维克党员检查工作和批评错误，而是一个乡下的臭讼事在县公堂上搬弄字句的态度，他把他的政治路线错误，解释成无足轻重的错误。他拿些什么“了解机械”，“不了解今天”，“不了解过程”，“只看见前途”……等等名词来掩盖自己的错误。他再不想到他这一路线错误如不公开揭发出来，对于党和革命本身有如何深沉的危害，他只顾到他自己和一部分负责同志的所谓个人“威信”！(四)不公开承认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在接受国际决议的名义和曲解国际决议的方式下继续立三路线的反国际路线的错误，反而认为：“一般地已经接受了国际的路线”。(五)不公开承认要立刻在国际来信指导之下来接受国际路线和反对立三路线，反而坚决地说：“认为必须实行坚决的斗争，反对露骨的机会主义的企图——就是想把三中全会的决议案以及这次纠正立三同志的错误，解释成为改变党的路线——变成了退却的路线。”这是再明显没有的反国际路线的供词，因为国际来信的根本用意，就是要求立三同志等改变自己的路线。这是再明显没有地代替着李立三等说话，因为只有李立三同志一类的人，才说要求变更中国党的路线为真正布尔塞维克的进攻路线——国际路线，是退守的路线。(六)国际来信说：“国际执委认为现在来‘争论’（维它同志等把它改为“讨论”）这些问题，会停滞党的工作，而使党的力量离开革命的决定胜负的任务。然而，必须对于所有的积极党员，完全明白地、用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解释这两条路线的实际，解释立三同志的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而团结党员在布尔塞维克路线的周围。”这一段话的本意是（1）立三及立三路线的一切忠实拥护者，对于立三路线错误问题，再不要固执己见地来掩护和辩论，应该无条件地向全党宣布和承认，以免引起党内的争论而致妨碍了实际工作。（2）中国党的积极党员，应该积极起来肃清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

义反共产国际的立三路线，使全体党员团结在布尔塞维克路线的周围。而维它同志等却故意曲解国际来信这一段原文的真义，把它解释成为立三路线问题，现在已经用不着讨论，只限于解释工作，只要解释一下便算完事。事实上就是真正解释立三路线的工作，现在领导同志维它等是担当不起的。因为直到现在他们还不能和不愿了解反国际路线的立三路线的实质，他们还不能和不愿放弃对于立三路线的拥护态度，以避免引起全党争论！（七）国际来信是给全中国党同志的，维它等同志却决定只把它发到各地方党部；以致交通比较便利的上海党部，现在还只负责同志见到，顶多也不过区委书记见到，一般同志还不晓得有这样一封信。这种坚决拥护立三路线的态度，怎能不引起所有布尔塞维克党员愤激和警惕！维它同志等起草的政治局这一决议，只是在事实上更进一步的宣告自己在政治上组织上的领导危机，只是使一般同志对于现在政治局的领导同志维它等更表示绝望，因为现在政治局的主要领导者，一部分是立三同志的忠实拥护人，另一部分（维它等）是曾讨论和同意过国际决议的人，这些人在相当时候以后，马上换一副面孔来不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他们在同意国际决议后，依然布置全国各大城市的起义，还下命令二次进攻长沙，他们在三中全会上曲解国际决议来继续立三路线，他们在三中全会上及三中全会后都拼命否认中央政治局内有过暂时地占据领导地位的以立三为领导的反国际路线。直到国际最近来信时，他们又作出这样掩护立三路线的决议，他们是自觉地对立三路线调和、投降，是立三路线拥护者。他们极力企图在接受国际决议的名义下来调和与继续立三路线，这样一来，便使维它同志等领导表示出不能保证国际路线执行底危机，因而使党工作仍陷于混乱境地！

3　结　　论

根据上述种种，我们可以坚决断言：以立三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因为对于中国革命各个根本问题有了模糊错误的认识，因为中国党过去的一部分领导者犯过严重的机会主义（陈独秀）与盲动主义的错误底影响残余，因为在六次大会后党的领导同志犯了许多个别策略的错误，因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薄弱和列宁主义的理论教育与工作经验的缺乏，在中国革命运动发展到新高潮日益生长的历史阶段上，便产生出以立三为领导的一部分领导者的非列宁主义的非布尔塞维克的政治路线。这一政治路线开始形成于六月十一日中央政治局的决议案上，正式宣告破产于长沙事变及在全国儿戏暴动的布置上。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对于立三路线采取了调和、投降态度，于是实际上继续着立三路线。现有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维它等没有保障执行国际路线的可能。现有领导同志维它等不能解决目前革命紧急任务，不能领导全党工作。因此，因立三路线而产生的党的领导的深刻危机，有引起党的危机的可能。为着尽党员对党应有的职责，为着负革命者对革命应负的使命，中共所有的积极党员，应该大家一致起来，团结在布尔塞维克路线的周围，把党从领导危机中挽救出来，以预制党和革命的危机，以保障国际路线的执行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因此，必须：

一，在国际直接领导之下，开始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以便根本改造党的领导。

二，在七次大会未开始以前的准备期内，由国际负责帮助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以领导全国正在紧张的革命工作。至少须加强国际对中央政治上组织上的各种问题的领导和帮助，对于政治局成份应有相当的改变。

三，立刻在国际路线领导和不妨碍秘密工作条件的原则之下，实行发展党内自我批评，在党报上及各种会议上（从中央到支部、小组）公开讨论最近国际各种决议及指示，向立三路线开火，坚决实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的倾向，及对于不正确倾向采取调和态度的调和倾向——尤其要特别反对主要的危险——右倾机会主义倾向。

四，立刻在党报上公布同志们的反立三路线的一切政治意见书。

五，立刻在加紧反立三路线及一般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中，来肃清那些不可救药和固执己见“左”右机会主义分子离开领导，以能积极拥护和执行国际路线的斗争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以便利于紧急的革命工作。

六，将国际最近来信（关于立三路线的信）印发给全党同志。

七，中央政治局在国际领导之下，立刻公开宣布三中全会决议及最近中央各种通告——尤其是九十一号、九十二号通告——无效，实行在国际直接领导之下，重新决定政治决议，并且号召各级党部完全遵照国际决议及指示执行实际工作。

八，在组织上实行布尔塞维克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坚决反对家长制度、命令主义、委派制度，惩办制度等等。

最后，我们以国际来信的结语，表示我这一政治意见书的预期和信念。

“中国共产共的一切党员，一定对于这种反对共产国际的方针，给以坚决的反抗，一切中国的布尔塞维克一定完全团结起来，象一个人一样，一致起来实行共产国际的路线。

“绝不疲倦的布尔塞维克的工作，勇敢的坚决的为着国际执委的路线而进行布尔塞维克的斗争，一定要领导中国共产党到中国革命的新的伟大胜利。”

4 再版书后

（或对小册子的补充）

当着这本小册子再版的时候，我想在所谓“再版书后”中说明下列的几部分问题：

一，关于反立三路线斗争中的几部分问题——在这本小册子中说得不充分，或者说的有错误地方以及未曾说到的那些问题；

二，关于反对反革命的罗章龙派底斗争问题；

三，目前党内两条战线上的斗争问题。

利用相当机会来说明这几部分问题，不仅是为着要相当地满足许多留心中共两年来党内斗争的同志们底要求，而且对于我自己也是一课有益处的学习。

一　关于反立三路线斗争中的几部分问题

A． 补充说明的问题：小册子中写得不充分的问题，据我现在看来，主要地有下列几个问题：(一)关于帝国主义时代的发展不平衡规律问题，(二)关于中国经济特点问题，(三)关于中国“工农运动发展不平衡”问题，(四)关于中国苏区中的反革命派别活动问题。当然，我必须郑重声明，我此处所说的“不充分”的意义，是说小册子中对这些问题的说法有许多不大清楚或重要遗漏的意思，而并不是说这几个问题未能从各方面发挥尽致；因为小册子在当时是为着作反立三路线的提纲而写的，为秘密环境限制及节省读者时间计，小册子中

的各问题都只能限于提出问题和简明回答，从各方面把各问题详细发挥，在当时的环境是不可能的。

(一)帝国主义时代的发展不平衡规律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小册子中曾经着重反对立三同志的美英资本主义在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前有不同的趋势（前途）的理论，这当然是对的；但未曾进一层指明立三同志对这个问题的主要错误，就是在于他根本不了解所谓帝国主义时代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实质究竟是什么。他对于不平衡发展的了解，际实上是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了解一样的，他把“资本主义各国发展水平的不同与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混为一谈”，换句话说，就是把“资本主义各国经济状况发展底水平底不同与发展不平衡问题混淆起来”，在这种错误了解之下，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便走到否认发展不平衡规律在帝国主义时代更加有力的事实，因此而走到完全否认在单个国家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因此而走到完全离开列宁主义、离开布尔塞维克党、离开革命的道路。立三同志在这种错误了解之下，企图在“第三时期”这面盾牌掩护之下，去否认单个国家革命有胜利的可能，因此而走到对中国革命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底悲观失望消极的道路上去。因此，把斯大林同志关于这个问题底列宁主义的正确说明介绍给中国同志们，是一件非常必要和异常有益的事。究竟帝国主义时代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实质是什么呢？斯大林同志在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议（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上的结论中说：

> “究竟帝国主义底发展不平衡规律的根本成份是些什么呢？第一，就是这样一回事，即是世界被帝国主义各集团已经分割了，在世界上已经没有所谓‘自由的’、未曾被占据的地域，为的占据新市场与原料来源地，为的扩大它们——那就要用力量从别的国家手中去抢夺。第二，就是技术底空前发展与资本主义各国底发展水平底均衡性加强，造成了和便利了某一群国家突进式地赶上另外一群国家底可能，就是比较弱些（但是很快发展着）的那些国家能够赶上另一些原来比它们强些的那些国家底可能底事实。第三，就是在各帝国主义集团间旧有势力范围底划分，每次都与世界市场上新势力关系相冲突，为的造成旧有势力范围与新的势力关系之间的‘均势’，就发生了用帝国主义战争的方法来定期的重分世界的必要。因此，——在帝国主义时代发展不平衡便加剧和加强了。因此——在帝国主义营垒中的冲突没有用和平办法解决的可能了。因此——考茨基所宣传的可以用和平办法来解决这些冲突的超帝国主义底理论，是不能成立的。因此，反对派否认在帝国主义时代发展不平衡底加剧和加强，便走到超帝国主义理论的地步。这些就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发展不平衡底特质。”

斯大林同志对于列宁主义的这一主要问题的正确说明，对于每个共产党员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只有对于这一问题有了正确的列宁主义的了解，才能产生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单个国家革命有胜利可能底坚决信心与万分勇气，才不致于堕落到托洛茨基主义与考茨基主义的泥坑中。当然，对于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当基础的同志们，仅仅看了斯大林同志这种基本扼要的说明，还难于了解这一问题的全部内容的实质，还需要加深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各个问题的研究，然后才能更加清楚明白地了解斯大林同志这种说明的理论基础与实际内容。然而，我们根据斯大林同志指示的根本原则和方法去研究列宁主义，毫无疑问地是绝对正确和绝对需要的一回事。

(二)关于中国经济性质问题，是异常重要而且经常发生争论的问题，不仅托陈取消派、新月派以及那些所谓“中国社会民主党”先生们，特别造出许多武断的中国经济分析（如

"中国没有封建余孽存在，中国经济已经资本主义化"（托陈派）"中国土地过多，中国没有土地问题"，（胡汉民、戴季陶、陈公博、汪精卫等）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国主义论是"海外奇谈"，（胡适之等）……）来曲解中国经济性质的特点，来企图作为自己反革命工作的理论根据；就是在我们党内的一部分同志中，对于这一问题也常有许多大同小异的分歧意见。我的小册子中指明中国经济的复杂性，指明帝国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特殊作用，同时指明封建剥削占优势等等，这当然都是正确的。但是，在我的说明中，还没有做到异常扼要和显明，而且在有些字句中或许还有使人误解或难解的可能；因此，我认为把共产国际决议及斯大林同志说话中关于这一问题的简明正确的分析，介绍给同志们，是一件异常必要的事。一九二六年十二月间，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议对于中国情形问题的决议案中，关于中国经济性质说：

"中国现在经济状况的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在中国经济中存在着的系统的复杂，从财政资本起到氏族社会性的经济残余止，同时，在城市和乡村中，商业资本底各种形式与小手工业及手工工业占有极大的地位。"

"中国乡村经济代表着半封建性的许多残余与正在发展着的资本主义成份最密切地纠缠起来的一幅画图。"

在中国经济分析中，除了少数被帝国主义豢养的所谓学者之流的胡适等而外，对于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中国民众以及使中国经济陷入半殖民地地位的问题，差不多是没有——至少是非常少有严重的争论。但是，关于商业资本及封建余孽问题，则直到现在还是托陈派等等拿来作反革命投机事业的武器，而且有时候他们的武断宣传还不免影响到我们队伍中某些幼稚的同志；因此，把斯大林同志对这个问题的正确说明，介绍给同志们，是一件很必要的事。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斯大林同志在答复中国劳动大学学生的问题中，对这两个问题有非常明白的答复。当时的问题是："为什么拉狄克同志断言中国乡村中的农民斗争，反对封建残余还没有反对资产阶级厉害是不对的？能不能说，商业资本或者封建残余在中国统制着？为什么军阀是大工业企业的所有主而同时又是封建制度的代表者呢？"斯大林同志回答说：

"拉狄克同志的确说过象你们在问题中讲的那些话。据我记得的，拉狄克同志在莫斯科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发言里，或者完全否认封建余孽的存在，或者不承认在中国乡村中封建残余有严重的意义。这当然是拉狄克同志底很大的错误。如果中国没有封建残余，如果这些残余对于中国乡村已经没有严重的意义，那末就没有土地革命的基础了，那末，就说不上了土地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现在阶段上的主要任务之一了。

中国乡村中有没有商业资本呢？是的，有的。不仅仅有的，而且它吸取农民的血汗并不比封建主们差些。但是这种原始积累式的商业资本在中国乡村中与封建主的统治、与地主的统治特别地混合着，它学地主一样用中世纪的剥削和压迫方法来对付农民。同志们，问题就在这里。拉狄克同志的错误，就是在于他不懂得这个特点，不懂得在中国乡村中封建残余统治与商业资本在保存对农民底封建的中世纪的剥削压迫方法中混合着这个特点。军阀制度、督军、省长各种的和一切的现有的混蛋的、强盗式的、军事的或非军事的官僚们，就是在这个特点上产生出来的上层建筑物。帝国主义帮助这一部封建官僚的机器。至于有些军阀有很多土地，同时又是工业企业的所有者——这件事并不能根本变更事实的本质。许多俄国地主在以前也曾有过工厂和其他的企业，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是封建残余的代表。如果许多区域的农民把百分之七十的收入交付地主及绅士；

如果地主操着经济方面、行政方面和法庭方面的实权；如果直到现在还有许多省份有买卖妇女和小孩的事情——那末，就应当承认，在这种中世纪环境中占着统治力量的是封建残余的力量，地主的力量，军事的和非军事的与商业资本特别地混合着的那种地主官僚的力量。

这些特殊条件，就造成中国现在正在发展而且将来更要发展的农民底土地运动。

没有这些条件，没有封建残余与封建压迫，在中国就没有土地革命的问题——关于没收土地等等的问题了。没有这些条件，中国土地革命便成为不能了解的东西了。"

斯大林同志的这一段说话，不仅把中国经济性质方面最引起争论的问题给了一个完全清楚明白和绝对正确的答复，而且把这种经济分析争论中所包含的真实政治内容的分歧，作了一个简单的答复。我们从斯大林同志这段谈话中，不仅可以了解拉狄克及与他有相同观点的人们，对于中国经济特性不懂得的错误，而且可以了解这种经济问题争论中，包含着的革命的与反动的政治实质。斯大林同志及共产国际执委对于中国经济特性的分析和结论，由中国千百万农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进行英勇的反帝革命与土地革命等行动所证实，由中国好几省的一部分领土内存在和发展着的苏维埃政权的行动来证实。而且我们相信，还要由现在和将来中国全部革命运动的进程和发展来证实。拉狄克的这种理论已经由国民党、托陈派、新月派、社民党、国家主义派及一切反革命派别和分子所采用，他们用它来反对和嘲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千百万工农英勇进行的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

李立三同志等所讲的中国是"封建经济"或"半封建经济"，与斯大林同志共产国际所讲的根本不同。第一，李立三等不了解中国经济系统的复杂性，简单地笼统地以"封建经济"或"半封建经济"等名词来说明中国经济性质，无论在理论上实际上都是错误的。第二，李立三同志等在所谓中国是"封建经济"或"半封建经济"这种笼统定义之下，实际上走到根本完全否认中国资本主义关系畸形发展的事实，这种错误的实际政治内容，在小册中我们已经说过了。

(三)关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问题——关于这一问题，对于革命运动在地域上发展不平衡这一点，乃是无可争辩的事实，除了立三路线否认这一事实外，很少引起争论，所以用不着多说。至于论到所谓"工农运动发展不平衡"这一点，在我们的队伍中，则不免时常有不同的了解。据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共产国际执委的正确了解是：第一，中心城市的工人群众与农民群众的革命行动时常表现不一致（例如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中，上海及广州、香港工人运动异常高涨时，农民运动当时还很薄弱；当一九二七年湘、鄂、赣各省农民运动勃发时，许多中心城市——如上海、广州、香港等——的工人运动因遭受了严重的打击，不能与农民运动同时并举……等等)；第二，当许多农民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区域里已经勃发着苏维埃政权和工农红军运动时，但最主要的中心城市里的工人斗争，因主客观许多原因，还未能发展到直接为夺取政权而战的程度。现在苏维埃区域的居民，参加苏维埃和红军运动的社会成份，最大多数是农民；而最中心城市的产业工人，还未曾和未能直接卷进这一运动里去。但是这绝不是说：第一，中国农民革命性比中国工人要大些；或者中国工人比起农民来要落后些；第二，中国现在的苏维埃政权和红军运动，只是纯粹的所谓农民革命运动，没有工人阶级参加和领导的。然而在我们队伍里有时有个别同志们，不免有忽视中国工人阶级力量和过分夸大农民的独立政治作用的说法；这使得我们感觉到这个问题有说明的必要。

他们根据着“中国现在苏维埃区域是纯粹农民运动”的错误观点，企图来作出一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内农民底特殊革命性的理论，这理论的实质是：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内的农民革命性抬高到第一位，使无产阶级由对农民的领导地位降到农民的助手之一的地位；因此（这是必然的）便在实际上走向否认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前途有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而认为前途是要发展“农民的资本主义”。这类同志企图曲解斯大林同志关于民族问题与农民问题相互关系的说话来作为自己的特殊理论底基础。他们说：斯大林同志对南斯拉夫民族问题（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在共产国际执委的南斯拉夫委员会上的演说），曾经说过：“民族问题从其实质上看是农民问题。”不错，这句话的确是斯大林同志说的。然而斯大林同志这句话的真实意义是什么呢？其意义：“农民是民族运动的基本军队，没有农民的这支队伍，就没有，而且也不会有强大的民族运动。”（见斯大林同志的同一演讲）但是，这是不是说农民问题与民族问题是合而为一的东西，或者说农民问题便包括了民族问题的全部呢？不是的，绝对不是的。斯大林同志在同一演讲中说：“不能把民族问题与农民问题合而为一，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除了农民问题以外，民族问题本身还包含有民族文化，民族国家等问题。”很明显的，斯大林同志这种说法，只是反对谢迷七不把民族问题看成实际上是农民问题的错误，因此，特别着重指明农民部队在民族问题中的重要性；但这种说法绝不能被曲解成“民族问题即农民问题”，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只是简单的农民运动等等，尤其不能解释成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农民有超过于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和革命作用。即就中国革命本身讲，斯大林同志把中国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看成决定革命胜负的问题。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共产国际执委的中国问题委员会的演讲中，斯大林特别讲到中国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他曾特别着重地指出，没有无产阶级领导，便不会有革命的胜利。这些同志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内农民特殊革命性——超过于工人革命性的理论，在理论上的错误和危害是显而易见的。世界各国——无论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运动的经验，都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对于农民的阶级特点的观点的正确，从列宁主义的观点看来，农民小资产阶级的特质，就在于它的两重性——劳动者与小私有者两重性；因为农民是小私有者，所以它有和小资产阶级其它阶层一样，不能有独立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作用；因为它是劳动者，所以它与无产阶级联合并受无产阶级领导的可能；但因为它的两重性，所以它的革命性能够发挥到怎样程度，以及农民革命能得到怎样结果，首先要看那个有独立政治作用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农民取得领导权。我们为节省篇幅起见，不去多论世界革命运动史上的经验，只略举中国最近的历史事变，便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一个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但因为当时在中国还没有一个足以创造新社会制度的独立阶级（特别是无产阶级）作领导，所以太平天国运动终于不免陷入一般农民暴动的悲运——以广大农民群众反对地主的革命行动始，以“改朝换帝”继续旧社会制度终。义和团是自发的带着浓厚原始性的农民革命运动，因为当时没有独立的先进阶级作领导，结果被中国地主阶级和商业资本利用，并被它们勾结与投降帝国主义一同压迫下去。辛亥（一九一一年）革命虽然是广大农民参加的运动，但因为当时无产阶级还不能起来独立领导这个革命运动，结果农民群众被自由资产阶级叛卖了，没有得到革命的真实利益。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国大革命史，是一部充满着中国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争夺对农民领导权，并且创造下中国无产阶级对农民领导权的实际基础的历史。正因为在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反帝革命与土地革命中，中国无产阶级用自己的英勇斗争和经过自己先锋队——共产党的政治活

动，取得和奠定下了无产阶级对农民领导权的基础，所以才产生了自一九三〇年——现在正在向前蓬勃发展的苏维埃红军运动。没有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农民战争发展的过程和结果中，不会产生苏维埃和红军。苏维埃政权的红旗是广州工人阶级在一九二七年底用武装起义力量第一次举起来的。广州起义开辟了中国革命的苏维埃阶段。我们有一切事实材料，可以充分证明中国工人阶级不仅是现在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积极参加者，而且是它的领导者。举几个例说：

1．中国苏维埃区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上，公开地承认无产阶级在各级苏维埃政权选举中被选额数的特权，并且公开地承认这是实际反映中国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积极参加和领导作用，承认以此来保证苏维埃政权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途。

2．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是中国苏维埃政权和工农红军的唯一领袖；在各级苏维埃政权及红军组织中，中共不仅有政治上的绝对威信，而且共产党员在组织上占领导地位。

3．在中国主要红军部队中，工人成份（安源矿工、景德镇磁器工人、铁路工人、手工工人、雇农等）有时占很大的百分数。

4．许多人以为现在苏维埃区域只是农民的区域，这也是绝对错误的。因为我们目前手头没有最近的具体统计材料，且把一九三〇年夏季日晖同志关于一九二九年秋季赣南各地情形报告作一个参考：

(A)一九二九年九月至十月，赣南各县党员人数及社会成份统计表：

县名	人数	成份		
		工人	农民	富农及其他知识分子
兴国	350	10	50	40
雩都	270	10	60	30
安远	70	40	50	10
寻邬	300	15	60	25
信丰	120	20	60	20
南康	80	10	60	30
上犹	60	5	50	45
赣州	60	50	40	10
大庾	60	80	10	10
宁都	200	10	70	20

(成份以百分数计算)

(B)一九二九年九月至十月，赣南赤色武装组织社会成份统计表：

县名	成份		
	工人	农民	其他
兴国	5	70	25
雩都	5	55	40
安远	20	70	10
万泰县	10	60	30
南康	10	70	20
寻邬	5	70	25
宁都	5	70	25
崇义	10	70	20

(以百分数计算)

这两个表当然只能作参考材料，因为它们已经是过时的旧东西。在当时赣南各县不仅城市还未被红军占领，而且许多乡村还不是苏维埃区域。最近两年以来，我们江西、湖北、河南、福建等红军，已经占领过许多比较重要的城市（如江西的吉安、赣州、安远、景德镇、宁都、兴国、瑞金；福建的龙岩、漳州、永定、上杭；湖北的黄安、麻城、黄岗；河南的光山、潢川、固始；安徽的六安、寿县、正阳关、凤台、凤阳、霍丘……等）；在这些城市中，不仅有很大数量的手工工人、苦力、车夫等，而且还有些现代产业工人——如矿山、邮务、电话、电灯、汽车、印刷、建筑工人等等；虽然有许多城市（如赣州、吉安、漳州等）我们占领的时间不久，虽然有许多城市，我们因战略关系，早已自动退出，然而，最近两年来，工人成份在我们党与群众组织中的数量和比重，毫无疑问地相当增加了。而且即就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赣南统计表看来，那种所谓现今中国苏维埃运动是纯粹的农民运动的说法，已经是毫无根据。此外，还有一个最近的统计材料，可以证明无产阶级在苏区中的领导作用。据一九三二年二日鄂豫皖苏区省委的报告，党的省代表大会，共出席三二六人，其中有二五个工人，七五个雇农，换句话说，即无产阶级成份约占百分之三十。大会总结，选举省委员会正式三十一人，候补十一人；正式委员三十一人中，有生产工人四人，雇工及零工十七人，占全体三分之二以上。

至于苏区现有的苏维埃底政权形式和工农红军底武装组织、赤色工会、雇农工会、贫农团等群众组织方式，革命竞赛、革命突击运动及轻骑队等等许多先进工作方法，无一不充分证明广大农民群众是在与无产阶级联合并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此外，谁都晓得，中国中心城市的工人群众，虽然还未能达到直接建立苏维埃政权底胜利，虽然他们对于苏区红军的领导和赞助，还表现得不够实际上的需要；然而他们曾经用过许多方法去加强苏维埃区域和红军——上海、广东、武汉、长沙、安远、景德镇、武长路、粤汉路、平汉路工人们，曾经在中共号召和组织之下，选派自己最好的干部，到苏区去作苏维埃政权和红军的干部，曾经举行过集会、示威、募捐、成立红军友谊会等组织来拥护红军，曾经经常地不断地举行英勇的艰苦的罢工斗争，“每一个经济斗争，每一个罢工，每一个群众发动，这在非苏维埃区域之

中，不但是进到组织群众的一步，亦就是进到武装起义道路的一步，而且是直接对于苏维埃区域的帮助”。(见共产国际执委关于李立三路线问题致中共中央信）从这种观点出发，那末，我们可以断言，现在中国各地苏维埃政权及红军底迅速发展和胜利，不仅是那些苏维埃区域里面工农联合及无产阶级对农民领导的结果，而且是苏区工农群众受中心城市工人革命斗争影响及帮助的结果。当然，苏维埃区域的发展和胜利，同时又影响、推动和帮助中心城市工人的革命群众斗争底扩大和深入。只有这样去了解问题，才能正确了解中国工农斗争相互之间的联系，才能正确了解所谓“工农运动发展不平衡”的真实意义何在，才能正确了解共产国际所指示的中共在苏区与非苏区里面“两位一体的”的各种任务；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正确地了解和判断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现势和前途。当然，这里绝不是说：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已经完全取得和巩固了，争取、巩固和扩大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不仅是在非苏区的主要任务，同样是苏维埃区域中的主要任务，同时，这里也绝不是有丝毫轻视中国农民革命作用的意思，中国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动力之一，是中国革命的一支最大的主力军，这是铁一般的事实。而这一切，只是说现在苏维埃运动，不是纯粹农民运动或没有无产阶级领导而已。

(四)关于中国苏维埃区域中的反革命派活动问题——当写这本小册子的时候，一方面因为当时我和其他同志（如秦同志等）被立三同志等停止了一切工作，我们简直没有知道苏区和非苏区的党的工作情形的可能；另方面，在许多苏区里，因为立三路线的工作错误的掩护，许多反革命派别还未能及时地揭露和爆发。因此，小册子中关于这个问题未能特别提出讨论，而只是在有些地方讲到了立三路线对于苏区及红军危害时，个别地附带地说到过，未曾一般地说明苏区内部阶级斗争及反革命派活动有关系的各个问题。目前利用小册子再版的机会，把苏区内部反革命派活动有关的各个根本问题作一个简单的说明；这或者对于许多同志了解苏区内反革命派活动及怎样与之斗争等问题有多少的帮助。

我们苏维埃区域内部有各种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并且参加这些活动的有一部分所谓“共产党员”与“少共团员”，这并非什么偶然的或者奇怪的事。这些反革命派别产生和活动的原因，首先是由于苏维埃区域内阶级斗争的剧烈化和阶级力量相互关系的激剧变动。在我们苏维埃区域里，进行着激进的反帝革命与土地革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军阀、大买办、封建官僚等）的财产被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和财产被没收，把它当作一个阶级来消灭，富农的土地被重分，在重分时，只是在一定条件之下（不参加反革命的活动等）得到一定数量的质量较坏的所谓“劳动分地”，在有些资本家的企业中开始实行工人监督生产，土地革命的果实，落到中农、贫农和雇农手里，工人群众得到许多政治上、经济上的空前未有的新权利（八小时工作、社会保险、增加工资、选举中的特殊权利；出版、言论、集会、罢工等自由），苏维埃政权带着显明的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性质，一切帝国主义者、地主、买办、资本家、军阀、官僚、政客、豪绅、富农等等的原有政治特权完全被剥夺了，而且失去了在苏维埃政权统治下一切政治自由的权利。工农红军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质，一切压迫者和剥削者失去了武装保护自己血腥利益的权利。苏区在革命前与革命爆发后完全是两个相反的世界。这样一来，不仅把苏维埃区域内部的阶级斗争紧张剧烈到前此未有的程度，而且把全国范围内的阶级斗争都紧张剧烈化起来。苏维埃区域内部那些失去了土地的地主和富农们，那些失去了一切政治经济特权的老爷、大人们，用一切力量来企图夺回自己的财产和政治地位，“受伤了的野兽十倍地发狂起来拼命报复，被打倒了的统治阶级百倍地拼命起来挽回命运”；非苏区

内的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们，眼看着自己的兄弟们，在苏区里遭受的命运，更加十倍地咬牙切齿捶胸顿足地来痛恨工农群众，他们不惜用一切最残酷最可耻的手段，来对付苏区与非苏区的劳动群众，企图以此来消灭现有的苏维埃区域和保持住自己的"财产与生命"。苏区与非苏区的压迫者剥削者们，加十倍地努力去反对在苏区统治着的工农劳动民众，这就是苏维埃内部反革命派别活动的主要来源。帝国主义者、地主、资本家们，反对工农劳苦群众和红军，是不惜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和办法的。国民党对红军的军事围剿，是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隐蔽形式，是中国地主资本家反对工农苏维埃政权的露骨行动。然而反革命从经验中学得了教训，就是仅仅从苏维埃区域外面来实行所谓"围剿"、"大举进攻"，是很难收到结果的。于是苏区内部的地主残余、富农及一切反革命分子们，便极力企图用一切方式组织起来，在苏区内部进行各种各色的反革命阴谋——从造谣惑众直到反革命暴动等等，来响应国民党的"围剿"；帝国主义者与国民党更动员和帮助一切反革命派别，到苏区去与苏区内部反革命派结合起来，以便统一和集中"剿共"行动。帝国主义者与国民党为的反对共产党、工农红军和一切革命工农兵劳苦群众们，不仅使用一切白色恐怖手段，不仅在上海、南京、广州、天津、武汉等处设遍军警侦探机关，而且在南昌特设一个总指挥机关（由杨泰永、段锡朋等主持）专门组织和接济各苏区内部的反革命派别活动。这些反革命派别的名称虽然不一致——江西A.B.团、福建社会民主党、湘鄂西改组派、湘东南恋爱研究社、鄂豫皖改组派、社会民主党，各地的托陈取消派及罗章龙派……等等，他们活动的口号虽有时因时因地而不同，——例如：A.B.团的口号是："红军终归靠不住的，我们大家总得想个法子，免得失败了杀头"、"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社会民主党的口号是："反对没收土地，实行二五减租"、"打倒第三国际，拥护第二国际"、"拥护苏维埃，打倒共产党"……改组派的主要口号是："实行二五减租"、"改组国民党"等等、托陈取消派及罗章龙等口号是："红军是土匪"、"组织新共产党"……他们的活动方法虽然因时因地而变更——例如暗杀党和红军负责领导人，造谣中伤党和红军的干部，散布红军失败的谣言，宣传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力量大和"恩惠"，经过医生设法用毒药毒坏党和红军负责干部的头脑，捣乱后方，故意破坏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威信，鼓动农民"反水"，替白军当侦探、送消息，阴谋暴动响应白军……等等，但是，他们都是直接受国民党南昌总机关指挥的，他们都是向着一个共同目标进行活动——推翻苏维埃政权和红军，消灭共产党及一切革命工农群众组织，使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在苏区恢复统治，预防非苏区反动统治灭亡，使中国几万万工农劳苦群众永远过着牛马奴隶的生活，使中国人都作亡国奴。帝国主义者与国民党，不仅派遣一些侦探设法混到苏区内部的各种机关中去，苏区地主残余及富农资本家等，不仅尽量设法钻进共产党、青年团、苏维埃、红军、工会等等组织当中去，就是原来偶然加入到革命队伍来的那些"半途革命家"们，当着这种阶级斗争紧急关头，也必然不免发生动摇、犹豫、悲观、失望以至投降到反革命营垒方面去；这并没有丝毫奇怪，这首先就由于我们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阶段的原故，有些高兴一般反帝口号和反对封建军阀口号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及小资产阶级分子们，在某种革命运动中，也可以混进我们共产党的队伍里来；但是当着真正广大劳苦群众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进行彻底的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创立工农红军的时候，同时，当着在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最初阶段已经发现许多艰难、困苦和复杂条件的时候，这些"半途同道者们"便不可免的要回到他们自己的营垒中来反对革命。斯大林同志还远在一九二六年底，在他所写的经过联共中央同意的、为宣传鼓动员用的提纲上，便指明了这一点："在中国革命胜

利的道路上，将要遇到比俄国革命更大的困难；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的逃亡者和背叛者，将比苏联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不知要更多多少。"（着重点是我加的——韶玉注）

这类阶级异己分子和害怕革命困难的分子们，当着中国苏维埃新高潮与日俱长而同时又暴露了革命过程中许多严重困难的时候（例如对帝国主义斗争，冲破国民党军事围剿，建立工农民主专政政府，创造和巩固红军，实行苏区与非苏区"两位一体"的任务，解决经济困难等问题），有些人便公开地投降到反革命营垒中去保护自己原来的阶级利益和另找出路，有些人虽然仍留在共产党内，却不自觉地执行敌人在共产党内部的政治奸细作用，属于前一部分人的，在苏区内便是那些干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托陈取消派等等勾当的假共产党员；在非苏区内便是那些干帝国主义侦探生活的顾顺章、任卓宣、傅胜蓝、廖划平、韩麟辉、王拙夫（唐虞）等一般下流无耻的家伙；属于后一部分人的便是那些在共产党内进行反党路线和组织反党派别的分子们。不仅罗章龙派是直接响应敌人进攻红军和共产党的产物（这一点以后我们亦说到），就是李立三路线在客观上也是反映出敌人在共产党内部的政治影响。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考察苏区反革命各派活动问题上，最容易看得明显。大家都记得：当李立三路线在苏区还占重要地位时，客观上掩护着一切反革命派别的活动和发展，使反革命派别，有公开地利用当时党的口号来进行反革命阴谋的可能（例如因立三路线忽视建立根据地及巩固红军任务，使反革命派别各处易于蛊惑群众不相信红军力量，不相信自己胜利的情绪；反革命派直接积极拥护立三路线的"立刻打武汉，打到南京"的口号，因为这些口号，在当时一方面可使红军受到损失和失败，另方面可把苏区根据地轻易让给地主富农来"复辟"——夺回土地和屠杀工农等），因此，使许多地主残余和富农分子，都能在立三路线极响亮的"革命"口号之下，混进共产党、青年团、苏维埃和红军中——甚至一部分地方苏维埃和地方党部团部领导机关中去，公开地和秘密地进行反革命活动。立三路线在苏区对反革命斗争的实际，也和其他一切问题一样：或者发起狂来拼命大干一下——只知道杀尽一切反革命分子，不懂得分别首从，不懂得对受反革命影响和利用的那些分子做思想上教育、说服的工作，当然，更不懂得加紧党内两条路线上的斗争，加紧苏维埃政权及其他群众组织中的政治教育、自我批评和群众创造性……等等，是揭露和克服敌人在我们内部奸细的有效方法之一了；或者冷淡消极、什么不干——如开始时根本没有肃反的专门组织——政治保卫局等和系统工作。

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中央四中全会后，全党在国际路线的基础上，进行实际工作的转变。中央为着保障和加强国际路线在各苏维埃区域及红军中的正确执行，在一切苏维埃区域内，都成立了中央一级代表机关（中央局、中央分局、中央代表等），在一切苏维埃区域内，都曾经举行过全区的、全省的、全县的党和团代表大会，加强和改造了各级党与团的领导机关；改选和改造了各级苏维埃政权，建立、扩大、加强和巩固了赤色工会、贫农团、反帝同盟、万国革命者救济会等群众革命组织，特别是在政治上、组织上及军事技术和军事训练上，巩固和扩大了我们的工农红军。正因为如此，我们苏维埃区域，在最近一年半的过程中，才得到历历可数的成绩：全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建立和巩固起来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经济政策法令、建设红军提案……等等颁布和实行了，苏维埃中国与国民党中国的对立形势更加明显和剧烈了；两个中国制度的斗争，成了决定中国一切政治生活底第一等事变了，国民党的四次围剿都被冲破了。苏维埃中国的领土扩张到原有的好几倍以上而且巩固了，许多分立的零碎的苏维埃区域在有些地方打成一片了，工农红军的数

量增加了，质量大大地改善了，军事技术和战争能力相当地增加了；土地问题、劳动问题、经济政策问题一般地正确的解决了，工农的物质生活和政治地位，大大地改善和提高了，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在全国劳动群众的心目中的威信，不可比拟地扩大和提高了。"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逐渐成为全中国民众日益相信的口号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各苏区的一切反革命派别都被暴露了，他们的一切阴谋活动都被发觉和打倒了，如江西的肃反胜利，闽西的驱逐傅柏翠事变，鄂豫皖的肃反胜利，湘鄂西肃清改组派的斗争，广东东江的破获社会民主党反革命阴谋等等。在我们一切苏维埃区域里，各种各色的反革命派别，都被广大工农群众的威力和共产党的正确策略所压倒了。当然，反革命派别的组织和活动，将要随着阶级斗争的向前加深扩大程度而更加不可避免的重新发现。然而我们在这一点上，已经获得宝贵的斗争教训和创造了相当的战斗基础。固然，我们在肃反工作中，曾作过许多错误，而且现在还有许多错误和弱点，但是，在我们苏区党和红军领导机关的领导之下，在我们的国家政治保卫队和工农红军忠勇奋斗的条件之下，在千百万工农劳苦民众的觉悟力、创造性、组织力和斗争决心勇气与日俱增的条件之下，一定有克服一切反革命派别组织和活动、而最终地取得革命完全胜利的可能的。

B． 纠正说明问题：小册子中写得有错误地方的，据现在看来，主要地有下列两个问题：(一)关于没收和平分土地问题；(二)关于长沙事变估量问题。

(一)关于没收和平均分配土地问题——在小册子中讲到土地农民问题时，根据四中全会后中央及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材料，我们应当指出有两个问题写得不对的。第一问题，关于"没收富农土地"问题，小册子在批评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的错误时曾说道："(五)在国际政治决议上所写的：'富裕农民的土地不在没收之列'的词句下，自己擅自加上一个括弧，在括弧中标明一句，'这里是指富裕的中农说的'，这就是公开主张'没收富农的土地'……。"这一段话的意思，就是说：第一，立三、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擅自在共产国际政治决议上自加括弧，这是对的；因为国际政治决议原文上，的确没有这个括弧和括弧内那句话。第二，说维它同志等加这括弧的用意，是主张"没收富农的土地"，这是不对的；因为立三、维它同志等，从来不仅不主张没收富农的土地，而且有时甚至公开主张联合富农；在三中全会及三中全会后几个月，维它同志在中央任何文件上，都没有主张没收富农土地的指示，便是事实上最好的证明。四中全会后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都主张"重分富农的土地"，但同时主张富农在其土地被重分后，在不作反革命活动的条件之下，可以分得一部分质量坏的"劳动分地"，这种办法是完全正确的；所以中国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法令上，完全采取了共产国际及中共这些主张。这种办法的出发点，是因为中国富农主要地是用半封建剥削方法去出租自己的土地来榨取大量的地租，重分富农土地的办法，在目前主要地还只是彻底肃清封建余孽底土地革命中的一种步骤；所以我们主张在一定条件下，仍然分给富农以一定量的劳动分地——这种办法与立三、维它同志等的半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中国现在苏维埃区域已经能够消灭富农的观点，也没有丝毫相同的地方。第二个问题，关于平分土地问题，小册子上说："在解决土地问题中，反对富农的具体办法是：根据人口与劳动力的混合原则，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形，来在富农、中农、贫农、雇农、苦力、红军兵士中，重新平均分配一切土地"。这一段话，从现在看，有下列几点错误：第一，未能真正抓住维它同志等关于这一问题的错误的核心，维它同志等所写的"平均分配没收来的地主土地"这个口号的错误实质是：(一)未写明"没收一切地主、寺院、教堂及其他大私有者的土地"(见共产国际执委一九三〇

年七月对中国问题决议)，而只说没收地主土地；(二)未显明说明“把这些没收来的土地，按照平均分配原则分给贫农和中农”(见同上决议，这样就不能使苏区地方党部及政府机关对于把没收来的土地分给什么人的问题有明确的了解，这样，就不能使苏区地方党部坚决起来纠正当时在分配土地上底那些不正确企图（或者妨碍没收地主土地，或者主张把没收来的土地按照农民所有生产工具为原则来分配——见同上决议）根据现有材料看来，当时在分配土地问题上，各苏区各有不同的办法，其办法有时并不与国际决议所指出者相同。第二，我所写的那种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办法，从现在正确观点看来，是那时候一种不正确的流行的口号。其实，它并不能作为我们的口号。当然，我们每个列宁主义者都懂得：平均分配一切土地这种办法的真实意义和内容。这种办法，从彻底消灭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的观点看，是革命的，从社会主义集中生产工具的观点看，是退步的；同时，每个列宁主义者都记得列宁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证主张，即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上，我们应当尽力赞助这种办法——如果这种办法由农民自己提出和要求实行的时候；但同时我们应当善意批评这种办法的缺点和不彻底性，并宣传我们的“土地国有”的主张。因此，“以平均分配为原则来重新分配一切土地（没收来的地主土地，以及富农、中农、贫农原有的私有土地包括在内)的口号和办法”，并不能作为我们指导土地革命的口号，而只能是在广大农民群众都自己要求和自愿实行时，我们应当赞助的办法和口号，尤其是在中农不愿或不满意这种口号和办法的时候和地方，我们应当尽可能地使中农能够保有他们原有的土地，并且在平均分配原则下得到较多较好的土地。我们在土地革命中的根本原则，应当是：“土地革命不是富农的，而是贫农和中农的”，“土地革命的动力应当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雇农、贫农和他们与中农的巩固联合。”（见同上决议）同时，我们不仅顾到革命的今天，而且要顾到革命的前途，我们始终是把目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看作是准备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前提底阶段；因此，我们不仅要在广大农民群众中，进行在中国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得到决定意义胜利或完全胜利时实行土地国有的必要的宣传，同时，还须有系统地极通俗地把苏联集体农庄化的宝贵经验，以及它对于基本农民的切身好处等作广大深入的宣传。

(二)关于长沙事变估计问题——在长沙问题（红军第一次占领长沙和第二次进攻长沙）上，当时因为我和其他同志没有任何党的工作，所以我们简直没有知道一点实际材料的可能。因此，小册子中所讲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只是根据着反对当时否认中国革命有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可能，以及我们承认有这一可能的一般理论原则来提出和解答问题；所以我当时并没有可能来根据实际材料去估量长沙事变（特别是第一次占领长沙）是否盲动冒险。据最近我们收到的中央苏维埃区党代表大会的材料，我们已经知道，长沙事变是立三路线的冒险盲动的具体表现之一，在这大会的政治决议中说：“长沙战争就是立三路线冒险主义发扬的最高峰，大会完全同意中央局扩大会议对于长沙战争的估量，长沙战争是冒险行动。”中央苏区党的最好领导和干部，他们根据着实际经验所作出的集体结论，无疑问的是正确的。当然，我们绝不因此而忽略了长沙占领的历史意义，“长沙战争正确地表示了工农红军的力量和英勇，得到了伟大的历史意义。”(见同上决议)大会决议上这一结论，也是完全正确的。为着使这一问题有更清楚和更周到的了解，我以为还须有一点补充的说明：就是，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因为一九三〇年夏季占领长沙的错误，便根本作出无论如何都不能占领重要城市的结论：谁以为我们红军永远都不必和不能去占领重要城市，谁便是对国际和党的策略作了极坏的机会主义的曲解。列宁主义与立三路线对这一问题的分歧，绝对不是在于：立三

路线主张中国红军要占领中心城市，国际路线是主张中国红军无论如何都不占领中心城市；而是立三路线在红军力量不够，占领中心城市的其他条件也未具备的状况之下，要红军去冒险进攻中心城市，结果不独不能占领，而且使红军受到不必要的牺牲；而国际路线是主张红军应当逐渐准备并把自己巩固和扩大到有占领中心城市的战斗力，同时，准备其他一切必要的前提，只有在敌我力量对比有利于红军的条件之下，才去占领重要城市。

C. 新加的几个问题：小册子中当时未曾说到，现时有必要说明的，据我现在看来，主要地有下列几个问题：(一)立三路线的半托洛茨基主义实质问题，(二)四中全会前反立三路线经过问题。

(一)关于立三路线的半托洛茨基主义实质问题——共产国际执委及中共四中全会都确定说："立三同志的半托洛茨基路线"或"半托洛茨基主义的李立三路线"，然而叛徒罗章龙等当时——直到现在却一口咬定说："李立三路线是托洛茨基主义路线，或者比托洛茨基主义更坏的路线"，因此，他们说："共产国际执委及中共中央四中全会对李立三路线取调和态度和掩蔽立三路线罪恶"，这些叛徒们以为他们的那种说法比共产国际及中共更"左"些，所以他们更是彻底地反对立三路线些。这些叛徒们在这一个"左"的词句下，企图干些什么勾当，已经是人所共知共见了。他们向人们宣传说："李立三路线是托洛茨基主义或比托洛茨基主义更坏的路线"，"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曾采纳了李立三路线，而中国共产党曾执行了李立三路线"，因此，"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国共产党是比托洛茨基主义中央和托陈取消派更坏些"——在这面盾牌掩护之下，罗章龙等不仅提出"开除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中央委员资格或党籍"的要求，而且实际上实行分裂和破坏中国共产党而去另行组织所谓"第二党"的行动。现在谁都明白了，叛徒们这些"左"的口号，绝没有丝毫反对或厌恶托洛茨基主义和托陈取消派的真义，而只是在这些口号之下，来企图进行诱惑一部分落后的共产党员和团员，跟着他们一路跑到托陈取消派营垒中去。他们实际上是宣传说："看呵！中国共产党比托陈取消派更坏些，我们一路到托洛茨基队伍中去吧！"表面上挂起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招牌，实际上做着托洛茨基主义的生意，这就是叛徒们装腔作势的实质。这也是现在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工作方法的特点。

罗章龙等叛徒被驱逐出党了，但罗章龙等对这一问题的观点，有时在个别的共产党员中间，还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发现着；而暴露这类观点的同志们，时常也是表示他们比共产国际执委及中共中央见解"更正确"的态度。他们同样以为不把中共政治局一部分同志们所犯的李立三路线错误看成托洛茨基主义的或比它更坏的错误时，便是轻视了李立三路线的危险实质，便是袒护了立三路线。因此，把共产国际执委及中共中央对于李立三路线的半托洛茨基主义的实质的估计，作一个简单的说明，目前依然是很必要的事情。

为的说明这个问题，首先必须了解托洛茨基主义现在的实质是什么，"托洛茨基主义实际上早已不是共产主义的派别了，实际上，托洛茨基主义是反革命资产阶级反对共产主义、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底斗争中的先锋队"。(见斯大林同志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为什么"托洛茨基主义是反革命资产阶级底先锋队"呢？首先因为，托洛茨基主义供给了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对布尔塞维主义的思想上的武器，斯大林同志在同上那封信中正确的说：

"谁供给了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以反对布尔塞维主义的思想上的武器，例如，在我们国家内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提纲，布尔塞维主义必然腐化等的提纲呢？这个武器是托洛茨基供给他们的。苏联境内一切反苏维埃的集团，都引证托洛茨基主义关于我们国家不

能建设社会主义，关于苏维埃政权必然腐化，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恢复的著名的提纲，作为自己必然要与苏维埃政权作斗争的根据，这件事实决不是偶然的。”

然而托洛茨基义主不仅供给了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以思想上的武器，并且还供给了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以反苏联的策略上的武器与组织上的武器。关于这些问题，斯大林同志在同上那封信中接着上面一段话，就说：

“谁供给了苏联境内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以策略上的武器，如反苏维埃政权底公开发动的尝试呢？这个武器是企图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行反苏维埃示威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供给他们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反苏维埃的行动，振起了资产阶级底精神，帮助资产阶级专门家的专门危害工作，这是事实。

谁供给了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以组织上的武器，如企图建设秘密的反苏维埃机关呢？这个武器是组织反布尔塞维克的秘密派别底托洛茨基主义者供给他们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反苏维埃的秘密工作，帮助了苏联内部一切反苏维埃集团组织上的形成，这是事实。托洛茨基主义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底先锋队。”

看了斯大林同志对于托洛茨基主义实质这段正确精彩的说话，还有没有可能来断定，曾经在短时期内占过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地位的李立三路线与托洛茨基主义是一样的东西——尤其是比托洛茨基主义更坏些的东西呢？不能，绝对不能！因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当时所犯的李立三路线的错误，虽然在思想上有许多主要问题带着托洛茨基主义的性质，但绝不能说，中共中央政治局这部分同志在执行立三路线时，采纳过或应用过托洛茨基主义的策略上的武器和组织上的武器。当然，李立三同志个人在反对共产国际的斗争中，采用过共产国际一切“左”右叛徒所惯用过的词句（如说：“共产国际不懂中国情形”、“忠实于共产国际是一回事，忠实于中国革命另是一回事”、“等打下武汉后再同共产国际说话，就不同了”等等），这是铁一般事实。同时，如果李立三同志个人不及时地在共产国际及全党同志威力下屈服和承认错误，如果他把他个人的反马克思反列宁主义的半托洛茨基路线在实际上继续和发展下去，他有可能地要走上托洛茨基主义的道路。然而，当估计到执行立三路线时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们底错误实质时，则应当根据一切事实来作判断的根据。

当我们现在讲到托洛茨基主义实质时，绝不能把他的思想上的武器和策略上组织上的武器分离开来。

因此，当我们估计到中共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所犯的立三路线错误实质时，我们正确地指出它的半托洛茨基主义性。这种半托洛茨基主义的实质在什么地方呢？（1）因为李立三路线是一种“在‘左’倾空谈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消极”的路线，同时，是一种盲动冒险的路线。而托洛茨基主义也是这样的。斯大林同志在估计托洛茨基主义的本性时说：

“内容是实际上的投降，形式是‘左’的词句和‘革命的’冒险癖，这种形式是用来掩盖和装饰这种投降的内容——这就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本性。

托洛茨基主义的这种两重性，反映出正在破产着的那种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的情形，这些小资产阶级不能忍受无产阶级专政的‘压制’，他们企望或者‘一下子’就跳进社会主义，以避免破产痛苦（从这一点就产生出在政治上的冒险主义与发狂性），如果这样没有可能的话，或者就对资本主义作不惜任何的让步（从这一点就产出在政策上的投降性）。”

根据斯大林同志这种论点去总结李立三路线的本性，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这样说：李立

三路线是形式上以"左"倾空谈掩盖着右倾消极的投降内容底路线。李立三路线的这种两重性，反映出正在破产穷困的那些中国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的情形，这些小资产阶级在国际帝国主义及中国地主资本家的长期残酷压迫剥削制度下，表示出无限的愤激、悲观和失望，在中国苏维埃革命新高涨的紧急关头，一方面眩于革命运动初步胜利的头昏，另方面对革命道路上的困难表示投降的绝望，他们希望或者"一下子"使全中国以至全世界都变成社会主义制度，以避免更加破产底痛苦和避免革命困难（从这一点就产生出在政策上的冒险盲动），如果这样没有可能，或者就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作不惜任何的让步（从这一点就产生在政策上的消极性和投降性）。

共产国际执委对中共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的立三路线的半托洛茨基主义性底估计，正是这样的观点。国际执委在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上说："……然而这个方针（指立三路线——韶玉注）虽然用'左倾'的词句遮盖其消极，实际上亦是机会主义，例如托洛茨基主义亦是这样的。"

（2）因为李立三路线对于革命中的许多根本问题，犯了与托洛茨基主义理论同样的观点。这些带着有托洛茨基理论观点错误的问题，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信上，有很简明正确的说明；中共中央四次扩大会议便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信上所指示的原则，在自己决议上对于这一点，作了个总结的说明："立三同志的错误，不是个别偶然的错误，而是联系许多错误观点，形成一贯的反列宁主义的系统，这些错误观点，在实质上是重复了托洛茨基的理论。立三路线否认在一般的革命高涨的基础之上，世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这就否认中国革命胜利和巩固这一胜利的可能。立三路线对于中国革命性质的阶段的正确了解，处于完全矛盾的地位，他用托洛茨基否认革命之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的观点，来代替列宁的革命转变的理论，这就表现他对于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任务，完全不了解。否认中国国内革命发展的不平衡，不理会中国政治经济环境的特殊性，所以立三路线就取消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可能。立三路线对于党是革命的组织者的作用完全不了解，对于共产主义者的先锋队和工农群众之间应有关系，亦完全不了解……。"立三路线的所以发生这些错误观点，就是因为李立三对于许多原则问题与托洛茨基的理论观点相同。李立三同志否认列宁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在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有效用，不相信中国工人阶级能够领导农民的作用，不了解农民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不承认中国环境的特点，不了解和忽视布尔塞维克党的组织原则和党对革命的组织与领导作用，这些都恰是托洛茨基主义理论上的主要组成部分。

以立三为领导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虽然曾经犯过这些托洛茨基主义理论上的错误，但他们不仅未采用而且坚决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策略武器和组织武器，因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们当时所犯的错误，还是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中的错误，不能把它与早已成为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先锋队底托洛茨基主义混为一谈。李立三路线是一种半托洛茨基主义性质的路线——共产国际执委与中共中央这种估计，是百分之百正确的。

罗章龙等直到现在还故意高呼："中共中央是托洛茨基主义秽物"，企图以此来证明他们的"解散整个中共中央，开除整个中央委员党籍"的要求，与"组织新共产党"的行动的"合理"，企图以此来解释他们反对共产国际执委和中共四中全会"对立三路线调和"的罪状的正确，实际上企图以此来破坏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和诱惑少数落后分子到托洛茨基主义者那个臭泥坑当中去，这当然是毫不足怪的。但是，那些主观上还愿留在共产党内，而同时到现在还

坚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内占过领导地位的立三路线错误是托洛茨基主义错误，尤其是比托洛茨基主义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还远的错误的同志们，以及认为这种说法是反立三路线时所应有的、不可避免的、但是没有什么多大意义的过火言论的同志们，却须格外当心点，却应当仔细把问题的实质弄清楚些，不然，便要在客观上帮助了托陈取消派的反中共和反共产国际的活动。

（二）关于四中全会前反立三路线斗争经过问题——四中全会前的反立三路线斗争的过程，虽然一共只有七八个月时间，然而其中详细情形，绝不是很短篇幅所能说得完的。此处要说的，只是这一斗争在非苏区经过的几个最主要阶段中的几件最主要和最显明的事实。这些事实在现在之所以必要说明，因为在我们队伍中还有一小部分同志对于这一斗争经过的情形不明了，时常在文字上和说话中，表示要晓得这一斗争经过的必要。同时，罗章龙派及托陈取消派经常用曲解和捏造事实的办法，来企图加强他们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反革命地位。这些反革命分子曲解和捏造反立三路线斗争过程的办法，不外下列几种：第一，托陈派可耻的武断说："立三路线就是共产国际路线，共产国际之所以反立三路线，是因为共产国际企图在反立三路线的借口之下，将不听指挥的李立三等逐出中央领导机关之外，而代之以斯大林派的人物，所以中共内部反立三路线的斗争，是无原则的派别斗争，是斯大林派的阴谋手段……"第二，托陈派与罗章龙派可耻的宣传说："反立三路线的主要人物不是共产国际执委和中共现在工作的那些干部同志，而是托陈取消派与罗章龙叛徒与何孟雄同志等"，托陈派说："我们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后，即反对中共中央路线，所以我们是反立三路线的始祖。"罗章龙派说："真正反对立三路线最早和最有力的是以罗章龙、何孟雄等为领导的那些人物，而不是那些所谓拥护国际路线的英雄们。"第三，不久以前才恢复党籍，原来犯过托洛茨基主义错误的分子们，最近无耻的造谣说："现在中央负领导工作的那些同志们，并未真正作过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尤其是他们未曾用过同志关系的说服方法来帮助当时中共中央负责者李立三同志等改正错误，而只是在国际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国党的信到中国后，在中央会议上放一阵大炮，把李立三等赶跑了，自己占据了党的领导的位置。"这些分子们直到现在还继续散布这些可耻的捏造谣言，当然是为的要来污蔑共产国际和中共领导同志，企图以此来影响中共的某些同志，并企图以此在中国工农群众面前来破坏共产党的威信，所以用铁一般的事实来打破这些分子的造谣，对于使一切中共党员和同情中国革命的朋友了解这些问题的真相，是一件必要的事情。

关于托陈取消派所捏造的那第一种谣言，当然已经没有辩答的价值，李立三路线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实质，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政治路线是根本相反和不能并存的实质，现在对于任何人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了。至于这些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先锋队员们所高叫的，什么"共产国际是斯大林派把持"等等反革命论调，早已在全世界共产党和先进无产阶级分子一致公认斯大林同志为列宁主义的最忠实、最坚决的继承者和发扬者的伟大事实中，暴露其反动无耻的原形了，也值不得再加任何的辩驳。关于托陈派所说的，他们是在第六次大会后，即反立三路线的问题，也是值不得辩驳；因为现在谁也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六次大会后至立三路线占领导地位前的政治路线，是与共产国际正确路线一般相合的。托陈派这种谣言的目的，是在企图证明中共自从六次大会后，即是把陈独秀机会主义和以后的盲动主义完全公开宣布死刑后，特别是把陈独秀、彭述之等逐出党的领导机关后，中共中央路线便不正确了；因此，中共中央领导全党坚决进行过的反对托洛茨基派及

陈独秀派的斗争，特别是把托陈派一切分子驱逐到无产阶级政党队伍以外去的斗争，是完全不正确的；托陈派企图在他们是"反立三路线老祖宗"这面盾牌掩护之下，来达到他们的派一部分人"回党破坏"，来达到他们"无论如何设法留在党内干"的目的，这是很显然而且是无庸争辩的事实。至于罗章龙派及托洛茨基信徒们宣传的四中全会前反立三路线经过的许多可耻的捏造谣言，因为有些人还不了解有些问题的真相，所以必须用铁一般的事实来打碎他们的阴谋诡计，以便那一小部分还不十分了解这一问题真相的同志们，能对于这一问题得到正确的了解。

四中全会前在非苏区反立三路线经过，可以分为下列几个阶段：(一)立三同志论文发表后至中央政治局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一日政治决议发表前为第一阶段；(二)六月十一日决议发表后至三中全会前为第二阶段；(三)三中全会至国际执委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信在中国发表前为第三阶段；(四)国际来信发表后至四中全会为第四阶段。

第一阶段．可以说是一部分同志企图用个人谈话的建议和说服方法，预制中共中央政治局一部分领导同志犯立三路线错误底阶段——在立三同志的许多主要论文散布在各期"红旗报"上和收集在"布报"第四、五合期上发现的时候，就有个别同志和政治局委员项同志的十数次谈话，与忠发同志等的几次谈话（当时因工作环境关系，没有遇见立三同志的可能），到六月十一日决议案通过的前夜，有些同志又有与立三同志的谈话；在这些谈话中，都曾诚恳地明白地指出立三同志这些论文中的根本观点的危险，同时，忠告中央政治局不要把立三同志论文中的意见采纳到自己的决议中去。关于这一点，有立三同志自己给中央政治局的声明书中一段话可以证明，在他声明书中说："(二)关于反立三路线斗争问题——正因为党有伟大的历史教训，正因为党走上了布尔塞维克化的道路，所以当立三路线形成之初，即遇到党内同志的反抗．这一反抗倾向的最明显最坚决的代表，便是陈、王、秦、何同志等反对六月决议案的斗争，还在六月决议案之前，我发表中国革命高潮前诸问题的论文时，陈同志等已起来反对这些错误观点。"但是，这些同志预制中央政治局一部分领导同志犯立三路线错误的企图未能达到目的，立三同志的论文毕竟成了中央政治局六月十一日决议案的底稿。

第二阶段，可以说是一部分同志在领导机关内进行反对中央政治局的一部分同志李立三路线错误的斗争底阶段——当一部分同志听说中央政治局根据立三同志论文通过决议时，便起来找中央负责同志（立三、忠发等）谈话，忠告他们不要把这一决议宣布，要求他们通过新的正确的决议。立三同志等不仅不采纳这些同志的意见，而且公开答复要同这些同志到中央工作人员会上去作公开的斗争。在中央工作人员会上公开起来反对中央政治局六月十一日决议的有几个同志（罗章龙那天虽然也出席了，可是并没有说一句反对这个决议案的话，而且声明同意这个决议)。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些同志才受到当时立三、忠发等的异常仇视，不仅在政治上到处打击这些同志（骂他们是"右派"、是"取消派暗探"、是"小组织者"等等），而且在组织上采取严厉的处罚办法来对付。关于这一切有开始承认立三路线错误时的中央通过的决议作证明，在中央发表的取消这些同志处罚的决议上说："在中央六月十一日决议案发表之后，立三同志的路线已在中央居了领导的地位。这一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当时在中央工作人员会议中，陈、秦、王、何四同志反对此种路线的观点，是合乎国际路线的观点，但立三同志固执自己的观点，认为四同志的意见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这显然是很大的错误，中央政治局当时因为赞助与执行立三路线的缘故，竟因四同志批评中央的路线而妄加他们以小组织的罪名，给陈同志以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给

其他三同志以最后严重警告，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这种批评与处分，不仅是不应当，并且更抑制了党员对指导机关的正确的自我批评，与取消了党内最低限度的民主化，而复活了六次大会所指斥的惩办制度与家长制度——这正是立三路线的组织原则。中央政治局现在站在拥护与执行国际路线与反对立三路线之不调和的立场上，认为过去对四同志的斗争与处罚是错误的。现在除正式的取消对他们的处分外，并将此错误揭发出来，以加重四同志对立三路线之不调和的斗争的责任。"(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六日政治局通过的决议)

在中央工作人员会议后，曾经有一部分文化工作党团同志（如灵壁等）及江苏省委宣传部的工作同志，以及个别的区委工作同志和支部同志同情和参加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在河南方面，八月间，有以列甫同志为领导的多数省委委员反对当时省委书记的立三路线的领导底斗争。关于这一斗争的经过，同样有中央文件的证明，四中全会后，中央政治局关于解决河南争论问题的决议上说："过去中央立三路线的领导，使河南省委工作上陷入严重的错误。去年七八月间，省委以昌勇同志为代表的少数拥护立三路线的同志们，认为河南全省暴动形势已经成熟，应当争取河南的首先胜利，于是不顾客观形势，到处举行盲动冒险的行动。甚至三个人也要示威，一个同志没有的地方，也要派人去立即组织暴动。这种错误意见，当时曾受以列甫同志为代表的省委中多数同志的反抗，这些同志提出反对盲动冒险和真正革命的群众工作的任务。一般的讲来，河南省委内的争论，是多数同志们合乎国际指示的正确路线反对反共产国际的立三路线底争论。不幸当时北方局的领导，依照立三路线去'解决'了这个问题。北方局加列甫等同志以'一贯右倾机会主义'与小组织行动的罪名，取消多数省委同志们的工作……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继续对立三路线调和，因此在河南问题委员会上，除了对北方局关于河南问题的处置加以肯定外，并给列甫同志以留党察看三个月的处分，在中央告同志书上，又认为列甫同志是破坏党的原则的派别。四中全会后，新中央政治局认为过去中央和北方局这一切处置都是错误的。现在除对于河南工作另有决议指示方针外，特决议取消以前一切对河南问题错误处置，取消对列甫同志的处罚，通告全党，号召河南省的全体布尔塞维克团结在国际路线之上进行革命工作。"(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九日通过的决议)

此外，在三中全会不久以前（九月一日），发生过何孟雄同志在上海区书联席会议上，反对立三路线的发言和他的九月八日声明书。中央在开始承认立三路线错误时，也曾发表过决议承认何孟雄同志的这一意见书一般的是正确的，并且指责了江苏省委当时加孟雄同志以取消派暗探的罪名和撤消他的省委工作为不正当；也正因为如此，所以罗章龙派才高叫何孟雄是反立三路线最早和最坚决的代表。然而，根据我们所有的和右派自供的一切材料，可以毫无疑问地判定下列事实：第一，何孟雄这一反立三路线发动，不是最早的，而是在六月十一日决议后至三中全会前最迟的一次反立三路线发动。第二，孟雄同志并不是最坚决的反立三路线的代表，不幸得很，他恰是最不坚决的分子，因为他在九月三日区书联席会议上受了立三同志打击后，马上便承认了自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后来他虽然在许多同志的帮助和催促之下，送给中央一个意见书，然而当着第二次上海活动分子会上，报告同志作报告打击他一顿时，他又公开地承认了他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并"请求报告同志来帮助他改正错误"；第三，根据西更后来向中央的报告，知道孟雄同志当时的这一意见书，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写的，而是开小组织会议讨论后写的。参加这小组织会议的西更同志，因为当时是政治局委员，曾经看见过当时国际执委给中国党的许多新的纠正中央错误的指示，所以能在声明书中写出一些与国际指示相同的意见。此外，孟雄同志曾与当时坚决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

们谈过多次话，这更是帮助他在声明书中能写些正确意见的主要来源。所有这一切，都证明罗章龙派用孟雄同志是反立三路线最早和最坚决的代表这面旗帜来掩盖他们的反党反革命行动的企图，是不能成立的。当然，更用不着说：孟雄同志在四中全会前后，曾离开了自己原有的比较正确的意见书的立场，而走到与罗章龙派联合进行反党的错误了。同时，我们必须指出孟雄同志对党的立场与罗章龙等还是有极大差别的，我很相信，孟雄同志如果不牺牲在国民党手里，他定会与罗章龙派分裂而回到党里来的。

第三阶段，可以说是反立三路线斗争由比较高级的领导机关（中央、省委等）内发展到比较多些的党员群众中去的阶段——三中全会前，党内许多同志曾经风闻国际执委对中国革命问题有了新的政治决议（一九三〇年七月对中国问题的政治决议及其他指示等），并且听说维它等同志已经准备召集中央全会来决定执行国际决议；因此，拥护国际路线与反对立三路线的同志们，都希望三中全会能有一个正确的合乎国际路线的决议。然而事实与这些同志的预料相反，三中全会的领导同志们，不仅在政治上用调和态度来继续立三路线，而且在组织上加紧实行惩办制度与家长制度来对付那些反对立三路线的同志们，把他们任何工作完全取消了（甚至连在立三路线时还保存的一部分反立三路线的同志的工作都取消了），而且连和同志们谈话都一概拒绝。这样一来，就逼得那些坚决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们，原来尽力希望说服中央政治局一部分领导同志去诚恳接受国际指示底同志们，不能不走到党员群众中去进行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因此，在三中全会决议发表后，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在上海已经日渐包括更多的党员群众。不少的支部、区委同志，某一部分领导工作同志，以及当时因事路过上海的（乃康同志等）苏区和外省的同志，都积极地卷入了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当时凯丰仓皓戒知等一批青年团同志及则名劳侠等一批党的同志，给了反立三路线一个极大的帮助。当时江苏省委负责人到上海来，在各种会议上，多半要遇到反立三路线的言论；在实际工作中，立三路线常遇到支部同志——首先是工厂支部同志的热烈的反抗，然而因为许多特殊条件，——革命斗争的紧张，秘密环境的困难，同志们一般理论水平的不够，立三路线主要分子握住了当时党和团的一部分最主要的领导机关，惩办制度与家长制度的盛行和布尔塞维克的党内斗争的经验不够……等等条件，当时由一部分干部所领导的下层党员群众所发动起来的反立三路线的力量，还不能使立三路线的中央政治局一部分负责同志们及各主要省委（江苏、河北等）的负责人自动起来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们以极大限度的非布尔塞维克的顽强性来企图作继续持久的抵抗；因此，在这一时期，使党的生活更陷入非常不经常的状态。只有在国际执委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在中国党内宣布时（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初），才动员了绝大多数的中共党员和团员起来进行反对立三路线及对立三路线的三中全会领导同志底斗争，才逼迫得执行立三路线的中央政治局一部分领导同志不得不一步一步地退出自己原有阵地，而宣布向共产国际和全党屈服。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党的四中全会决议上，特别加重地指出说："现在党所遭受的一切严重影响，都是立三同志和赞助他的同志们忽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令和预先警告的结果。"同时，四中全会指出"中央委员会路线的纠正与一切错误的克服，是全靠了共产国际。"

那些在国际来信和四中全会后高叫自己是反立三路线的"先锋"和"始祖"的英雄们，在三中全会上和三中全会后，依然是同意立三路线的健将。试拿三中全会上他们的几个最主要人物的发言记录中最主要点看一下，便可证明。三中全会上讨论政治问题时，罗章龙的发言上说："听了报告，看了决议，我对于整个的系统意见完全赞成。报告中严厉的提到自我批

评，我也是完全同意。……三位中央同志，尤其是立三同志的自我批评精神，我认为很好。”余非的发言上说：“听了特生、少山两同志报告和几个同志的发言，尤其是立三同志的发言，及看了国际材料和参加了国际的讨论，以及最近参加实际工作以来，对照那些情形，深深感觉得中央的路线与国际路线是没有丝毫不同，企图将国际与中央对立，反对个人的方法，正是过去托洛茨基用的反党方法。”而西更则在国际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到中央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说：“我对于维它同志的发言完全同意……三中全会的路线是没有问题的。”

把这些铁一样的材料看了以后，同志们就可以看出罗章龙叛徒等高叫罗章龙及其党徒们是“反立三路线代表”，现在中共领导干部的同志们“从来没有真正反对立三路线”的狂吠，是如何可耻与捏造了！当然，他们这种可耻谣言，只有在国民党的报纸上（新加坡的“新国民日报”上标题为“最近共产党的内幕及总崩溃的趋势”一文，以及中国境内天津“大公报”摘要登载而改标题为“国难中之共党衰落”一文等等），才能取得热烈的欢迎和转载。

第四阶段，是反立三路线斗争普及全党而同时又是真的站在国际路线和爱护党的同志们与假的（站在右倾机会主义观点上进行反党派别活动的分子们）反立三路线的阵营的公开划分的时期——在共产国际执委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央信公开在中国党内发表后，在中共中央十一月二十五日决议——尤其是九十六号通告上公开宣布立三路线错误后，立三路线之危害革命和党，已经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了。当时在党内再没有一个人敢说不反对立三路线了。也只有在这样的时候，罗章龙、余非等才大吹大擂地活动起来，他们把反立三路线这几个字当作商标一样地向党员群众宣传，他们企图在假的反立三路线的旗帜之下，来达到在政治上以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来代替国际路线，在组织上以自己的右派小组织来占据党的领导机关底目的。右倾机会主义不能真正进行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也同“左”倾机会主义不能真正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一样。右倾机会主义者当时高叫他们能够反对“左”的李立三路线，也和立三路线者大吹在立三路线时代，他们曾经“坚决地实行过一条战线上（即反右倾)的斗争”底一样滑稽和愚蠢。“左”倾和右倾是机会主义的两方面，“什么地方有‘左’的倾向，什么地方一定有右的倾向”，(斯大林）同时，什么地方有右的倾向，什么地方一定也有“左”的倾向，“左”右机会主义经常是相互掩护相互帮助和相互助长的。立三路线的实质，便是“左”倾词句下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消极。立三线路占统治时代，不仅同时还作出许多露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如土地问题中的错误办法，争自由运动中的幻想资产阶级当时还有革命作用等)，而且事实上正掩护和培植着那些各种各色的右倾机会主义政治主张和右倾派别的发荣滋长。罗章龙等的反立三路线的立场，不仅不能丝毫反对立三路线，而且实际上正模糊、混淆和障碍了真正反立三路线底斗争。“左”右机会主义都同样的仇视和反对共产国际的唯一正确路线，这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观点看来，都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事。所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党开始向国际路线转变时。便抬起头来企图将党拉向机会主义另一方面去，这是毫不足怪的。当然，右倾分子不能不懂得：如果他们在这种党已经克服了立三路线而实行真正两条路线上的斗争底关头，公开的提出自己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政纲，那末，他们就必然要马上受到李立三路线一样的命运。因此，他们企图躲在反立三路线旗帜下，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偷运些右倾机会主义的私货来，以便用投机取巧的手段抓得党的领导机关，然后再来实行自己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然而，狐狸无论如何灵巧，时常总不免要“露出尾巴”来，因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无论如何尽力企图在未夺到领导机关前，暂时不要露出自己的真面目；但是，结果依然不能不在许多原则问题讨论中，暴露出右倾机会主

义的狐狸尾巴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们最初的发动，是采用许多转弯抹角的巧妙方式：他们不说他们不相信共产国际路线对中国党的正确领导作用，只说"中国共产党自六次大会以来路线便不正确"，或者"当时中央所犯的各个问题的错误，已经动摇了党的总路线"；他们不说国际来信中所指出的政治路线与任务不能实用，只说要由他们来"树立国际路线"和"重新讨论一切问题和制定一切新的决议"；他们不说他们估计中国当时形势已经没有革命运动高潮，只说"立三路线实行的结果，已经完全破坏了党，破坏了团，破坏了工会，破坏了红军，立三路线所造成的恶果，与陈独秀机会主义与瞿秋白盲动主义所造成的结果，没有丝毫轻重的差别"；他们不说他们正在准备组织反革命的"第二党"，只说要"推翻整个中央——开除一切中央政治局委员党籍，撤消一切领导机关同志的工作，党内绝对民主化"；他们不说消极怠工和破坏党的工作，只说"在反立三路线的时候，不能进行实际工作，谁提出加紧在实际工作中反立三路线的口号，谁便是妨碍反立三路线的斗争"；他们不说他们反对真正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们，只说反对"C.S.S.小组织"；而却又不说明这到底是个什么组织；他们不说他们对党的发展抱悲观绝望态度，只说"反对九十六号上未有宣布党的危机"的扩大和深入；他们不说他们不反对右的倾向，只说"右倾目前已经没有什么危险"或者"至少在国际来信后，右倾没有什么危险了"……这一切错误意见，开始是由个别分子在这种会议或那种会议上散布和宣布，最终，由全总一月一日党团决议把他们系统化起来，成为一些隐藏暗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们当时的政治纲领。

右倾分子这些错误意见，——在上海各种会议和谈话中发现时，改组后执行国际路线的江苏省委便坚决地与这些错误倾向斗争。江苏省委当时通过的关于中央九十六号通告的决议，便是坚决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最好证明——反对中央政治局一部分领导同志的立三路线残余，同时反对当时刚才抬头的公开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在这个时候，有一部分同志表示对右倾调和，对右倾有自由主义倾向，这部分同志恰是犯了立三路线错误以致不愿批评别人错误倾向的人，这部分同志当时曾经公开地或暗藏地主张对右倾机会主义倾向调和与让步；在这些分子看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些错误，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严重性，都不过是个别问题的"词句"或"名词"不妥当，都不过是反立三路线时不可免的或应有的"过火"言论；同时，这种思想在当时刚承认错误的政治局有些个别同志中，也有相当的影响，所以在中央九十六号通告上，才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如说反立三路线便包括了两条战线上斗争的全部，对于已发现的错误倾向一字不提，不说立三路线破产而说党的危机等等）。然而当时真正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们，却深刻地用布尔塞维克的警惕性看透了右倾机会主义这些问题提出的严重性；他们坚决地指出，如果这些倾向公开发展下去，便有成为露骨的右倾机会主义纲领的极大可能性。这种极大可能性的来源，不仅由于提出这些问题的分子们绝大多数是曾经犯过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成份，而且由于一方面立三路线"左"倾词句揭穿后暴露出公开的右倾消极；另方面，当时的客观环境有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发展的极大可能。同时，不加紧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倾向，也便不能真正克服立三路线。历史事变的发展，证明拥护国际路线同志们的意见是正确的，另些同志的意见是缺乏布尔塞维克的党员的警惕性。

在这小册子中，关于反立三路线斗争有些问题原来写得不充分和错误的来源，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秘密斗室中，简直没有可能找到比较充分的参考材料；另方面是由于我对许多问题理论上的了解还不够——尤其是当时被取消了一切实际工作，简直没有在实际中来进一步证验和了解立三路线在当时实际工作中的错误的可能。在这个再版书后中我曾经尽我现在所见

到和懂得的，企图把“不充分”的问题补充得“较充分”，“错误的”问题改正到“比较没有错误”或“少错误”。然而这个企图在实际上究竟得到了百分之几的成功，我自己是很难断定的。但是，我希望我自己能够在理论学习中及实际工作中取得更多的进步，以便将来写别的东西时能够避免和减少许多缺点与错误；同时，有可能再去检查一番这小册子及再版序言中有否其他缺点和错误。此外，并且希望其他读这本小册子的同志们，也在口头上、书面上尽可能地帮助我指出小册子和这一书后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至于那一部分当时未曾写到的问题，在当时是还未曾感觉到有写的必要；而到现在，党内斗争的环境，党的发展的利益，党外敌人对我们党内斗争的历史曲解的企图以及许多新干部新同志对最近两年来党内斗争内容的全部了解的意望的迫切……等等条件，使得我们不能不简明地谈到这些问题。

二　关于反对反革命的罗章龙派底斗争问题

关于反对反革命的罗章龙派底斗争问题，直到现在在我们党的组织内和同志中，还远没有反立三路线斗争问题那样传布得宽广和深刻。这里主要的原因是：一方面罗章龙派不仅未曾占据住党的领导地位，而且很快地被四中全会后执行国际路线的中央领导着党的先锋部队——上海党的组织，将它从政治上、组织上打毁下去和肃清出去；另方面罗章龙派当时的活动主要地域，只限于上海及北方（北平、天津、满洲的一部分）等局部区域。但是，罗章龙派反党反革命行动的残酷无耻，以及党把这反革命派别在斗争中驱逐出去的经验教训，是值得每个共产党员知道和了解的。关于反对罗章龙派斗争的经过，中央、江苏省委、北方党部有许多文件，可以供同志们的研究和参考的。但因为党处在秘密环境，并且这些文件多半是对于某个人、某个问题或某几部分问题的决议的关系，所以还有不少同志对于反罗章龙派斗争缺乏系统的了解。因此，利用反立三路线的小册子再版的机会，把反罗章龙派斗争问题，作一个比较有系统的简明介绍，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在一定意义上讲，不了解反罗章龙派斗争问题，即是不能了解反立三路线斗争的全部，罗章龙的政治路线在一定意义上讲，实际上就是去掉“左”倾空谈假面具后的立三路线；当然，更用不着说：不了解反罗章龙路线斗争，便不能了解中共两年来两条战线上斗争的实质和现在与将来发展的前途了。

一、四中全会与罗章龙派在四中全会上的反党活动——共产国际估计中共四中全会的实质和意义说：

> “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很满意地指出：中共中央第四次扩大会议，在两条战线斗争上，打退了那些企图利用一部分工人干部对立三路线错误及调和态度的不满意情绪，来达到反党目的的右派分裂者和取消派的进攻，同时，给了李立三路线的半托洛茨基主义的方针和对他的调和态度坚决的打击。四中全会在使党更进一步的布尔塞维克化的事业上作了很严重的步骤，改正了政治路线，更新了党的领导。同时，使党开始了在全部工作转变中来实际的和真正的解决当前紧急任务。”（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一九三一年五月关于中共任务决议）

正因为如此，所以罗章龙派不仅在四中全会后，而且在四中全会上便实行对党作残酷无情的进攻。在四中全会上，罗章龙派除去坚持四中全会前全总党团一月一日决议上的政治错误，以及其他一切右倾分子的错误倾向（这些倾向，在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外，更对四中全会本身，四中全会日程、决议及领导机关更新等问题上，提出与国际和党完全相反的意见。当四中全会宣布开会时，罗章龙、王凤飞、余非、韩连辉等，便起来反对四中全会的开

会，要求立刻解散四中全会和改期号集紧急会议；当着破坏四中全会工作这一企图被国际代表和大多数到会代表否决和打击后，他们立刻反对四中全会的议事日程，他们主张除了政治决议、反国民会议宣言、告红军书、告同志书、改选政治局和补选中央委员议程以外，还要讨论和通过土地问题、职工运动、红军问题、经济政策问题、组织问题、军事工作、妇女青年问题等等决议。因此，他们要求把开会时间延长到三——四天。当着他们这些提议被大多数到会代表否决后，他们马上便提出"立刻退席"的要求来威吓会场；当着他们这种非党行动受到斥责和打击后，他们便企图在夺取领导机关问题上作一最后的挣扎。当进行改选政治局成份时，他们提出一个整个的政治局名单，这名单中除去被他们诱惑的两个工人同志外，其他的完全是与中央指出和为大多数到会代表赞成的相反。他们提出的这一名单九个人当中，顾顺章、韩连辉不久便成了国民党的侦探，罗章龙等不久便成为托陈派的伙伴，此外，他们并提出在一九二九年便被开除了党籍的托陈派分子王仲一，要求恢复其党籍和中央委员资格。他们的名单和提议，当然被大多数否决了，大多数代表一致通过了由中央提出来的新政治局成份。在他们夺取领导机关的企图失败以后，罗章龙信徒——四中全会后不久即成为国民党公开侦探的袁乃祥，便拍案咆哮，企图给警察侦探以破获的机会！叛徒的这种可耻的罪恶的企图，当然立刻被到会大多数代表们的镇静力镇慑下去了。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共四中全会，在极短时间内有组织地、有计划地完成了自己各方面应有的任务。

二、四中全会后罗章龙派的反革命活动——罗章龙派的反党阴谋（在政治上用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代替共产国际的路线，在组织上以右派小组织的领袖占据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在四中全会上受到严重打击后，他们便马上公开地实行反对四中全会底小组织活动，他们反对四中全会第一个理由是：他们原来要求召集的是紧急会议。同志们都知道，在反立三路线斗争过程中——特别是三中全会后，真正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们，当时特别提出请求国际召集全党紧急会议的口号。当时提出这要求的主要原因是，中央占领导地位的一部份同志不愿承认立三路线的错误，反而用调和态度拥护立三路线的错误。当时提出这一口号的目的是，请求国际采用紧急迅速的办法来纠正中共领导的政治路线的错误，以便迅速执行摆在目前的紧急任务。这一要求在中央九十六号通告未发出以前——特别是四中全会以前，在一定意义上和范围内是正确的。罗章龙派在四中全会前，对于这一口号还是很冷淡的。只有在四中全会上受到失败后，他们才把真正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们已经放弃，但是原来在党员群众中已经有相当影响的这个召集紧急会议的口号，大叫起来，企图在这个口号之下来达到他们反党的目的。

共产国际执委根据着充分理由，将同志们要求开的紧急会议改为扩大的四中全会，是异常合乎当时政治上、组织上、工作环境需要上的要求的。这些理由，同志们在附录中"江苏省委常委会议对于中共第四次扩大会议总结及目前党的任务的决议"上，可以完全看到的。

罗章龙派反对四中全会的第二个理由是：四中全会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未能解决它应有的任务。罗章龙派这种意见底根据的第一点，就是四中全会只通过了政治决议、告红军书、反对国民会议宣言、告全党同志书等，未有讨论和通过其他问题（土地、农民、职工、组织、军事……等）的决议。同志们现在都知道：罗章龙派这种意见的真相，并不是真正为的要通过新的决议来解决这些任务，而是反对共产国际执委对这些问题在一九三〇年七月通过的那些决议。四中全会认为共产国际的那些决议在四中全会时和四中全会后依然完全有效，因为当时的革命情况及党的任务与国际决议指示的没有不同，因此，党对这些决议的任务，是在于在实际工作中来执行它们和实现它们，而不是另外再通过些与它们不同或相同的决

议；具体执行和实现这些决议的指示和办法，不仅没有在四中全会短时间内做到的可能，而且也没有这种必要；因为这是中央政治局和全党组织的经常工作。罗章龙派则认为当时中国革命新高涨已经过去，所以国际执委的一九三〇年七月那些决议已经不适用了，所以必须照他们的退却路线来通过一切问题的新决议。

罗章龙派这种意见根据的第二点，就是四中全会决议依然继续对立三路线调和，"四中全会政治上是调和主义的继续。"同志们现在都知道：四中全会决议不仅宣布了立三路线的完全破产，不仅宣布了三中全会的调和态度的绝对错误，而且最严厉批评了六月十一日以后至四中全会以前的中央各种主要文件上的严重错误。并且把立三路线所造成的实际恶果，作了一个正确的总结。当然，四中全会在这些主要问题上没有而且也不能采纳罗章龙派的提议，因为在他们对这些问题的提议中，包含着右倾机会主义和托陈取消派的私货。例如：第一，在对中央十一月二十五日决议和九十六号通告的估计问题上，他们企图造成"党的危机越过越扩大加深"的理论；他们的立场是，三中全会决议比六月十一日决议更坏，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央通告比三中全会决议更坏，中央九十六号通告比十一月二十五日决议更坏，四中全会比起三中全会来是"更可耻的、更背叛阶级利益的与国民党官僚黄色工会走狗同一作用"的会议；因此，他们的结论是："中国共产党越过越坏，党是向崩溃的道路发展下去。"党能不能采纳右派这种提议呢？当然不能。据四中全会估计，中共自国际七月决议——特别是关于立三路线问题来信后，换句话说，就是在立三路线逐渐宣告破产后，党的一部分领导同志，虽然未能迅速地转变到国际路线，同时，虽然在转变过程中犯了许多严重错误和经过许多困难，虽然领导同志这种迟缓和困难转变的错误，妨害和延缓了国际指示的执行，同时就是妨碍和延缓了革命任务的正确解决；但以党的发展过程和趋势看来，党在立三路线破产的过程中和转变到国际路线的过程中，是表现出党日益走上健全化的道路，党的健全化的程度如何，首先要看党在克服立三路线与右倾机会主义和执行国际路线底程度如何来决定。坚决不移地执行国际路线，是保障党日益健全化和布尔塞维克化的有力保证。现在谁都明白了：罗章龙派的"党日益向前崩溃"的理论，就是他们分裂党和组织反革命的"第二党"的理论根据。第二，在估计立三路线实行的结果上，他们企图贩进"革命新高涨已经完结"的理论；他们的论断是："立三路线破坏了党，破坏了团，破坏了工会，破坏了红军，破坏了中国革命，立三路线所造成的恶果，与陈独秀机会主义和瞿秋白盲动主义所造成的结果，没有丝毫轻重和程度上的差别。"因此，他们的结论是："苏维埃运动已经没有了任何群众的基础，工人运动只能作细小的经济斗争了。"党能不能采纳这种提议呢？当然不能。四中全会深切地了解，必须把对于立三路线的实质和对于立三路线实行的结果这两种估计分别开来；如果我们估计到对立三路线本身包含的对于党和革命的危害实质，当然我们毫无疑问地可以断定，立三路线实质上对于党和革命的危害，与陈独秀机会主义和瞿秋白盲动主义没有好坏的差别；而且从立三路线的历史根源讲，立三路线正是在六次大会前形成到当时还没有肃清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底新表现。立三路线如果不受到党内干部与共产国际执委双方面的、及时的、坚决的打击和纠正，毫无疑问地它可以而且必不可免地要对党和革命运动造成与陈独秀机会主义和瞿秋白盲动主义同样程度的危害。但是，当我们估计到立三路线已经造成的结果时，换句话说，即是估计到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在几个月执行立三路线所造成的结果时，更确切点些说，就是估计到革命领导错误对于革命主观和客观力量造成的结果时，我们就不能不很郑重地很实际地来考察铁一般的事实；因为只有根据这种估计才能得出对时局估计和党的任务的

正确结论。因此，四中全会决议一方面正确地指出立三路线执行期间对于党和革命运动造成一切严重恶果；另方面正式向全党宣布它“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的最近来信”，“完全实行共产国际的一切指示”，换句话说，即是完全同意国际一九三〇年七月决议及十一月来信对于中国时局估计及党的任务的指示。现在谁都明白了：罗章龙派的“党和中国革命都已经被立三路线破坏完了”的理论，就是他们离开党，反对苏维埃和红军（骂红军是土匪，说苏维埃没有前途等），反对一切罢工示威，反对工人政治斗争等等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和取消主义政纲的思想基础。第三，在估计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至立三路线形成前的中共中央政治路线和工作情形问题上，罗章龙派企图偷运来托陈取消派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共底私货。他们的论断是：“中国共产党自六次大会以来路线便不正确了”，或者“因为中央犯有个别严重错误，已经动摇了党的总路线”，甚至“立三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因此，他们的结论是：“中共六次大会的路线就是布哈林的机会主义的路线。”因此，“那些因为反对六次大会路线被开除的托陈取消派们（陈独秀、彭述之、王仲一等），都应当请回党和党的领导机关中来”。党能不能采纳这种提议呢？当然不能。四中全会深切地了解，如果党采纳了他们这种提议，就是替那些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先锋队员们底回党破坏阴谋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四中全会决议很正确地一方面指示“六次大会以来的党的成绩，因立三路线执行的结果，大部分已经消灭了”，另方面却坚决肯定“六次大会以来直到一九三〇年六月为止，中央虽在富农问题、黄色工会问题、改组派问题等上面，做了许多个别错误，但在一般的正确路线之下，党是有了很大的成绩”。四中全会深切地懂得：任何方式地对于国际路线正确性的动摇和对于托陈取消派反革命活动的掩护，都有加以严重打击的必要。现在谁都明白了：罗章龙派的“中共自六次大会以来路线便不正确了”的理论，就是他们与托陈取消派公开合并起来的思想武器。第四，在估计执行立三路线的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的错误实质问题上，他们企图大贩托洛茨基主义的私货；他们的立场是：“执行立三路线错误的中央政治局，比托洛茨基主义离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道路还远些，比陈独秀领导更坏些”；因此，他们的结论是：“中国现在比较好的还是托洛茨基主义与陈独秀领导，中共中央应当整个解散和开除出党。”党能不能采纳这种提议呢？当然不能。党很清楚地知道：罗章龙派这种说法是托陈派自命为“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漫骂诬蔑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叛徒”的改头换面的把戏，是他们很久以来企图达到解散中国共产党全部领导以造成党的混乱和解体的阴谋的另一方式，党不能不给这些可耻的分子以严重的打击。现在谁都明白了：罗章龙派这种“中共不如托陈取消派”的理论，就是他们公开反对共产党，高叫共产党必然崩溃，实行加入托陈取消派的思想武器。

党不仅不采纳罗章龙派这些反党的提议，而且四中全会给了他们这些提议以致命的打击，四中全会坚决的指出右倾机会主义是目前主要危险，四中全会在两条战线斗争上使用了十足的火力。因此，罗章龙派高叫“四中全会在政治上是比立三路线更坏的东西”，有什么丝毫奇怪呢！？

罗章龙派这种意见根据的第三点是：“四中全会在组织问题上完全是与立三路线调和的，完全没有解决它应有的任务。”他们这种论点的根据是：第一，四中全会的到会代表成份，最大多数依然是立三路线的主要分子；这简直是毫无根据的。首先我们要说明的——连罗章龙派当时也同意的，就是怎样了解和决定“立三路线分子”的问题。如果说“凡是执行过立三路线的党员，都是立三路线分子”，那末，我们可以说，当时全党党员中，除去在立三路线时代害病或因为某种特殊原因未参加党的任何工作的极端少数同志外，其他的全党党员都是曾

经在立三路线占统治地位时执行工作的。因为在我们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规定上，每个下级党部和个别党员虽然对上级指示有不同意时有提出意见以至抗议的权利，但是在问题未解决前还须执行上级决议的。立三路线在几个月内曾经成为党的领导机关内占领导地位的路线，所以如果要从这种意义上讲，那末，不仅当时在立三路线时代未曾反抗过立三路线的同志们是立三主义者，就是那些虽然自始至终坚决抗议，但同时在立三路线时代根据中央决议还进行了多少的党的工作的同志们，也都是立三主义者了。这种论断显然是不合乎事实和有害于党的，这种论断显然是对于全党同志的侮蔑。因此，在四中全会前和四中全会上，党即曾正确地解答了这个问题。党认为应负立三路线主义责任的立三主义者，除立三同志个人外，只有当时积极赞助他的路线而且负党的主要责任的那一部分同志。即是当时政治局工作的一部分主要领导同志，加上江南省委书记、北方局书记、少共中央书记等几个同志。这当然不是说，除他们几个同志外，其他负比较主要工作的同志们，都不负一点立三路线错误的责任，而只是说他们几个应当负最主要的责任，他们几个人在当时可以而且应当被称为立三主义者。根据党这种正确了解的观点来考察问题，那末，我们可以看到四中全会到会代表成份是一般的令人满意的。到会代表三十九人中，只有七人是上述那种立三路线主要负责者，其余的人是自始至终坚决反立三路线的干部、苏区代表、上海工人干部、各主要群众团体的党团负责同志、北方工人干部、少共中央代表、支部同志等。立三路线主要负责者七个人所以必须到会的原因，不仅因为他们是当时中央政治局内及最主要的省委内一部分主要的负责人，需要他们来报告工作和发言，同时正因为他们是立三路线主要负责者，要他们在四中全会上向共产国际及全党公开宣布和承认他们自己的错误。第二，罗章龙派说："四中全会上政治局的改造，完全是不正确的，政治局被'C.S.S.派'的小组织中人包办了"，在四中全会后的头几天，罗章龙派拼命高叫反对C.S.S.小组织，但不说明这小组织的内容，所以弄得有些人莫明其妙。过了几天之后，他们自己把假面具完全揭穿了，他们公开说："C.S.S.在英文就是China Stalins Secton的缩写，在中文就是中国斯大林派，斯大林派不独在中国有，而且在德国、法国、波兰、日本等国内都有小组织，斯大林特别指定一些人来包办中国革命和垄断中国党，陈某等就是C.S.S.派的人物。""反对斯大林派"——这是共产主义的"左"右叛徒用惯了而为觉悟的无产阶级恨极了的口号，这是一切反共产国际、反各国共产党、反共产主义的分子们无耻的宣传。整个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及全世界先进工人群众用一致地热烈地承认和拥护"斯大林同志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直接继承者和发挥者，斯大林同志是整个共产国际及全世界工人阶级的革命领袖"的宣言，答复了这些"左"右叛徒的阴谋诡计。这些托陈取消派的伙伴们，高叫"反对斯大林派"的口号，当然是毫不足怪的。我们认为我们是斯大林的学生，这是很光荣的事，因为只有斯大林的学生，才是唯一的真正的马列主义者。罗章龙派高叫四中全会组织上不正确的主要原因，绝不是因为他们痛恨立三主义的分子，而是因为他们最厌恶真正拥护和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分子。在他们看来，真正拥护共产国际的分子们，对于他们比立三主义者更要危险些（这当然是的确的）。四中全会后，王十人公开找当时的一个主要立三主义者罗×同志说："还是你领导江苏省委好，我们赞成你来干"；达汗对另一个当时的主要立三主义者××同志说："现在我们联合起来反对斯大林派，我们大家还是比较处得来，斯大林派比你们立三派更要危险得多；他们真多懂得一些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如果他们将来永远不错个什么路线，那就越过越糟了；所以现在要乘他们还未巩固时，我们大家联合起来干一下子。"事实上四中全会上改造的政治局，在正式与候补委员十

六人中，有十个工人成份。这在当时有三个工人同志还未表示出他们被罗章龙派利用的情形下，这种改造，是异常正确的。在这一改造当中，撤消了维它、立三两同志的政治局委员资格，忠发同志等是在他们公开承认错误，并且为的实际工作便利和给他们以改正错误机会等等条件下，继续担任政治局工作。同时，并吸引了拥护和执行国际路线最坚决的那些同志和工人干部参加中央的领导。然而，在罗章龙派看来，四中全会在组织上自然未曾解决它应有的任务，因为四中全会否决了他们右派小组织提出的名单，打碎了他们夺取党的领导机关来干取消派活动的企图。因此，他们这种无耻叫号，有什么丝毫奇怪呢！？

四中全会在政治上组织上之所以对于中国党的布尔塞维克化的事业上有极伟大的历史意义，正是因为四中全会是根据国际指示和党的利益及革命需要来解决了，它应解决的任务，正是因为它不仅彻底地击碎立三路线，而且同时在全党面前揭穿了罗章龙派等取消派暗探们的反党诡计。因此，在四中全会后，全党绝大多数的布尔塞维克团结地象一个人一样坚决拥护和执行四中全会的决议，坚决拥护四中全会上产生的新的政治局，在政治局领导之下，残酷无情地来打退那些立三主义残余和罗章龙派的反党活动。同时，罗章龙派、不改正错误的立三路线的分子、托陈取消派们，直到现在都拼命咒骂四中全会。这一切好恶的不同，都是必然的和丝毫不足为奇的事。

罗章龙派在四中全会后特别地积极地活动起来反对共产国际和党，其主要原因不仅是由于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是党内历史上的机会主义派别的残余，而且是由于当时的两种情况所促成：第一，罗章龙派是在立三路线的“左”倾空谈假面具完全揭穿之后，暴露出露骨的右倾消极失望的反映；第二，罗章龙派特别是直接反映和响应着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当时对红军和共产党的加紧进攻。讲到第一点，读者总还记得，我们在前面讲到立三路线实质时，根据斯大林同志对托洛茨基主义实质所作的正确估计的原则所下的定义；现在如果我们应用那种同一原理来估计罗章龙路线的实质时，我们可以毫无疑问的说：“罗章龙路线是公开露骨的右的机会主义的投降路线。罗章龙路线一般地反映出那些受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本家长期的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而同时对革命胜利表示完全绝望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情绪，特别是反映出在立三路线的冒险盲动失败后“左”倾空谈揭穿以后的悲观失望的情绪。这些情绪反映到政策中来，便是公开露骨的取消主义。”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四中全会后，罗章龙派便不仅包括了一切右派的分子，同时还参加进去那些不承认错误的立三主义分子。这种“左”右联合的反党派别，是有它的同一的社会根源和政治基础的。斯大林同志所说的下面这一段话，恰好作为这些反党分子的写照：“‘极左’的情绪，经常总是与公开的机会主义情绪符合着这件事实——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事实。列宁不止一次说过‘极左’的反对派是右的、孟塞维克的、公开的机会主义反对派底反面，这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极左’的反对派之所以干革命，只是因为他等待革命明天就胜利，那末，很明显地，如果革命发生障碍，如果革命明天还不能胜利，他就一定要对革命表示悲观失望。”（见“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演说）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在立三路线盛行时代，曾经暂时地“兴奋了”“激动了”自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便经常表示消极怠工一部分分子（罗章龙本人便是其中最明显的代表之一）的积极性，使立三同志曾经傲然自得地说：“我的路线无论怎么不好，可是它的确曾经把许多很久消沉的分子都变成过积极的干部。”立三同志不了解，那些消极分子之所以一时变成“积极干部”，只是接受“明天革命便在全中国以及全世界同时一齐胜利”的投机号召；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在罗章龙路线公开发现时，那些在立三路线盛行时代，曾经用过极大努力来干冒险

盲动的一部分分子（顾顺章便是其中最好的代表之一），便不迟疑地投到罗章龙派队伍中去（顾顺章在四中全会后，曾经三次找右派分子谈话，表示他与右派合作反党），使罗章龙到现在还扬扬自得地说："许多很好的干部，（?!）都拥护我们的路线。"罗章龙很懂得，他的路线能够团结一部分对革命完全悲观绝望的分子。

从一定意义上讲，罗章龙路线便是冒险盲动干不通和"左"倾空谈揭穿后的李立三路线。因此，如果李立三用"全世界革命一齐胜利"的"左"倾空谈来掩盖他对于中国革命胜利的悲观失望，那末，罗章龙便公开宣告"中国革命无论如何不能胜利"；李立三用"全国革命同时胜利"的"左"倾空谈来掩盖他对于几个和一个省区的首先胜利的可能底否认，那末，罗章龙便公开"否认中国革命有首先在一省或几省胜利的可能"；如果李立三用"立刻打下武汉，立刻打下南京"等等冒险盲动来损害红军的主力，那末，罗章龙便公开用"红军是流氓土匪"，"红军没有前途"等等咒骂造谣来损害红军的威信和帮助敌人进攻红军；如果李立三用统一行动、组织暴动等等"左"倾空谈取消团、取消工会和涣散党的力量，那末，罗章龙便公开用"反对罢工，反对示威，根本反对暴动，现在还不能组织赤色工会，党已经要崩溃了"等等谰言来实行组织反革命的'第二党、第二工会'底活动。罗章龙派这种公开的取消主义的政治路线，不能不使他们在组织上走上离开革命而另找出路的道路。讲到第二点，读者还记得，一九三〇年底和一九三一年初，国民党在帝国主义赞助之下，正组织第一次围剿红军和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的运动。当时帝国主义、蒋介石、改组派、托陈取消派、新月派、国家主义派……等等的刊物和报纸上，同声一气地高呼："三个月内，中国红军与中国共产党必定消灭"的论调；当时国民党除却遣兵调将进攻苏区红军外，同时，还特别加紧组织些新的反共机关（在上海以杜月笙、黄金荣、杨虎等流氓头子主持，在江西由段锡朋等负责，在北方由张开运主持），一方面在苏区内部去组织和帮助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托陈派的活动；另方面在上海及其他各大城市专门派遣奸细侦探，到共产党内去，同时并威胁利诱共产党内部的动摇分子和异己分子去进行分裂和破坏共产党组织。同时，在这个时候，因为立三路线实行的结果，使有些苏区的红军和苏维埃的确受到很大的损失以至部分的失败，有些非苏区——首先是大城市的党的组织及其他群众的力量，受到很大的损失，这种情形，更使那些对革命动摇、悲观、失望的分子们容易发生响应敌人的情绪。恰恰在这个时候，罗章龙派公开提出取消主义的政纲，这除却直接反映对敌人进攻革命的动摇、悲观失望情绪外，还有什么解释呢?!恰恰在这个时候，罗章龙派实行起来分裂党、分裂团、分裂工会并企图分裂红军及其它群众组织（组织所谓中央非常委员会，所谓第二省委、第二区委、第二工会党团。在北方组织非常委员会，并派几个人企图到苏区去破坏红军等）的行动，这除却直接帮助敌人来进攻红军和共产党以外，还有什么作用呢?!恰恰在这个时候，罗章龙派把一切托陈派分子，开除党籍很久的分子，来历不明的分子等等收集起来，并且哄骗一部分我们的同志去和那些反动分子一块在旅馆里和其它公开地方去开几十人一次的反党会议，把我们党的主要干部的名单，在一切传单小册子上公开散布，结果使得我们二十几个同志（即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五人）在上海被捕牺牲，在北方被捕监禁（上海东方旅馆的破获林育南等二十五个同志的牺牲为罗章龙派的王拙夫——唐虞——告密，北方大破获的告密人，便是罗的信徒韩连辉等等），这除却直接帮助敌人来破获我们组织和消灭我们干部以外，还有什么意义呢?!罗章龙派这些政治上的纲领和组织上的活动，除了直接执行反革命的意志和愿望——在革命新高潮时引起共产党内部的破裂和混乱外，还有什么作用呢?!

如果这种公开帮助敌人和实行敌人指示的罗章龙派，还能称为共产党内部的派别，那末，什么东西才算党外的反革命派别呢?!罗章龙派从它散布“反对四中全会力争紧急会议”的反革命传单和小册子（宣布党的主要干部名单及国际代表姓名，向敌人告密的文件）和实行组织所谓第二党那一天起，它便不是共产党内部的派别，而是党外的与托陈取消派、社会民主党、A.B.团等等一样的反革命派别了。罗章龙派早已不是共产主义内部的派别了，它早已是反革命的国民党的一支小分系了！

三、反革命的罗章龙派底完全破产——在上面所讲的话当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罗章龙派之所以在四中全会时和四中全会后加紧活动，以及它由党内派别迅速转变成党外反革命派的主要原因。同时，由上面一段话当中，我们也可以知道罗章龙派的活动是有一定社会基础和反党小组织做背景的。因此，当它初宣布反党时，曾经诱惑过党内一部分落后分子跟着它跑——当然这些分子中的主要人物绝大多数是原来参加右派小组织的和不改正错误的立三主义者。然而除此以外，一小部分同志及少数工人干部对于立三路线及对立三路线的调和态度底愤恨，也曾经被罗章龙派在假的反立三路线的口号之下利用过。罗章龙派当时用欺骗口号（如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等），武断宣传（把“新”“旧”干部对立，工人与知识分子对立，反对C.S.S.小组织——当初许多人不知C.S.S.是什么意义）和反党方法（例如用原来工作关系，欺骗一部分支部同志及外县同志当时与党隔离关系，不经领导机关同意，私自在各处召集秘密会议……）。然而，罗章龙派领袖们自鸣得意和决心反党反革命的那一天，同时就是它宣告完全破产的那一天，当罗章龙把全总党团秘密印刷机关窃据和印发向敌人告密式的宣言和小册子的时候，当他们的秘书长把全总经费拐到北方放高利贷的时候，当他们不顾一切秘密工作而召集一切反党会议以致牺牲干部时，当他们对共产国际及中央尽量地谩骂造谣时，一部分好的干部（原来是受罗章龙欺骗的人物）马上便表示不愿走上反革命道路而立刻向党承认错误回到党内来。在罗章龙派反革命面目揭穿的过程中，在四中全会决议、国际各种决议在党员群众中扩大深入的过程中，在中央、省委、区委及支部同志积极动员和积极斗争的过程中，在对犯错误同志的坚决斗争与忍耐说服工作的过程中，到二月末，罗章龙派在上海已经只剩下了残余的挣扎，绝大多数曾被欺骗的干部和支部同志，都诚恳地接受中央当时所提条件（“(一)立刻停止反党小组织活动，并写声明书，向党承认错误；(二)在党所指定的会议上和工作中去承认和改正自己的错误；(三)把原来担负党的、团的、工会的……等等工作向党和相当党团交代清楚，向党公开宣布自己参加罗章龙派活动经过及自己所知道的关于这个反革命派别的一切情形……”），脱离了罗章龙派而回到无产阶级的党内来。只有很少数的始终不承认反党错误和已经不能挽回到党内来的那些反革命分子（如罗章龙、王十人、韩连辉等等），被驱逐到无产阶级政党的队伍以外去。上海的罗章龙派的反动中心塌台后，马上使他们的北方组织也受到影响而逐渐崩溃；在三月底四月初的时候，罗章龙派在北方的活动便成了奄奄一息了。这样，在上海及北方曾经“轰动一时”的罗章龙派的活动，便在三个多月过程中，被中国共产党在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到实际工作中去及进行无情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中，打得烟消云散，与托陈取消派反革命活动同样受到可耻的破产与完全的失败。

罗章龙派这样迅速可耻的破产，一方面固然由于他们的取消政纲及反革命活动在党员群众及工人阶级面前迅速揭露了；另方面还由于党在实际工作中坚决执行了国际路线及在两条战线斗争上正确地运用了布尔塞维克的斗争方法。党在四中全会后的中央领导之下，在一月

至四月间，在苏区内冲破了国民党的第一、第二两次围剿，恢复和巩固了苏区根据地，打击和镇压了苏区内部各种反革命团体的活动，提高和巩固了红军的战斗力，改善和提高工农群众的生活状况，改良了苏区的经济状况。在非苏区内恢复和巩固了被立三路线及右派涣散了的党的组织，恢复和巩固了青年团、赤色工会、反帝同盟、贫民协会、济难会等等群众组织的工作，加强和注意了对群众经济斗争及政治发动的准备和领导。这样一来，就把罗章龙派所高喊的"革命已经失败了，党一天一天塌台了"的无耻谰言，被铁一般的事实打得粉碎了。党在反立三路线和反罗章龙派的斗争中，一方面表示了党内斗争的原则性和不调和性，另方面采用一切必需的和正确的斗争方法（在全党内作极广大的教育工作，对犯错误同志作极忍耐的说服工作和批评工作，领导机关直接到党、团和赤色工会的支部内去教育和说服那些对问题不十分了解和受罗章龙派欺骗愚弄的分子，与罗章龙派迅速地断绝和隔离一切组织上的联系，驱逐那些走上反革命道路的和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分子出党……等等）。因此，党在反立三路线的斗争中，能够使一切立三路线主要分子对党屈服，在组织上不受损失的情况下克服了立三主义者。在反罗章龙派斗争中，能够使绝大多数暂时犯错误和受愚弄的同志们，在完全自觉地心悦诚服的条件下对党承认错误（例如好些同志曾经自愿地写三、四次以上的声明书来逐渐深刻地揭露自己的错误，而且在实际工作中证实改正错误等等），在组织上在肃清少数异己分子的情况下，打碎了反革命的罗章龙派底组织。

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共产党和赤色工会队伍里，没有了罗章龙这类工人阶级的叛徒们，越健全、越巩固和越发展些，驱逐和肃清自己营垒中的异己分子，就是驱逐和肃清敌人在革命营垒中的奸细，是我们在与阶级敌人残酷战斗中必需的和不可少的步骤和方法之一部。世界革命的工人运动史曾经千百次地证实这一点，中国工人运动史——特别是最近几年来中国革命运动发展史，也完全证实这一点。

三　党内目前两条路线上的斗争问题

"列宁在我们党内经常进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反对'左的'和明显的孟塞维克的倾向。""我们的党在和两种倾向——右的和'左'的斗争中生长和巩固的。"（斯大林）所以"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应该是党的一切活动和领导的基础"（共产国际执委一九三〇年七月对中国问题决议）。立三路线早已宣告死刑了，立三路线在全党面前早已宣告破产了，主要的立三主义者和立三同志早已向共产国际和党实行屈服了；罗章龙路线早已成为反革命的托陈取消主义的一个小分流了，罗章龙路线早已在全工人阶级面前宣告死刑了，罗章龙及其主要的同道者早已被驱逐到无产阶级队伍以外去了，然而立三主义和罗章龙路线的残余，更正确些说，"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的倾向，还时常在我们队伍中的个别分子对个别问题上时常发现着。这当然是毫不足怪的事。因为第一，使主要立三主义者投降和驱逐主要的罗章龙主义者出党，这是一件事；把他们的思想肃清，这是另一件事，这是比较困难些的事。斯大林同志在讲到与托洛茨基主义斗争时说："把托洛茨基主义者逮捕和流放起来——这是一件事，肃清托洛茨基主义思想——这是另一件事，这比较要困难些。"这是完全正确的。第二，党内现在没有了如立三路线或罗章龙路线那一类的已经完成的系统的整个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是一件事；但是，党内还有——也不能没有个别的分子对个别问题的有"左"的或右的机会主义的倾向，特别是"左"的或右的错误，这是另一件事。当然，我们知道：机会主义的倾向与完全形成了的机会主义不一样的，倾向是还未完全溶化于机会主义而且还能改正的。同时，我

们更知道：对任何问题的“左”右错误，如果不能及时改正而任它们发展下去，都可以而且不可免地要成为机会主义倾向；同时，任何机会主义倾向，如果不及时地受到批评和改正，如果放任它自己发展下去，都有成为一贯的机会主义系统的可能。第三，这些倾向是敌对阶级思想影响到我们队伍中来的反映，是我们队伍中薄弱的、落后的和动摇的分子们受敌对阶级的思想影响底反映。

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我们党内个别同志中，还有立三路线的残余呢？正确些说：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我们党内个别同志中，现在有“左”的机会主义倾向呢？更确切点说：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我们党内个别同志中，还时常有“左”的错误呢？这主要地表现在下列问题上：第一，忽视革命运动本身还包含有的困难和弱点的倾向（例如忽视革命不平衡发展，忽视主观力量比客观情势相对的落后……等等），这在非苏区中由个别分子具体表现出来的，便是无条件地在各地组织暴动的企图，无准备地以空洞号召来实现各地总同盟罢工的企图等等。在苏区工作中由个别分子具体表现出来的，便是不顾敌我力量对比而无条件地随时随地在军事上冒险盲进的倾向，不顾巩固根据地而盲目地到处进攻的倾向，过早地进攻大城市的企图……等等。第二，不估计群众情绪，脱离群众的倾向，这在非苏区中由个别分子以至个别组织具体表现出来的，便是继续采用指定罢工、命令群众的方法去“领导”工人斗争，不愿深入企业、农村和兵营中去作群众工作，硬用赤色工会纲领——甚至党的全部要求口号去与黄色工会中工人建立“下层统一战线”，完全取消工会中的民主制度，一切由党来指定和包办，拒绝利用公开环境工作的可能……等等。第三，以“左”倾词句掩盖右倾消极的倾向，例如在非苏区有个别地方同志拿“不要破坏了中日无产阶级团结”，不要煽起“民族仇恨”等“漂亮”词句，来放弃反日斗争的发动和领导，把“拥护苏联是目前世界无产阶级第一等任务”的口号来和以武装人民进行反对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以保障中国统一和独立的口号对立起来；以为在经济危机条件下，只有组织总同盟罢工或同盟罢工才能胜利的“左”倾空谈，掩盖对于个别企业中罢工斗争放弃的消极等等。第四，在苏区有些地方所采取了过早的（如消灭富农企图）和有害的（如忽视与中农联合、有时侵犯到中农利益）“左”的倾向等等。

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我们党内个别同志中，还有罗章龙路线的残余呢？换句话说：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我们党内个别同志中，现在还有右的机会主义倾向呢？这主要的表现在下列问题上：第一，在对于革命运动的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估计不足的观点上。这一倾向表现得最明显地，在非苏区中，是以一部分工会工作同志们为代表的最近职工运动中的某一些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这些错误，据我们最近得到材料看来，有以下各点：(一)以为在目前经济危机条件下任何罢工没有胜利的可能；(二)认为工人斗争在现在阶段上，只能有防御的性质和合法的范围；(三)平时不去作准备罢工的工作，到群众自动罢工时，又借口罢工要长时期准备来阻止罢工；(四)提议组织赤色工会与黄色工会之间的灰色工会来代替组织赤色工会的任务；(五)完全忽视和轻视女工和青工的力量和斗争要求；(六)对组织反对日本进占上海的总同盟罢工的口号，采取消极反对的态度，甚至完全否认工人群众的反帝斗争和一般政治斗争的必要；(七)企图把赤色工会与党对立起来或脱离党的领导等工团主义的倾向等等；其次，便是那些对于群众的武装反帝斗争情绪的估量不足，以为“谁要提出武装群众的口号，谁便是立三路线的残余”；否认民族革命战争有胜利的可能；对苏维埃运动和红军发展前途抱悲观失望的情绪；否认党和群众团体的工作成绩，对党的健全化和布尔塞维克化问题不相信和怀

疑……等等。在某些苏区内一部分人中表现得最明显地，便是(一)曲解巩固根据地的策略为“退却路线”、“保守主义”；(二)曲解在一定条件之下去争夺和占领城市的国际路线为无论何时都不能占领任何城市；(三)遇有敌人进攻，不顾及敌我力量对比，便主张“逃跑”、“躲避”和“退让”的政策；(四)不相信红军胜利及工农群众力量能保证革命运动能胜利地开展；(五)根本害怕帝国主义，不准备领导广大群众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等等。第二，在对于不站在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领导权观点上进行工作的问题上。这一倾向表现得最明显地，在非苏区中，例如不愿组织独立的工人反日会；不愿提进工农干部作领导工作；不积极征收工人入党（前此的河北一部分党员有此现象）；不愿在有群众的黄色工会中工作；不以同志的说服态度去对付加入黄色工会的工人群众……等等倾向。在苏区中，有些个别地方延缓没收和分配地主的土地，使地主残余、富农分得较好的土地，把地主当作富农，把富农当作中农，轻视赤色工会在苏区中的作用和意义；不积极组织雇农工人的独立工会；不作工人改良生活斗争。第三，表现在一部分人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上——如消极、怠工、官僚主义等等。

因此，无情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集中火力反对主要危险——右倾，同时，丝毫不放松反对“左”倾的斗争，是使党更向前布尔塞维克化的保证，是使党能够领导革命运动顺利地向前发展和得到更伟大的成功的保证。

因此，把一切妨碍党进行两条战线上斗争的手段和方法，确切点讲，把那些掩护错误和帮助反党倾向的各种暗藏的与“灵巧”的手段和方法，揭穿出真相来，是使党能够顺利地进行反倾向斗争和克服倾向底保证。

这些手段和方法主要地有下列几种：第一种是对任何倾向采取调和态度的调和派，调和派之中，有些是对于党内一切反倾向斗争，装做出不懂得和没有兴趣的样子；有些是作出部分地同意共产国际和中央，部分地同情于不正确倾向的态度；有些是把一切党内斗争都解释成无原则无意义，同时自命为不参加任何斗争的“清高分子”；无论调和派采取的手段如何，然而调和派的实质终究是一个：“调和派是懦弱的机会主义者——是变相的机会主义者”，调和派实质上是腐败的自由主义者。第二种是两面派，两面派之中，有些是在口头上拥护国际和中央的正确路线，但在实际上不执行而且反对这个路线；有些是表面上拥护和接受国际与中央的各种正确决议，暗地里却进行反对这些决议的斗争；无论两面派的手段如何，然而两面派的实质终究是一个：“两面派是对党的正确路线底阳奉阴违和口是心非者”，是用阴谋和投机取巧的手段来进行反党斗争者。第三种是各种机会主义的“私贩者”，“私贩者”之中，有些是用转弯抹角的方法偷运机会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到党的队伍中来；有些是用表面上反对某种机会主义而暗地里偷运另外一种机会主义到党的营垒来的方法。无论“私贩者”的手段如何，然而“私贩者”的实质终究是一个：“‘私贩子’是用‘偷运’的方法来反对列宁主义路线的分子。”第四种是企图用制造无原则派别的手段来达到反党斗争底目的之分子，这般人之中有些是企图把党内“工人”与“知识分子”对立，有些是企图把所有“新”“旧”干部对立，有些是企图把实际工作同志与曾短期学习同志对立，无论这些人用的是那种手段，然而他们的实质终究不外下列各项：“用制造无原则派别斗争的方法，或者来掩盖自己所犯的不正确倾向的错误，或者在反对别人派别的旗帜之下去进行组织自己的反党派别”；这类人的口号是：“党内有些什么派，什么派，人家都组织起来了，我们不能不组织起来呵！”。这些反党斗争的手段和方法，在最近之所以特别被采用的原因，是由于共产国际路线之正确，以及中央在四中全会后执行共产国际路线之正确性，已经成为铁一般的无可争辩的事实了。那些反对、怀疑

和不相信国际路线的分子，以及其他各种另有某种企图的分子，时常多半不敢公开地表示出反对国际和中央的正确路线底态度，时常不能不采取比较隐蔽些的手段和方式来进行反对国际和中央路线的活动。

因此，我们不仅要反对那些早已被揭穿了的、被宣布死刑了的李立三路线和罗章龙路线，不仅要反对那些很明显地一望而知的"左"的或右的机会主义倾向，不仅要对任何理论上和实际上的"左"的或右的错误做斗争，而且要对那些暗藏的、狡猾的和转弯抹角的反党手段和方法，进行无情的斗争。只有如此，才能使我们党在思想上、工作上、组织上达到巩固与统一。

在我们队伍中，有时听到有一小部分人发出这样的呼声："不要闹了！闹够了！什么'左'倾右倾呀，两条路线上斗争呀，闹得够了，都是同志们，何必要闹得一塌糊涂呢?!同志们关系简直闹坏了！"。发出这类呼声的主要的是两种人：一种是那些犯了"左"右机会主义倾向错误，而又不高兴党来批评和纠正他们的错误的人们，他们企图用这一类呼声来模糊和放松党内同志们对他们错误的注意和斗争。另一种是那些在革命斗争及党内斗争战线上感觉到厌倦的人们，或者是不了解党内斗争的来源和意义的人们。为使这些同志们能够了解无产阶级政党内底党内斗争的来源和意义，把斯大林同志对这个问题所说的著名的话介绍给读者们，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

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议上，讲到联邦共产党内部斗争的来源时，曾经说：

> "……可以这样想，俄国人太爱闹了，喜欢争论，制造些分歧意见，然后经过克服党内矛盾来使党发展。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这并不是什么爱闹的问题，这是因为在党的发展过程中。在无产阶级斗争的过程中，产生了原则的分歧。事实是这样，矛盾只有用斗争办法才能克服。为这种或那种原则、为这种或那种斗争目的，为使达到目的底这种或那种斗争方法而斗争的办法，才能克服矛盾。对于党内关于临时政策问题，纯粹实际工作问题等有不同意见的人们，可以而且应当作各种协调。但是，如果这些问题联系到原则上的分歧，那末，任何协调，任何'折中'路线，都是与事无补的。对于原则问题没有也不能有'折中'路线，或者是这种原则，或者是那种原则，应该成为党的工作底根据。对于原则问题的'折中'路线，是使人模糊头脑的'路线'，是抹煞分歧的'路线'，是使思想上蜕化的'路线'是使党思想上死亡的'路线'。"

同时，斯大林同志坚决认为：

> "我们党的历史，是党内的矛盾斗争的历史，是克服这些矛盾和在克服这些矛盾的基础上逐渐地巩固了我们的党底历史。"

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矛盾的来源是什么呢？斯大林同志在同上这一演讲中说：

> "这些矛盾和分歧，从什么地方来的，它们的来源在什么地方呢？这就是，第一，在阶级斗争环境中，资产阶级及资产级级思想对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底压迫，无产阶级中最不稳固的阶层，同样，无产阶级政党中的最不稳固的阶层，时常接受和反映这一压迫，不能把无产阶级当作完全与社会分离或者站在社会以外的，无产阶级是与社会的各种阶层经过各种线索联系起来的社会之一部分，而党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因此，党也就不能不与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阶层发生联系和不能不受其影响。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对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底压迫，就表现在资产阶级的思想、道德、习惯、情绪，时常经过

那些与资产阶级社会有这种或那种联系的某些无产阶级阶层而侵入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之中来。

“第二，就是工人阶级的成份不一致，在工人阶级内部有各种不同的阶层。我想，无产阶级，从其整个阶级看来，可以分为三种阶层。第一阶层——这是无产阶级的基本群众，它的核心，它的常备军，这就是‘纯粹的’无产阶级群众，这些群众早已与资产阶级断绝了联系。这一阶层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可靠的支柱。第二阶层——这是不久才从非无产阶级出来的，从农民、市侩、知识分子等出身的人，这些从别的阶级出身来的分子，不久才加入无产阶级成份中来，把他们原有的习惯、习气、动摇、犹豫等带到工人阶级中来。这种阶层对于一切无政府主义的、半无政府主义的和‘极左的’派别是最好的基础。最后，第三阶层——这就是工人贵族、工人阶级的上层、无产阶级中生活最有保证的一部分，这些人们带有与资产阶级妥协的希望，带有很大的趋炎附势的情绪，带有‘出头做人’的情绪。这一阶层对于露骨的改良主义者与机会主义者是最好的基础。

“虽然外表上有些差别，但是工人阶级中的后两种阶层，都是或多或少地接受机会主义洗礼的部队，公开的机会主义主要地是反映工人贵族的情绪，用‘左’倾词句掩盖的机会主义，主要地是反映工人阶级中那些还未完全与小资产阶级断绝联系的半市侩等阶层的情绪……

“很自然地，在阶级斗争发展的每一个紧急关头，在每一次斗争剧烈化和困难增加的时候，无产阶级的各种阶层的观点、习气和情绪的不同，便不可免地要在党内的某些分歧形式上表现出来，而资产阶级及其思想的压迫不可免地要加剧这些分歧，使这些分歧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斗争的形式上寻找出路。

“可不可以避开这些矛盾与分歧呢？不可以，不能够。要想避开这些矛盾，这就等于自欺。恩格斯是对的，他曾说过，长久抹煞党的矛盾是不可能的，这些矛盾只有由斗争来解决。”

斯大林同志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内部斗争的来源底这种说明，对于我们中共原则上一般的同样是完全正确的。

当着一九二七年革命处在紧急关头时，爆发了陈独秀机会主义，它把土地革命与反帝革命对立，把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变成使无产阶级服从资产阶级的利益底尾巴主义，最后并公开走到否认阶级斗争的孟塞维主义，毫无疑问地是当时中国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对无产阶级队伍中最不稳固的阶层的压迫底反映；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和一九二八年初，爆发了瞿秋白盲动主义，它不去耐心地刻苦地重新集聚革命的力量，以准备革命新高潮之到来，反而用冒险盲动的方法去找求投机取巧的出路，以致使革命组织加倍地受到敌人的打击和摧残，毫无疑问地是那些半市侩式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情绪底反映；当着一九三〇年——三十一年，中国革命新高潮和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化的关头，爆发了李立三路线与罗章龙路线。这一切都证明斯大林同志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矛盾和为克服这些矛盾而进行斗争等底来源等指示底正确。

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资产阶级民主性，特别是中国革命中的许多严重困难性（首先就是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困难），更加重了在每一次阶级斗争紧张关头中，中共内部矛盾的爆发和斗争尖锐性。有些分子不相信中国革命的各种困难的本身含有克服这些困难的可能条件，于是时常发生对困难投降和悲观失望的情绪，于是不可免地发生许多“临阵脱逃”或“中途变

节”的现象。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七年所写的中国革命问题的宣传大纲上，便早已指明了这一点，他说：

> “这件事实——帝国主义主要地用统一战线来进攻中国革命，在帝国主义者之间没有象在十月革命时那样的分裂和战争，那些分裂和战争削弱了帝国主义——这件事实，告诉我们说，中国革命在其走向胜利的道路上，将要遇到比俄国革命更大得多些的困难，在这一革命过程中的逃阵和变节，比起苏联在国内革命战争时代，将更不知要多好些。”

斯大林同志这段先见的预言，不仅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党每当紧急困难关头时，在党内便不可免地发生一部分分子的动摇、犹豫以至消极失望，并且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党内那些不能救药的机会主义分子，结果大部分都公开地跑向敌人营垒中去找反革命的出路。

同时，关于党内反倾向斗争的意义和必要，斯大林同志同样有一段非常正确和明显地指示，他说：

> “如果不同时与我们党内倾向斗争，不克服这些倾向，能不能和阶级敌人进行胜利的斗争呢？不，不能够。所以不能够，是因为在后方，在我们党内有敌人意识的反映，在后方留有不相信我们事业和用尽一切方法阻碍我们的运动向前进步的人们，与阶级敌人开展真正的斗争是不可能的。
>
> “因此，对一切离开列宁主义路线的倾向作无情的斗争，是党的经常任务。”（见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因此，恩格斯还远在一八八二年便说过：“大国家的一切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这是与辩证的发展规律完全符合的。”因此，斯大林同志说：“用斗争办法来克服党内矛盾是我们党发展的规律”，不仅是联共发展的规律，而且是其它无产阶级政党发展的规律，是所有较大的党——不管是联共也好或欧洲各国的党也好，都是一样——的发展底规律。

中国共产党在不断地克服离开列宁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发展着和巩固着。一九二七年的“八七”会议，在反陈独秀主义的无情斗争中，加紧了中国共产党布尔塞维克化的过程。一九二七年的十一月中央会议虽然犯了个别错误，却继续着使中共布尔塞维克化的事业。一九二八年的中共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了陈独秀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的死刑，使党更进一步地走进布尔塞维克化。一九二九年党在打击和驱逐托陈派的斗争中，表示出党在理论上、组织上和实际工作上的坚定性和进步。一九三〇——三一年党在克服李立三路线和驱逐反革命罗章龙派的斗争中，使党在更向前布尔塞维克化的事业中创造了不朽的成绩。没有这些严重的党内斗争，没有克服这些反列宁主义倾向底斗争，中共布尔塞维克化事业的进步，以及在中共领导下正在日益向前扩大深入的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的任何胜利与成功，都是不会有任何希望的。

我们以上所特别着重指明的党内两条战线上斗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绝不能误解为把党变成争论的俱乐部。有些同志误解了两条战线上斗争的真实内容和意义，有时把任何不必要引起争论的问题都拿起来举行争论，有时把某个或某些同志对某个问题的错误，而且不坚持主张的错误，便当作某种机会主义倾向来举行斗争，特别是时常把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变成口头清谈，变成无内容的时髦名词，不仅与实际工作丝毫无补，而且甚至在清谈斗争的方法之下放弃和阻碍实际工作，这都是不正确的和有害于党的办法。斯大林同志关于这个问题也讲得非常明白的。他说：

“这并不是说：党应当变成争论的俱乐部，恰恰相反，无产阶级政党正是而且应当是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我想说的只是，如果党内分歧带有原则性，就不能抹煞和忽视这些分歧；我想说的只是，只有用为原则路线而斗争的方法，才能使无产阶级政党不受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影响；我想说的只是，只有用克服党内矛盾的方法，才能使党健全和巩固。”

因此，只有使党达到健全与巩固的党内争论，才是我们党所需要的和应该进行的争论。

党内争论的目的，在使党更加健全与巩固，因此，我们坚决反对那些把党内政治争论变作个人攻击或个人仇视的现象。一方面，有些犯了某种机会主义倾向的人，时常不仅不愿改正自己的错误，并且不高兴和痛恨那些批评和纠正他们错误的人，以为“批评就是攻击，攻击就是批评”。因此，拼命坚持着自己的错误，同时，咬牙切齿地痛恨着那些曾经或现在批评他们的错误的人。他们不了解，批评和纠正他们错误的人，不仅为的是使党更加健全和巩固，同时也就是为的帮助他们脱离政治错误的泥坑。他们把同志的好意当作恶意，这诚然是非布尔塞维克的表现。同时，在另一方面，也时常遇见另外一种幼稚的不正确的现象。就是有些同志对于犯过某个问题或某种问题错误——但是已经改正了这些错误的人，当然更用不着说对于那些犯过某种问题错误倾向的人了，永远抱着敌视的非同志的态度。当然，我们都知道，党内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是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之一，在党内斗争中，时常不可免地要引起斗争双方的某种程度的敌视——尤其是那些犯有错误的同志们坚持着自己错误并向党进攻的时候；然而这绝不是说，对于那些犯过错误、但是已经改正错误或者正在改正错误的人们，一定要抱着敌视的态度，抱着不以同志关系来帮助他和教育他改正错误的态度。列宁主义的党，对于那些不能救药的机会主义分子，毫不留情地将他们驱逐出去，以便整洁我们的队伍；同时，列宁主义的党，对于那些犯过错误，但能够纠正和愿意纠正的同志们，却要设法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机会，帮助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方法，以免减少我们的队伍的力量。同志们，试把联共党史、共产国际史及中共史检阅一遍，便可明了这些说话的正确。

坚决的和正确的在党内进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是使中共在思想上组织上达到布尔塞维克的巩固与统一的前提和保证。

一九三〇年七月，共产国际执委关于中国问题决议上对于中共党内两条战线上斗争的指示，应该成为每个中共党员随时随地的指南针。

“现在，除开解决组织任务来提高自己的战斗力之外，党应当保证自己的思想上的布尔塞维克的纯一性，比前此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些，但是，要保证坚定的政治路线和正确的解决摆在党面前的许多新任务，要保证党的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真正实现，只有进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才有可能。——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和‘左’的盲动的狭隘情绪的倾向，同这两种倾向在理论上和实际上作斗争，集中火力反对主要危险——右倾。如果在共产党内部不进行不调和的、无情的反对那些那怕是没有形成的和最小的‘左’右倾向底斗争，同时，便不能最终地战胜托陈派和完全克服对他们的调和情绪。只有真正进行不调和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才能精确的和真正的按照布尔塞维克式的来解决摆在党面前的许多新的任务。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应该成为党一切行动和指导的根据。”

目前的政治形势及党的紧急任务

——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中央决议案——

(一)自从去年蒋阎战争暂告结束之后，国民党反动统治调动了三十师以上的兵力，动员了一切反动的势力，联合一致的向红军苏维埃区域进攻，同时在非苏维埃区域施行极残酷的白色恐怖，以镇压革命运动。这一进攻不足，反革命的国民党又采用欺骗群众（如国民会议，宣言取消领事裁判权，明令裁厘以及污蔑共党暗杀杨虎与做土匪等等）与分化群众（如在苏区内组织反革命的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取消派，在非苏区内派遣侦探打入共产党内与收买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自首告密等等）的策略，来破坏革命的战线。这种反革命与革命阶级斗争的紧张和尖锐，一方面表现国民党统治不稳定而日趋崩溃，另一方面也就证明了红军苏维埃的存在与发展，的确给了反动统治的最大的威胁，所以不管反革命的动员是如何宽广，它进攻革命的策略是如何狠毒，只要苏维埃红军真能依照国际路线，发动广大群众，执行正确的土地、劳动、经济、苏维埃建设等政策与红军进攻的策略，敌人的“围剿”计划必然遇到失败的。江西鲁涤平路孝忱二师的先后失败，京汉路上岳维峻两旅人的缴械，袁英、吉鸿昌、夏斗寅、赵观涛、蒋光鼐、蔡廷楷各部队的不断失利，福建卢新铭杂色部队的损失，这都是反革命军阀在二次“围剿”中所受到的严重打击。在革命方面，除了江西红军一三集团军与鄂豫皖第四军在每次胜利中都得到壮大外，便连湘鄂西的游击队，湘鄂赣的十六军，赣东北的第十军，在最近以极少的兵力，配合着广大群众，都能支持着原有的根据地，不断的给敌人以打击。尤其是江西AB团的被解决与闽西社会民主党的肃清，这更是给敌人捣乱苏区内部的一个严重回击。

不但如此，国民党在群众面前所施的欺骗政策，也一件件的暴露真相。首先是裁厘，结果，变成征收统税，特种消费税，而各地苛捐杂税不仅未减而且更加增多，这样，连大商人都通电说得不到好处，要讲价钱，结果，只有更加重工农贫民的担负。领事裁判权的撤废宣言，本是一纸空文，它不仅为现在各帝国主义者的在华特权加了一层保障，并且还预许将来帝国主义列强可以在顾问咨议的名义之下干涉中国的内政，国民会议的开幕更证实它是十足的官僚、军阀、资本家、豪绅、工贼的反革命会议，这就它出席代表成分看来，便知工贼官僚托名代表工农来参加国民会议，只能接受镇压革命剥削工农自由的“约法”，与拥戴蒋介石做屠杀工农的“大总统”。真正工农贫民的代表，只有参加那官僚、军阀、豪绅、资本家、工贼以及一切剥削者除外的工农兵会议，推翻国民党反革命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才能求得工农劳动群众真正的解放与中国的完全独立。尤其是国民会议开幕的日子，广东的陈济棠对南京政府表示了独立的行动；北方的石友兰、孙殿英等等杂色军队，亦正在团结第三派势力来反对蒋介石。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虽不定立即开始，但英帝国主义恰于此时宣布关于领事裁判权的谈判决裂，这不能不是英帝国主义从中起了主要的作用。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更加利用这一时机，尽量扩大它的势力范围。美帝国主义也很露骨的教训南京政府要加紧进攻苏联，这正是与国际形

势紧相关联着的。最近因为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是一日千里的进步，而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恐慌日益严重，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亦异常发展，于是帝国主义列强在最近法意海军协定和国际商会大会上，便更加露骨的表现出它们对于苏联进攻的急迫，这一方面自然表现得出帝国主义列强自身矛盾与其经济恐慌仍是无法避免，另一方面也就表现出它们对于苏联的进攻是完全一致，而中国国民党便是他们在东方最得力的助手。所以南京政府企图与苏联恢复邦交，是为更便于向苏联借口挑衅。且帝国主义列强间的矛盾，尤其是英美间的、日美间的矛盾，反映在中国国民党各派与各系军阀间，改组派的继续活动，蒋胡间的冲突，四川云南的军阀混战，北方阎系军队不断的哗变，湘鄂赣三省“围剿”红军的军队不能协同动作，都足以说明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统治是日益加强。而国民党反革命进攻红军苏维埃区域的结果，不仅没有减少他们内部的矛盾与冲突，并且更加加强起来，这正是摆在国民会议前面的一幅与统一和平恰恰相反的画图。

(二)但无论如何，却不允许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来，说在军阀混战的加紧布置与开火中间，国民党军阀对于红军苏维埃区域的进攻，已经不是主要的危险，或者更进一步对于反蒋的其他各派军阀存有丝毫的幻想，这都是离开阶级立场之机会主义的观点。我们应认识国民党各派军阀的冲突，只能成为我们利用之以击破敌人“围剿”的弱点，绝对不能消灭反革命各派进攻革命的一致。所以不论改组派也好，胡汉民派也好，北方的阎冯残部也好，他们攻击蒋介石第一个口号便是“剿共不力”。事实上国民党十九路军即使真开回广东去对付陈济棠，或者再调去更多的兵力，但“围剿”江西红军的计划，都丝毫不会改变。并且敌人在屡次挫折之后，进攻红军的战略也有了不少改进。如对红军不用极呆板的“围剿”，而改用“长追”“堵击”“会剿”“预备”等等部署，并依赖着民团的游击队，国民党的宣传队与苏区内部反革命的阴谋，来企图根本消灭苏区与红军。同时南京政府对于群众的欺骗政策虽是不断暴露真相，但它仍将层出不穷的施行欺骗。在白色统治区域，最近各地中共党部的确遇到不少次的破坏，尤其是党内主观上的原因。自四中全会后，党的路线上虽有坚决的转变，但全党经过右派的分裂，两面派的动摇，新的干部尤其是工人干部还没能很好地引进，以致一切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与右派消极的现象，成为非常严重的问题。苏区的党富农路线与反革命的分子，还占据在许多党及苏维埃的领导机关内。在非苏区的工农群众斗争中，党的领导力量也表显得非常薄弱，但群众自发的斗争却仍在发展。特别是五一运动，在几个中心城市表现出党之发动群众工作非常不够，甚至有消极的现象，这些严重的错误与弱点，是使党要成为一切事变的尾巴。现在比任何时机都好，比任何时机都便于我们发动群众，揭破敌人欺骗与利用敌人弱点，以揭破反革命对苏区的“围剿”。主要的要看全党有没有决心，在这剧烈的阶级斗争前面，执行国际路线到一切实际工作中去，根本消灭立三主义的工作方式与目前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消沉态度，这是全党的战斗任务。

(三)为着上述的目的，中央政治局特规定目前全党的紧急任务如下。

1. 中央政治局本身对于加强对苏区的领导任务，必须更实际的进行。中央派赴各苏区的中央的组织或中央代表，必须加强他的成分。有些苏区如赣东北湘鄂边还没有实行这一制度的，必须立即派遣得力的中央代表前去。对苏区的干部供给，自三中全会后，全数虽已将近二百五十人，但在成分上看来，(工人成分仅占百分之十五)极不能令人满意。且派遣干部到苏区是为加强领导工作与训练广大的新干部的，故干部的标准，今后中央组织部必须注意他的成分和工作能力，特别是政治认识。关于输送工人到苏区的工作，不仅没有丝毫成绩，

并且发生许多错误。主要的是全党没有把这一工作看成是一种战斗任务，在群众中做成运动，特别是要拥护红军与苏维埃的运动密切联系起来。只有在工人群众热烈的拥护红军的情绪之下，才能有自愿的往苏区去的真实要求。中央在五六两月中要严格的督促几个中心省委，在他们已经承认的定额中，要求他们“兑现”，并且要拿这一工作是否做到成为各省省委是否执行拥护红军苏维埃第一等任务的测验。关于输送工人的交通路线与办法也必须立即改善，并须规定出更具体的办法，中央政治局责成军委对于国民党反革命新的进攻红军的计划，速即起草一训令给各红军与各地党部，由中央政治局通过迅速发出，督促各地进行。

2．关于反国民会议、反黄色工会、反军阀战争、反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红军苏维埃区域，应成为全国目前，特别是红五月运动中的最主要的任务。中央宣传部与各级党的宣传部，应领导全国的宣传工作在这一任务上编印便于群众中散发的传单小册子，特别是标语与画报，组织宣传队在工厂、作坊、农村群众中作广大的宣传。即使开始只是三、四个人的小队一两厂的活动也是万分需要的。在国民会议开会后，我们要努力做到在某些工厂中，通过反国民会议拥护工农兵会议的决议与宣言，这是最有伟大意义的斗争，各级党报与赤色工会的报纸，必须在这一任务上多加宣传。苏维埃区域的党，更应在实现各级苏维埃的改造与全国苏维埃大会的任务上，来对抗国民会议；建立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与各苏区政府来对抗国民政府，公布与实施苏维埃政府的一切法令，以揭破国民会议所允诺的统一和平建设都是欺骗的，这是苏区最迫切的任务。

3．根据各地五一运动的教训，中央特别号召几个中心城市的党部，如上海、南京、香港、厦门、青岛、天津、唐山、北京、太原、奉天等地，必须极艰苦的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尤其是职工会的工作去准备五卅运动。五卅运动要以反帝斗争做中心，并且要执行反帝运动策略上的转变。使反帝运动的日常斗争与部分口号成为吸引广大工农群众，以至下层小资产阶级团结在反帝的革命运动旗帜之下的必由之路。五卅运动委员会在党的领导下要尽可能的在工厂、作坊、农村中立即建立起来，吸引各地的群众来参加，以建立下层的统一战线；同时更应进一步组织分区的或地方的五卅运动委员会。五卅运动必须与厂内群众日常斗争相联系，但不能等待斗争而不做关于五卅运动的发动。在发动五卅运动中，要利用各种群众集合的场所，去举行飞行集会，要发动群众的各种斗争，去号召五卅的罢工、罢业、罢操与示威，特别是在斗争条件更成熟的工厂，更应组织工人经济罢工或同业罢工来发动。在五卅当天，要尽可能的坚决的做到有准备，要反对说飞行集会都是立三路线的继续。或采取投机取巧的方法，不在运动的当天举行示威或飞行集会（如上海某区），这都是极可耻的取消主义与逃避主义，党必须予以坚决的斗争。同时立三路线的工作方法，也必须坚决的肃清。苏区关于五卅纪念的举行，应依照中央通过的红五月运动中的苏区工作计划执行。特别重要的应于工厂作坊农村兵营中放假一天，一切武装群众尤其是红军赤卫队少年先锋队应举行武装示威，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的进攻，但必须与作战的任务联系起来。

4．全国各地党部，在军阀军队中的工作成绩与各地兵变潮流及兵士斗争的发展是极不相应的。尤其在国民党军阀两次“围剿”苏区都受了失败与正在准备他们自己的战争当中，不论苏区与非苏区，到敌人军队中的工作更应成为全党的第一等任务。中央要求各地党部必须将中央通过的目前兵运决议全部实现起来。尤其重要的是进攻红军的敌人部队中的工作。黄河流域的兵运及红枪会运动，两广的兵运农运，淮河流域的农民斗争，中央及省委与地方党部都有单独的指示和工作计划，并定期考查他的成绩。同时为要统一全国农民运动的领

导，中央下面必须设法成立农民部。

5．没有比现在再重要的是党内思想的稳定与一致。这首先就需要全党加紧反改组派反取消派反罗章龙派的斗争。特别是国民会议开幕的现在，将资产阶级的影响从党内根本肃清出去。更重要的是肃清立三主义的运动尤其是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现在必须与实际工作中联系起来。并且在白色恐怖极端严重与党内立三路线破产的现在，党员间的拼命情绪特别是消极与逃避观念，将更加浓厚。因此党报上党的一切会议上一刻不可忘记的是两条战线上的斗争，特别反对主要危险右倾。各级党部对此工作执行得迟缓和松懈的，便是对执行国际路线不坚决，上级党部及党员间应执行自我批评的检举。

6．只有在全党的思想的稳定与一致之下，才能谈到党的指导机关的巩固。阶级敌人现在用尽一切方法来破坏党来捣乱党。右派罗章龙小组织分化出去之后，接着就是敌人的奸细侦探发现在党内，阴谋破坏党的机关与摧残党的干部。为着保证党的领导机关的巩固与安全，党应用最大的努力注意秘密工作。但保存与发展的组织之最真实的基础，还是使全体党员，特别是白色统治区域的党员都能打进生产中去，打入社会中去，密切群众的联系党现在一切组织工作中心都应放在这一目标上，没有真实的生产和社会基础，没有与群众的密切联系，便绝对没有稳固安全的领导机关。打破机关主义委派制度与官僚主义的工作方式，是现在组织上最切要的斗争任务。中央省委及各地党部都须在这一原则上重新审查自己的一切组织方式与机关。凡违反上面原则的都应坚决的予以取消和改变。党内异己分子的淘汰，也自能在这一转变中肃清出去。在苏区关于巩固党及苏维埃政府与红军的任务，应依照中央关于富田事变决议案的原则进行。在这里特别是肃清反革命分子及其组织应与保存党的一部分秘密基础同时进行。只有在党与阶级战线巩固的条件下，党方能更有力的领导着红军与工农群众击破敌人的“围剿”,争取革命的胜利。

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
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议案

（一九三一年八月）

一 中国目前的革命危机

（一）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指出了中国进到革命危机的时期。"在中国，革命危机底表现，就是在数千万居民的领土内，已经组成了苏维埃和红军，这就使中国在殖民地世界底民族革命运动中站着第一个位置。苏维埃和红军之成立，就预定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在反帝土地革命中的领导权会得到胜利，这个领导权，已经在国家政权底萌芽里巩固起来。"

中国土地反帝革命底胜利，现时已经带有全世界的历史的意义；共产党巩固起来和增长起来；共产党对于日益蓬勃的工人斗争和对于日益高涨并且继续扩大的农民运动的影响正在增长；红军建立起来，增长起来和得到胜利；在中国南部和中部的广大领土内建立了苏维埃；在这些区域内，彻底进行土地革命底口号等等——所有这些事实完全证实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底立场和政治路线是正确的。

陈独秀派及托洛茨基派曾口口声声，预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有良好的前途，国民党政权将长期稳定，而现时他们则在国民党的"国民会议"口号之下进行斗争，来反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反帝土地革命，来反对中国苏维埃，反对工农专政，托陈派底整个反革命的观念系统，已被事变的过程打得粉碎。

（二）中国的革命危机，这就是说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底破产，这就是说，帝国主义底统治与绝大多数人民底切身要求绝对不能相容。中国受到半殖民地地位的束缚，而这种束缚底依据在于：封建地主的土地占有制处在统治的地位，同时高利贷又风行全国。这种半殖民地地位的束缚，已经使中国陷入空前的各方面的经济危机。农业危机已成长期的病症而且剧烈到万分，这种农业危机已使千百万人民有饿死的危险。中国本国的工业处在破产的地位，其中大部分已转到帝国主义者手里。银价底跌落，加强了世界经济危机底破坏作用。国民党底政策破产了，国民党镇压革命，与帝国主义妥协，它允许在这种基础上去保证国家底经济稳定和民族统一，国民党底这种允许也破产了；事实上中国不但没有统一，而且军阀战争（这种战争同时反映出各帝国主义者争夺自己的影响）继续加剧；经济的衰败日甚一日等等，——所有这些事情，便使地主与资产阶级反革命营垒底破裂瓦解，日益加紧，日益加速。在这种情况之下，群众底觉悟性正在扩大着和增加着，他们觉悟到：除了革命以外，除了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以外，除了苏维埃胜利以外，就没有出路，而且也不能有出路。

国民党底基本政策就是用极厉害的恐怖手段来直接镇压工农革命，同时它还企图采用各

种手腕（召集国民会议、土地法草案和劳动法草案、装腔作势地说提高关税、空谈什么取消领事裁判权等等）来帮助自己的基本政策，以便破坏革命运动。中国共产党不应该轻视这些手腕底危险性。中国共产党应该揭破这些手腕，以便更加破坏国民党底统治。

（三）中国革命运动底发展，是不平衡地进行着：苏维埃政权在数千万居民的领土内取得胜利，但同时革命危机还没有把国内大部分领土内的群众引上直接推翻国民党和帝国主义者政权的斗争。

最妨碍苏维埃运动继续扩张到中国最重要部分去的因素，就是国际帝国主义底力量，国际帝国主义结成统一战线来反对中国人民底民族解放运动。愈往下去，外国帝国主义者将愈成为与中国劳动群众革命运动作斗争的基本力量。它们已经进行毫不掩饰的武装干涉来反对中国劳动人民及其苏维埃和红军。外国帝国主义者用自己的军舰和武力占领了中国基本的无产阶级中心城市，而与国民党一块来摧残和镇压斗争群众底革命毅力。

在非苏维埃区域里，党组织底力量还薄弱，因此共产党对非苏维埃区域里的工农群众革命斗争，其中也对于大的和最大的工业中心里工人的罢工斗争，都没有充分去加以领导、组织和扩大，虽然无产阶级底战斗毅力和斗争决心是日益增长，因为这个缘故，所以阻碍革命运动的这个因素便日益加强。目前中国基本工业中心群众反帝运动底范围显然不充分广泛，这在基本上也是由于上述这些原因。党和工会旧时领导底以前的、差不多完全蔑视群众的工会工作，蔑视继续发展和领导反帝斗争的任务的态度，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消灭。正因为我们党在非苏维埃区域里有这些弱点，所以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势力，得帝国主义者武装干涉的帮助，还能够妨碍非苏区城市工人运动、工农群众运动，使这种运动不能与苏区工农红军斗争联合起来。

（四）可是，国民党虽借助于帝国主义者而集中极大的武力来镇压工农运动，但无产阶级所领导的（无产阶级的领导经过共产党、红军和苏维埃，而日益有系统地实现）农民战争，却日益普及于新的区域。苏维埃政权与红军底根据地正在扩大和巩固起来。目前革命运动之所以强有力，它底范围之所以广泛，它对群众之所以有影响，就是由于下层民众本身用革命的办法去解决土地问题、米粮问题和八小时工作制问题，就是由于下层民众本身建立红军和建立自己的苏维埃政权。

中国苏维埃使整个殖民地世界都革命化，为要使中国苏维埃运动底继续发展，就要更加扩大和巩固苏维埃及红军底根据地。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底制度之所能够维持，大半是依靠帝国主义者与军阀用军队的力量来镇压工农，群众稍有反抗和斗争的企图，就必然碰到整个国民党制度底压迫，在这种条件之下，共产党员所领导的工农红军，自然成为收集、团结和组织工农革命力量底中心，成为整个革命运动高涨底最重要的动力，成为中国革命危机底最高表现，成为为推翻国民党而斗争底基本形式，成为一定可以保证革命继续发展的力量。

（五）一切党组织底注意力，都应该集中到：继续扩大苏维埃区域，建立工农运动间广大的战斗联络，使非苏区的革命斗争与工农红军底动作相呼应。党应该在非苏维埃区域里大规模地普遍宣传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底活动。为要使革命往前顺利发展，为要保证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中国共产党应该首先解决以下三位一体的任务：（1）牢牢掌握根据地并继续扩大这个根据地，在这种基础上，去建设和巩固红军；（2）成立苏维埃中央政府，巩固苏维埃政权，而苏维埃政权应在自己统治的领土内彻底执行反帝土地革命底基本口号；（3）展开非苏区的群众革命斗争、农民运动，而尤其是工人的罢工，同时要极努力地巩固和扩大革命

职工运动。所有这三个任务，应该是与继续加紧和扩大反帝斗争联系起来。这应该是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里注意力底中心。同时，在苏维埃区域里，党应该提高农民群众底土地运动到反帝革命底程度。胜利地完成这些基本任务，就是苏维埃运动在中国取得胜利的担保。

二　中国共产党是目前阶段上革命运动底领袖

（六）共产党所领导的苏维埃运动底胜利，使得共产党口号和思想底影响，在非苏区也雷厉风行地普遍到工农群众和军阀军队底兵士群众当中去，接受这些影响的工农和兵士一天比一天多。中国阶级斗争底整个过程，唤起千百万劳动群众去参加积极的革命斗争。党力量底主要来源和革命胜利底担保就在这里。

但是中国共产党至今还未能使自己在群众中的工作，适应于因革命斗争之普遍和增长而提出的要求。中国共产党极其薄弱地在组织上巩固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党还未能组织与广大群众的实际的日常联系，未能取得对工人罢工斗争的领导，未能建立无产阶级底群众组织，未能在全中国领导农民运动。主要地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中国虽有革命危机，面党却没有在非苏区掀起强大的运动来保护苏维埃区域，以反对国民党军阀的"围剿"。

在目前运动底阶段上，当国内有革命危机，而苏维埃政权已在好些区域内取得胜利的时候，斗争底结局，首先要靠而且直接要靠共产党本身为转移，靠它政治路线是否正确，靠它实际工作做得怎样为转移，靠它在广大群众中的影响程度为转移，靠它思想上政治上是否一致及其全体党员行动是否一致，是否遵守纪律为转移。

（七）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指出：一九三〇年夏季革命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面前提出了许多新任务：继续发展对地主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进攻，并准备与帝国主义决战，为要解决这些新任务，就要建立苏维埃根据地，把赤色游击队变为正式红军，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和尽量展开全中国工农群众底斗争。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内以李立三同志为首的一部分领导者，却拿出反布尔塞维主义的和半托洛茨基主义的路线来与列宁主义的路线相对立。这条路线便是企图用冒险的盲动主义来代替布尔塞维主义的政策，不肯进行群众工作，不肯进行真正解决革命任务的斗争（在解决土地问题时抱着右倾机会主义的态度，要在苏维埃区域建立集体农庄和苏维埃农庄的那种过左的企图，企图取消非苏区的职工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等等）。

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完全赞同对于李立三同志底反列宁主义的立场和路线所进行的彻底斗争，因为李立三同志借"左的"半托洛茨基主义的空谈作掩饰，而放弃了为建立苏维埃根据地、为巩固红军和成立苏维埃政府而斗争的任务，因为他轻视了组织群众和为工人阶级日常要求而斗争的意义，因为他否认了中国革命底资产阶级民主阶段，而同时在实际工作中却实行了右倾机会主义。

（八）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指出：中国共产党三中全会没有在党面前揭穿李立三同志底错误与半托洛茨基主义立三路线底真正实质，没有懂得：克服李立三反列宁主义的观点，这就是反对目前阶段上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底前提和特殊形式。三中全会对于李立三底反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采取了骑墙的调和态度，这就帮助了右的取消派和分裂派，即反革命的陈独秀主义底走狗（罗章龙）向中国共产党路线的进攻。应该满意地指出：那个时候在党底内部发展了一种健全的趋势去克服当时的一部分领导者底动摇。

（九）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满意地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底第四次扩大会议，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中，击退了右的分裂派和取消派底进攻，坚决打击了李立三同志底半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及对这种立场调和的态度，当时右的分裂派和取消派企图利用一部分工人干部对立三错误及与立三错误调和的态度之不满，而来达到反党的目的。四中全会，使中共在继续布尔塞维克化的道路上向前进了一大步，它纠正了政治路线和刷新了党的领导，同时开始了党全部工作中的转变，去实际地和彻底地解决摆在党面前的那些刻不容缓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在四中全会时以及在四中全会刚完以后，为保证实行党底路线和团结党底队伍起见，采取了几个组织办法（改选政治局，因为罗章龙及其两个信徒发表反党小册子和进行分裂活动而将他们开除党籍），国际主席团完全批准这些办法，认为这些办法是必要的。

（十）立三主义者向党投降，这就使继续与“左的”机会主义作斗争的任务容易执行。但是这个斗争是不应该松懈的。同时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去反对目前的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以及与右倾调和的态度。

右倾机会主义，散播对革命力量不信任的心理，并阻滞革命运动底发展；它降低工人运动底程度，它不去动员广大群众来保护和帮助苏维埃运动，它却企图使工人底斗争和组织，屈服于国民党的合法条件。右倾机会主义，对于党的基本口号，即对于反帝土地革命底口号采取取消派的态度，它采取消极等待的策略，它用这种态度和策略来妨碍非苏区农民运动与反帝运动底扩展。在苏维埃区域内，右倾机会主义则与剥削分子联合，妨碍工人为提高自己生活水平的斗争，并且在实质上坚持本着富农精神来解决土地问题。右倾机会主义，放弃和降低关于建设红军和巩固党在红军中的领导的任务，它帮助苏维埃区域内的地方观念底倾向，它放弃或轻视为扩大苏维埃运动的斗争，——所有这些，以及与此类似的右倾机会主义表现，都只是替剥削者阶级出力。右倾机会主义者，抹煞工人对苏维埃与红军的领导，约束民众底革命创造力，使苏维埃的党的机关官僚化，并阻难党反对“AB团”这一类反革命组织的斗争。右倾机会主义底政策和策略，将使革命失败。右倾机会主义不常是提出公开的政纲来反对党底路线，这个事实，并不减少它的危险性，而是增加它的危险性，因为这个事实使得我们难于当着群众去揭露右倾机会主义，同时使得右倾机会主义容易在实际工作中流行起来。中国共产党必须大规模地开展工作，来揭破右倾机会主义所有的观点，无论在理论上或在实际工作上，都去与右倾机会主义作不调和的斗争。

（十一）党与群众发生联系，群众信任共产党——这就是革命胜利底重要条件。因此，共产党应该进行特别坚决的斗争，去反对轻视和降低群众在革命中的作用，反对不信任无产阶级底力量和战斗能力，反对蔑视工农广大群众底革命创造力，反对轻视党底作用，这些现象，在右倾机会主义与“左的”机会主义方面，虽然形式不同，但都是它们所同具的本质。只有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斗争同时把右倾看作是目前主要危险，只有在这种斗争中才能保证执行党底列宁主义路线。

同时，党应该加紧自己的斗争去反对现在已经联合起来的托陈派。近来党松懈了自己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与这些反革命派别进行斗争，同时这些派别却显然加紧了它们的活动。中国共产党应该顾到它们用来破坏党与红军的新手腕，而尽量在出版物上、在自己的组织内以及在工农群众间加紧坚决的斗争，去反对国民党及中国一切反革命势力底这些奴仆。

（十二）只有中国共产党不仅在自己的政治路线上，而且在自己的成分上以及工人在党的一切领导机关内所起的作用上，都成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只有在这种条件之下，无产阶级底

领导权和革命底胜利发展才能得到保证。无畏地、有系统地，而同时又本着突击的精神，去征收最优秀的工人分子入党，这应该成为党底一切支部与委员会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中国共产党应该在大的和最大的企业中奠定自己的下层组织。应该恢复和巩固全国各大城市的党组织。务必在极短期限内恢复那已经丧失的与企业中一部分党员的联系，这些党员，往往好几年来继续进行斗争，而没有党底领导，没有与党组织发生联系。中央委员应该尽量提高工厂支部在全党生活中的作用；党委员会应该特别注意听工厂支部的意见；应该把党内优秀的工作人员派给工厂支部，并且工厂支部的工作，应该成为一切党组织的模范。必须在最近将来，使支部成为企业内的真正领导中心，由支部来应付当地一切问题并团结和组织工人底斗争。

现时在实际工作中党员分配得不适当，例如很多的党员坐在上层机关里，这些同志，既与群众斗争没有联系，所以变成党底一种重荷，党应当消灭这一种实际工作中的缺点。必须重新审查各机关内的工作人员以便尽量把他们派去担任下层工作，首先是派到企业里去。中国共产党应该顾到党急于需要干部人才，而认真注意有系统地提拔新的积极分子，尤其是从工人和贫农中提拔新的积极分子，注意加紧和改善自己的全部宣传工作和党内教育工作，并建立很多的党校，特别是在苏维埃区域里。

苏维埃区域内党的建设问题，应该得到极快的解决。应该采取一切的办法去巩固苏区里的中心领导机关和党组织。应该尽量加强红军各部队里党的中心和党的领导。应该竭力设法，以便有系统地去改善苏维埃区域里党组织底社会成分，以便加紧所有群众组织中党团底工作。必须有系统地和无情地肃清党队伍内一切戴假面具的和异己的分子。本着这个目的，在苏维埃区域里，必须建立党的监察委员会。

必须在条件所容许的范围内去发展党内的民主和自我批评。特别是在苏维埃区域里，自我批评，能够成为而且应该成为巩固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的最重要的工具和两条战线上斗争（首先是反对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底武器。

三　扩大非苏区里的群众工作

（十三）在非苏维埃区域里，党工作的最近目标，即党应该用全力去达到的那个目标，就是组织强大的群众运动来保护苏维埃区域，尽量帮助工农红军来粉碎国民党军阀的“围剿”。组织群众，领导他们的日常斗争，使这两件事情与保护苏维埃运动的群众宣传鼓动汇合起来，——这就是党应该握住的基本关键，以便唤起工业城市的工人群众，来积极帮助苏维埃区域。

（十四）提高工人阶级战斗力的重要条件，就是从新建立、巩固和扩大无产阶级底群众组织。现时的不满情绪日益厉害，日益扩大，在这种条件之下，使工人群众，尤其是使企业工人群众有组织，这无疑地会使无产阶级底革命斗争加强多倍。在四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在群众工作中所采取的步骤（多半是在上海的组织里），已经得到相当的成绩，这就证明工人革命运动有很大的可能。党应该重新建立和巩固赤色工会，而重新建立和巩固赤色工会的基础就是在企业里建立很多的下级组织：如工厂里的职工小组，工厂全权代表制，选举的工厂委员会，首先在最重要的生产部门里，在大的工业城市里，在大的工厂、矿山、海港、铁路、兵工厂等等里面。必须以巩固下级工会组织为基础而去重新建立各生产部门的工会。工会应该拟定个别工业部门中工人迫切要求底钢领，并将这个钢领提交每个企业内工人群众去讨

论，提到非党的工人会议上去讨论。职工会应该详细统计这种讨论底结果，并应根据这一点来规定最后的局部要求钢领，把这种钢领作为自己的群众工作与展开工人战斗的基础。

（十五）这个要求钢领，应该成为一种工具，以便用这种工具去揭露黄色工会领导机关及其首领底叛变作用，揭露国民党底劳动法。轻视在黄色工会里的工作，这是严重的危险。在黄色工会底会员群众当中，正增长着对国民党极不满意的情绪，例如对国民党"改组"工会的指令极不满意的情绪。党应该揭破国民党"改组"工会办法底实质，使大家知道，国民党之所以实行这些办法，是因为工会会员群众急进化，这个办法的目的，是为的更加镇压工人阶级。特别重要的，是要有系统地根据具体事实来揭破黄色工会首领底口是心非的把戏；这些首领，在口头上虽反对这种"改组"，而事实上却是这种"改组"的执行者。共产党员丝毫也不要庇护以前的黄色工会，而应该利用这种改组，去加紧工人反国民党的斗争，去巩固赤色工会。加紧赤色工会的工作，特别是赤色工会对于罢工运动的领导，这两件事情会造成良好的条件，以便在黄色工会里建立群众的职工反对派和进行下层的统一战线策略。共产党员和赤色工会，务必在黄色工会、行会工会、国民党工会（改组派的工会也在内）底群众中间进行努力的工作，去在他们那里建立职工反对派，要利用群众工作底各种极小的可能，其中也要利用黄色工会底俱乐部，来达到上述的目的。

同时，党的组织应该继续已开始的工作去利用公开的机会和设立相当的地点（夜校、体育组织等等），以借助于这些公开的机会，来巩固自己与工人群众间的联系。

（十六）现时工运状况底特点在于：罢工斗争大大增长和加剧，但同时绝大多数的罢工，却是自发地发生的，并且由于党组织在群众中间的工作极端薄弱，所以大多数的罢工得不到革命的领导。同时，这些罢工当中，有很多带着反攻的性质，并且这一类的罢工，一天天增加着，这就使得共产党支配和扩大罢工斗争，有异常良好的前途。

因此，现时在这方面的主要任务就是：无论如何要巩固党与群众的联系，准备、组织和领导工人阶级底罢工斗争，这在最近将来，无疑义地会使得罢工运动底范围扩大起来，会使得罢工斗争进到更带进攻性质的斗争形式。革命职工运动底中心任务，依然是在个别最重要的工业城市中或在一些有决断意义的工业部门里，去组织和准备经济的战斗。上海最近的一次丝厂工人底罢工，在实际上证明了：现时已经可以鼓起整个产业部门的工人作斗争。但同时这次罢工也证明党在准备这类运动方面的工作是极其薄弱的，并证明党是不会在组织上去巩固自己在已经爆发的斗争中的影响。因此，学习准备、组织和进行革命的罢工斗争，这个任务，现时对党有第一等的意义。凡是轻视经济罢工斗争的态度，都应消除，"罢工是革命底学校"（列宁说的话）。党大大地去扩展和组织经济斗争，这就会把工人中最落后的阶层引入革命运动。个别工业部门内的罢工（只要是经济要求与政治要求配合起来），本身就是对苏维埃区域强有力的帮助。在党底正确政策之下，对于工人底情绪作清晰的革命的估计之下，在共产党员不顾牺牲地进行工作去扩大战斗和组织无产阶级的条件之下，这种罢工运动，在短促的期限内，就会转变为强大的政治运动，以便在保护苏维埃的直接口号之下去反对国民党，这样一来，举行总的政治罢工就会成为迫切的任务。

（十七）现时机会主义底最危险的表现，就是不愿意和不善于把下述两件事情结合起来：（1）进行斗争去争取迫切的经济上的需要；（2）进行不断的日常的群众工作，去发动群众以便保护苏维埃运动。共产党员务必利用群众每一个不满意的表现，利用他们每一次的进攻，去进行一贯的和灵巧的政治鼓动。这种鼓动的基本内容，便是解释红军与苏维埃为全中国劳

动群众之解放而斗争的意义，解释苏维埃区域内工农所得到革命成绩底意义。党务必为群众底迫切需要而进行斗争，它必须与这种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去组织宣传运动，使群众保护和帮助中国苏维埃运动，从各企业里成立许多保护苏维埃运动的委员会、派志愿者到红军中去、募捐帮助红军起，一直到举行群众的政治罢工、革命的游行示威、阻止运送军队与军火等等为止。

除此以外，党应该继续它在失业工人间开始得很迟的有系统的工作。党应当把他们组织在专门拟定的口号周围，同时党应该使他们的斗争合并在中国无产阶级与农民群众底总斗争之中。

(十八)同时，党应该采取一切办法，去继续扩大反帝运动，去保证自己在反帝运动中的领导。党应该利用帝国主义压迫底任何一个表现，利用国际帝国主义干涉苏维埃、破坏苏维埃所进行的反对中国反动势力的战争之每一件事实，利用国际帝国主义对劳动群众的每一个暴力行为，去鼓起和加深中国民众对帝国主义者的仇恨心理，并组织群众去与它们作坚决的斗争。党应该加紧自己口头上的和刊物上的全部反帝鼓动和宣传工作，扩大反帝大同盟这个群众组织底活动，并且在群众对帝国主义压迫的义愤自动爆发的时候，就成立行动委员会。

(十九)党应该更认真地去注意妇女运动。党应该在这方加紧自己的工作去替女工拟定特殊的局部要求，去利用特殊的公开工作的形式，去扩大企业中妇女代表会议底经验，去举行失业工人妻子与军阀军队中兵士妻子底专门会议，这样来把劳动妇女组织到和吸收到革命解放斗争底总潮流里去。

(二十)党应该认真地去加强自己对中国少共的领导和帮助，因为少共曾经过了自己发展中异常困难的一个时期，那时候李立三主义的领导曾企图取消它这个独立的组织。中国少共是工农青年底领袖，它在中国革命底全部发展和斗争中，在为苏维埃政权的战斗中，在进行土地革命中，在把极广大的青年工农阶层争取到党方面来的事业中，在巩固红军当中，在建立新的红军队伍当中等等，负有表演极大作用的使命。中国少共，在自己的领导人员当中，克服了立三路线及调和主义以后，就造成了自己继续增长和发展的前提。它在反对右派的斗争中曾积极起来拥护共产国际底路线，它继续进行着斗争去反对立三主义“左的”错误和残余，正在领会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并且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已达到了第一批的重要成绩（动员青年工人到红军里去、成立新的工厂支部、个别的组织增长着、培养工人干部、开始在军阀军队里作工、领导个别的青年罢工等等)。少共底基本任务，是要领导和组织青年工人底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要尽量帮助和参加苏维埃运动，尽量帮助和参加巩固红军的事业，要继续在组织上去巩固少共本身，并改善其社会成分。少共中央第四次全会曾提出许多任务，应该以解决这些任务为基础，来达到少共思想上的发展和巩固。

(二十一)同时，党应该最积极地在国民党区域内展开农民运动，建立农民委员会，在农民委员会中进行革命的工作，组织农民为日常要求而自发起来的斗争（抗税抗租、不缴军阀的捐款等等)，使这种斗争革命化，并使这种斗争变为夺取和瓜分地主土地的斗争。党在国民党的一切领土内都应该积极组织和展开农民游击运动，但是党应该首先用这种农民游击运动去削弱与苏维埃作战的国民党军队底后方，去截断它们的交通线，去夺取辎重和军械底运输等等。国民党区域内的土地运动和游击战争，能够引起而且应该引起许多新的苏维埃政权策源地之成立和现有的苏维埃根据地之扩大。

(二十二)党务必尽量展开工作去破坏军阀的军队，首先是去破坏与苏维埃及红军作战的

那些军队。客观的环境，对于党在这方面的工作，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好些。为土地的斗争，会使贫困化的而有很多是在军阀军队里当兵的农民群众转到工农革命方面来。然而共产党员却未曾充分利用敌军底这种败坏过程，去破坏军阀对苏维埃区域的进攻。应该消灭立三路线底盲动错误，但这并不是说要放弃争取国民党军队之兵士群众的斗争，这并不是说不去利用、组织和扩展兵士的哗变。说敌军底兵士纯粹是从城乡间失去阶级意识的分子里招募来的，这种估计是有害的；不去利用军阀队伍里兵士底经济局部要求，这种倾向是错误的。毛泽东同志曾为军阀队伍的兵士俘虏开设短期训练班，这种好经验，共产党必须广为采用；党必须继续派送最好的先进的工人与游击队员到军阀军队里去，以便进行工作去建立共产党员底小组，以便破坏敌人底军队；党必须赞助和鼓动国民党军队里所发生的一切和各种冲突。继续扩大苏维埃区域，破坏蒋介石的"围剿"，这大大要依靠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游击队等等之破坏军阀队伍和使兵士群众转到土地革命与苏维埃方面来的这种不顾牺牲的工作为转移。

（二十三）为要动员非苏维埃区域的工农群众来积极援助红军和苏维埃起见，为要到处开展土地革命起见，苏维埃中央政府应该颁布中国劳动群众与被剥削群众底斗争纲领，土地反帝革命底纲领，来表彰苏维埃政权底目标和任务，表彰在苏维埃区域里工农与城市贫民已经得到的成绩（政治法、土地法和劳动法、征税政策等等）。这个反帝土地革命底纲领，应该成为共产党员、先进工人和革命农民在全国各地工农、兵士与城市贫民间的一切工作之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与中心。

四　党在苏维埃区域内的任务与苏维埃运动底前途

（二十四）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要加强和巩固红军，保证红军各部队底动作一致，保证全体工农群众给红军以战斗的帮助，击退国民党底新进攻，粉碎和破坏国民党的军队，并开始进攻，以便扩大苏区，形成连绵不断的苏维埃区域。

这都要党加紧所有的力量去执行以下的任务：

（甲）尽量提高红军底战斗力。要办到这件事情，就要加紧红军政治教育的工作，就要使每一个红军战士都知道和懂得工农革命底目标以及红军底任务，尤其是要共产党员在红军中加紧工作，他们应当做军事纪律底模范，以便用这种办法去巩固红军全体人员底军事纪律。不仅在苏维埃区域里，而且在非苏维埃区域里，都去尽量巩固红军与劳动群众的联络。吸收工人、雇农、苦力、贫农与中农到红军队伍里来，同时把显然是富农的分子与豪绅的分子清出红军队伍，首先就是把它们清出红军长官的干部。扩大和巩固赤卫队、少卫队和赤色自卫队，加紧它们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在那里建立党的和少共的核心。借少共底帮助，对于苏区的工农青年，开始实行普遍的军事训练。用必要的灵活办法，使这些群众的军事组织底战斗行动与红军部队一致，把它们变为后备队，以便用受过训练的革命工农干部来迅速补充红军部队。革命的群众团体（工会、贫农团等等）有组织地和自愿地把自己的优秀会员送到红军队伍里去，这对于巩固红军底社会成分有很大的意义。党、红军、苏维埃和职工会，应该有系统地和不断地对苏维埃区域农民群众解释：只有扩大苏维埃运动与苏维埃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的时候，才能保存他们的胜利品。

（乙）必须组织苏维埃根据地附近的国民党区域内工农发动底强大浪潮，必须组织群众的

援助，去帮助红军底斗争。红军、苏维埃和职工会，应该从工农中间挑选成千的鼓动者和组织者分派到这些区域里去，这些鼓动者和组织者，应该进行广大的宣传，去说明苏维埃革命底任务与目的，去说明苏维埃给了工农一些什么东西，同时应该在国民党区域内，尤其是在国民党军队底后方，去组织土地运动和游击战争。这些工农全权代表，应该成为发起人，使工农选派自己的代表团和代表到苏维埃区域里去。

(丙)在一切苏维埃区域内，应彻底执行和实现土地革命底基本口号。苏维埃政权底政策，苏维埃的建设，红军底建设，都应该保证无产阶级底领导权，保证巩固与贫农中农的联盟，保证在苏维埃领导之下在社会生活各方面去开展群众的革命自动性——“极广泛地开展下层民众底创造力”(列宁说的话）——，保证用专政的政权去镇压革命底敌人。

(二十五)必须彻底实行苏维埃的民主制，这就是：保证苏维埃与群众真正不断的联系，保证苏维埃政权底一切机关是完全选举出来的，并保障撤换代表的权利（选举人有权利撤回自己的代表),规定苏维埃和苏维埃的每一个代表要有系统地、不是在形式上而是在事实上的报告和负责任。苏维埃应该依靠着职工会。必须在苏维埃下面和在乡村里加速组织贫农团，必须把全体雇农、贫农、中农群众团结在苏维埃底周围，必须严格实行剥夺富农与城乡其他剥削者阶级底选举权，并有系统地把钻到苏维埃里来的富农分子清洗出去。

在地方上，苏维埃国家应该有下层民众底直接自动性，把这种自动性作为自己政权底根源。苏维埃应该成为民众这种自动性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有些苏维埃区域里机会主义者阻碍工农底革命创造力，官僚式地命令群众，这种现象，应该极无情地加以铲除。长沙的经验，以及那些没有选举城市苏维埃而建立了上层苏维埃政府的无产阶级中心城市（安源、景德镇等处）底经验，都证明有一种极危险的倾向存在着，这种倾向要降低工人阶级与工人代表苏维埃在革命中的作用。这种倾向，使工农的联合有发生破裂的危险，使无产阶级对苏维埃的领导有削弱的危险。这种倾向，实际帮助着富农来限制土地革命底范围，并帮助富农企图取偿于工人阶级来解决经济上的困难（例如，工业品与农业品之间价格上相差甚远）。

(二十六)在最短的期限内，应该在最有保证的区域里成立中央苏维埃政府。苏维埃政府应该宣布和实现反帝土地革命底纲领（推翻国民党政权，没收地主土地给农民，与帝国主义作彻底的斗争，去争取民族完全独立，争取全中国在苏维埃政权下统一起来，没收帝国主义者底财产，八小时工作制，社会立法和工人监督生产)。苏维埃政府对于少数民族，应该以他们的完全平权和它们的自决权为基础来实行布尔塞维克的民族政策。

(二十七)党和苏维埃应采取一切方法，以便使雇农、贫农和中农根据本身的利益来亲自解决土地问题 。

应该立刻没收地主、军阀、豪绅、高利贷者和外国教堂底一切土地，无论是他们自己经营的土地或是出租的土地，都一律没收，对于小地主和“正”绅，都一概毫无例外，同时并不给旧业主以任何代价。没收来的土地，应该在苏维埃领导之下，根据平分的原则，分给贫农、中农、雇农、苦力和红军战士。被没收土地底旧业主不应该得到任何分地。

没收土地，不应该波及中农的私有土地，对富裕的中农亦然。可是以前属于富农的土地，却应拿去分配，分给贫农、中农、雇农、苦力和红军战士。对于没有参加反苏维埃的武装斗争的那些富农，应该给他们以只供劳动的分地，但不给以好的土地，同时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们以前是耕种土地的而且以后他们也将亲自耕种土地。

苏维埃运动底实际，在个别区域里，表现出一些土地问题解决的不正确的例子，譬如强

迫实行总平分。无论什么时候，共产党员都不应该强迫平分土地，都不应该从上面用纯粹的行政手段来实行平分土地。共产党员，既承认总的平分土地，是肃清土地上一切束缚关系、肃清地主私有土地底一切痕迹与结果的一种彻底方法，并且是进到往后土地国有的一种预先步骤。他们是能够向农民解释平分土地的利益的，因为消灭田地间隔和离远的种种不便，以及根据雇农、贫农、中农的利益来分配土地等等，将使农户底收入提高。可是，如果不是农民群众亲自出来倡导平分土地的问题，则共产党员不应该特别提出这个问题。只有在农民基本群众与雇农直接地积极地赞助之下，只有在拥有私有土地的中农和贫农同意这种办法的时候，苏维埃才应实行这种办法。同时，共产党员，无论在实际上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无论在牵涉这个问题的全部鼓动工作当中，都必须从具体的情况出发，都必须顾到中国各地社会经济条件的不同，例如中国有些区域内自耕农——私有财产者很多，他们保存着自己小私有财产的情绪和偏见。

必须巩固无产阶级与贫农中农的联盟，同时要保证工人阶级在这个联盟中的领导，这就使我们的党在土地改革底全部实际工作中一定要顾到农民群众本身的利益和同意，并以此为出发点。例如地方上的党机关和苏维埃机关，应该依农民本身底愿望（不侵犯他们的宗教情感），来解决隶属于宗教会社、庙堂等等的土地问题。同样，每个乡村里的地方党组织和苏维埃组织，应该根据雇农、贫农和中农的利益，来具体地选择当地条件下最有益的分地原则。可以按照一家人口的多少或按照一家有劳动能力的人数多少来分配土地，或者可以采取人口与劳力的混合原则。同时应该顾计到的，不仅是所分配的土地面积的大小，而且是该地质量的好坏（能有多少收成）。

同时，党应该预防过早的颁布土地国有命令的企图。只有当苏维埃革命在国内有决断意义的各区域内取得胜利，并且农民基本群众赞助土地国有的条件之下，才能实行土地国有。

（二十八）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应该是运用来保证工农红军的胜利，和根本改善工农的经济状况。

苏维埃应该取消和根本铲除一切封建束缚关系。取消劳动群众欠给高利贷者的一切债务，进行斗争去反对束缚性的契约之重新出现。进行阶级的征税政策，促进商品流通底发展，尽量帮助合作社（首先是供给与消费的合作社）底建设，促进手工业的发展。苏维埃政权应该设法反对资本家底怠工和歇业，一直到没收他们的企业为止，同时要依靠工人的监督机关，这种机关，在一切大的和中等的工商企业与银行钱庄企业内都应该建立起来。

苏维埃政权应该立刻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对同等劳动给以同等报酬，实行劳动法（每年的休假期；每周一个休息日；保护童工，使童工不受剥削，同时要采取一种方针，以便手工业与家庭手工业中完全废止童工制，并颁布法令禁止苏区的一切工业企业中采用童工制；工人生病时予以医治和给以工资；给残废者以律贴，由业主出钱作保险费；辞退和雇用工人，只有经过职工会）。从十四岁到十六岁的幼年工人，其工作日，应该限定为四小时，从十六岁到十八岁的青年工人，则限定为六小时。

农业雇佣临时特殊条例里，应该规定雇农工作日的长短（容许延长一点），同时在这种条例里，应注意到生产底季候性质和中农之雇用零工。

苏维埃政权应该立刻设法去帮助失业工人和设法减少失业工人底人数，同时它应当明白知道：只有苏维埃制度在中国多年存在，才能完全消灭失业现象。必须阻碍私人业主关闭企业和缩小生产的行动。在条件具备的地方，就要把失业工人联合起来成为劳动组合，这种劳

动组合首先就是为红军的供给和其他的公众需要而生产。

(二十九)党在苏维埃区域内的政策，应该由下列一个任务出发：进行资产阶级民主的土地革命以及这种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

在现时日益增长的苏维埃运动底过程中，工人和农民就已经创造着前提，以便中国转上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这些前提就是：

正在从土地革命中长成的工人农民红军兵士代表苏维埃及工农红军队伍，已成为工农革命专政底机关。革命的人员，正在建立新的国家机关，这个机关，给"被压迫的阶级中，工人与农民中，最觉悟的、最努力的先进的一部分"以组织形式，"这样一来，这就是使被压迫阶级底先锋队可以用来唤起、教育、训练和领导这些阶级之全体广大群众的一种机关……"(引号内是列宁说的话)。

在土地革命底过程中，贫农中农群众，在无产阶级底领导之下，既力谋完全消灭和彻底消灭封建的土地私有制，他们必然会与投到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方面去的富农发生冲突。乡村贫农底作用及其组织性正在增长着(在苏维埃下面建立贫农团等等)。

土地革命日益明显地表现出自己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土地运动与反帝运动之间的相互影响，日益发展起来和巩固起来。农民基本群众，正在无产阶级底领导之下起来斗争，去反对帝国主义，去消灭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他们根据本身的斗争经验，深信：如果不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土地革命底胜利是不可能的。

无产阶级在革命运动中的领导作用正在巩固着。无产阶级底党——中国共产党，乃是领导苏维埃的唯一的政党，乃是工农红军底组织者和领导者，乃是工农唯一的首领。无产阶级底领导权，在国家政权底萌芽中巩固起来，它是发展到无产阶级专政去的萌芽和过渡的阶段。

(三十)同时，要进行斗争去创造和巩固这一种前提，以便中国转上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这种斗争要求我们尽量扩大苏维埃与红军底根据地，要求苏维埃和红军战胜反革命底武装力量，要求我们在中国有决定意义的领土上建立苏维埃政权。

只有苏维埃革命，才能实现中国底国家统一。工农运动之汇合，大的无产阶级中心城市里反革命政权之被推翻和苏维埃政权之建立——将把新的工农广大阶层吸收到革命里来，将多倍加强无产阶级底领导权(根本改善共产党底社会成分，吸收无产阶级群众参加苏维埃底直接建设，替苏维埃和红军培养许多无产阶级的领导干部，集中运动)，这样一来，就会使中央苏维埃政府具有真正全中国的、全民族的力量和意义。

在中国很大一部分领土内消灭封建军阀的割据和地主的土地占有制，在那里建立统一的苏维埃国家，这就会促进阶级力量对比底改变而有利于无产阶级。在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民族解放战争中，不仅把农民广大阶层，而且把城市小资产阶级广大阶层，都团结到工人阶级底周围，这将使无产阶级——在反帝斗争中唯一彻底的阶级——变为中国人民公认的真正领袖。

同时，中国无产阶级底国际联系，它与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战斗联盟，中国工农与社会主义已经取得胜利的国家底联盟，也日益扩大起来。苏联各民族底经验、榜样和帮助，以及全世界无产阶级底斗争，也巩固着中国无产阶级底地位，这种经验、榜样、帮助和斗争乃是中国将来转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重要因素。

这样，在土地反帝革命底过程中，无产阶级对农民的思想上的领导，不仅思想上的领

导，而且国家方面的领导，都会形成起来和发育起来。日臻巩固的苏维埃，在中国共产党员领导之下，将成为这样一个政权，这个政权不仅能够彻底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底一切任务，而且能够保证以后的转变，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转变到直接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三十一）苏维埃进行斗争，去争取中国国家的统一，去消灭地主的土地占有制和帝国主义的奴隶制；这种斗争底利益，在革命过程中，使得苏维埃政权不仅要把外国人的一切企业彻底收归国有，而且对于本国资本底企业，首先是具有全民意义的企业（银行、铁路、军事企业、大规模的河海道运输业、电站和其他市政企业等等），也要实行没收，然后收归国有。进行这些办法，以及把土地、水利和灌溉上的设备收归国有，这就会大大巩固无产阶级在它继续为社会主义而斗争中的地位。

中国资产阶级实行怠工并从事积极的反革命行动，地主、军阀和帝国主义者底统治形成经济的破坏，群众竭力寻找出路以摆脱痛苦不堪的贫困，尤其是在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反对资产阶级地主联盟的人民战争中要保证胜利等等，凡此种种，都使苏维埃必须进行往前的步骤，以便一方面在经济上解除中国资产阶级底武装，另方面采取个别的办法去进行国家监督，以后再去进行国民经济计划化。

这些个别的办法之所以必要，是为着执行以下的任务：（1）保全和巩固土地反帝革命底成绩；（2）把反帝土地革命进行到底。这些个别的办法，应该从极广大的劳动群众与被剥削群众底需要中产生出来，而尤其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办法之所以必要，应该为这些群众所觉察。

这里必须注意到：中国是小的和最小的商品经济底国家，在这种国家里，土地革命的结果，简单的商品经济（农民经济）底作用还更加增长起来，在这种国家里，就是在封建的土地占有权被革命消灭而利于农民基本群众以后（并且也在平分土地和国有土地以后），资本主义无疑义地也将表现出继续增长的一种趋势，在这种国家里由于生产力底程度低微，无产阶级底人数就比较稀少，——因此，革命转变底时期（以及日后社会主义建设底时期），较之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将要相对地延长些。

（三十二）将来土地反帝革命在中国有决断意义的区域内取得胜利并把这种革命彻底进行，这就会大大地巩固无产阶级底国家领导权并形成力量对比底一定变化而有利于无产阶级，只有这个时候，从工农两个阶级底专政，直接转到无产阶级专政，直接转到社会主义的革命阶段，才会成为党底中心任务。

尽量提高无产阶级（雇农亦在内）底组织性和自觉性，把贫农团结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底周围，巩固和加深与中农的密切联盟，在这种基础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内业已形成的苏维埃，将转变为无产阶级底专政机关。要预先指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道路，这是不可能的。

为非资本主义的——即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而斗争的一切阶段上，党与苏维埃政权底政策所应遵守的主要原则，应该是巩固工人阶级与贫农中农的联盟，同时要取得和巩固无产阶级在这个联盟中的领导作用，这在起初为的是使土地反帝革命得到胜利，而以后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底任务解决到什么程度以及在解决的过程中，为的是用有系统的说服、举例、经济上和组织上的帮助等等办法，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合作化和集体化），去改造农民的落后的个体经济，以便完全消灭资本主义并用社会主义的精神来重新教育农民。

在无产阶级与贫农中农密切联盟之下，以及在无产阶级已经得到胜利的一些国家底直接

帮助（这种帮助是中国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条件，是加速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的重要条件）之下，中国社会主义底胜利就会有保证。

（三十三）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指出：共产国际在资本主义各国的分部，直到现在，还远远没有执行自己的义务，还没有不顾牺牲地去援助中国苏维埃革命。因此共产国际主席团责成共产国际各分部，进行极广大的群众宣传运动，去拥护中国苏维埃，用所有的方法（在军队里组织革命的工作，这也是一种方法），进行斗争，去反对帝国主义者在财政上和军事上帮助中国的反革命，去力争撤退外国驻华的军队，去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干涉。

中国苏维埃底事业，就是整个国际无产阶级底事业。

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一）日本帝国主义驻满军队，于九月十八日晚，借辞南满铁路破坏的口实，紧急的以武力占领沈阳、营口、长春与南满安东两铁路线上的各重要城市，炮毁重要的要塞建筑、兵工厂及繁盛的街市，屠杀无数的中国兵士与劳苦群众。同时更在次一日占领吉林、延边、新民各地。并向青岛、天津、北京、葫芦岛、秦皇岛各地增兵。并委任沈阳及其他地方的行政长官，拆毁沈阳兵工厂，移动大队的驻鲜军队入满。而日本全国的军队，亦是在整个动员备战的状态之中。这严重的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殖民地政策之产物，是日本武装占领整个满洲及东蒙的企图的最露骨的表现，是将满洲更殖民地化，而作更积极的进攻苏联的军事根据地的实现。日本帝国主义所以能够而不得不采取这个政策的原因是：

1　剧烈的空前的世界经济危机，用极大的力量打击着日本帝国主义。日本的经济危机，猛烈发展着，浸及一切的生产部门与国内国外的贸易，广大的群众失业，无产阶级与劳苦群众的生活的极端恶化，并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群众斗争的日益紧张与革命化（失业斗争之严重，罢工斗争的开展，与朝鲜、台湾的骚动）。所有这些，促使日本帝国主义者不得不采用更急进的帝国主义政策，以巩固掠夺，加紧殖民地的剥削，加紧战争的准备，企图在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之中来找得经济危机的出路。

2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惊人的成功，五年计划的完成与超过，引起一切帝国主义者的愤懑与仇恨。因之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加倍地积极准备反苏联的战争。而最近五年计划的成功，使得苏联在西伯利亚东部的社会主义力量亦大大的增厚与巩固，这更加厉害地使日本帝国主义恐怖惊慌。尤其是苏联的存在给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与劳苦群众的一个最大的刺激，而成为他们革命斗争的大本营。在日本国内阶级斗争日益紧张的现在，不能不使日本的资产阶级更加坐立不安。远东海参威朝鲜银行支行的停业，日俄无区卢布贴现律的争执，驻日俄大使之被刺等等，都明显的表现日本帝国主义对苏联的政策的变化。目前日本的武人已经明白宣言，反苏联的必要准备是正在加紧进行，占领满洲一切军事战略上的要点自然亦是这进行中之一个主要步骤。

3　中国革命运动的开展，苏维埃和红军的巩固与发展，国民党军阀的进攻苏维埃的屡次溃败与复灭，反帝国主义运动的高涨与灾民斗争风起云涌；城市工人斗争的浓厚的反攻与进攻的成份，政治性质之日益显露，农民游击战争之发展，兵变潮流之勃起，以及北方农民群众的实现土地革命与建立苏维埃政权之最初的行动（红军二十四军的成立），国民党统治的经济的财政的危机及其部分的分崩，这些都使得帝国主义感觉得在中国的半殖民地奴役制度的危机，以及国民党没有力量压迫革命运动的勃发。因之更积极地进行组织公开的军事武装

干涉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与苏维埃运动。满洲的占领与武备的增加，是使日本帝国主义更能便利的调动大队的陆军来干涉北方及中部的游击战争与苏维埃运动。

4 而促进日本这个政策通行无阻的，不能不归功于国民党的无耻的投降帝国主义及出卖民族利益。国民党政府事前参预了日本武装占领满洲的计划，命令自己的军队无条件的缴械与投降，将千百万的劳动群众给日本帝国主义者蹂躏、虐杀、奸淫与剥削。而事变时亦只有空口的抗议，"镇静的" 外交，向强盗机关（国联）乞求，希望美国主持公道，或者在纪念周上大哭一次。而实际上更加紧对于群众的民族自觉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残酷压迫。国民党政府的投降帝国主义与无耻出卖民族利益，给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政策与武装占领作开路先锋。

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武装占领满蒙，是在上述的背景之上实行的。他的真实的意义，是以军事和武装的力量将中国屈服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奴役之下，巩固他们在满洲的统治，加倍地压榨剥削中国的劳苦群众，以找求本国经济恐慌的出路。并依据着满洲的战略上的各要点，准备反对苏联的进攻与帝国主义争夺市场和殖民地的强盗战争，准备直接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战争。所以满洲事变是瓜分中国为各个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的开始，是反苏联战争的序幕，是世界新的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初步。

(二)在世界经济恐慌剧烈发展与革命危机日益成熟的情势之下，在世界帝国主义者一致地疯狂地进行反苏联战争准备的情势之下，日本公开地以武装占领了满洲。日本利用着各个帝国主义反苏联战争的一致和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无暇东顾的机会，进行了满洲的武装占领。这个占领与军事行动是最露骨的反苏联战争的序幕。军事战略的重要各地之占领，日本军队向北满的推进，中东南段的强占与路员工人的屠杀，到处表露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反苏联挑衅的军事冒险。日本军事主要指挥者反苏联的狂言，英国帝国主义停止现金兑现的决议，德国总参谋部之活跃，这些都告诉我们实际反苏联战争已经准备妥当，东方战线战争的开始爆发将是极大的可能的前途。同时，我们必须估计：在世界经济恐慌与市场问题态度紧张的现象，在瓜分中国问题的周围，在发展巨大的帝国主义间的冲突与矛盾，首先是日英美法的斗争。所以帝国主义强盗间的强盗战争，在满洲问题周围爆发的危险一样地威胁着。现在全国无产阶级及劳苦群众身上放着伟大历史的任务：这一任务便是武装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反对日本的殖民地屠杀政策，用革命斗争的力量消灭反动的在帝国主义怀抱中献媚乞怜的国民党政府，实行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以求民族的与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沏底解放。

(三)满洲事变对于中国事变发展的前途，将给予决定的影响。日本帝国主义残酷的暴行，毫无疑义地将激起广大的劳苦群众的民族觉醒，在党的正确的领导之下，这个民族的觉醒能够很迅速地转变到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正在急剧高涨中的反帝运动的高潮，将以更大的力量向前开展。农民的饥荒与土地斗争的紧张，城市工人运动斗争进攻与政治性质之日益明显，敌人士兵群众情绪的动摇与不安，给苏维埃运动与红军的斗争以极大的顺利，造成了全国革命危机先决条件更进的成熟。这事变给予中国的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以新的重大的打击，群众的民族的觉醒与革命斗争的剧烈，北方军阀的巨魁张学良在军事上的、财政上的丧失，民族的武断宣传的破产，国民党政府对于帝国主义的投降、屈服与无耻的揭露，这些将更加促进国民党统治的崩溃与破产，及胜利的革命斗争的顺利的客观环境。正是这个客观环境，将使得国民党的各反革命派别企图在反对革命及苏维埃斗争的旗帜之下团结起来，

更加残酷的进攻苏维埃和红军（国民党告同志书上说明这是应付满洲事变的第一等的任务），压迫一切群众的革命斗争与反帝国主义运动，以博取帝国主义者的欢心，而维持自己行将没落的统治。然而由于帝国主义在华矛盾的紧张，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军阀内部的矛盾和冲突是不会消灭的，反而会更加紧张起来。虽然国民党民族武断的宣传的破产和它的投降帝国主义的面目在群众面前更进一步的揭露，但是，国民党必然要更利用民族主义及一切的武断宣传来阻滞群众运动的革命化。

（四）党在这次事变中的中心任务是：加紧的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地警醒民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他们到坚决无情的革命斗争上来。抓住广大群众对于国民党的失望与愤怒，而组织他们引导他们走向消灭国民党统治的斗争。抓住一切灾民、工人、兵士的具体的切身要求，发动他们的斗争走到直接的革命斗争。领导群众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力政策，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役和侵略，反对进攻苏联和苏区，拥护苏维埃，武装保卫苏联，反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而斗争。为着这些任务的实现，中央责成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以布尔塞维克的坚决性与无限的革命热忱来进行下列的工作：

1　进行广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的运动。丝毫地不要害怕群众的民族主义热忱，相反的必须加紧惊醒群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到反帝的斗争上去，同时坚决地反对一切国民党的武断宣传。向广大的群众指出：只有群众自己的力量能够战胜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求得民族的解放。只有苏维埃政权才是唯一的能够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权。估计着群众的仇恨和热忱，提出武装群众的口号；使这些武装群众团体变为游击队与工人自卫队。同时必须指出只有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府，才能真正地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使武装群众的口号很密切地与武装暴动口号的宣传密切的联系起来。

2　组织各色各种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公开组织，或者参加一切已经存在的反帝组织而夺取它们的领导。经过这些组织正确实行反帝运动中的下层统一战线，和吸收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阶层参加斗争。在各大城市中公开的出版群众的反帝日报，抓住国内重要工厂——尤其日本工厂进行组织反日的罢工、示威。同时各地党部团部也应该注意学生中的工作，使一部分贫苦学生群众离开民族主义武断宣传的影响而作坚决的革命斗争。

3　广大的进行武装保卫苏联的宣传鼓动工作，在苏区与非苏区之内组织“苏联之友”协会。积极地进行拥护红军苏维埃的工作，动员工人到红军中去，募捐援助红军，很广泛地把苏维埃政府的宣传以及全国苏区大会的各种法令草案散布到群众中去。

4　估计到在这次事变后士兵情绪的动摇和不满，这些士兵在经常军官的保国卫民的欺骗宣传之中，而一旦地身历了国民党的卑鄙无耻，反抗与愤懑的情绪是必然增涨的。党应该加紧士兵中的工作，各省委应该派大批的同志到白军中去发动他们的争斗，组织他们的游击战争。这是真正的武装拥护苏联及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方法之一。

5　在灾民斗争中（不论在城市与农村中的），必须加紧把他们与反对帝国主义斗争联系起来，经过反帝的口号及他们切身的要求来发动广大的灾民斗争，必须说明反帝国主义运动与土地革命的关系。不推翻地主的土地占有，不能根本的消灭帝国主义在乡村的支柱，不根本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土地革命胜利无从巩固。

6　特别在满洲更应该加紧的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北宁路中东路哈尔滨等），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紧在北满军队中的工作，组织它的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

7　必须估计行将来到的战时的地下党的困难的环境，各省委必须有专门的计划来改善党的秘密工作，使它能够在严重白色恐怖与战争状况之下来继续工作，这是应该看做目前的战斗任务之一。

附注：关于苏区党目前的任务，中央另有决议。

中国各地苏维埃政府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告全国民众书

全中国的工农兵及一切劳苦民众们！

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最近用武力占据东三省各重要城市与军事地点，用枪炮炸弹屠杀无辜的工农兵士群众，想把东三省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把东三省的劳苦群众完全变成它的奴隶，同时，更利用它现在已得的地位准备向建设着社会主义的苏联进攻，并且更进一步地准备第二次残酷的世界大战！

中国的劳苦民众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这种暴行的反抗与愤激，用罢工、罢课、罢操以至罢市的方法，坚决的同日本帝国主义做斗争，实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国民党的官僚军阀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这种进攻采取怎样的态度呢？“无抵抗”，“和平”，“镇静”，这就是他们的回答！当然，向来投降帝国主义勾结帝国主义压迫与屠杀中国民众的国民党、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不能有其他的态度。过去济南惨案，最近万宝山惨案、朝鲜惨案以及所谓青岛事件与中村事件，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真面目，不是为全国民众共睹的吗？什么“团结一致抗日救国”的把戏，国民党现在再不能欺骗我们了。国民党想拿一些空洞的民族主义宣传转移民众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视线，一定是徒劳无功的。全中国的民众在这一件事之后，将进一步的了解：要打倒帝国主义，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在华的走狗——中国国民党！！

能彻底反对帝国主义，为打倒帝国主义而争斗的，只有工农兵的苏维埃政府。中华苏维埃政府曾经一再表示了真正为了民族独立与自由而斗争的坚决性；主张否认一切帝国主义债款，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驱逐一切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没收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财产。我们苏维埃区域内帝国主义的剥削与压迫是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正因为这样，所以帝国主义与国民党才一次二次以至三次地调动数十万大兵去进攻苏区与红军，想用铁血把中国的革命运动镇压下去，使中国完全变成他们的殖民地！然而我们的工农红军在全中国民众的拥护之下，在苏区内广大民众的直接帮助之下，一次两次以至三次地打败了帝国主义国民党的进攻，使中国革命的浪潮更向前进。全中国的民众在中国红军伟大胜利之后，将更进一步地相信：只有工农兵苏维埃与工农红军，才能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

全中国的工农兵以及一切劳苦民众们！必须努力拥护自己的苏维埃政府，只有苏维埃政府是唯一的真正的民众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能争得民族独立与解放，能把地主阶级的土地给与贫苦农民，能将八小时工作制给与工人阶级，能用许多经济政策来保障民众生活的改良，以至走到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主义的社会。

全中国的工农兵及一切劳苦民众们！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我们自己的苏维埃政权；这是被压迫被剥削的中国劳苦民众的唯一出路。这种出路，苏联的工农已经指点给我们看了。在中国苏维埃区域内，数千万工农和红军兵士已经找着这个出路了，他

们正准备一切力量同你们联合在一起，共同取得全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完全胜利，把现在局部的、分散的苏维埃区域，变成为整个的伟大的苏维埃共和国！！

日本海陆空军立刻退出东三省！

赔偿中国民众所受的一切损失！

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

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滚出中国去！

没收帝国主义的一切财产！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投降帝国主义的中国国民党！

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

八小时工作制！

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武装拥护苏联！

反对世界第二次大战！

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区与红军！

拥护中国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苏维埃革命胜利万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万岁！

共产国际执委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中国东三省而斗争的号召

——摘自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共产国际执委为十月革命第十四周年纪念节宣言："告各国男工女工，告资本主义世界底劳动者和被压迫者宣言"——

……帝国主义者在找寻逃脱危机的出路当中，事实上已经在东方开始了战争。法帝国主义者，一方面白里安高谈和平的言论来迷醉群众，同时便赞美日本强占东三省的行动。受英法指使的国际联盟，在日内瓦排演着和平主义的把戏，既与日本密谋分赃，同时却向全世界声言，说在东三省"没有任何战争"，这样来进行瓜分中国。它想把中国变为在整个东方的军事抢劫的根据地，变为将来对苏联作战的许多根据地之一。美帝国主义很顽强地企图获得自己的一份赃物。帝国主义者走狗的国民党和蒋介石，为要博得帝国主义者的欢心，公然屠杀反日游行示威群众，国民党和蒋介石不能够、而且也不会去保护中国底独立。

强占东三省，这并不是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战争，这是对中国劳动群众和中国革命的战争，这是对我们的战争。

不要受人的欺骗以为还没有战争吧。

组织群众的革命回击来反对新帝国主义战争底祸首吧！

积极帮助你们的中国兄弟去反对日本的侵掠，反对国际联盟，反对卖国殃民的国民党，对蒋介石，以造成统一的独立的中国吧。

靠进攻苏联来逃出危机，乃是帝国主义者所最希望的道路……已经在中国开始的战争，便是更加向前作反苏联战争的一步。

中央委员会为目前时局告同志书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亲爱的同志们！

自从我们英勇的工农红军在中国千百万工农劳苦群众热烈的拥护之下，击破了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二次“围剿”以后，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与胜利，尤其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成立，工农劳苦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满洲，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的反帝浪潮的汹涌澎涨，再加以全中国工农运动灾民斗争与士兵斗争的开展，使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的统治日益动摇，使全中国的革命危机，日益成熟。

在帝国主义列强猛烈的向中国民众进攻的形势之下，国民党除了采取“镇静”“不抵抗”与“逆来顺受”的投降政策之外，更积极的把东三省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把全中国出卖给欧美列强，使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政策得到进一步的实现。而同时对于全中国反日的民众则协同帝国主义的军队与巡捕房采取了最残酷与压迫的屠杀政策，尤其在“一致对外”“北上抗日”等口号之下积极对于苏区根根地，尤其是鄂豫皖苏区的新的进攻，企图用最狠毒的白色恐怖的手段来消灭全中国正在急速发展的革命斗争。

然而这一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引起了全中国更广大的工农劳苦群众的反抗，国民党在全中国劳苦民众心目中的信仰急速的破产。最广大的工农学生士兵群众喊出了本党所提出的“罢工，罢课，罢操，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民众自动武装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的口号，使开始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的斗争，现在发展到直接反对国民党的斗争。

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的斗争，现在正在急速的开展出去！全中国革命的学生群众所开始的剧烈的反国民党的斗争，向国民党示威，同国民党军警冲突，以至捣毁国民党市党部机关，践踏孙中山照像等的斗争，将是引起全中国最广大的工农劳苦群众起来实行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直接行动的火焰，将是全中国革命形势的新的发展！

新的革命的浪潮是汹涌地滚向前来了。到革命战场上来的，将不只是数千数万的学生群众，而更将是千百万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为了自身的自由与解放而斗争的工人，农民，兵士，与一切劳苦的群众！

在这一革命的浪潮前面，帝国主义与国民党是如何的颤抖着呀！它们现在正在积极动员一切反动的力量准备把这一革命运动浸到血泊中去。上海各帝国主义的报纸，现在正在告诉国民党政府应该如何像过去段祺瑞一样，去残杀这些学生的“暴徒”。上海各租界现在都已宣布戒严，帝国主义军舰都已开始在黄浦江集中。帝国主义将无疑的利用直接的屠杀，来镇压这一蓬蓬勃勃的革命运动。

动摇崩溃着走向坟墓去的国民党，现在正在准备集中全中国所有的反动力量，协同帝国主义，一致的来对付民众。全中国的大资本家，买办，大商人，银行家，以及一切官僚，军

阀，大学教授之类，现在都齐集到南京、广东，协商如何在国难会议等名称之下联合一致来拯救垂危的国民党的统治。在空洞的，欺骗的表明“政府外交方针”的宣言与声明底下，真正进行着最残酷的流血惨剧。

而一切力量的反革命派别如像改组派，国家主义派，社会与教育派，新月人权派等，正在特别大卖气力，鼓吹“民主政治”“一致对外”等等武断宣传，要反对国民党的工农劳苦群众去“信仰国民党”，去“和平镇静”，去等待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残杀！好以此来维持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

亲爱的同志们！革命与反革命现在是正在动员所有的力量准备更激烈的更残酷的斗争。我们党目前主要任务，是在动员千百万工农劳苦群众在我们的领导之下，用民众的铁锤去打击这一崩溃着的，动摇着的反革命统治，取得中国革命在几个主要省份（湘鄂赣皖）的首先胜利。这任务已经不是将来革命发展的前途，而是目前所要实现的摆在议事日程上的斗争任务。一切我们工作的布置，就要拿这一任务的完成为中心。

在完成这一中心任务之下，我们要求全党同志更艰苦的深入到群众中去，用尽一切力量发动工人群众的罢工，兵士群众的罢操，农民与灾民的斗争与游击战争，以及广大的群众大会与示威游行。民众自动武装起来的口号必须立刻转变为争取武装与夺取武装的斗争。参加斗争的群众，必须普遍的组织起来，成立反帝反国民党的各民众团体的代表会议，来集中领导，必须努力的进行公开或半公开的组织，去领导广大的群众斗争，去执行党所决定的一切策略。

当全中国广大的工农学生群众，在两个多月痛苦的切身经验中，了解到本党口号的正确，要求新的出路时，我们必须最大胆的，最广泛的提出只有工农兵以及一切劳苦民众的代表会议（苏维埃）才能真正的去打倒帝国主义，去争取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才能去消减国民党所造成的中国民族的奇耻大辱，才是中国民众的真正出路。民众自动武装起来的口号，必须密切的与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武装暴动的宣传，发生联系，应该毫不迟疑地使广大民众团体的代表会议（如“上海群众反日救国联合会”）逐渐成为民众政权的雏形。

我们必须在这一斗争的开展上面，千百倍地加强我们关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和它的一切法令与决议的宣传鼓动。我们必须把苏维埃政府反帝国主义的纲领与一切它的根本主张，深入到广大的工农士兵群众中去。红军是工农的武装，是反帝国主义的战斗队，必须为全中国民众所明白了解。在这种了解上，去加紧拥护苏维埃与红军的工作，去反对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对于鄂豫皖苏区的新的进攻。

在群众直接反对国民党斗争中间，一切反革命的在野派别的欺骗宣传是革命中最危险的东西。我们的同志，必须要能够利用最明显的事实，揭露这些派别（主要的是改组派，国家主义派，新月人权派，社会与教育派，第三党，取消派）的欺骗，与它们维持地主资产阶级的整个统治的作用。在各种团体内，必须向在它们影响之下的群众进行忍耐的详细的解释工作，使这些群众脱离它们的领袖，而走到我们的领导之下来。

在赤色区域内，我们的党必须利用目前顺利的环境积极的向外发展。在坚决的执行国际路线之下，发动广大的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反富农的斗争，巩固苏维埃，扩广红军，把几个分离的苏区打成一片，并占领几个主要的与次要的中心城市。在目前形势之下，苏区内的全体同志必须最坚决的毫不畏惧的对于我们的敌人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在全中国广大的工农兵以及一切劳苦民众的斗争的拥护之下，争取革命在湘鄂赣等省的首先胜利！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是立在伟大的事变的前面。要完成在我们前面的伟

大的任务，争取革命在几省的首先胜利，全体同志必须坚决的站在国际与中央的领导之下，如一个人一样，去打击一切机会主义，尤其是对于目前形势估计不足与消极怠工的右倾机会主义，来发展与巩固我们布尔塞维克的党。全体同志必须坚苦卓绝地到群众中去，实现国际与中央所给与你们的一切指示。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创造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几个广大苏区内的胜利，我们将要创造中华苏维埃在几省内的胜利！

努力吧！胜利是我们的！

中央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

（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

“要取得民族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必须推翻国民党军阀的这一领导，把领导权拿在民众自己手里。

因此，我们主张：

（一）十九路军士兵立刻不顾一切长官的命令，追击日军到租界内，消灭日军的根据地，坚决反对‘退却’‘停战’，把上海交给任何帝国主义；

（二）民众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一切压迫，自动启封一切革命团体，大批的装装工人与一切劳苦群众，组织民众的义勇军与游击队，保护自己的革命组织，并参加前线作战；

（三）革命的士兵，立刻组织兵士委员会，直接接收与分配民众的捐款与慰劳品，监视与逮捕一切不抵抗的长官，并且加入民众的革命组织；

（四）武装的工人农民兵士，立刻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这一民族革命战争；

（五）革命军事委员会立刻没收一切日本帝国主义的银行、工厂、商店与交通工具，拿来作为民族革命战争的用途，并且以同样的办法对付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其他帝国主义的中国资本家；

（六）革命军事委员会立刻腾出一切公共房屋给失业工人与灾民居住，没收一切日本帝国主义的建筑交给工人灾民的组织；从大资本家大商人大批的征发粮食与衣被，分配给失业工人与灾民；没收一切帝国主义走狗与投机资本家的财产；立刻宣布八小时工作制与社会保险，改良失业工人的生活；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

（七）由革命军事委员会召集工农兵以及一切劳苦的民众的代表会议，把政权交给民众自己的政府。

我们以为只有这些具体办法的实现，才能把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拿在我们的手里，而不为国民党军阀所出卖。也只有这样，民族革命战争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

（原编者按：此文件未觅得全文，只有后一部分，文件标题是编者加的）

共产国际执委为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而斗争的号召

——摘自一九三二年五月一日共产国际执委一九三二年五一节宣言："告各国工人，告全体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书"——

……帝国主义战争已经成为事实。日本帝国主义，是亚洲的宪兵，它与欧洲宪兵法帝国主义极端紧密地勾结起来，得着帝国主义列强底默认，已经用武力强占了东三省和上海。许多城市乡村都被炸毁，杀死的饿死的工人农民、妇女儿童尸骨成堆，这就是反对中国工农的帝国主义战争底第一个总结。武力瓜分中国，使太平洋两大帝国主义强国——日美——底对抗形势更加紧张，刻不容缓地直接提出要用新的更可怕的世界大战来重新瓜分世界的问题。反对中国的战争，就是进攻苏联战争底序幕

帝国主义的强盗们，并且还想来侵犯他们所妒恨的那既没有危机也没有失业现象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欧美的资本家们，拿火车与轮船装载军械、炸药和毒气，送往日本，这不仅为的和中国作战，而且为的反对苏联。

……男工们，女工们！全世界的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们！表面上看起来，是没有宣布战争，但是日本帝国主义之进攻中国，已经成为事实。谁能使这个战争不变为世界帝国主义的大屠杀呢？是不是国际联盟呢？难道不是国际联盟赞美日本帝国主义抢劫中国么，难道不是自从开始存在时就援助一切最大帝国主义强国反对软弱而被压迫民族的国际联盟、赞美日本底行动么？难道不是国际联盟底筹备会议和裁军会议屡次否决了苏联底总裁军提案么？是不是第二国际呢？难道不是第二国际在一九一四年叛卖了你们么？难道不是第二国际在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大战时宣称这是最后一次战争么？不就是它的各支部经常在国会里面赞成军费案吗？不就是它援助了进攻摩洛哥、叙里亚、安南吗？不就是在它的协助下由飞机炸毁了印度整批的乡村吗？不就是第二国际卑鄙地造谣中伤，说什么赤色帝国主义而来准备了对苏联的战争吗？不就是这第二国际在战争已开始时还在宣称"不会再有战争"吗？

男工们，女工们！职员们，贫苦农民们！在这个历史关头，当苏联社会主义胜利已成事实的时候，当帝国主义对华战争已成事实的时候，当武装干涉社会主义国家的准备正在完结的时候，当革命浪潮日益高涨的时候，当推翻资本主义的胜利斗争底前途日益接近的时候，——在这个关头，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们，却与资产阶级一块来准备战争，想把你们变为炮灰，以便再来一次拯救资本主义。

在中国，腐化的国民党的狗党们，实行疯狂的残杀恐怖。国民党的刽子手，与帝国主义强盗勾结起来，实行向中国苏维埃区域作第四次的进攻，而每一次进攻，都被光荣的红军打退了。

拒绝向日本运输任何军械或军需，以反对日本抢劫中国的战争！用反战的群众发动来反对帝国主义底新的屠杀战争准备吧，来反对武装干涉苏联战争底准备吧！

工人，农民和兵士们！

大家都在五一节这一天来表示你们不屈不挠的斗争决心吧！

反对资本家的进攻！

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

保护全体劳动者底祖国苏联！

争取无产阶级专政！

争取世界革命底胜利！

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论中国

（一九三二年九月）

一 资本主义稳定底完结和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

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已经完结了。但是，在最重要的和有决定意义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还没有直接的革命形势。目前这个时机，正是过渡到各阶级间和各国间巨大冲突底新周期去的过渡关头，正是过渡到革命与战争底新周期去的过渡关头。(摘自“关于国际状况和共产国际各分部任务的提纲”)

* * *

国际关系中的相对稳定时期已经完结了。日本帝国主义在法国完全和公开帮助之下，以及在英国暗中帮助之下已经实行武力侵犯中国，这个武力侵犯，是帝国主义新战争底开端。因为世界经济危机底结果，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已经更加剧烈起来，这个剧烈斗争底表现，就是帝国主义制度底一切矛盾，都更加紧张。帝国主义营垒内的主要矛盾（英美矛盾）日益加强，美日冲突愈趋紧张，在凡尔塞制度底周围，德法斗争异常尖锐，波德关于但泽问题，关于东普鲁士问题的斗争非常加紧，意法帝国主义的斗争日形剧烈，因这一切事实而发生帝国主义列强力量底重新配合，——所有这些，将引起新军事冲突底爆发。国际联盟对于日本进攻中国所采取的态度，又一次地显然证明了：国际联盟是英法帝国主义用来进行战争和武装干涉的工具。美国之所以反对日本占领东三省，是为要达到自己的帝国主义目的："公平地"在远东重新划分势力范围。日内瓦会议、洛桑会议、鄂大瓦会议，并不能消灭帝国主义者中间的矛盾。

………………

日本帝国主义，在英法帮助之下，已经把东三省变成进攻苏联的根据地。(摘自“关于远东战争和共产党员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对武装干涉苏联的斗争中的任务问题决议案”)

* * *

日本占领东三省和进攻上海，已经把美日英以前关于规定在华势力范围的协定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与法国勾结和得到英国实际帮助之下，把东三省变为自己的殖民地，而把武装瓜分中国和武装干涉苏联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面。国际联盟根据法英底意旨，拥护日本帝国主义。美国抱着自己在远东的帝国主义目的，公开拿拼命扩充军备来威胁对方。太平洋矛盾底总和，便是新的世界帝国主义战争底主要来源。(摘自“关于国际状况和共产国际各分部任务的提纲”)

二　革命高潮底发展和中国共产党底当前任务

自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以来，革命高潮底增长，特别表现在以下各国：

在中国，群众反帝国主义斗争，日益高涨，苏维埃运动，日益扩大，英勇工农红军，获得伟大成绩。

………………

……在中国，已经有革命形势，而在很大一部分领土内，苏维埃革命已经获得胜利。(摘自"关于国际形势与共产国际各分部任务的提纲")

*　　　　*　　　　*

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热烈欢迎日本共产党为反对日本地主资产阶级所开始的帝国主义战争而进行的英勇斗争，热烈欢迎中国共产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一切帝国主义者而进行的革命斗争。

中国共产党今后也一定应该竭力保证无产阶级在白区民众反帝运动中的领导权。要达到这个目的，中国共产党应该执行下述各项任务：更加扩大和加深苏维埃运动，巩固中国苏维埃和红军，将苏维埃运动与白区群众反帝斗争联系起来，广泛地和一贯地在群众反帝斗争中，采用下层统一战线策略，组织群众，口号就是：进行民族革命解放战争，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者，推翻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以便争取中国底独立、统一和完整。(摘自"关于远东战争和共产党员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对武装干涉苏联的斗争中的任务问题决议案")

*　　　　*　　　　*

中国共产党有以下的特殊任务：

(一)在进行民族革命斗争的口号下，动员群众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他帝国主义者，争取中国底独立和统一；(二)发展和统一苏维埃区域，巩固红军；(三)进行斗争来推翻国民党政权；(四)坚决地实行把赤色工会变为群众组织和夺取国民党工会里的工人群众；(五)扩展游击运动，在东三省提出以下的口号：建立农民委员会，抵制捐税和政府命令，没收帝国主义者走狗底财产，组织选举的人民政权；(六)普遍宣传苏维埃区域底成绩和中国工农与苏联工农亲密联合的口号。(摘自"关于国际状况和共产国际各分部任务的提纲")

三　中国无产阶级底经济斗争

在无产阶级经济斗争方面，革命高潮增长底表现就是：群众的罢工运动发展起来（西班牙、中国、波兰、捷克斯拉夫、日本、法国、比利时、保加利亚、英国、印度、美国等等)，经济危机发展得最迟的国家内，无产阶级底新队伍也加入经济斗争（在比利时，有波里那时矿工罢工；在荷兰，有特维特纺织工人罢工；在瑞典，有阿大连制纸工人罢工；在瑞士，有苏黎支电气工人罢工)，不大的经济运动迅速地变为广大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罢工（布力克士、波里那时等等地方)，在罢工斗争和失业工人斗争中，各国共产党和革命职工运动底比重增加，新的工人积极分子发现出来，他们违抗和违反改良派职工官僚底意旨，英勇地作反对资本家进攻的斗争。……

革命高潮的增长，改良派工会危机底成熟，以及日益逼近的伟大革命战斗，正在造成一

切前提，以便认真地改善赤色工会底群众工作，以便巩固它们在组织和领导无产阶级经济斗争中的作用。

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指出，虽然赤色工会已经获得许多重大的成绩（在捷克斯拉夫、波兰、西班牙、日本），可是大多数赤色工会，还是没有善于利用群众因为反对资本家的进攻而表现出来的愤怒底增长和阶级斗争底加剧，来领导罢工斗争和失业工人运动。……

在中国，虽然革命工人运动有很大的发展，可是赤色工会底无产阶级经济斗争组织者和领导者作用，却曾经减弱过，只是在最近时期内，才重新提高起来。……

自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以来，有些大罢工运动底经验（如在布力克士、在波里那时，如瓦萨电车工人罢工，上海电话工人罢工，东京地道电车工人罢工，特维特纺织工人罢工等等）表示出：共产党和革命工会，在领导无产阶级底经济斗争方面，已经获得成绩，而这些成绩之所以获得，是因为党和革命工会在一切斗争阶段上，都一贯地采用了下层统一战线底策略，及时提出了为群众所感觉迫切的、为群众所了解的要求和口号，在广泛的无产阶级民主基础上组织了他们，吸收了一切斗争工人参加领导罢工，坚决地揭露了改良派职工官僚底手腕，揭露了一部分人对他们所采取的轻信和调和态度。

在具有群众法西斯蒂工会或类似的反动群众团体的国家内（意大利、中国），特别是在法西斯蒂工会占垄断地位的地方，共产党员应该积极地和有组织地在它们内部工作，利用一切公开的和半公开的机会，去吸收这些团体底会员群众参加阶级斗争，去在群众面前破坏这些团体的威信，巩固革命职工运动在群众里的势力。（摘自"关于经济罢工和失业工人斗争教训的决议案"）

四　中国与共产国际底各分部

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承认，各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里的共产党，在动员群众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对准备武装干涉这件事业当中，的确是已经获得许多很好的成绩，可是，全会认为：各帝国主义国家里的共产党，没有善于用革命行动，来妨碍向中国运输军队和向日本运输军火；没有善于唤起军事企业和运输业中的广大工人群众起来斗争；群众运动扩展得迟慢，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有同志对远东战争抱着机会主义的忽略观点，同时也是因为有同志对于战争问题抱着"左"倾定命主义的轻浮态度。

……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指出：各国共产党，没有善于解决以下的迫切任务：在企业内、铁路上、商埠中、轮船上建立依靠着群众的公开的、半公开的或秘密的监督委员会以及秘密的行动委员会；在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基础上，来动员那些加入改良派工会和其他工人群众组织中的广大工人群众，以便阻碍向中国运输军队和向日本运输军火；在农民群众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中扩展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对武装干涉的鼓动。对于那种轻视日本反对中国的战争的机会主义轻视态度；对于那种轻视帝国主义战争与武装干涉危险的机会主义观点，对于那种不了解现时暗中爬进新世界大战形势底一切特点的机会主义态度，对于那种离开列宁主义关于战争学说的个别和平主义倾向，对于那种消极对待战争问题的机会主义消极态度，对于那种认为革命自然会从战争里面自动发生出来的定命论的机会主义心理，都未给以充分的布尔塞维主义的回击。

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对武装干涉的斗争中，在反对法西斯主义，社会民主党，资产

阶级和平主义——它们用各不相同的方法来帮助帝国主义者准备和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及武装干涉苏联——的斗争中，各国共产党底共同任务，有下述各项：

……积极回答反苏联运动底一切表现，加紧在广大群众中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底成绩，动员群众反对白俄党人，普遍宣传苏联底和平政策，动员群众积极保护苏联、中国和中国苏维埃革命。

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认为，各国共产党最重要的任务，是要组织和领导工农以及全体劳动者底斗争，来保护中国和中国革命，来保护各国工人底祖国——苏联去反对日益逼近的武装干涉，保护资本主义各国底劳动者不致受到帝国主义新战争底危害。（摘自"关于远东战争和共产党员在反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对武装干涉苏联的斗争中的任务问题决议案"）

五　中国与第二国际底各政党

第二国际及其各政党底领袖们，在远东战争时期内，随着本国资产阶级底要求而再三改变自己的策略。在日本反对中国战争开始时，他们号召工人拥护国际联盟，而说国际联盟和凯洛格公约是和平底武器。当时，他们拥护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底政策，只批评别国帝国主义政府，宣布日本之侵犯中国，只是无关于欧美工人阶级利益的远方的殖民地的战争，劝导工人们向国际联盟及本国政府请愿，说这就是反对战争的斗争方法。他们或者完全不提到武装干涉苏联的危险，或者直接欺骗群众，说苏联并没有什么被他人武装干涉的危险。而同时第二国际底各政党，还努力加强反苏联的造谣中伤运动，企图削弱苏联和平政策对于劳动群众的影响，拼命帮助各帝国主义政府掩饰得不很高明的侵略政策，以及反对苏联所提出的完全裁军的提案。改良派工会对反对军事生产和反对给日本运输军火的斗争，曾实行怠工，反而说战争会消灭失业现象。与第二国际及黄色工会国际有联系的日本社会民主党，完全拥护了日本资产阶级底强盗战争，而认为这个战争是进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日本社会民主党底这种立场，便可以明白证明：全世界社会民主党在发生新帝国主义战争时，将会采取如何的立场。

以后，在群众压力之下，第二国际执行委员会在苏黎支通过了一个决议案，在表面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并主张保护苏联，而由主张武装干涉和拥护对苏联作反革命发动的立场，转变到表面上中立和口头上保护苏联的立场。可是在事实上，第二国际底各政党，仍旧继续着反苏联的造谣中伤运动，援助俄国孟塞维克武装干涉者，对工人反对军事生产和反对给日本运输军火的一切具体的行动，却实行怠工，继续散布和平主义的幻想，希图使群众离开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武装干涉的实际斗争，抵制在亚姆斯坦举行的反战代表大会，参加准备和组织帝国主义战争与武装干涉，而在每一个国家内拥护本国的资产阶级政府。

（摘录«关于远东战争和共产党员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对武装干涉苏联的斗争中的任务问题决议案»）

“九一八”事变的前前后后

万　峰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我国东北按照预定计划突然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制造了“九一八”事变。这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和远东进行侵略扩张的一个重大步骤，是他们所犯下的一次可耻的侵略罪行。

1931年9月18日夜里十点钟左右，盘据在我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守备队用炸药炸毁南满铁路长沈线上柳条沟（在沈阳北郊）一段路轨。接着日军就诬指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和“袭击”日本守备队，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立即命令日军向我沈阳附近的北大营和沈阳城进攻。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士兵在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下不战而退。日军纵火焚烧北大营，并占领迫击炮厂、火药厂和兵工厂。第二天拂晓时分，日军即攻占了沈阳城。日本军国主义强盗劫掠了沈阳兵工厂所存的八万多枝步枪和四千挺机关枪，还有二百多架飞机和一切军用器械及粮秣弹药。他们所到之处，烧杀掳掠，沈阳城内伏尸遍地，令人惨不忍睹。

在占领沈阳的同一天，日军还分别占领了辽宁省的南迄营口、复州，北至四平街，东至安东等十数座重要城镇，不数日内，除辽西一隅外，辽宁省的重要城市全部沦陷。而在吉林省境内的日军19日攻陷长春，21日占领省会吉林。前后不到一周的时间，辽宁和吉林两省便沦于日本军国主义铁蹄之下。11月下旬日本军国主义者又占领黑龙江省，第二年1月2日占领锦州。

日本军国主义用武力侵占我国东北以后，一面继续策划把侵略战争扩大到中国内地，一面抬出清朝逊帝溥仪于1932年3月9日制造了一个傀儡的“满洲国”。从此以后，敌伪猖狂，狐鼠横行，三千多万东北同胞惨遭涂炭，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刺刀之下过了十四年暗无天日的生活。

侵略计划蓄谋已久

日本军国主义始终隐瞒“九一八”事变的真相。但是，无数事实证明，“九一八”事变完全是日本军国主义蓄谋已久的一个侵略步骤。日本军国主义在它的发展初期就以侵略中国作为它的大陆扩张政策的主要目标。经过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特别是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魔爪伸进了我国东北。自此以后，日本军国主义只要有机可乘，就千方百计地扩大它的所谓“满蒙权益”，不住地叫嚣“满蒙”（指中国东北和东部内蒙古）是日本的“生命线”，亟欲吞并它。特别是在二十年代末期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空前巨大经济危机前后，受到危机严重影响的日本帝国主义就更想用加速和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来摆脱危机。1927年军阀巨头田中义一的内阁，一上台就打出“强硬外交”的旗号，公然要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在向日本天皇密奏的“奏折”中，田中陈述了日本侵华的基本方针：

"欲征服中国则必先征服满蒙，而欲征服世界就必须征服中国"。1931年8月，也就是在"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大将在师团长会议上训示说："军人干预政治是当然的，满蒙问题只有用武力解决。"与此同时，日本陆军发表军制改革案，包括增强飞机、战车等近代化装备及增兵朝鲜等重要事项，并改革关东军的配备，完成了武装侵略我国东北的战斗准备。

据原在伪满"协和会"担任"参与"的一个军国主义分子山口重次在1955年9月15日出版的《日本周报》上著文供述，关东军在决定了作战计划后秘密在驻沈部队内反复进行夜间偷袭演习。在9月18日夜里炸毁柳条沟一段铁路之前，日军曾派工兵进行测量，充分证明这一切都是日本军国主义者预先安排好的。

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日本军国主义者几乎是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用了仅仅一百多天的时间就占领了我东北全境，这是蒋介石"不抵抗政策"所造成的。1931年蒋介石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口号下，以所谓第三次"围剿"疯狂地向中国人民革命根据地进攻。他为了扑灭人民革命竟不惜"引狼入室"。1927年日本田中内阁上台时正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八天之后。而在这年的10月，蒋介石一度溜到日本，同田中搞了一次不可见人的政治交易。蒋介石回国后在上海接见记者时说："我们决不无视日本在东北的政治经济利益。"另据1940年出版的山浦贯一所著《森恪》一书的记述，当时蒋介石同田中和森恪（"东方会议"的主宰者、田中内阁的外务次官、积极策划侵华阴谋的政客）会见时，双方曾达成这样的"谅解"："日本承认由反共反苏的国民党统一中国，中国（蒋介石）则承认日本在东北的特殊地位。"正是因为这样，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进犯东北的活动已十分明显时，蒋介石不仅毫不作抵抗的准备，反而严禁张学良所部的东北军进行任何抵抗。1931年9月11日蒋介石通令东北军说："遇有日军寻衅，务须慎重避免冲突"。"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介石又命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缴械任其缴械，入占营房即听其侵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又要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

本来，"九一八"事变当时的形势是有利于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东北及全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暴行的怒火炽燃，斗志昂扬。"九一八"事变前夕，在关东军司令部指挥下的兵力，据战前日本军方宣布的数字是一万零四百人，加上预备役军人和警察部队充其量只有二万数千人。而当时中国东北四省的军队总计达二十多万人。若不是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东北决不会那样白白地断送给日本军国主义。

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助长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气焰，使它得寸进尺，又从东北侵入华北。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更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长达八年之久的全面侵华战争中，日本军国主义曾蹂躏了我们祖国的大半壁锦绣河山，在血腥的"三光"政策洗劫下，给中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极大的损失。只是由于全中国人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艰苦卓绝的长期抗战，加之苏联红军出兵东北的胜利，才在1945年彻底打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日本军国主义者从"九一八"开始的十五年间的侵华战争，终于以可耻的失败而告终。

日本人民反对侵略战争

日本侵华的滔天罪行，完全是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和日本垄断资本一手造成的。这同日本人民是毫不相干的。中国人民一向把日本军国主义同日本人民严格加以区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不但给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日本人民始终为反对日本军国主义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中国人民怀着感激和战友的情谊来回忆当年日本人民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的英勇活动，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人民就组成“对华不干涉同盟”（后发展为“日本反帝同盟”）从事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正义斗争。1931年3月在德国的日本革命家团体和“中国社会主义研究同盟”一道发表声明，高呼“日军立即撤出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而在“九一八”事变后第二年，日本人民的忠实儿子、日本共产党创始人片山潜同志和我国著名社会活动家宋庆龄一道参加了“国际反战委员会”。该委员会发表了声讨日本军国主义的檄文，历陈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揭露它制造“满洲独立”的侵略目的。后来，不顾法西斯的残酷压迫，许多优秀的日本共产主义战士、爱国志士和前线的反战士兵们，从牢房、从前线不断地发出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正义呼声。尽管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统治使得日本人民的这一斗争遭到无比的困难，然而日本人民发出的这一正义呼声，曾经多么有力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斗争！

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加紧复活

日本军国主义欠下中国人民的累累血债还没有清算，如今竟然又蠢蠢欲动，加紧复活。

在战后十六年的今天，我们看到当年的一群参加侵华罪恶活动的军国主义者又重新冠带登场。象前卖国首相战犯岸信介就曾在伪满担任过“产业部次长”，以“满洲五巨头”之一的角色同战犯东条英机一起残酷地奴役过我东北的人民。另一个前卖国首相吉田茂在田中内阁时就作过外务次官，曾积极推行田中的侵华方针。

目前，日本陆、海、空军已达二十五万人，拥有舰艇十万余吨，飞机一千三百多架。陆军的火力高达战前的四倍，机动能力为七倍。而且还在加紧扩军备战，准备进行核武装。现在日本的经济力量特别是作为军事潜力的工业，有了更大的发展，1960年日本工业生产高达战前（1934年至1937年平均）的三倍半。日本垄断资本集团正在推行野心勃勃的所谓“十年经济计划”，以进一步扩大军国主义经济基础。此外，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已逐步把整套统治机器重新掌握在自己手中，并步步加强法西斯统治。日本军国主义正在美帝国主义扶植下加紧复活，具有更大的危险性。

当年日本军国主义之所以那样肆无忌惮地发动“九一八”事变吞并我国东北，战后日本军国主义又野心勃勃地复活，都是同美帝国主义的怂恿或扶植分不开的。三十年代，美帝国主义在继续要求“门户开放”的口号下拼命向中国进行侵略扩张。为了减少竞争的阻力，它竟以中国东北为牺牲品来笼络日本。早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前，美国钢铁大王卡奈奇就在1929年派记者团到中国和日本，要蒋介石把东北卖给日本，企图以此减少美国渗入华中华南的阻力。“九一八”事变时，美帝国主义除鼓动蒋介石同日本妥协外，还同日本订立密约。事

变发生后，日本驻美大使和美国国务卿史汀生谈妥了一项以中国东北为牺牲的政治交易：美国应许“不与闻满洲事变”；日本应许美国在中国“什么事都好商量”。恰恰就是这个袒护日本军国主义通过“九一八”事变劫掠我东北的美帝国主义，战后十几年来从重新武装、以几十亿美元给日本垄断资本“输血”直到释放战犯和把吉田茂、岸信介、池田勇人之流的忠实代理人抬上政权宝座等等，对于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不遗余力。战后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得这样快，并且成为比战前更危险的军国主义，都是美帝国主义大力扶植的结果。这一切充分地说明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共同的敌人。（下略）

（原载《人民日报》，1961年9月17日）

〔附〕日本田中内阁侵略满蒙之积极政策
——田中奏议（节录）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原编者按：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垄断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图谋加紧侵略中国大陆的野心亦日甚一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形势，又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中国领土的妄想。大战以后，虽然因为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高涨和美帝国主义的争夺，使日本侵略我国的计划屡遭挫折；可是它最害怕中国人民的觉醒，又急欲强先美英一步在中国取得优势力量，并且在满蒙建立反苏基地。政友会的头目田中义一组阁后，就积极反对国内民政党等所主张的“对支贸易主义”政策，于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五日，由内阁总理兼外务大臣田中义一致函宫内大臣一木喜德，请代将对满蒙的积极政策秘奏天皇，这就是恶名昭著的“田中奏议”。

日本的军国主义者错误地认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田中奏议即是一个先从掌握满蒙开始，进而达到吞并全中国、独霸亚洲和征服世界的狂妄计划。他们企图以否认满蒙是我国领土的谬说，用各种恶毒手段操纵蒙古旧王公，利用朝鲜浪人和本国退伍军人的活动，采用强取权利、以权利培养贸易的方针，达到它灭亡全中国、奴役我全国人民的可耻目的。

从此以后，日本侵略者的魔爪便更加频繁的伸向我国，以致后来竟疯狂到发动“九一八”事变和芦沟桥事变那样的侵略战争。

奏　　章

内阁总理大臣田中义一引率群臣诚惶诚恐谨伏奏我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之件。

对满蒙之积极政策

所谓满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内外蒙古是也。广袤七万四千方里，人口二千八百万人，较我日本帝国国土（朝鲜及台湾除外）大逾三倍，其人口止有我国三分之一。不惟地广人稀，令人羡慕，农矿森林等物之丰，当世无其匹敌。我国因欲开拓其富源，以培养帝国恒久之荣华，特设南满洲铁道会社，借日、支共存共荣之美名，而投资于其地之铁道、海运、矿山、森林、钢铁、农业、畜产等业，达四亿四千余万元。此诚我国企业中最雄大之组织也。且名虽为半官半民，其实权无不操诸政府。若夫付满铁公司以外交、警察、及一般之政权，使其发挥帝国主义，形成特殊会社，无异朝鲜统监之第二。即可知我对满蒙之权利及特益巨且大矣。故历代内阁之施政于满蒙者，无不依明治大帝之遗训，扩展其规模，完成新大陆政策，以保皇祚无穷，国家昌盛。无如欧战以后，外交内治多有变化，东三省当局亦日就觉醒，起而步我后尘，谋建设其产业之隆盛，有得寸进尺之势。进展之迅速，实令人惊异。因而我国势力之侵入，遽受莫大影响，惹出数多不利，以致历代内阁对满蒙之交涉皆不能成功。益以华盛顿会议成立九国条约，我之满蒙特权及利益概被限制，不能自由行动；我国之存立，随亦感受动摇。此种难关，如不极力打开，则我国之存立即不能坚固，国力自无由发展矣。矧满蒙之利源，悉集于北满地方，我国如无自由进出机会，则满蒙富源，无由取为我有，自无待论；即日俄战争所得之南满利源，亦因九国条约而大受限制。因而我国人民不能源源而进，支那人民反如洪水流入，每年移往东三省者，势如万马奔腾，数约百万人左右。甚至威迫我满蒙之既得权，使我国每年剩余之八十万民，无处安身。此为我人口及食料之调节政策计，诚不胜遗憾者也。若再任支那人民流入满蒙，不急设法以制之，迄五年后支那人民，必将加增六百万人以上，斯时也，我对满蒙反增许多困难矣。回忆华盛顿会议九国条约成立以后，我对满蒙之进出悉被限制，举国上下舆论哗然。大正先帝陛下密召山县有朋，及其他重要陆海军等，妥议对于九国条约之打开策。当时命臣前往欧美密探欧美重要政治家之意见，佥谓成立九国条约，原系美国主动，其附和各国之内意则多赞成我国之势力增大于满蒙，以便保护国际之贸易及投资之利益。此乃臣义一亲自与英、法、意等国首领面商，颇可信彼等对我之诚意也。独惜我国乘彼等各国之内诺，正欲发展其计划而欲破除华盛顿九国条约之时，政友会内阁突然倒坏，致有心无力，不克实现我国之计划。言念及此，颇为痛叹。至臣义一向欧美各国密商发展满蒙之事，归经上海，在上海船埠，被支那人用炸弹暗杀未遂，误伤美国妇人。此乃我皇祖皇宗之神祐，义一方得身不受伤。不啻上天示意于义一，必须献身皇国为极东而开新局面，以兴新皇国而造新大陆。且东三省为东亚政治不完全之地，我日人为欲自保而保他人，必须以铁与血，方能拔除东亚之难局。然欲以铁血主义而保东三省，则第三国之亚美利加，必受支那以夷制夷煽动而制我。斯时也，我之对美角逐，势不容辞。更进而言之，以臣义一在上海船埠受支那人爆炸之时，转伤美人性命，而支那便安然无事，则东亚之将来如非以如此作去，我国运必无发展之希望。向之日俄战争，实际即日支之战。将来欲制支那，必以打倒美国势力为先决问题，与日俄战争之意，大同小异。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若夫华盛顿九国条约，纯为贸易商

战之精神。乃英、美富国欲以其富力，征服我日本在支那之势力。即军备缩小案亦不外英、美等国欲限制我国军力之盛大，使无征服广大支那领土之军备能力，而置支那富源于英、美富力吸收之下，无一非英、美打倒我日本之策略也。顾以民政党等徒以华盛顿九国条约为前提，盛唱对华贸易主义，而排斥对华权利主义，皆属矫角杀牛之陋策，是亦我日本自杀之政策。盖以贸易主义者，如英国因有强大之印度及澳洲为之供给食物及原料；亚美利加因有南美加拿大等可为伊供给养料及原料之便，则其余存之力，可一意扩张对支那贸易，以增其国富。无如我国之人口日增，从而食料及原料日减，如徒望贸易之发达，终必被雄大资力之英、美所打倒，我必终无所得。最可恐怕者，则支那人民日就醒觉，虽内乱正大之时，其支那民尚能精勤不息、模仿日货以自代。因此，颇阻我们贸易之进展。加之，我国商品专望支那人为顾客，将来支那统一，工业必随之而发达，欧美商品必然竞卖于支那市场，于是我国对支那贸易必大受打击。民政党所主张之顺应九国条约，以贸易主义向满蒙直进云云者，不啻自杀政策也。考我国之现势及将来，如欲造成昭和新政，必须以积极的对满蒙强取权利为主义，以权利而培养贸易，此不但可制支那工业之发达，亦可避欧势东渐之危险。策之优，计之善，莫过于此。我对满蒙之权利如可真实的到手，则以满蒙为根据，以贸易之假面具而风靡支那四百余州；再以满蒙之权利为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亚及欧罗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亚细亚大陆者，握执满蒙利权，乃其第一大关键也。况最后之胜利者赖粮食，工业之隆盛者赖原料也，国力之充实者赖广大之国土也。我对满蒙之利权，如以积极政策而扩张之，可以解决种种大国之要素者则勿论矣。而我年年余剩之七十万人口，亦可以同时解决矣。欲实现昭和新政，欲致我帝国永久之隆盛者，唯有积极的对满蒙利权主义之一点而已耳。

满蒙非支那领土

此所谓满蒙者，依历史非支那之领土，亦非支那特殊区域。我矢野博士尽力研究支那历史，无不以满蒙非支那之领土，此事已由帝国大学发表于世界矣。因我矢野博士之研究发表正当，故支那学者无反对我帝国大学之立说也。最不幸者，日俄战争之时，我国宣战布告明认满蒙为支那领土。又华盛顿议会时，九国条约亦认满蒙为支那领土，因之外交上不得不认为支那主权。因此二种之失算，致祸我帝国对满蒙之权益。如以支那之过去而论，民国成立虽倡五族共和，对于西藏、新疆、蒙古、满洲等，无不为特殊区域，又特准王公旧制存在，则其满蒙领土权，确在王公之手。我国此后有机会时，必须阐明其满蒙领土之真相于世界当道，待有机会时，以得寸进尺方法而进入内外蒙古；以成新大陆。且内外蒙既沿王公旧制，其权明明在王公手中，我如欲进出内外蒙，可以与蒙古王公为对手，缔结权利，便可有裕绰机会，而可增我国力于内外蒙古也。至对于南北满之权利，则以二十一条为基础，勇往迈进，另添如下之附带权利，以便保持我永久实享之权利。

一、三十年商租权期限满了后，更可自由更新其期限，并确认商工农等业之土地商租权。

二、日本人欲入东部内外蒙古居住、往来、及各种商工业等，皆可自由行动，及出入南北满时，支那法律须许其自由，不得不法科税或检查。

三、在奉天、吉林等十九个铁矿及石炭矿权，以及森林采取权获得之件。

四、南满及东部蒙古之铁道布设并铁道借款优先权。

五、政治、财政、军事顾问及教官增聘以及佣聘优先权。
六、朝鲜民取缔之警察驻在权。
七、吉长铁道之管理经营延长九十九年。
八、特产物专卖权及输送欧美贸易之优先权。
九、黑龙江矿产全权。
十、吉会、长大铁路敷设权。
十一、东清铁路欲向俄国收回时之借款提供特权。
十二、安东、营口之港权及运输联络权。
十三、东三省中央银行设立合办权。
十四、畜牧权。

对内外蒙古之积极政策

满蒙既为旧王公所有，我国将来之进出必须以旧王公为对手，方可以扶持其势力。依故福岛关东长官之长女，因献身于皇国起见，以金枝玉叶之质，而为未开化民族之图什叶图王府之顾问。加之图什叶图王之妃，乃肃亲王之侄女，因此关系，图什叶图王府与我国颇为接近。我特以意外之利益及保护而罗致之，在内外蒙古各王府等，无不以诚意对我敬我。现在图什叶图王府内之我国退伍军人，共有十九人在矣。而向王府收买土地及羊毛特买权或矿权，均被我先取定其特权矣。此外接派多数退伍军人密入其地，命其常服支那衣服，以避奉天政府嫌疑，散在王府管区之内，实行垦殖、畜牧、羊毛买收等权。按其他各王公，仍依对图什叶图王府方法而进入，到处安置我国退伍军人，以便操纵其旧王公。待我国民移往多数于内外满蒙之时，我土地所有权先用十把一束之贱价而买定之。然后将其可垦为水田者种植食米，以供我食料不足之用；不能垦为水田者则盛设牧场，养殖军马及牛畜，以充我军用及食用；余剩之额，制造罐头送贩欧美，其皮毛亦可供我不足之用。待时期一到，则内外蒙古均为我有。因乘其领土权未甚显明之时，且支那政府及赤俄尚未注意及此之候，我国预先密伏势力于其地，如其内外蒙古之土地，多数被我买有之时，斯时也，是蒙古人蒙古欤？抑或日本人之蒙古欤？使世人无可分辨。我则借国力以扶持我主权，而实行我积极政策。我国对于蒙古之施为，因欲实行如上之政策，由本年起由陆军秘密费项下，抽出一百万元以内，急派官佐四百名，化装为教师或支那人潜入内外蒙古，与各旧王公实行握手，收束其地之牧畜、矿山等权，为国家而造成百年大计。

朝鲜移民奖励及保护政策

朝鲜自与我合并以来虽可一时小康，无如欧战后，美大总统提出民族自决，以动弱小民族，而朝鲜人心亦为所煽，其不稳空气充满吉林八道。乘满洲警察之不完全，彼等不逞鲜民遂以满洲为策源地。又幸满蒙到处皆有丰富利源，以安朝鲜移民，因之日移日众，至今日在东三省之朝鲜民，几至百万有奇。如此之现象，为帝国对满蒙之利权，不求而可自得，真可为国家造成莫大幸福。而帝国对满蒙之国防上经济上，添加无数势力，为鲜民统治上，显出莫大曙光。然朝鲜民移住东三省之众，可为吾国民而开拓满蒙处女地，以便吾国民进取；

且亦可借朝鲜民为阶段，而可与支那民联络一切。一面利用有归化支那籍之鲜民，盛为收买满蒙水田，而另由各地之信用合作或银行，或东拓会社，或满铁公司，通融彼等有支那籍之朝鲜民以资金，而作我经济侵入之司令塔也；亦可作我食料之增产以救国危。是亦新殖民地开拓之一机会。彼归化之朝鲜人民，虽为支那之归化民；不久仍然复归为我国民。与南美加洲之归化日本人，悉异其旨也。彼等不过只因一时之便宜而归化为支那民耳。按在满蒙之朝鲜人，如扩张至二百五十万人以上者，待有事之秋，则以朝鲜民为原子，而作军事活动。更借取缔为名，而援助其行动。加之鲜民中之在满蒙者，已有归化者，亦有未归化者。斯时事到之日，是支那籍之朝鲜民作乱，抑日本籍之朝鲜民作乱，无论谁何，亦难详辨。然我国虽可利用朝鲜人如此之行动，亦不可不备支那政府之利用朝鲜人制我也。如论满蒙系支那之政治区域，是亦我国之政治区域，彼东省政府如敢以利用朝鲜人而制我，则我用兵之机会可以急速矣。最可恐惧唯赤俄耳。唯恐支那方面利用赤俄魔手煽动朝鲜民之时，则我国之思想一变，国难立至。现内阁对此尚无充分警戒以防其未然。加之我国如欲开拓新大陆，对朝鲜民之保护及取缔更须严重一层，故依三矢之条约，许我遍设警察署于北满各地者，以为扩充警察力，以便怀柔朝鲜民及援助朝鲜民之急进。另以东拓及满铁附随其后，助鲜民之经济及金融。他如进入内外蒙之鲜民，其金融可由东拓特别通融，以便借朝鲜民之力，而开拓内外蒙古，及把握其商权也。按朝鲜民之侵入满蒙，为帝国之国防上经济上最有密切之关系明矣。此后必须由政府极力助其完成，以期为帝国造成新机会。有如我石井之协定，我帝国在满蒙之特殊地位，既于华盛顿会议时放弃，幸得朝鲜民移往日多，现几及百万余人，且投资日大，因此我虽放弃石井协定之特权，亦可借朝鲜民移住之新问题，而恢复其特权于满蒙。如有如此之实情，我再恢复其特权，依法理上在国际必无人敢反对我国之行动也。（下略）

（原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帝国主义侵华文件选辑》）

〔附〕中日上海停战协定

（一九三二年五月五日）

原编者按："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在蒋介石政权的"不抵抗主义"和"国际联盟"的妥协纵容下，毫无顾忌地不断制造新事件。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又借口僧人被殴等事件进攻上海，为它殖民地化中国扩大新基地。

这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人民抗日运动十分高涨。国民党驻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在当地的工人、学生、市民抗日运动的影响下，当日军节节进逼时被迫抗战。战斗经过了一个多月，结果因为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出卖而失败。

以英、美为代表的各帝国主义国家，既不满意日军威胁到它们在华中、华南的利益，又不愿意得罪日本这样一个东方的反苏反共警犬。英、美、法、意、德五国公使，曾于二月二日照会中、日两国，提议中、日两国军队都退出上海，划上海为所谓国际共管的"中立区"。

但日军仍不断增兵淞沪，拒绝这项提议。于是各帝国主义又向日本让步，三月四日通过“国联行政院”决议，要求中、日两国在第三国协助下“停止敌对行为”。眼见中国人民的抗日运动高涨不已，日本军国主义和中国的反动势力都不免有所恐惧。因此，南京反动政府与日本便于五月五日签订了一项上海停战协定，规定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地区中国无驻兵权，承认上海为非武装区域，而日本则可以在许多地区驻扎若干部队。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暂时的停战，只不过是给日本一个回旋余地，使它有时间从容地准备再一次大规模的进犯。

第一条 中国及日本当局，既经下令停战，兹双方协定，自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五月五日起，确定停战。双方军队尽其力之所及，在上海周围，停止一切及各种敌对行为。关于停战情形，遇有疑问发生时，由与会友邦代表查明之。

第二条 中国军队，在本协定所涉及区域内之常态恢复，未经决定办法以前，留驻其现在地位。此项地位，在本协定附件第一号内列明之。

第三条 日本军队撤退至公共租界暨虹口方面之越界筑路，一如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事变之前。但鉴于须待容纳之日本军队人数，有若干部队，可暂时驻扎于上述区域之毗连地方。此项地方，在本协定附件第二号内列明之。

第四条 为证明双方之撤退起见，设立共同委员会，列入与会友邦代表为委员。该委员会并协助布置撤退之日本军队与接管之中国警察间移交事宜，以便日本军队撤退时，中国警察立即接管。该委员会之组织及其办事程序，在本协定附件第三号内列明之。

第五条 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发生效力。本协定用中、日、英三国文字缮成，如意义上发生疑义时，或中、日、英三文间发生有不同意义时，应以英文本为准。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五月五日订于上海

外交次长　郭泰祺
陆军中将　戴　戟
陆军中将　黄　强
陆军中将　植田谦吉
特命全权公使　重光葵
海军少将　岛田繁太郎
陆军少将　田代皖一郎

见证人：依据国际联合会大会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三月四日决议案协助谈判之友邦代表

驻华英国公使　蓝普森
驻华美国公使　詹　森
驻华法国公使　韦礼德
驻华义国代办使事伯爵　齐亚诺

附件第一号

本协定第二条所规定之中国军队地位如下：

查照附连上海区邮政地图（比例尺十五万分之一）由安亭镇正南，苏州河岸之一点起，向北沿安亭镇东最近小滨之西岸至望仙桥，由此北过小滨至沙头东四基罗米突之一点，再由

此向西北至扬子江岸边之浒浦口，并包括浒浦口在内。

关于此项地位，遇有疑问发生时，经共同委员会之请求，由该会委员之与会友邦代表查明之。

附件第二号

本协定第三条所规定之地方如下：此项地方在附连四地图各别标志为甲、乙、丙、丁并称为一、二、三、四各地段。

地段(一)见甲图　双方订明：一、吴淞镇不在此地段之内；二、日方不干涉淞沪铁路暨该路工厂之运用。

地段(二)见乙图　双方订明：万国体育场东北约一英里许之上海公墓，不在日本军队使用地段之内。

地段(三)见丙图　双方订明：曹家寨及三友织布厂，不在此地段之内。

地段(四)见丁图　双方订明：使用地段，包括日本人公墓及东面通至该墓之路在内。

关于此项地方，遇有疑问发生时，经共同委员会之请求，由该会委员之与会友邦代表查明之。

日本军队向上列地方之撤退，于本协约生效后一星期内开始，并于开始撤退起，四星期内撤完。

依照第四条所设之共同委员会，对于撤退时不能移去之残疾病人或受伤牲畜，采取必要办法，以资照料，并办理其日后之撤退事宜。此项人畜，连同必需之送药人员，得遗留原地，由中国当局给予保护。

附件第三号

共同委员会以委员十二人组成之。中国及日本两政府暨依据国际联合会大会三月四日决议案，协助谈判之与会友邦代表即英、美、法、义各驻华外交代表，各派文武官吏代表各一人为委员。该会委员依照委员会之决定，得随时任用认为必要数之助理员，所有关于程序事宜，由委员会斟酌办理。该委员会之决定以过半数行之。主席有投票取决权。主席由委员会内与会友邦代表委员中选举之。

委员会依照其决定，以其认为最善之方法，监视本协定第一、第二、第三各条之履行；并对于履行上述各条之规定，有任何疏解时，有促使注意之权。

（原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帝国主义侵华文件选辑》）

〔附〕塘沽协定

（一九三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原编者按：日本乘蒋介石继续进行反共内战的时机，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三日杀

进山海关，二月底占领热河，三月又大举进攻长城各口。这时，国民党二十九军及防守长城沿线的军队，曾违反蒋介石的意志自动抵抗，而蒋介石却坚持他“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竟下令“侈言抗日者杀无赦”，使抗日军队都不能抗战或不敢抗战。不久，日军就经过冷口、滦东等要隘逼进平津。

蒋介石和汪精卫刚刚在庐山开过会议（商讨华北停战问题），五月二十八日就联名发出“救国必先剿共”的通电。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长黄郛又遵照蒋汪指示，命熊斌于同月三十一日和日方代表冈村宁次签订“停战协定”于塘沽。

根据这一协定，国民党政府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占有东北三省及热河省，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的地区，并且把整个华北都放置在日军监视之下，为日本进一步控制华北、策动华北“特殊化”准备条件。

这一协定的签订，引起了当时全国舆论很大的不满，连大公报社论（六月一日）也说这样的协定是“败辱的屈服”。然而协定签字后，汪精卫（行政院长）立刻从庐山返回南京发表书面谈话，诡辩这次停战谈判仅限于军事，而不牵涉政治问题。并且说：“人谓昔日以不抵抗而失地，今以抵抗而失地，此言诚然。”从这些事实里，可以看见当时蒋、汪合作对日妥协的一般。

一、停战协定

关东军司令官元帅武藤信义，于昭和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在密云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所派军使该分会参谋徐燕谋，正式接受停战提议。依此关东军司令官元帅武藤信义，关于停战协定委任全权于该军代表关东军参谋副长陆军少将冈村宁次，在塘沽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所委任停战全权华北中国军代表北平分会总参议陆军中将熊斌，缔结下列之停战协定：

(一)中国军即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之地区，尔后不越该线而前进，又不行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二)日本军为确认第一项之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以行视察，中国方面对之应加保护及与以各种便利。

(三)日本军如确认第一项所示规定，中国军业已遵守时，即不再越该线追击。且自动归还于长城之线。

(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域内之治安维持，以中国警察机关任之。右述警察机关，不可用刺戟日本感情之武力团体。

(五)本协定盖印之后发生效力，以此为证据，两代表应行记名盖印。

中国民国二十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昭和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参谋副长　冈村宁次

中国北平分会总参议　熊　斌

二、觉书

万一撤兵地域，有妨碍治安之武力团体发生，而以警察力不能镇压之时，双方协议之后，再行处置。

昭和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关东军代表　　冈村宁次　印
中国军代表　　熊　　斌　印

（原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帝国主义侵华文件选辑》）

〔附〕日本天羽“四一七”声明

（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七日）

原编者按：日本既已退出了国际联盟，英、美等西方帝国主义又不甘心日本抢走它们在中国已经到手的权利。它们当时固然都没有决心直接对付日本，但是总可以扶植中国统治集团中的英美派去抵制日本的。因此，国联就有国际与中国技术合作委员会的组成，美国对蒋介石政权乃有五千万美元棉麦借款的成立，并且出售飞机给中国，派罗杰士（教授）到中国调查银价，中国的宋子文、孔祥熙（美国买办）则积极计划组织新的银公司。这些情形使日本感到不能坐待，遂由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出面，发表一纸排挤他国（主要指英、美）在华势力、关闭中国门户、视中国为其独占保护国的狂妄声明。这一声明，不但又一次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和世界舆论对日本的谴责，而且促进了英、美对中、日问题意见的日见接近。

关于中国问题，日本之立场及主张，容有与列国不一致者，而日本为达成在东亚之使命实行其责任，实处于不得不尽其全力之立场。日本前此迫不得已，退出国联，即因对于日本在东亚地位与国联见解不同所致。而日本对中国之态度，亦有不必与各国一致者。此由于日本在东亚之地位使命，不得不然。日本对于各国无时不努力于维持增进友好关系，固不待言。惟维持东亚和平及秩序，在日本责任上单独行之，乃当然之归结，而遂行此事，乃日本之使命，日本具有决行之决意，然而实行此项使命，日本不得不与中国共同分担维持东亚和平之责，中国以外，固无分担责任之人。是以中国之保全统一，以及恢复国内秩序，即自东亚和平见地上观之，亦日本所最切望者也。而中国之保全统一并秩序之恢复，要俟中国自身之自觉与努力，此为已往历史所明示，现在及将来，亦复如是。从此种见地观之，中国如果利用他国排斥日本，或竟用违反东亚和平之手段，或用以夷制夷之对外政策，在日本不得已惟有加以排击。再如各国方面，如因顾虑由满洲事变、上海事变所造成之局面，而欲对华采取共同动作，纵令其名目为财政的援助或技术的援助，要之，其在中国必然的含有政治意味。此种形势，必将进而启划定势力范围并国际共管及瓜分之端绪，此不仅造成中国之大不幸，亦且于东亚之保全，推而至于日本本身，亦有发生重大结果之虞。是以日本在主义上，乃不得不加以反对。如各国各自与中国在经济贸易上，有所交涉，事实上虽成为对华援助，以不碍及维持东亚和平为限，无干涉之必要。倘至扰乱东亚和平，则不得不加反对，例如最近各国，

向中国售卖军用飞机，教授飞行术，派遣军事教练官、军事顾问等及供以政治借款，其结局显系离间中日及他国间之关系，并造成违反维持东亚和平之结果，日本亦不得不反对。此种方针，实为日本向来方针当然之演绎。因最近外国方借共同动作以援助一类之种种名义，在华积极活动，故于此际表明我立场，要不为无谓也。

（原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帝国主义侵华文件选辑》）

〔附〕美国史汀生“不承认主义”对中日两国照会

（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

原编者按：一九二九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得美国和欧洲列强都把全力放在内部事务上，日本便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乘机发动了劫掠中国的东北事件。美国当时在远东还没有足够的力量能够控制中国和对付日本，因而在九月二十五日致中日两国通牒，“劝告”中日双方停止敌对行为。这实际上只是要日本适可而止，不再南攻锦州，而去北击苏联，借以保持美国在华北的既得利益。日本没有理睬美国的“劝告”，反而利用时机，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二日进占了锦州。美国国务卿史汀生这时才颇感惊诧，不得已于同月七日向中日两国发出“不承认主义”的照会。其实这也并不是真心反对日本占据我国东北。在史汀生发表照会的第二天，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另一个补充宣言里，便无意中道破了这个秘密：“（一）美国丝毫无意干涉日本在满洲合法条约之权利。（二）美国不拟过问任何解决事件之方法，惟此项方法不得破坏美国在中国之权利。”

最近锦州方面之军事行动，业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以前中华民国政府在南满最后存留之行政权威，破坏无遗。美国政府仍深信国联会行政院近日所派之中立调查团，必能使中、日两国间现时困难，终得解决。但美国政府鉴于目前情势，及其自身之权利与义务，认为有对中、日两政府作下列通知之义务：即美国政府不能承认任何事实上之情势为合法；凡中、日两国政府或其代表所订立之任何条约或协定，足以损及美国或其人民在华条约上之权利，或损及中国主权独立或领土及行政之完整，或违反国际上关于中国之政策，即通常所谓门户开放政策者，美国政府均无意承认。又凡以违反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七日中、日、美三国均为缔约国之巴黎公约之方法，而造成之情势或缔结之条约或协定，美国政府亦无意承认。

（原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帝国主义侵华文件选辑》）

〔附〕"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坚持对日妥协退让坚持消灭革命力量的反动言论摘录

（一九三一——一九三四年）

一、蒋介石认为中国的敌人不是日本帝国主义而是中国共产党，所以要加紧反共反人民

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为功。盖主战固须先求国内之统一，即主和亦非求国内之统一，决不能言和。是以不能战，固不能言和，而不统一，更不能言和与言战也。吾国当此内忧外患之来，军事与外交之当局所恃者，惟有耿耿之一片爱国之赤忱，竭其愚忠，尽其职责，至于成败利钝，非所逆睹；毁誉荣辱，更非所计。必须政府与国民信任之专，共同一致，为国后盾。不求急功于一时，而策成效于来兹。

（原载《外交为无形之战争》——蒋介石1931年11月30日在外长顾维钧举行宣誓就职时讲演）

现在我们国家正是内忧外患相逼之时，一方面国内有狂暴的土匪，天天拼命的杀人放火；一方面国外有日本帝国主义，天天向我们猛烈地侵略。日寇敢来侵略我们的土地，甚至公然要来灭亡我们整个国家，就是因为我们国内有土匪扰乱，不能统一。帝国主义一向是幸灾乐祸兼弱攻昧取乱侮亡的，所以我们由内乱而招致外侮，是必然的；反转来说，只要能够正本清源，先将这个心腹之患彻底消除，那末外面皮肤小病，一定不成问题，现在剿匪就是要来治疗心腹之患。只要剿匪成功，攘外就有把握。再就我们主观的战略来看，现在我们国内没有安定统一，并且有土匪拼命的捣乱，若是在这种情形之下，来谋攘外，那我们就是处于腹背受敌内外夹攻的境地了。各位官长都知道，无论我们有怎么强大的武力，也不论是大战小战，若是遭到腹背受敌内外夹攻，前后方都告危急，那是没有不失败的。所以我们如果不先安内而要求攘外，在战略上理论上说，都是居于必败之地，决不能希望胜利，何能达到我们救国的目的，不仅是不能救国，而且适足以速国家之亡。总之我们就客观的情形与主观的战略看来，今日救国的途径，只有照着古人"攘外必先安内"这句话来力行；我们必须先把后方与内部安定起来，然后攘外才有办法，才不致处于内外夹攻的危急。

（原载《革命军的责任是安内与攘外》——蒋介石1933年5月8日在崇仁总指挥部对中路军官长讲话）

我们应当坚确认定革命军当前的责任，第一个乃是剿匪来安内，第二个才是抗日来攘外。要晓得剿匪的工作，实是抗日的前提，要抗日就先要剿匪，能剿匪就一定能够抗日。大家总要记住我们革命的生死成败，我们国家的绝续兴亡，在目前完全系于剿匪，剿匪如果失败，那就一切都要失败，都不可挽救，你想匪都剿不了，那里还能抗日，这不是自欺欺人之谈吗。

我们既明白攘外必先安内的道理，那就不可徒慕抗日的虚名，以为剿匪没有荣誉，没有功绩，亦没有人知道；要晓得剿匪一旦成功，主义就可实现，这样我们革命军人才可以得到历史上最大的光荣，也才可以求得国家民族永远的生存。进一步来说，即使剿匪真是得不到什么勋名，而我们革命军人亦必须认识自己的责任；只要剿匪是为国家民族打开生路之惟一要图，是革命现状最迫切的要求，那么我们就只有勇往直前的来拼。

（同　上）

这回围剿的成败，是国家生存死亡的关键，剿匪成功则可按照总理的主义与计划，实行建设事业，国家前途也有无限希望，万一这次剿匪仍无效果，则中国必将趋于灭亡之途，在外患日迫，帝国主义严重压迫之下，中国内部，若是仍无办法整理，则中国必不能继续苟延存在，并且现实的匪区，是中国中心区域，中心区域的匪患，真是国家心腹之患，此时如果不能立即肃清，中国就决不能复兴，惟有灭亡而已。……这回剿匪的成效如何？不只是关系我们革命事业的成败，实在是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因为长江一带，是中国的精华所萃，现在的匪区就是中国的中枢，各省在这些区域内尚且不能肃清匪患，则中国其他一切的问题，自然就都谈不到，国家决不会有苟安存在的余地。

（原载《剿匪的成效如何是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蒋介石
1932年6月22日对豫鄂皖湘赣军政长官讲演）

我们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东三省热河失掉了，自然在号称统一的政府之下失掉，我们应该要负责任，不过我们站在革命的立场说，却没有多大关系，无论是政治方面，军事方面，在东三省与热河，过去都没有在革命势力之下统治着，革命的主义不能在东北宣传；照这样说，这回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和热河，我们是不能负责的。

所以我们要以专心一志剿匪，要为国家定长治久安的大计，为革命立根深蒂固的基础，皆不能不消灭这个心腹之患，如果在这个时候，只是好高骛远，侈言抗日，而不实事求是，除灭匪患，那就是投机取巧，……无论外面怎样批评谤毁，我们总是以先清内匪为唯一要务，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本末颠倒，先后倒置。

（原载《剿匪的理论与实际》——蒋介石
在1933年4月7日对剿共军高级将领训词）

中正来赣督剿，实本有匪无我，有我无匪之决心，凡我剿匪将领，嗣后若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决心剿匪者，当视为贪生怕死之辈，立斩无赦。

（蒋介石1933年4月10日在南昌国民党省党部对各将领的训话）

二、蒋介石认为日本只要三天就能灭亡中国，所以绝对不能抵抗

如果我们以现在所有的部队，统统加到长城一带阵线上去求决战，这一战决下来，当然是我们失败！因为现在时代，无论如何，他（按指日本）的武器比我们精良，技术比我们高明，我们在最短期间，是无法补救这两个重大的缺点的。还有，我们如果象现在这样军情要来和他作一次歼灭战，那么，一仗打下来之后，我们后面，再没有部队可来增补，决不能作继续不断的长期抵抗！我们全国的战斗力，既经被这决战完全消灭之后，那就无法来作长期抵

抗。那么，敌人不仅是要占领平津，势且长驱直入，凡铁道线所通的与他们骑兵所能到的任何地方，凡是我们国家政治经济交通的重要地区，都要被他们占领封锁，他只要配备相当的兵力，就可来控制我们全国，那时，我们整个的国家生命，就要灭亡。

（原载《国家兴亡责在军人》——蒋介石1933年4月12日在南昌总部讲演）

我们抵抗敌人的条件，有没有完备呢？我们自己可以很简单很沉痛的答复一句话：一点也没有！不仅是物质上和实力上没有具备，就是在我们思想上精神上，也没有统一；我可以断言：现在如果我们和日本打仗，一定有些恣睢灭裂的反动派来乘机捣乱。只拿这一点来讲，已够制我们的死命了。不待敌人来打我们，我们国内就要内乱，如此，我们还有什么方法来抵抗敌人？有什么方法可以复兴民族？有什么方法可以使得我们的子孙能够继续繁荣生存在我们祖宗五千年遗留下来的这块土地上呢？所以照军事的观点看来，我们现在真是没有立国的资格，不配称为现代国家！当然抵抗不了日本，当然要给敌人来压迫，欺侮！

（原载《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蒋介石1934年7月对庐山军官训练团精神训话）

前年我在"一二八"以前，曾发表一篇文章，引总理的话，告诉我们中国一般国民说：全国同胞要知道，如果我们中国没有得到时机，贸然和日本开战，日本可在十天之内完全占领我们中国一切重要地区，就可以灭亡我们中国。……何以说日本十天之内可以灭亡我们中国呢？因为我们中国没有现代作战的条件，不够和现代国家的军队作战，如果不待时而动，贸然作战，那只有败亡而已；不仅是十天之内，三天之内他就可以把我们中国所有沿江沿海的地方都占领起来；无论那一个地方，西边不仅是到重庆而且可以到成都，南边不仅是到广东，而且可以到梧州邕宁；他的潜势力早已准备充足，而且他的兵舰早已遍布各地，不仅是沿江沿海的地方他随时可以占领；无论那一个地方都可占领；也不仅是东四省已正式被他占领，就是我们的华北，事实上也早已在他控制之下，凡我们华北所有的铁路线和所有交通便利形势险要的地方，他都早有军事的布置，随时都可占领的。比方讲现在胶济路的情形，他虽然表面上没有派兵占领的，但是沿胶济路所有的日本工人商人，全是他们的退伍军人，天津、汉口等重要商埠以及察哈尔，张家口各处，所有的日本人，全是他没有穿军服的官兵；所以依现在的情形来看，他只要发一个号令，真是只要三天之内，就完全可以把我们中国要害之区都占领下来，灭亡我们中国！

（同　上）

我们中国的重要地方，虽然他没有派遣穿军服的军队来正式占领，然而事实上他已经不断的增派便衣队，在那里一步步的准备了。

不仅是在北平天津济南青岛广州汉口上海有租界的地方，或通商口岸公然为他军事侵略策源地，完全给他们没有穿军服的军队，无形占领；须知凡是他兵舰所到的，领事馆所在的地方，也统统被他们无形的占领了，无论什么地方，统统有随时可以正式占领的准备。我们中国在如此情形之下，自己没有一点准备，没有一点国防，如果现在贸然和他打仗，那不是把自己的国家徒然断送吗？岂不是疯子和傻子吗？你自己毫无准备，而你的敌人早已埋伏在

你四围了，只要你一动手的时候，他马上起来包围你，你还不是自己送死吗？所以现在这时候，说是可以和日本正式开战，真是痴人说梦，太不知道自己了，太不知道敌人了！然则我们有什么方法来抵抗敌人复兴民族呢？是否现在这时候，竭全力来准备国防，拼命的制造飞机大炮，就可以和他来作战吗？各位将领一定也知道，不仅是我们现在临时添制武器，整顿国防，已来不及，不能和他抵抗；就是从现在起，大家同心一致在这专一方面来努力，三十年还是不够，到那时候，说我们想靠物质的力量，可以战胜日本，那还是等于做梦；何况现在日本人决不许我们有一个可以准备国防，也不许我们有一个时间来制造武器呢！退一步说，就算日本人让我们尽量来设备国防，我们的人力和财力，那里能赶得上呢？比方讲，我们国家的边疆要修要塞，海岸有海岸的要塞，所用的二十四生地的一门大炮至少就要四百万元，子弹还不算在内，即此一项来说，我们的财力和人力，那里办得到呢？何况事实上日本人绝对不许我们有一点国防建设，……

（同　　上）

现在我们整个国家的生命，民族的生命，可以说都在日本人的掌握之中，没有方法可以自由活动一点。最近我听得有人说广东广西这个地方才是复兴民族根据地，他们以为日本在华北在长江可以随时侵略，但是决不能打到西南的腹地来，这真所谓皮相之谈，不知道日本国家侵略企图的真相何在！我们不知道日本除陆军海军之外，近年对于空军的建设，是怎样的扩大，更不知道他们要并吞整个中国是不分东北和西南的。现在我们中国的军队无论你在那一个地方，无不是在日本人掌握之中，日本人要你几时死，就可以几时死，要占你什么地方，就可以占什么地方，还讲什么复兴民族的根据地是西南。

（同　　上）

三、蒋介石认为国际联盟有公理、公约、公法，所以中日问题要靠国际联盟来主持公道

但照近日日兵行动，尤其是轰炸锦州，国联认为形势非常严重，已决定提前于十三日开会。我们相信这一次开会，一定能依照公道的主张，找得和平的路径，使东亚和平，以至世界和平，不致被日本一国所破坏。

（原载《拥护公理与抗御强权》——蒋介石
1931年10月12日在国府纪念周讲演）

我们更要知道世界上任何国家或任何个人，都不能离开世界而独立。就国家论，立国于世，必有与国，国与国间自必有其相安相助之道，决不能只顾自己的权益而妨害甚至侵犯他国的权益，如果如此，则此只知为自己的国家，必不能得与国的同情，而安然并存。我国是世界国家之一，即不能离开世界，同样既是国际联合会的一分子，既不能离开国际。任何国家，离开国际，都不免失败，都要自取灭亡。现在日本即陷于此种境地，军人只晓得自己的陆军强大，只想一脚踢进我东三省腹地，即可踞为己有。殊不知世界还有公理，决不容许他这样飞扬跋扈，来破坏世界的和平。

（同　　上）

我想我们是世界的一国，又是国际的一分子，无论如何，都有拥护公法与维持公约的责

任。且不但我国有此责，就是世界各国，也都有这个责任的。今日我们固甚愿以和平的方式，来保全非战公约的尊严，虽日本侵占我们领土，我们仍不对他宣战，是为了要维持公理，为公法公约而竭力忍耐，……我们在精神上已有最大的胜算，无论敌军怎样强大，怎样来威胁我们，我们总是处之坦然，不为屈服的。我们更应相信国际有公约，人类有公道，我们要以和平的心理去遵守，以牺牲的精神去拥护。横暴不足畏，威武不足屈，我们要和平奋斗，以捍御此次的国难，以拥护国际的公法。

（同　上）

“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群众运动

（一）“九一八”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勃发

在“九一八”前夜，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怒涛已经到处奔流着，“九一八”的炮声一响，更如山洪暴发起来，全国人民为了回答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占辽吉，举行了空前伟大的反抗运动。学生罢课、请愿、游行和示威；工人罢工，组织义勇军和吁请政府出兵收复失地；商人和全国人民则举行了经济绝交的抵货运动，其中尤以青年学生为最热烈和勇敢。

从“九一八”第二天起，上海、北平、天津、杭州、太原、长沙、西安、开封、广州、福州、武汉、南昌等处的青年学生即举行了广大的反日运动，组织抗日义勇军十人团等等，到十一月尾，南京政府向国联提议设立锦州中立区，施肇基代表向国联提议天津共管，以及外长顾维钧向日使芳泽开始直接交涉之后，全国学生更加愤激，纷纷组织“请愿团”“示威团”等向南京请愿示威，这些学生组织的行动，是极其悲壮伟烈，可歌可泣的。根据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五日的“生活周刊”说“各校学生因国事日危，悲愤愈甚，纷纷入京请愿者万余人，沪上诸同学在车站待车时，受当局多方留难，复经长时间的饥寒困苦，已艰难备尝，十一月二十六日赴国府请愿后，鹄立于雨雪之中过夜，一任风雨饥寒之肆虐者一昼夜，甚至有病苦不支而倒地者，全体一心，至死不去，其悲壮哀痛牺牲义勇的精神，苟尚有几希人性者，对此万余纯洁忠诚大公无私的青年男女，必不能自禁其肃然起敬，油然兴其无限的悲感和同情”。

后来全国学生感觉到单纯请愿的不够，乃有示威团的组织，以便向日本帝国主义示威，向不抵抗主义者示威，十一月三十日先由北京大学发动，跟着全国响应，北大示威团十二月一日由平南下，三日抵京，五日在南京成贤街上举行第一次大示威，结果被南京卫戍司令部派兵击散，殴伤学生三十余人，逮捕一百八十五人，武装押送回平，这就是有名的“一二五”事件。

全国各地学生为了响应北平学生南下示威团及援救他们的被捕，先后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在“一二五”事件的第二天，上海中等以上各校抗日联合会，即开紧急会议一致通过：一、援助北大同学；二、质问政府为何逮捕北大同学，并限二十四小时内答复，否则全市总罢课，向南京出发；三、反对锦州中立区，及天津共管计划；四、明日全市学校总示威，以及准备向南京出发等决议；七日，上海学生一万五千余人举行了总示威运动，九日因上海市党部凶手绑架和殴打北大、中大学生代表，再度激起了上海学生的公愤，交通、光华、大夏、法政、复旦、两江、美专、暨南、商船等校学生八九千人包围市政府，向市长张群提出：不准压迫抗日运动，释放被捕同学，惩办凶手及其主谋陈希曾、陶百川等要求；当时不得要领，相持直至翌晨九点钟，释放被捕的北大代表，公审凶手王福生，及张群答应惩办陈希曾、陶百川等，上海市政府之围才告解除。

同时在南京的中大、北大、武大等校学生，也举行了联合总示威。自十日起南京全市学校总罢课，十五日又联合各地学生捣毁压迫民众抗日运动的中央党部，殴伤行政院副院长陈铭枢等。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十二月十七八两日南京、太原、西安等地学生的怒吼。这里且看当时报章的记载吧：

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出版的“国闻周报”说：“北平各校学生示威团，于十二月十五日在中央党部示威后……，十七日午又在中大结队，率领中大及沪生约千余人，由中大出发，经中山路鼓楼，过外交部而至中央党部示威。沪学生行列在前，平学生及中大学生在后，沿途高呼口号，沪各校学生经过中央党部，即向东边百子亭高楼门而去。平各校示威团及少数之中大学生约六七百人，全部鹄立中央党部门前，将党部包围，高呼……口号，中央党部事前将铁门关闭，复令军警在内防守，彼辈猛冲数次，未得冲入，遂将大门两旁警卫室及传达室窗棂玻璃摧毁，复派人飞跑至高楼门百子亭，要求沪各校学生仍回中央党部……将中央党部包围，并用石块砖头冲撞党部大门及党部墙垣；同时散发各项油印……小标语，并向党部附近民众及保卫党部的军警宣传，谓此来系为……劳苦民众而流血等语……。历二小时，复声称到国民政府去，并投石块将党部大门上的青天白日玻璃党徽及大门电灯击毁，高呼口号而去。……下午四时，示威团三千余人，向珍珠桥“中央日报”而来，该馆事先业将大门关闭，示威团先头队伍约百余人，系上海学生，经馆门高呼口号而过，续至之北平示威团及少数中大学生约三百余人，至馆门时，立即停止，……向大门猛冲，门坚未为冲入，有数人越窗而进，将大门开放，在门外者即蜂拥冲入，先将大门打破，电话割断，随将经理室、会计处、广告股、发行股、材料股玻璃及文件帐册家具等，悉行捣毁……适宪警赶到弹压制止，始将全部队伍驱散……。

“学生捣毁中央日报馆后，旋至国府，国府事先已将大门铁栅紧闭，并派警卫在门内准备，以防不测，该团至，见大门无法冲入，随在门外高呼打倒卖国政府，打倒卖国外交及其他口号……将国府门外岗亭及玻璃捣毁，约半小时之久，始行退去……。”

在太原，“十八日晋男女四十余校学生三千余人，假中山公园举行，‘九一八’纪念露天大会。……散会后全体学生赴省党部请愿，因党部纠察队把守大门，未得入，派代表二十余人进内，要求援助学生共起抗日……纠察即用备妥之木棍，殴击各代表，全体学生闻讯，向内部拥入，并用石子乱击，纠察队即开枪”，结果“除代表二十余人均受木棍轻伤外，学生中枪受伤者三人……”。“在西安，中学生千余人，十八日晨在中山大街集合，各执木棍群往捣毁省党部……并请省政府转呈中央撤换阻碍抗日运动的党委”。

这些记载，虽然出之统治者的报章，其中参杂许多攻击学生的词句，但从此也可以看到当时青年学生参加救亡运动，是何等的英勇无畏了。

劳动者，特别是工人，参加救亡运动的热烈和积极，也不下于青年学生。上海全市八十万工人曾于九月三十日派代表入京请愿，并于十月二日召集全体代表大会，通过下列各种抗日决议：(二)请南京政府立即出兵抗日；(四)通电全国工人一致对日经济绝交；(五)请南京从速救济日厂华工；(六)通电全国工人一致严密组织义勇军，并请政府颁发军械；(七)建议抗日会严厉惩办奸商及一切奸细；(八)请抗日救国会通电全市工厂、商号，限于十日内，将所现存日货，完全缴交抗日会保存，自十月十一日起，实行检查。上海日纱厂八万余工人，自动组织抗日会，益拟一齐退厂，十一月初，日商同兴纱厂工人开全体大会，一致表决，即日退出，实行不合作主义（详见民国二十年九月二十二日和十二月二十日申报）。

在北平，十月十日，邮务工会先行组织抗日救国会，通电请全国一致备战，成立邮工义勇军，组织邮工宣传队，组织全国邮工抗日救国会及北平工人抗日联合会等决议。跟着北平工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十月十八日)，包括邮务、大车、火柴、粪夫、缝纫、地毯、报贩、电车、自来水等工会在内，通过从速组织义勇军，实行对日不合作及积极募集爱国捐款等决议(民国二十年十月十日至二十日的华北日报)。

其他各地，如南京、天津、汉口、广州、汕头等地，工人也无不积极参加抗日运动，其情形也与上海、北平两地相仿佛，或发表宣言，以示决心，或向政府请愿，请求对日采取抵抗政策，或征募爱国捐款，作为抗日运动费用，或实行对日经济绝交，或退出日商厂号，采取坚决的抗日态度（见第二次中国劳动年鉴一四三——一四五页)。

全国人民和商民的抵货运动亦颇热烈，且给了日本资本家以相当打击。例如在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于十月四日通过对日经济绝交决议，并实行检查日货，商界代表亦宣誓自十月一日起，决不买卖日货，其他各地商界，也有相类的举动。因此所给予日本帝国主义的损失是相当大的。单抵货一项，据一九三二年八月二日申报的统计，日本对华输出一九三一年九月比上年九月减少百分之三四·七，十月减少百分之五九·七，十一月减少百分之六十八，十二月减少百分之六三·八；另据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的生活周刊记载，“日本近来因我国抗日运动激烈，在十月中旬日本停船之数量达五百十九艘，总量为三十万八千六百八十七吨，预计至本年底，停船将达全日本总船舶吨量百分之六十，这就是日本全国船业受到半数以上的影响。又据另一消息，我国进口外货统计，日货原属百分之三十，自暴日横行，全国一致抗日，各海关进口税收亦减少百分之三十，这样看来，日货进口，势将绝迹”。这使得日本的资本家不能不惊慌起来。十月中旬，大阪十一经济团体的紧急会议，就是谋以挽救因中国抵货运动所受的损失而召集的。

在“九一八”事变后，整个政府和绝大多数军队，虽然是彻底的不抵抗，但是其中的某些个别部队，却进行了多多少少的抵抗。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当日寇占领辽吉之余，乘机进攻黑龙江，满以为兵不血刃便可以占领黑省，谁知碰到马占山将军，四日晨日军以飞机掩护铁甲车队向嫩江桥进攻，马占山部迎头痛击，十时暴日不支败退，午时日军增加援兵反攻，马部奋起抗战，前仆后继，以一当十，五时日军大败而逃，退到泰来。六日，日军复增援大举进攻，以手榴弹为冲锋利器，士兵上刺刀向我猛扑，我军多缺乏刺刀，以托柄抗敌，以死肉搏，仍将敌击退。后来卒以众寡悬殊，马部粮尽饷绝，退出齐齐哈尔，但也足见当时马部抗战的激烈和英勇了。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晚上，上海十九路军的抗战也是十分英勇的。在上海抗战之前，日海军陆战队司令盐泽有“四个钟头占领上海”的宣言，本庄繁更有“三个月占领支那全土”的豪语，许多外国观察家也说上海华军最多不能支持三天。但自上海战争发生后，一切外报和敌人的代言人，不得不另眼相看了。例如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伦敦每日电闻报”社论说：“战争三日后之荣誉属诸中国军队，其威力业已成立，较诸一般世人所预料者更为伟大，定可恢复中国乃能自卫的国家之威信。”上海“泰晤士报”记者也说：“华兵之抵抗力非常坚强，猛烈之炮火加于彼等，彼等屹然不动，当其阵地为炮火所毁时，彼等即以来福枪兵士伏于其口，准备抵抗日兵之进攻，故日军终不能前进。”甚至连东京“时事新闻”上海特派员野坂三郎也不能不公开承认“自事变后迄今数旬……而战况仍迟滞不能进展，在此情势下，大失吾人从前一战即逃主义的期望，中国军的精强勇猛，已见诸事实……。”其

实十九路军将士的英勇尤不止此，据一九三二年二月六日"生活"记者韬奋说："有友人亲自前线归来，目击受弹致命的我国军士于临死时，尤高呼'中华民国万岁！'闻之酸鼻。"至于轻伤不退，重伤不哭的例子更不胜枚举。

在马占山嫩江抗战和十九路军上海抗战发生以后，全国便进行了广大的援助运动。特别是在上海抗战中，全国人民的援助十九路军运动更加热烈。例如各地学生，不是罢课游行，便是请愿示威及下乡宣传，唤起民众，参加抗日。各校义勇军的活动也更加积极，上海学生之参加前线作战者，不知多少。最著名的是复旦大学和冯庸大学的义勇军，他们在战线上协同战士英勇作战，单复旦一校死伤已有二百余人。浏河之役，冯大义勇军的功劳尤不可抹煞。此外如挖战壕、做防御工事、救护伤兵、教育战士、联络军民感情、募捐款项等等，青年学生也做了不少的工作。

中国工人参加上海抗战，也是人所周知的事实，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二十九日下午，上海总工会下令总罢工，除了交通、水电工人外，差不多全上海的工人都实行罢工了，在小沙渡、杨树浦等工人集中地区，举行了盛大的集会，电车和汽车都停了下来，开车的卖票的工人们要乘客一同下车，加入示威的行伍。在东新桥、泥城桥等处，虽然受到武装巡捕的追逐，但是依然举行着热烈的反日宣传。几天之后，许多工人大刀队、手枪队、长枪队、工程队、交通队以至救护队等等组织起来了，有的开到前线，和十九路军一同作战或服务，有的留在后方，同样紧张地工作。同时所有上海的日厂工人，除九大纱厂外，其他五十四家中等日厂的六七万工人，也一律自动退出。所有在日清、大阪等轮船公司的华员、水手等，于船抵吴淞时离船上岸。所有在日本商店、住宅、机关服务的店员、侍者、女佣等，也纷纷告退，当时罢工中的码头工人，曾经拒绝过敌人的重金收买。

上海商会及银钱两公会也决议罢市，二十九日午起各商店一律停业。

象这样如火如荼的援助十九路军抗日运动，很有可能使十九路军抗战坚持下去，甚或可能把日寇赶出上海。但不幸得很，正当十九路军和日军在闸北吴淞进行拼命战斗的时候，南京政府的代表却和日军司令在英国旗舰上杯觥交错。当十九路军因援绝退到第二道防线时，南京政府代表郭泰琪等，却和日代表在英领事馆中商订停战条约了。

从上海停战谈判那几天起，全国人民即一致反对，到五月初，上海停战协定成立时，上海市民的反对情绪非常激烈。五月二日上海各团体抗日联合会通电全国，坚决反对出卖上海的停战协定。三日晨，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代表四十余人，拥入郭泰祺宅，痛殴经手谈判的郭泰祺，以为对外投降者的警告，谁知南京政府恼羞成怒，对于殴郭的爱国志士，诬为"狂悖已极"，要"迅即查明下手凶徒，递解归案，严加讯办。如系出自不法团体指使，应即将该团体解散，并严究主名"。(汪精卫致上海市长吴铁城电)这样一来，全国人民更加愤激，纷电南京政府责问，并要求马上释放殴郭的各团体代表，这使得郭泰祺本人，也不能不假惺惺派人到巡捕房把被捕的上海各团体代表二人释放出来。

与上海停战协定同时，又有"上海自由市运动"。这是由于英、法、美帝国主义者发动的，他们要"召集上海圆桌会议，解决(一)越界筑路的管理权；(二)免除上海周围驻扎华军的危险；(三)改良特区法院"。总之要使上海以至上海周围更加殖民地化。中国人民对于这种割裂上海的运动，也是极端愤恨的，对于主张该说最积极的英人木头者，更受到救国团体的警告和中国舆论严重的反击，卒至使上海自由市的计划失败而后已。

(二)民族解放运动的潜伏时期(从上海协定到长城抗战)

在上海停战协定以后，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因为政府当局的高压，以及全国人民感觉到单是奔走呼号和游行请愿的不够，于是转入地下的秘密活动，从事于积蓄力量的准备工作，因此在表面上，轰轰烈烈的运动是看不见了，人们看得到的只是一片阴森惨淡的景象。

在北平“此间因当局严禁公共示威运动，今日对日本承认‘满洲国’并未发生骚扰，仅有国立某大学附属中学之学生四五十人，于午后在煤山附近道中集会，作反日宣传，当有警察驰至劝众解散，众不愿，警察乃发空枪数响，并将全队学生拘至大学附近之警署，将解至公安局”。(见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四日“生活”的小言论)

在上海，“九一八”周年纪念前后，市政府发表了“取缔越轨行动”的布告，上海市长发出劝告市民“勿浮嚣妄动”之文件，对于爱国分子公开声明“执法以绳”，“依法严办”；同时上海市公安局施行“特别戒严办法”，用军法来对付爱国运动。(见“申报月刊”第一卷四期及九月十八日“申报”)

在天津“市政府奉令制止爱国运动”，“奉行政院令免贻口实”，“公安社会两局派员查拿”爱国分子。(一九三二年九月七日天津“大公报”)

在广州则口喊“抵抗”，“出兵讨叛”，但实际禁止一切民众的爱国活动。

在全国各地，各工厂只得“万勿停工，以免酿成事故，所有纪念仪式，均在厂内举行”，各学校亦“严禁学生游行示威，各于是日上午在该校内举行志哀礼，并勿许任意出校，以免发生意外”。(见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九日全国各地报纸)所以当时有人说，“九一八”是象做阴寿一样的消沉。

然而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是不可压止的，当时轰轰烈烈的运动虽然暂时没有了，但各种运动的暗流，却依然滋长着，“自然是好象压在大石之下的萌芽一样，在曲折地滋长”。(鲁迅语)例如公开抵货除奸运动，虽然被政府禁止了，但爱国分子却自动组织了许多暗杀和警吓奸商的团体(如铁血锄奸团、血魂锄奸团等等)。这些团体，客观上虽能阻碍真正抗日运动的开展，但在他们的主观上却是爱国的。

一九三二——三三年间发展得最广泛和最迅速的，是各地的文化运动。全国各地因为南京政府当局的禁止游行示威，革命的知识分子，只好集中力量于文化方面的活动，一般青年学生也因为国难日趋严重，痛感国家民族前途的危殆，急于在精神方面找到适当的出路，因此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结合起来，便形成了各地文化团体和刊物的风起云涌。上海、北平、广州等中心区域，每处的文化团体不下数十百个，广州“世界情势社”出版的“世界情势”，“文化战线社”出版的“文化战线”，“一般文化社”出版的“一般文化”，“万人社”的“万人”，“广州文艺社”的“广州文艺”，以及中大“抗日剧社”，“前卫剧社”等等的社刊，在开展两广文化运动上，都曾起过相当的作用，其中尤以“世界情势”的影响为最大，后来凭着该杂志团结和吸收了数百个前进的青年，训练成为广州文化运动的基干。

北平方面的“中国论坛”、“转变”，上海方面的“文化月报”、“世界文化”、“文艺新闻”、“文学月报”等等刊物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这里，应该特别注意的是关于“中国文化总同盟”的活动及其发展，因为它对于当时的文化运动，是有着决定的领导作用的。谁都晓得，“中国文化总同盟”(以下简称“文总”)

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团体，它的盛衰，可以作为中国人民解放运动的指示器。自一九三〇年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以来，跟着便成立了社会科学作家联盟、社会科学研究会、新闻记者联盟、世界语联盟、电影员联盟、话剧演员及美术工作人员等联盟，后来又联合成为"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到一九三二——三三年间，每个单位都拥有数百或千余盟员不等。北平、广州等处设有分盟，它们的工作，也跟着各地文化运动的开展而迅速地展开。

为要更加广泛地开展全国的文化运动，必须肃清当时文化战线上的毒素，所谓"自由人"或"第三种人"。这任务，"文总"胜利完成了。

一九三二年春夏间，有自称"自由人"的胡秋原和自称"第三种人"苏汶等出来摇旗呐喊，他们之中，有的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如胡秋原)，装成要求文艺自由的样子，有的说文艺是"脱离政治，脱离阶级而自由的"，"文艺(或文化)不是阶级斗争的武器"。他们的共同目的是反对代表中国人民谋解放的左翼文化，是"帮助了别一阶级的狗来咬左翼文坛"，是反对当时已经开展的文化运动的阴谋诡计。正如鲁迅所说："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作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种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没有的。"(全集第五卷三六页)

另一方面，广大群众的实践斗争也颇不少，在上海停战协定签字后几天，上海百余抗日团体便成立抗日反帝联合会。五月初，安徽省合肥西乡有千余人的抗日示威大游行，并和军警发生武装冲突。六月二十四日，全国"民众援助东北义勇军反对上海自由市代表大会筹备会"成立，专门负责援助东北义勇军的工作。七月，上海有六千工人签名请释放中国人民朋友牛兰夫妇运动。八月一日，上海东西南北四区都有工人示威及露天大会，尤以沪东工人的大示威为最有声色。是日天一亮，即有游击式的宣传队在杨树浦路一带散发传单，讲演"八一"反日反帝的意义。晚间七时，工人五六百集在一工厂荒地上开会，吸收了千多群众参加，巡捕暗探卡车到来后，也因人多不敢干涉。会后适值沪东日班工人放工，成千成万工人从工厂中涌出来参加了这个示威运动，冲破了武装巡捕的三道防线，卒至达到游行示威的目的，才告结束。

虽然如此，但轰轰烈烈的运动，这时期是比较少见了，所以说它是民族解放运动的潜伏时期。

(三)民族解放运动的复兴

然而，中华民族解放运动是不能长期压止的，经过一九三二年下半年的准备和训练，到一九三三年初，日军进攻榆关热河的时候，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又复兴起来。在日寇占领榆关以后，全国工人即联合起来进行种种抗日工作。例如南京市工人，于一月十一日通过：(一)通电全国一致誓死抗日；(二)电张学良及华北将领积极抗日；(三)向党政机关请愿从速收复失地；(四)通告各工会会员严禁购买日货；(五)函知各界抗日会，积极进行检查日货工作等重要决议。平津各地工会，也于十五日开会，通电请政府实行对日宣战，及准许战区附近工人组织自卫团体的决议。上海总工会则于二月二十六日发表"告全国工友书"，要团结一致，共赴国难，厉行抵货，加紧抗日。其余广州机器工会、海员工会、全国各铁路工会等等，或则节衣缩食，捐薪抗日，或者发表宣言，要求政府实行抗日。这使南京政府在热河危急时不能不宣言保卫热河，使得政府在日寇进入长城各口时，不得不进行了或多或少的局

部抵抗。

但是没有决心的抵抗是必然失败的，跟长城抗战的失败以来的是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不管该协定的条文对于丧权辱国的技巧写得多么巧妙，但中国人民的眼睛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因为塘沽协定的消息一出，全国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便马上联合起来了。五月二十六日在张垣成立的“抗日同盟军”就是这种运动复兴的标帜。

抗日同盟军的社会成分非常广阔，它里头有曾经在长城各口英勇抗战的正规军，有曾经转战东三省和热河各地的东北义勇军，有的是在敌人威胁区域的农民，有的是平津各学校的知识分子，有的是国内外著名的军政领袖。

例如抗日同盟军第一军佟麟阁部，原来就是二十九军担任张垣防务的三十八师二二三团和二十九军第二教导团，同盟军第二军吉鸿昌部及第五军第十六师等原来是东北义勇军，第五路军邓文和第十六军李义忠部原来就是马占山的旧部，同盟军第六军张凌云和第二军的一部是由察省本地武装改组而成的。同盟军中的学生大队和政治工作人员，谁都知道大半是华北学生，至于同盟军的领导者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佟麟阁等，则都是著名的抗日军政领袖。

同盟军成立之后，经过两星期的训练和整理，六月中旬召开军民代表大会，确定了抗日纲领及军事、政治、财政、经济和组织的具体方案，六月二十日开始北征，分兵三路，以邓文第五路军为左翼第一梯队，李忠义第十六军为右翼第二梯队，骑兵第三师团义宣部为第三梯队，以吉鸿昌为总指挥，二十二日在张北集中，克复康保，二十七日向宝昌推进，七月一日进抵宝昌附近，和伪军主力发生激战，伪军下级官兵，纷纷携枪来降，伪军退多伦。驻沽源的伪军刘桂堂部全体反正，和同盟军联合收复沽源。当时摆在同盟军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再进而收复多伦，因为多伦在滦河上游，是内外蒙的中枢，是塞外军事、政治、经济的重地，而日寇也有重兵驻守，并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

同盟军在收复康保沽三县以后，七月四日分兵向多伦进发，七日晨开始进攻，经过两日夜的英勇战斗，已将多伦城包围，十日晚，吉鸿昌亲率敢死队爬城三次，死伤二百四十余人，终未得手，直到十二日晨乘天色黑暗，日本飞机不能出动时，以牺牲千余抗日兵士的代价，才得攻入城内，把日伪军完全驱逐出察省境之外。

同盟军在收复察北各县后，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如上海各界抗日联合会，各团体救国联合会，教育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妇女协会，海员工会，邮电工会，商人救国协会，国货工厂联合会，江苏各县民众救国联合会，西南各省人民对外协会总会，广东民众援助义军大会，福建全省公务员救国协会，河北省各界抗日同盟会，北平各界抗日联合会，天津各界抗日联合会，华北青年抗日同盟会等民众团体，有的是函电交加，颇为同盟军后盾，有的是在物质上给予援助。

同盟军得到全国人民热烈拥护后，对于抗日进行更加积极，七月下旬在张垣成立了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准备进一步收复失地。然而在南京政府方面，则不但自己不愿抗日，就是别人抗日也是不准的。对于抗日同盟军当然不能例外。因此多方设法破坏（见本书第二章第四节），卒至使同盟军解体而后已。

同盟军失败后两月，发生了要求武装抗日的福建事变，这事变也因为南京的破坏而失败了(见本书第二章第四节)。

福建事变失败后，不久（一九三四年五月）国内著名人士宋庆龄、何香凝、王法勤、白

云梯、李达、沈德明等一七七九人共同签名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提出了：(一)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二)全体人民总动员；(三)全体人民总武装；(四)立刻设法解决抗日军费；(五)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六)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等六项主张。同时成立“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总会于上海。全国各地及海外南洋、马来群岛等处，先后成立“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分会”，签名赞成该纲领和加入该会的会员，不到三个月便达三十万人，其中包括了军政商学农工兵各界。六月，“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又发表了“对日作战宣言”，号召全国人民自动起来对日作战，首先就要排除对日作战的一切障碍，跟着明确指出对日作战的第一重障碍就是不抵抗主义；第二是信赖国联，请求帝国主义列强主持公道；第三是卖国贼的亲日政策；第四是“建设救国”；第五是借口中国无力抗日的失败主义。最后它“号召全国同胞一切爱国志士，所有不愿意当亡国奴的公民，不分民族、宗教、党派、性别来拥护抗日作战纲领，结成反日统一战线，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求得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与领土完整”。

在文化思想方面，这时期最值得注意的是语言改革运动和文字通俗化运动。早在一九三二年六月宋阳便在“文学月报”上提出了文艺大众化问题，引起了当时热烈的争论，到一九三四年间，有些文化上的顽固分子(如许梦因、汪懋祖辈)，要求“复兴文言”，结果发生“大众语”论争以至发展到语言本身改革的运动。

什么叫做“大众语”呢？“所谓大众语，就是大众说得出，听得懂，看得明白的文字”。就是“代表大众意识的语言”。这种语言“必然是现代的富有流动性的，而且必然在形式和内容上一致，即在用语、写法、思想上完全抛弃陈腐的尸骸的”。因此，最后便归结到中国文字的“拉丁化”，用比较简便的拼音符号来代替死硬硬的方块字。在实际上，许多新文字的刊物出来了。

在新文字没有完全实现之前，为要使得一切读物比较容易为大众接受，首先实行文字上(或写作上)的通俗化，是万分必要的。因此在一九三四——三五年间，通俗化运动颇盛于当时，许多作家都努力于求写作上的通俗化，例如艾思奇同志在“读书生活”上的哲学讲话，可说是这个运动中的代表作。在这以前，一般人都觉得哲学是一种高深莫测的专门学问，在艾同志这些讲话发表以后，一般人对于哲学的认识有些改变了，至于这时期通俗化运动，对于后来救亡运动的推动作用，那更用不着说了。

(《从“九一八”到“七七”国民党的投降政策与人民的抗战运动》，
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附〕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九日于上海)

宋庆龄

当作一个政治力量来说，国民党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是一件无法掩盖的事实。促成国民党灭亡的，并不是党外的反对者，而是党内自己的领袖。1925年孙中山病逝北京，国民革命

突然失却了领导，以致中辍。幸而当时在广州的党内同志严格遵守他的遗教，以群众为革命的基础，使北伐能于短期内在长江流域取得胜利。但是不久之后，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与军阀和政客之间的相互争吵，造成了宁汉分裂，使党与人民之间的鸿沟日益加深。

残暴的大屠杀和恐怖迫使革命转入地下。国民党以反共为名来掩饰它对革命的背叛，并继续进行反动活动。在中央政府中，国民党党员力争高位肥缺，形成私人派系，以巩固他们的地位；在地方上，他们也同样剥削群众，以满足个人的贪欲。他们和一个又一个的军阀互相勾结，因而得以跃登党和政府中的高位。但是，忠实的、真正的革命者却被有意地百般拷打，以致于死。邓演达的惨遭杀害就是最近的例子。

五年以来，内战和政治阴谋循环不已。由于背弃了革命政策，各敌对的派系都向帝国主义者投降，并且不惜利用武力和最下流的手段。过去北洋军阀政客所不敢做的事，都在"党治"的名义下毫无顾忌地做出了。因此，国民党今天已名誉扫地，受到全国的厌弃和痛恨，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孙中山的遗嘱连一天也没有真正实行过。

近来宁粤两派发生分裂，形成两个对峙的力量。双方各自指摘对方的缺点，又夸耀自己的长处。他们用虚伪的政治口号，比如"政治公开"、"民主统治"、"革命外交"等，作为欺骗中国人民大众的武器。但实际上，广州和南京这两派都以军阀为靠山，都在力争他们的帝国主义主子的欢心，而且都背叛并屠杀中国人民大众。

由于日本公然侵入我东北，广州和南京，这两个集团由于国难当前和舆论的谴责，都不得不暂时停止公开的战争，而召开所谓"和平统一会议"。阴谋围绕着会议进行了三个月之久，争论的中心问题不外乎党中央委员会和政府中职位的分肥。关于构成全国极大多数的农民工人的苦难和急需，在这个会议上没有一个字提到。这些敌对的派系，昧于自私自利，完全看不出个人独裁、党的堕落、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都是它们使国民党脱离了群众的结果。

惟有以工农政策为基础的党才能为社会主义打下基础，才能粉碎军阀的势力并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假如所谓"和平"与"统一"进行顺利，从而各派都满足了它的贪欲，那末"和平"不过是和平地分赃，"统一"不过是对群众进行统一的掠夺而已。绝不可能想象中国人民愿见这样的"和平"，或全国愿要这样的"统一"。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在南京看到这种统一的第一个果实。仅在三天以前，在帝国主义国家使节的命令之下，这个"统一政府"竟力图镇压爱国的学生运动。在不到十二个小时的时间内，兵士和流氓包围了学生，棒打枪刺，把他们象畜牲一样地赶出城去。学生多人死伤，据报另有大批失踪。

暴行是在这样的时候演出的：一支外国帝国主义的军队正向锦州推进，而所有卖国贼和帝国主义分子正受到优遇、阿谀和保护。在口头上讲着革命外交、全民民主和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人们到达南京后，这个暴行就发生了。可以明白地看出，新的统一的政府是由日、法、英、美等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组成的，是服务于这群利害冲突的主子的，它将继续接受帝国主义者的命令，镇压中国民族求解放的任何一种形式的群众运动。

我不忍见孙中山四十年的工作被一小撮自私自利的国民党军阀、政客所毁坏。我更不忍见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的中国，因国民党背弃自己的主义而亡于帝国主义。

因此，我不得不率直地宣布，既然组织国民党的目的是以它为革命的机器，既然它未能完成它所以被创造起来的任务，我们对它的灭亡就不必惋惜。我坚决地相信：只有以群众为

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我深信：虽然今天当权的反动势力在进行恐怖活动，中国千百万真正的革命者必不放弃自己的责任；反之，由于国家当前形势的危急，他们将加紧工作，朝着革命所树立的目标胜利前进。

（《为新中国奋斗》，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

〔附〕废止内战大同盟章程

（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第一条 本会认为外侮纷来，源于内乱，内乱靡已，由于内战，特集合全国人民为废止内战之运动。

第二条 本会废止内战之运动，得以下列次序行之，(一)平时本会应发布公开之文字或演说，陈述内战之罪恶，阐发和平之功效。(二)如有政治纠纷发生，足以引起内战时，本会应劝告双方信任若何民意机关（正式国民代表机关未成立前，法定民间职业团体可替代之）调处之，任何一方绝对不得以武力解决。(三)不幸内战竟发生时，本会团体会员及个人会员应一致拒绝合作，更得采用和平适宜方法制止之。

第三条 本会除专为废止内战运动外，不得为他种之行为。

第四条 凡赞成本会宗旨者，不论个人、团体、性别、职业、党派，勿须介绍，均得签名入会，并得由本会公开发表之。

第五条 本会得设总事务所于上海，并得设分事务所于必要地点。

第六条 本会得设常务委员若干人，任期一年，组织常务委员会得议决及综理本会一切事务，因会员众多，会区广大，势难召集大会，为手续简单便利起见，第一任常务委员之名额及人选，由发起人决定公推之。第二任起，由常务委员会决定公推之，必要时，得设事务职员，亦由常务委员会决定选任之。

第七条 本会得设名誉委员若干人，由常务委员会推举之。

第八条 本会不收会费，其经费得向赞助团体及个人募捐，但不得向中央及地方政府或任何公家机关请求补助。

第九条 本会应需一切事务的章程，由常务委员会制定之。

第十条 本会成立年限，暂定为五年，但期前若无内战发生，认为无须再运动废止时，得提前解散之。

〔附〕关于“废止内战大同盟”

上海全国商会联合会、沪市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5月25日联合通电津、粤、京、汉、平商会及银钱业两公会，并转教育界暨各界团体及朝野名人，发起废止内战大同盟。……

此种运动，本全国人民一致之公意，酝酿已久，最近动机由于吴达诠氏本月17晚应上海地方维持会之邀，为一度沈痛之讲演，认为对外长久抵抗，非从政治、军事、教育、经济，各种建设入乎不可，但唯一之障碍，为国内战争，苟内战不能废止，一切均无从说起。且认为国内民生状况，已朝不保夕，若再有内战促其崩溃，必回演历史上之惨剧，赤眉、黄巢、张献忠、李自成往事，不难再出现于全国，必致失国际间维护者之同情，遂侵略者之欲望。且

申言反对任何不良之政治，不难以他种方法达到之，若以武力反对，直以暴易暴耳。民国二十年来之复辙不可复蹈，以自促灭亡云云。沪上各界名士史量才、邹韬奋、黄膺白、张熔西、俞寰澄、黄任之、刘湛恩、王晓籁、徐寄庼、张公权、李馥荪、钱新之、张啸林等，均表赞同，热心作和平之运动，18日起，林康侯、王晓籁、徐寄庼、秦润卿分头向四团体接洽发起，四团体先后开会，全体通过，二十五晨全国商会联合会开会后，即将通电发出，亟希望全国各界团体及名人一致参加发起云。

上海各界发起"废止内战大同盟"电到津后，各界人士一致表示赞成，津市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均次第开会，一致参加共同进行。段芝泉谈话云，年来四民失业，生产萧条，直接之因，固原内政不修，间接之因，实原内战环起暴发而不可止。今日中国非修明内政，无以图存，人人能知之，能言之，然欲内政修明，非先废止内战不可，外患孔亟，夫何待言，内政克修，外交方可着手。张伯苓谈话云，废止内战为全国人民之公意，饱尝内战苦痛之中国人，在此一致对外之时，良心上可判定无一人不表示赞成。所怀疑者为此项运动之效力若何，但可断定只要人人加入，效力立见，无所用其怀疑。京、平、汉、济及星加坡各商会，同业公会，银行公会，教育机关各法团名流，莫不纷纷响应。

（原载《国闻周报》9卷22期，1932年6月6日出版）

〔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于上海）

宋　庆　龄

对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性质，我们必须有一个清晰的了解。这个同盟不是一个政党。它的目的不是领导中国人民大众去作政治与经济的斗争，因而它的目的不在领导夺取政权的斗争。虽然，一方面我们对于我们的工作是这样去看的，但另一方面也必须了解，我们所要处理的问题却是政治性的。在我们初次的宣言中，我们所列举的任务如下：

一、争取释放国内政治犯，反对目前到处盛行的监禁、酷刑和处决的制度。本同盟首要的工作对象是大量的无名囚犯。

二、予政治犯以法律的辩护及其他援助，调查监狱的状况和公布国内剥夺民权的事实，以唤起舆论的注意。

三、协助关于争取公民权利，如出版、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的斗争。

由于本同盟不是一个政党，它的行列可以容纳一切真诚支持我们的斗争要求的人们。但是那些帮助政府压迫人民或为这种压迫辩护的人们，在本同盟中是没有立足余地的。本同盟也不容留那些只是软弱地"批评"政府个别的专横残暴的行为，而实则拥护那整套压迫人民的"合法的"恐怖制度，并支持国民党——地主、资本家、豪绅和军人的政党——钳制民主

权利的人们。

本同盟要达到上述目的，就必须反对盟内或盟外人士改变本同盟的章程和工作性质，或使它成为国民党统治体系的附属品的一切企图。这样一种同盟根本就不配得到那些诚恳地愿为我们的要求而战斗的人们的支援。相反地，我们大家都应该和这种反动的同盟作斗争。我们已经有过一个考验，可作为例子。胡适身为同盟的盟员，又是北平分会主席，竟进行反对同盟的活动，他这种行动是反动的和不老实的。胡适是同意了同盟所发表的基本原则才加入同盟的。但当国民党与张学良公开反对本同盟时，他害怕起来了，并且开始为他的怯懦寻找借口和辩解。本同盟清除了这样一个"朋友"实在是应该庆贺的，同时还要尽力防止类似事件及破坏再度发生。在这许多基本原则上，我们只有绝对团结，不能容许动摇。不同意我们的原则的人就不应参加本同盟；但如果同意而参加了，就必须坚决地拥护它，支持它。

让我们来看一看人民的民主权利这个问题。本同盟的敌人和批评者对我们的活动与原则提出了很多无稽的反对理由。民主权利是不能与震撼世界和震撼中国的斗争分开的。相反地，它和这些斗争是结合在一起的，而且是这些斗争的一部分。争取民主权利和争取政治犯的释放，对革命都是必要的。我说对革命是必要的，就是指中国获得政治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必要。不然除了投降与分裂，就没有其他出路了。没有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和中国的朋友会希望中国投降或分裂。而我也不能想象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盟员们会希望看到这种事。因此，我们的工作就是为防止投降分裂的斗争的一部分。

我想说一说本同盟几件最重要的工作。

我们的敌人和批评者向我们提出了一些满以为可以窘倒我们，使我们哑口无言的问题，如："你们要求释放绑票匪吗？"我们的答复是：绝不！绑票匪和匪徒们是今天统治中国的制度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反对这一制度。那些分子并不在本同盟内，他们是一班高官显贵与半官方人物。他们并不属于中国人民大众，倒常常是当局压迫人民大众的工具。正如美国匪帮棍徒的经济基础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和私酒的贩卖上，中国匪帮棍徒的经济基础就奠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的政权以及鸦片的买卖之上。而且，我们所反对的是正在全国及租界中进行的对反帝战士的绑架和逮捕，那是中国人和外国帝国主义分子干的，而且常常由他们的工具——棍徒们来执行。我们反对国民党政府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镇压国内的革命运动。这种勾结说明了国民党的腐败，说明了中国的利益是怎样出卖给帝国主义者的，也说明了国民党对帝国主义在思想上与政治上的屈膝。害怕跟这些罪恶作斗争的人们最好不要参加本同盟。

另一批敌人则企图吓退我们。他们问道："你们要求释放那些从事政治暴行的政治犯吗？"对这一问题，我们的答复是同样地清楚：我们不赞成个人的恐怖行为。它决不能代替群众的斗争，并且常阻碍群众斗争。但我们也明白，当人民的各种权利完全受到压制的时候，个人的恐怖行为就比通常时候普遍。使用恐怖手段的人常常是与群众或群众的组织毫无关系的。甚至在今天，许多文明国家仍在庇护一些向暴君们施行恐怖手段的人。美国、英国和法国都曾收容并保护过许多这种人物。当世界大战时，现任第二国际书记的菲特烈·阿德勒为行刺奥国军政部部长而坐了牢。群众合理地要求无条件释放他。一九一八年，奥国的革命释放了他和其他数万政治犯。

其实我们还用不着到欧洲去找这种例子。我们中国就有很多著名的例子，例如：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在他革命的时期就是一个投炸弹的刺客。蒋介石政府不是也在三月十一日释放了刺杀张宗昌的刺客郑继成吗？政府确是这样做的，因此我们破例不反对政府这个行动。我们

的要求是不要将这种赦罪的行动局限于与蒋介石政府利益有关的那些案子。我们要求释放一切政治犯。他们不是罪犯，他们是人类解放斗争的先驱者。他们中间大多数人所以被捕，全由于他们运用了或企图运用他们的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的基本权利。我们所以要求释放他们，不过是我们要求实现公民权利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中国人民的精华在监狱中被摧残得奄奄一息；而流氓、军阀、职业政客、资本家和封建地主却把持政府中的要职，把我们的国家奉送给帝国主义。这真是无比的丑行。如果要中国不成为一个被奴役的国家，我们释放所有政治犯的要求就是革命上必要的要求。

本同盟的敌人把我们中间一些人叫作共产党人，并且强辩说苏联没有民主。的确，苏联有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但这一专政是人民中绝大多数群众的统治。苏维埃的制度是司法权行政权合一的，是真正民主的国家专政机构。工农广大群众有权选举和罢免他们的苏维埃代表。因此，苏维埃才是工农大众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机构。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等权利，有史以来就没有象在苏联那样发达，别的国家也没有那样有力的群众组织。一个拥有三百万党员的政党把所有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都摆在群众面前，教育他们，领导他们，公开同他们讨论一切问题，负起了最重的工作与责任，公开地在每一步伐中作自我批评，并且为了避免错误和替群众获得最大的利益，邀请群众提出批评。青年团拥有一千万工人农民的团员，它是新的一代的伟大的教育者与组织者，这一代已经摆脱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主义观点，自觉地成长为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者。伟大的儿童组织少年先锋队进行着同样的工作。有两千万会员的工会，与这个工人的国家一致地保护着工人们的利益，帮助组织社会主义的生产，也做着伟大的文化工作。合作社有数百万社员，解决了一个伟大国家的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工作。数不尽的文化、科学及其他机构，给群众带来了文化的发展，带来了科学与艺术。新闻、文学、电影和剧院的巨大发展，全部明确有力地驳斥了我们敌人的谎言。谁能想象没有千百万群众自觉的努力，没有一个代表广大群众利益的领导，苏联能取得从消灭地主和资本家、驱逐帝国主义到完成五年计划的伟大成就呢？当然是不能的。只有当群众被吸收到整个的行政工作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及文化工作中时，才能取得群众自觉的努力，这也是同样可以肯定的。如果说反动派和一般市侩们不明白这一点，那主要是由于他们一想到建筑在剥削制度之上的旧社会必将进入一个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就不寒而栗。这时代的开端，我们今天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了。

本同盟的另一些反对者说："象英、美、法这些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不是比苏联的制度优越吗？"我的意见是：绝不。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对人民大众来说，始终是有名无实的。它只给予少数人民主的权利。甚至在"最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群众的权利也是受限制的。他们只能对资产阶级所允许讨论的问题、允许进行的选举和允许存在的政党表示意见和进行投票。然而，结社的权利还是受到限制的，游行示威必须事先得到批准，不然就要被殴打。此外，工农更受到种种阻碍：所有大印刷厂、出版社、教育机关和大会场，除了很少的例外，全在资本家的掌握中。民主只是形式的，只是宪法上的具文，只有在它不妨碍资本家剥削者掠夺人民的"权利"时，才被允许留存。事实上，这些"民主"制度不过是严密保障着一小撮剥削者的权势的一种制度。这些制度的"民主权利"不过是掩盖这一小撮剥削者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独裁统治的烟幕。但是连这一点形式的民主，在它与资产阶级的利益发生抵触的时候，也要被取消的。在上次世界大战中，我们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全看到这一点，最近我们在别的许多国家内也看到同样的情形。战后，意大利的法西斯分子在

资产阶级“民主”机构的废墟上建立了独裁。至于德国工人在一九一八年革命中获得的民主权利，其最后的残余在今天的德国也正在被消灭中。在英国、比利时、法国和美国的每一次大罢工中，我们都看到对工人们所施用的围攻与恐怖手段，并且公开宣布其目的为保障少数资本家的利益。反对广大人民的阶级压迫越来越凶恶；它粉碎了资产阶级形式民主的体制，为法西斯主义的恐怖统治开辟了道路。

在欧美存在着这些情况，中国的情况如何呢？国民党更糟糕。它的法律据说是为“人民”谋福利的，而实际上却公开地、无耻地为极少数的封建地主、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的利益服务。有关“人民”的纸上法律只是一种宣传，内容完全是空洞无物的。每天都发生极端残酷地镇压工人、农民和学生的事件，这就说明了真实的情况。甚至当日本侵略上海时，工厂老板竟以此为借口来减低工资与延长工时，而当局也按照他们的一贯做法，乘机加强对人民的反动压制。东北和热河被公开奉送给日本帝国主义，这也变成了进行新的镇压与压迫的借口。最近在汉口，当局就利用热河事变颁布了许多新法令，其中一条说：外人所办的工厂中的工人，如果为争取改善生活情况而直接同资本家谈判，因而“造成了严重局势”的话，一律处死！这命令宣称，凡企图组织社团或集会者将立即加以逮捕！上海和各地国民党对各种报纸实行新的检查，以防止中国人民知道真实情况。可是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却对中国的情况、政府的每一措施和军队的每一调动都了如指掌。只有中国人民被蒙在鼓里，希望靠这样可使他们更容易地受人欺骗剥削，使他们不致起来反对投降，保卫国家。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敌人和反对者在思想上是受了资产阶级论点和对“民主”的幻想的影响的。他们喜欢指摘苏联国内也有压迫。那末，让我们再以苏联作一个比较吧。譬如：全世界——在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在苏联，都有陆军海军；但是，它们的功用是多么地不同呵！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部队是为了进行侵略，为了压迫殖民地人民，为了进攻象中国这样的弱国，为了保护他们已经建立的(用武力建立的)、掠夺自己的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的“权利”。在中国，军队几乎全是用来进行军阀的混战和镇压为自己权利而斗争的工人和农民。然而在苏联，军队却是为了保护人民，抵御充满敌意的资本主义世界在积极准备的新干涉战争的。帝国主义的军队可以在中国土地上横行无阻，但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兵士只要把鼻子伸过苏联边界，就会被打得头破血流。反人民的少数剥削者的使用武力与反对少数剥削者的广大人民的使用武力，其间也有同样的分别。对于前者，使用武力是为了支持残酷的剥削与奴役的制度，为了阻碍社会向更高的阶段发展，尽管资本主义已经证明完全破产，已经显示虽然人类劳动生产力大有增加，它还是没有能力来供给群众粮食、衣服和房屋等生活必需品。在后一种情况下，以前一向受剥削的人民大众使用武力，是为了反抗千方百计要想夺回已失的权利的少数人。在这种情况下，武力就成了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使用的一件武器，为社会向更高阶段前进与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而使用的武器，而不是用来奴役人的武器。

有人或许要问：“你既然不相信资产阶级民主，为什么还要在中国为民主权利而斗争呢？”回答很简单。第一，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与人民大众的民主权利是截然不同的。为了民主权利，工人农民将永远斗争下去，因为他们一旦得到了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的权利，他们就得到了一个更有利于发展他们争取最后解放的斗争的基础。在这个斗争中，我们必须和中国的民众站在一起，提醒他们不要信任国民党的纸上诺言，例如新宪法中最近提出来的“人权”，而要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和力量。

第二，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中国正受着被帝国主义世界瓜分的威胁。这一瓜分过程，几十年前就由帝国主义开始，而日本帝国主义正在进行的全面战争更加速了这一过程。谁能想象不唤起全体人民参加民族革命战争就能击败日本帝国主义呢？谁能相信在这个战争中封建的国民党军人和将军们能够领导人民呢？如果有人那样想，请他看看东北和热河吧，请他注意一下华北进一步的发展吧，在那里我们看到蒋介石政府为了直接和日本谈判，正通过帝国主义在北平的外交官们从事一个秘密的幕后阴谋活动。报纸所以被国民党检查官严格审查，是因为蒋介石政府正在秘密出卖中国。他们不让中国人民明了真情。可是中国人民却必须为这次以及其他许多次祸国殃民的事件付出代价。如果人民大众不来阻止，结果就是中国被瓜分、被灭亡。凡关怀中国和中国人民大众的利益的人必须明白：要使人民广泛地组织起来，掀起对帝国主义的抵抗，肩并肩地在一支不可征服的队伍中前进，用民族革命的精神来反对中国的一切敌人，不论谁当权，群众都必将从他们手里夺回他们的这些民主权利。如果他们与中国要生存下去，他们就一定会而且必须这样做。这就是斗争的伟大的一方面，我们的同盟只不过是这个斗争的一小部分而已。我们越是记牢这一点，我们就越能完成我们的日常工作，就越能得到更广大的群众的信任。

民权保障同盟还必须对另一个可怕的罪恶进行毫不妥协的战斗。那就是虐害政治犯的制度，这种制度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一个反帝战士或一个共产党员被捕之后，他几乎总是受到毒打或其他酷刑，有时甚至因而丧命，来逼他供出警察所要知道的事情，强迫他出卖同志和组织。与酷刑并施的是迫使政治犯“悔过”的整套办法。这些“悔过书”一般都是公开的宣言，政治犯宣告他们背叛从前的信仰，现在接受国民党的纲领。所有这些公开宣言，虽然每次都签上不同的名字，但读起来却是一模一样，词句雷同，全象一个人或一批人按照一个公式写出来的。这些用酷刑逼出来的、或者是假借那些束手待毙的犯人的名字发表的宣言，适足以使这个酷刑和腐败的制度臭名昭彰。它们暴露了使用这些方法的这个制度的弱点，它不用拷打和杀害反帝战士的方法就无法维持下去。它们也说明了国民党本身不能得到人民大众的任何尊重，而必须要借用被捕的革命志士的名字才能使人注意。但这些方法骗不了人。我们很明白它们是怎样被逼出来的。我们也知道如果政治犯相信国民党，他们以前有自由的时候就早已加入国民党了。事实是，只是刑具和死亡的阴影才逼着革命犯人宣称支持国民党。

中国有许多所谓“知识分子”，胡适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个，除非酷刑在他们的眼前施行，他们是不相信监狱中施用酷刑的。可是，有那一个犯人敢在狱吏面前公开说话呢？有那一个狱吏会让调查者看一看刚受过酷刑的囚犯或者让他亲眼看看酷刑的场面呢？连最温和、最软弱的人都承认，在中国的土牢中政治犯象牲畜一般地被锁在囚室里。他们甚至认为这是自然的事。而帝国主义者，一方面用同样的方法对待政治犯并且督促中国当局继续如此办，一方面却以此为借口，说外国人不能受中国法律管辖。可是，我所关心的并不是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假惺惺。我所关心的是塞满在牢狱中的中国青年们。想想吧！男男女女，时常是些男孩女孩，这些中国的精华，被判定多少年地坐在肮脏的监牢中，吃的是不堪下咽的食物，不能与外界互通信息，没有书报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锁在沉重的枷锁上。他们没法反抗酷刑，无力抗拒狱吏的蛮横，只有依靠我们在外面的人把他们从垂死中拯救出来。因此，从土牢里拯救上万的政治犯是本同盟的一桩重大的任务。

我们更要为政治犯们组织法律的保障，要尽可能给他们法律上的援助，使他们的案件能

够提出来公审。我们必须要求立即废除用任何方式限制公民权利的一切法律和条例，象“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之类。我们必须反对新提出的宪法中那些假仁假义的条款，这个宪法刚说到各种基本权利，跟着就用一些“依法办理”之类的词句，把它们收了回去。这种词句实在的意思就是：民权只有国家的极少数人，也就是剥削者和为剥削者张目的知识分子才能享有，迫切需要民主权利的工农大众却是不能享有的。

我们的另一项工作是必须摧毁审问政治犯的秘密法庭，在那种地方不仅是最起码的公道，而且连人的基本权利也一齐遭到玩弄与蹂躏。在这种法庭上，政治犯受到种种酷刑，没有任何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并被秘密地送进监狱去苟延残喘，或送上刑场。我们更必须与外国帝国主义者在租界施行的秘密拷打和秘密“罗织成罪”的办法作斗争，帝国主义者根据最轻微的口实进行逮捕，用特务——他们一般都是棍徒——捏造的证据引渡被捕的人给中国当局去重受酷刑、监禁和屠杀。拷打和屠杀中国人民的外国人和中国人，他们的罪行必须加以制止。我们要求释放数万中国政治犯，我们也必须要求立即释放保罗·鲁格夫妇。他们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但是，另外却有一批人应该监禁起来，象英帝国主义分子伍德海。那一个国家能让这样一个冷血动物胡作非为，天天游说中国将军，要他们带领军队投降日本呢？

那些自以为可以无限期延长他们对人民的血腥统治的人是大错特错了。人民大众一定要为他们的基本权利而斗争。这个斗争会加强起来，会席卷全国，会使中国强大和统一。这就回答了我们敌人的最后一个问题：“你们拥护革命吗？”我们并不是一个革命的政党。我们的任务十分有限。但是，我们生在革命的时代。世界六分之一的地区已经完成了革命，古老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众正为伟大的斗争而集合起来。殖民地的人民必须集中力量，粉碎帝国主义统治的枷锁。中国今天看来似乎没有力量，但明天一定会解放自己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战争是一个事实。但革命的形势也同样是一个事实。不是革命在中国胜利，就是帝国主义征服和瓜分中国。别的道路是没有的。我相信中国人民的最后胜利，所以我相信革命一定会建立自己的权利，建立中国的统一、独立和完整，以及人民自治的权利。我以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就是推动我们达到这个目标的工具之一。

（《为新中国奋斗》，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

国民党统治的日益法西斯化

为要“围剿”苏维埃红军，为要镇压抗日的群众运动，以及破坏武装抗日的发动，必须强化反动的政治机构。在这方面，蒋介石确做了一些工作。

首先是独裁化。据一九三一年六月，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五院正副院长，各部会长“以国民政府主席之提请，由国民政府依法任免之”（见该法第十六条）；十七条又规定国府主席有“公布法律，发布命令”之权，这就是说所有全国的一切军政大权全由国府主席一人独裁，而当时国民党就是执行这个独裁的人。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通过的“国府组织法”，规定国府主席和五院院长，“均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见该法第十条），国府主席不负实际政治责任，五院长则“各自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十一、十五条），这样骤然看来，似乎已经不是独裁制了，可是中执会之上，又有“中央政治会议”，该会常委为蒋、汪、胡三人，汪精卫是有名的姨太太，胡汉民始终未曾入京，因此，中政会议以至整个的南京实权，也仍旧是蒋介石一人包办。

蒋介石为要巩固这种独裁的政治制度，于是效法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先后组织中央干部俱乐部（即CC团）和复兴社（即蓝衣社），采用特务的和西欧的法西斯主义反革命的方法，来巩固其统治。早在一九二九年就由陈立夫、陈果夫、徐恩增等组织CC团，专门担任反动的特务工作，其活动范围，主要是在国民党党部，政府机关里头，它的成份，主要是那些吃党饭的人和一部分腐化堕落的知识分子。

复兴社（即蓝衣社）是于一九三二年三月正式成立的。当时的负责人为刘健群、戴笠、陈诚、康泽、贺衷寒等。它的成份多为军人与青年，据他们自己说，他们之所以要组织蓝衣社，是因为“过去的革命工作已经破碎无遗，必须重新来一番革命，因此也就一定要个新兴的革命组织，来担当革命，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责任”，是因为“自由主义已日就没落，大多数国家，都倾向于统制化之一途，厉行一党专政，领袖独裁”。蓝衣社的特点，在理论上主张政治集权，在组织上，实行绝对的独裁制，所谓“领袖超越一切”“一切服从领导”，它的纪律，从记过、苦工、禁闭、停止或开除社籍直到死刑。（以上材料均见一九三六年四月出版的“我们的训练”）它的内部共分四系：其一为戴笠之特务系；其二为陈诚之军事系；其三为康泽之别动系；其四为贺寒衷之政训系。此外在全国各地设立青年励志社等，以为吸收社员的外围组织。

在“四次围剿”失败后，复兴社先后成立“庐山军官训练团”“行营剿匪别动队”“军事教育总队”等，以造成其中坚干部，其工作的主要对象是在军队中，这是同CC团主要不同的地方。

但不论蓝衣社也好，CC团也好，“特务化”和“法西化”是其主要的特点，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反对共产党，破坏革命运动，绑架或暗杀一切反蒋的革命分子。

特务化的CC团，与法西斯化的蓝衣社，事实上代替了国民党。国民党那时已经成了半

生不死的躯壳了，这两个小团体都是集中在“领袖”一个人绝对的领导与统治之下的，这两个团体内部也有很多的矛盾，但这种矛盾正便利于“领袖”的统治。

独裁化的另一表现，是军权高于一切，只要谁有军队谁就支配一切，因此，小军阀则统治地方各省各界，大军阀则统治全国。在事实上据一九三四年统计，全国二十二省中，有二十省是完全在军人统治下的，除江苏、陕西两省，其余二十个省府主席都是纠纠武夫。其实江苏、陕西虽表面上的省府主席不是军人，但他们也是受军人支配的，可不是吗？请看南京政府的组织和法律。

在南京，国民党的最高组织为“中央政治常务委员会议”，可是除此以外，又有一个“军事委员会”，这个军委受谁管呢？受委员长管，委员长受谁管呢？受“中央政治常务委员会议”管，中常会是由谁支配呢？又是委员长。这就是说，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就是全国政治上的统一独裁者。地方，原是党政军三头分治，但从一九三二年秋，党政委员会成立之后已经变为事实上的军人专政。所谓党政委员会，就是把所有党务政治等问题收归该会掌握。用蒋介石自己的话，就是“把党务和政治的一切问题统统归纳在本会（即党政委员会）指导之下来负责任，并由本席兼总司令的名义来负这责任，处置一切”。（见蒋对汉口政委会演词，一九三二年八月）

到一九三三年七月，南京又颁布了“剿匪区内各路总司令处理地方党政事务暂行条例”。更加明文规定把党务政治集中于军人一身，例如该条例第三条规定：各路总司令“(一)对管区内各级行政官吏如认为有不称职或犯罪行为者，将咨请省政府撤惩，或遴选适当之人员咨请省府委任，遇必要时，并得先行处置……；(四)关于剿匪政治设施之各部分，……认有变更之必要时，得遂请行营核夺施行；(五)凡与剿匪无直接关系的地方政治……也受各总司令的指挥监督；(六)各级行政官吏之命令或处分，如认为违法或失当时，得停止或撤销之”。

又如该条例的第七条规定各路总司令：“对管区各级党委及其他办理党务之人员，如认为滥用职权或犯法营私者，……得声请依法惩处。必要时，并得先行看管或为其他必要的处置。对管区内各级党部之决议或行动，如有抵触法令违背纪律及其他足以惹起地方人民不良之影响者，得警告或制止之，对管区内各级党部之组织，如认为不健全或与剿匪军事之进行不能努力协助者，得声请改组，必要时得暂时停止其活动。”这不是军权高于一切是什么呢？

南京政府为要强化统治机构，曾经施行了许多“改革”，例如增加统治层级，加强下层的统治组织，注重下级人选等等。

拿统治层级来说，九一八前，南京政府的统治层级，原为省与县两级，九一八后增加为四级。我们知道，凡是专制反动的统治，则统治层级必定较多，例如清朝，在省之下分道、府、州、县，在县之下，则有团、都等组织，国民党也效法于此，一九三三年八月，行政院颁布了“行政督察专员暂行条例”，一九三五年一月，又颁布了“剿匪省份各县分区设置办法大纲”。在前一个条例中规定离省会较远地方，“因有特种事件发生，得临时设置督察专员，帮助省府办理该区域地方行政”（第一条）。“行政督察专员的职权，可以调遣该区内的警察和保卫团队”（第十一条）。在后一个办法中，规定每县划分为三区至六区，设区长一人，帮助县长在该区内处理所有大小各事。这样一来，原来的省县两级制，便变成省、专员、县、区的四级制了。

拿加强下层的政治机构来说，首先便是注重县长人选。一九三三年一月，鄂豫皖三省剿

共总部颁布了"匪区内县长任用限制办法"。在这办法中，严格规定县长的资格必须经过考试，必须有稳固担保，才能有做县长的希望。又规定本县及邻县人不得做县长，实行效法清代的"回避政策"。蒋介石对于县长人选问题非常注意，他认为"县长是政治的基本力量"，并且要县长们努力去找寻"地方上的正绅"，去聘请"十室之内的忠信"出来担任地方上的下层行政工作（详见蒋介石一九三三年七月对湖北各县长的演讲——全集第二编一百五十一——一百五十八页）。一九三四年八月又颁布"县行政人员训练办法大纲"，规定县以下各级行政人员必须施行训练，各省行政人员也如此。

国民党强化统治的另一个办法，就是加强地方武装组织。为了这，国民党也颁布了许多条例，其中最重要的是"剿匪区内各省民团整理条例"。在这条例中，约有下面几个要点：第一、是统一名称：凡各县的武装民团，一律改称为保安队，凡武装不全或无武装的民团，在红军未到之前，称为壮丁队，在红军曾到之处，则称为"剿共义勇队"（见该条例第三条）。第二、是划一编制和指挥，凡保安队都以中队为单位，中队以上为大队、总队；壮丁队和"剿共义勇队"则每保编一小队，合小队为联队，区队、县总队均由区、乡、镇、保、县各级首长指挥(见该条例第四、五、八、十、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各条)。第三、是严定训练人选：除由县长兼大队总队长外，必须经过保安处长担保以及经过总部批准之人，才能充任副队长和教练员。第四、是从新划清保安队与壮丁队的任务：规定前者负责维持本县治安，尽力于邻县防务的协助；后者则规定专任警戒、通信、守护、运输、工程等等。第五、是规定自官佐至士兵，一律具联保切结。这样一来，各地方武装组织，便变成了一个相当坚强的反动武装队伍了。

国民党在强化政治机构中，最重要并且最值得注意的，是保甲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保甲制度曾经是历代统治阶级强化反动统治制度中的重要杠杆。从周朝到清朝，几乎没有一代的统治者不利用这个制度来压迫中国人民。跟着清朝皇帝的被推翻，这个制度也松弛下来，谁知到了南京政府手里，却从新把它厉行起来。在一九二九年三月国民党的"训政时期施政纲要"上面，明明白白规定"实行各县地方自治"，并且为着"促进地方自治"，南京政府曾经颁布许多法令。可是到一九三二年八月，鄂豫皖三省"剿共"总司令部忽以"严密地方民众组织，彻底清查户口，增进自卫能力，完成剿匪清乡工作"为借口，颁布了"缓办自治，专办自卫"的"剿匪期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

为什么要实行保甲制度呢？从鄂豫皖"剿匪总部"的解释，是为了要"清查户口""严防奸宄""安定地方"。关于这一层，在蒋介石给各省政府的命令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他说：

> "欲谋地方安定，只有沿用家族制度中的家长以严密民众组织之基础。乃可执简而驭繁，否则事事均须直接个人，一切付诸全民公决，非特一盘散沙，无从掌握，且恐绝对无法应付目前严重纷乱的环境。"

单从这几句简单的话中，也可以知道国民党为什么要采用保甲制度了。

至于保甲的内容如何？它做了些什么东西，得到什么成绩，我们不妨根据该条例及客观事实来加以概括的叙述。

据保甲条例第二条说："剿匪区内各省县长应根据实际情形，划分全县为若干区，依照本条例之规定，限期编组保甲，清查户口……。

第五条　保甲之编组，以户为单位，户设户长，十户为甲，甲设甲长，十甲为保，保设

保长。

第八条　户口之编查由县长监督行之……。

第九条　清查户口应按编定各户挨次发给门牌，令其照填，张挂户外……不得遗失毁损……。

第十一条　户口查竣后，保长应将保内壮丁人数呈报区县长，寺院之僧道亦同。

第十三条　甲长由本甲内各户长公推，保长由本保内各甲长公推……。

第十六条　甲长之推定或变更，由甲内户长联名报告于保长，保长之推定或变更，由甲长联名报告于区长……。

第十七条　县长区长查明保长甲长不能胜任，或认为有变更必要时，得令原公推人另行改选……。

第十八条　保甲编定后，保长即召开保甲会议，协定保甲规约，共同遵守，其规约中应行订定下列各项：一、(略)二、关于编制门牌调查户口；三、关于境内出入人之检查取缔；四、(略)五、关于匪患之警戒通报及搜查；六、关于防匪碉楼堡塞或其他工事之筹设；七、关于公路干支线之修筑及交通设备之保护……。

第二十条　保长承区长之指挥监督，负责维持保内安宁秩序之责，其职务如左：一、监督保甲长之执行职务；二、辅助区长之执行职务；三、教诫保内住民毋为非法；四、辅助军警搜捕匪犯；五、看管参加反动或曾受匪胁而现已悔过自新者；六、处罚违反保甲规约；七、分配督率保内应办防御工事之设备或建筑；八、执行规约上之赏恤；九、处理怠政罚金……。

第二十一条　甲长承保长之指挥监督，负维持甲内安宁秩序之责。(其在甲内的职务和保长大略相同，故从略)。

第二十三条　各户之户长除……一律加盟保甲规约外，应联合甲内他户户长至少五人，共具联保连坐切结，声明结内各户互相劝勉监视，绝无通匪或纵匪情事，如有违犯者，他户应即密报惩办，倘瞻徇隐匿，各户应负连坐之责……。

第二十四条　各户户长，遇有形迹可疑之人潜入，或留客寄宿，外出旅行及归来，和发生死亡等情，即应报告甲长……。

第二十五条　保长甲长知户口有异动，或接受保甲户长通知时，除速报上级外……得……紧急处分。

第二十六条　保长甲长……得随时召集保内甲内各甲长户长分配任务。

第二十七条　保长甲长……应办救灾御匪或建筑碉堡公路等事务，须多数居民工作时，得将保甲内十八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之男子编成壮丁队，由保长甲长督率分任之，……遇军警搜捕匪共，或攻剿匪共时，应受军警长官之指挥，尽力协助于搜捕追剿……虽……僧道及船夫，亦不得免其差。

第三十条　保内之住户，如有枪枝，即行呈报区县，……违者以私藏军火论。

第三十二条　保甲经费得向保甲内之住户征集之……。

第三十五条　凡保甲内住民有勾结窝藏赤匪，或纵脱逃者，除依刑法及其他特别法令，从重惩罚外，凡甲长及曾具切结联保之各户长，应各科以四日以上，四十日以下之拘留……。

第三十六条　违反下列各项之一者，科四元以上，四十元以下之罚金：一、拒绝加盟于

第十八条所指之保甲规约者；二、拒绝或延交保费者；三、遇有第二十四条所列各款之情形而不报者；四、填报户口不实，或任意销毁门牌者；五、拒绝编入壮丁队者；六、凡经分配工作而不遵办者；七、怠于执行保甲规约上所规定的任务者……。”

我们不惮琐碎，引了这许多条文，为的是要使得大家明白保甲制度的整个内容。当然这许多条文不能也用不着逐条解释，只要指出其中的几个要点就行了。第一、这一个制度是相当严密的东西，因为它把保甲内所有的人民，不分职业、地位、性别、年龄一律组织起来，而其中最要命的就是这个连坐法，使得老百姓互相监督，互相看管，除了反抗之外，便很难逃得出这个制度的压迫。第二、这个制度是由上而下即是由县长、区长派人强制人民来组织，并不是出于人民自己的愿意和需要。第三、保长、甲长表面上是由保甲内住户选举，但实际能够当选的多是土豪劣绅，因为没有权势的贫苦人家不但不能当选，就是当选了也无法干，而县长、区长还可以借口“不能胜任”，另行改选。第四、这个条例上，对于人民只规定有种种任务和责任，但没有半点权利，并且对于人民所应负的义务，则规定得无微不至，建筑碉堡及其他防御工事要人民做，修公路和运输内战用品等要人民做，甚至连老百姓的婚姻、丧家、出生入死都要一一呈报政府，否则就受惩罚。第五、保甲所有经费，是由保甲内人民负担，这样的结果，不但增加了老百姓的负担，并且土豪劣绅辈更可从中敲诈勒索、乘间渔利。第六、保、甲长的职权，条例上已经规定为政府官吏的助力，可以“监督”“教诫”“看管”“处罚”“督率”保甲内的人民，但实际执行起来，则不止这些，简直做了乡村中的土皇帝。最后对于人民的武器的限制之严，可与日本在东三省收缴民枪先后媲美。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奴隶制度！

象这样的保甲制度，人民对于它不消说是没有好感的。这儿且引湖北各地一句流行的俗语来证明，它说：“保甲，保甲，人人披锁又带枷，保长去拿锁，县长去掌把(印柄也)”，这就是人民对保甲制度的态度啊！

这个保甲制度，当然，对于国民党确曾做了许多事情，江西的碉堡，是从保甲制度实行后，由保甲长督率江西老百姓日夜赶筑成的。高唱入云的“公路建设”“军事建设”（如飞机场）“水利建设”等等，也差不多大部分是由保甲长强迫各地人民来建筑的。甚至政府许多的征税、收粮、抽饷等等，也是靠保甲长来执行的。怪不得到现在为止，国民党还死死拿着这个制度不肯放手。

*　　　　*　　　　*

上述那许多“办法”、“条例”、“大纲”之类的东西，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先从“剿匪区域”开始，然后推广到全国，这就是说，国民党要把全国人民当“匪”来处理。

（转自《从“九一八”到“七七”国民党的投降政策与人民的抗战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一九三一年一月三十一日公布）

第一条 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有左列行为之一者处死刑：

(一)扰乱治安者，

(二)私通外国图谋扰乱治安者，

(三)勾结叛徒图谋扰乱治安者，

(四)煽惑军人不守纪律放弃职务或与叛徒勾结者。

第二条 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有左列行为之一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一)煽惑他人扰乱治安或与叛徒勾结者，

(二)以文字图画或演说为叛国之宣传者。

第三条 有左列行为之一者处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为第一条第四款之罪犯所煽惑而不守纪律放弃职务或与叛徒勾结者，

(二)为第二条第一款之罪犯所煽惑而扰乱治安或与叛徒勾结者，

(三)为第二条第二款之罪犯所煽惑而为之展转宣传者。犯前项之罪而自首者，减轻或免除其刑。

第四条 明知其为叛徒而窝藏不报者，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犯前项之罪而自首者，减轻或免除其刑。

第五条 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有左列行为之一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为叛徒购办或运输军用品者，

(二)以政治上或军事上之秘密泄漏或传递于叛徒者，

(三)破坏交通者。

第六条 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或集会或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者，处五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七条 犯本法所定各罪者，在戒严区域内由该区域最高军事机关审判之，在剿匪区域内由县长及司法官二人组织临时法庭审判之。

临时法庭设于县政府，以县长为庭长。

第八条 依本法判处各罪，由军事机关审判者，应附具案由报经该管上级军事机关核准后方得执行；由临时法庭审判者，应附具案由报经高等法院核准后，方得执行，并报省政府备案。

该管上级军事机关、高等法院对于所属审判案件认为有疑误者，应令再审或派员会审。

第九条 军警机关逮捕本法所指犯罪行为之嫌疑犯时，应立即通知有关之主管机关。

第十条 本法未规定者，适用刑法之规定。

第十一条 本法有效期间及其施行日期，以命令定之。

《暂行反革命治罪法》，于本法施行之日废止。

（原载《东方杂志》28卷3号）

〔附〕中美航空新合同

（一九三〇年七月三十日交通部发表）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交通部与美国飞运公司订立合同

兹由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交通部（以下简称甲方）与依据美国一九二二年在华经商条例组织设立之美国飞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为合组股份有限公司起见，双方签立合同，订明条款如左：

第一条 组织

第一节 双方本于合作之精神，同意遵照中华民国法律，共同组织一股份有限公司，定名为中国航空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经营在中国之航空载运为业务。

第二条 公司之资本

第一节 公司资本总额，定为中华民国国币一千万元，共分一万股。每股一千元。甲方有权认五千五百股，乙方有权认四千五百股，均须依照本条第六节之规定。

第二节 甲方在沪蓉航空管理处及原中国航空公司之资产应移交于公司，并就其所投资之数额，由公司发给甲方股份七百十二股。

第三节 乙方之资产应移交于公司，并就其所投资之数额由公司发给乙方股份一千七百二十三股。

第四节 公司除依照本条第二节之规定发给甲方股份外，再派给甲方股份一千五百零二股，按照额面缴付股款。

第五节 公司除依照本条第三节之规定发给乙方股份外，再派给乙方股九十股，按照额面缴付股款。

第六节 公司资本总额内其余之股份，须依股东会之议决，定其缴股之时期及方法；但关于其余股份缴股或公司资本增减之议决，至少须有已发总股份十分之八之同意。

第七节 公司股票须为记名式，除经已发总股份十分之八以上之同意外，不得转让股份。

第三条 管理及监察

第一节 公司之管理权属于董事会，董事会由董事五人组织之。五人中三人由甲方选任，二人由乙方选任。如经股东之委托，董事得为股东之代表，并在股东会出席。董事会有董事四人出席，方足法定人数。董事会之决议，除本合同有特别规定外，以出席董事过半数表决之。

凡关于公司债之发行、其他方法之借款、或负担债务、不动产或飞机之购置、而价值超

过国币二万元以上者；公司与邮政总局同日所订之邮运合同、或与中华民国政府、或与政府内任何机关将来所订之任何合同之解除或缔结、或各该合同内权利之变更放弃：以上各件之议决，至少须有公司已发总股份十分之八之同意通过之。

第二节 董事会应就董事中选举董事长一人，副董事长两人。

董事长及一副董事长、归甲方提出，其另一副董事长归乙方提出，董事会应依所提出者选举之。

董事长依其职权，当然为公司总经理，并为董事会之主席。董事长不愿主持董事会事务，或不愿执行董事长或总经理职务时，得委托副董事长一人代理之。

第三节 董事会之下分设左列三组：

(甲)营业组；

(乙)财务组；

(丙)机航组。

各组之主任、副主任均由董事会任命；但营业组主任、财务组主任、机航组副主任、归甲方提出；机航组主任、营业组副主任、财务组副主任、归乙方提出；应依所提出者任命之。各组之职员，由各该组主任荐请董事长委派之，但为使公司基础得臻稳固起见，公司职员人数务须最少在足以执行并发展公司业务所必要之范围内由董事会决定其员额。公司职员之薪俸额，须以同样职务人员通常所受之相当薪俸为标准。

第四节 自本合同依第九条第二节所规定发生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双方应开会议，以便制定公司章程细则及其他一切规条，并设立董事会。

以上均须依照本合同办理。十四日内，更须开第一次董事会，并按照上开规定选出董事及董事长。

第五节 公司设监察二人，由甲方指命一人，乙方指命一人。

第四条 财务

第一节 本合同第二条所规定之公司股款及公司航空载运邮件客货及其他所收入之款，均为公司之资财，应存储于双方所同意之中国国籍之银行。

第二节 公司付清营业开支后，所余之款项，须另行存储，以备增加设备及改良所必需之费用，并派给股东股利；但股利须俟公司一切营业开支付清债务本息算结并提相当公积金后，始得派给。

第三节 公司之一切支出均用支票，支票须由受委派之二人签名，其一人由代表甲方之董事委派，另一人由代表乙方之董事委派。

第四节 公司之簿记、会计，均须用最新式之制度、簿记应用中文，并以中文记载为凭；但遇乙方要求时，亦须兼用英文记载。

凡簿册每月须有可靠之注册会计师审核之。

第五条 航空路线

第一节 公司应经营下列诸线之航空邮运事项。

第一线上海南京九江汉口宜昌万县重庆成都，

第二线南京徐州济南天津北平，

第三线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厦门汕头广州。

公司须首先开办第一线，一俟有成绩后，应即开办第二线及或第三线。

如公司在本合同发生效力后三年内迄未开办第二线及或第三线，则公司当然丧失第二线及或第三线营业之权利，但确因不可抗力致公司在二年内不能开办此两线者，不在此限。

第二节　各种航空邮件在上列路线者，公司按照其与中国邮政总局同日所订合同上之条款，有航空载运之专利权。

第三节　航空邮件之邮费及接受及处置邮件之一切章程规则，均应按照公司与邮政总局同日所订之合同办理。

第四节　公司亦得在上列三线航运客货；但非专利，并不得因而妨碍航空邮运之安全及效能。

第五节　遇有军事必要时，军政部得命令公司之飞机离开堡垒及或军事重要地带，在安全之处绕道飞行。

第六条　经营

第一节　乙方应于本合同核准有效后，即将技术上经验供甲方之用，受其指挥并与合作，以图本事业之增进发展。

第二节　公司固定政策，雇定中国人员充当公司职员、驾驶员、机械师，乙方在中国及美国应使中国人有充分机会得受驾驶员之训练，同时应使中国人有充分机会得受机械师、无线电管理员之技术上训练，并使得受关于航空载运一切事项之实地经验。

第三节　凡飞机及机件以最优等并最新式者为限方得购买，并应尽先采用中国制造之物，如不能得中国制造之物，始得尽先采用美国克特司武莱得飞机厂之制造品；但国币一千元价值以上之航空物品，应一律用投标方法购买之。

第七条　空港及升降场所

第一节　甲方在可能之范围内，准许公司使用在上开各路线所有之各空港及沿途之升降场所，但公司应缴纳相当租金。

第二节　上开各路线之必要地点，如无空港及沿途升降场所时，应由公司担任此项之设备。

第八条　无线电

第一节　为使飞行安全起见，甲方允准公司有权装置维持并使用适宜之收发无线电报机及无线电话机，并允将相当长度之电波供给公司使用。此种关于无线电之权利，专供公司与各站及各飞机间传递消息之用，以维持公司业务之效能；但一切商用之通信及其他与公司无直接关系之通信，概不得传递。

第九条　合同

第一节　甲方应允对于公司所有之物件及其他财产，给与合情理之保护。

第二节　本公司合同由双方签订后经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核准备案，并正式用书面通知乙方，始生效力。

第三节　本合同自批准发生效力之日起，以十年为有效期间。期满前一年，若任何一方未以书面通知对方本合同终止，则本合同除十年有效期间外，继续有效用五年。

第四节　本合同期满时，甲方有权平允估价买收公司所有之一切财产。

第五节　双方对于本合同如有争执时，应将该争点提交公断，每方各推举公断员二人，该四公断员合推公正员一人，如原举之四公断员不能得多数同意时，由合推之公正员决定之。

第六节　甲方受原中国航空公司之委托与乙方同意，俟本合同批准有效时，下列各合同当然即行终止失效，凡各该合同所规定或发生之权利均行消灭：

(一)民国十八年四月十七日原中国航空公司与美国航空发展公司所订之航空邮务合同；(该合同系后经美国航空发展公司移转于乙方者；)(二)民国十八年四月十七日原中国航空公司与美国航空发展公司所订之创办经营航空学校工厂航空输运合同；(该合同后经美国航空发展公司依法委托乙方代为取消者；)(三)民国十八年七月十六日原中国航空公司与美国航空发展公司所订之空港金币借款合同。(该合同后经美国航空发展公司依法移转于万国航空公司更由万国航空公司依法委托乙方代为取消者。)

原中国航空公司依上开航空邮运合同之条款所给与乙方之左开各期票，应即同时销灭。

期单数	日　　　期	金数（概以金币算）
第一号	民国十八年十一月一日	金币一三、六七〇·五七元
第二号	十八年十二月一日	二八、七八七·〇五元
第三号	十九年一月四日	一七、〇五九·六一元
第四号	十九年二月一日	二八、三六〇·五七元
第五号	十九年三月一日	三二、八七一·二九元
第六号	十九年四月一日	二九、五八八·三九元
第七号	十九年五月一日	三二、〇六九·五六元
第八号	十九年六月一日	三八、八六七·二〇元

本节所载之原中国航空公司系民国十八年四月十五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所特设，而为中国政府所有者。

第七节　本合同兼用中英两国文字订立，共制四份，双方及公司各执一份，其余一份应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备案。

关于本合同解释发生疑义时，以中文合同为标准解决之。

第八节　本合同对于任何一方之合法承继人均有拘束力，但该承继人须以中国或美国之国籍人民为限。

本合同于中华民国十九年七月　日即西历一千九百三十年七月　日在中华民国南京签订。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交通部长

美国飞运公司代表

（原载《东方杂志》27卷17号）

〔附〕中美棉麦借款合同

（一九三一年七月和一九三三年六月）

原编者按：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延续的年份。美帝国主义于一九三一年七月八日，和蒋介石政府签订了一项美麦借款合同；一九三三年六月四日，宋子文参加世界经济会议路过华盛顿，又和美国签订一项中美棉麦借款合同。

美帝国主义以取得中国统税及海关收入为担保，与蒋政权成立这样两个合同（而且还取得了对于借款的保管、支配、监督等附带权利），这固然是为它本国濒于破产的农业生产寻找出路，援助蒋介石进攻江西根据地和排除异己，同时也是为要一步一步把蒋政权紧紧地掌握在它的手中，和正在进攻中国的日本侵华势力相对抗。因此，日本统治阶级对中美两国成立借款合同就极为不安，同样以各种手段和美国的侵华阴谋相敌对，乃至采取更加积极的步骤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

一、美麦借款合同

（一九三一年七月八日）

（一）美国粮市评价委员会经农部核准愿售美麦（二号西白麦）四十五万吨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国民政府愿承购此项麦粮，其装运上项麦粮至美国沿太平洋口岸上船之费用由美国负之。

（二）上项麦粮卖主有代以麦粉之权，但麦粉数量至多不得逾总数之半，麦粉价格以比价定之。

（三）起运美麦之美国，沿太平洋口岸由卖主择之。每次运麦数量如下：九月底及十月全月份九万吨，十一月、十二月、一月、二月份，每月七万五千吨，三月份六万吨。每月起运之日期由买主定之，但须在五日前先行照知卖主。

（四）每次麦价以起运口岸签发提单日之市价为准。

（五）买主每次收到美麦及（或）麦粉后，应备就国民政府购麦欠据交付卖主指定之代表，欠据所填日期与提单上所填日期相同，前项欠款之本利应以美金在纽约交付。麦款利息以长年四厘计算，每年六月三十日及十二月三十一日为付款日期，期限分三期偿还，每期付三分之一。第一期一九三四年（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付清；第二期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付清；第三期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付清。

（六）买主收到美麦一批时，应委代表将签就之临时欠据交卖主收执为凭，是项临时收据，应于短期内，依照第五条规定合并为确定的总欠据三份。

（七）上项麦及（或）粉专供中国水灾区域慈善赈济之用。

（八）装运美麦及（或）粉应尽先雇用美籍商船，但如装运时有他国商船泊于起运口岸，

能依照第三条规定条件装载该项麦粮，而其运价低于美船则买主有另雇是项船只之权。

中华民国二十年七月八日在上海

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委员长　宋子文

美　　国　　农　　部

二、中美棉麦借款合同

（一九三三年六月四日）

合同要旨转载如下：

一、美国财政建设公司贷款于中国政府；

二、借款总额　美金五千万元；

三、用途　棉花借款五分之四麦及面粉五分之一；

四、利息　年利五厘；

五、期限　棉花还本，货到中国时一成；三个月后一成五；第二年最后六个月一成；第三年一成五；第四年二成；第五年三成。

麦及面粉还本第四年二成五，第五年七成五。

六、担保品

(一)统税各收入除统税内之烟酒已经有旧合同借款担保，只可作第一担保品；

(二)海关收入有赈灾附加百分之五本已担保赈灾面麦借款可作本借款之第二担保品。

七、签订人　　中国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　宋子文

美国财政建设公司　总理　琼　斯

八、签订合同日期西历一九三三年六月四日。

（原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帝国主义侵华文件选辑》）

总政治部的任务及红军中政治部与政治委员的关系

——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第六号——

（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七日）

组织革命战争，消灭军阀战争，是目前革命的中心任务。执行这个任务，就要创造铁的红军，要争取广大群众，因此加强红军中的政治教育，使红军的指挥员战斗员明了他们的任务并且坚决的去执行；同时加紧对群众的宣传和组织，发动战区之内的广大群众起来斗争，就成了我们的迫切任务。执行这些任务的，是红军中的政治委员政治部。统辖各地红军的这些任务就要有个总政治部，现在全国各地红军有大的发展，统一和加强他们的政治指导，成了迫切的需要。为了这个需要，在本会内面设立总政治部，以毛泽东为主任。为了事实需要，本会总政治部，暂时兼任第一方面军总政治部职务。

总政治部指挥红军中的政治部并指导政治委员的政治工作，总政治部的命令，红军之中政治部要绝对的服从。而关于政治工作方面的则政治委员同样要接受并服从，各红军中的政治部要经常的按级向总政治部做报告，政治委员除向上级的政治委员会报告外，同时并向上一级的政治部做政治工作报告。红军中政治部与政治委员在组织上是各有单独的组织系统，但在工作上则下级政治部服从上级政治部的指挥，同时要服从同级政治委员的指导，下级政治委员服从上级政治委员的指导，同时在政治工作方面同样受上级政治部的指导。

此通令到达后，望切实执行为要。

主　席　　项　英
副主席　　朱　德
　　　　　毛泽东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信

——民权革命中的土地私有制度——

（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曾山同志并转省苏维埃诸同志：

现在春天到了，各地农民动手耕田的还很少，这件事值得我们注意。为什么农民动手耕的很少啦？有些固然是习惯上的原因，耕田时季素来推迟，但除了这个原因之外，据我们调查还有：(1)田没有分定，(2)耕牛缺乏，(3)红白交界靖匪威胁不好耕田几种原因，关于田没有分定一层，在现在红色区域是个大问题，过去田归苏维埃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的空气十分浓厚，并且四次五次分了又分，使得农民感觉田不是他自己的，自己没有权来支配，因此不安心耕田，这种情形是很不好的。省苏应该通令各地各级政府，要各地政府录令布告，推促农民耕种，在命〔令〕上要说明过去分好了的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了的）即算分定，得田的人即由他管，所分的田，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以后一家的田，一家定业，生的不补，死的不退，租借买卖由他自主。田中出产，除交土地税于政府外，均归农民所有。吃不完的，任凭自由出卖，得了钱来供给零用，用不完的由他储蓄起来，或改田地，或经营商业，政府不得借词罚款，民众团体也不得勒捐。那些说农民余钱剩米归苏维埃公用的话完全是谣言。农民一家缺少劳力，田耕不完，或全无劳力一点不能自耕的，准许出租，定租多少以两不吃亏为原则，由各处议定。还有红色区域准许自由做生意，赚得钱来，均归本人。以上这些规定，是民权革命时代应该有的过程，共产主义不是一天做得起来的，苏联革命也经过许多阶段，然后才达到现在社会主义的胜利。这是希望各级苏维埃及民众团体负责同志大家明了的。实行上述办法，AB团等反动派别，或者要乘机造谣说共产主义不成功了，又要恢复地主制度。各级政府负责同志便应根据民权革命的意义，加以驳斥。说明只有实行现在民权革命时代所必要的政策，才是真正走向共产主义的良好办法，决不是什么恢复地主制度。那些反动派别的话完全是错误的。缺牛一层，第一，要提倡耕种互助，邻近乡村，牛多的帮助牛少的耕田。但这种帮助不是完全白送，除牛多人家自愿送耕不要租钱之外，应该准租牛，只有正式准许租牛，才能相当解决缺牛问题。第二，全乡或全区缺牛太多，简直不能下耕的，县区乡等级政府应为设法调济，鼓动牛多区乡把牛出借或出卖。在这里县区两级政府应有全区全县牛数的调查，有了这个调查，才能实行救济。第三，禁止杀牛。现在一边缺牛，一边各圩市尚有杀牛的，违反贫农利益，应加禁止。第四，红白两区域一般农产品与工业品流通交易，应许完全自由，没有特殊情形（如米荒时）不加禁阻，并不限价（红色区域内部更不限价），但目前贩牛出口，因为红色区域缺牛太甚，影响很大，应暂时禁止。至于红白交界农民受靖匪威吓不敢耕田，以致荒了许多田地，解决这个问题，只有领导工农武装

向地主武装猛力进攻，使红色区域向前发展，过去不能耕种的地方，便可以耕种了。以上意见望讨论施行并复信给我们为要。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　　主　任　　毛泽东

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情况的报告

（一九三一年四月）

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是在一九三一年三月十八日开幕，讨论了：接受国际来信，土地问题，一、三军团过去工作的检阅，富田事变，CY工作问题，及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等，一共讨论了四天。后来中央派来中央局工作的同志，又于四月十七日，继续开会一天，听了关于四中全会及中央对目前形势估量的报告，及中央代表团关于富田事变的意见。扩大会通过了下列决议：一、接受国际来信与四中全会的决议；二、土地问题决议；三、关于一、三军团工作总结的决议；四、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五、CY工作的决议。扩大会选举了彭德怀、林彪、周以栗、曾山、陈毅五同志，参加中央局为委员，请求中央政治局批准，但立即开始参加中央局的会议与工作。

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

——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的决议第一号——

（一九三一年四月）

中央局扩大会议，听了关于立三路线，及四中全会的报告以后，完全同意国际来信和四中全会的决议。扩大会议一致认为立三路线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盲动主义的路线。自从六月十一号政治局决议案起，他就完全统治了中央，统治了全党。但在苏区中，从苏大会起，立三路线就已经起了领导作用。在国际七月决议给与中国党以正确路线时，为要接受国际路线而召集的三中全会，不但没有完成这个任务，把党从立三路线之下解放出来，转变到国际路线上去，反而向立三路线调和，使国际路线不能在党内得着实行。

扩大会特别指出四中全会的伟大意义，他深刻的批评了上述时期中央局的错误路线。痛斥了当时中央对国际指示，以及对国际代表的不尊重。他完全接受了国际路线，给党的政治路线一个彻底的转变，正确的指出党的目前任务。同时四中全会又改造了中央及中央政治局，把立三路线负责最重的同志，开除出政治局及中央。吸引了新的积极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到中央及政治局来。四中全会以及全会后的中央，又给予罗章龙等所领导的反国际反党的右派，以严重的打击。并且能够克服右派。四中全会以及全会后的中央的这一切决议与工作，扩大会议表示完全的同意。

扩大会议一致认为在汀州会议以前，四军前委的路线是一般正确的，是执行中国党六次大会的正确路线的。四军前委是坚决为工农政权而斗争，曾经坚决的反对过不要政权的流氓路线。前委坚决的执行土地革命来争取群众，关于土地革命的一切机会主义，曾作残酷的斗争，从这些斗争中，贡献了土地问题许多宝贵的经验。前委对于红军有了正确的了解，建立了红军的整个制度，如建立党的领导，建立政治委员制度，建立士兵委员会，建立军需制度和筹款路线，特别是建立做群众工作的路线等。此外前委又认清武装地方群众，正确的执行城市政策。前委为了坚决执行这些任务，曾向盲动主义，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流氓路线，作了长久的坚决的斗争。流氓路线曾经在四军七次代表大会正式进攻，起了领导作用，统治了前委，党的正确路线，一时失败。经过八次大会，特别是九次大会严重奋斗，流氓路线的领导，又从事实上宣告破产，正确路线对于流氓路线坚决的斗争，才在这个时候，作了一个总结。前委之所以能正确的坚决的为执行中国党六次大会的路线而斗争，是因为前委能正确的分析各个时期的政治形势，特别认清半殖民地的中国斗争的实质，农民战争的作用，才确定苏维埃之能够存在与发展，又从苏维埃运动实际斗争中获得经验。才能正确的运用策略，反对左倾右倾的机会主义，但从汀州会议起（这时四军与三军汇合，成立一军团前委）前委就接受了立三路线，放弃了巩固苏区的工作，采取了冒险路线，去向大城市冒进。虽然在个别问题上，如土地问题，地方武装问题，红军的群众工作等，前委并未因立三路线而动摇自己的正确路线。但攻打长沙后（这时一军团与三军团汇合，成立总前委），事实证明立三路线是错误

的，行不通的，所以总前委即由开始怀疑立三路线，进而反对立三路线。转变到正确的路线上去，这个转变的正式形成，是在新喻的罗坊会议。这就已经在党的文件上，明显的确定了这个转变。这是经过袁州会议，峡江会议，太平圩会议，许多严重斗争，才有这个结果。最后在宁都的黄陂会议，更具体的指出党内有两条路线，必须推翻那条错误路线（立三路线），执行这条正确路线，革命才能走向胜利的道路。

三军团前委在立三路线时代，是完全执行了立三路线。但三军团在过去的军委及后来的三军团前委领导之下，作了许多英勇战斗，如长沙、岳州、平、浏、大冶等战争，确在红军战史上，写下最光荣的一页。三军团过去关于夺取群众，执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等问题是忽视的，红军底战略是流动式的游击。三军团第一次进攻长沙在整个政治路线上是执行立三路线，但三军团所以能够占领长沙，在政治意义上获得这样大的胜利，是因为三军团前委正确地估量了长沙本地的敌我力量的对比（关于全国阶级力量的对比的分析前委是犯了立三路线的错误估量），是因为三军团的英勇斗争。至于第二次进攻长沙，则更是冒险主义了。但长沙战争明显的证明了立三路线是行不通的，宣布了立三路线的彻底破产，使总前委底路线得着转变，使三军团在总前委领导之下，迅速的走上正确路线，虽然全国党部并未能立即了解长沙底战争底教训，来反立三路线。总前委在转变路线之后，正确的决定了击破敌人进攻底战略，——引敌深入，坚决底反对盲动主义，结果，得着龙岗、东绍底伟大胜利。

江西党的路线大体可分为三时期说明：

第一，是一九三〇年二七会前的时期，这是机会主义的路线继续统治的时期，主要的是没有建立苏维埃政权。赤色区域已经开辟了二、三年了，还不分配土地，地主、富农充满了党和革命团体，土地革命已经发动了，却不能正确的领导农民斗争，建立革命基础。

第二，是二七会议（四军前委，赣西特委、五、六两军委的联席会）到二全会议（赣西南特委二次全体委员会议）这一时期是转变机会主义，坚决的执行土地革命。这才发动了赣西南底广大群众几次攻吉的英勇斗争，创造现在的苏维埃区域。二七会议是提出了“号召党内革命同志起来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使党迅速的布尔塞维克化。”但这一时期的缺点，没有从组织上坚决肃清机会主义分子，而且在后半期，在政治上就接受了立三路线的影响，使苏区忽视巩固工作。

第三，是二全会议到富田事变。二全会议，就是立三路线领导的会议，实际上是AB团操纵向党进攻。二全会议后立三路线便完全统治了江西的党，动摇了平均分配土地的原则，把地方武装完全集中到廿军卅五军，抛弃苏区的巩固工作，冒进的攻打中心城市，攻赣。对于一方面军前委的批评“是同时扩大，同时深入，是十足的农民意识。”“先打吉安，后打九江，是断送中国革命高潮。”立三路线这样的发狂，结果做了AB团一面好旗子，造成反革命的富田事变。

苏区中央局是在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之下成立的，它的路线当然是对立三路线的调合路线。中央局在整个工作的布置，并没有坚决的去执行国际关于苏区工作的指示，更没有给党过去工作中的立三路线以批评与纠正。虽然在许多单个问题上（如地方武装问题，工会与苏维埃的关系，红军中的CY问题等），有了正确的解决。中央局对目前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根本没有指出反革命进攻革命，尤其是进攻红军与苏区，是中国目前政治生活中的中心问题，而指出军团只是为了准备军阀混战而来进攻红军（见八号通告）。这种错误的估量，有放松我们的主要任务——击破敌人进攻——的执行，产生等待军阀战争的情绪的可能，仅只因为过去，总前委已经有了正确的估量，才没有发生这种不良结果。

再中央局关于富田事变的解决，也是错误的。中央局的通告说："不能肯定富田事变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又说："富田事变是由党内无原则派别纠分演进而成的"，这是模糊了富田事变的反革命性，没有认清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立三路线的一部分拥护者的参加的反革命暴动，而用"党内派别斗争"来解释这个事变。这种解释是非常错误的，脱离阶级立场的，这种解释是放松了反AB团的斗争，使AB团能够在这种错误的解决之下，能继续活动，继续发展他们的组织，所以中央局的决定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非常危险。

中央局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内是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夹杂不清的。中央局没有认清革命的目前民主阶段，没有认清在中国现有土地关系之下，党是应该坚决的领导平均分配一切土地。中央局决议对平均分配是动摇的，如说："平均分配是小资产阶级幻想"，这是不认识平均分配土地是消灭封建关系最彻底的办法。只有在平分之后农民认为平分是已经平均了贫富，已经是社会主义了，这是幻想，党对这种幻想，应当谨慎的加以批评。一般的说平均分配是幻想，这是动摇了平均分配土地的决议，这是可以被利用来反对土地革命。再中央局决定以劳动力为主，以人口为辅的分配方法，而预先没有经过详细审查与研究，没有采用过去斗争的经验，这是不审慎的。再中央局没有了解中国土地革命是带了残酷的农民战争的形式，以人口平分，才能迅速的争取群众。此外，关于反富农问题中央局没有分清暴动前与暴动后反富农策略的不同。在暴动前，主要的不但从政治上反对富农的领导，还要在经济上废除富农的债务，没收富农的土地；在暴动后，（如现在时候）主要的是从政治上肃清富农的影响，驱逐富农出苏维埃，巩固雇农贫农的领导，使富农在政治上处于被统治的地位。而不是照中央局通告所说的："从经济上解除富农的武装消灭富农的半封建剥削"（分田后，半封建的剥削已经消灭了）。中央局的错误指示，不但不能纠正过去对富农问题的一切左倾错误，反而要助长这些错误。最后中央局没有深刻的采用过去执行土地革命的丰富经验，没有重视过去关于土地问题的理论斗争的经过。这都是中央局犯了上述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后，中央局对于改造苏维埃，创造真正的铁的工农红军，建立苏维埃根据地，以及召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准备与宣传等等问题的注意力，还是不够。这一切都是调和路线的结果。

立三路线在苏区执行的恶果是很明显的：苏维埃区域相当的缩小了；地方武装集中到红军中去了；党与苏维埃在某种行动上说，是脱离了群众；党与苏维埃在组织上涣散了；AB团及其他反革命派得着机会发展，并且能得钻进党内与苏维埃内；红军因为过去执行猛烈的扩大，也受了相当的损害。

扩大会议在估量目前形势时，完全同意中央关于"反对军阀进攻红军与苏区的决议"以及中央给红军的几次训令。扩大会一致认为最近革命的发展，引起了反动统治的团结，来进攻革命，特别是进攻红军与苏区。在另一方面，国民党又实行欺骗政策。如"国民会议""大赦""裁厘"等等来欺骗群众，组织苏区内的反革命团体，如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北极会等等，企图从内部破坏苏维埃与红军。但同时必须指出统治阶级虽一致进攻革命，但他们内部矛盾，不但存在，而且继续发展。中国革命势力发展的不平衡，使革命势力对于各系军阀的威吓的程度不相同，所以他进攻红军时，军阀战争仍旧是有爆发底可能。并且最近胡汉民被蒋介石扣留，北方军阀备战的形势非常紧张。这是证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尖锐和大规模军阀战争的积极准备。

南京政府虽派遣重大兵力向红军及苏区进攻，但红军是有击破这种进攻的充分可能，因

为白军是不健全的，官长和士兵是不一致的，士兵的生活是痛苦的，进攻红军的各派小军阀间也是不一致的，有冲突的。在红军方面，上下完全一致，"万人一心"，又有广大工农的拥护，完全不是孤军作战。所以在红军与白军的残酷斗争中，红军与广大工农在共产党正确领导之下，是能够争取得第二次伟大胜利。击破帝国主义国民党的进攻，龙岗东韶第一次伟大胜利，就是证明。

在目前这种形势之下我们的主要任务是：

（1）动员一切力量，把工农群众与地方武装正确的去与红军主力配合，应用一切于我们有利的战略与战术，去击破敌人的包围与进攻，在击破敌人进攻的过程中，要达到把江西苏区创造成全国苏维埃的根据地，在这个根据地上，召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临时中央政府，关于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与号召，应当立即开始。

（2）立刻规定锻炼真正的铁的工农红军的具体计划，纠正过去工作的缺点与错误，改造军事及政治干部，尽量提拔工人，来担任领导工作，改进士兵的军事训练，建立铁的纪律，肃清红军中的AB团，及其他反动分子。并须堵绝一切反动分子，重新混进红军的可能。

（3）继续改造苏维埃政权，不仅要洗刷地主豪绅的子弟富农流氓等等，还要建立苏维埃的经常工作，要在工作中去获得群众的更高信仰，应当立即消灭党包办政府工作的现象，"党是立法机关，政府是行政机关"的恶现象。应当建立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一贯的工作系统。政府应当立即颁布选举法以及经济政策条例。

（4）关于土地问题，确定以人口平分，在没有平均分配好的地方要立刻执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已经分配好了的地方，就要肯定土地私有，不得动摇再分。地主的家属和封建制度的附属品，如道士，和尚，地理家等人中间的剥削分子，没有分得土地的权利，但允许他们租用土地（详细办法，当另有决议案），商人（乡村小市镇的贫民分子，多以农为主，以商为次的人，不在此例）不能分得土地。至于地主及其家属的房屋，亦应一概没收，转分给贫苦群众，但可以允许这些分子，移到已经空出来的坏房子去。

（5）加紧无产阶级的领导，建立健全的阶级工会与工会工作，正确的去领导阶级斗争，去实现政府劳动法。在目前的苏区内，雇农工会的工作，是工会运动中的重要部分。独立劳动者，不得加入工会，但独立劳动者分得田后，如仍是贫农地位，得照其他贫农一样加入贫农团。

（6）加紧肃反工作，以求彻底消灭一切反革命派别。

（7）加紧苏区内反帝国主义的工作与宣传，特别是反帝国主义进攻苏区与红军，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特别是反对正在准备着的进攻苏联的战争，建立反帝大同盟的组织。

（8）坚决的执行改造党的工作，洗刷异已阶级的成分，彻底改造干部，创造新的真正的工农干部来担任领导工作。

（9）加强在白色区域的工作，特别是白军军队里的革命工作，以求领导白色区域革命运动，捣混敌人的后防，瓦解敌人的军队。

扩大会议指出，只有正确的执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党才能正确的完成这些任务，目前党的最主要的危险，仍旧是右倾机会主义，消极，悲观，失望，向阶级敌人让步等等的右倾情绪。这些情绪特别是因为敌人的进攻，以及苏区内阶级斗争的尖锐，而更得着机会生长，所以党应当用大力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但同时丝毫不能放松反立三路线的斗争，要坚决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特别是实际工作中的立三路线。正确的执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坚决的执行国际路线，以及四中全会的决议，这样一定能够引向新的伟大的胜利。

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

（一九三一年八月三十日）

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诸同志：

根据□□同志来此的报告，中央很欣喜的知道最近八个月来中央苏区党所领导的红军与群众的艰苦奋斗的情形，中央苏区现在正处在与敌人长期的艰苦的内心作战的状况中，敌人倾全国的力量来进攻苏区与红军，单在江西便有二十师以上的兵力，你们正依靠着红军，围绕着广大群众，继续冲破敌人的“围剿”。但这一苏区根据地还很流动，与周围苏区还没打成一片，群众的积极性还没充分表现出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也还没建立，而非苏区群众的拥护苏维埃红军的运动又很微弱，这些都使你们执行阶级战争的任务更加严重，需要你们以最大的努力来实行国际和中央的一切指示，为着这个中央必须给你们以新的指示。

中央首先指出：在几年来土地革命的深入中，在最近一年多红军的英勇战斗中，在苏区内外阶级敌人的残酷进攻中，中央苏区是获得了他的伟大的成功。他的成功为中国革命危机来到的主要标志，成为殖民地苏维埃革命运动的旗帜，他影响到中国统治阶级极度的动摇和加速他的崩溃过程，他兴奋了全中国工农群众为着苏维埃旗帜而斗争。这里他具体的表现是：

（一）自长沙战争后，红军一三集团军围绕着广大群众的力量，曾两次冲破敌人的“围剿”，得着伟大的胜利，最近又正在开始冲破敌人第三次的“围剿”。

（二）没收了胜利区域地主阶级的土地，并实行平分土地。

（三）在这些区域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完全被推翻了，并建立起地方苏维埃政权。

（四）建立了并锻炼出巩固而有纪律的红军的铁军，他的成分最大多是贫农党员占全军三分之一，他与群众的联系极好，红军在群众中有极坚固的信仰。

（五）党在群众中红军中成为唯一的革命领导者，一切反革命派别在苏区许多破坏革命的企图和行动，都遭受了群众和党的严重的打击，特别是AB团活动的失败。

但并不因为有了这些伟大的成功，我们便不需要执行严格的自我批评，来检查中央苏区还存在着的错误和缺点。恰恰相反，只有我们愈加认识和纠正了我们的错误和缺点，只有我们的成功，才能愈加扩大和巩固。中央苏区现时最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

第一，这种错误表演在巩固根据地和红军问题上头。现时的河东（赣江以东）苏区很明显的是中央苏区的主要根据地，你党还没有用一切可能力量动员阶级群众来巩固这个根据地，红军是尽了他捍卫这个根据地责任的，但仅仅依靠红军还是不够的，群众的自卫力量还很脆弱，环绕苏区的白色统治区域的群众工作完全没有，白军中的工作完全忽视，苏维埃政

纲还没能做到最大限度的实施，苏区中的生活非常缺乏，这都是使根据地不能巩固的。并在相反的，在巩固红军的成分上不以清洗地主富农商人分子为中心，而笼统的提出"洗刷流氓"的口号，在苏维埃选举法上亦规定出流氓没有选举权被选举权，这都是模糊阶级路线的规定，将使破产而流落的农民与广大的敌人军队中的士兵群众被解释为流氓分子而排斥到土地革命的战线之外。

第二，这种错误表演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上头。你们对于消灭地主阶级与抵制富农政策还持着动摇的态度，例如你们容许地主残余租借土地耕种，对于富农只是抽肥补瘦，抽多补少，而不实行变换富农肥田给他坏田种的办法，对于经济政策也因为对于整个农民"一视同仁"，土地税至今犹未征收。这样反富农的斗争自然得不着正确的领导，相反的富农又来利用这一口号压迫中农乃至贫农，而说是打富农，于是贫农团雇农工会的组织也就等于失败，甚至富农还可以混入。合作社也被富农和地主残余把持，而将物价卖得比一般市价还贵。这一切都表现土地革命的果实还没落到贫农中农身上而为富农所攫去。

第三，这种错误表演在党与政权的关系和群众在政权中的作用上头。苏大会至今未能开成，但又将工农革命委员会的临时政权取消了，而代之以军事组织，实际上党又包办一切，这使群众对政权的认识模糊，而不相信政权是自己的。因此苏维埃改选运动，至今很少成绩，而各下级苏维埃仅成为"办差"机关，群众代表参加政府工作的练习非常缺乏，于是各级政权机关仍多为地主残余富农商人所把持，形成所谓"苏维埃"的人，一切群众团体也多为同类人所盘据，群聚苏维埃机关吃饭，而群众工作便必然的软弱，党及群众团体的改造，使遇着极大的阻碍（如有一地方改组了九次据说还为AB团所占领），因为群众力量在这些地方无从表现出来，在红军中只以党包办一切，于是军事指挥与政治委员的权能便表现不出。这一切，都存留着极浓厚的国民党工作方式的残余。

第四，这种错误表演在工人运动和反帝斗争上头。因为过去苏区长期在农村中发展而很少接近城市，所以对于工人运动一向是忽视而犯有错误。八小时工作制至今未能实行，工会起初被独立劳动者小手工艺者所领导，所以向无斗争，现在还因袭着这种没有斗争的状态，使工人在政权中，在群众组织中，在红军中，都很少能起领导的力量。所以反帝同盟在苏区是没有组织，一切群众生活都缺乏，团体的组织力量未加强，这一艰苦的反帝国主义反地主资产阶级的阶级战争。

第五，这种错误表演在党内和群众中缺乏思想斗争和教育工作上头。苏区反AB团的斗争是正确的是绝对必要的，富田事变无疑的是反革命的暴动，但在斗争的方法上最缺乏的是思想斗争的深入与群众中的教育工作，在处置方法上，亦还很少能将他们领袖与他们影响的群众分别看待，将他们组织内的分子与一般的阶级异己分子分别处理，将各种错误思想和阶级异己分子由动摇不满而走入反革命的中间过程看做是我们在群众中与他们斗争的过程。这种错误在AB团斗争的初期，犯的尤其严重。因此，苏区内便缺乏另外的反改组派，反第三党，反取消派，反罗章龙派，反富农思想乃至反农民落后意识的斗争，党内便缺乏肃清立三路线与反一切错误倾向之两条路线上的斗争，而一般的认为一切错误都可谓AB团所包容所代表，这是如何简单化而有害的错误呵！

综合这一切的错误与缺点，很明显的看出中央苏区对于工人对雇主的斗争，农民对消灭地主阶级的斗争，贫农雇农对富农的斗争，整个苏区的工农劳苦群众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区的斗争，都还缺乏更宽广的发动，而没能使之达到极高度的尖锐化。造成这种错误的最

根本原因，无疑的是由于阶级路线不明确和群众工作不充分，这对于进行阶级战争的基础的推广和力量的增强是要受着很大的损失的，而首先要影响的便是红军的巩固和扩大与他在长期作战中所遇到的困难。

在这里中央必须指出，党中央过去对于联合富农政策的错误，立三路线的领导，三中全会调和路线的影响，是造成苏区错误的主要来源。苏区群众在实际生活中对于这种错误路线的反抗，苏区党的领导在许多政策上决定的正确，红军的英勇团结是战胜这些错误的有力的前提。但我们同时要指出只有在中央局扩大会后，苏区才向着国际路线转变而且在这一转变中间，你们对于上述的根本错误也还没有深刻的了解与执行及时的纠正，这决不能委之于为进行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困难所阻。我们绝对不否认因为战争的激烈和继续，使中央苏区对于一切任务的执行都必须环绕着战争问题的中心。但你们必须承认，根据上述许多错误的存在，证明苏区同志对于立三路线的错误，尤其是国际路线的正确，还缺乏全部的深刻的了解。你们要明白：不仅江西省委二全会是执行了立三路线，便是汀州会议一直至吉安大会的总前委都还是在执行立三路线，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局还是在执行对立三主义的调和路线；立三路线不仅表现在“左”的盲动主义的错误上，同样表现在右的富农路线的错误上，并且富农路线在土地问题上不仅表现在以生产工具为分配的标准上，同样表现在将土地分配给“一切”人（全民）和不没收富农的剩余工具上。所以不用说二全会是露骨的富农路线与立三路线的领导了，即有正确路线的去年“二七”会议与今年中央局扩大会，你们也还犯有富农路线的某些错误。国际路线的执行，便在根本肃清这些“左”右机会主义的错误。尤其是国际路线对于苏区任务的规定，是针对着战争状态的，所以国际来信说，离开战争来讲巩固根据地与建立苏维埃政府是不可以想象的，你们必须从这里去了解国际路线，坚决的去执行国际和中央所指示的全部，以彻底肃清上述的一切错误。

*　　*　　*　　*

目前的全国形势乃至全世界的形势是有利于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极度的经济恐慌与社会主义苏联空前的巩固和成功的对抗上，世界的革命高潮是影响着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的。在中国政治经济总危机的基础上，最近水灾又淹遍了全中国的大河流域，农村是加速的破产，城市工业是极其衰颓，一切物价都异常高涨，工农劳苦群众的生活是更加痛苦，失业的和破产的群众迅速的增加，水灾的难民已达到六七千万，这种恐慌简直是空前的。而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都日益加强和日益残暴，国民党统治的内政外交在这里都表现出充分的破产，他在群众中的一切欺骗政策都不断的暴露和揭穿。群众的革命斗争在今年更有进一步的发展，军阀军队中士兵的哗变是不断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对统治阶级的不满亦日益增高，尤其是苏维埃运动和红军的发展成了目前中国革命危机最主要的标志。这不仅中央苏区有了他几次冲破敌人“围剿”的伟大胜利，便在其他苏区也同样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鄂豫皖与湘鄂西。因此国民党军阀虽在帝国主义指使之下一致的进攻革命，企图用最大力量来消灭苏区与红军，但终不能因此便减少他们自己中间各派的矛盾，相反的，愈加因为他们的进攻苏区的累次失败，反革命各派便愈加在争取“反共”领导和寻求新的统治方法之下，更加激烈化他们的冲突。近几月来两广政府与南京的对立，最近石友三的事变与酝酿中的山西问题，特别是占中国全人口六分之一的难民问题的严重，将使国民党统治更加速他的崩溃。固然，无论怎样变化，尤其是红军愈加胜利，反动统治总要用他最得力的力量来做最后挣扎，并且帝国主义还要来直接组织他们，但因为他们中间的矛盾无法消灭，尤其因为苏维埃运动

已逼及长江流域，而群众斗争又日益发展，他们便不能以全部力量都集中到一起，来进攻一三集团军与中央苏区。在这里我们有坚决的信心：只要中央苏区能发动更广大的群众围绕着红军，与敌人进行长期的艰苦的战争，你们必将能继续冲破敌人的"围剿"，瓦解敌人的主力，以实现一省几省的首先胜利。

因此，现在中央苏区的中心任务应是：最大范围的发动群众，巩固并扩大红军支持长期的艰苦的阶级战争，以冲破敌人的"围剿"，并扩大苏区和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在这个根据地上建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最大限度的实施苏维埃政纲。为要达到这一目的，中央对于下述的具体的任务，实有详细说明的必要。

第一，为着进行阶级战争，首先应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国际来信曾经指出巩固根据地不是从和平中得来的，而是从战争中建立起的。中央局同志只说要长期作战与艰苦奋斗。但要支持长期的艰苦的战争，决不能仅着眼于红军问题。当然红军是国内战争最主要的力量，谁要否认将红军改造成铁军的重要，谁要否认在战争时估计到他们的技术能力与给养能力的重要，谁便根本不懂得怎样进行战争。但谁要否认在战争时我们应当计算到组织群众斗争的力量，计算到白色统治区域群众对于赤色区域的影响，计算到敌人军队中的工作，计算到红军占领区域与已得胜利的巩固，则谁也根本不懂得怎样与敌人进行长期的艰苦的国内战争。一三集团军二次冲破敌人的"围剿"，十四日之内转战四五百里，战败敌人在八师以上，这种伟大的胜利是无可比拟的。但应当计算到当我们战胜敌人后，敌军退走的区域，群众还不能以组织的力量袭击敌人，敌人军队中士兵也还不能因战败的影响而广大哗变，以加速敌军的崩溃。当红军各个击破敌人时，地方的群众武装还不能显示他的力量来进行穷追敌军和搜索战场的任务；在红军作战的后方，各级党部团部各种群众组织虽只高谈"参战"，但对于实际力量的增加和苏区的扩大是极小成绩的。这些缺点的存在，显明的是中央苏区至今还没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以致红军在长期作战中便要"疲于奔命"！而当着红军不在某一区域时，敌军便易于长驱直入，使群众偏入依靠红军力量而对自己的力量认识不足，所以现时的红军力量可以击破敌人的一方，并可乘胜各个击破敌人，但因为战线这样长，等到我们将各方面敌人都击溃后，再加以适宜的休息，敌人又可聚集新的力量来包围进攻，如此我们将因于长期的内线作战，很困难的向外发展，二次冲破"围剿"后到三次战争，我们便处在这个弱点上。关于战争的前途，红军在冲破三次"围剿"后，必须向外发展，必须占领一个两个较大的城市，这是中央局已经了解的，但当着上述困难没有打破前，实现这些任务，是要遇到极大阻碍的。现时中央局的任务，便在围绕着进行国内战争的中心问题，努力发展苏区内部的阶级斗争（决不单是反AB团的斗争。主要的还有工人与雇主，雇农贫农与富农，农民对消灭地主残余的斗争），组织群众的团结力量（职工会，雇农工会，贫农团，反帝同盟以及各种群众示威），尽量扩大和加强群众的自卫能力（如赤色警卫队，赤卫队，少年先锋队，游击队等），引导他们到实际参加战争的战斗。苏区内部阶级斗争的加强，决不是防碍战争的进行，相反的，正是巩固和加强自己的阶级战线，而减弱敌人在苏区的响应力量，并且斗争愈发展，群众的发动力和团结力量才愈能加强。这样，才愈能使他们密接于战争的拥护和参加，这样，才能愈使他们自动的去发展游击战争，阻碍敌人的前进，截击敌人的后退，搜索战场和掩护红军必要时的退却等等，而不仅仅随着红军来往和"跑反"或仅仅做些慰劳，和救护的工作。并且仅仅这样还不够，你们必须有组织的派人到环绕苏区的白色统治区域去工作，到敌人后方和敌人军队中去工作，我们坚决的相信在那里红军的影响是很大的，只要你们有决心的去训

练和组织俘虏士兵与苏区周围的"跑反"群众，你们必可收得显著的成效，这在鄂豫皖和湘鄂西都有事实可证的。譬如你们上次在闽北筹款，日期虽然很短，但你们却没有去进行组织群众和训练一批干部以树立工作基础，而仅仅作些宣传工作，这是不能巩固红军在那里胜利的影响的。还有根据地的巩固，必须与扩大根据地联系起来。敌军虽用包围和封锁的办法对付中央苏区，但他在赣南这一面是无办法的，然而你们却没有利用这个机会组织游击队和征调干部去发展赣南六七县的地方工作，并且去流通这些地方对白色统治区域（如广东）的商业，你们与闽西的交通和联系，始终是若断若续，而没能完全打成一片，这都是些损失，你们必须立即注意和纠正。即在军事策略方面，集中红军主力，实行各个击破敌人，这是我们的原则，但不是说要集中主力，便连一部分的必要的分兵配备，去发展游击战争去巩固后方，去袭击敌人的力量都不要，也不是说只有诱敌深入的办法才可以各个击破敌人，在力量许可时，我们必要用追击敌人的办法来消灭敌人。这一切，都是巩固根据地的必要条件，同时也就是进行长期的艰苦的国内战争的必要条件。没有这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第二，为着进行阶级战争，必须彻底的解决土地问题与实行苏维埃政纲。你们在解决土地问题时，必须谨严农民与地主的对抗，必须下决心的消灭地主残余，绝对不能使他们仍保有租借权而密接土地关系，对待地主残余的办法，只能是分配他们做苦工。你们必须加紧雇农贫农与富农的对抗，而抓紧对中农的联盟，尽管那些地方的土地是完全分配了，但旧时雇农对雇主的仇恨，贫农对高利贷者的愤怨，依然是存在着的。所以分配土地时，我们要主张变更富农的土地所有给他坏田耕种，富农的剩余工具要没收，中农的土地绝不要动摇，而雇农贫农便可分得地主富农的肥田和工具。在分配方法上，大致要以人口与劳动力作混合标准，而不是以谁为主，过去中央局的争论是错误的，因为实行这些问题的中心是要使贫农中农雇农得到土地革命利益而不要被富农攫去。并且在土地问题上要不加深对富农的抑制和斗争，反富农的斗争与雇农工会贫农团的组织将失掉他的中心意义。而农村中的阶级分化亦将模糊起来，于是富农分子便可混入各群众组织与政权机关中来，而不能彻底肃清出去。政权机关与群众团体，果为富农所把持，则苏维埃政纲中一切为贫农雇农中农的设施，都将无从实现，对战争的参加，便是消极的，对反AB团的斗争，便要得相反的结果。这种情形同样表现在城镇中的，便是八小时工作制与改良工人生活之未实行。这一政纲的实行，必须从斗争中来。没有工人的斗争，不仅工资不得增加，生活不能改善，便连苏维埃政纲所宣布的八小时工作制也被雇主商人工头抑制住不得实行。并且这些商人雇主手工艺者便是工会的主持者，甚至是政权机关领导者。他们如何能发展工人群众的斗争，实施阶级的经济政策，征收累进所得税，提倡工农劳苦群众的合作社和发动广大群众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红军的运动?!所以彻底的解决土地问题与最大限度的实施苏维埃政纲是发动苏区工农群众斗争和影响非苏区群众斗争发展的动力，他与进行战争决不是矛盾的两面，而是增强和扩大阶级斗争的群众基础和力量的。（关于反帝斗争，望参考中央五月份关于反帝运动的决议。）

第三，为着进行阶级斗争，必须更作力于改造和扩大红军的任务。在几次冲破敌人"围剿"的伟大胜利中，红军是开始锻炼了自己成为铁军，但我们同时要指出红军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抛弃游击主义的传统与小团体的观念，这与红军已在进行大规模战争与担负着争取一几省的首先胜利的任务是不相称的，你们必须了解铁军的意义不仅在作战勇敢有好的军纪和省风纪，更重要的还在他的成分要根本肃清地主富农商人等分子而完成为工人和农民的队伍，他的干部主要成分要是工人的，党的威信要提得极高，政治委员制度要彻底实行，政治工作要

独立起来和有系统的进行，军队中党的生活应该是为巩固红军和保证一切命令的执行，而不是包办一切的，党员的行动应是红军的模范，红军的编制要开始适应于大规模作战的组织，红军的战斗力亦应着重于技术能力的增进，特别要有堡垒战卫市战，射击飞机等等的演习。为着实现这些任务，你们必须将现有的红军一三集团军实行扩大，至少要增加五千人到一万人，你们不仅要集中那些脱离生产的独立团和赤色警卫队，你们还应到赤卫队、少年先锋队、游击队中去做扩大红军的运动，吸收他们最勇敢的分子到红军中去。中央给你们的红军编制草案与政治工作条例等等，当然有冲突地方是要你们参酌实际情形去实行的，但在原则上你们必须遵照国际改造红军的主张，逐步的应用利于大规模作战的编制与红军的作战能力而完全脱离游击主义的传统。红军中参谋处的工作须健强起来，关于交通发报联络等等工作，都需在参谋处的工作内和指挥下有系统的进行。红军学校必须集中举办，学生成分需要吸收工人与雇农，训练的人要以各军中选拔一部分，使红军中宝贵的实际经验完全与军事政治学理打成一片，在这里一切学术科都要提高，要融合各军的长处来武装新的干部，以打破小团体的保守观念。你们于红军主力军之外，还须多量的组织游击队或较集中的警卫队，使他们担任起来保卫苏区，发展新的苏区和在红军主力军胜利时追击敌人的任务。红军主力军在作战时必须使这些队伍与他的行动配合。我们要红军主力军打破游击主义的传统，但我们决不是主张放弃游击战术的运用，相反的你们要大量的利用游击队的游击战术来环绕着红军作战，来疲敝敌人的战斗力以便于战胜敌人。你们对俘虏士兵要有一个观念上的转变，他们中最大多数都是破产的农民你们要以土地革命的利益吸引他们，要鼓动他们自愿的到红军中来，要利用他的作战经验和技术能力，决不能当他们是一般的流氓无产阶级洗刷出去而不积极的加以政治训练。要分配红军中俘虏士兵以土地，即当这些士兵是外籍人，也要如原有的外籍红军一样，由各村苏维埃画出一块红军的公田，由农民或苏维埃政府为他们耕种，以后缴纳苏区政府作接济这些外籍红军的家用，或做这些红军的给养。便是敌军中的下级干部你们也必要开始的利用，自然对他们必须要十分谨慎，必须有好的政治委员的监督。

第四，为着进行阶级战争，必须加紧的进行改选运动与建立全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因为战争的激烈使你们很困难的选择适当的地点去召集全国苏维埃大会，这是我们估计到你们建立苏维埃临时政府的中心意义，却愈因敌人进攻的激烈愈显示出两个政权（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政权）对抗意义的重大，苏大会能不能开成是全国的，这仅能就他的作用去想象，能不能开成是全苏区的这也不关重要，更重要的是必须有一群众的苏维埃政府去领导这一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的国内战争与发展土地革命。所以当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没有成立以前，取消工农革命委员会是绝对错误的，现在中央苏区必须经过各革命团体的推选重新恢复工农革命委员会的临时政权，而且要有决心的使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能在十月革命节所召集的苏大会中产生出来而再不延期。这一大会的准备召集，主要的要看各地苏维埃改选运动作得如何，中央区首先要使各地真正发动起来为实现苏维埃政纲的群众斗争与实际参加战争的运动，在这个基础上来改选苏维埃代表与其政府，来改选工会、雇农工会、贫农团与一切革命团体，以便这些机关中将一切地主残余富农商人雇主与一切腐化分子清洗出去，使真正的工农劳苦群众当选为苏维埃代表。这一工作，过去是延缓而未执行或执行不好的，现在只要这一工作做得有成绩，即使其他苏区代表未能依期赶到，苏大会仍然有群众基础可以召集的，群众中有了明确的政权观念，并且有了真正群众政权的建立，党包办一切的错误才能根本铲除，苏维埃政权才能成为号召苏区内外群众对抗国民党统治的最重要的武器，而国内阶级战争也才能

在群众更统一的意志下进行。

第五，为着进行阶级斗争，必须坚决执行发展党巩固党的任务。现时苏区党的发展是畸形的，红军一三集团军中，党员的数量超过他所占领的区域的地方党员一倍有余，党的工作也是红军中健全，而地方党部软弱，许多得力干部都集中到红军而地方党部的干部还没有及时训练出来.这一方面对于红军的重视是对的，但另方面对苏区工作的放松却是不对的，战争的进行必须以各方面去动员，党在地方上的领导和动员是绝对重要的，中央苏区的党必须以极大力量来加强地方党部的工作。要选派得力干部去加强党的巡视制度，要加紧工作的检查，要帮助团去进行改造和工作上的转变，要引进新的斗争分子加强各级党的指导机关，特别是工人雇农的分子，要举办苏区干部学校，有系统的训练党的干部，当然这种训练是要与当前的战争任务相联系的。你们对于干部的引进和训练，不仅要做到自给，还要做到能派遣大批干部到邻近区域去发展工作。最要紧的中央苏区要加紧一般的宣传教育工作，党报要经常的出版，要提高党员的理论水平，使苏区几年来宝贵的斗争经验，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而得到理论与实际完全融成一片，以巩固无产阶级的路线。苏区党的工作重心应放在支部或地方党部中，特别是支部组织在较大的乡村中，应以村为支部单位，使支部全体大会能经常的开会，乡村支部应向雇农手工业工人和贫农开门，支部应有本身的经常生活，应举行识字运动，办墙报和画报等；支部在群众组织中应起党团作用，领导和发动群众斗争，加紧群众中文化教育工作妇女运动和帮助团去进行青年工作，在政权中尽量引导工人雇农贫农乃至中农来参加政府工作，并参加到各种委员会中去。地方党部不仅要注意已有党的组织、地方的工作的发展，并且还应注意到邻近没有党的组织的地方去发展工作，地方党部的管辖范围应不限于旧时行政区域，而应依照土地革命发展的便利与战争的范围得临时改定。党的组织应保存一部分的秘密基础，以便在必要时可以转到地下去。这一切党的组织工作的转变，都为的是巩固党发展党使党更有力量的以各方面去发动群众去扩大工作，以加强阶级战争的进行。

第六，为着进行阶级战争和上述的各项任务，必须有明确的反AB团斗争与反一切错误思想和一切反革命政治派别的斗争，以巩固阶级战线。中央肯定的说，反AB团的斗争是绝对正确而必要的，但中央号召你们必须对AB团要有明确的认识，AB团是地主残余与富农的组织，但不是每一个地主残余或富农分子便一定是AB团，AB团是反革命的组织，但不是每一个反革命派别在苏区便一定是AB团。党的错误路线，农民中的落后意识，群众中党员中的不满情绪和腐化现象，常常被AB团拿来利用，但不是每一个党的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和拥护者，每一个落后的农民每一个犯有错误倾向或行动的党员或群众，便一定都是AB团.甚至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都可被AB团拿来故意做错来毁坏党的信用，但不是每一个将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做错了的党员和群众便一定都是AB团。虽然地主残余必须消灭的，富农必须反对和抑制的，一切反革命政治派别必须处罚和消灭的，党的错误路线必须纠正的，农民中落后意识党员和群众中的错误倾向和腐化现象，必须斗争和肃清的，虽然对这些斗争也必须与反AB团的斗争联系起来，但绝对不能在解释和处理这些斗争时都笼统做AB团看待。你们对AB团的斗争，一方面是将他简单化了，而最缺乏的是思想上的斗争与群众中的教育工作，群众至今还不能了解AB团的政纲究竟如何，什么样子的主张和行动便是AB团的类似的，便应该起来反对和斗争，所以至今苏区还只看见从上而下的逮捕和处罚一批一批AB团，还没看见从下而上的一批一批的AB团被群众举发出来，这是最值得考虑的。另方面你们又将AB团扩大化了，我们一定要坚信在红军的累次胜利中在群众斗争的威胁下AB团在中央苏区是已经遭受了严重的

打击，只要我们能坚决的执行上述各项任务，加紧群众中党员中思想的斗争，我们一定能继续战胜AB团并给他一个彻底的破获。无疑的赤区内部的阶级斗争与敌人从外部的进攻是互相呼应的，但我们与内部阶级敌人斗争，必须分散他们的力量，而离他们与外部的联系，孤立各个异己分子，加紧思想斗争与群众中教育工作以夺回他们所影响下的群众，征服自己阶级战线中的错误思想，这样，才能巩固自己阶级的力量而拆散敌人的队伍。过分夸大敌人的破坏力量与减弱我们自己阶级的坚定心，这是有危害的，只有这些地方去了解反AB团的斗争，党才能找出正确的出路，才能顺利的去进行党的目前任务和彻底的改造党与政权和群众团体的各级指导机关，而肃清一切动摇腐化和富农分子，乃至AB团的残余。在这里有系统的肃反工作和政治保卫处的组织，自然是非常重要的，你们必须选拔最得力的干部去担任这方面的工作，同时党还要加紧进行反改组派、第三党、取消派、罗章龙派的斗争，加紧党内反立三路线、反主要的危险右倾机会主义与调和派的斗争，这种主要的右倾危险是表现在对进行国内战争消极，对执行阶级路线动摇与对AB团过分的恐慌。党内自我批评也必须发展，自然这种自我批评，须在战争环境所许可的条件下进行而是为着巩固党的领导与巩固阶级路线的。

只有这样党才能很有力量的发动群众领导红军，去进行长期的艰苦的国内阶级战争。

这一切任务的执行中央坚决的相信扩大会后中央局的领导是能够站在国际路线之下来完成的。中央更号召苏区党的全体同志要以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和列宁主义的强固性，去执行国际与中央的一切指示，去改正一切错误，去反对一切不正确倾向，而为国际路线斗争。

中央苏区的同志们！国内战争是在你们那里激烈的进行着，反革命的蒋介石在帝国主义指使之下，正倾他所能调动的全部兵力来进攻苏区，来烧山毁屋，用毒瓦斯来毒杀一切群众，但他抵挡不住红军的英勇与群众的威力，"围剿"的计划已一次一次的失败，而他的统治内部又正在分崩离析不断的火并，他的统治后方，又正闹着六七千万人的水灾，接着来的便是口遍全国的饥荒。这正是国民党统治的末日，只有苏维埃革命彻底的解决土地问题，赶走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与推翻国民党军阀的统治，才能根本消灭军阀战争与解决灾荒问题。同志们，奋起你们战斗的勇气，坚定你们执行国际路线的决心，迅速的冲破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彻底消灭蒋介石的主力，你们一定能实现一省几省革命的首先胜利！

中　　央

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

——党政军群工作的综合报告一二次战争及富田事变——

（一九三一年九月三日于上海）

欧 阳 钦

一、中央苏区一般情形及党的路线的转变

自去年十月工农红军主力一三两军团退出吉安到赣江东岸，我们的中央苏区即在这一区域，这一区域有联系的是万安，泰和，吉安，吉水，永丰，乐安，广昌，南城，南丰，石城，瑞金，宁都，雩都，兴国，赣县，这些县的县城除赣县都曾经占领过，但不是长期的，这一区域的范围，已经建立有苏维埃政权的，大约经常有四五百里，不过经常要受到敌人进攻及战争的影响，比如因为内线作战策略的关系，在几次战争前苏区都缩小了，及至战争胜利之后马上又恢复或有新的发展，至于赣江西岸也有十余县有苏维埃政权，但自第一次战争胜利之后，敌人把交通封锁得非常严密以至关系断绝，乃至最近七军过江来才打通联系，但往来仍须要武装保护，因为三次战争关系，这一联系恐暂时不能保存接续。

中央苏区这一时期——从退出吉安以至现在——完全是残酷斗争的时期，外面敌人有一次二次三次猛烈的武装进攻，并且用严密的经济封锁，同时苏区内部的地主残余富农以及一切反革命分子在AB团领导之下尽量的破坏，企图里应外合来消灭苏区，这一时期敌人是集中了武装力量社会力量经济力量来进攻中央苏区。但中央苏区的布尔塞维克的党员，在党的正确策略领导之下以艰苦斗争的精神领导工农红军，及苏区广大工农劳苦群众打破了敌人的几次进攻，相当的肃清了反革命AB团的组织，得到几次伟大的胜利。

关于党的路线的转变问题，在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这一次会议是今年三月接到国际来信时开的），到会的有红军及地方党部的代表，当时仅有国际信这一材料，四中全会文件尚未到时对四中全会的情形不明了，所以在第一次会议上仅讨论到接受国际来信及反立三路线问题，及至四月初弼时家祥诸人及四中全会文件均到了又召集了一次会议来讨论，这一次会议叫做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的继续。这次会议时间虽只有一天，但对党的路线均讨论了，全体一致接受国际及四中全会的路线，坚决的反对立三路线及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与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对于过去那边红军及地方党部路线的估计，认为红军四军前委过去的路线一般的是执行六次代表大会的路线，如彻底平分土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创造红军等等，但自去年八月汀州会议后曾一时期接受了立三路线，二次进攻长沙失败后事实上的教训已经对立三路线而怀疑而抵抗以致改正了。三军团前委的路线在二次进攻长沙前完全是执行了立三路线，但以后因为事实上的教训由怀疑而至抵抗过立三路线了。

江西地方党部的路线在去年“二七”会议以前完全是机会主义的路线，如对土地革命完

全没有执行，“二七”会议是坚决的反对了机会主义的路线，自“二七”会议到八月的“二全”会议路线是正确的，自“二全”会议之后到富田事变，完全接受了立三路线，经过AB团的利用，疯狂的执行。

中央局成立后的路线，中央局是一月十五日成立的，当时项英同志去是带了三中全会调和路线去的，所以中央局第一时期（从成立到一次扩大会议）完全是调和路线，特别是对军阀战争与革命战争的分析及解决富田事变的问题因调和路线而至非常错误。

自中央局扩大会议之后，中央苏区党的路线完全是接受了国际路线，自然在了解上与执行上还有许多不够。

二、一次战争与二次战争的胜利及三次战争问题

因为我们红军主力在中央苏区，所以敌人亦集中力量来进攻，这一区域有一次二次三次的大进攻。在一次战争时是一方面军从吉安退到赣东，这时红色区域有相当的缩小，AB团在立三路线掩护之下极力的在苏区以内破坏与捣乱。卒至演成富田事变，在富田事变时AB团仍是打起红旗提出“毛泽东反水”等等口号来欺骗群众，这时敌人又猛烈进攻，苏区缩小，此时群众对我们是有些怀疑，敌人以为我们内部发生了问题，即乘机深入。我们这时的策略是坚决进攻，引敌深入以消灭敌人，这次进攻的主要敌人是张辉瓒、谭道源两部，我们最初是布置先消灭谭道源的，一切已经布置好，只等他进来即包围缴械，但此时有一AB团向谭报告，谭本已下了动员令，但马上停止前进，因此我们等了几天没有来，即马上回到龙冈打张辉瓒，张此时是孤军深入龙冈，因龙冈地势很好，所以完全被我们包围，全部被俘虏与缴械。这次胜利后，我们马上又回转东韶去打谭道源，本来计划可完全俘虏缴械的，只因三军行动稍迟（三军在龙冈战争是最先接触当正面牺牲颇大），未能按照命令时间达到目的地，以至敌人逃走了大部分，仅缴了两团人的枪。第一次战争即从此结束，所得的胜利是很大的，张辉瓒除朱耀华部未来者外全部消灭。谭道源被消灭两团以上。共缴枪支八千（内有自己小部分及千多坏的或没有枪柄的），自此次胜利后苏区又恢复原状了，群众亦深切的认识了AB团的造谣及了解了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红军是革命的，群众的斗争情绪提高起来了。

自第一次战争胜利之后，我们估计到敌人的进攻不会放松，我们即马上准备第二次战争，号召广大群众起来准备参加第二次战争的工作，但敌人得到了一次战争冒进深入以致失败的教训，二次战争的策略与计划非常审慎与周密，敌人二次战争的计划是企图消灭我们，他的策略是用十五师以上的军队作一大的包围，在军事布置上，蒋蔡的十九路军在赣南兴国赣州一线，王金钰的第五路军（王金钰本人两师，公秉藩一师，郭华宗一师，郝梦麟一师的北方军队）在赣江东岸的泰和万安吉安吉水永丰一带，朱绍良的第六路军（毛炳文许克祥胡祖钰各一师）在南城南丰广昌一带，在闽赣边的有刘和鼎周志群卢新铭诸师，这些都只是在前方作战的，在后方还有许多部队未算入。他们在这一大包围的布置之下行动上是非常稳重的，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特别的防备冒进深入，被我们各个击破，他们每日进展只五里十里或二十里。并且在大队前进的先一日必用几营或一个团去游击一次，侦察详细后才进，并且到达了一个地方，即马上建筑强固的工事，并召回地主豪绅组织善后委员会组织民团，这是敌人对付二次战争的策略与布置。

我们在这敌人慢进的时期中间（一月至五月）肃清了一些红色区域以内的地方武装，最

大的如兴、雩、宁、瑞交界的三都七堡，并扩大了一些红色区域，发展了地方武装，加紧红军政治军事训练教育工作，相当的改造苏维埃政权及整理党的组织，对于肃反工作，更有比较好的成绩，这是在这一时期我们的工作。

我们对于二次战争的策略经过了许多次数的讨论，在中央局扩大会后第一次讨论，当时大多数同志以敌人包围得这样严密及在军事上敌我力量的对比相差得太远，我们此时主要的是如何退敌，所以当时的策略是“分兵退敌”,那时认为我们把兵力分散，一则可以使敌人包围落空，二则目标转移，可以退敌，当时只有分兵退敌，才可以巩固现有苏区，才可以扩大红色区域，才可以扩大红军，才可以解决给养，才可以训练干部,这是第一次的讨论,时间是四月十几。但是过了几天，又召集第二次会议讨论（这些会议都是中央局召集的，参加的人除中央局同志外，各军军长政委，有时参谋长及政治部主任都参加),这一次的讨论仍是继续第一次讨论的精神，不过认为马上分不好，应该打一仗再分，才是更进攻与积极的，但究竟打敌人那一路，当时多数同志的意见是打蒋蔡，理由是蒋蔡打坍之后我们有出路，便于发展，可以伸开两手到湘南到赣南。这时泽东同志意见认为在进攻我们的人中，蒋蔡比较是强有力的，在历史上未曾打过败仗，曾经在湘南把张发奎打得落花流水，我们现在主要的是择敌人弱点打破，打蒋蔡没有绝对胜利的把握，我们应打王金钰这路，因为这路敌人既弱且地势群众都好。在这一决定后马上动员（此时军队尚集中在宁都附近一带)，中央发一告同志书，总政治部发一告群众书，但这文件的精神都是很积极的，是号召群众起来参加二次战争消灭敌人，整个红军第二天即开始行动，把主力军集中在东固南龙一带，仍是等敌人进入赤区腹地再出击，军队集中的时间大约是在四月二十五、二十六日，此时敌人的进展还是不快。等到四月三十一日对策略的问题又提出来讨论，由泽东同志先报告，这一次讨论的精神则完全转变了，认为目前全国革命是高涨的，我们应取积极进攻策略，敌人包围我们的军事力量虽多，但有许多弱点，如在包围的军阀与军阀不一致，指挥不统一，他们军官与兵士中间不一致，兵士不愿打红军，没有群众条件，地势不熟，给养运输非常困难。我们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虽然很小，但我们有几个优点：第一红军好，此时士兵群众斗争情绪非常之高，干部非常热烈，红军上下一致的团结力量非常坚强，大家都是磨拳擦掌的要打；第二群众好，群众得到了土地革命的利益，又被敌人的摧残，斗争情绪当然好，对红军是极端拥护；第三是地势好，我们对于这带地势都非常熟悉，我们可以占领优越的地势以进攻敌人。现在敌人有这么多弱点，我们有这么多优点，我们是可以以少胜众的，在历史上以少胜众的事实很多，革命的军队要以少胜众，所以当时最后决定的策略是“坚决的进攻，艰苦的奋斗，长期的作战，以消灭敌人”。并且承认过去的“分兵”的策略是机会主义。在这一策略决定之后，在红军与群众中，都大的动员起来，除开党的会议之外，红军中各军开誓师大会，群众中乃在五月纪念节群众大会宣传鼓动，对粮食给养问题准备足三月。当时尚有二个半月的经费，所差半月要由节省中出来，各军办公费减到最低限度，在红军中及群众都号召大家节省，准备艰苦的长期的与敌人奋斗。当时组织了一个战争经济委员会，统一经济问题，各军许多政治工作人员，以及党的干部，都派到各下级政府及党部去，一方面发动广大群众筹买粮食,米,盐……(都是照当地的市价收买),一方面帮助改造政权，改造党,肃反参战……等工作，分作几区组织筹办。

自这一策略决定之后，敌人的进展还是不很快，我们在这一时期，还能在群众中做了一些工作，及至到五月十几，敌人的行动非常快了（原因大概是南京的国民会议及广东问题发

生）各方面都在前进，到五月十五日公秉藩部已经进到东固附近来了。我们准备出击，此时敌人对我们军事力量布置的估量认为东固只有我们一部分的主力，而我们大部分主力在宁都一带，他们的计划第一步占领富田藤田一线，第二步占领东固龙冈，以后即追至宁都，他们在瑞金开一口，预备压迫我们到闽西来消灭我们，他们认为激烈的战争将在宁都一带。

我们当时出战的战略是由左打到右（即由西而东），公秉藩部到东固附近，我们十六日分三路出击，左路第三军在观音岩，中路第四军在九层岭，右路十二军在上下坊一带牵制白沙水南的敌人。三军团则去包围富田，总司令部由中洞进，这次公逆亦前进，预备在这天到东固，因此，我们在路上遭遇，而最先遭遇的是总司令部，公逆猛烈的向前冲，总司令部仅带一特务队，因抵制不住而上山，幸此时三军已在左翼接触抄到他的后方，四军亦占领九层岭，因此敌人有受我们三、四军包围，战争很激烈，多至白刃相接，我们被敌人手榴弹击死伤的很多，战争从上午十时至下午三时才结束。公逆全部被我们完全缴械，公逆本人仅带几人逃走（有说是从俘虏中混走的），这次战争结束后各军向富田前进，富田敌人是王金钰部。

三军团到十六日午夜才达到富田，四军亦达到，此时敌人已于十二时退走了一部分，结果仅能解决敌人两团多人。

此次战争蒋蔡在赣南兴国，我们仅有红军一师人，配合地方武装牵制，假使此时蒋蔡北进，则我们后方受到危险非常困难，但此时蒋蔡不但未前进，并且将前进到城冈的部队撤退到兴国城（原因大概是因为广东问题发生），所以我们无后顾之忧。

富田之战后红军主力即向右移，水南白沙一路的敌人都在撤退，我们追击去，仅有小的抵抗，郭华宗郝梦麟两师都各被我们解决一部分，再向右移动，敌人即为孙连仲部队，我们二十一进攻中村孙部，孙部战斗力比较强，经过几点顽强的抵抗之后，才被我们包围解决两团多人。中村之役后即进广昌，广昌敌人系朱绍良所指挥的许毛胡三师，广昌的防御工事特别坚强，非常不易冲上去，广昌虽然卒被我们包围占领，但是我们牺牲颇大，而解决及缴枪很少，但打死了敌人师长胡祖钰。广昌战后即到了闽赣边之建宁，建宁敌人是刘和鼎部，刘最初不料我们主力已到，不甚防备，后来虽知道了，但认为我们久战之余兵力疲乏，可以与我们一战，建宁没有建筑工事，敌人凭山而守，后被我们红军冲上，又被我们包围，所以建宁被我占领，解决敌人两团以上，得敌人后方西药颇多，刘和鼎本人化装逃走，其制服及徽章都被我们得到了，占领建宁解决刘和鼎是五月三十日。

自建宁战争后，第二次战争告了结束。总计从五月十六到五月三十日，大的战争五次（（1）东固、富田，（2）水南白沙，（3）中村，（4）广昌，（5）建宁），打坍敌人十三师以上，毁坏敌人工事四五百里，缴获敌人步枪约一万余（但自己死伤兵的枪有一部在内，同时有千余无机柄枪），大炮三尊（可用），无线电机四架（2架15W，1架100W，1架50W），其他机关枪迫机炮手枪手榴弹都很多。

二次战争一般的说来，都是比从前进步，不过有一最大的缺点，即没有后方组织，在战争后打扫战场，多靠地方政府，以致做得很不好，战争结束后武器散在战场上许久才能收拾，恐还要丧失一些，伤病兵在战场上抬救亦不快。

自二次战争结束后，我们红军力量即分散在闽北许多县筹款，占领许多县，如宁化，将乐，归化，顺昌，永安等县，此时从报纸及无线电消息已经知道了，两广问题的发生及北方问题的紧张，当时已经估计到南京政府在这一次惨败之后两广问题发生北方问题紧张必然很快的对我们的三次进攻，我们当时计划筹足比较充分的给养，准备长期的战争，但敌人很快的

增加，老蒋比较嫡系的军队到前方，蒋亲到江西，敌人的前进非常快，因此我们即决定缩短筹款期间，集中力量。

敌人这次战争的策略是猛进长追，在军事上布置右路为蒋蔡，总指挥陈铭枢，中路为上官云相所指挥的是些北方军队，左路是陈诚、罗卓英、毛炳文、许克祥、蒋鼎文、卫立煌，这些部队，这路是敌人主力，何应钦指挥。他们第一步计划是乘我们主力散布在闽赣边时，以其主力猛烈的从南城南丰一直进到石城，企图把我们的力量分散，但我们已先二日超过石城集中了，所以敌人第一步计划是失败了。

敌人又企图压迫我们到广东福建或湘南，使两广不得不来对付我们，一方面和缓了两广反蒋，一方面可以夹击我们。

我们对于三次战争的策略，总的路线仍与二次战争同，坚决的进攻，艰苦奋斗，我们离开了现在的苏维埃区，对广东此时不管，专门对付南京，我们集中一切力量在一个优越的地势，仍是引敌深入，先择敌人弱的部分击破，然后各部击破，所以在三次战争前自动的放弃了很多的地方引敌人进来。

我离开中央苏区是七月二十日，这时我们的力量正在集中，还未与敌人接触，我们对三次战争的估计，认为是有胜利的把握，因为第二次战争一些胜利的条件都完全存在，有些还要充分，同时所谓老蒋的嫡系部队，我们曾经小接触过，并不强于二次战争所被击破的部队，又因为他们要并进长追，所以没有能建筑象二次战争那样工事，我们打是比较容易，我们运用二次战争的经验来争取三次战争的胜利是有把握的，不过这次战争，是老蒋的拼命战，必然比一、二次要残酷得多。

三次战争胜利后，要在赣南占领比较大的城市（如赣州、吉安），巩固在赣南的根据地，并发展新的苏区及扩大红军。

三、红军的现状

从上面几次战争中，红军一、三军团一般的说，已具铁军的资格，是无待说明了，那边红军的编制，总的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直辖两个军团，即第一军团与第三军团。第一军团有第三军、第四军、第十二军及十五军及六十四师（原二十二军改编的）。第三军团即彭德怀同志所指挥的五、八两军。但第一军团现在没有军团指挥部，各军直属总司令部指挥。第三军团没有军部即由军团总指挥直接指挥各师。再七军二十军，现在已过到赣东来，我来时才过来的，尚没有新的改编，是直属总司令部指挥的。

现在那边的红军团结是非常坚强，在指挥上完全是统一的，不过在些小的问题上，如干部问题、医药问题等等，还有各军多顾及本军的小团体倾向。

红军武器和人员总的数量（另详），那边的编制仍是旧的"三三制"，每团有一机关枪连，每师有一迫击炮连（尚在编制中），共有一炮兵团，工兵营，各军各师都有直属部队及教导队或随营学校等。

红军的指挥员与战斗员的成分，上级干部仍是以知识分子出身的多，但他们都是经过长期的斗争锻炼出来的，下级干部多工农成分，战斗员中的成分每军产业工人都有一小部分（一百到二百人，多系安源工人）。手工业工人有一部分，最大多数为贫农，中农亦有一部分，但富农地主出身的仍有极少数。

红军中政治委员制度仍未能照新的政治工作条例建立，仍是旧的编制，由连到军都是政治委员，但一切主要问题仍是党来决定，在党的委员会决定之后来执行。

红军中一般政治教育，平时每日都有政治课，由政治委员领导。遇有纪念节或特殊事件即召集大会，有时发动士兵群众实际参加群众工作，士兵会经常的有文化工作，如识字运动，壁报娱乐会等。有些士兵最初不识字的现在竟能识字与写文章了。壁报是士兵自己投稿的多，从政治上一直到日常生活上的文章都有，有些部队办理得还不错。

军事教育平日每日都要上操，最注意散兵抢山与瞄准等，在二次战争中在军事技术上已经比以前进步，如射击瞄准多能正，但总的来说，现在大规模的战争军事技术的教育还是缺乏。

士兵会（现在叫做士兵会）现在仍有工作，以连的单位组织，直属部以伙食单位组织，没有上层的机关，在政治委员领导下工作，他们的工作审查经济文化运动——识字壁报娱乐等，参加群众工作及帮助维持军容风纪等，但对于军事行动则不干予。

红军与群众关系比较上是算好的，群众对于红军是拥护的。如群众帮助红军运输筹办粮食，侦探交通，抬伤病兵等都表示其积极性。红军对于群众工作，亦特别注意与群众结一种生死密切的关系。如红军所在地召集群众大会，派干部到群众中实际去帮助工作，如帮助他们分配土地，建立政权，组织群众等工作，如士兵群众在插秧打禾时实际帮助农民去插秧打禾，不要工钱不吃他们的饭。又红军有三大纪律（打土豪要归公，不拿贫苦工农一点东西，一切要听指挥），八项注意（上门板、捆禾草、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买卖要公平、说话要和气、窝屎找毛坑、不抄白军士兵的腰包），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红军任何人都知道并且非常熟悉，且能完全执行，这些在与群众关系上都是非常重要的。

红军的给养，红军中的薪饷制完全废除（除最近从敌人俘虏过来的无线电员及医生等少数人有薪饷外），待遇完全是上下一致，每人都只有伙食费，有时每天一角五分，有时一角，有时八分，零用靠分伙食尾，经济充裕的时候有时发一二元的零用费，伙食费的多少也是看经济情形来决定，但增加或减少在士兵群众中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现在整个的经济完全是统一的，各军都是由总司令部发给，后方的由军事委员会管理。我们的经济来源完全是红军本身到白区去筹款，经济总要筹足三个月的款项。

红军的后方医院，现在伤病的是很多。我来时后方医院有将近三千人，假使在战争之后更要增加，过去医院的组织，是有一总医院，下设四分院，分院之下设所，伤病员多分住在所里，总院成了一空机关。过去有二个分院的院长及政治委员都是AB团，把医院弄得非常糟，甚至伤病兵都怕去住医院。自AB团破获后，经过了几次的整理，现在是决定在革命军事委员会设立军医处，取消总院制，分设几个医院均直属军医处指挥，那边的药品与医生都很缺乏，药品除缴敌人的之外，有时要被我们所扣留的地主豪绅到吉安去买来。医生亦缺乏，除我们有少数的西医外，利用俘虏过来的医生，中医中药均用。

红军大规模的学校现在尚未办。最近办过一次随营学校，但成绩不甚好，原因是许多教员及负责人都是从外面去的，各军一些实际情形尚不了解，所以结果要偏于一些空的理论去了。各军自己所办的教导队或随营学校，他们不脱离他们本军的实际生活，一经毕业，马上可以工作，所以红军中的负责同志对于办理大规模的红军学校问题过去并不十分重视。实际目前非常需要办一个大规模的红军学校。最近总前委曾经讨论，中央局提出，我们现在急需要办一大规模学校，过去办得不好，我们应利用过去的经验来改善，过去办理的人少实际工

作经验，现在应把一部分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好的干部从红军中调出来参合。外面派来一部分有理论的同志合办，可以把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即不致落空。学生由军队调一部分，由地方招一部分，大规模的来办。这一意见大家都赞成，但现在又因为战争到了，恐尚未执行。

红军兵工厂现在还只有一修械处，有三、四十工人，目前主要还只是修理各种枪炮。

红军交通器工具，总司令部与各军，各军与各师，在驻军时有有线电话可通，无线电除中央送去的以外，我们已有了五架，三架15W，一架100W，一架50W，现在除50W的外均可用。平常总司令部与革命军事委员会，与三军团总部都可以通电。现在非常急迫的需要与上海打通。无线电技术人材，最大部分是俘虏过来的，我们已办有两期训练，一期15学生，一期18学生，俘虏生打电的没有人监督，其中有一部分表现还好。

红军中的党组织，以连为单位组织支部，团、师、军都有委员会。现在红军中一切问题多是由党来决定。许多政权方面的问题，军事方面的问题，都是党代替了，是党管一切，结果是党包办了一切。而对于党本身的党务工作，如发展组织，党员训练与教育工作自然要放松了些，这是还未执行新的政治工作条例的原因。红军中支部生活，会议是可以开，缴纳党费是没有问题，但一般同志的政治水平还低。核心的领导工作还非常之弱。党员与团员在红军中所占的数量大约有三分之一，干部最大部分都是党员。

总括的来说这个中国主力红军是好的，是一天一天进步的，指挥给养都是绝对统一的，团结是一致的，我们党完全可以掌握得住，完全是在党的领导之下而奋斗。目前最大的困难即是干部的缺乏与士兵的补充与扩大。

四、苏维埃政权问题

江西苏维埃政权的发展，大部分是由红军把国民党统治推翻后建立起立的，有少数地方经过地方暴动。

苏维埃政府组织的系统是省——县——区——乡——村，这些苏维埃政府的产生，村乡都是经过群众大会，区、县有经过代表大会的，有经过群众大会的，有系党指定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是去年吉安打下，经过三万人的群众大会产生，过去在江西苏维埃之下还有各路办事处，以指挥各县。现在各县办事处已经取消，省直接指挥各县，各级政府的关系不好，财政也不统一，有各自为政的形势，下级对上级的报告及上级对下级的实际的指导都很少。

苏维埃政府的领导问题，现在仍成为严重问题，因为江西苏维埃政权是靠红军建立的，在红军初到来时，一切情形不熟悉，最初起来的大部分是些富农流氓分子，真正下层的工农群众最初不敢起来，所以在过去的政权机关完全是被富农流氓把持，一直到现在这一富农的基础还未肃清，所以这些苏维埃政权的领导大部分仍是操在富农手里，AB团亦是在这一基础上来发展，因此苏维埃政权与群众的关系不好，许多苏维埃政权，不但不能为群众谋利益还要压迫群众，群众不认识苏维埃政权是自己的政权，不敢批评政府，监督政府。所以这个政权还是脱离群众，真正的雇农、贫农、工人还很少参加这一政权。有许多政府中吃饭的人很多，每月用的经费很大，工作人员腐化，而各级政府的工作名义上，省、县、区各级苏维埃都有土地、财政、国民经济、社会保险、交通赤卫诸部或委员，但实际政权的经常工作没有，各级政府的经常工作只有帮助找夫子、买粮食、招待过路红军或政府人员、放哨、打路票等工作，其余如财政的预算，土地分配的调查，土地税、商业税的征收，农田水利的设

备，文化教育等工作都没有，各级政府的经费仍是过去所谓打土豪来的。

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问题，在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时已经提到这一问题，应特别注意准备，在决议案亦写到，要全党来注意这一工作。当时决定后即马上进入战争的环境，全部力量在对付战争，所以又未能进行这一工作，及至二次胜利，中央局马上筹划这一工作，并决定八月一日开会，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通令，并且无线电对全国工农劳苦群众发出通电，并由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了全苏大会的选举条例，选举条例的原则是凡不剥削人，以劳动为生，不论男女，不论国籍，在十六岁以上的均有选举与被选举权，凡以剥削为生的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以传教为生的和尚道士尼姑，以及参加反革命组织被政府剥夺公权的都没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选举的标准以乡为初选单位，乡每工人雇农五人可选一代表，贫农、中农及其它每五十人选一代表。区的复选，工人、雇农每二十人选一代表，贫农、中农及其他每二百人选一代表。镇市及大于镇市的城市工人每五十人选一代表，其他五百人选一代表。县是最后的复选，每三千人选一代表。红军中初选以连为单位，以三十人选一代表，复选为军，每三百选一代表，县与军所选出来的代表，直接到全苏大会（这一条例大概是如此，但详细我记不清楚）。

中央局对全苏大会问题，有决议案宣传大纲以及解释全苏大会回答式的小册子发表，满拟很快可以开会，但后来因各级对于这选举工作做得不好，且又有军事行动了，所以又决定把大会日期改在十月革命节举行，希望各苏区多派代表去。

五、土地革命问题

江西的土地革命问题，虽然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彻底的解决，但是过去经过了许多斗争，有许多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的教训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在去年"二七"会议以前，对于土地革命完全是机会主义，严格的说土地革命尚未开始，那时候有许多地方苏维埃政权已经建立很久了，但是土地尚未开始分配，有些地方主张，五十亩以下的地主土地不没收，有些只提打土豪不提分田地的口号，有些主张革命家属土地不没收的，有些主张以生产工具与劳动力为标准分配的，各种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来阻碍土地革命的进行，在"二七"会议坚决的与这些反革命的倾向斗争，"二七"会议提出的口号是没收一切土地按人口彻底平均分配，抽多补少，自"二七"会议后在江西才开始了土地革命，破坏了封建制度，分配了土地，但是没收一切土地口号后来亦承认是错了，同时仅有抽多补少的口号，富农乃把瘦田抽出来而保存肥田，所以在打下吉安之后又提出抽肥补瘦的口号来，这一时期立三路线的集体农场制等没有接收，没有动摇这一分配土地的原则。

现在没收与分配土地是这样，即以乡为单位，把这一乡所有的土地山林都算起来，分为上中下三等，折为谷的担数，再算这一乡有多少人（地主家属，富农都算在内），不论男女老少按人口平均分配，近山的多分山，近田的多分田，由农民原有的土地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生的不补，死的不还，确定土地私有权，准许租借买卖，红军同样的分得土地，工人如果愿意分的亦分得土地。

江西土地已有分配两三次的，如在抽多补少时分了一回，抽肥补瘦时又分了一回，但是在有些地方因为领导权被富农AB团把持还未能完全执行，甚至有在党部或政府工作人员中

专分好田的。

中央局项英同志去后，把分配的标准改为以劳动力为主，人口为副，并决定十五岁至四十五岁为一劳动单位通告下去，有些地方执行发生许多问题，有些地方未执行，到中央局扩大会议时，对于这一分配标准问题经过了严重的争论，反对以劳动力为标准分配的理由：（1）土地少的地方以劳动力为标准分配，许多人家不够吃；（2）以人口平均分配简单快，以劳动力人口为准复杂难算，富农可以从中作弊，以延缓土地分配，且以人口平均分配是群众的要求；（3）现在农村破产的贫农家庭不一定是人口少，富农家庭也有劳动力多的；（4）在人口80%是是贫农、中农的地方按人口平均分配是贫农、中农得到利益。所以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仍是决定以人口为准平均分配，在中央局扩大会继续时，承认过去的解决土地问题一般的是正确的，惟对于地主家属及和尚道士尼姑等在原则上不分配土地，但允许租借土地给他们。

自中央土地法令到后，在中央局工作的同志，已经了解了过去一切人平分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口号均是缺乏阶级的立场，对富农土地不没收是错误的等，决定要提出讨论，到前方开全体中央局会议，来讨论这一土地法令，来改变过去解决土地问题的路线，但是到了前方因为军事紧张，总司令部马上要开动，所以对这一问题又未能讨论，但是不知道我来后曾讨论否。我想那边的同志只要理论能说服他们，并且能解决实际问题，对于正确路线的接受是不会成问题的。

六、苏区的经济政策问题

这一时期苏区的经济完全是被敌人封锁，工业品很少能输入苏区，因此苏区的工业品非常缺乏，但食盐以及一些日常用品如毛巾、牙粉、牙刷、火柴、纸烟、袜子仍有卖，但价格要比上海贵一倍，苏区内的土产如谷米、纸张、茶油等不易输出。那边的米价颇贱大约只大洋二元半一担。在我们红色腹地的商业，过去因为策略的错误，以及AB团的故意破坏以至市场不堪了。在江西仍是圩场经济，每隔几天一次圩，农民拿东西到圩场上来卖，现在因为策略的改变，允许自由贸易，所以商业又渐渐的恢复起来，市场的东西慢慢多了，一般的纸票均不用，只我们江西工农银行的纸票可用，普遍是用大洋及铜元，有些地方小洋也用，现在奸商操纵市场的事还未发现，货物的价格没有规定。

在新发展的红色区，均执行我们的经济政策，商业没有多大的破坏，市场的情形比较好。

现在主要的是还是恢复商业问题，大商人还很少，大半系小商，所以对商业界累进税还没有征收，现在准备要收了。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还未把征收的标准定出来。

七、苏区群众组织

苏区里面的工农劳苦群众一般的说来是得到土地革命的利益的，所以群众对革命的表示是好的，是拥护的，一般对斗争的情绪是高的。但是因为过去富农流氓等把持了群众的领导机关，所以群众的组织很不健全，不能起很多的领导作用。

工会的组织过去有江西省赤色总工会，各县各区各乡都有工会的组织，但工会会员最大

部分是独立劳动的，学徒老板都组织在一块，没有甚么斗争，经常工作是一般政权方面，而没有工会本身的工作，而在各工会领导机关，许多AB团，如在江西省总工会竟清出四十余AB团，各县县工会都有AB团把持，省总工会的委员长肖道德即是AB团。

在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是决定独立劳动者不加入工会，现在已有开始洗刷，但如果领导权不夺回，这一工作当然很困难的做好。

江西省总工会，现在已经取消，而以全总中央执行局代理工作，全总执行局自蔡树藩、陈友生二同志去才组织，当时没有什么工作，又因战争的关系把他们派到下层去工作，后来陈病了，蔡又被飞机炸伤，执行局是停顿的形势，最近梁广同志去，蔡陈又均好了，已经开始了工作，现在是梁为主任，他们很迫切希望全总能再派几人去，特别需要一执行局的秘书长，过去的秘书长是AB团，现在是倪志侠同志担任。

农村中真正被剥削的工人很少，有些造纸榨油的作坊停顿，八小时工作制还未执行。

我们占领的几个县城及大一点的镇市，自然工会的工作比较重要，但对于这些地方也未能去建立健全的工作。

雇农工会，本来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主要的还是雇农，但过去苏区党有一错误的认识，以雇农分得了土地后，即不算雇农了，因此苏区几乎没有雇农了，但这一错误现已改正，雇农工会现在各级都有了组织，有一江西雇农总工会，各县区乡都有雇农工会，但工作仍是形式多，能在群众中起领导作用少。

贫农团各乡以乡为单位都有组织，但他们的工作，只是一些广泛的政权方面的工作，如讨论参战坚壁清野、肃反……这些问题曾对于怎样去反富农，怎样去监督苏维埃政权，怎样在选举运动起作用，是没有的。

总之现在无论在雇农工会、贫农团组织还免不了富农中农钻入；因为苏区对于农民各阶层的认识非常模糊，大家都自认为过去是贫农或雇农。

互济会的组织各级都有，江西有一省互济会的组织，但他们的工作亦只是做点一般的宣传工作，及慰劳红军等工作，而对于广大的反白色恐怖的运动及革命互济的工作做得很少。

妇女群众没有单独的组织，只是加入在各级组织中。

反帝大同盟尚没有组织。

八、地方武装问题

在过去立三路线集中武装原则之下，地方武装的枪枝几乎完全集中去了，在第一次战争胜利后缴获七八千枪枝，而大批武装了地方，当时发给地方的枪枝有四五千，特别对赤白交界的边界的地方发得多。

现在各县都有一红色警卫营，或独立团的组织，各区都有一特务队或游击队的组织，这些部队都是脱离生产的，其组织与红军差不多，他们的武装亦很好，他们指挥平时在县由县政府指挥，区由区政府指挥，但红军总司令部及各军军部，可以调动他们。

他们的战斗力当然不及正式红军，但他们扰敌堵敌牵制敌人是有很大的作用，但带的地方性仍浓厚。

现在已将各县地方武装一部分，组织三个独立师，即赣东一师，赣南一师，永吉泰一师，这些师的师长均是由各红军派去的，现在这些师虽然带着地方性，但是预备要补充到各红

军的，集中这一部分，另又发了一部分武装给他们。

过去AB团特别在地方武装中发展，如乐安、万泰的警卫营大部分的干部都是AB团，但后来均破坏已渐次肃清了。

除这些地方武装，其余凡二十三岁至四十五岁的壮丁均组织在赤卫队，赤卫队有赤卫、侦探、交通、担架、慰劳等队的组织，由各政府的调动指挥武器仅少数步枪，其余以梭标等为多。

九、肃反工作与富田事变问题

江西过去土地问题没有彻底的解决，地主残余没有消灭，富农没有抑制，而这些分子又窃取了苏区中国共产党以致苏维埃政权的领导机关，及至后来群众斗争一天一天尖锐，土地革命一天一天的深入，外面敌人进攻一天一天的严重，这些分子马上一批一批的走入反革命的道路，而秘密的组织反革命的组织，在江西最显著的是AB团，自然其他改组派社会民主党取消派托陈派都是有的，但要以AB团为中心。

A·B (ANTI-BOLSHEVIK) 是"反布尔塞维克"的意思，他的组织在江西有长期的历史，武汉政府时代即以段锡朋几人为首领而组织，是国民党的右派，主要的是反共，他组织成分主要的是地主富农而组织是全国总机关设立南京，以段锡朋为首领，蒋介石利用他们来反共，来破坏红军与苏维埃政权，这种组织等于西欧的"法西斯蒂"，他们主要政纲是以"反共"为中心，而一般是以国民党的政纲为政纲。

江西的党与团，政权，群众组织各领导机关，过去几乎都是地主残余富农知识分子所把持，而这些分子最大部分都是加入AB团了，比如过去的江西省行委最大部分的都是AB团分子，各县县委政府整个是AB团的，有许多接连破坏三次四次，有许多甚至有破坏到九次的，少共的领导机关更严重，过去团的赣西南特区委，各县县委，童子团少先队，负责的最大部分都是AB团分子，有许多地方武装中AB团问题亦很严重，总之过去赣西南的知识分子的地方干部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AB团的分子。

AB团的组织系统，在赣西南有一总团部，下有几路团部，各县各区各乡都有团部，负责的有团长副团长，他们在红军中的组织是另外的系统，而一般组织的青年、妇女、成年都是分开的，都没有什么文件。他们发展组织对于一般地主残余富农知识分子的动摇分子，是用革命没有出路的话来动摇他们，如说南京政府现在已经稳定了，白军这样进攻，红军一定要失败，苏维埃要消灭，我们的思想要有转变，我们应自找出路等等。对于一般群众是用强迫的办法，如说替他们保险，白军来不杀他，邀他开会时最初并不说是AB团的会议，开了几次会后即通知他，你已加入AB团了，你在AB团已开几次会，你不要泄漏秘密，如泄漏秘密即以手枪对付。并且说现在上层的共产党部政府机关的人都是等等。他们并利用许多公开的名义引诱人加入，如革命研究会，或者甚么嫖客委员会，好吃委员会等等奇怪的名字。

AB团在苏区主要的策略是破坏，使群众对共产党对苏维埃政权不满意，他们特别注意利用我们党的不正确的路线来进行其破坏工作，过去在立三路线掩护之下他们做了很多工作，立三路线的确是帮助了AB团的工作，比如他们利用攻打大城市之口号，要红军不顾敌我力量的对比去打南昌九江，企图消灭红军，利用猛烈扩大红军的口号即大批大批送AB团分子，或强迫群众老弱病残的分子，或强迫群众来当红军，削弱红军的力量，利用集体农场

口号反对平均分配土地，利用婚姻绝对自由的口号，实行乱交及漫无限制的自由恋爱，利用反富农的口号去打中农贫农，不久自由贸易对商业完全破坏。他们一方面作了这么多的恶，使群众非常不满，另一方面又在群众中宣传鼓动，说这是共产党的主张，使群众对共产党怀疑不满意，所以在第一次战争胜利以前，群众情绪是有消沉的状态。

他们对革命的领袖用了许多离间的策略，无论大小问题，稍有一点意见的不同，他们即尽量的利用，拉一方面，打一方面，不过这些企图没有成功。他们对红军的破坏，在红军中组织AB团，平时在部队造谣，集合时发谣风，破坏武器，丢弃枪枝零件，减少子弹的弹药，离间军心，在行军作战时，在后面放枪打自己的人，在退却时阻碍交通等，他们的破坏工作是无微不至，但红军中的AB团在一次战争前只第三军及二十军比较严重，其它各军比较少，但三军经过大的破坏已经渐次肃清，其他各军亦有破坏，特别在总政治部破坏更大，现在整个的红军中AB团问题不是严重的问题了。红军我们完全可以抓住。是没有问题的。

AB团在苏区有几次暴动的计划以响应白军，但都失败了，几次计划暗杀红军的领袖亦没有成功，AB团的上层组织已经破坏了，下层各级组织已继续不断的破坏了很多，维尚未能完全肃清，他们仍在活动，所以在中央苏区的AB团仍是相当的严重的问题。自然其他反动政治派别亦必不可免的有其组织，并且会要继续不断的发生。

关于肃反机关的组织，江西省政府各县各区政府都有肃反委员会的组织，红军中军师团亦均有肃反委员会的组织，其他各机关如红军随营学校医院等均有这种的组织，过去这些组织没有好的统一组织指挥系统的肃反委员会，无论区的各机关的都可以判决反革命分子，及处死刑等，并且有时不报告上级，所以现在究竟处决了多少人尚不能有精确的统计，同时有些肃委的处决，不一定完全正确，但总的来说所处决的反革命最大部分是正确的，现对于这一组织，逐渐加以改正，在革命军事委员会下成立了一政治保卫处是一肃反的最高机关，指挥整个肃反工作，各级肃委渐次改为政治保卫处，并决定区一级的肃委没有处决的权，各级肃反工作应向上级报告。

关于肃反工作的路线，对反革命坚决的进攻，跟踪穷追，并注意多找证据，在处办的原则方面，如果对于地主富农知识分子的成分，或是在AB团负重要责任的分子，或是做了很多破坏工作的均极严厉的解决。其对于一般被欺骗的工农劳苦群众，或青年群众多从轻处置释放他们。对于重要分子的审判，多召集群众代表大会会审，由他自己向群众宣布其加入AB团的经过，及AB团的罪恶与阴谋，经过群众代表判决，有时亦召集群众大会宣布。现在群众对于AB团是反革命的组织这点是完全了解了，但对于所谓“老革命”是不是AB团则有时还有怀疑，但经过代表大会判决的，则立刻了解了。我们注意反革命的自首，曾由江西省政府颁布了自首条例，对于捕后能真实的自首供出他们的组织及各种阴谋的亦优待他们。

关于富田事变问题，富田事变是去年十二月间的事，是当时大批的破获了AB团拘捕了AB团的许多重要分子，关在二十军里面，总前委派李绍九同志去处置这一问题，二十军的AB团刘敌（是一团政治委员）当时即领导二十军（因为当时二十军内干部有许多是AB团）在富田暴动，把所有AB团被拘的分子均释放，把二十军军长刘铁超同志及中央派去提款的易××及李××同志捆起来，把省政府主席曾山赶走，提出毛泽东反革命的口号，制造假信，送给朱彭黄三同志，把二十军拖到河西，把红军学校一部分缴械，仍打起红旗要攻打吉安，当时总前委对于这一事变的估计肯定了是AB团的暴动，采取坚决进攻的策略，及至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的中央局所对于富田事变的估计，认为客观上是反革命的暴动，又认为江

西过去党内无原则的派别纠纷是促成富田事变的原因，又认为不能肯定这是AB团所领导的暴动。因此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是双方处罚和平了事，而对于许多重要分子认为仍是共产党员可以教育，AB团即利用这一调和路线大批回到赣东来，向党承认自己的错误请党教育，实际他们到赣东来恢复工作发展组织AB团，在这一时期是有相当的发展。

到中央局扩大会才认定调和路线时中央局对于富田事变的解决完全是错误的，并且指出其危险，肯定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的暴动，承认总前委过去解决的路线是对的，不过在技术上有些缺点，成立了一富田事变的决议案，这一决议案的精神与中央政治局对于这一问题的决议案大致相同。

同时又发现了许多材料证实了那些领导富田事变的分子都是AB团的重要分子，把他们拘禁起来，并且都自供出来了。

十、地方党的组织现状

江西地方党部在富田事变前有江西省行委的组织，这一省行委当时完全是为AB团分子所把持，并且在立三路线掩护之下做了很多的反革命的工作，自富田事变后他们虽仍在永阳企图用省行委名义工作，但是已失去了群众的信仰，所以结果即解散了。

自省行委解散之后，我们即组织了一赣西南特区委，即等于省委，特区委设东路、南路、西路、北路各分委，南路东路在赣江之东，西路北路在赣江之西，特区委书记是陈毅同志，但当时因为交通的关系，特区委与各路分委也被敌人隔间，在二次战争前未发生关系，对东路的关系也不好，所以当时特区委所能指挥的只直属的县委及区委及省政府的工作而已。

自二次战争之后为统一指挥集中力量集中人材计，而将赣西南特区委取消，在赣东成立三个特委，即赣东赣南永吉泰三特委，直接属于中央局指挥，当时另有一闽赣边工作委员会的组织，但后来取消了，在河西成立湘赣边省委，指挥河西及湘东南的工作（原来中央是决定湘东南省委的在中央局有这一变更）。

现在组织的系统在各特委或省委之下，如县委——区委——支部——支分部或小组，支部是乡为单位，支分部或小组以村为单位。

关于党员的数量及成分一向没有精确的统计，过去所谓几万或十几万的数目字都是不正确的，特别在最近AB团大破获之后更不容易统计了，现在只就我们比较正确的估计，在赣东大概有党员五千余，成分更难统计，总的说来是以贫农为多，赣西现在据说约有一万多党员，但尚未清洗党的领导问题，过去各级领导机关被AB团把持，充满了地主残余及富农分子，一直到现在虽然比从前好些，但尚未完全肃清，即以支部负责的而论，多半落在富农商人，独立劳动者的手中，甚至道士阴阳先生都有。其原因是这些地方的政权及党多半是红军来才建立才组织的，在红军来时最初起来的多半是些这分子，因为这一基础传流下来尚未肃清，同时贫农雇农多不识字不活动，他们最初多不敢起来，所以这些领导被那些分子窃取去了，甚至因为党要提拔工人雇农，他们可以冒称工人雇农，自然土地问题没有彻底的解决，反富农的斗争，没有真正的很好的发动，真正的工人雇农贫农没有积极的起来争取这一领导，所以能使这现象仍旧存在。

关于党的训练与教育工作，一般同志的政治水平都低，党的训练教育工作都缺乏，训练

的材料亦很少，并且文字的材料不能深入到群众中去，党的决议案通告等多只能达到区一级，每个支部中能识字的不过几个人，各级的巡视工作是有，但都不深入，大半只是出席会议做报告了事，检查工作亦是形式主义多。

党的支部生活因为现在支部是以乡为单位组织，许多乡都是纵横有四五十里，支部大会不容易开，支分部及小组会可以经常开，不过开会的形式主义非常厚，比如开一小组或支部会亦为群众大会一样的议事日程及仪节，而讨论问题又偏于广泛的一般的问题（如最近多半是讨论参战应敌，扩大红军肃反等等大问题，并且常重复的讨论，几次都是这些问题），对于支部的本身工作及怎样分配每个同志的工作及本身的教育训练问题等则讨论很少，所以支部的日常工作亦不能很好的建立起来，而支部在群众中的核心作用亦表现得非常之脆弱。

总的说来，江西地方党的组织力量是脆弱，特别自大破坏AB团之后更是破碎不堪，但是党的基础是有的，群众对于党的政纲是信仰的，群众在土地革命中是得到了利益，所以虽然AB团从中破坏，工农劳苦群众仍是跟着党走，加入到党里来，目前最困难的问题，现在旧的干部是没有几个了，自然我们亦了解要从下层提出新的干部及训练干部，但是不一天可以做到，在这一过渡时期工作非常繁重，没有干部实在是困难极了。

CY工作，CY一般情形与党的情形差不多，CY中央局现在经常只一人负责工作，其余的两个同志均派到下面去工作，CY现在中央局之下没有特委的组织（因为CY干部比党更困难），只有几个中心县委由CY中央局派一同志在那里领导，现在赣东方面的团员数量与成分亦没有精确的统计，大致与党员数量相差不多。

CY所领导的少先队儿童团的数量亦没有统计，但是亦有相当的工作少先队还能检阅，如在兴国检阅少先队则有二千余人，平日放哨查路票等多由少先队担负，CY曾动员少先队去参加红军，但成绩不甚好。

儿童团亦可以做些文化宣传工作等。

写在报告后的几句话：

1．本来我来时中央局预备开一次全体会议，每个问题讨论一次以便来报告，但是到我起程时，军事上已非常紧张，中央局以及总司令部都马上要行动，所以未能讨论，现在只就我平日所知道的，很客观的写出来。

2．写这报告时手中没有一点文字材料，只凭脑记忆出来的。

3．我曾带有几种材料到闽西（(1)赣西南特区委一个负责同志对赣西南工作报告。(2)滕代远关于赣西南的报告。(3)张君龙的报告。(4)中央局的工作报告。(5)中央局扩大会对于富田事变的决议。(6)中央局扩大会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要他们密写送来中央，如果这些材料来时可以参考。

4．我到中央苏区只三个多月，有许多历史上的问题还不能完全写出来。

5．我是七月二十日离开中央区的，这些都是七月二十日以前的情形。

6．有些问题不需要写的均已口头报告了。

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

（一）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主要特点，是江西工农红军冲破了敌人第三次的"围剿"与其他苏区红军的胜利，是普及全中国的灾民斗争，与澎湃着冲击前来的反帝潮流。

江西工农红军主力，在一个多月英勇的战斗中，击溃了国民党十一个师以上的兵力，消灭了五个师以上的部队，使国民党左、中、右三路全线溃退，使帝国主义国民党第三次围剿计划完全失败，使蒋介石不能不从前线逃回南京，宣告"剿匪军事已告一段落"。此外，鄂豫皖苏区除巩固原有阵地外，占领了广济、圻水、英山等县，击败与消灭了敌人进攻的部队。湘鄂西苏区除巩固原有苏区外，更占领了潜江天门等县。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在工农红军的这些伟大胜利中，无疑的展开了更广大的发展前途。这些胜利，更充分的证明出中央关于敌人第三次围剿的训令的估计与指示，以及共产国际主席团最近对于中国决议的完全正确，同时也就又一次的给予那些对中国革命悲观失望，对于工农红军造谣污蔑的反革命派——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罗章龙右派，邓演达第三党等，以及党内动摇、悲观、失望、消极的那些立三主义残余，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致命的打击。

我们的工农红军所以能够战胜兵士数量上比我们超过数倍，军事技术上比我们高明得多的国民党军队，当然不只是由于我们为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而战的工农红军将士的伟大的革命热情与勇敢善战，而且也由于苏区内外千百万工农群众的拥护。这一次我们的伟大胜利更明白的告诉我们，只有彻底实行国际与中央所指出的正确路线，正确的解决土地问题，巩固苏维埃与红军，以及领导千百万工农群众的一切斗争，我们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这一胜利，对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是最大的威胁，而且将加速的促进中国反革命内部的崩溃过程。但是对于苏区数十万红军与游击队，以及千百万掌握着苏维埃政权的工农群众，却是一帖最有力量的兴奋剂，使他们更其相信自己的力量，振起他们战斗的决心与勇气。对于千万万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下饥饿着、死亡着、奋斗着的工人、农民与兵士，以及一切劳苦民众，却是一盏指示出路的明灯，使他们更加易于跑到苏维埃的旗帜之下自求解放，更加唤醒他们对于苏区工农红军的拥护与创造新的工农红军苏维埃的热忱与勇气。

（二）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一方面使中国的农村经济急速破产，另一方面使新的生产力无从发展，以至造成了长期的经济恐慌与不断的灾荒。今年泛滥全中国的水灾，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的必然结果，这一四十年来所未有大水灾，一方面更深刻的表现出了中

国经济危机的不可救药，另一方面将更进一步的使这一危机益陷于全部崩溃的境地。

全中国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等待着饿死冻死与病死的灾民，现在已达一万万人，即占全中国人口四分之一。国民党虽是用了种种“赈灾”名义，又从民众身上搜括了不少金钱，但这些金钱大都为国民党的军阀官僚所中饱，国民党在广大的灾民群众前面完全表示了无办法与张惶失措的情绪，使他不能不疯狂般的用戒严，监禁，屠杀等方法去对付这千百万无告的灾民群众。

这一万万的广大的灾民群众，现在已经逐渐明了：国民党不但不能救济他们，而且只能剥削他们压迫他们与屠杀他们。他们现在也开始知道用自己的力量来救济他们自己了。示威游行、抢米、分粮、杀土豪地主，以及反对国民党官吏，同国民党军警的冲突的斗争，现在正在大规模的开展出去，实行土地革命的游击战争，正在风起云涌般的推向前来。他们在苏维埃与红军的影响之下，将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了解到，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创造苏维埃与红军，才是他们唯一的出路，无疑的这一千百万灾民的斗争，将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的致命的打击。

(三)世界经济危机的深入，苏联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功，世界革命运动的高涨，以至在几个国家内革命危机的成熟，使帝国主义对于苏联，对于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对于一切革命运动的进攻更其加紧了，同时各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也正在日益增长着。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行动以及他们相互间的错综关系，就是这一分析的最好的具体例子。而日本帝国义主却更露骨地，明目张胆地，表明了他一切的愿望，用武力占据了他所需要的东三省，要把东三省完全变成日本的殖民地。

很明显的，日本帝国主义这一次占据东三省，完全不是偶然的事，而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殖民地政策与中国国民党一贯投降帝国主义与勾结帝国主义政策的必然的结果。同时这一事件，必然将更其加紧各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侵掠与对于苏联的进攻。并且使帝国主义内部（尤其是英、日、美）的矛盾，更其增加。这一事件将成为世界大战尤其是反苏联战争的导火线。

但是伴着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加紧侵掠而来的是中国民众反帝潮流的高涨，尤其在日本占据东三省之后。东三省的占据，象电火一样燃烧了千百万工农群众的以至小资产阶级的反帝热情，使他们为了中国民族的自由与独立而斗争。当然中国反帝运动的发展所以如此迅速，不单是由于帝国主义的暴行，而也是由于中国国民党一贯投降与勾结帝国主义，压迫与屠杀中国民众的下流无耻的行为所造成的，国民党“反帝”的欺骗的武断宣传不断破产，使全中国的民众觉悟到，只有用他们自己的力量，才能打倒帝国主义。全中国的民众，在实际斗争中，现在也已经很快的了解到，要打倒帝国主义，就必须打倒国民党，而且实际的经验将告诉他们，只有苏维埃政府，才能同帝国主义做彻底的斗争。

反帝的怒涛，现在正在向前呼啸着。他将冲破一切帝国主义的藩篱与城堡。

在红军胜利灾民斗争与反帝斗争开展的背景上，我们当然也明显的看到：工人斗争的发展。这斗争的反攻性质，已经带有很浓厚的进攻性与政治性，并且他开始从自发的散漫的汇合成为更自觉的更有组织的更伟大的斗争了。在有些产业部门中，同盟罢工的形势已经日益成熟。农民斗争随着灾荒而更其发展。兵士的动摇，也日益加深。兵变的潮流，现在已经普及于全国。在华北，革命的士兵第一次公开的打出苏维埃的旗帜，实行平均分配土地，建立苏维埃政权了。中间阶级的动摇，与他对于国民党统治的不满，也日益增加。一切这些革命

势力急速发展与反革命统治的日益崩溃的丝线，织成了全中国成熟着的革命危机的图画，这一图画，很明显的画出了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

(四)因为革命运动的发展，因为帝国主义的加紧进攻，因为经济危机的加深，因为地主资产阶级内部的不断斗争，因为财政的破产，国民党统治的崩溃，正在加速的进行着。但是促进国民党崩溃，使国民党走向灭亡道路上去的主要动力，自然是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尤其是苏维埃与红军的巩固与发展。"因此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的斗争。"这一斗争，现在正在更剧烈的更广大的向前开展着。

无疑的，由于世界政治经济危机的扩大与深入，由于中国半殖民地的地位，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由于地主资产阶级内部不能调和的矛盾，以至由于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国际帝国主义间及中国各派军阀间政客间在目前还正在加速尖锐化着他们相互间的冲突和矛盾。因日本帝国主义的占据东三省，使英美日三国间的冲突更其露骨化，使北方冯阎军阀加紧了反张与反蒋的斗争，因蒋介石第三次"围剿"失败，而使广东出兵湘南，而且反动统治营垒中的冲突，矛盾与斗争越加剧烈与复杂，客观上便越有利革命斗争的发展，也是不能否认的事实。但是革命的发展必然的促进反革命的团结。当着目前中国千百万劳苦群众的革命怒潮突飞猛进的时候，国际帝国主义是同样的抖颤着，他们将不惜用尽一切方法来求得到进攻革命步调上的一致。日本出兵满蒙所发的"对俄与防止华北赤祸"的宣言，无疑的是到得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资产阶级的一致同情，英美在华报纸都异口同声的警告国民党各派军阀小心着，"今冬武汉有被共产党占领的危险"，要国民党各派忠实同志们联合一致去加紧"剿共"工作，最近苏维埃与红军的大胜利，灾民与反帝斗争的勃发，将更其推动国际帝国主义更直接的更明目张胆的更血腥的向中国革命进攻。

自从满洲事件发生后，国民党的各派军阀，正在"全国民众一致抗日救国"的旗帜之下，团结一切反革命的力量，准备向革命作新的进攻，国民党的"民族统一战线"，实际上是要工人增加生产，要农民加倍服从地主，要兵士更进一步的服从长官，要灾民镇静牺牲，要红军放下武装一致对外。很明显的，这种统一战线不是为的对付帝国主义，而是为了对付革命。在这一统一战线之下，国民党可以在任何时候，拿破坏民族统一战线的名义向工人农民与兵士进攻，实行它屠杀的拿手好戏，很巧妙的将民众的反帝情绪转移到破坏民族统一战线的"国贼"身上。国民党现在正在"抗日救国"的呼号下面同帝国主义做着买卖，准备在帝国主义直接指挥之下，再用血与铁来消灭革命运动。一切国民党欺骗的宣传的急速破产，更加速了这一过程。

(五)我们固然相信，在"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死斗争中"，不论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任何卑鄙行为与恶辣手段，都挽救不了他们已经注定了的死运，几十万以至几万万中国劳苦民众在他们的先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一定能够继续不断地战胜反革命的进攻，以至根本推翻反动的统治，但是中央必须唤起全党同志注意：虽是我们的红军主力已经冲破了敌人的三次"围剿"，虽然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时，恰当中国革命运动急速向前发展的时候，但中国反动统治阶级目前还没有达到已经再不能再与革命抗争的死亡程度，他们是正感觉着死亡的逼近而加紧顽强的抵抗。

因此，不仅以为第三次"围剿"冲破后，敌人再没有力量去进攻苏区与红军的思想，是童稚的自欺。即以为第三次"围剿"冲破后，再不会有象蒋介石第三次"围剿"那样大规模的战争，也是不合于事实的空想。实际上，正因为我们冲破了蒋介石第三次"围剿"，正因为

冲破了第三次“围剿”后中国的政局是怒号着革命的大风暴，国际帝国主义者及各派军阀才更要努力企图用“团结一致”的力量去首先对付革命运动的先锋——中国工农红军。

同时我们必须看到中国革命的弱点，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这不平衡，在目前不但在工人与农民运动中存在着——（这是指工人斗争在主要城市中还没有到达直接夺取政权一点而言），而且在地域上也还存在着。虽是革命运动的急速发展正在使这不平衡，逐渐走向平衡。党的主观力量的薄弱，也不能不说是这种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之一。党在四中全会后的转变，还没有完全深入到下层党员群众，党的政纲还没有为更广大的工农群众所彻底了解，党还没有能完全领导工农群众的一切斗争，尤其是产业工人的斗争。

所以在目前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死斗争中，为要得到更伟大的胜利，需要党在苏区与非苏区内更加十百倍的去动员、组织和武装更广大的成千百万的工农劳苦群众；需要党更加十百倍地努力去领导苏维埃运动与工农红军以及千百万劳苦群众去更热烈的更英勇的取得国内战争的胜利。

（六）为得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央认为在苏区与非苏区的方面，应该立刻执行以下的紧急任务：

（1）苏区的党，在冲破了蒋介石第三次“围剿”之后，必须立刻在政治上与军事上巩固已得的胜利，更坚决的更彻底的执行国际与中央的一切指示，更深刻的发展苏区内部的阶级斗争，引起最广大群众的斗争热情，来发展与巩固苏维埃贫农团，雇农工会与职工会等，并且集中力量追击敌人退却部队，消灭他的一方面，“在政治军事顺利的条件之下，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不要再重复胜利后休息，致使敌人得以从容退却。以致能很快的重整他们的旗鼓，向苏区为新的捣乱。

（2）尽可能的把零碎的分散的苏区打成一片。红军十六军，十军及闽西新十二军必须与中央区打通。湘鄂西的第九师必须与鄂西红军打通。二军团必须向汉水流域发展，取得与湘鄂西第九师与鄂豫边第九军的联络。此外十六军与鄂豫皖，鄂豫皖与湘鄂西必须取得联络。这样来扩大与巩固苏区根据地。

（3）在十一月半前，各苏区必须选出和派出代表参加中央苏区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选举时必须做最广大的宣传鼓动工作，更彻底的实现苏维埃政府的一切法令。中央苏区必须在十月革命节正式成立苏维埃全国临时中央政府。坚决的与那些借口军事紧张而推迟这一工作的错误倾向做斗争。各苏区也必须于十月革命节前成立当地苏维埃政府。

（4）立刻扩大与巩固红军。坚决依照新颁的红军组织条例及政治工作条例，实行改组。同时必须从赤卫队，少年先锋队中，挑选积极勇敢的分子来扩大红军。中央区应扩大到比原有的数目增加三分之二，鄂豫皖增加二分之一，湘鄂西增加三分之一，闽西十六军，十军等，都必须扩大成为军或师。此外必须成立红军补充军。中央区及鄂豫皖区各县成立一团。其他各苏区各县至少成立一营。中央区须成立警卫师，湘鄂赣省，湘赣边省与鄂西皖西的独立师应充实起来。中央区与鄂豫皖省区至少创办红军军官学校，及军事政治学校各一所，各军建立随营学校。此外，各军必须开始城市战堡垒战的演习。

（5）立刻发动与组织广大工农群众反对日帝国主义军队占领满洲反对太平洋战争与拥护苏联的群众示威游行。必须坚决的同那些以为苏区只要土地革命不要反对帝国主义的倾向做斗争，必须利用这一机会在苏区内成立反帝同盟，更有计划地与更经常地领导与发展反帝的工作，这一工作在目前帝国主义更猛烈的向中国革命进攻的形势之下，应该特别加紧。

(6)要扩大苏区至中心城市，要取得苏区四周围民众对苏维埃与红军的同情与拥护，苏区的党必须有计划的选派党员团员以至积极的工农干部，到环绕苏区四周的白色区域，首先就是武汉、南昌、九江、长沙、宜昌、沙市、南浔路、平汉路、武长路、株萍路等的工人、灾民、农民与士兵中去建立工作（中央区与豫鄂皖至少须派出一百五十人至二百人，其他苏区五十至一百人）。坚决打破一切白区工作都应该依靠中央的错误观念。此外要尽量的将苏区内的灾民群众组织起来，给他们以相当的训练，派他们到白色区域去“报荒”，去进行灾民中的工作。

(7)中央及河北，山西，陕西的党部必须共同派遣十个到二十个干部到晋绥边，新成立的二十四军中去，加强政治上军事上的领导，使之成为燃烧起华北红军苏维埃运动的火焰。

(8)在非苏区方面，必须加紧拥护红军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的大胜利。最广泛的将红军胜利的消息散布到广大群众中去，做庆祝红军胜利，征调工人干部，选派代表与为红军募捐的运动。必须把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法令草案更多的翻印分散出去，向群众做关于苏维埃红军的宣传鼓动工作，并且同苏维埃临时政府在十月革命节成立纪念日的群众运动联系起来。

(9)必须立刻订出具体计划，征调干部和工农中的积极分子去到灾区工作。尤其是武汉、九江、芜湖、江北等地。在灾民工作中，党要注意到使灾民斗争联系到失业工人与城市贫民的斗争，以至继续发展到农民的秋收斗争与冬荒斗争。要团结他们在灾民团，灾民自卫队内而树立起无产阶级的领导。要从要饭吃的斗争，引导他们到抢米，抢劫军粮等广大的灾民的骚动，以至走向游击战争，土地革命与苏维埃运动。必须同因为反帝斗争的开展而忘记千百万灾民的斗争的倾向做斗争。

(10)党应该特别加紧反帝斗争，尤其是反日斗争的领导。以开展反帝的革命运动。尽量同下层小资产阶级群众，如象一部分革命学生，小商人，以至城市贫民成立反帝的统一战线，并且成立这种反帝的公开组织，而取得其领导。应该利用一切公开与半公开的可能，发行反帝日报与传单标语，并且组织宣传队等，利用各种公开名义到街道上，尤其是工人区域去演讲。在上海等地，现在应该立刻以“罢工，罢操，罢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尤其是“工农武装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应该是党目前的中心鼓动口号。但是这些口号绝对不能同“打倒国民党”“拥护苏联”“拥护工农兵苏维埃与红军”等口号的宣传分裂开来。尽量用全力来准备各个企业的总罢工，尤其是日本企业的罢工，使斗争更能得到无产阶级的领导，使斗争扩大与深入。在满洲党要立刻分配干部到南满各地，中东路、吉长路沿线的农民群众中与动摇不满的东北军阀军队中去发动反日斗争，游击队战争与兵变，同时这一反帝斗争，必须同揭破国民党的反帝欺骗与反对国民党密切的联系起来。全国反帝同盟，要利用反帝斗争的开展在今年内成立起来。

(11)在上海、天津、青岛、唐山、香港、哈尔滨、大连的党部，在中央帮助之下，应该动员得力干部，去加强正在开展着的工人斗争的领导，去发展与巩固赤色工会，和打入黄色工会中的工作，特别是去建立海员，铁路，兵工厂中的工作。同时尽可能的在某些城市中（如上海、唐山、天津等）努力去准备和组织某一产业的同盟罢工。

(12)江苏、安徽、广东、河南、河北、陕西、山西、山东等地党部要在某些武装斗争已经成熟的农民区域，集中力量去发动那边的农民斗争，一直到游击队战争。在北方，更要特别注意兵变发展的区域（如山西、河北、河南），使这些兵变配合着当地的农民与工人的斗争，

创造出北方的苏维埃区域。

党内两条战线斗争的加深与组织上的巩固，是实现上述任务的必要前提。目前主要危险还是右倾机会主义。这主要的表现在：对进攻苏联与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估计不足，或者企图等待战争来讨“便宜”的情绪，不相信苏维埃运动与红军在目前能够得到胜利，对于中国革命危机的日渐成熟表示怀疑，把土地革命和反帝斗争分割开来，对城市工人斗争的形势估计不足与忽视，富农路线，黄色倾向，反帝运动中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尾巴主义，以至对困难投降、消极、怠工与失望的情绪和行动等。“左”的机会主义——立三主义的残余，也时常表现出来，如不愿深入群众中去作艰苦的工作，而空喊脱离群众的口号，不愿到黄色工会中工作，不知道利用下层统一战线，以至惧怕利用任何公开与半公开的工作方式的关门主义等等。此外，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与对右对“左”的调和情绪与口是心非的两面派，都是执行上述紧急任务的仇敌，党必须对他们作思想上与组织上的斗争。以加紧秘密工作（任何所谓“小”的破坏秘密工作的行动，都必须给以严厉的制裁）和深入群众的主要方式去巩固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建立以少数党员为几千以至几万群众的核心的支部工作。更广泛地灵巧地运用公开与秘密工作联系的方法，从最近革命战斗中吸收工人、雇农、贫农的先进分子，以至愿终身为无产阶级利益而战的知识分子，来扩大和充实党的组织。这些都是使我们党更能适合于目前国内战争的环境的组织上的迫切任务，这些思想上组织上具体任务的完成，更需要党善于使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与每个同志的艰苦卓绝的工作。中央坚决的相信：各级党部必定能够在最短的时期之内，百分之百的把这些紧急任务完成起来！

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

苏维埃运动已经成为目前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成为中国革命危机的主要标志了。在最近三四年来，由零星的农民游击队发展成为目前强有力的红军，由微小的游击区域发展成为目前广大的苏维埃区域了。在这些苏维埃区域里，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没收了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平均分配了土地给中农贫农，消灭了地主阶级的武装，建立了工农的军队。

两个政权——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与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的对立，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中心问题。最近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进一步的崩溃，中华工农兵苏维埃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产生，使这两个政权的对立更加尖锐化，这两个政权的斗争更加剧烈化。

这两个政权的斗争，是不能调和不能中断的斗争。在苏维埃运动一开始后，帝国主义国民党就不断的来进攻红军与苏区，尤其是最近一年来，帝国主义国民党派遣几十师的兵力，动员一切反动社会力量来与苏维埃运动作殊死的斗争。但是，国民党“剿共”计划完全失败，红军与苏区获得伟大胜利，这更证明苏维埃运动的力量。这一切事实更给所有不相信和污蔑苏维埃运动的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以及一切右倾机会主义一个致命的打击。

苏维埃运动在其发展中，因为路线的错误——立三路线，曾受到一些损失。但是国际路线的执行，使苏维埃运动走上巩固发展的道路。苏维埃运动中立三路线的错误与恶果，我们必须作一个总的检阅，这样来更深刻的了解国际路线的正确，来定出苏维埃运动发展的方针。

苏维埃运动中的两个路线——国际路线与立三路线

苏维埃运动自开始就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共产党在最近几年的艰苦斗争中，领导着苏维埃运动，获得了伟大胜利。但同时也犯了不少严重错误，现在必须以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来检阅过去的工作。

在最近一年来，苏区党的最严重错误就是执行了立三路线，这路线确实使苏维埃运动受到很大的损失与挫折。但在四中全会以后党开始转变到国际路线上去克服了立三路线，而使苏维埃运动走上巩固发展的道路，由立三路线到国际路线的转变，确实是苏维埃运动中的一个重要关键。

在立三路线之下，党不去巩固苏维埃根据地，反而采取不顾力量对比向中心城市冒进的政策，不去建立真正的工农红军，不去巩固和扩大地方武装，反而取消地方武装，不顾及一切社会成分的去胡乱的扩大红军，结果使苏维埃区域受到打击和削弱，使红军受到挫折和部分失败。

长沙战争就是立三路线冒进主义发扬的最高峰，大会完全同意中央局扩大会对长沙战争的估量；长沙战争是冒险主义的行动，但是它确实表示了工农红军的力量和英勇，得到了伟大的历史意义。但是长沙战争的过程，铁一般的证明立三路线的错误和破产。

在转变到国际路线以后，苏维埃根据地开始巩固，红军开始改造，苏维埃运动开始走到巩固发展的道路。

立三路线不仅是简单的冒进主义，而是根本不认识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重要，不认识真正发动群众的布尔什维克的工作，立三路线过分估量军事力量，而根本忽视苏维埃运动的群众基础之建立，因此，苏区的群众不能广大的发动起来，组织起来，一切群众组织成为空的纸面上的机关了。苏维埃政权机关也不能发生应有的作用，结果苏维埃运动不能吸引广大群众的参加，不能得到强固的群众组织基础。

在转变到国际路线以后，群众开始发动，开始组织，苏维埃运动的群众基础开始建立与巩固。

在立三路线之下，苏区的土地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在土地问题上立三路线是左的面具——集体农庄、苏维埃农庄，掩盖着极右倾的富农路线——不没收富农多余的及好的土地，向富农让步。再立三路线是根本忽视土地问题，因此在很多苏区中，地主富农的土地很多没有没收，土地很久没有分配，至于分配了的地方，有些是按照生产工具为标准的十足富农路线，有的是按照立三路线所领导的苏代会之土地法令，就是注重土地问题的江西省苏区的党部也同样没有正确的解决土地问题。"二七"会议虽然反对了露骨的富农路线，虽然在土地问题上进了一步，但其提出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分配土地给一切人"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也是同样的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这种"分配土地给一切人"是非阶级路线，是大多数苏维埃区域的普通现象。上述一切错误，使土地革命不能深入，使贫苦农民或者根本没有得到土地革命的利益（如没有分配土地的地方），或者没有得到最大利益，而使富农偷取土地的果实。这些错误，使农村中的阶级斗争与对阶级关系的认识模糊起来。

在转变到国际路线以后，土地问题得到根本解决，执行了土地革命中的明确的阶级路线，执行了贫农中农的土地革命，雇农、贫农、中农得到土地革命的最大利益，他们的革命积极性提高了，苏区的群众工作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立三路线是根本不认识党的领导作用，它不但继承国民党"以党治国"的理论，实行包办一切，并且直接取消了工会青年团等组织。苏区执行了这路线是削弱了党的领导作用，是取消了政权、工会以及一切群众团体的作用。立三路线的盲动主义，使赤区中与赤区附近的白区中的党员与干部受着了许多不必要的牺牲。立三路线在党的发展路线上，在干部的提拔上，都没有阶级路线。结果，使许多阶级异己分子混进党内，组织反革命党派，使党受到极大的危机和困难。

在转变到国际路线以后，党开始改造，党的作用提高，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开始肃清出去，党一天天的巩固起来。

立三路线是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自然不能具有明确的阶级路线。但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这一现象在苏区里面表示得特别明显，并且是普遍于一切苏区的，这是因为苏区党的无产阶级意识薄弱，农民的落后思想反映到党内的恶果。在过去不仅是在土地问题上，并且在一切政策上，在政权、红军、工会、群众团体的成分上，干部的提拔上，同样也没有明确的阶级路线，结果，阶级斗争不但没有去充分的发展，反而模糊起来，工农的积极性没有发扬，而使

一切阶级异己分子——地主豪绅子弟、富农、商人混进了政权和一切革命组织，在干部中也充满了这些异己分子。

立三路线的执行，使我们不能在组织上来巩固革命的果实，来巩固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反而使阶级异己分子能够混进革命组织和党的组织里来，使这些阶级异己分子得到利用立三路线的错误，来发展反革命的政党——AB团，改组派，社会民主党，第三党，托洛茨基派等等——的一个机会。这些反革命分子并且有时是占据了政权及党的领导机关，这样来进行反革命的活动和暴动。这些反革命的政党与反革命事变已成为一切苏区的普遍现象。

富田事变就是这种反革命事件的最明显的表示，大会完全同意中央和中央局扩大会对富田事变的决议：富田事变是AB团反革命的暴动。当时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个事变的处置方法是完全正确的。

在转变到国际路线以后，阶级路线开始执行，政权开始改造，阶级工会与贫农团开始建立，党内异己分子开始洗刷出去，贫苦工农的积极性开始发扬，反革命派受到严重的打击。苏维埃运动组织上的巩固得到初步成功。

总之，由立三路线转变到国际路线，的确是苏维埃运动中的主要关键。在立三路线，富农路线，非阶级路线，以及过去一切不正确的路线之下，红军受到损失，苏区受到消弱，群众力量不能发扬并且未能组织起来，加之反革命组织满布于赤区，的确使苏维埃运动遇到极大的危机。但转变到国际路线以后，苏维埃运动巩固起来，并且得到大的发展。最近各苏维埃区域都击破了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屡次“围剿”，获得新的胜利，都是国际路线执行的结果。尤其是中央区三次战争的伟大胜利，更表示反对立三路线执行国际路线的正确领导的结果。

中央苏区过去工作的检阅

中央苏区是全国最大的苏区，是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地，是全国红军主力军所在地，因此中央苏区的巩固与发展，在全国苏维埃运动中据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因此担负在中央苏区的任务也就特别重大，所以中央苏区过去工作的检阅是绝对必要的了。

苏区党代表大会完全同意中央九月指示信，一致认为这指示信所给与中央苏区的批评与其所指出的任务是完全正确的。

在中央局扩大会议以前，不仅地方党部，就是红军中党的领导机关都是执行立三路线，扩大会议前的中央局是执行了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中央局扩大会议的确是转变到国际路线的开始。可是对于中央指示信上所指出的中央区的极严重错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和充分的群众工作——仍旧没有明确的了解和及时的纠正。中央局八月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是纠正这些错误的重要开始，是正确的解决了土地问题。大会认为这个决议是正确的，大会认为扩大会后尤其是八月土地问题的决议后，中央局的政治路线是一般正确的。

大会首先指出：中央苏区是获得了伟大的成功；红军围绕着广大群众的力量，击破了帝国主义国民党三次“围剿”，战胜了几十万的白军，开辟了战争史中的新纪元；在中央区已经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实行了平分土地，并且在八月土地决议后，开始实行土地革命中的阶级路线，实行中央所提出土地法令草案；在中央区建立了强有力的红军，阶级异己分子已经有了初步的肃清，贫农占了多数，工农干部也开始大批提拔；在中央区广大群众已经开始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开始提高，党在群众中的信仰提高，一切反革命派特别是AB团遭受极严重的打

击与失败。

中央区虽然有了这些伟大的成功，但中央区至今还存在着许多严重的错误与缺点，这些错误就是中央指示上所说的，“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和充分的群众工作”。大会除同意中央的全部批评外，特别指出：

1． 苏维埃根据地问题：赣东南的苏区是中央苏区的主要根据地，这根据地应当伴随着闽西苏区和河西与湘东南苏区，而把这些苏区打成一片，建立起更广大的根据地。但是中央区的根据地还是很流动的，与闽西苏区只在最近才能贯通，与河西苏区仍是隔离的。在中央区的根据地上，阶级群众没有充分的发动起来，群众的组织力量更是脆弱，苏维埃政纲没有最大限度的实施；苏区的阶级斗争不但没有发展到最高程度，并且受到障碍，从阶级群众一直到党的干部对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认识，是不深刻不清楚的。因此阶级群众的积极性没有发扬，而阶级异己分子时常占领领导机关，结果，一切任务的执行只有从上而下的命令，而没有从下而上的群众发动与批评，从政权一直到各种群众团体的组织非常散漫，并且许多还是纸上空文。在这里要指出，中央苏区的地方工作是赶不上闽西和其它苏区的。

2． 红军问题：红军一、三集团军确实获得了伟大成绩，成分上实行了改造，工农干部开始提拔，共产党在红军中的信仰很高，反对军阀倾向的残余，曾经做了残酷的斗争。但是红军中的工作仍有错误与缺点：首先在改造红军的成分上，不以肃清地主富农商人等分子为中心，而笼统的提出“洗刷流氓”，同时又把白军的一切士兵当作流氓，这是模糊了阶级路线。根本肃清地主富农商人及一切异己分子和提拔工农干部尤其是工人干部的工作没有全部执行。其次红军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脱离游击主义的传统，这个游击主义是表现在组织的散漫，小团体主义的自由行动，工作缺乏科学的分工，忽视阵地战和白刃战等等，因为党的包办，政治委员和军事指挥员的权能表现不够，政治部不能建立而且没有从上而下的系统，军事训练与政治教育都不充分。此外，军阀倾向的残余仍旧存在，具体表现就是在指挥员对战斗员和军队对工农群众的恶关系，以及不尊重苏维埃政权的恶习惯。

3． 土地问题：中央局在八月土地问题决议后，过去的非阶级的“分配土地给一切人”的路线开始纠正。但在执行中，仍旧没有充分发动群众来执行这个决议，仍旧有向地主豪绅及富农让步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而目前最严重的就是反对中农，破坏与中农联盟的“左倾”错误，中农分中田，不允许中农去参加苏维埃政权，把贫农团来代替苏维埃政权，这都是这种左倾错误的表现。雇农工会、贫农团、合作社的组织是不健全的。

4． 苏维埃政权问题：苏维埃政权虽然经过屡次的改造，但还有阶级异己分子——地主富农商人等——混在苏维埃政权机关里，因此更失去了工农政权的阶级性。苏维埃政权的阶级统治的作用薄弱，政纲没有完全实行，政权的工作没有建立，从上而下的政权系统没有树立，而且党包办政权工作，政权的基本组织——城市苏维埃和乡村苏维埃——根本没有成立，而代之以乡村政府执行委员会及政府小组，政权的组织和工作不是按照政权的形式，而是仿造群众团体的方式（如政府成立宣传部、妇女部，政府委员可以随便调动，政府可以随便改组等），并且又是一贯的命令群众，政权的威信很低，政权机关忙于“办差”（找伕子等）、“招待过路人”、“打路条”等非政权的工作。这一切都使苏维埃政权不能变成群众的有工作能力的工农的阶级政权，不能变成工农群众斗争的统一意志的表现。

5． 工会运动与反帝运动：工会运动在赤色区域是一般忽视的，过去的工会完全不是阶级工会，企业主、老板、独立劳动者，甚至于和尚、道士、地理、阴阳先生都加入工会，工人反对

雇主的阶级斗争是没有发展的，工人生活的改善还很差，八小时工作制一般的是没有实现，其他的劳动保护法更没有实现，工会领导的斗争是独立劳动者对农民的斗争，这是破坏了与农民的联合。最近工会虽有改造，但工会的整个系统仍旧没有建立，工人反对雇主的斗争仍没有充分发展。同样，反帝运动是一般忽视，反帝国主义的宣传，群众中进行非常少，反帝大同盟的组织只在开始建立。

6. 党与青年团问题：共产党在群众中的信仰极高，成为革命的唯一领导者，这是党的伟大成绩。但是，党的无产阶级基础非常薄弱，在党的工人和雇农极少，而地主子弟富农商人这些异己分子仍旧有混在党内的，这是过去在党的发展中缺乏明确阶级路线的结果。党的组织非常松懈，党员对组织的认识缺乏，党内的教育训练很差，理论水平政治水平很低，党包办一切的制度非常普遍，国民党“以党治国”的理论与工作方式的遗毒，在党内很浓厚。党的生活非常缺乏，党内的思想斗争，反对倾向的斗争，两条战线的斗争，差不多没有，党内自我批评缺乏到极点，党内的事务主义非常浓厚，并且存在着一种否认理论否认政治的狭义的经验论的落后思想。这一切都使党的组织工作与生活不能健全的建立起来，而使党在一切组织中与群众的领导作用削弱。青年团的工作一般是忽视的，党对青年团的组织与工作，一般是犯了取消主义的错误，党对青年团的领导与帮助非常脆弱。

7. 肃清一切反动派别的斗争：中央区的肃反工作是获得了伟大胜利，反AB团的斗争是正确的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在肃反工作中仍旧有很大的错误。首先反AB团底思想斗争与群众中的教育工作更是非常缺乏，尤其是反改组派、社会民主党、第三党、取消派，右派的斗争更是缺乏，而把反对一切反革命派的斗争缩小到破获、捕拿、处决的范围里去。同时，又把一切反动分子，一切不满分子，一切犯了错误的人都当做AB团看待的。肃反代替了党内的思想斗争与两条战线的斗争，党内生活与群众政治生活落入非常状态，这是把反AB团的斗争简单化了，并且过分估量AB团底力量，轻视革命力量，因此发生恐怖，而把AB团扩大化了，并且在处理AB团时，未能每次都把领袖与被欺骗被威胁的分子分别开的。这一切错误形成了一种非常错误非常有害的“肃反中心论”——认为一切工作只有从肃反做起，结果，群众没有发动，党、团、政权及一切群众团体不能改造，不能建立，而这样的肃反有时是得到相反的结果，肃反的专门组织不健全，破获反动派的工作不能成为一种专门的特殊工作，而一切党部反把这种肃反工作当着普通群众工作来做，而根本不去进行反对反革命派的思想斗争和群众的教育工作，这一切都是极严重的错误。

这一切错误与缺点，都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的表现与结果。

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任务

目前国际的中国的政治形势，是利于苏维埃运动发展的。

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得到惊人的伟大胜利，五年计划不但执行而且超过，农业飞快的集体化，富农日益消灭，工农生活大加改善，政治和文化程度大加提高，无产阶级专政得到进一步的巩固，正在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上前进。

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上，经济危机发展到最高度，生产大缩小，金融大混乱，失业达到惊人的数目，各国财政陷于破产的地位，工人阶级的生活恶劣到万分，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榨取比以前更残酷。世界革命工人运动与殖民地革命运动正在高涨，革命条件在许多国家里日

渐成熟，世界革命的大风暴不久就要到来，资本主义制度正向死亡的末日走去。

在苏联与资本主义对抗日益加深，与帝国主义国家间的为争世界霸权为争市场的斗争更形剧烈的条件下，帝国主义正在准备世界大战，特别是为反对苏联的战争，最近日本占领东三省，固然使日美英各国间的冲突加剧，同时目前战争的主要危险——反苏联战争的危险，更是日益逼近。

在中国，政治经济的总危机更加深入，反动统治进攻苏区与红军的失败，水灾普遍于十六省，灾民达六千万，工人农民贫民达到极贫穷的极痛苦的地位，国民党政府内政外交完全破产，小资产阶级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增加，红军与苏区在胜利后有了新的大发展，日本出兵东三省，引起了全国反帝运动的大发展，工人运动高涨，苏维埃运动大发展，北方开始出现苏区，反动军队的兵变与哗乱正在继续，这一切都表示中国反革命统治之进一步崩溃，表示革命条件之逐渐成熟。

统治阶级为要挽救其死亡，正在企图团结与联合，以求一致进攻革命，现在这种企图虽然是没有达到，但是他们进攻苏区与红军的准备与计划是毫不放松的，不过反动统治内部矛盾和崩溃并不因此而消灭而减弱，而革命力量的发展，一定能战胜反动统治无数次的更疯狂更野蛮的进攻，而在这些无数次的革命战争的胜利中去"完成一省和几省的革命首先胜利。"这是世界革命运动的新局面，在这种新局面下，苏区党的任务是：最大限度的努力去执行国际路线和中央指示的全部，彻底的转变党的路线，最大限度底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创造并扩大铁的红军，发展新的苏区，建立巩固底根据地，实现全苏大会的一切政纲与法令，建立健全的地方苏维埃政府，这样来支持不断的艰苦的阶级革命战争，来发展苏维埃运动。

1．为着发展苏维埃运动，为着进行阶级战争，首先必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这个任务在中央苏区与其附近（闽西、湘赣边与湘鄂赣边等）苏区中更加重要，为要建立根据地，不仅是要去扩大和建立红军铁军，还要最大限度的去发动苏区的群众，发扬他们的积极性，组织他们到工会，到一切群众团体，到地方武装的组织中去。必须最大限度的发展阶级斗争：农民消灭地主豪绅残余的斗争，雇农贫农反对富农的斗争，工人反对雇主的斗争。还要以最大的决心建立赤区附近的白区的秘密工作，进行白军中的革命工作。苏区必须扩大，中央区与闽西的联系必须巩固，中央区与湘赣苏区以及赣南的零星苏区必须于最短时间内贯通，再进一步与赣东北与湘鄂赣边苏区贯通，这样来扩大巩固苏维埃根据地。

2．为着发展苏维埃运动，为着进行革命战争，必须巩固和扩大铁的红军。为使红军能够担负起大规模作战和争取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的任务，红军中的一切工作必须实行彻底的转变，完全脱离游击主义和小团体主义的传统，建立起严密组织的，有先进军事技术的，有强固的有系统的政治工作，军事上顽固的政治上坚定的铁的红军。阶级异己分子应当继续肃清，干部应当是工人的，贫农的，党的包办应当取消，政治委员制度与政治工作条例应当坚决执行。政治部应当建立经常有系统的工作，要坚决的增进军事技能，要教练阵地战、街市战、白刃战、夜战的技能，要坚决反对落后的阻止红军技术进步的狭义的经验论；同时要反对不尊重苏维埃政权，不爱护战斗员的和其他一切军阀思想与行动的残余。红军必须扩大，并要进行扩大红军的经常运动。

3．为着发展苏维埃运动，为着进行革命战争，我们必须进行改造苏维埃的运动。政府中的一切阶级异己分子，应当迅速洗刷出去，"以党治国"的国民党理论与党包办政权的恶习惯应当根本肃清，政权应当建立起自下而上的系统，建立起各部的经常工作，应当吸收广大

工农群众来参加政权的各种工作。为要改造苏维埃，首先必须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基本组织——乡苏维埃与城市苏维埃，建立起这个经常的代表会议制度的政府，政权的民主化必须发展。这样使苏维埃政权变成工农的真正的群众政权，来实施全苏大会的宪法与一切法令，团结起广大工农群众来与赤区内外的敌人作斗争。

4． 为着发展苏维埃运动，为着进行革命战争，必须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坚决实行土地革命中的阶级路线。在新区域中一定要明确的实行全苏大会的土地法，在老区域中没有执行中央局八月决议的要继续执行。土地的分配，贫农中农以人口为标准，富农分坏田并且要以人口与劳动力混合做标准，红军必须分田，由苏维埃政府设法代为耕种，外籍的红军战士必须由苏维埃政府在各地划出公田分给他们，以维持他们的家庭生活；要坚决的反对固执和拘泥于过去"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机会主义，要坚决的反对侵犯中农利益和破坏与中农联盟的"左倾"错误。为要实现中农贫农的而不是富农的土地革命，一定要发动并组织广大雇农贫农中农的群众，要认清若不发动广大劳苦农民为土地的斗争，土地革命的利益不会真正的落到雇农贫农中农的手中。

5． 为着发展苏维埃运动，为着进行革命战争，必须加紧反帝运动及职工运动的工作。为要发展反帝运动必须坚决反对苏区只要土地革命不要反帝运动的右倾观念，必须使全党认识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才可以保障土地革命的胜利，要利用一切做反帝国主义的广大宣传与鼓动，最近要切实利用日本出兵占领东三省的事件，进行广大的反帝运动，并须在这个时间内成立苏区的反帝大同盟的组织。为要发展职工运动，必须坚决的反对忽视工会与工人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苏区工人很少没有什么工人斗争的错误观念，要建立真正的阶级工会，一切老板师傅等分子要洗刷出去，工会要坚决的正确的领导工人反雇主的斗争、雇农反富农的斗争，来改善工人的生活，来实现劳动保护法，同时这些斗争必须在巩固苏维埃政权，巩固工农联盟的原则之下去进行。这样来发扬苏区工人的积极性，来加紧无产阶级对土地革命的领导。

6． 为着发展苏维埃运动，为着进行革命战争，必须纠正过去肃反工作中的错误。必须了解，只有发动并组织广大的群众改善我们各方的工作，建立强有力的党和政权，要进行反对反革命派的思想斗争和群众教育，我们才可以镇压一切反动阶级与消灭一切反动派别。否则仅靠"肃反"工作是不能达到巩固革命的目的的。肃反工作要集中到政治保卫局的系统去，对付反革命组织的方法与技术必须改进，要搜集多方面的材料，绝不要单独相信口供，要坚决实行自新自首政策，要坚决反对肃反的中心论，要反对把反革命派扩大化而产生的恐怖，要反对肃反工作中的唯心论，要反对处决中的非阶级路线。

为要执行上述的一切任务，必须巩固党的组织，首先要改善党的成分，严密党的组织，提高党内的政治教育，提高理论政治水平，勇敢的提拔工农干部，对干部进行专门的教育，党的发展工作必须坚决的实行阶级路线，党的生活必须用最大限度的努力去建立去改进，党的宣传工作要有系统的去进行，党与政权及其他团体要建立适当的关系，组织党团，提高党的领导作用，消灭党的包办制度。支部工作与生活必须变成党的工作中心，党对青年团的领导必须加紧，必须反对党内对青年团工作的取消倾向。

党内要发展广大的思想的斗争，反对一切错误的思想与倾向，反对事务主义，反对狭义的经验论，反对农民的落后意识以及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党内的自我批评必须尽可能的发展，反对命令主义与惩办制度。

党的两条战线的斗争必须发展到最高度，集中火力反对党内目前的主要危险——右倾，但不放松反“左倾”的斗争。只有坚决的执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才能保障党的正确路线之执行，才能执行路线的转变，才能纠正和肃清过去的一切错误，才能完成国际与中央所给我们的全部指示，才能完成革命的重大任务，完成中国革命在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

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关于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

一、苏区党的环境与任务

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与建设工作的总方针

最近一年来，中国苏维埃运动有飞速的发展。当前的革命任务，是要建立强固的革命根据地，争取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前途，因此更加加重了苏区党的任务。苏区党的一切建设工作，应当适合于向前开展着的反帝国主义与军阀斗争的革命需要，和正在进行着的国内革命战争环境的需要。

苏区与白色统治区域环境不同

苏维埃区域党与白色统治区域党所处的环境，是不相同的，在苏维埃区域以内，是已经推翻了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实行了土地革命，建立了无产阶级所领导的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府，和保卫及发展这一政权的工农红军。

苏区党的任务与建设工作的重要

在苏维埃政权之下，共产党是公开存在的政党。他在苏维埃区域的任务，是要在正确的阶级路线之下，领导并组织所有工农群众来巩固并发展苏维埃政权与红军，保证党对政权、红军及其他武装组织和群众组织的绝对的领导作用。这里巩固党本身的组织，坚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最高限度的提高各级党部——从支部起——的积极性，严紧党的纪律，增强党的领导作用，成为最先决最重要的问题。

二、苏区党的现状

党的组织工作的实际转变，又是初步的开始
重要缺点与错误是缺乏明确阶级路线与充分群众工作

苏区党在四中全会后确实有了很大的转变，在政治路线上，逐渐脱离了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而走上了国际、四中全会的正确阶级路线。但是党的组织工作的实际转变，还只是初步的开始。对于肃清隐藏在党内的反动分子——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等，洗刷富农地主成

分等，确有相当成绩。提拔工人干部与转变工作方法，相当的引起注意，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与威信提高了，这些表现是开始走上健全化的道路。但是尚有很多重要工作，还极不能令人满意。最主要的是表现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动员群众的工作，而立三路线的残余，右倾机会主义和实际工作机会主义仍然表现非常严重。

目前党表现最严重的问题就是：

甲、党的阶级基础薄弱，忽视巩固无产阶级领导问题

党的无产阶级基础薄弱到异常的程度，党内的领导机关，大多数仍然操纵在知识分子中及独立劳动者手中，甚至还有地主富农分子暗藏在党的指导机关以内，在某些地方表现有党对雇农、苦力、工人关门的严重状况。一般的状况，是忽视强固无产阶级领导的根本问题，很少注意工人运动的领导。

乙、不了解党的领导作用，党包办一切的理论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理论的遗毒

各级党部对于党的领导作用的了解，是非常模糊而不正确的，以为要保障党的领导作用，是要由党来包办一切。党包办一切的理论，造成政权与群众组织完全失去其独立系统的工作。这种现象的来源，仍然是立三路线取消群众组织的残余，同时表现是国民党“以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理论的遗毒。

丙、支部工作不健全，不注意群众工作的领导

党的基本组织——支部的工作很少建立起来，一般的状况，是支部没有独立工作的能力，不能在群众中起有组织的核心作用，常常做了群众的尾巴。上级党的一切重要决议很少能传达到支部中去，支部缺乏经常的分工和检查工作，很少努力群众组织工作的领导，这样使党员不能过完善的党的生活。

丁、党的生活极不健全，工作方式很少转变

党内生活表现缺乏积极活跃的状态。固执迟钝的现象，家长制度，命令主义，委派制度，派别观念与党内和平主义等还表现得浓厚。党内民主化的运用与自我批评的执行，一般的是很缺乏。官僚主义腐化的现象，在党内与政权机关中滋长，而党又没有正确的执行纪律。各地党部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仍然保留许多旧的残余。没有坚决从工作中去创造许多执行的工作方式来代替旧有的方式。

戊、教育工作缺乏，忽视理论，形成事务主义状况

党内教育工作与思想斗争也是很缺乏，一般党员对党的基本主张与重要策略的了解，是很浅薄的。还有许多党员不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基本常识的系统教育工作尚未能引起党严重的注意。而在党内流行一种狭隘的经验论调，实际上是反理论倾向而形成一种事务主义的现象。

己、党的发展不及客观发展形势，不注意干部提拔，介绍新党员方式错误

虽然革命斗争是一天一天胜利的向前发展，工农群众的积极性是在不断的增长，然而党

的数量是减少的。特别是对于提拔雇农、苦力、工人干部的工作，许多地方尚表现是消极的形式主义，尤其过去赣东南地方与红军中拉伕式的介绍党员，是非常错误的。

庚、指导机关不健全，上下级关系不密切

各级党的指导机关——从支部委员会起都是不健全，没有科学的分工；没有建立各部的经常工作。一切工作多半是集中在书记一人身上，缺少集体领导和巡视工作。上级党部对下级尤其是支部工作情形，不能有很深切的了解。上下级党部的关系异常不密切。

辛、党内反革命派别活动仍是一个严重问题

因为在机会主义时代，党内混进了一批豪绅地主富农成分，这些分子，在土地革命斗争真正深入就动摇叛变革命。加上立三路线的恶果，以及党本身的弱点，造成反革命派别——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第三党，托陈派，右派——在苏区党内、政权红军及群众组织中发展的机会，甚至篡夺了一部分指导机关。现在各主要苏区党虽积极领导肃反的工作，渐次夺回了党的领导，然而这些反革命派别在党内、红军、政权与群众组织中的生活，仍然表现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不健全状况的客观上和历史上原因

以上这些党内不健全状况形成的原因，就是因为在现有的苏维埃区域以内，缺少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基础。农村落后的散漫的小生产经济生活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的落后的散漫的生活与手工业工作方式。同时国民党“以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的思想侵入到我们党里来，以及过去党对革命理论一般忽视，和过去立三路线的恶影响，党的组织发展上没有明确的阶级路线等，都是造成党不健全客观上和历史上的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明确的阶级路线

但是党没有明确的阶级路线，对国际路线尚缺乏深刻的认识，没有实际工作中实行工作路线的彻底转变；党内缺少思想上及两条战线的斗争，和自我批评发展的不充分，没有充分努力去进行强固党内的阶级基础和强固无产阶级领导的任务，这些是造成党不健全状况最主要的原因。

三、建设工作的中心任务

共产党是阶级的先进的领导群众的有严密组织的政党

共产党是最先进阶级——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她的目的是要领导无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和封建社会，经过社会主义革命达到没有阶级也不要政党了的共产主义社会。她必须是先进的时常站在群众前面领导群众向前斗争的，她是要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绝不是固执落后而随着群众尾巴跑的。她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她本身必须有强固的无产阶级基础和极严密的民主集中的组织，来担负着正确领导革命的责任。

党必须是一个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布尔塞维克的组织

现在阶段中党的任务，是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然而她将来是要领导这一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因此，我们党每一个分子都必须是一个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布尔塞维克党员。要使我们的党真正成为一个坚强的布尔塞维克的党。

坚决执行全部工作彻底转变

依据当前革命形势，党的建设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基于国际的四中全会的精神，来坚决执行全部工作的彻底转变。要与过去一切缺点与错误和各种不正确观念作无情的斗争，使党能迅速克服这些困难，而更加布尔塞维克化。使党得到新的工作上的伟大进步。

（1）强固无产阶级的领导

保障领导作用绝不是由党来专政

在现在苏维埃政权仅及于偏僻地区的情况之下，巩固无产阶级领导是保障这一运动绝对能在共产党领导下向前发展的唯一主要条件。这里党必须认识清楚，保障党与无产阶级的绝对领导作用，绝不是由共产党专政来包办一切。而是要建立真正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共产党在这一政权中经过无产阶级成分和自己的党员来负起领导的责任。

强固阶级领导不仅是要政治上来争取群众而且要在组织上巩固党的影响

要达到强固无产阶级领导的主要任务，首先就要党能运用明确的阶级路线。不仅要极广泛的扩大党的政纲与策略的宣传。努力动员并领导广大群众起来斗争，在政治上来争取苏区中所有的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群众。而并且要加紧工会雇工会贫农团的组织工作与政治领导，使党在这一基本群众中——工人贫农雇农苦力——能够在组织上来巩固自己影响，推动他们来参加政权工作，保障政权中无产阶级领导作用，巩固与中农的联盟关系。

要纠正一部分同志与群众的错误观念

这里党必须与一切动摇阶级路线，忽视工人运动在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贫农中工作的倾向，作无情的斗争。同时党应当注意纠正有一部分农村无产阶级和党的同志对于无产阶级领导问题的另一模糊错误认识。这种错误，就是时常把工会与政权对立起来，造成工人与农民的隔膜现象。这完全是因为不了解强固无产阶级领导，是要在一切实际斗争与工作中表现自己的积极性，成为群众所信仰的模范者，才能够真正领导广大的群众成为群众中的领导阶级。

（2）强固党的阶级基础，建立支部工作

党的基础要建立在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群众上，反对对无产阶级斗争倾向

关于党组织上的改造，首先就要注意到党的阶级基础必须坚决的建立在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贫农群众上。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党坚定的顽强的执行阶级路线。这一方面是须要彻底肃清地主富农师傅老板分子和一切异己分子，坚决改变干部的成分。尤其是要肃清一切对无产阶级——工人，雇农，苦力关门的倾向，要在斗争中吸引这些成分中觉悟的进步的分子，来增强党内无产阶级的基础。

支部工作必须彻底转变，支部要做群众工作

党的支部工作必须有彻底的转变。要使支部真正成为党与群众的连环。必须培养支部在党的政治路线与策略之下独立工作的能力。支部必须负起对于政府和周围群众组织——工会，雇工会，贫农团，赤卫队，游击队，反帝同盟，互济会，合作社，俱乐部等——经常的领导的责任，努力巩固党在这些群众中的政治影响，领导群众的斗争。在没有这些群众组织的地方，就要领导群众建立起来。要坚决反对支部不管或忽视群众工作和把支部看成是单纯的教育机关的倾向。

（3）健全各级委员会

健全各级党的指导机关，改变指导方式

建立强固的各级委员会——从省委直到支部——是目前党的组织任务中最中心任务之一，要最高限度提高这些党部委员会的积极性和实际工作的效能，各级党委员会必须有经常科学的分工，建立各部的工作。要消灭过去一人包办一切的手工业、家长式的工作方法，取消秘书长制度。要肃清党内一切不经过正当组织上的，超组织的，或信仰偶人的现象。上下级党部须建立亲密的关系，下级党部对上级必须经常有口头的或书面的工作报告，上级党部必须切实建立巡视工作制度，经常派人巡视下级党部，检查并实际上帮助其工作。对于下级要随时给以具体的活的（口头的）指导。改变文字的不落实际的指导方式。

（4）改进党的生活

提高党员注意党内生活的积极性

党员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提高，与党内生活的健全与否，是有极密切的关系。以后党应当注意推动党员对于党内一切问题的讨论，提高全体党员注意党内生活的积极性。要注意党的政策上的讨论，使每个党员能够明了当前的斗争任务。要经常检阅党的工作，上级党部必须向下级党部和党员群众报告自己的工作，引起同志在自我批评精神和两条战线斗争的基础上，来讨论与批评。只有这样才可以真正肃清命令主义通知主义的现象。只有这样才能发现党的进步的缺点，各种新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高党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消灭一切事务主义，培养自动工作能力，养成生活的政治化。

推行党内民主化，但要防止极端民主化与超组织的政治自由倾向

要适当的推行党内民主化来消灭委派制度的残余。民主化推行的程度，当然要依据当时的客观条件来决定（如在当地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等问题严重情形之下，自然是不能广泛的适用民主原则）。要防止一切极端民主化和超组织的政治自由的倾向，尤其是在红军中要防止这种不正确倾向的发展以至于妨碍红军的统一指挥。红军中的同志，是应当绝对服从上级军事政治指挥员的命令（如是发现上级指挥员有反革命阴谋当然例外）。

但一般的情形，以后地方党委员会和红军各级的党务委员会的产生。非在特别情况下，均须由党大会或代表会议产生经上级党部批准。这一原则，同样要适用到苏维埃政权和各种群众组织指导机关的产生。

实行自我批评，防止派别观念陈见和制造派别的倾向

实行党内自我批评，是保障党正确路线执行，推动党的进步的最有力的方法，这可以防止党内腐化官僚化和其他一切怠工消极等不正确倾向与现象的产生与发展。以后各级党委员会及支部大会须经常举行工作的自我批评，务要使每一个对党的路线与工作有意见的同志能够有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要反对一切抑制自我批评，尤其要反对抑制工农同志批评党的企图，以免除一切背着党表示不满而引起消极怠工的恶现象。在厉行党内自我批评中，同时要防止一切派别的陈见和感情的无原则的争论与攻击个人，不正确足以妨碍党进步的倾向之发展，要消灭一切派别观念或制造派别的企图。要使自我批评成为为着国际和中央正确路线斗争的工具等。

（5）创造党的新干部

坚决提拔干部训练干部反对动摇这一路线的企图

提拔干部是目前党的一个重要任务，必须坚决从下层提拔在各种斗争中表现积极坚决执行正确路线的工农分子参加党的指导工作，代替旧有不好的干部。使他们团结在党的委员会周围，成为党的最好的活动分子。对于所提拔的新干部，党必须带有很大的教育性质，时常给以个别的特殊教育。在初提拔起来的时候，一定要按照他的工作能力与兴趣分配以适当工作，提高他的工作能力，逐渐的提到上级指导机关来工作。我们要与地方及红军中一切对于提拔工农干部犹豫，留恋旧干部和形式主义做无情的斗争。这些不放心或以为工农分子工作能力薄弱的观念，实际上就是企图阻碍工作路线的转变的右倾的机会主义。

对于干部的培养除开在实际工作训练外，还须要有计划的组织各种党的、军事、政治以及群众工作和苏维埃工作的训练班或学校，经常挑选一部下层积极工农分子去受训练，训练的方法与材料，都须要有很实际充分的选择与准备。

（6）加强党的教育训练工作

加紧党内教育，防止两种倾向，注意思想斗争

党内教育工作，主要的是要使实际斗争与理论问题，能够很好的联系起来，一方面是要打击狭隘的经验论与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的发展，防止忽视政治和理论教育的倾向。另一方面又要防止一切离开实际斗争的空谈主义，和一切夸大狂。

以后党的重要决议和文件，尤其是每一次大的斗争之后，必须把斗争中一切经验和教训整理起来，作为一种实际教育的材料，传达到党员群众中去，引起同志讨论。对于党内不正确的思想和倾向应当要抓住，来做思想上的斗争，使每一个党员能得到正确的阶级认识。

过去反立三路线，反右派及托陈派等类的思想斗争，及国际路线的传达以讨论，是非常的不充分。这一工作，以后还需要继续进行。对于改良主义及其他反革命派别思想和理论的揭穿，亦得要引起党的注意。

注意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工作

在这些教育工作和思想斗争当中，必须要很灵活的联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党的政纲及目前任务，以达到提高党员政治理论水平的效果。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

论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教育，还须要注意有系统的进行，特别是对党的干部——尤其是红军中的干部，更加需要。为着这一工作，党必须切实执行下列几种办法：（1）要组织读报班，读党报小册子和决议案，从这里面提出问题讨论。（2）在支部大会或特别召集干部会议，作浅显的政治和理论问题报告。（3）组织各种问题研究会。（4）出版各种问题简要的小册子并收集和编订其他材料，供给党员作研究的参考。（5）在各种训练班要按受训练同志政治理论水平，定出这类问题的课目。（6）能识字，理论水平较高的同志，应自己看读基本的理论书籍。党应收集并翻印这类书籍。

对新党员必须有特别教育工作

关于新入党的党员，党必须给以特别的教育与训练。一方面是要适当分配以具体可能胜任的工作，去使之受实际工作的训练，同时须要施行个别的谈话式的和集体的——组织新党员训练班的教育方法。使他们在进党以后的短期中能够了解一个党员所应知道的基本常识。

（7）严紧党的纪律

严紧党的纪律，反对官僚腐化现象

严格执行党的铁的纪律，是严密并巩固党的组织，提高党在群众中威信的方法。现在在各政权机关红军及各种群众组织中，多半是党员担负着最重要的工作。为要保障这些同志真正成为群众中的模范者，防止一切腐化官僚化贪污等现象的产生，党必须严格的执行纪律。下级党部与党员对于上级党的决议，应负绝对执行的责任，一切违反苏维埃法律对于革命有损害行为的党员必须比非党员的工农分子受更严厉的革命纪律制裁，这尤其是在红军及其他武装组织中更加重要。党应当加紧反对官僚腐化贪污等现象。并提出反对这类现象的口号，防止那些现象滋长。

防止两种不正确的倾向

在严密党的纪律当中，必须防止两种不正确的倾向产生。第一种：就是假借说服要防止惩办制度；或是因为感情关系而放松纪律的执行，以致走到根本忽视党的纪律。第二种：就是完全不用说服的精神，采用机械的或过分的施行纪律的惩办制度，这种惩办制度的结果，是足以妨碍干部的培养，减弱党员积极性发展的。

（8）建立红军中党的组织工作

实现政治委员制度与政治工作条例

以上的原则与办法，同样运用于红军的党部。为要强健红军中党的组织，保障党的政策的实现，和加强红军中的政治工作与军事训练，党应当切实实行政治委员制度与红军政治工作条例。红军中包办一切军队行政的各级党的委员会应即取消。各级党的组织，应当由各军政治部管理，各军党由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负责管理，并指导其工作。中央局对各军的工作指导亦须经过总政治部。同时政治委员与军事指挥员在工作上应有明确的适当的分工。这些工作上的划分，是为着培养新的干部，推进一般干部的积极性增强工作的效能，绝不是减轻政治委员对军队中所负党与军事领导上的政治责任。

(9)建立健全的党报

反对忽视党报作用的倾向

党报是领导全党的斗争，组织广大群众在党的政治主张周围的一种最重要的武器，要消灭过去党一贯的忽视党报作用，在全党树立对党报的正确观念。建立完善的党报，应看成是党的建设工作中重要的一部分。

党报内容要最大限度的具体指示性

各苏区的高级党部，应当集中力量组织一个党报。党报的论文对于下级党部应带有指示文件的性质。所有内容应有最大限度的具体性质。指示地方党部如何执行国际和中央的路线以及每一个斗争的策略与方法。应当发表许多斗争的经验教训和新的工作方法。经常提出党建设工作的各种问题，帮助路线彻底转变的执行，但是党报的文字须力求简单、通俗，尽量求得能适合党员的需要。

为着建立完善的党报，每个党员尤其是干部，应当负责供给党报的材料与文章。并且要努力负起发行的责任。

(10)建立党与政权及群众组织的正确领导关系

党只能经过党团实现自己的领导，不应机械占据政权与群众组织整个机关

党对政权及群众组织的正确关系，是要经过党团的领导作用来实现党的领导。党绝对没有权力直接命令政权和群众组织，尤其是不应当去包办其一切工作。

以后在政权及群众组织指导机关当中，党应注意引进非党的工农积极分子参加工作，培养这些分子的能力，提高这些群众干部的积极性。政府和群众组织。必须真正经过群众选举产生，绝对禁止党来指定委派的制度。党员不必机械的占据这些机关的最大多数，尤其不需要使全体委员都是党员，而以能够保障党的领导为标准。

建立党团的经常工作

这里最主要的，就是要建立健全的党团来保障党的领导。党团应绝对服从所属党部的指示，执行其一切决议。经常保持党团在一切会议上一致的意见。加紧对于本机关非党员的政治工作，达到取得多数来实现党的一切领导，党团在每一次政府和群众组织开会之前，必须召集会议准备自己的意见，上级党部必须经常加紧对党团的领导与工作的检查。

(11)发展党的组织

执行对工人雇农苦力开门的路线，防止投机分子混入党

苏区党的发展，是党组织上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在党的发展当中，必须特别要执行向工人、雇农、苦力开门的路线。地主富农分子完全不能容许入党，对小资产阶级分子入党必须有严格的条件。要防止一切投机分子混进党里来。但是吸收半无产阶级的贫农中农先进觉悟分子入党仍然是很重要的工作。在大的斗争之后，或重要纪念节，可举行公开征求党员。

发展组织与扩大党宣传不可分离，新党员入党必须根据自动的原则

发展党的组织与扩大党的宣传是有不可分离的关系。党必须经常向群众解释共产党的组织和政纲及当前任务与策略，使工农群众对党有正确的认识，自动的要求入党，要绝对消灭赣东南与一部分红军中过去不经过本人同意的不正当的介绍手续，而秘密拉伕式发展党的方法。对非无产阶级分子入党后，必须严格执行候补期。

要注意秘密工作的建立

苏区党在公开存在的条件下，仍要注意秘密工作的建立，尤其是苏区的党要准备随时可以转入秘密工作环境的基础。这就是要保留一部分干部与同志的秘密，来担负新环境的工作。

要注意邻近白色统治区域及重要城市中秘密党的建立

根据苏区党执行向外发展的任务，党必须注意赤区邻近的白色统治区域与中心城市中秘密党的建立。同时建立白军中党的工作，是目前苏区党的一个重要任务。党必须选派一部分适宜的干部到这些地方去发展党的组织，建各立种群众的组织。

(12) 党 团 关 系 问 题

过去团的严重状况没有积极领导是一个重要原因

团的组织与工作，比党表现更加严重状况。这种结果的产生，一方面是因为立三路线执行的恶果，团的阶级基础薄弱，在许多地方曾被反革命派别篡夺了团的领导，造成了现在的严重状况。然而过去党忽视团的作用，对团的取消观念，没有积极领导团帮助团的工作，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党应把团的建设工作看成自己的重要任务，建立党团密切关系

青年工农群众在苏区与红军中的作用，显然是增长的，党应当把团的建设工作看成是自己重要任务的一部分。要加强对团的领导，帮助团的工作路线的彻底转变，为着团的工作的建立与发展，党必须调一部分适宜青年运动的干部做团的工作。

各级党与各级团，在组织上必须建立起亲密的关系，要切实执行互派代表出席会议的制度。

反对党内对团的取消观念

党为着加强对团的领导，首先要给党内一切对团的取消观念以有力的打击。并且须要使党员了解青年运动的重要意义，和CY工作路线的实际内容与工作方法。

四、实行两条战线的斗争

防止转变中各种不正确的倾向

在党实行全部工作彻底转变当中，可以产生各种不正确的倾向。一种是在发现党内各种

不健全状况，因而对党的力量和领导作用估量的不足，走向悲观失望的错误认识。一种是对党的各种弱点，不能有正确的认识，不能深刻的了解这些弱点的严重意义，因而对于执行彻底转变的路线会要走到消极的怠工，企图继续现有的状况。或者口头承认，而实际不去真正执行彻底转变的任务。另外有一种“左”的不正确观念，就是夸大党的进步，以为这种转变是很容易的事。不了解这些党内不健全状态，是有其长久的历史根源，必须要有思想上的斗争与说服，克服一切不正确的认识，才能达到彻底转变的任务。这种认识，一遇到执行转变的困难，同样会要走到悲观失望的前途。

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尤其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

因此在党四中全会与国际路线基础上来执行布尔塞维克的全部工作，彻底转变当中要深入两条战线的斗争。在实际工作当中，要与一切立三路线影响和党内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做最残酷的斗争。在目前转变当中要特别注意，与一切悲观失望和估量不足的主要的右倾机会主义；以及不能深刻认识转变中的艰苦斗争的“左”的不认真的倾向做斗争，要反对一切党内和平观念，派别观念与小集团和地域观念的倾向，同时要尽量揭破一切口头上承认国际路线正确，实际不执行的阳奉阴违的两面派。要坚决反对这种两面派阻碍实际工作的彻底的转变。

防止肃反工作代替两条战线斗争

肃反是当前苏区的重要任务，然而要防止肃反的简单化、扩大化而阻碍两条战线斗争，甚至于代替了这些斗争的错误。

两条战线斗争是巩固党的战线，保障国际中央战线的正确执行的。党必须从坚决的做两条战线的斗争中，消灭党内一切不正确的倾向，来巩固党内布尔塞维克的一致。

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

中国工农红军在土地革命发展过程中，由零星的工农游击队伍生长出来，它与一切反革命势力作了英勇坚决的斗争，得到了伟大的胜利，而且将本身组织壮大起来，成为目前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力量。

国民党军阀和帝国主义为要消灭中国革命发展，曾动员了很大的反动势力和数十万技术精强的军队来三次围攻我红军及苏区，结果都被我英勇红军配合群众力量冲破了，因此使中国统治阶级更极度的动摇和加速的崩溃，开展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英勇的红军在这几年的坚决斗争中表现了他的伟大力量，引起全国和全世界劳苦群众的爱戴和拥护。

当前的革命任务是要建立强固的革命根据地，争取一省及几省政权首先胜利，红军便是执行这一任务的主要力量，所以目前红军一切的建设，应该适合于实现这一任务的要求。

在红军中党的路线，确实有了很大的转变，如成分的改善，战斗力的提高，红军的扩大和巩固，战略、战术的采用，都能渐次实现国际正确路线，使立三路线之下的衰弱的红军逐渐巩固扩大起来，打破了数十万技术精强的敌人，成为目前苏维埃运动的主要力量。

目前红军中表现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游击主义的传统，还是深远的保留着，组织上一般的松散，各工作机关没有精确分工，也没有建立经常工作，作战自由行动，纪律不严明，教育训练不切实加紧去创造技术精强的部队，后方组织工作没有精确计划，更没有深远计划，这些涣散无组织无计划的现象，成为红军中最严重的状况，为进行大规模作战的绝大障碍。但反对游击主义绝对不是反对游击战术，恰好相反，游击战术要尽力采用，尽力发展。

党过去在红军中是起了领导作用，但一般说来仍然是薄弱的，并且还是不能得到一般的正确和明显的了解，把党在红军中领导作用看作党在红军中管理一切，将军事和政治机关的经常工作由党来包办，党包办一切的结果，把红军中军事政治机关，失去其独立系统的工作，变成了不健全的残废机关。这种由党来包办一切的根源，仍然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余毒。党包办一切的结果，将党变成了事务主义的机关，反而放轻了党在红军中的本身工作。党的组织非常松散，党的生活也不健全，党员的领导作用异常薄弱，党的发展很迟缓，党对红军的政治文化宣传教育工作也不去加紧，因此不能很紧密的将整个非党员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这种严重情形，已成为红军中普遍现象。

红军中军阀军队残余，在过去虽经过坚决的斗争，大体消清，而成为创造工农红军的一个重要基础，但在某些方面仍未彻底消清。如关于管理教育，还不能完全站在阶级利益上及实际要求上去实施，还带着形式主义（如打骂责罚的态度等)。尤其对党及地方政府机关的关系，有些还充分表示象国民党军队对国民党政府一样的态度，以为红军是政府的创造者，政

府机关应小于红军，没有认清红军是苏维埃政府一部分政权机关是工农专政的工具。红军中生活腐化的现象有些还是存在着，到处都有表现。

红军中狭隘的经验论，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不小影响，根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单凭自己的狭小经验和短小眼光来分析各种问题，这完全是农民的落后思想，事实上会要走到错乱的非阶级路线的前途上。

在党内党权高于一切的观念没有完全打破，所以在组织上产生了各级党的委员会，这种组织是削弱了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代表党和政府制度不能彻底实行，政治部工作不能健全起来，这是主要原因之一。

过去对于干部的洗刷培养和训练，仍然缺乏明确阶级路线和极端注意，对于提拔和培养工人成分的干部，做得非常不足，各级机关工作人员也不能在自己实际工作中加强工作能力，使其工作专门化，这是因为党包办了一切，各级军事政治机关工作不能健全起来的结果，对于集中力量有组织的举办军事政治学校，创造大批干部，提高红军作战技能，仍然表示过犹豫的态度，这是因为狭隘的经验论和小团体观念没有完全打破的缘故。

目前中国革命形势转到了一个新的局面，中国统治阶级正在全部崩溃，帝国主义在中国矛盾更加尖锐化，中国革命高潮猛烈向前发展，这一发展前途必定引起反动阶级更加猛烈向苏区红军进攻，但这种形势的转变，是非常有利于国内革命战争的开展。当前红军作战的环境和任务不仅在政治上有了一个新的转变，同时在敌我力量对比上，地理条件上，经济环境上和群众基础上都有了与过去不相同的条件。因此，红军一切的建设，必须根据当前和将来作战的环境和任务转变过来，建筑在大规模的作战基础上，反对游击主义的传统，建立周密而有系统的组织，建立科学的分工，大会更具体的指出，在军事政治组织上及提高红军战斗力上一切必要的实际办法。

（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是中国工农红军高级的指挥机关，管理红军的组织与给养以及教育训练并指挥红军作战行动，只有立刻健全这一严格集中的指挥机关，才能坚决的执行上级领导机关的计划与统一行动，才能战胜军阀帝国主义的势力，才能达到当前革命任务。

（二）加强党在红军中领导作用，首先就要彻底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和建立各级政治工作机关的组织与工作。因为政治委员和政治部是代表党和政府在红军中最高党的政治机关和人员，打破党的包办主义，把在红军中超过政治委员政治部的职权的各级党的委员会取消，党的一切组织都应该在政治部管理之下，这样才是彻底实行政治委员制度的主要前提，军队中党的生活，应该是巩固红军战斗力和保证命令的执行而不是包办一切的。

（三）红军中党的政治工作机关，应有系统的建立起来，因为只有健全和巩固党的组织与政治机关系统，才能保证政治工作的实际，才能提高一般政治水平低落的干部的阶级觉悟，才能提高红军战斗力，才能将整个红军在共产党领导下为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最有力的工具。

（四）红军中主要干部成分要是工人雇农贫农以及在战斗中表示最勇敢忠实的革命战士，应尽量提拔和吸引进来，军事政治学校应集中力量办下去，学生成分要多吸收工人与雇农，在教育上理论与实际融合起来，以打破单纯的狭隘经验论及空谈论调。

（五）加强红军中政治及文化宣传教育工作，为巩固红军战斗力主要条件，在军事训练须着重于技术能力的增高，特别要注意提高技能，要有堡垒战白刃战街市战夜间战射击飞机等的演习。政治教育精神上，须基于军事化苏维埃化国际化几个重要原则上提高红军的阶级觉

悟水平及将整个红军团结在共产党和苏维埃领导之下作坚决的阶级斗争。

(六)红军编制须统一起来，要开始适合于大规模作战的组织，要根据目前器械地理条件社会机关及作战对象，并以中央颁布红军编制草案为基本，制定统一和适应的编制。

(七)健全各级参谋处组织和工作，尤为目前迫切需要，因为现代火器的发达影响于作战环境异常复杂，而且在战斗条件之下，一分钟战斗时间都有决胜负的意义，如果没有严格而有力量的参谋处组织和工作，就不能在复杂战斗条件之下组织作战行动和统一指挥。

(八)提高军纪、指挥员威信，为巩固红军战斗力重要条件。红军军纪是建筑在阶级利益上，须以自觉和相当监督精神维系之下，红军军纪要与每个战斗员在日常生活上养成坚忍的勇敢，团结的精神。提高指挥员威信，须与加紧对指挥员在思想上行动上正确，能做红军的领导者。

(九)应制定颁行红军优待条件惩罚条例及各种条件。

(十)巩固红军后方组织，就是保证红军后方战线与前方战线的胜利，关于军械军医及一切军需用品，均应精确的统一而有深远的调查和计划。

(十一)为应付目前作战环境和完成目前任务的要求，各苏区红军须巩固扩大，红军一三军团于最近期内须扩大，至少要增加到一万人，在扩大红军运动中须有明确的阶级路线，坚决的反对立三路线和召兵买马的观念，应扩大并加紧对独立师及地方工农武装领导，这样来把一部分地方武装编入到红军中去，要在有基础的群众中做扩大红军运动，以宣传鼓动经过群众路线的方法吸收最勇敢的工人雇农贫农及可靠的中农分子到红军中来。

为着巩固的进行阶级战争和上述各项任务，必须很坚决的反对红军中一切不良倾向和思想，游击主义，党的包办主义，事务主义，军阀部队残余，以及狭隘经验论和空谈论调，这些都是障碍红军巩固发展的坚石，尤其是游击主义为目前红军须要适应于大规模作战中最大障碍。在红军中加紧二条战线的斗争，尤其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同样为目前第一个最大任务，只有在无情的坚决斗争中，才能走到国际的正确路线上，才能保护红军团结和战斗的提高。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①]

——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

无产阶级所领导的农民斗争，正在继续发展和日益高涨；帝国主义军阀虽然疯狂似地来抵抗，可是苏维埃运动还是向上增长并且扩大；日益使中国的工农武装了自己，组织了红军，一县又一县的农民，从数千年来在封建地主豪绅的压迫之下解放出来了，没收并分配了这些压迫者的土地，打倒了封建制度，消灭了国民党政权，建立了工农苏维埃政权。这个政权，是能够彻底完成中国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及土地革命任务底政权。

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批准和决定没收地主的土地及其他大私有者的土地。为没收和分配土地有一个统一的制度起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基本农民群众与革命发展前途的利益之基础上，采取下面的土地法令，作为解决土地问题的最好的保障。

第一条：所有封建地主、豪绅、军阀、官僚以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无论自己经营或出租，一概无任何代价地实行没收。被没收来的土地，经过苏维埃由贫农与中农实行分配。被没收土地的以前的所有者，没有分配任何土地的权利。雇农、苦力、劳动贫民，均不分男女，同样有分配土地的权利。乡村失业的独立劳动者，在农民群众赞同之下，可以同样分配土地。老弱残废以及孤寡，不能自己劳动，而且没有家属可依靠的人，应由苏维埃政府实行社会救济，或分配土地后另行处理。

第二条：红军是拥护苏维埃政府、推翻帝国主义和地主资本家政府底先进战士，无论他的家庭现在苏维埃区域或在尚为反动统治的区域，均应分得土地，由苏维埃政府设法替他耕种。

第三条：中国富农性质是兼地主或高利贷者，对于他们的土地也应该没收。富农在没收土地后，如果不参加反革命活动而且用自己劳动耕种这些土地时，可以分得较坏的劳动份地。

第四条：没收一切反革命的组织者及白军武装队伍的组织者和参加反革命者的财产和土地；但贫农中农非自觉地被勾引去反对苏维埃，经该地苏维埃认可免究者，可在例外；对其头领则须无条件地按照本法令执行。

第五条：第一次代表大会认为：平均分配一切土地，是消灭土地上一切奴役的封建关系及脱离地主私有权的最彻底的办法；不过苏维埃地方政府无论如何不能以威力实行

①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曾在本出版社一九三三年所印出的《苏维埃中国》第一集上发表。后来在王明同志著的《经济政策》一书上又作为附录发表一次。但这两次所发表的，只有七条，尚非该土地法的全文，因本出版社当时由国内报纸上所搜集到的只有七条。现在本出版社在国内各种报纸上搜集的结果，得到该土地法的全文，共计十四条，兹在《苏维埃中国》第二集上完全发表，请读者注意。

这个办法。这个办法不能由命令来强制执行，必须向农民各方面来解释这个办法，仅在基本农民群众愿意和直接拥护之下，才能实行。如多数中农不愿意时，他们可不参加平分。

第六条：一切祠堂庙宇及其他公共土地，苏维埃政府必须力求无条件地交给农民；但执行处理这些土地时，须取得农民自愿的赞助，以不妨碍他们奉教感情为原则。

第七条：较富裕的农民，企图按照生产工具多少来分配被没收的土地。第一次大会认为，这是富农有意阻碍土地革命发展和为自己谋利益的反动企图，须给以严重的制止。地方苏维埃政府应根据各乡村当地情形，选择最有利于贫农中农利益的方法；或按照每家有劳动力之多寡同时又按人口之多寡——即混合原则来进行分配；或以中农贫农雇农按照人口平均分配，富农以劳动力（即按照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地方，富农每个有劳动力者，所得分田数量，等于按人口平均分配每一人所得分田数量）为单位，人口为补助单位去分配。分配土地时，不仅应计算土地的面积，而且应估计土地的质量——（特别是收获量）。在土地分配时，还应尽可能地使之适合于进行土地改革，预备消灭官荒，片段，大阡陌等各种封建遗迹。

第八条：没收一切封建主，军阀，豪绅，地主的动产与不动产，房屋，仓库，牲畜，农具等。富农在没收土地后，多余的房屋农具牲畜，及水碓油榨等，亦须没收。经过当地苏维埃，根据贫农中农的利益，将没收的房屋分配给没有住所的贫农中农居住，一部分作学校俱乐部，地方苏维埃，党及青年团委员会，赤色职工会，贫农团和各机关使用。牲畜和农具可由贫农中农按组织按户分配，或根据贫农意见，自愿的将各种没收农具办初步合作社，或在农民主张和苏维埃同意下，设立牲畜农具经理处，供给贫农中农耕种土地的使用，经理处应由地方苏维埃管理，农民得按照一定规则，支付相当的使用金，所有农具的修理，经理处工人的供养以及新农具新牲畜的购备，由农民加纳使用金的百分之几，以资弥补。

第九条：没收地主豪绅的财产，同时必须消灭口头的及书面的一切佃租契约，取消农民对这些财产与土地的义务与债务，并宣布一切高利贷债务无效。所有旧地主与农民约定自愿偿还的企图，应以革命的法律加以严禁，并不准农民部分的退还地主豪绅的土地，或偿还一部分的债务。

第十条：一切水利，江河，湖沼，森林，牧场，大山林，由苏维埃管理，来便利于贫农中农的公共使用。桑田，竹林，茶山，渔塘等，必如稻田麦田的一样，依照当地农民群众的自愿，分配给他们使用。

第十一条：为着实际的，彻底的，实现土地革命的利益，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雇农工会，苦力工会，贫农团，是必要的团体，认为这些组织是苏维埃实行土地革命的坚固柱石。

第十二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认为在苏维埃政权下，土地与水利的国有，是彻底消灭农村中一切封建关系，而事实上就是使农村经济达到高度的，迅速的发展必经步骤。不过实际实行这个办法，必须在中国重要区域土地革命胜利与基本农民群众拥护国有条件之下，才有可能。在目前革命阶段上，苏维埃政府应将土地与水利国有的利益向群众解释；但现在仍不禁止土地的出租与土地的买卖，苏维埃政府应严禁富农投机与地主买回原有土地。

第十三条：地方苏维埃如在该地环境应许条件之下，创办下列事业：

一，开垦荒地；二，办理移民事业；三，改良现有的及建立新的灌溉；四，培植森林；五，加紧建设道路，创办工业，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第十四条：本法令不但适应于现已成立之苏维埃区域，而且应用于非苏维埃区域及新夺取的苏维埃政权的区域。各苏区内已经分配的土地，适合本法令原则的，不要再分；如不合本法令原则的，则须重新分配。

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

常务主席　项　英　周以粟　曾　山　朱　德

张鼎丞　陈正人　邓　发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

——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为着反帝国主义革命与土地革命的发展，工农革命联盟的巩固，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特规定下列基本条例，作为目前苏维埃经济政策的根据。

一 工 业 方 面

（一）为保障国家完全独立和民族解放起见，苏维埃政府将操在帝国主义手中的一切经济命脉，实行国有（租界、银行、海关、航业、矿山、工厂等），在目前允许外国某些企业重新另定租借条约，继续生产，但必须遵守苏维埃一切法令，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及其他各种条例，如这些企业主违反这些条例，实行怠工和关厂，或干涉苏维埃政府的行政权维护反革命，则必须立刻没收其企业作为国有。

（二）苏维埃政府对于中国资本家的企业及手工业，现尚保留旧业主手中而并不实行国有，但由工人监督生产委员会及工厂委员会实行监督生产，若这些企业主怠工破坏苏维埃法律或参加反革命的活动，故意破坏或停止生产，则必须立刻没收他的企业，按照具体条件交给工人劳动合作社或苏维埃政府管理。

（三）竭力促进工业的发展，苏维埃特别注意保障供给红军的一切企业的发展（工厂、作坊、手工业、家庭企业等）。

二 商 业 方 面

（一）苏维埃应保证商业自由，不应干涉经常的商品市场关系；但苏维埃必须严禁商人的投机和提高价格，应解散商会，禁止大小商人以商会名议垄断价格，如遇商人怠工，或经济封锁而危及基本群众主要生活商品的供给，或因红军需要，苏维埃政府应规定必需品的最高价格，但这种方法，须在必要时施行，有可能即须恢复商业自由。

（二）与非苏维埃区域的贸易，还绝不能实行“对外贸易垄断”；同时，苏维埃政府应实行监督这些贸易，以保障苏维埃区域必需商品的供给，银币输出必须得该地苏维埃允许。

（三）为着整个苏维埃贸易与保障劳苦人民的利益及改良劳动群众必需品的供给，苏维埃政府必须极力帮助合作社的组织与发展，苏维埃对于合作社，应该以财政的协助与税的豁免，苏维埃应将一部分没收的房屋与商店交给合作社使用，并且为要保证劳苦群众的供给，苏维埃政府必须提倡公共仓库，储畜粮食，以便实行廉价供给与接济

三 财政与税则

(一)消灭国民党军阀政府一切的捐税制度和其一切横征暴敛，苏维埃另定统一的累进所得税则，使之转由资产阶级负担，苏维埃政府应该豁免红军战士、工人，乡村与城市贫苦群众家庭的纳税，如遇意外灾害，更应豁免或酌量减轻一切税额。

(二)取消过去一切口头的书面的奴役及高利贷的契约，取消农民与城市贫民对高利贷的各种债务，严禁预徵或债务的奴役，应以革命的法律，严防并制止一切恢复奴役与高利贷关系的企图，城市与乡村贫民被典当的一切物品，完全无代价的归还原主，当铺应交给苏维埃。

(三)苏维埃区域内的旧货币，在目前得在苏维埃区域通行，并消灭行市的差别；但苏维埃须对这些货币加以清查以资监督，苏维埃应发行苏维埃货币，外来的货币，须一律兑换苏维埃自己发行之货币。

(四)为着实行统一币制并帮助全体劳苦群众起见，苏维埃应开办工农银行，并在苏维埃区域内设立分行，这个银行有发行货币之特权，工农银行对于各农民、家庭手工业者、合作社、小商人等实行借贷，以发展苏维埃经济，这个银行应实行兑换货币，其分行并带徵税收。

(五)对各土著及大私人银行与钱庄，苏维埃机关应派代表监督其行动，禁止这些银行发行任何货币，苏维埃应严禁银行家利用本地银行，实行反革命活动的一切企图。

四 市政方面

苏维埃实行相当调剂，以减轻城市贫民的房租，没收地主、豪绅、军阀、官僚、政客的房屋和财产，这些房屋应交给工人苦力、学徒等居住；财产由城市贫民分配，或由苏维埃用作公共事业，城市苏维埃应采取一切办法改良贫苦人们的居住条件。

中央关于“平分一切土地”的口号的决议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中央近来检阅各苏区的报告，觉得各苏区党部对于“平均分配一切土地”问题的解释与执行是不相一致而且有错误的。譬如皖西北特委，在第二次扩大会议决议案上说：

“有些地方是离开了没收豪绅地主阶级的土地与实行彻底分配一切土地的原则，形成了一贯的富农路线”（七月三十一日）。

从这一段话上看来，似乎不彻底实行“分配一切土地”那就要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但是在皖西北地方苏维埃政府对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的报告上，又说：

“商城市分配土地，犯了极严重的错误，主要的是没收的原则应用到中农的土地上去。所以商城不是没收豪绅富农的土地，而实是没收一切土地，平均分配一切土地”（六月底）。

从这一段话看来，则是“平均分配一切土地”是“犯了极严重的错误”。

在鄂豫皖区苏维埃给皖西北地方苏维埃的一信上则说：

“对中农的土地，不可变更他原来的位置，如果已经变了的，必须宣传叫他提出意见来。如不满意，必须以山地等补充之。”（七月二十九日）。

这里是说不可变更中农原来的土地。这就是说，在实行“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原则之下，中农的土地是不包括在内的。

在鄂豫皖中央分局给麻城县委的信上也说：

“侵犯中农的利益，是绝对不行的。他们的土地，以不动为原则”（九月十六日）。

这是在鄂豫皖苏区的情形。

在黄某某同志巡视鄂东苏区的报告中说：

“在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口号之下，把中农土地没收，使中农动摇”（七月十一日）。

这就是说，在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口号之下，也没收了中农土地，也分配到了中农的土地，以至使中农动摇。

在赣东北苏区赣东北特委政治决议上说：

“在扩大会决议上，没有特别指出“平分一切土地”是错误的”（七月二十二日）。

赣东北省委第一次扩大会决议上指出省委的中心任务，是在：

“所有被没收的土地及其一切土地，一律经苏维埃平均分配”（赣东北省委报告）（十月三十一日）。

在中央苏区，则以为：

“被没收的土地，应当按照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原则（数量上质量上的平分），就是多少同好坏分匀，来分给农民。因为平均分配一切土地，是消灭土地关系中的封建制度最彻底的办法。……在平均分配土地的一切过程中，应当把已经没收的地主土地和富农土地和中农贫农自己的土地一起拿来平分，使雇农苦力贫农中农分得同样多同样好的土地，就是多少分匀，好坏分匀”。见苏区中央局“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八月二十一日）。

在湘鄂西苏区，在湘鄂西省军事委员会“关于九师最近行动的决议”则这样写着：

“武装农民发展农民战争，同时宣传平分一切土地，并在农民自愿的条件之下实行”(八月二日)。

中央认为虽是有些苏区，正确的了解到“平分一切土地”口号的执行，决不能侵犯中农的利益，然而有些苏区对于这一口号的了解与执行，还是模糊的与错误的。

中央必须再一次的告诉苏区的各级党部，共产国际还在一九三〇年七月在“中国问题决议案”上分明的写着：

“必须坚决打击富农的企图，这些企图或者是想阻碍没收地主的土地，或者是想按照农民各自所有的生产工具去分配已经没收的地主土地。党对于这种富农的企图应当反抗，就是要实行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没收教堂寺院以及其他大私有财产者的土地，把这些土地依照平均分配的原则交给贫农和中农，同时不要把没收的原则应用到富裕农民的土地上去”(这里是指富裕的中农说的)。

中央根据国际这一指示，曾经起草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法令草案。该草案上关于中农的土地与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问题给了很明确的如下的回答：

“中等农民阶层的土地不没收”(第三条)。

“平分一切土地是消灭土地上一切奴役的封建的关系及脱离地主私有权一切束缚最彻底的方法。不过苏维埃政府无论如何，不能以威力实行，不能由上命令，必须向农民各方面解释这个办法，仅在基本农民群众愿意和直接拥护下，才能实行”(第五条)。

从这里我们可以分明的看到，我们在土地革命中的中心口号，仍旧是“没收地主教堂寺院以及大私有财产者的一切土地。”富农的土地也在没收之列，但在富农不参加反革命，自愿耕种土地的条件之下，仍可分得坏的土地（像赣东北党那样所提出的“没收地主与富农的土地”,把地主与富农平等看待是不正确的)。中农的土地绝对不能没收。至于没收来的土地平均分配，或是进一步的实行平均分配一切土地（自然中农的土地也在内),那最好由农民的最大多数去决定。

中央认为有些苏区的党部，如赣东北，中央区等，只是机械的去平分一切土地，以为不实行平分一切土地，就是富农路线，就是机会主义，这种观念是完全错误的。他们在这种了解之下，完全忘记了中农，侵犯了中农的利益。中央根据各苏区分配土地的经验，必须使全党同志了解，在实行平分土地的过程中，中农的土地以不动为原则。对于那些利用平分一切土地的口号去侵犯中农利益的“左”的企图，必须给以最严厉的与坚决的打击。但是我们不反对而且赞成在“基本农民群众（自然中农也在内）愿意和直接拥护之下”去实行平均分配一切土地，因为这是土地革命最彻底的办法。而且我们在目前还应该尽量宣传“土地国有”的口号，对于这个口号的宣传，苏区的党部是忽略的。

苏区的各级党部必须向广大的雇农贫农群众解释，他们要保持他们所分得的土地，要扩大与巩固苏维埃政权，要坚决的去战胜反革命与富农，他们必须同中农结成最密切的同盟，必须不但不损害到中农的利益，而且要给中农以土地革命的实际利益。就是中农所有的土地比雇农贫农所分得的较多些，我们不能以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口号，去分配他们的土地。妨害中农的利益，强迫平均分配他们的土地，必然会使他们动摇到敌人方面，来反对苏维埃政权。这种“左”的反中农的路线，是富农路线的另一表现，实际上同拥护富农利益的机会主义，根本没有丝毫的不同。

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

（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

（一）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与地主军阀的封建剥削，使中国的经济危机发展到整个国民经济总崩溃的形势。国民经济的崩溃在全国范围内及一切经济部门内进行着。工业的危机迅速地开展着丝纱面粉等主要的轻工业部门，都处于恐慌与衰落的状况中（上海丝厂开工的仅十分之二，其他各地亦一样，丝厂工人失业者在十万人以上，纱厂方面厚生三新等厂倒闭，日本厂的纱锤织机迅速增加，面粉业开全工者仅五月），重工业更加非民族化而处于帝国主义的垄断的状况之中。农村经济的崩溃更是急剧而猛烈；在地主与高利贷者的奴役与剥削，军阀的搜括与不断的内战，帝国主义的掠夺之外，更加上了空前的水灾，几十万的农民群众被大水淹死，几十万栋房屋为洪水所毁灭，几千万的农民在寒冷的冬天，冻饿、死亡。十四万万亩以上的土地被水冲荡而失去任何收成。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的奴役与剥削农民造成了空前的水患，但是他们对于这些被灾的饥寒交迫生死不得的农民不曾有任何的救济。他们利用赈灾的名义，发了八千万公债，加了几十种捐税，向美国帝国主义借了高利贷式的美麦借款，而一点都没有用到灾民身上．相反的更加用工赈急赈名义奴役农民，在灾区中更增加了许多新的苛捐杂税；资本家更利用广大的失业失地的劳动后备军，来扣减工厂工人不得一饱的工资，来增加他们工作时间；地主与高利贷者更利用时机来剥削他们。国民经济的浩劫，使无数千万的劳苦工农受到骇人听闻的惨痛、贫困、饥饿、瘟疫与死亡。千百万群众的痛苦已经到了极点。

（二）经济危机的深入直到国民经济总崩溃，无数万工农群众的灾难痛苦及他们革命斗争的剧烈紧张，在这种情况之下，苏维埃运动得到许多伟大的胜利，国民党不但不能消灭甚至不能暂时阻止革命运动的发展。在三次“围剿”中，国民党军阀受到悲惨的失败，红军击溃了十五师以上的国民党军队。第三次“围剿”的结果，仅仅在赣南，红军就获得了一万枝以上的步枪，五百万发的子弹，一百五十枝以上的机关枪，俘虏了二万余人。从第三次“围剿”冲破后，红军更得了许多新的胜利，闽粤赣区恢复了杭武永苏区，占领了永定、汀州、连城，发展和扩大到宁化、清流。赣东北区不但与闽北崇安铅山一带苏区联系一起，并且向着浙皖边发展，占领了常山、婺源等县城。鄂豫皖区扑灭了反革命派破坏红军的阴谋，大大地巩固了红军与苏区根据地，并且占领了英山、霍丘与黄安的县城。湘鄂西区贺龙同志所领导的第三军与九师会合后，更巩固了洪湖根据地，正在与敌人坚苦的战斗中创立襄河北岸的新的根据地。湘鄂赣与湘赣边都一样的扩大原有的根据地，向着蒲圻嘉鱼及上犹崇义发展着。中央苏区不但恢复了第一次“围剿”前的区域，并占领了赣南会昌、寻邬、安远、信丰各县，并且正在围攻赣南的中心城市——赣州。由于孙连仲部二十六路军的全部投入红军（约二万

余人)；宁都、广昌都重新入于红军之手，并且有占领抚州消息。吉安已如孤城，反动统治在江西所保持只有南浔路上的八九县。在残酷的国内战争之中红军坚强了自己，锻炼了自己，夺取了敌人的武装武装了自己，向着红色铁军的道路上前进。红军已经成了伟大的坚固的革命的铁拳。由于苏区内部反革命组织的破获，及立三路线所造成的毒害坚决的肃清，没收来的土地的重新分配给苦力雇农和基本的农民群众；苏维埃机关的改造与阶级异己分子的肃清，大大地提高了工农劳苦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及苏维埃政权在他们中间的威信。全国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的建立给苏区与非苏区的革命运动以总的领导，更能顺利地实行无产阶级对于农民土地革命的领导权。目前的任务：为扩大苏区、为将几个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而斗争，为占领几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斗争。

(三)红军与苏维埃运动伟大的胜利，国民党统治的日渐崩溃，促使帝国主义从隐藏的武力干涉（供给反革命军队以军火军费与军事顾问等等）转变到直接的公开的武力干涉，这便产生了日本的武力占领满洲的事变，同时日本占领满洲是帝国主义新的瓜分中国的开始，是进攻苏联的具体的危险的步骤。日本帝国主义者不仅企图将满洲变为自己的完全殖民地，变成为进攻苏联的军事根据地，它并且企图经过自己的走狗韩复榘、阎锡山、冯玉祥伸手到中国北部与进攻蒙古人民共和国。法帝国主义完全同意与援助日本的行动，企图实现反苏联的军事冒险与占领云、贵。英帝国主义部分的赞助日本的行动，只要日帝国主义者不侵入英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美帝国主义者，它的企图是将全中国放置在自己的金元势力之下，在事变开始的最初时期取了等待与观望的态度，实际上同样的帮着日本帝国主义来掠夺中国民众及造成反苏联的场地。事变的开展暴露了美帝国主义与日、英帝国主义集团的矛盾。目前的形势显然是：在反对苏联的战争准备上，在将满洲造成反苏联的军事根据地上，在掠夺中国民众压迫中国革命运动上，帝国主义是一致的（国际联盟及美国都一样是掠夺和压迫中国的强盗)；它们在瓜分中国分配中国的富源上孕育着开展着帝国主义企图间的冲突与矛盾。反苏联战争的准备，瓜分中国，直接的公开的压迫中国革命运动，是目前帝国主义国际的策略之中心。对于中国劳苦群众的掠夺与瓜分中国是在急剧的进行，红军苏维埃的发展将促使帝国主义更公开的用武力压迫中国革命运动，中国工农革命运动与帝国主义者的武力广大武装的冲突的整个历史的阶段是在前面。因之党的任务是：组织、准备、领导、武装千百万的无产阶级与农民群众，进行革命的民族解放战争，来保护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来争取中国的独立解放，来争取中国的统一。

(四)经济危机的加深，苏维埃和红军的胜利，帝国主义进攻中国革命与瓜分中国的急进，这是决定中国目前情势的三个因子，是生长中国革命危机的三支柱石。经济危机深入到国民经济总崩溃的地步，使得千百万的工农生活极端恶化，失业失地，饥饿寒冻，使得他们的斗争极端紧张，因为他们只能在反抗与死亡中选择自己的出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苏维埃与红军，成了新的革命高涨的柱石，成了全中国劳苦群众革命斗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苏维埃红军的光荣的胜利，给国民党统治之下的劳苦群众指出了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的道路。满洲的事变惊醒了最广大的劳苦群众及城市乡村的小资产阶级的民族的觉醒，激动了他们的仇恨、愤懑与反帝国主义的热忱，国民党统治的必然的投降帝国主义，更促进反帝运动转变成为直接的反对国民党统治的革命斗争。

城市工人的罢工斗争是在高涨着，在工厂中，在矿山中，在铁路上，在船上，在苦力与黄包车夫中，罢工斗争不断的发展着，冲破了国民党政府的接一连二的禁止罢工的命令。罢

工斗争大部分是经济的斗争，但是经济口号与政治口号的密切的联系，及罢工的顽强性与坚持性，是目前罢工斗争的必然的特点。个别的反帝国主义的罢工，已经不是偶然的现象，已经在个别的城市发展到了总同盟罢工的形势（如太原一天的总罢工），许多产业部门爆发着酝酿着一业的同盟罢工（如招商局，上海的纱厂、印刷、市政等）。对于国民党政府机关、资本家与黄色工会的一致的进攻，工人阶级正以自己的英勇的反攻与进攻来回答。在国民党统治总崩溃的基础上，黄色工会的反革命的面目，反工人阶级的面目亦逐渐被工人阶级所认识。开展着的反黄色工会的斗争，正在蓬勃起来。黄色工会的新的欺骗，亦层出不穷的积极进行，常常用假的领导来消灭工人斗争。一部分群众还对他们有多少幻想。必须深刻的估计到罢工斗争极大部分是自发的，党和工会对于罢工斗争的领导，还是非常薄弱。党和工会还缺乏有耐心的艰苦的准备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罢工战术与策略上的许多错误，使得个别的在赤色工会领导下的斗争不曾能够得到胜利结束。罢工经验的研究是非常的不够，争取黄色工会中会员群众的问题还没有郑重的提出。赤色工会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斗争，还是非常的不充分，它与工人群众的联系，还是非常薄弱。

反帝斗争吸收了新的千百万的群众参加革命斗争，从和平的请愿转变到剧烈的示威，与军警肉搏，捣毁国民党部与政府机关。广大的群众在几月来斗争的经验上认识国民党统治的卑鄙无耻与投降帝国主义，感觉到非推翻国民党统治与建立民众自己的政权不能够求得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要求政权、建立民众政权的企图，在广大的群众中成熟着，并有了初步的尝试（如民众法庭等）。但是这个运动主要的还建筑在学生群众身上，工人群众还没能够成为反帝运动的主力，因之运动还缺乏坚持性、顽强性与清晰的口号。党在这方面的工作不能够抓住一切群众斗争的领导，对于一切反革命派的斗争还是不充分，有些党部落在群众的后面，有时有些党部又害怕与学生群众间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作斗争，有些党部采用了不可允许的关门主义的政策，放弃反帝运动的领导（如陕西），一般的还不能够将反帝运动与工人群众的经济斗争亲密的联系起来。

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广大的农民与灾民斗争日益开展，抗租抗税、抢米分粮、捣毁国民党的政府机关及游击战争，是这些斗争的形式，甚至发展到地方暴动，占领县城（如长乐）。

士兵的斗争哗变是同样发展着，二十六路军全部（二万余人）投入红军，各地零碎部队的投入红军与哗变，都证明了土地革命的开展，影响着反革命的军队崩溃与瓦解。同时党在农民群众及士兵群众中的工作，还是非常的缺乏，甚至还剩留着机会主义的消极。

（五）红军与苏维埃的胜利的开展，国民党统治区域中高涨着的工农革命斗争，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冲突与互相间的把戏花样，将四年来统治中国、出卖中国、压迫劳苦群众、屠杀劳苦群众的军事独裁者——蒋介石的政府推翻了。继起的新政府，国民党各派的联合政府（这里面，蒋介石派依然占有重大的影响），依然是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在阶级的实质上，对内对外的政策上，当然不会有任何的变更。新政府中亲日势力的优势，将使它更迅速地完全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屈膝匍匐于日本帝国主义强盗面前。同时这一政府只是不稳固的暂时过渡的政府，各派军阀及其幕后的帝国主义者正在积极的准备着新的军阀战争——这个战争是被全国的反日的怒潮与红军的胜利所阻止着。

在目前形势之下，国民党的破产已经是铁一般的事实。广大的群众认识了国民党的统治卑鄙无耻的投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民族武断宣传与欺骗已经不能使广大的群众相信了。在这种情形之下，一切反革命的在野派别都积极起来，改组派的“国民救国会议”，江苏耆老的

"困难救济会",第三党的"和平政府",托陈取消派的"召集国民会议实现民众政权",所有这些主张，他们一致的作用，是帮助国民党来维持它的统治，来使群众不去反对与推翻国民党统治，而向国民党去"官民合作"。在革命危机迅速成熟的时候，这些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

(六)估计着目前形势，必须指出：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变动了，这个变动是有利于工农的，有利于红军苏维埃的。国民党各派的力量都削弱了，相反地，工农与苏维埃运动的力量是增长了，强固了。红军成了极大的坚固的力量，苏维埃政权统治了几千万人口的区域。红军与游击队的发展，造成了包围南昌、吉安、武汉等重要的与次要的大城市的形势。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扩大苏区，将零星的苏区联系成整个的苏区，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是放到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上面了。为着实现这个总任务，党必须更进一步的巩固工农红军，巩固苏维埃政权及其临时中央政府，执行正确的以工农革命利益出发的土地、劳动、经济政策，用一切力量开展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中的工农革命斗争，加紧反帝运动的领导，加紧对工人自发的罢工斗争的领导，将工人组织到赤色工会中去，争取黄色工会的会员群众，发动领导农民与灾民的斗争，瓦解反动军队与争取士兵群众。

(七)在苏区方面：(1)工农红军的行动必须更加积极起来，更加互相呼应的行动，依据现在的成功开展着胜利的进攻。必须依照中央最近的军事训令来努力求得将中央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赣边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结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在大江以北，应以鄂豫皖区为中心，而将皖西北、鄂东、鄂豫边、湘鄂西苏区联系一起，造成威胁武汉、长江上下游及平汉铁路的形势。胜利的进行革命的进攻，要求我们要来巩固红军，加紧红军战士的政治训练，改善红军的成份，动员城市的无产阶级到红军中去，提高红军战士的积极性，并在这个基础上消灭一切反革命派的破坏红军的阴谋。(2)土地问题的正确的解决，在提高劳苦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上，在保证苏维埃运动的胜利上有决定的意义。绝对不允许以强力及苏维埃的命令，强迫进行平均分配一切土地。平均分配一切土地必须用发展农民自己的组织创造力与毅力来进行。保护雇农、贫农的利益，反对富农，顾及到中农群众的利益，是党在平分土地中领导的原则。不得中农的同意，不能够更动他的土地。党必须坚决地进行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苦力、雇农、贫农与中农。富农（大多数是封建的剥削者）的土地亦在没收之列，但是在他自己耕作的条件之下，他可分得一部分坏的"劳动分地"。(3)一切经济政策、租税政策上的过早或妨害基本农民群众利益的办法（如鄂豫皖、赣东北的高税率与不坚决执行免除贫农一切捐税，赣东北的组织苏维埃农庄的企图等)，应该立即纠正。(4)坚决的改造下层苏维埃机关，坚决进行肃反工作，肃清阶级异己的分子，发展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来进行苏维埃的建设。建设苏维埃机关的一切日常的工作是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必要方法。(5)一切忽视改善工人生活，对于执行劳动保护法的忽视，将给阶级敌人以很大的帮助，而妨碍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巩固。对于创立苏区中的群众的赤色工会工作之迟缓是一刻也不能忍耐的了，必须立即派选得力的干部来进行组织工人阶级自己的阶级工会的工作。

(八)在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党的责任是开展一切群众的斗争，领导一切群众的部分的日常的经济的斗争，领导反帝斗争走向总的向国民党统治进攻的道路中去，以响应配合红军的

行动，来争取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这里第一等的任务，是用最大的力量去开展城市工人的罢工斗争。只有工人阶级罢工斗争能够给反帝运动、城市贫民与失业工人斗争以坚定的信念，不折不挠性与革命顽强性。因之，党在工厂中间的工作，在黄色工会会员中间的工作，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来得急切。小心的准备一切工人阶级部分斗争，领导一切工人自发的斗争，组织与准备工人群众的年关斗争，发展赤色工会，争取黄色工会的会员群众，组织工人选举的罢工委员会并转变为工厂委员会，组织失业工人与在业工人共同的斗争委员会，组织工人纠察队，吸收失业工人参加，这是目前的主要的任务。自然必须将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善于引导与联系到反帝的斗争，拥护红军与苏维埃的斗争。一切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党的工作的中心，应该集中到工厂去，到工会工作上去，到领导罢工斗争上去。

党必须抓紧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断暴行，法国及其他各国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行动（法国的侵入云南，英国的占领西康等），及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如不抵抗，订立中日密约，三井借款等）来开展群众的反帝斗争的新的阶段。各级党部应该在实际工作中坚决地勇敢地去实现国际最近加紧领导反帝运动的指示。在一切宣传鼓动之中，加紧去揭破一切国民党的出卖民族污辱民族，加紧去揭破一切反革命派的实际上帮助国民党维持它的反革命的统治。广大的宣传民众革命的民众政权的口号，使广大的群众了解只有苏维埃政权是真正民众政权。党和苏维埃政权应该号召民众武装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来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争取中国的独立和统一，并再告诉群众，推翻勾结帝国主义的国民党政府，是求得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

更进一步的开展反帝斗争，到处在工厂中，学校中，兵营中，街道上组织群众的反帝组织，并创立每一个城市的反帝代表会，组织反帝的示威，争取反帝示威自由。加紧的反对一切在野的派别，在组织上巩固党的政治影响的开展，这是党在反帝运动中的中心任务。

对于一切灾民的抗捐抗税的斗争，士兵的斗争，党应该加以坚决的领导，一切对于这些工作的机会主义的消极应加以最严厉的打击。党应该站在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群众斗争的领导地位，应该发展这些斗争来破坏国民党政权，来拥护和援助红军的行动，组织这些斗争成为响应红军的胜利的进攻的浪潮。

在组织上巩固党的组织，准备党的组织与党员去迎接行将到来的伟大的阶级决战，是十分重要的。这里必须加强党员的政治教育，提拔新的工人干部，考查教育旧的干部，特别应该注意到敌人的破坏党混入党的阴谋，而严密党的组织，同时应该广大的征收工人农民及一部分贫苦的革命学生到党内来，改善一切党的组织的领导的方式，一切问题集中到支部去，改善支部的生活，建立在工厂作坊中的党的堡垒。

（九）为着执行党面前的战斗的任务，争取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必须无情的坚决的进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右倾机会主义仍然是目前革命的危险，这种倾向在现在表现在对于目前革命危机紧张的估计不足；对于红军行动的消极，悲观失望的胡说红军涣散，不愿意利用顺利的形势开展进攻的斗争，以昨天的正确的策略，当做永远不变的教条；对于工会工作的消极，忽视工人的经济斗争，认为工人斗争在经济恐慌之下是不可能的；在反帝运动中作国民党各派及其他各派的俘虏等。应该集中火力来反对右倾。“左”的倾向危险，由于革命危机迅速成熟，亦逐渐的增长起来，和立三路线复活的企图（如主张号召上海的一天的总罢工，放弃在黄色工会中艰苦的争取它的会员群众工作，而主张小部分工人自动退出黄色工会等），

对于这种倾向的斗争一分钟亦不能放松。应该反对一切口头上承认决议案的正确而实际抵抗或不想一切的方法去执行决议案的两面派的态度。艰苦的布尔塞维克的工作，发展自我批评与深入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中央坚信各级党部的同志，必定能够完全实现这个决议，而确立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

（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

中国苏维埃与中国红军的伟大胜利，反帝运动的急激发展，工人运动反攻与进攻的浪潮的高涨，与全中国千百万农民、灾民与兵士群众的革命斗争，使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日益走向崩溃，使中国的革命危机更加成熟，并且把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的任务，放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上。同时帝国主义列强，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正在用他们的武装力量瓜分中国，积极的企图着把中国从苏维埃的“洪水”中，拉到完全殖民地化的道路上去。

在全中国阶级斗争这样紧张剧烈的时候，帝国主义国民党以及一切拥护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反革命派别，更加疯狂般的向着中国唯一革命的唯一领导目前中国革命运动到胜利的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进攻。他们不但用白色恐怖破坏我们的组织，逮捕与屠杀我们的同志，而且在思想上，利用种种造谣污蔑的手段，利用一切他们公开的报章杂志，利用中国共产党内的叛徒托陈取消派与罗章龙右派等向我们进攻。因为他们很明确的了解到不消灭发动、组织与领导全中国千百万工农群众做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斗争的共产党，他们的灭亡是必不可免的事。

在全中国阶级斗争这样紧张剧烈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正在动员全党的同志，发动、组织与领导全中国千百万的工农群众向着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做积极的进攻。中国共产党自从四中全会之后，克服了立三路线，粉碎了罗章龙所领导的右派小组织，在执行四中全会的国际路线中，巩固了党内布尔塞维克的统一与团结，改变了党内的成份，巩固与扩大了中国的苏维埃区域与红军，领导了白色区域工、农、兵士、灾民等广大的群众斗争与反帝运动。这些成绩使中国共产党能够更有阵地的向着统治阶级与一切反革命派别进攻，更有力量的打击党内一切机会主义者，更广大的发展自我批评，更彻底的转变一切我们的工作方式，使我们的党更能适应目前的革命环境，更能顺利的去实现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战斗任务！

拿革命的进攻，去回答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以及一切反革命派别对于革命的进攻，这是目前中国革命危机中革命与反革命在决死斗争的过程中的中心特点。

然而这种特点，还没有能够为中国共产党内的全党同志所了解。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与反革命的武断宣传，不能不影响到了我们党内一部分最不坚定的同志，使他们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估计不足，对于党所提出的许多中心任务发生机会主义的动摇，以至走到悲观、失望、消极、怠工的道路上去。这类机会主义的动摇，对于中国党实是目前最大的危险。因此同这类机会主义的动摇做斗争，实是中国党完成目前它的中心任务的先决条件。而且只有最坚决、

无情的反对机会主义倾向的斗争，才能使全党同志更能清晰的了解我们的任务，为这些任务的实现而斗争。

从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中心任务出发，来检查我们党内的思想，那我们立刻可以发现非常严重的机会主义思想，在许多地方障碍着国际与中央路线的执行。这种思想，主要的表现在对于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估计不足，即表现在对于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估计，虽是有时这种机会主义在"左"的词句的掩盖之下。

在世界革命方面，右倾机会主义最明显的表现在对于目前两个世界的对立，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对立了解不足。我们的有些同志不了解："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地猛烈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超过资本主义制度的优点，从没有像现在暴露得这样鲜明"(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决议)。这些同志也不了解，两种制度间这个天天生长的矛盾，现在成了国际关系的核心，影响到帝国主义世界许多矛盾进一步的发展。因此我们的同志不能了解："资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世界间、资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间各种矛盾的发展，极端地加强了武装进攻苏联的危险"(同上)。因此我们的同志放松了动员广大群众拥护苏联的战斗任务。

譬如满洲事变之后，山东省委认为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遭受美国的重大打击，自然要企图培植军阀以与美所御用的南京政府相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眼见着华北固有的势力被美帝国主义日渐削弱，眼见着自己所养的军阀被蒋系所打倒，在这种无可忍的当儿，便不能不御驾亲征了，便不能不揭破一切面具，向南京政府及张学良开战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宣传大纲"四月三十日)。

山东省委在这里一句话也没有说到日本占领满洲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帝国主义的进攻苏联，因此山东省委也无法说明，为什么在日本占领满洲的开始时，各帝国主义表示了一致的赞助与拥护。因为看不到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危险，所以山东省委在拥护苏联的工作上表示了机会主义的消极。

河南省委从锦州失陷一直到上海事变，在一切决议上，无数次的提到"帝国主义强盗战争已箭在弦上"(见省委二月为上海事变及宁政府迁都决议)，但从没有一字提到"在反对苏联战争的准备上，在将满洲造成反苏联的军事根据地上，在掠夺中国民众压迫中国革命运动上，帝国主义是一致的"(见中央关于争取革命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不但如此，而且在省委"检查过去反帝工作决议"上，对于省委在满洲事件的通告中关于"日本武力占领满洲……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有计划有准备的实行侵占满洲、进攻苏联、压迫中国革命的开始"的分析，反认为是错误的。

中央苏区中央局的负责同志在"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中，认为"日本出兵占领奉天、长春、厦门、烟台是为着威吓张学良反蒋，同时取得在华的根据地"(见泽鸿给中央报告)。同时这个负责同志还说："从去年十一月起，世界状况已有一个转变。帝国主义内部恐慌，已达极点，世界大战就要爆发，结果是无产阶级要起来革命；在这一情形下，敌人是无法进攻苏联和革命的"(见三月二十七日均鹤给中央的报告)。从这许多例子上分明的看出，我们的同志对于目前两个世界的形势如何的了解。他们只看到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看不到目前"国际关系的核心"是两个世界的对立，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是动摇世界资本主义制度，与推进世界革命的最有力因素；看不到苏联是世界革命的领导者与组织者；因此不了解目前帝国主义反苏联战争的危险，是最主要的危险，不了解帝国主义者正在加紧准备反苏

联的战争中，找求着他们内部日益生长着的矛盾的解决与出路。

对于两个世界对立的不了解，也就是对于世界革命的估计不足。这种机会主义的估计，必然会发生对于苏联的力量的不信任，不相信苏联在世界帝国主义的包围中，会胜利的走向前去，以至对于世界革命的前途消极悲观。这种估计，也就是使得我们党内一部分同志不了解共产国际所放在各国共产党前面“拥护苏联”的战斗任务的意义，对于这一任务，采取消极怠工的态度。这种消极怠工，不但在山东、河南、中央苏区等地表示出来，而且在其他的地方，也有同样的危险。请问不同这种倾向做斗争，不使全党同志明晰地了解目前国际关系的枢纽在那里，这一工作的转变，是可能的吗·

对于中国革命右倾机会主义的观念，是对于中国目前两个政权的对立的不了解或估计不足。我们的同志还不能了解或不很了解，国民党政府是在迅速地走向崩溃与死亡，苏维埃政府，是在迅速地走向巩固与发展。我们的同志不了解，或不很了解：

“在中国，革命危机表现于苏维埃与红军的组织，他们的领土内，有千百万的户口，因此中国是站在殖民地民族革命运动的前线……从土地革命中产生出来的苏维埃与红军，正在以苏区的具体经验，引起产业中心的工人与农民群众来加入斗争，没收地主的封建财产，分配土地与农民，消灭反革命国民党刽子手的政权”(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决议)。

“全国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的建立，给苏区与非苏区的革命运动以总的领导，更能顺利地实现无产阶级对于农民土地革命的领导权”(中央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

中国苏维埃政府的存在是中国革命危机的主要标志，苏维埃政府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与组织者。所以工农兵政权与地主资产阶级的对立，是中国革命的主要特点，在中国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上与相互关系上有决定的意义。不了解目前中国革命形势的这一特点，必不能了解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主要原因，是进攻中国革命，尤其是对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进攻的一致。

就是因为这原因，山东省委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完全是为了日美的冲突，同中国苏维埃运动没有丝毫关系。还有其他省委或多或少都犯有这种错误。甚至有些同志，如像中央职工部的负责同志，认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满洲，不是由于中国革命的发展，而是由于中国革命的失败。满洲省委在二月二十五日国际失业工人运动决议上，也只是说：“今年二七纪念与二月二十五日国际失业工人斗争日，正在日帝国主义占据满洲，继续扩大残暴行为，各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加紧进攻苏联。”而没有一句话说到帝国主义对于中国革命的进攻。中央苏区在他们去年十一月党大会所通过的政治决议案中，没有一句话讲到帝国主义对于中国革命尤其是苏区与红军的进攻问题，似乎帝国主义对苏区是没有关系的。

对于两个政权的对立的不了解，也必然会发生这种机会主义的估计，以为国民党军阀内部的战争，是无法免除的，以为三次“围剿”失败之后，国民党决不敢再向苏区与红军实行进攻。犯这种机会主义的同志，不能了解：虽是国民党军阀内部的矛盾是无法解决的，但是他们决不因为他们内部矛盾的紧张，而停止他们对于苏区与红军的进攻，而且恰正相反，他们正因为苏区与红军的发展与巩固，所以他们正在“团结一致”向苏区红军进攻，在加紧他们对于苏区与红军的进攻中，找求他们内部间矛盾的暂时解决。

在三次革命战争之后，中央苏区的负责同志认为：

“三次革命战争是反革命的国民党军阀向苏区红军的进攻，我们是防御战，今后是我们进攻敌人，所以提出四次革命战争是不正确的。”(见泽鸿报告)。

这类估计，当然很值得我们惊奇的，因为这里面丝毫马克思主义也没有。这种估计没有法子使我们动员千百万工农群众在苏维埃的周围，使我们能够在同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新的血战中得到新的胜利。也就是因为这种估计，所以使中央区的同志从容不迫的去打“土围子”，而把扩大红军与改造红军等的中心任务放在脑后。

很明显的，这类估计实际上是对于中国苏维埃政权估计不足，也正因为这一原因，所以不能明晰的了解两个政权的对立，在中国革命中有何等重大的意义。陕西省委在过去曾经“号召全党，号召群众，说工农红军在第三次围剿中，受到了暂时的挫折和部分的失败，苏维埃运动已经到了严重的关头”(见省委十二月政治决议)，表示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没有丝毫的信心。广东省委在十二月十日“反日本帝国主义运动目前阶段中的任务”的通告上，简直没有一个字提到扩大广东的苏区与红军，以为这是广东党所不值得注意的问题。甚至在中央宣传部最近所印出的“上海三次暴动五周年纪念宣传大纲”上，在列数“无产阶级领导一般劳苦群众的当前任务”中，也没有提到巩固与扩大中国的苏维埃政权这一中心任务。

这类机会主义的观点，当然不能动员全党同志，去为了扩大与巩固中国的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去动员千百万的工农劳苦群众起来拥护苏维埃与红军，反对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对于苏区与红军的新的进攻，把这一工作当做我们党目前的战斗任务。

在另外一方面，对于另一个政权，即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的反革命政权，许多地方表示了过分的估计。在疯狂般的白色恐怖前面，在国民党调动数十万军队向鄂豫皖苏区与江西苏区实行新的进攻的前面，我们的有些同志就对于革命力量表示了怀疑，对于苏维埃与红军缺乏信心，以至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对于党的任务消极怠工。

一些同志，不能了解或不愿了解：虽是国民党这样残酷，这样积极的向着革命，尤其是苏维埃与红军进攻，然而这种进攻，同去年三次“围剿”时已经大不相同了。中央在“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上，很清楚的写着：

“估计着目前的形势，必须指出：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变动了，这个变动是有利于工农的，有利于红军与苏维埃运动的。国民党各派的力量都削弱了，相反地，工农与苏维埃运动的力量，是增长了，强固了”。

全中国的大水灾，国民经济的总崩溃，反帝斗争的普及全国，工农兵士斗争的开展，苏区与红军的伟大胜利与发展，中国共产党政治影响的扩大，对于国民党当然有绝大的影响。国民党在广大民众前面的“威信”已破碎得不堪了。国民党以及其他在野反革命派别的欺骗宣传的范围，是大大的缩小了。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完全宣告了破产。甚至国民党政府所依靠的武装力量，经过这样激变的时期，也在急速动摇崩溃的过程中；整连整营整师以至整军（二十六路军）的叛变，投入红军，已是经常有的事。

国民党对于中国革命对于苏维埃与红军的进攻，是愈加感觉得“棘手”与困难了。然而这愈是使它疯狂的利用白色恐怖与血的屠杀来压迫革命运动与进攻苏区和红军。也正是因为国民党的崩溃，因为它表示出消灭中国革命运动，中国的苏维埃与红军的无能，所以帝国主义加速的瓜分中国，“促使帝国主义从隐藏的武力干涉（供给反革命军队以军火军费与军事顾问等等）转变到直接的公开的武力干涉”(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

在白区对于统治阶级力量的过分估计，对于这一阶级力量对比的辩证法的变动的不了解，是我们常见的事。我们从各级党部的文件中，可以找到不少的例子。这种估计只会造成对于目前形势的悲观失望，对党的任务的消极怠工，而在苏区，这种估计则造成了对苏区与红军

的取消观念，保守主义与等待主义。

我们在这里想把苏区的一些例子拿来，证明出我们的同志对于敌人的力量机会主义的估计。湘鄂西苏区的一部分反对中央分局的布尔塞维克领导的潘家珣与万涛同志，他们认为在敌人猛烈进攻苏区的情形之下，必须缩小红军，将红军化为地方武装，化为游击队，把红军的向外发展看成逃跑右倾，而把巩固苏区看成"庸俗的保守主义"（见湘鄂西省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对于潘万两同志的批评）。鄂豫边的负责同志，在敌人进攻的情形之下，不去坚决的组织群众，给敌人以严重打击，却实行"总退却"，而且自己却不得中央与边特的同意逃跑到上海。赣东北苏区的一些同志在敌人堡垒政策之下，表示张皇失措，主张红军主力避免与敌人作战。中央苏区在去年十一月党大会的决议案，对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中心任务，只是这样的写着：

"统治阶级为要挽救其死亡，正在企图团结与联合，以求一致进攻。反革命现在这种企图虽然没有达到，但是他们进攻苏区与红军的准备与计划是毫不放松的。不过反动统治内部的矛盾与崩溃，并不因此而消灭而减弱。而革命力量，一定能够战胜反动统治无数次的更疯狂更野蛮的进攻，而在这些无数次的革命战争的胜利中去完成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

中央苏区的同志似乎在这里讲到国民党的崩溃，讲到国民党的一致进攻，以至相信在无数次革命战争的胜利中去完成一省与数省革命的首先胜利，然而很明显的，中央苏区的同志在这里表示出了浓厚的等待主义，等待敌人的进攻，等待新的胜利。他们始终没有能够利用客观上的顺利环境去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他们把"巩固苏区根据地"当作符咒一样的去念，把消灭"土围子"当做巩固根据地的中心工作，以等待敌人的新的进攻，新的"坚壁清野"，新的"诱敌深入"与新的胜利。这种观点，实际上同样是对于反动统治的过分的估计所产生的。

不是没有原因的吧！中央苏区同志在他们的决议上，没有一句话讲到在国民党新的进攻苏区和红军中，帝国主义作用的扩大，在许多地方帝国主义准备用自己的武装力量向我们进攻。他们也不能了解，国民党正因为感觉到自己的力量的削弱，愈是公开无耻的投降帝国主义，把重要的中心城市，交给帝国主义共管，很明显的表示出了它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清道夫。

也就是对于反动统治力量的过高估计，使他们不能了解：

"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扩大苏区，将零星的苏区联系成为整个的苏区，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是放到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议事日程的上面了"（中央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

当然，在我们反对对于反动统治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估计时，我们还必须指出对于反动统治的一些"左"的估计。

满洲省委在"为反对国民党统一政府的宣言"（一月二十七日）中就说到"国民党各派的和平会议，全体会议与统一政府的成立，这是国民党统治中国宣告最后破产的一幕"，是国民党"企图挽救已经绝气的统治"。河南省委认为"怒潮般的反日运动当中，群众所得到的教训，以至最落后的群众都认识国民党各派、新月人权派、第三党等等的真面目，表示不满意了，最后的幻想已经绝望，都环绕在共产党的周围"（关于广暴纪念通知）。满洲省委甚至在二个月的工作计划上写着"在辽西、哈尔滨、东满、珠河，把工农代表会议建立起来，首先在辽西、

哈尔滨开始"这类荒唐到万分的条文。当然这些"左"的估计，并不阻止这两个省委对于目前的群众斗争表示悲观失望，放弃放在他们前面的许多战斗的任务。

就是鄂豫皖苏区省委在正确的了解中央决议的精神之下，也不免犯了对于国民党力量的"左"的估计。他们在今年二月七日省委会的政治决议案上说：

"国民党政府的迁都洛阳，一方面由于进攻苏区与红军的失败，已经成为帝国主义所斥逐的走狗，或者宁可说是降了级的走狗。不过降级都是地主资产阶级所欢迎的，因为在进攻苏区与红军的战场上，主要的火线，将由帝国主义所担任，而国民党洛阳政府与其他军阀政府只担任偏师的任务"。

这种"左"的估计，当然同我们上面所说的没有丝毫共同的地方。这种估计，会使我们看不到帝国主义利用国民党对于苏区与红军的进攻，看不到国民党军队在目前还是我们正面的敌人。这必然会使我们放松反国民党的斗争。

然而目前的主要危险，是对于国民党统治过分的估计，与对于革命的力量估计不足的右倾机会主义！

在我们党内现在特别严重的问题，是在民主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对于这问题，不论在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方面，不论在土地革命方面，我们的一些领导同志没有明晰的了解，甚至根本忽视这一问题，而实际上这一问题正是中国革命问题的中心的中心。

如若我们研究一下，为什么自从"九一八"满洲事变起一直到现在止，我们的反帝工作，没有得到应得的成绩的中心原因，那不能不指点出这是由于我们党内许多负责同志，还不知道如何利用这一反帝斗争去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我们的许多同志或者是在"争取公开"的名称之下，做国民党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尾巴，或者是在"左"的口号之下，根本放弃这一工作，采取了消极怠工的关门主义。在中央"为上海事变给各地党部的信"上也曾经这样说：

"在各地的反日工作中，我们很明显的看到两个不能容许的极端：或者是完全的关门主义，不能参加任何反日运动；或者是所谓完全'公开主义'，变为国民党的俘虏。譬如陕西省委，过去对于反日运动完全消极，后来改正了这种错误，但却转到另一极端，使我们的反日运动，变成了和平公开运动。再譬如四川省委，当广大群众起来反日时，我们主张反帝不反日，但后来自知错误，即另趋极端，组织'援马委员会'，要求国民党政府的保护，并且在刊物上表示愿同国民党合作"。

满洲省委在满洲事变发生以后，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而不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对于"民众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海陆空军出境"的口号一字未提，对于蓬勃发展着的东北义勇军更是不闻不问，更说不上组织东三省各重要罢工。江苏省委，对于反日罢工、义勇军的组织以及抵货运动等也表示消极怠工。广东省委，公开在"两广实话附刊"上发表"反对救国义勇军、学生军等的组织"，认为抵制日货"是消极的不中用的方法，而且一方面必然要扩大英货的市场，是英国最得意的一件事"（白希同志十月十五日为广西工作来信）。此外河北省委、山西省委也有同样的观点。山东省委甚至把铁路支部一个工人同志开除，因为他提议组织工人义勇军。

很明显的，我们的同志还没有了解深入到各种形式的反帝运动中去争取反帝运动的领导，用一切力量组织反日罢工与武装工人，使工人阶级成为反日运动的骨干。对于中央很久以前所提出的"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出境"，"以民族革命战争争取中国

民族的独立解放”的反日的中心口号，表示怀疑与动摇，甚至对民族二字表示畏惧。一直到现在，在各省的文件上与工作上，这一口号还没有成为动员群众与组织群众的中心口号。这些同志还没有了解到争取民族革命战争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使无产阶级成为中国民族独立解放的领导者与组织者，是中国共产党在反帝革命中的中心的中心；他们不了解只有这一领导，才能使反帝革命扩大深入，才能推动中国革命运动到更高的阶段。

在苏区我们的党，对于这一问题，同样的没有明确的了解。在过去，苏区的党只知道土地革命，不知道民族革命。现在在有些苏区，像鄂豫皖苏区与湘鄂西苏区，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但是对于苏维埃是中国唯一反帝国主义的政府，工农红军是唯一反帝国主义的军队，只有苏维埃与红军才能取得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这一点，在很多同志中间，还是不很了然的。这里我们又可举出中央苏区的例子。在他们的政治决议案中：

“为着发展苏维埃运动，为着进行革命战争，必须加紧反帝运动及职工运动的工作。为要发展反帝运动必须坚决反对苏区只要土地革命，不要反帝运动的右倾观念。必须使全党认识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才可以保证土地革命的胜利。要利用一切反帝国主义的广大宣传与鼓动。最近要切实利用日本出兵占领东三省的事件，进行广大的反帝运动，并须在这个时间内成立苏区的反帝同盟的组织”。

这就是中央苏区对于反帝运动的全部了解！这里完全没有了解中国苏维埃是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者与组织者，是唯一主张以民族革命战争去保卫中国不受帝国主义的侵略的政权，是唯一主张以民族革命战争去争取中国民族独立解放的政权，虽是他们一般的指出了“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才可以保障土地革命的胜利”。这里，显然的，把争取民族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放到脑后去了。

苏区的党不但在反帝运动中忽视了无产阶级的领导问题，而且在土地革命中，也同样忽视了这一问题。几个苏区，如像赣东北苏区、湘鄂赣苏区、中央苏区等对于怎样保证无产阶级在苏维埃运动中绝对领导权的问题，可以说完全忽视，在分配土地上，中央苏区过去提出“分配一切土地给一切人”的观念，不用说是十足机会主义的观点，即去年八月的土地问题决议上的“绝对平均主义”也还是机会主义的。然而十一月的政治决议，却认为这一决议是正确的。在关于红军问题的决议上，没有一句话讲到保证在红军中无产阶级的绝对领导与工人骨干的问题。关于党内工人分子的吸收工人干部的提拔问题，始终没有注意。在苏维埃政府中工人成份的增加，以及苏区工人运动与工会工作的发展，完全表示了消极怠工。甚至在十一月党大会所通过的“苏区工会运动决议案”上这样说：

“现在苏区还不包括有大的中心城市，还缺乏产业工人。农村工人群众主要的是雇农、手工业工人和苦力”。

“苏区不断的在敌人包围封锁和残酷的战争中，经济受着极大损害，最大多数手工业停闭，手工业工人随之而失业。雇农在土地革命后都得到土地”。

照中央苏区的同志这样说来，他们过去完全忽视工会工作工人运动，是完全有理由的，因为他们那里根本没有工人。这些同志一方面根本不了解中国苏维埃运动是中国无产阶级所领导的，中国的苏维埃不是农民的苏维埃，而是工农民主专政，而是中国“无产阶级领导权，已经在国家政权的萌芽中巩固了起来”（国际十一次会决议）；另一方面，他们也不了解如何在发展工人运动，提高工人群众的觉悟程度与组织力量，提拔工人干部等工作中去巩固无产阶级在苏维埃中的领导。

在“共产国际杂志”去年十一月十一日社论上这样写道：

“中国共产党员愈明确的估计到现存政权的阶级基础，则中国共产党对于苏维埃的领导愈巩固，愈强健。在这个问题上的一切动摇，都马上要反映到苏维埃政权与红军的日常具体的政策上，而使革命受到很大的危险与破坏。所以中国共产党用如此强固性与坚决性去揭破了和揭破着立三同志的半托洛茨基的路线。李立三同志忽视了一种根本上重要的情形就是：苏维埃的一切革命办法，应从现存政权的两个阶级性之估计出发，应从运动现阶段上过早的社会主义的办法之不可容许中出发，同时应从巩固无产阶级在这个政权中领导作用，而有坚忍的有系统的有纪律的工作之责任之估计中出发（建立正式的工农红军，并有无产阶级的共产党的指挥骨干，在苏区的城市中组织工人代表苏维埃，在苏维埃专政的一切机关中有系统的提拔工人）。所以凡把中国苏维埃当做似乎只是‘农民’苏维埃或劳动者苏维埃等等的，也是同样的危险。这样把无产阶级融化在劳动者的一般群众中，这样把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加以抹杀……”

但是：

“如果指出这一点便心满意足，以至甚至连一分钟减弱为巩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而作的坚强的稳固的斗争，这对于中国共产党是极端危险的”。

这种“极端危险”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农民苏维埃”的观点，与对于民主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的忽视，在中国党内是分明存在的。不同这种机会主义倾向做斗争，中国革命将受到很大的损失，而且也没有法子使中国革命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向去。只有像猷新同志那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才会在“论革命转变问题”中，可以一句话都不讲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见“布尔塞维克”四卷四期)

同上面所讲的问题有直接关系的，即是对于目前工人运动形势的估计不足。中央职工部、全总以至上海工联的一些负责同志的言论与行动，差不多给了我们以最好的例子。

在去年十一月中央通过职工运动的决议时，中央职工部刘同志对于目前工人运动形势的估计，即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认为目前工人的斗争，是防御的与反攻的。刘同志等更认为在经济恐慌资本进攻的条件下，罢工不能得到胜利，罢工不容易发生，他们甚至说工人惧怕罢工。在中央职工部关于一九三一年职工运动的报告上，曾经这样说：

“资本家要与国民党帝国主义更加联合一致来压迫工人的斗争，更加采用一切的暴力与残酷的方法来镇压斗争的工人，黄色工会更与资本家国民党打成一片来破坏工人的斗争，因此使斗争遇着很大的困难。罢工的失败经常的威胁着压迫着要求斗争的工人。赤色工会还没有来得及准备群众的力量，去克服客观上所给予的这一切困难”(见“红旗周报”三十一期)。

“国民党资本家压迫和破坏工人斗争这一切的系统，是非常严密的，是从工人群众的内部与外部齐来的。在工人一方面如果不能击破资本家国民党这一切的进攻，使之失败，那斗争的胜利，就很难得到的。试问在工人群众一方面，在赤色工会一方面，是不是能够对付资本家国民党这一切问题呢？”(同上)

“资本家是什么都好，无产阶级是什么都坏”：这是职工部报告的全部精神。在“工会组织问题”上职工部刘同志更说到工人积极分子如何动摇畏惧，工人群众如何在斗争中胆怯与没有办法，如何“在胜利之后，切忌领袖个人的骄傲，并且还要注意到群众的骄傲”(见“红旗周报”三十二期)。

对于中国工人运动这种悲观失望的估计，当然会使这些同志所领导的全总与工联，走到

消极怠工的路上，当然会使这些同志，放弃组织罢工与领导工人的反帝罢工，并且使经济斗争政治化。这种观点，当然会使全总的党团书记鲁深同志觉得全国的“工作没有对象”，使工联的负责同志，感觉到“什么也没有”，以至工会工作深深的陷在机会主义的泥坑中间。

对于工人运动这种机会主义的估计，在各省也是同样的严重。这里最有趣味的例子是山东省委巡视员与铁路特派员李芳岐的争论。机会主义者李芳岐，虽是在他领导下面发生了津浦路与胶济路的罢工。然而对于他，这是“工人运动低落”的表现。但是在省委巡视员的结论中也同样的表示出对于工人运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估计。他说：“认为工人害怕，不敢斗争”，这自然是右倾，“不过在津浦路中，虽然现在正有斗争的可能，也有若干自动的组织，但这一铁路没有斗争的历史，群众受我们的政治影响很少。我们不要忽视了，要领导工人经济斗争革命化，没有广大群众围绕与拥护，那是很难可能的”。

不在领导工人的经济斗争中去取得广大的工人群众，去使斗争革命化，而是先要有了群众，然后能领导斗争。这不是很明显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吗？这种先组织后斗争的机会主义的观点，差不多在很多地方发现过。就是中央职工部的仲篪同志也有过这样的意见。

对于目前工人运动形势估计的不足，使我们的同志不能坚决的准备罢工，组织罢工与领导罢工，使我们的同志不能深入企业中去发展与领导罢工斗争，用最大的力量去建立工厂委员会与赤色工会，以及黄色工会中的革命反对派。这种机会主义的估计，使我们同志不能了解：

“罢工依然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的主要武器，罢工在整个的革命时代是无产阶级斗争的主要武器之一，罢工斗争在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有更重大的决定的作用与意义。无产阶级不仅以罢工这个工具来击碎资本对工人生活水平线的进攻，而且只有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才能给反帝运动，城市贫民的斗争，与失业工人运动以决心与革命的持久性”。“每一个经济斗争，每一个罢工，每一个群众发动，这在非苏区之中，不仅是进到组织群众的一步，亦就是进到武装暴动道路的一步，而是直接对于苏维埃区域的帮助”。因此“在我们赤色工会的领导者之中，流行的机会主义的观点，认为在经济恐慌之下，只能进行总同盟罢工或同盟罢工，而不能组织个别罢工与个别工厂的罢工是不会胜利的观点，是极端危险与极端有害的”(中央为职工运动告同志书)。

不同对于目前工人运动形势估计不足，以及在工会运动中各种机会主义的观点做斗争，党在工人运动中的工作的彻底转变是不可能的。只有这一工作的转变，我们才能保证工人阶级在民主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使斗争更有坚持性与组织性，使斗争走到更高的阶段，使我们的党真正变为中国工人阶级的群众的布尔塞维克的党！

最后我必须讲到对于中国革命不平衡发展的机会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在我们党内还有很大的影响。

这种革命不平衡论，在去年赣东北苏区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上，曾经这样说过：

“在目前整个赣东北群众斗争的发展中，还仍然有很大的弱点。最主要的，如城市与农村发展的不平衡，苏区周围如皖南、浙西、景德镇、鄱阳等处的农民运动，不仅没有达到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情形与程度，即使有些农民群众的斗争，亦多是自发的散漫无组织状态”。

照这观点看来，就是在赣东北苏区内城市工人运动与乡村的农民运动，赤区的农民运动与靠近赤区的农民运动都是发展不平衡的，而且这是赣东北苏区群众斗争中最主要的弱点。

这种观点，不但在苏区的党内，就是在白区的党内，也是同样存在的。一般的，大家认为城市的工人运动是落后于农民运动，北方的革命运动落后于南方的革命运动。这一革命不平衡论发展到极点时，甚至说上海沪东的一个纱厂工人运动，落后于沪西另一个纱厂，因此在上海工厂与工厂间的革命运动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上海工联同志）。

河北省委在反帝运动的决议案上，认为：

"华北反帝运动有很多弱点，主要的是没有取得工人群众的积极参加与领导，学生运动的反日斗争没有同工人农民的斗争很好的联系起来。学生群众的反日情绪，大部分只表现在'请愿'方面，未能不断的举行群众示威游行。反日斗争没有像南方那样激烈，未能很好的转变为反国民党军阀的斗争"。

陕西省委在去年十二月七日的政治决议案上说：

"目前有些区域内农民的武装斗争的政治客观条件是已经成熟了……同时我们特别要深刻了解目前农民运动还有许多严重的弱点，农民群众对苏维埃政权、土地革命的决心与勇气还没有的"。

依照这许多革命不平衡论专家看来，在北方决不能提出创造北方苏维埃区域的问题，因为北方的革命运动落后于南方，因为北方的农民群众对于苏维埃政权、土地革命的决心与勇气还是没有的。如若谁提出创造北方苏维埃区域的问题，谁就是立三主义者。

我们认为这类革命发展不平衡的理论，同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对于中国革命的了解，没有丝毫共同的地方。这种理论除了给机会主义的消极怠工以辩护之外，没有任何意义。

以为中国目前的工人运动落后于农民运动的观点，我们认为是完全错误的。这种观点，在苏维埃运动方面，必然要以为中国目前的苏维埃运动是农民的运动，中国现在的苏维埃是农民苏维埃。然而事实上，像"共产国际杂志"所说的：

"中国现在所存在的苏维埃（虽然他们还没有把自己的政权普及于国内的各个工业中心），无论如何，不能视为只是农民的苏维埃。如果这样看法，那么这无异于只看到现象的表面而已。这在一九二七年，中国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在政治上已经形成了农民的要求，规定了土地革命与反帝国主义革命的纲领，同时又提出了根本重要的口号，如要求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土地给农业工人、贫农和中农，然后进而（在苏维埃政权在中国决定一切的领土内巩固起来的时候）国有土地。无产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以及直接的派了自己最好的队伍为红军中英勇奋斗的部队，而集中了农民散漫的游击队，造成了和造成着红军中自己的工人的共产主义指挥的骨干，造成了和巩固着红军中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如果没有这种纪律，那么，红军也许不会有最伟大的胜利了。中国无产阶级经过自己的党而指导工农红军的战斗，指导苏维埃，而且在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中无条件的占有了大多数"。

只有反革命的取消派，才会污蔑中国的苏维埃为农民的苏维埃，与中国的红军为农民军，而不知道没有无产阶级在苏维埃红军中的领导，就不会有现在的苏维埃，现在的红军，就不会取得这样伟大的胜利。同时也只有反革命的取消派才以为只有城市工人阶级直接起来武装暴动之后，工人运动才算不落后于农民运动，而不知道中国革命的特点正表现在中国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群众把苏维埃政权从乡村推进到城市，从小的城市推进到大的城市。

可见以为中国工人运动落后于农民运动的观点是机会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同我们的观点没有丝毫共同的地方。

此外，这种观点在白色区域内，也完全是不正确的。在中央为职工运动告同志书中，这

样描写了目前中国工人运动的现状：

“中国无产阶级最主要的队伍（上海纺织工人、市政工人、印刷工人，唐山的矿工，天津的市政工人与纺织工人，河南的兵工厂工人，津浦与北宁路的铁路工人，外洋与长江船的海员，四川的盐井工人与纺织工人）都卷入于汹涌的罢工浪潮之中，在许多产业部门之中爆发了产业的同盟罢工（上海丝厂、招商局海员、唐山五矿），在别的一些部门之中正在成熟着（上海天津的纱厂与市政工人）。对于国民党政府机关资本家黄色工会的一致进攻，工人阶级正以自己的反攻与进攻来回答。罢工的浪潮粉碎了国民政府连一接二的禁止罢工的命令，冲破了警察的弹压与黄色工会官僚的破坏，而在全中国的重要产业中心与部门中震荡着。斗争带着极大的坚决性、坚持性与顽强性，常常转变到与警察肉搏与冲突。在某些罢工中，罢工工人甚至企图解除那些去弹压罢工的军队的武装（如吴淞永安等）。工人阶级依着自己的团结坚持与英勇，在许多罢工中得到了胜利或者部分的胜利（北宁路、唐山五矿等等），无情揭破了赤色工会中某些领导者的在经济恐慌之下罢工或一二工厂的单独罢工不能得到胜利的胡说的机会主义性质。在高涨着的罢工浪潮中，一切经济的斗争都带着极尖锐的政治性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在个别的城市中爆发了反日的总罢工（太原）”。

请问除了闭着眼睛胡说工人运动落后的反革命的取消派与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者，谁能说在白色区域内工人运动落后于农民运动呢？这种观点，必然会走到对于目前中国革命运动中无产阶级的领导问题发生怀疑，而向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与取消派投降。

至于说北方的革命运动落后于南方的革命运动，在一般同志所说的，是完全错误的。北方的工人运动，如像天津、唐山、北宁路、青岛等各大中心城市的工人运动不但不比广东、香港、武汉等地落后，而且超过，陕西、山东、河北等省的农民运动也并不比江苏、浙江的落后。当然，在目前，在北方，没有像湘鄂赣数省的那样的苏维埃与红军，然而，这种苏维埃运动也正在向着北方发展，并且红军二十四军曾经一度的在北方树起了苏维埃的旗帜。事实证明：“红军二十四军的失败，最明显的告诉了我们，不是在山西没有创造苏区与红军的客观条件，而是十足的机会主义的葬送”（中央三月九日给河北省委的信）。事实证明不是陕西的“农民群众对于苏维埃政权、土地革命的决心与勇气还是没有的”，而是陕西的党还没有决心与勇气去发展陕西的土地革命，去创造北方的苏维埃区域。事实证明，如果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不去向农民群众宣传苏维埃政权与土地革命，不去领导他们的日常斗争转变到夺取土地与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斗争，农民是不会单独的起来建立苏维埃政权的。

创造北方苏维埃区域的问题，现在是明显的提到全国党的前面，然而我们的同志却想以北方的革命运动落后于南方革命运动的不平衡理论来掩盖他们这一战斗任务的消极，想以我们党在领导革命运动中的主观弱点与错误放到客观的身上。

当然革命发展不平衡在全中国是存在的。但这种不平衡不是在于工人运动落后于农民运动，北方落后于南方，如像那些托洛茨基主义者与机会主义者所说的；而主要的表现在有些区域已经有了苏维埃与红军，而有些区域还没有。但是这种革命不平衡的产生，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封建割据的状态，是因为帝国主义列强对于中国各地的势力和特权，是因为中国各部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而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党的基础与党的领导。譬如赣东北苏区附近农民群众还没有在苏维埃旗帜之下起来斗争，红二十四军的失败，以及北方还没有苏维埃与红军等，这许多不平衡事实的基本原因，当然不是由于客观条件，而是由于我们党的主观力量薄弱与机会主义的错误。

立三主义者根本不顾一切客观的与主观的条件空喊暴动，如山东省委同志空喊创造山东苏维埃，而放弃工人、农民、灾民与士兵的工作，即为最好的例子；而同时有些同志想以“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来解释他们自己的消极怠工，这在表面上虽同立三主义者的“左”的盲动相反，但其为机会主义则一也。布尔塞维克指出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原因时，首先就应该指出党的正确的领导与正确的策略是消灭这种不平衡的主要原因。马克思曾经说过：“我们不但要认识这个世界，而且要改造这一世界”。这种革命者的精神，当然同一切机会主义者没有丝毫共同之点的。

不同那些托洛茨基主义者与机会主义者的革命不平衡论做斗争，我们对于苏维埃与红军，对于中国革命运动，就不能有坚强的信心；我们就不能动员一切力量去发展、领导与组织工农兵群众的革命斗争，配合已有苏区与红军的发展去创造新的苏区与新的红军，而只有等待革命的条件的自然成熟了。

对于上面这许多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的机会主义的动摇或不了解，无疑的是妨碍我们党动员全党同志与千百万群众去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的战斗任务的主要危险。不同这些“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尤其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开火，我们的党决没有法子去完成我们在目前中国革命危机中所负担的重大责任。

同时，为得要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为得要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使斗争深入到全党同志中去，我们也必须同那些对于机会主义的调和主义或者像斯大林同志所说的“腐朽的自由主义”做斗争。

对于倾向的自由主义或调和主义在我们党内是非常严重的。在我们不少同志中间，往往缺乏一种对于倾向的仇恨与同倾向斗争的积极性，以为一点点的小错误是可以马虎过去的。这种倾向发展到极点，就是对反革命分子的调和与自由主义的态度。譬如北平同志甚至与取消派反革命分子做朋友，上海党内团内也有同志以为托洛茨基主义在理论上是还可以在党内讨论的东西。鄂豫皖苏区曾中生同志的自由主义，曾经造成了红四军的整个反革命的组织。

这种对于倾向的调和主义与自由主义，就是我们中央党报的编辑同志与宣传部的一些同志，有时也不免表现出来的。像猷新同志的“论中国革命转变”的文章，包含有许多严重的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甚至有些地方偷运了托洛茨基主义的私货，而布报的编辑者，却“马马虎虎”的把它发表出来了。贯雷同志的世界经济恐慌的小册子上也有严重的政治错误，甚至有些地方偷运了立三主义的私货，然而我们却不加任何注解，而把它出版了。此外有些含有个别错误的一些文章，我们也没有能够加以详细的审查，而把它们发表了出去。这种现象当然绝对不能再行继续下去！

为得要使全党同志对于中国目前的任务有明确的了解使他们为了任务的实现而斗争，我们必须绝对不调和的同一切这些机会主义的倾向做斗争，在斗争中教育同志，提高同志的理论水平与警觉性，以巩固党思想上的布尔塞维克的一致，使我们党能够领导全中国千百万的群众向敌人实行胜利的进攻。

苏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

（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一日）

（接受中央关于这一运动周的指示信，关于红五月运动的决议及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信的决议案）

中央局完全同意和接受中央关于红五月运动的决议（已油印发出），中央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指示信与中央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信（以上两个文件登在实话第四期）的全部指示。中央这一切指示完全证明了中央局自去年三次战争胜利以来对于目前政治形势的估量，犯了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这种错误主要表现在：由于对目前革命形势估量不足，对敌人溃崩的形势估量不足，过分的估量了帝国主义相互间的矛盾和冲突，以为太平洋上帝国主义战争将要“一触即发”，忽视了帝国主义反苏联战争的主要的根本危险，更不认识，从满洲以至上海事变以来，帝国主义是在武装瓜分中国的进行中执行了以武力直接干涉中国革命的任务。

还在去年苏区党大会以前，中央局对时局宣言上，便认定帝国主义“大战的危险有一触即发之势”（宣言），更错误的还在认定“日本出兵东三省，便是帝国主义为重新瓜分中国重新分割一切殖民地而战争的开端”（宣言），而根本不认识更主要的还在为的进行反苏联的武装干涉，为的武装干涉中国革命，来反对中国民众。苏区党大会政治决议案虽指出“日本占领东三省，固然使日美英各国间的冲突加烈，同时目前战争主要危险——反苏联战争的危险，更是日益逼近”（决议案），然而却没有一句话提到日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是要将它完全殖民地化，是武装瓜分中国，是“由暗中进行的侵犯转为公开的战争，来反对中国民众”（共产国际杂志三十一期社论，见实话三期），在任务上更没有一句提到动员群众拥护苏联，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今年二月中央局政治决议案及反帝示威决议，根据上海事变，又认定“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大战，将要一触即发”（政治决议案），根本不认识目前时局的重心是“反苏联的武装干涉的准备现在是在更大的战线上进行着，并且先用反中国的武装干涉方法实现着”（共产国际杂志社论，见实话四期），所以对于帝国主义指使中国军阀摧残中国革命，竟从“为要顺利的进行他们中间的战争”（政治决议案）出发，而没有从为要解除他们的经济危机，“为的是远东造成苏联与苏维埃中国之间的分裂，为的进行反苏联的武装干涉，为的瓜分中国”（共产国际杂志社论，见实话四期）出发，对于帝国主义直接公开以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特别是

苏维埃与红军，看着是帝国主义战争爆发后的事，而根本不认识“中国工农革命运动与帝国主义者的武力之广大武装的冲突的整个历史阶段还在面前”(中央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决议)。

这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由于对目前革命形势估量不足，与对反革命力量过分估计，不认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地猛烈发展”(国际执委十一次全会决议)，没有充分估计从满洲事变起，反苏联战争的危险的全部实在性，不了解中国目前两个政权（工农兵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对立的尖锐是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革命发展已经直接威胁了动摇了帝国主义的在华统治，并且苏区已经脱离了帝国主义的羁绊。不认识中国“目前革命危机所由开展的环境中之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国际帝国主义的作用之加强”（共产国际杂志三十一期社论）。不了解“反苏联战争的准备，瓜分中国，直接的公开的压迫中国革命运动，是目前帝国主义国际的策略之中心”(中央：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决议)。

目前事变的发展，更加证明了国际与中央分析的完全正确与中央局估量的绝对错误。

由于资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世界之间的基本矛盾从没有像现在极端的尖锐和紧张，由于资本主义各国企图在进攻苏联中来脱出经济危机，由于资本主义与殖民地各国革命运动强有力的高涨，由于满洲事变所增强的反苏联的挑战性，都使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苏联的进行，进到新的严重的阶段。现在日本在北满的积极活动，满洲傀儡政府向苏联的挑衅，日本武装起来的白俄在苏联边境的扰乱，日本参谋部关于在远东建立白俄“中立”国的计划的泄漏，上海“和平谈判”的结束，日内瓦军缩会议与伦敦四届会议在幕后的活动……都是表示帝国主义强盗在要把旧世界的一切力量团结为一，疯狂般的进行反苏联的武装干涉，而以日本为苏联大战中的远东先锋队。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强盗自满洲事变后，虽然在他们内部为着分配中国的富源与争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上发展着极尖锐的冲突和矛盾，但在牺牲中国民众利益，压迫中国革命特别是进攻苏维埃红军与苏联的一致基础上，是求得了他们共同的协调。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在满洲的屠杀、轰炸、焚烧与直接的摧残中国革命民众的武装反抗，是得到一切帝国主义的同意和赞助的。国联调查团的来华与上海条约的议定，将更进一步的瓜分中国，现在全国各大中心城市与口岸，都集中了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武装力量，单单在漳州附近的厦门便集中了帝国主义军舰二十八只，这证明帝国主义公开直接的侵犯来反对中国民众的战争，不仅在满洲在上海激烈进行着，并且要进到公开直接的进攻苏维埃与红军。

一贯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各派军阀政府。自从去年三次“围剿”苏区与红军惨败以后，虽然反映着各派帝国主义的矛盾、军阀制度的矛盾与地主资产阶级各派的矛盾而日益分崩离析，但主要的却在尽力企图和缓他们内部的冲突来对付革命，一致的祷祝和鼓吹反苏联战争的爆发，听命帝国主义强盗执行出卖中国，镇压全国反日反帝的革命斗争，特别是进攻苏维埃与红军的指令，以与帝国主义强盗行为相呼应，以做挽救他们死亡的挣扎。现在国民党军阀政府已经签字于出卖上海、出卖民族利益的“休战协定”。对于全中国革命斗争正在继续施行镇压，对于苏维埃与红军，正在调集新的军队，对中央苏区对鄂豫皖对湘鄂西以及对一切苏区进行“全线的新的总进攻”(中央给各苏区党部信)。只在中央苏区周围便调动了二十三师，而这些苏区正是已经脱离了帝国主义羁绊的地方。

所有这些，更加强了中国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的反帝反国民党的革命斗争与工人罢工运动的有力高涨，而苏维埃与红军更不断的得到新的胜利和大的发展（最近鄂豫皖红四军团得到

了空前的大胜利)。现在上海民众已因国民党政府签字于出卖上海和约而痛殴郭泰祺(国民政府外交次长),这将引起全国反帝高潮更大的爆发;工人的罢工运动开展了苏维埃与红军不断的胜利,更领导着推动着全国反日反帝反国民党革命斗争在共产党与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走上苏维埃的道路,求得中国的完全独立解放与统一。

在这样的政治形势面前,依照中央的指示,苏区党的中心任务:应使用一切力量开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组织、准备、领导和武装千百万的无产阶级与农民劳苦群众进行革命的民族解放战争,来保卫中国革命,保卫苏联,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侵犯与瓜分中国,压迫中国革命与武装进攻苏联,来争取中国的独立解放与统一。号召组织与领导无产阶级与农民,发展群众阶级斗争,积极发展革命战争,粉碎国民党军阀的新的进攻,坚决进行胜利的进攻,争取苏区的扩大,争取闽赣湘鄂苏区打成一片,争取中心城市——赣州、吉安、抚州、南昌与江西及其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来消灭出卖中国污辱中国民族的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这是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直接对日作战的必要前提,这是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

从这一任务出发,检阅过去中央局领导的工作,由于对于政治形势估量的一贯错误,便不能从各方面广大的动员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尤其是对于反对帝国主义武装进攻苏联直接干涉中国革命与保护苏联,保卫中国的动员是等于放弃。在革命战争的进行上,因为对革命力量估量的不足,对积极向敌人进攻,迅速的夺取中心城市与实现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便发生很大的迟疑和等待;这是最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于革命发展与红军行动的积极化有最大的阻碍和妨害,这种保守倾向便更加助长了农民中落后意识与保守观念的发展,一刻也不应再容留在苏区党内。

为要坚决的纠正过去中央局领导的这一错误,为要彻底的执行中央的指示,中央局特号召中央苏区各级党部全体同志在红五月工作中立即实行彻底的转变,这首先就须要领导和参加少共国际与中国少共中央所号召的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的运动周。苏区少共中央局已决定这一运动周在五月二十五日至三十一日举行,党中央局认为苏区党不仅不应以这一运动周是由青年团发起,党便可以不管,或仅采取应付的态度,并且应当积极的领导群众、动员群众到扩大革命战争中来反对帝国主义进击苏联瓜分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共同进攻中国革命,特别是苏维埃红军的阵地上去。同时更要从现在起就抓紧五卅总示威的动员和准备,就要以全力完成各地红五月的全部工作计划。

中央局根据中央的决议指示,更决定红五月与这一运动周中应执行下列的具体任务:

(一)要依照中央决议与指示信及红五月口号,进行最广大的反帝与拥护苏联的宣传鼓动,要动员群众拥护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宣布与领导的对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不承认国民党签字的出卖上海条约与一切投降帝国主义出卖中国的协定。党的各支部在红五月运动中要有宣传员的指定,并在其周围群众中要组织起来宣传队到广大群众中去做文字上、口头上的宣传鼓动工作。

(二)中央局所规定的扩大红军"突击月"的数目,各县委依照省委分配的数目,必须完全达到,并且应当特别注意吸收工人到红军中去,以加强红军中无产阶级的领导。

(三)各地苏维埃政府要在红五月中检查苏大会和临时中央政府的一切法令决议,特别是劳动法、土地法的执行程度,没执行的或执行不充分的,要坚决反对对执行苏维埃法令怠工消极的错误,立即求得全部实施与决定实施的具体方案。

(四)苏区各省委、县委、区委委员在红五月中，都要亲身到群众中去，参加发动工人斗争与加紧农民春耕的工作，要求工人斗争纲领百分之百的实现，劳动法、土地法全部实施，普遍的订立起集体合同与劳动合同，争取各业工人全体加入工会，健全与巩固工会的领导机关，要将斗争的积极分子引进到工会指导机关工作，一切贪污腐化怠工的分子，必须经过群众的发动淘汰出指导机关，积极的引进工人干部到苏维埃政权中、到红军中去担任领导工作，以强健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五)各地反帝同盟要健全发展和扩大起来，苏区反帝同盟总会要于六二三开成立大会，委托全总执行局党团经过全总执行局准备这一工作。对于青年团发起的“反帝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党应发动和领导工会，反帝同盟，贫农团……去参加这一运动周的工作。

(六)各地党部要迅速的发起与成立拥护苏联大同盟，要吸引最广泛的群众自愿来加入，它的组织原则与方法与反帝同盟相同，它的主要工作是广泛的进行对于苏联实际生活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与拥护苏联的宣传，动员起群众进行拥护苏联实际工作，这首先就是积极向外发展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全苏区拥护苏联大同盟筹备委员会即由党团中央局全总执行局少先队总队部等组织发起组织，江西闽西省一级可暂不设，直接与各县拥护苏联大同盟发生关系。

(七)苏区各省委，边区地方党部，各红军政治部五月份要依中央局与省委的规定派人到白区白军中去工作，并要完全做到。

(八)赤卫军和少先队的关系，要正确的建立起来，为着发展赤卫军便取消了合并了少先队或模范少先队的错误，必须立即纠正，同时少先队也应介绍一部分积极分子到赤卫军去。边区要加多成立向白区活动的游击队，积极向外发展，扩大与创造新的苏区，并经常的扰乱敌人的后方。

(九)各地党在红五月中，要发展党员一倍，要特别注意质量的发展，要向工人苦力雇农开门，党内异己分子与贪污腐化的分子必须淘汰出党。红五月工作要以支部为中心去动员群众，要真正建立起城市与农村党的支部生活与党团工作，要坚决的进行改造党的工作（改造党的工作计划另有决定发表)。

(十)中央局过去发出的红五月决议中的具体工作，仍然要继续执行。

为着实现上面的具体任务，必须依照中央所指示：“真正的开展两条战线上的斗争”，这首先就须彻底纠正中央局过去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右倾机会主义是苏区党内的主要危险，特别表现在对于目前革命形势估量不足，对敌人力量过分恐惧，过分估量了帝国主义大战的危机，忽视反苏联战争的主要根本危险，忽视反帝运动与土地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不认识帝国主义直接干涉苏区的危险，不了解红军积极行动的必要而对于迅速夺取大城市迟疑，主张向着偏僻区域发展，这简直是苏维埃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的路线。同时对“左”倾的“轻敌”“盲动”的错误，也应反对，但主要的火力应向着右倾机会主义做最坚决最残酷的斗争。要知道不向这些错误开火，是不能彻底向着国际和中央路线转变而实现当前的任务的。

中央的决议指示信与这一决议要一直发到支部去讨论并立即执行。收到这一决议较晚的地方，决不能因其已近五卅，便放弃许多任务不去执行，而是要更加紧的检查红五月已经做过的工作，迅速执行这一决议中一些新的规定，并且红五月过后，这些任务仍然要继续进行。

红五月工作的全部经过与总结，各级党部必须于六月初按级报告到中央局来。

中央给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电

（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日）

（一）党大会一般的接受了中央的指示，在苏区工作的转变上有了进步的作用。但大会对于政治情势估计不足，因此，对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及进攻的路线，缺乏明确的肯定的指出；虽然当时中央屡次去电指示，但是没有为中区的领导同志所严重注意。

（二）在中区工作中对于巩固无产阶级领导的问题，没有给以严重的注意，特别对于工会工作是一贯的忽略了。大会的职工运动的决议案以不正确的苏区没有工人的理论，来阻碍着工会工作的彻底转变。

（三）对于苏维埃工作中、扩大红军中、肃反工作中的错误，及白区工作的忽略，都没有明确的指出来，总之，没有造成这些工作的即时的必要的转变的前提。

（四）对于反帝，尚没有确切的认识三次“围剿”的组织者是帝国主义者，及目前帝国主义直接进攻苏区的危险性的增长；没有坚决地提出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及国民党。

（五）自我批评的发展，在大会及其前后都没有充分的发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尤其非常薄弱。大会上以反对所谓狭隘的经验论，代替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这些都是党大会最主要的错误与缺点。

（六）伍豪同志到苏区后，有些错误已经纠正，或部分的纠正，在某些工作上有相当的转变。但是未估计反苏联战争的危险，未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及加强工会工作。一切工作深入下层的彻底的转变，或者还未开始，或者没有达到必要的成绩。

（七）目前的情形正是反苏联战争的前夜，瓜分中国正在彻底进行，红军在这几次空前伟大的胜利，正是全中国劳苦群众对于帝国主义干涉与反国民党的胜利。而国民党的无耻的出卖污辱中国，也更加的揭露了。全国工人斗争与反帝运动的风潮般的高涨。中国革命的危机不仅是存在而且是发展的。

（八）在目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从新进攻苏区，亦在疯狂的进行。国内战争的范围更是扩大了；帝国主义在组织进攻苏区中的作用，增加了帝国主义直接武装干涉的危险。在目前国民党统治急速崩溃，军阀内部紧张的冲突，更有利于红军，但绝不能认为现在处在军阀混战大爆发的前夜，他们已无力进攻红军。一切四次“围剿”不可能的理论，应该受到严厉的打击。

（九）应该明白的估计到，现在全国力量的对比，是已经与三次战争时不同了的，是更有利于红军的发展，有利于革命的。目前应该采取积极的进攻策略，消灭敌人的武力，扩大苏区，夺取一二中心城市，来发展革命的一省数省的胜利。红军的行动要更加能够呼应，与互相牵制敌人；特别应该从各方面来动员准备群众与赤色战斗员，去为反帝国主义的武装而斗争。口上的苏维埃的讨论是机会主义的讨论。

（十）为着开展胜利的进攻，改造与转变党、团与苏维埃工作及一切群众组织的工作，是一刻也不能迟缓的。扩大红军，加紧红军的政治教育，成为头一等的任务。中局应采取一切必要的方法，来改善领导工作。这些首先应该依据党内发展自我批评及下层群众的积极性上来进行。中央相信中局全体同志能够团结一致的像一个人一样的，在中央这一指示之下，为了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而斗争。

苏区中央局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

——苏区党大会前后工作的检阅及中央苏区党的目前中心任务，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央局通过——

目前时局的特点是：世界上两种不同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对立和矛盾，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地猛烈发展，国内两个政权（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政权）的对立的尖锐，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苏联社会主义之胜利的建设，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危机之加深与尖锐化，世界革命运动之强有力的高涨，以及满洲事变所增强的反苏联的挑战性，使帝国主义强盗——不管它们中间的矛盾如何加强——对于反苏联武装干涉的准备，正在更大的战线上；同时，在反中国的武装干涉上，疯狂般地进行着。现在正是反苏联战争爆发的前夜，全世界帝国主义的一切秘密的公开的活动，首先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满洲东蒙所采取的一切积极行动，都是要把全世界的一切力量团结为一，来反对正在建设新世界的苏联。在中国，经济危机的深入，已到了国民经济的总崩溃的形势，苏维埃与红军的不断的伟大的胜利，全国革命运动猛烈的发展，国民党在其与革命作斗争中的破产，及其统治的日益崩溃，于是，帝国主义强盗遂由隐藏的武装干涉转到直接的公开的武装干涉，来反对中国民众，来彻底进行新的瓜分中国。日本以武力侵占满洲与进攻上海的事变，便是这一反中国的公开的战争的开始，并得到各帝国主义的同意和赞助。现在上海的“休战协定”已签字了，这表示帝国主义强盗要越快越好地来瓜分上海，瓜分中国，以便集其全力来对付中国革命，对付苏联。国民党反革命在这“协定”之下，是无耻地出卖中国，出卖民族利益，更露骨地听候帝国主义的驱使，做帝国主义奴役中国的清道夫，加紧压迫中国革命运动，特别加速调动了全国范围的军队，来进攻苏维埃与红军。因此，帝国主义强盗在瓜分世界，瓜分中国上，是孕育着开展着他们中间的矛盾和冲突，国民党各派军阀政府，也日益分崩离析，但帝国主义反苏联战争的准备，武装瓜分中国的进行，帝国主义国民党加紧进攻中国革命，特别进攻苏维埃与红军，实是目前反动统治策略的中心。

经济危机的加深，苏维埃和红军的不断胜利，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与进攻中国革命的急进，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危机的更加成熟。最近工人罢工有力的高涨（全国邮务工人、上海丝厂工人、报馆工人、电话工人的同盟罢工，天津纱厂工人的罢工、汕头码头工人的罢工等），反日运动的发展，小资产阶级的民族的觉醒与反帝的热忱，农民灾民斗争的开展，白军士兵的革命化，尤其是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又宣布对日的民族革命战争，各地工农红军在进攻中的全线的伟大胜利（鄂豫皖、湘鄂西、赣东北、河西以及中央区），这更加领导着全国群众的反日反帝的民族解放运动与推翻国民党统治的土地革命的两大革命潮流，日益汇合在共产党与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走上苏维埃的道路，为着扩大民族革命战争，求得中国的完全独立与解

放而斗争，为着争取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乃至全国的胜利而斗争！

这一切事变的发展，完全证明了中央对于时局的分析与屡次对于苏区党的指示的正确。中央在争取一省数省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上，曾经指出："党的任务是：组织准备领导武装千百万的无产阶级与农民群众，进行革命的民族解放战争，来保护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来争取中国的独立解放，来争取中国的统一。……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扩大苏区，将零星苏区联系成整个的苏区，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两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是放在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上面了"。拿着对于这一党的总任务的执行如何做标准，来检查苏区党的工作，中央苏区的党是犯了不可容许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主要的是中央局过去领导的错误。

自从去年三次革命战争胜利后，苏区中央局在其对时局宣言（一九三一年十月）上，便表现对于当时政治形势估量不足，竟认定"日本出兵东三省是帝国主义为重新瓜分中国，重新分割一切殖民地的战争的开端"(宣言)，而根本不认识主要的是为的进行反苏联反中国的武装干涉；对于革命的发展完全没有认识采取积极进攻策略的重要，反而说"敌人现在是无力来进攻我们，……我们现在正是积蓄力量，准备将来的斗争"(宣言)；向着中心城市发展，还认为"是冒进"与"冒险"。于是红军行动的中心，便放在"打土围子"与"创造新战场"上，以等待敌人的新进攻，以"关闭"来创造苏维埃共和国。这一右倾的估量与保守主义的错误，一直影响到苏区党大会与党大会以后。

苏区党大会是继续中央局扩大会以来的向着国际路线的转变，是一般的接受了中央当时的指示（八月来信)，它在苏区工作的转变上，是起了进步的作用，它彻底揭发了过去苏维埃运动中立三路线的错误，它开始纠正了当时苏区党内所缺乏的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它并领导了党大会以后在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与扩大苏区上，在建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上，在巩固红军与加强地方武装上，在开始注意地方党的工作上，有了相当的成绩。但这绝不能掩盖了党大会所犯的严重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党大会对于当时政治形势是估量不足；决议案上对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及积极进攻的路线，没有明确的肯定的指出；对于日本侵占满洲，没有一句话提到日本帝国主义是要将它完全殖民地化，是武装干涉中国革命运动的开始；更根本没有认识帝国主义在三次"围剿"中强大的作用，与帝国主义直接的公开的进攻苏维埃与红军的危险性的增长。因此在实际任务上，便没有积极向外发展，夺取中心城市的规定和行动，便没有提出以民族革命战争来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并首先加紧进攻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甚至没有一语提到武装拥护苏联与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中央苏区一向忽视巩固苏维埃运动中无产阶级的领导，特别是职工运动在党大会前完全是取消状态，党大会上虽与这取消主义作斗争，但职工运动决议案上又将反对经济主义倾向，工会代替政权等等不是很普遍的错误放到重要地位，掩盖了反对那不发动不领导工人群众斗争的中心的错误，在成份上又排斥了沿门卖工的于工会之外，并且还给了不正确的苏区没有工人（说产业工人缺乏，手工业工人失业，雇农分了土地、女工很少等）的理论做基础，来阻碍职工运动的彻底转变。在苏维埃中，在红军中，保证无产阶级与党的绝对领导权的问题，也就没有引起党大会的注意。在决议案上，没有一句话提到加强工人成份到苏维埃政府中，没有着重提到红军中工人骨干与加强党的领导的问题，反而笼统而又消极地说一句"党的包办应当取消"。没有提到宣传土地国有的重要，更没有一句话提到革命转变的问题。对于过去苏维埃工

作中，扩大红军中，土地问题中，尤其是肃反工作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以及白区白军中工作的忽视，党大会都没有能给以明确的足够的批评，没有能造成这些工作的及时的必要的转变前提，尤其是对于揭发肃反工作错误的机会主义的顾虑，使大会不能认识这一错误的异常严重性。对于中央局八月的土地问题决议案没有批评它的绝对平均主义，与反对以人口劳动力混合为分配土地标准的严重错误，反而承认它是正确的。特别是对于自我批评与工作检查，党大会及其前后都没有正确的积极的领导和充分的发展，并且要指出当时中央局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大会上反对狭隘的经验论和事务主义的倾向，虽是需要的，但没有将这种错误的机会主义根源指出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国际的，并且代替了反机会主义的全部斗争，掩盖了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所有这些，都是苏区党大会中最主要的错误与缺点！

党大会后，尤其是今年一月开始攻赣行动以后，中央局关于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任务，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转变，但因为对于目前政治形势仍然估量不足，没有估计反苏联战争与反中国革命的武装干涉的主要危险，反而过分的估量帝国主义相互间的大战危机，认为在上海事变中将要一触即发（二月中央局决议案），这就影响到夺取赣州的战略与战术的错误，影响到红军向外发展的行动，还不能达到最高限度的积极化，与全国红军互相呼应，常常束缚在“分散”筹款“分散”做群众工作的任务上，而没有得到解除，影响到苏区工农劳苦群众，对于参加和发展革命战争的工作，对于反对帝国主义与武装拥护苏联的运动也就不能广大的动员起来，相反的，反助长了苏区中农民落后意识与和平保守等待观念的发展。

党大会后半年来，中央局对于过去有些错误，如肃反问题中、土地问题中、工会工作中的严重错误，虽已经给了纠正或部分的纠正；在扩大和巩固红军工作上，在建立苏维埃政府工作上，在开始注意地方党的工作上，有了相当的转变，但对于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工会工作的加强，雇农工会贫农团工作的建立，白区白军中工作的建立，党的改造与支部生活的建立，尤其是党内两条战线上的斗争，都还没有给以应有的注意，甚至完全忽视。一切工作还都没能深入到下层，没有达到必要的成绩，尤其是因为对于党大会中的错误没能给以揭发，这就障碍着向着国际和中央路线的彻底转变。

中央局对这一错误的造成，主要的是由于对目前革命形势估量不足，对反革命力量过分估计，对目前两个世界与中国两个政权的对立的不了解与估计不足，对于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中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的忽视——这些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根源。不彻底揭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严重错误，不坚决地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开火，便不能坚决地执行积极进攻的路线，迅速地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革命的首先胜利。但如果以为有了这些严重错误，便是中央局整个政治路线错误，这也是不正确的右倾估计，因为这将否认了掩盖了苏区党大会与党大会以后的进步和转变，同样要模糊了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央局以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的精神，号召全苏区党来彻底纠正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首先就须坚决地执行中央关于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以实行彻底的转变。

根据目前形势的开展，争取和完成江西及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任务，是迫切地放在中央苏区党的全部工作上面了。最近几次全国工农红军的胜利，特别是鄂豫皖苏区空前的伟大胜利，正是全中国工农劳苦群众对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与反国民党的胜利的回答，这更加促使国民党军阀在更大的范围内，来进行对苏维埃红军的全线总进攻。全国反动统治，已经动员了他们所能调动的一切军事力量与社会力量，单对中央苏区，就集中了湘赣闽粤四省四

十师以上的军队来"围攻"。一切反革命派别，现在都在反苏维埃的旗帜之下活动起来。现时必须估计到，国内战争范围的更加扩大，使战线的延长已经到八九省，特别是帝国主义在进攻苏区中的组织者的作用，是更加强了。国民党军阀愈加在进攻苏维埃与红军中，表现其不断的破产，帝国主义武力与中国工农革命运动和红军的直接武装冲突的整个历史阶段，将愈益迫在面前。苏区党的任务，应战斗的动员工农劳苦群众与红军战士，开展全国各苏区互相配合互相策应的胜利的进攻，积极的准备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在苏维埃中央政府领导之下扩大民族革命战争，来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进攻中国革命与进攻苏联，来争取中国的独立解放，来争取中国的统一。

估计目前形势的发展，更必须指出：现时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大大的不同于去年三次战争时了。国民党统治是在急剧的崩溃，军阀内部的冲突是日益紧张，国民党各系军阀的力量都在削弱和瓦解，反动统治的民族武断宣传与欺骗，是日益在群众面前破产。相反方面，工农革命运动的力量是增强了，苏维埃与红军的迅速发展与扩大，成为领导和组织中国革命的坚固的力量，党及无产阶级的领导力量亦加强了。最近红军的全线新胜利，更造成了包围武汉、南昌、吉安、赣州等大城市与交通要道（赣河、襄河、长江流域与京汉路线）的有利形势。当然，革命发展不平衡，在全中国目前还是存在的；如果以为国民党军阀已经无力进攻我们与新的"围剿"不可能，这是极有害的"左"倾辞句，掩盖着对于积极进攻敌人的消极。但是右倾的夸大敌人的力量，认为国民党军阀将要爆发大混战，不相信苏维埃红军胜利的伟大，及其给予全国工农革命斗争的影响与领导作用，而不坚决的执行积极进攻的策略，这是最主要的危险。要认识目前的形势是更有利于红军的发展，更有利于革命的。中央苏区党的任务，应领导红军与广大工农劳苦群众，配合和响应全国工农革命斗争与各苏区红军的行动，采取更积极的进攻策略，使红军行动达到最高度的积极化与迅速的向外发展，消灭敌人武力，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新进攻，摧毁国民党的统治，尽量的扩大苏区，发展和深入土地革命，将湘赣、湘鄂赣、赣东北与中央苏区完全打成一片，夺取赣河流域的南昌、九江、抚州、吉安、赣州、萍乡等中心城市，以实现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的首先胜利，乃至争取全国的革命胜利。

为着实现这一总任务，中央苏区的各级党部应环绕着发展革命战争的中心，迅速的执行下列的具体任务：

（一）中央苏区红军的行动，必须达到最高度的积极化，必须与其他苏区红军更加有互相配合，互相策应，互相牵制敌人的行动，以达到革命战争在全战线上的一致和继续的胜利。为着这一任务的实现，全国主力红军的统一指挥系统必须建立起来，红军的主力必须集中，必须最大限度的迅速行动；要努力做到解除红军主力"分散"筹款、"分散"做地方工作的任务（当然不是说红军不做群众工作），使红军用全力于决战方面，到白色统治区域去开展胜利的进攻，连续的战胜敌人，消灭敌人武力。依据中央新的军事训令，中央苏区红军，应迅速的求得赣江流域的连续胜利，以夺取赣州、吉安、樟树、南昌、九江等城市为目的，来配合目前尚隔断着的几个苏区，以开展江西的首先胜利，以配合和响应鄂豫皖、湘鄂西两苏区在京汉路两边及长江流域包围武汉的胜利行动。湘赣、湘鄂赣两苏区应联系一起，造成威胁吉安、樟树、南昌、九江的形势，以策应中央区红军在赣江流域的积极行动。西河苏区应迅速的与湘赣苏区打成一片，扩大赣西南的苏区到南康河两岸及湘粤边境，造成夺取赣州更有利的条件。湘赣苏区更应注意湘东南苏区的发展和扩大，以克服湖南在湘鄂赣三省中的落后。

湘鄂赣苏区应更积极的在鄂东南活动，以响应红二军团与第四方面军，以牵制敌人进攻其他苏区的部队。闽西苏区除尽力扩大苏区到广东境内，恢复和发展饶和埔苏区，并与闽南游击区域努力求得联系外，应以主力向闽北发展，造成广大的苏区，与赣东北苏区打通，成为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东方一翼。

（二）进行坚决的革命的进攻，求得迅速的连续的胜利，要求我们百倍的努力来扩大和巩固红军，这是苏区党头一等的任务。二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五个月内扩大红军主力一倍的计划，到现在还差得很远，红五月的突击，也没能达到预定的数目，这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党及苏维埃政府没能将扩大和拥护红军看成是战斗的任务，党团员还不能做群众到红军中出的表率，反而怕到红军中去，红军中政治工作也没能达到必要的成绩。现在必须立即实行转变。中央苏区（包括江西、闽粤赣、湘赣、湘鄂赣）要在三个月内（七、八、九）达到扩大红军一倍的成绩。要在回答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新进攻，几千百万劳苦群众加入红军的口号之下，进行最广大的群众运动。各级党部要规定三个月内自己的扩大红军的计划与数目，一定要达到和超过。要反对扩大红军中命令主义的错误，特别是机会主义的消极。各县或几县应联合成立红军补充团，以更有系统更有训练的方法去扩大红军。巩固红军成为铁军，党大会后确有相当的成绩，但不能过分估量；尤其是过去对于加强红军中党的领导与工人骨干的问题的忽视，现在必须立予改正。党及工会要从各方面动员工人成分到红军中去，要选派工人干部到红军中做领导工作，到红军学校去受训练，以加强红军中无产阶级的领导力量。要十倍的加强红军中政治工作，特别是党的支部生活；要使党的支部成为巩固红军的堡垒，每个党、团员，都能成为红军战士的表率，而更加提高他们的积极性。政治委员条例，必须无条件的实行，凡是对于政治委员制度不尊重的，必须给以严厉的打击。红军中政治军事训练的加强，纪律的巩固，指挥的集中和统一，后方工作的建立和整顿、游击队习气和军阀残余习气的肃清，都是巩固红军的必要条件，并在这一基础上，消灭所有反革命派破坏红军的阴谋。闽西红军中逃兵现象的严重，决不能说这是由于农民家乡观念重，无法克服，地方党及苏维埃政府要从领导扩大和拥护红军，执行优待红军条例上，红军本身要从加强政治工作与党的领导上，用大力来消灭这一现象，并要与说闽西群众不能当红军的倾向作严厉的斗争。

（三）领导工农红军与千百万劳苦群众，进行反对帝国义主、反国民党的民族革命战争，是苏区党极端重要的光荣的任务。过去苏区的许多地方党部及苏维埃政府（甚至福建省苏区），竟将领导革命战争，看做是军事机关与红军的专门任务，而自己只站在帮助的地位，这是极端错误的。党及苏维埃政府，一定要认识自己是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要拿全力动员群众到前线去参加作战，派工作团随红军出发，要最大的努力执行后方工作，并充分准备和供给战争中一切精神上物质上的条件，好更有力的粉碎敌人进攻，进行革命的进攻。党及苏维埃政府要放弃过去对于战争的庸俗的机会主义见解，要广大的发展群众的地方武装组织（赤卫队少先队游击队等）。要派得力的干部领导独立师、独立团特别是游击队，去到白区中和敌军后方积极行动，侵蚀并破毁敌人的根基和武力，组织农民暴动，号召并组织白军兵暴，普遍的繁殖新的游击队，发展新苏区，破坏敌人交通，劫夺敌人辎重，袭击敌人部队，来配合和策应主力红军作战——这些，都是巩固和扩大苏区，实行全线出击，协助主力红军胜利的必要的条件。苏区党要坚决改正过去地方武装在苏区“守口子”不出进攻敌人的保守主义，要使独立师、独立团、游击队担负起到白区中筹款，供给红军给养，与依着红军胜利

的开展，去做扩大苏区的工作，使主力红军得以用其全力于决战方面。组织游击队，工作团，积极向外发展，去到白区工作，不仅是边区，也是赤色腹地党的领导责任。各级党部必须坚决地纠正过去忽视白区白军中工作的错误。为着扩大苏区，为着夺取中心城市，更需要中央苏区的党迅速的选派和训练得力干部，去到苏区附近的中心城市交通要道与敌人军队中，进行群众工作与发展党的秘密组织。中央局二月关于白区白军中工作的训令，及各省委自己规定的计划，必须求得全部实现，以造成争取江西及邻近省区首先胜利的有利条件。

（四）苏区内应该进行最广大的反帝国主义与武装拥护苏联的宣传鼓动，应该最残酷的揭露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出卖中国的面目，尤其应该从各方面来动员，组织广大群众与红军战士，去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而斗争。应该使每个工农分子与红色战士认识：帝国主义反苏联战争的危险是逼在面前；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最主要敌人；满州、上海事变以来，特别是上海“停战协定”签字以后，帝国主义是一致的公开的来干涉和镇压中国革命，并准备以武力来直接进攻苏维埃与红军。应该使他们认识：不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土地革命胜利是不能巩固的。应该使他们认识：国民党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清道夫，现在正举其全力来压迫全国反日反帝运动，进攻已经脱离了帝国主义羁绊的苏区与真正的反帝武装力量——中国工农红军。应该使他们认识：只有共产党和苏维埃才能真正领导全国的民族革命战争，直接对日作战，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只有中国工农红军才是真正实行民族革命战争的武装力量；只有苏联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才是真正能联合以反对帝国主义的国际力量。更应该使他们认识：扩大苏区，消灭国民党武力，夺取中心城市，正是给帝国主义的直接打击，是实际去进行民族革命战争，是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必要前提，是武装拥护苏联的实际行动。各级党部应该在这些基础上，来战斗的动员与组织苏区中的无产阶级与农民劳苦群众，极广泛的吸引他们到反帝大同盟与拥护苏联大同盟之内，最广大的发展苏区内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与援助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反帝运动与罢工斗争，来彻底的肃清过去对于反对帝国主义与武装拥护苏联的运动的忽视。

（五）为着巩固苏维埃运动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苏区职工运动的加强，是再也不能一刻迟缓了。为着苏区工人斗争纲领百分之百的实现而斗争，为着拥护苏维埃劳动法全部实施而斗争，为着普遍的订立集体合同劳动合同而斗争，为着改造与健全职工会的组织，争取全体工人加入职工会而斗争，为着巩固工人阶级在土地革命和反帝国主义斗争中的领导而斗争，为着在工人中扩大红军，选举积极的工人干部去到苏维埃和红军中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而斗争——这些都是苏区党及职工会的战斗任务。过去苏区党及职工会对于领导和发动工人斗争的消极，对于沿门卖工的排斥在工会之外的错误，现在必须立即纠正。必须严厉的打击那种说苏区没有工人，说职工运动主要错误是经济主义，主张降低工人要求，对女工运动忽视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党及职工会必须坚决执行去年十二月职工国际及中共中央对于苏区职工运动的决议，必须在广大的发展工人阶级的斗争基础上，来消灭工人中行会主义的倾向，来提高工人阶级对政治斗争与参加苏维埃和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与领导力量，来扩大和加强苏维埃政权下的工会，使之成为工农民主专政的柱石，以准备“由现时的民主革命转变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雇农工会的工作，必须加强起来，要使它成为领导贫农团，领导乡村消灭地主残余、反富农斗争，和团结中农的中坚力量。为着防止资本家投机商人怠工和破坏苏维埃，为着工人学习管理生产，苏区职工会必须在企业中，在手工业作坊中，组织工人监督生产委员会（不是监督资本），要雇主经常的来向工人报告企业的生产量与营业状况，以便工人实行

调查与监督。为着目前总任务的执行，党及职工会更必须迅速派人到苏区附近中心城市与交通要道，去做工人运动，发展赤色工会的组织与夺取黄色工会下的群众，特别是交通工人中的工作。

（六）中央指出："土地问题的正确解决，在提高劳苦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上，在保证苏维埃运动的胜利上有决定的意义"（一省几省首先胜利决议）。中央苏区关于土地问题，一直到党大会后，苏维埃土地法令宣布，才得着彻底的正确的解决。去年八月土地问题决议案，是进一步的解决了土地问题，但决议上的"绝对平均主义"，承认以人口为平均分配土地标准（富农在内）是正确的，并肯定过去"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是土地革命中一个成绩，这显然是不正确的机会主义错误。现在地方上关于土地问题的实际解决，还存在着许多严重错误，如随着红军胜利发展的新苏区，一般的多是命令式的分配土地，没有发动农民自己的积极性与创造力，以致许多富农还分有好田，甚至地主家属还拥有土地，在老苏区，过去单纯以人口为分田标准的地方，富农的好田还没有完全被收回，地主的财产也有未没收的，红军公田还有分得荒田的，并且无人耕种，一般的中农的利益还多被侵犯；强迫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错误，还没有纠正过来，这一切都证明土地革命的利益还没有完全落到贫农雇农与中农的身上，各级党部必须用全力来改正这些错误。在今年秋收前，苏区的土地问题，必须得到实际的全部的彻底解决，地方上全部的重新分配或部分的收回掉换，要依照当地情形与基本农民群众的要求来决定，土地上的设施，党应领导苏维埃政府开始注意和实行，主要的要得到农民群众的帮助，最急需的还是发动农民保护秋收，帮助红军家属收获，增加生产，多种杂粮，政府举办谷仓，提倡与组织信用贩卖合作社，以充裕群众和红军的粮食，以救济米荒。土地国有的宣传，党应看做当前的紧急任务。应向农民群众指出：只有土地水利收归国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之后，农村经济才能有最高度的发展，农民生活才能得到根本的改善。从巩固无产阶级对于农民土地革命的领导权出发，党及雇农工会要十倍的努力进行组织贫农团、团结中农的任务。贫农团的工作必须认真的建立起来，要使它真正能起乡村苏维埃政府的柱石的作用，并团结中农在自己的周围。要坚决的反对反中农的倾向。

（七）建立坚强而有工作能力的苏维埃政府，是目前最迫切的任务。苏大会后，福建江西两省苏大会的成功，给了两省苏维埃改造以总的领导，现在必须加紧进行下级苏维埃的改造。要坚决的肃清政府中阶级异己分子，贪污腐化分子；要严厉的打击政府中官僚主义、机会主义、形式主义以及消极、涣散、怠工与塞责的恶现象；对于政府中和平建设，不发动群众，不领导革命战争的错误，必须立即予以纠正；要发展群众对苏维埃政权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选拔得力的工人干部到苏维埃机关中工作，以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成分；苏维埃的一切法令和决议，必须求得全部实施；各级苏维埃政府要建立各部与自己的日常工作；城乡苏维埃代表制必须坚决的实行，并要吸引苏维埃代表和群众积极分子参加各部委的实际生活，经常的召集分区分乡的选民大会做报告，以密切政权与群众的联系，以建立苏维埃在群众中的信仰。苏维埃一切政策，必须以发展革命战争的利益为出发点。过去中央区对于租税政策的规定，不仅是累进税率过轻，应当改正，且对于征收商人的营业累进税，也迟到现在还未执行，以致苏区中一切战费的开支，还完全依赖于红军自己筹款，这是再不容许继续的现象。现在必须节省地方上的一切开支，将捐税的重担加在最有财产的阶级的身上；努力到白区去筹款；并发行相当数目的苏维埃国家纸票；在十分必要时，更可举行对富农商人的临时征发，以供给红军，使革命战争能在更有利的条件下进行。苏维埃政府一切工作的加强，必须密切的联

系到苏维埃政权在全国影响的增加与提高。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不仅要号召而且要实际去领导和组织全国的革命斗争，以更有力的来争取与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的革命首先胜利。

（八）在国民党统治日益破产的情形之下，一切反革命的在野派别，都更加积极起来，用尽欺骗的口号，企图和缓群众的革命斗争，来维持国民党的统治。这是革命开展中最危险的敌人，尤其是托陈取消派。同样，苏维埃和红军的胜利愈加扩大，愈加发展到中心城市，这些反革命派别更愈加要利用机会钻进苏区来活动，用阴谋来破坏苏维埃与红军。因此，肃反工作不仅不能松懈，而且要更加紧张的进行的。中央苏区过去破获AB团、社会民主党、托陈取消派、罗章龙右派的教训，鄂豫皖、湘鄂西对改组派的破获，都警戒着我们要十二万分的加强党及无产阶级在苏维埃和红军中的领导，要最广大的发展反对反革命派的思想斗争与群众教育工作，要最大限度的发展群众对于肃清反革命派的积极性，与自觉来检举一切反革命的活动。在国内战争环境中，处置反革命派与反革命的活动，必须严厉，肃反不容许乱捉人，也不容许漏网一个反革命分子。必须根本改正最近中央苏区对于肃反工作的消极，但同时要防止重复过去的错误。

（九）在组织上，发展改造和巩固党的组织，成为目前扩大苏区、夺取中心城市、实现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重要前提。这里，必须首先纠正过去机会主义的发展路线，努力向工人、雇农、苦力开门；大大的增加党内新的成分，洗刷党内腐化的异己分子；加强党员的政治教育；引进并训练新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改造地方党部；改善各级党部的领导工作方式，加强对团的领导，改善党与团的关系。要把一切问题集中到支部去，改造并建立支部生活。党内生活必须是活泼而有生气的，必须发展党内自我批评和经常的工作检查，最大限度的发展党员群众的积极性，使党的决议与一切工作都能深入到下层去，深入到实际中去。关于发展党和改造党的工作，中央局另订工作大纲，责成中央苏区各级党部认真的讨论执行。

（十）为着执行苏区党当前的战斗任务，必须无情的坚决的进行党内两条战线上的斗争，这首先要从彻底揭发和改正党大会和中央局过去的错误做起，然后才能保障国际和中央的路线的彻底的执行。目前苏区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这主要表现在：对目前革命形势和敌人崩溃形势估量不足，对目前两个世界与中国两个政权对立的不了解与估计不足，过分的估量了帝国主义大战的危机，忽视反苏联战争的主要的根本危险，忽视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不认识帝国主义武力直接干涉苏区的危险，对领导扩大与参加民族革命战争消极，不了解红军积极化的重要，对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当作是前途而不是目前行动的方针，对夺取中心城市迟疑，主张向偏僻方向发展，对扩大红军、反帝运动、拥护苏联与工会工作忽视，对发动群众斗争，白区白军中工作与肃反工作消极，对苏维埃政府工作注意不足，对富农让步。这一切，都是极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须集中火力来反对。“左”倾的危险表现在：忽视目前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认为帝国主义已无法进攻苏联，国民党已无力进攻我们，“围剿”已不可能，“轻敌”必“盲动”，反中农倾向，以及一切立三路线的残余等，也应给以严厉的打击。同时，要反对实际工作中机会主义与口是行非的两面派。要了解放松任何一种倾向在党内存在，就是帮助敌人，动摇革命的战线，同时也就要助长苏区农民落后意识、保守观念、太平思想大大的发展起来，障碍着积极进攻路线的执行。所以对于倾向的自由主义，对于反倾向斗争的调和态度，都是布尔塞维克党所绝对不容许的。苏区党在不调和的斗争中，坚决的执行目前的中心任务，一定能迅速的取得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的首先胜利。

苏区中央局关于粉碎敌人大举进攻地方党部紧急动员工作检阅的决议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通过）

（一）因为中央区是全国最大的苏维埃区域，帝国主义国民党有过三次进攻惨败的教训，这一次向中央苏区的大举进攻是下了最大的决心，目前敌人正在加紧对于中央区大举进攻的动员与布置，增调新的军事力量，筹划充足军事费用；加紧进行对于中区左右翼——赣东北湘鄂赣苏区的进攻，以造成对中区进攻的便利条件；加紧在中区四周修筑军用马路堡垒和工事；改编与组织豪绅地主武装向苏区进扰；严紧对于中区的经济封锁政策；扩大其改良欺骗的武断宣传；派遣侦探，组织各种反革命派的阴谋破坏，收买利诱革命队伍中的动摇异己分子；迅速解决自己内部不可靠的队伍，肃清白军中表示动摇不满而倾向革命的成分……这些都是敌人积极准备更长期进攻的周密布置。

（二）我们应看清这一次敌人大举进攻形势的严重性，同时认清全国革命危机日益增长尖锐化。国民党统治更形动摇崩溃，目前革命阶级力量的变化是有利于革命，在坚固的胜利的信心之下，充分紧急动员领导组织所有的革命力量，采取积极进攻路线，选择敌人弱点各个击破敌人。在各个战线上向外扩大游击运动，组织白区的战斗，争取动摇与不满的白军士兵与白区群众，扩大苏区，打通与赣东北湘赣以及东江苏区联系，采取一切方法来破坏敌人大举进攻的准备，以布置在积极进攻的基础之上，组织强固的运动的防御线的配合红军积极进攻行动，进行并准备与敌人的长期艰苦斗争，求得消灭更多的敌人，争取这次战争的全部胜利，去夺取中心城市，完成江西首先胜利，是我中央苏区党当前的中心策略和任务。

（三）中央局根据各级党部文件和极少数的工作报告，检阅过去一个月战争紧急动员工作，认为这一时期的动员是非常迟缓不普遍不深入而极不能令人满意的。

1． 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没有深入到下层群众中去，一般的表现群众没有认识敌人大举进攻的严重形势。苏区腹地群众仍然表现浓厚的太平观念，边区群众则表现浓厚的恐惧、动摇以至逃跑主义，没有积极的发展群众的阶级斗争，更加提高群众的积极性，造成群众紧张和热烈一切为着战争的情绪，这证明我们的政治动员是异常不够的。

2． 因此照旧工作的状况是很普遍现象，甚至有些地方的工作比以前的进步速度还要差。十月份扩大红军除胜利县是继续兴国的冲锋精神表现很大成绩，闽西的上杭县有相当进步外，其他各县仍是照旧速度去进行，甚至比上几月的成绩还少，因此江西还未达到原定数目，闽西与原定计划相差还远。九十两月徵调十分之一的党团员，除少数地方特别是兴国比较的相当成绩外，其他各地因动员不够而未收到应有的效果。中央局决定结束江西福建的徵调运动，各地关于这一工作应作一个总结报告中局。

3． 党政府及军区对于赤卫军游击队及独立师团少先队的扩大整顿，干部特别是工人干

部的培养，政治军事训练的加紧等，还没有引起严重的注意。许多的地方武装，在十一月七号检阅以后停顿起来，这表示还没有认清广大地方武装在粉碎敌人大举进攻巩固苏维埃政权的作用。特别是游击队，除赣县万太伸入白区外，没有积极坚决的向外去组织白区的斗争。边区的地方武装一般只是守口堵敌，没有积极执行进攻路线去破坏敌人布置，表现对敌人大举进攻动摇恐惧的纯粹防御保守等待的严重错误。

4．对于扩大苏区，除红军在新的胜利中赤化了广大的新区域以外，其他方面因为没有积极向外扩大斗争，在这一时期是没有成绩。白区白军中的工作，始终是为各级党部所忽视，没有认清这是粉碎敌人大举进攻夺取中心城市的重要条件。对于新区域及基础不强固区域的巩固，迅速分配土地，肃清残余地主武装，建立和巩固政权群众组织与党的基础等工作，进行得很迟缓，而且表示党特别是闽西党对这些区域迅速巩固的注意仍是非常不够的。

5．对战争紧急动员中经济动员方面的工作还没有引起严重注意与努力，土地税缴纳与公债票推销异常迟缓。节省运动虽在各级机关中引起注意，但未成为群众运动。特别是加种杂粮没有成绩，苏维埃纸币还未能在群众中建立巩固的信仰。这表示没有认识长期艰苦战争必须有充分物质准备的重要意义。

6．肃反工作赤色戒严，还没有引起严重注意，一般表示忽视消极与怠工。地方武装与政权组织中洗刷动摇异己成分的工作没有坚决执行，思想斗争的发动仍然被各地所忽视，其他修路拆毁工事城墙工作进行很迟缓。

(四)总结过去一个月动员工作，除江西扩大红军获得相当成绩外，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的动员成绩，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表现我们党在战争紧急动员的领导和组织力量还是很薄弱，中央局认为进行与准备粉碎敌人大举进攻的动员工作，没有获得应有成绩，是由于下列主要原因：

1．对于这一次帝国主义国民党大举进攻中央苏区严重形势的认识不足。中央局在最初一时期同样没有深刻的认识，江西闽粤赣省委动员文件未明显提出大举进攻形势，有些县的动员文件仅只一般的提出粉碎敌人四次围剿，有些地方党部文件中虽提出了大举进攻的问题，但实际工作的布置极不充分。这种对于大举进攻形势估计不足与忽视的错误，是放松一切动员工作最重要的原因。这里表现更严重的，就是有些地方党部特别是边区党对于敌人大举进攻表现机会主义动摇恐惧，失却胜利信心，不了解积极进攻路线的整个内容，是要深入发展阶级斗争，努力去巩固和扩大苏区，积极向外发展斗争，扩大苏区，去破坏敌人大举进攻的准备与布置，而走到偏重秘密组织坚壁清野的准备以及守口等待的纯粹防御路线之错误，这都是由于对目前革命形势估计不足的右倾机会主义所产生的结果。

2．中央局特别指出在这一次战争紧急动员当中，党内团内的动员是异常不够的。党内特别是下级地方党与团的指导机关中，反映着浓厚的落后的农民的和平保守以及失败情绪和意识。一般党员对目前革命发展的形势认识薄弱，对敌人大举进攻形势不了解，缺少胜利的信心。尤其是有一部分党员表现可耻的躲避战争，因怕当红军惧怕担任战争紧急动员工作，走到消极怠工，不参加党的会议，甚至表示愿意脱离党。我们应该认识党内团内动员不充分，党团员对于动员工作的消极甚至落在群众积极性后面，是这战争紧急动员工作没有收到应有成绩的一个重要原因。

3．工作方式没有适用战争紧急动员环境而转变。支部不能在每一工厂作坊农村街道中起积极有组织的领导作用，没有充分运用政府和群众组织——工会贫农团赤卫军少先队……

去有计划进行宣传和一切鼓动的工作。各种会议没有充分准备与具体决定和实际分工（中央政府紧急动员令许多区乡甚至县苏没有详细甚至完全没有讨论和具体布置工作），成为形式主义的应付，一切宣传鼓动不能很好联系到群众的实际生活，没有很好运用革命竞赛方式到下层党部中去，缺少工作的经常检查与督促，没有真正执行面向支部面向群众的工作方式，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强迫群众命令群众（特别表现在推销公债中）的脱离群众引起群众不满意的工作方式，是目前极严重的危险现象。不去以群众斗争与充分的政治上去动员群众，照旧的工作方式，官僚主义强迫命令主义等，与我们不能动员群众是有极重大关系的。

（五）帝国主义国民党向中央苏区大举进攻的形势益加紧张，红军正抓住敌人布置还未完全的时机，采取积极进攻策略，突破一方面，以求得各个击破敌人。地方各级党部应以最大限度的积极与努力转变我们战争紧急动员的工作。关于这一任务的实现，中央局更有以下的决定：

1．为着领导群众全部实现中央政府战争紧急动员令的工作，首先在党内，必须充分发展两条战线的斗争，要集中火力打击一切忽视敌人大举进攻严重性，特别要打击对于敌人大举进攻表示动摇恐惧，失却胜利的信心，消极悲观，不去坚决执行积极进攻路线而走到守口等待纯粹防御路线的右倾主要危险。要不放松打击轻视敌人大举进攻力量的“左”倾观点。各级党部直到每一支部都应立即召集一次动员工作检阅会议，在充分的自我批评与两条战线斗争基础上根据本决议对于过去工作作一次检阅，并定出具体工作计划。在支部大会与活动分子会议中详细解释目前革命形势，使每一个党员正确的认识大举进攻形势和党的中心策略，具有胜利信心，而积极的自觉的努力执行一切动员的紧急任务。要认识这一党内充分动员与转变，是每个动员工作或转变的先决条件。

2．必须坚决执行积极进攻路线，抓紧目前敌人加紧布置的时机，努力向白区发展游击战争，扩大苏区，以最大决心与努力去建立白军白区工作，以一切方法，去破坏敌人大举进攻的准备与布置，（破坏敌人修路工程，组织这些路工的反抗斗争，破坏敌人运输线的桥梁道路与轻重，向敌人不断的游击以分散疲劳敌人……）以阻止敌人进入苏区，配合红军主力消灭敌人。努力在深入土地斗争，发动工人斗争，提高群众积极性，肃清残余反动武装，去迅速巩固新发展的区域和基础不巩固的苏区。加紧肃反工作，坚决洗刷地方武装中动摇的异己成分，发展思想斗争，揭露国民党一切改良欺骗宣传，巩固革命队伍的力量，这都是积极进攻路线的具体紧迫的任务。

3．充分运用政府与群众组织——特别要抓着贫农团工会赤卫军少先队城乡代表会——进行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使全苏区的工农劳苦民众正确了解大举进攻形势和任务，坚定他们胜利的信心，提高他们积极性到最高的限度来参加战争紧急动员一切工作。在这一基础上以最大的努力去扩大红军，特别是党团员应自觉的踊跃加入红军，完成劳战委员会扩大红军的计划，扩大整顿地方武装（应立即实行县区党部书记担任赤卫军政委，加强党对地方武装的领导），迅速缴纳土地税销售战争公债等中心工作，苏维埃纸币有些地方尚不通行，党应注意在群众中巩固苏维埃纸币的信仰。

4．要以最大的努力与决心去转变动员群众的工作方式，肃清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强迫命令的工作方式与作风，这些都是取消政治动员脱离群众可以引起群众反抗的危险现象。一切动员工作应放在支部身上，支部应以最大努力去领导贫农团工会的支部，城乡代表会，及赤少队的工作，这是我们一切动员工作的基础。各级委员会切实了解支部工作和支部周围群众

的意见，特别是区委应以极大力量去帮助指导督促支部工作的健全与建立，上级党应派人去支部中巡视检查，经常指导督促所属党部的工作。每一次党或群众政府的会议必须事前有充分准备，有具体工作决议和分工及工作检查。要注意在工作方式转变的经验中，去创造新的紧张的布尔塞维克的工作方式。

这一决议，各级党部直到支部均应提出讨论，并向中局报告讨论经过与执行情形。

苏区中央局关于肃反工作检阅决议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一）因为苏维埃革命运动胜利的发展，成为不可摧毁的力量，帝国主义国民党有了三次进攻革命遭受惨败的教训，知道凭军事力量的进攻是不能收到成功的，所以在四次“围剿”中，特别注意政治上的进攻．在其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策略之下，这一次大举进攻中央苏区和红军，我们应估计到除以极大兵力准备持久围攻外，必然要特别注意政治上的欺骗与阴谋，蒙蔽白区的工农群众，特别是要打入苏区内部来破坏革命。而这种政治上的欺骗与阴谋的主要方法，除在白色区域用抗日的欺骗来掩盖其出卖民族利益帮助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实质，制造“剿共”胜利的消息，组织“匪区视察团”等，传播一些苏区如何“残酷”的谣言，企图减低白区工农群众为着苏维埃政权斗争的勇气，在苏区边境用“优待俘匪”“按口授田”“农村合作社”等类口号企图欺骗和动摇苏区内的工农群众外，在苏区内部必然而且正在用一切方法进行下列进攻革命的阴谋活动：1.以金钱来收买利诱革命队伍中动摇异己分子，打入红军、政府、地方武装和党及群众组织中，来破坏革命力量。2.用一切方法组织苏区内部豪绅地主残余和资本家富农等反革命力量，来进行反抗苏维埃政府的一切活动。3.指挥、组织和发展AB团、社会民主党、托陈取消派、改组派、罗章龙右派等反革命派别在苏区内部的一切反革命阴谋破坏的活动。

（二）我们应估计到以上一切必然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中大举进攻中央苏区时七分政治的内容。各级党部必须根据党以积极的进攻，进行和准备长期艰苦战争来粉碎敌人大举进攻的总路线，以最大的努力加紧肃反工作。必须认识肃清苏区内一切反革命活动与组织，断绝一切敌人各种反革命派别思想的传播，巩固革命的队伍与后方，是我们粉碎敌人大举进攻，争取战争全部胜利不可分离的重要部分。

（三）中央局检阅过去半年来中央苏区的肃反工作，认为在今年一月中央局决议发布后，各地大体上说已纠正过去肃反工作中缺乏明确阶级路线的错误，消灭了在群众中恐怖的现象，在较老的苏区以内在红军中建立起各级保卫局的组织系统，破获了李黄荣反革命案件，最近拘捕了江西AB团的领袖段起凤，有些地方举行户口的清查，一部分是相当地发动了群众等，这是我们肃反的成绩。然一般情形，各地对于肃反工作表现机会主义消极与忽视状况，尤其是最近二月来在粉碎敌人大举进攻的战争紧急动员中，各地党和保卫局缺乏或者是完全没有认识肃反工作重要性，继续过去忽视这一工作的状况，这是不可容许的严重错误。

（四）过去这一时期中肃反工作的消极与忽视，显然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估计不足，没有认识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中特别注意从政治上来进攻和破坏革命的严重性，而反映着农民中落后的和平保守意识，认为反革命势力和派别已受到了严重打击，在革命胜利的向前发展中，不能再有积极活动，不知道苏区内被推翻的豪绅地主以及富农和反革命派别余留的势力，必然要在这时企图和进行其反革命的阴谋；因此放松对于肃反工作的注意，忽视

在广大群众中的思想斗争与教育工作，没有经常有系统去揭发一切反革命思想与阴谋活动的内容，更没有充分去运用群众路线，以广大群众力量去严密监视豪绅地主富农一切反革命活动，举发一切反革命派别和分子在苏区内的阴谋破坏革命的行动；甚至有些地方与个别同志发生一种对反对反革命派别的斗争采取了妥协调和姑息和自由主义的立场；更严重的有些区委区乡苏及支部同志签名担保豪绅地主与富农的现象。各级保卫局及边区肃反委员会组织和工作多不健全，特别是区一级的特派员经常更换，缺乏单独工作能力，侦察网没有普遍建立，侦察技术薄弱。地方党表现还没有深刻了解保卫局工作是巩固革命胜利、镇压和肃清反革命活动、防止一切反革命深入革命队伍中来的重要工作，因此，党与政府很少讨论肃反工作，对肃反机关政治上的领导和组织上的巩固没有负起应有的责任。

(五)由于这一切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就给了苏区内反革命势力和派别抬头活动的机会，以致在江西闽西时常发现反革命标语、神教性的反革命组织（江西）和地主富农的秘密组织与活动（闽西有富农做草鞋准备慰劳白军），甚至在群众游行示威中叫出反动的口号(长汀)，地方武装中发现拖枪叛变的事实，甚至企图举行反抗苏维埃政府的暴动（宁都事件），以及红军中郭炳生等可耻的叛变，带枪反水的个别现象时常发生。这一切事实指明反革命派别和分子抬头活动的严重情况。党如不以最大的注意去肃清和防止一切反革命组织与活动，在长期而更艰苦斗争中，必然要演成更严重的恶果的。

(六)在目前战争紧急动员当中，各级党部必须认识肃反工作是粉碎敌人大举进攻、争取战争全部胜利的重要部分。这首先应在党内发动思想上的斗争，反对一切由于对目前形势估计不足而产生的忽视肃反工作倾向，严厉打击一切对于反对反革命派别斗争的妥协调和姑息和自由主义的错误，同时要防止一切不相信群众基础而过分估计苏区内反革命派别力量的机会主义，和过去肃反工作错误的重复产生，纠正过去各地把肃反工作简单看成是肃反机关——保卫局和边区肃反委员会——责任的错误观点，根据以前中央及中央局关于肃反工作决议，依据群众路线与阶级路线，使肃反工作适应目前战争形势而有彻底的转变。

(七)为着肃反工作的彻底转变，中央局指出下列工作必须切实的执行：

1. 在各种刊物及群众会议上，指出敌人在这次大举进攻中以极大力量来欺骗群众、破坏革命力量的策略，经常注意揭发敌人和一切反革命派别的改良欺骗造谣及其收买利诱阴谋破坏革命等罪恶，扩大党的政治主张的宣传，加强群众政治教育，提高群众的觉悟与政治坚定性，加紧群众对于阶级敌人及一切反革命派别的阶级仇恨。

2. 必须充分运用群众路线，发展群众的阶级斗争，特别注意发动群众举发一切有反革命活动和嫌疑分子，以供保卫局和其特派员来侦查。要注意以群众力量严密监视豪绅地主资本家和富农的行动，切实执行对于这些成分和有反革命嫌疑的户口清查。必须认识，只有广大群众积极自觉的参加肃反工作，才是彻底肃清一切反革命势力阴谋活动最有力的保障。

3. 对于因破获而被拘捕的反革命分子，应根据中央政府第六号与十一号训令，按照阶级路线，迅速解决。对于阶级异己分子，有反革命证据者应经过公审严厉处置；对于工农分子因受欺骗而加入反革命组织而未负重大责任者，应许其自新，从轻迅速处理，并注意宣传被欺骗的工农分子自首。边区肃反委员会对于显著而重要的反革命分子，要迅速严厉处置，因为这对于群众斗争的发动是有密切关系的。

4. 各级党部应根据中央政府训令与中央局通知，领导各级政府检举委员会，并发动群众，严格去检举政府、地方武装中的阶级异己分子，贪污腐化消极动摇分子，以防止反革命

的利用和混入。在其他群众组织的机关中——如工会、互济会、反帝拥苏同盟等——亦须发动群众检举这类分子撤换其工作。红军中必须加紧思想斗争，继续坚决撤换异己动摇分子，特别要注意提拔工人干部担任政治和军事责任，凡是经过自首或自新的工农分子，恢复选民资格者，在原则上是有参加武装组织的权利；但在目前革命战争剧烈发展的时候，对于工作不积极、政治上表示不坚定的分子，仍应拒绝其加入武装组织，已加入的应洗刷出去，特别是游击队独立师团和红军中更应迅速加以洗刷；可吸引到其他群众组织，加紧对他们的政治教育，以争取他们积极来参加革命工作，而不致重犯错误。

5．中央局责成各级党部选派一部分最好的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以健全各级保卫局及边区肃反委员会的组织，并在支部及群众组织中找出一部分政治上坚定的分子介绍给保卫局来，建立周密的侦察网。特别要注意城市及边区的侦察工作，因为这些地方是反革命最容易混入和隐藏的地区。

6．中央局责成国家保卫局负责同志于最近期间中，详细审查各级保卫局干部成分、政治坚定性和其工作状况，坚决撤消一切消极怠工动摇异己分子，严厉纠正各级保卫局对于肃反工作所表现的平常照旧的消极应付的现象，这是没有认识在敌人大举进攻中肃反工作的重要性。以后国家保卫局应经常加紧对各级保卫局工作上的督促和领导，特别注意保卫局工作干部的训练，尽量求侦察技术上的进步，根据所得材料迅速去破获反革命全部组织。

7．各级党部——直到支部——最近应讨论一次肃反工作，对过去一时期肃反工作作一次检阅，订出以后工作的具体实现的方法。各级保卫局虽是有其集中系统的组织，但省、县及区党部对于各级保卫局及区的特派员工作仍应负起政治上领导的责任。中央及省县保卫局工作委员会，以后应定期举行会议，经常检阅肃反工作的进行。

拥护党的布尔塞维克的进攻路线

——一九三三年二月在工农红军学校第四期毕业生的党团员大会上政治报告之最后一段——

博　古

同志们！在我们了解了目前国际与国内的政治形势之后，我们必须说到党在目前所应采取的总路线的问题。大家知道，党的策略路线是随着整个国际与国内的政治形势而变动的，是随着革命运动的高涨与低落而变动的。斯大林同志说：

“策略是随着运动的高潮或低潮而变。譬如在革命的第一阶段时（一九○三年至一九一七年二月）战略是不变的，但策略则经过几次改变。一九○三年至一九○五年，党的策略是进攻的，因为那是革命的高潮，运动继涨增高，策略必须顾及此事实，因此，斗争的形式是革命的，是适应革命高潮要求的，……斗争形式变了，组织形式亦随之而变。……

一九○七至一九一二年这一时期，党不得不采取退守的策略，因为那是运动的低潮，革命的低落，策略不能不顾及此事实，因此，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不能不变”（《列宁主义概论》）。

我们现在要问，在目前的政治形势之下，党的策略路线应该是进攻的呢？还是退守的呢？没有问题，在目前我们党的策略，党的总路线应该是进攻的路线。

目前正是资本主义局部稳定终结，许多国家内革命危机的条件迅速成熟，整个的国际形势正是处在走向新的革命与战争时期的过渡阶段，所以共产国际“在各国共产党面前极端锐利的提出实现各国共产党在目前基本任务的问题。这就是在经济和政治斗争的过程中，准备工人阶级和被剥削群众，去为夺取政权而斗争，为着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十二次全会决议）。这就是说要各国共产党采取积极的进攻路线，去开展各个战线上的布尔塞维克的进攻。“要不失一刻的去加强并促进为夺取工人大多数，为提高工人阶级革命积极性的布尔塞维克的群众工作”（同上）。

在中国正当着革命形势已经存在着的时候，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剧烈高涨，工农红军与苏维埃运动猛烈扩大开展，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国民经济全部的崩溃，与暴风疾雨一样开展着的白区工人农民的斗争，国民党统治的崩溃和破产，都在我们党面前提出开展各个战线上的布尔塞维克的进攻，来把革命形势迅速地变成为胜利的大革命，来争取工农民主专政在全中国的胜利及迅速的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总的进攻路线包括着苏区和非苏区的党，用一切力量来夺取群众、组织群众、准备群众、领导群众，在经济和政治的斗争中间，提高他们的革命的积极性，和准备他们为着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而斗争，为着全中国的苏维埃形式之下的革命的工农民主专政而斗争。这就要中国共产党实行：第一，在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之下，去动员群众来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的斗争，反对出卖中国民族利益的国民党的斗争；第二，必须动员工人阶级与劳苦群众来反对与粉碎国民

党对于苏区和红军的进攻，巩固和发展苏区，将各个苏区联合起来，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为着这个目的，必须加强巩固与猛烈的扩大红军；第三，必须在非苏区中，在发展工农群众经济和政治的斗争之中，去准备和领导他们，配合着红军的胜利的进攻，来推翻卖国的国民党统治；第四，必须一分钟一秒钟不迟缓地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到革命的旗帜之下来，这就要我们采取坚决的转变赤色工会为群众组织，与夺取组织在国民党工会黄色工会内工人的路线；第五，在农民中，党必须经过一切为保护农民日常利益的斗争来广大地发动游击战争。在满洲更需要提出农民委员会，反抗一切捐税和政府的命令，没收帝国主义走狗的财产与组织民众选举的政府的口号；第六，就是要把苏维埃建设的成绩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成功，传播到广大的群众中去，并且最广大的解释和宣传苏联与中国工农兄弟联盟的口号。所有这些，就是共产国际和党目前所采取的总的进攻路线的内容和实质。

我们苏区的党的组织，应该怎样把这个共产国际和党的进攻路线，在全部党的实际工作中间具体化起来和实现起来呢？

在目前我们正处在与敌人大举进攻作坚决斗争的时期，正处在完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的紧急关头，在英勇的工农红军在屡次战争中取得伟大胜利，及全国革命形势日益增涨的时期，反革命的国民党最无耻的出卖中国，投降帝国主义，在帝国主义的指挥之下，集中一切军事上的力量，向着中国工农红军，中国苏维埃进攻，特别在目前向着中央苏区作绝望的大举进攻。反革命的大头目——蒋介石第二次到了南昌，新的几师军队正向着江西，向着抚河流域开动，这是国民党军阀在所谓第四次"围剿"中的最后奋斗。虽然，我们武装上数量上还远赶不上敌人，但是在全国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动上，显然现在比以前更加有利于我们，白军士兵的动摇不满，工农红军英勇善战和历次战役的丰富经验，以及全世界政治形势的发展都告诉我们，在这一决战中间我们有着取得完全胜利的一切条件，问题是在我们能否在实际工作中全部的实现共产国际和党的进攻路线。

所以，目前苏区党面前的重大的历史的任务是"最积极的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的民族革命战争，粉碎敌人的新进攻，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及准备组织领导广大的工农群众与赤色战斗员，去和帝国主义者的武装作坚决无情的胜利的斗争"（党中央八月指示信）。这在目前就要求我们抛开一切动摇，集中一切力量，准备一切牺牲，去求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去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来开展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新的局面与形势。

根据目前的形势以及共产国际和党的总路线，中央局在二月八号的决议案中提出了下列的立即执行的紧急任务：

（一）最大限度的扩大与巩固主力红军，在全中国苏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来同帝国主义国民党作战，……从二月二十日起至三月二十日止，闽、赣两省必须输送一万（赣七千闽三千）新战士到前方。

（二）号召所有工农劳苦群众武装起来，加入赤卫军、少先队，……现在就应该开始宣传，为着争取革命战争胜利，每个工农分子应该武装起来到红军中去，这样来准备从自愿军役制转变到义务军役制。

（三）独立师团游击队必须按照中革军委训令，以积极的进攻，牵制和扰乱敌人，破坏敌人后方交通，领导白区群众斗争，进行赤化工作，并配合红军主力，打击敌人，特别在赣南闽西边区，必须进行最有力的运动防御战……。

（四）组织与领导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最广泛的动员全苏

区工农民众，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满、蒙，进攻平、津，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一切强盗行为，……用一切力量，使反帝拥苏同盟变为反帝国主义的广大的工农组织。

(五)集中一切经济力量为了战争。……

(六)提早春耕运动增加生产。……

(七)用一切力量来发展与巩固苏区，赣、闽两省应以最大力量立刻加强对新发展区域的领导。……

(八)修桥补路拆毁城墙工事工作应于二月底前完结。……作战区域或靠近作战区域的党，应领导当地政府，群众组织，成立战地委员会，担负清扫战场，处理伤病兵及白军俘虏工作……。

所有这些便是我们主要最紧急的任务，亦就是进攻路线，在目前阶段上的具体的主要的内容与实质。只要我们能够以布尔塞维克所特有的顽强、坚决、毫不倦怠，敏捷迅速的为着这个进攻路线的全部实现而斗争，我们将有一切的把握，完全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正像我们粉碎一二三次“围剿”一样！

但是正在这时候，在我们党内（很可惜的，甚至在党的领导同志内），有一部分动摇懦弱无气节的小资产阶级的分子，受着阶级敌人的影响，充分地暴露了那种悲观失望，退却逃跑的情绪，以致形成他们自己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反抗党的进攻路线，妨害党的布尔塞维克的动员群众，这个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最明显的代表者，便是从前福建省委的代理书记罗明同志与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同志。那么，这个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的实质在那里呢？

这些机会主义者，首先从对于目前国际与国内的有利于我们的客观形势不了解出发，从对于目前阶级力量对比变动有利于我们的情况的不了解出发，从对于坚决、积极、艰苦地与敌人争斗着的群众力量的不了解出发。罗明同志对于闽西、上杭、永定几年来与敌人作长期坚决争斗的工农群众，作了以下的惨淡黑暗茫无前途的描写：

“边区群众一时上山，一时下山，一时太平，一时又大恐慌，因此开会，集中武装等等都很难动员……”“大地有些群众说被敌人进攻几次，就弄得这样苦了，上级还要说准备长期战争，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呢？”

“有许多群众说，‘我迫得十分不得已了，不得不暂时妥协屈服，我的心还是红的，我也相信整个革命是要胜利的，我也希望红军能够胜利……’”。

接着罗明同志用慷慨激昂之笔写道：

“同志们！听一听我们群众的呼声啊！在群众这样的痛苦中，在群众的痛苦的呼声中来了解自己的主要错误！”

到底什么是自己主要的错误呢？可惜罗明同志没有说。也许是我们没有及早的妥协屈服以致“群众”受这样的痛苦吧!！这正是罗明同志的退却路线的实质，而这段话同时又给说明罗明同志的机会主义退却路线的社会根源，这种社会基础便是那些“心里是红的”而实质上是白的，或者心里是白的，表面上是红的那些人。我想大家都明白的，这些人便是那些地主豪绅的残余与富农，或者受着他们影响的极小一部分落后的农民群众。这些人便是罗明同志的“我们的群众”！为着解除他们的“痛苦”，在苏维埃政权之下的“痛苦”，罗明同志便主张逃跑退却，好让他们去“妥协屈服”，得到在国民党政权下“解放”。在另外几个地方，罗明同志亦用同样的笔调去污蔑英勇斗争着的劳苦群众，如说：“少先队改装，不戴少队帽，妇女

装假发，用布包头，恢复旧装”。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罗明同志对于群众情绪与群众力量已经有这样的估计，那么怎样去实行党的进攻路线呢？当然，是没有办法。岂仅罗明而已，就是全世界上最好的革命领袖亦没有办法，罗明同志正是这样大言不惭的写着：

“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或请列宁复活，一齐到上下溪南，或者到其他地方去，对群众大演说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的情绪”。

既然这样，那区区罗明又有什么办法呢？可是，同志们！切不要看轻罗明同志，他似乎比列宁还稍为高明些呢（大概高明得不多吧！），他想出了“锦囊妙计”，这就是进攻路线是此路不通，还是以左右散开向后转为是，这样罗明、杨文仲等便把自己的退却路线与党的总路线对抗起来。这个路线表现得最明显的是在罗明同志到新泉之后，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同志所写给省委的政纲式的信，在这封信中，他主张：

(一)……二四军团必须立即回师湘鄂西与鄂豫皖，以便更大的牵制敌人的兵力配合中央区的行动，……

(二)………………………

(三)………………………

(四)过去一切的工作计划完全是党代替政权（如扩大红军，地方武装，土地问题等，)因此党对于发动群众的斗争，即减少其注意力“我意关于行政上及扩大红军地方武装等工作应由政府计划……而使党更多注意领导群众斗争方式上的研究，……

(五)反帝同盟拥苏大同盟及青年部等革命群众团体的名目太多，每人有十余种组织可加入。下层同志确听到头晕，找头绪不到，因此，这些组织不能健全起来而是一种空招牌，我觉得必须尽可能的减少或合并。

(六)各处地方武装在数量上是不见少，但在实际的集中训练是极差的，有许多训练与组织不好，不但不能配合红军主力作战，而且还是扰乱主力红军的行动，或给以坏影响，这是无益的。因此地方武装不要只顾数量的多，而要顾作战能力，……
边区工作应注意工作分配与计划，不能与中心区一样，特别是扩大红军问题……”

这便是罗明与杨文仲同志的政纲，自然罗明同志在他信里有许多地方要委婉曲折一点，但是基本的立场是一样的。这个政纲不能不说是完全反对共产国际与党的进攻路线的，不能不说是一个机会主义，取消主义的退却路线的政纲。

党的决议写着：“在这一决战中间，我们有着取得胜利的一切条件”。(二月八日决议)

而机会主义者认为这是可疑的，以为“两军主力双方决战，牺牲必大”，所以，下命令一般的要“二四军团立即回师湘鄂西与鄂豫皖”。更进一步，那当然是调赴中央区，配合一方面军行动了。这不禁令人想起李立三同志过去要苏联出兵蒙古，红军出动响应的提议了。不过右倾机会主义者更懦弱一些而已！

党主张：“最大限度的扩大与巩固主力红军。在全中国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

机会主义者说：第一，扩大红军边区应该例外，边区是不能扩大红军的。第二，“扩大三百主力红军还不如扩大一百地方武装”。第三，党不应管扩大红军的事，这完全是党代替了政权。

党主张：“号召所有劳苦群众武装起来，加入赤卫军，少先队”及“每个工农分子应该武装起来加入红军”。

机会主义者说："各处地方武装在数量不见得少"，而且多了反难组织好训练好，"不但不能配合主力红军作战，而且还是扰乱主力红军的行动，或给以坏影响，这是无益的"。所以，"关于地方武装方面目前最中心的迫切的工作，是先造成基干部队"（罗明信）。

党主张：独立师团等等应该积极的进攻，牵制敌人、扰乱敌人、破坏敌人后方交通路线，……来配合红军主力作战。在边区要进行最有力的运动防御战。

机会主义者说："因为地方武装（包括独立师在内——古注）过于软弱，一打就垮"。所以他们只能用来去打连南汀东南的团匪，这一带的团匪的力量很弱，目前还没有和白军配合，很容易消灭他，并在消灭这一带的团匪中，可以锻炼地方武装的战争力……以后很快能与白军打仗"（均见罗明信），关于组织强有力的运动防御战，那更可不必，只要向北发展，军区指挥向北一迁，那就"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了。"这样，不但不会防害闽西的巩固，相反的，只有如此才能配合闽西的斗争，才能不使杭永孤立"。

党主张：最广大的动员全苏区工农民众，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瓜分中国的强盗行为，用一切力量使反帝拥苏同盟变为反帝国主义的广大工农的群众组织

机会主义者说："反帝同盟，拥苏同盟及青年部，革命群众团体名目太多……必须尽可能减少或合并"。其实李立三的行动委员会又简单又少麻烦，或许更合杨文仲同志的胃口吧！

党主张：党应该动员一切力量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

机会主义者主张：党应该从领导国内战争——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中脱离出来，而去研究各种发动群众斗争的方式。这就是要党从领导胜利的苏维埃革命的布尔塞维克的群众的党，回到从前那种学究主义的研究性的小组织去。

同志们！难道还不明白么？这里清清楚楚的放着两条路线，一条是党的布尔塞维克的进攻路线，一条是机会主义的走向取消主义去的退却逃跑的路线。

为着要动员我们一切力量，去粉碎敌人的进攻，克服我们面前的困难，那只有一种方法：便是开展在各方面的布尔塞维克的进攻。这首先要我们粉碎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的动摇，把他们隔绝起来，因为他们防害我们的进攻，惊惶失措、悲观失望，将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不相信胜利的思想，传播到党里面来，传播到群众中间去。布尔塞维克的不调和的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将是保证我们胜利的先决条件。

因此，对于这样两个原则不同的路线的模棱两可的态度，是最有害的腐朽的自由主义，任何对于拥护党的总路线的不彻底，温和，半途而废，实际上将完全的成为机会主义退却路线的俘虏，而给革命与整个苏维埃运动以极大损害。很可惜，我们闽粤赣省委的另外一部分同志正是处于这样的状态之中，多少感觉到罗明、杨文仲等同志的错误，多少温和地批评了他们，东一点西一点，但是缺乏拥护党的路线而斗争的布尔塞维克的彻底性与坚定性，因此在实际工作中犯着许多极严重的机会主义的错误。

同志们！我们目前正处在胜利的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的面前！我们有着取得这次决战胜利的一切条件，同样在我们面前还有许多困难。只有机会主义者会在敌人大举进攻的面前悲观失望，在困难面前投降屈服。每个中国的布尔塞维克应该团结在共产国际和党的进攻路线的周围，用十倍努力，十倍坚定，十倍积极，勇敢地去克服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与实现我们面前历史的使命！

在今天红校第四期学生毕业的时候，每一个党团员应该说：我们不仅是手拿枪枝来保卫

土地革命与发展苏维埃运动的战士，而且是拥护党的进攻路线的坚决战士，今后我们将更加坚决的更加积极的为着党的路线而战，为中国苏维埃在全国的胜利而战。同志们！高举我们列宁主义的旗帜，高举我们工农红军的光荣的旗帜，团结在中央和中央局的周围，克服我们队伍中的一切机会主义的动摇，实行布尔塞维克的全线的进攻，走向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

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与严重，国民经济总崩溃的继续发展，苏维埃运动与红军的惊人的生长与扩大，使中国的革命形势更进一步的紧张与尖锐化起来。最近一时期的许多事实，确切的证明了共产国际第十二次全会“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的估计之完全正确。我们正处在中国革命与战争的中间，革命形势的开展正走到了一个急剧的转变的关头。决定中国革命形势增长的三个主要的因素与柱石，是更扩大与尖锐了，中国革命的三个主要支流是猛烈的增长着。这是：

（一）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资本主义相对稳对终结的基础上产生的瓜分中国的战争，是以全力在进行着。日本帝国主义在英法的援助之下，开始了并继续的以全力来扩大掠夺中国的强盗战争，满洲热河以及河北北部的并吞（这是帝国主义东方宪兵造成在东方的反苏联根据地之重要的步骤），并没有满足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贪心，他的强盗的血手向着内蒙古与外蒙古人民共和国伸张着。英法同样是实际的占领了西藏西康与云南贵州。美帝国主义者正在锐利的注意着他自己剥夺中国民众的“权利”。同时为着缓和自己内部冲突和竞争，帝国主义者正在企图造成统一战线来瓜分与共管中国（李顿报告书，国际联盟下技术协助中国调剂委员会之设立等）。五分之一的中国版图，六分之一的人口，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践踏之下，整个中国在殖民地，奴隶命运的威胁前面。国民党的无耻的投降与出卖，非但不能缓和民族危机与帝国主义侵掠的野心，相反的只有更加刺激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者的强盗掠夺的贪欲。但是日本的军事侵掠，民族压迫与民族危机的加深，激起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群众的风暴般的反帝斗争的高涨（满洲、热河、河北的游击战争，反日罢工示威，抵货与航空救国等等），虽然他在各个地域中间发展的程度还带着明显的不平衡的性质与由于我们工作的错误与弱点还没有完全掌握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但是，无疑的，运动是在更扩大与深入，更多的带着群众性质，而成为丰富的革命源泉，是根本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的有力的支流。

（2）经济崩溃的大踏步的前进，工业首先是民族工业的主要部门轻工业的倒闭与减工（丝厂的全部停业，纱厂减百分之五十，面粉，树胶等工厂生产量半数以上的锐减等），对外贸易的惨落（入口减百分之三十，出口减百分之四八，而入超反增百分之六点二），农业中整个部门的毁灭（如育蚕茶叶等）与全般的衰退，一九三一年大水灾的创痛未复，新的普遍全国的水灾又发生了。这结果，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产业工人是被抛弃在工厂门外，工人生活状况之恶化，农民的破产赤贫化与成千成万民众的饥饿，达到空前的程度。工人阶级与农民群众的反对资本进攻——反对地主资产阶级及国民党官僚机关之剥削与压迫的斗争，是继续的增长着（顽强的罢工斗争，失业的斗争，示威，农民暴动与游击战争）。

（3）帝国主义国民党所进行的四次"围剿"，由于工农红军的英勇善战，军事技术的提高，政治觉悟的坚定，苏区及国民党区域中广大劳苦群众对于苏维埃运动与工农红军的热烈的拥护，及党的正确的布尔塞维克的领导，是被我们彻底与完全的粉碎了！在粉碎敌人的四次"围剿"中，中国的苏维埃运动不但巩固着自己原有的阵地，而且开创了大块的新苏区，将苏维埃运动的种子与影响，散布到更广大的革命运动比较落后的区域(四川、满洲及西北的陕甘晋)。红军主力非但没有遭到损失，相反地，与敌人残酷的战争中增强了自己，锻炼了自己，敌人的十几师军队是复没了，敌人的全部计划粉碎了，这是中国革命史新的光荣的一页。这种伟大的胜利，是在全中国革命形势急速的开展的基础上获得的，这一胜利更加尖锐化了全中国的革命形势。

二，帝国主义国民党对于全国苏区的四次"围剿"的开始，是在上海工人与十九路军士兵英勇的保卫上海斗争被国民党出卖镇压之后，他的进行继续了差不多一年，他的最后的结束是在二三月间国民党军队在黄陂东陂的惨败之后。紧接着东黄陂惨败之后，蒋介石曾经几次企图依据他原有的力量不变更四次"围剿"的总计划，向我们作新的进攻，但是这一切企图都是失败了，使得蒋介石不能不暂时的改变积极的进攻为城防的政策，而在新的基础上调遣新的军队，组织新的力量，以较长期的准备来进行新的五次"围剿"。总结四次"围剿"这一时期的经验，无疑的我们是得到极大的胜利与成功，苏区是巩固与扩大了，全国红军有一倍左右的数量上的增加，红军的战斗力是大大的提高了，苏维埃政权是更进一步的巩固了，他对于全中国民众的影响是更加扩大了。不论在苏区与非苏区之中，我们党的工作亦有了进步，党的政治影响是极大开展了，党与群众的联系及本身的组织力量是增强了。四次"围剿"的冲破指示给全中国民众看，苏维埃革命是千百万群众参加的民众革命，有着强固与不可克服的力量，一切企图用武装进攻或经济封锁来阻止或消灭苏维埃运动，将不可避免的受到惨败。更使他们了解，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因此，推动着广大的群众更进的革命化，并使中国存在着的革命形势有进一步的开展。当然，在粉碎敌人的四次"围剿"中间，我们的工作还存在着许多异常重大的弱点，这是主要的表现在我们没有能够把国民党区域中开展着的反帝斗争及工农群众的日常斗争更大开展起来，提他到更高的阶段，把他们与工农红军胜利的战斗配合起来。在反帝动动中，一方面我们还不善于依据在工厂的基础上，建立广大的群众的反帝的下层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在个别的地方，常常以上层勾结代替了广大群众的统一战线，因此妨害着我们对于反帝运动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巩固。在工厂与企业中的工作还是非常的薄弱与缺乏经常的持续性，与广大的无组织的以及在改良主义影响下的工人群众几乎完全隔离的状态，还没有能够克服，领导反抗资本进攻的罢工与领导农民日常斗争还非常的不够，许多屡次重复着的错误（日常斗争的轻视，下层统一战线之不了解，隔离反革命派不足及盲动主义倾向等）还存在着，这就使我们不能够把比较初步的广大群众的运动发展成为较高阶段的斗争——政治总罢工以及其他的大规模的革命斗争形态。党还没有能够最迅速的利用每一个具体的事实，揭露改良主义派别的面目，把他们和群众隔绝起来。士兵中的工作不管士兵不满的增涨，我们的工作还是极端薄弱。在军事方面，在粉碎敌人的四次"围剿"中，我们还没有能够建立一个全国的集中的军事领导，因而不能够在单一的战略意志之下，互相配合的遂行战斗任务。广泛的发展游击战争，配合红军主力作战，是非常的不够。战略与战术方面的机动与活泼性还很差。红军后备军的组成，还赶不上战斗开展之需要。在苏维埃方面，中央政府还缺乏对各省苏区的集中的领导，对于苏区经济上必须的建设以保证我

们军事的胜利，仅在开始。苏区工会还没有能成为真正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柱石。党的发展及领导方式之布尔塞维克化，还只有初步的改善。所有这些弱点，就妨害我们在粉碎四次“围剿”中实现中心城市的夺取及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之实现。

三，革命形势更进的尖锐化，使得解决从民族危机与经济浩劫中的革命的或者帝国主义的出路问题，极端的尖锐起来。在中国前面放着绝对的问题，或者是被帝国主义瓜分共管而成为完全的殖民地，或者是独立自由领土完整的苏维埃中国。这个问题的解决，将在最短促的历史时期中。帝国主义正经过国民党来实现它完全瓜分中国将中国变为殖民地的计划，而国民党忠实的为帝国主义的走狗，为它们清除道路。在这整个计划之中，新的大规模的五次“围剿”，是不可分离的重要的一步。在四次“围剿”粉碎之后，帝国主义国民党即刻开始了新的五次“围剿”的准备，蒋介石与南京政府最卑鄙无耻的公开出卖华北，签订极端污辱中国民族的华北停战协定，以取得日本帝国主义的赞助，来进攻中国的苏维埃与红军。宋子文的周游欧美，以出卖中国的各种权利为条件取得了美国二万万元的棉麦借款，英国一万万元的军械借款，以及许多其他的密不宣布的秘密借款。同时国民党召集了新的五省“剿匪会议”与政治工作人员会议，总结了他们在四次“围剿”中失败的经验，并重新确定了新的进攻计划，组织军官团，重新训练自己的军官，调遣新的大批的部队入赣，招收与训练新的十五师军队，用一切收买与利诱的方法，团结反革命的各派军阀，一致的向苏维埃与红军进攻。以严酷的白色恐怖，非人的拷打，监狱，屠杀与暗杀，镇压国民党统治区域中的革命运动。同时更以武断的欺骗宣传，愚弄与麻醉群众。阶级敌人对于苏维埃和红军的新的“围剿”，是在疯狂般的准备着，五次“围剿”是更加剧烈与残酷的阶级决战。在这次“围剿”中，帝国主义的作用是更加增强了，没有帝国主义的帮助与组织，新的“围剿”是不可能的。五次“围剿”是帝国主义经过国民党实行将中国完全殖民地化的最具体的最凶恶的步骤，它与帝国主义在华北的军事侵略及资本进攻都密切的联结着。粉碎五次“围剿”的斗争，即是阻止危机中的帝国主义的出路的斗争，即是争取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国的斗争。五次“围剿”的粉碎，将使我们有完全的可能实现中国革命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

四，冷静的估计目前形势的时候，应该指出：四次“围剿”的粉碎，革命形势之新的紧张化，造成了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有新的有利于我们的变动。国民党及其他各派军阀在政治上与军事上都是一天一天的削弱。财政上的困难，随着广大地区之丧失及国民经济之崩溃而日益增长。大批外债的借入，将国民经济的破产及今后财政上的困难以新的激动。投降帝国主义的政策，更加促进了广大群众对国民党的忿恨，揭露了国民党的无耻民族武断宣传。由于屡次军事冒险的失败，不仅广大士兵群众不满意及不愿和红军作战的情绪增涨了，而且中下级军官的惧怕红军的心理是普遍在国民党的部队中生长起来。反帝斗争与工农革命运动，不管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如何严厉，是在蓬勃的增长着，国民党内部各派军阀间的矛盾，是无法解决。军阀混战的爆发虽是暂时阻滞着，然而终究是不可避免的。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统治阶级的力量的削弱，国民党统治的急剧崩溃。这种削弱是将要随着我们的新的胜利与工作的改善而更加加速。在五次“围剿”中间，我们有着比以前更充分的取得决战胜利的一切条件，这个胜利将更大的扩大联络各个苏区与取得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将根本击破帝国主义经过国民党来完全殖民地化中国的计划，而使我们与帝国主义者武力冲突成为必不可免的前途。正因为这样，所以新的五次“围剿”是比以前的四次“围剿”更加残酷与剧烈的战争。要胜利的粉碎这次“围剿”，要争取民族危机与经济浩劫中的苏维埃的出路，那我们必须

紧张我们一切的努力，动员尽可能的广大的群众去参加革命斗争与革命战争。

五，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央认为更加迫切的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去实现下列的紧急的战斗任务。

（1）苏区的党的组织：

甲、必须立即战斗的动员群众，在"粉碎敌人的新的五次围剿"，"保卫与扩大苏区"，"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等口号的周围，广大的解释阶级敌人新的进攻的形势，及我们有充分的条件粉碎这个进攻，号召全苏区的群众热烈参加革命战争，保卫苏维埃。

乙、继续以突击的精神猛烈扩大红军，在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之下，创立新的军团，新的师。必须在规定的时期完成中革军委最近的动员计划，必须在短期内增加一倍至一倍以上的红军的实力。继续采取一切方法来提高红军的军事技术，自觉的阶级的纪律与政治觉悟。扩大与加强赤卫军少先队的军事政治的训练，使赤少队成为红军现成的后备军，在军事机关一声号召之下，立即加入红军，这是从实际上准备过渡到义务兵役制的步骤。

丙、必须以极大的注意来开展苏区周围以及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创立新的游击区域。必须保证游击队中坚强的军事与政治的领导，向游击队中脱离及违背党和苏维埃政策的举动作无情的斗争。游击战争的开展。是主力红军在决定胜负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

丁、红军各部之间，必须在整个的战略意志之下，遂行战斗的任务。中革军委应集中与加强对于各个苏区工农红军的领导，以保证更好的互相呼应与行动的配合。

戊、加强与改善各级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中央政府必须以更大的努力来加强自己对于各个苏区的领导作用，并采用各种具体的方法来组织与援助国民党统治区域中的群众的革命斗争。最大限度的开展与深入苏区内部的阶级斗争，经过查田运动去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消灭地主的残余，削弱富农的力量，镇压一切反革命的企图和活动。同时在查田运动中，必须以最大注意去巩固与中农的联盟。加紧开展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严厉的与一切忽视工人日常利益的倾向斗争，这样去加强工人在苏维埃及红军中的领导。在这个基础上采用广大的民主主义及自我批评来准备第二次全苏大会。

已、为着保证红军的给养与供给，及进一步的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党及苏维埃政府必须进行必要的经济建设。合作社运动之开展，是这个战线上的主要的一环。秋收与食粮收集储藏运动，同样是目前战斗的任务。利用冬季农闲时节进行大规模的河道水利灌溉之修理与增添，是保证明年春耕运动胜利的前提。党必须与借口战争不管一切经济上的建设，或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忽视战争动员的倾向斗争。

庚、党必须加强在附近苏区的白区中的工作。这里首先应该利用一切军阀的压迫，苛捐杂税，地主的榨取，提出具体的口号，以开展群众斗争，吸引到更高的阶段，和红军的行动配合起来。在这方面，我们的注意力应首先放在大的中心城市及工人集中的区域中去。

（2）国民党统治区域中的党的组织：

甲、必须立即进行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新的进攻苏区的广大的煽动，指出这个进攻与国民党的出卖中国的政策和资本进攻是不可分离的。号召与组织反对进攻苏区的示威，抗议，罢工游行，集会与群众会议。在码头与运输工人中组织警备委员会，阻止一切进攻苏区的军火的运输。发动最广大的群众，在"集中全国兵力开赴华北收复失地"的口号之下，反对调

兵入赣，提高每个群众的斗争，使它和反对国民党对苏区红军的进攻联结起来。

乙、开展与加强反帝运动中无产阶级的领导。必须以最大的力量去执行中央最近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信及致满洲省委的信，大胆的广泛的应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尽可能的利用一切公开半公开的可能，应利用反帝非战同盟代表会的举行，来开展反帝的斗争。必须利用每一个帝国主义侵略与国民党的卖国的事实，进行广泛群众鼓动，揭破国民党一切的武断宣传。党必须以最大的注意去争取我们对于满洲及河北的游击运动的领导。必须尽量的在群众中，在反帝的宣传鼓动中，普遍“中国民众与苏联的兄弟联盟”的口中。

丙、集中党的注意力，在最受资本进攻威胁的企业中去进行坚苦的群众工作，组织工人阶级的反抗，采取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以孤立反革命派，与增强我们与群众的联系。必须具体的开始建立群众的赤色工会与争取国民党工会工人的工作。

丁、领导成千成万失业工人，灾民，难民，兵士，广大的农民群众，为了日常利益而斗争。从领导他们的斗争中，使他们参加到斗争中来，引导他们走向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斗争，走向为了苏维埃的中国的出路而斗争的道路。

对于灾民，难民的工作，因今年的新的水灾的形成，也特别占到了重要的地位。对于各地发展着的游击战争，党应该用极大的力量去领导与组织，使他们走向创造新苏区的道路。在士兵群众中，我们的任务不是简单的个别士兵的拖枪逃走，而是在士兵中进行领导他们日常的斗争，组织士兵到士兵委员会或反日会中，组织大批的士兵的暴动与哗变，为创造新的苏维埃区域而斗争。在国民经济总崩溃，水旱灾荒日益发展的情形之下，党对于群众日常斗争的领导，同争取苏维埃中国的任务，是丝毫不能分开的。

（3）但是要完成这些伟大的任务，我们必须扩大与巩固我们的党——中国革命的唯一领导者。开展党内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与罗明路线的思想斗争。把一切对于党的战斗任务消极，怠工或感觉到疲倦的分子，驱逐出去。吸收大批的新的工人干部到党内来，教育他们担任党的领导工作。党必须用耐心的详细的解释工作，发展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使全体党员同志了解目前五次“围剿”的形势与我们党所负担的伟大的历史任务，提高他们最大限度的积极性，转变一切党内旧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作风，把工作重心放到支部，深入到群众中去，学习领导群众的艺术，领导千百万工农群众来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依靠千千万万工农群众的力量上来坚决执行共产国际与党中央的正确指示，克服一切我们在发展中的与胜利中的困难。我们相信，我们不但能够击破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五次“围剿”，而且能够取得苏维埃政权在全中国的胜利！

中共中央委员会

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三次全会论中国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

一 “在中国——是战争、武装干涉和革命”

共产国际执委最近一次（第十二次）全会已经指出，资本主义底相对稳定已经完结。自从资本主义相对稳定完结以后，资本主义总危机底发展已使全世界资本主义系统动摇得更加深遽了。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底靠山——苏联——扩展着社会主义建设和日益增强自己的力量；而资本主义世界底经济，却正在崩溃下去。在资本主义的世界里，贫穷、破产和饥荒底锁炼日益加紧束缚着。资产阶级用法西斯蒂暴力压迫和抢夺劳动阶级的办法，用强盗战争反对别国人民的办法，来疯狂地加强自己的经济剥削方法，可是同时，劳动群众底革命义愤，劳动群众要推翻剥削阶级底不堪忍受的压迫的决心，也日益增长着。

资本主义各国内部阶级矛盾和国际冲突底异常紧张，证明革命危机底客观前提已经成熟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于在现时，世界简直已经紧紧逼近到革命与战争底新周期……

资产阶级日益不相信单用加紧剥削本国劳动者的方法可以找到逃出危机的出路，于是帝国主义者就以战争为主要方针。国际状况现在带着新的世界大战前夜底性质。

（一）新的世界大战底火焰，正在太平洋沿岸延烧起来。日本军阀为地主资产阶级帝制最深刻的内部危机所驱使，继续向中国进行掠夺战争，既已利用国民党底帮助征服华北，又正在准备攻打蒙古人民共和国。英帝国主义正在伸手夺取中国东南各省、西藏和四川，法帝国主义正在伸手夺取云南。日本法西斯蒂军阀是反对中国反帝土地革命的冲锋队。美国、日本和英国帝国主义，站在国民党背后，帮助对着中国唯一的人民政权——中国苏维埃举行第六次“围剿”。中国苏维埃革命底胜利，东三省底游击战争，日本革命势力底增长，各殖民地人民底解放运动，这都在帝国主义者后方造成新战线。中国苏维埃革命已经成为世界革命底巨大因素。

必须根据苏联工人和集体庄员在农民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一切战线上得到的伟大胜利底实际经验，顾计各国底特殊条件，而向每一国底劳动者明白提出一个纲领，使他们看清，苏维埃制度在他们本国将给他们什么好处。在这里，须要特别指出，在苏维埃制度之下，失业现象和朝不保夕的忧惧情形一定会消灭，劳动条件和社会保险会经常改良，而同时工作时间又减少；乡村劳动者会摆脱一切封建残余和各种束缚；无地和地少的农民一定会得到土地；贫农会得到赞助，农民合作社及集体农庄会得到帮助；青年工人及一切劳动者底文化，将能完全自由发展等等。

苏维埃政权底基础，是工人和半无产者底群众组织，所以它能使过去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群众，真正有普遍地享用民主权利的可能。

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底国家形式。

苏维埃政权，是保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底国家形式（中国及其他各国）。

对劳动者说来，它是民主制，可是对剥削者说来，它却是无情的专政。

（摘自《关于法西斯主义、战争危险与各国共产党底任务决议案》）

二 反对白色恐怖

无产者们！全世界底劳动者们！共产主义者们！

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内，工人阶级优秀分子底鲜血都正在流着。德国法西斯蒂与国民党刽子手举行竞赛，争着来残杀工人阶级底先进战士，争着来拷打、虐待、强迫和侮辱革命工人。中世纪刑罚底残酷，却远不及民族社会党人和蒋介石底残忍。

据红色救济会底统计，单是最近一年来，资本主义和殖民地各国受苦刑而死的和被惨杀的革命家，就有四万六千人，受伤和残废的有十六万人，被捕的有二十二万八千人……

在柏林和上海，在东京和东三省，在索非亚和瓦萨，在南洋群岛和安南，各处的奴隶主和军阀都在残杀革命战士。

蒋介石招聘德国、英国和美国的将军及社会民主党的警察总监格津斯基之流，成千成万地屠杀中国革命的工农。去年秋，上海工人反战集会者被捕，全体被捕者一律就地枪决。一九三三年夏，国民党刽子手拘捕了一百五十个参加反法西斯蒂代表大会的人，把他们解到南京残杀了。

在日本，执政的法西斯蒂派，两年以来拘捕了一万五千革命的工农和兵士下狱。数十个日本共产党员被杀了。在东三省、高丽、台湾，因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强盗而被残杀的有数万人。

在南洋群岛，荷兰奴隶主实行残杀"七省"军舰上武装起义的水兵。

在安南，"民主"的法国用枪炮镇压本地武装起义者。

在印度、亚剌伯及巴勒斯坦，英帝国主义者成千成万地枪杀反抗殖民地压迫制度的劳动者……

到处都来进行群众抗议运动，以反对在德国、中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法西斯蒂恐怖吧！……

起来和凶残的法西斯蒂恐怖作斗争吧！

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三次全会，号召共产国际一切分部，号召全世界工人和劳动者，以极大的牺牲精神来保护苏联去反对帝国主义者底反革命阴谋，来保护中国革命及其苏维埃政权，使之不受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

（摘自《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三次全会底宣言》）

中共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通过)

(一)共产国际十二次全会在对于目前世界形势的分析中指出:"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终结已经开始,但在最重要的与有决定意义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还没有直接革命的形势。目前正处在走向阶级与阶级间国家与国家间的伟大冲突的新阶段——即走向革命与战争的新阶段的过渡期中"。

五中全会毫无保留地接受共产国际这个有历史意义的基本论点,并责成全党,以布尔塞维克的坚持性,来彻底的实现从这个结论中产生起来的党当前的伟大的负责的任务。

一年来的事变的发展,完全证明了十二次全会的论断之正确。全会以后事变发展之总和,正是明显的带着过渡到新的战争与革命的性质。

社会主义建设在苏联飞速的跃进着,它以惊人的速度实现了工业化、集体化与文化革命的计划,正向没有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大踏步的迈进。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一年之成功,不仅在经济上,更大的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的独立性,而且在国防上亦大大的提高了起来,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苏联的国际意义及其对于世界劳苦群众的革命影响,日益增高。因而引起了帝国主义列强之愤恨与嫉视。他们正在进行各种的阴谋挑衅与军事准备来进行反对苏联的战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它正在疯狂般的准备反苏联的军事冒险。同时正因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国防力量之增高与彻底的和平政策,使得许多帝国主义的国家不能不在苏联和平政策之下屈服,而与苏联订立不侵犯条约及恢复邦交。

经济危机之发展促使资本主义系统更进一步的崩溃,而且明显的带着战前的性质,各国资产阶级企图用以克服经济危机的手段,同时亦即是准备新的战争的手段。罗斯福的复兴运动的"试验"遭受到完全失败。德国法西斯诡诈阴谋,并没有减少失业工人。资本主义世界中剧烈的进行着经济战争,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之失败,证明帝国主义放弃了谈判与外交辞令,而代之以剧烈的关税壁垒与货币战争及新的帝国主义大战准备,而日内瓦"军缩"会议的"结果"则是美、日、英、法、意帝国主义列强的扩大军备的宣言,法西斯蒂德国要求武装的合法权利的喊叫,帝国主义在中国飞机大炮轰炸雷鸣和新的反苏联战争的准备。英美,美日,英日间的冲突,首先在争夺中国方面,在太平洋上,正在迅速的增长着。希特勒的登台增加了欧洲帝国主义间的冲突。在增长着的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前面,国际联盟正处在分崩离析与解体的状态之中。战争是可以在任何一个口实之下爆发起来。同时帝国主义者正在企图暂时和缓自己之间的生长着的矛盾,以便首先爆发一个反苏联的战争。世界无产阶级与劳苦群众正逼临着战争的威胁。

波兰、捷克斯拉夫、英国、美国、中国及其他国家工人之顽强的罢工,波兰农民暴动,西班牙土地革命之发展,中国苏区之扩大和巩固,印度北方之农民暴动,斯脱拉堡之巷战,以及帝国主义国家士兵与海军中之骚动,证明虽然革命运动之发展还是不平衡的,但明显的带着走向新的

革命与战争的过渡性质。帝国主义者资本家地主军阀则以更加利害的压迫剥削，更加疯狂的法西斯蒂恐怖，更加以剧烈的战争，进攻中国民众及苏维埃政权，来回答这个群众革命斗争的高涨。

第二国际下的各国社会民主党和亚姆斯国际的黄色工会，更在法西斯化的过程中前进了几步，不但德国的"社会主义"法西斯蒂和黄色工会领袖完全投降希特勒，而且在法英及其他各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亦公开的替法西斯蒂做清道夫的工作，竭力阻止无产阶级的胜利。

第二国际正在崩溃着，投降各个独立的社会法西斯蒂政党，这个过程还没有完结，因为战争还没有爆发。这种崩溃的过程，正是反映着过渡时期之特点。各国社会民主党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持，正在各自为了自己的主人准备战争。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之伟大胜利，帝国主义间的矛盾的增长，经济战争，扩张军备，反苏联战争准备，革命运动之发展，及第二国际之崩溃，都证明着"走向革命与战争新阶段"的过渡是迅速地加紧着。

(二)一年来事变之开展，证明十二次全会之论断——在中国存在着革命形势之完全正确，中国正处在尖锐的革命形势之中，最深刻的民族危机影响到民族生命之一切形态。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已到了新的高的阶段——即是直接瓜分中国的阶段。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保证着这个政策之加速度的进行。日本帝国主义者不但占领了满洲与热河，而且已经实际地统治了华北。正在经过它忠实的走狗——国民党及组织内蒙的王公，而准备最后地占领整个黄河以北的中国领土。同时日本帝国主义猛烈地巩固它在长江流域的地位及依据台湾为根据地加强着它在福建的阵地，准备着在一个适当的口实之下，公开的占领福建，它的势力亦正深入于广东。日本帝国主义正以全力来争取自己在中国的优势，并将中国变成为自己的奴隶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侵略步骤与军事布置都是为着一个目的：准备着进攻苏联的战争及争取太平洋上主人翁地位的帝国主义战争。

英国帝国主义赞助着日本侵略，只不过企图将日本的刀锋离开它自己的势力范围，而转向北方进攻苏联。同时它公开的经过西藏的傀儡进攻四川和青海。在新疆事变的幕后亦明显的看到英帝国主义的血手。虽然英日帝国主义间的矛盾是增加着，但是这不会减弱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相反地，帝国主义所遭遇着的增长着的困难，只有增加他们侵略的贪欲。

法帝国主义一样的利用安南的优越地位而操纵云南、贵州、广西的统治，并时刻准备着公开地占领这些区域。

美国帝国主义正在狂热的准备着与日本帝国主义争取太平洋霸权的强盗战争。同时它在帝国主义强盗反苏联的挑衅与战争准备上成为更加积极的因素。美国帝国主义尽力的企图维持和加强它对国民党政权的影响，经过这个工具来奴役中国民众，使中国成为美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它以棉麦借款帮助国民党进攻中国革命和中国民众，摧残中国经济，奴役中国民众。

国际联盟积极的参加和组织瓜分中国奴役中国的计划及反苏联战争准备。"九一八"事变以来，国际联盟尽量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夺取中国领土，摧残和屠杀中国的民众。国联的一些"反日"的决议，与日本之"退出"国联的滑稽戏，只不过是帝国主义内部的冲突的反映，和用来欺骗中国民众及世界劳苦群众的烟幕弹。

可是不管在瓜分中国上帝国主义者内部的冲突是怎样的剧烈，但是他们都一致地积极地指挥和组织国民党对于中国苏维埃的疯狂的进攻。因为他们知道，苏维埃中国之存在，是帝国

主义者进行瓜分中国将中国变为完全的殖民地的计划的最大障碍。为着实现完全瓜分与奴役中国的计划，各个帝国主义列强一致的组织反对苏维埃中国的反革命战争，供给国民党以金钱枪炮飞机与军事专家，企图将中国苏维埃及几千万苏区劳苦群众沉没在血海之中。

(三)中国经济状况是一幅崩溃破产失业饥饿的悲惨的图画。这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中国之结果。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侵略，更使中国的经济状况极度的恶化起来。

农村的危机已经达到空前的极点，农村经济在完全毁灭的状态之中。日本帝国主义的轰炸与掠夺，洋米洋麦与人造丝的倾销，军阀的搜括，内战与强迫种鸦片，巨大的水灾和其他灾难，使千百万农民群众饥饿死亡，流离失所。丝茶与其他的特殊的生产品，是全部的毁灭了。家庭手工业是被资本主义的倾销消灭了。米麦及其他基本的农产品，在洋米洋麦倾销之下，即使在良好的收获状态之中，亦不能够抵偿成本与劳动力的消耗，及满足军阀地主高利贷的贪欲。广大的农民群众正在饿饭。几千百万农民没有饭吃，没有地种，没有地方可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们在漂泊的难民队中挨冷受饿，忍受着非人的痛苦与死亡。

民族工业也在崩溃的状态之中，重工业差不多全部都被帝国主义霸占着，棉业、丝业及其他轻工业是在破产的状态之中，许多工厂关门，许多工厂减少工作的日子，中外资本家同样毒辣地减少工人阶级的饿饭工资和恶化他们工作的条件。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工人是失业了，他们得不到任何的救济，在都市中街道上流浪着，过着悲惨痛苦的非人的"生活"。

农村经济之浩劫，民族工业的衰落，与世界经济恐慌之深刻化，影响到整个国内国外贸易之惊人地锐减，入超更大大的增加，国内市场的缩小，更使国内商业处于停滞和破产的情况之中。

与国民经济崩溃与浩劫并驾齐驱的，是帝国主义经济势力的激增。巨额的入超在数量上超过了整个中国的出口数，大批的投资于准备战争与镇压革命运动的军事工业，长途航空线的设立，重工业甚至轻工业中帝国主义的资本已经占取着垄断的地位。大批的借款，不仅在财政上资助反命革的统治来屠杀中国民众以尽其清道夫的作用，而且更进一步加紧中国农村经济崩溃的过程，和巩固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统治。

(四)暴风雨般的群众的革命斗争的烈火，在广大的中国领土上燃烧着。不管国民党和帝国主义残酷的恐怖和压迫，然而城市中的工人更多集合于他们自己革命的政党即中国共产党的周围而战斗。不管黄色工会领袖的出卖，而反对中外资本家的空前未有的伟大的罢工却时常爆发起来，罢工的人数是逐年的增加着，最近两年来的罢工人数远超过于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时代。斗争的性质是异常坚持与顽强，常常为着达到自己的要求，工人群众不惜接一连二的利用罢工的武器。罢工工人的热烈战斗热情，更加明显的显露了罢工的革命反攻的性质。工人群众常常以革命的自卫来回答资本家、国民党当局、军警与工贼之残酷的恐怖，罢工工人与军警之肉搏冲突是屡见不鲜的事实。罢工斗争不仅在地域上普遍到全中国，而且牵动到一切的生产部门，浓厚的政治性的反帝国主义罢工，更加清楚的显露了工人阶级在反帝运动中之领导作用。

农民的抗税抗债抗租分粮的斗争，往往发展到武装暴动，发展到游击队的建立。农民自己将土地革命旗帜非常显明地高举起来。为着挽救自己的死亡与饥饿，农民群众坚决的平民式地没收和分配地主豪绅的粮食与土地。在反帝国主义斗争及土地革命的影响之下，国民党部队的瓦解，是在急速的成熟着，广大的士兵群众的反对进攻红军要求抗日的斗争是在开展着，兵变与暴动不断的产生。在帝国主义国民党官僚及自己的封建剥削者压迫之下的少数民族，

亦开始被吸引到革命斗争的舞台上来。为争取弱小民族的解放,为争取土地,为推翻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军阀官僚和自己的封建剥削者而斗争。

国民党的投降与卖国,及其对于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残酷的压迫,非但不能阻止群众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的发展,而且相反的使反帝运动正在脱离对民族主义的幻想与国民党的影响,坚持自己的队伍,驱逐自己队伍中的动摇分子与反动领袖,而团集在共产党的"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周围。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游击战是越发发展起来了,满洲人民革命军与义勇军,在困难的条件之下,坚决的进行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

(五)中国革命形势存在的最好标志就是苏维埃运动增长,胜利与成功,它的力量一天比一天的更加坚强与雄大,苏维埃运动已经成为中国革命有力的柱石,成为一切国民党区域中群众斗争所环绕着的太阳,并使中国革命成为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民众革命的先锋队。

苏区的工人和农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了自己的苏维埃政权,获得了土地,工作与自由,真实的改善与提高了经济的文化的生活。整个的力量与热忱,卷入了建设新的工农民主专政的国家建设工作之中,卷入于神圣的保卫苏维埃领土的革命战争之中。伟大的常胜的铁的红军是创立起来,接连粉碎了帝国主义国民党集其全力进行的四次大举进攻,不仅保卫了原有的苏区,而且大大地扩大了苏维埃版图,在广大的中国西北部创立大块的川陕苏区。得着全中国几万万劳苦群众拥护的苏维埃运动,是坚强不可战胜的力量。苏区劳苦群众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成功与胜利的经验,给全中国的民众指出:只有反帝国主义土地革命的胜利,国民党统治的推翻,苏维埃中国的确立,才能解放中国,统一中国,脱离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奴役,脱离剥削压迫饥饿失业和非人的法西斯蒂恐怖。

目前的形势,是中国领土内存在着的两个绝对相反的政权,两个绝对相反的世界,正在进行生死存亡的斗争。在中国及中国的劳苦群众面前尖锐的摆着一个问题:或者是直接的和经过国民党的工具而变为帝国主义的奴隶殖民地,或者是反帝国主义土地革命的胜利,苏维埃政权在全中国的确立。

在屡次失败之后的帝国主义国民党,正动员其所能动员的一切力量向着中央苏区作绝望的进攻,这个进攻已经继续了几个月。但是由于工农红军的英勇善战,由于全中国苏区与国民党区域中千百万劳苦群众的拥护,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之发展,蒋介石五次"围剿"的原有计划是失败了。但是五次"围剿"还没有全结,蒋介石的变更作战的部署,只是为了他能够最迅速的经过福建来从东方侵入基本苏区,继续他的五次"围剿",决定胜负的决战还在前面。每个工人农民,每个赤色的战士,每个革命者,在这个紧张与负责的关头,必须以一切办法来准备迎接这个决定胜负的战斗,而取得其胜利。这个胜利,将实现一省或数省的苏维埃革命首先胜利,并奠定苏维埃革命在全中国胜利的强固基础。

(六)民族危机之深刻化,苏维埃运动之成功与胜利,革命形势的开展,最清楚的显示了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统治的破产。国民党最无耻地投降帝国主义,出卖中国,卑污地担任着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清道夫的作用,蒋介石已经公开宣言"谁言抗日者立斩无赦",这个宣言最清楚地暴露了国民党政府之完全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在理论上实际上,都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毫无顾忌的代言人与走狗。它压迫中国民众的抵货运动和反帝国主义的其他一切行动。压迫反日的义勇军,缴义勇军的械。依靠帝国主义的帮助,实行其进攻苏区的大规模的战争。用白色恐怖屠杀和拷打中国工农,为的是要延长他们的残酷剥削,要增加几万万群众的痛

苦和饥饿。它与日本帝国主义订立塘沽协定，实际上将黄河以北的中国领土全部的交给日本帝国主义。它毫无顾忌地进行中国直接交涉，更大的出卖中国与激励其他帝国主义的贪欲。

国民党广东系的反对南京政府，用抗日的宣传来粉饰自己，这是企图欺骗民众和获得群众拥护以维持其破产的统治。广东系的抗日宣传，同时是英日帝国主义间生长着的对立的反映，其结果是广东系在英帝国主义面前，尽其极端卑鄙献媚之能事。同时广东系又与日本帝国主义谈判借款，推进日货的倾销，使日货由广州而深入中国。

华北的军阀，尤其是南京政府所委任的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主席黄郛，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他们与"满洲国"汉奸没有丝毫的差别，他们准备建立一个公开的日本的傀儡政权，充当日本忠顺的工具。只要日本帝国主义视为可以不必顾虑其他帝国主义在北方的利益的时机已经成熟的时候，他们就要干起来。

云南和贵州的省政府完全被法帝国主义所支配，英帝国主义日益统治广东和四川省政府。从此所呈现的一幅图画里，可以看出国民党和封建军阀将中国出卖给外国帝国主义，已经达到了什么程度。

十九路军之公开揭树独立的旗帜，抛弃国民党的外衣，创立所谓人民革命政府和提出一些"左"的革命空话及武断宣传，这是证明着国民党内部的纷争与崩溃的深刻。"人民革命政府"存在以来一个月多的事实，证明它的一切空喊与革革的词句，这不过是一部分以前国民党的领袖及政客们的一种欺骗民众的把戏。他们并不是为了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是为了要维持这个统治，为了阻止和妨碍中国民众胜利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和向着苏维埃道路的迈进。

被民族危机国民党经济浩劫及群众革命斗争所震慑着的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内部矛盾冲突和崩溃，正在激烈的增长着。这种矛盾和冲突同时正是反映国际帝国主义者正各自利用各个军阀的集团，为着侵略与瓜分中国清除道路。统治阶级内部的纷争和冲突，财政上增长的困难，与反革命之武断宣传与欺骗之破产，都促使反革命的统治在政治上军事上之日渐削弱与促进他们的没落的速度。蒋介石及蒋系法西斯蒂独裁的企图，并不表示国民党统治之坚强，恰恰相反，反映着国民党统治之破产与革命势力之加强，因而需要整个统治在个人独裁的支配之下，集中一切反动势力来镇压革命。福建事变同样是证明着：依国民党的旧的方式来继续统治是不可能的了，所以有一部分的军阀与政客想以毁弃国民党旗帜来引诱民众，而维持地主资产阶级之政权。而所谓人民革命政府存在的短短的历史与其惨酷的破产，已经足够的证明在中国人民面前只有两条道路：或者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殖民地的道路；或者是反帝国主义土地革命的胜利苏维埃的道路，中间的出路是没有的。在这种情形之下，党在动员广大的劳苦群众，为着粉碎五次"围剿"，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中，"必须最谨慎周到细心敏捷地，一方面，利用敌人间每一个(即令是最小的)可能机会间隙，利用……各种资产阶级间每个利益的冲突。他方面，利用每一个(即令是最小的)可能机会，以获得群众的联盟者，尽管这个联盟者是一时的、动摇的、不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都不要紧"(列宁)。而同时，必须集中火力反对一切反革命的改良主义的派别(社会民主党，AB团，生产党等等)，这些派别目前以找寻殖民地道路与苏维埃道路之间的中间道路为标榜，而实际上则是为着挽救破产的反革命的统治，并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强盗行为放射烟幕弹。

(七)四中全会后三年来的事变与党在领导群众斗争中所获得的伟大成绩，愈益明显地显示了四中全会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大意义。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在坚决的两条战线斗争

的基础上，四中全会一方面击溃了以立三同志为首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半托洛茨基的路线，严厉的指斥了当时政治局某几个同志对于共产国际路线的虚伪的两面派的态度；另一方面严厉的打击了右派的取消主义者，他们企图利用党内一部分工人干部对立三主义及调和主义之不满，进行党内斗争。这个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和党的领导机关之革新，政治路线之纠正，奠定了党内工作全部转变的基础，保证了党在思想上行动上的布尔塞维克的一致与坚定，四中全会完成了党在布尔塞维克化方面极大的进步。

四中全会以后，中央政治局在艰苦的环境之下，忠实地执行着共产国际与四中全会的路线，坚持地进行了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倾向和动摇，粉碎了各种机会主义(如职工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北方落后论及苏区中的罗明路线等)。在实际工作中间，开始了党的全部工作之彻底转变，得到许多重要的成功与胜利。

五中全会指出，在这个时期内党的最大的成绩就是在：巩固的苏维埃根据地之创立，工农红军数量与质量上的扩大及提高，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建立及其在全国民众中影响与威信的增高，反革命的阴谋的扑灭与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屡次的疯狂的进攻苏区。在苏区中党的政治组织的工作都有很大的进步，这首先在中央苏区方面，土地革命问题在基本的苏区已经彻底的解决了，工农联盟在这个基础上大大的巩固了，广大的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与创造性是提高了，他们积极的参加保卫苏区的斗争，加入红军，组织游击队，保证红军的给养与供给，伟大的经济建设与文化革命正在开始，苏维埃代表会议制度的确立，更加密切了苏维埃与群众的联系，吸收更广大的群众参加国家的建设工作。

然而在苏区党的工作中，严重的弱点还是很明白的暴露着。特别是边区新区的薄弱，游击战争开展异常不足，环绕在苏区周围的国民党统治区域工作中的薄弱，工作中的强迫命令的存在，许多区域中首先是鄂豫皖与川陕，工会工作之不可容忍的薄弱等。

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区域中，在非人的白色恐怖的统治之下，共产党的工作处于极端困难的地下党的条件之中。虽然如此，党依旧生长着，活跃着，加强着自己的影响，在许多省分中党得着了一些成绩与进步。党不顾一切困难与恐怖，努力发动与争取反日反帝运动的领导，组织与争取反日义勇军，团集他们在彻底的革命政纲周围。党努力的加强自己对于罢工运动的准备与领导。在许多省分中党加强了农民运动的领导，尽量提高农民斗争的积极性与觉悟程度，发展革命的游击战争，在陕甘边创立了新的红军部队与苏维埃根据地。五中全会着重的指出，在白区中党的工作，是太薄弱，尤其是许多重要的产业中心城市党的工作的状况是很严重的。党的最大的弱点，是在工会工作之极端不够，对于工会工作之估计不足及其忽视的倾向依然存在着，罢工之准备及领导不足，结果使工人阶级的若干重要部分仍旧在国民党黄色工会领袖的笼罩之下。党与工厂的联系极端的微弱，赤色工会没有能真实地转变为广大的群众工会。在反帝运动中建立广大下层统一战线的工作依然没有应得的成绩，因此，在反帝运动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亦不能加强起来。在农村中缺乏有计划的坚持的工作，玩弄游击战争，而在许多条件成熟的区域中则不能迅速的彻底实现土地革命，因而使我们游击队遭受到失败，瓦解白军士兵工作极薄弱。党在组织上的巩固，尚远远的落后于政治影响的开展，这些严重的弱点，必须迅速的克服，这是争取中国革命胜利的前提。

(八)尖锐的革命形势的存在，要求党千百倍的加强自己的革命群众工作，用一切力量经过广大的下层统一战线的运用去夺取群众，组织群众，准备群众，领导群众，在发动他们的经济和政治的日常斗争中，提高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和领导他们为着民族危机与经济浩劫中

的革命出路而斗争，为着苏维埃中国而斗争。这个斗争之胜利，紧密的联结于完全与彻底的粉碎五次“围剿”的斗争，因为五次“围剿”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在它殖民地化中国中间的最具体与凶恶的步骤，而粉碎五次“围剿”的斗争，即是阻止中国走向殖民地道路的斗争，即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动员全部力量，为着完全与彻底的粉碎五次“围剿”而斗争，这是当前战斗的紧急任务。

为着完成这个光荣的伟大的任务：

甲 在苏区的党的组织，应该以布尔塞维克的坚强与努力来完成下列的任务：

（1）动员一切力量，一切资源，发扬党和群众的积极性到最高限度来扩大和巩固红军，将一切其他的任务围绕在这个任务的周围。一切党的工作，应该在“一切为着国内战争前线上的胜利”的列宁口号之下进行。尖锐的革命形势，要求我们在尽可能的短时期内，实现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必须加强党的群众的青年的妇女的组织，使他们在动员新的战斗力量上起更大的作用。尤其重要的，健全赤卫军和少先队的组织，使他们变成为红军的现成的有良好训练的后备军与地方部队。在党的领导之下，红军已经在行动上达到高度的配合，这是由于红军战士的明确的阶级意识，自觉的铁的纪律，组织与战斗经验的丰富，政治与军事领导的改善与加强。虽然如此，决不能丝毫的放松继续加强与改善这个工作，每一个革命者必须以提高红军的军事技术战术的素养，提高阶级的觉悟与自觉的铁的纪律，为自己的职责和任务。更加须要红军各部队在一个统一战略意志之下，进行战斗的任务，更加须要将川陕苏区与鄂豫皖苏区及红二军团的部队的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任务与中央苏区的伟大的任务配合起来。极端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在敌人后方的侧翼，与苏区的周围开展游击战争，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组织群众参加斗争，发展土地革命与新的苏区。游击队必须成为土地革命的发动者与组织者，党和苏维埃政权影响之散布者与群众武装斗争之骨干。

（2）加紧与改善苏维埃工作，使苏维埃政权更加强与密切自己与千百万劳苦群众的联系，吸收他们最积极的分子参加管理国家行政与各方面的活动。必须继续的坚持进行反对暗藏在苏维埃机关中之阶级异己分子之斗争。必须广大的开展反对苏维埃机关中的个别的贪污腐化浪费公款及官僚主义的分子的斗争，这个斗争除掉健全工农检查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个别的打击和反对具体的罪恶的负责者外，还必须与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文化革命及吸引更广大的群众参加与监督苏维埃的工作联结起来，与发展苏维埃的民主主义及自我批评联结起来。上级的苏维埃政府（中央政府各省政府）必须加强对于下级苏维埃工作之领导。尤其重要的是他们不仅要成为苏维埃工农之政权机关，而且要成为白区劳苦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斗争之组织者和领导者。

（3）正确的实行苏维埃的土地的经济的政策，是国内战争与经济封锁之中加强苏维埃政权权力与影响之重要的方法与步骤。土地革命之彻底进行，在基本的苏区之中，已经有着伟大的进步。但在新苏区与一部分边境区域中，土地问题依然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那里屡次为党所指斥的错误的办法与“富农路线”，还是部分地或多或少地执行着。因此在土地革命已彻底实行了的基本区域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将这些土地在农民手中稳固起来。党和苏维埃政权应采用一切力量与方法，来提高与组织农民群众的生产与劳动热忱，组织广大的耕种与收获的运动，使得土地生产量大大的提高。党和苏维埃必须以极大的注意来进行河道灌溉，水利的修整与开发，工具耕牛之适当的分配与增加劳动力调剂互助之组织，科学的农事知识之灌施与传布。而在那些土地问题还没有解决的区域，基本问题即在依据党的历次的指示，迅

速进行没收一切地主阶级土地及大的私有土地将他在雇农、苦力、贫农、中农之间平均分配，并且必须迅速的进行查田运动，使土地革命的利益完全落在最基本群众身上。在经济建设的范围，目前最主要的是广大的发展各种各色的合作社的组织，恢复那已经破坏了的手工业的生产，与活跃苏区内部和苏区与白区之间的贸易商业，这样来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及更进的改善工农生活。

（4）为着实现在苏区党面前的伟大的任务，必须努力地扩大、加强、健全一切苏区内的党的工人的青年的妇女的以及一切群众的组织。

苏区的工会是工农民主专政的台柱，是苏维埃政权最可靠的支柱，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党必须将工会工作提到最高的水平，必须克服对于工会工作的忽视。苏区的工会必须坚决地在保卫工人阶级的日常利益的斗争中，在改善工人的经济的文化的生活中，吸收最广大的工人群众来积极的参加革命战争与苏维埃建设的各方面，党应该提出并实现"每一个苏区工人应该是工会会员"的口号。青年工人与农民在革命与战争中的伟大作用，已经在国内战争，经济与文化建设的各方面表现了起来。党必须更加注意青年中的工作和他们的经济和文化的需要。青年团必须在最短时期内迅速的转变为比现在更大几倍的青年工人半无产阶级贫农及中农中的觉悟分子的群众的组织，必须以最大的注意来开展在团员中间的共产主义列宁主义的教育，青年团应该成为在一切战线上的尖兵与党的第一个助手。

必须根据党以前的决议案来健全各个区域中的女工农妇代表会的工作，吸收最广大的工农妇女群众积极的参加经济与文化的建设。

在严重剧烈的国内战争的环境之中，加强党的组织，健全党的组织，使他能够适应迅速变化着的国内战争的环境，是一个重要的任务。苏区的党必须最大限度注意到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和团的组织，必须训练工人的新干部，提拔他们到领导的机关，必须将阶级异己分子和不可靠的分子从组织上肃清出去。加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与坚强不倦息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是保证党能完成自己的伟大任务的保证。

乙　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中党的任务是：

（1）用最大的力量去准备、组织领导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在尖锐的革命形势之下，罢工的意义是极大的增涨了，党必须将整个注意力放到我们这个工作的最薄弱的一环而求得坚决的转变。党的全部力量应放到工厂、工会罢工上面，这里我们的注意首先应该集中在重要的工业中心，最受资本进攻威胁的大的工厂之内——尤其是许多接近苏区的工业中心城市中。五中全会严厉的指斥许多地方组织及个别党员的忽视工会工作的倾向，并且认为忽视和躲避工会工作的人不能算是共产党员。为克服工会工作的落后，五中全会责成每一个组织，自中央至支部，订立具体的工作计划，这个计划中，还必须包括着在大的工厂和企业中组织巨大的赤色反对派小组，及群众的赤色工会筹备委员会的各种具体步骤，并经常的检查其执行的程度，加强我们在工厂中的影响。胜利的领导罢工斗争的锁钥，是广大的运用下层统一战线，只有在正确的下层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只有为着工人为着每一个细小的要求在坚持不挠的斗争中，我们才能够争取工人到我们方面来，才能够建立群众的赤色反对派与赤色小组，才能够胜利的领导罢工，及隔绝黄色领袖在工人中的影响，对于每一个罢工，党必须郑重的准备，必须消灭我们的口号与要求的呆板与机械性。为着罢工的胜利，群众的人数众多的罢工委员会是必要的。在失业工人中的工作必须加强起来，要加强与改善我们在失业工人中的宣传鼓动的工作，要组织失业工人的委员会，要把失业工人斗争与在业工人斗争密切的联系

起来。要领导失业工人为要求救济要求继续照付工资，要求工作做而示威的斗争。为加强我们与工人的联系，要更大的注意一切工人的附属组织和体育组织中的工作。

（2）在农民中，党的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发展农民群众一切反对捐税，反对高利贷，反对地租的斗争，发展分粮抢米，夺取土地的斗争，提高这些斗争到革命的游击战争与土地革命。党的注意力应该首先集中到苏维埃运动发展上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区域中去，使这些区域的农民斗争与工农红军的作战直接的联结起来。在水灾旱荒的区域里面，党必须加强自己宣传鼓动与组织的工作，组织农民要饭吃要房子住要救济的斗争。在农村中工作时，党必须注意到农民中的分化，坚决地组织农村工人的单独的组织（农业工人工会），而将贫农团结在他的周围，在坚决的反富农的斗争中团集中农的自己的周围。在农民群众的原始的宗教性的组织中（如红枪会大刀会等），党必须加强自己的工作，夺取其下层群众。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党必须坚决的组织与领导农民进行游击战争，驱逐国民党官僚，打倒地主豪绅，没收与分配土地。党必须加强在白军士兵和民团中的工作，根据士兵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不满意，鼓动他们的忿恨，反对国民党进攻红军，要求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组织他们的哗变与暴动。

（3）帝国主义侵略的加紧与国民党的无耻投降，给我们以良好的机会去加强和扩大群众的反帝斗争，党必须坚决地为着创造反帝的下层统一战线而斗争。这个统一战线必须根据在明了通俗的民族革命战争的纲领之上，要在一切反帝斗争的形式中实现起来，并在这个统一战线之下加强与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党必须最广大的散播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对于全国部队订立反日作战协定的号召，及其所提出的三个条件，无情的暴露国民党及改良主义派别的替帝国主义侵略清扫道路的作用。党必须利用各种各色的名义去发展反帝反日的群众组织，并且积极的参加一切反日的组织，到那里去提出我们的纲领、路线、提议来揭露这些组织中的领袖分子的面目，动员群众积极的反对帝国主义。党应该加强抵货运动的领导，使他们成为广大的群众运动。在满州、热河、河北，党应该积极的去参加义勇军的活动，派遣可靠的同志与工人分子去加强义勇军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与影响之下的义勇军与游击队，必须在明确的革命纲领的基础上，与其他反日的部队订立共同反日作战的协同动作。以自己的英勇的例子及对士兵的政治工作，争取这些部队。这些义勇军的部队必须将反日斗争与发动土地革命联结起来，消灭在自己行动的区域中豪绅地主的统治，建立民众的政权，号召满洲及其他日本占领区域中的民众拒绝缴纳租税及一切“满洲国”及日本当局的命令。

（4）由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斗争的高涨，党在少数民族中的工作的不可容忍的薄弱亦清楚地暴露了出来。党必须加强在蒙古人、回族、苗族、瑶族之间的工作，党必须领导少数民族的民族解放与自立（包括分立权）而斗争。必须发展他们中间的革命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统治，反对土著的地主土司喇嘛贵族与高利贷者，密切的将少数民族的解放斗争与土地革命联结起来，指出只有中国苏维埃革命才能够保证少数民族取得解放与建立他们自己的苏维埃共和国与各民族间的真正的和平与自由。五中全会责成政治局及各省委，根据党的革命的民族政策定出各民族中具体工作的纲领。

白区党的组织上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巩固党的组织，建立坚固的工厂支部，改善秘密工作与领导方式，改善宣传鼓动与接近群众的方法。这里最主要的任务，是创立与加强党在大的工业中心的工作与组织。必须派遣可靠的得力的同志，到这些城市的重要企业中，建立壮大与巩固党的堡垒。党的一切工作的中心应该放在工厂中、工房中、农村中、学校中、兵营中，只有这样才能够加强与群众的联系及避免国民党法西斯蒂恐怖之袭击。白色恐怖的打击

与党多方面活动之结果，新的干部的需要是大大增加了，只有勇敢的提拔那与群众密切联系及在群众斗争中表现其忠实与先锋作用的工人干部，这个问题才能解决。必须反对借口秘密工作而拒绝提拔干部的保守主义，这在那些知识分子仍然占主要领导地位的省份（如四川北方的某些地方）中更加重要。在疯狂的恐怖之下，党必须最严格的改善秘密工作，改善党的各组织间的联系，坚持的进行反对敌人奸细的斗争。党对青年团的领导必须加强，不但要派得力的代表去工作，而且要把团的工作与生活的问题经常放在党的工作日程上。

（九）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首先直接依靠共产党，依靠党的正确的布尔塞维克的政治路线和实际工作，依靠党的行动上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致，依靠党员的布尔塞维克的纪律，依靠党领导群众斗争的能力。

只有坚决的奋斗，反对一切离开和曲解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布尔塞维克的路线，党才能胜利的领导争取苏维埃中国的斗争。

自从四中全会以来，党在坚决的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坚强了锻炼了自己，获得了思想上的布尔塞维克的坚定性与一致，最后走上了布尔塞维克的道路。但是，这个事实，并不能丝毫的使我们减弱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及两面派的态度的无情的斗争。在新的形势前面，在新的困难的前面，在革命形势激烈的转变的关头，在党内最不坚决的一部分中，新的动摇新的倾向是必然要发生的，而且已经明白的暴露着。党必须毫不放松的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对工会反帝和其他群众组织与工作之忽视和估计不足，反对在放心乐观主义的托词之下忽视加强我们的力量和工作之倾向。只有进行一个坚决的斗争，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党才能够发展布尔塞维克的路线。右倾机主主义者怀疑革命的发展，忽视群众的力量，在敌人进攻面前惊惶失措，妨碍革命运动的发展，降低工人斗争的水平，尾巴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者在党的队伍中散布悲观失望灰心丧气的叫喊，混乱我们的队伍，帮助敌人的进攻，引导革命到失败的道路。右倾机会主义不常提出公开的政纲反对党的路线，更多的是将用两面派的态度在实际工作中对党的路线怠工，党必须在理论上与实际上揭露右倾机会主义的面目，揭露两面派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保证党与共产国际路线的彻底的实现。同时必须最广大开展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与真实的实现新的活的领导方式，坚持不屈的反对一切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作风，使我们能够在伟大的事变前面担负起共产主义先锋队的光荣的任务。

（十）中国正处在革命与战争的漩涡中，粉碎五次"围剿"的决战面前，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正是尖锐的提了出来。五中全会坚信，在党的正确的布尔塞维克路线的基础上，在十几万党员积极艰苦不倦息的布尔塞维克的群众工作的基础上，党将要领导工农群众和工农红军获得新的胜利，给反革命势力更大的打击。党在这个基础上，会加强在中国革命现在阶段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会更加发展资产阶级民主的反帝国主义土地革命到达社会主义革命。在我们已将工农革命民主专政推广到中国重要部分的时候，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才会统一，中国民众才会完成民族的解放，才会脱离国民党的帝国主义的统治，劳苦群众才会从奴役剥削饥饿之下解放出来。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工农才会走上苏联各民族在胜利的革命所指出的光荣大道。

五中全会给二次全苏大会党团的指令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

（一）中国苏维埃政权，依靠于全中国与全苏区工农劳苦群众的拥护，前方红军的英勇善战，和中国共产党中央与苏维埃中央政府领导的正确，自从四中全会到现在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巩固与发展。它粉碎了帝国主义国民党对于苏维埃区域的四次“围剿”,扩大了苏维埃的领土，创造了坚强的铁的红军。建立了苏维埃政府的系统与集中的领导，加强了它在全中国广大工农群众中间的革命影响与领导作用，成了全中国革命形势中最主要的因素。为了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新的五次“围剿”,为了争取苏维埃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以及全中国的胜利，二次全苏大会应该仔细的总结二年来苏维埃革命的丰富经验，清楚的拿具体的事实告诉全中国广大的工农劳苦群众，只有苏维埃的道路能够把中国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殖民地道路上拯救出来，动员与组织全中国千千万万工农劳苦群众团聚在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的苏维埃的旗帜之下,为苏维埃的新中国而斗争。二次全苏大会必须再一次的向全中国反日反帝的工人、农民、士兵、东北义勇军、人民革命军、学生、自由职业者以及一切爱国的人民与武装队伍宣称：苏维埃政府愿意同他们亲密地联合起来，共同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以及一切帝国主义出中国，收复东北失地，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同时苏维埃政府在这里必须采取实现这一主张的更积极的与具体的步骤。

（二）苏维埃政权是在不断革命战争胜利中发展与巩固的，只有以革命战争去消灭国民党以及帝国主义的武装力量，苏维埃政权才能取得中国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以至全中国的胜利。因此，集中一切力量开展革命战争，一切牺牲给于革命战争，是二次全苏大会的基本路线。为了更有力量领导与组织战争，二苏大会必须用更大的力量加强对于各个苏维埃区域政治上与军事上的领导，使各个苏维埃区域能够在苏维埃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总的政治领导与统一的战略意志下面，互相呼应与互相配合的行动，为联系一片的苏区，为保卫苏区，为夺取新的苏区与中心城市而斗争。大会必须坚决打击对于革命战争的胜利没有信心,在敌人进攻前面退却逃跑与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者,同一切忽视革命战争的和平苟安的倾向作坚决的斗争，并指出“左”的乐观的宿命论,实际上也是等于革命战争的积极动员的放弃。

（三）革命战争的胜利，首先依靠于坚强的工农的武装力量,首先是工农红军。二苏大会必须继续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的实现而斗争，用最大的力量动员广大的工农群众到红军中去，创造新的方面军，新的独立师团，新的游击队，来完成发展苏区与夺取中心城市的更高的任务。必须采取一切办法来保证党在红军中——地方武装与游击队中的绝对领导，确立政治委员制度，加强党的与政治机关的领导，动员最好的工人干部到红军中去，来提高红色战士的政治觉悟与自觉的阶级纪律，坚决同游击主义的传统作斗争，以新的战术来重新教育我们的军事干部。红军政治部下地方工作部必须大大的加强起来，使红军所到的区域都能够迅速的赤化。扩大赤少队与模范赤少队，使每个劳苦群众加入赤少队，加强对赤少队的政

治、军事的训练，使赤少队成为红军的现成的后备军，这是自愿兵役制转变到义务兵役制的必要的步骤。优待红军家属工作的完满执行，是扩大红军的必要条件之一。革命军事委员会必须加强对各军区、各军分区、各县区军事部的领导，改善那里领导的干部，并且使后方的勤务机关适合于开展新的革命战争的需要，使主力红军在战争中不受到任何物质方面以及补充方面的困难。开展红军系统中的思想斗争，反对贪污腐化与官僚主义，洗刷隐藏着的破坏红军的阶级敌人与开小差的分子，提拔政治坚定与工作积极的新的干部，是完成这一任务的必要前提。

(四)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改善工人的生活，更大的发扬他们的积极性，是争取革命战争胜利的有力的保障。自从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已经纠正了过去立三路线的富农路线的错误，使土地革命的利益真正落到了雇农、贫农与中农的手里。去年在中央苏区开展起来的查田运动，是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武器。今后的路线是：把查田运动的中心从先进的区域放到落后的区域。在土地分配得不正确的区域，必须发动广大群众起来重新分配。这里，必须坚决执行消灭地主、反对富农、依靠贫农、联合中农的明确的阶级路线。落在雇农、贫、中农手里的土地，必须巩固起来，只有在大多数农民自愿的条件之下，才得重新分配。土地国有的办法，在目前是错误的。"只有在苏维埃革命在国内重要省份中获得胜利后，只有在农民基本群众拥护国有土地后，我们才能实行土地国有"(国际决议)。

对于工人群众必须活泼的运用劳动法，从各方面去保证工人阶级的利益，限制资本家雇主的残酷的剥削，发展他们反资本家雇主的斗争，团结他们，组织他们，提高他们觉悟的程度。使他们了解苏维埃政权的巩固是同工人阶级的最后解放不能分开的，使他们在为了他们自身利益斗争时，不要一刻忘记同基本农民的亲密的联合。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加强无产阶级在苏维埃革命中的领导，保证将来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转变。

(五)为了满足革命战争物质上的需要，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为了更进一步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二苏大会必须特别注意苏维埃经济的建设问题。指出经济建设是与革命战争不能分离的不能对立的任务。苏维埃经济建设在去年一年内虽是得到了伟大的成绩，但经济建设同革命战争还是不能很好的配合起来，尤其在粮食问题的解决上。关于粮食问题苏维埃政府应该用极大的力量给以解决。人民委员会下粮食部的设立是刻不容缓的任务。苏维埃政府应该用极大的力量，为提高农业与工业的生产，发展苏区的贸易而斗争。苏区生产力的提高，是同苏区工农生活的改善与苏维埃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紧密地联系着的。根据广大工农群众自己的利益，把他们组织到各种合作社中，给他们以政治上、经济上的领导，是苏维埃政府最中心的任务，苏维埃的经济机关必须同群众的合作社发生最密切的关系，依靠他们与经过他们来完成自己的任务。只有这样，苏维埃政府才能同地主、商人、资本家的投机与垄断做斗争，从实际的例子上以社会主义的教育来教育广大工农群众，造成将来社会主义转变时的一些前提与优势。同时苏维埃政府容许并鼓励商人资本的投资与营业，利用他们的资本来发展苏区经济，但这必须在他们遵守苏维埃法律与工人监督生产的条件下。在苏维埃政府的力量加强与工人监督生产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是可怕的。在中国革命目前的阶段上，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一切消灭资本主义以及实现"军事共产主义"的企图，都是有害的。

(六)为了开展革命战争的胜利，加强苏区周围的白区工作，开展苏区周围的游击战争，建立新的游击队与苏区，是极端重要的。这一工作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任何可观的成绩，而且在白色区域内，我们游击队的非阶级路线造成了赤白对立的严重现象。估计到白区群众对于

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愤恨，与对于苏维埃政府的增长的同情，以及顺利的革命工作环境，苏维埃政府尤其是各边区的苏维埃政府必须用一切力量与方法，进行在白区群众中以及白军士兵中的宣传与组织的工作，广泛的宣传苏维埃革命和目的，宣传苏维埃已经给与工农的利益，经常进行拥护苏维埃红军的行动，发起由工农自己派遣代表到苏区参观，利用群众每一微小的对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不满，发动他们的斗争，引起他们走上直接的游击战争与武装暴动去建立新的游击区与新区的苏维埃区域，尤其在国民党军队的后方，我们的游击队在这里负担着极大的任务，它应该是苏维埃政府基本政纲的宣传者与执行者，它的任务是发动、组织与领导当地群众推翻当地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为建立新的苏维埃政权而斗争。

二次大会应责成各军区各军分区，各边区县苏的军事部，采取紧急的有效办法去扩大游击队，改善各地游击队的成分与加强党的领导，并且拿苏维埃的基本政策与如何领导群众斗争的教育，去教育每一个游击队员。各级军事机关必须有计划的整顿与指挥所属游击队的行动，使游击队的积极活动更能与红军主力的活动适当的配合起来，达到一定的战略上与战术上的任务。对于各地同我们还没有关系的游击队，苏维埃政府应该同他们取得联系，并且给他们以人力上与政治上军事上的具体帮助和领导。

(七)为了保证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苏区内部的阶级斗争，来巩固新区边区和后方根据地，是一刻不能放松的任务。必须指出，新区边区的工作，依然是我们工作中最薄弱的一环。在苏区内，地主资产阶级虽被打倒，但未消灭，而且他们不肯相信他们已经失败了的，这尤其是在新区与边区。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直接帮助之下，他们必然要疯狂般的企图以反革命的活动来推翻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政权对于这些反革命的活动必须采取最无情的镇压。加强肃反机关的工作，扩大保卫队的武装力量，严密赤色戒严，来肃清新区边区的土匪、民团、大刀会、童子兵以及敌探与反革命组织的活动，是同反革命斗争必要的步骤．须最大的提高革命的警觉性，揭发隐藏在苏维埃机关内进行暗中破坏活动的阶级异己分子与害虫，给他们以严厉的革命的制裁。必须清楚的了解苏维埃革命秩序的任何微小的混乱，苏维埃法律任何微小的破坏，以及稍不注意，便立刻会强固地主资本家的地位与影响，削弱工农民众的力量。在新区边区必须最迅速的最坚决的解决土地，立刻改善工人的生活，牺牲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利益来发动广大工农群众的积极性，争取他们在苏维埃政权领导之下，吸收他们加入红军，加入地方武装与参加苏维埃的一切工作。必须把工人迅速的组织在阶级工会之内，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柱石。必须采取坚决的路线去改造新区边区的革命委员会，并将他们转变为群众正式选举的苏维埃政权。真正具体的仔细的去了解新区边区的实际情形，将最好的干部派到那里去，经常给以帮助与领导是转变新区边区工作的重要前提。

(八)最后二次大会必须采取一切办法来改善苏维埃机关的工作，使苏维埃更同广大工农群众密切联系起来。使更多工农群众参加苏维埃的管理，学习自己管理我们自己的国家，这也是保障革命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这里苏维埃政府必须发展广泛的苏维埃的民主，使每一个苏维埃的代表都是群众的领袖与积极分子，使每一个苏维埃的代表参加苏维埃的工作，使每一个苏维埃的决定，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与参加。必须把工作的重心放到乡苏与市苏，这是苏维埃政府的下层基础，是直接同群众发生关系的政权机关。必须开展苏维埃的自我批评，同一切机会主义者、官僚主义者、贪污浪费的分子做坚决的斗争。这样一方面把隐藏在苏维埃机关里面的阶级异己分子与害虫尽量的洗刷出去，另一方面大胆的提拔工农积极分子来担任苏维埃的工作。必须很耐心地去培养与教育新提拔起来的干部，使他们能够胜任他们

所负担的工作。必须普遍的应用集体的讨论与个人负责制，最严厉的反对不做实际工作的空谈主义。经常的检查工作执行的程度，监督工作的进行与具体的活的领导，是消灭空谈的主要办法。中央政府的各部与各省苏维埃政府的领导成分，必须加强起来。工农检查部应该极大的发挥它的检查一切苏维埃法令的执行，反对贪污腐化，反对官僚主义，与改善苏维埃机关工作的战斗作用。各级党部应该动员最好的干部，尤其是工人干部到苏维埃政府工作，加强党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作用，必须使每一个同志深刻了解，苏维埃政府是中国共产党唯一的领导之下巩固与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对于苏维埃政府的一切工作，负有绝对的责任。苏维埃政权中无产阶级领导的加强，是使苏维埃革命将来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与保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词

——毛主席讲词的速写——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二日）

同志们！我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开幕了。(鼓掌，奏乐)

同志们！今天是第二次全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的日子，我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全体代表们致革命的敬礼！(全体鼓掌，起立欢呼！)

同志们！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以来，已经有两年又两个月了。两年以来，全国事变的发展，完全显示了证明了反革命统治阶级是更进一步的动摇崩溃，而苏维埃运动与全国革命斗争则是大大的发展了。

中国是一个被帝国主义压迫侵略的国家，是一个受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政府屠杀，压迫，奴役的国家，全国广大的领土是被国民党送给帝国主义者了，使全中国受着帝国主义瓜分共管的威胁，使中国快到了完全灭亡的地位。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工农劳苦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自己团结起来，武装起来，创立了自己的政府与国家。我们的第一次全苏大会宣告了这个国家的成立，这就是我们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从此全中国就是两个政权的极端尖锐的对立了。

两年来革命的发展，使全国革命形势更加开展了。广大工农群众团结在苏维埃旗帜之下，向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两年来我们得到了极伟大的胜利。帝国主义国民党在我们胜利的面前发抖起来了，他们继续三次"围剿"之后，组织了四次以至五次的"围剿"。但是我们打破了敌人四次的"围剿"，在粉碎第五次"围剿"中间，我们已经得了第一步胜利。现在我们是处在对五次"围剿"的决战中，是处在最紧急的关头。

两年来，全国红军在浴血的斗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这中间，我们许多同志为苏维埃流着最后一滴血，而光荣地牺牲了。许多在国民党区域在白色区域领导革命斗争被国民党屠杀了。这些同志中间如黄公略，赵博生，韦拔群，恽代英，蔡和森，邓中夏，陈原道，鲁易，沈泽民，王良，胡阿林，张锡龙，吴高群，彭鳌等等，他们是在前线上，在各方面的战线上，在敌人的枪弹下屠刀下光荣地牺牲了。我提议我们静默三分钟向这些同志表示我们的哀悼和敬仰（全体代表起立静默三分钟）。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任务是要彻底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是要把苏维埃运动推到全中国去，是要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灭亡中国的阴谋毒计。我们的大会是担负着很大的责任，我们的大会应该号召全苏区全中国工农劳苦群众为着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而斗争，号

召全苏区全中国群众武装起来，集中一切力量，粉碎五次“围剿”，争取革命战争的最大的彻底的胜利，争取革命在全中国的胜利。

我们的大会是全国最高的政权机关，他有着极大的力量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相信是一定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是有完全的把握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的大会将使五次“围剿”得到彻底的粉碎，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把苏维埃的版图扩大到一切国民党统治的地方去，把红旗子插到全国去，让我们高呼：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万岁！

苏维埃新中国万岁！

（压倒一切的鼓掌声，全体起立欢呼！）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

（一九三四年一月）

毛　泽　东

（一）　目前形势与苏维埃运动的胜利

同志们！自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以来已经整整两年了。两年来的事变的发展完全显示了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的更进一步的动摇与崩溃，苏维埃运动的剧烈的开展与胜利！

今天我们所处的时期，正是中国革命形势更进一步尖锐化的时期，也正是全世界紧紧地逼近到革命与战争的第二个新周期的时期。

社会主义世界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对立，现在是极端尖锐化了。一方面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已经得到了最后的巩固，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只在四年内就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在去年的第一年内，又经已得到了伟大的成绩。苏联早就消灭失业现象，而且全体劳动民众的生活水平与文化水平都是极大的提高了。苏联的国防是极大的巩固了。苏联的和平政策在全世界革命民众的拥护之下，到处得到了成功，最顽强的美国帝国主义也不能不和苏联订立国交了。

资本主义世界则是另外一个样子，资本主义的暂时的稳定已经终结，资本主义总的危机已经走进了一个新阶段。各个帝国主义国家正在疯狂的准备战争，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的结果，使各个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尤其是日美间的矛盾，在新的基础上开展起来，重新分配世界的帝国主义强盗战争是正在极端的威胁着全世界民众，然而帝国主义却又在企图暂时缓和它们内部的矛盾，而从牺牲苏联牺牲中国去找寻出路。反苏联战争的准备并没有一刻停止，而瓜分中国进攻中国革命的战争则已经在明目张胆的进行中。

但是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亦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影响之下，在帝国主义经济恐慌与战争威胁之下，生长、扩大起来。猛烈的阶级斗争和民众革命，是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面开展着。全世界战争与革命的火焰，是逼近着我们。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由于国民党经济总崩溃，由于苏维埃运动的胜利，使中国革命形势更进一步的发展起来，使中国革命推进到了世界革命中特别显著的地位。

目前中国时局的重心，是广大的国内战争，是革命与反革命生死存亡的斗争，是工农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政权尖锐的对立，是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积极瓜分中国和中国民众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奋斗的斗争，是帝国主义积极准备太平洋大战和进攻苏联战争，与中国和东方劳苦群众为阻止及消灭帝国主义大战为保护苏联的斗争。

一方面，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完全投降了帝国主义，引导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广大的领土，垄断中国政治上经济上一切主要的权利；引导国民经济走向全部崩溃，使工农劳苦群众的生活遭受着空前所未有的痛苦；剥夺一切革命民众的自由，压迫一切革命活动，实行疯狂的法西斯蒂恐怖；在帝国主义指挥之下组织一切反革命力量向苏区与红军作拼命的进攻。所有这一切，都是为着一个目的：将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与帝国主义的利益融成一片，将中国引入完全殖民化的道路。

另一方面，苏维埃政权，号召，组织，领导全国革命民众进行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组织领导红军与民众为着保护苏维埃领土发展苏维埃领土而斗争，以坚决的进攻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屡次“围剿”。严厉镇压苏维埃领土内的一切剥削分子的反革命企图。一切土地给予农民红军兵士。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救济失业，实行社会保险制度。给一切革命民众以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的完全自由。引进广大工农群众管理自己国家机关，只不准占人民极少数的剥削分子的参加。组织民众的经济生活，使民众生活从过去地主资产阶级统治时代受尽饥寒的地位，进到不但完全免除饥寒并且日益向上改良的地位。组织民众的文化生活，将过去地主资产阶级统治时代完全没有享受教育可能的广大民众，进到日益提高文化程度的地位。所有一切，也都是为着一个目的：推翻地主资产阶级在全国的统治，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将几万万民众从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的压迫剥削下解放出来，阻止灭亡中国的殖民地道路，建立自由独立领土完整的苏维埃中国。

两个政权对立的日益尖锐化，不能不促进两个政权之间日益激烈的决死的斗争。目前正是在两方面斗争将近决定胜负的历史的时期。反革命的六次“围剿”正在继续五次“围剿”粉碎之后大规模的向着我们前进。苏维埃政权的历史任务，就在号召、组织、领导全苏区全中国一切革命民众进入这一伟大的战斗中。动员广大工农群众加入红军，提高红军的政治教育与军事技术，扩大地方武装与游击队，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加强苏维埃对于各个苏区红军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加强苏维埃各方面工作的速度与质量，加强苏维埃财政机关与经济机关的工作，以保证革命战争中的物质需要；开展工人阶级斗争，组织工人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到粉碎敌人的斗争上面来；开展农民的土地斗争，动员广大农民群众为夺取土地与保卫土地而斗争；号召全苏区全中国一切工农劳动群众以一切牺牲一切努力给予革命战争，这样去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六次“围剿”，这样努力去阻止殖民地化中国的道路，争取苏维埃革命在全中国范围的胜利。

（二） 帝国主义的进攻与苏维埃政府对于反帝运动的领导

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来两个年头中间，国内最大的事变就是帝国主义的进攻及反革命对于革命的第四次第五次与第六次的“围剿”。

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开始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从残酷的飞机大炮的屠杀中占领了东三省与热河，控制了平津，还正在向着内蒙及整个华北准备其更大规模的杀人战

争。英帝国主义从西藏向四川进攻。法帝国主义准备侵入云贵，美帝国主义则欲将长江流域及福建置于其直接统治之下。所有这些帝国主义，都在以奴役中国民族为目的，以消灭中国苏维埃政权为目的，以准备进攻苏联为目的，同时还以准备帝国主义强盗之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目的，向着广大的中国领土伸张其毒手与阴谋。而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却在一切奉送帝国主义的方针之下，断送了几百万方里的土地，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进攻，采取了可耻的不抵抗主义，以一切中国民众的利益为代价，换得帝国主义的政治上经济上与军事上的帮助，以便利其集中力量对于中国民族生存唯一可靠的力量苏维埃与红军的进攻。

在这种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下，全国革命民众的反帝运动便极端猛烈的发展起来，东三省几十万义勇军的奋斗，上海十九路军兵士和工人群众的血战，普及全国的反帝运动，曾经达到了空前的高涨。

这时候在全中国革命民众面前，摆着两个政权的相反的行动：国民党完全投降帝国主义，尽量压迫反帝的民众，苏维埃则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尽量援助与领导反帝运动。

两年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曾经屡次通电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与国民党的投降卖国。一九三二年四月十四号临时中央政府正式公布对日宣战，同时颁布对日作战的动员令，号召全国民众开展民族革命战争，反对奴役中国的帝国主义与卖国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曾经发布宣言，号召一切进攻苏维埃与红军的国民党军队，在(一)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二)保障民众的民主权利（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等自由），(三)武装民众创立抗日义勇军，这三个条件之下，苏维埃政府愿意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战斗的作战协定。国民党与日本订立塘沽协定及最近进行中日直接交涉的时候，临时中央政府曾一再向全国全世界宣言，表示代表全国民众严厉反对这种出卖民族利益的政策与行动。各地民众的反日斗争，苏维埃政府是实行援助的，单是上海沪西纱厂工人的反日罢工运动，苏维埃曾以一万六千元援助他们。此外，苏区群众还有对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募捐援助，对于其他反帝斗争的精神上与物质上的许多援助。

至于苏维埃领土之内，则早已取消了帝国主义的特权，肃清了帝国主义的影响。牧师神父是被民众驱逐了，教会侵占人民的财产是被收回了，教会学校是取消了。在中国境内只有苏区是脱离了帝国主义统治的地方。

所有这些事实都在指明：只有苏维埃政府才是唯一反对帝国主义的政府。苏维埃政府应向全国民众指出：用直接的民族防卫战争战胜帝国主义，是苏维埃与全体民众的最大的责任。而要实行这一责任，只有依靠于广大民众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发展，首先是团结一切力量战胜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因为它是苏维埃与民众反对帝国主义的障碍物。要使民众明白：只是因为国民党的作梗——它横亘于帝国主义进攻地带与苏维埃领土之间，并且集中一切力量向着苏维埃领土进攻，使红军无法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使苏维埃与红军不得不以坚决的进攻来肃清道路——粉碎国民党的“围剿”，为实行对日作战的第一个步骤。

但是苏维埃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直接的广大的冲突，是一天一天的逼近了。这就要求苏维埃十分的加强其对于一切反帝斗争的领导——苏维埃应当成为全国民众反帝国主义斗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苏维埃政府只有用尽一切力量使民众明白当前的危机与国民党的罪恶，依靠于广大民众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觉悟程度与组织力量的提高，才能顺利的执行自己的神圣的任务——以民族革命战争与革命的国内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血腥统治。

（三） 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围剿”与苏维埃政府反对“围剿”的斗争

因为中国苏维埃区域是全中国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是全中国反帝国主义的主力军，因为苏维埃运动与革命战争的猛烈向前发展，所以国民党一次，二次，三次，四次，五次，以至六次在帝国主义的直接帮助之下集中一切力量，向着苏维埃与红军进行绝望的进攻，企图消灭中国革命势力，为帝国主义们瓜分中国担负肃清道路的责任。

但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每一次进攻，都遭到了严重的失败，中国苏维埃与工农红军在全中国民众的拥护之下，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领导，已经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同时苏维埃与红军的胜利，更加兴奋了全中国的劳苦民众，使他们认识只有苏维埃与红军才是真正为了民族的独立自由而战，只有苏维埃与红军才能救中国。

当敌人四次“围剿”开始的时候，正是国民党出卖了东三省，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之后，卖国的国民党不但不以一兵一卒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仅不管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的屡次宣言愿意与真正抗日军队订立抗日的战斗协定的提议；相反的，国民党卖国罪魁蒋介石，在四次“围剿”失败后，立刻接着举行五次“围剿”,集中了数十万军队进攻鄂豫皖与湘鄂西苏区，压迫红军离开围绕武汉的区域。在我们方面，虽然因为要避免与过于强大的敌人力量作战，因为我们主观上某些策略的错误，红四方面军不能不退出鄂豫皖苏区，作了有名的远征，但红四军在四川南江，宣汉，绥定一带创造了新的广大的苏维埃根据地。由于红四方面军的远征，在辽远的中国西北部，开展了广泛的群众革命斗争，把苏维埃的种子广播到革命形势比较落后的区域中去了。红四方面军的英勇善战，在不足一年之内，已经在廿余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已经发展了十倍以上的红军队伍，号召了整个四川的工农劳动群众与白军兵士倾向于苏维埃革命，在中国西北部建立下苏维埃革命新的强有力的根据地。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川陕苏区有地理上、富源上、战略上和社会条件上的许多优势，川陕苏区是扬子江南北两库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川陕苏区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这使蒋介石与四川军阀都不得不在红四方面军伟大的胜利面前发抖起来。同时，从洪湖根据地退出的红军第二军团，不但主力没有受到重大的损失，而且在川鄂湘边，配合着红四方面军积极行动，取得了新的胜利。即洪湖一带，亦尚有游击队的存在。在鄂豫皖苏区方面，我们的根据地虽然受了部分的损失，但留守的红军部队和游击队，英勇地向四周发展了游击战争。

至于中央苏区，这里是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因此，当然也就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主要进攻的目标，国民党集中了全国大部分的兵力和我们作了顽抗的战斗，他调动了所谓“中央军”,蒋蔡军阀，两广军阀与湖南军阀，从四面包围中央苏区及其临近各苏区，然而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斗，我们获得了空前的胜利。最大的胜利是在一九三三年的上半年，单只这半个年头，中央苏区红军消灭了白军二十四个团，六个营，二个连，击溃白军三个师，十二个团，五个营，二个连，缴获步枪两万枝左右，机关枪短枪一千枝左右。尤其是在东黄陂战役，消灭了敌人最顽强的基本纵队，使敌人的五次“围剿”遭受了最后的惨败。

在粉碎五次“围剿”的伟大胜利中，红军不但数量上扩大了，而且质量上增强了，红军指挥员战斗员政治上的坚定，军事技术上的提高，比五次战役以前是有了长足的进步。苏维埃领土扩大了，除四川广大苏区外，在福建的西北部，江西的东部，扩大了广大的苏区，增加了近百万的人口，建立了新的闽赣省。旧的苏区更加巩固了，这表现在苏维埃工作改善，工农群众革命积极性的提高，农村中城市中阶级斗争的发展，以及苏区中残余的反革命势力遭受到严厉的镇压。同时，这一胜利影响国民党区域非常之大，广大白区的工农群众，在这一胜利影响之下，更加提高了他们的斗争的勇气。一切参加“围剿”的国民党军队，不但兵士中发生了普遍的动摇，甚至干部中亦发生了绝大的恐怖情绪，甚至使蒋介石不得不公开宣布“不剿匪请抗日者杀勿赦”的绝望命令。

然而这些胜利的取得，决不是偶然的。他依靠了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正确，依靠了苏维埃政府领导集中，与他的政策设施的适当，依靠了红军英勇善战，依靠了苏区广大工农群众的热烈的拥护，并且还依靠了白区工农群众的日常斗争和反帝反国民党运动的开展，依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与殖民地被压迫民众的同情与援助。这些都是战胜敌人的基本条件，没有这些条件，是决不能够取得胜利的。

国民党军阀在五次“围剿”惨败之后，唯一的出路是更加无耻的投降帝国主义，从帝国主义取得大批的借款与军械，聘请大批的外国顾问，收集一切旧有力量，组织新的力量（训练新兵，训练新的航空队，训练蓝衣社军官团等)，总之，集中一切反革命的势力，在帝国主义指挥之下，对于苏维埃与红军进行第六次“围剿”。

苏维埃对于六次“围剿”的斗争，是决定中国或者被帝国主义瓜分共管而成为完全的殖民地或者是独立自由领土完整的苏维埃中国这个伟大斗争的重要环节之一。

苏维埃应该号召一切苏区中白区中参加斗争的群众，明白认识这一斗争的严重性。只有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用百倍积极百倍坚毅的精神统一于苏维埃指挥之下，才能争取这一斗争的完全胜利。

苏维埃应该指示给一切参加斗争的群众：在粉碎五次“围剿”之后我们有着战胜敌人六次“围剿”的一切基本的条件。党与苏维埃的正确的领导，红军的坚强与扩大，苏区与白区广大工农群众的斗争积极性，这一切都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基础。

由于我们的努力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发展，已经使帝国主义及国民党的新的大举进攻受到了我们的严重打击，敌人的原定计划已经失败了，不得不在新的阵地与新的计划之下，向着我们作绝望的进攻，我们是处在六次“围剿”的最后决战的面前。国民党军阀的堡垒政策与经济封锁政策虽然极其残酷，但并不是不可战胜的铜墙铁壁。提高我们的军事技术，加强我们的群众工作和士兵工作，改进我们的军事策略，集中我们的一切力量去克服这些困难，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我们应该指出：敌人的困难是大大超过于我们，白军士兵的动摇，敌人统治下工人农民以及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愤恨与不满，统治阶级各派军阀之间的斗争与分裂，援助国民党的各个帝国主义者间的矛盾与冲突，以及国民党财政经济的破产，所有这些，都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客观方面的条件。

这里应该指出：当着帝国主义国民党进行六次“围剿”之际，福建出现了一个“人民革命政府”。这个“人民革命政府”的出现，表现国民党系统的进一步的破裂。由于苏维埃运动的伟大胜利，与国民党在全国民众面前破产，使得中国反动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不得不采取新

的方式，企图于国民党道路与苏维埃道路之外寻找第三条道路，以保持反动统治阶级垂死的命运。然而这一企图只是徒劳，因为如果“人民革命政府”这一类的组织不从真正中国人民利益出发，不坚决承认苏维埃政府还在去年四月间即已宣布了的三个条件，而与苏维埃政府订立并真正执行反帝反国民党的协定，而是止于欺骗与讲空话，那么，广大的革命民众不会于“人民革命政府”与国民党政府之间采取任何不同的态度，它必然要遭受悲惨的失败也是可以预言的。而苏维埃在全国民众对它的信仰日益增加中，在国民党及一切反革命派别的欺骗日益破产中，将坚决的粉碎六次“围剿”，以便努力阻止帝国主义殖民地化中国的道路，努力争取在全国范围内苏维埃革命的胜利，在事实上证实这一句名言：“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

（四） 两年来苏维埃各种基本政策的设施

当着我们来说苏维埃各种基本政策的时候，首先要问什么是这些政策的出发点呢？答复这个问题，应该明白苏维埃过去与现在所处的环境和从这种环境所产生的任务。

苏维埃的过去时期，他是生长于游击战争中，他是从许多极小的地方生长起来。这些地方是各自独立没有联合，每一个苏区的四围都是敌人的世界，敌人对于苏区是每时每刻的摧残与压迫。然而他能够战胜这些敌人，他是从战胜敌人无数次的压迫中间生长和发展起来的。这就是苏维埃产生的环境。

苏维埃现在所处的环境，同过去有许多的不同：他有广大的领土，有了广大的群众，有了坚强的红军，他已将许多散漫的力量集中起来（虽然还没完全集中起来），他已经组织成为一个国家，这就是我们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国家已经有了他的地方与中央的组织，已经建立临时中央政府，这个政府是一个集中的权力机关，他依靠着广大的民众，依靠民众武装的力量——红军。这个政府是工农的政府，他实行了工人与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他对于工农和广大民众是广大的民主。同时他是一个专政，是对占人民中极少数的军阀，官僚，地主，豪绅和资产阶级的专政，而且已经是一个已经具有极大权力的专政，这个专政已经向着全国范围扩大他的影响，他在广大民众中间有了很大的信仰，他与过去游击战争时代情形大不相同了。然而战争仍是经常的生活，并且更加广大与激烈，原因是这个专政与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专政之间的对立一天一天尖锐起来，现在已经进到两方面快要决定胜负的时期，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大规模的“围剿”是摆在它的面前。这就是苏维埃现在的环境。

这种环境决定了它的任务，就是它必须用全部力量去动员民众，组织民众，与武装民众，必须一时不停地去进攻它的敌人，去粉碎敌人对于它的“围剿”。它的任务是革命战争，是集中一切力量去开展革命战争，用革命战争去打倒敌人，并且还要打倒强大的帝国主义的统治，因为帝国主义是敌人那一个专政的拥护者与指挥者。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目的，为的是要解放中国人民，为的要把中国四万万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的奴役和蹂躏之下解放出来，为的要使几万万中国劳苦同胞从军阀、官僚、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压迫之下翻过身来，为的使中国民众能够学习苏联工农一样将来胜利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建立光明的，幸福的人类新生活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就是苏维埃的根本任务。

从此，我们明白苏维埃在这种环境与任务之下，施行各种基本政策，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巩固已经胜利了的工农民主专政，为了发展这种专政到全国范围内去，为了动员组织武装

全苏区全中国的工农劳苦群众以坚决的革命战争推翻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统治，来巩固与发展这个专政，并且为了从现时工农民主专政，准备将来变到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去，这就是苏维埃一切政策出发点。

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秉承第一次全苏大会的指示，两年以来坚持这种政策的总方向，收到了伟大的成绩。已经从经验上证明给中国全体革命民众看：只有苏维埃政府的政策，才是为了民众政权与民众利益的政策，才是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反革命政策坚决对抗，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挽救全民出于危亡，解放全体民众出于水火的唯一的政策。

不待说，在两个政权尖锐对立的中国，苏维埃每一具体的施政，要立即取得广大民众的拥护。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反革命政策之下，受尽压迫剥削的民众，对于苏维埃每一具体的施政，简直如同铁屑之追随于磁石。这种情形，造成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极大恐慌，反动统治阶级因此不惜以一切最无耻的造谣，来污蔑苏维埃的施政。然而铁的事实，是给无耻造谣的有力回答，每一个有眼睛的中国人，只要不是丧心病狂的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地主资本家，便不能不承认苏维埃政府的政策与国民党政府的政策有何等天渊之别。

一、苏维埃的武装民众与建设红军

我们首先来说苏维埃的武装民众与建设红军。

为着反对敌人的“围剿”，为着进行革命战争，为着保卫中国民族和国家，苏维埃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武装民众与组织坚强铁的红军，组织地方部队和游击队，组织关于进行战争的给养与运输。两年来在与敌人四次五次以及六次“围剿”坚决斗争中，苏维埃在这一方面的努力大大取得了成功。

首先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立，统一了全国红军的领导，使各个苏区各个战线的红军部队，开始在统一的战略意志之下，互相呼应与互相配合行动起来，这是由散漫的游击队的行动进到正规的大规模的红军部队的行动的主要关键。两年以来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着全中国红军，首先是中央苏区红军，进行了光荣的胜利战争，粹碎了敌人的五次“围剿”,并且取得反对六次“围剿”的第一步胜利。而四川红军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之下，已经取得了光荣伟大的新胜利。

红军在两年中是迅速扩大了。是比两年前扩大了几倍。这一方面之所以得到了成功，是依靠于广大工农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并且还依靠于动员方法的进步与苏维埃优待红军法令的执行。在一九三三年五月一个月中间，中央苏区的若干个县中扩大了近两万的新战士。很多的地方，工农群众潮水一般的涌进红军中去。一切以为群众不愿意当红军，或者以为在新苏区边区等处不能扩大红军的机会主义的说法，事实已经证明是错误的。然而动员方法之正确，苏维埃优待红军法令之彻底执行，是迅速完成动员计划的关键。废弃一切强迫命令，实施充分的宣传说服，制裁破坏扩大红军以及领导开小差的阶级异己分子，是动员方法的重要节目。提高红军战士的社会地位到最光荣的标准，给予红军战士一切可能与必需的精神上与物质上的待遇，分配外籍红军战士以土地，而发动群众代替他们耕种，为每一红军战士的家属很好的耕种土地，实行消费合作社对于红军家属百分之五的廉价，实行为红军家属开办供给日用必需品的专门的商店，实行在国家企业与合作社的盈利中抽出百分之十供给红军家属，号召群众为红军家属的疾病困难募捐接济，号召群众对于红军战士及其家属给予精

神上物质上的慰劳，所有一切关于优待红军战士及其家属的法令与办法，实际与彻底的执行，是保障红军踊跃的上前线去及巩固其在前线上的战斗决心的必要与重要的步骤。这些工作，在苏区各地存在着很多的模范，在这些地方的广大工农群众，以手执武器保卫苏区与发展苏区为自己神圣的责任，而大批的不断的涌向前线去。其中如江西的长冈乡十六岁至四十五岁的全部青年成年男子四百零七人中，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去了三百二十人，留在乡间的八十七人，去的与留的成为百分之八十与二十之比。福建的上才溪乡，全部青年成年男子五百五十四人中，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四百八十五人，留在乡间的只六十七人，去与留的比例为百分之八十八与十二。这些乡中的壮丁这样大数量的英勇的上前线去，然而乡村的生产，家庭的生活怎么样呢？不但不发生不好的影响，而且更加扩大了改良了。什么原因？因为劳动互助社，耕田队，及其他一切的办法，有组织有计划的调剂了乡村的劳动力，解决了红军家属每一个困难的问题。我想这种光荣的教训是值得全苏区学习的。

红军铁的一样的巩固，应使与红军的扩大密切的连接起来，两年以来这一方面的工作，同样的得到了好的成绩。现在的红军，已经走上了铁的正规的革命武装队伍的道路，这表现在于：(一)成分提高了，实现了工农劳苦群众才有手执武器的光荣权利，而坚决驱逐那些混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二)工人干部增加了，政治委员制度普遍建立了，红军掌握在可靠的指挥者手中。(三)政治教育进步了，坚定了红色战士为苏维埃斗争到底的决心。提高了阶级自觉的纪律，密切了红军与广大民众之间的联系。(四)军事技术提高了，现在的红军虽然还缺乏最新式武器的采用及其使用方法的练习，然而一般的军事技术，是比过去时期大大进步了。(五)编制改变了，使红军在组织上增加了力量。所有这些，大大提高了红军的战斗力，成为不可战胜的苏维埃武装力量。

广泛的扩大赤少队与游击队，是苏维埃武装民众进行革命战争的极端重要的事业。赤卫军少先队是前线红军的现成后备军，是保卫苏区的地方部队，并且是从现在的自愿兵役制转变到将来实行义务兵役制的桥梁。而游击队则是新苏区的创造者，是主力红军不可缺少的支队。两年来各个苏区中是发展了这些部队。他们的军事政治训练也相当的加强了。他们加入红军，他们之保卫地方，他们之袭敌扰敌，在历次粉碎“围剿”的战斗中，显示了他们极其伟大的成绩，致使敌人惊为奇迹，成为敌人侵入苏区的绝大困难。这在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是特别表现了它的作用。把这个制度广布到一切新开辟的苏区去，极大的扩大他们的组织，加强他们的训练，使这些部队成为红军在革命战争中最可依靠的兄弟，这是苏维埃的重要责任。

充实红军的给养与供给，组织联络前线与后方的军事运输，组织军事的卫生疗治，同是对于革命战争有决定意义的事业。在我们还没有取得若干中心城市与敌人经济封锁的情况之下，这一任务的进行是极其艰难的，然而两年以来，凭借了苏区与白区广大工农的积极性，使我们对这事业亦已建立了相当的基础。我们已经在这一方面保证了红军在过去长期中的给养供给与运输，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成绩。但是当前粉碎的六次“围剿”的决战，及以后更加广大的战争，需要我们用更大努力增加这一方面的力量，保证这一方面更加充分的供给。

更大规模的革命战争是在我们的面前，苏维埃武装民众政策更加显示了他的绝顶重要性，一刻不放松去武装民众，去从切实的工作中，以最快速度，实现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创造，是苏维埃基本的战斗的任务。

苏维埃的基本任务是革命战争，是动员一切民众力量去进行战争。环绕着这个基本任

务，苏维埃就有着许多迫切的任务。它应该对广大民众施行广泛的民主。它应该坚决镇压内部的反革命。它应该启发工人的阶级斗争，发展农民的土地革命，在工农联合以工人阶级领导的原则下，提高工农的积极性。它应该执行正确的财政经济政策，保证革命战争的物质需要。它应该实行文化革命，武装工农群众的头脑，以及其他的许多基本政策。所有这一切，都是为着一个目的：以革命战争去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巩固与发展工农民主专政，并准备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阶段去。

二、苏维埃的民主制度

现在我们来说苏维埃的民主制度。

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他是民众自己的政权，他直接依靠于民众。他与民众的关系必须保持最高程度的密切，然后才能发挥他的作用。苏维埃具有绝大的力量，他已经成为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而且也是群众生活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他的力量的伟大，是历史上任何资产阶级国家形式所不能比拟的。但他的力量完全依靠于民众，他不能够一刻离开民众。苏维埃政权需要使强力去对付一切阶级敌人，但对于自己的阶级——工农、贫民、职员、革命知识分子等大多数民众，则不能使用强力，而他表现出来的只是最宽泛的民主主义。

苏维埃最宽泛的民主，首先表现于自己的选举。苏维埃给予一切过去被剥削被压迫的民众以完全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使女子的权利与男子同等。工农劳动群众对这种权利的取得，乃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总结两年以来各地苏维埃的选举经验，一般来说是有很大的成绩。第一，关于选民登记。用红榜白榜的办法，将有选举权的居民与无选举权的居民实行严格的划分。以不准任何剥削分子参加的选民大会的选举，代替了过去开群众大会选举的办法。第二，关于成分比例。为了保证无产阶级在苏维埃政权中的领导干部，采用了工人及其家属十三名选举代表一人，农民及贫民五十人选举代表一人的办法，拿了这样的成分去组织市乡代表会议。从区到中央，各级的代表大会与执行委员会，工人与农民的代表都有适当的比例。这样便在苏维埃政权的组织上保证了工人与农民的联盟，并使工人站在领导的地位。第三，关于选举单位。为了保证多数的选民参加选举，并使工人能够选举他们的适当的代表进苏维埃，一千九百三十三年九月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新的选举法，规定每个乡苏和市苏，分成几个选举单位进行选举。即是农民以村为单位进行选举，工人则单独为一单位进行选举。这样就使民众参加选举十分便利了。第四，关于参加选举的人数。苏维埃选举运动的发展，使选民群众极大的认识了选举与自己生活的关系，过去不积极参加选举的民众，现在许多都积极起来了。一千九百三十二年两次选举与一千九百三十三年下半年的选举，许多地方到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选民，有些地方仅只害病的生育的以及担任警戒的人不曾参加选举会。第五，关于选举名单。一九三三年下半年进行的选举，实行了候选名单制度，使选民在选举之先就有应否选举某人的准备。第六，关于妇女的当选。现在多数的城乡苏维埃，妇女当选为代表的占百分之二十五以上。部分地方如上杭的上才溪乡，七十五个代表中妇女四十三个，占了百分之六十。下才溪乡九十一个代表中妇女五十九个，占百分之六十六。广大的劳动妇女但参加国家的管理了。第七，关于工作报告。即是由乡苏市苏在选举以前，召集选民开会，报告苏维埃的工作，并引导选民批评这种报告。这一办法，一九三三年下半年进行的选举，也比较上一年实行得更加普遍了。所有这些，都使民众对于行使管理国家机关的权

利的基本步骤——苏维埃的选举，有了完满的办法，保证了苏维埃政权巩固的基础。

其次，苏维埃的民主，见之于市与乡的代表会议。市乡代表会议制度但苏维埃组成的基础，是使苏维埃密切接近于广大民众的机关，两年来的进步，使我们的这一制度更加完满了。其最显著的特点在于：(一)为着使乡苏市苏的代表与当地居民密切联系，便于吸收居民的意见，并便于领导工作起见，依照代表与居民住所接近，将全体居民适当分配于各个代表的领导之下（通常以居民三十人至七十人置于一个代表的领导下），使各个代表对于其领导下的居民发生固定的关系。这样便使民众与苏维埃在组织上连成一片了。(二)乡苏市苏的代表，按其住所接近，在三个至七个代表之中选举一人为代表主任，其任务是在乡苏及市苏主席团指导之下，分配和指导其领导下各代表的工作，传达主席团的通知于各个代表，召集其领导下的居民开会，解决其领导下居民中的较小的问题。一村之内，并须有一个总的代表主任，负领导全村工作之责。这样便使市乡主席团与代表之间密切的联系起来，并使村的工作得到了有力的领导。(三)在乡苏维埃与市苏维埃之下，组织各种经常的及临时的委员会，如优待红军委员会，水利委员会，教育委员会，粮食委员会，卫生委员会等，其数可以多至数十，吸收群众中大批的积极分子参加这些委员会的工作。不但乡有委员会，村亦应该有某些必要的委员会。这样便把苏维埃工作组成了网，使广大民众直接参加了苏维埃的工作。(四)乡苏及市苏的选举，规定每半年举行一次（区苏亦半年一次，县苏省苏则每年一次），这样便使民众的新的意见容易涌现到苏维埃来。(五)在两次选举之间，代表有犯重大错误的，得由选民十人以上的提议，经选民半数以上之同意撤回之，或由代表会议通过开除之。这样便使不良分子不能长期驻足于苏维埃机关了。所有这些，都是苏区中许多地方正在实行着的市乡苏维埃的特点。大家都可以看见苏维埃政权的民主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实在是历史上任何政治制度所未曾有的。而苏维埃依靠这一制度，同广大民众结合起来，他就使苏维埃成为最能发扬民众创造力的机关，使苏维埃成为最能动员民众以适应国内战争，适应革命建设的机关，这也是历史上除苏联外无论什么政府所做不到的。区以上各级苏维埃政权机关完全建筑于市乡苏维埃的基础之上，由各级的工农兵代表大会与执行委员会而组成，政府工作人员，由选举而任职，不胜任的由公意而撤换，一切问题的讨论解决据根于民意，所以苏维埃政权是真正广大民众的政权。

其次，苏维埃的民主，还见之于给予一切革命民众以完全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与罢工的自由。当着国民党统治区域剥夺一切革命民众的自由权利，执行疯狂的法西斯蒂恐怖的时候，苏维埃政府下每个革命的人民，都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苏维埃并且给予一切可能的物质条件上的便利（会场，纸张，印刷机关等等），一切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集会结社与言论出版，苏维埃总是极力的领导着。苏维埃所不允许的，只是那些压迫剥削分子的反革命自由。

不但如此，为了巩固工农专政，苏维埃必须吸引广大民众对于自己工作的监督与批评。每个革命的民众都有揭发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错误和缺点之权。当着国民党贪官污吏布满全国，人民敢怒而不敢言的时候，苏维埃制度之下则绝对不容许此种现象。苏维埃工作人员中，如果发现了贪污腐化消极怠工以及官僚主义的分子，民众可以立即揭发这种人员的错误，而苏维埃则立即惩办他们，决不姑息。这种充分的民主精神，也只有苏维埃制度下方能存在。

最后苏维埃的民主精神，还见之于其行政区域的划分。苏维埃取消了旧的官僚主义的大而无当的行政区域，把从省至乡各级苏维埃的管辖境界都改小了。这是什么意义？这是使苏

维埃密切接近于民众，使苏维埃因管辖地方不大，得以周知民众的要求；使民众的意见迅速反映到苏维埃来，迅速得到讨论与解决，使动员民众为了战争为了苏维埃建设成为十分的便利。国民党军阀利用封建时代的大省大县大庄乡制度，这仅仅便利于隔绝民众，苏维埃政府是用不着的。这里应该指出：关于村的划分是重要的一节。因为乡苏维埃之下，执行苏维埃工作的最便利的方法，是以村为单位去动员民众，依靠了村的适当的划分，村的民众组织的建立，村的代表与代表主任对于全村的有力的领导，乡村的工作才能收到最大的成效。

三、苏维埃对于地主资产阶级的态度

其次说到苏维埃对于地主资产阶级的态度。

苏维埃实现了最完满的民主制度，他是为广大民众直接参加的，他给予广大民众一切民主的权利，他对于民众绝对不使用也绝不需要使用任何的强力。

但是，地主资产阶级，即一切被革命民众所推翻的剥削分子，苏维埃对之则是另外一种态度。

地主资产阶级，因为他们是剥削者，因为他们是过去的统治者，所以他们对于苏维埃是怀着极端深刻的仇恨的。因为他们虽被推翻但并未消灭，他们还有根深蒂固的社会基础，他们还有优越的知识与技术，所以他们虽被推翻，却时时企图复辟，企图推翻苏维埃政权，恢复原来的剥削制度。特别在国内战争时代，敌人对于苏区不断举行军事的进攻，更使这些被推翻的剥削者时刻企图以反革命行动响应进攻的敌人。因此苏维埃政权不能不从各方面对于这些分子施行严厉的制裁与镇压。

苏维埃制裁剥削分子的政策，第一件是拒绝他们于政权之外。苏维埃的宪法规定，对于地主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与革命为敌的人，完全取消他们的选举权，取消他们的红军中在地方部队中服兵役的权利。但这些分子却总是千方百计企图混进苏维埃机关中红军中与地方部队中来，特别在新开辟的苏区，群众斗争的发展还不充分，这些分子更容易利用机会混了进来。过去的经验完全证明：同这些阶级异己分子混入革命政权的活动作残酷无情的斗争，是苏维埃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

第二件，是剥夺一切地主资产阶级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这种自由苏维埃仅只给予革命的民众，而不给予任何地主资产阶级分子。因为地主资产阶级分子必然的要利用这种自由作为他们反革命的工具，剥夺这些分子的自由是绝对必要的。苏维埃之所以日臻于巩固，剥夺了这些阶级敌人的自由，减少了他们借以活动的机会，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第三件，利用革命武力与革命法庭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苏维埃基于武装民众的任务，建立了坚强的红军与广泛的地方部队，这是苏维埃直接依靠的铁的力量，苏维埃依靠了他，才能战胜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武力，才能镇压苏区内部的反革命活动。但是，苏维埃还有一个与此相连的镇压反革命的重要的武器，这就是苏维埃法庭。苏维埃法庭直接依靠于武装力量，依靠于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活动，依靠于人民的阶级斗争，使苏区中一切反革命企图受到严厉的镇压。数年来各个苏区中都发生了反革命的严重的活动，如中央苏区与湘赣苏区等处的AB团，福建的社会民主党，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闽浙与闽赣等地的改组派，湘鄂赣的托陈取消派等，都曾经企图甚至已经实行他们的反革命暴动。但结果都受到苏维埃法庭的严厉的镇压，克服了他们的暴动阴谋，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在这一方面政治保卫局与苏维埃法庭已经聚集了丰富的经验，纠正了过去许多地方没有执行明确阶级路线的错误。苏维埃

法庭的群众化，即苏维埃法庭的制裁反革命应该同广大群众的肃反斗争联系起来，现在也更加进步了，巡回法庭的普遍使用就是证明。

总结起来看，苏维埃具备着对于广大民众的十分宽泛的革命的民主主义，但同时就在这种民主主义中间构成了他绝大的权力——建筑于千百万工农民众坚固的信仰与自觉的需要之上的权力。苏维埃运用这种权力，形成了自己的专政，组织了革命战争，组织了苏维埃法庭，向着阶级敌人开展各方面的激烈的进攻，而苏维埃法庭则在苏维埃领土之内起了它镇压反革命活动的伟大的作用。

如果拿工农专政的苏维埃法庭与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国民党法庭相比较，那又是一幅绝妙的图画。

苏维埃法庭以镇压地主资产阶级为目的，对于工农分子的犯罪则一般处置从轻，国民党法庭以镇压工农阶级为目的，对于地主资产阶级的犯罪则一般处置从轻，法庭的作用完全给政权的阶级性决定了。

苏维埃法庭一方面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活动，苏维埃对于这些分子绝不应该有丝毫的姑息。但是另一方面，对于已经就逮的犯人，却是禁止一切不人道的待遇，苏维埃中央政府已经明令宣布废止肉刑，这亦是历史上的绝大的改革，而国民党法庭则至今充满着中世纪惨无人道的酷刑。

苏维埃的监狱对于死刑以外的罪犯是采取感化主义，即是用共产主义的精神与劳动纪律去教育犯人，改变犯人犯罪的本质。而国民党监狱则是纯粹的封建野蛮的虐杀，法西斯蒂的酷刑，劳苦群众与革命者的人间地狱。

消灭敌对阶级的反革命阴谋，建立苏维埃领土内的革命秩序，而废除司法范围内一切野蛮封建的遗迹，这是苏维埃法庭的目的，苏维埃在这一方面的所有的改革，同样是有它的历史意义的。

四、苏维埃的劳动政策

其次说到苏维埃的劳动政策。

苏维埃基于他的政权的阶级性，基于武装劳动民众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伟大任务，必须坚决的发展工人的阶级斗争，保证工人的日常利益，发展工人的革命积极性，组织工人的这种积极性到伟大的革命战争中来，并且使工人成为革命战争的积极领导者，成为巩固与发展苏维埃政权的柱石，这就是苏维埃劳动政策的出发点。

在苏维埃劳动政策之下，工人的利益得到了完全的保护，它与过去的国民党统治时代及现在的国民党区域比较起来，真有天堂地狱之别。

当着苏区还是国民党统治的时代，工人是在做雇主的奴隶，工作时间之长，工钱之少，待遇之残酷，工人地位之没有任何法律保障，这是每个工人所永远不能忘记的。所有这些，在现在的国民党区域，不但是一样的存在着，而且变本加厉了。最近的情形，白区工人的实际工资减少了百分之五十以上，而减工，裁工，关厂，则成为资本家进攻工人的普通方法。因此造成了广大的失业，单以产业工人说，失业人数达百分之六十以上。一切国民党统治区域，罢工是犯罪的行为，一九三三年三月国民党在汉口公开宣布罢工者处死刑。一切工人与资本家的争议，国民党无不是站在资本家方面向着工人压迫的。

但是，这些罪恶，在苏区中便一扫而空了。

苏维埃政权之下，工人是主人翁，工人领导着广大的农民担负了巩固苏维埃的伟大的责任。因此苏维埃的劳动政策的原则是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巩固与发展苏维埃政权。根据这种原则，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颁布了劳动法，一九三三年加以修改，重新颁布。此次修改的劳动法，对于城市与乡村，对于大企业与小企业，都能使之应用适当。

现在苏区是一般的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订立了劳动合同与集体合同。在城市内与许多的乡村内已经普遍建立了劳动检查所与检查员，目的是检查雇主是否有违背苏维埃劳动法的行为。对于雇主犯法行为的制裁，则属于专门设立的法庭。为了防止资本家对于劳动者的操纵，为了保护在帝国主义国民党长期“围剿”所造成的一部分失业工人，苏维埃垄断了劳动介绍权，一切资本家请工，必须到苏维埃设立的劳动介绍所去。失业救济机关的设立，现在也日益推广了，失业工人一般得到了具体的救济。农村工人又都分配了土地。社会保险制度是确立了，社会保险局已建立在苏区各个城市中。所有这些都是工人们在国民党政权下所丝毫不能得到的。然而苏维埃政权则以为这些政策的实行乃是自己的最大的责任。

由于苏维埃坚决执行自己的政策，苏区工人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首先是关于工资。苏区各地的实际工资，比较革命前，是一般的增加了。下面是汀州的一个例子：

		最高工资			最低工资			中等工资	
职业	期间	革命前	现在	比较	革命前	现在	比较	革命前	革命后
京果工人	每月	一〇元	三二元	加二二元	二元	二二元	加二〇元	(革命前的)(没有统计)	三〇元
纸业工人	每月	一〇元	三五元	加二五元	三元	三一元	加二八元	(革命前的)(没有统计)	三三元
油业工人	每月	六元	一八元	加一二元	三元	一二元	加九元	(革命前的)(没有统计)	一五元
药业工人	每月	六元	三〇元	加二四元	二元	二六元	加二四元	(革命前的)(没有统计)	二八元
刨烟工人	每月	七元	三六元	加二九元	三元五毛	三〇元	加二六元	(革命前的)(没有统计)	二八元
印刷工人	每月	一五元	三六元	加二一元	五元	二八元	加二三元	(革命前的)(没有统计)	三四元
五金工人	每月	六元	一八元	加一二元		一四元		(革命前的)(没有统计)	一六元
木匠工人	每日	六毛	八毛	加二毛					
木船工人	由汀州至上杭	一四元	四六元	加三二元					
染业工人	每月	五元五毛	二〇元	加一四元	二元	一八元	加一六元	(革命前的)(没有统计)	一九元
油纸工人	每月	五元	二一元	加一六元	二元	一七元	加一五元	(革命前的)(没有统计)	一九元
酒业工人	每月	六元	二〇元	加一四元	三元	一八元	加一五元	(革命前的)(没有统计)	
布业工人	每月	一〇元	三五元	加二五元	二元	三一元	加二九元	(革命前的)(没有统计)	三二元

从这个表看来，汀州市工人的工资比战前最少的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二(木匠)，最多的竟增加了百分之一千四百五十，即增加十四倍半（布业工人）。这种惊人的增加，完全是反映了国

民党时代的惊人的低落。当然汀州工人的工资是比较其他苏区城市的工资要特别高一些（并且工人吃的伙食是算在内的），但是其他城市的工资也是增加了的，如瑞金城市的泥水木匠工人，在最近一时期，从革命前每日两角五分，增加至每日四角五分，增加了百分之八十。

不但城市，农村中工资也增加了。下面是赣县田村区各时期零工工资的比较：

		手艺工人	纸业工人	农业工人	苦力运输工人
最高工资（每日）	革命前	三毛	四毛	二毛八分	四毛半
	一九三一年五一前	三毛	四毛	三毛	六毛七分五
	现　在	三毛五分	四毛五分	三毛二分	九毛六分
	比革命前增加	五分	五分	四分	五毛一分
中等工资（每日）	革命前	二毛二分	二毛二分	一毛	二毛六分
	一九三一年五一前	二毛五分	二毛四分	一毛五分	三毛九分
	现　在	三毛	三毛	二毛	五毛
	比革命前增加	八分	八分	一毛	二毛四分
最低工资（每日）	革命前	一毛	一毛四分	三分	一毛
	一九三一年五一前	一毛	一毛一分	六分	
	现　在	二毛	二毛五分	一毛	二毛
	比革命前增加	一毛	一毛一分	七分	一毛

这个表表示了一个农村，但其他农村中工资是一般增加了的。至于国家企业中的工资，拿最近两年来中央直辖的若干种企业来说，是一般增加了百分之二十，最高增加了百分之四十。

工资的交付，一般都办到了按期付清，因为苏维埃的监督，雇主拖欠工资的事情是很少了。少数顽强的资本家，经过劳动法庭的裁判，也不敢与工人为难了。

关于法定工作时间——八小时制的实施，两年来在苏区的一切城市是普遍实现了。农村中的雇佣劳动者，每日的实在工作时间也少有超过八小时，十六岁至十八岁的雇佣劳动者的时间，是一般比较成年为少。

关于妇女及未成年人的保护，如同工同酬，产前产后休息，十四岁以下童工的禁止，也是一般的实行了。

关于学徒的保护，则一般的缩短了学徒的年限，改良了学徒的待遇，扫除了对学徒的封建压迫。学徒的生活是相当的改善，学徒的工资是增加了（如江西方面，学徒每年至少有十五元的津贴，多的则有每月三元的）。

关于一般待遇，在城市中，特别在国家企业里，工人的卫生与伙食有了很大的改善，各个城市工人的伙食普通是每月六元以上。农村工人的伙食，与雇主同等。

苏区工人是组织了坚强的阶级工会。这种工会是苏维埃政权的柱石，是保护工人利益的堡垒，同时它又成为广大工人群众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苏维埃对于工会，在法律上保障了它的权利，因此工会会员极大的发展起来。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统计，现在苏区工会会员数，仅以中央苏区及其附近几个苏区计算，共有二十二万九千人，其分布：中央苏区一一〇、〇〇〇人，湘赣二三、〇〇〇人，湘鄂赣四〇、〇〇〇人，闽浙赣二五、〇〇〇人，闽赣六、〇〇〇人，闽北五、〇〇〇人，根据中央苏区的材料，没有加入工会的工人，仅只有三千六百七十六人，不足全体工人的百分之五，即是说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人是加入工会了。

一部分地方如兴国，加入工会的竟达百分之九十八。请问这是国民党区域能够梦见的事情么？不但中国，全世界除苏联外，那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是有这种情形的？

总之，两年以来苏维埃的劳动法，已在苏区所有城市中实行了，乡村中也实现了它的主要条文。在两年当中，虽然遇到了不少的资本家富农对于劳动法的抵抗，但因工人群众的积极斗争，与苏维埃的严厉监督，使这种抵抗归于无效。同时对于独立生产者与中农贫农雇用工人，有时发生违反劳动法的事情，则应该经过恳切的劝告使之明了而自动的拥护劳动法。因此工人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工人的革命积极性大大发扬起来，工人在革命战争中，在苏维埃建设中，是起了它的伟大的作用。

根据中央苏区公略、万太、龙冈、兴国、胜利、西江、雩都、寻邬、上杭、宁化、长汀、新泉十二县的统计，工会会员七万零五百八十人中，现在红军及游击队服务的一万九千九百六十人，等于会员的百分之二十八。参加苏维埃等革命机关工作的六千七百五十二人，等于会员的百分之十，他们大部分是在苏维埃机关负责。以上两项共计二万六千七百一十二人，占会员总数百分之三十八。现在还在家的会员则为四万三千八百六十八人。这十二县在家的工会会员，退还第二期公债四万三千八百五十五元，最近购买经济建设公债十九万七千八百零三元，在家会员平均每人买了四元五角。在家会员现在是党团员的一万二千四百三十五人，占在家会员总数百分之二十八。从这些统计，证明了工人群众积极的加入红军，参加与拥护革命战争，拥护中国共产党。然而这些都是苏维埃保护了工人的利益，发扬了工人的积极性得来的，那些说工人在革命后没有得到什么东西，说工人的积极性没有发扬起来，只可算作完全的胡说。

五、苏维埃的土地革命

现在我们来说苏区的土地革命。

中国的苏维埃与红军，是从土地革命中生长与发展起来的。广大的农民群众在地主阶级与国民党军阀的残酷压迫剥削之下，只有土地革命才能解放他们。苏维埃土地政策的原则，就在于完全推翻地主阶级与国民党军阀一切封建与半封建的剥削与压迫。

一切过去及现在的国民党区域，农村中是吓人的地租（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八十），吓人的高利贷（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百），与吓人的苛捐杂税（全国计一千七百余种之多），结果土地集中于地主阶级与富农的手里，绝大多数农民失去土地，陷于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惨境。因为土地上面的无情掠夺，农民失掉防御灾荒的能力，结果使水旱灾荒遍于全国，一九三一年被灾区域达八百零九县，被灾人口达四千四百余万人。因为层层的被掠夺，农民缺乏再生产能力，许多耕地变得很瘠，许多简直变成荒地，同时农民仅有的一点出产，又被帝国主义的农产物品倾销所压倒，因此中国农村经济陷于完全的破产状态。农村中土地革命的火焰，就在这种基础上强有力的爆发起来了。

苏区土地革命的威力，扫荡了一切封建的残迹，千百万农民群众从长期的黑暗中惊醒起来，夺取地主阶级的全部土地财产，没收了富农的好田，废除了高利贷，取消了苛捐杂税，打倒了一切与革命为敌的人，而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农民第一次从地狱中出来，取得了主人翁资格，这就是苏维埃政权下与国民党政权下农村状态的根本区别。

第一次全苏大会颁布了土地法，使得全国土地问题的解决有了正确的依据。因为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在分析阶级问题上发生了许多的争论，人民委员会根据过去土地斗争的

经验，作出了“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将地主富农中农游民等许多问题给予了正确的解决，农村斗争将更有力的发展起来。关于分配土地方法上面的许多问题，如象距离，肥瘠，青苗，山林，池塘等等，还急待收集各地经验作成必要的决定，这在新区分配土地的领导上是非常的必要的。

为着彻底消灭封建残余势力，使土地革命的果实完全落在雇农贫农，中农的手里，中央政府发动了广泛而深入的查田运动。根据一九三三年七、八、九三个月的统计，中央苏区江西福建粤赣三省共计查出地主六千九百八十八家，查出富农六千六百三十八家，从这些被查出的地主富农等手中收回土地三十一万七千五百三十九担，没收地主现款与富农捐款，共计六万零六千九百十六元。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更加发扬起来了，雇农工会与贫农团成为苏维埃在农村中的柱石。三个月中间得到了如此伟大的成绩，证明农村阶级斗争还需要苏维埃予以充分地注意，而查田运动是继续发展农村斗争彻底消灭封建残余的有力的方法，也是完全证明了。

土地斗争的阶级路线，是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与消灭地主。这一路线的正确应用，是保证土地斗争胜利发展的关键，是苏维埃每一对于农村的具体政策的基础。因此苏维埃政府对于那些侵犯中农（主要是侵犯富裕中农）及消灭富农的错误倾向，是应该严厉的给予制裁，同时决不应该放松对于那些同地主富农图谋妥协的错误，只有反对这一切的错误，土地斗争才能走上正确的轨道。

土地革命斗争的群众工作，两年以来得到了不少的经验。总结其要点则为：(一)分配土地的运动与查田运动，均必须以全力去动员广大贫农中农以及农村工人群众，自己动手向着地主富农作斗争。分田与查田的工作，都必须经过群众的同意。每一阶级成分的处理，必须通过于群众的会议中。苏维埃人员单独的少数人的进行分配土地与清查阶级，那便是有降低群众斗争热情的危险。(二)没收地主阶级土地以外的财产与富农多余的耕牛农具房屋，必须以大部分分配于贫苦的群众，如果不是这样做而归之少数人员使用，那么也就要降低群众的情绪，而有利于剥削分子的反抗。(三)土地的分配不宜在长期不定的状态之中，应当在相当短促的期间内分配妥当，使之固定在农民的手中。以后非有当地多数群众的要求，不应轻易再行分配。如果不这样做，那么违反农民的意见，不但影响农民于土地生产的积极性，而且同样将为剥削分子利用了去阻碍土地斗争的发展。(四)查田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清查剥削成分，而不是为了清查被剥削成分，因此不应该按家按亩去查，而应该动员最广大群众清查那些暗藏着的地主富农分子。(五)必须打击那些阻碍分田与查田的反革命分子，在群众的同意之下用最严厉的办法处治他们，从逮捕监禁，群众公审，直至枪决，这是完全必要的。如果不是这样做，那么土地斗争就要受到极大的障碍。(六)应该极力发展阶级斗争，而避免地方斗争与姓族斗争，地主阶级与富农，却是极力想拿地方斗争与姓族斗争来代替阶级斗争以便阻碍土地革命的前进，苏维埃人员不应该去上地主富农的当。(七)土地革命的发展，依靠于农村基本群众的阶级觉悟与组织程度的提高，因此，苏维埃人员必须在农村中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宣传，必须健全贫农团与雇农工会的组织。

土地革命不但使农民得到土地，而且要使农民发展土地上面的生产力。由于苏维埃的领导与农民劳动热忱的提高，苏区的农业生产在广大的地方是恢复了，有些并且更加发展了。

在这个基础之上，农民的生活是有了很大的改良。农民推翻了地主与国民党的剥削，生产结果落在自己的手里，因此现在农民的生活比较国民党时代是至少改良了一倍。农民的大

多数，过去一年中有许多时候吃不饱饭，困难的时候有些竟要吃树皮，吃糠秕，现在则一般不但没有饥饿的事，而且生活一年比一年丰足了。过去大多数农民每年很少吃肉的时候，现在吃肉的时候多起来了。过去大多数农民衣服着得很烂，现在一般改良，有些好了一倍，有些竟好了两倍。

那一种生活那一种政权是农民群众愿意的呢？让一切国民党区域的农民群众自己答复这个问题吧！

六、苏维埃的财政政策

再说苏维埃的财政政策。

苏维埃财政的目的，在于保证革命战争的给养与供给，保证苏维埃一切革命费用的支出。但是有着广大的革命战费与革命工作费用的支出的苏维埃共和国，当它还是处在全国范围内的较小部分，又是一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地方，并且实行着便利于广大民众的税收政策，许多外边人们竟不知道苏维埃财政的出路在什么地方。而国民党占据着广大的区域，大数量的搜括民脂民膏，为什么反而弄到财政破产？

没有什么奇怪，苏维埃的财政政策与财政的使用，同国民党是根本的不同。

苏维埃的财政政策，建筑于阶级的与革命的原则之上。因此苏维埃的财政来源乃是：(一)向一切封建剥削者进行没收或征发；(二)税收；(三)国民经济事业的发展。

所谓向封建剥削者没收征发，即是向苏区与白区地主富农筹款，根据过去的经验，这一方面的收入常常占了主要的位置，这和国民党的财政政策恰好相反：苏维埃把主要财政负担放在剥削者身上，国民党则把主要财政负担放在工农劳苦群众身上。

苏维埃的税收，是统一的累进税，现在简单的两方面实行，这就是商业税与农业税，税收的基本原则，同样是重担归于剥削者。

商业税的征收，分为关税与营业税。关税是以按照苏区的需要程度统制货物的进出口为目的，因此税率有完全免征的，有高至百分之百的。在中国境内，只有苏维埃实行了完全自主的关税制，不受任何外国政府的干涉，一切货物在边境税关纳税之后通行全苏区，无第二次之征税，一扫国民党厘金关卡层层抽剥的虐政。

营业税即是商业所得税（工业税现在没有收），按照商店资本大小盈余多少，征收统一的累进税，资本小盈余少的税轻，资本大盈余多的税重。资本在百元以下，群众的合作社以及农民直接卖出其剩余生产品，这些都实行免税。

农业税依靠于农民的革命热忱，使之自愿的纳税，同样是累进原则的征收法。家中人口少分田少的税轻，家中人口多分田多的税重。贫农中农税轻，富农税重。雇农及红军家属免税，被灾区域按灾情轻重减税或免税。

苏维埃采取统一的累进税法，乃是世界上最优良的税法。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不敢采用或者不敢彻底采用的。至于国民党的税收，则是一篇绝大的糊涂账。其税收原则是主要取之农民及其他小有产阶级。正税之外，有无数的附加税。据天津大公报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二日的统计，国民党区域内捐税名目共有一千七百五十六种之多，而四川的田赋预征到了一九八七年，陕西的田赋比国民党未到时增加了二十五倍，这是国民党对于劳苦民众的“恩德”！

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苏维埃财政的收入，是苏维埃财政政策的重要部分，明显的效验

已在闽浙赣苏区表现出来，在中央苏区也表现出来了。这一方面的着重的进行，是苏维埃财政机关与经济机关的责任。这里应该指出：国家银行发行纸票的原则，应该根据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财政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地方，这一方面的充分注意是绝对必需的。

至于财政的使用，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苏维埃人员明白贪污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向着贪污浪费作坚决斗争，过去虽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加倍的用力。节省每个铜板为着战争与革命事业，是苏维埃会计制度的原则。苏维埃对于财政的使用，应该与国民党的使用有绝对的差别。

苏维埃的财政不是没有困难的，红军的扩大，战争的发展，使苏维埃面前有着它财政上面的困难。但是困难的克服，即包含于困难本身之中，开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改善我们的苏维埃工作，向着一切国民党区域去扩大我们的财政收入，向着一切剥削分子的肩上安放着苏维埃财政的担子，向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去增加苏维埃的收入，这就是克服困难的方法。

七、苏维埃的经济政策

（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

八、苏维埃的文化教育

现在要说到苏维埃的文化教育了。

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为着动员民众一切力量，加入于伟大的革命斗争，为着创造革命的新时代，苏维埃必须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动统治阶级所加在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而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

谁都知道，国民党统治下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地主资产阶级手里的。他们的教育政策，是一方面实行反动的武断宣传，以消灭被压迫阶级的革命思想，一方面施行愚民政策，将工农群众排除于教育之外。反革命的国民党把教育经费拿了作为进攻革命的军费，学校大部分停办，学生大部分失学。因此在国民党统治之下，造成了人民的愚昧无知。全国文盲数目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对于革命文化思想则采取极端残酷的白色恐怖。任何进步的文学家，社会科学家，一切文化教育机关中的革命分子，都要受到国民党法西斯蒂的摧残。使一切文化教育机关变成黑暗的地狱，这就是国民党的教育政策。

谁要是跑到我们苏区来看一看，那就立刻看见是一个自由光明的新天地。

这里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工农劳苦群众的手里，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苏维埃政府用一切方法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为了这个目的，给予群众政治上与物质条件上的一切可能的帮助。因为现在的苏维埃区域，虽然是处在残酷的国内战争环境，并且大都是过去文化很落后的地方，但是已经在加速度的进行着革命文化建设了。

根据江西福建粤赣三省的统计在二千九百三十二个乡中，有列宁小学三千〇五十二所，学生八万九千七百一十人，有补习夜校六千四百六十二所，学生九万四千五百十七人，有识字组（此项只算到江西粤赣两省，福建未计）三万二千三百八十八组，组员十五万五千三百七十一人，有俱乐部一千六百五十六个，工作员四万九千六百六十八人。这是中央苏区一部分的统计。

苏区中许多地方，学龄儿童的多数是进入了列宁小学校，例如兴国学龄儿童总数二万〇九百六十九人（内男一二，〇七六，女八，八九三），进入列宁小学的一万二千八百〇六人

(内男生八，八二五，女生三，九八一)，失学的八千一百六十三人(内男三，二五一，女四，九一二)，入学与失学的比例为百分之六十与四十，而在国民党时代，入学儿童不到百分之十。苏区很多地方的儿童们，现在是用了大部分时间受教育，做游艺，只小部分时间参加家庭的劳动，这同国民党时代恰好相反了。儿童们同时又组织在红色儿童团之内，这种儿童团，同样是儿童们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

妇女群众要求教育的热烈，实为从来所未见。兴国夜校学生一万五千七百四十人中，男子四千九百八十八人，占百分之三十一，女子一万〇七百五十二人，占百分之六十九。兴国识字组组员二万二千五百十九人中，男子九千人，占百分之四十，女子一万三千五百一十九人，占百分之六十。在兴国等地妇女从文盲中得到了初步的解放，因此妇女的活动十分积极起来。妇女不但自己受教育，而且已在主持教育，许多妇女是在作小学与夜学的校长，作教育委员会与识字委员会的委员了。女工农妇代表会在苏区是一种普遍的组织，它注意于劳动妇女群众的整个利益，妇女教育当然是她们注意的一部分。

群众识字的人数是迅速增加。识字的办法有夜校，识字运动与识字牌。夜校有一定的地点，识字组在群众的家里，识字牌在道路的旁边，领导识字运动的机关则为乡村的识字运动委员会。拿兴国来说，全县有一百三十个乡的识字运动总会，五百六十一个村的识字运动分会，三千三百八十七个分会下面的识字小组，二万二千五百二十九个加入识字小组的组员。这是扫除文盲的极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种运动应该使之向着全苏区一切城市与乡村中间开展去。

苏区群众文化运动的迅速发展，我们看报纸的发行也可以知道。中央苏区已有大小报纸三十四种，其中如“红色中华”从三千份增加四、五万份以上“青年实话”发行二万八千份，“斗争”只在江西苏区每期至少要销二万七千一百份，“红星”一万七千三百份，证明群众文化水平是迅速提高了。

苏区中群众的革命的艺术，亦在开始创造中，工农剧社与工农歌舞团的运动，农村中俱乐部运动，是在广泛的发展着。

群众的红色体育运动，也是迅速发展的，现虽偏僻乡村中也有了田径赛，而运动场则在许多地方都设备了。

苏区还缺乏完备的专门教育的建设。但为了革命斗争领导干部的创造，我们已设立了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及教育部领导下的许多教育干部学校。中等教育与专门教育之应该跟着普通教育的发展而使之发展起来，无疑的应该成为教育计划中的一部分。

为了造就革命的知识分子，为了发展文化教育，利用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为苏维埃服务，这是苏维埃文化政策中不能忽视的一点。

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

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什么？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

每个人都明白，所有这些方针与任务，只有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有实现的可能，因为这是阶级斗争极端尖锐的表证，这是人类精神解放绝大的胜利。

九、苏维埃的婚姻制度

现在说苏维埃婚姻制度。

为了解放妇女于野蛮封建的婚姻制度之下，为了实行真正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还在一九三一年的十一月，中央执行委员会即颁布了苏维埃的婚姻条例，在这里，确定了结婚与离婚的完全自由，废除了包办强迫买卖的婚姻制度，禁止蓄带童养媳。两年来在一切苏维埃管理区域是一般的实行了这一法令，凡非亲族血统在五代以内，非神经病与危险性的传染病，男子年满二十，女子年满十八，经双方同意，并在乡苏与市苏举行登记，即可以实行结婚。离婚则只要男女一方提出要求，经过乡苏或市苏登记就行了。

这种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打碎了中国四千年束缚人类尤其是束缚女子的封建锁链，建立适合人性的新规律，这也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胜利之一。

但是，这一胜利，是附属于工农民主专政的胜利之后的，因为工农劳苦群众婚姻制度的解放，必须首先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实行土地革命，男女劳动群众尤其是妇女第一有政治上的自由，第二也有了经济上的相当的自由，然后婚姻自由才有最后的保障。苏区中劳动妇女同男子一样有了选举权，并且分配了土地和工作，所以新制度是能够完全的实行了。

因为数千年来婚姻关系野蛮得无人性，女人所受压迫比男子更甚，所以现时苏维埃的婚姻法令着重于保护女子，把因离婚而起的义务更多的给了男子去负担。

因为小孩子是革命的新后代，过去社会习惯上不甚注意小孩子的保护，所以关于保护小孩，婚姻法令上有了单独的规定。其中关于私生子地位的承认与私生子的保护，是给了特别的注意的。

这婚姻制度的实行，使苏维埃取得了广大的群众的拥护，广泛群众不但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解放，而且在男女关系上也得到解放。

就拿婚姻制度一件事来说，苏维埃区域与国民党区域，也是两个绝对相反的世界。

十、苏维埃的民族政策

最后，关于民族政策。

争取一切被压迫的少数民族环绕于苏维埃的周围，增加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革命力量，使一切被压迫民族得到自由与解放，是苏维埃民族政策的出发点。

国内的许多少数民族如蒙古人，西藏人、新疆缠回，甘肃回民，高丽人，安南人，苗人，黎人等等都受着帝国主义和中国历来封建皇帝与封建军阀的剥削和统治，国民党所谓“五族共和”只是欺骗人的鬼话，而且冯王祥的屠杀甘肃回民，白崇禧的屠杀广西苗族，乃是国民党最近的“赏赐”。另方面，少数民族自己内部的统治阶级，如王公活佛喇嘛土司等，与英日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军阀相结合，使这些民族的广大劳苦民众遭受更加厉害的压迫与剥削，或者他们（王公，活佛，喇嘛土司等）直接投降于帝国主义，引导帝国主义迅速的殖民地化这些区域（如西藏，内蒙），更进一步的掠夺民众，这是少数民族过去与现在生活的实质。

苏维埃政府坚决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军阀对于少数民族的统治与掠夺，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其颁布的宪法大纲的第十四条宣言：

> “中华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自决权，直到各民族脱离中国建立自己的独立自由国家。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属住在中国境内者他们加入中国苏维埃

联邦，或者脱离苏维埃联邦，或者建立自己的区域，均由各民族照自己的意志去决定。中国苏维埃政权在现在必须努力，帮助这些弱小民族，使他们脱离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王公喇嘛土司等压迫统治，而得到完全的解放。苏维埃政权应在这些民族中间发展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言语”。

这是对于全世界帝国主义和中国国民党实行民族压迫的响亮的回答，中国广大工农群众及其苏维埃政府，不但自己正在用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以求脱离帝国主义的羁绊，而且号召国内一切弱小民族同时脱离中国统治阶级以及帝国主义的羁绊，直到这些民族的完全独立。不但如此，苏维埃宪法大纲第十五条又说。

“中国苏维埃政权对于凡因革命行动受到反动统治迫害的中国各民族以及世界各国的革命战士，给以托庇苏维埃区域的权利，并且帮助他们重新恢复斗争的力量，直到这些民族与国家的革命运动得到完全胜利为止”。

苏区的许多高丽，台湾与安南革命同志的寄居，第一次全苏大会，高丽代表的出席，这次大会的几位高丽，台湾，安南与爪哇的代表出席，都证明了苏维埃这一宣言的真实。

共同的革命利益，使中国劳动民众与一切少数民族的劳动民众真诚地结合起来了。

民族的压迫基于民族的剥削，推翻这个民族剥削制度，民族的自由联合就代替民族的压迫。

然而这只有中国苏维埃政权的彻底胜利才有可能，赞助中国苏维埃政权在全国范围的胜利，同样是各少数民族的责任。

从苏维埃政府所决定的这些政策和实施的这些成绩看来，很明显的苏维埃中国内的民众已经得到了许多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过的政治上，经济上，社会生活上的解放和胜利。然而谁都晓得，我们苏区目前所作的一切，还只不过是苏维埃革命伟大解放政纲的部分实现的开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自始即有一贯的明显的施政纲领和前途，苏维埃中央政府早已向全中国和全世界明白宣言过，他要完全消灭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他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完全新式的独立自由的国家，使中国人民过着真正的幸福的新生活。在将来向前发展过程中，它将实行国家工业化政策，它将实行国家农业集体化，它将逐步实行完全有计划的国民经济，它将根本消灭失业痛苦，它将根本消除贫穷的现象，它将使人民享受优裕丰富的生活，它将有不可战胜的国防力，它将有豁然独立的国际地位，它将使中国变成永远没有人压迫人和人剥削人的幸福光荣的社会主义社会，换句话说，今日社会主义胜利建设的苏联，这是我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向前发展的活榜样！

（五）苏维埃在彻底粉碎六次“围剿”争取全国革命胜利面前的具体战斗任务

当着我们说到了目前新的形势，说到了两年来苏维埃政权反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围剿”的斗争，说到了苏维埃实施的基本政策的时候，就使我们得到一种确定的结论。即是说，苏维埃运动是大踏步前进了。两年以来，苏维埃运动的胜利，明显地变动了敌我两方的力量，敌人加强了他们的动摇与崩溃，而苏维埃运动则在猛烈的发展中，革命的力量是更加壮大了，革命的阵地是更加巩固了。民族战争与革命的国内战争已在中国广大范围内开展着，红军已

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工农民主专政的基础已经确立了，苏维埃工作已经在各方面得到伟大的成绩，苏维埃中央政府的集中领导不但在苏区树立了坚固的基础，而且在国民党统治区域成为广大民众的革命旗帜了，所有这些都已经成为现时生活实际，成为不可否认的客观存在的事实了。

然而革命的前进，要求我们估计到另外一些情形，要求我们以深刻的自我批评精神来检查革命的战线中存在着的弱点，这是我们不能放弃的责任。

估计我们的弱点，首先必须明白，现在苏维埃已经胜利的区域虽然是很广大了，但在全国来说，则还是处在较为狭小的范围内，还是处在一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地方。反革命还保存着他们的广大的区域，还占据着各个重要的城市。因此，苏维埃争取全国胜利的任务是最严重地放在我们的肩上。日益加紧两个政权之间决死的斗争，要求我们以极大的努力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不容许丝毫的自满自足观念留存在我们革命队伍中间，也不容许表现任何微小的疲倦态度。

第二，在过去的两年中间，虽然全国民众的反帝运动是广大的开展了，苏维埃中央政府对于运动的领导也有不少的成绩，然而若拿了与当前民族危机的严重性比较，与阻止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投降卖国的严重任务相较，则现时发展着的反帝斗争力量，显然还是异常不够的。苏维埃还没有采用更多的办法去发展广大群众的民族的与阶级觉悟，去组织民众的反帝斗争，而且就在民众自发的反帝斗争中，苏维埃政府直接的帮助与领导还是非常不充分。广大白色区域的工人反资产阶级的斗争，农民反地主的斗争，苏维埃还没有充分的尽其组织与领导的责任。即在苏区周围的国民党区域，也还未用最大力量去组织群众的斗争，使这些区域造成迅速变为苏区的条件，使红军在这些区域作战得到群众更多的配合，特别是在白区士兵中造成暴动响应红军的局面。

第三，红军的数量与质量，虽然是迅速扩大和增强了，但对于执行战胜帝国主义国民党整个军事力量，争取革命在全国胜利伟大任务上，倒还是相差很远。后方扩大红军的工作，还不能适应前线的要求。赤卫军、少先队的编制与训练，在许多地方还是差得很。游击队的组织与行动，一般还是很不够的，优待红军家属的工作，在有些地方做得非常之不好。所有这些使得革命战争的发展，还只限于过去的成绩，使得我们每一次冲破敌人“围剿”之后，还不能乘胜直进，争取更加伟大的胜利。

第四，在一切为了战争的任务下，我们还不能使一切苏维埃工作，完全适合于革命战争的要求。这不论在土地斗争方面，在经济建设方面，在财政方面，在肃反方面，以及在文化教育方面，都有他的弱点的存在，指出其一般的弱点，即是说，革命战争要求这些工作以很快的速度，争取大的成绩；然而在各地执行起来，都是参差不齐的。很多地方真正达到了所谓很快速度和最大成绩的标准，依靠了这些地方的工作，使革命战争得到了很大的帮助，但在另一些地方，则不但工作进行非常之慢，甚至经过很长的时期，还不能得到应有成绩，特别在有些新区与边区中间，那里的工作更加差些。这种情形的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地方的苏维埃机关中存在着一些不了解甚至不愿意执行苏维埃法令政策的分子。这些分子当中，有些是严重的机会主义者与官僚主义者，有些简直是地主资产阶级派遣进来的暗探。他们不是推进苏维埃的工作，而是妨碍了苏维埃的工作。他们不使苏维埃工作服从战争，而是使苏维埃工作离开战争，他们不愿意去开展群众的斗争，而使群众斗争停顿起来。他们不曾对于广大群众的动员，不曾对于群众的说服教育，去执行苏维埃工作，而是用空谈空喊，甚至强迫命

令的官僚主义去执行苏维埃工作。他们不去了解下层的情形，不去教育新进的干部，不去听取群众的意见，而只是机会主义的诬蔑下级干部不好，那里的群众没有革命积极性。在这些地方苏维埃的民主是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没有吸收最广大群众来参加苏维埃的选举，没有吸收群众中大批积极分子来参加苏维埃的工作，这些地方的市乡代表会议制度，还没有很好的建立，还没有使苏维埃成为真正广大群众自己的政权机关。在这些原因之下，就使得许多苏维埃工作，在这些地方缺乏应有的成绩，使他不能适应革命战争的迫切要求。应该明白指出，这是苏维埃工作中间一个很严重的弱点。

所有这些弱点的存在，给了我们一种深刻的警觉：就是必须克服了这些弱点，苏维埃运动才能适应一切客观的有利条件，而采取更大规模向着更大范围内发展去。

我们已经有了一个伟大的力量，这个力量成为我们发展的基础。但是革命形势的需要，超过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力量还不够，我们必须增加力量。

为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围剿”,争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必须号召全苏区全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众，坚决执行下列各个具体战斗任务。

一、在红军建设方面

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对于全国红军的领导，更进一步地强健起来，使全国红军的行动比较过去更加能够在统一战略意志下互相呼应与互相配合，使各地方军事机关更加能够在中央领导之下充分的执行他们自己的职务。

把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普遍的深入的传播到全苏区全中国广大工农群众中去，号召群众在最短促的时间之内，为着实现这个最低限度的口号而斗争。要使群众明白，摆在面前的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政权之间的决定胜负的战斗，苏维埃政权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直接广大的冲突，依靠我们数百万大红军的创立，因此一百万红军的首先创立，是苏维埃与每个工农群众神圣的责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与各级地方苏维埃应该负责，收集两年尤其是去年红五月以来，各地扩大红军的丰富经验。着重的指出以充分的政治鼓动，去代替强迫方法。以残酷的阶级斗争与苏维埃在这一方面的法令，去对付破坏扩大红军与领导开小差的阶级异己分子与不良分子，以充分执行苏维埃优待红军战士及其家属的一切法令与办法，去提高红军战士们的社会地位，去增加红军战士及其家属的精神上的安慰，去解决红军战士及其家属一切物质生活上的困难，是扩大红军的重要方法。还要指出，为红军家属耕种土地以及日用必需品的供给，是优待工作的重要部分。一切对于优待红军战士及其家属怠工消极与阳奉阴违的分子，应该受到苏维埃法律的裁判。

应该把巩固红军放在红军建设的重要地位，使红军不但能够很快扩大，而且能够很快强健起来。应该更进一步提高红军战士的政治教育，使每个红军战士都自觉的为了苏维埃新中国而奋斗到底，使红军成为苏维埃的宣传者与组织者，成为创造新苏区的执行者，使红军战士与广大苏区白区的工农劳苦群众之间发生更加密切的联系。要从政治教育去提高红军的自觉的纪律，使他们明白这是保证战争胜利的重要武器。政治委员制度，应该建立到一切红军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队里面去。应该提拔更多的工人成份充当各级军事的与政治的指挥员。红军学校应当使之成为比较过去更能训练大批高级的与初级的军事政治干部的学校。注意红军中成份的考察，对于地主资产阶级分子混进红军中来破坏红军的企图，应该给与严重的打击。巩固红军使红军成为铁军的工作，与政治工作同等重要而为现时红军所迫切需要

的，就是军事技术的提高。这一任务的解决，在战争的规模日益扩大，在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队日益采用新的军事技术的前面，对于我们是绝顶重要的。"学会与提高新的军事技术"的口号，应该深入到每个红军战士中去，红军学校应该为了这一目的去尽他最大的努力。

应该把赤卫军少先队的新的编制方法推广到苏区的一切地方去，把一切劳动的青年成年男女，全部武装起来。红军后备军与地方守卫部队的作用与责任，应当使每个赤少队员清楚的认识。义务兵役制在将来更大规模的国内战争中的需要与作用，现在就应该向一切劳苦群众与赤少队员适当地宣传起来。应当用大力进行一切可能的与必要的军事训练与政治训练，野营演习方法应当尽可能推广到一切地方的赤少队中间去。在敌人进攻与苏区剥削分子企图捣乱的情形之下，赤少队保卫地方的责任应该特别的加重，许多地方赤色戒严的松懈现象，应该给与迅速的纠正。动员模范赤少队整连整队的加入红军中去，与动员之后立即重新编制起这些队伍来，是扩大红军最好的方法之一。与红军作战不可分离而起其伟大支队作用的，是新区边区以及白区中间的红色游击队。加强和扩大现有的游击队，最广泛地繁殖新的游击队，收集过去游击战争的丰富经验，极大地加强游击战争的教育与指导，把千百支游击队伸出白区去，伸出到敌人的侧方与后方去，在这些地方袭击敌人，发展群众斗争，创造游击区域，以至发展到创造新苏区，特别在尚未连成一片的各个苏区之间去做这些工作，与主力红军的行动互相配合起来，是苏维埃十分迫切的任务。

应该用一切办法去保障红军的给养，供给与运输，苏维埃的财政机关与经济机关，军事系统中的供给运输与卫生机关，应该为着这个共同目标而努力。运输队的动员，应该克服过去的弱点，使红军不致因缺乏运输员而妨碍了运动与作战。一切牺牲一切努力给予战争，是每个苏维埃人员每个革命分子的责任。

二、在经济建设方面

为着冲破敌人封锁，抵制奸商操纵，保证革命战争的需要，改良苏区民众的生活，苏维埃必须有计划的进行各种必要的与可能的经济建设。

首先是发展苏区广大的农业生产。苏维埃应该用一切方法去提高农民群众的生产热忱。应该乘着春耕夏耕秋收各个重要的农事季节，进行提高生产的普遍而广大的运动，动员整个农村民众一齐进入生产的战线中。普遍组织劳动互助社与耕田队，有计划的调剂乡村劳动力，动员广大妇女群众参加生产，是扩大生产的重要方法。应当领导并帮助农民去解决耕牛农具肥料种子水利以及防止害虫等及农业上面的具体重要的问题。耕牛合作社应当普遍组织。根据去年春耕夏耕运动的经验，"完全消灭荒田"，"增加今年二成收获"，应当成为战斗的口号。应当收集种棉经验，发展棉区的棉花生产。应当发起植树运动，号召农村中每人植树十株。牲畜的增殖，苏维埃应给予注意。某些重要农业部门如粮食棉花等，中央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及各省国民经济部，应当作出具体实施的计划。苏维埃粮食部，粮食调剂局，与群众粮食合作社，应当在工作上密切联系起来，为了完全保证红军与民众的粮食供给而努力。

苏区广大手工业的恢复，军事必需工业的建立，是苏维埃经济建设的重要任务。苏维埃恢复与发展工业的计划，应当放在战争需要，苏区民众需要，以及白区出口的可能基础之上。钨砂，煤，铁，石灰，农具，黄烟，纸，布匹，糖，药材，硝盐，樟脑，木材等项，应当是主要部门。应该用极大的努力去发展对于这些工业的群众的生产合作社，将失业工人，独立劳动者与农民，尽量组织到生产合作社来。同时应该容许并奖励私人资本家的投资，扩

大苏区的这些生产。苏维埃在目前不应当企图垄断所有的生产事业，但创办并发展一些特别需要与特别有利的国有企业，则是可以而且应当的。提高劳动热忱，发展生产竞赛，奖励生产战线上的成绩昭著者，是提高生产的重要方法。

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发展苏区的对外贸易，以苏区多余的生产品（谷米，钨砂，木材，烟，纸等）与白区的工业品（食盐，布匹，洋油等）实行交换，是发展国民经济的枢纽。苏维埃对外贸易局与各种商业机关，必须更加健全起来。同时奖励私人商业，使他们为输出与输入各种必要商品而努力。而普遍的发展消费合作社，把广大工农群众组织在这种合作社内，使群众能够廉价的买进白区必需品，高价的卖出苏区的生产品，则在苏维埃贸易与整个经济建设上都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苏维埃对于消费合作社，中央总社与各省总社的领导，应当极大地加强起来。还没有建立省县总社的地方，应当迅速的建立。

经济建设中资本问题的解决，主要是吸收群众资本，把他们组织在生产的消费的与信用的合作社之内，应该注意信用合作社的发展，使在打倒高利贷资本之后能够成为他的代替物。经过经济建设公债及银行招股存款等方式，把群众资本吸收到建设国家企业，发展对外贸易，与帮助合作社事业等方面来，同样是要紧的办法。应该在苏维埃法律范围以内，尽量鼓励私人资本家的投资，使苏区资本更加活泼。应该尽量发挥苏维埃银行的作用，按照市场需要的原则，发行适当数目的纸币吸收群众的存款，贷款给有利的生产事业，有计划地调剂整个苏区金融，领导群众的合作社与投机商人作斗争，这些都是银行的任务。

三、在苏维埃建设方面

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建立，使全国苏维埃运动得着总的领导机关，对于中国革命有绝大的意义。两年以来，在领导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斗争中间，得到了光荣的伟大的胜利。我们应该指出中央政府在自己的组织上与工作上还存在着许多不健全与不充分的地方。为着加强中央政府对于各苏区与全国革命的总领导，必须使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在工作上划分开来，必须健全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组织与工作，必须充实各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并改善他们的工作方法，必须增设必要的人民委员部即如粮食委员部等，使中央政府在革命形势更加开展的面前，能够充分地发挥他总的发动机作用。

省苏维埃是地方政府最高领导机关，是中央政府与各县区苏维埃之间的连锁，必须极大的加强中央政府对于各个省苏的领导，密切中央政府与各个省苏之间的联系（中央区各省与中央区以外各省），严密检查各个省苏的工作。必须极力改善各个省苏的工作。必须极力改善各个省苏的工作方法，实行集体讨论，精确分工与个人负责的制度。加紧对于各县苏区工作的检查。极力纠正过去有些省苏工作上松懈与不集中的现象。

乡苏市苏是苏维埃的基本组织，因此用极大努力改善乡苏与市苏的工作。必须在一切尚未建立代表会议制度的地方，把这个制度建立起来。必须进一步加强各地代表会议的工作，应该设立他的主席团。应该设立他的许多的委员会，并把委员会制度建立到村里去，吸收大批工农积极分子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应该建立每个代表与一定数目的居民发生关系的制度。应该建立主任制，每个村里要有一个主持全村工作的代表主任，应该准许他能够召集一村的代表与居民去开讨论村中工作的会议。乡苏与市苏是动员群众执行苏维埃工作的直接负责机关，他的工作中心是如何最健全地最充分地动员全市全乡的民众，为着苏维埃的每一任务每一工作的完满实现而斗争。乡苏与市区苏维埃必须把极大的注意力，放到各村各街道的实际

工作上去。必须对于各村与各街道的工作，实行定期检查制度。各村或各街道之间的革命工作竞赛，是争取工作速度的有效方法。乡苏与市区苏维埃切实而迅速的改善，依靠于区苏与市苏正确具体的领导。区苏市苏的注意力应该全部放在各个乡苏各个市区苏维埃的工作改善上面。充分地解释，频繁的巡视，切实的检查，与民众中间的考验，是区苏市苏领导方法的要点。县苏对于区苏工作的考查，也应该以这些为标准。

各省苏必须把自己的注意力极大的投到新开辟的苏区去，把在新区建立并加强革命委员会的工作，看成自己重要的职务。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形式与工作内容，都与市乡苏维埃有许多不同，一切白色区域变为苏维埃区域，经过革命委员会的过程。因此，健全革命委员会的组织与工作，使革命委员会能够负担起来武装民众，发动民众斗争，肃清反动势力，迅速转变到建立苏维埃政权，是各省苏区各新区边区县苏应该极大地注意的。

苏维埃的民主虽然发展了，但应该指出许多地方还是异常不够的。必须严厉地展开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把那些遮塞在苏维埃与民众之间的废物抛开去，这些废物就是官僚主义与命令主义。苏维埃人员应该从对于民众的动员与对于民众的说服去执行苏维埃工作，而不应该用强迫命令的办法去执行苏维埃工作。苏维埃人员应该注意民众的每一要求与每一提议，而不应该忽视这些要求与提议。苏维埃人员特别是工农检查委员会，应吸引广大民众对于存在在苏维埃机关中的不良分子，开展广大的批评斗争，直至用苏维埃法律严厉制裁他们。保证苏维埃与民众中间良好的联系。为了健全苏维埃的成份，必须实行苏维埃选举的群众化。必须向群众解释选举的意义，吸引最广大选民来参加选举。在选举中绝对的屏除那些阶级异己分子，贪污浪费与官僚主义分子。选举大批的工农积极分子，来管理国家工作。在这里，依照选举法的规定，引进大批工人干部，加强工人在苏维埃政权中的领导地位，是健全苏维埃工作的重要关节。为了苏维埃工作的群众化，苏维埃必须与工会，贫农团，女工农妇代表会，合作社及其他一切民众团体发生密切的联系，经过这些团体去动员广大民众，执行苏维埃的工作。

为了争取苏维埃工作的速度与质量，使一切苏维埃工作适合于革命战争的要求，必须用极大的力量除掉苏维埃工作人员中间的松懈不紧张的现象。绝大的提高苏维埃人员的工作热忱，使每个工作人员都自觉的为工农民主专政的国家工作而努力。同时必须森严工作纪律，一切对于工作不积极，疏忽与废弛职务，把苏维埃工作放在不要紧的位置等等的分子，应该向之作严厉斗争，直至开除他们的工作。必须反对贪污浪费现象，因为这种现象，不但是苏维埃财政经济的损失，并且足以腐化苏维埃工作人员，使他们对于工作失去热忱与振奋精神的元素。必须把“一切工作服从战争”“争取工作的速度与质量”的口号，提到全部苏维埃人员的前面去。在这一方面，各级苏维埃的主要负责人，特别是工农检查委员会，应该对于苏维埃工作人员，进行充分说服教育工作。

应该把苏维埃法令政策的彻底与忠实的执行，移在全部苏维埃人员的肩上去，应把违反苏维埃法令政策的行为，首先是苏维埃人员自己的违反放在严厉责罚的地位。

必须充分执行劳动法，把劳动法的每一条文解释给广大工人群众听。八小时工作制的实行，最低工资的规定，是保证工人利益的中心与起码的部分。劳动检查所与劳动法庭，必须使之起完全的作用。必须向着那些忽视工人利益而企图与资本家妥协的人员作坚决的斗争。必须对于失业工人实行具体的与及时的救济，失业救济委员会必须在一切有失业工人的地方组织起来。社会保险制度，必须在一切可能实行的地方真实的实行。必须给予社会保险局的

工作以应有的注意，必须避免过去有些地方对于保险金支配上的错误。为了这些工作的充分执行，应该把苏维埃劳动部健全起来，劳动部与工会之间应该发生密切的关系。

充分的实行土地法，实行关于土地斗争的一切法令，向着全国范围开展广大的土地革命，这是苏维埃中心任务之一。没收地主阶级和大私有者土地的斗争，应该着重地猛烈地使之在一切新收入的苏维埃版图中开展起来。应该收集过去土地分配方法的许多经验，普遍应用到一切新区去。应该把查田运动开展到一切土地问题尚未彻底解决的地方去，把那些地方封建残余势力给以迅速的肃清。土地斗争中正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是保证土地革命彻底胜利的先决条件。

执行苏维埃的文化教育政策，开展苏维埃领土上的文化革命，用共产主义武装工农群众的头脑，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实施义务教育制度，增加革命战争中动员民众的力量，同样是苏维埃的重要任务。

苏维埃制裁剥削分子及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政策，必须坚决执行，国家政治保卫局与苏维埃法庭，必须提高自己的警觉性，对于反苏维埃法令的剥削阶级分子，及一切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实行严厉的制裁与镇压。在这里政治保卫局工作与苏维埃法庭群众化，动员广大群众参加肃反斗争，是非常必要的。

争取苏维埃工作的速度与质量，使一切苏维埃工作，完全适合于革命战争的要求，这是苏维埃工作的总方向。

四、关于领导反帝斗争与白区工作

为了坚决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猛烈的发展全国工农斗争，为了使苏维埃区域扩大到全国去，苏维埃政府必须加强对于全国反帝斗争与国民党区域工农革命斗争的领导。对于这一方面的消极，就是放纵了帝国主义的强盗侵略，就是延长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寿命，就是限制了苏区发展的速度与范围。苏维埃中央政府及各省苏维埃，必须把自己的眼光放大到广大的国民党区域去，不但要领导每一个群众自发的反帝运动，而且要在广大工农群众以及小资产阶级群众中间，利用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投降卖国的每一具体事实，启发群众的民族觉悟与阶级觉悟，号召他们组织与武装起来，为驱逐帝国主义保卫中国领土而斗争，特别在东三省，热河，察哈尔，华北等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地带，组织人民革命军义勇军，领导旧有的义勇军，使之脱离国民党的反动影响，而与日本帝国主义坚决的作战。苏维埃政府对于工人的每一反帝罢工，农民以及小资产阶级每一反帝斗争，必须尽可能的给予精神上与物质上的帮助。

对于国民党区域工人反资产阶级的斗争，农民反地主的斗争，一切革命民众反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群众斗争，苏维埃政府必须用一切办法去组织，去援助，去领导。一切苏维埃人员应该明白，要想把苏维埃运动发展到全国去，要想把比较苏区庞大若干倍的国民党区域造成转变为苏区的条件，要想创造新苏区，要想在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大规模的“围剿”中间能够得到白区群众的援助，必须把极大的注意放到白区去。必须从苏区派遣人员，准备一切必须的物质帮助，去组织与领导白区群众斗争。对于这一方面的消极，就是对于扩大苏区与发展革命战争的消极。特别是苏区附近的国民党区域，这些地方的群众受苏维埃的影响最大，受国民党军事奴役食盐公卖等等的压迫最甚。苏维埃尤其是各个省苏及边县苏区政府，必须利用各种时机取得与这些群众的联系，组织他们的日常斗争，发展到游击战争，到群众

暴动，到建立苏区与老苏区联结一片。在这里苏区与白区交界地带的工作，应该看得非常之重要。在这些地带苏维埃（或革命委员会）与游击队，必须完全遵守苏维埃的基本政策，禁止一切不分阶级乱打土豪的行为。没收地主阶级及反动派的财物，必须大量的发给当地群众。此外关于赤白对立问题，逃跑群众问题，食盐封锁问题，被难群众问题等，必须根据阶级的与群众路线，很好的给予解决。必须把造成赤白对立与群众逃跑的原因除掉了去。交界地带工作的改善，是争取白区变为苏区的重要关节。

同志们！我们苏维埃和红军，正在担负着挽救中国民族死亡的重大责任，我们要完成这个责任，就必须完成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所指出和规定的任务。同时，同志们都知道，中国苏维埃革命的胜利，不仅是四万万中国民众的解放，而且是整个东方被压迫民族脱离帝国主义锁链的先导，是给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在太平洋上爆发世界帝国主义大战的计划一个致命的打击，是使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从东方战线上进攻苏联的计划受到摧毁，是使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时期大大的缩短逼近，我们的任务是何等的光荣和伟大！

同志们！努力！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演讲完，随着雷鸣一样的掌声，全体代表起立，欢迎毛泽东同志，欢唱国际歌）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一九三四年一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

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谨向全世界与中国的劳动群众宣布它在全中国所要实现的基本任务，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大纲。这些任务，在现在的苏维埃区域内已经开始实现。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认为，这些任务的完成，只有在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在全中国的统治，在全中国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统治之后。而且在那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大纲才能更具体化，而成为详细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谨号召全中国的工农劳动群众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指导之下，为这些基本任务在全中国的实现而斗争。

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基本法（宪法）的任务，在于保证苏维埃区域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和达到它在全中国的胜利。这个专政的目的，是在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势力，统一中国，有系统的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苏维埃的经济建设，提高无产阶级的团结力与觉悟程度，团结广大贫农群众在它的周围，同中农巩固的联合，以转变到无产阶级的专政。

二，中华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国家。苏维埃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色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在苏维埃政权下，所有工人农民红色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只有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的分子是没有选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的。

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最高政权为全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大会闭会的期间，全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下组织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政务，发布一切法令和决议案。

四，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工人农民红色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汉满蒙回藏苗黎和在中国的台湾，高丽，安南人等）宗教，在苏维埃法律前一律平等，皆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公民。为使工农兵劳苦民众真正掌握着自己的政权，苏维埃选举法特规定，凡上述苏维埃公民在十六岁以上皆享有苏维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直接派代表参加各级工农兵苏维埃的大会，讨论和决定一切国家的地方的政治事务。代表产生方法是以产业工人的工厂和手工业工人农民城市贫民所居住的区域为选举单位，这种基本单位选出的地方苏维埃代表有一定的任期，参加城市或乡村苏维埃各种组织和委员会中的工作，这种代表须按期向其选举人做报告，选举人无论何时皆有撤回被选举人及重新选举代表的权利，为着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广大的农民与劳苦群众走向社会主义，中华苏维埃政权在选举时，给予无产阶级以特别的权利，增加无产阶级代表的比例名额。

五，中华苏维埃政权以彻底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为目的，制定劳动法，宣布八小时工作制，规定最低限度的工资标准，创立社会保险制度，与国家的失业津贴，并宣布工人有

监督生产之权。

六，中华苏维埃政权以消灭封建剥削及彻底的改善农民生活为目的，颁布土地法，主张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雇农、贫农、中农，并以实现土地国有为目的。

七，中华苏维埃政权，以保障工农利益，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更使劳动群众脱离资本主义的剥削，走向社会主义制度去为目的，宣布取消一切反革命统治时代的苛捐杂税，征收统一的累进税，严厉镇压一切中外资本家的怠工和破坏阴谋，采取一切有利于工农群众并为工农群众了解的走向社会主义去的经济政策。

八，中华苏维埃政权以彻底的将中国从帝国主义压榨之下解放出来为目的，宣布中国民族的完全自由与独立，不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的政治上、经济上的一切特权，宣布一切与反革命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无效，否认反革命政府的一切外债，在苏维埃领域内，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绝不容许驻扎，帝国主义的租界租借地无条件的收回，帝国主义手中的银行，海关，铁路，口业，矿山，工厂等，一律收回国有，在目前可允许外国企业重新订立租借条约继续生产，但必须遵守苏维埃政府的一切法令。

九，中华苏维埃政权以极力发展和保障工农革命在全中国胜利为目的，坚决拥护和参加革命战争为一切劳苦民众的责任，特制定普遍的兵役义务，由志愿兵役制过渡到义务兵役制，惟手执武器参加革命战争的权利，只能属于工农劳苦民众。苏维埃政权下，反革命与一切剥削者的武装，必须全部解除。

十，中华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为目的。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民主，主张工人农民的民主，打破地主资产阶级经济的和政治的权力，以除去反动社会束缚劳动者和农民自由的一切障碍，并用群众政权的力量，取得印刷机关（报馆印刷所等），开会场所，及一切必要的设备，给予工农劳苦民众，以保障他们取得这些自由的物质基础。同时反革命的一切宣传和活动，一切剥削者的政治自由，在苏维埃政权下，都绝对禁止。

十一，中华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彻底的实行妇女解放为目的，承认婚姻自由，实行各种保护妇女的办法，使妇女能够从事实上逐渐得到脱离家务束缚的物质基础，而参加全社会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生活。

十二，中华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革命战争许可的范围内，应开始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首先应在青年劳动群众中施行。应该保障青年劳动群众的一切权利，积极的引导他们参加政治的和文化的革命生活，以发展新的社会力量。

十三，中华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真正的信教自由为目的，绝对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一切宗教不能得到苏维埃国家的任何保护和供给费用。一切苏维埃公民有反宗教宣传之自由，帝国主义的教会只有在服从苏维埃法律时才能许其存在。

十四，中华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国的地域内，他们有完全自决权：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中国苏维埃政权在现在要努力帮助这些弱小民族脱离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王公喇嘛土司等的压迫统治而得到完全自主。苏维埃政权，更要在这些民族中发展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言语。

十五，中华苏维埃政权对于凡因革命行动而受到反动统治迫害的中国民族以及世界的革命战士，给予托庇于苏维埃区域的权利，并帮助和领导他们重新恢复斗争的力量，一直达到革命的胜利。

十六，中华苏维埃政权对于居住苏维埃区域内从事劳动的外国人，一律使其享有苏维埃法律所规定的一切政治上的权利。

十七，中华苏维埃政权宣告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是与它站在一条革命战线上，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苏联，是它的巩固的联盟者。

（原载《红色中华》，1934年2月14日出版）

中央关于国际十三次全会提纲的决定

（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二日）

中共中央讨论了十三次全会的提纲（"法西主义战争危险与各国共产党的任务"）以后，一致地完全同意全会对于国际及中国情势的分析与它所提出的党的任务，并有以下的决定：

（一）责成一切党的组织直至支部为止，仔细的讨论与研究十三次全会的提纲。在讨论时，不仅应该在理论上明确与清晰的解释迫近革命与战争新周期的国际形势及全会后国际工人革命斗争的伟大事变（奥国暴动，巴黎总罢工与示威等等）的意义，并且应该最密切地联系解释到在革命、战争与干涉中的中国革命形势与党的任务，特别是检查党的决议，首先中央五次全会的决议的执行程度，并定出每一个组织自己的最近时期的行动与工作计划——在白区的党的组织首先是五中全会所指出的工会与群众工作的计划，苏区的党则是：战争动员（包括扩大红军，发展游击战争，健全与加强赤少队等等）与加强苏维埃工作的计划。

（二）由于法西主义在中国的增长及其欺骗群众的武断宣传之加强（"新生活运动"等等），必须加强思想上与行动上反对法西主义的斗争：

甲，在反对法西主义的思想斗争方面，必须：

1．经常的具体的揭露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法西斯蒂的利用"民族主义"的武断宣传，而实行卖国辱国与替帝国主义侵略作清道夫的面目，揭破"中国实力不如人""以礼义廉耻之提倡为复兴民族之武器"及清洁整齐朴素等原则的"新生活运动"之实际的意义：就是在帝国主义疯狂的侵略面前散布失败主义，企图使广大的群众离开真实的抵抗帝国主义侵略，拯救中国的道路，——武装民众民族战争的道路；而培养封建的复古的奴隶道德，替帝国主义的侵略者准备顺从的殖民地奴隶。着重地"在群众面前揭破法西斯蒂，既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是一个新制度的支持者，而是资本的奴仆和走狗，"特别是中国法西斯蒂是中国地主资产阶级中最反动的派别，是帝国主义手中最忠实的工具和奴仆，它已经把而且更加要把中国及中国的劳苦群众引导到饥饿死亡惨酷的殖民地被压迫剥削的奴隶地位。

2．必须明确的说明中国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各派（南京、广东、北平）政权实质上都已经是法西主义的专政，他们之间冲突只不过是关于法西斯蒂专政的方式与方法的争论与反映各个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国民党整个地在法西斯蒂化，同时在国民党之中又形成公开的法西斯蒂的一派，这派正在争取整个国民党"蜕变"为法西斯党来实行全国的完全的公开的法西斯蒂专政。把法西斯蒂与国民党对立起来，将是极大的错误，虽然国民党内有一些派系（如广东）在口头上反对法西斯蒂，而实际政策上将用与南京一样的法西斯蒂的方针，至于反对国民党的派别（社会民主党，AB团，生产大众党，托洛茨基派等）则在第三条道路的找寻的烟幕之下欺骗群众，替法西斯蒂清除道路。只有工人阶级及在其领导下的农民与一切劳动者的坚决的革命斗争，只有苏维埃的发展与胜利才能推翻崩溃中的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从沉重的危机中拯救中国。

3．必须揭露中国法西斯蒂反对苏联的战争挑衅宣传，及欢迎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舆论制造的每一步骤，指出卖国的法西斯蒂是强盗战争的欢迎者与反苏战争中帝国主义的走卒。并在这基础上，加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及反苏联战争的革命工作。

乙，在反对法西斯蒂专政与恐怖方面必须：

1．对于法西斯蒂的每一个恐怖行动（如"群众的逮捕"，工厂学校的"围剿"，捣毁革命的及一般左倾的组织与文化机关，文化统制等等），必须在下层统一战线的基础上组织群众的反抗运动，及动员群众组织革命的武装自卫，保护革命的组织，反对白色恐怖，争取一切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罢工之自由。这种下层统一战线，必须在反法西主义斗争的一切形式中实现起来，尤其在工厂之中；必须记住工厂是反法西斯蒂斗争的堡垒。

2．一切法西斯蒂的群众组织及他们所召集群众会议，我们必须打进去，在里面进行革命工作与宣传煽动。这在法西斯蒂目前在许多地方召集新生活运动大会及组织新生活促进会之类的组织时，尤其重要。但是不应该号召群众去参加这种法西斯蒂的大会或团体。在法西斯蒂控制下的各种工人组织中，去进行坚持的革命工作，组织这些工会中的革命反对派，是绝对必须的。

3．由于法西斯蒂的特别注意士兵团丁警察，及他们正在组织其新的部队与集中大部分军事力量进攻苏区与红军时，十分增长了我们在士兵群众工作的意义，中央责成各级党部及红军中的政治部加强在白军中的积极活动，改善我们在白军中的宣传鼓动工作，坚持地进行瓦解白军的活动。

4．由于法西斯蒂正在伸其魔手侵入苏区的边境，屠杀革命的群众，进行一切破坏苏区的反革命阴谋与奸细动作，苏区的党及红军中的政治机关，除了加强揭露法西斯蒂的凶残与发动群众的反抗运动外，必须严厉镇压一切法西斯蒂的便衣队、敢死队、暗杀队的活动，以巩固苏区与保证革命战争的胜利。

5．必须将反对法西斯蒂的斗争与反对五次"围剿"、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联结起来，指出法西斯蒂为着完成清道夫作用，正在以全力进攻苏区为其中心的任务。中国民众的民族与社会的彻底解放的唯一的道路，是苏维埃的道路。必须根据二次苏大会的材料，具体的指示给中国的劳苦群众看：苏维埃政权已经给了劳苦群众些什么，及它将给他们些什么东西，来动员广大的群众拥护苏维埃与红军，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围剿"，争取苏维埃道路的胜利。

（三）关于党面前其他的政治任务，群众工作，与党本身的巩固方面，中央认为五中全会已明确与详细的指出了。中央要求全党的同志，最坚决地将这些任务在实际工作中实现起来，这就是最忠实地为着国际路线而斗争！

为着实现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做了什么和将做些什么?

——一九三四年七月八日博古同志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演讲会上的演说——

同志们！我今天的报告，是要把三年以来，党在组织民族革命战争方面的工作，做一个总结，和说明党在这方面所规定的最紧迫的任务是什么。

这个总结是非常必要的，这因为：(一)目前我们正处在日本帝国主义新的大举进攻的面前，处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新阶段面前，处在中国民族危机新阶段的面前。这个紧张的情况，要求我们仔细的检查过去整个时期中在这方面的工作，它的成绩和缺点，并由此决定我们新的任务。(二)因为正是在这方面，亦能够清楚的看出四中全会以来，党在中央的领导之下，在自己的布尔塞维克化方面的进步；党不仅能够正确的提出总的路线与总的口号，而且能用具体的灵活的战术的方法，使群众在自己的政治经验上相信党的口号，使党的口号成为广大群众的口号，以保证党的基本路线之实现。我们应当具体的说明党的这一进步，这对于我们党——首先是年青的新党员有极大的教育的意义。(三)因为反帝问题，是党与一切反革命派斗争最尖锐的一方面，在这个问题上，党用自己的无产阶级的政策，反对改良主义的和国民党的狭隘民族主义的武断宣传，并在这方面取得巨大的胜利。党在残酷与艰苦的斗争之中，在思想上、理论上大大的增长了。总结在这方面我们几年来的经验，将能更加尖利我们反对一切反革命派别的思想上、理论上的武器。

一　党在反帝问题上的基本方针、口号和战略原则

试问：在中国革命发展的现阶段上，党的基本方针、党的总的政治路线是什么？

党的基本方针，即在于尽量发展苏区与非苏区的群众革命斗争，把全国的革命斗争统一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而适时地配合起来，率领它们为推翻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地主的统治，为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而斗争。这就是党的总的政治路线。

但仅有着总的路线是不够的，因为如果没有根据着这一方针而定出的明显的具体的口号，就不能组织与号召群众，发展革命斗争。我们党不仅有了上述的方针，并且定出了动员群众的三个基本口号：

(一)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保卫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

(二)推翻卖国、辱国的国民党政府，是胜利的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先决条件；

(三)只有中国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才能彻底进行与领导最广大的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并达到完全的民族解放。

从“九一八”以来，一直到现在，党的动员群众的基本口号就是这三个。

但是，仅仅有了口号，还不能组织胜利的伟大的民众革命，要达到这一目的，还必须使党的口号变为群众的口号。使党的口号变为群众的口号，是布尔塞维克战略原则的第一个。

斯大林同志在“十月革命与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一文中说：

“如果这个革命是一个真正民众的，含有广大群众的革命，那末，它的胜利，只靠一个党的正确口号是不够的。还需要有一个必须的条件，才能使革命真正获得胜利，这就是说：必须要群众根据自己的经验，去相信这些口号之正确。只有那时候，党的口号才能成为群众的口号，只有到那时，革命才成为真正的民众的革命。布尔塞维克在十月革命准备期中，其策略上的一个特点就是：它能正确的决定那种路线和关键，能很自然的使群众跟着党的口号走去，使他们能根据其本身的经验，很自觉的去了解和承认这种口号的正确。换句话说：布尔塞维克策略上的另一特点就是，它能把党的领导和群众的领导不相混淆，它很了解第一种领导和第二种领导的基本区别”(“列宁主义问题”第三五页)。

党在中央的领导之下，是依据着斯大林同志的这一指示而工作的。三年来党在反帝运动方面的努力，正是在用一切方法使党的口号由群众根据自己的经验来相信是唯一的正确的口号，借以保证革命发展成为伟大的民众革命。

当我们总结过去的工作时，第一个出发点就是、而且应当是：党在把党的口号变为群众的口号上，怎样做了工作，并得到了些什么？

党的战略的第二个原则，也是布尔塞维克在十月革命中取得胜利的先决条件，就在孤立妥协的改良的政党。

斯大林同志告诉我们说：

“列宁主义战略上根本规律，就是在承认：

一、在革命将获最终胜利的时期中，最危险的革命底敌人的社会柱石就是妥协的政党。

二、要推翻我们的敌人（沙皇及资产阶级），首先必须设法使这些政党陷于孤立。

三、在革命准备期中，我们的枪锋，应注射在这些政党上面，首先必须把它们孤立并和劳动群众隔离”(同上二十八页)。

斯大林同志所指出的这一原则，也就是党在三年以来所采取为领导的战略原则的。

在这方面要指出：在三年来的斗争中，我们在抗日救国的问题上，不仅是要与一切反革命派别血战，而且在朝的国民党统治，虽然实质上最无耻的投降与出卖中国，然而口头上自始至终想用种种方法企图表示它是要“抗日救国”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妥协的改良主义政党的口号纲领，正是从国民党武器库中拿出来的。因此，要揭露妥协的改良主义的派别，必须揭露国民党一切无耻的武断的宣传。

党在三年来的工作中，还有第三个中心的领导的原则，即是尖锐的把苏维埃与国民党对立起来，把这两个不同的政权，不同的制度，对立起来。在群众中竭力提高苏维埃与红军的威信。

党在三年的斗争中的领导的战略原则就是这三个。

二　党在三年来怎样在实际工作中实现了这些基本原则？

党在反帝斗争中的工作，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到今天，可以分作四个阶段来说，这四个阶段就是：一、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底南京大示威为止；二、上海

"一二八"战争起，经过李顿调查团来华，到一九三三年春一月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红军发表对日作战统一战线的三个条件的宣言止；三、人民革命政府的产生到它的破产；四、目前阶段——即日本新的进攻与民族危机的新阶段。

第一阶段——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到南京的枪杀。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直接在"九一八"事变影响之下，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惊醒了广大的中国民众，唤起了他们的民族的自觉。千百万的群众是卷入于反日斗争的热潮之中来了，这是每一个真正的民众革命的先决条件．但是，同时这种最广大的群众的民族的醒悟，在最初的阶段上，亦必然的将一些偏见、幻想、迷惘，带到运动中间来。列宁曾经说过：

"一切种种被压迫者，不满意者的群众斗争之爆发，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和落后的工人必然会参加这个斗争——非有他们的参加不能有群众的斗争，不能有任何的革命——而且同样必然会把他们自己的偏见，自己的反动的幻想，自己的弱点与错误带到运动中来"（列宁："关于民族自决辩论的总结"）。

"九一八"以后的情况正是这样。广大的群众是觉醒了，运动的范围是扩大了，但是整个运动还缺乏明确的纲领和口号。一切党派都用各种各色的方法，来争取群众，各种各样的、众口纷纭的、五光十色的口号、纲领、宣言在战斗着，国民党、"国家主义派"、"社会与教育派"、"新月派"……以至托陈取消派，都提出了自己的口号与纲领。这一时期，是各种党派、各种口号、各种纲领斗争最剧烈的时候。一切反革命的在野党派："国家主义派"、"社会与教育派"、"新月派"……一直到托陈取消派，虽然有五花八门的面目，但是它们同有两个基本口号：(一)要求国民党南京政府对日宣战；(二)要求取消一党专政，容纳各反革命党派参加政权——这个要求的具体口号，就是所谓"组织国防政府应付国难"。

当全国民众对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极度愤恨的时候，国民党的基本方针，就是把一切罪恶推到张学良的身上。国民党把自己与张学良分开来。为要竭力表示不抵抗的只是张学良而不是国民党，所以国民党与一切反革命派别一起，鼓吹"要求国民党对日宣战"的口号，同时它提出"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口号来对付一切在野的、反革命党派的"国防政府"口号。国民党一方面竭力维持群众中对它的幻想，另一方面则团结一切反革命党派，首先是团结国民党内部力量，来抵抗广大群众的民族觉醒。

在这样的极其复杂的环境之下，我们党的方针和具体方法是怎样的呢？

党抱着下列三个基本方针：

(一)坚决的揭破一切反革命党派的各种口号，在群众中广大的传布与通俗化党的基本口号（即前述的三个基本口号）。并经过各种过渡的口号，使群众在自己的切身的经验上，确认党的口号是唯一的正确的口号。党把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来反对国民党及一切反革命派别的要求国民党对日宣战。党并提出各种辅助的口号"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罢工之完全自由"，"织组义勇军要求发枪并夺取枪械"，"织组反日的罢工、罢课、示威游行"等等，并且根据每一个事实证明整个国民党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清道夫，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是国民党政策的典范，并使群众能依据自己的切身经验而证实这一点。党揭破"国防政府"是卖国的、屠杀群众的口号，把苏维埃的口号与"国防政府"的口号对立起来。

(二)紧抓着群众中的民族觉醒，清楚的估计到群众中存在着的弱点、偏见与幻想，不是简单的站在群众运动之外去批评这些弱点、偏见和幻想，不是仅限于文字的、口头的揭露反革命派的口号，而是一方面最明确的指出，要求国民党对日宣战的口号之幻想与反动，另一方面尽

量发动群众,不是在纸头上、电文上，而是以群众的行动,广大群众的请愿与示威，要求国民党实行对日宣战,借以使群众在自己的切身经验上了解国民党是不会对日宣战的,借以消除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并揭露在野反革命派别之真正的政治面目。

(三)迅速团集革命的力量，形成全国革命运动领导的中心与骨干。党加速建立全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就在一九三一年十月革命纪念节,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举行了，颁布了革命的政纲,成立临时中央苏维埃政府。党把苏维埃的革命政纲,与国民党的反革命政纲对立起来。并在这个革命政纲的周围团集全国的革命力量。

党所进行的具体步骤是:一、利用广大群众民族觉醒的苗长中，国民党失掉控制力量的间隙,尽量争取半公开的地位,用一切可能的公开与半公开的方法,如集会、刊物、群众示威等,进行广大的宣传。二、把反革命派所召集的群众大会的领导权，夺取到我们的手里，把大会变为革命的集会;上海九月二十六日的群众大会，就是最好的例子。三、发动群众向国民党南京政府进行示威与请愿,夺取这些群众示威请愿的领导权在自己的手里。四、最广泛的组织群众的反日团体(反日会、后援会等)及义勇军的组织,发动一切形式的群众抗日运动,抵货、罢课、罢工、示威等等。

党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在这个阶段上得到什么结果呢?

九月二十六日的上海群众大会,我们在这大会上夺取了领导权,把反革命派所召集的大会变为革命的大示威。十一月三日、五日,党所领导的两次上海闸北示威中,国民党开始撕破它的"对日宣战"的假面具,公安局五区下令开枪屠杀向国民党请求对日宣战的群众。广州在十一月十日发生同样的惨杀。但国民党仍用撤换公安局长职务的办法,来维持群众中对它的幻想,装出模样,好像下令枪杀的只是公安局长,而不是国民党,好像国民党还是准备对日作战;我们党于是集中火力,把运动推向国民党的中央机关去，动员了广大的学生群众，到南京请愿和示威。直到北大南下示威团到南京后，国民党南京政府对于示威和请愿的学生,实行大批屠杀。国民党已经不能容忍群众的民族觉醒,下令禁止一切反日罢工示威等,连到南京请愿对日宣战也被禁止。国民党公开的说,"对日宣战”是政府的事,民众不得过问。这时候国民党迫得不能不取消"对日宣战”的口号,而改用所谓"长期抵抗”的口号。国民党不能不暴露自己帝国主义走狗的面目，以血的镇压来对付群众抗日运动。

这样,一方面,国民党"对日作战”的欺骗被拆穿了,群众在自己的经验上认识了国民党的卖国贼的作用,另一方面，群众的反日运动开展起来，并且这个运动带着直接反对国民党的性质,群众的反日组织是形成和巩固了起来,而十一月七日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成立，更把苏维埃与国民党的原则的对立尖锐显示了出来。

第一阶段的情形，就是如此。

第二阶段——“一二八”到中央苏维埃政府与红军的抗日作战协定三个条件的宣言。

南京屠杀之后,党继续开展反帝反国民党的斗争,组织反对南京政府屠杀群众的行动。在上海,这一斗争得到“抬棺示威”的名字。党在上海领导群众把在南京被惨杀的杨姓学生的棺柩抬着游行,组织了几年来所从未有过的几万人的大示威,示威的行列通过许多上海最重要区域与街道。这时候运动是扩大了,但运动有自己的弱点,就是还没有吸引更多的工厂工人来参加运动,无产阶级的骨干还是比较的弱。党立即就注意到工厂中的工作,使这一运动不仅有无产阶级的路线,而且有无产阶级的组织的骨干。党组织了沪西的同兴、日华等日本纱厂的罢工，并把它扩大成为全沪西以至全上海的日本纱厂总罢工。这一目的，在上海战争尚未爆发的前

夜，就达到了。这一伟大的日本纱厂同盟罢工，革命化了整个上海的环境，使帝国主义在赤色的上海面前恐怖起来，因而决意采用直接武装占领的方法，来与革命的上海工人与上海民众作战。同时，亦因为上海工人的英勇斗争及群众的反日运动的高涨，使十九路军士兵受到革命的影响。由于这些情形，爆发了"一二八"上海战争。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晚十时，国民党已经完全答应了帝国主义的一切要求，十九路军军阀下令军队撤退淞沪，把上海让给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并且封闭民众反日会，禁止一切反日运动，镇压反日罢工，自己担负起反对上海反日运动的清道夫的使命。我们现在所有的材料，已经完全可以证明，上海战争中最初抵抗的是工人义勇军。工人群众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引起了十九路军士兵的自动参加，大家知道，当"一二八"战争爆发的时候，十九路军已大部退出上海，留在上海的只有一团人。战争爆发后，因为十九路军士兵要求抗日，十九路军军阀最初只肯每团抽一些人去作战。但是十九路军士兵违抗了他们官长的意志，全部参加了抗日战争。工人义勇军与十九路军士兵，把这个英勇的抗日战争支持了一月零四天。

国民党采取了一切办法，来迅速的结束战争，他们准备收缴十九路军士兵的枪械，最后更用机关枪扫射不肯撤退的十九路军士兵。一切反革命党派，重新提出了他们的已经破产了的"要求南京政府对日宣战"的口号。

我们的党做了什么呢？我们告诉全国民众，怎样能够取得上海战争的胜利。党在二月二十六日，即是上海战争的炮火最激烈的时候，拿上述一标题发表了宣言。宣言说：

"要取得民族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必须推翻国民党军阀的这一领导，把领导权拿在民众自己手里。

因此，我们主张：

(一)十九路军士兵立刻不顾一切长官的命令，追击日军到租界内，消灭日军的根据地，坚决反对'退却'、'停战'把上海交给任何帝国主义。

(二)民众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一切压迫，自动启封一切革命团体，大批的武装工人与一切劳苦群众，组织民众的义勇军与游击队，保护自己的革命组织，并参加前线作战。

(三)革命的士兵，立刻组织士兵委员会，直接接收与分配民众的捐款与慰劳品（当十九路军士兵在上海抗日作战时，一个多月中共收到民众捐款与慰劳品数千万元，大多数被军官吞没——博注)，监视与逮捕一切不抵抗的长官，并且加入民众的革命组织。

(四)武装的工人、农民、兵士，立刻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这一民族革命战争。

(五)革命军事委员会立刻没收一切日本帝国主义银行、工厂、商店与交通工具，拿来作为民族革命战争的用途，并且以同样的办法对付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其他帝国主义和中国资本家。

(六)革命军事委员会立刻腾出一切公共房屋给失业工人与灾民居住，没收一切日本帝国主义的建筑物交给工人与灾民的组织；从大资本家、大商人大批的征发粮食与衣被，分配给失业工人与灾民；没收一切帝国主义走狗与投机资本家的财产；立刻宣布八小时工作制与社会保险，改良失业工人的生活，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

(七)由革命军事委员会召集工农兵以及一切劳苦的民众的代表会议，把政权交给民众自己的政府。

我们以为只有这些具体办法的实现，才能把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拿在我们的手里，而不为国民党军阀所出卖。也只有这样，民族革命战争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

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在上海战争中，党提出了最彻底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纲领，提出了要取得上海战争的胜利的革命的办法：这是实现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最具体的行动纲领。

但是，我们党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主要的弱点，这就是，党没有能把上海战争的军事上的领导权夺取在自己手里，一直到战争结束，军事上的领导权是在十九路军军阀的手里的。我们的这一弱点，一方面使国民党能够出卖上海战争，另一方面使国民党及十九路军军阀能把自己描写成为"民族英雄"。这就使得：

一、国民党能在"一二八"后再行欺骗群众，似乎国民党中至少还有十九路军那么一派不是不抵抗的。国民党利用了这一政治资本，就提出"抗日必先剿共"的口号。国民党卖淫妇汪精卫之流，把上海战争失败的责任推到苏维埃与红军身上，说上海战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红军"捣乱后方"，使国民党"不能调兵援助十九路军"。为了增加这种武断宣传的政治资本起见，国民党尽量利用一些所谓"民族英雄"，除了蒋光鼐、蔡廷楷等以外，还把出卖满洲义勇军的马占山、苏炳文等抬出来。蒋介石把马占山、苏炳文等请到江西来"参观匪区惨状"，叫他们回去宣传，说"江西的共祸，比满洲的亡国还要凄惨"等等。

二、国民党散布对国际联盟与美国的幻想，说"世界公理尚存"，要群众去等待美国与国联来主持公道。党的弱点，使得党在"一二八"战争以后，要用极大的努力，长期的工作，才能把国民党的欺骗完全揭露。

"一二八"战争之后，群众已经知道国民党的投降出卖，但是他们还没有确信苏维埃与红军真正抗日。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党的方针应当是三个：第一个基本方针就是最明显的表示苏维埃与红军是决心准备抗日的，揭破国民党"红军捣乱后方"的欺骗。

正当国民党说红军妨害抗日的时候，苏维埃中央政府于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五日发表了对日宣战宣言和动员令。宣言中说：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国民族彻底解放和独立。苏维埃中央政府向全国工农兵及一切被压迫民众宣言：要真正实行民族革命战争，直接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必须首先推翻帮助帝国主义压迫民族革命运动、阻碍民族革命战争发展的国民党反动统治，才能直接的、毫无障碍的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才能使民族革命战争，在全国大大的发展起来"。

国民党把淞沪变为共管区域，而苏维埃政府宣布对日作战下动员令。在动员令中，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红军、地方部队与赤卫军，全体准备随时出动，全国苏区准备一切力量来发展民族革命战争。

苏维埃中央政府的这一行动，相当的揭露了国民党的"抗日必先剿共"的武断宣传，但还未能把它完全揭露。因此国民党尚能在"抗日必先剿共"的口号之下，进行四次"围剿"。

为着更进一步揭露国民党的武断宣传和表示苏维埃红军的抗日决心，在黄狮渡战斗胜利，四次"围剿"开始粉碎的时候，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山海关的时候，中央苏维埃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于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发表第二次宣言，这就是最著名的在三个条件之下订立抗日作战协定的宣言。宣言说：

"国民党政府及其政客，解释他们的罪恶行为卖国勾当的理由之一，就是说：中国苏维埃的

存在，使他们不能动员一切力量来进行国防，使蒋介石不愿意与日本军阀作战，而用将近一百万的大军，去进攻已经创立了自己的苏维埃政府的中国工农。

“但是中国民众愿意自己保卫自己，许多部队与几十万的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反对屠杀自己的兄弟姊妹，赞成武装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他们开始了解，只有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能够胜利的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苏维埃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斥国民党的解释是愚笨的谎话，他们想用这些愚笨的谎话，在全国民众的面前掩盖自己的卖国行为。

“中华苏维埃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再一次提醒中国民众，我们在去年四月已经号召全国民众与我们一起共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而蒋介石对于这个号召的回答，是动员一切军队进攻中国工农政府与工农红军，而不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

“中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中国民众面前宣言：在下列条件之下，中国工农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一)立即停止进攻苏区。

“(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

“(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

这一宣言，是反帝、反国民党最主要的文件之一。它揭破了国民党的“红军捣乱后方”的谎话与造谣，使国民党军阀处在最困难的地位中。这一宣言的影响，如此之大，使得国民党政客丁文江之流也来讨论这一宣言。丁文江做了一篇文章，叫做“假使我是蒋介石”，在这篇文章里，他说，假使他是蒋介石的话，他就要与红军订立抗日作战协定了。帝国主义的报纸，也把这一宣言登载出来，并且认为这是中国的重大事变。宣言惹起国民党下层党员的不满，质问国民党中央，为什么不与红军联合抗日 以致于汪精卫不得不在国民党中央常会上含糊的狡猾的回答道：“我们当中有许多人质问，为什么本党中央不与红军订立抗日作战协定呢？这个问题是太幼稚了”。最后，这个宣言瓦解了“围剿”苏区的部队的军心，直接帮助我们彻底粉碎四次“围剿”。在士兵群众要求北上抗日，不愿与红军作战的情绪的压力之下，许多中下级白军军官要求北上抗日，离开江西，甚至蒋介石的最忠实的走狗陈诚也惧怕因士兵反日情绪与对苏维埃红军的同情之增大，而在与红军作战时遭受更大的损失，被迫向蒋介石提出北上的要求。这使蒋介石再不能容忍下去，不得不公开下令说“侈言抗日者，立斩无赦”。

这样，我们就把国民党“抗日必先剿共”的政治资本，完全夺去，把国民党的卖国贼脸，赤裸裸的在广大群众面前揭穿。

为要掩饰自己的投降出卖，国民党用一切力量企图证明“中国无力抗日”。借此在群众中散布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失败情绪。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卖淫妇汪精卫做这样的演说：“要有抵抗的能力，要充实抵抗的能力，必须从政治上、社会上想种种方法去充实国民的生产力，然后再想种种方法，使国民的生产力能应用于武力……”换句话说，中国现在没有力量抗日，要抗日必须等“建设”后才有办法，所以现在只好让日本向中国进攻，只好步步投降，步步屈服。他的这些话，不过是想把国民党的一切卖国行为，以及将来更大的无限制的卖国行为，解说成为合理的行为，但国民党已经被迫得不能不公开承认，它完全不是什么民族英雄，它迫得承认，它是向日本帝国主义步步投降，步步屈服，而且是反对抗日的。

党除了上述的第一个方针以外，还有第二个基本方针，这就是建立广大的民众的反日统一战线的方针。群众已经对国民党不满，但还没有完全的相信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最广泛

的团结群众，在斗争中提高群众的觉悟。党在这时候与左倾的关门主义作斗争，因为左倾的关门主义，把那尚没有相信和拥护苏维埃的、而真心愿意反日的群众，当作反动的看待。党同时也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这种右倾机会主义不愿提高群众的革命觉悟，不愿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把我们变成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尾巴。党在许多文件中提出统一战线的问题，在去年九月党中央给满洲省委的信中，指出了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与策略方针：

"在满洲群众运动现在发展阶段上，我们的总策略方针，一方面，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另一方面，准备进一步的阶级分化及统一战线内部阶级斗争的基础，准备满洲苏维埃革命胜利的前途"（"斗争"十九期）。

在这封信上，中央指出了统一战线的四个基本原则：

"第一，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坚持和保存自己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即无产阶级政党自由的和不留情的批评，和揭穿统一战线内同体中的一切不彻底、动摇、叛变、变节、投降的企图和事实。

"第二，在实际执行统一战线的策略时，必须具体的、注意的计算到客观的环境和主观的因素，须分别的对付各种不同的对象。

"第三，必须牢记着：下层统一战线，必须是我们活动的基础，任何的上层统一战线，都只有在我们能够抓紧巩固的下层统一战线，和上层处于下层革命情绪的威胁下的时候，才可能和有用。

"第四，不保证反帝运动有无产阶级的骨干，没有无产阶级广大的群众革命组织（赤色工会、罢工委员会、反日会、工人纠察队、工人义勇军），就不必想在无产阶级的周围来实行真正革命的统一战线，或使之有利于无产阶级，也不必想夺得无产阶级的领导"（同上）。

党在这四个原则的基础上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苏维埃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关于三个条件的宣言，亦是根据着这一基本方针而作的。党用了统一战线的方针，在满洲以人民革命军为骨干，与其他义勇军订立了统一战线。谁也知道，因为党的这一方针，满洲的反日战争不但不因国民党军阀的叛卖变节，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屠杀大举进攻，而削弱，而失败；相反的，现在连日本帝国主义者也承认，没有十年的"进剿"，不能把这个力量消灭。它日益团结满洲最广大的反日群众，成为满洲苏维埃运动的胚胎。

党的第三个基本方针，是尽量揭露国联与美国在中国的帝国主义侵略。针对着国民党的散布美国国联的幻想，党在群众中指出，国联和美国并非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相反的，它们鼓励日本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和中国革命，另一方面自己也实行趁火打劫，加紧的瓜分中国。党利用了李顿调查团来华及其报告书，美帝国主义在上海战争时企图瓜分上海等等事实，进行揭破的工作，消灭国民党在群众中散布的幻想。结果是很明显的，国际联盟是帝国主义强盗的分脏的机关，美国一样的是帝国主义侵略者，这些观念是最深刻的印入于广大群众的心头。

第二个阶段的情形，就是这样。无疑的，在这个阶段上，由于我们采取了许多灵活的、适时的战术步骤，我们取得了一些成功。然而，这个阶段上以及以后的时期中，我们还有许多弱点，最主要的就是我们没有能够适时的揭破国民党"中国无力抗日"的武断宣传，而以明白通俗的反日作战纲领，在群众中广泛的通俗化起来，以坚定群众对于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的信念。

第三阶段——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产生及其覆灭。

一九三三年下半年，日本帝国主义进攻滦东、察哈尔，卖国贼国民党与日本帝国主义订立了出卖华北的塘沽协定。苏维埃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宣言，使进攻苏区的白军瓦解，在四次战役中得到最后的胜利，并且接着在福建方面摧毁了十九路军军阀的进攻，得到极大的胜利。

国民党统治的破产，群众的不满和革命情绪的增涨，苏维埃红军的伟大胜利，这不能不迫使统治阶级找寻新的机动，玩弄新的把戏，以新的统治方式来维持自己的统治。一九三三年秋季我们在统治阶级的营垒中看到两种政治的倾向，一方面是以蒋介石为首的一派之法西斯蒂化的激进，这一派想依靠于野兽般的恐怖主义，无情的残酷的镇压一切群众的不满情绪，依靠法西斯蒂的屠刀来维持自己破产了的统治。另一方面则是十九路军军阀为首的一派，企图借助于"左"的、假革命的口号与纲领，以阻止群众更进的革命化，而在新的形式之中继续地主资产阶级统治。最后，这便形成统治阶级营垒中公开的分裂。福建便组织了独立的"人民革命"政府，它在一个时期中成了一切在野的改良主义的反革命派集合的中心。

人民革命政府的问题，是放在党面前的一个新的问题。这个政府公开的与南京政府对抗，口头上讲着一切革命的词句，并且以口头上的应允苏维埃的三个条件而要求订立反日、反蒋的作战协定。事实上，对于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很清楚的，这些屠杀工农兵与革命士兵的刽子手，不会执行任何与南京国民党有原则上不同的政策的。问题的复杂更在于他们的确有一部分群众的支持，这些群众极端愤怒国民党的投降和卖国，然而还没有能够确信我们的主张，福建派的首领们正是用找寻第三条道路之旗帜以剥削群众间的这种情绪，而阻止他们直接的转到共产主义的苏维埃的方向来。

在这种情况之下，党采取了如下的基本方针：

(一)尽量利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以争取群众的同盟者，以推动和发展在福建以及全中国的群众的反日、反国民党的斗争。将这个问题提高到争取革命后备军的高点上来。

(二)最严格的、无情的揭露福建派口号与政纲的反动性，及其领袖的动摇、妥协、投降、出卖，并使群众在自己的实际经验上了解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的真理，以促进第三条道路找寻者的破产，以保证群众决定的转变到我们方面来。

(三)在福建派承认苏维埃红军三个条件的基础上，不拒绝与福建政府订立初步反日、反蒋的协定，以便在群众的面前证明苏维埃红军忠实于自己的宣言，并只要有最小的可能都用来为着实际的实现民族革命战争而奋斗，同时，最严厉的批评、指斥福建派对协定的执行的延宕，迟疑背约，借以揭破他们的真实面目。

党的这个基本方针是根据列宁斯大林的战略战术的原则而定下的。

斯大林同志曾在列宁主义概论上指出：除了在直接的革命后备军之外，还有一种间接后备军。且特别指明这种间接的后备军"对于革命过程有重大的意义"，这种后备军是："(1)无产阶级以外之本国的其他阶级相互间的矛盾和冲突，无产阶级可以利用来削弱敌人的势力，增强自己的后备军；(2)敌视无产阶级国家之资产阶级国家互相间的矛盾、冲突和战争(譬如帝国主义的战争)，无产阶级可以利用来向敌人进攻或对敌防御"("列宁主义概论"九三页)。

斯大林同志接着说："战略的指导的任务，就在正确使用所有这些后备军，以求在革命发展的某一阶段中，达到革命的根本目的"。

怎样才能够正确的使用这种后备军呢？

在"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列宁更详细的解释了这一问题：

"要想战胜更有力的敌人,只有用最大的力量,并且必须最谨慎周到、细心敏捷的,一面利用敌人间每个(即令是最小的)间隙,利用各国资产阶级间,各国内部各种资产阶级间的每个利益的冲突,它方面,利用每个(即令是最小的)可能的机会以求获得群众的联盟者;尽管这个联盟者是一时的、动摇不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都不要紧。谁要是不懂这一点,谁就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对于现代科学的社会主义,一窍不通。在比较长久的时期中,在比较复杂的政情中,谁要是不曾在实际上证明他会应用这个真理,那么他就可以说还未学会怎样在斗争中帮助革命阶级,以求把全体劳动人民从剥削者手中解放出来。以上所说的,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及以后的时期,都可适应"。

列宁与斯大林同志所提出的这一战略原则,党把它采取了作为对付"人民革命"政府事件的领导的战略原则。党依照着这一原则,把利用敌人内部矛盾提到为争取革命后备军的高度上来,这样来揭破第三条道路的武断欺骗,忠实于自己的发展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的事业。

党与苏维埃政府怎样实现了这个基本方针呢?党采取了许多具体的步骤,其主要的是:

(一)最坚决揭露"人民政府"的政纲:指出其政纲中之"否认帝国主义强制的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实际上就是对帝国主义的投降及拥护不平等条约的继续存在,指出"计口授田"实际上是阻止农民自己动手的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是反对土地革命的口号,揭破所谓"生产人民"的术语,是用以模糊、抹杀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工具,而以党和苏维埃的革命政纲尖锐地与它对立起来。

(二)利用它的反日、反蒋的"左"的空谈及民主权利的允诺,发动广大的反日、反蒋的群众运动,号召群众自己动手的实现一切民主的武装的权利,提高这个运动到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及土地革命的高点。

(三)为着这点加强党在福建的工人、农民及一切劳动群众中的工作,组织他们在工会、"反日会"、农民委员会等等中间,并实行自己武装起来,同时采用最广泛的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并保证在这个运动中的我们的独立领导。

(四)在苏维埃红军宣言的三个原则的基础上,苏维埃与"人民政府"订立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并采用许多政治和军事的步骤,以求这个协定的实现及推动反日、反蒋的斗争。同时,最严厉地批评、指斥、揭露"人民政府"的对协定的怠工,借以揭露"人民政府"领袖的反革命面目。

(五)加强在十九路军士兵中的工作,号召他们反对反动的长官,实行坚决的反日、反蒋的武装斗争,号召他们与红军联合与加入红军。

这些以及其他的步骤,保证了党的基本方针之实现,扩大了党和苏维埃的影响,使群众了解第三条道路的破产的实质,使它迅速的走到破产。广大群众不仅知道国民党是不能抗日的,并且知道也不能抗日,所谓第三条道路,只有苏维埃能够领导胜利的抗日战争。

不管在这个时期中我们的工作上还有许多弱点,以致我们没有能夺取十九路军影响下的士兵到我们方面来,没有能够很好的利用这个时机,但是我们基本的方针是正确的,而政治的成功亦是不可忽视的,这个是我们要说的第三个阶段。

三　民族危机的新阶段中我们党要做的是什么?

现在我们已进到第四个阶段。就是:民族危机的新阶段。

那些事实表明民族危机的新阶段?这就是:

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华北、华南，都在最积极的进行侵略。日本帝国主义事实上已经占领了整个黄河以北的中国地方，而且事实上开始占领福建。但这并不使它满足。四月十七日，日本外务省所发表的宣言，声称中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保护国，一切帝国主义不得日本帝国主义的允许，就不得干涉中国事情。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是要把全中国做它的殖民地。在发表宣言之后，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了许多步骤：日本公使有吉与卖国贼蒋介石、汪精卫、黄郛密谈卖国协定；实行中满通车，使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无阻碍的侵入华北；日本帝国主义提出一千五百余件所谓"中日悬案"与国民党进行交涉，其中一件就是要国民党政府承认三万万元的西原借款；日本帝国主义把南京副领事藏本藏在山里，借口藏本的"失踪"，动员兵舰集中南京，镇压南京政府更进一步的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台湾浪人在福建到处活动等等。总起来说，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不仅要占领华北，并且要独占全中国，把全中国变为满洲，变为它的役隶的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正在积极的进攻福建，这是将来直接进攻中央苏区的准备。

国民党更公开的、无耻的投降帝国主义。现在国民党已经不但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而且是帝国主义的傀儡。它已经出卖了满洲、华北、藏、康、新疆等半个中国，还在继续出卖整个中国给帝国主义。

国民党用法西斯蒂的"新生活运动"来麻醉民众。"新生活运动"的口号，是"复兴中国民族"，不是用民众的武装的抗日战争，而是用提倡礼义廉耻，走上复古的旧道路，提倡旧的奴隶顺从的道德，使全国人民安稳的做奴隶。"新生活运动"，不是蒋介石所发起的，而是帝国主义所发起、由蒋介石来进行的。日本帝国主义实际上才是"新生活运动"的发起人与组织者。日本的最积极主张侵略中国与进攻苏联的法西斯蒂军阀——前陆相荒木贞夫，在一九三三年十月与日本新闻记者谈话："道义的日本，建设皇国的日本于道义之上，集日本全部的努力，其庶几乎有效"。以侵略、屠杀、轰炸、抢掠、奸淫为事业的"道义的日本"，要把中国也创造成为"道义的日本"的一部分，所以要使国民党先在中国亡国之前，把旧道德提倡起来，准备顺民，以便"皇国的日本"好来安稳的统治。今年四月二十日，日本驻福州公使今村，在蒋鼎文的宴会上说："中日两国的国交，要建立于道德之上"。换句话说，中日两国的"国交"，要建筑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用"新生活运动"，提倡旧道德，养成帝国主义顺民的基础上。

国民党高喊"中国无力抗日"，"抗日必先建设"。国民党的四中全会，定出它们的任务，是所谓"充实国力"，"力求建设"，"专力剿共"，而不是抗日。国民党的这些一切，都是为要在群众中散布对于抗日作战的悲观失望的情绪，阻止群众的革命斗争。

同时，全中国民众的反帝运动，虽然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镇压之下，但仍是发展着。最近，七月一日中满通车的第一次列车，在塘沽与芦台之间，发生爆炸，乘车的汉奸遗老之流死伤了半数。在华北战区中，发现了革命的传单。在白区，成千的爱国志士正在发起民族自卫会。反日、反帝的斗争也正在走上新的、更剧烈的阶段。

在目前的阶段中，党应当采取什么方针？

为着实现党的基本口号，我党的中央已经和将要采取什么步骤？我们应该动员做些什么？

（一）党在四月二十日的宣言中，定出了反日统一战线的五大纲领：1.坚决反对国民党整个的投降出卖政策，反对国民党出卖东北、华北与全中国的塘沽协定和中日直接交涉。抛弃对国联与美国的任何幻想，只有工人农民和一切劳动者的团结与统一，才是中国民族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力量与胜利的保证。2.全中国的民众必须起来，为保卫中国领土与独立而作神圣的民族

革命战争。3.号召民众直接参加反日战争与游击战争。用所有军器库及入口武装来武装民众，组织民众的反日义勇军。积极援助东北的抗日义勇军以及广大群众抵制日货的行动。4.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卖国贼汉奸的财产，停止支付一切债款本息，设施累进税来作为抗日的费用。5.中国必须立刻完全对日绝交，动员整个海陆空军对日作战，立即停止进攻苏区及军阀战争。

这一个步骤，使我们具备了一个最通俗的纲领，作为团结全国民众的旗帜，揭破国民党的“中国无力抗日”的欺骗。

但是，仅仅有这个纲领，还是不够的。要使这个纲领为群众所了解，要使群众了解中国是有力抗日的，必须进行具体的解释，解释我们对日作战的时候，兵力那里来，武器那里来，战费那里来，拿什么做领导机关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使全国群众完全相信，抗日是有办法的，而且一定会胜利的。

这个解释与鼓动应该依照着下面的基本纲领而进行：

一、全体人民总动员：广泛组织民众反日义勇军、反日游击队、募捐委员会，以援助满洲、热河义勇军与游击队，以及作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基金。组织侦探队、破坏队、交通队、运输队、救护队、宣传队等等；组织纠察队，以监督抵制日货，吸引和动员一切民众去进行反日、反帝斗争。

二、动员一切海陆空军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不许一兵、一卒、一个飞机留在后方反对本国民众。停止进攻苏区，一方面使红军能够进行反日、反帝战争，它方面，使军队不至于参加屠杀工农，而给他们一种可能，把自己的武器用去反对中国的死敌——帝国主义侵略家。

三、以兵工厂和军器库的一切武器来武装全体民众，将本国已有和正在制造的以及由外国买来和输入的武器武装起来。

四、解决抗日战争军费的具体办法：1.没收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财产（租界、银行、工厂、铁路、轮船、矿山等）和商品，这已经是一笔很大的经费，因为日本在华的投资已经超过了日金二十万万元；2.停付日债一切本息；3.没收一切卖国贼的财产；4.实行财产累进所得税；5.在国内人民和国外华侨以及一切同情中国劳动群众的民族解放斗争的人们中，进行广大的募捐运动等等。

我们必须动员我们一切的力量，用一切方法来通俗化这个纲领，这是揭破国民党“无力抗日”的胡说的最有力的工具。

（二）不仅要宣传，而且要用这个纲领来广大的组织群众，把工人、贫民、学生以至小商人、自由职业者，组织在各种民众反日组织之中，我们用一切力量来形成民族革命自卫委员会，成为领导抗日战争最高指挥机关与政权机关。

（三）加强白军士兵中的工作，要采取更多的方法来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是我们工作薄弱的一环，今后必须努力的加强它。要学习上海战争中的经验，利用居民中的反日情绪来影响士兵群众。

（四）提高苏维埃与红军在群众中的威信。目前的阶段中我们已不能满足于宣言与协定。时机已经成熟，工农红军已经必须而且能够分拨一部分的力量直接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已经在这方面采取了相当的决定。我们应该给群众证明：红军是民众抗日战争的主力。（鼓掌）

红军直接对日作战的时期已经日益迫近，我们全体红色的军人，应当准备着在任何时候

率领着全国民众，进行神圣的抗日战争。（鼓掌）这种情形，要求红军努力提高军事技术、军事政治的教育和自觉的纪律，使红军能随时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

我们的赤少队，也要加强政治军事的训练，准备将来一声号召之下，站在全国民众的先头，去同日本帝国主义决一死战。

（五）但是，当苏维埃与红军进行一切工作来组织全国民众的抗日战争的时候，丝毫不能减弱我们粉碎国民党五次"围剿"的工作。因为这个"围剿"，是帝国主义所组织的，是对中国唯一完全脱离了帝国主义势力的区域的进攻。帝国主义对中国民众的每一次进攻，都是与国民党对苏区的"围剿"联系着的。"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国民党不是去进行抗日，而是进行对苏区三次"围剿"。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山海关、热河，国民党不是去抗日，而是进行对苏区的四次"围剿"。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国民党不是去抗日，而是进行对苏区的五次"围剿"。日本帝国主义宣言独占中国，国民党不是去抗日，而是向苏区大举进攻。只有忠实于我们的口号："推翻国民党卖国政府，是进行胜利的民族革命的前提"。彻底粉碎五次"围剿"，我们全部红军才能北上抗日，才能真正实现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把日本帝国主义及一切帝国主主驱逐出中国。

*　　*　　*　　*

我们将实现列宁的预言。列宁曾对东方的弱小民族说：

"无论这些民族如何弱小，无论欧洲的压迫者在斗争中使用一切惊人的技术与军事艺术，似乎他们的力量是不能战胜的；然而，被压迫民族所进行的革命战争，如果它善于唤醒真正千百万的劳动者与被剥削者，那末，它包含有这样的可能，这样的奇事，就是说：不但从世界革命的前途的观点，而且从直接的军事经验的观点来看，东方民族的解放现在就实际上完全可以实现的。"

我们将要教训帝国主义者们，教训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们，教训高喊"中国无力抗日"的汉奸卖国贼国民党：中国的民众将在苏维埃的领导之下，胜利的进行民族革命，得到彻底的民族解放，如列宁所预言的那样！（大鼓掌）

中国现状与中共任务

——一九三四年，在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三次全会上的讲演——

王　明

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上中国共产党底任务

第一章　中国——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底舞台

同志们：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完全同意全会提纲上和库西宁同志报告中，对于国际形势底估计，就是说："现在国际形势简直已经逼近到战争与革命底新周期"了。"由于本身最深刻的不可解决的矛盾，资本主义制度已经破坏了，与资本主义总危机最密切关连着的世界经济危机，把资本主义社会底一切根本矛盾紧张到了这样的程度，就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发生这样的变化，即是把经济危机变成革命危机"。中国的状况便是对国际形势这种估计底最好的实际证明。

还在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时，因为当时全会估计国际状况，是资本主义稳定底终结和转变到战争与革命底第二个周期的过渡。中央代表团那时便指出："中国已经正在进行革命和战争"，"中国已经是革命与战争底整个连环当中主要的一环"。

十二次全会以后已经一年了，现在世界既已简直逼近到第二个革命与战争底时期，试问中国在这一时期中发生了一些什么新的东西呢？

一　革命更向前发展

革命运动在中国更向前发展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它首先表现在苏维埃革命更进一步的胜利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强大——大家都知道，当共产国际执委十二次全会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正组织在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去反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工农红军；在这次围剿当中，国民党动员了八十六师以上的军队，组织了许多地主富农的武装队伍（民团，剿共义勇队等），直接参加这次围剿军事行动的，一共差不多有一百万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武装队伍。

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在那个时候说，他们这次围剿一下子把中国苏维埃运动永远消灭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临时暗藏在我们党内的反革命罗章龙派底残余，曾大声高叫说：中共和红军绝对不能冲破这次大规模的围剿。悲观、恐惧和失望的情绪，使这些机会主义者公开地跑到国民党营垒里头去；此外，甚至于许多中国革命的朋友和有些共产党员们，也不免抱着悲观的态度，他们以为，这次红军和中共恐怕很难胜利吧？然而不管这些分子的狂吠，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三次全会会议上，完全有权利高兴地向全世界宣布说：那个在一九三二

年秋天开始底反苏维埃的五次围剿，在一九三三年春末夏初时已经完结了。其结果是：国民党军队的大惨败和工农红军的大胜利；这个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苏维埃政府领导下得到的。(大鼓掌)

这种胜利产生了一些什么结果呢？

(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领土更进一步的巩固、扩大和统一

红军在五次战争胜利中，在中国南部、中部和西北部共占领了七十六个县。虽然因为军事行动的关系，这些新占领的县城有一部分是时得时失；但是直到现在，差不多有四十个以上新占领的县份是保存在红军的手里。红四军在五次战争当中，在四川省创造一个很大的并且很强固的苏维埃区域。中外报纸都说得很对：四川省对于红军行动有很多优越的条件，就是四川是一个很富的省份，是帝国主义难得达到内部的省份，但是红军很容易防守的省份。四川的新苏维埃区域，也和中央苏维埃区域一样有很好的顺利发展底前途。

赣东北苏区，闽西苏区与江西中央苏区统一起来了，结果使中央苏区的许多领土能够表现这样的巩固：在最近两年战争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敌人没有一次能够侵入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最主要的根据地里去。

此外，在六次围剿战争开始时，红军又新占领了十五县和两个比较重要的工、商业中心城市，这就是福建的延平和四川的万县。

这样一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土已经发展到比任何西欧与东方资本主义列强的领土都大些。

共产国际十二次全会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土占中国内部十八省的六分之一的面积。同时，这个领土是包括固定的苏区和游击区域。现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土，就是说固定的苏区和游击区的总面积，已经占中国内部十八省的总面积四分之一了，而固定苏区已占内部十八省的六分之一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领土的总面积，共计一百三十四万八千一百八十平方基罗米突（即二百五十八万零八百三十五平方里)，其中固定苏区面积共占六十八万一千二百五十五平方基罗米突（即一百二十三万四千九百五十平方里)，如果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固定领土和西欧及东方的资本主义列强的领土比较一下，就可以得到下列的结果：

比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固定领土来：

法国领土等于百分之八十小数点九

德国领土等于百分之六十八小数点七

英国领土等于百分之三十五小数点五

日本领土等于百分之五十五小数点九

仅仅一个中央苏区就要比波兰加上比利时的领土大两倍。

(乙)红军更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

红军在冲破五次围剿战争中，打破了国民党四十师的军队，其中有十八师差不多完全被打溃了。红军俘虏敌人八万人，其中有很多师、旅、团长等等(例如只在一个中央苏区，只在一九三二年一年当中，就俘虏敌人的三个师长，十一个旅长，十八个团长；从一九三三年一月到四月俘虏敌人两个师长，两个旅长)，夺获敌人十四万支步枪，一千三百九十架轻重机关枪，二十架军用无线电机，几百架炮，六架飞机。此外，差不多有三万国民党军队的兵士投降到红军方面

来。(鼓掌)

因为有这些伟大胜利的关系，红军更加壮大和巩固了。在共产国际执委十二次全会时，正式红军有二十万到二十五万人，非正式的武装队伍(就是有新旧式枪械的游击队，赤卫军，少年先锋队等)有四十万人以上。现在正式红军已经约有三十五万人，非正式武装已经有六十万人以上。

在这个时期内，新成立了六军人：在鄂豫皖苏区，在第四军主力退走后，新成立了红二十五军和二十八军。在中央苏区新成立了第十一、十五和十九军；在四川苏区新成立了一军。新成立了五个师，其中有三个模范师是在中央苏区的(一个由青年团组织起来的少共国际师，两个由工人和雇农组织的模范师)，在这些模范师当中，党员青年团员占红军战斗员的绝大多数。这些模范师是一切红军的铁的骨干和突击队伍。在四川新组织了两个师，一个在川东北，另一个在川西。

在质量方面，红军在这一时期中，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首先就是共产党和无产阶级骨干加强了。在中央苏区许多基本的红军队伍当中，党员占全体成份的百分之五十到五十八，无产阶级的成份，即是工人、手工工人、雇农平均占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至于工人模范师中，差不多完全是工人、雇农、手工工人、店员等无产阶级的成份。

(丙)苏维埃建设方面底新成绩

从中央苏维埃政府成立(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号，苏维埃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到共产国际执委十二次全会这一时期，可以算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形成的时期。最近这一年，可以算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更向前发展和壮大，并且得到全世界在事实上承认这个国家的时期。苏维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最近一年来，对于苏维埃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基本法律和指令，做了很多具体化、补充和在实际上实现底工作。例如：

1. 在苏维埃行政系统方面——颁布和实行了重新划分行政区域的命令；颁布和实行了地方苏维埃组织系统条例和工作条例；颁布和实行了各级苏维埃选举和改选的章程和细则等等。

2. 在经济政策方面——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了专门关于合作社条例(譬如在中央苏区在这一个时期中就成立了五百个以上的生产、消费和信用合作社)，关于国家和私人的借贷条例；关于允许在苏区工商业投资条例；关于征求专门人材启事；关于工人监督生产和在苏维埃监督之下允许土地买卖的条例；以及关于禁止不断平分土地的指令(这种不断平分土地，特别是湘鄂西苏区等地方很流行的现象，实际上不断平分土地是振兴农业经济的很严重的障碍)。

苏维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极力设法改善苏维埃区域的农、工、商业。他们努力领导春耕运动，秋收运动和修堤运动；他们组织犁牛站、农具、种子和肥料等去帮助那些没有耕牛，没有农具，没有肥料和没有谷种的农民；他们在经济工作当中，组织了广大的革命竞赛运动和突击运动；他们领导农民开垦了很多原来的荒山、荒地；他们努力改良苏维埃工农银行的工作；他们实行正确的赋税制度；他们实行了广大的节省运动，以便尽量节省经济来保障红军底给养。

3. 在使苏维埃国家机关改良和节省方面——在这个时期里，开始真正组织和实行工农检查局、轻骑队以及其他考查苏维埃各级机关的群众组织底工作，在很多地方，工农群众已经

广大地起来对苏维埃机关实行自我批评，并且得到很大的结果。中央和地方苏维埃政府，已经开始实行预算和决算制度，并且每经一个月或三个月公开向群众公布收入和支出的账目，同时，把苏维埃各级政府底预算和决算来和国民党各级政府的预算和决算做个明白的比较，使群众在事实上亲眼看到：只有苏维埃政府是唯一的廉洁政府，这种廉洁政府是中国人民有史以来时时刻刻所希望出现的。

4.在发展人民教育方面——虽然苏维埃区现在经济和人材都感觉很大的困难，但在最近一年来，在一切主要的苏区里，都开始了认真地组织人民教育底工作。例如，在中央苏区宁都一县，就组织了三百五十个初级列宁小学校，八十五个平民夜校，许许多多的识字班，十三个俱乐部；在这一县，仅仅在列宁小学校读书的就有七千五百六十人以上，这些小学校不仅仅不要钱，而且供给学生教科书和伙食，在这些小学校里，只有富农的子弟才缴学膳费。这样的人民教育制度，这样广大的教育组织，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过的现象。根据我们得到的材料，在今年年初，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瑞金城内，已经成立了第一个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在第四军的苏区内，已成立了各种苏维埃中学。

5. 在解放妇女方面——中华苏维埃政府不仅坚决地实行婚姻条例（如离婚结婚自由等等），不仅坚决地主张劳动妇女在分配土地当中与男子完全平等，而且坚决主张在每个苏维埃机关或委员会的领导成份当中，至少要有五分之一或五分之二是劳动妇女，同时，在每个苏维埃里设有改善妇女生活委员会。

6. 在群众组织方面——过去这一年，是各种群众组织迅速发展的一年。首先就是赤色工会，——它是党、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底最可靠的支柱。虽然我们直到现在还没有关于整个苏维埃中国领土内赤色工会会员的统计，但是据我们已有的个别材料，已经可以证明，赤色工会在苏维埃中国领土内是广大的群众组织。例如，只在一个中央苏区，还在今年年初的时候，赤色工会会员便有十八万到二十二万。现在有十个省总工会。在每个苏维埃区域里，最近一年来都召集过工会代表大会和各种代表会。

赤色工会在苏维埃中国内起很大的和领导的作用。举一个例子看：从今年六月到八月三个月中，由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局所发起，组织了红军两个工人师，就是一个农业工人师，一个手工工人和店员工人师。兵工厂工人在一切苏维埃区域内，总是加倍地工作，在有些地方甚至于一天出产比较平时多三倍以上的子弹和枪械来供给红军。

贫农团是我们党和苏维埃政权在反富农和反地主残余当中底群众柱石。他们已经成为广大群众组织了。例如，在中央苏区内八县里，贫农团团员便超过十四万九千人以上。

国际革命者救济会——根据今年八一在瑞金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底统计，只在中央苏区便有会员六十万人。在这个代表大会上，不仅讨论了救济会在中国的工作和任务，不仅通过了给国际革命救济会总执委主席斯塔数娃同志贺电，并且通过了致在德国法西斯蒂统治下和日本血腥天皇统治下奋斗的战士底慰电。同时并通过了募捐款项去帮助德国和日本的兄弟们底决议案。这件事实，只不过是表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奋斗的劳苦群众，对于德国在以台尔曼为领袖的共产党领导下而英勇斗争的德国无产阶级广大同情的一种具体表示。中国劳苦群众对于德国无产阶级和德国共产党之所以表示这种广大的拥护，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中央进行了有系统的工作去反对法西斯蒂，拥护德国共产党在希特勒拿到政权以前、拿到政权时和拿到政权以后所采取的正确的布尔塞维克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路线，拥护共产国际主席团今年通过的关于德国问题的决议。我们党和中国劳动者对德国党和无产阶级这种热烈同情的表示，就

是在事实上坚决打击莱母麦尔和来以曼等对于德国共产党领导底侮蔑。

同样,中国劳动群众对于日本英勇的无产阶级反对日本资产阶级和天皇统治底斗争,表示广大的同情和赞助,绝不是偶然的一回事;而是由于中共进行有系统的工作去动员群众拥护日本革命斗争的结果。同时,日本共产党实行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实行真正地反对本国资产阶级对中国民众进攻底斗争,在实际上也就更加巩固了中、日劳苦群众互相间革命同情。中日两国劳苦群众非常迫切地希望,在中日两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结成统一战线去反对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

反帝同盟在中央苏区内就有五十万人以上的会员,苏联之友会在中央苏区和救济会一样,差不多有六十万会员。

7. 在苏区内部反对反革命底斗争方面——在这个时期,我们政治保卫局的工作和组织,已经大大地改良和加强了。因此,虽然国民党用尽一切方法,企图在我们的后方组织反革命的暴动,但是在最近一年来,在一切苏维埃区域内,已经没有发生过像从前那样的反革命暴动了。(鼓掌)我们底政治保卫局已经能够及时地暴露和破坏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对苏维埃中国的许多反革命阴谋和诡计。

(丁)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成为中国民族解放斗争底唯一的、可靠的柱石了!

在以前,虽然苏维埃政权在目前这个阶段上,一开始就提出根本消灭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在中国统治底任务,虽然在我们苏维埃中国内已经消灭了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但是,因为苏维埃区域离中心城市较远的原故,所以在最初的时候,广大劳苦群众首先容易看到的,就是苏维埃政权是唯一执行土地革命的政权。然而,在最近一年来,因为共产党实行灵巧的和正确的策略,因为共产党极力造成反对帝国主义的广大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因为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能够及时地实行反帝国主义和反国民党底行动,苏维埃政府已经成为全中国人民底唯一的反帝国主义的政府了。只有苏维埃政府能够真正领导和组织武装人民反对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底民族革命战争,以便取得中国民族独立、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已经成为全中国和全世界大家公认的事实了。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之下,在最近一年来,在实际上证明了:虽然直到现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还没有能在地域上把所有苏维埃区域统一起来,但是,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一切领土内,实行统一的行政制度,统一的经济政策,统一的财政系统,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实行统一的政治上和军事上底领导。这样,中华苏维埃政府就在实际上证明了:它和南京政府及其他军阀、官僚底政府底不同之点,首先就是由于它是工农政府,所以虽然它在地域上还没有能够把各个苏区统一起来,但是,它在实际上是唯一的能够使中国达到革命统一底政府。而国民党南京政府,虽然名义上是国民党中国内所谓"中央"政府,但是,实际上,在南京政府统治的范围内,每个军阀,每个官僚以至于每个土豪和绅士,都是各自为王,各自为政,都有权利收捐、收税,都各有自己的法律和命令。

从以上这些事情看来,很明显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已经完全具备有现代国家的一切条件和成份,这完全有资格称作文明的人民共和国。

正因为如此,所以虽然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欧洲,美洲或东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法律上和形式上正式地承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然而,外国政府和中国军阀政府,已经不能不在实际上承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国家了。这首先就可以从它们的言论机关上看得出来,它们之

中，有的承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不可战胜的力量；另一个承认苏维埃政府是中国组织得最好的政府；第三个承认苏维埃中国人民底生活要比国民党中国人民底生活幸福些；第四个说苏维埃政府是唯一能使中国国家统一底政府……等等。举几个例子来看：

在国际联盟底报告当中（李顿报告书）我们看到有下面这段话：

"共产主义在中国不仅成了政治的学说，在中国不仅创造了独立的共产党，并且共产党已经成为南京政府的竞争者了。因为共产主义在中国创造了自己的特别的法律，自己的军队和政府，并且有自己的领土的势力范围"。

在英国帝国主义的正式机关报"太晤士报"上，在今年十一月十三号和十四号两天的报上，登了一篇题目叫作中国底共产主义的论文，这个论文底作者，自己不久以前，曾到过江西和湖南的苏区边境。在这篇文章中，他写道：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布成立了，它统治了并且现在还统治着许多区域。经常固定的中心区域，是江西的中部和南部，以及福建的西部。但是，湖南、广东和湖北的一部分，也渐渐地归到它的版图里面去了。有许多人这样想，这里所谓共产主义，不过是通常对于土匪，不满意的行动和失业现象等的称呼。然而他们错的太远了！根据我们在江西和湖南南部剿共战线上得到的印象，可以供给我们许多材料，使我们可以做出比较正确的、但是更令人不安的结论。中国的象征——散漫消极。但是中国共产党员绝对不是消极散漫的人。赤色区域完全是在首都瑞金底总参谋部——中央政府底严格管理之下"。

美国自由资产阶级的"新共和周报"，在今年九月第二十七期上登载了一篇题目叫作红色中国的论文，在这个论文里写道：

"苏维埃区域是处在比邻近军阀统治区域兴旺底状况，苏区的米粮收成要好些，捐税要少些，而沿江沿河的堤防要高些……，苏维埃政权存在以后，实行了自己的货币制度，并且在人民教育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成绩。在六年不断战争当中，苏维埃证明了它是唯一的真正的中国人民政府。北方军阀是日本的奴仆，他们靠日本的津贴过生活；广东派在英国的影响之下；蒋介石和他的南京政府准备着替任何外国政府效劳，只要人家给他借款和军火。他们服从日本人，但是他们更特别同情美国的资本主义。苏维埃得不到任何的借款，任何的武装，除了它从敌人方面夺来的武装以外。它一天一天地实际证明了，假若江海沿岸在帝国主义卵翼下的各政府一旦失了西方和日本底帮助，那末，全中国在几个月或几年之内，将要完全成为共产主义的了"。

在日本出版的英文刊物也不得不承认说：

"现在在中国发生的运动，在使中国民族解放事业上所起的作用，将要比从辛亥革命以来所发生的任何事变所起的作用要大些。很明显的，红军在四川之所以能得到胜利，首先就是由于江西红色势力的响应和牵制国民党军队底结果。如果这一种互相配合和互相呼应的行动，使南京大感不安，那末，当然它们也使列强感觉不安，因为这一种情形当中埋伏着真正统一中国底希望。但是中国统一，对于有些列强完全没有好处和没有利益的"（见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一号日本大事记）。日本帝国主义的报纸大阪每日新闻在今年十月十四号登载了一篇自己的九江特约通讯，在这通讯上面说：

"中国苏维埃区域人民底生活条件，比红色势力没有到那些地方以前要好些"。

中国天津的资产阶级底益世报，在它的社论上说：

"……内部的冲突我们始终主张应持'楚人失之，楚人得之'的见解。俄罗斯的克伦斯

基打倒了俄皇，俄国并没有亡国。列宁抢夺了克伦斯基的政权，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俄国也并没有亡国。国家内政上变了何种局面是次要问题，亡国的惨痛是不能忍受的……"。

最后，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实，就是在最近的时候，我们已经看见这一类的现象，即个别的军阀派别、在和红军屡战屡败之后，在兵士群众和一部分下中级军官革命情绪压迫之下，不能不这样提出问题：或者继续和红军战，那么，毫无疑问地他们将要完全塌台；或者把自己枪头调转过去反对日本及其走狗蒋介石，以便从绝路上另找出路。

苏维埃中国在全中国和全世界面前已经长成为一个真正的独立的人民共和国——这是现在最主要的问题。

第二，近年来中国革命运动底更向前发展——表现在非苏维埃中国群众革命斗争底更加扩大和深入：表现在反帝国主义斗争，特别在东三省、热河、北方和福建等处广大群众反日的武装斗争更向前发展；表现在工人群众斗争更进一步的革命化和扩大；表现在农民运动广大发展和无产阶级、共产党及苏维埃政权在农民运动中影响和作用底加强；表现在军阀军队中士兵群众更加瓦解和革命化；表现在极大部分小资产阶级从反动党派影响之下解放出来而日益倾向革命和共产党等等。关于这些问题，康生同志在他的发言当中都要讲到的。

从以上所讲的这些东西看来，很明显地，中国在目前这个时候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里这样唯一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正在进行着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底胜利的苏维埃革命。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不仅已经成为现在中国在一切政治生活中底主要中心，而且已经成为决定世界政策底主要因素之一了。

这是最近一年来，国际政策中所发生的一个最重要的新事件。

二 战争与武装干涉底扩大和深入

在中国不仅进行着革命，而且同时发生着战争与武装干涉。

在近年来，战争与武装干涉也都扩大和深入了。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很久就发生战争了。但是，直到现在，欧洲和美洲许多工人和劳动者，对于中国战争问题，还不十分清楚。中国现在到底发生些什么战争呢？就是革命的战争和反革命的战争。革命战争表现在各种形式上：它的最高形式，就是现在在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以工农红军作先锋底武装人民所进行的战争，这个战争同时包含有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的性质和反国民党的国内革命战争的性质。而且这两种性质是相互地混合着。它的最初形式和阶段，就是现在东三省、热河等地方真正反日的游击战争，这个战争是广大民众进行的，这个战争是民众决心武装驱逐日本强盗和卖国贼蒋介石、黄郛、溥仪等情绪底具体表现；它的最初形式和阶段，就是反国民党反军阀底民众战争，这种民众战争，有些地方是采取抗捐军的形式，有些地方是采取反对地主、官僚、警察制度底地方农民暴动的形式，而这些战争向前发展的结果，必然要成为反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

在中国的反革命战争，就是帝国主义为瓜分中国的战争，就是帝国主义反对中国人民革命的干涉战争，而且这两种战争在基本上也是相互混合着的。

在最近一年来，在中国的革命战争，反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战争，都是更加扩大和深入了。

我首先说明反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及其英勇工农红军底干涉战争。我已经说过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苏维埃的五次围剿，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但是，在红军

冲破五次围剿以后，蒋介石、刘湘及其他国民党军阀，在国际帝国主义更多金钱军火帮助之下，又在组织和实行比以前更大规模的第六次反苏维埃的围剿。为的使这个围剿能够得到胜利，美国帝国主义借给南京政府五千万美金，即所谓“棉麦借款”，以及四千万美金所谓“航空借款”。根据这一批航空借款，美国计划建造八百五十架军用飞机给南京政府，而其中一百五十架飞机，已经送到中国了。英国帝国主义借给蒋介石五百万金镑，借给四川军阀刘湘两千万金镑。日本强盗一方面和蒋介石签订了所谓“北方休战条约”，以便蒋介石能够公开地把一切军队动员去反对红军和苏维埃；另方面日本帝国主义把南京政府借到的美棉承买去一大部分，然后将军火作为棉价交给蒋介石去反对红军。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在蒋介石面前加紧地示威，表示它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表示它准备着尽一切可能的力量去帮助蒋介石消灭中国赤化的危险，以便把蒋介石从美国资本影响之下解放出来，而把他变成日本的公开的和忠实的走狗。从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波兰和其他的国家，不断地有大批的轮船运输机关枪、大炮、坦克、飞机、军装、化学毒品等到中国各地——到上海、南京、九江、南昌、武汉、广东……等处。只是因为这个缘故，在五次围剿中已经打败得一塌糊涂的国民党刽子手，才能够又组织新的大规模的反对红军的第六次围剿。在这一次围剿当中，蒋介石和其他刽子手们，在福建、江西、浙江、广东、湖南边界上，便动员了四十四万二千以上的军队去反对中央苏区。十三师到十五师的军队去反对鄂豫皖苏区。八师军队去反对湘鄂西苏区，二十师以上的军队去反对四川各苏区。然而事实还不止这样呵！第六次反革命对苏维埃的围剿与过去国民党各次反苏维埃围剿的主要不同之点，就是在于全世界反革命的帝国主义直接地和公开地参加这次围剿底军事行动。一百五十个美国的和坎拿大的飞机师，在江西福建战线上往来盘旋。许多美国的和德国的化学技师和军事技术专家，正在替蒋介石服务，过去德国国防军总司令赛克特和另外两个德国将军维撒尔及克雷伯尔，以及七十个德国参谋部底军事顾问，不仅仅制定了六次围剿的军事计划，而且直接参加国民党军队作战行动。正是这些国际资本雇佣的走狗们，现在正在进行可怕的航空战和化学战去反对自由的苏维埃中国，去屠杀中国人民。过去的柏林社会民主党警察总监——格山斯基和他的助手社会民主党党员魏一士，已经到了南京去帮助国民党改组警察机关，以便保证国民党在反对红军战争中底后方安全，以便加紧逮捕和屠杀成千累万的中国的反帝反国民党的革命民众和青年。这绝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这是德国社会法西斯蒂和整个第二国际首领们的真正的血腥面目。此外，美、日、英、法、意各国军舰，正在升着火，脱着炮衣，准备着在任何时候，都能开始实行军事行动去反对中国暴动起来了的工农兵贫民和革命知识界。在万县(是长江沿岸和四川省的重要商埠之一)，在英、日、意军舰和红四方面军以及暴动起来的工农贫民之间，正期待着爆发残酷的战斗。

必须注意到，帝国主义列强之所以不顾它们内部相互间有多少不可调和的矛盾，不仅在财政上和军事准备上一致地帮助蒋介石，而且用自己的军力直接地和公开地参加六次围剿的军事行动，其原因不仅是由于苏维埃中国及其工农红军在五次战争中，已经表现出是不可战胜的力量；已经表示出反革命的国民党已经没有力量能够摧毁中国日益发展的苏维埃革命；其原因不仅是由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策和胜利，已把苏维埃事业实际上变成了全中国广大民众的事业，他们都力求在苏维埃旗帜之下进行革命斗争，来取得自己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其原因也不仅是由于苏维埃中国对于安南、印度、日本、高丽、台湾、南洋群岛、古巴、整个东方和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有极大革命化的影响，他们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榜样，来学习应当怎样进行斗争去反对外国和本国的压迫者和剥削者。在目前这种情况之下，在国际事变发展

的观点看来，帝国主义直接武装参加第六次围剿的军事行动的原因，首先就是由于苏维埃中国是苏联以外的世界上第二个苏维埃共和国，是把中国民众们从完全贫困和衰败中挽救出来底唯一的柱石和希望，由于苏维埃中国几年长期存在这一件事实，就是对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者进行革命斗争底强有力的号召，就是坚定他们对自己力量和胜利底信心，同时，也就是明显地表示出世界资本主义已深刻腐朽到如何的程度；由于苏维埃中国妨碍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妨碍他们把中国变成军事根据地，妨碍他们准备新的世界大战；妨碍他们统治中国这样广大的市场，而这个广大市场对于国际资本在目前尤其特别需要的，因为国际资本想利用这个市场，来多少地减轻一下在资本主义制度总危机基础上产生的长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所引起的痛苦的和不可救药的病症。摧毁这个太平洋上的革命根据地，是世界帝国主义准备和进行太平洋世界大战，首先就是从东方进攻苏联的干涉战争底必要条件。摧毁苏维埃中国就是给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个严重的打击。摧毁苏维埃中国就是日本和国际帝国主义使中国人民当亡国奴底必要手段。

现在我讲到帝国主义为瓜分中国底强盗战争。在最近一年来，日本帝国主义除原来占领的东三省外，又用武力占领了热河、察哈尔，并且实际上又取得了整个北中国底完全监督权，同时，在收买内蒙古王公实行所谓“内蒙独立”底阴谋之下，实际上又取得了整个内蒙古的统治。英帝国主义经过西藏的王公喇嘛实行帝国主义战争（根据英国自己报纸的消息也说：西藏军队穿着英国式的军装，用着英国的大炮、机关枪和步枪，在英国的军官指挥之下），这种西藏军早已占领了整个川边省，并且侵入到四川和云南边境。此外，英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积极地在新疆组织各种各样的暴动和骚乱，其目的是在完全瓜分新疆省。法帝国主义也绝不愿在瓜分中国行动中表示落后，它不仅派兵舰占领了南中国海的九个小岛（珊瑚岛），而且时时刻刻都在加紧准备着武装侵入云南和贵州省。美国帝国主义因为许多原因的关系，在中国直到现在还没有开始公开的军事行动，但是它一天一天地把自己的海、陆、空军力量在中国增加起来，准备着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和其他帝国主义者争夺全中国。

在最近几个月，日本在北中国和长城一带开始了部分的撤兵行动，这绝不是像日本强盗及其走狗们——日本社会民主党和蒋介石宣传的那样，所谓“中日军事行动终止了”，或“远东战争危险减少了”，恰恰相反，这只是明显地表示日本强盗加紧准备在最近的将来，开始大规模的反苏联的冒险战争罢了。

最后，我讲到关于军阀战争问题。因为军阀们在日益高涨的人民革命面前表示发抖，所以近年来曾暂时地没有爆发过那种大规模的包括全国主要各省的军阀战争。然而，在过去这一时期中，仍然是有五省（山东、福建、云南、贵州、四川）发生过军阀战争；特别是四川军阀刘湘和刘文辉之间的战争，曾延长七八月之久。受这次战争痛苦的不仅仅有几十万的兵士，而且有千百万的人民。而根据我们得到的一切消息，大概在最近的将来，还要爆发大规模的军阀战争；参加这个战争的，将是蒋介石的主要力量和其他反蒋军阀的力量。所有这些事实，不仅是证明中国军阀制度已经深刻腐朽了，而且是证明，在他们的主人之间（美、日、英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日益剧烈化。所有这一切事实，无条件地证明全会提纲上分析的正确：“新的世界大战的火焰正在太平洋沿岸燃烧着”。

从以上所讲的这些事实看来，很明显地在中国同时发生着革命战争，反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战争。从现在国际状况和中国国内状况的观点看来，中国武装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的战争，在现在特别是进步的革命的和神圣的；因为这个战争的目的，不仅是为达到几万万

中国民众底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且是为消灭太平洋帝国主义大战和消灭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底大战，由此可见，国际帝国主义为完全把中国民众变成亡国奴所进行的强盗战争和武装干涉战争，在现在条件之下，是加倍的反动的反革命的和令人痛恨的战争；因为这种战争底目的，是为的要造成实行全世界帝国主义太平洋大战和从远东实行反苏联战争底必要条件。

三　帝国主义对中国加紧全线总进攻和国民党更进一步的崩溃

在中国最近一年来所发生的事变当中，第三个主要的新事件，就是世界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民众全线总进攻和国民党更加分崩离析。因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更加深入的关系，因为全世界国家与国家之间和阶级与阶级之间底矛盾空前紧张的关系，因为帝国主义尽力把危机痛苦结果转加在本国工人阶级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底劳苦群众身上的关系，特别因为中国有革命与战争的形势底关系，国际帝国主义者特别更加紧对中国全线总进攻。武装占领中国领土，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用新的军事借款的方法取得新的政治上和军事上底特权，实行商品廉价倾销（首先是日本的丝、纺织品；美国和坎拿大的麦子，美国的棉花，印度和安南的米等等在中国倾销），中国原料价格空前跌落和银价大跌——这一切就是帝国主义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更进一步进攻底全副锁链当中底各个主要连环。

当帝国主义这样加紧进攻关头，比从前任何时候更加明显地暴露出国民党政策底卖国辱国的性质。为的明显地证明国民党底卖国政策，我们可以举出所谓"怀柔协定"即所谓"中日妥协原则"作个例子，这个协定的内容有下列几点：

"（一）中国承认满洲国为独立国，前隶于中华民国之奉、吉、黑、热四省，即为满洲国领土。

（二）中、日、满为保证东亚和平，于必要时，日本得派遣舰队停泊中国沿海，日、满陆军得通过或防守中国察、绥两省境内，以防止中、日、满之共同敌人来侵，但必须事先通知中国。

（三）为复兴东亚经济于平定之途，中、日、满得互为经济的友好的提携，及内乱戡平的援助，而中国方面，尤须注意国内排货排满之制止。

（四）中、日、满正式协定，于中国认为可能时开始协定。中满国界之确定，于中、日、满正式协定之后，始会同确实划定之。中日满正式协定成立时，此原则即失效力。

（五）休战之协商及缓冲地带之划定，由中日军事当局于此原则成立之翌日实行之。"（见"中国论坛"一九三三年，九一八专号）

这样一个公开的卖国的协定，蒋介石、黄郛、上海总商会、胡适等还厚着脸皮说：中日停战协定只限于停止军事行动，决未牵及政治问题！并且他们还宣传说：北方协定是南京政府底外交成绩之一。无怪乎连大公报的社论也不能不对国民党底政策和言论加以下列八字的批评："好话说完，坏事做尽"！

在最近一年来，帝国主义对中国更进一步的进攻和国民党对帝国主义更进一步的投降底结果，首先就是使已经完全破产的国民经济和异常穷困的群众生活更加恶劣化。一九三三年的水灾，包括了全中国（从广东到东三省），产生了一万万灾民；一半以上的产业工人和手工工人处在严重的失业状况之下，而一切在业工人差不多每星期只能做三天或五天的工；民族工业和交通业更进一步的破产和非民族化，农村经济大破产——这一切事实已经足够说明国民党中国经济破产更加深入和扩大的情形了。

国民党统治的六、七年来，只是一个南京所谓"中央政府"便发行了十六万万元的国内公

债（在北洋军阀政府时代，十五年以内也不过发行了五万万到六万万元的国内公债）；在今年每省都发行了五百万到四千万元的省公债；每月南京政府要开支一千六百万到三千万元“剿共”军费；南京政府用公开贩卖鸦片的方法来增加税收，公开增加广大民众几十年来所誓死反对的盐税和米粮税来增加收入；——这一切事实，已经足够证明国民党政府财政破产的情形了。

国民党区域底经济状况，在最近这一时期破产得特别厉害底原因，同时也是由于蒋介石和其他刽子手对于中国内部十八省六分之一的面积底领土（就是对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底固定领土），实行严格的经济封锁。其实，这种经济封锁，实际上使非苏区的人民比苏区的人民感受到更大的痛苦。因为在苏维埃中国内，人民自己的苏维埃政权和共产党还采取许多恢复、振兴和发展农、工、商业底办法，使劳苦群众生活状况得到很多的便利和改良。而在国民党中国里，这样的事是没有的而且也不会有的。关于这一点，举一件事实，便可以显明地证明了。例如有些军阀已经不得不自己提议取消对苏区底经济封锁了。

正因为中国近来经济和政治状况发生这些变化，所以国民党在最近一年来也就更加表现崩溃和塌台。国民党更加崩溃和塌台，一方面表现在苏维埃革命更加胜利；另方面表现在那许多被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打倒了的军阀政客派别（例如安福系黄郛和北洋系军阀等），现在又公然出头来与国民党竞争着去替帝国主义效劳和榨取人民血汗了。同时，国民党内部更加分崩离析，更加证明这一点。如果国民党在其有史以来，无论什么时候都不是一个统一的政党，那末，现在国民党正式分成三个党了，就是蒋介石党（蓝衣社），胡汉民党（即所谓新国民党）以及所谓“农工党”。而在每一个党内，又分成许多小派，在每一个派内又分成许多小组织。在这些党与党，派与派，小组织与小组织之间，现在正在闹着严重的分离和纠纷。在最近的将来，在这些党与党之间和派与派之间，不可免地要发生武装冲突。正因为如此，所以过去这一年，同时也就是一切国民党附属组织和对国民党抱假的反对态度底那些党派崩溃的一年：在邓演达被蒋介石刽子手枪毙以后，所谓第三党或中国社会民主党更烟消云散了；托陈取消派在陈独秀、彭述之等被捕以后，尤其是在他们在法庭上公开揭穿自己反革命真面目以后，也崩溃到不成其为一个派别了；所谓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党，毫无疑问地也正在塌台（譬如在北平一处，就有一千多个国家主义青年党党员共同发表宣言声明脱党）。反革命的罗章龙派，早已在南京、上海和北方警察侦探机关当中“为三民主义效劳”去了。

此地应当指出一件事，就是近年来在中国反革命营垒当中发生的一件新现象——即是在中国开始发生了一种特殊的所谓“法西斯蒂”运动。这里问题的中心，当然不在于国民党采取法西斯蒂的方法来反对共产党和革命运动，也不在于国民党实行广大的民族的和社会的武断宣传，这一切都不是新的，这一切都是国民党从背叛革命那一天起一直到现在都应用的。而新的是在于：第一，在最近一年来，法西斯主义问题，不仅蒋介石蓝衣社所出版的各种专门宣传法西斯主义的报章和杂志上（例如：社会新闻、社会主义月刊、汗血、剿共半月刊、青年杂志等等）广大地吹嘘；而且差不多在一切法西斯蒂朋友和仇敌的刊物上，都不断地加以讨论；第二，新的就在于，在最近这一个时期形成了一个新的蒋介石的公开恐怖组织（蓝衣社），而其他的反革命派别（例如胡汉民派等等）在反对蒋介石的时候，已经挂起“反对法西斯蒂和拥护民主政治”的招牌了；第三，新的就在于，蒋介石等在最近这一时期，已经不是专在所谓孙文主义旗帜之下来笼络旧的军事干部和创造新的军事人材，而是更努力地打出希特勒主义的旗帜来企图笼络自己的干部和在兵士、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当中散布自己的

影响。

中国这种特殊的所谓“法西斯蒂”运动底主要来源，任何人都很明了的。这就是(一)国际的特别是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影响；(二)各国帝国主义者，都在企图经过自己底走狗来在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当中，创造下某种的社会基础，以便更加适于其准备和实行帝国主义战争（由此，国民党和非国民党底各个派别，大家互相谩骂对方是法西斯主义者，而同时他们之中每个派别，都更加明显地公开地采用法西斯蒂的方法和口号，都更加公开明白地出来拥护自己帝国主义后台老板底利益)；(三)革命势力底发展和反革命势力底崩溃。由此可见，中国这个特殊的所谓法西斯运动的目的是非常显然的。就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企图夺取那些非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成分，这些分子之中，许多人现在因为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不断对中国进攻，因为自己生活极端痛苦，所以抱一种绝望情绪；因此，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就企图把他们对国民党的仇恨变成对共产党的不满；把他们对帝国主义底愤恨变成对苏联底仇视。同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尤其想利用这些分子，作为反对苏维埃革命和一切进步运动底工具，以及在反革命营垒内部作相互火并的工具（例如在蒋介石蓝衣社所发表的暗杀的勾命单上，包括了各种各样的人物——从共产党领袖、著名作家、有名新闻记者，以至一切反蒋的军阀和政客都在内)。如果我们任何人都不怀疑，无论德国的、无论意大利的，无论其他国家的法西斯蒂，无论社会法西斯蒂在德国、波兰和其他国家玩弄什么“反对法西斯蒂和拥护德谟克拉西”底把戏，都绝不能挽救正在死亡的德国的、意大利的和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底命运；那末，对于任何人都更加相信，无论孙中山主义，无论蒋介石的特殊的所谓“希特勒主义”，无论胡汉民和农工党所玩弄些什么假的反法西斯主义的把戏，都丝毫不能挽救那已经被整个世界发展史和中国发展史宣布了死刑的帝国主义和中国地主资本家在中国统治的命运。虽然如此，绝不能象有些共产党员一样做出这样的结论，就是以为中国这种特殊的法西斯运动，对于共产党没有任何的意义。中国法西斯主义运动对于革命的危险，不仅在于它能够做到用比较更有组织些底恐怖行动来反对革命运动，而且还在于在中国现在条件之下，民族武断宣传很有夺取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可能。而这种危险目前特别含有实在性，因为我们党在最近一年来，的确有减弱在城市小资产阶级当中工作的趋势。

尽力地随时随地揭穿蒋介石的各种各样的法西斯蒂的手段和口号，是我们党目前紧急战斗任务之一。

从以上所讲的这一切东西看来，很明显地，在中国同时进行着革命，战争与武装干涉。中国事变底更向前发展，有使世界完全进入到革命与战争底第二个周期底可能。还是中国苏维埃革命决定意义的胜利，预制太平洋帝国主义大战和帝国主义在远东反苏联大战底爆发；还是帝国主义大战尤其是帝国主义反苏联战争在中国苏维埃革命决定意义胜利前爆发；——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决定，这个问题要靠斗争力量来决定。但是不管怎样，以中国苏维埃革命决定意义的胜利来制止在远东爆发世界大战底危险，是中国共产党最近的目的和最重要的最伟大的任务。全世界和全中国事变的发展，把中国革命底意义提高到为世界共产主义胜利而斗争底第一等重要的地位，除苏联以外，中国革命已经是世界革命中一个最主要的最有决定意义的成份了。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底唯一领袖

中国事变到底向那个方向发展呢？这首先就要看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底唯一领袖

——的政策、策略、工作和斗争如何而决定。

我们完全有权利说，过去这一年是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底一年。苏维埃中国和非苏维埃中国内底革命运动，在最近这个时期，所以能得到许多胜利和成绩，就是因为我们党有正确的政治路线，有战斗力强的策略，有毫不疲倦的工作和勇敢牺牲的斗争；就是因为我党中央坚决执行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的总路线。

一　什么地方具体表现出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期更加布尔塞维克化呢

（甲）"对共产国际总路线百分之百的忠实"

中央更加布尔塞维克化底首先的具体表现，就是中共中央不怕一切困难，不顾任何复杂，坚决不移地执行在共产国际领导下的四中全会（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开的）所决定的总的政治路线，以求达到预定的目的。什么是我们革命在这个阶段上的总的政治路线呢？我们现在的总的政治路线就是：尽力和及时地把苏维埃中国和非苏区的革命群众运动，在无产阶级统一领导之下联系和配合起来，以便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和一切军阀官僚底统治，并在全中国建立起工农民主专政底苏维埃政权。

同时，我们党在中央领导之下，不只是规定了这个正确的总政治路线，而且能根据这个路线，具体地把最合乎中国革命运动每个时期条件底那些政治任务和策略任务提到计划的第一位。从四中全会到"九一八"东三省事变以及苏维埃中央政府未成立以前，我们这个路线曾经具体化为两位一体的任务：就是一方面，创造和巩固真正的铁的红军，成立临时中央苏维埃政府和巩固革命根据地；另方面，在国民党区域广大的开展群众革命斗争——首先就是工人的罢工斗争。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和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以后，我们这个总路线就具体化成下列三位一体的口号：(一)以武装人民的民族革命战争去反对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以保障中国的民族独立，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二)推翻卖国辱国的国民党政府，是顺利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底条件；(三)只有苏维埃政府和红军能够彻底进行和领导反对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底民族革命战争，以取得中国民族的完全解放。

根据这些基本口号的观点，我们党提出更加巩固红军，发展苏维埃区域和广大开展反帝和反国民党的群众革命斗争等任务。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对中共提出的六个任务，事实上不过是上述这些基本口号更加具体化和显明化而已。在执行总路线和这些根本策略口号的过程中，我们党遇到过而且正在遇着许多非常多的巨大困难和复杂问题，特别是在最近两年中。大规模的五次围剿和马上随之而来的严重的六次围剿，以及帝国主义对苏维埃中国所实行的日益公开露骨的武装干涉——这一切已经足够说明我们的困难和复杂性了。

然而，我们党在中央领导之下，不怕这一切困难和复杂性，坚定不移地执行自己的总政治路线——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的路线。这一点不仅是革命运动胜利的根本原因，而且也是使我们党和党的领导更加布尔塞维克化底主要条件。

这一点对于像我们党这样的党更特别重要，因为在四中全会以前，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不止一次发生过这类现象，就是一部分党的领导人物不去执行国际路线，反而曲解、修改以及公然离开国际路线，结果使他们自己坠入到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泥坑中去而莫能自拔（如一九二七年武汉时期中的陈独秀机会主义，一九二七年底和一九二八年初的瞿秋白

盲动主义，一九三〇年夏秋之际的李立三路线），同时，使党和革命也受到了不小的损害。

现在，根据四中全会后新政治局领导的实际例证，每个共产党员，每个工人和每个劳动者一天一天地更加相信了：中共四中全会所提出的“对共产国际路线百分之百的忠实”这个口号，是使党更加布尔塞维克化和苏维埃革命更加胜利的唯一道路和保证。

（乙）策略战斗性和灵活性底加强

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第二点的具体表现，就是我们党在中央领导之下，不只是能够规定和提出这些基本的策略任务和口号，而且会根据这些口号采取和实行那些具体的、灵活的和出奇制胜的策略办法，以便保证我们总路线和基本策略任务底实现。

为的明白地证明一年来我们在这类具体策略办法方面底进步，可以举出下列几个问题作例子：

（1）在胜利地打败国民党大规模围剿，更加巩固和扩大红军以及统一和发展苏维埃领域问题方面——我在开始时已经说过了，我们在苏维埃中国得到了新的大胜利。同时，你们大家都知道，这些胜利之所以能够得到，都是由于我们党正确领导底结果。现在就要问一问：在过去这一年来，在我们党中央所采取的那些为争取苏维埃革命更加胜利底策略办法之中，有那些办法是最主要的和最值得学习的东西呢？在我们看来，有下列三点：

第一点——形成、巩固和发展苏维埃的国家性——在这个问题当中的最困难和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经济政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中国革命发展现在阶段上底经济政策，应该是工农民主专政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换句话说，就是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和使中国走上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底过渡时期底经济政策。但是，因为现时苏维埃中国底领土散漫和经济落后，以及长期不断战争环境底关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实行其经济政策底过程中，不能不遇到许多补充的困难和复杂性。因此，虽然在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已经通过了关于经济政策底各种根本原则和法令；但是，对于这个问题有许多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还是弄不清楚。于是，在苏区里，时常在许多党的、苏维埃的和职工会的工作人员当中，对于经济政策犯着时“左”时右的错误。而正因为如此，党中央在最近这个时期，就特别更加严重地在理论上和实际上研究经济政策问题。中央给了全党以清楚明白的理论方针，中央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经济政策底根本思想出发点，应该以下列各点为根据：（一）中国现在阶段革命底性质，即是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二）苏维埃共和国底实际情形，即是不断的长期的国内战争，现在领土底经济落后和不统一等情形；（三）革命底前途，即是为将来社会主义道路发展而斗争。

除了理论和原则指示之外，中央还对于经济政策实行方面作了许多的补充和确定，以便恢复、振兴和发展农、工、商业，并尽量利用当地所有一切可能的富源。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在苏维埃中国经济状况上得到许多好结果。正因为在苏维埃中国有了正确的经济政策，我们才能保证了红军的给养，才能改善了工农生活状况，才能引起红军战士和广大劳苦群众在反对国民党军队和拥护苏维埃政权斗争中，表现出惊人的英勇热烈情绪和牺牲精神。正因为有了正确的经济政策，我们才能保证了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战斗联合，只有这个巩固的联合能保证我们的胜利。正因为有了正确的经济政策，我们才能明白地在实际上显示出苏维埃中国和非苏维埃区域之间底状况根本不同，才能引起非苏维埃区域广大劳苦群众——首先就是上海、武汉、香港、广州、厦门、福州、重庆、成都、天津、哈尔滨等大城市的工

人群众，对于共产党、苏维埃、红军热烈深切的同情和赞助，才能动员他们的战斗力量去为拥护中国苏维埃，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围剿和为苏维埃革命在全国胜利而斗争。

第二点——更加巩固和扩大红军并提高其战斗力——为的达到这个目的，党在中央领导之下，在过去一年中曾采取了下列的办法：坚决实行苏维埃政府所颁布的优待红军条例（首先就是动员群众替红军战斗员及其家属种田收谷，邮政、交通对红军战士一概免费等等）；改良动员群众加入红军和扩大红军的办法；加强红军中工人和雇农的骨干及共产党的领导；由好的共产党员、少共团员、工人、雇农和贫农成份组织红军模范师和模范军；根据新的大规模战争的条件，将红军编制加以适当的改组；巩固和扩大各种军事学校以培养大批新的军事干部（例如，只在中央苏区中央军事学校内，最近一年来便有两期学生毕业，每期约一千五百人）；最后，加紧配合和联系正式红军队伍与其他群众武装队伍（武装的赤色游击队、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等）及没有武装而直接参加前后方战事工作底群众组织（交通队、探报队、看护队、慰劳队、担架队、运输队、洗衣队、补衣队等等）之间底行动。在苏维埃中国内，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每个劳动者都坚决地执行自己的战斗任务，连每个妇女和小孩都起战斗作用。妇女在红军反对国民党军事围剿底斗争中有极大的作用；其作用绝不限于在看护伤病战士和替红军洗衣、补衣等方面帮助，而且是直接参加作战行动。譬如举这样一个活的例子吧：

"红军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女士在红军离通、南、巴北上时，率农妇赤卫队五百余人，保护负伤官兵三百余人，驻于苦树坝附近。有田颂尧部一团，由小路袭去；张率农妇应战，敌军官长发现红旗，见前面山头有缠红布之农妇，即下令'八百米达发现敌人，各放'！士兵不发一弹，山谷中口号大震：'欢迎！革命的士兵兄弟到红军中来'！'红军是打日本的先锋'！'……'官长下令'快放'，'齐放'，但士兵仍不动。及团长率同马弁（即卫队）到来，以手机关枪督战，不前进者即用机关枪扫射。此时士兵大哗，其中有一下士向团长大声质问：'老子们打了十几年仗，从未见过保国卫民的军队，放着东洋人帝国主义不打，打自家人，还要同堂客（四川呼女人为堂客）两个打仗！真岂有此理'！官长立即枪毙发言士兵。不料突来一片'打死反动长官到红军中去'的呼声，一时大乱，团长亦被绑，营长以上者无一人幸免。五百农妇缴一团白军的事件，已传遍全川（报纸亦略有登载）"（见"中国论坛"一九三三年第二卷第九期，登载的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五日成都蜀笑通讯）。

关于青年和少共作用，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少共），在一九三二年下半年和蒋介石军队作战当中，有一次在战胜之后检点俘虏时，他发现了其中没有将领和高级军官。他询问俘虏士兵，才知道将领和上级军官在前一天晚上就带着六十个卫队逃走了。于是他立即翻身上马，率同骑兵连追纵赶去，经过二十四小时的奔驰，他终于将逃将赵冠英和其他上级军官及卫队全数活捉回来。因此，现在在红四方面军有一首军歌中，有这样一句话："英雄陈昌浩，活捉赵冠英"（鼓掌）。

关于我们党善于组织群众帮助和拥护红军，以及人民对于蒋介石和国民党已深恶痛绝这些事情，就连蒋介石也不能不公开承认的。蒋介石与日本"中央公论"杂志记者谈话时曾公开说：

"地方人民，良莠甚难区别。正式赤军外，又有步队，游击队，即所谓农民游击队。此等游击队之编成，系于共产军占领某地后，即由共产军强制（?!）被占地域之住民与强健之农人编制为队，应客观事实之需要，群起作游击战争，扰乱讨伐军后方，或袭击讨伐军之输送

部队。其他如侦探，谋叛，掩蔽正式赤军之所在，均各尽其能，各致其用。平常时期，彼辈从事耕作，迫至必要时期，即全副武装为共产军队尽力。故无论任何良民，政府军队均不能不严为防范。最近政府军队数师复灭，师长阵亡达二人者，实皆因此种游击部队，群起与共产军前后呼应，有以使然。再则游击队与良民无所辨别，因之军队出动讨伐，辄不禁起草木皆兵之感。即在未加入共产之良民区域，军队亦觉非杀尽良民，无从安心。杀时苟为游击队，自亦无可訾议。惟区别孰为游击队中人，孰非游击队中人，甚属困难，有此困难，于是讨伐上遂引起困难之结果。即：(一)粮秣给养杂役之补给，陷入不可能状态；(二)匪区附近一带之良民，深恐讨伐军到达，泾渭不分，玉石俱焚，因之良民区域，渐为赤色浸润……”。

蒋介石这个自供当然是不得已的，但是他的这个自供是很有价值的。因为在他这个短短自供中，他无形中把他和托洛茨基派对共产党和红军底侮蔑造谣完全打得粉碎了。蒋介石和托洛茨基派不是经常侮骂红军为“杀人放火”的“赤匪”吗？现在，蒋介石在全世界面前不能不公开自供说：在苏区和邻近苏区干见人便杀遇屋即烧的勾当的，只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

第三点——有系统地和及时地用联共经验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胜利来推进中国苏维埃革命——红军冲破五次围剿底主要原因之一，便是苏联五年计划四年完成和斯大林同志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总结报告的发表。我们党曾广大地在群众中宣传斯大林同志在今年一月联共中监联席会议上底报告，——特别是报告中直接有关于中国问题的部分。例如，当斯大林同志讲到把工业化计划丢在末位的危害时，他直接说：“那时候，我们的情形就会与现在中国的情形多少相像，中国没有自己的重工业，没有自己的军事工业，于是现在只要不是懒汉，什么人都去欺压它”。我们党应用斯大林同志所说的这些话和苏联五年计划胜利的事实，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坚决的明确地宣称：只有中国布尔塞维克和在其领导之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才能把中国从没有重工业、没有军事工业、没有国防设备，成为外敌经常军事袭击对象这样的国家，变成有自己的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有国防设备和能够抵抗一切外敌侵略底国家。只有中国布尔塞维克和在其领导之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才能把中国从经济上落后，政治上不独立和殖民地地位这样的国家，变成经济发展和政治独立自主的国家。只有中国布尔塞维克和在其领导之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才能把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中，经常不断而且年甚一年地发生水灾、旱灾、虫灾、饥荒、失业，公开贩卖和吸食鸦片，屠杀和苦死千百万人民，变成那样的一个国家，在那个国家中，人民经济突飞猛进地发展，没有饥荒，没有失业，完全消灭了麻醉人民的毒剂——鸦片，全体人民都过幸福的生活，并要建设没有阶级的、完全没有人剥削人、完全没有人压迫人的、光明的幸福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就像现在在苏联在布尔塞维克党领导之下所作的一切那一样。这种宣传和鼓动工作，曾把我们党、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底威信提到空前未有过的原则上的高度，同时就取得了极广大民众对我们的热烈同情和赞助。这件事情又一次地在事实上证明全世界无产阶级领袖斯大林同志断言的正确：“五年计划底国际革命意义简直是不可限量的”(见其在一九三三年一月联共中监联席会议上底报告)。

我更用不着说，应用联共的革命竞赛和突击运动等经验，曾经给了我们党在苏区和非苏区底党和群众工作以极多好结果；我也用不着说，在全苏联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召集以后，我们党马上在中央苏区召集了江西八县的第一次贫农团代表大会，这一代表大会在深入反地主残余和反富农斗争方面，以及在动员农民加入红军方面，都收到了极大的效

果等等(例如，代表大会曾决定在三个月内动员八万人加入红军)。

我们党在中央领导之下，在苏维埃中国所作底一切——特别是最近几年来所作底一切，已经有伟大的全世界历史意义了。我们党在中央领导之下，在实际上证明了列宁和共产国际思想底绝对正确——证明苏维埃政权是世界制度。我们党在实际上证明了，苏维埃政权不仅适合于资本主义国家革命底需要，而且能适合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革命底需要。我们党在实际上证明了，苏维埃不仅是无产阶级专政底唯一国家形式，而且也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底工农民主专政的国家形式，同时，它并能保证这个专政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此外，我们党在中央领导之下，用自己的实际经验更加充实了列宁关于临时革命政府、革命军和创造革命根据地（那怕最初在很小地域以内）有极大意义和作用底理论方针。我们党在发展苏维埃革命事业中所积蓄的经验，不仅已经成为我们中共的最有价值的收获，不仅已经成为安南、印度、高丽、台湾、古巴、爪哇和整个殖民地半殖民地民众解放斗争底模范，而且已经成为值得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员——首先就是日本、西班牙等国的共产党员努力学习底教训。

（2）在揭穿国民党是卖国党，和证实苏维埃政府是英勇的武装民族自卫底政府，这个问题方面——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东三省以来，以民族武装自卫去抵抗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问题，成为现代中国一切政治问题底核心。谁在这个问题上得到胜利，谁就成为中国的主人翁。但是，关于这一点不仅我们懂得，而且我们的敌人——蒋介石和其国民党也懂得。正因为如此，所以国民党无论怎样再三地不断地作下降日卖国底勾当，但随时随地却用尽一切手腕和武断欺骗与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作绝望的斗争。我们党在中央领导之下，是否会揭穿国民党在这个问题上底各种欺骗手腕和武断宣传，而使群众相信我们党的口号底正确呢？我们可以回答说，在基本上我们是作到了的。

如果想把最近两年来，我们在这一方面底斗争作一个概括的总结，那么，大概可以分作下列几个时期：

第一时期——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东三省事变至一九三二年初上海战争前夜止。在这个时期中，国民党的主要欺骗口号，一方面是散布南京政府准备对日宣战底空气，使民众幻想和要求国民党对日宣战；另方面是高唱“静候美国主持公道”和“静待国联制裁暴日”。

我们党是怎样揭穿国民党这些骗人把戏呢？为的揭破国民党这副假面具，我们党在中央领导之下，绝不限于提出和宣传我们总的策略口号——“以武装人民进行反对日本和其它帝国主义底民族革命战争”，或者“人民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党在实际上组织了各种各式的群众反日运动——罢工、露天大会、示威、扩大组织反日义勇军，由群众向国民党要求立刻发给反日义勇军枪械，立刻出兵收复失地等等。结果，逼得蒋介石和国民党在自己实际行动中把自己的假面具揭穿了（国民党在上海、南京、广州等处枪杀反日工人、学生和市民，公开禁止一切反日运动和公开禁止主张对日宣战等等）。

第二时期——从上海战争至一九三三年一月日本占领山海关之时止。在这个时期当中，国民党的主要欺骗口号是：“上海战争失败是因为红军捣乱后方”，因此，“抗日剿共必须并重”，但“对外必先对内”。

我们党怎样揭穿国民党这些骗人把戏呢？为的揭破国民党这副假面具，我们党在中央领导之下作了很多的事情：不仅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努力帮助参加上海防卫战的工人和十九路军兵士；同时，党更积极地参加了英勇上海防卫战底一切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行动；中央苏维埃

政府还在一九三二年初便公开对日宣战，同时，并发表了动员红军和民众积极准备对日作战底专门训令；党和苏维埃政府组织了广大民众反对上海停战协定和李顿报告书；党制定了对各种形式的反日游击队伍建立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底策略，并且把这个策略在东三省、热河各地实际应用起来，以便广大开展反日游击战争；特别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就是当日本进攻山海关时，中央苏维埃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发表的告全国人民和军队的宣言，在这个宣言上，苏维埃政府和红军表示出他们要武装抗日底诚恳热望和积极准备，他们公开宣言愿在最简单条件之下（一、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给人民以最低限度的民主权利——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示威等自由；三、允许人民自由地广大组织和武装反日义勇军）与任何军队订立共同武装抗日底战斗协定。结果，使蒋介石和国民党被逼迫得自动地公开地揭破自己的假面具。蒋介石公开对军队和民众下令说："在共匪未肃清以前，绝对不得言抗日，有敢言抗日者，定严惩不贷"，这样一来，蒋介石和国民党又不能不在广大民众面前暴露出自己降日卖国的鬼脸。

第三时期——从蒋介石公开发表禁谈抗日的禁令之日（今年四月底和五月初）至现在。在这个时期，蒋介石和国民党公开宣言停止抗日，其借口是说中国太贫太弱，目前没有抗日的可能。我们党怎样揭穿国民党这种骗人鬼话呢？我们党在中央领导之下，为的用自己的革命政策来显然对抗蒋介石这种公开降日卖国政策，主要地采取了下列的步骤：苏维埃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在蒋介石发表禁谈抗日命令的第二天，马上发表告红军和民众书，号召组织一百万红军，以便对日作战；同时，号召一切军队和民众不顾蒋介石的禁令而自动起来与红军一起去武装反抗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党坚决地拥护革命反日民众团体提出来的组织民族革命战争的具体纲领，这个纲领之中的要求是非常简单明了的，但是真正能够组织民众武装抗日的，这个纲领是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最广大民众所能够了解和接受的。纲领中心内容是：(一)全体民众总动员起来参加抗日战争的前方和后方工作；(二)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到前线去对日作战；(三)把国内一切兵工厂、军械局、火药库内的枪炮子弹和从外国购买来的军械拿来使全民总武装；(四)具体解决抗日军费问题底办法——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一切银行、铁路、航业、矿山、工厂、作坊和商品，停付日债一切本息，没收一切卖国贼财产，征收统一所得累进税，在本国和外国（首先是华侨）当中募捐……等等；(五)建立人民武装抗日底总领导机关（如"中华全国人民武装抗日自救会"）等等要求。此外，我们党普遍地在民众间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革命战争底革命性、进步性、现实性和胜利可能性底理论，广大的阐明俄国布尔塞维克胜利地打退了十四个资本主义国家武装干涉底经验，英勇上海防卫战底经验，东三省反日游击战争底经验，红军反对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屡次围剿底经验等等，以便尽力在实际上证明：在现时国内和国际环境之下，中国武装人民底反日民族革命战争，不仅有组织和实现的可能，而且其胜利有可能性与现实性。

正因为我们党在中央领导之下，进行了这样长期的、系统的、灵活的理论上和实际上的斗争，我们才能逐渐地揭破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一切欺骗和把戏，才能使群众在自己的亲身政治经验中来信服我党口号底正确。正因为如此，我们党才能一步一步地把我们党的口号——"推翻国民党是顺利的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底条件"，"只有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是彻底实行民族革命战争底战士"等——变成广大民众的口号。正因为我们党进行了这种毫不倦息的艰苦斗争，来组织反对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底民族革命战争，所以东三省、热河、福建和全中国，民众才越来越多地团结在我们党、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底周围，把他们认作是唯一能真正领导

神圣的反日民族解放战争底政党、政府和军队。

此外，必须指出，除上述这些主要成绩之外，我们党在这个时期，在策略方面，在群众工作方面，还得到有其他许多的进步——首先就是在组织、准备和实行工人群众的罢工斗争中，在企业内建立工人战斗的统一战线底工作中，以及在黄色工会内部工作中底进步。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康生同志将要讲到的。也正因为有了这种进步，所以才能使我们党在赤色工会和在黄色工会方面底工作达到了初步的转变。

（丙）组织上更加巩固和发展

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第三点底具体表现，就是其组织上底更加巩固和增长。党员在最近这一年从三十万人增加到四十一万〇六百人。而且不仅在苏维埃中国增加了，同样在非苏区有很大的发展。在去年共产国际执委十二次全会时，我们在非苏区实际上不过有三万党员，而且因为严重白色恐怖的关系，差不多其中有一半不能与党经常发生联系。现在非苏区里有统计的已经有六万以上党员了，而且其中有一半以上已能够经常交党费和在党组织内工作了。在党员质量方面，也有相当的改善，工人党员成份以前在全党中平均占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现在已占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了。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底具体性和生动性，对企业中支部工作底注意力，都比前此改善和加强了。许多地方党部和群众组织底独立工作能力和自动性增长了。党报作用加强了，党报质量相当改善了，在非苏区和苏区底党报份数都增多了。引进了许多新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干部政治的和理论的水平以及工作积极性都提高了。在理论上和实际上底无情的两条战线上斗争和自上而下及自下而上底自我批评。——这一切就是说明我们党更加巩固和增长底主要事实。最后，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不管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和其各种走狗们，以及党内个别机会主义分子们，对我们党和党的领导——特别是对党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作下如何卑鄙龌龊的造谣、侮蔑、谩骂和阴谋诡计，不管他们如何狂吠中国共产党底分裂和没落，中共代表团在共产国际执委这个全会上，完全有权利高兴地向一切兄弟党说：我们党在其布尔塞维克中央领导之下，现在达到了在其十三年存在底历史当中空前未有过的统一、团结和一致（鼓掌）。这一点也就是我们党和革命在最近这个时期能得到胜利底根本基础。中国共产党现在是联共以外，在全世界上第二个胜利地领导苏维埃国家和工农红军底共产党了。

这当然绝对不是说，在最近这个期间，在中共内已经没有个别工作人员犯过这样或那样"左"的或右的机会主义错误了。如果像在我们党这样一个大的群众的政党内，在这样非常复杂和困难环境之下工作的党内，没有一些工作人员犯过个别问题的错误，那简直是一件怪事了。我们大家都记得，中共在其中央领导之下，在最近这个时期，经常进行了而且进行着锐利的两条战线上底斗争。党在中央领导之下，首先坚决反对目前阶段上底主要危险——右倾倾向，这个倾向主要表现在，党内一部分分子，对于国民党军事围剿和日渐逼近的帝国主义对苏维埃革命底公开武装干涉，表示悲观失望和消极的情绪和观点。同时，党在中央领导之下，同样坚决地反对个别领导同志的"左"倾情绪，例如有个别领导同志还在五次围剿时，便把国民党估计成为"死尸"等等。

中央帮助苏区中央局反对一部分工作人员在苏区各种重要问题上底各种不正确倾向：在职工劳动问题上，——反对那种表面上"左"的，实际上是对于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底孟塞维克式了解底倾向，这种倾向具体表现在，把个别工人阶层的局部和经济的利益与整个工人

阶级的根本政治利益对立起来，这种倾向底具体表现，就是有些个别工作人员，有时不顾苏区军事环境和经济状况，提出一些不仅不能办到而且甚至有害的要求（例如要求雇主不用苏维埃纸币而用现洋发工资等等），这些分子用以掩盖自己错误的是一些“左”的词句，例如什么“在苏区工人斗争的形式应当与国民党区域没有什么分别”等。同时，反对在这个问题上底另一种态度，就是有些工作人员在军事环境和经济困难借口之下，完全否认有改善工人群众物质状况可能，并且否认赤色工会应尽保护工人日常切身利益的作用。在土地农民问题上——首先反对右倾倾向，这种倾向的具体表现，就是不顾基本农民要求和情绪，延缓或阻碍实行平分土地，同时，反对另一种表面上好像“左”的，实际非常有害的倾向，就是有些地方时常不断地（甚至一年三——四次）重新平分那些已经由基本农民群众分配过了底土地。在军事问题上——一方面，反对那种对于国民党军事围剿抱悲观失望的态度，反对那种经常提议红军采取防御策略，甚至要求正式红军分散成为零星的小的游击队伍，以及完全否认和巩固根据地底可能必要等这类错误观点；另一方面，反对那种“左”的、冒险的倾向，其具体表现，就是完全否认有暂时地部分地军事策略上的退却底可能和必要（例如，为避免和敌人过大力量底作战；或者为避免在不利的地理条件之下应战；或者为的抽出时间准备和找到好的机会再作进攻等等），就是对于保存红军实力有第一等重要意义这一点估计得不足或根本不了解，机械地了解巩固根据地任务，甚至以为可以牺牲大量红军力量去达到这一目的。

中央同样领导非苏区党部在党和群众工作各方面进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例如：在工会工作中——反对个别党员和工作人员这样一种不正确的右的倾向，其具体表现，就是以为我们党和赤色工会独立地组织和领导工人罢工是不可能的，以为工人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尤其是反日反帝斗争联系是不可能的，或者以为赤色工会底向前发展和变为广大的群众组织是很少希望的；同时，反对“左”的狭隘的关门倾向，其主要表现，就是不了解建立和巩固一切工人在反对资本家和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统一战线底必要，不了解加紧在黄色工会中工作和在其内部建立赤色反对派组织底必要，以及机械地把党的基本政治要求与工人部分的经济口号混淆起来。

在反帝的民族革命斗争中——中央在全国——特别是在东三省和北方进行坚决的斗争，首先就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观点，这些分子不相信广大民众反对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底民族革命战争有实行和胜利底可能。同时，反对另一部分人的有害倾向，那些人不了解、不愿意和不善于根据各地各个时候底具体条件，来建立和巩固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底一切反帝力量底统一战线。

在农民和士兵群众中底革命工作方面——中央领导地方党部反对以为北方和西北根本没有武装行动，或者没有夺取暴动胜利可能底这种右倾观点，同时，反对有些地方党部把农民或士兵武装行动当作儿戏，没有相当的足够的准备，便实行武装行动等冒险盲动的倾向。

中央领导全党在苏区和非苏区无情地反对那些破坏党的铁的纪律、破坏秘密工作条例等坏倾向，反对任何人的任何派别倾向底企图。

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在理论上和实际上进行毫不留情的两条战线斗争底基础上，更加巩固和增长起来了。中国共产党已经增长成为真正列宁主义的、真正布尔塞维克的党了。

(二)我们的错误和弱点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现在我们要问，除上述的这些成绩之外，在最近一年来，我们党的工作当中有没有错误

和弱点，主观力量比较起客观形势来相对落后的现象，是否已经完全克服了呢？

在非苏维埃中国党和群众工作中的错误和弱点是很多的，而且并不是不重要的，他们主要表现在下列各点：——

直到现在，还不能保证在广大发展的反帝运动当中有组织的无产阶级骨干，其原因是由于我们党和工会在许多重要城市和中心地方（武汉、广州、九江等）底工作和组织太薄弱，特别是在国民党和黄色工会工人群众中的工作太薄弱；在这样严重的革命和战争的环境当中，许多地方党部在敌人武力当中，还没有经常的和系统的工作，这简直是不可允许的弱点和错误；在广大农民和贫民群众当中，只做了很少的工作；对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群众斗争，抱着忽视的态度；对于在劳动妇女和青年当中的工作和意义估计得不够；最后，为秘密工作最基本原则而斗争和反奸细斗争都作得不够。

在苏维埃中国，我们在党、苏维埃和群众工作中，也发现了自己的许多弱点和错误，其中最重要的有下列各点：

许多党和苏维埃组织对于在中农当中的工作注意得不够，而且有时候对中农的关系不正确(首先就是左倾幼稚的态度)，党和苏维埃组织相互间，党、苏维埃和群众组织相互间，时常没有足够的正确的关系(或者相互混合，或者互相代替，或者互不相关等等)；有一部分共产党员对于反对反革命组织及其活动底斗争和警惕性有减弱的倾向等等。

虽然党和革命运动有了很大的成绩，然而把主观力量和客观形势的需要及可能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到主观比客观相对落后的现象，毫无疑问仍然是存在着的。中国现在的客观环境已经是这样：假若我们的党更加紧工作，我们完全有可能把那些誓死不愿当亡国奴，誓死为抗日救国而奋斗的那些忠实的“民族武装自卫者”（或者所谓“爱国志士”)夺取到我们方面来；同时，我们也完全有可能把那些贫民、失业工人和饥寒交迫的劳动者，夺取到我们方面来；我们有完全的可能把他们变成为民族解放、为米粮、为土地、为工作、为房屋而斗争的积极战士，把他们实际上变成为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统治而斗争底英勇战士；同时，就使他们变成为苏维埃革命在全中国胜利而战底生力军。而这类忠实的反帝战士，这类无衣、无食、无住的劳苦群众，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和东三省各地，事实上不只是几百万，也不只是几千万。但是，直接在我们党组织的领导之下，而进行革命斗争的，还不过其中的一部分而已。在这种意义之下，我们得到的成绩与客观环境的需要和可能性比较起来，其落后性依然是很大的。为消灭这个落后现象而斗争，是中共最近的战斗任务。

第三章　中国苏维埃革命最近的前途和困难与中共和兄弟党底任务

一　中国苏维埃革命最近的前途和困难

现在国际和国内一般状况，毫无疑问地比前此任何时候都更加便利于中国苏维埃革命底发展和胜利。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在最近将来有两种可能的前途：或者是中国苏维埃革命底决定意义的胜利，预制太平洋上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和帝国主义者进攻苏联战争底爆发，或者是帝国主义大战——首先就是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者进攻苏联战争，在中国苏维埃革命还

未得到决定意义的胜利之前就爆发起来。关于反苏联战争很快到来的可能，关于这个战争在每分钟都有爆发的可能，在日本帝国主义在东三省，在中东路上不断的公开的挑衅和阴谋，在外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远东边界上实行军事试探的行动，就可以明白看出了。但是，无论在这种或那种情形之下，我们中国共产党认定我们底主要任务只有一个：就是为苏维埃革命在全中国得到决定意义的胜利而斗争。或者用莫洛托夫同志的话来说，就是："完全打溃敌人和使红军胜利"。据我们的意见，莫洛托夫同志这句话不仅合乎联共在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任务，而且也合乎中国共产党在最近将来的主要任务。

然而不管一般的环境是如何顺利，但是必须严重地估计到这一点，就是中国苏维埃革命在其向前发展和争取决定意义胜利的道路上，将遇到不会比现在小，而是更大些和更多些的，国际的和国内的困难和复杂性。不过从这些困难和复杂性的本身性质看来，他们主要的都是我们运动向前发展中的困难和复杂性，而且其中没有一个是不能克服或不能战胜的。同时，因为世界范围内和中国内部事变向前发展的关系，所有这一切的困难和复杂性，——至少是其中许多的和并非不重要的困难和复杂，完全有可能不仅逐渐地而且是突变地成为容易战胜和克服的东西。

中国革命的根本敌人是一切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这就是我们的根本困难。虽然中国离欧美帝国主义中心较远，但是，中国在海陆双方和这样一个强盗的、专依劫掠为生的封建资产阶级君主制度的明治、荒木底日本帝国主义毗连着。这个凶悍的强盗，已经用武力把中国整个活的肌体上割去了东三省、热河和察哈尔，这个暴徒时时都准备着更进一步的向中国人民进攻，这个贪婪无厌的野兽，可以从本国和殖民地在最短时间内，派遣大批的海陆空军到中国底一切腹地。中国底一切主要经济命脉，都早已掌握在帝国主义底手里。中国的主要城市和江海口岸，早已实际上被帝国主义武装占领了。帝国主义公开地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时期一天一天地快要到来了。

中国苏维埃革命向前胜利底第二个主要困难，就是我们国家底经济上和军事技术上的落后。从这两个主要的困难就产生了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的弱点，虽然这种不平衡在最近年来，已经有逐渐减少的趋向，然而直到现在它仍然是苏维埃革命发展当中底主要弱点之一。

此外，一方面，现在苏维埃领土底经济落后和不统一，以及红军在军事技术方面的缺点；另方面，我们党在非苏维埃中国，首先是许多大的中心城市和东三省当中，党和群众工作底薄弱，以及我们在敌人基本军队中工作底不够等，就形成了我们的补充的困难。

用一切方法，首先就是加紧动员和组织苏维埃中国和非苏维埃区域几千万以至几万万劳苦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在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底旗帜之下，为有饭吃、为得到土地、为民族独立而进行广大的革命斗争——这就是战胜一切困难和复杂性及夺取苏维埃革命决定意义的胜利底最可靠的和最正确的办法。

二　新任务、新条件之下要用新的方法做工作

为的巩固革命既得胜利和实际上创造争取苏维埃革命决定意义的胜利底前提，中央向全党提出下列最近的任务：一、动员一切力量冲破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第六次围剿，更加用一切方法巩固和扩大红军，巩固和扩大苏维埃底国家性，加紧为更加巩固和扩大苏维埃领土而斗争；尽最大可能在国民党中国去发展和领导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群众运动，在这个运动当中，要创造无产阶级的骨干，以便保证无产阶级取得和巩固领导权，广大地开展在黄色工

会和国民党工会工人以及无组织工人中的工作，夺取他们到我们方面来，以便把赤色工会变成广大群众的组织，加紧组织和领导中国无产阶级底罢工运动；用一切方法发展反日的群众游击运动（特别在东三省和北方）并夺取这个运动的领导；坚决地作夺取士兵群众底工作，并提高党在国民党中国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群众斗争中底作用；最后，更加紧巩固和发展党，首先就是使党员成份和领导机关成份工人化，教育和引进成千成万的新干部，在这些原来没有我们党的地方，或者有，但是很薄弱的地方，去建立强固的和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地方党部，在军事工业和交通工业当中，建立强有力的党的组织，加紧反奸细的无情斗争，加紧为保证秘密工作和铁的纪律底斗争，更加开展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为理论纯一性，组织统一性和团结性，为反对各种各样离开共产国际和党的总路线底机会主义倾向而斗争，特别是为反对目前主要危险底右倾倾向而斗争。

有些人猛然看起来，或许会以为这些任务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同志们！这种观点完全是不对的。那一个要看不出这些任务当中的新东西，他就犯了这样的错误，就是他不从实质上，不从真正内容上，而从形式上，从名词上来了解问题。其实，时常同样的名词所说明的任务，应当随具体环境来作不同的了解和实行。举几个例子来看：

第一个例子，关于在苏维埃中国形成、巩固和发展苏维埃国家性底任务，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提出的。但是，如果在苏维埃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前，我们对这个任务底了解和执行，就是成立临时中央革命政府和制定及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各种基本法令和条例；而在中央政府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新式国家在中国形成后，我们对于这个任务底了解和执行，就是把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法令和条例具体化起来，并且根据新的具体环境将它们加以补充和校正，以便在实际中逐步实行；那么，我们现在能否像前此一样去了解和执行这个任务呢？谁都会回答说：不能。现在我们对于这一任务底了解和执行，应当比较有更高的程度，应当比较有更具体的形式。例如，更加开展经济上和文化上底建设，更加发展和肯定赋税制度和国家预算决算制度，更加严格注意各级苏维埃底选举、改造和召回代表权底实行，更加改良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局底工作，更多地尊重革命法律等等。

第二个例子，关于开展反帝运动底任务，我们时时都说的。但是能否无论什么时候对这个任务作同样了解和执行呢？譬如说，在九一八事变以前和以后，特别是在现在，一方面，蒋介石和整个国民党已经在事实上和言论上完全暴露出卖国贼真面目；另方面，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更加紧向中国进攻，以便完全瓜分中国；我们能否说现在反帝任务与前两年所说的反帝任务作同样了解和执行呢？谁都会回答说：不能。因为以前这个问题——“或者中国人民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出中国，以取得中国的民族解放；或者全中国人民都变成为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的亡国奴”——还没有像现在这样迫切地摆在广大群众底面前，而国民党卖国辱国底真面目，也还没有象现在这样暴露得明白和深刻。但是，现在我们对于反帝运动任务底了解，已经是直接组织和实行武装人民反对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底民族革命战争了。现在我们完全有可能把中国民族危机底出路问题，不仅公开地和半公开地提到全体人民各阶层中去讨论，提到一切群众组织、一切群众会议和一切群众日常生活中去讨论，而且易于在实际上对群众证明我们的革命口号底正确，并引导他们走上坚决战斗底道路上去。在以前，譬如说在东三省九一八事变以前，能否这样提出和解决问题呢？当然不能。

第三个例子，关于在敌人武装力量中工作底任务，我们时时都说的。但是，在现在政治条件之下，我们党在执行这个任务时，有没有点新的东西呢？我们回答说：有的。新的是什

么呢？新的就是：(一)我们现在对于敌人军队提出的任务，已经是夺取敌人军队要比瓦解敌人军队更重要些。因为根据东三省、热河、上海、江西、福建、四川和其他地方底实际经验，在现在革命力量和影响发展的条件之下，在空前未有的民族反帝高潮之下，只要我们作了相当的工作，有时候甚至于简直不充分的工作，就有很大的可能，把这个军队从帝国主义后备军和中国反革命的武装支柱，变成为反对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以及卖国贼底战斗力量；(二)我们的军事工作，现在当然仍和以前一样，主要的是夺取士兵群众。但是，现在我们同样应当注意在敌人军队的下级以至中级军官成分当中的工作。譬如，在下级军官和各种军事学校的青年学生当中，有许多是真正的热诚的所谓"爱国志士"，他们真正愿意为民族解放与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拼命，他们到军事学校或军队中去的目的，很多只是为的得到军事知识和武器。虽然他们之中，有些人暂时地曾被国民党民族武断欺骗蒙蔽过，但是，他们现在一天一天地感觉到国民党卖国殃民的滔天罪恶，感觉到靠国民党绝对没有希望，因而极力企图在革命和共产党方面去找新出路。

第四个例子，关于在灾民和失业工人中工作底任务，我们以前也说过的。但是，在现在条件之下，在我们了解和执行这个任务当中，有没有什么一点新的东西呢？我们回答说：有的。新的是什么东西呢？新的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些群众中工作底目的，首先就为的是：一方面应用他们这些最广大的人力后备军来扩充红军和赤色游击队的队伍，以加强反帝国主义和反国民党底武装斗争；另方面，预防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有可能利用这部分力量做后备军去反对革命（例如蒋介石不久以前下命令要在三个月之内招收六十万新兵，而他首先就是要在灾民中去招募）。

或者最后一个例子，关于夺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革命方面来底任务，我们也是时常都说过。但是，现在在这个阶层当中发生了一点什么新的东西没有呢？我们党在这方面的工作有没有新的东西呢？是的，有的。一方面，因为空前未有的民族危机，因为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之下，广大群众生活痛苦到极点，而且广大民众的身家性命都没有丝毫保证；另方面，因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底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因为中国苏维埃革命巨大的胜利，在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当中，发生了一种显然的变化。就是发生了倾向革命和共产党的左倾情绪。我们现在在这方面的任务，首先就是加紧在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中的工作，把他们之中许多人变成为反帝运动的积极战士，应用他们作为宣传鼓动员的力量，并且把他们之中的各种专门人材吸收到我们方面来去帮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设工作。

此外，必须严重地指出这一件事实，就是我们实际工作落后于客观形势底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因为在党和群众组织当中，有许多同志对于党的任务底了解和执行，时常是一成不变地、琐碎地、机械地、教条式地，时常是不曾估计具体的主观和客观的条件，不曾在新的条件之下，用新的方法做工作。全党应当在这个问题方面，起一个根本的转变。

三　红军在反对六次围剿中底新胜利和兄弟党对于中国苏维埃革命底任务

你们大家大概都还很清楚记得，在不久以前（今年九月六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正主席毛泽东同志，副主席项英、张国焘同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同志，曾经共同发表宣言，告美、英、日、法、德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劳动者，以及一切帝国主义的仇敌和中国人民底朋友。在这个宣言中，他们号召全世界劳动群

众起来帮助反对蒋介石和帝国主义的六次围剿。他们在这个宣言上说：

"兄弟们！姊妹们！同志们！朋友们！

为保卫自己的苏维埃共和国，成千累万男女老少劳动者，不惜用自己的血肉、头颅、生命等，英勇地打退了那人数比他们多，军器比他们好的国民党的一连五次的围剿。现在，这个年青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却正处在一个严重的危险关头了！

在这个紧急关头我们向你们请求：

帮助我们反对那些要使我们再过黑暗的非人生活，并且要屠杀我们的刽子手呵！"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对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这个宣言给了很大的响应。

一切中国革命的朋友和仇敌们，每天都盼望知道关于六次战争的消息。大家都想急于知道，在赛克特——过去德国国防总长，现在国际资本走狗（蒋介石）底走狗——直接指挥之下的国民党军队，在这一次与红军作战时到底得到了怎样的结果。

现在在十二月初，在六次围剿战争的三个月后，中共代表团在共产国际执委十三次全会上，可以向全世界宣布：

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反苏维埃的六次围剿，在基本上已经溃散了！（鼓掌）

只有在赣北战线上，在红军和蒋介石主力之间，现在仍在进行残酷的战斗。红军在这条战线上，还未得到决定意义的胜利。但在其它一切战线上，在福建、广东、四川战线上，英勇的工农红军，已经取得了反六次围剿的决定意义的和完全的胜利。

虽然我们还没有得到关于我们军事胜利的全部消息，但是，据我们已有的个别材料看来，在各方面的胜利已经是大有可观了。例如：在福建战线上，十九路军还在十月初已经被我们打败了。在这条战线上，我们得到了这样的胜利：十九路军的六师人有四师人（第七十九，六十，三十一，三十二师）被我们打败了。卢兴邦的一师和刘和鼎的一师也受到了严重的失败。十九路军有三团人投到红军方面来。红军俘虏了国民党军队的三千三百兵士，一个旅长，三个团长，四个营长。在占领延平时，红军得到了十二只满载军火、粮食、盐和金钱底十二只大轮船（例如，要一万以上的工人才能把其中八只大船上的物品卸下来），红军得到了四千六百枝步枪，五十枝重机关枪，三十架轻机关枪，五百架盒子炮，二千顶钢盔帽，四十万发子弹，五百个手榴弹和三架军用无线电机。（鼓掌）差不多闽西、闽北各县都完全苏维埃化了。

在四川战线上我们的胜利也同样的不小：田颂尧的四十六团军队，差不多完全被红四方面军打溃了；结果，我们得到六千枝步枪，一百架机关枪，俘虏了他们的几个上中级军官，他们的兵士，死、伤、俘虏等一起损失约一万以上。刘湘和杨森的一部分军队，同样被打败了。赖心辉的第八旅在马边、峨边等川西各县暴动起来了，暴动的士兵和农民游击队已经组织成为四川红军第一独立师了。这样，在川西就创造起来了新的苏维埃区域。广东军队，在赣南战线上，因为他们的后方闹问题，因为他们接连打了好几个败战，现在已经暂时的完全停止了对我们的军事行动。在赣北战线上，红军打败了蒋介石的第九十六师，第五师，第六师，第七十九师，第二十三师等，同时仅仅在打破蒋介石第五和第六两师的胜利当中，红军便得到了七千八百多枝步枪，两架军用无线电机。红军曾经好几次地给赛克特和蒋介石的军事计划以严重的打击。现在已经时常使他们在许多地方不能不从进攻的策略变成保守的策略。因为最近福建事变的关系，那个原来已经感觉后方不安的蒋介石军队，更加感觉到楚歌四面

了。失败的空气现在充满着蒋家军的后方。

应当特别着重指出，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在中共直接领导之下最近得到的这种胜利，是空前未有过的胜利。从军事的观点看，这个胜利的空前意义是：第一，它是在这样短的期间中得到的；第二，在这个胜利的过程当中，红军不仅占领了而且能把万县和延平这两个大城市和商埠拿在自己的手里；第三，在这次战争中，红军更加表示出它的伟大的威力，以致逼得有些敌人也不能不换副面孔来和红军说话，并暂时地停止了对红军底军事行动；第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在四川万县附近汇合了，这一点是我们很久想做而未能做到的事情。从政治的观点上看，这个胜利底空前意义是：第一，这个胜利把红军的威信更加提高了，使人们相信它是不可战胜的力量；同时把苏维埃政府底地位也更加抬高了，使人们更加不能不在事实上承认这个政府；第二，因为这个胜利底结果，在许多民众和军阀军队士兵群众中间，很快地发展着革命化的过程——特别是在苏区邻近各地方。福建的最近事变，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福建独立政府底成立，福建政府发表许多激进的口号，不仅是反蒋反日，不仅是宣布允许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信仰、罢工、示威等自由，不仅宣布召集所谓生产者代表大会，不仅宣布成立民主共和国，不仅公开宣布退出国民党，而且甚至于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宣布中国完全独立自主，宣布按人口来平均地权，以及将一切森林、水利和矿产等均收归国有。福建政府之所以提出这许多左倾动人的口号，不仅是由于十九路军上级将领玩弄手腕和左倾词句，不仅是由于其他军阀政客们叫些好听口号以求得保证自己反蒋斗争底胜利，而且是由于广大民众，士兵群众以至一部分下级军官成分的革命情绪对上层压迫所产生的结果——这些士兵和下级军官之中底许多人，曾经和共产党及上海工人一起，在一九三二年春季参加了英勇的上海抗日民族防卫战，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篇幅上，写下了最光荣的一页。可以断言，福建事变绝不会孤立无援的，在福建事变之后，接踵而起的，料还大有人在。福建事变客观上应当引起全国新的更大的更广泛的反蒋反日的群众运动底怒潮；第三，如果以前我们每次的胜利，使反革命派别更加团结和更加一致地去进攻红军，那么，这一次因为反革命在自己经验中感觉到红军是不可能战胜的力量底缘故，我们的胜利却反而临时地加紧了反革命营垒中底分裂、冲突和公开火并，这一点就必然客观上有利于苏维埃革命底向前发展。一方面，根据红军和全国革命运动力量底增长，另方面根据帝国主义者互相间冲突底极度紧张和因之而起的国民党内部斗争底加剧，我们可以预言，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人民和英勇工农红军一定要共同欢呼庆祝完全冲破六次围剿的胜利！反革命营垒内的这种紧张局面，是由于最近日本行动和蒋介石完全公开投到日本帝国主义怀抱中去等事件引起的。据最近我们得到的可靠消息：蒋介石和日本又签订了新协约，这个协约主要内容包括下列几点——日本允许蒋介石的条件是：(一)放弃领事裁判权；(二)借款；(三)用日本顾问代替德国顾问；(四)保证蒋介石底军事供给。蒋介石对日本的交换条件是：(一)互免商品入口税——实际上就是免一切日货进口税；(二)承认中国北五省是日本势力范围，日本负责担负这五省的外债，中国只有在日本同意之下，才有权利租给别国新租界；(三)在法律上正式承认满洲国。因此，美、日、英之间底冲突特别紧张起来了，日本在占领东三省、热河和察哈尔以后，现在实际上又取得了北方富庶五省底完全监督权；而且日本帝国主义在蒋介石帮助之下，时时有进占全中国底危险。美国一方面尽力企图恢复自己在南京政府中底原有地位，另方面在南方和北方更加积极活动起来——首先就是在福建和广东，美帝国主义希望经过十九路军上级将领来加强自己在福建和广东底势力，同时将英日走狗从这些省份中排挤出去；

英国则一方面与法国签订了共同瓜分西北和川边及云南等省底协定，另方面在总的方面赞助日本反对美国底斗争；而同时又进行严重的斗争去反对日本在北方和长江流域影响底增长，并且利用自己在华南地位来进行抵制日货底运动。这样一来，就把国民党内部各派别冲突也非常剧烈化起来了。

如果要问：在最近的将来，如果在红军完全冲破六次围剿以后，在中国将发生什么情形呢？据我们推测，大概不外下列两种可能的情形：

(一)或者因为军阀和帝国主义者因为对于革命运动发展发生极度的恐惧，于是又暂时地把自己相互冲突和缓一下，以便延迟相互之间的公开火并，而得以共同力量去组织新的反苏维埃围剿；并且就是很快地爆发帝国主义者的直接的公开的对苏维埃革命底武装干涉，也并非不可能的——首先就是英、日等帝国主义者在四川、福建和江西等底武装干涉行动。

(二)或者因为帝国主义者暂时还不愿采取那种代价太大的公开武装干涉的办法，因为这些强盗相互之间冲突得厉害，特别是因为国民党在一连六次围剿战败后，不能不需要相当时期来重新搜集和准备力量去进行新的反苏维埃战斗——红军或许在许多战线上得到某种形式的暂时的（虽然是为时不久的）军事休息（即是说，敌人停止对红军底军事行动）也并非没有可能的。

但是，应当着重地懂得，帝国主义者很快地组织新的隐蔽形式或公开形式的武装干涉底可能性，目前还是大于其它的可能性。而且，无论在这种情形也好或那种情形也好，在完全冲破六次围剿以后，中央为争取苏维埃革命决定意义胜利底斗争，为胜利地抵抗帝国主义者公开方式或隐蔽方式的武装干涉底斗争，无论如何不能有丝毫地减轻，而应当是更紧张的和更严重的战斗任务。

我们的兄弟党——首先是日、英、美、法、德各国共产党，在真正拥护和帮助中国革命和中国苏维埃方面，也应当这样地提出和解决问题。

然而，应当用布尔塞维克所特有的爽直性，用自我批评的精神，坦白地说出：虽然在反对六次围剿斗争中，在欧洲和美洲兄弟党工作中看到初步的转变，首先就见到在党和群众刊物上对于宣传中国苏维埃革命问题较前加多，对于在群众中宣传鼓动拥护中国苏维埃底工作也较前广泛；虽然我们的日本兄弟党，英勇地、布尔塞维克式地、用尽一切所有的力量，起来反对那血腥的以明治和荒木为代表的日本帝国主义，起来拥护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虽然我们的德国兄弟党，能不顾残酷的法西斯蒂白色恐怖，用尽一切力量，起来揭发赛克特和其他德国将军参谋参加国民党反苏维埃围剿底兽行，起来暴露社会民主党领袖格尔仁斯基和其助手魏一斯替蒋介石警察机关服务底罪恶；——然而，直到现在，帝国主义国家内的我们的兄弟党所作的拥护中国革命和反对远东帝国主义战争底工作，还远远地落后于他们的帝国主义政府在反对苏维埃中国组织和进攻苏联战争及瓜分中国世界大战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性。

我们兄弟党在这个有严重意义的工作中，表示出这样长期的落后性，其原因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是不是因为这样，就是直到现在还有许多我们同志对于中国革命底国际意义和作用估计得不够呢？他们或许以为，中国革命是殖民地革命，是世界革命的某种不甚重要的助力，所以值不得对中国革命加以严重的注意。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一个极蠢笨的错误。这种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革命的态度，一般地就是不正确的，非列宁主义的，而对于现时中国革命，尤其是不对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现在的革命，绝不是什么某个极小殖民地国家内发生

的某一种自发的群众运动，不过因其有反帝性质，所以客观上带有革命性。中国现在革命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苏维埃革命，中国现在革命是世界革命整个连环当中最主要的一环。现在中国革命向前胜利底每一个步骤，都是在实际上创造将来更进一步转变到实行胜利地社会主义建设底前提。

或者是因为这样吧，就是我们许多同志对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问题，还保存有那种错误的和不正确的观点，即是那种早已在一九二六年就被斯大林同志严厉指责过了的观点吧？他们或许还这样了解帝国主义干涉底问题，就是如果没有从帝国主义国家运送大批军队到中国去，那么，也就没有什么真正的帝国主义干涉。

现在且看斯大林同志对于这个问题怎样指示的，他说：

> “而对于干涉问题时常了解成这样情形，就是要有运送外国军队到中国领土内这件事实；要没有这件事实，那就也没有干涉。同志们，这是最蠢笨的错误。干涉并不限于运送军队，而运送军队并不能成为干涉底主要特点。在资本主义国家革命运动底现在条件之下，直接运送军队时，可以引起许多的抗议和冲突，所以干涉有更巧妙的和更隐蔽的形式。在现在条件之下，帝国主义所打算的干涉，就是采用组织附属国的国内战争底方法，财政上帮助反革命去反对革命底方法，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帮助他们的中国走狗去反对革命底方法。但尼金和柯尔卡克，犹尖尼奇和乌兰格尔反对俄国革命底斗争，帝国主义者曾极力想把这个斗争解释成绝对是本国内的斗争。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而且不仅我们知道，全世界都知道，在这些俄国反革命将军底背后，站着有英、美、法、日帝国主义者，如果没有这些帝国主义者底帮助，俄国严重的国内战争是不可能的。在中国现在也应当这样说。吴佩孚和孙传芳，张作霖和张宗昌反对中国革命底斗争，是不可能的，如果这些反革命将军受不到各国帝国主义者的指点，如果帝国主义者不供给他们以金钱、军火、指挥和顾问”（见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六年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议底中国问题委员会上底演讲）。

斯大林同志关于一九二六年中国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斗争底这个指示，是完全正确的。而这个指示，对于目前蒋介石和刘湘，陈济棠和张群反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及其红军底斗争，更是加倍地正确。我们大家都相信，而且我们的敌人也公开地说，如果没有日、美、英、法、德等帝国主义者拿金钱，军火，指挥和顾问等底帮助，蒋介石和整个国民党早已被强有力的人民苏维埃革命从中国领土上推倒了。而对于干涉问题底这种意见，对于现在中国情形，尤其是绝对不正确，因为不仅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已实行公开武装干涉，其他一切帝国主义者现在每天每时都大大地在中国领土内增加自己的海、陆、空军力量，此外，必须估计到一件有极大实际意义底事实，就是中国是一切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因此，即在所谓“平时”，帝国主义在中国已经驻有相当的军力，因此，即在公开武装干涉底第一个时期，当帝国主义者还没有感觉到在华军力不够，当他们的干涉行动还没有受到严重打击以前，他们的确还不需要运送新军队到中国去。

最后，是不是为的这样原因，就是有时我们同志对于本国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底革命斗争，与拥护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底国际主义底斗争之间底相互关系，还了解得不够，以致把它们两者分割或对立起来呢？如果是这样，那就要严重地去研究俄国布尔塞维克在列宁和斯大林同志领导之下，在十月革命胜利中底经验。难道不是大家都知道，正因为正确地把反对帝国主义大战和争取和平底真正国际主义革命斗争，与工农为面包、为土地底革命斗争以及

被沙皇和俄国资产阶级压迫下底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三者联贯起来，才使布尔塞维克能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中得到胜利吗？因此，必须明白地了解，拥护中国苏维埃底事业就是拥护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事业，就是为本国苏维埃政权胜利底战斗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完全有权利向各国兄弟党要求执行加入共产国际二十一条章程中底一条，这一条是由列宁直接提议的，这一条上说：

“每个愿意加入共产国际底党，应该誓死帮助每个苏维埃共和国及其反对反革命势力底斗争。共产党应该进行坚决的宣传，使工人拒绝运输送给苏维埃共和国敌人底军用品，在送去镇压工人共和国底军队中，进行公开的或秘密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完全有权利向兄弟党要求执行这个起码的和光荣的任务，以便用各国劳动者底兄弟友谊联合去对抗全世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革命联合，以便在最近将来能够在实际上实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宣言在我们兄弟党面前所提出来的那些任务。这个宣言在结尾上说：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特郑重号召你们与我们一起共同进行英勇的群众斗争：

反对帝国主义者干涉苏维埃中国！

反对帝国主义者瓜分中国！

反对帝国主义者在屠杀中国人民中准备新的帝国主义大战！

反对美、英、日、法、德等帝国主义者用毒气、飞机、坦克、大炮等屠杀苏维埃中国的劳苦民众！

反对运输一切军火到华！

要求立刻召回美国飞机师，军事技术专门家和德国将军及参谋！

要求立刻撤退美、日、英、法、意等国驻华海陆空军！”

我们应当很快地完成这些任务。

如果当帝国主义干涉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时，在资本主义各国内，不过才开始形成共产党，那时候共产党还很薄弱，但是，无产阶级和劳动者居然能在自己的队伍中涌现出象我们安得列·马尔其这类的英雄，还居然能在拥护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和反对本国资产阶级底斗争中，显示出那种惊人的英勇。那末，在现在条件之下，不仅在日、英、美、法、德、意各国海陆空军中埋伏有成千成万的“安得列·马尔其”，而且在每个资本主义国家中迅速地增长着共产主义革命和强有力的共产主义部队。我们坚决相信，中共和一切兄弟党——首先就是日、美、英三国兄弟党，在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领导之下，在利用苏联共产党经验帮助之下，一定能够胜利地完成我们的历史任务。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及其英勇的工农红军万岁！

中国胜利的苏维埃革命底领袖和组织者——中国共产党万岁！

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及其突击队——苏联共产党和我们的领袖斯大林同志万岁！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国际革命同情万岁！

（继续很久的鼓掌，欢呼口号，代表们起立唱国际歌）

对工作的几点意见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一日）

罗　明

省委：（杭龙工作另作报告）

依据敌人在大举中央区中对福建方面进攻的形势，与依据我们总的工作布置，我认为我们目前应特别注意下列的紧急工作：

第一、要用最大的力量迅速的方法与最短的时间赤化连南、汀东南，使新泉与连城、长汀巩固联成一片；同时，要与宁化、清流联结起来向永安方面发展，这是巩固闽西与闽北打成一片发展计划中最迫切的工作，我们要抓紧这个最好的时机来进行这一工作。

我虽向震林同志提过几次，要依照这点来布置军事的工作，党和政府工作也要找到这一重心。据震林同志说东南指挥部和省委省苏这一方面还是采取缓进的计划。我认为缓进是失了最好的时机，我认为我们在这一方面可以抽出很多力量（关于军事力量、党和政府的力量），应该采取猛进急进的速度，完成这一工作。

我的理由是这样：

（一）这一带团匪的力量很弱，目前还没有得到白军直接的混合，很容易消灭他，在消灭这一带的团匪斗争中，可以锻炼我们汀、连、新泉一带的地方武装（只要一个小的主力来领导），在许多小仗当中来强大他们的战斗力，以便很快的能与白军打仗；同时，可以在这样的发展斗争中，取得许多小小胜利，来提高连、汀、新泉一带群众斗争的情绪，锻炼群众中在战争的自信力，这是大战紧张中一点非常必要的工作。

（二）这一带区域的争取与开展，不但是汀、瑞最及时的工作，而且这样的开展，可以威迫敌人打击敌人，对新泉以及对白砂的前进，使我们多很多时间来加紧长汀、连城、新泉、上杭各地紧急动员工作，多发挥我们战争的力量，威迫敌人打击敌人，使敌不能前进不能急进不能顺利与各路配合使敌人疲倦削弱暴露更多的弱点……争取时间……，一天一点钟都要争取。

（三）要在这时才比较好争取这一带新区域的群众工作，和巩固我们党和政府在这一带群众中的强固领导。

（四）过去争取北四、五区，争取岩西北，虽然在工作上有许多严重的错误，但失了时机，不能及时的争取与巩固是一个非常主要的错误。

现在争取连南、汀东南……这一工作，要学习北四、五区与岩西北的严重教训，再不要失了这一最好的时机。自然不是说以后就不能进行。但我们要明白这是一个最好的时机，抓到这个时机，我们可以得到多倍的成绩。

过去因北四、五区工作垮台，以及北四、五区邻近区的工作很差（上杭的华家亭，新泉的

新泉、芷溪一带)，十九路军和傅柏翠最近就有可能向新泉方面游击，如果敌人向这方面游击时，就要增加我们在连南、汀东南工作一带的困难．一方面团匪、地主、富农得到白军直接的配合，要更加活动起来，在我们后方、侧面及内面来捣乱；主要的群众方面，因为我们过去工作弱，在战争紧张中，生活方面和情绪方面都要受到大的影响．我们要估量到那时的情形，及时建立这一带工作，不要到那时来慌忙，如果我们能够这样，我们就可以消灭那时慌张应付的状态，这也是龙岩和宁化方面所得到的教训。

根据上面四方面，我们应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来完成这一任务。

第二、集中红军行动及扩大红军方面：我们应注意到十二军头上了，我们要迅速造成新的主力，要抓紧第八师、第七师，扩大和加强政治军事上的领导，使这两师能扩大到三师，成为能集中行动，与十二军一样的主力。这个主力的行动，应该向闽西与闽北之间一带积极行动，以争取永安、消灭卢兴邦为比较常定的目标，这样就更加更有利与北面主力配合而又能与闽西联系。

我认为这要迅速做到。

我认为独立八师可以留一团配合特务营（可改为八师第七团）在杭、永行动，配合杭、永二个独立团及岩太游击队（永定独立团只有一连配合游击队等有一团的兵力；上杭不久即可成立一独立团；岩太游击队有二百余人，等于一个独立团，我认为名义可以不拘束）来行动，来打击向杭、永进攻的敌人；同时，要配合各种力量各方面力量以夺取龙岗、上杭城为比较常定的目标，配合第十师向武平与江西会昌、寻邬联成一片。

在杭、永应保存八师的名义，使在群众中不致产生不好的影响（……）。

现在的八师可抽一团，及再扩大一团，由七师调一团，新成立一师，可以用十二军第××师的名义。因十二军在闽西有威信了，很迅速的调动连城、(二字不明）来行动。在连城方面还有第三、四独立团及第九师一团来配合。

必要时，第七师、第九师可以配合起来集中行动。我认为军区指挥部应立即搬到南阳来和政治部一块，多注意布置新泉、连城向闽北发展的口的军事行动及红军与地方武装的工作。一定要迅速加紧这一方面向北发展，使闽西、闽北巩固的打成一片，积极的与北面主力来配合行动，来消灭敌人从北面的进攻；同时，消灭十九路军向闽西方面的进攻。

如放松一点，如放了这样最好发展的时机，那就是大大的罪恶！

这样不但不会妨害闽西的巩固，相反的，只有如此才能配合闽西的斗争，才不致使杭、永孤立。

在杭、永方面可以成立一个分区来指挥。

上述的意见我已和谭震林讲述几次了，他还没找到这个时机，及时的迅速的做到这一点。

在这时扩大红军应特别以长汀为中心，不要放过这一时机。长汀在目前战争环境紧张中，比较容易进行政治动员，打破党内小群众太平享乐的观念同时，又不会产生很恐慌的状态，这是最好动员的时机。

上杭环境就比较不同了，扩大红军就比较困难了，当然我们要加紧动员……。

省委请作多帮助长汀进行这一最中心的工作啊！

我们在上杭会再找到扩大红军最有经验的来长汀，帮助扩大红军工作。以前派了五个人，不知工作如何？

至于其他各县如永定、武平以至上杭，我认为在敌人进攻比较紧张当中，应先抓到这个时机来扩大独立师、独立团和其他地方武装，先解决目前紧急的打击敌人进攻的问题。从这样的地方的紧急动员中来提高地方武装和群众的斗争情绪，从中来扩大主力红军，不但在群众比较容易直接动员，就是独立团、独立师、赤卫模范营、模范少队中也可以比较有组织的抽调大部分来到主力红军(过去有这样的事实，鼓动中来抽调不是改编硬编)。这是适应群众的斗争的情绪和目前的斗争的需要，不是什么对地方主义的投降。

我们强大地方武装中要与主力红军的扩大和联系，宣传鼓动中与组织上都是如此。

关于扩大红军问题我以前有两封信，此处不再说了。

第三、关于地方武装方面：我以为目前最中心迫切的工作，是先造成基干部队，去实际参加作战，从作战中来锻炼。

在边县边区的地方武装，要向外推进，抓到团匪来打击；对白军，不愿打，采取游击战和运动战，要从打小仗中来锻炼，要从打仗中胜利中来提高他们的勇气和斗争情绪，学习战争的经验。

分兵保口自然是绝对错误；不估量地方武装力量，硬打强敌也是错误的。一定要地方党和政府很小心的领导，在比较内的地方武装，最好调到边区参加作战，最好时常配合比较能打的部队多打仗。

照中央政府命令，加紧政治军事训练和党的领导是对的，特别是检查阶级成分和政治军事成分。

同时，我们应特别注意：

打一次胜利的小仗，胜过关门训练十天，胜过打三次野操。

先有一连基干能打的赤卫军来领导，胜过三五连大家同样的赤卫军。

上杭过去编了很多赤卫军模范营、模范队，也打过了一些仗，这次打大仗，大散特散，这是因为实际作战没有中心基干能打的部队来领导和配合。

我们要了解推动地方武装发展，不断对主力红军一个很好的配合，而且推动群众斗争，转变当地群众斗争情绪一个主要的工作。“比于江西打两次大胜利，对这方面群众中自然一个大鼓动，但如果当地地方武装时常打败仗，群众时常受摧残，群众斗争的情绪还不能更积极发挥，就是这个原因。”

第四、关于各县区工作：我认为整个任务之下，要找到中心县中心区，使中心县区能在其他各县区中起领导作用。

同时，要依照各县区的环境和当地群众斗争力量和情绪，以及党的力量，以找到各县区特殊的任务。

过去党和政府领导的方式太机械了，各县区一般的方法，一般的计划，还是不好的。特别是忽视边区、边县和新区、新县的工作，这是不能巩固的向白区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边区边县以至新区新县，千篇一律的在上下层讨论，一项一条就是扩大红军，分配人数，各区……，第二条，就是简单的政治动员。这样的动员不能照计划做到我们应做的工作，而且会妨害我们的工作。

省委在过去计划上，都机械的规定永定要扩大多少红军，这是不好的。

我认为目前在永定以至上杭许多边区边乡，目前最中心的工作是推动强大游击队、赤卫军和建立白区工作，积极行动，向外游击，打击敌人的进攻，一定要地方武装不断的在胜

利中来提高群众斗争的情绪，使群众更相信地方武装的力量，才能打破完全依靠主力红军的观点。

“永定上下溪南地方武装顽强的斗争，对整个发展的配合与对主力红军行动配合的力量，胜过出三百红军送到前方的主力”，近来永定、上杭工作比较有点。

如果这样来领导当地工作，又会进步又更好，出更多红军。

近来上杭、永定方面，我们就靠这样的领导来转变，来在目前的环境中来动员群众斗争，已得到了许多战绩了。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一日于新泉

这是罗明的信给你们参考。圆孔是省委加下去的。

省　委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

苏区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五日）

中央局检阅了福建省委工作之后，认为省委是处在一种非常严重的状态中。在省委内一小部分同志中，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这一路线对于目前革命形势的估计是悲观失望的，对于敌人的大举进攻表示了张惶失措，认为在杭永岩苏区内群众的革命斗争已经低落，群众对于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政权已经采取了中立的态度，广东军与十九路军的欺骗宣传已经深入了广大群众，一切发动群众斗争的政治工作必然失败，所以实际上他是主张党应该抛弃这一苏区根据地，向着后方逃跑退却，这一路线甚至公开走上了取消党，取消群众革命团体的取消主义道路，(明显的例子是新泉县委杨文仲给省委的信)。

这一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虽是遭到了以代理书记刘晓同志为首的省委大多数同志的部分的反对与批评，但这一反机会主义的斗争并没有开展起来，这一斗争只是限制在省委机关之内，而且只是停止在个别的问题上。省委大多数同志没有深刻了解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坚决站在党中央与中央局的进攻路线上而斗争到底，省委大多数同志在这一斗争中表示了他们的不坚定与机会主义的动摇，因此在实际工作中也犯了许多严重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因此中央局决定：

(一)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指出这一路线的露骨的表现就是以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为代表的取消主义。

(二)省委对于这一路线的腐朽的自由主义态度，必须受到最严厉的打击，指出这种自由主义的态度，与斗争的不坚决，实际是对于罗明路线的妥协与投降。

(三)立刻召集省的临时代表会议，尽量吸收中心支部的工人雇农同志参加，成立新的省委。

(四)在临时代表会议召集之前决定以陈寿昌刘晓钟友勋等同志为临时常委，处理一切工作。

(五)派中央局同志出席这一会议做报告并领导这一会议的顺利进行。

(六)立刻撤消罗明同志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杭永岩全权代表工作。

(七)公布这一决定，并在各种党的会议上与党报上解释这一决定。

罗明路线在江西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五日）

洛　甫

仔细的检查江西一些边区的工作，那我们立刻可以看到罗明路线不但在福建的杭、永、岩，而且也在江西。这次会、寻、安三县党积极分子的会议，完全证明了这一结论的正确。

江西会、寻、安三县的党的领导机关，在敌人大举进攻的前面，同样的表现了对于群众力量的悲观失望的估计，同样的表现了张惶失措与退却逃跑，以至将整个寻邬县的苏区根据地放弃，使国民党军阀能够在那里自由的去进行他们的烧杀政策。

不论从那一方面的工作看来，会、寻、安党的领导机关过去是执行了一条同党的进攻路线完全相反的退却逃跑的所谓单纯的防御路线。这一路线同福建杭、永、岩的罗明路线没有什么大的分别。这正象在三县积极分子会议上所说的："这是在会、寻、安的罗明路线"。

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在中央局领导之下，一致揭发了过去这一路线的错误，开始了同这一单纯防御路线做最坚决的斗争。而且大会很热烈的"保证在中央局领导之下所订立的革命竞赛条约，能够得到百分之百的完成"，坚信"会、寻、安的百万工农群众在中央局的正确领导之下，能够胜利的前进，巩固与发展赣南苏区"（均见决议）。

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最坚决的打击了过去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的领导，对于会、寻、安的工农群众与党员群众的机会主义的估计。这一机会主义的领导到处叫喊"边区群众悲观失望，中心区群众太平享乐"，"各级党部以至每个党、团员都表现仓皇失措，悲观失望"，"在残酷斗争中，一般党、团员没有表现一点布尔塞维克的顽强性，坚决性，不能领导群众作艰苦的持久的战争"，而对于自己的机会主义的领导却没有一点自我批评的精神。三县积极分子会议宣告了这种对于群众与党员群众的机会主义估计的最后破产！

三县积极分子会议在中央局直接领导之下，很正确的指出了江西党的省委二月二十八日对于会、寻、安三县委指示信中所包含的错误。首先在省委指示信中没有明确的指出会、寻、安的单纯防御路线即是会、寻、安的罗明路线，却含糊的说："会、寻、安的党所犯的纯粹防御路线之来源，与罗明路线相同的"，中心县委"把军事工作与群众的基本动员工作分割开来"会"更进一步的确立了纯粹防御路线的基础"，并且说"防御路线的结果，必然走到罗明退却路线的前途"。这里又是"来源相同"，又是"基础"无异，真叫人听了有些"前途"茫茫了。

省委指示信上更没有清楚的指示出进攻路线与单纯防御路线的根本不同在那里。把单纯的防御路线简单看做是"坚壁清野"、"布置后方"、"偏重于三分区工作"等一些军事上的行动，而没有看做这是包涵会、寻、安党的全盘工作的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的路线。而且更莫明其妙的说："把工作中心放在坚壁清野、布置后方上面，这样便暗示了党、团员群众以退却逃

跑的路线”.这样的说法，实际上是在使会、寻、安党的负责者，首先是邓小平同志，逃避他们自己在执行退却逃跑的路线中所应负的主要责任。

此处关于会、寻、安群众力量与党员群众的力量的估计，也是非常的不够；对于以后如何执行党的进攻路线，也没有明确的指示。这正象三县积极分子会议的决议上所写的："这种指示信当然没有法子将这一反纯粹防御路线的斗争开展出去”。

同时我们更必须指出省委对于会、寻、安三县过去的工作一贯来是忽视的。对于三县工作的实际情形，省委是不能了解的。省委现在想根据三县机会主义领导的负责者邓小平同志的报告，给三县以正确的指示，这当然是不可能的。这一次三县积极分子会议，省委也没有派一个人来参加，而把一切交给中央局，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也值得我们的严格批评。

但是我们必须说，关于纯粹防御路线的问题，不但在会、寻、安，而且还在江西其他边区。

我们现在丢开那些江西边区县委的空洞的、冗长的工作计划与数目字的工作报告，而拿一些负责同志在边区经过时所得到的一些实际材料，照录一二，使读者对于边区工作，得到一些确切的了解。下面是一个负责同志关于乐安工作给江西省委与中央局的一封信。

“昨到招携，匆促间得知下列的严重现象：

一、善和区分配运输员，区委区苏派模范队包围了乡村拉伕，群众登山，模范队开枪示威，群众两天不下山，区苏令人去捉。红军派去帮助的人批评区委区苏，他们不接受，说：农民说不通，非如此不可。后经严重批评，始肯登山劝回，但去了又说：现在红军打胜仗回来了，胜利品已挑回来了，你们可以不去当挑伕了。群众回说："我们不下山耕田，看你们吃屎”。事后群众中更有人跑到牛田（白区）去报告靖卫团，说红军拉伕。昨晚总政治部批评县委，他们还不认识此问题之严重。县委巡视到区委，看召集不成会便回来了，只说该区运输队发动不起，而不能认识这一现象的极端严重性。显然这区里还有反革命在捣乱，围山、放枪、与向靖卫团报告，正是里应外合的诡计。

二、向富农捐款，有某一区群众中竟有人说富农比贫农还穷，显然是有富农混入群众中去说话。

三、县委到区，区到乡的巡视，只是开会骂一顿，如开不成则回。

四、招携查有烟馆三，土娼多家，饭店中有大批烟客及白区可疑的商人，我们昨夜已查得他们在勾引红军开小差卖枪，以至向白区跑。自广昌至此边区各地，几无地不有大批反革命活动，如广昌，如东韶，如洛口，如招携。(中略)

地方工作亦如此，中心区域固须加紧巩固，而边区必须特别注意，才能使苏区日益扩大与巩固，否则不仅赤白对立现象不能消灭，且更使边区不能巩固，不能迅速向外发展，不能随着红军的胜利而扩大苏区——这是最值得苏区党注意的问题！

招携工作我们虽未作深刻的考察，但从昨日一瞥便觉得地方上非常沉寂。前年的反动标语至今犹未洗刷，最多涂上一两字，改头换面都说不到，招携的田都荒了不少，其他更可知。红军的消息、位置，敌人时常从乐安苏区得到。我们得的只是“片鳞只爪”，已使我感到去年八月我所说的边区严重现象，不仅未变，且更加深。同志们：工作的转变不是口头上书面上的事，而是要在实际上表现。省委若再不警觉的去加强与整顿边区工作，则严重的现象，将要继续严重”(三月二十五日)。

下面是又一个同志关于万太工作给中央局的信：

“驻伯加对河之绍口的敌人，白军一营，警察队约一二队。十号四队警察队到了伯加（枪

支四百上下)，我们集中万太独立团等部队，于十二号清晨到达伯加附近占领阵地向敌攻击。本来我们有完全消灭该敌的胜利条件，结果不但没有消灭敌人，并且被敌人追攻我们几里路。主要原因：由于万太独立团等部队不听指挥，作战时，听到枪声就向后跑；同时有一部分干部和士兵造谣言，前面正在进行消灭敌人，后面对自己部队打枪，左路自由撤退。由于这个原故，所以没有消灭敌人。万太武装内部还潜伏了不少的阶级异己分子，与反革命AB团自首自新分子。这是非常严重的现象。

万太一般的工作，差极了。主要原因：由于万太县委一贯的执行单纯的防御路线。这一错误的根源，在去年五月就开始形成，造成了不少的恶果。两次沙村事变，一次窑下事变。直到现在，边区失败情绪非常浓厚。区一级和乡苏时刻准备东西逃跑上山。横直七八十里没有一个哨。土地还没有彻底解决，劳动法更是没有执行。并且还有些干部反劳动法的倾向。肃反工作更是严重现象。许多前方洗刷出来的流氓阶级异己分子，和反革命AB团、改组派、自首自新分子，送出境的，都推在万太。窑下区委区苏札的屋场及附近地方，有些著名的AB分子，捉又捉不到。有时他做担架，如果我们去捉他，有一部分群众报信，他就跑了。这是我们的工作不深入，没有深入阶级斗争的具体表现。边区肃反委员会，形成三不管，政府、保卫局、党，都不理它。我们在伯加附近路上检查行人时，检出了许多来往人，身上有白符号（守望队的)，我们把这些人扣留盘问，该乡党的支部书记还来求情，他说‘你不知道，我们边区乡的群众都有白符号！’（三月十五日）

还有一位同志关于万太工作情形也说：

“万太地方武装在去年六七月间有×千×百多枝枪都背起了，但现只有×××枝枪背起在，其余大批的都开小差跑了。其原因是：

一、在县委机会主义领导之下，把地方武装的斗争情绪降落了。

二、政治军事教育工作非常之差。

三、阶级异己分子在地方武装中还留着，又无坚强指导员和政委，党不注意领导。

四、强迫编队，取消一切地方群众武装编成四个挺进游击队——四五月来有了两次编队。一次是谢唯俊到万太要编队，在‘不编队的就是AB团捣鬼’的口号下，编了一次。结果开小差跑了三分之一。二次是江西军区郭天民到万太，更是奇怪，把边区的一切群众武装一律取消，编成四个挺进游击队，结果跑了三分之二。罗明的‘基干部队’论，在万太也实行过”(三月二十日)。

以上所说的严重现象，不但在万太与宜乐，而且在南广等边区。这些现象，不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省内的具体表现是什么?!这种现象应该如何引起省委的严重注意，而与之做最坚决的斗争。但是，可惜得很，省委对于这种江西的罗明路线的斗争是十分不够的。省委对于这种严重的问题，同时于会、寻、安三县的问题一样，或者是根本不很知道，或者知道了也马马虎虎的写些一般的指示信，就算了事。对于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存在，始终没有公开的指示出来，甚至当雩都中心县委指出赣县工作是罗明路线在赣县的具体表现时，省委立刻回答中心县委说：“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这样笼统的过分的说法，实际上并未指出赣县党错误表现的实质；一方面不能使赣县了解赣县工作错误的所在，一方面要阻碍反罗明路线的深入”(三月十五日省委给雩都中心县委指示信)。

我们固然应该反对笼统的过分的说法，中心县委给赣县县委的指示信，我没有看到，不敢在这里下什么断语，但是省委给赣县县委的指示信，我是看到的。在赣县江口事变之后，

省委所给赣县的三封指示信，实际也是非常一般的与笼统的。省委只是说赣县党“是处在极严重的状态中，充分表现了各区及县委本身对目前政治形势认识不足，对敌人大举进攻的形势没有了解，对党的进攻路线的全部意义没有认识，充分表现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省委三月四日指示信）。这类话当然也是笼统到再不能笼统的了，笼统到令人无从知道赣县领导机关所犯的主要错误到底是“左”还是右的！

宜乐的工作，虽是那样严重，但省委的指示在不到几百个字的短信中可以说一无所有。万太方面则最近又把在会、寻、安犯严重错误的邓小平同志派去代表省委解决那里的问题。从三月二十八日省委给万太、永丰的信上，又可看到：“省委听了小平同志的报告，完全同意公略、万太扩大会的精神与决议”，但是我们在这封信上，还是不能充分了解万太所犯的错误究竟是什么。一方面说：“这次扩大会，更进一步揭发了永、公、太单纯防御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转变永、公、太的路线上起了重大的发动的作用”。同时又说：“万太在长期机会主义领导之下，要从单纯防御路线的泥坑中，拔救出来，这是一种很艰苦的工作”。此外又说：“放弃边区白区工作是过去永、公、太执行单纯防御路线走向罗明退却的路线的主要内容”。在一封信的中间对于永、公、太的错误估计，有这么多，使你无法知道他们所犯的错误到底是什么错误。

一方面说单纯防御路线是错误的路线，另外一方面却又说，这不是路线，而是错误。天晓得，到底这是什么希奇古怪的东西？

对于单纯防御路线这类错误的糊涂的了解，自然没有法子使全党同志坚决的起来同这一机会主义的路线做斗争。

这类错误的糊涂的了解，自然不能不在指示信上做这类令人惊奇的指示，比如在信上说：“只有在实际工作中表现你们执行中央省委的工作的路线，才能证明你们真正是转变了，也只有实际工作的效果，才能回答和冲破党内机会主义的错误”。

怎样以“实际工作的效果”来“回答和冲破党内机会主义的错误”？大概机会主义的错误是不要紧的，只要实际工作有了效果，机会主义自然吓跑了。这好比邓小平同志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是不关紧要的，只要他在万太等地的实际工作有了效果，就可冲破与回答他的错误。

可惜事实却并不是这样！在机会主义错误之下虽然也有“实际工作的效果”，但这种效果只能是机会主义的、退却逃跑的效果！

象这样的指示信，当然没有法子转变边区的工作。省委没有能够抓住在江西边区的罗明路线的具体表现，指出它的内容与实质，而与之做最坚决的斗争。省委没有充分了解单纯的防御路线主要的不是表现于分兵把口，布置后方，而是表现于对于群众力量与党的力量以及敌人力量一贯的机会主义的估计，表现于以这一估计为根据的整个党的工作与群众工作的具体布置。所以反对单纯的防御路线，主要的不是在使地方武装出击就算了事，而是在反机会主义的思想斗争中改造我们一切党的与群众的工作，来执行党所提出的战争任务。不然，在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之下，地方武装的积极行动的“实际工作的效果”，是永远不会来的。

江西省委必须最严格的检查所有边区各县的工作，揭发自己过去对于边区工作的指示的政治错误，同时对于边区工作的忽视做坚决的斗争。江西省委必须最清楚的明确的指出单纯防御路线的内容与实质，指出有些边区所犯的单纯防御路线，即是江西的罗明路线，把这一反对单纯防御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深入到群众中去，彻底改造各县、特别是边区各县党的与群众的工作，来执行党的进攻路线，巩固与扩大江西苏区，完成江西革命的首先胜利！

为党的路线而斗争

——要肃清在江西的罗明路线，粉碎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

（一九三三年五月六日）

罗　迈

在中央局的领导之下，四月十六日至二十二日的江西党的全省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正确的、具体的、清楚的揭发了在江西的罗明路线(即“单纯防御路线”)，并一致给了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以严重的打击，他们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同时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总结会议为党的路线而斗争的成功，无疑的教育了江西全党，同时就定下了江西工作转变的基础。

(一)江西机会主义的政纲

江西的罗明路线，是一条反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条与党的进攻路线没有丝毫相同而完全相反的路线。这条路线根本不相信党的力量，不相信群众的力量，因而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走上了悲观失望的取消主义的道路。

虽然邓、毛、谢、古等至今不肯诚恳的揭发他们的机会主义系统，但我们一经仔细检查他们的声明书和他们在总结会议上的发言，即不难暴露出他们的共同的机会主义政纲。

第一，对于中国现时苏维埃运动的内容的估计和策略上的结论，邓、毛、谢、古等是与党绝对相反的。

“只有苏维埃才能解救中国”(斯大林)。“苏维埃和工农红军是中国革命的杠杆，是中国劳苦群众从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地主资产阶级统治下解放出来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共产国际主席团一九三一年中国问题决议)。“苏维埃的道路不仅是中国工农社会解放的唯一道路，而且是民族解放的唯一道路。中国开展着的国内的革命战争，显然同时便是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及闽赣两省委信——见“实话”第八期)，所以“红军与苏维埃运动，将使帝国主义更公开的用武力压迫中国革命运动，中国工农革命运动与帝国主义者的武力广大的武装冲突的历史阶段，是在面前”(同上)。

因为这个原故，“中国共产党须用一切力量去保证无产阶级在国民党中、国内群众反帝运动中的领导权。为这一目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更进一步发展和加紧苏维埃运动，巩固与加强中国苏维埃和红军，把苏维埃运动与国民党统治下群众反帝斗争相联络起来”(共产国际十二次全会决议——见“斗争”第四期)。要组织与领导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最广泛的动员全苏区工农民众，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满蒙、进攻平津，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一切强盗行为，……来争取中国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民众与革命士兵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之下。用一切力量使反帝拥苏同盟变为反帝国主义的广大工农的组织”(中央局决议——见“斗争”第二期)。——这是国际路线，党的进攻路线。再看邓、毛、谢、古等为首

的罗明路线的主张：

古柏曾代表这一路线公开的说："目前苏维埃运动与革命战争，还只是土地革命的。在苏维埃区域内，土地革命与反帝革命两大潮流，要到工农红军与帝国主义直接武装冲突时，才能算汇合起来。到那时，革命战争才能算是民族革命战争"。邓、毛、谢、古等由于对于苏维埃运动的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估计出发，在策略上便主张放弃苏维埃根据地，主张红军上山，反对扩大红军，根本取消反帝运动，实际取消反帝拥苏同盟(见他们自己的声明书)。——这难道不是一条与国际路线绝对相反的政纲？

第二，关于巩固和发展苏区，把苏区联络一片与扩大红军一百万的任务，邓、毛、谢、古等的主张同样是与党的路线绝对相反的。

中国现在存在着革命形势，共产国际十二次全会指示给中国共产党六大任务之一是"发展并联合苏维埃区域，加强红军"。这里很明显的，要把苏维埃区域联成一片，便是要解决夺取中心城市和交通大道的任务，争取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准备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这里就需要有强大的铁的红军，武装一切劳动群众，加强地方武装扩大游击战争，建立白区工作，巩固新苏区，发展新苏区，最后集中一切经济力量为着战争。所以中央局二月八日决议指出：

"1.……在全中国各苏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

"2.号召所有工农劳苦群众武装起来，加入赤卫军少先队。……这样来准备从自愿兵役制变到义务兵役制"。

"3.独立师团游击队，以积极的进攻，牵制和扰乱敌人，破坏敌人之后方交通，领导白区群众的斗争，进行赤化工作，并配合红军主力打击敌人……"。

"4.集中一切经济力量，为了战争……"。

"5.用一切力量来发展与巩固苏区……"。

这是党的主张。罗明路线者怎样主张的呢？他们认为向着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苏维埃是没有可能的，只有向着高山和穷乡僻壤，那里没有敌人或是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所以他们主张放弃苏区根据地，在会、寻、安，在信、赣，在永、吉、泰，他们曾经实行过这一主张。因为没有巩固和发展苏区的信心，自然就做梦也不会梦到要去建立白区工作，虽然他们都曾经领导过边区和新区的党。对于肃反工作自然也是忽视的。在他们领导过的区域，反革命分子的活动特别厉害，阶级异己分子潜入各种领导机关，甚至于包庇反革命（如古柏）。至于说到工农红军，他们同样是悲观失望的。在三次战争后，依据全国的形势，红军应该向着中心城市发展，他们却说红军的力量只能留在苏区打土围子。打赣州的时候，他们袖手旁观的讥笑，对党指示的工作，完全怠工。在敌人第四次大举进攻的前面，他们主张放弃苏区根据地，红军主力应退到兴国一带来或调到河西去，实行退却逃跑。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红军有力量在白区消灭敌人。当红军在许湾打了胜仗的时候，他们还在说："好战略，看将来！"对于扩大红军，他们认为边区是不可能的。又说扩大红军，不如扩大地方武装，实行对扩大红军怠工。而对于扩大地方武装，他们反对武装一切工农群众，所以放弃赤少队工作（如谢之在二分区）。最后对于"动员一切经济力量为了战争"，他们借口苏区群众担负太重，来反对推销公债、退还公债和借谷子，并主张主力红军要把打土豪筹款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这与中央局二月八日的决议，有丝毫相同么？

第三，对于革命动力的认识和党组织群众领导群众的策略，谢、毛、邓、古等又是走

到与党的路线绝对相反的方面。

国际不止一次的指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到了苏维埃阶段，革命的动力是工人农民（贫农、中农）和城市贫民。党要巩固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在农村实行倚靠贫农，联合中农，反对富农，这样才能保障民主革命彻底胜利，并转变这一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

为着能动员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积极参加革命和革命战争，就必须尽可能改善工人生活，正确的领导工人经济斗争，实行劳动法，解决失业工人问题，扩大产业工会组织，不让一个革命的工人留在工会之外，要输送大批工人干部到苏维埃、红军、贫农团等去担任领导工作。对于农民群众，必须彻底实行土地法，使土地革命的果实落在贫农、中农的身上。要组织贫农团，联合中农于其周围，使之成为与富农斗争的武器。最后，为着从经济上巩固工农联盟，必须巩固和发展苏维埃经济，发展工业、农业和商业，发展合作社，以满足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的需要。"中央局必须着重的指出，这些紧急任务的能否完成，要依靠于我们是否能在广大群众中造成以一切奉献给革命战争以争取革命战争胜利的热情与兴奋而决定。只有群众动员的深入，只要彻底的实行土地法与劳动法等，以改善群众的生活，来发展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才能保障这些任务的完全实现"(二月八日决议)。

江西的罗明路线者怎样主张的呢？他们主张革命的动力不是工农劳苦群众，而是流氓，因为他们认为工农群众，在边区是悲观失望的，在中心区是太平享乐的，都不愿革命了，所以只能利用流氓来领导革命。从这里出发，他们取消工人运动，根本不理工会组织，拒绝引进工人干部，甚至抑制工人干部。他们虽然胡说现在苏维埃运动只是土地革命的，他们却反对彻底解决土地问题，说土地是一次分不好的，要经过三次四次以至好几次，甚至主张“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富农路线。在他们工作过的地方，是土地问题最没有彻底解决的地方。对于贫农团，他们同样是不理的。对于发展春耕运动，发展合作社。是怠工的。——这里显然的又是与党的进攻路线绝对相反的。

第四，便是他们的官僚主义领导方式。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罗明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去倾听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不去分析具体的事实和个别的情形，给以具体的个别的指导，而坐在房子里发命令，命令党员和群众去执行，执行不通的时候，便骂群众悲观失望，实行强迫和惩办，结果使党脱离群众。许多从会、寻、安来的干部说，会、寻、安的党员和群众听到邓小平要来，便害怕不敢见面。这就是江西罗明路线领袖们实行官僚主义的最好的成绩。

依据右面的分析，邓、毛、谢、古等在江西创造了执行了一条反国际的反党的路线。这条路线已经形成了具体的政纲，策略方面，口号方面，组织形式上，全部与党的进攻路线对抗起来，已经使江西边区的党遭受了大的损害。

(二)"速即解散一切根据特殊政纲组成的派别，不然则无条件的立即开除出党"(列宁)。

江西罗明路线的创造者，不仅创造了和执行了一条机会主义路线，并且已经根据他们的机会主义政纲，而组成了一个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这是一切顽强的机会主义者必然要走的道路。

无论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他们都曾经是立三主义的坚决执行者。可是他们在四中全会后，坚持自己的机会主义和派别的立场，在反立三路线和反右派的斗争上，对党采取了两面派的态度。

那时，邓小平在上海不仅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且在掩藏在两副面孔的下面，散播对于四中全会后中央领导的不信仰，实际就是在反对共产国际和四中全会。一点也没有奇怪的，邓小平到了苏区，曾会在党大会前后，与毛、谢等共同提出了对四次战争的机会主义的口号，共同进行反对中央局的活动。在这次总结会议上，他对于谢唯俊、毛泽覃公开在会场上进行反党的活动默不作声，对古柏仅作了一次外交形式的批评，这不是偶然的，而是表明邓小平一向在进行反党的派别的活动。为什么恰恰与谢、毛等一鼻孔出气？正因为过去有共同的机会主义观点，后来更有共同的罗明路线的机会主义政纲。一种派别总是建筑在一个共同的政纲上面的。邓小平在他第一次声明书上说，"我的错误的来源之一，是由于有派别观念"，"四中全会后，由于反新领导的派别观念，逃避了反立三路线和反右派的斗争，不愿意对立三路线时代的错误，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来进行布尔塞维克的检查与揭发"。邓小平在这里掩盖了自己在四中全会后对于机会主义的坚持。事实上正因为邓小平在四中全会后，还在坚持自己立三主义的错误，所以对于真正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的四中全会，和新的中央采取反对的立场，不过是掩藏在两面派的形式之下罢了。所以他当时对反右派的斗争，采取了"没有关系"的态度（邓小平这次还说，反右派与他没有关系）。邓小平一直到总结会议，还没有放弃他的派别的活动，正是因为他还在坚持自己罗明路线的错误，不能有别的解释。

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在四中全会后，不仅没有承认自己执行立三主义的错误，而且造成一种胡说："大城市上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上，却全是马克思主义"。正因为如此，他们在党大会前后，提出了机会主义的口号，进行反对中央局的活动；拿"洋房子先生"的口号反对中央局的领导，拿"找岔子"的口号反对中央局和省委对工作的批评；抵抗和破坏指导机关的指示，"合我的口味就执行，不合就不执行"；甚至从自己的派别的眼镜底下，诬蔑中央局每一个负责同志是一派的领袖。他们互相通讯、谈话和讨论，所谈的、写的、讨论的，并不是一般的政治问题，而是如本文前面所述的与党的路线绝对相反的机会主义的策略、口号以及反对领导机关等。因为这样，他们的通讯、谈话和讨论，完全向党秘密起来。不仅如此，他们对党的决议、指示，常实行怠工和破坏。很明显的，他们是形成一种秘密的结合，这种秘密结合有共同的机会主义政纲，反对党的领导机关，不执行党的决议和指示。这就明显的是一种小组织形式的结合。这种结合，虽然经过总结会议残酷的斗争，但一直到总结会议最后的一天，才完全暴露出来。

经过总结会议对邓、毛、谢、古等残酷的斗争以后，经过省委对于他们第一次声明书的决议以后，经过对于他们许多次教育和说服以后，我们应该检查一下他们四个同志是否诚恳的承认了错误和解除了自己的武装。最好拿他们第二次声明书来作标准。

首先看邓小平的第二次声明书吧！省委决议指出"邓小平同志对于自己的错误，没有遇着揭发和压迫，就隐瞒起来"，邓小平如何回答省委这一指责呢？他说"我觉得：第一是我感觉了解是错了，没有什么问题；第二是自己感觉到不会走到小组织的行动，不成严重问题。……"好一套外交词令！不要让他滑过了。第一，难道还不明显，邓小平所以始终不肯诚恳的认识和揭发自己的机会主义，从四中全会以来对于立三路线如此，现在对于罗明路线又是如此，很明显的是在坚持自己的机会主义，"等待机会再来反攻"（省委决议）？可是邓小平在这里又再一次的把这一根本问题掩盖过了。第二，邓小平直到今天还是只承认我有一个抽象的"派别观念"，而对于他所进行的反党的派别的活动，却不肯揭发出来。第三，在第二次声

明书上对于自己如何逃出第七军，如何在会、寻、安，还在去年十一月，就召集三县负责同志会议，计划放弃三县等这些极可耻的事实，一个字没有提及。所以第二次声明书，除开给了省委决议以外交词令的回答以外，什么也没有。

再看毛泽覃同志。他在第二次声明书中承认他有一个机会主义的路线。这条路线的政纲在他自己看来，只有简单的两条：第一条是"在土地问题上，在近来虽然执行了正确的办法，而在当时，就以为苏区内分了土地，阶级斗争已经不必要了"，这就是说他在很早（当时）的时候，对分配土地有点错误见解。第二条是认为"红军攻坚很困难，……主张红军在苏区内打，在苏区外打是没有办法的"。再看他如何揭发他的小组织行为。他说："许多机会主义的意见，不敢向党提出，仅只秘密的谈论，这种小组织行为……"说到他的小组织行为，便只是"秘密的谈论自己的机会主义意见"，而他自己的机会主义意见，又一共只有两条，并且有一条还是在很早的"当时"。那么党说他是罗明路线的创造者，是反党的小组织的领袖，岂不白冤枉了他吗？

再看古柏同志。在他写了整个十五张纸的第二次声明书中，除了说一些自己机会主义的观点而外，对于反党的小组织的行为的揭发，则几乎没有说到。古柏同志在总结会议上，曾经极力掩盖自己，想把自己装饰成一个完人，而在起草决议时，为着自己的小组织的利益，向党来一次反攻。现在在党的布尔塞维克的火力之下，不得不承认些错误，却不肯揭发小组织的反党的行为，这难道是偶然的？

谢唯俊同志的第二次声明书，依然没有系统的揭发自己反党的路线，而只简单的说了三条新区工作的政纲。对于个人反党的行为有些揭发，而对于小组织的行为，则极少揭发。这依然是不彻底的。

最后必须严重指出，四个同志对于自己的根据特殊政纲而组织的派别和小组织，至今没有给以组织上的揭发，也没有宣布如何解散这种派别和小组织。根据以上的事实，很明显，邓、毛、谢、古四个同志是没有解除他们的武装，虽然受了党的严重打击，而表示暂时的投降，但这种投降是不能保证他们能成为真正的战士的，因为他们的武装还没有解除下来。

（三）怎样开展这一斗争？

一、总结会议只是开始了真正的反罗明路线和根据这一路线而形成的派别和小组织。江西党的任务，就是要将这一斗争开展到全体党员中去、不让一个党员站在这个斗争的阵线以外。要在斗争的过程中检查每一个同志的思想，检查每一件具体的工作，把罗明路线或罗明路线的个别倾向，表现在个别同志和个别工作上面的，都能给以揭发和肃清。

二、党内斗争的目的，是为着党内思想和行动的一致，为着党在争取群众方面的策略、口号、斗争方式和组织形式的布尔塞维克化，而不是清谈。所以党内斗争的开展，必须紧密的联系到争取群众的方法，联系到去研究每一个群众斗争（如每一个查田分田的斗争，每一个工人的经济斗争等），每一个组织和鼓动群众的工作，我们在策略上、口号上、斗争方式上、组织方式上，是否是正确的，是否有右的或"左"的倾向，而给以正确的结论和指示。学习领导群众的艺术，要成为这一斗争的目的。

三、要把引进新的积极分子特别是工人干部到指导机关内，当作反罗明路线斗争中的主要任务之一。在真正正确的反机会主义斗争，即真正能把思想与实际联系起来的反机会主义斗争中，最能表现出那一个党员为党的路线而斗争是坚定的，工作是积极的，是与群众联系密切而在群众中有信仰的，党就要把这样的同志勇敢的引进到各级指导机关中来，参加指导工

作；同时对于不能称职的指导机关，应该实行部分的或全部的改造。

四、在开展反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对于许多原则上的问题，应当向党员群众作解释工作。对于一般党员的个别的倾向和错误，应当尽量作教育和说服的工作；不经过教育和说服，不经过斗争，而简单的采取组织上的办法，那么，便不能真正开展反机会主义斗争，不能教育党员。这种办法是于党有害的。故各级指导机关，应注意到预防这种弊病的发生。

五、在斗争中，不可免的要遇到少数顽强的机会主义分子，他们不诚恳的承认自己的错误，不服从党的决议，那么，对于这样的顽强的机会主义者，不采取必要的组织上的结论，就正如斯大林同志所指示："凡主张以党内思想斗争方法来'战胜'机会主义分子的理论，乃是迂腐的和危险的理论，能够使党陷于疯瘫和慢性病的状态，能够使党受机会主义宰割，能够使无产阶级丧失革命的政党，能够使无产阶级缺乏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武器"。尤其是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派别，更"是破坏组织和党内分裂的源泉。前方与帝国主义作战，而后方有这样'同盟军'，这就等于陷于腹背受敌的地位——前方敌人进攻，后方内奸捣乱。因此不顾惜与这些分子作战，并驱逐他们出党，乃是反帝国主义斗争胜利的先决条件"（斯大林）。

六、斯大林同志这一个指示，可以用来证明省委对于邓、毛、谢、古四同志所采取的组织上的结论，是绝对必要的。我们应该要求他们四同志完全不隐瞒的从政治上组织上向党揭发他们的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并且要求他们立即解散他们根据罗明路线而组织的派别和小组织，否则立即开除出党，同时却绝对不容许他们象古柏、毛泽覃一样，为自己派别的利益，诬蔑党的领袖是许多派别的首领。

这里必须警告那些曾经参加过或者助长过这种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分子，他们不要妄想在党正在集中火力对付邓、毛、谢、古的时候，用两面派的态度，掩盖自己的错误。布尔塞维克的火力，终久是不能躲避的，古柏就是一个最好的榜样呵！

七、最后，要彻底肃清罗明路线的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必须同时反对党内一切"左"的关门主义的倾向（如经济斗争中"左"的高调，如土地斗争中侵犯中农的利益等等）。"左"的机会主义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滋养料，不同时反对"左"倾，是不能彻底来肃清右倾机会主义和罗明路线的。在思想上和实际上进行真正的两条战线斗争，集中火力反对主要的右倾危险，把两条战线斗争，变成党的指导和行动的基础，这是江西党彻底实行工作转变的主要前提。

为加强党对革命战争的领导而斗争

——谭震林同志和我们的分歧——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五日）

寿　　昌

我们党以进攻路线领导工农群众和敌人作决死的战斗。在我们党的队伍内发生了极小部分同志的机会主义的动摇，从罗明同志以至于江西罗明路线邓古毛谢的小组织，从余泽鸿同志（闽赣）以至陈佑生（湘鄂赣）他们大多是小资产阶级出身，代表着地主残余富农的意识，来和党的路线对抗。充满着悲观消极的情绪，"他们象那脚患风湿，腰部肿痛、头昏颠倒，神志不清的龙钟老头儿，蹒跚于党内，满腔灰心失望，专说废话"，（斯大林）我们现在应该指出这种罗明路线、亦存在于部分的红军中的党，如象我们的谭震林同志便是腰痛脚软的机会主义者之一。

这一次闽粤赣省委扩大会议（六月十二日）对于谭震林同志的错误，开展了极猛烈的射击，无疑的这是反罗明路线斗争进一步的开展与深入，特别是克服和转变闽粤赣省党工作中历来的巨大的弱点——对于革命战争领导的软弱，有极大的意义。

谭震林同志正和其他的罗明路线机会主义者同样，有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共同观点，又翻出一些新花样来。

谭震林同志对目前政治形势有很荒谬的见解，他以一种市侩的非阶级的观点分析政治。因此，在去年汪陈出洋的时候，认为蒋粤战争有爆发的可能，十九路军阀与粤系军阀对闽西苏区的进攻，要暂时的停止，在十九路军包围陈国辉的时候，认为十九路军主要是为了争夺地盘，而不是为进攻革命，在今年三月间十九路军进占连城的时候，则更认为十九路军只是前来投机而并无决心。

震林同志这种观念不是没有受过指斥。闽粤赣省委曾经几次批评他的错误，但是震林同志始终虽是口头的接受，而牢牢的固执着自己的错误，他根本不了解在目前全世界走向革命与战争的阶段的过渡期中，国际的两个制度的对立与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尖锐化的基本矛盾。我们党并不否认军阀内部的矛盾，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军事的占领的结果，使国民党的统治更加分崩离折，这些正是有利于革命的发展和革命战争的胜利的开展的客观条件。但我们必须了解正因为国民党，日趋于崩溃没落，因此他必然更无耻的投降帝国主义，竭力的求得内部的妥协，对革命作最后的疯狂的进攻，如象谭震林同志的见解，事实上只是替代苏维埃的敌人传播其麻醉的影响到革命的队伍中来，松懈了我们的动员工作。

如果以为谭震林同志怀抱着这样错误的幻想，孩提般或者是天真的，乐天知命的在这个"敌人不会进攻"的幻想的摇篮中甜密的睡着了，那你便是错了。事实上震林同志经常的在恐慌失措的境象中颤抖着，在这点，震林同志是罗明同志的好徒弟，江西罗明路线的同道。

当幻想被现实所戳破的时候，当十九路军迫近他的摇篮的时候，于是震林同志悲啼了，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坚决采取纯碎是防御路线（提出以桃地小兰为第一防线，官庄水口濯田为第二防线等）而没有集结力量打击和消灭敌人以保卫闽西苏区的勇气和决心。即在党临时代表大会以后，在反罗明路线斗争的刺激下在黄潭，马洋洞，水西渡诸役，我们都得着相当的胜利，但正因为震林同志机会主义的领导，临事动摇，退缩畏怯，致不能开展战斗，争取战斗更大的胜利，以争取杭永苏区的恢复。特别在最后武平战役中，表示动摇和糊涂，甚至根本不了解这次战役的意义与任务。这些错误都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有利于我们的条件，没有任何信心，充分表现对敌人进攻的极端的恐慌，主张放弃苏区而退却逃跑，这和罗明同志的罗明路线和江西的罗明路线是完全一样。

应该指出，在红军中的党，如果存在着罗明路线的领导者，对于胜利的保障是非常危险的。由于对于争取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的任务缺乏胜利的信心，和罗明路线对于群众悲观失望的估计。震林同志犯了很多的错误，如在党临时代表大会以前对于扩大红军工作的取消观念,(只要逃兵归队，不要扩大红军的口号),对于地方武装以及游击战争的消极忽视，这种观念直到代表大会以后还不曾转变。对于新泉龙岩白沙新坊以及广大白区群众革命积极性估计不足，因此更不敢深入白区出击敌人而采取等待防守的路线等。

震林同志在扩大会议中以及写给省委的申明书，屡次企图以战略战术的错误掩盖其政治立场与政治路线的系统的错误，这正表明震林同志对战略战术原则的阶级性时代性的无知。震林同志机会主义的政治思想自然产生机会主义的战略。对于目前残酷的日益开展的国内战争所要求的无产阶级的战略，对于一切事物的明确的阶级分析，具有峻绝的气魄，以消灭敌人为战役和战斗的目的，这些震林同志是不了解的，扩大会议正确的指出谭震林同志的战略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诸葛亮式的。屈指一算，心血来潮，汪陈出洋，两广战争爆发，白军不会进攻，或者是分付人马在桃溪小兰濯田洪山埋伏，待诱敌深入，如此那般等几难道不明显吗？这种战略的阶级立场与时代环境的根据在何处呢？因此，在震林同志领导下的福建军区的一切工作的重大缺点，游击主义的传统。命令朝发夕改时时刻刻摇摆着，对于政治形势和敌情从没有过稳定正确的判断，缺乏机断专行的决心，以及参谋工作政治工作的薄弱等等，我想在此地没有细说的必要，总括言之。震林同志的机会主义领导非阶级的落后于时代及革命战争急剧发展的需要的战略的指导等，阻碍了我们创造铁的红军的任务的实现。

震林同志的错误是一贯的机会主义的性质，第一，他的思想雷同于江西罗明路线的邓毛古谢四同志，这在土地（震林同志不同意于不分阶级均分土地，抽肥补瘦等),对于四次围攻的悲观，对战略（诱敌深入，不到白区作战）对群众的悲观估计，以及对扩大红军与地方武装的消极等等问题上，都是明显可以看出的。特别在苏区党大会上，震林同志事实上参加邓小平等提出准备四次战争的机会主义口号以作反党的活动，第二，他的机会主义错误虽经中央局及省委的迭次指出，但是完全不被尊重，而坚持自己的意见，在这次扩大会议及其申明书中仍然不深刻揭发其全部机会主义的错误事实与根源，企图以战略和战术的错误脱离其政治立场和政治路线的内容。对于江西罗明路线及其小组织行动表示吞吐含糊的态度，这是表示震林同志未曾坚决舍弃其机会主义的反党的路线的思想的武装而准备随时的反攻。这证明震林同志熟读三国志，不仅学会了诸葛亮的战略，同时亦学会关公拖刀计的高明战术呢，但这却为布尔什维克党所不允许的。

闽粤赣省委扩大会议这一斗争，对于党对革命战争领导的加强有极大的意义。的确，我

们省委对于战争的领导是薄弱的，虽然，我们对于一分区三分区有了相当的领导。在和一分区的机会主义领导作斗争中，我们得以揭露李韶九先生的阶级立场的本质，而将他撵出组织以外，但到现在我们还未曾彻底转变一分区工作使坚决为进攻路线斗争。特别对于军区的领导以及和谭震林同志错误的斗争，我们在扩大会议以前，还未曾最大限度发扬我们的火力，而使他的错误继续影响及于军区。虽然军区在党临时代表大会工作得到部分的转变，但震林的领导，成为转变的最大阻碍。

我想，列宁宝贵的教训"抛开一切动摇，集一切力量，准备一切牺牲"，以争取战争的胜利，这将决不能看作一个空文，我们要努力求得其实践。在闽粤赣省学习江西光荣的经验动员整团整连的地方武装加入红军，加强军区及地方武装的领导，检查，督促各级党部，苏维埃与红军实现中革军委的战略战术的指导，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反对游击主义，提高军事技术与政治训练，学习苏联国内战争的经验和教训，提高和锻炼出时代的以及阶级的战略和战术，反对死守"三国演义"的"孙吴兵法""曾胡治兵语录"的腐朽思想。为得战争的需要，加紧在经济战线上的工作，首先是供给红军以粮食，保障红军的给养，这将是闽粤赣省党的目前迫切任务。

为完成这一任务，就必须发扬反罗明路线斗争的火力，对于头颠倒，腰痛脚软的朋友们务必给以布尔什维克的当头一棒，让他清醒过来，把腰竖起来，把脚跟立定，为进攻路线战斗。

对于谭震林同志的斗争，我们要教育全党，特别是福建军区内的党的组织，这一斗争的开展，将使福建军区工作有迅速的转变。

（原载《斗争》18期，1933年7月15日出版）

苏区中央局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

（一九三三年六月二日）

听了毛泽东与胡海同志的报告之后，中央局认为虽然在瑞金及其他县份中个别区域里，查田运动得到了很大的成绩与丰富的经验，但是整个的说来，查田运动还仅仅在开始的阶段上。为着总结现有的经验及在整个苏区中开展彻底的查田运动，必须指出：

(一)伟大的土地革命的浪潮，在它强有力地扫荡了农村中间封建半封建的势力，推翻了地主土豪在农村中的统治，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剥夺了他们千百年来借以奴役劳动农民的土地占有，没收了他们的土地，分配给了雇农、贫农、中农；但是由于封建的半封建的势力，在中国农村中的根深蒂固、在革命最初阶段上，雇农、贫农的组织性与觉悟程度之不足，以及党和苏维埃政权过去对于土地问题解决的不正确路线（如“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等），在许多区域中，土地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有些区域中，虽然已经分配了土地，但是地主、豪绅与富农，常常利用各种方法（或者假装革命，混入党、苏维埃机关，或者利用氏族的关系和影响，或者隐瞒田地，或者以物质的收买、政治的欺骗、武力的威吓），来阻止雇农、贫农的积极性的发展，以便利他们的土地占有，甚至窃取土地革命的果实。这种现象，除了个别的先进县区之外，在大多数区和乡中间，都是或多或少的存在着。

(二)在这种情形之下，查田运动成为发动群众深入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与肃清封建半封建的势力的有力的方法。查田运动，无疑的是一个剧烈与残酷的阶级斗争，是粉碎、扑灭地主豪绅的抵抗的顽强的斗争。在查田运动中，一方面大大的提高了雇农、贫农和中农的阶级觉悟、积极性与组织力量，另外一方面，地主豪绅的残余与富农，亦进行种种的反革命的企图，来破坏、抵抗查田运动的彻底的进行。这里，他们常用的方法，是利用他们混入党和苏维埃机关和贫农团的暗探，滥用党和苏维埃的威权，压制群众斗争的发展，欺骗、收买、威胁一部分群众，散布各种谣言，动摇中农群众，组织秘密会议，诬告陷害积极的苏维埃工作人员，直至暗杀积极的雇农、贫农与苏维埃的工作人员。因此，党的各组织的任务，是要依靠在雇农、贫农，巩固地与中农群众联合着，开展最热烈的斗争，来反对和剥夺地主残余与富农的一切反革命企图。依据在雇农、贫农及中农群众的积极性发展的基础上，适时的、无情的揭露、粉碎与镇压一切地主残余与富农的反抗，以深入阶级斗争及彻底进行土地革命到底。

一切以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的敷衍态度来对查田运动，是最有害的。这实际上，便是对于地主残余与富农抵抗土地革命彻底进行的投降与屈服。

(三)正因为查田运动是一个剧烈的阶级斗争，因此，明确的阶级路线，是保证这个运动胜利的必要的先决条件。这是说，我们应当最清晰的分别农村各个社会阶层与采取对于他们的正确与适当的策略。雇农群众，是城市无产阶级在农村中的兄弟，是土地革命的先锋队。

贫农群众，是党和无产阶级在农村中的支柱，彻底进行土地革命的积极拥护者。中农群众，是目前农村中最大的基本的队伍，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者。富农，是与封建剥削密切的联系着，并且大半是半封建的阶层，是敌视土地革命彻底进行的力量。地主，是土地革命与苏维埃运动凶恶的敌人。这里，党的正确的策略，应该是依靠在雇农及贫农（农村中无产阶级及半无产阶级），与中农群众结成巩固的联盟，并使雇农群众在查田运动中，起先锋队的领导作用，来消灭地主阶级的残余势力，削弱富农经济上的势力与打击他们窃取土地革命果实的企图。根据现在所有的经验，在执行这个总的策略路线的时候，应该特别注意的是：第一，加强与发扬雇农及农村中的工人在查田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因此，苏维埃的工作人员，必须与工会取得密切的联系，经过工会，来发展与组织农村工人的积极性，使他们成为查田运动的先锋。第二，必须特别的注意到与中农群众的联盟。中农是革命后苏维埃农村中最广大的基本群众，一切我们的处置与策略，必须获得他们的赞助和拥护；每一个贫农团与苏维埃的决定，必须使在以村或屋的群众会议上，得到中农群众的了解与拥护；一切中农群众的呼声，须最注意的倾听，并严厉的打击任何侵犯中农的企图。第三，必须把地主和富农分别清楚，在无情的消灭地主残余的斗争中，决不容许任何消灭富农的企图。当然，我们应对富农窃取土地革命果实的企图给以严厉的打击，没收他们多余的农具与好的田地，分给他们以坏的“劳动份地”。

（四）在查田运动中，必须动员尽可能的广大的群众，来完成这个任务。因此，必须经过党、团、工会的支部会，贫农团的会议，乡苏代表会，女工农妇代表会议等等，来进行这个动员。在这些会议中，须详细的解释查田运动的意义，解释分别阶级成份的标准与方法，检举每一个隐藏着的地主与分得好田的富农，在得到大多数的群众拥护之下，没收地主的一切土地及房屋、农具等等，及收回富农的好地。没收与收回的田地，除留一部分为公益地及红军公地外，应分给以前没有分得地的乡村工人及贫农。没收的东西，主要的应散发给当地的群众，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加提高群众的积极性。除了个别例外的情形外，一般的不应该采取全盘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法；必须使已分好的土地，在农民群众手中稳固起来。

（五）查田运动的真实的开展，将毫无问题的联系着党和苏维埃机关工作的改造和加强。必须在查田运动中，依据在农民群众斗争的开展上，来清洗一切混入党与苏维埃机关的地主富农的暗探，提拔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新的力量，新的干部，以健全与加强党和苏维埃机关的工作。在必要时，进行苏维埃的全部选举。但是这里必须得注意到群众的意志，和各个机关的具体的成份与工作状况；一切简单的命令主义，解散乡或区苏维埃和贫农团等等，将是不可允许的错误。在某些条件之下，这种举动，恰恰是适合着富农地主的阴谋。在这个运动中，同样必须加强健全与扩大一切群众的组织（工会、贫农团、女工农妇代表大会等等）。

（六）查田运动最密切联系到党和苏维埃工作的全部改造。首先是肃反与检举运动。因此，必须严格的纠正以为查田运动是土地部的事，党和苏维埃的其他各部，处于不理或旁观的地位。中央局责成各党部与苏维埃中的党团，采取具体的办法，来执行这个决议与中央政府的查田运动训令。

查田运动是广大区域内的中心重大任务

（一九三三年）

毛　泽　东

一切过去的经验都证明：只有土地问题的正确解决，只有在坚决的阶级的口号之下，把农村中阶级斗争的火焰掀起到最高的程度，才能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参加革命战争，参加苏维埃各方面的建设，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使苏维埃运动得着更大的力量，争取更大的发展与胜利。

依着土地革命发展的经验，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发展，是有他的大致的阶段的，就是(一)没收分配土地的阶段，(二)检查土地的阶段，(三)土地建设的阶段。依照土地斗争的三个发展阶段，在任何苏区之内，大致都有三种区域的存在，就是：(一)斗争深入区域，(二)斗争比较落后区域，(三)新发展区域

在新发展区域，土地斗争的发展，还在没收与分配土地的阶段，这里的中心问题，是以武力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权，建立革命的临时政权（革命委员会），建立地方的工农武装，建立革命的群众团体，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和富农的土地，分配土地给雇农，贫农，中农分给富农以坏田废除债务，焚田契与借约。这个阶段中的斗争，是包括革命与反革命开始接战以至革命打败反革命而实行处理他们的土地财产的这一整个的时期。

在斗争深入区域，这里已建设了巩固的苏维埃政权，地方武装与革命群众团体是广大的发展了，地主富农的封建半封建的势力已经完全克服下去，土地已经彻底分配好了，农民群众在土地问题上的斗争，已经进到了改良土地发展土地生产的阶段。所以这里的中心问题是土地建设问题。

在斗争落后区域，它的发展阶段介在上说两种阶段之间，它是从临时政权的时期进到了正式政权的时期，但还没有到政权的完全巩固时期。这里地主富农的公开的反革命斗争，已经在第一个时期被革命群众打败了，他们中间的许多分子，就从那时候起，摇身一变，把自己的反革命面具取下来，带上革命的面具，也赞成革命，也赞成分田，自称贫苦农民，照例应分土地。他们积极的活动，凭籍他们历史的优点，“说也是他们会说，写也是他们会写”，所以他们就在第一个时期中乘机偷取土地革命的果实。无数地方的事实，证明他们在把持临时政权，钻进地方武装，操纵革命团体，比较贫苦农民分得更多更好的土地。及至进到第二时期，因为上级政府的督促与群众斗争的发展，改造了革命委员会为苏维埃，群众团体与地方武装也经过了第一步的改造与发展，那些假装革命的分子，部分的被洗刷了出去。土地许多地方来了第二次的分配，甚至有第三次第四次的分配，地主富农偷取的土地也清

出了一部分来。但是苏维埃群众团体与地方武装中间，还依然躲藏着许多阶级异己分子，在那里“挂红带子称同志”，在那里造谣言，开私会，在那里骂群众的“左倾机会主义”，“乱打土豪”，“公报私仇”，或者他们“开会话得有劲，闭会一事不行”，当着斗争激烈的时候，他们组织反革命的秘密团体，如国民党，社会民主党，AB团，新共产党，以及各种各色的东西，来破坏革命，谋害革命的积极分子。总之地主富农阶级用各种方法来压制群众的斗争，企图保持他们政权上的与土地财产上的权利，保持他们残余的封建势力。在这些区域里，革命群众与地主富农之间是严重的斗争着，但这里的斗争，不是象第一时期里红旗子同白旗子的公开的斗争了，而是革命农民群众同戴假面具的地主富农分子的斗争。这种斗争有它的一种特别的困难，就是暗藏的反革命不比公开的反革命，农民群众能够一眼看清楚。加上农村中各种根深蒂固的封建关系如氏族关系等，要使农民群众的阶级觉悟程度，一般都认识到应该最后消灭封建残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就要求共产党与苏维埃政府一定要耐心地去向农民解释，一定要做许多艰苦的工作，要有正确的阶级路线与群众工作的方法，这里的中心问题，就是查田查阶级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不能最大的发展起来，封建残余势力不能完全打倒下去，苏维埃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巩固，扩大红军，筹措经费供给红军，扩大地方武装，进行土地建设与经济建设，发展文化教育等等重大的任务，都没有法子得到最大的成功。所以查田运动是这些区域里的最中心最重大的任务。

拿中央苏区来说，这种斗争比较落后的区域，占了全苏区的大部分，会昌，寻邬，安远，信丰，乐安，宜黄，广昌，石城，建宁，黎川，宁化，长汀，武平十三个全县，瑞金，雩都，博生，胜利，永丰的大部分，公略，万泰，赣县，上杭，永定，新泉的部分，就是兴国也还有均村黄塘两区，所有这些都是土地问题没有彻底解决的地方。

这些地方的农民群众还没有最广大的发动起来，封建势力还没有最后的克服下去，苏维埃政权中，群众团体中，地方武装中，还有不少的阶级异已分子在暗藏着活动着，还有不少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在各地暗中活动破坏革命。为了这个缘故，这些地方的战争动员与经济建设，都远落在先进区域（兴国差不多全县，胜利，赣县，万泰，公略，永丰，上杭的一部分，博生的黄陂区，瑞金的武阳区，雩都的新陂区，永定的溪南区等）之后，这种地方竟占了中央区差不多百分之八十的面积，群众在二百万以上。在这个广大区域内进行普遍的深入的查田运动，在二百万以上的群众中燃烧起最高度的阶级斗争的火焰，向着封建势力作最后一次的战争，而把它们完全打倒下去，是共产党与苏维埃政府一刻不容再缓的任务。

（原载《红色中华》86期，1933年6月17日）

在八县查田运动大会上的报告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四日）

毛　泽　东

一切过去的经验都证明：只有土地问题的正确解决，只有在坚决的阶级的口号之下，把农村中阶级斗争的火焰掀起到最高的程度，才能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参加革命斗争，参加苏维埃各方面的建设，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使苏维埃运动得着更大的力量，争取更大的发展与胜利。

依着土地革命发展的经验，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发展，是有他的大致的阶段的，就是(一)没收分配土地的阶段，(二)检查土地的阶段，(三)土地建设的阶段。依照土地斗争的三个发展阶段，在任何苏区之内，大致都有三种区域的存在，就是：(一)斗争深入区域，(二)斗争比较落后区域，(三)新发展区域。

在新发展区域，土地斗争的发展，还在没收与分配土地的阶段，这里的中心问题，是以武力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权，建立革命的临时政权（革命委员会），建立地方的工农武装及群众团体，才能保障阶级路线的正确执行，才能达到消灭封建残余势力的目的；一切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工作方式，是查田运动最大的敌人。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主要是讲阶级，通过阶级，没收分配，及对工会，贫农团的正确领导等。

一　讲 阶 级（做宣传）

一、查田运动的策略。是以工人为领导，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去削弱富农，消灭地主。宣传的内容，就是要向群众很清楚的说明这个策略。

二、为了说明这个策略起见，要将什么是地主，什么是富农，什么是中农，什么是贫农，什么是工人说清楚。在这个说明中证明地主是封建剥削者，富农是半封建剥削者，因此只有采取消灭地主削弱富农的政策，才能使土地革命的利益完全落到中农、贫农、工人身上。

三、但是富农与地主有分别，富农自己劳动，地主自己不劳动，所以对地主取消灭的政策，对富农则取削弱的政策，因此消灭富农的倾向是错误的，同时不应该把富农成份当做地主待遇。

四、对中农的策略——联合中农，是土地革命中最中心的策略。中农的向背，关系土地革命的成败。所以要反复向群众说明这个策略，说明侵犯中农利益是绝对不许可的。为了联合中农不侵犯中农利益起见，要提出“富裕中农”来说明他，要着重说明富农与中农交界地方，使富裕中农稳定起来。要揭破地主富农对于中农的欺骗，使中农脱离地主富农的影响，团结在贫农周围，一致向地主作斗争。

五、要揭破地主富农的每一欺骗口号，向群众做广泛的解释。要注意地主富农利用氏族的、地方的落后观念，来对中农贫农进行欺骗破坏。

六、要说明查田运动是粉碎敌人围剿的武器。因为把封建残余势力肃清了，去掉了敌人藏在苏区的捣乱者；广大群众革命热忱提高了，扩大红军，经济建设等项工作就更加好做。

七、要按照当地环境提出具体口号。如在落后的村子，要找出落后的原因，提出发动群众的具体口号。比如该地有反动地主威胁群众，因此群众不敢积极起来斗争，必须提出捉起这个地主的口号；又如当地政府人员犯了脱离群众的严重错误，使得群众不满意，就要从揭发这些人员的错误着手宣传，以发动群众斗争。

八、以上均是宣传的内容，以下再说宣传的方式。查田宣传的对象，第一要向乡一级干部分子（乡苏代表，各群众团体负责人）讲话，使他们首先明了，经过他们去宣传群众。第二要在工会与贫农团会议上讲话，使会员群众明了。第三要在村子群众大会上讲话，使每一个群众都明了。

九、宣传员，主要由乡一级积极干部分子担当，有布置的出席群众会议上去讲话。其次是组织宣传队，经过训练后派往群众中去讲话。

十、宣传的方法，第一、口头讲话，第二、贴布告，第三、写标语，第四、出传单，第五、演新剧，第六、墙报上做文章等等。

二 查 阶 级

一、查田运动是查阶级，不是按亩查田，按亩查田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

二、查阶级是查地主富农阶级，查剥削者，查他们隐藏在农民中间而实在不是农民的人，查这些少数人，决不是查中农贫农工人的阶级。因此不得挨家挨户去查，挨家挨户去查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

三、查阶级之前，一定要经过宣传的阶段，即讲阶级的阶段。不经过公开的普遍的讲阶级就动手去查，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

四、查阶级要发动工会贫农团的会员及其他群众多数人去查，要群众查了随时报告贫农团与查田委员会。不应该只是少数人去查，少数人去查要引起群众的恐慌，是绝对错误的。

五、查阶级要查明白。不论是一个地主，一个富农，要把他们过去的剥削情形和生活情形查得明明白白，才能使本人服罪，使群众满意；如只查了大概就下断语，那就容易弄错，本人不服，群众不满意，就阻碍了查田运动。对那些中农的成份，更要仔细查清，不使中农弄成富农，富农弄成地主。

六、一家阶级查出来的材料，要填在一张“阶级成份调查表”上，使大家好评论，日后好根究。如只讲在口里记在心上，或只是在薄上写两三行，易于遗失，是不好的。

三 通 过 阶 级

一、通过阶级就是决定阶级成份，是对这个人决定问题的时候，故要十分谨慎。一定要是查清楚了的，才能提出去通过。

二、通过的次序，首先是贫农团，要开贫农团大会。经过大家讨论，大多数人举手赞成，

才算在贫农团通过了。如有疑问的，移到下次讨论，此次不要通过。

三、第二是乡查田委员会，对于贫农团的意见加以审查，对的通过，不对的改正，怀疑的再调查。

四、第三是区土地部，区土地部决定不下的，提出于区查田委员会。区查田委员会决定不下的，提出交县土地部。

五、第四是村子群众会。一定要在本人村子里召集群众大会，向群众报告本人的剥削情形与生活情形，看群众赞成不赞成，赞成的通过，不赞成的再去调查，决不可硬要通过，如果硬要通过，就会引起群众不满，这就是命令主义，要坚决反对的。

六、以上通过阶级的四个步骤必不可少，特别是群众会通过，更加重要。许多地方，不经过群众通过就去没收，是错误的。

七、如果过去有通过错了的，如把中农当富农，富农当地主，地主当富农；应该推翻原案。要在群众大会上说明过去错误了，现在改正的理由，取得群众的满意。

八、过去弄错了现在翻过来的，如是中农一定要赔他的土地财产，即使田已分了，也要抽出赔他，如是富农，现在有赔则赔，如果实在没有赔，只好将来替他想别种方法。这种赔还，最能争取群众。如果将错就错，不肯改正，那是完全不对的。

四 没收分配

一、没收地主土地财产，没收富农土地及多余的耕牛农具房屋，只有经过村子群众大会得到群众的同意后，才能实行。决不可不得群众同意就去没收，决不可黑夜去没收。

二、没收了地主的财产除开现款及宝贵物件交政府财政部外，其他一切东西，都应分发群众，这是提高群众斗争热情的好方法。

三、趁着开村子群众会通过阶级的时候，举出临时的没收分配委员会，即刻没收，当场分配，不得迟延没收，不得迟延分配，不得把东西挑到政府里去再讲分配。

四、要分配给本村子，不可全乡平摊（大地主不在此例）。

五、首先要分配给红军家属、雇农、工人及其他群众的贫苦者，不可不分阶层同等分配。

六、猪鸡等物，煮起来在群众大会上使大家吃，不可工作人员少数人吃。

七、政府工作人员最好不要求分东西，以作模范。如果十分缺少用物，要取得群众的同意，在群众大会上通过，要防止工作人员自由拿东西。

八、没收的耕牛及重要农具，在群众同意下，由分得的人组织犁牛合作社，共同使用。

九、没收来的土地，迟延不分是不对的，除开留出红军公田及公共事业田外，要迅速分配。首先分给过去那些未分田及少分田的人。再有多时，以村为单位大家平分。山林、渔塘、房屋、茅厕，同样要迅速分配给群众。

十、在每次分配东西群众斗争热忱最高涨时，要适时的提出扩大红军，发展合作社等口号，领导群众热烈参加革命战争，热烈参加苏维埃建设。

五 工会贫农团

一、所有讲阶级、查阶级、通过阶级、没收分配等许多工作，都只有动员工会，动员贫

农团才能收得最大的效果。工会应成为农村阶级斗争的领导者，贫农团是农村阶级斗争的柱石。

二、正确的开展查田运动，依靠于工会指导自己的会员加入贫农团，在贫农团内部起积极的作用。

三、要发展贫农团，使贫农团成为广大贫农群众自由愿入的团体。

四、要洗刷贫农团中暗藏的坏分子。

五、贫农团在查田运动中要勤快开会，要抓紧查田运动为自己的中心工作。

六、要团结中农在贫农团的周围，贫农团的会议应该吸引中农来旁听。

七、工会贫农团领导查田斗争工作，不能违背前面各段所述的原则。

只有依照上面所述的策略与方法，来动员广大群众，才能使查田运动得到完满的成功。一切不做宣传，或宣传不正确、不认真、不普遍，查阶级、通过阶级与没收分配，不按阶级路线与群众路线，不得群众赞助与同意，都不能使查田运动收到成绩，反会使群众不满，阻碍查田运动的进行。因此反对查田运动中的侵犯中农，消灭富农的左倾机会主义，反对包庇地主富农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与工作方法，是正确开展查田运动的必要条件。

（《论查田运动》，苏南新华书店版）

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

（一九三三年八月）

毛　泽　东

一　伟大的胜利

查田运动在党与中央政府的号召之下，已经广泛的开展起来了。如果说，查田运动过去还仅仅在开始的阶段上，那么在六月的八县查田大会后，七月一个月的工作，便已超过了去冬以来大半年中所做的成绩。一般说，在开会的八个县中，查田运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形势，查田运动已经成了一个广大的群众运动。瑞金与博生成绩最大，两县共查出了二千几百家地主富农；胜利、雩都、会昌、汀东、长汀、石城、宁化各县，亦都有了初步的成绩。在一切查田有成绩的区乡，广大的群众斗争发动了。苏维埃工作中，党的工作中，许多过去停顿着的状态，现在都活泼起来了。苏维埃中的坏分子许多被洗刷出去了，暗藏在农村中的反革命分子，受到了严厉的镇压。一句话，封建残余势力，在广大群众面前遭受了惨败。在这个基础上，各种工作更加开展了。在查田有成绩的区域，扩大红军与扩大地方武装，推销经济建设公债与发展合作社，秋收秋耕与发展劳动互助社，以及俱乐部夜学小学等文化建设事业，都得到了极大的成绩。一切工作进行更加顺利了。在群众活跃的基础上，大批积极分子自己创造成为各种工作的干部，许多工农积极分子加入了党，被吸引到苏维埃工作中来。最好的例子是瑞金的壬田区。壬田区的查田运动在中央政府工作团帮助之下，五十五天中发动了全区的群众，彻底消灭了封建残余，查出了地主富农三百余家，枪决了群众所谓"大老虎"的十二个反革命分子，镇压了反革命活动。在群众面前检举了苏维埃工作人员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一些分子，清洗了一些混进苏维埃来的阶级异己分子出去。全区查出土地二万七千担，全区二万余劳苦群众差不多平均每人重新得了一担二斗谷土地，分配了豪绅地主的无数财物给予群众。依靠于群众积极性的空前提高，五十五天中扩大红军七百余人进瑞金模范师去，没有一个开小差。节省谷子卖给红军，达到一千九百余担，全县没有任何区比得上它。在各乡的要求下，全区担任推销经济建设公债四万元，地主罚款富农捐款已收得七千五百元，承认继续去筹的一万元，合作社迅速的发展了，文化教育建设如俱乐部识字班夜学也增加了。党员数量扩大，党的领导加强了，工会工作也进步了。全区另换了一种新气象，由瑞金的一个落后区，五十五天中变换了地位，成了与武阳区相等的一等区了。我们现在要问：壬田区为什么得到这样大的成绩呢？那我们应该指出：由于他们认识了查田任务的重要，由于他们的动员方式、阶级路线与群众工作，都是坚决执行了中央局与中央政府的正确指示，他们做了真正布尔什维克的工作。在任务的认识上，他们懂得查田运动与革命战争的密切联系，因此他们认真的做这个工作，抓紧了查田运动的领导，有计划的去布置当地的工作。在动员方式上，他们在全区十

一个乡中，抓紧了最落后的与比较落后的七个乡的工作，在这七个乡中动员了党，动员了团，动员了乡苏，动员了工会与贫农团及其他群众团体，经过他们去动员广大的群众。在阶级路线上，坚决执行了依靠雇农贫农与联合中农的策略，广大的发展了贫农团。他们说明了查田不是分田，查阶级不是查中农贫农雇农阶级，他们"讲阶级"的工作做得很充分。当着鹅凤乡的地主恐吓中农，使部分的中农发生恐慌的时候，我们的同志找了几个中农来作个别的谈话，经过他们去传达其他的中农，鹅凤乡的中农立即稳定起来，接着积极拥护苏维埃的查田政策，从受地主富农欺骗转变到与贫农工人一致联合进攻地主富农。壬田乡的同志亦曾错误的处置了几家成份，但他们迅速的改正了错误。关于领导群众斗争的工作，首先他们做了广泛的宣传，不是开全区全乡会，他们开的是村子屋子会，这样去接近更广大群众，向他们作了多次的宣传鼓动，所以全区群众都明了查田查阶级是自己的责任，自己的利益。其次调查阶级的成份，发动了多数人去查，详细搜集了各个成份的材料证明给群众看，所以没有发生群众不满意的事。其次通过阶级成份，是首先经过了查田委员会的分析决定，提交贫农团讨论通过，送达区苏批准，再到被没收人的村子里召集本村群众大会，解释明白，举手赞成，然后进行没收。在分配财产与土地上，工作人员都能了解自己应做模范不拿东西，而把东西完全分给群众，没收的村子多分，其他的村子少分，得到了群众的完全满意。土地也迅速分配了，别地拖延很久才分的现象，壬田区是没有的，所以迅速发动了群众。他们打进落后大村子的办法也是正确的，他们不畏惧这些大村子，他们也不用蛮干的办法去对付，他们对大村子是集中了火力，做了更多的宣传，从争取当地积极分子着手，团结他们，教育他们，经过他们去发动其他的群众。他们很耐心地去做这种村子里的工作，表面上看是迟慢的，但实际上是迅速的，他们在五十五天中把壬田区所有落后大村子一概发动了，很短时间消灭了这些村子的落后。柏坑乡的一个村子打不进去，原来那里有两个著名"大老虎"一向在作怪，他们就采取不同的办法，首先捉到这两个坏东西在当地开巡回法庭审判他，经过群众热烈拥护枪决他，那里的群众斗争就象烈火一般燃烧起来了。他们开了十次群众审判大会，三次巡回法庭，都是经过了极广泛的群众路线，本乡的人多到，别乡的人每村派代表，小乡十几人，大乡四五十人，所以每一次公审与裁判的结果，都立即传播到了全区各乡各村中去，不但使各个乡村的群众都觉得今天审判的这个人该罚该杀，而且使他们立即想到自己地方的那些同样作恶分子也该处治他。壬田区的查田运动真算得全苏区的模范！瑞金九堡区的工作也有极大成绩，他们是首先抓紧三个乡去做，召集各乡的查田委员会委员到区苏开了三天训练班，讲明了动员方式、阶级路线与争取群众的方法。他们在没收分配问题上创造了一个好办法。他们的办法是：要去没收一家地主了，就号召本村本屋的群众一同去，在群众大会上举出没收分配委员会，在群众的监视下进行没收，没收的东西堆在一个大坪上，再经过群众的同意立即分配给应得东西的群众。吃得的东西又是一个处置，就是杀猪煮饭让群众大家吃一顿。这个办法在九堡区收了极大的成效。他们的没收分配委员会不是经常组织的，而是临时组织的，更加密切联系了群众（关于土地的没收分配，仍由经常的土地委员会负责）。一切东西不挑到乡苏去，不待集中了若干家然后分配，免去了拖延时日与被别人偷了去的毛病。九堡区在其他的路线上方法上一般也是正确的，所以能够发动广大群众自己动手查阶级。他们办到了没有一个地主富农到乡苏区苏来闹成份，与过去查田时的情形完全相反，过去总有许多被查的地主富农到苏维埃来横闹，说把他们查错了。不但本人，甚至乡代表贫农团负责人也有来替他们求情讨保的。这次当然不是地主富农不闹了，而是要闹也闹不起来了，他们的同宗，他们的亲戚，没有一个人赞助他们，地主富农软了

劲，没有闹的可能了。这件事证明九堡区发动群众的工作做得极充分，不然是办不到这个地步的。

所有这些光荣模范的例子（这种例子别地还不少）给了党与中央政府的号召以布尔塞维克的回答，证明了中央局与中央政府的指示的绝对正确性。那一处完全执行了这些指示，那里就立刻取得伟大胜利。但是谁违背了这些指示，忽视了这些指示，那里的工作就犯了错误，没有成绩或者成绩很微弱。让我再拿事实来证明。

二 有些地方放弃查田运动的领导

查田运动的战斗任务，在中央局查田决议发出之后，在中央政府查田训令及召集八县查田大会之后，查田运动在各县的开展，并没有普及到一切地方，这如福建全省查田的成绩还只当得博生一县的成绩，胜利、雩都、会昌、石城每县的成绩，还只当得瑞金最好的一个区至两个区的成绩。各地有许多区的查田委员会没有开过一次会。甚至县查田委员会，亦还有几个县没有去抓紧全县的查田工作（会昌、雩都、石城、宁化）。许多区与乡的查田委员会，区乡主席不做主任，籍口别事忙，放弃查田不管。党对查田的领导，在一切查田有成绩的地方，都明显的表示出党的坚强领导作用，党员群众的大多数，在支部与区委的领导下做了很多布尔塞维克的勇敢战斗工作。但在一切查田没有成绩及成绩微弱地方，就表现出党部忽视查田运动，这如会昌县委在中央局查田决议发出后，差不多两个月没有讨论过一次查田工作，直到七月底才开了一次会讨论查田。瑞金的下肖区委在一个时期中，对查田运动完全放弃不管。瑞金城市区委虽为查田开过一次会，却没有推动四郊支部去注意查田的领导，各个支部没有为了查田运动开过会的。在别的地方如雩都、胜利、石城、宁化，县委与许多区委，同样没有用大力去注意查田工作，党与中央政府说："查田运动成为发动群众深入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与肃清封建半封建的有力方法"（中央局决议），"查田运动是各地苏维埃一刻不容再缓的任务"（中央政府训令），"查田运动是目前工作中心最主要的一环"（八县大会总结）。我们的许多同志却在说："忙得很，没有工夫照顾查田运动"。党的决议说："一切以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的敷衍态度来对查田运动，是最有害的"。这些同志却还是以官僚主义形式来对待查田运动。

三 有些地方竟对地主富农投降

在查田运动开展了的地方，也还表现许多个别的仍是严重的错误，那就是这些地方党部中苏维埃中还常常遇见到个别的同志，在查田运动这个激烈的阶级斗争面前，表现了他们的机会主义动摇，这主要在当着查田运动激烈发展的时候，他们丢弃不了姓族与地方的关系，包庇同姓同村的地主富农成份。或者错误的分析阶级成份，把地主当富农，富农当中农，有些裁判部的工作同志，在他们的极端疏忽中接受了地主富农假冒群众名义对于查田积极分子的诬告。另一方面我们有些保卫局与裁判部的同志，又没有能够跟着群众查阶级斗争的开展，去积极镇压反革命，甚至当着群众请求捉拿与枪决抵抗查田的地主富农分子时，还有不接受群众请求的，瑞金的裁判部就是做了许多这样错误的例子。

四　侵犯中农的倾向是最严重的危险

"左"的机会主义倾向，在七月查田中，又在很多地方发生了。这里应该着重指出的就是侵犯中农的倾向。虽然在中央局的决议上早已明白的写着："必须特别注意与中农群众的联盟，中农是革命后苏维埃农村中最广大的基本群众，一切我们的处置与策略，必须获得他们的赞助与拥护。每一个贫农团与苏维埃的决定，必须是在一村或一屋的群众会议上得到中农群众的拥护，一切中农群众的呼声，必须注意听。并须严厉的打击任何侵犯中农利益的企图"。在八县大会的结论上指出："查田的目标是查阶级，而不是再分田"，"联合中农应从不侵犯中农的利益做起"，"在查田的开始，应普遍宣传苏维埃联合中农不侵犯中农的政策。在查田进行中，应审慎决定那些介在中农与富农之间的疑似成份，不使弄错"。但是这样的指示，并没有为许多地方的同志们所注意。瑞金城区查田，一起始就按家按亩去查，查得中农恐慌，竟有中农跑到苏维埃来请求改变自己成份，他们请求改为贫农，他们说："中农危险得很，捱上就是富农，改为贫农咧，隔富农就远了一点"。这样沉痛的呼声，还不值得我们倾听吗？黄柏区洋古乡的同志向群众说："查阶级不查别的，只查中农富农地主阶级"。踏径区的同志，插起牌子遍查，查得一部分中农恐慌逃跑躲到山上。博生县的某些乡中，同样在插牌子遍查，同样发生了中农恐慌的事。八县大会的结论早已经说了："那种说到查田就以为应插牌子的意见，是不对的"，但全未为这些同志所注意，这种插牌子遍查的方法每县都有发生，这是异常严重的情形。他们把查田与分田混同了。不错，分田是应该插牌子的，是要一丘一丘查清数目，然后拿去分的，但若把这个办法应用到查田运动上来，那就混乱了农村中的斗争目标，过去我们曾经指出："查田与分田必须严格的分别，这种分别，不但为了巩固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使他们不起分田不定的恐慌，而且是为了查阶级斗争的胜利。必须集中全力，特别是联合中农，去对付地主富农的反抗，这种时候，决不应在农民自己的队伍中发生任何的纷扰"（八县大会结论）。这样的策略，是我们领导查田斗争中整个策略最重要的一部分，可是还为许多的同志忽视了。这种忽视，一刻也不能再忍耐下去。那些经过指导还故意在做这些错误的，当地的上级苏维埃须给他以严厉的处罚。要在党内团内开展思想斗争，反对任何党员团员侵犯中农利益违犯联合中农策略的思想与行为。已经做了错误，如已经没收了中农的土地财产的地方，苏维埃人员要向当地中农群众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把土地财产赔还他。去年兴国曾赔还许多中农的土地，取得了中农群众的满意，是一个宝贵的教训。

五　贫农团的关门主义与忽视雇农的领导作用是错误的

"贫农群众是党和无产阶级在农村中的支柱，彻底进行土地革命的坚决拥护者"，"依靠贫农"是我们查田运动及一切土地斗争的重要策略之一，而贫农团则是查田运动中有极伟大作用的团体。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已经指出过去贫农团的关门主义倾向是错误的，应该废除介绍制，向贫农工人打开大门，一切男女老少的贫农工人均可报名加入。但是，许多地方仍然沿着旧办法不改，仍然非有介绍不能进贫农团，甚至在瑞金踏径区当着尚未入会的贫农

群众跑来参加贫农团会议的时候，贫农团负责人居然拒绝他们参加。博生的竹蟀岌区，七月一个月中贫农团没有发展一人。在一切查田有成绩的区乡，贫农团是广大的发展了，而在没有成绩或成绩微弱的区乡，那里的一个表证，就是贫农团的关门主义状态。雇农在查田运动中的伟大的领导作用，同样为许多同志所不认识。党的决议说。"雇农群众是城市无产阶级在农村中的弟兄，是土地革命中的先锋队，因此苏维埃的工作人员必须与工会取得密切联系，经过工会来发展与组织工人群众的积极性，使他们成为查田运动的先锋。"我们的同志，依照这个指示去做的，仍然不是多数。这里主要的方法，是使农村工人加入贫农团，而在其中成立单独工人小组，经过这些工人小组，去团结贫农积极分子，发展贫农团，推动查田运动前进。黄柏区山河乡的经验是可宝贵的，当我们的同志两次召集贫农团开会不成的时候，就去开了一个农业工会与手艺工会的会员群众联合会，发动了几十个工人积极起来，每人带领一个贫农分子加入贫农团，第二天贫农团再开会，果然一齐到了，开展了山河乡的查田运动。山河乡这个经验应该把它运用到一切农村中去。这里工会的上级领导机关，应该给下级工会以积极的指导，要把查田任务看成为工会的重要任务之一。

六　关于富农问题的不正确观念

农村斗争中整个我们的策略，是依靠着贫农，坚决的联合中农，并使雇农起先锋队作用，团结所有一切力量，去消灭地主阶级与反对富农。关于富农问题，党已经正确的说了："必须把地主富农分别清楚，在无情的消灭地主残余斗争中，决不容许任何消灭富农的企图。"七月查田中，虽然还没有发现公开主张消灭富农的理论，但是把富农分子当做地主全部没收了他的家产的，就已经在许多地方发现了。这一错误的来源，是由于抹煞富农的劳动力。当着我们说："没有劳动或只有附带劳动而有地租等等剥削的是地主"的时候，有些地方就把在生产中用了有相当多的劳动的分子，认为是"附带劳动"一类，把他当地主看待。有些地方，则把富农兼有高利贷剥削的认为是"高利贷者"，而照着"消灭高利贷者"的办法去对付这种富农。有些则算陈账，算到革命前若干年上去，一人在革命前五六年甚至十几年前请过长工的，也把他当做富农；或者仅仅只请过一年两年长工前后没有请过的富裕中农分子，也放在富农一类。更加严重的是过去兴国某地方的例子，那里的办法，拿剥削的种数去分别地主与富农的成份，三种剥削的叫地主，两种剥削的叫富农，比如请了长工、收了租，又放了债，则不管他家里有几多人劳动，总之他就是地主了。还有"反动富农"这个问题，在许多地方弄得颇糊涂。武阳区一家富农兼商人，七个人吃饭，因过去他家有一人加入AB团，在两年前被杀了，两年之后那里的同志一定要全家没收他。在别的许多地方，同样发生许多这类的事情，把富农在暴动前不十分严重的反革命行为，如参加"收三成租谷"之类（瑞金），暴动后几年，他也没有做过反革命活动，群众的多数对他不要求惩办，而我们有些同志，则一定要没收他。正确地说，我们对待这类分子的办法，在巩固了的区域与尚未巩固的边区，应该有策略上的不同。在边区，无疑要采用严厉办法，镇压一切包括富农在内的反革命分子；在中心区则要分别情形决定，暴动前有过严重的反革命行为，或暴动后还在做反革命活动的，自然应该坚决的没收他，否则不应该没收。有些一家中只没收他本人以及同他反革命行为有直接关系的分子，其他的人则不没收。这样处置才是正确的处置。

七　工农检察部没有负起自己应有的责任，有些并且做出了错误

我们的工农检察部的同志，许多不认识查田运动开展中正是开展思想斗争，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贪污腐化与消极怠工，驱逐阶级异己分子出苏维埃去的最好时机，对于这些工作做得异常不够。许多我们工农检察部同志，在这个激烈的阶级斗争面前，表现了自己的消极动摇，自己的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甚至如瑞金市苏工农检察科长，包庇市苏裁判科长的极大贪污行为（私用公款千余元）。渡头区的工农检察科长对于区苏主席放弃查田运动不管，也不去批评他与检举他，工农检察部的检举运动，有些地方又走到了别的错误方向，把恋爱问题当作腐化，把拿了地主的东西当作贪污，对于这样的分子进行检举甚至公审，有些地方把犯了轻微错误的开除职务。不去有系统的发动自我批评，开展思想斗争，把这种艰苦的工作省去，而代之以简单的惩办主义。不消说，苏维埃工作人员中那些犯了长期与严重错误的分子，是应该坚决洗刷出去的；但是错误不到这种程度的也给予撤职处分，则是过分了。关于阶级异己分子的问题，普遍的只讲成份，不讲工作，只要是出身坏，不管他有怎样长久的斗争历史，过去与现在怎样正确执行党与苏维埃的路线政策，一律叫做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出去了事。完全不错，我们要坚决洗刷那些阶级异己分子，那些成份坏又加工作坏的（包括地主富农、消极怠工、贪污腐化等等），无疑地应该洗刷干净，但如果不是这样也把他洗刷出去，那就是过分的了。

八　关于查田斗争的领导艺术

了解了任务与路线，但没有领导群众斗争的布尔塞维克的艺术，查田运动是仍然不能开展的。本文的开头已经说了壬田区等处许多很好领导斗争的例子，但在另外许多地方却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不少的错误。有些地方对于地主富农集中的落后大村子，不知道用各种方法去发动斗争，即如有种大村子只有首先捉拿著名凶恶即群众所谓"大老虎"的那些豪绅地主分子，才能开展当地的斗争，我们的同志却没有这样去做。关于用分配没收来的财物去发动群众斗争这个最好的方法，还有许多地方不知道采用。在瑞金踏径区的瓦子乡，甚至把东西只发给查田干部与贫农团会员，其他不发，理由是自己不积极的不应分东西。有些地方没收的东西分配得很慢，甚至没收了一个多月还未发给群众。没收的土地分配得更慢，不少地方的同志不知道去动员苏维埃的各部，动员各个群众团体，不知道动员所有的党员团员，在各个群众团体中各个村屋中，去起核心领导作用。工作推不动，就说这里本来没有办法的。有些地方当着群众查阶级的斗争已经发动起来了，许多群众都来报告地主富农请求去查田没收时，我们的同志不能立即抓紧群众这个热潮去领导群众开展斗争，把查阶级的工作开展到各个村子里去。有些地方则在查了一番之后，群众的斗争热情不能继续向上高涨，表现了停顿状态的时候，我们的同志不能用各种方法去激励群众，使斗争继续高涨，一直领导到消灭一切封建残余的地步。许多地方当着经过了查田运动，群众斗争热情蓬勃发展起来了的时候，不知道把这种热情组织到别的战线上去，比如不当着群众得了东西得了土地的时候，即在那时的群众大会上，或在其

他一切有利时机，鼓动群众去当红军，去买公债票，去进合作社，鼓动群众去加紧秋收秋耕的工作，去建立俱乐部识字班，发展夜学与小学。把这种最好的时机放过去，另等上级对于这些工作的督促来了，才又重新开头去做宣传鼓动，这种落在群众斗争热情之后的尾巴主义的领导，乃是最有害于革命工作的。

另一方面，在许多别的地方，又发生了少数人蛮干的恶劣现象。我们曾经着重的指出：要反对对于争取大多数群众的忽视与命令主义的工作方式，只有耐心的艰苦的去做发动群众争取群众的工作，才能取得大多数群众的拥护，达到消灭封建残余的目的。这样的群众工作，是执行阶级路线的唯一保障。查田运动的开始，必须在一切村屋中做广大的宣传，向群众说明查田运动的必要，说明查田不是分田，查阶级不是查中农贫农雇农的阶级，特别重要的是把什么叫做地主富农中农向群众分析清楚。村屋的群众大会应该不只开一次，特别是那些落后的村屋应该多去开一次，应该不让一个革命群众不听到我们的宣传。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应该首先在乡苏代表会，工会，贫农团，女工农妇代表会，及其他群众团体中，向一切积极分子解释明白，经过他们去向广大群众作宣传。查阶级应该不是少数人去查，要发动多数人去查。通过阶级成份不但在贫农团乡苏与区苏通过，而且要在被没收人的村屋中开群众大会，取得群众的同意，才能进行没收。分发财物，要发给本村本屋群众，取得本村本屋群众的满意。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争取群众的大多数。党与苏维埃工作人员每个时候，每件工作，都不要忘记群众的大多数，我们要面向群众，是在要面向群众的大多数，我们的工作要深入群众，是在要深入一切大的小的村庄、一切大的小的市镇里的群众。要严厉反对少数人干的关门主义、命令主义错误办法。可是我们的同志许多地方并不是这样去做的。在瑞金，许多区乡中，没有向群众讲过一次阶级(没有分析过什么是地主富农中农)。在瑞金及别县的许多地方都发现不经过宣传就动手去查，以至地主富农跑出来造谣欺骗中农，说什么本乡地主富农多得很，或者说本乡有几百家地主富农要查(瑞金)，而我们的同志，还不知用明白的“讲阶级”办法，去打破这种造谣。广昌的地主说：“查田运动是中央政府要过去欠债的人把债还与中央”，我们同志没有立即去戳穿这种鬼话。在踏径区的几个乡中除了不做宣传之外，查阶级只是查田委员会的几个人去查，通过阶级不但不经过群众大会，连贫农团也不经过，他们说：“群众靠不住，群众不会分析阶级，阶级成份提到群众大会去通过是要发生纠纷的，还是只由查田委员会通过靠得住。”这个踏径区同志的理论，真算是天下奇闻！好几个地方没收地主时，不在白天而在晚上，唯一的理由是怕地主跑掉了。有一处地方开群众大会，用了“全区大会”的办法，可是到的不上两百人，三个人轮流从上午演说到下午，不让群众休息，也不让群众喝水吃饭，说是怕群众跑掉了。这样蠢干的办法，又算奇闻的一种。

九　开展两条战线斗争克服自己错误
争取查田运动的彻底胜利

无疑的，查田运动是在广大地域内开展了。但当着这个运动前进的时候，当着我们正确估计了已得成绩奠定了运动发展的基础的时候，我们还要警觉地注视运动中途的障碍物。只有发动两条战线斗争的火力去清除这些障碍，才能推进查田运动更加迅速的前进。开展反右倾的思想斗争，反对对查田运动严重意义的估计不足，反对对地主富农的妥协投降，反对

群众斗争的尾巴主义领导，是每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同时要把侵犯中农的危险唤起全体党员的注意，“要严厉打击任何侵犯中农利益的企图”，因为这是目前查田工作中已经明显表现出来了的十分严重的危险。对富农的不正确观念，也无疑要影响到中农上去。一切命令主义的蛮干，对于联合中农是最大的危害。两条战线斗争的火力扫荡了查田运动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物，查田运动就可以大踏步前进，它的彻底胜利就有了充分保障了。

（原载《红旗周报》61期）

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

（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

在分田与査田的斗争中，发生了许多实际问题.这些问题，或是以前的文件没有规定,或是规定不明悉，或是苏维埃工作人员解释不正确，以致执行上发生错误．人民委员会为了纠正及防止这些问题上的错误起见，除了批准“怎样分析阶级”,关于分析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工人的各项原则外，特作下面的规定：

(一)劳动与附带劳动

在普通情形下，一家中有一人每年有三分之一时间从事主要的劳动，叫做有劳动。一家中有一人每年从事主要的劳动的时间不满三分之一，或每年虽有三分之一时间从事劳动，但非主要的劳动，均叫做有附带劳动。

（注）这里应注意：一、富农自己劳动，地主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劳动。故劳动是区别富农与地主的主要标准。二、规定一家中劳动的标准人数为一人，如一家有数人，其中有一人劳动，这家即算有劳动。有些人以为要有二人甚至全家参加劳动，才算这家有劳动，这是不对的。三、规定劳动的标准时间，为一年的三分之一，即四个月。以从事主要劳动满四个月不满四个月,做为劳动与附带劳动的分界（即富农与地主的分界)。有些人把有半年时间从事主要劳动的，还算做附带劳动，这是不对的。四、所谓从事主要劳动，是指从事生产上主要工作部门的劳动，如犁田、莳田、割禾及其他生产上之重要劳动事项。但不限在农业生产上面，如砍柴、挑担及做其他重要劳动工作，都是主要劳动。五、所谓非主要劳动，是指各种辅助劳动，在生产中仅占次要地位者，如帮助芸草，帮助种菜，照顾耕牛等。六、劳动既是区别富农与地主的主要标准，因此对于那种只雇长工耕种，没有其他地租债利等剥削，自己负指挥生产之责，但不亲自从事主要劳动者，仍照地主待遇，不得分配土地。七、构成地主之成份的时间标准，以暴动时为起点，向上推算，连续过地主生活满三年者，即构成地主成份。

査田运动中，对于劳动与附带劳动问题,发生许多错误.或以有劳动当作只有附带劳动，把他判为地主。或以只有附带劳动当作有劳动，把他判为富农。都是因为过去对于地主与富农的分界没有明确标准的原故。依照上面规定，可以免去这种错误。

但上面的规定，是指“普通情形”而言。在特别情形下，须有不同的处置。这里有两方面的情形：第一方面，是大地主，而家中有人参加生产者。例如有人剥削地租债利的数量很大，如收租百担以上，或放债大洋千元以上，而家中人口不多，消费不大，则虽这家有人每年从事四个月以上的主要劳动，仍是地主，不是富农.例如人口甚多,消费甚大，则虽有百担

租或千元债，如果其家有人从事主要劳动，仍不是地主，而是富农。第二方面，是拿剥削情形说是地主，但到暴动前数年，因死亡或疾病原因，忽然丧失劳动力，不得不把土地全部出租或雇人耕种，因此，全家过地主生活，如果把这种人当地主待遇，是不妥当的，应照本人原来成份待遇。又如有人，名义上还是地主，但其土地权已属别人，剥削收入极少，本人已有附带劳动，甚至生活比农民不如者，此种人，应照富农分给坏田；其特甚者，在群众同意下，可照农民分田。再如有人过去是农民，暴动前二年，遇特别机会，突然致富，成了地主，土地固应没收，但因其二年前是农民，在群众同意下，亦可照富农分给坏田。

上述这些特别情形，查田运动中，有些地方把它忽视了，这也是不对的。

(二)富裕中农

富裕中农，是中农的一部分，对别人有轻微的剥削。其剥削收入的分量，以不超过其一家中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为限度。在某些情形下，剥削收入虽超过总收入百分之十五，但不超过百分之三十，而群众不加反对者，仍以富裕中农论。在苏维埃政权下，富裕中农的利益，应与一般中农，得到同等保护。

（注）这里应注意：一、富裕中农，是中农的一部分。富裕中农与其他的中农不同的地方，在于富裕中农对别人有轻微剥削，其他中农则一般无剥削。二、富裕中农与富农不同的地方，在于富裕中农一年剥削收入的分量，不超过其一家中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富农则超过百分之十五，这种界限的设置，是实际区分阶级成份时所需要的。三、所谓富裕中农的轻微剥削，是指雇牧童，或请零工，或请月工，或有少数钱放债，或放少数典租，或收少数学租，或有少数土地出租等。但所有这些剥削，在其一家生活的来源上，不占着重要的成份，即不超过百分之十五。而其一家重要部分的生活来源，是依靠自己的劳动。四、在接近暴动的时期内，虽曾经有过与富农在同等时间内的、剥削分量相同的剥削，但不超过二年者，仍以富裕中农论。五、所谓某些情形下，虽超过百分之十五，但不超过收入百分之三十，群众不加反对者，仍为富裕中农。这里所谓某些情形，是指剥削分量虽超过百分之十五，但家庭人口多，劳动力少，生活并不丰富，更有遭遇水旱灾荒，或逢疾病死丧，反而转向困难者。然而在这些情形下，在剥削分量不超过百分之三十者，不能认为富农，而应认为中农。若没有这些情形，则剥削收入超过总收入百分之十五者，即为富农，不应认为富裕中农。这些情形的正确判断，依靠于当地群众之公意。富裕中农，在农村中占着相当的数量，查田运动中，许多地方，把他们当做富农处置，这是不正确的。各地发生的侵犯中农事件，多半是侵犯了这种富裕中农，应该即刻改正。

举例：一、有人全家六人吃饭，二人劳动。有田五十担，收实谷三十五担（时价每担四元，共值百四十元），完全自耕。有屋五间，牛一只。有塘一口，出息大洋十二元。杂粮生产及养猪年收约一百元。放生谷三担，利加五，年收一担半（值六元），收了四年。放债大洋一百元（合小洋一千八百毛），利加二五，年收二十五元，放了五年。判断：此家靠自己劳动为主要生活来源，自己生产占二百五十元以上。对别人有债利剥削，但年收息只二十九元，在总收入百分之十五以下，全家开销后有剩余，生活颇好，但因剥削分量不大，故只算富裕中农，不是富农。二、全家五人吃饭，一个半人劳动。有田二十五担，收实谷十七担。租来田七十五担，收实谷四十二担，交租二十五担，交了十年，杂粮生产及养猪年收五十元，雇牧童一个，雇了三年。放债大洋六十元，利加三，年收十八元，放了四年。有屋五间，牛一只。有木子山一块，年摘木桃三十担。判断：此家生活主要靠自己劳动，每年剥削人家极少，不

过二十余元（雇牧童与放债合计），而受人剥削地租二十五担之多，全家开销所余无几，只能算普通中农，还不是富裕中农。

(三)富农的剥削时间与剥削分量

从暴动时起，向上推算，在连续三年之内，除自己参加生产之外，还依靠剥削为其一家生活来源之一部或大部，其剥削分量，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者，叫做富农。在某些情形之下，剥削分量，虽超过总收入百分之十五，但不超过百分之三十，而群众不加反对者，仍不是富农，而是富裕中农。

（注）这里应该注意的是：一、以暴动时为计算剥削时间的起点，而不能把其他任何时间作为计算剥削时间的起点。有些人算陈账，拿了中间空隔了的很早年代的剥削，作为决定阶级成份的根据，这是不对的。二、以连续三年的剥削，作为构成富农成份的标准时间，如果剥削时间不超过二年，或虽有三年而是中间空隔了的（不相连续的），虽其剥削分量与富农在同等时间的剥削分量相同，仍以富裕中农论。三、剥削的分量，必须是超过了全家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才能构成富农成份。如果剥削分量在总收入百分之十五以下，虽有三年或三年以上的连续性，也不能构成富农成份，而仍是富裕中农成份。四、所谓全家一年总收入是指自己生产部分与剥削他人的部分合计，例如某家全家，一年自己生产部分四百元，剥削他人部分一百元，合计五百元，即是总收入。他剥削部分占总收入百分之二十，故是富农。五、某些情形，是指家庭人口多，劳动力少，因此生活不丰富，或因天灾人祸反而转向困难者。在这种情形下，剥削分量虽超过百分之十五，但不超过百分之三十，群众不加反对者，仍以富裕中农论。这里，群众的意见是十分重要的，这种情形的考量，也是要十分仔细的，不应该把富裕中农弄做富农，引起中农的不满意。但同时，也不应把富农弄做富裕中农，引起贫农的不满意。所以应仔细的考量，要取得群众的同意。

査田运动中，对于这个时间与分量的问题，闹出许多纠纷，这是因为过去对于富农与富裕中农的分界，没有明确的标准，或把富裕中农当做富农处置，或把富农当做富裕中农处置，中间的争论，时常发生。现在规定的两者分界办法，可以免除这种弊病。

举例：一、全家十一人吃饭，二人劳动。自己有田百六十担，收实谷百二十担（值四百八十元）。有茶山二块，每年出息大洋三十元。有塘一口，每年出息大洋十五元。杂粮生产及养猪等，每年约值百五十元。经常雇长工一个，雇了七年，到革命时止，每年剥削剩余劳动约值七十元。放债大洋二百五十元，利加三，年收七十五元，放了五年，到革命时止。有一儿子是秀才，会做呈子打官司，借势欺人。判断：此家自己有劳动二人，但雇长工，又放债不少，剥削收入超过了全家总收入百分之十五，人口虽多，但开销后余钱不少，故是富农，应分坏田。他家有个劣绅，本人应不分田。二、全家三人吃饭，一人能从事主要劳动四个月。有田六十担，自耕三十担，收实谷十八担，出租田三十担，收租谷十二担，收了五年。经常每年请短工二十天，有牛一只，每年可收牛税谷二担。放债大洋一百二十元，利加三，年收三十六元，放了三年。判断：此家剥削收入超过自己生产，但因有一人从事四个月主要劳动，故是富农，应分坏田。

(四)反动富农

在暴动前，尤其在暴动后，有重大反革命行为的富农，叫做反动富农。反动富农应该没收他本人及其家属中参加了这种反革命行为的人的土地财产。

对于反动资本家，适用上述的原则。

（注）这里应该注意：一、必须是“有重大反革命行为”的富农，才叫做反动富农。如当暴动时，领导民团屠杀工农，对革命政府顽强抵抗；特别是暴动后，还在领导别人组织反革命团体机关，或个别进行重大反革命运动，如暗杀，当敌人侦探，自动替白军带路，逃往白区帮助国民党，积极破坏查田运动与经济建设等。这种富农出身而有重大反革命行为的分子，经证明确实者，没收其土地财产。其他富农中，虽有反革命行为，但不是有领导的或重要的行为者，均不得没收其土地财产。二、反动富农家属之中。只没收参加了这种重大反革命行为的分子的土地财产，其他分子的土地财产，则不没收。三、以找生活为目的，暂时跑去白区的，不是反动富农，不应没收家产。但不愿在苏区居住，而跑去白区居住，满一年不回来者，虽不是反动富农，仍应没收家产。四、对于反动资本家之定义与处置，完全适用以上之规定，过去许多地方把没有重大反革命行为的富农分子的土地财产没收了，并且一家中，把没有参加反革命行为的富农分子的土地财产也没收了，这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一个来源，是在江西没收分配土地条例的第三条：“凡加入反革命组织（如AB团，社会民主党等）的富农，全家没收”，不分首领与附从，不分参加者与未参加者。关于家属问题，虽在这一条的后半指出了：“其家属未加入反革命组织，又无反革命行为，并与其家中反革命分子脱离关系，当地群众不反对者，得发还其土地”，但前既全家没收，后才发还一部，仍非正当办法。因此，这一条应照现在规定修正。又过去有些地方，扩大反动资本家的范围，没收了一些不应没收的商店，这也是不对的。

举例：全家九人吃饭，一人劳动，又一人附带劳动。有田百六十担，自耕八十担，收实谷四十五担。出租田八十担，收租四十担，收了十年。有山五块，出息每年大洋七十元。经常雇长工一人。欠债大洋四百二十五元，利加二五，欠了三年。放债大洋三百八十元，利加三，放了五年。有一人当靖卫团连长，当了两年，与赤卫军作战五回。又有一人加入AB团半年，不是重要分子，已向政府自首。家里其他各人，无明显反动行为。判断：此家成份是富农。有一人做了重大反革命工作，此人是反动富农，应没收家产。其他各人不应没收。另一人虽加入AB团，不是重要分子，又自首了，也不应没收。

(五)富农捐款

在削弱富农的政策下，在国内战争时期中，除了实行分给坏田，没收多余的房屋、耕牛、农具、征收较高的累进税，这些基本的办法外，再向富农要求临时捐款，是应该的。但捐款数量，至多不得超过富农现有活动款项全数百分之四十。捐款的次数，也应有限制。

（注）一、近来进行富农捐款，发生两种倾向：一种是包庇富农不去捐款，一种把富农现款捐尽，与地主罚款无别。两者都是不对的，而后者则是消灭富农的倾向企图，并有影响到中农的危险。现规定至多不得超过百分之四十，各地可按富农过去是否交过捐款，及现在家况如何，在上述最高限度规定内，分别要求富农捐出适当的部分。二、捐款，是临时性质，与经常的土地税不同，故捐款次数应有限制，不能捐至多次，毫无止境。三、向富农捐款之权，限于国家财政机关，任何其他机关，不得向富农捐款。

(六)富农应有的土地、房屋、耕牛、农具

凡确定为富农应有的土地、房屋、耕牛、农具等，在遵守苏维埃法令下，富农自己有处置之权，他人不得妨碍。仅在便利生产又得富农同意的条件下，工农贫民才可与富农斢换房屋。

（注）一、近来有些地方，发生工农贫民拿自己的土地、房屋、耕牛、农具，斢换富农

应有的土地、房屋、耕牛、农具，甚至有斢换衣服肥料事情，这是不对的。因为“削弱富农”应有限制，分给较坏的劳动份地，没收多余的房屋、耕牛、农具，征收较高的累进税，并要求捐出一部分现款，这样“削弱”的政策，已经实现了。超过这种限制，就是消灭富农的倾向，在目前革命阶段上，是不应该的。只有在便利生产，并得富农同意的条件下，才可将房屋互相斢换。二、土地问题正确解决以后，如富农分得之坏田已经改良，变成好田，他人不得再去斢换。三、暴动后，富农添置的耕牛、农具、房屋，确有多余，不得再行没收或斢换。

(七)富农的义务劳动

富农应当比工农贫民担负国家较多的义务劳动，但以不妨碍富农的生产为限度。

(注）责成富农担负义务劳动与责成地主担负义务劳动，应有分别。地主的壮丁，应该完全编入劳役队，加以训练，使之参加国家与当地的劳动工作，在劳动过程中，改造其阶级性，消灭地主阶级。富农应该比较工农贫民担负更多的义务劳动，但不能同地主一样，使之担负无限制的义务劳动，致妨碍生产。因此，把富农与地主编在一个劳役队，在农事的紧张时期内，在富农劳动力没有多余及没有补偿办法的情形下，使之担负长期脱离生产的义务劳动，是不正当的。但不妨碍生产，或富农劳动力有多余，或有其他补偿办法，则不在此例。

(八)破产地主

在暴动前，地主已经全部或最大部分失掉他在土地财产上的剥削，但仍不从事劳动，依靠欺骗掠夺或亲友接济等，为主要生活来源者，叫做破产地主。破产地主仍然是地主阶级的一部分，不得分配土地。但地主破产后，依靠自己劳动为主要生活来源，已满一年者，应予改变成份，有分配土地之权。地主破产后，依靠自己劳动为生活来源之一部，其分量达到其一年生活用费三分之一者，得照富农成份待遇。

(注）有些人把部分破产的地主，叫做破产地主，这是不对的。因为这种地主有部分产业依以剥削，这不过剥削的分量有改变罢了。有些人把破产后已经从事主要劳动满一年的，叫做破产地主，这更是不对的。因为地主破产后，从事主要劳动已满一年（指暴动前），他已经由地主变为工人、或贫民、或农民了。有些人把地主破产后，已经从事一部劳动者，仍照地主待遇，这也是不对的，因为其劳动已达到维持一年生活三分之一者，这种人已应该给予以富农待遇。

(九)贫民

农民、工人、独立生产者、自由职业者外，一切依靠自己劳动从事一种或几种职业者，或大部分依靠自己劳动力为生活者，或依靠极小资本，自己经营，以取得最低限度的生活费者，均叫做贫民。乡村及小市镇贫民分子失业者，应分配土地。城市贫民分子无房屋者，应分配城市中地主的房屋。

(注）贫民在城市中，占着相当大数量；在乡村及小市镇上，亦有一部分。贫民的职业，是很复杂的，有些贫民，一人的职业，常依季候更换，而不能固定。贫民的生活，是很困难的，他们的收入，常不够支出。

所谓依靠极小资本自己经营的贫民分子，是指小贩。

不剥削他人的医生、教员、律师、新闻记者、著作家、艺术家等，叫做自由职业者。

(一〇)知识分子

1．知识分子，不能看做一种阶级成份，知识分子的阶级成份，依其所属的阶级决定。

2．一切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在服从苏维埃法令的条件下，应该充分利用他

们为苏维埃服务。

3. 知识分子在他们从事非剥削别人的工作，如当教员、当编辑员、当新闻记者、当事务员及著作家、艺术家等，是一种使用脑力的劳动者。此种脑力劳动者，应受到苏维埃法律的保护。

（注）一、近来许多地方，无条件排除知识分子，这是不对的。利用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为苏维埃服务，是有利于苏维埃革命的政策。在他们为苏维埃服务的时间，应设法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二、所谓知识分子的阶级成份，依其所属阶级决定。如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是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是富农，中农出身的知识分子是中农。把知识分子看做是一种单独的成份是不对的。把农民子弟在学校读过书的分子（所谓毕业生），当做一种坏的成份，这更是不对的。三、把当教员等工作，看做不是劳动，这也是不对的。

(一一)游民无产者

在紧靠暴动前，工人、农民及其他民众，被地主资产阶级压迫剥削，因而失去职业和土地，连续依靠不正当方法为主要生活来源，满三年者，叫做游民无产者（习惯上叫做流氓）。

苏维埃对于游民无产者的政策，是争取其群众，反对其首领及其他依附剥削阶级积极参加反革命的分子。关于争取一般游民无产者群众的主要办法，是使他们回到生产上来，照一般革命民众的例，分配土地和工作，并给予选举权。但分配土地，须在乡村居住，并须自己能耕种者。

（注）这里应该注意：一、所谓依靠不正当方法为主要生活来源，是指从事偷盗、抢劫、欺骗、乞食、赌博、卖淫等项不正当职业。有些人对于在业或半失业而兼从事一部分不正当职业（非主要生活来源）的分子，概叫做流氓，这是不对的。甚至把工农贫民中过去染有不良习惯（如嫖、赌、吃鸦片）的人，都叫做流氓，这更是不对的。二、有些地方，对于积极参加反革命的游民无产者领袖分子（所谓流氓头）不加惩办，反而分田给他，这是不对的。有些地方，对于一般游民无产分子，又拒绝其分田的要求，这也是不对的。

(一二)宗教职业者

凡以牧师、神父、和尚、道士、斋公、看地、算命、卜卦等宗教迷信的职业为主要生活来源，满三年者（紧靠暴动前），叫做宗教职业者。宗教职业者，无选举权，并不得分配土地。

（注）凡有这些宗教迷信职业，而不是依为主要生活来源者，及依为主要生活来源而不满三年者，均不得称为宗教职业者。应各依其成份分别待遇，不得一律取消选举权，或一律不分土地。即是说，凡以这些宗教迷信为副业的，或依为主要职业不满三年的，如是工、农、贫民，均应有选举权，而居乡村者，均应分配土地。本人如此，家属更不待说。有些人把和尚、道士、看地、算命等人，叫做流氓，这是不对的。

(一三)红军战士中地主、富农出身的分子与土地

红军战士中地主富农出身的分子，在他们坚决为工农利益作战的条件下，不论指挥员、战斗员，本人及家属，都有分配土地之权。

（注）一、优待红军条例：第一条“凡红军战士家在苏维埃区域内的，本人及家属，均须与当地贫苦农民一般的平分土地、房屋、山林、水池”。这里，本已包括一切红军战士在内。但近来有些地方，只问社会出身，不问政治表现，把地主富农出身而坚决为工农利益作战的红军战士已经分得的土地，重新没收，这是错误的。所谓“红军战士家属”，是指父、母、妻、子、女及十六岁以下的弟妹，其他的人，不得享此权利。二、地主富农出身的红军战士，

如被开除军籍，得收回其土地。

（一四）工人的家庭是富农或地主者

工人的家庭是富农或地主者，工人的本人及其妻子，依其工人成份不变更。其应分土地与否，依其在乡村或在城市，分别处理。家中其他的人，照地主富农之成份处理。

（注）一、地主或富农家中，在紧靠暴动前，有人出卖劳动力已满一年者，应承认其为工人成份。本人及其妻子，照工人成份待遇，其应有的一部分财产不没收。工人本身及妻子如在乡村，应分配土地；本人及妻子如在城市，不应分配土地；本人在城市，妻子在乡村，本人不分配土地，妻子分配土地，家中其他的人，照地主富农成份处理，不得享受工人权利。家中如尚有其他成份，依其成份处理（例如：一家有人在乡村，靠收租放债为主要生活来源已满三年，此人是地主。有人出卖劳动力已满一年，此人是工人。又有人在市镇上开自做自卖的小手工业店已满一年，此人是独立生产者。各依其在一定时间内生活来源的性质，而决定其成份，又各依其成份而决定其在苏维埃法律下的待遇）。二、农村中工人、独立生产者、小学教员、医生等人中，有兼有小块土地，因乡村不够生活，出外谋生，而将其小块土地出租，并非依为主要生活来源者，应照一般农民分配土地，不能当地主看待。

（一五）地主、富农、资本家与工人、农民相互结婚后的阶级成份

1．结婚的行为，不能改变阶级成份。

2．地主、富农、资本家与工人、农民、贫民相互结婚后的阶级成份，依照结婚在暴动前后的分别，依照原来阶级成份的分别，并依照结婚后生活情形的分别，而决定其成份。

3．凡在暴动前结婚的：地主、富农、资本家女子嫁与工农贫民，从事劳动满一年者，承认其为工人或农民或贫民成份。不从事劳动，及从事劳动不满一年者，依原来成份不变更。工农贫民女子嫁与地主、富农、资本家，则须与地主、富农、资本家过同等生活满五年者，才能承认其为地主或富农或资本家成份。如生活不与地主、富农、资本家同等，而与工农贫民同等（即靠自己劳动为主要生活来源），或过同等生活不满五年者，依原来成份不变更。

4．凡在暴动后结婚的：工农贫民女子嫁与地主、富农、资本家，依原来成份不变更。地主、富农、资本家女子嫁与工农贫民，须从事劳动满五年者，承认其为工人或农民或贫民成份，如不从事劳动，及从事劳动不满五年者，依原来成份不变更。

5．不论何时与何种成份结婚，所生子女的成份与父同。

6．土地与公民权的应否享有，依其成份。

7．地主、富农、资本家女子嫁与工农贫民者，不得编入劳役队。随嫁的现款在五十元以下者，不得向他罚款或捐款。

8．暴动前，工农贫民以子女卖与地主、富农、资本家者，及工农贫民与地主、富农、资本家相互以女招郎者，其出卖子女及招来郎婿的成份与待遇，适用上述一至七条之规定。

9．暴动前，工农贫民与地主、富农、资本家相互以子过继者，不问过继时之年龄如何，在十岁以下者，成份不变更。从满十岁起，工农贫民之子，过继于地主、富农、资本家，与其过继父母，过同等生活满五年者，其成份同于过继父亲。如生活不与过继父母同等，而与生身父母同等者，依原来成份不变更。地主、富农、资本家之子，过继于工农贫民，与其过继父母过同等生活满三年者，其成份同于过继父母。如生活不与过继父母同等，而与生身父母同等，依原来成份不变更。

（注）这里所谓劳动，包括家务劳动在内。

(一六)地主、富农兼商人

1．地主兼商人的：其土地及与土地相连的房屋、财产没收。其商业及与商业相连的店铺、住房、财产等不没收。

2．富农兼商人的：其土地及与土地相连的房屋、财产，照富农成份处理。其商业及与商业相连的店铺、住房、财产均不没收。

3．对于地主、富农兼商人罚款或捐款，应限制在地主、富农部分，不能侵及商业部分。

4．商人不编入劳役队。

(一七)管公堂

管公堂是一种剥削。但应分别地主、富农或资本家管公堂与工农贫民管公堂的不同。

(注)管理各种祠庙、会社的土地财产，叫做管公堂。管公堂，无疑是剥削的一种，特别是地主阶级及富农，备着公堂，集中大量土地财产，成为剥削的主要方式之一。凡属这种为少数人把持操纵有大量剥削收入的公堂，管理公堂的行为，当然是构成管理者阶级成份的一个因素。但有些小的公堂，为工农贫民群众轮流管理，剥削数量极小，则不能构成管理者阶级成份的一个因素。有些人以为只要管过公堂的都是地主、富农或资本家，这是不对的。

(一八)一部分工作人员的生活问题

在苏维埃机关及其他革命组织的工作人员，未分配土地而生活特别困难者，本人及其家属可给分相当土地，或以其他方法解决其困难。

(注)已分配土地的一般苏维埃工作人员的生活，中央政府已有命令解决(即发动群众耕种其土地)，这里只说未分土地的人员。所谓家属，是指父、母、妻、子、女及十六岁以下的弟妹。

(一九)公共事业田

新区分配土地及老区检查出来的土地，重新分配时，应酌量留出为了桥梁、渡船、茶亭及农事试验场等公共事业而使用的土地。

(注)桥梁的修理，渡船的修理与船工的工资，茶亭的修理与茶亭的设置，这些公共事业的费用，均须按照需要，留出一部分土地。发动群众耕种。此外，县苏、区苏、乡苏还须在政府机关附近适当地方，留出一部分土地(县苏可留五〇担至一五〇担，区苏可留十五担至二十五担，乡苏可留五担至十担)，以为开办农事试验场之用。在农事试验场未开办以前，可租给农民耕种，只收最低的田租。

(二〇)债务问题

1．在暴动前，凡地主、富农、资本家以金钱或物品贷付于工农贫民者，除店铺货账外，本利一概取消。凡工农贫民以金钱或物品存放于地主、富农、资本家者，其本利应照数归还。

2．专靠或大部分靠高利贷剥削为一家主要生活来源者，叫做高利贷者。高利贷者，照地主成份处理。

3．在暴动后的债务，凡不违背中央政府颁布之暂行借贷条例者，均应归还。

(注)有高利贷剥削(一切国民党统治区域，不论城市乡村，债务中最大多数，都是高利贷剥削)，但不是专靠或大部分靠高利贷为其一家主要生活来源的，不能叫做高利贷者，而采取完全没收的政策，应各依其成份处理。以为凡有高利贷剥削的，都是高利贷者，这是不对的。一面放债，一面欠债的，应将其“欠人”、“人欠”，互相抵销，看其剩余部分的性质与程度，再与本人其他剥削关系总合起来，决定其成份。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

全中国的民众们！日本帝国主义在英法帝国主义及国际联盟的公开援助之下，已经开始侵入华北。这是帝国主义强盗更进一步的完全瓜分中国及奴役整个中国的侵掠。这种侵掠造成了和平居民的整批残杀，城市与乡村的毁灭，以及痛苦与饥荒的增加。上海与满洲的惨状，在大部分的中国土地上，极残酷的重复着。

因为国民党军阀蒋介石张学良等的不抵抗与投降，因为他们对于抗日士兵的压迫遣散与屠杀，使中国士兵大批的死在帝国主义的枪炮之下，国民党军阀帮助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者更进一步的侵略与屠杀，同时他们用一切力量镇压反帝国主义斗争，抵货运动与组织武装的义勇军。

国民党政府及其政客，解释他们的罪恶行为卖国勾当的理由之一，就是说中国苏维埃的存在，使他们不能动员一切力量来进行国防，使蒋介石不愿意与日本军阀作战，而用将近一百万的大军，去进攻已经创立了自己的苏维埃政府的中国工农。

但是中国民众愿意自己保卫自己，许多部队与几十万的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反对屠杀自己的兄弟姐妹，赞成武装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他们开始了解只有武装的民族革命战争，能够胜利的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苏维埃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斥国民党的解释是愚笨的谎话，他们想用这些愚笨的谎话，在全国民众面前掩盖自己的卖国行为。

中华苏维埃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再一次提醒中国民众，我们在去年四月已经号召全国民众与我们一起共同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而蒋介石对于这个号召的回答是动员一切军队来进攻中国工农政府与工农红军，而不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

中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中国民众面前宣言：在下列条件之下，中国工农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我们要求中国民众及士兵，拥护这个号召，进行联合一致的民族革命战争，争取中国的

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将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斗争与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军阀的卖国与投降的斗争，联结起来，开展武装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朱　德

中央致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的信

——论反帝运动中的统一战线，一九三三年六月八日——

各级党部和全体同志们：

(一)目前的形势与建立广大的统一战线的重要：

“华北停战协定”的签字在任何程度上没有而且也不能阻止日本帝国主义的向前侵略以及因此而丝毫有所缓和目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且恰恰相反。停战协定更给了日本强盗继续和加强侵略华北与整个中国的许多方便，给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以更大的刺激来瓜分中国。事实上也正在如此。停战协定签字后之数日，便轰传藏兵分三路进攻青海，回族军阀马仲英在英国指使之下称兵新疆，实行割裂的企图。宋子文代表南京政府向美国所借的五千万元美金“棉麦”大借款，也于此时公布，都不是偶然，至于在“停战”后的华北，正进行和开展着非常严重的局面，那尤是有目共睹。

1．帝国主义的清道夫——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按照卖国的协定，忙将中国军队撤退至“预定之线”，对不服撤退的部队便施以武装的压迫，把平津及河北数十县变成“非武装区”，送给日本帝国主义自由宰割；另一方面，则从撤退的部队中抽调入赣“剿共”以与帝国主义者分工合作，压迫中国革命。

2．在日本强盗的枪尖上在河北树起了第二个傀儡政府，以确立囊括整个华北与中国的更逼近的根据。协定签字以后，日本军队至今并未后撤，且撤亦不过至“长城之线”，南下西进，随时皆可自由行动。平津近郊的日兵多移增至平津（北平已由二百名日兵增至二千五百名），扼守着华北的咽喉。

3．在日本帝国主义者卵翼之下的“伪军”如李际春等部则盘据河北，殆无撤退的任何准备，日本初则否认与这些部队的关系，继则提议警察以“警备”所谓“非武装区”，这实际上等于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现在日军似无大活动，但“伪军”之积极却较前增加，刘桂堂部已深入察省，日且宣称非夺取张家口无以保热河之安全，且连络内蒙王公，企图实现其满蒙政策，虎视着革命的外蒙共和国和进一步的进攻苏联。

4．日本之占据华北，必使各帝国主义国家之冲突加深，而对于日美在太平洋之争霸将益加强。“日本为保障华北海道交通计，将在黄河设立管理权，日曾在釜山附近建筑津轻海军根据地，现又将旅顺军港恢复，将来日如占青岛作第二根据地，则在黄海海面将永无他国舰影，日本种种计划与东亚大陆战争及对美战争之准备，均有关系”（“真理报”五月二十七日社论）。

5．日军进展当与中国亲日军阀之活跃相并行。日本将利用华北各派军阀之冲突——特别是在“停战”后防地之分配上，煽起大规模的军阀战争。冯玉祥方振武已开端于先。他如四川军阀战争正酣，西南的反蒋的酝酿，都昭示着各帝国主义列强正在积极准备便于他们瓜分中国的军阀战争。

在这一个严重而险恶的形势之前，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比任何时候都要严重：组织千百万的群众，号召他们及各种武装部队起来作反国民党卖国的战争，不许国民党这样干下去，起来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侵略，不许这些强盗们的侵犯中国，而建立在反帝运动中真正的统一战线，就是组织这一广大群众走上革命斗争的基本策略。只有团结与统一工人、农民及一切劳苦群众，才是民族抵抗的力量与胜利的保证。

因此，在目前建立和加强这一统一战线是有非常严重的意义：

（1）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国民党南京政府这一背叛民族利益的投降政策激起了广大群众的反帝和反国民党的斗争，但参加这一斗争和运动的群众有的曾经过了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的训练，有的是刚从政治上觉醒过来，有的是久经革命风暴的政治经济中心和区域，有的是不久才卷入革命斗争的漩涡，有的是彻底的革命工农分子，有的是动摇的不坚决的社会阶层。总之，社会的地位，政治的经验与由革命发展中之不平衡所造成的结果，都不能不影响着这一反帝反国民党运动的形式和程度。只有我们党坚决实行广大的统一战线，才能团结和组织千百万的广大群众进行这一反帝的革命斗争，才能团结一切反帝的力量。

党一方面要坚决的依靠民众自发革命运动的高涨，同时又要能够对于各种运动保持着统一领导的作用。正因为这种运动的领导，才能使我们很快的形成一支群众的政治军队，准备大规模的革命暴动与战争。

（2）我们党不应该抹杀这一事实，就是我们党的政治口号，还没有为大多数群众所了解与积极拥护。有的还在国民党各种民族武断宣传的影响之下依然幻想他的“新的生命”,有的还是为黄色工贼们所欺骗着，有的是在国家主义派及其他一切反动派别蒙蔽和麻醉之下。这只有在我们的党坚决实行广大统一战线的基础之上开展反对国民党及一切反动派别的斗争，才能把这些群众从这些反动的领导和他们的政治影响之下解放出来。

我们的策略是：火力集中在国民党和孤立一切反革命的妥协的党派。要达到这一点，我们就不应该站在群众和各种群众运动以外。党所提出的“武装民众进行民族革命战争”，“打倒国民党是这一民族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先决条件”等主张,以苏维埃政府前后三次关于“反日战争同盟”的宣言，便是揭破、打击国民党和孤立一切反革命的妥协党派，以争取最大多数群众——首先是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来完成反帝国主义革命的主要条件。

（3）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用一切力量来削弱中国民族的抵抗力量与分裂反帝的统一战线：制造军阀战争，压迫一切群众的反帝斗争，同各种民族的武断宣传来控制一部分的群众以及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之下，疯狂的进攻苏区，就是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这一政策的具体表现。只有我们党坚决实行广大统一战线并将这一群众的革命统一战线来对抗帝国主义和它的清道夫——国民党阻挠中国民族解放与压迫整个中国革命的统一战线，才能击破敌人的阴谋毒计，形成一个壮大的革命阵容。

（二）为什么没能建立起这一统一战线？

对反帝运动中建立统一战线的意义之确切的认识是非常必要而迫切。因为这正是我们的动力。考究目前我们党为什么不能在反帝斗争中建立统一战线的原因，中央认为必须着重指出者：

1． 没有充分坚苦的在企业中的工作以发动和领导的工人的群众斗争，及发展革命的工人的组织，不切实了解工厂作坊乃是我们建立统一战线的基本阵地。

现在，在工厂倒闭，各业减工，资本总进攻的基础之上开展着工人的罢工斗争，在上海、

无锡、南通、济南、武汉、天津……几乎无日没有工人的斗争，这是一个很顺利的客观形势。但我们党和赤色工会都没有抓紧这一斗争的形势，赤色工会组织上的发展依然不能令人满意，在天津没有一个在我们领导之下的反日的工人群众组织和工人义勇军，在上海的情形，也并不好些。无产阶级——这一全体劳苦群众的先锋队之政治上的动员和组织性的程度是值得特别警惕全党的。

中央认为：不保证反帝运动中有无产阶级的骨干，没有无产阶级广大的群众革命组织（赤色工会、罢工委员会、反日会、工人纠察队、工人义勇军等），则不必想在无产阶级的周围来实行真正革命的统一战线，或使之有利于无产阶级，也不必想夺得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因此尽量扩大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首先和特别是工人）和士兵群众的政治教育工作和组织，基本的是藉着发展他们的政治经济斗争的方法。这是中国共产党现在第一等基本的任务。

2．没有深入到一切有群众的地方和组织及参加各种群众的运动，而在许多情形之下是站在外面干叫。国民党所扮演的"航空救国"的把戏，且多少能把他变成群众的运动，欺骗着一部分的群众，我们则始终没有加入进去夺取其领导。在我们领导之下的群众组织——首先就是赤色工会，救国御侮会，不是不坚决的实行群众的路线，度着狭隘的生活，便是不进行坚苦的群众工作，把每一件工作进行一个彻底，有始有终。

正因为如此，就更便宜了国民党及一切反动派在许多地方还能施行其欺骗和控制群众的伎俩。因此尽量应用群众的路线，进行坚苦的布尔塞维克的群众工作，开展反对国民党及一切反动派的政治影响的斗争，是建立和巩固统一战线的主要条件之一。

3．但能否夺取广大的劳苦群众，那就要看我们党怎样能把自己的口号变成广大群众的口号以至使革命前进，怎样使党的政策不仅为先锋队及多数工人阶级所采纳，且亦为大多数民众所采纳。

在这一方面我们的弱点正多：有些同志不是关着门，空喊口号，便是把党内的中心的政治口号到处背诵，一般的只管一再重复的喊出来，不善于将他具体化，部分化和充实起来，使群众易于了解和接受。我们的工作方法，口号，都是千篇一律，不顾工作对象与环境之不同。

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口号只为少数先锋队所了解与拥护，许多党的组织和同志只会对先锋队说话，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学会对千百万的广大群众说话，用之以领导党者来同样的领导广大的群众。

在这里，我们应该记得："多数党政策上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他能把党的领导和群众的领导不相混淆，他很了解到第一种领导和第二种领导的根本区别，所以他不仅是一种党的领导之科学，同时也是群众的领导之科学"（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

现在仍在各处可以看到两种现象：一方面有些党的组织根本代替了群众的组织，以党内的工作方法来对付群众，这固然不能团结广大的群众；另方面则是那些群众组织内面的负责的领导同志完全抄袭党的工作方法和形式，以致有许多群众组织实际上变成了第二党的形式，这自然也不能组织成千成万的群众，遂形成目前群众组织较党尤为弱小的现象。

我们党在任何时候不应混淆党的和群众的领导，同时"能够使群众以自己的经验，相信党的口号的正确，并领导这些群众走上革命的地位，这是党夺取广大劳苦群众的最主要的条件"（斯大林，见同书）。

4. 没有坚决的利用半公开和公开活动的可能性。要组织广大的群众运动是不能按照秘密路线来进行的。只要把成千成万的群众都拖入秘密的活动是不可能的。这一个初步的真理的了解，对于处在地下党是非常重要，不进行艰苦的群众工作，发动广大的群众运动 固然不能争取公开和半公开活动的可能，但没有后者是没有法子能够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斗争，他是建立广大的群众的统一战线之必要的条件。

在这方面，在实际工作中也可看到两种不正确的倾向：不是模糊我们在群众组织和各种群众运动中之独立的政治面目，降低或放弃我们原则上的立场以无论如何求得所谓公开活动的可能，便是认为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血腥统治和白色恐怖之下争取公开的活动只是一种有害的幻想，或者是保持"革命的清高"不肯"同流合污"，这都是不正确的。

中央认为在目前争取公开和半公开的活动是非常迫切，这要求我们全党首先要进行艰苦的群众工作，改变和丰富我们的工作方式及如列宁所教训我们的"要学会取用一切武器"和抓着日常事变中一切问题来发动群众，不要和站在圆圈里的母鸡一样，自己束缚自己。

这些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建立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因。

(三)反帝统一战线的行动纲领。

目前中国的客观形势是很顺利的：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反动的统治造成了空前的民族危机，国民经济的破产，工农地位的恶化无以复加，小资产阶级城市贫民的困苦及士兵群众的牛马待遇，这样就引起了普遍于各大中心城市的工人斗争，继续不断的农民暴动，小资产阶级的不满，士兵群众的革命化和中国境内弱小民族的解放斗争。我们党应坚决的采取统一战线的策略，改正过去在这方面的错误与弱点，只有这样才能把这些群众的斗争和运动统一起来而汇合为一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的巨流，来配合目前胜利发展着的苏维埃运动，以促进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

在这一形势之下，我们党应该在广泛的基础之上，创造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首先利用工会、民众救国会等群众组织提出以下几点作为共同的行动纲领：

第一，打击国民党的投降叛变，指出希望国联与美国的援助是一个危险与失望的幻想。着重说明，只有团结并统一工人、农民及一切劳动群众才是民族抵抗力量与胜利的保证。

第二，着重的提出全国民众必须起来为保卫中国的领土与独立而作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

第三，号召民众参加反日的战争与游击战争。应当积极的援助群众抵制日货的行动与宣传，募捐援助义勇军。

第四，用军器库及入口的武器来武装民众。在同一基础上，没收大量物品以为抗日之用。

第五，完全脱离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和一切民族叛徒的影响，为获得我们的自由，必须取消一切对日债务和借款利息的支付，实施累进税以应付开支。

第六，中国必须完全对日绝交，动员整个海陆空军对日作战，立刻停止进攻苏区及军阀战争。

第七，反对国民党南京政府出卖东北和华北及中国的停战协定。

自然，这一行动的纲领，只是一般的概括的，在实际工作中须要我们对准着各个不同的对象与具体条件来零活的去运用。特别是不要忘掉工农士兵群众的切身要求，相反的是要在组织这些群众的日常政治经济的斗争基础之上，来发动他们走上拥护这些纲领的革命斗争。

(四)目前应该怎样行动？

根据目前的形势和这一行动纲领，我们党、工会、团除全部实现中央五月二十五日紧急通知中的指示外，应该立刻进行下列的工作：

1． 在各处召集群众大会，组织示威游行，反对卖国的“华北停战协定”，要求南京政府立即将协定的全文发表，并在各工厂、学校、兵营等处组织“反对华北停战协定委员会”“华北后援会”等。

2． 在这些群众大会上，游行示威中，鼓动群众要求南京政府立即宣布对日绝交，调全国海陆空军对日作战，不准派一个兵南下，特别在北方各部队中组织“反对南下进攻红军”的运动，在平汉路，津浦路组织铁路工人的怠工与罢工斗争，反对运兵南下。

3． 在各工厂、各学校、兵营组织和扩大抵货团，组织“反对还债给日本”的宣传队，并提出将这些赔款和利息全部来救济失业工友、灾民和城市贫民及抗日之用。

4． 组织工人的学生的抗日义勇军，要求政府发给武器，及组织群众夺取军器库的武器，特别是组织上海、天津等处的码头工人，没收外来的武器的斗争。

5． 英帝国主义帮助日本，在实际上占领了西藏，近且指使藏兵进攻青海及侵略新疆。我们应该将这些事实公布在广大群众的面前，发动反英的运动，组织“抵制英货”的斗争。

6． 在农村里，加紧发动农民群众不缴一个铜板的税给卖国的南京政府的运动，特别是在河北的战区里，要加强农民中的作用，不纳租，不缴税，组织农民游击战争。

7． 华北的抗日义勇军现在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前有日军的轰炸，后有国民党军阀及当地地主的反动武装的压迫，粮尽弹绝，过着极悲惨的生活，应该将这一事实在广大群众中宣传，要求南京政府予以充分的接济并组织群众的募捐，组织群众的捐款保管委员会，由群众派代表送至义勇军的部队。此外，应发动群众将“航空救国”的捐款买飞机送给义勇军及用作各种物质上的接济。

8． 各地之救国会应立即召集代表会议，创立有力的反帝组织来进行这一工作。

9． 工会方面，应以全国总工会及职业团体的名义提出保卫中国的领土是劳苦群众生死存亡的问题，且以共同斗争的唯一提议，去接近国民党工会、工人俱乐部、兄弟会、爱国团体以及无组织的工人。反对减工、反对减低工资及要求增加工资，要求政府与资本家救济一切工人，立刻释放一切政治犯，武装民众抵抗日本的侵略，用上述这些口号来提议具体的共同行动。

10．青年团应不惜一切力量，把党这一建立反日的统一战线的行动纲领使每个人都见到听到。在青年的一切会议上，工会、学校、抵货团体中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行动的提议，扯碎一切怠工的反动的领袖的假面具。

准备学生暑期休假时去发展农民运动的工作。

发展军事训练，向市政府要求集会权利与军事训练的设备，要求选择军事教官的权利，发武器给战斗员，要求有宣传的自由权。唤起并团结军队中的革命分子，在士兵群众中有力的宣传党的这个纲领，加强北方的工作。

11．各级党、团、工会的组织应动员一切力量努力宣传苏维埃政府前后几次的宣言，在工人、士兵、学生群众中组织实际的回响，把广大的群众团结在这一宣言的周围。加强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揭破国民党及一切反动派别的武断宣传。

12．各级党部应将中央这封信拿到党、团、工会及一切群众组织中讨论，加强的实行统一战线之重要，并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上用实际的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工作来回答中央的布尔塞维克的号召与指示。

此　致

布尔塞维克的敬礼！

中共中央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五日）

全中国的民众们！

自九一八事变到现在，国民党反日反帝的假面具，已经完全为铁的事实所粉碎，国民党已经最公开的变成了日本与一切帝国主义的走狗与瓜分中国的清道夫。全中国广大民众也从痛苦的切身经验中了解到只有打倒国民党，方才能够自动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同侵掠中国的日本与一切帝国主义直接作战，根本推翻帝国主义的在华统治，保障中国的独立统一与求得中国民众的彻底解放，同时苏维埃与红军反帝反国民党的伟大胜利，在全中国民众前面清楚的指出了只有坚决反帝反国民党的苏维埃的道路，才能把中国从帝国主义铁蹄之下，最后的解放出来。因此，广大群众反帝反国民党的革命斗争有了进一步的开展，他们对于苏维埃与红军的同情与拥护也是大大的增加了。他们要求的是中国政治经济危机中革命的出路！

在这一革命形势更加尖锐化的情形之下，在反革命国民党统治内部的进一步的动摇与崩溃，实是不足为奇的。在福建一部分国民党的领袖，因为国民党的根本破产，与广大群众的革命化，所以最后抛弃了国民党的尸体，自己创立了他们的生产大众党，把他们原来的国民党政府改组为人民革命政府，并且提出了他们新的主张与新的政纲。无疑的，这是国民党内部进一步的动摇与崩溃的最具体表现与重要关键！

但是自从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到现在，已经差不多有一个月了。它除了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对军阀官僚豪绅地主等的空喊之外，并没有任何真正反帝与反军阀官僚豪绅地主的实际行动。它一方面宣布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信仰示威罢工之自由，但是同时却宣布临时戒严条令以取消他们在口头上所给与人民的一切权利。它的政纲上写着肉体劳动与精神劳动均受最大的保护，然而它对于工人与劳动民众的生活，并没有采取任何改善的办法，它的“计口授田”实际上只是要农民不自动起来为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而斗争。同时它对于农民目前所不能忍受的苛捐杂税，以及一切压迫与痛苦状况，并无丝毫的改变，即是它所号召的反对蒋介石的斗争，也只有空喊，而并无具体的布置与行动。它的人民义勇军实际上不过是地主武装(民团）的改名。真正武装民众的工作，完全没有开始，一个月人民革命政府的存在，事实上证明，这一政府还不是人民的，而且还不是革命的。

中国共产党以及全中国民众，决不相信一切口头上宣言上的革命辞句与好听的名称。只有实际的革命行动才能证明一切政府的是否革命。福建的人民革命政府，如若停止于目前的状态，而不在行动上去证明它真正把言论出版集会信仰示威罢工之自由给与人民，它真正采取了紧急的办法去改善了工农与贫民的生活，它真正准备集中一切武装力量，并且武装广大工农群众去进行反日反蒋的战争，它不会同任何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府有什么区别，那它的一切行动，将不过是一些过去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们与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推翻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正是为了要维持

这一统治，为了要阻止全中国民众的革命化与他们向着苏维埃道路的迈进！

中国共产党始终认为只有民众自己独立的革命行动才能打倒日本与一切帝国主义，打倒一切反革命的国民党政府，希望或期待任何上层统治者的“革命”来代替民众自己的革命斗争，结果必然是不能补救的极大的失望！

中国共产党号召福建的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立刻自动的组织起来，成立工人自己的革命工会，农民自己的农民委员会与农民协会，成立吸收广大工农群众与革命学生与知识分子参加的反日会，成立反日反蒋的人民革命军，义勇军，以及各种各色人民的别动队，并且立刻要求人民革命政府散发武装，武装他们，联合革命的士兵群众同进攻福建的蒋介石部队与准备武装干涉福建的日本与任何帝国主义力量决战。福建的民众必须自动的依靠自己的力量立刻收回日本租界与关税，宣布一切对日不平等条约的无效，开展真正抵制日货的运动，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资本家的企业与财产，并且把它的海陆空军驱逐出福建。必须立刻逮捕一切卖国贼汉奸，镇压他们的反革命活动，并没收他们的一切财产来充实反日反蒋的战争经费，来分配给劳苦的民众，同时工人必须以罢工等斗争，来反对资本家残酷的剥削，以取得八小时工作制与工资的增加，农民必须以抗租抗税，解除地主武装，武装自己，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来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必须要求人民革命政府立刻采取紧急办法，救济城市与乡村的失业工人与贫民，并改良士兵的生活与待遇，此外福建的民众，应该立刻要求人民革命政府响应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历次反日反帝与反国民党的宣言与号召，不再进攻彻底反帝反国民党的中国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同苏维埃政府与红军联合一致去进攻中国民众的共同敌人——日本与一切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走狗中国国民党，首先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南京政府。福建的民众与全中国的民众，也就将在这一斗争中来试验到底这一人民革命政府是带有多少革命性的政府，还是完全是反革命派别骗人的把戏！

中国共产党向全中国民众宣言，在全中国民众前面只有两条道路，或者是帝国主义的国民党的殖民地的道路，或者是坚决反帝国主义的与反国民党的中国民族的解放的道路，只有工农兵以及劳苦民众的民众革命的胜利，才能保障中国民族解放道路的胜利。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一切想在革命与反革命中间找取第三条出路的分子，必然遭到惨酷的失败，而变为反革命进攻革命的辅助工具！

一切反帝反国民党的民众联合起来！

民众自动武装起来打倒日本与一切帝国主义！

打倒卖国辱国的国民党南京政府与一切国民党政府！

揭破一切欺骗民众的阴谋与武断宣传！

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附〕福州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利宣言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中国各地之人民代表，在以法西斯为灵魂之国民党、国民政府公然积极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出卖国家，残害人民，痛民瘼的危亡，已至最后的关头，为救护国家保障人权起见，乃临时集于福州。大会一致认定中国革命之中断，与年来中国殖民地化之加深，以及人民的种种痛苦，皆蒋介石媚外残民之结果，为求中国自由独立起见，大会一致作下列之基本决议：

甲　一、中国为中华全生产的人民之民主共和国，中国最高权力属于生产的农工及共同支持社会结构的商学兵代表大会；

二、中国国家之独立为不可侵犯之最高原则；

三、全国人民不论种族性别及职业，除背叛民族剥削农工者外，有绝对之自由平等权。

乙　一、为排出帝国主义在中国势力，打倒军阀，铲除封建残余制度，发展人民经济，实现彻底的民主解放；

二、否认一切帝国主义者强制订立之不平等条约，首先实现关税自主；

三、实行计口授田，以达到农业共营国营之目的，一切森林矿山河道荒地概归国有；

四、发展民族资本，奖励工业建设，凡有关于民族生存民生日用之重要企业，概归国营；

五、人民有劳动之权利义务，肃清军阀官僚豪绅地主等寄生分子及地痞流氓等游民分子，肉体劳动及精神劳动均受最大之保护；

六、人民有身体居住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示威罢工之自由；

七、人民有武装保卫国家之权利义务。

丙　人民临时代表大会认国民党政府为买办军阀豪绅地主之反革命政府，且为全民族最可耻之巨敌，为迅速推翻此反革命政府起见，大会更宣言：

一、否认南京反动政府；

二、号召全国反帝反国民政府之革命势力，立即组织人民革命政府，打倒以国民政府为中心之法西斯系统；

三、于最短期间召集第一次全国生产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解决国是。

（原载《国闻周报》10卷47期，1933年11月27日出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及"人民革命军"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六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政府及十九路军，双方为挽救中国民族之危亡，反对帝国主义殖民地化中国之阴谋，并实现苏维埃政府及红军每次宣言，准备进行反日的军事同盟，因此，订立初步协定条件如下：

（一）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暂时划定军事疆界线（如附件），在该线不得驻扎主力军队。同时，十九路军必须运用各种方式，排除或消灭存在福建与苏区接壤地间，妨碍贯彻该协定之一切障碍势力。

（二）双方恢复输出输入之商品贸易，并采取互助合作原则。

（三）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立即释放在福建各牢狱中的政治犯。

（四）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赞同福建境内革命的一切组织之活动（各民族抗日反帝团体及革命民众一切武装组织，并允许出版、言论、结社、集会、罢工之自由）。

（五）在初步协定签订后，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即根据订立本协定原则发表反蒋宣言，并立即进行反日反蒋军事行动之准备。

（六）初步协定签订后，互派全权代表常川互驻，应由双方政府负责，保护该代表等人员之一切安全。

（七）双方人员有必要往来时，由各驻代表要求签发互照通行证，双方负保护安全之责。

（八）本协定在福建及十九路军方面反日反蒋军事布置未完成前，双方对于协定交涉应严守秘密，协定之公布须得双方之同意。

（九）在完成上述条件后，双方应于最短期间，另定反日反蒋具体作战协定。

（十）双方贸易关系，应依互助互惠之原则另定商业条约。

（十一）本协定在双方全权代表签订草约后即发生效力，正式协定共计两份，经双方政府军事机关正式负责人签名盖章后，各执一份执照。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
工农红军全权代表　潘健行
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
全权代表　徐名鸿

（原载《红色中华》149期，1934年2月10日）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
致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与十九路军的第一电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与人民革命军的将士们：

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的代表同你们的代表订立反日反蒋的协定草约以来，已经有一个多月，但是我们直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你们积极的反日反蒋的行动，亦没有看到你们在发动群众斗争与武装民众进行反日反蒋的方面有任何具体的实际工作。而蒋介石却已经派了三个纵队向福州与延平进攻，日本帝国主义也已经准备好以占领福州厦门来响应蒋介石的军事行动，你们与福建广大民众是在极端危险的中间，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郑重的告诉你们，在这一危险前面的任何消极与迟疑不决，对于中国革命是极大的罪恶，因此苏维埃中央政府与工农红军要求你们立刻依照我们反日反蒋草约上所决定的基本原则，采取断然的行动，集中你们所有的武装力量，立刻开始反蒋的决战，同时必须最坚决的发动与武装广大的民众，组织真正人民革命军与义勇军，真正给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的民主权利来开展反日反蒋的群众斗争，我们相信只有依靠于千百万广大民众的力量，我们才能取得最后胜利，我们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准备在任何时候同你们联合，同你们订立作战的军事协定以反对与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党政府，我们盼望你们迅速告诉我们你们的决定。

毛泽东、朱　德

（原载《红色中华》149期，1934年2月14日）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
致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及人民革命军第二电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三日）

人民政府李陈蒋诸委员：

依据目前情势福州既濒危急，人民政府已在危险之中，苏维埃中央政府根据过去双方协定敢以反日反蒋联合战线的精神向贵政府作下列紧急提议：

一，人民政府应立即实践其宣言中及协定上所允诺的人民民主权利。

二，人民政府应立刻武装福州及其附近与泉漳各地的群众，赞助和拥护广大群众参加反日反蒋战线以保卫福州及泉漳各地。

三，赞助群众，立即组织反日反蒋的斗争团体，不应借口战局紧张妨碍或禁止这种组织的发展。

四，应实际的赞助蒋敌后方（如闽浙沿海各地）的民众武装组织，和反日反蒋活动。

五，应有决心的肃清自己队伍中准备向蒋介石投降，或请托帝国主义保护的分子。

六，向十九路军全体官兵宣布为反日反蒋只有与苏维埃和红军合作到底，并采取一切有效方法与联合一致的军事行动。

蒋介石与日帝国主义显已协同动作，并以扑灭十九路军为共同目的，贵政府果欲真正贯彻反日反蒋主张，则我们上述提议是挽救目前人民政府及十九路军濒于危险的唯一出路，亦即贵政府对于自己负责的宣言与协定中所许诺者究有决心实现与否之最后试验。要知反日反蒋的民众的与武装的战线果能真实建立，即使福州失陷蒋介石与日帝国主义者必不能长治久安，而这一联合战线在全国亦必日益开展无疑。且贵政府果肯武装民众赞助福建首先是福州人民自卫，则时局将有新的开展，福州未必不保也。时机危急，希即考虑赐复为盼。

毛泽东、朱　德

（原载《红色中华》149期，1934年2月14日）

中央为福建事变第二次宣言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全中国的民众们：

福建的所谓人民革命政府已经在国民党军阀刽子手蒋介石的武力的进攻面前，在反革命的领袖们的投降、叛变、与失败主义的策略之下，悲惨地结束了自己的存在！福建所谓人民政府昙花一现的历史及其最后的惨酷的破产，更一次的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正确。我们曾经在自己的宣言中指出："在全中国民众面前只有两条道路，或者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殖民地道路，或者是坚决的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只有工农兵以及劳苦民众的革命胜利，才能保障中国民族解放道路的胜利。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一切想在革命与反革命中间找寻第三条出路的分子必然要遭受到惨酷的失败，而变为反革命进攻革命的辅助工具！"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历史，正是反革命的改良主义的历史，正是空费气力的第三条道路的找寻者的历史。福建所谓人民革命政府的破产，完全不是说：中国的民众没有力量没有方法去胜利的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打倒帝国主义最大的工具的蒋介石！恰恰相反，它证明只有中国民众自己起来，依靠民众自己的独立的革命行动，在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领导之下，才能打倒日本与一切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清道夫的国民党政府。

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惨酷的失败与破产，和中国苏维埃运动与工农红军的伟大胜利与苗长，这个对照，最清楚的显示了，只有工农劳苦群众的革命斗争，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的胜利才能够把中国从严重的民族危机中解放出来，才能够使中国脱离殖民地奴役的地位而获得社会与民族的解放。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只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才是胜利的中国革命的唯一的领导者！

另一方面，中国民众在福建所谓人民革命政府的存在与破产之中深刻的了解了反革命改良主义的实质。在福建聚集了一切中国的反革命的改良主义的集团与派别，从国民党内部的反对派、生产党、第三党、社会民主党、AB团到托洛茨基主义者，从李济琛、蔡廷楷、蒋光鼐、陈友仁、黄祺翔到胡秋原、严灵峰，他们讲了好些反帝反蒋的漂亮的空话，他们发布了糊涂与矛盾的政纲，他们空口允许"计口授田""民主权利""保护劳动"等等空谈，并胆敢冒充人民与革命！然而在两个月内，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一切行动都是动摇犹豫投降出卖妥协与失败主义的行动，他们的目的，不是为着领导与发展工农兵及劳苦群众的革命斗争，真实的打倒日本与一切帝国主义，打倒卖国的国民党政府，而是要阻止民众革命斗争的发展，麻痹与欺骗群众，使反帝反蒋的斗争陷于失败，而帮助帝国主义国民党巩固自己的统治。在军事上，福建派最初即采取消极的态度，眼看着蒋介石的调兵遣将而默然不动，以后在蒋介石进攻的面前就接一连二的投降背叛，从陈维煊谭启秀而至沈光汉毛维寿区寿年张炎，使英勇的十九路军士兵遭受蒋介石的惨酷轰炸与屠杀。在对于帝国主义的关系上极力趋奉与勾结美国与日本，在福州日本浪人暴动劫狱枪杀华警的重大事件前噤不作声，以帝国主义的领事馆与

兵舰为自己的托命所与救星。在武装民众方面，借口军事时期禁止一切民众的最低限度民主权利，培植与帮助民团来发展地主豪绅镇压农民群众的武装，而对于组织真正工农的义勇军却竭力的怠工与阻止。对于工人农民及一切劳动者的痛苦的生活，则非但没有任何具体的办法来改善他们，而且相反的竭力禁止工人的罢工斗争与农民反抗地主与争取土地的斗争。现在每一个中国民众，每一个工人农民与劳动者，可以从切身的经验上了解，一切改良主义者漂亮的空谈与革命口号，只不过是欺骗民众的烟幕弹与把戏！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领袖们的行动最无情与惨酷的揭露一切反革命改良主义派别的原形，一切好听与动人的革命口号，只不过是为着阻止中国民众革命向着胜利的大道迈进！

全中国的民众们，福建事变的最深切与痛苦的教训就是在这里，就是在一切改良主义者的第三条道路的找寻，只不过是他们的一种借口与把戏，而实际上，他们的政策与步骤与蒋介石国民党是没有区别的。

全中国的工人农民与劳苦群众们！你们是解放的中国的将来的主人！只有你们自己的坚决的斗争，才能够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才能够保证中国的独立、自由、解放与领土完整。中国广大的苏维埃区域中几千万劳动者的成功与胜利的经验，说明只有依照他们的光荣大道——苏维埃的大道，才能保证你们社会与民族解放的胜利！

全中国的民众们！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是惨酷的失败了，他们的领袖们是无耻的投降背叛与妥协了，刽子手蒋介石正在残酷的屠杀与镇压福建的群众斗争与十九路军的士兵群众，日本帝国主义准备随时占领福建与公开的干涉中国苏维埃，蒋介石——这个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已经驱使他在江西与福建的军队重新大举进攻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特别是从福建从东方向苏维埃进攻，而为日本帝国主义公开占领福州及直接干涉开辟道路。企图消灭土地革命和反帝国主义革命，使全中国的工农永远受着压迫剥削，完全的变为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奴隶！

全中国的民众们！形势是非常紧迫与严重的，你们肩上放着光荣的革命任务——援助中国苏维埃与工农红军，用一切来保护苏维埃，保护中国革命！

全中国的工人们！失业者们！国民党工会会员及一切工人团体的会员们！唾弃一切反革命改良主义领袖们，不要相信他们的欺骗与胡说，亲密的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发展罢工斗争，争取你们的要求。反对减少一个铜板的工资，要饭吃，要工做！要求将全部军费救济失业工人与灾民难民！不替国民党造一枪一弹运一枪一弹来进攻红军！

全中国的农民们！灾民难民们！自动的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发展抗租抗税抗债的群众运动，不要听信改良主义者的“计口授田”的空口允诺，自动的夺取地主豪绅的土地耕具，实行土地革命，发展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

一切愿意继续抗日反蒋的十九路军的革命的士兵们与下级官长们，反抗你们投降出卖的长官，与红军联合起来！反对蒋介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全国的兵士们，起来响应苏维埃政府的号召，反对进攻工农红军，要求去打日本帝国主义！反抗一切进攻红军与苏区的命令！反对强迫修马路、修堡垒，要求发清欠饷，组织大批的哗变加入红军！

全中国的劳苦群众们！每一个不愿作亡国奴的中国人！起来发展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坚持抵制日货的运动！援助义勇军！援助中国革命，中国民族解放的武装力量——工农红军！打倒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

全中国的民众们！一切工人与农民团体的会员们！反对改良主义派别领袖的叛卖与欺骗，组织统一的革命战线，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的法西斯蒂恐怖暴行！发展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保卫中国苏维埃与红军！

打倒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

打倒卖国的国民党政府！

打倒一切欺骗民众出卖民众的反革命改良主义！

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

——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提出，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日——

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因为张学良和南京政府采取无抵抗政策，所以日本帝国主义很容易的把我们的东北三省占了去。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轰炸了我们的上海闸北，但是因为上海工人、十九路军兵士、贫民、苦力、学生们英勇的武装反抗，所以日本没有能够占领我们的上海华界（闸北、南市、吴淞等等）。去年一月一日，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们的山海关，二月间占领了我们的热河，以后几个月，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们的察哈尔，实行进攻绥远、内蒙与华北、最近且以哀的美敦书的方式与政府当局谈判，要求获得统治华北与中国的一切条件。东北军已经南下，日本已派遣大军实行占领黄河以北的省份，并公开宣言整个中国是它的保护国。

显然的，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想用武装力量来实行民国四年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件，它并且用流血政策来开始实现田中内阁的所谓对华的积极政策（即完全占领全中国及把全中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

因此，现在全中国的民众，不管是汉人或是其他民族（蒙古、回族、满洲、西藏、苗瑶等等），都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生死的关头，他们都有受日本帝国主义轰炸、枪毙、格杀、拷打、强奸、污辱的危险。他们都要更加受冻、受饿、受穷、失业，他们将要受到和高丽人、台湾人同样的悲运。他们将要受到和在东三省三千万兄弟姊妹，热河与华北千百万兄弟姊妹同样的牛马生活的痛苦！

中国人民在自己的痛苦的实际的经验当中，已经深刻的觉悟到：要想依靠国民党政府来抗日救国，已经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事了；要想从美国或国际联盟方面出来帮忙反对日本，也只是一种幼稚的蠢笨的思想，因为大家都晓得，美国和国际联盟什么具体的反日办法也还没有拿出来；而且大家晓得，就作为美国和国联能拿出一点办法来反对日本，那么与中国民众一定也不会有什么好处，这只是"前门拒虎，后门进狼"的办法罢了。由此可见：中国人民只有自己起来救自己——中国人民唯一自救和救国的方法，就是大家起来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就是中华民族武装自卫——换言之，就是中国人民自动对日作战，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所公认为唯一的正当的方法了。的确，这是中国人民自救救国唯一出路，这是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这是正义的战争，这是进步的战争，这是保障中国民族生存的战争，这是拯救四万万人民的战争，这是为保障我国国家独立自主和领土完整的战争，换言之，这是使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不当亡国奴的神圣战争。

然而，因为我们对于组织和实行这个正义的民族战争，没有一个共同的具体的纲领，所以直到现在我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行动就成为散漫的、无计划的、不能集中的，所以因此也就不能成为强有力的行动。关于这一点，拿已有的具体事实一看就明白了。比如说，我们的反日义勇军、反日救国军、反日游击队，虽然在东三省、热河和日本强盗打了很多仗，

虽然我们的兄弟姊妹们英勇的实行了各种各样的反日斗争（反日罢工、罢课、示威、反日宣传、抵货等等），但是直到现在，我们不仅没有能够把东三省、热河和察哈尔收复回来，并且简直还不能阻止日本帝国主义向我们继续的进攻。因此，我们认为目前绝对必要提出几点最根本最具体的办法来，作为我国人民武装抗日的共同行动纲领。我们提出下列各点：

（一）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中国的陆军常备军，在数量上比全世界任何国家要多些，除警察、民团、商团不计外，我国人民平时要养活三百万人的军队；海军和空军虽然还比较薄弱，但是人民为得养活他们，花了很大的经费，特别在最近几年，海军和空军的开支比以前大得多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因此人民完全有权利要求，把一切海陆空军立刻开赴前线，对日作战，立刻停止一切内战，立刻停止屠杀中国同胞的战争。然而大家都晓得，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仅仅靠我们的军队是不够的，所以必须：

（二）全体人民总动员——就是说，开始的时候，可以用志愿军的办法，将来要逐渐的实行征兵制，要立刻成立广大的千百万人的群众的反日民众义勇军（工人反日义勇军、农民反日义勇军、学生反日义勇军、职员及各种自由职业者——医生、教职员、新闻记者等等的反日义勇军，同样要组织商人的反日义勇军），并且要使他们到前方和后方对敌作战。此外，必须组织广大的人民的参战组织（如供给粮食队、交通队、救护队、破坏队、宣传队等等）。很明显的，要想这样作，那就必须：

（三）全体人民总武装——为达到这一点，必须要求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立刻把全国兵工厂、军械处、火药局已有的、正在制造和将来制造的各种武器（大炮、步枪、机关枪、手枪、炸弹、迫击炮、大炮子弹、飞机，甚至土炮、土枪、长枪、大刀等等），完全发给人民反日义勇军，以便实行武装训练，并直接对日作战。如果谁要不愿意将武器自动的发出来，那么，人民只有自动的去拿这些武器；如果这些武器还不够，那么就要想法筹款向外国购买。但是大家都知道，要对日作战，这还不够，所以我们还须要：

（四）立刻设法解决抗日经费——在战争一开始时，我们提议采取下列办法，解决经费问题：

1． 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一切财产——银行、工厂、矿山、铁路、轮船、大商店、日货等等（这已经是一笔很大的经费，因为日本在华投资已经超过日洋二十万万，就等于中国大洋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以上），停付日债一切本息（这又是一笔大款）。

2． 没收一切卖国贼的财产。

3． 国库一切收入，都用作对日作战的经费。

4． 实行征收财产累进所得税。

5． 在国内人民和国外华侨以及一切同情中国人民的人士当中，进行广大的募捐运动。

如果这些办法都实行的话，至少可以保证第一个时期的对日作战经费；如果将来还感觉经费不够时，我们还可想出其他的办法，来保证对日作战的经费，以便取得对日作战的胜利。

此外，在对日作战时，我们还须要强有力的集中的领导机关，因此必须：

（五）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这是全国人民武装抗日的总领导机关。这个委员会的各界代表，是由各团体（各界反日会、反日义勇军等）在全体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上选出来的。在各省由各界反日团体，选出各省的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在各县、各城市、各乡村、镇、各区，成立县、市、乡、区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在各

工厂、各铁路、各矿山、轮船、乡村、兵营、学校、公司、商店等等组织反日会分会和反日义勇军及其他反日队伍。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有权力解决和支配与中国人民武装抗日有关系的一切事件。此外，为保证对日作战的胜利，我们还必须：

（六）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首先就是要联合高丽、台湾、内蒙古和日本代管的各种岛屿的一切被日本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同样的要联合在日本国内进行英勇斗争，反对日本天皇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革命工人、农民、兵士、知识界等等，以便共同打倒我们的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同时，我们公开向全世界宣言：一切对中国人民武装抗日作战表同情、援助或守善意的中立的国家和民族，我们都认为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朋友；同时，对于那些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中国人民的，或者学日本强盗一样实行瓜分中国的国家，我们把他们看成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伙伴，我们将他们视为中国人民之敌。

我们上列六点，虽然还不敢说是包括了组织反日战争一切必要条件，但是，我们认为这些条件是最基本的、最具体的，只要能够作到这六件事情，我们就能够实行对日作战。我们号召一切中国同胞——一切愿意过人的生活，不愿当日本帝国主义的亡国奴的同胞，立刻在工厂、矿山、铁路、轮船、学校、乡村、公司、商店、兵营等等地方，举行谈话会、露天大会、代表会等，来讨论我们这个武装抗日纲领，并且立刻实行起来；首先就要实行组织反日会、反日义勇军，实行组织援助东北义勇军募捐委员会，并采取各种方法来为本纲领推行全国而奋斗。

我们完全相信：如本纲领能见诸实行，则结果不仅能阻止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们继续进攻，不仅能收复东三省、热河、察哈尔和一切失地，而且我们能够把日本帝国主义从中国赶出去。

中华民族反日神圣战争万岁！

大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中央政府为国民党出卖华北宣言

（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九日）

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兵士以及一切劳苦群众们！

万恶的国民党政府，自出卖了东三省，出卖了内蒙古，出卖了平津之后，现在又把整个的华北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

经过了卖国贼蒋介石、汪精卫、黄郛的庐山会议，南昌会议，经过汪精卫、黄郛与日本帝国主义代表在上海南京的直接交涉，国民党已经愿意把黄河以北所有中国的领土，完全划为“满洲国”的领土。“满洲国”与华北的通车通邮已经开始，华北的军队全部南调“剿共”或改编为“满洲国”军队亦在进行，北平的整委会已经进一步改组，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傀儡组织了。国民党更允许“满洲国”在华北增设关卡征收捐税，而日本帝国主义的商品则可以毫无阻碍的通行华北。在“中日满经济提携”下，国民党承认日本在华北投资的优先权，“共同”开发华北财富与华北交通。同时，国民党方面负责取缔华北所有反日反帝的革命组织与活动，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允许以大批的借款军火供给国民党去进攻中国苏维埃与红军。

全中国的民众们！华北已经为万恶的国民党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了。但是华北的出卖不但不能停止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侵掠，而且更引起了它并吞全中国的野心与贪欲。日本帝国主义的血手正在伸向福建与长江一带。在今年的四月十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公开宣言：中国是日本的，日本是东亚的主人翁，日本反对任何其他国家在任何名义之下“掠夺中国”！同时华北的出卖，和日本帝国主义独占中国的企图，自然更促使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加速度的来直接瓜分中国。英帝国主义在新疆、青海与康、藏等广大的区域内正在建立着它的“西藏国”。云南的班洪与澜沧等地亦已为它占领。法帝国主义在云南、贵州、广西侵掠，以及美帝国主义争取统治中国的行动都在疯狂的进行着。这些帝国主义的国家联合（如英日同盟）与冲突（如日美冲突）都不是为了帮助中国，而正是为了更快的瓜分中国，把中国变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对于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国民党的政策是一贯的投降出卖。国民党不但要出卖华北给日本帝国主义，而且要把全中国出卖给一切帝国主义！南京国民党政府与广东国民党政府的冲突，决不是因为他们对于出卖中国有什么不同的意见，而正是由于他们在卖国时的分赃不均与卖国时的争宠与竞赛。

全中国的民众们！在日本帝国主义并吞整个华北，在一切帝国主义直接瓜分中国，在国民党卖国辱国的情形之下，只有全中国民众一致的团结起来，武装起来，开展武装群众的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与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出中国，打倒出卖华北出卖整个中国的国民党，我们才能免去亡国奴的痛苦，才能把中国从殖民地道路上挽救过来，建立独立自由与领土完

整的新中国！时间是紧迫了，我们不能有一刻的狐疑与犹豫不决。迟缓等于死亡！

只有卖国贼国民党才会无耻地说，中国目前“国力未充无力抗日”。国民党有着二百万军队，但国民党说“无力抗日”；国民党有着数万万元的借款与岁收，但国民党说“无力抗日”；而一切这些，国民党都用来进攻中国唯一反帝国主义的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用来镇压全中国民众的反日反帝的革命运动。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农民、每一个革命者都会看到这不是国民党的“无力抗日”，而是由于国民党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的走狗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清道夫。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号召全中国的民众团结起来，武装起来反对国民党的一切压迫屠杀与欺骗，同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作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完全拥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提出的反帝纲领。这一纲领是：(一)坚决反对国民党整个的投降出卖政策，反对国民党南京政府出卖东北华北与全中国的“塘沽协定”和“中日直接交涉”，抛弃对国联与美国的任何幻想。只有工人农民和一切劳动者的团结与统一才是中国民族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力量与胜利的保证。(二)全中国民众必须起来为保卫中国领土与独立而作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三)号召民众直接参加反日战争与游击战争。用所有军器库及入口武装来武装民众，组织民众的反日义勇军，积极援助与参加东北的抗日义勇军，以及广大群众抵制日货的行动。(四)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及汉奸卖国贼的财产，停止支付一切债款本息，设施累进税，来作为抗日的费用。(五)中国必须立即完全对日绝交，动员整个海陆空军对日作战，立即停止进攻苏区及军阀战争。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号召一切真正愿意反对帝国主义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政治倾向，不分职业与性别都在中国共产党这一反帝纲领之下团结起来，只有执行这个纲领，中国民族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曾经向全国进攻苏区的武装队伍一再宣言，愿意在下列三个条件之下，订立反对帝国主义的作战战斗协定：(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的民主权利；(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但卖国贼首蒋介石、陈济棠、何健等对于我们这次宣言的回答，是出卖整个华北与整个中国给日本与英美法等帝国主义。从他们那里得到更多的金钱武装，加紧对于我们苏区的五次围攻，这使得我们苏维埃政府不得不集中一切力量首先消灭卖国贼首蒋介石的主力部队。不消灭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等的武装力量，我们全苏区的工农红军以及全苏区千百万劳苦群众直接同日本与其他帝国主义作战是不可能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向全中国民众宣言，在上列三个条件之下时刻准备着动员我们数十万工农红军与千百万劳苦群众首先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我们相信一切愿意反对帝国主义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人都会自动的参加这一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相信卷入全中国千千万万群众参加的民族革命战争，不但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且能够战胜一切帝国主义！我们已经从苏维埃区域内把帝国主义完全驱逐出去，我们还要从中国把他们扫荡。

开展民族革命战争把日本与一切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

民众自动武装起来，收复东北与华北的领土！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

反对国民党出卖东北与华北的中国领土，取消一切卖国辱国的中日密约！

打倒出卖东北华北与出卖中国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与一切国民党政府！

粉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五次“围剿”，保卫反帝国主义的中国苏维埃政权！

拥护中国共产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纲领！

全中国反日反帝的统一战线万岁！

独立自由的苏维埃新中国万岁！

中央执行委员会　主席毛泽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
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

（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五日）

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兵士以及一切革命的民众们！

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了我们的东三省，侵占了我们的热河、内蒙古，现在又夺取了我们的整个华北。在中国南方，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舰大炮与海陆空军，正在计划福建省的直接占领。日本帝国主义是想把全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把全中国的民众变为亡国奴，永远受日本盗匪们的屠杀、奸淫、剥削与蹂躏。

国民党军阀蒋介石张学良等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是一贯的投降与出卖。他们出卖了东三省，出卖了热河内蒙，现在又与"满洲国"直接通邮通车，承认"满洲国"，出卖了整个华北与福建省。他们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民众的反日运动，镇压抵制日货运动与反日义勇军的游击战争。他们在"无力抗日"名义之下，集中了全国一百万以上的军队，耗费了十万万的银元，使用了一切他们所有的飞机大炮，向着全中国唯一反日反帝的工农的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进行不断的"围剿"。一切这些，证明国民党军阀，是日本帝国主义最忠实的走狗。国民党军阀，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汉奸卖国贼！

中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断侵掠，曾经一再号召全中国民众武装起来，以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掠，公开对日宣战并下了对日宣战的紧急动员令，动员全苏区的民众准备直接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更曾经向全中国民众一再宣言，在"(一)停止进攻苏区与红军，(二)给民众以初步的民主权利——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示威的自由，(三)立即武装民众与创立群众的反日义勇军，以保卫中国"的三个条件之下，愿意同全中国任何武装队伍订立作战的战斗协定。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曾经一再反对塘沽协定，反对中日直接交涉，反对承认日本傀儡政府的"满洲国"，反对国民党出卖华北，公开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以及全中国一切反日反帝的革命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对于反日反帝的运动的一切镇压与屠杀。

全中国广大的工人、农民、兵士以及一切革命的民众，都反对国民党出卖东三省，出卖热河、内蒙古，出卖华北，出卖福建与全中国，而拥护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的反日主张与反日行动。这不能不使国民党更疯狂的封锁我们，向我们进攻，使我们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不能同全中国民众直接联合起来，不能同东北抗日义勇军一致行动，去同日本帝国主义

进行民族的革命战争，把日本帝国主义的盗匪们，驱逐出中国。国民党军阀对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一致联合起来共同反日的提议，完全置之不理，而且更无耻的出卖中国，加紧他们对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的五次"围剿"，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中国。

因此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为了要动员全部力量，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不能不首先同进攻我们的百万以上的国民党匪军血战，保持已经脱离了帝国主义羁绊的自由的苏维埃领土，不再受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匪徒们的蹂躏与出卖。从无数次同国民党匪军血战中创造起来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中国革命根据地，我们是定不放弃的，但是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决不能坐视中华民族的沦亡于日本帝国主义，决不能让全中国为国民党汉奸卖国贼所拍卖干净，决不能容许全中国广大劳苦民众为日本帝国主义整批的屠杀与蹂躏以及东北义勇军的孤军奋斗，故即在同国民党匪军的优势兵力残酷决战的紧急关头，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不辞一切艰难，以最大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只要进攻苏区的武装队伍接收我们提出的三个条件，那我们工农红军的主力，即可在先遣队之后，全部出动，同全中国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全中国的民众们！我们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愿意同全中国的民众与一切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开展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切反日的民众都应该帮助我们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团结在我们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周围，加入我们的抗日先遣队，武装起来，直接同进攻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的盗匪们作战，一切抗日的民众，都是我们的同胞，一切抗日的武装，都是我们的同伴，我们都要联合起来。一切禁止与压迫我们抗日的个人团体与武装队伍都是汉奸卖国贼，我们应一致起来消灭他们。

我们认为只有全中国民众的武装的民族革命战争，才能打倒日本与一切帝国主义，取得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与保持中国领土的完整。

为了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更具体主张：

(一)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出卖东三省、热河、内蒙古、华北、福建以及全中国。反对国民党政府卖国辱国的中日直接交涉，反对承认满洲伪国。抛弃对帝国主义强盗集团国际联盟以及美帝国主义的帮助的幻想。

(二)立刻宣布对日绝交，宣布"塘沽协定"与一切中日秘密条约的无效。动员全中国海陆空军，对日作战。立刻停止进攻苏区与封锁苏区，使工农红军能够完全用来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

(三)号召全国民众将国民党军库中兵工厂中所有武装以及一切入口武器用来武装自己，组织民众的反日义勇军与游击队，直接参加反日战争与游击战争。积极援助东北义勇军与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四)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卖国贼汉奸的一切企业与财产，停止支付一切中日债款本息，设施累进税，并将国民党全部军费，拿来作为反日经费。

(五)普遍组织民众反日团体，如反日会、抵制日货委员会、募捐援助义勇军与红军委员会，以及各种反日的纠察队、破坏队、交通队、宣传队、运输队等。吸收广大的群众，不分男女老幼、宗教信仰、政治派别到反日团体中来。用罢工、罢课、罢市、罢商与示威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投降。

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是不顾一切牺牲，要为这一纲领而奋斗。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要求全国民众拥护这一纲领，同我们在一起为这一纲领的全部实现而奋斗到底！

让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让国民党的汉奸卖国贼去叫喊“中国无力抗日”吧！全中国民众的反日总动员，全中国民众的反日武装，全中国民众的反日团结，有全部的力量打倒日本与一切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汉奸的集团的国民党！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　主　席　毛泽东

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主　席　朱　德

副主席　周恩来　王稼穑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第6册
作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 编
页数=656
SS号=10273508
DX号=
出版日期=
出版社=

封面
目录
目录

苏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
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1932年5月11日）
中央给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电（1932年5月20日）
苏区中央局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1932年6月27日）
苏区中央局关于粉碎敌人大举进攻地方党部紧急动员工作检阅的决议（1932年11月21日）
苏区中央局关于肃反工作检阅决议（1932年12月14日）
拥护党的布尔塞维克的进攻路线（1933年2月）&博古
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1933年7月24日）
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三次全会论中国（1933年12月）
中共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1934年1月18日）
五中全会给二次全苏大会党团的指令（1933年12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词（1934年1月22日）&毛泽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1934年1月）&毛泽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934年1月）
中央关于国际十三次全会提纲的决定（1934年4月12日）
为着实现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做了什么和将做些什么？（1934年7月8日）&博古
中国现状与中共任务（1934年）&王明
对工作的几点意见（1933年1月21日）&罗明
苏区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1933年2月15日）
罗明路线在江西（1933年4月15日）&洛甫
为党的路线而斗争（1933年5月6日）&罗迈
为加强党对革命战争的领导而斗争（1933年7月15日）&寿昌
苏区中央局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1933年6月2日）
查田运动是广大区域内的中心重大任务（1933年）&毛泽东
在八县查田运动大会上的报告（1933年6月14日）&毛泽东
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1933年8月）&毛泽东
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1933年10月10日）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1933年1月17日）
中央致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的信（1933年6月8日）
中共中央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1933年12月5日）
〔附〕福州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利宣言（1933年11月20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人民革命政府”
及“人民革命军”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933年10月26日）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致福建人民革命政府
与十九路军的第一电（1933年12月20日）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致福建人民革命政府
及人民革命军第二电（1934年1月13日）
中央为福建事变第二次宣言（1934年1月26日）
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1934年4月20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国民党出卖华北宣言（1934年6月19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1934年7月15日）